周恩來

上

陳兼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周 恩 來

本書運用史料之廣泛，不僅體現了陳兼數十年研究之功力，更揭示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可獲取或發掘的當代史料之規模——這讓通常認為共和國在檔案開放上一向是「遺忘的荒原」的西方讀者深感意外。憑藉批判性同理心，陳兼無論對周恩來生涯軌跡的整體把握，還是對其各關鍵階段的評判，皆令人難以挑剔。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傑出研究教授），刊於 *London Review of Books*

人物傳記難寫，像周恩來這樣被世人關注和熟知的歷史人物的傳記尤其難寫。陳兼二十年磨一劍，成此巨著，實屬不易。作者史料功夫了得，在中、美、蘇、英、法、印等多邊檔案文獻的基礎上，把人物置於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考察，盡力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此書既是一部中國革命史，亦是一部新中國外交史。

——**沈志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

陳兼撰寫了我們時代的一部偉大政治傳記。周恩來常被視為迷霧環繞的領袖，但我們若不理解他，就永遠無法理解當今的中國。這部傳記使我們對他的了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恐怕都難以被超越。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耶魯大學歷史與國際關係講席教授）

周恩來是20世紀中國的核心人物，這本書是周恩來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基於作者數十年在中國近現代史、冷戰史及國際關係領域的研究，本書聚焦黨內政治、國際關係、周恩來對現代中國發展的貢獻三大主題。全書敘述引人入勝，充滿生動的歷史細節，對專家學者和普通讀者來說，都十分易讀且富有參考價值。

——**魏美玲**（Emily Wilcox，威廉與瑪麗學院中國研究教授），刊於 *Chinese Studies International*

在中共歷史人物的研究中，1980年代以來，周恩來是評價起伏最大的人物之一。從最初眾口一詞的「道德楷模」，到後來「違心論」、「忠君論」、「助紂為虐」的爭議，莫衷一是。陳兼積二十年之功，重建周恩來的往事，再次做出了帶有鮮明風格的解讀。人們可以不贊成他的觀點，但不可不讀這本21世紀有關周恩來研究的最新著作。

——**韓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暨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教授）

周恩來是中國現當代史最為複雜的歷史人物。十里長街淚送總理的哀榮，天安門廣場化詩為劍的憤怒，承載了一代中國人的情感和希望。隨着歲月的沉澱，許多歷史細節的出現，人們漸漸褪去了過去的刻板印象，看到了一尊充滿矛盾的千面佛形象。陳兼是經歷了文革全過程並對這場劫難心心念念的國際學者。他的周恩來研究由樸素情感進入冷峻理性的學術探討，在中外史料互證的基礎上，填補和校正了許多周恩來生平的史事，呈現了一個豐富多元且充滿矛盾的周恩來形象。

本書不僅是對周恩來的重新審視，也是對中國共產革命史的深度反思。在作者鋪展開的這張碩大的中國革命圖景中，傳統與現代、舶來與本土、白區與紅區、城市與農村、革命與建設、激進與穩健、理想與現實，各種歷史變革因素相互激蕩，相生相剋，相沖相和，構成了這個「革命」自身內在的深刻的悖論。毛澤東、周恩來作為陽剛與陰柔兩種力量的代表人物，既剛柔並濟共同塑造了這場革命，也在更根本意義上為這場革命所塑造。他們在政治性格上的種種悖論和種種糾葛，也正是這場革命內在緊張和結構性矛盾衝突的顯現。作者將他們稱之為革命的「囚徒」。這是很高的歷史站位。不論讀者對他們的態度是褒是貶，閱讀這本書都能提升認識的維度。

——**王海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周恩來終於有了一部與其歷史地位相稱的完整傳記。作品憑藉豐富文獻資料，客觀評估了周恩來對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的深遠影響。這是一部極其重要的歷史著作。

——**拉納・米特**（Rana Mitter，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美亞關係講座教授）

陳兼沒有解開「周恩來之謎」，然而他生動地展示了這個謎何其複雜，促使讀者不由得尋求自己對「周恩來悖論」的答案。

——**夏偉**（Orville Schell，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刊於 *Foreign Affairs*

中國共產革命如同迷宮，這本傑出的周恩來傳記為人們提供了理解它的地圖與鑰匙。這是一部關心中國及其世界影響的讀者不可錯過的傑作。

——**徐國琦**（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

這部巨著是二十年研究的結晶，創造性地利用了中、俄、英及多種歐洲語言的檔案資料及口述訪談，為中國革命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全新的視角。陳兼挑戰了長期以來在中國革命敘事中「以毛澤東為中心」的傾向，將目光聚焦於持續半個世紀之久、複雜多面的「毛周關係」，通過這種關係展現了塑造中國共產主義發展進程的軍事、外交、政治和經濟的多重力量。

——**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歷史與社會學榮休教授），刊於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這是必讀之作。陳兼以細膩的筆觸和深刻的同理心，完整呈現了周恩來從少年到生命終點的歷程，精彩講述了周恩來時代的中國故事。這部罕見的歷史著作融入了作者作為20世紀中國研究傑出權威的親歷者視角，不時流露深沉思索。

——**謝爾蓋・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

從中國現代研究的寬廣視野來看，這本傳記平衡了以往過度側重毛澤東個人作用的敘事。陳兼通過對周恩來政治經歷的細緻考量提醒我們，塑造中國革命歷史的力量是多元的。他對於這位中國最深不可測的領導人的人性化刻劃，讓讀者看到周恩來是中國現代性進程中的一位「調和者」：他既不是純粹的激進革命者，也不是全然的保守派，而是一個承載了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種種矛盾與張力的複雜人物。

——**艾建宇**（Pawan Damodar Amin，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

一位史詩般的人物值得擁有一部史詩般的傳記，陳兼的周恩來傳正是這樣一部作品。陳兼悉心梳理了關於中國革命的浩瀚文獻，並深入挖掘中國黨和政府檔案館中的第一手史料，為這位僅次於毛澤東的重要領導者描繪了一幅富於同情理解、卻又不失批判眼光的肖像。

——**沃爾登・貝洛**（Walden Bello，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社會學教授），刊於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在中共檔案被更大規模地開放之前，這本書很可能將成為一代人理解周恩來的典範性傳記。

——**齊慕實**（Timothy Cheek，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刊於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陳兼所著《周恩來》將國內外的周恩來研究提升到一個新水平，是必讀的經典著作。在收集大量鮮為人知的歷史資料的基礎上，作者憑藉其學識、感悟力、敘事技巧和學術勇氣，前所未有地呈現了周恩來如何成長為曠世的革命者，以及他如何深刻塑造了20世紀中國的革命和「繼續革命」。本書敘述的周恩來的一生不僅堪稱傳奇，也有令人無法釋懷的悲劇；特別是對周恩來深邃內心世界的探尋和追問，留下無限感慨和思考的空間。

——**牛軍**（原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歷史學者，陳兼通過周恩來這個個人的行動、思想、言語和行為，重新解讀了整個中國及世界的歷史。陳兼在數十年收集的大量證據之上重建了一個個重要時刻。這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微觀史。

——**巴德妮**（Paola Paderni，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中國歷史與制度系教授），刊於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這部著作提供了關於當代中國最詳實的史料，必將成為未來長期沿用的參考書目。

——**希亞姆・薩蘭**（Shyam Saran，前印度外交秘書），刊於 *Business Standard*

陳兼調取了數量驚人的中國檔案及他國史料，這本傳記著作恐難有超越者。

——**史諾**（Philip Snow，國際關係及歷史學家），刊於 *Literary Review*

關於毛澤東和鄧小平等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生平已有大量著述，但一部全面敘述周恩來一生的著作卻遲遲未見問世。憑藉紮實的研究、詳盡的細節以及平衡的視角，這本書終於為周恩來呈現了一部實至名歸的傳記。

——**羅伯特・魏圖**（Robert Wihtol，原亞洲開發銀行東亞局局長），刊於 *The Strategist*

這是一部傑出的傳記，有力剖析了中國共產黨發展背後錯綜複雜的運作機制。

——**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

周恩來

上

陳兼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周恩來》（上、下兩冊）
陳兼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26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或將其用於人工智能訓練。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88-237-388-4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cup.cuhk.edu.hk

Zhou Enlai: A Life (in Chinese, 2 volumes)
By Chen Jia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2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237-388-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cup.cuhk.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China

謹以此書獻給

先母張文鈿、先父陳立強、

愛妻陳之宏

目錄

上冊

中文版序：走近周恩來 xxxv

引言 lxv

第一部 早年

第1章 童年（1898–1910） 3

第2章 從東北到南開（1910–1917） 9

第3章 負笈東瀛（1917–1919） 21

第4章 五四風雲（1919–1920） 35

第5章 歐洲歲月（1920–1924） 45

第二部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第6章　在大革命的風暴中（1924–1927）　63

第7章　地下上海（1927–1931）　81

第8章　紅區（1931–1934）　107

第9章　長征（1934–1935）　133

第10章「國難當頭，抗戰第一」（1935–1937）　153

第11章　霧都重慶（1938–1943）　181

第12章　紅太陽在延安升起（1941–1945）　215

第13章　在大國政治的漩渦中（1944–1946）　243

第14章　內戰（1946–1949）　275

註釋　307

下冊

第三部 建設「新中國」

第15章「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1949–1950) 365

第16章 朝鮮戰爭(1950–1953) 397

第17章 高饒事件(1952–1955) 427

第18章 從日內瓦到萬隆(1954–1955) 467

第19章 從「反冒進」到反「反冒進」(1956–1958) 503

第20章 大躍進(1958–1960) 543

第21章 毛澤東退居二線(1959–1962) 583

第22章 主席回來了(1962–1964) 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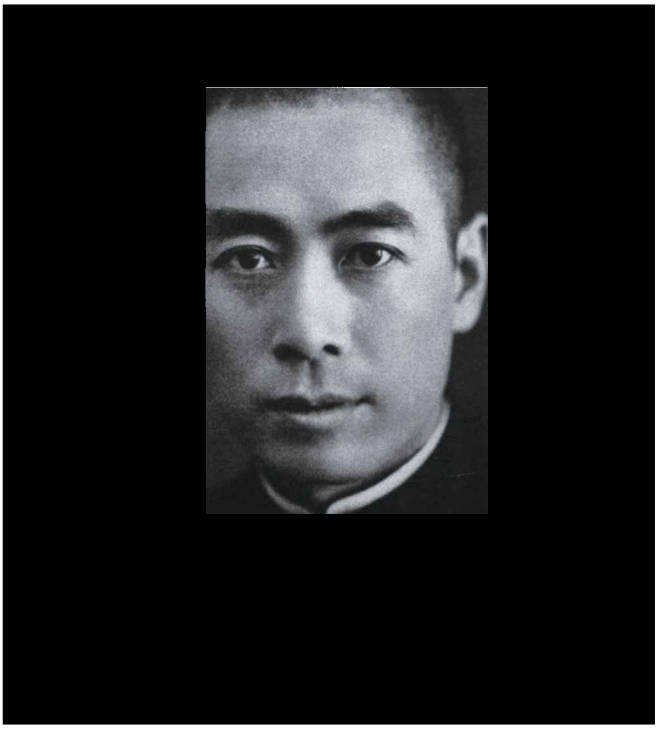
第23章「中間地帶」的革命(1962–1965) 6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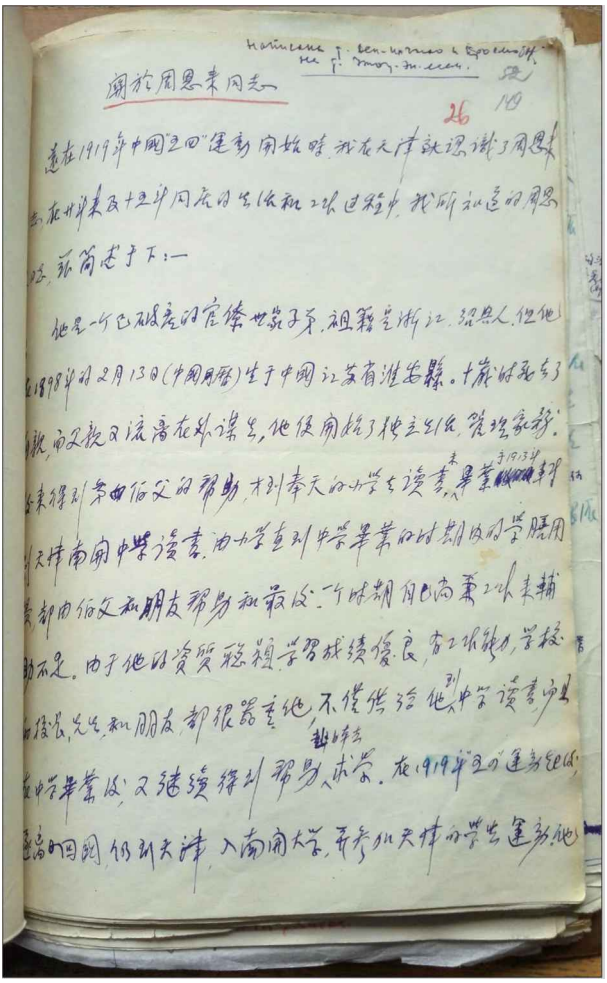
第24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1964–1966) 695

第四部 文革歲月

第25章 文革大潮初湧（1966–1967） 737
第26章 天下大亂（1967–1968） 767
第27章 林彪事件（1969–1971） 801
第28章 敲開美國的大門（1969–1972） 839
第29章 高處不勝寒（1972–1974） 881
第30章 最後的日子（1974–1976） 915

鳴謝 941
註釋 945
參考文獻 1057
索引 1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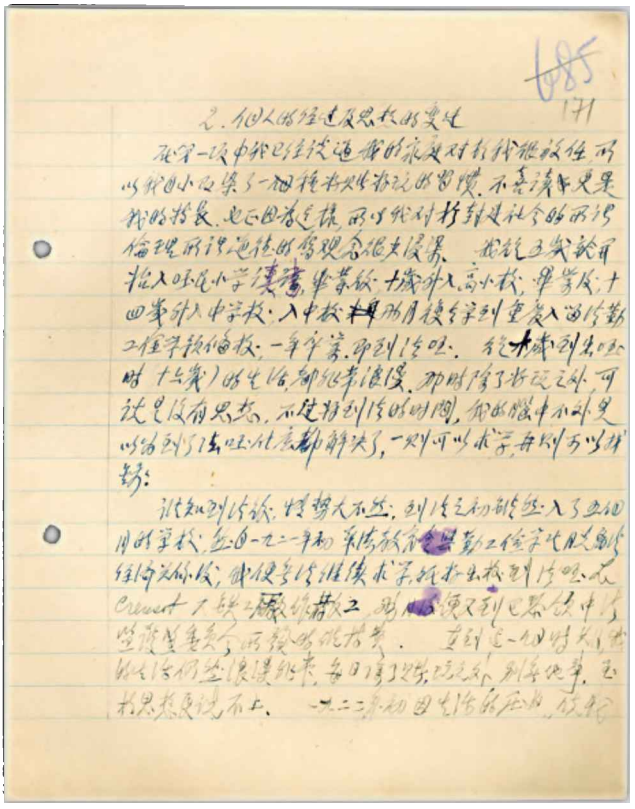


關於周恩來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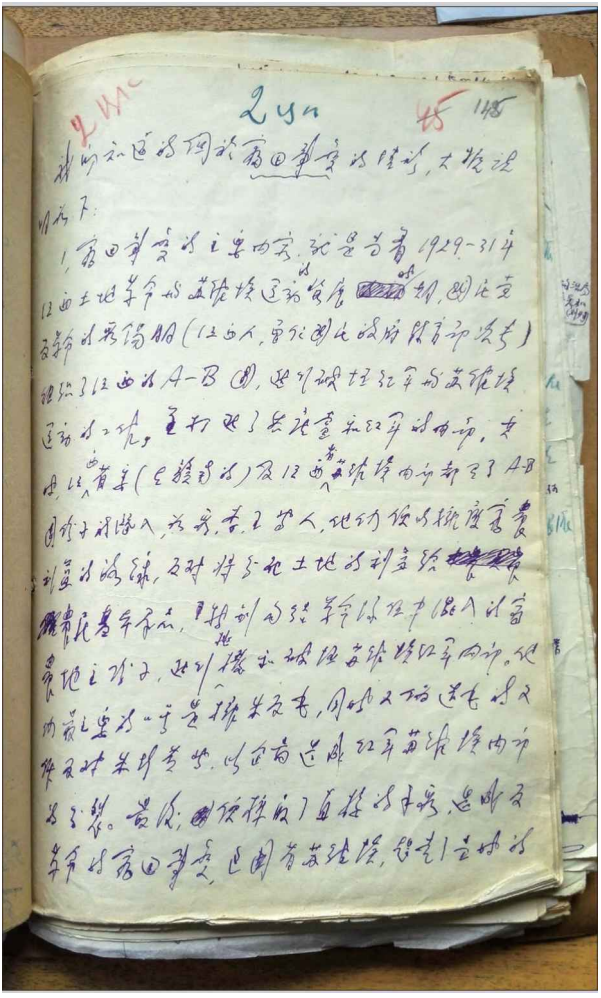
遠在1919年中國"五四"運動開始時，我在天津就認識了周恩來，在北京及十五年周在廣州工作和二次回國後，我所知道的周恩來，簡述于下：—

他是一個已破產的官僚地主家子弟，祖籍是浙江紹興人，但他在1898年的2月13日（中國舊歷）生于中國江蘇省淮安縣。十歲時喪失了雙親，兩次被收養在外家，他很聰明好學，受過家塾教育。後來得到其伯父的幫助，才到奉天的小學去讀書，畢業于1913年，即入奉天南開中學讀書。兩次在小學和中學畢業的時期的學費，都由伯父和朋友幫助和救濟，自己兩袖清風，家境貧寒，由于他的資質聰穎，學習成績優良，富于組織力，學校和教員先生和朋友都很器重他，不僅供給他到中等讀書的費用，在中學畢業後，又繼續得到幫助，赴日本留學。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他剛由日回到天津，入南開大學，并參加天津的學生運動，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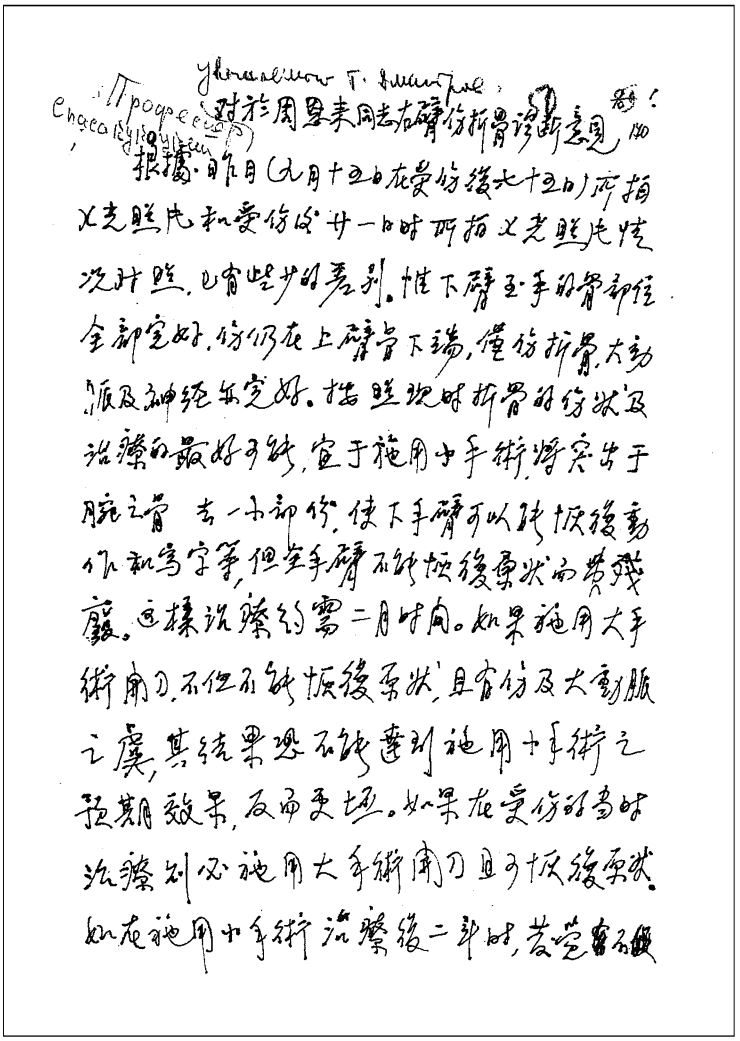
鄧穎超在莫斯科期間送交共產國際的〈關於周恩來同志〉報告手稿，1940年2月22日。
（ф. 495, оп. 225, д. 139,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後簡稱РГАСПИ]）



鄧小平在莫斯科期間手書的自傳，1926年。他在其中寫道：
「我的家庭對於我很放任，所以我自小即染了一種好賭好玩的習慣。
不喜讀書更是我的特長。」(ф. 530, оп. 2, д. 15, РГАСП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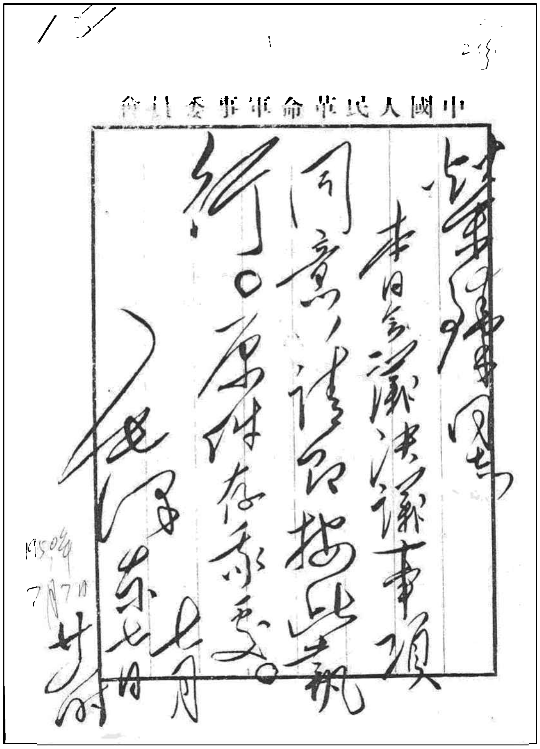
周恩來關於富田事變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手稿，1940年3月6日。
（ф. 495, оп. 225, д. 139, РГАСП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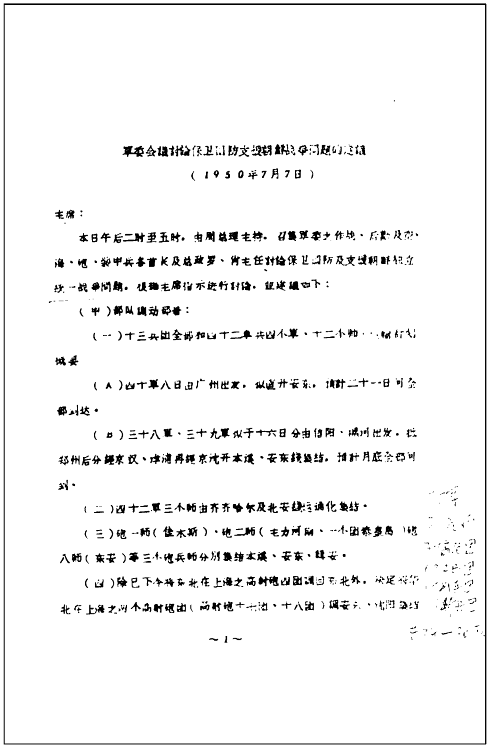


对于周恩来同志右臂骨折骨诊断意见

根据：昨日（九月十五日在受伤后十五日）所拍X光照片和受伤后廿一日时所拍X光照片情况对照，已有些少的差别。性下臂至手的骨都接全都完好，伤仍在上臂骨下端，僅伤折骨，大动脉及神经均完好。据照现时折骨的伤状及治疗的最好手续，宜于施用小手術，將突出于腕之骨一小部份，使下手臂可以转动仍如常字等，但左手臂不能恢復原状而劳残废。这样治疗約需二月时间。如果施用大手術開刀，不但不能恢復原状，且骨份及大动脉之虞，其结果恐不能達到施用小手術之预期效果，反而更坏。如果在受伤的当时治疗，必施用大手術開刀且予恢復原状。如在施用小手術治疗後二年时，若骨不能

1939年7月，周恩來右臂骨折。這是他1939年9月抵達莫斯科入住克里姆林宮醫院後，蘇聯醫師對右臂傷折骨診斷意見的中文稿，1939年9月16日。
(ф. 495, оп. 225, д. 139, РГАСПИ)





軍委会議討論保卫国防支援朝鮮戰爭問題的決議

（1950年7月7日）

毛席：

本日午后二時至五时，由周總理主持，召集軍委之作战、后勤及空、海、炮、装甲兵各首長及总政罗、肖主任討論保卫国防及支援朝鮮[illegible]统一战爭問題，根據主席指示進行討論，並建議如下：

（甲）部队調动部署：

（一）十三兵团全部和四十二軍共四个軍、十二个師，[illegible]

（A）四十軍八日由广州出发，拟直开安东，預計二十一日可全部到达。

（B）三十八軍、三十九軍拟于十六日分由信阳、漯河出发，經郑州后分經京汉、津浦再經京沈开本溪、安东鐵嶺集结，預計月底全部可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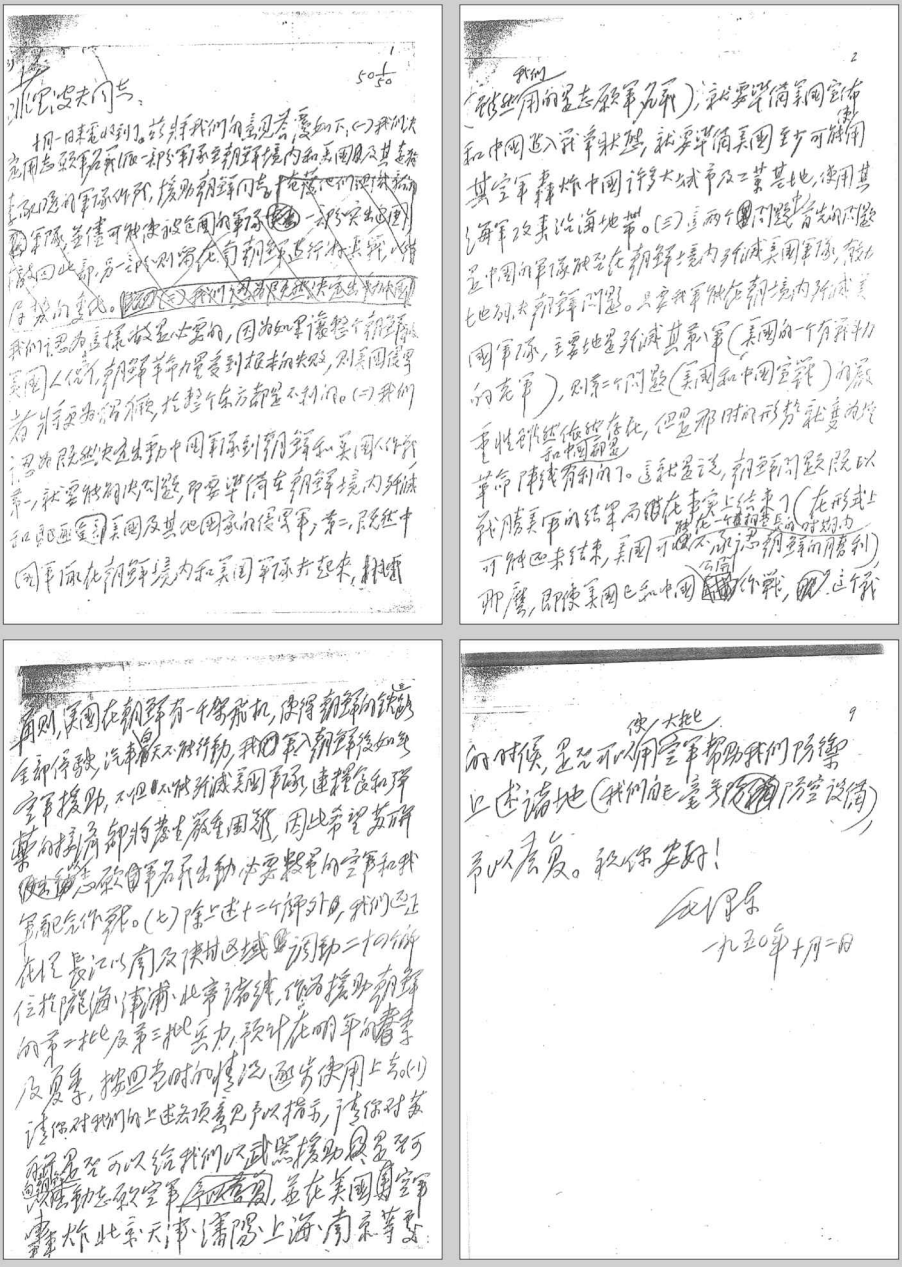
（二）四十二軍三个師由齐齐哈尔及北安經[illegible]通化集结。

（三）炮一師（佳木斯）、炮二師（毛力河……、一个团秦皇島）炮八師（东安）等三个炮兵師分別集结本溪、安东、輯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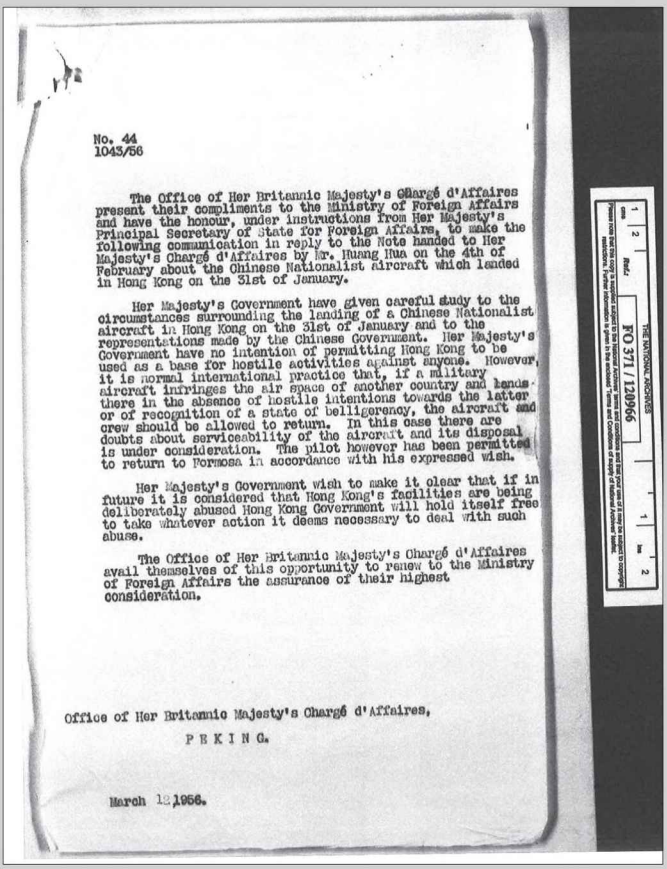
（四）除已下令将东北在上海之高射炮四团調回东北外，决定将华北在上海之两个高射炮团（高射炮十七团、十八团）調安东、[illegible]集结

～1～

聶榮臻關於建立東北邊防軍為入朝參戰做準備給毛澤東的報告、
毛澤東同意報告的批示手稿，1950年7月7日。（解放軍檔案館）



毛澤東關於中國決定出兵朝鮮給斯大林的電報手稿（未發出），1950年10月2日。
（中央檔案館）



No. 44
1043/56

The Office of Her Britannic Majesty's Chargé d'Affaires present their compliments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have the honour, under instructions from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to make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 in reply to the Note handed to Her Majesty's Chargé d'Affaires by Mr. Huang Hua on the 4th of February about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aircraft which landed in Hong Kong on the 31st of January.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have given careful study to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landing of a Chinese Nationalist aircraft in Hong Kong on the 31st of January and to the representations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have no intention of permitting Hong Kong to be used as a base for hostile activities against anyone. However, it is normal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at, if a military aircraft infringes the air space of another country and lands there in the absence of hostile intentions towards the latter or of recognition of a state of belligerency, the aircraft and crew should be allowed to return. In this case there are doubts about serviceability of the aircraft and its disposal is under consideration. The pilot however has been permitted to return to Formosa in accordance with his expressed wish.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wish to make it clear that if in future it is considered that Hong Kong's facilities are being deliberately abused Hong Kong Government will hold itself free to take whatever action it deems necessary to deal with such abuse.

The Office of Her Britannic Majesty's Chargé d'Affaires avail themselves of this opportunity to renew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assurance of their highest conside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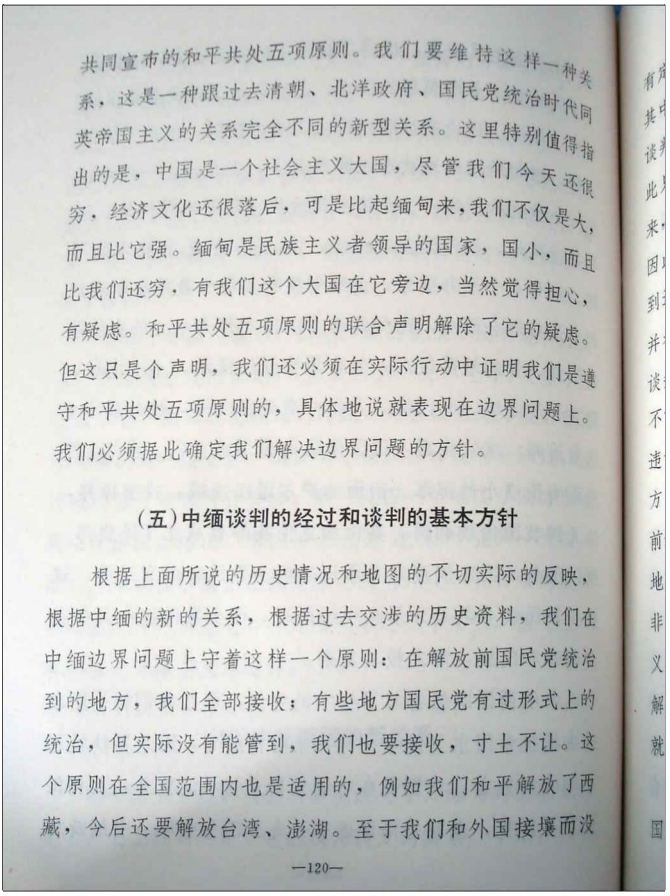
Office of Her Britannic Majesty's Chargé d'Affaires,

P E K I N G.

March 12, 1956.

THE NATIONAL ARCHIVES
FO 371/120966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後，英國駐華代辦處給中國外交部的照會，1956年3月12日。照會中，英方保證「無意讓香港被利用為對任何人進行敵對活動的基地」。
（FO 371-120966, UKNA）



共同宣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要维持这样一种关系，这是一种跟过去清朝、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时代同英帝国主义的关系完全不同的新型关系。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尽管我们今天还很穷，经济文化还很落后，可是比起缅甸来，我们不仅是大，而且比它强。缅甸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国小，而且比我们还穷，有我们这个大国在它旁边，当然觉得担心，有疑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解除了它的疑虑。但这只是个声明，我们还必须在实际行动中证明我们是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地说就表现在边界问题上。我们必须据此确定我们解决边界问题的方针。

（五）中缅谈判的经过和谈判的基本方针

根据上面所说的历史情况和地图的不切实际的反映，根据中缅的新的关系，根据过去交涉的历史资料，我们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守着这样一个原则：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到的地方，我们全部接收；有些地方国民党有过形式上的统治，但实际没有能管到，我们也要接收，寸土不让。这个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适用的，例如我们和平解放了西藏，今后还要解放台湾、澎湖。至于我们和外国接壤而没

—120—

周恩來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內部報告，1957年7月9日。
報告詳細闡述了中國處理同緬甸及其他鄰國邊界問題的一系列基本考慮和原則。
（1057-8-44，河北省檔案館）

79
请旦30

谢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

苏联政府同意您于本年4月8日来函中所提关于根据1957年10月15日苏中协议为北京提供特别重要的资料和样品的建议。

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已被责成同中国方面的代表就组织此项事务的具体问题进行商谈，并签订相应合同，以便于最近期间内即可按您的建议着手提供上述资料和样品。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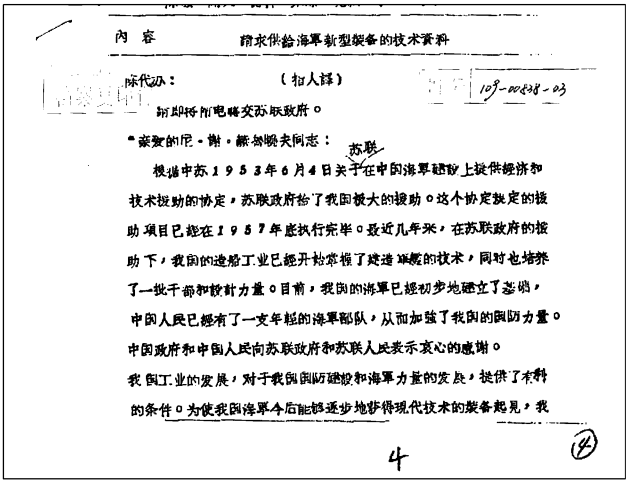
尼·赫鲁晓夫（签字）

1958年4月24日

于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9

赫魯曉夫給周恩來的信，1958年4月24日。其中「同意……為北京提供特別重要的資料和樣品」指的是核武器資料及原子彈樣本。（109-00838-03，外交部檔案館）



內容　請求供給海軍新型裝備的技術資料

陳代辦：　（加人譯）

109-00838-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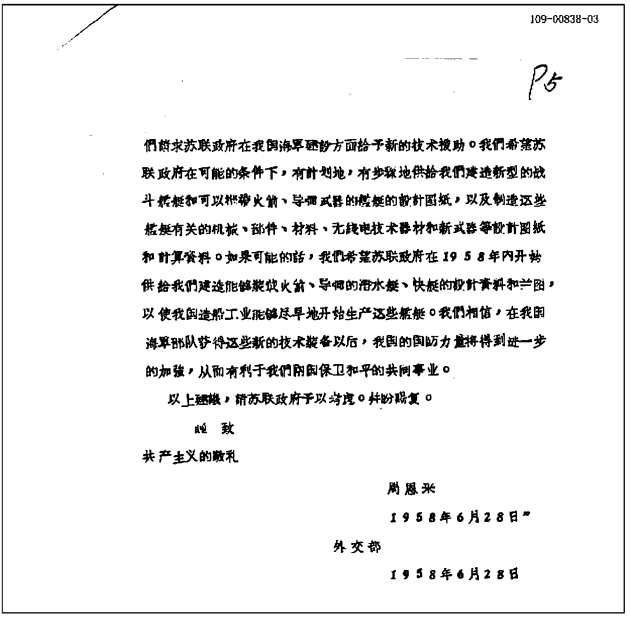
請即將附電轉交蘇聯政府。

"蘇聯的尼·謝·赫魯曉夫同志：

根據中蘇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關於蘇聯在中國海軍建設上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的協定，蘇聯政府給了我國很大的援助。這個協定規定的援助項目已經在一九五七年底執行完畢。最近幾年來，在蘇聯政府的援助下，我國的造船工業已經開始掌握了建造艦艇的技術，同時也培養了一批干部和設計力量。目前，我國的海軍已經初步地建立了基礎，中國人民已經有了一支年輕的海軍部隊，從而加強了我國的國防力量。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國工業的發展，對于我國國防建設和海軍力量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為使我國海軍今后能够逐步地掌握現代技術的裝備起見，我

4



109-00838-03

P5

們請求蘇聯政府在我國海軍建設方面給予新的技術援助。我們希望蘇聯政府在可能的條件下，有計劃地，有步驟地供給我們建造新型的戰斗艦艇和可以裝導火箭、導彈武器的艦艇的設計圖紙，以及制造這些艦艇有关的机械、部件、材料、无綫电技术器材和新式器等設計圖紙和計算資料。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希望蘇聯政府在一九五八年內开始供給我們建造能够裝載火箭、導彈的潛水艇、快艇的設計資料和圖，以使我國造船工業能够尽早地开始生产這些艦艇。我們相信，在我國海軍部队掌握這些新的技术裝备以后，我國的國防力量將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而有利于我們的国保卫和平的共同事业。

以上函達，請蘇联政府予以考虑。并盼覆复。

此　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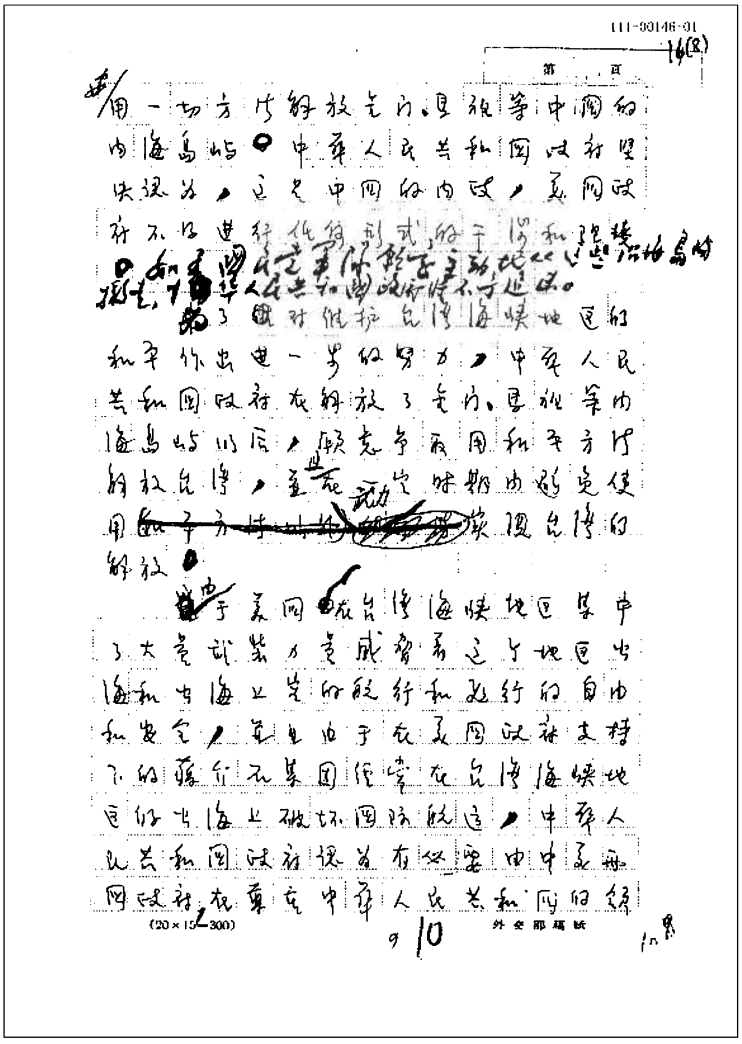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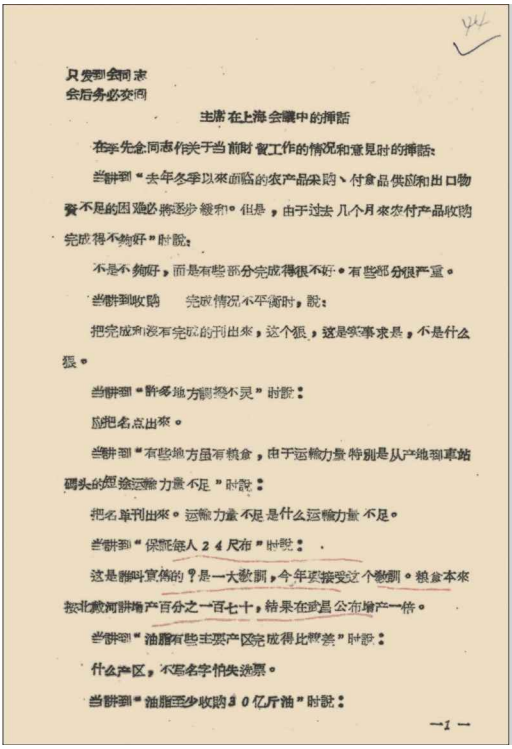
外交部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五日

周恩來給赫魯曉夫的信，1958年6月28日。
信中要求蘇聯向中國提供海軍新艦艇、導彈等新裝備。
（109-00838-03，外交部檔案館）



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上的發言稿，經周恩來親筆修訂，1958年9月10日。其中提出，「如果國民黨軍隊願意主動地從這些沿海島嶼（指金門、馬祖）撤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不予追擊」；並在收復這些島嶼後，「在一定時期內避免使用武力實現台灣的解放」。
（111-00146-01，外交部檔案館）



只发到会同志
会后务必交回

主席在上海会議中的插話

在事先未同志作关于当前財貿工作的情况和意見时的插話：

当講到"去年冬季以來面臨的农产品采购、付食品供应和出口物資不足的困难必將逐步緩和。但是，由于过去几个月來农付产品收购完成得不够好"时說：

不是不够好，而是有些部分完成得很不好。有些部分很严重。

当講到收购　完成情况不平衡时，說：

把完成和沒有完成的刊出來，这个張，这是实事求是，不是什么張。

当講到"許多地方調拨不灵"时說：

应把名点出來。

当講到"有些地方虽有粮食，由于运輸力量特别是从产地到車站碼头的短途运輸力量不足"时說：

把名单刊出來。运輸力量不足是什么运輸力量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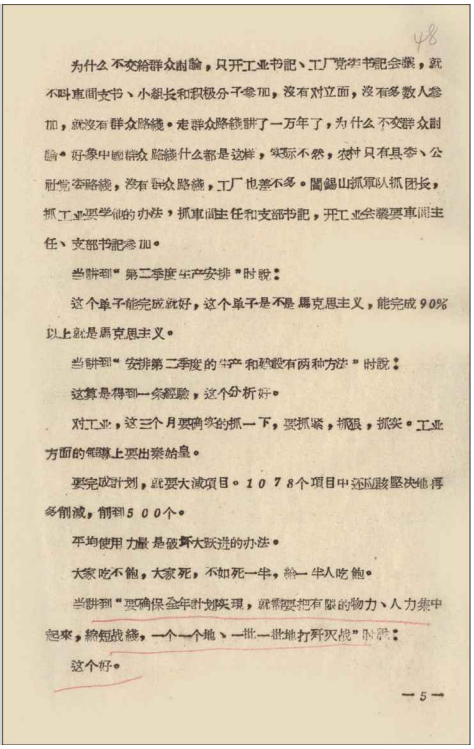
当講到"保証每人24尺布"时說：

这是謊报宣傳的？是一大欺騙，今年要接受这个欺騙。粮食本來按北戴河講增产百分之一百七十，結果在武昌公布增产一倍。

当講到"油脂有些主要产区完成得比較差"时說：

什么产区，不要名字怕失选票。

当講到"油脂至少收购30亿斤油"时說：



为什么不交給群众討論，只开工业书記、工厂党委书記会議，就不叫車間支书、小組长和积极分子参加，沒有对立面，沒有多数人参加，就沒有群众路綫。走群众路綫講了一万年了，为什么不交群众討論。好象中國辦农业路綫什么都是这样，实际不然，农村只有县委、公社党委路綫，沒有群众路綫，工厂也差不多。闖錫山抓軍队抓团长，抓工业要学他的办法，抓車間主任和支部书記，开工业会議要車間主任、支部书記参加。

当講到"第二季度生产安排"时說：

这个单子能完成就好，这个单子是不是馬克思主义，能完成90%以上就是馬克思主义。

当講到"安排第二季度的生产和調拨有两种方法"时說：

这算是得到一条經驗，这个分析好。

对工业，这三个月要确实的抓一下，要抓紧，抓狠，抓实。工业方面的領導上要出乘帥皇。

要完成計划，就要大減項目。1078个項目中还应該堅决地得多削減，削到500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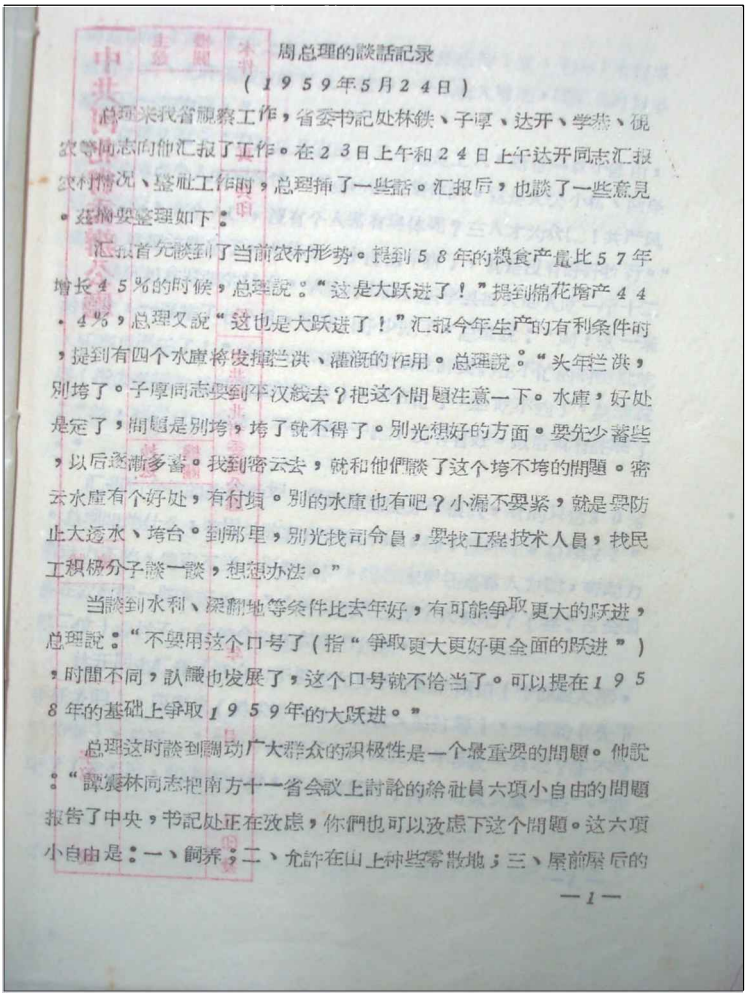
平均使用力量是破算大跃进的办法。

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

当講到"要确保全年計划实現，就得要把有限的物力、人力集中起來，給短战綫，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打歼灭战"时說：

这个好。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插話，1959年3月26日。在談到搞工業項目時，毛澤東說：「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壞大躍進的辦法」，接著說「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很顯然，他說的是工業項目要砍掉一半，而不是人「死一半」。(91-18-494，甘肅省檔案館)



周总理的談話記录

（1959年5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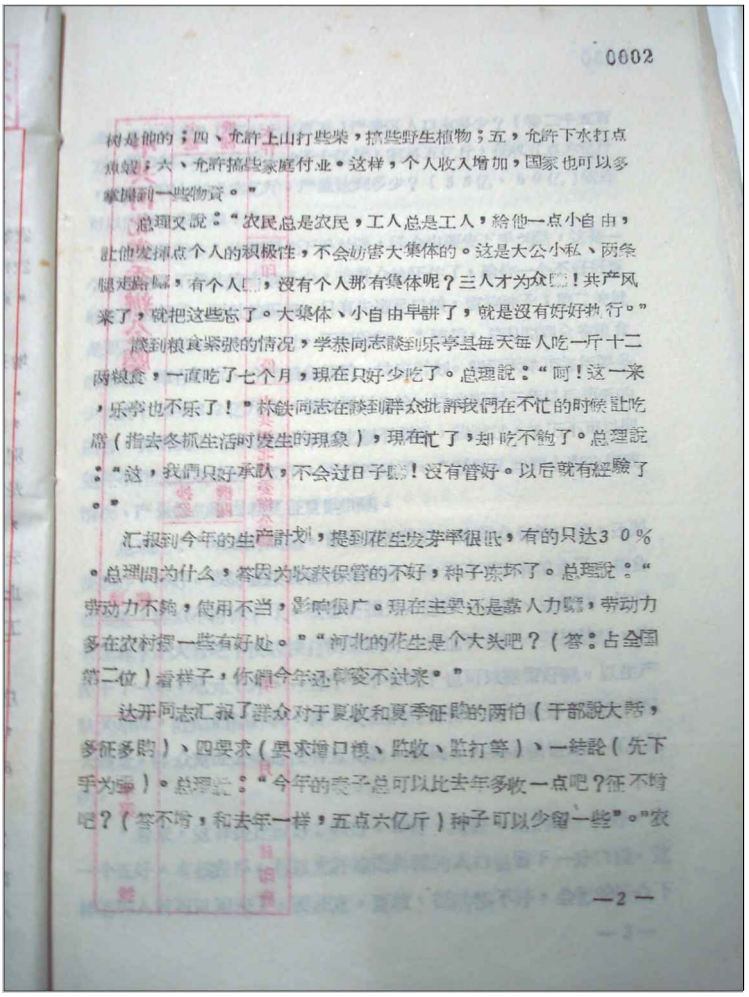
总理来我省視察工作，省委书記处林鉄、子厚、达开、学恭、視农等同志向他汇报了工作。在23日上午和24日上午达开同志汇报农村情况、整社工作时，总理插了一些話。汇报后，也談了一些意見。其要点整理如下：

汇报首先談到了当前农村形势。提到58年的粮食产量比57年增长45%的时候，总理說："这是大跃进了！"提到棉花增产44.4%，总理又說"这也是大跃进了！"汇报今年生产的有利条件时，提到有四个水庫将发揮拦洪、灌溉的作用。总理說："头年拦洪，别垮了。子厚同志要到平汉线去？把这个問題注意一下。水庫，好处是定了，問題是别垮，垮了就不得了。别光想好的方面。要先少蓄些，以后逐漸多蓄。我到密云去，就和他們談了这个垮不垮的問題。密云水庫有个好处，有村填。别的水庫也有吧？小漏不要紧，就是要防止大透水、垮台。到那里，别光找司令員，要找工程技术人員，找民工积极分子談一談，想想办法。"

当談到水利、深翻地等条件比去年好，有可能爭取更大的跃进，总理說："不要用这个口号了（指"爭取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时間不同，訊息也发展了，这个口号就不恰当了。可以提在1958年的基础上爭取1959年的大跃进。"

总理这时談到調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是一个最重要的問題。他說："譚震林同志把南方十一省会議上討論的給社員六項小自由的問題报告了中央，书記处正在攻虑，你們也可以攻虑下这个問題。这六項小自由是：一、飼养；二、允許在山上种些零散地；三、屋前屋后的

大躍進期間，周恩來在河北視察時的談話記錄，1959年5月24日。
（855-5-1551-1，河北省檔案館）



0602

树是他的；四、允許上山打些柴，捡些野生植物；五，允許下水打点鱼虾；六、允許搞些家庭付业。这样，个人收入增加，国家也可以多拿回到一些物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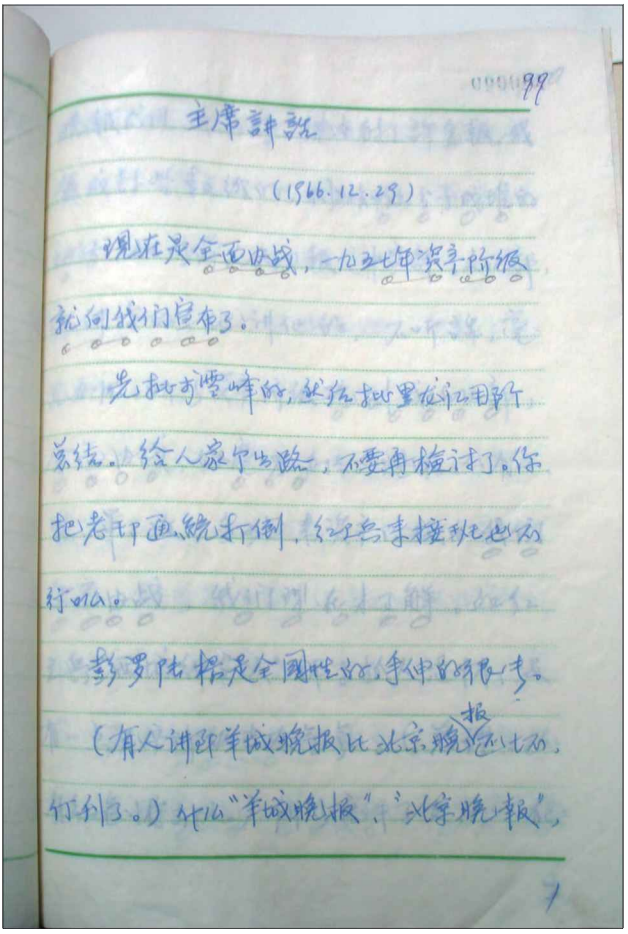
总理又說："农民总是农民，工人总是工人，給他一点小自由，让他发揮点个人的积极性，不会妨害大集体的。这是大公小私、两条腿走路嘛，有个人嘛，沒有个人那有集体呢？三人才为众嘛！共产风来了，就把这些忘了。大集体、小自由早講了，就是沒有好好执行。"

談到粮食緊張的情况，学恭同志談到乐亭县每天每人吃一斤十二两粮食，一直吃了七个月，現在只好少吃了。总理說："呵！这一来，乐亭也不乐了！"林铁同志在談到群众批評我們在不忙的时候让吃席（指去冬抓生活时发生的現象），現在忙了，却吃不飽了。总理說："这，我們只好承認，不会过日子嘛！沒有管好。以后就有經驗了。"

汇报到今年的生产計划，提到花生发芽率很低，有的只达30%。总理問为什么，答因为收获很管的不好，种子冻坏了。总理說："劳动力不够，使用不当，影响很广。現在主要还是靠人力嘛，劳动力多在农村搞一些有好处。""河北的花生是个大头吧？（答：占全国第二位）看样子，你們今年还翻番不过来。"

达开同志汇报了群众对于夏收和夏季征購的两怕（干部說大話，多征多購）、四要求（要求增口粮、验收、監打等）、一結說（先下手为强）。总理說："今年的种子总可以比去年多收一点吧？征不增吧？（答不增，和去年一样，五点六亿斤）种子可以少留一些"。"农

周恩來提出，要給農民六項自由；又說：要「大公小私、兩條腿走路嘛，有個人嘛，沒有個人那有集體呢」。



主席讲话

(1966.12.29)

现在是全面战线，一九六七年资产阶级

就倒我们台了。

先把对坐峰的，然后把里应外合用个

总结。给人家个出路，不要再检讨了。你

把老子通统打倒，老子总未投降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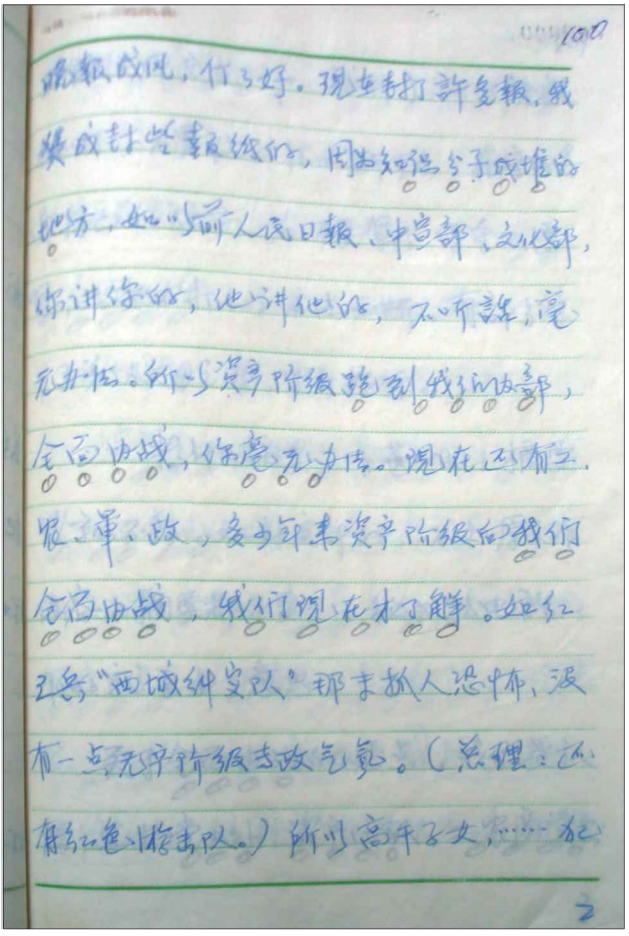
行吗。

彭罗陆杨是全国性的，手伸的很长。

(有人讲即羊城晚报比北京晚报(报)还长

个列子。)什么"羊城晚报"、"北京晚报"，

毛澤東在中央碰頭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12月29日。
（855-8-3389-9，河北省檔案館）



毛澤東在會上數次談及文革就是「全面內戰」。

001

总理在几国乒乓球队活动
日程上的批示

1.哥伦比亚：

要予先向观众公布热烈欢迎，绝不许冷淡，这是亚、非、拉，不要忘记！

上海多看些地方，如工业展览馆、公社、学校、里弄工厂。

2.美国：

要予先通知，应鼓掌的还要鼓掌，参观工业展览馆。

3.尼日利亚：（不到上海）

应当热情招待，不能忘记，它是黑非洲，初建交国家。

4.英国：

也要在应鼓掌时鼓掌。

上海可参观工展、学校、里弄工厂，观看白毛女。

21日去广州，参观公社、广交会及其它。

周恩來在六國乒乓球隊活動行程上的批示，
詳細指示面對不同國家隊時觀眾應有的態度，1971年4月11日。
（B126-2-107-1，上海市檔案館）

REPRODUCED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DECLASSIFIED
Authority NND 979520
By JWF NARA Date 9/12/97

Secretary Kissinger:
Now we could be of help in two ways.

-- One, if the war should be prolonged in the obvious way, we could be helpful by supplying equipment and other services,

-- What I want to discuss today is what we can do to shorten the period of vulnerability.

One way of shortening the period of vulnerability is to point out certain areas which any force has to keep in mind in defending itself. One problem any country has is early warning. With respect to bombers, that means an air defense that can not be saturated. And with respect to missiles, it means getting some warning of missile launching.

Now any help we would give you in our mutual interest should be in a form that is not easily recognizable. With respect to missile launches, we have a very good system of satellites which gives us early warning. The problem is to get that information to you rapidly. We would be prepared to establish a hotline between our satellites and Peking by which we could transmit information to you in a matter of minu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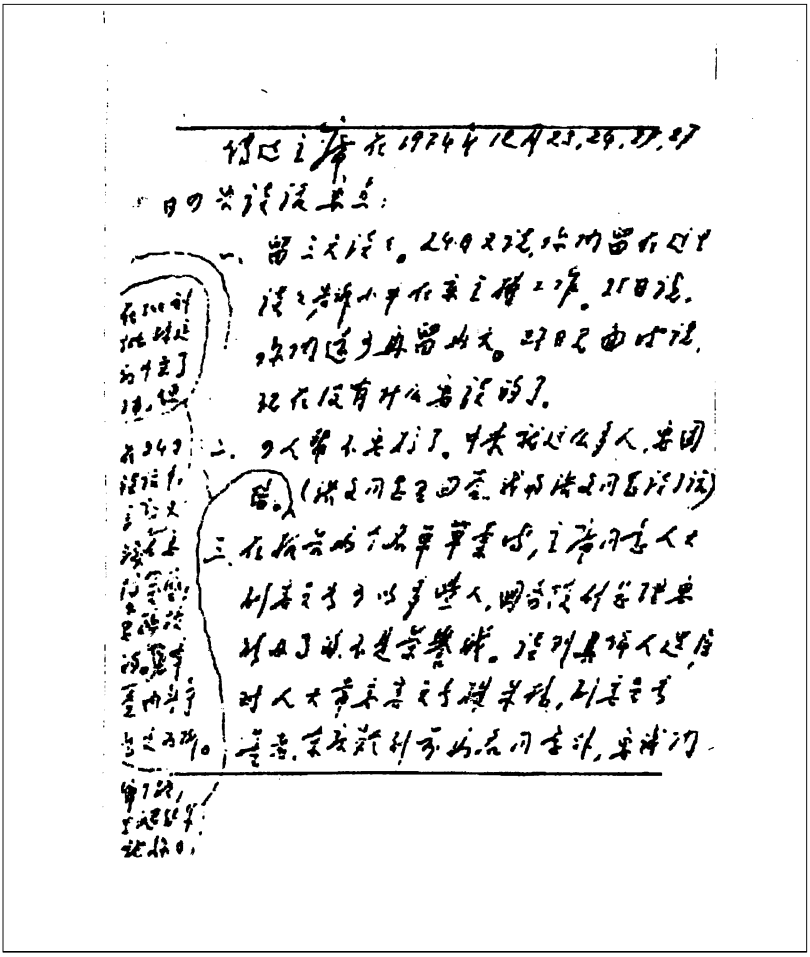
Prime Minister Chou: Through the satellites?

Secretary Kissinger: Well, the information goes to Washington and then to Peking. We could do that in one of two ways that would not attract attention.

-- We could just annou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otline just as we have with Moscow, Japan, etc. But yours would be of a special nature but that would not be generally known. This would enable you to move your bombers and if possible you could move your missiles if you knew an attack was coming. You would then need good communications from Peking to your various bases, but we could probably help with that in some guise.

-- Another way is to sign between ourselves an agreement on accidental nuclear war, the same as we have signed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also establish a hotline.

周恩來和基辛格的「一對一談話」記錄，1973年11月13日。
基辛格提出，中蘇一旦發生戰爭，美國可幫助中國建立對蘇聯導彈發射的早期預警能力，「我們準備在我們的衛星和北京之間建立一條熱線，通過它，我們可以在幾分鐘內就將信息傳遞給你們」。(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



周恩來親筆起草的〈傳達主席在1974年12月23、24、25、27日四次談話要點〉，1974年12月27日。（中央檔案館）

圖片是〈要點〉的第一頁，部分內容為：

傳達主席在1974年12月23、24、25、27日四次談話要點：

一、留三天談談。24日又說，你們留在這裏談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說，你們還可再留兩天。27日見面時說，現在沒有什麼要談的了。

二、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在24日談話中，主席又說，在批劉批林運動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來就好。並舉黨內鬥爭歷史為例。（洪文同志有回答，我與洪文同志談了話）

中文版序

走近周恩來

一

這是一本我以近20年時間寫出的嘔心瀝血之作。從一開始，我就以中英文同時寫這部傳記。2024年，英文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現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個中文版，在問題意識、基本思路和主要觀點、資料搜集和引用以及敘事組織和鋪陳上，同英文版是一脈相通的。考慮到中英文讀者不同的知識背景和閱讀習慣，這個中文版並不簡單地就是英文版的中文翻譯。除了在歷史事件及背景的敘述、檔案文獻的引用，以及中文版展示了一批檔案文件圖片等的區別外，另一個不同之處是中文版加入了這篇序。

這本傳記的英文版出版後，受到國際學術界廣泛關注，在較短時間內就有數十篇書評（包括一些長篇書評）發表。在基本肯定的反響中，意見較集中的一條，是這本傳記沒有一篇跋或結論，給人以一種「故事沒有講完」、意猶未盡的感覺。這一情況的出現有種種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還要從我到美國求學後的一段要緊的經歷說起。1980年代中期我到美國讀博後，正值各種「時髦理論」侵入歷史研究領域之時，也令我在博士論文選題和寫作時頗感困惑。1989年9月，我參加了一個極不尋常、對我來說也極為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由國際冷戰史研究泰斗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教授發起並主持，應邀在會上做報告的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美國讀博的研究生，做評論的則是外交史和國際關係研究

領域的世界著名學者。其間，我和在美國外交史領域久負盛名的孔華潤（Warren Cohen）教授有一番交談，向他請教「怎麼做歷史」。他的回答是：「這太容易了，講一個好的故事，同時把故事的意義講出來。」這番話竟令我有一種茅塞頓開之感。此後，我寫博士論文就是循着這條走的，越寫越順，居然在幾個月內就完成了論文並通過答辯。此後，這一直是我從事歷史研究及寫作的一條必循「法則」。我寫周恩來傳也是這麼做的，試圖在講述一個關於周恩來的「好故事」的同時，邊敘邊議，把我體察感受到的意義講出來。這樣，寫到傳記結尾時，是否還有必要寫一篇似乎是要為周恩來的人生、政治和外交生涯「蓋棺論定」的「結論」呢？與其如此，是否還不如給讀者留下足夠的空間，由他們得出自己的結論更好？

在中文版基本完稿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同仁們又多次向我提出這個問題。當我表示不想逼着自己寫這樣一篇「結論」時，編輯們又提出：「你能否考慮寫一篇具有『實質性內容』的中文版序，和讀者分享你寫這本傳記走過的心路歷程呢？」見我仍在猶豫之中，甘琦社長說，在這篇序裏，能不能就回答兩個問題：為什麼寫這本書？又怎麼寫成了現在的樣子？我被甘琦和她的同事們說服了。於是，就有了這篇既是序、也帶有「導言」用意的文字。

二

我是怎麼會想到要寫一本周恩來傳記的呢？1980、1990年代，我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撰寫的第一本英文專著是《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中美對抗的形成》（*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不斷地會寫到周恩來。在我的第二本英文專著《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裏，周恩來同毛澤東一道是中心人物。然而，直到2004年，我從未想到要寫一本周恩來傳記。那年，我在弗吉尼亞大學任教。一天，我的同事、在國際學界影響頗大的美國外交史專家梅爾文·萊夫勒（Melvyn Leffler）教授把我找去，開門見山就說，他已經同波多馬克出版社（Potomac Press）簽約，要編一套關於20世紀世界偉大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的叢書，周恩來自然應在其列，這是

一本簡傳（a short biography），大約四五萬英文字。他說：你在已出版的兩本著作中對中共革命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和外交史都有深入研究，而周是你筆下的重要人物，你寫他應該不難。萊夫勒還誇大其詞地說：以你對中國革命史和外交史的知識為基礎，「這本傳記你大概只要六個星期就可以寫出來」。說完，他哈哈大笑起來。

萊夫勒的這個邀約是我不能拒絕的。在我的學術經歷中，他是我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他讀過我寫的《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後，評價甚高；後來又讀了《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初稿，給我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見。弗吉尼亞大學要招聘一名中美關係研究講席教授時，他竭力鼓勵我應聘，還在同事中大力推介我。當時，我其實並不真正懂得要為周恩來寫傳記（即便只是簡傳）將要跨越的是怎樣一片思想與學術的「汪洋大海」。我當然知道不可能在六週裏就寫出這本傳記，但還是以為，以我當時的學術能力和積累，要完成這本傳記應該不會太困難。我欣然答應了萊夫勒的邀約，並同波多馬克出版社簽訂了先期合同。

若要進一步深究，我接受了萊夫勒的邀約，還有學術上和思想上更深層次的兩個原因。第一，是在我心中（我相信也是我們許多同代人心中）抹不去的「1976年記憶」。那一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在舉國舉世哀悼的同時，卻發生了北京最高層對哀悼「降級處理」的控制和阻礙。這一番操作，把十年文革期間早已累積於普通中國人心中的壓抑和憤怒推到了爆發的臨界點。在我們的心目中，周恩來是「一個有良心的共產黨人」，當時社會上流傳的「政治謠言」，涉及的都是以江青為代表的「反周勢力」的種種醜惡行徑。毛澤東發動文革，曾以在億萬人「靈魂深處鬧革命」為號召和目標，但到1976年，卻已在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心目中成為一種地地道道的「異己」存在。清明節來臨，萬千民眾聚集到天安門廣場，在「悼念敬愛的周總理」的旗幟下，抗議的矛頭不僅指向聲名狼藉的「四人幫」，更直指高高在上的「偉大領袖」。「四五運動」——1976年天安門事件——是中國「革命時代」走向終結、後革命時代帷幕拉開的重要轉折點。

時過境遷。在改革開放年代對中國革命時代批判及反思的大背景下，中國共產黨革命以及周恩來在其中（包括文革中）所起作用的各種記錄（包括負面記錄）不斷披露。關於周恩來的評價，一個較大的衝擊發生於2003

年。曾長期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並任室務委員及周恩來傳記組長的高文謙出版了《晚年周恩來》一書，其中尖銳地提出，周恩來在文革中並非如人們想像的那麼清如冰壺；恰恰相反，他出於「自保」的考慮，在毛發動的文革中扮演了「助桀為虐」的角色。高的這本書幾乎顛覆了周長期以來享有的「天下大亂時的中流砥柱」形象，在中國讀者（尤其是知識階層）中影響極大。這一切，與我和我們這一代人的「1976年記憶」形成了強烈反差，但同時，也激發了我深入探究周恩來人生及政治外交生涯的好奇心。

第二個深層次原因是，全球冷戰結束後，國際學界對於革命、中國革命（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革命主角評價的主流看法發生了極大改變。從學術史（而不僅僅是政治史）發展的視角來看，1989年是20世紀世界歷史一個巨大的轉折點。天安門悲劇的發生，成為全球範圍內大變動時刻到來的前奏。那年初冬，在冷戰期間東西方對峙中成為實體象徵的柏林牆轟然倒塌。之後，幾乎只是歷史意義上的一瞬間，蘇聯和整個蘇聯集團土崩瓦解，曾席捲全球的國際共運退潮，成為一種「20世紀的歷史現象」。於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赫然登上了歷史前台。

所有這一切，促使人們反省歷史，並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國際學術界對於「1949年的意義」的再探討，以及對俄國十月革命意義追根究底的重新審視；批判性反思還追溯到200年前的法國大革命（1989年恰好是法國大革命200週年）。「革命」這個曾在20世紀風光無限的詞，開始變得黯淡失色。本來，隨着改革開放宏大歷史進程的前行以及與之相關的重審歷史的推進，學者們已開始對「革命時代」的到來本身以及革命的歷史正當性提出各種質詢。全球冷戰結束後，國際學界對曾在20世紀成為時代主題的危機、戰爭和革命的探討表現出空前的熱情，並朝着否定革命、以「去革命化」為中心關切的方向轉變。在這一背景下，1994年，曾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李志綏出版了回憶錄，披露了毛在紅牆背後的諸多「秘辛」；2005年，暢銷書作者張戎和她的丈夫哈利戴（Jon Halliday）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出版，試圖摧毀毛「獲得正當性的每一根支柱」。這之後，對毛、周以及中國共產黨革命全盤否定的趨勢，又在馮客（Frank Dikötter）

等其他學者的著述中進一步固化，形成了國際學界對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持否定態度的一股「新主流」。實際上，前文提及的高文謙所著《晚年周恩來》的出版也是同這一變化分不開的。

我自1990年代初開始在美國大學任教，時間正好與上述發展重合。我的博士論文和最初發表的兩本英文專著都以毛澤東和新中國對外政策為研究中心，提出毛從來不把在中國奪取政權當作革命的終點；在他看來，中國革命的最終目標在於徹底改造中國的國家和社會，並在打倒「舊世界」的同時創造出一個將根據革命中國的理念所設計的「新世界」。唯其如此，中國革命的內外使命存在着深刻的內在聯繫：關於中國革命（包括「繼續革命」）勝利及其經驗所起榜樣作用的宣示，為毛在新中國成立之際所作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聲明（從本質上看，這是一項關於「新中國」合法性的聲明）提供了實證上的支持，並轉而成為國內深層次和長時期持續動員（尤其是大躍進和文革那樣的「超常動員」）的最重要源泉。我當時的計劃，是要順着上述思路寫一本關於毛時代中國對外關係的專著的，書名都想好了，是《天下的革命：毛澤東的中國面對世界》。我接受萊夫勒邀約準備寫一本周恩來傳後，在問題意識和基本看法上仍準備循着這條路子走。

三

即使我心裏明白不可能在六週裏就寫出一本周恩來的簡傳，但我動筆後幾乎馬上就感覺到，這是一件遠比我的想像要困難得多的事情。

周恩來自1920年代初投身革命後，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一直是深度捲入中國共產黨革命和新中國內外事務的一個中心人物，他的活動涉及面極為廣泛，要寫他的傳記不僅要寫他本人，還要寫到他親身參與或與他有關的方方面面。記得我開始寫這本書時，剛剛從弗吉尼亞大學轉到康奈爾大學任教。當我和同事高家龍（Sherman Cochran）教授講到我準備寫周恩來傳時，他沉思片刻後說：你膽子真大，周恩來的活動遍及中國20世紀歷史的前四分之三，還參與過那麼多重大國際事件，你要寫的不是一部傳記，簡直就是一部20世紀中國史，不好寫！我開始動筆寫書後，就已感到高家龍的話真是一語中的；同時我也覺得，一本幾萬字的小書恐怕只能

講一個簡略的周恩來故事。就在我不知如何應對這種情況時，恰遇波多馬克出版社出問題歇業了。2014年，我與哈佛大學出版社簽訂先期合同，寫一本英文28萬字的周恩來「綜合傳記」(comprehensive biography)。

但對我來說，更具挑戰意味的是，周恩來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我應該怎麼寫他？這是很多人向我提出的問題。我還記得，好友許紀霖得知我準備寫周恩來傳時說：周恩來和毛澤東都不好寫，但我看得懂毛澤東，卻看不懂周恩來。又想起，1990年代初我訪談師哲(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多位中共領導人的首席俄文翻譯)時，曾在他家中住了近三個星期，天天都在談話。他告訴我：一班中共領導人中，最難懂的就是周恩來。

這裏的一個關鍵，在於如何看待周恩來和被林彪稱之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毛澤東之間的關係。在學界對周恩來的各種研究和探討中，人們普遍認為，他幾乎一生都處於毛澤東的巨大陰影之下(in Mao's shadow)，使得他的本相被遮蓋，難以為人們所真切地探知。在議及周時，學者們經常使用的英文詞是enigma或myth，中文的意思就是他是一個「謎」或「謎團」，「深不可測」。這是因為學者們發現，在可以接觸到的一切文獻和其他資料的基礎上，要走進他的內心世界幾乎是不可能的。

於是，怎樣才能設法走進周恩來的內心世界，成為我寫傳記時遇到的最大挑戰和最大困惑。我清楚地知道，要講一個關於他的好故事，又怎能沒有對於他內心世界的探究？然而，在寫這本傳記的這些年裏，除了他留下日記的很短那一段(1918年)外，我不管做怎樣的嘗試，卻始終找不到進入他內心世界的途徑。曾有朋友向我建議，可以借用行為心理學或心理分析的「科學」方法，來「深入探究」周恩來的行為邏輯和心理狀態及活動。我不想這麼做。且不談這種做法和我對「如何寫歷史」的基本想法不一致，也不是我在學術上之所長。我更擔心，這可能會使我在講述周恩來的故事時，讓自己的主觀故意走到要講述的故事前面，出現「馬車拉馬」的情況，把根本並不屬於周的「東西」強加於他。

我在寫書過程中逐漸認識到，我能做的，恐怕就是不斷地嘗試以各種方法——尤其是在盡可能窮盡可以看到的各種文獻資料(包括回憶錄和口述資料)、並對之甄別研讀的基礎上，憑藉同理心和「移情」方法不斷地

試圖走近周恩來。這並不容易，也是為什麼這本書我會寫了那麼長時間的原因之一。在方法上，我嘗試在敘事過程中常常把自己也放進去，以自己在毛時代生活的經歷和感受為參照，同周的經歷聯繫起來，「重建」他走過的路。

四

很顯然，我能否講述一個關於周恩來的「好故事」，對文獻資料的廣泛收集和深入發掘就成為一個「重中之重」的挑戰。在這一點上，首先我是極為幸運的：我開始寫周恩來傳時，一個從事多語種、多邊檔案研究的「黃金時代」正在到來。

從世界範圍看，美、英等一系列西方國家檔案一直循規開放，學者要使用一般來說不難。隨着全球冷戰結束，從1990年代初中期起，俄國和東歐國家檔案也開始向學者開放，從總的趨勢看，限制越來越少，範圍越來越廣，一扇利用大量俄文檔案文獻研究20世紀中國史（包括中外關係史和中國革命史）的大門被打開了。在中國國內，改革開放的東風也吹進了檔案開放的領域。1987年，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第一部《檔案法》，確定了檔案定期解密開放的原則。1997年，全國人大又通過經修訂的《檔案法》，進一步拓寬了檔案服務於學術研究的通道。

我在寫作博士論文以及將論文修改為專著的過程中，充分利用了美、英等國的檔案文獻材料；但對中文文獻資料的使用，當時還局限於公開出版或內部發行的各種文件集、決策者的年譜和選集、回憶錄以及訪談記錄等。從1990年代末起，情況開始變化。我仍然清楚地記得，1999年盛夏，我和沈志華、李丹慧一道，在桂林參加了一次關於中國與冷戰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後，到廣西省和福建省檔案館查閱檔案。我們驚奇地發現，共和國時期（大致到1966年）的大量檔案文獻已解密開放，其中也包括許多當年向下傳達的中央級文獻資料。例如，在福建省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中，有一份1965年4月12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備戰和援越抗美問題的記錄。周恩來在會上提出，中國「要後發制人」，「援越抗美」的口號「可以分開兩句說：支援越南，反對美帝」，全國的動員「不要一擁而上」。這段重要史

料，我當即抄錄下來，並在《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中引用。這之後，我對省、市檔案館解密文獻資料這個「寶庫」格外注意，並盡可能充分利用。

更令我興奮的是，就在我決定要寫周恩來傳的2004年，中國外交部檔案館開始有步驟地解密館藏文件。在近十年的時間裏，檔案分三批開放，力度越來越大。這對於周恩來和中國內外政策研究來說，是又一處極為可貴的寶藏。外交部檔案開放後，我連續幾年利用暑假和其他時間去那裏做檔案研究（有幾次還帶領研究生一起前往）。從2004年到2008年，我代表康奈爾大學冷戰史研究項目，並會同美國威爾遜中心國際冷戰史項目，同外交部檔案館簽訂了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亞非會議這兩個重大項目上的檔案利用合作議定書（這兩個項目後來都完成了）。2006年，我又作為顧問，直接參與了外交部檔案館和美國國務院歷史辦公室（負責編輯美國外交文件集的機構）在中美關係從緩和走向正常化（1969–1979）這一重大項目上的檔案開放合作議定書（可惜這個項目後來未能進行下去）。我在外交部檔案館的研究工作得到了館方從上到下的大力支持，這對我寫作周恩來傳的幫助極大。

從2000年起，我在華東師範大學多年兼任紫江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同時又先後與沈志華、楊奎松、韓鋼、王海光、李丹慧等一批中國頂尖學者為同事，共同組建了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史研究中心、周邊關係研究院、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以及當代文獻史料中心，通過同他們的緊密合作以及動員組織研究生參與檔案收集和整理工作，又輔之以同國內外其他學者同行在檔案收集和交換上的合作，使參與各方的學術研究都因此能更好地前行。這些年裏，我一方面把自己收集的解密檔案全部送交華東師大現代文獻史料中心保存；另一方面，我個人的學術研究也從中心保存的大量中、英、俄、日、法等多邊檔案文獻中受益匪淺。

在上述背景下，我在準備撰寫周恩來傳時，已盡可能通過多邊檔案的對比及甄別研究，使自己的歷史敘事建立在更為扎實可靠的基礎之上，並糾正國際學界由於缺少一手資料、或由於對資料的誤讀而產生的敘事或解釋錯誤；同時，檔案文獻也是對於民間一些謠言誤傳最有力的否定。這些年來，我有太多這些方面的經歷和感受，在此謹舉重要的幾例。周恩來在1939年右臂受傷後，由於未得到及時的正確治療造成了終身殘疾，這本是

一樁早已為人熟知的事情。但近一二十年，坊間卻一再出現他受傷是真、殘疾卻為「偽裝」的謠言。俄國解密文件中，有蘇聯醫生為周診斷的詳細報告，以及中共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關於此事的一系列來往文電，「偽裝」之說為謠言便不攻自破。

1959年3月，在大躍進的嚴重惡果已經暴露出來的情況下，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聽取工業項目發展過頭的報告後，說「要大減項目」，從1,078個削到500個，並用比擬的方法說「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但在一本關於大饑荒的頗具影響的書中，作者卻把毛的「不如死一半」的話，說成毛指的是人「不如死一半」。這個誤讀太大了！甘肅省檔案館的解密文獻中有這一文件，我把這一段的影印件放到了這本書中。

在文革中，「備戰、備荒、為人民」是一段最著名的毛主席語錄，但根據河北省檔案館的解密文件，這七個字實際上是周恩來根據毛的講話內容總結出來的。不僅如此，周還同時強調，「保備戰」固然重要，但「第一位是農業」，更是要保的重點。在十年動亂中，農村基本未受波及，大饑荒沒有捲土重來，與此是有關係的。

1973年11、12月的「批周風波」，是周恩來晚年政治生涯遇到的一次最大危機。據稱，他在同基辛格的會談中，在「中美軍事合作問題」上犯下了「右傾投降」的「賣國罪行」。根據毛指示參加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一次他要被「打倒了」。但周在同基辛格的會談中究竟說了或者做了些什麼，連捲入此事者都講不清楚；而在美方當事人基辛格送給美國國會圖書館和耶魯大學的「全部檔案材料」中，偏偏沒有關於他和周恩來舉行「一對一」會談的任何材料，在基辛格自己的回憶錄中也對此事語焉不詳。美國有一個《信息自由法》，任何人都可以據此要求政府解密並提供「未列為例外」的信息。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這是一個民間機構）資深研究員伯爾（William Burr）有一次根據《信息自由法》要求解密其他信息時，卻意外地收到了周恩來和基辛格「一對一」談話的記錄。我在伯爾的幫助下，在國家安全檔案館獲得了這些記錄。從中可以看到，周並沒有對基辛格所建議的「中美軍事合作」表示同意，更沒有在基辛格帶來的雙方合作諒解備忘錄上簽字，而只是和基辛格約定，雙方將通過特別

約定渠道進一步討論此事。但此後，基辛格再沒有從中方收到關於此事的任何下文。2012年3月，基辛格將他的全部檔案材料送給耶魯大學，我應邀參加了同時舉行的一個閉門學術會議，同基辛格就此事有一番兩個多小時的對話。我根據從中、美兩方看到的材料告訴他，周恩來在他回美後受到了嚴厲批判。每當涉及他同周談判的具體內容時，基辛格卻閃爍其詞，顯然有難言之衷。但由於中方關於周恩來和基辛格談判的文件尚未解密開放，而政治局「批周」會議的記錄又已被銷毀，對這件「謎案」的探討無法再進一步深入下去。

這件事其實也反映出了我在利用檔案文獻寫作周恩來傳時遇到的困局：一方面，很多時候我會覺得可以利用的文獻資料太多了，無法窮盡；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時候我仍然面臨着很多關鍵性的文獻資料或者尚未解密開放，或者不知是否存在的困境。這是我不願為周恩來傳寫「結論」的又一重要原因。

五

那麼，我又是怎麼會寫成讀者現在看到的這本周傳的呢？我想，最好的回答方式應是和讀者分享我研究周、寫周的過程中走過的心路歷程。我寫周恩來，是從他的童年寫起的。我讀了各種資料後曾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周恩來後來成為革命者、甚至成為共產黨人，似乎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周恩來和自幼就表現出叛逆性格的毛澤東全然不同，他曾自承「天性傾向調和」。他在三位女性長輩（嗣母、生母、乳媽）的呵護下長大，從幼年起便開始在嗣母引導下閱讀中國歷史文化典籍。乍一看，這似乎指向了與他後來成為共產主義革命者相反的方向。

但實際上，這裏揭示的正是人生的複雜和不可預測，也說明一個人進入社會後的經歷對他的生活道路選擇的重大影響。在對周恩來早年經歷進一步探討後，我發現，他成為革命者並選擇走上共產主義道路，並不是一種「歷史的誤會」，而恰恰是「歷史使然」。他是在大清甲午戰敗後的1898年（亦即戊戌變法那一年）出生的。他幼年讀書經歷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促成了他對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中國歷史文化要義發自內心的

接受。12歲走出故鄉淮安後，他看到落後的中國面對西方列強和日本的侵略，正處於一派國難深重的環境與氛圍之中，滋生出「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又從中生發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願景。

當周恩來將這種願景轉變為行動時，何以沒有選擇改良？何以選擇了革命？其實，從一個更為寬廣的視角看，這又成為一個更大的問題：20世紀席捲中國的，為什麼不是改良而是革命？這恐怕還是要從歷史本身的發展中尋求答案。中國開始走入現代，並非自鴉片戰爭始。早在「漫長的18世紀」（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域外新農作物的引入和銀銅的大量持續入口，導致了中國農業生產結構性改變以及相應的城市化發展，經濟與社會也開始匯入逐步興起擴展的全球化初潮。大清在鴉片戰爭中完敗後，又有1860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甲午戰爭中慘敗於日本，以及世紀之交八國聯軍佔領京城並被迫支付庚子賠款之類的巨變。與此同時，民生維艱，貪腐遍地，民變不斷，大清已顯示出太多「王朝末期」的症候。即便以中國歷史上王朝興替的週期律來看，19、20世紀之交也到了又一個「改朝換代」的時刻。革命本來就同中國歷史上「造反有理」及「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傳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此時更被越來越多人（尤其是部分知識精英）視為拯救國家、民族乃至中華文明於危難之中的最有效手段。戊戌變法和晚清新政的失敗，更起到了為這種趨勢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是周恩來後來選擇走上革命道路的大背景。

惟其如此，我在這本周傳的引言中提出：革命不是原罪。就民心普遍思變的激烈與急迫程度而言，革命在中國的發生和發展曾有過巨大的歷史正當性。這裏的一個基本的意思是，革命之所以會在中國發生，歸根結柢，乃是歷史本身的發展使然；或者說，革命以這樣的規模、烈度、深度和持久的程度席捲中國，並達到那種摧枯拉朽乃至「翻天覆地」的地步，是有其道理的。

從周恩來留下的旅日日記和到歐洲後的書信來看，他從熱血青年轉變為共產主義革命者所走過的心路歷程很能說明問題。這應當歸因於他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產生的、欲拯救中國必須「革心」和「革新」的想像願景。他又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有着「願中華崛起」的強烈信念。但這兩者在他觀念世界中的結合卻並非通途。儘管他在日本求學期間已接觸到社會

主義思想，五四運動中被捕入獄後，又在難友中講述過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但他初到歐洲求學時，仍表示要「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信仰。之後，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述，他在探尋為拯救和改造中國而最適於「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時，詳盡比較了英國的「保守」之法和俄國的「暴動」之路的長處和短處，得出了中國「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的看法。這是他信奉共產主義、決心取暴動與革命之途的思想入口。

然而，我在研讀文獻中又注意到，周恩來成為共產黨人後，即便當他為使黨具備行動上的效率和戰鬥力、主張必須把中共建設為一個列寧主義黨的同時，他又提出，黨員不能「蠢如鹿豕，只知服從」，而應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並為自己留下批判思考的空間。這在他的觀念世界中留下了一處「人性關切」和「人道關懷」的禁地，即便在他深度捲入共產黨革命、並成為堅定的共產黨人後，也從未泯滅。

周恩來是在19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時期從歐洲回到國內的。這也是中國「革命時代」的兩股潮流（國民黨革命和共產黨革命）處於合作狀態的時候。周恩來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是同他在兩大革命合流的背景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及軍法處長的經歷分不開的。而他之所以會有這一番經歷，又和他與時任黃埔校長的蔣介石之間緊密的工作聯繫以及蔣對他的欣賞有關。此後，隨着國、共兩股革命潮流分道揚鑣，周恩來和蔣介石分屬敵對陣營，但他對蔣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的看法卻並沒有全然改變，並始終相信蔣不會「賣國」。

六

周恩來和毛澤東在1926年「三二零事件」後第一次相遇。周、毛兩人在性格、思維方式、處世及待人接物的態度，以及如何「搞革命」的看法等上面，極不相同。周恩來並非沒有思想，但更是一個做實事的人，也從未表現出成為革命最高領導人的意願和決心。毛澤東有梟雄氣質，從來就不是安分守己之人。他從小就同習慣於家中說了算的父親關係緊張，但潛移默化之中已承繼了父親的霸道氣質。他幼年時曾跟着信佛的母親

「拜菩薩」，但成長起來後還是無神論者。然而，他又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儘管他常常把歷史唯物主義掛在口上，但他的世界觀和思想方式卻受到了唯意志論的深度滲透。他關於革命以及「繼續革命」的言論，尤其是他的一系列關於「理想境界」和「理想社會」的想像，帶有嚴重的唯心指向，強調的是「思想領先」和「意識形態掛帥」。這使得他的「革命」及「繼續革命」的想像和實踐與普通人生活經驗難以契合，而產生「合法性危機」。他自稱身上既有「虎氣」，又有「猴氣」，對此不可小視。如果他僅有其中之一「氣」，就不成其為毛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這種「虎氣」和「猴氣」的結合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如果他只有能夠吸引人於一時的烏托邦想像和表述，或只有非凡的權謀，他都不可能在推動革命和「繼續革命」上走得那麼遠。他在實際政治鬥爭的環境裏，在戰略和政策表述與實施的層面，將這兩者結合起來的能力可謂無與倫比。這是他在登上中共最高領導人寶座後，能夠得心應手地駕馭周和其他領導人、使他們幾乎處處服膺於他的底層原因。周恩來與毛多年相處後說過一句體會甚深的話：「毛主席活着，誰也不是對手」，這是一句大實話。

周恩來在同毛的長期相處中也學得了一套因應之道。我認為，那種關於周一直「處於毛的陰影之下」的說法，只是一般性的概括，而不是一種可以涵蓋他們全部關係的「程式」。周、毛兩人在廣州第一次相遇後的五十年間，有近十年時間，周曾是毛的上司，甚至一度還掌握着對毛的生殺大權。直至經過長征之後，毛才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周的首肯和支持起了重要作用。此後直到兩人都於1976年逝世，毛一直是能夠決定周政治生命的最重要之人，而周（尤其是在延安整風後）似乎也一直表現出對毛的思想、戰略、路線和政策全面服膺的態度。但實際上，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尤其是，從思想觀念來看，周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內化的毛主義者（也就是說，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對毛主義的一些基本教義從來沒有真正信服過）。根據周、毛關係在共事的半個世紀裏的發展變化，我覺得可以分為五個不同的階段：第一段，1927–1935；第二段，1935–1949；第三段，1949–1958；第四段，1958–1971；第五段，1971–1976。

第一階段，從1920年代中期到1935年初遵義會議召開。在這一時期，尤其是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中共轉入地下，周恩

來長期處於中共軍事、組織、情報的領導中樞，實際上是毛澤東的上司。其間，周恩來支持過或保過毛。但他也整過毛澤東，甚至曾是蘇區整毛的始作俑者。他和毛之間的恩恩怨怨，絕不是幾句話講得清楚的，也打下了毛終其一生雖一直用周，卻從未給予周「最終的信任」的根基。

但總的來看，在這一階段，周並沒有用「官大壓一頭」的態度來對待毛，而是始終對毛表現出足夠的尊重。在這背後，我以為周有着一種極富「革命功利主義」意味的考慮。從上海時期到江西時期，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共以及在推動「土地革命」的名義下從事武裝鬥爭的紅軍，都是蔣和國民政府眼中的「叛亂勢力」，同國民政府在力量對比上極為懸殊，他們面臨的第一要務是如何生存下去，然後才談得上怎麼「搞革命」。因此，用周自己的話來說，當時在戰場上打勝仗是「決定一切的」。在長征中，當紅軍幾乎被逼到絕境時就更是如此了。在那種條件下，戰場上的一個敗仗就可能使「革命大業」葬送殆盡。周在以往同毛的交往過程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毛會打仗，這成為決定他對毛的態度最關鍵的因素。但周恩來從過去與毛「交手過招」的經驗中又知道，毛的野心很大，不好相處，卻仍然在遵義會議上選擇了支持毛重新出山進入最高決策層。之後，他不僅主動將紅軍指揮權拱手交給毛，自己甘願在軍事上做毛的助手，而且還通過只與毛分享破譯的敵軍調動部署情況的電文，製造了「毛澤東用兵真如神」的傳奇，從而加強並鞏固了毛在中共及紅軍領導層的權力和權威。所以，我在傳記中寫道，在毛澤東走向中國共產黨革命中最高領導人的道路上，周是起了最重要作用之人。

七

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後，隨着毛澤東逐步登上中共革命最高領袖的寶座，到1949年革命獲得全國性勝利，周、毛關係也進入了第二階段。這一時期，周、毛共同經歷了長征後半段，攜手合作，成功應對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巨大挑戰並幸運地到達陝北。此後，中共和紅軍又因西安事變的意外發生，逃過了蔣介石集中全國軍力對當時已彙集於陝北不毛之地的紅軍各部施以「最後一擊」的危險局面。1937年全國抗戰爆

發後，中共通過同國民黨又一次形成「統一戰線」，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抗戰伊始，毛澤東就主張，中共必須利用抗戰的時機，在抓住「民族」旗幟的同時，把發展並擴充自身軍事政治實力放在首位。周恩來並非從一開始就支持毛的意見，而是同從莫斯科歸來、對登上中共最高領導人位置「很有想法」的王明一道，主張「抗日第一」、「一切通過統一戰線」。這就造成了他和毛在大戰略和路線上的嚴重分歧，也形成了對毛在長征後期獲得的軍內、黨內最高領袖地位的潛在挑戰。雖然周很快就主動與王明「劃清界線」並逐步接受了毛的主張，但這仍被毛視為他在歷史上的一樁「嚴重錯誤」乃至「罪過」，成了他在毛手裏的一根一輩子都抓住不放的「大辮子」。

在周、毛關係的發展中，延安整風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從1938年到1943年，周恩來駐節重慶，負責中共在「大後方」的工作，獨當一面。在紅都延安，毛澤東從1941年起開始發動整風運動，起初並未觸及周，但周其實已是整風的潛在對象。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後，周被召回延安參加整風。毛要對他做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一棍子打暈，再用一盆冷水激醒」。從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周連續五天在政治局會議上就自己在歷史上的「錯誤」和「罪過」作「深刻檢查」，批他最凶的人中，有一大批中共領導人，尤其是當時在黨的領導層地位躥升的劉少奇（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一位前輩討論延安整風，他說，他讀劉少奇給周肆意上綱上線的會議記錄，覺得簡直不可思議）。最後，還是在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出面干預後，毛順水推舟，讓周「過關」。自此之後，周的工作確實要在毛的巨大陰影下進行，也不斷表現出對毛的思想、路線和戰略的服膺。但這陰影並不只罩住了他一人，也高懸於整個中共領導層之上。

從長遠看，延安整風也標誌着中共革命進入了新階段。中共在「統一思想」和「擺平山頭」的旗幟下，形成了一套以毛澤東的領導權力為核心崇拜的「黨文化」，並將大政方針的最後決定權和革命「合法性敘述」的最終界定權力都交到了毛一人之手中，卻沒有在機制層面留下對之加以制約的任何設計。革命以「毛崇拜」為起點，不斷地變成一個巨大和無所不包的

組織和思想的牢籠，在思想、精神乃至心靈上使革命的參與者（包括周恩來）成為革命的囚徒。由此而產生的，是人性的扭曲異化同領袖被神化結合在一起，使得革命開始走上歧途——走向其聲稱要追求的「人的解放」初衷的反面。

然而，若從中共與蔣和國民黨相爭「打天下」的視角來看，延安整風對毛和中共來說是一次極大的成功。1946年至1949年，國共爆發全面內戰，這也是對毛澤東的領導能力、毛思想的正確性以及毛領導體制有效性的一個重大考驗。結果，短短三年間，毛澤東和中共居然在一場乍看上去「敵甚強、我甚弱」、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對抗中，以一種近乎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徹底打敗了蔣介石和國民黨。這也是毛、周合作最親密無間的時期。整個內戰期間，周恩來始終同毛在一道，以軍委總參謀長之身，協助毛指揮協調中共部隊的軍事行動；在他的策劃佈置下，中共情報網絡滲透進入了國民黨方面的各個層級。更要緊的是，毛、周抓住蔣「民主無量、獨裁無膽」的「兩頭都不靠」的弱點，把「反獨裁」和「爭民主」的口號叫得震天響，逼使蔣和國民政府在政治、軍事、社會動員、宣傳等所有領域都失去主動，最後一敗塗地。延安整風後，周恩來在中共領導層的地位和在黨內的影響力一度削弱了，但由於他在內戰中與毛的合作和所起的作用，又重新得到了加強。在人類歷史上，任何「造神」的行為都需要「奇跡」的配合。中共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在內戰獲得全勝，幾乎就是一種奇跡，這對於毛進一步被「神化」、毛思想和毛體制的權威和毛本人日益不受制約的權力的確立，其影響不論如何估計都不為過。

八

1949年，中國共產黨革命獲得全國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誕生。然而，在毛澤東看來，這並不是革命的終結，而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這個話，讀者應該是熟悉的。我對此的解讀是：他想像中的「革命」不僅要將中國人改變為「新人」，將中國改造為擁有普遍正義與平等的新型社會和國家，也要通過樹立中國革命（包括「繼續革命」）的經驗為世界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榜樣，開創一個中國在其中佔據中心

地位的「新世界」。正是以這樣的想像為底蘊，他向世界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關於「新中國」使命的「合法性宣示」，也已透露出毛為他的「革命後的革命」或「繼續革命」創造內在動力的深遠意向。周恩來也說過要「將革命進行到底」，但他的想像和毛並不相同。從這一刻起，到九年後周恩來在「反冒進」上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毛為國家主席，周任政府總理（還兼任外交部長），兩人關係進入了發展的第三階段。

關於建設「新中國」的設想，中共領導人最初的共識是要先搞新民主主義，再接着搞社會主義。周恩來在他負責起草的新政協《共同綱領》中提出了兩個重要意見。第一，新中國要建立的，是以包括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基礎的「民主聯合政府」，它「既不是一個階級專政，也不是一黨獨佔政府」。第二，新中國是「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成」的「中華各民族聯邦」。毛澤東對《共同綱領》做最後修訂時，把這兩項都刪去了。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似乎沒有對此提出異議（但在組建新中國首屆內閣時，周仍希望讓其表現出「聯合政府」的氣象：除總理由周恩來擔任外，四位副總理中有兩位非中共黨員的「民主人士」；15名政務委員中，又有9位由非中共人士擔任）。當我在文獻中發現這些不曾引起研究者重視的重要細節時，心中震動不小。不由得想到，如果周的想法付諸實施的話，那麼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是否會有很大的不同呢？

共和國成立不過一年，就發生了出兵入朝參戰這件大事。朝鮮戰爭爆發後，毛從一開始就力主出兵（美軍仁川登陸前是入朝助戰，之後是出兵援朝，甚至要「爭取全勝」）。我在本書中根據自己的研究提出，他的動機除了保衛東北邊境等安全利益上的考慮，還有推動「革命後革命」的深層次原因。他希望看到的是，通過高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旗幟，將朝鮮危機帶來的挑戰和威脅轉變為中共在國內實行廣泛政治動員和社會整合的動力，從根本上加強中國人對新政權以及毛本人和中共宏大的政治和社會改造計劃的內在支持與認同。周恩來是中共領導人中較早支持毛出兵動議的人（用毛自己的話來說，中共領導人中最初支持出兵的只有「一個半人，我一個，恩來半個」），但他也為通過外交途徑阻止美軍和聯合國軍逼近中朝邊境做出過最大的努力。

中國參戰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但也把戰線從鴨綠江邊推回到三八線附近，從而使毛和中共領導人能夠在國內外宣佈，抗美援朝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從中共領導人的角度看，更要緊的是，中國入朝參戰的經歷和結果大大加強中共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威信和對中國社會的進一步控制，也加強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對毛來說，他也因此獲得了加快「繼續革命」腳步的「政治資本」。朝鮮戰爭還沒有結束，毛澤東的大動作就來了。周恩來於1952年9月訪蘇，獲得了斯大林將為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提供全方位援助的保證。毛聽取周在政治局的彙報後立即提出，要腰斬新民主主義，將立國之初決定的「在十到十五年內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準備」，改為從即時起「在十到十五年內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中共建政後，這是毛第一次在推進「繼續革命」上露出如此鋒芒。劉少奇、周恩來等其他中共領導人因與毛想法不一，反應遲緩。頗受毛信任的高崗摸準了毛的思路，大力推進此事，並向身為二把手的劉少奇開火，結果反而因行事莽撞、在黨內高層散佈了毛的「私房話」，暴露了毛的真實意圖，使毛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局。在處理高崗事件時，周恩來站出來為毛「脫困」，最後毛通過同劉、周的一場實際上的「交易」——毛放棄高崗、劉少奇拋出饒漱石、周恩來被迫犧牲潘漢年——既使得他自己「脫困」，也使得他在十到十五年內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在黨內佔據了主導地位。

1956年，在20世紀中外歷史發展中是極重要的一年。國際上，赫魯曉夫和蘇共搞「非斯大林化」，促發了波蘭局勢動蕩和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亂」。中國國內，中共八大修改黨章，拿掉了關於「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的提法；八大政治報告提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國內主要矛盾已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綜合現有資料來看，毛澤東對這一提法並不滿意，但因為一時拿不出一個替代性的提法，沒有直接發難。

這一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毛、周在「建設新中國之路怎麼走」這個大問題上的分歧，在周堅持在經濟建設中「反冒進」時露了頭。1955年到1956年，根據毛的「社會主義建設過渡時期總路線」，中共在農村全面推動農業集體化，在城市大搞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生產經濟領域也出現了「社會主義建設新高潮」。毛開始要求擴大和加快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

擴大和加快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事業的規模和速度。然而，周恩來卻發現中國的經濟因投資比例過高、發展速度過快，導致了資源浪費和緊張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他因而提出，必須把「反對急躁冒進」提上日程，並採取措施解決由「冒進」而帶來的各種問題。毛澤東對此不以為然。在5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還因反對毛追加當年基建投資的主張，罕見地和毛澤東發生爭執，並說：「作為總理，我從良心上不允許我不反冒進。」毛聽到後「非常生氣」，但並沒有與周發生正面衝突，而是轉身就離開了會場。這為毛後來疾言厲色地對周開刀、大批「反冒進」留下了伏筆。

毛和劉、周等其他中共領導人還在應從波、匈事件中汲取何種經驗及教訓上存在分歧。在事件發生後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說：波匈事件的重要教訓是，「重工投資過多，沒重視輕、農，人民生活沒有改善，領導人特權，人民生活苦，群眾不滿走上馬路」。周恩來則強調，除了要反對「對外的大國主義」，還要堅決反對「對內的大民族主義，對人民的專制主義」(這是否意味着周沒有放棄他在《共同綱領》中的想法)。他還強調，搞社會主義不能「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毛的看法和他們不一樣。他注意到的，是匈牙利事件中有一個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的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後來，時勢轉變後，他點了裴多菲俱樂部的名，說它是煽風點火、大搞反革命顛覆活動及資本主義復辟的急先鋒。

自1949年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就一直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後革命焦慮」。他作為充滿想像力的革命政治家的直覺告訴他，他的思想和黨內其他領導人(不僅僅是同周)有很大的差異；他也極為擔心，他所希望推動的「革命」和「繼續革命」會失去內在動力。怎樣才能把「革命後的革命」推向前進？1957年春天，毛先是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力推動給中共「整風」的運動，並歡迎和鼓勵黨外人士參加。但結果，這卻演變為一場「引蛇出洞」的「陽謀」大劇，轉變為一場聲勢浩大、充滿火藥味的「反右」運動，在知識分子中挖出了幾十萬「右派」。

我在研究文獻資料中有一個重要發現：在「反右」已開始時，周恩來和毛澤東發生了一番「話語對峙」。1957年7月，毛在那篇號召全面反擊「右

派進攻」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文章中講到民主集中制時，說了一段將無數次被引用的話：「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幾週後，周恩來在一次報告中談到「適當的民主集中制」時，居然用了與毛同樣的排比方式，但把群體與個體關係的次序顛倒了過來：「我們的制度就要有恰當的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紀律，又有個性的發展，又有統一性，政治制度就會適合這一條。」我讀到周的這段話後的感覺，豈是一句「心靈的震動」可以表達！毛把「集中」、「紀律」、「統一意志」放在第一位，但周卻把「民主」、「自由」、「個性的發展」放到了前面。這裏所透露的，難道不是周心目中對個體與群體/國家關係中孰先孰後的真實看法嗎？所以，我更有理由相信，周恩來從來就不是一個內化的毛主義者。

1957年9、10月，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正式否定了八大決議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他經深思熟慮後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後來的發展看，這是毛的繼續革命得以不斷推進、文革最終得以發生的一個理論上的基本出發點。

在這次全會上，毛澤東開始對周恩來的「反冒進」發難，說在1956年「來了一個右傾」。進入1958年後，毛又進一步對「反冒進」全面開火。最令毛警覺的有兩點：第一，周在1956年4月的政治局會議後當着他的面說過，「作為總理，我從良心上不允許我不反冒進」；第二，周「反冒進」的意見居然在中共領導層獲得了廣泛呼應。從周恩來的「反冒進」到毛澤東的「反『反冒進』」，成了毛對周的一場大攤牌。毛火力全開，甚至指責周「離右派只有五十米」了。這也是毛對自己的權力和權威的一次大測試。結果，其他中共領導人居然無人站在周恩來一邊，而是都順着毛的路子批判「反冒進」。面對毛和中國領導層眾口一詞的批判，周全然無法為自己辯護，只能一再就自己的「反冒進」錯誤作上綱上線的檢查。

我當時寫到這裏時有一種真切的感受：周恩來絞盡腦汁地試圖寫出能讓他「過關」的檢查，是他人生中一個內心極為痛苦並激烈衝突的時刻。他的常識應告訴他，毛正要做的一切——尤其是那場毛宣佈將要到來的

「更大的冒進」——會給中國經濟及中國人的生活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但他卻不能說出這些想法(即使說出來了，在中共領導人中也將是孤掌難鳴)，反而不得不給自己扣上一堆帽子，反覆檢討。這是周恩來的悲劇，也是中國革命時代的悲劇！

九

1958年是大躍進的一年，也是周、毛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年。上半年，周恩來因「反冒進」而受到毛的嚴厲批判。毛在中央會議上宣佈：「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反馬克思主義。」之後不久，大躍進的狂潮開始席捲全國。接着，周、毛關係的發展也以周恩來開始對毛採取「只可順守、不可逆取」的態度為標誌，進入了從1958年「大躍進」興起到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的第四階段。

這裏，「只可順守、不可逆取」這八個字，是周恩來1960年代初通過「中間渠道」給當時在台灣任副總統的陳誠遞送信息時給陳的一個忠告：面對已經年邁的蔣介石，陳不可陷入與蔣的衝突，而應取「只可順守、不可逆取」的態度，等待到「蔣之後」再攤牌。中央文獻研究室一位研究員告訴我，當他們在中央檔案館提供的文件中看到周給陳誠的這句「忠告」時，拍案叫絕，都覺得這其實也反映出了周關於自己如何與毛共事相處的想法。在我看來，這裏的所謂「順守」，就是與毛共事時不要去觸碰毛的「逆鱗」，但又要守住「底線」，絕不能讓中國這艘大船觸礁沉沒。所以，才會有周在文革前夕從毛的講話概括提出「抓革命、促生產」和「備戰、備荒、為人民」之類的「最高指示」。他看準的一條，就是毛固然要把中國搞得大亂，但並不想把由他為「偉大舵手」的中國這條大船搞到觸礁沉沒的地步。所謂「逆取」，我想到的是，這又一次透露出周從來就沒有成為內化的毛主義者；即便在他表現出對毛的思想、戰略和路線的全面服膺時，仍保留着自己有所「守」亦有所「取」、「守」是為「取」服務的信念。在文革的大亂中，他好幾次在內外講話中說，「不會一直這樣下去的」，恐怕就是這種信念的體現。

大躍進伊始，毛在周恩來的頭上擺了五個中央領導小組，大大削減了他的實權。隨後，又要他擔任鋼鐵生產領導小組組長，讓他也「上了船」，

但他是管事的，不是決策的。周在為大躍進「唱頌歌」、又拼命抓完成「大煉鋼鐵」指標的同時，並沒有放棄他的一些基本信念。我在河北省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中看到，1959年5月在河北視察時，他居然在「大躍進」的一片喧囂聲中提出，要給農民六項小自由；還說，要「有個人嘛，沒有個人那有集體呢？」我讀到這段話時，有一種石破天驚的感覺。我覺得，這對於分析周恩來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是特別能說明問題的。

大躍進的狂潮席捲全國後，闖了大禍，導致了大饑荒這一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罕見的大災難、大悲劇。這期間，毛澤東退居二線，讓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頂在「一線」，處理各種棘手問題。但實際上，毛並沒有真退，有兩個權力他從來沒有放手，一是軍權，二是主流政治話語的界定權。當時，雖然劉少奇提出，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果，但包括劉、周、鄧在內的其他中共領導人卻沒有正面向毛的權力和權威、更沒有從根子上向毛的「繼續革命」的理念和實踐提出挑戰。一旦中國受到大饑荒重創的經濟和社會因劉、周、鄧等推行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政策而逐漸恢復時，毛實際上又輕易地回到一線，更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吶喊，準備反攻倒算。

我寫這段歷史時，一個不斷出現的問題是：在經歷了大躍進、大饑荒那樣的空前災難後，毛何以能夠在短短幾年內又積聚起空前的社會力量的支持和參與，發動文革，甚至敢於發出「全國全面內戰」這樣近乎歇斯底里的吶喊？黨政組織系統的控制、對於信息流動的阻斷、對於宣傳機器的全面掌控等等，當然都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否還有其他的、更深層次的原因？我的看法是，這裏的一個關鍵之處恐怕還在於，毛的那一套以「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為中心的關於「新中國」合法性的大敘事，還沒有失去普通中國人的「內在支持」；周、劉、鄧等其他中共領導人對毛的服膺，也絕不僅僅只是對毛的威權在組織上的服膺，也是對毛的思想、毛關於革命和「繼續革命」的大敘事，以及同這一切相連接的戰略和政策的服膺。而他們在革命大敘事的構建上，卻提不出可以與毛分庭抗禮的替代性方案。

就在這種背景下，毛的「後革命焦慮」又發展為一種更為強烈的「晚年焦慮」或「身後焦慮」。自1960年代初起，他多次提到自己要「去見馬克思」了，這其實是他的「晚年焦慮」及「身後焦慮」的活生生的表露。毛回到一

線後親自出馬，把國內的「防修」和國際上的「反修」聯繫起來，伴之以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侵害中國的大聲聲討，以及把大躍進失敗和大饑荒發生的責任歸於蘇聯對中國「逼債」。他在以此封住黨內其他領導人的口的同時，又展開了另一輪超常群眾動員，從開展「四清」，到推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直到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文革開始後，毛給周恩來安了兩個重要的差事：一是中央文革碰頭會召集人，二是中央專案辦公室負責人。這都是周不想幹也要幹的（卻又沒有真正的實權），但他仍做出了「順守」的選擇，並像「橡皮圖章」般不得不為一些最重大的迫害案子簽字背書。但這也讓周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幾乎無解的挑戰：他面臨的是一連串的「道德陷阱」，以及與這些陷阱相伴而來的「道德悖論」。他必須不斷地逼迫自己在良知、理性和嚴酷現實的壓迫之間作出極為困難、即便以他極高的政治智慧和協調能力也無法保持「完璧無瑕」的選擇。如何看待周身上與此相關的種種道德瑕疵？這是周恩來評價中最富挑戰性的問題，也是最受到周的批判者詬病的污點。其實，毛對此倒是看得最清楚，並一直在這方面給周「挖坑」。

但有一點我必須指出，在周涉及的所有文革「大案」中，沒有哪一樁可能因他取反對態度而改變。所有案例的結論（不管有無周的參與）都是根據「有罪推定」而由毛和那批「毛派」事先做出的；周反對與否，不會改變受害人的遭遇和命運，卻意味着他站到了毛的對立面，甚至是公然觸碰毛的「虎鬚」和「逆鱗」。這將是他在政治上的自殺，並將失去他手中多少仍能對破壞性的文革進程起到牽制或鉗制作用的那點「權力」。在這裏，在政治盤算和道德衡量之間，不存在妥協的空間和餘地。（由此又聯想到道德批判和歷史批判之間的關係問題。道德批判無疑是歷史批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道德批判是極為困難的——因為它要面對遠非單純的道德批判所能涵蓋的歷史複雜性；但道德批判卻又可以是極為「簡單」的——如果它在建立自身出發點時「偷懶」，把關於歷史複雜性的思考排除在外。）

1966年底，毛澤東在他的73歲生日聚餐和幾天後的中央碰頭會議上，明確地把文革稱為「全國全面內戰」。這之後，由上海「一月革命」打先鋒，向「黨內走資派」奪權的烽煙向全國蔓延開去，「天下大亂」的局面真的出現了。然而，毛澤東一旦放出了群眾運動的「魔獸」，即使以他貌似

絕對的權威和近乎無限的權力，卻做不到完全控制群眾運動的發展軌跡。他呼喚「全國全面內戰」的到來，但一旦「全面內戰」真的成為現實時，他想要踩剎車，而「全面內戰」卻像失控的大車，根本不聽他的使喚。1967年7月，毛澤東親臨群眾中的兩大派嚴重對立、武鬥不斷升級的武漢，想親自創造一個由他登高一呼、天下歸心、群眾的「派性」鬥爭也偃旗息鼓的例子，不料卻差一點遭到「不明真相」的群眾的衝擊，他自己也在周恩來的緊急安排下，從武漢附近的一個軍用機場乘飛機落荒而逃。在武漢事件的巨大衝擊下，毛對群眾運動的看法和態度變了。1968年7月，毛澤東親自派遣工宣隊、軍宣隊進駐接管派性肆虐、武鬥不斷的清華和北大。從這一刻起，在文革曾風行一時的各地紅衛兵組織土崩瓦解或名存實亡，紅衛兵運動也就此壽終正寢。

歷史真是弔詭。我在書中提出了這樣的看法，說到底，文革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毛澤東和「體制」的徹底對立或分道揚鑣。不管毛澤東對當時的體制多麼不滿，歸根結柢，他仍然是這個體制最重要的創造者，也是最主要的「得益者」。因此，在一個非常基本的層面，他同體制有着「合為一體」的關係。在這一意義上，即使他擁有似乎無限的權力，他仍然是體制的「最後的囚徒」。從這樣的角度看問題，他在1967年夏末秋初對文革中「造反有理」、「全面內戰」態度的上述「轉向」就毫不奇怪了。回頭看，其實周恩來正是「體制」的人格化存在，而他的「逆取」其實也正是建立在他自己對這一點的清醒認識上的。

1969年，九大這個「團結的、勝利的大會」召開後，本來應當走向終結的文革卻始終終結不了。毛澤東和他的接班人林彪之間矛盾的出現只是表象，問題的真正癥結在於，林彪不要再「搞革命」而是要轉向建設了，而毛卻認為「革命還沒有完」。然而，比毛的意志和權力更強大的，是歷史本身發展的力量。

十

在中共革命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也許沒有哪件事比1971年9月發生的林彪事件更富戲劇性、更具爆炸性了。林彪攜妻兒倉惶出逃，

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這一事件完全出乎毛澤東、周恩來的意料。本來，文革走到這一步，毛的「繼續革命」的思想和實踐早已引起了人們普遍的懷疑和不滿，林彪是毛欽定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卻以這種幾近天方夜譚的方式死去，幾乎在所有人（我想，也一定包括周恩來）的心目中摧毀了毛一貫正確的神話，對毛和毛的「繼續革命」大業的衝擊是致命的。直到1976年周、毛相繼逝世，他們之間的關係進入了與先前全然不同的新階段。

即使周恩來從來就不是一個內化的毛主義者，但直至林彪事件發生，他仍保持着對毛的「繼續革命」理念與實踐的某種服膺和遵從。他的行為也表現出一種「雙重關懷」的特徵：既唯領袖馬首是瞻，也以「為人民服務」為目標。林彪之死給周恩來帶來的複雜感受中，有一種應為「兔死狐悲」（這尤其是因為，他和林彪在革命和建設之間關係上理念相近）。但我覺得更要緊的是，它抹去了周內心深處對毛主義（尤其是對毛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還殘存的最後一點敬畏和信奉，成為他對毛和毛主義基本態度的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毛的陰影依然存在，但周對毛——也包括對江青、張春橋等「毛派」——的態度變了。

就在林彪事件發生幾乎同時，從乒乓外交到基辛格、尼克松先後訪華，中美關係解凍。從表面上看，這裏的動因可以歸於中蘇之間反目為仇後成為死敵。但我覺得，幾乎所有的現有討論都忽略的一點是：隨着文革走下坡路、中美緩和的發生，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以「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為中心意象的新中國合法性敘述的內涵發生了變化。自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後，毛和中共給「蘇修」扣上「社會帝國主義」的大帽子，到與林彪事件幾乎同時發生的中美關係解凍，構成「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這一合法性宣示的兩套內在話語（一套強調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想像，另一套則強調中國的崛起與富強）出現了此消彼長的情況。其重心越來越從毛的烏托邦想像游離開去，朝着革命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靠攏。

也在幾乎同時，在周恩來主持下並獲得毛澤東批准，從西方國家進口總值達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技術的「四三計劃」提出並付諸實行。從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和效應來看，這是中國進入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市場」的重要一步。它同後來的「改革開放」不可同日而語，但卻又是「改

革開放」於1970年代後期起步的一個重要前奏。還有一點也極重要，與上述相關：「新中國」的「國際身分」從現存國際體系體制（這仍然由美國及西方資本主義國際佔據主導地位）的「局外人」和挑戰者開始朝着「局內人」轉變。

周恩來作為中美關係解凍最重要的中方操盤人，在國際上聲譽大增。同時，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又在毛澤東未表態的情況下，竭力主張要批評林彪的「極左」。這直接觸動了毛「身後焦慮」的敏感神經，引起毛的警覺。1973年11月，周恩來遇到了他自「反冒進」以來最大的政治生涯危機。毛以周在同基辛格的會談中「犯了嚴重錯誤」為由，給他扣上「右傾、賣國」的帽子，指令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對他進行持續近三週的嚴厲批判。對此，周恩來卻一反常態，採取了他先前從未有過的「軟對抗」態度。自延安整風起，「多做工作、經常檢討」就是周恩來對自己以及在自己手下工作的人們反覆強調的一個基本要求。然而，這次他卻一反遵循了幾十年的這條「規則」，在會上要麼保持沉默，要麼說自己只是「做得不夠」，絕不肯按照「右傾、賣國」的口徑往自己身上潑髒水。

當時，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鄧小平已回到政壇，並按照毛的指示列席了批周會議。他發言時沒有批周「喪權辱國」，而是抓住周對毛的態度，說周的問題癥結是：「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我們在座的所有人都認為，我們對毛主席是可學而不可及的；你內心卻認為，毛主席不只是可學的，而且是可及的。」鄧的發言抓準的，正是毛的「身後焦慮」這個要害，但又不至於會打倒周。在這一點上，周和鄧「心有靈犀一點通」，立即照這個路子做了檢討。毛的眼睛一直盯着鄧，鄧發言後也通過了毛的考察；這之後，毛在一夜之間叫停了這個批周會議。

毛澤東搞的這場「批周」風潮聲勢很猛，卻落得這樣一種有始無終的結局，從中折射出來的不僅是毛、周關係的改變，也涉及到毛與和周所代表的「建制力量」之間的關係。文革中，毛打倒這個、打倒那個，到頭來卻還是沒有鬥過建制力量。而被打倒的那些人，也一個個地被「解放」了出來，周恩來也成為毛既要打，卻又不能打倒、也打不倒的存在。毛澤東即使再有「虎氣」，但以周為代表的建制力量卻像另一隻如來佛的手掌心，是他這個「猴子」無論怎麼折騰也跳不出去的。這是否意味者，即便是毛

澤東也成了他自己創造的革命的「最後的囚徒」?

在周恩來生命的最後幾年，他身患絕症，毛澤東也是——他們兩人是幾乎同時被確診患有不治之症的，並都只有兩年左右的生命預期了。我寫他們這兩年的經歷時，有一種感覺：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誰能夠活過誰」的悄無聲息、心照不宣的生命與生存競爭。周在政治上的縝密心思，幾乎全都用到為「毛之後」的到來做準備上了。對毛，他仍然堅持採取「順守」之法，而絕不做「逆取」之事。他身患重病後，毛對他的檢查和治療態度曖昧，他絕不正面對抗，甚至兩度寫信給毛，以極為卑微的語氣向毛表示，他願意在有生之年寫出一篇對自己歷史上所犯錯誤的「像樣的總結」(當我讀到這些文字時，心中不由得想到，周這麼做針對的正是毛的「身後焦慮」)。但同時，周又敏銳地抓住了毛晚年內心的矛盾和變化，一方面全力支持鄧小平的整頓，並把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歷史問題」的把柄交到鄧手裏，直接影響了鄧對江、張(也包括對毛)的態度，以自己的「鋼鐵工廠」來對付四人幫的「帽子工廠」。另一方面，周又在與毛的最後一次長談中，當面向毛報告，據康生說，江青和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周和康生都是主管情報工作的，這個話，只有周能對毛講)。這一着，決定性地影響了毛對「身後政治佈局」的考慮。周逝世一個月後，毛雖然把鄧小平又打了下去，卻沒有讓一心謀求總理位置的張春橋、而是讓「你辦事、我放心」的華國鋒接任總理。由此看來，周恩來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絕不僅僅是「鉗制」了文革的災難性影響，更重要的是(尤其是到了他們的晚年)他通過「注意鬥爭方式」，沒有「讓大權落到他們(四人幫)手裏」。這一切，恐怕改變了毛之後中國的命運。

十一

我在這些年寫周恩來傳的過程中，感覺他的真實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變得清晰起來。他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但不是一個「謎」。他的人生和政治生涯，確實被籠罩在毛澤東的思想、權力和權威的巨大陰影之下，但我從研讀文獻資料中看到的是，即便如此，他內心深處仍保留着自己的信念、看法和行事理性。

我還會不斷地問自己一個問題：在毛的革命和繼續革命的洶湧大潮中，尤其是在天下大亂的文革歲月裏，對中國和普通中國人來說，究竟是有一個周恩來好，還是沒有一個周恩來好？我對他的研究越是深入就越是感到，在毛時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政治舞台中心有沒有一個周恩來是不一樣的，他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當毛的「繼續革命」在「破字當頭」指引下，不斷將中國的國家、社會以及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帶入困境乃至像大饑荒和文革那樣的大災難時，他雖不可能阻止這種行動，卻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手中的那點權力，取「順守」之法，盡可能地牽制或限制毛肆意妄為的大動作帶來的惡果。當一切走向瘋狂時，在中國權力中心有一個仍能保持理智和理性的周恩來，就顯得尤為重要。

周恩來並非如官史所稱道的那樣是「道德聖人」。在中國革命時代，他和毛共事幾達半個世紀，怎能沒有道德瑕疵和道德污點？這首先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革命涉及的一切悖論中，最根本的是道德悖論。始於烏托邦空想的革命是一個巨大的「道德陷阱」。它將「善」的想像和追求在實踐中推到極致，但同時這也為「惡」乃至「大惡」以「善」的名義泛濫打開了通道。我覺得，周恩來的故事告訴我們：革命，尤其是勝利了的革命，似乎是治療社會頑疾的一服猛藥，它會帶來巨大的效應，但也會產生巨大的副作用，並會留下各種後遺症。它觸及不到的，是同各種頑症聯繫在一起的人性的弱點(尤其是人的可墮失性)。甚至，革命的猛藥本身也往往是「以毒攻毒」，會張揚乃至無限放大人性的弱點——當革命的勝利讓革命者獲得巨大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時，更是如此。結果，治標不治本，到頭來似乎得不償失——頑疾依然存在，只不過變了模樣而已。要想從頭開始，卻做不到了。再搞革命？再來一服猛藥？以「革命」來「告別革命」，其實只是讓「革命」延續乃至得到永生。

隨着20世紀的逝去，「革命」、尤其是左翼激進革命的負面記錄大量湧現，其理念和實踐在人們的反覆檢視及嚴厲批判之下也不斷地被「妖魔化」。這同無數生活在革命時代的人們的慘痛經歷和經驗是分不開的，因而絕對是有道理的。然而，若因此便給革命「蓋棺論定」，不再做追根尋底的進一步探究，卻是對革命的不公，是對千千萬萬曾參與革命、乃至為革命獻身的生命的不公，也是對歷史的不公。我們若要徹底地「告別革命」，

最需要追問的是，革命何以會發生「異化」、走上岔道和自身初衷的反面。

這裏可講的道理千頭萬緒，說到底，恐怕可以歸結為兩點。第一，以「人的解放」為初衷的「改天換地的革命」卻走上人的壓迫和人性泯滅的歧路，同它所面臨的一個幾乎無解的悖論分不開。以毛澤東的革命和「繼續革命」為例，它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革命如何改造「人」? 這涉及到如何消滅「舊人」，以及如何想像並創造「新人」。在現實生活中，「新」「舊」之間卻沒有可以明確劃分的界限，相互之間也沒有不能逾越的鴻溝。在毛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今日座上賓、明日階下囚的現象比比皆是。所謂「新人」與「舊人」之間的身分轉換或重新認定，真是容易得很。然而，「新人」本不存在，從無到有，卻仍需由「舊人」來創造。於是，這又引出了極具諷刺意味的現實：儘管毛的「繼續革命」以挑戰並摧毀「舊文化」為目標，但在設定革命的方法和手段時，卻從未能超越「舊文化」的制約與影響。到頭來，以人的「解放」名義而推動的革命卻帶來了最殘酷的人的壓迫。毛和他的同志們認為，他們正在書寫的是一段將結束一切「歷史」的歷史；但他們本身，卻仍是他們希望終結的歷史的產物。

第二，問題還出在革命所創造的巨大的、再無任何制約與制衡的政治權力。一般來說，比之其他導致政治權力轉換的過程，勝利的革命更容易產生一種缺乏制衡、對於勝利的革命者也缺乏制度約束的政治權力。在中國共產黨革命中，由於「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問題變得更為尖銳。毛的革命和「革命後的革命」，將除了他本人以外的所有人都變成革命的對象，試圖以革命的名義，創造出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王聖合一」的權力結構。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以「革命」的名義行使的絕對的權力，又打着「革心」的道德革命的大旗，則有本事使腐化深入到人的心靈深處，乃至人的靈魂。

若從這樣的視角看問題，我們是否還應想到：對「革命」的批判中還有一個涉及到每一個曾生活在「革命時代」的人的層面。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首先都是中國歷史、文化以及他們所處時代的產物，每一個經歷過中國革命時代的人實際上也是。在後革命時代，尤其是在歷史又處在巨大轉折關頭的今天，當我們試圖反思、批判和超越中國革命時代時，我們是否應當清醒地意識到：我們自己，即便曾是革命的受害者，

其實也是「革命時代」的某種產物。我們所使用的批判武器及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仍是催生了毛、中國革命時代的那些同樣的東西。既然如此，當我們批判革命時是否能切記不要重蹈革命的覆轍？我們是否能認識到，不管我們自以為所追求的價值或目標多麼崇高，其實沒有什麼可以使我們獲得不被權力和周遭環境所侵蝕的「免疫力」。而革命批判本身，恰恰可能會使我們陶醉於一種自我崇高的想像之中，使我們自以為或者具有這種免疫力，或者對這個命題不屑一顧。我們恐怕應認識到，不管我們多麼努力，也做不到徹底「告別革命」。這裏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某一角落，可能仍隱藏着某種導致革命發生的「基因」。說到底，既然我們是革命時代的「產兒」，那麼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不可避免地仍會是革命的囚徒。

今天，中國的革命時代已成過去，然而它巨大的正面與負面的遺產卻遠遠沒有獲得徹底清理。周恩來的故事——乃至20世紀中國「革命時代」的歷史——給人們留下的最大教訓之一，應當是「摧毀」比之「建設」可以遠為淋漓盡致，也遠為容易。尤其是毛統治下中國共產黨革命所遵循的「不破不立」的政治哲學，更使得革命的進程在「破」的領域可謂摧枯拉朽，但在「立」的範疇卻是舉步維艱。然而，「破」字當頭，「立」字並不一定就在其中。而被破了的東西要重新立起來，卻遠不是那麼容易的。不知讀者是否能把上述看法作為讀這本傳記時的參照？

確定周恩來最終的歷史定位，從來就不是我寫這本傳記時為自己定下的目標。在學術層面，我看到的是周恩來已成為如此具有爭議的人物，因此，我從不奢望我所講述的周恩來故事會不引來各方的批評、非議乃至否定。我講述的這個故事，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更何況，周恩來的故事是仍在演進中的中國「漫長的崛起」過程的一部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個故事會怎樣被人們在未來講述，不僅將取決於檔案文獻和其他史料的解密及使用，也將取決於周恩來所留下遺產中的哪部分會被那時的人們銘記和發散。寫到這裏，不由想起了流傳世間的周恩來故事中最有名的一段。在1970年代初的一次會晤中，基辛格詢問周恩來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周的回答是：“It is too early to tell”（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

引言

北京，1976年1月11日，農曆乙卯年臘月十一。這個冬天本來就冷，這一天又冷得出奇，天空佈滿陰霾。

從凌晨起，人們不分男女老幼，開始來到橫貫京城東西、又穿過有着傳奇色彩的天安門廣場的長安街兩旁。下午，聚集在十里長街沿途的人群已達數十萬之眾。三天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達27年之久的周恩來去世，他們到這裏來向他告別。天安門廣場，是每年「五一」、國慶舉行大規模群眾集會的場所；長安街，也見證過無數次群眾性的迎送場景。但這一天，聚集到這條「中國第一大道」兩旁的民眾卻沒有任何官方組織的背景，而是自發前來。他們之所懷，是極為真切的悲痛之心，其中又夾雜着極為真實的憤懣之情。

他們或許並未意識到，自己所經歷的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事後看來，他們所發出的，是預示着20世紀席捲中國的「革命時代」瀕臨終結，歷史大變局將要到來的一個重要信號。

下午，天空飄起雪花。4時多，一列長長的車隊從市中心的北京醫院駛出——周恩來逝世後的這幾天裏，他的遺體便陳放於此，數以千計的人前來瞻仰遺容，向他告別。[1]車隊沿着長安街向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駛去，所到之處，人群都發出一片唏噓哭泣之聲。當載着周恩來遺體的靈車進入人們的眼簾時，許多人頃刻之間迸發出嚎啕大哭，隨着車行，延綿不絕。5時許，一番簡單的儀式過後，周恩來的遺體在八寶山火化。

四天後，周恩來的官方追悼會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與周恩來共事達半個世紀之久，他雖然送了花圈，卻既沒有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也沒有參加追悼會。[2] 在會上致悼詞的，是副總理鄧小平，當時已處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的邊緣。悼詞稱周恩來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對於國際反帝、反殖、反霸的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3]

會後，官方立即宣佈，對於周恩來的悼念活動到此終止。根據周本人的遺囑，他的骨灰沒有保存，而是撒到了中國的山川平原和江河湖海。[4]

然而，悼念周恩來的群眾活動並沒有結束。在遍佈中國各地的城鎮鄉村，人們繼續舉行各種活動，追思「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這些活動往往在或明或暗之間轉變為某種隱晦乃至公開的抗議，矛頭則是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為首，包括激進毛派領導人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四人幫」。因此，隱隱之中，這些活動其實也對「偉大領袖」本人提出了挑戰。

3月25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推進「反擊右傾翻案風」、保衛「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的報道。其中，出現了「黨內那個走資派支持那個還在走的走資派」的可疑字句。[5] 鑒於上海是「四人幫」的政治基地，很多人馬上便聯想到，這是那夥被認為「反周」的極左領導人在背後作祟炮製的一個「政治陰謀」，有意將批判和羞辱的矛頭指向周恩來。隨後，南京發生了學生和市民自發悼念周恩來的集會遊行，並出現了「保衛周恩來」、「打倒陰謀家張春橋」的標語。[6]

4月1日，中共中央電話通知各地黨組織，將南京事件定性為「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扭轉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嚴令各地追查「謠言製造者」和「幕後策劃人」。[7] 然而，上面雖然三令五申，下面仍舊我行我素，以悼念周恩來為名而舉行的各種抗議活動仍在持續和擴展，並無偃旗息鼓之趨勢。

4月初，周恩來逝世三個月後，北京終於出了大事 —— 1976年天安門事件爆發了。清明節來臨之際，人們聚集到了天安門廣場。他們所公開表

達的，是一種普遍存在於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的情緒——一種植根於他們對自己日常生活經驗的深刻不滿，一種對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所導致的殘酷政治環境的強烈反感。他們在刻有周恩來手書碑文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獻上了大量花圈、花籃、輓聯、詩詞和祭文。其中的一首詩，出現了這樣的字句：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王的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8]

上述字裏行間，毛澤東的名字沒有出現。然而，讀着這首詩，人們卻不會不從背負着千古罵名的秦始皇，產生對「偉大領袖」的聯想。廣場上，人們大聲誦讀着這一首以及其他相關詩文，口耳相傳之間，又將諸如此類的說法和想法傳播到京城各處，乃至全國各地。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像這樣的矛頭直指「今上」的大規模群眾性抗議行動還是第一次。

年邁的毛澤東雖已病入膏肓，離「去見馬克思」的時日已經不遠，但他老人家的頭腦仍有清醒之時，立即便意識到了天安門事件「犯上作亂」的「反革命」意涵。他在聽取了擔任中央政治局聯絡員的侄子毛遠新的彙報後，批准了對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民眾實行武力驅散及鎮壓的決定。[9]

4月5日晚9時半，大批軍人、警察和民兵手持棍棒，開進廣場，毆打並驅散留在廣場上的民眾，數十人遭到逮捕。4月6日清晨，廣場已經被清空了，除了大批軍人、民兵以及執勤的公安人員外，只有幾輛清掃車在朝霞的映照下，緩緩地清除着殘留在地面上的血跡。

然而，這一切所帶來的只是一種極為膚淺的「政治穩定」局面，再也不可能重新激發起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對於毛澤東「繼續革命」的內在認同和熱情投入了。即便毛澤東本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認，儘管他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自己身上集中了無上的權威和無限的權力，但他試圖將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加之於中國人心靈的宏大革命計劃，其實已經破產了。

這是中國「革命時代」的葬禮。從這一刻起，中國後革命時代的帷幕拉開了。



圖0.1：1976年4月初，成千上萬普通民眾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
（Top Photo Corporation / Alamy Stock Photo）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自此，中國的社會和國家都發生了極為深刻和廣泛的「去革命化」——在一些關鍵點上，也是「去毛化」——的歷史性變化。從1970年代後期起，隨着鄧小平復出後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改革開放」起步發展。中共領導人逐步採納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半個世紀間，中國經濟經歷了巨大的增長和發展，也見證了中國漫長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社會和人們觀念世界既深廣又持久的改變。[10] 作為這一歷史轉變過程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國家的合法性也陷入了揮之不去的嚴重危機。

上述這一切，也從中國人對於周恩來的記憶以及各方人士對於周恩來的看法中反映出來，並對周恩來和他的歷史遺產提出了挑戰。

曾幾何時，在中國的官方評價、公眾輿論，乃至學術界對周恩來生平及歷史地位的評價上，各方對他作為正面歷史人物應予高度肯定這一點上，似乎存在着一種廣泛的契合，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那些日子裏尤其如此。那時，整個中國似乎都沉浸在對已故周總理的追思和頌揚之中。周恩來的名字同「四人幫」被大肆醜化形成了強烈的對照，

成為中國革命時代正義和進步形象的象徵。在政治建樹和人格上，周恩來被稱之為「聳入雲霄的高山」，「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國家和民族的良心」，「人民和未來的希望」。[11] 在這一背景下，國際知名作家韓素音（她也是一本周恩來傳記的作者）甚至提出，在周恩來的身上「要發現缺點或缺陷」是不可能的，也沒有意義。[12]

這一切的背後，無疑有着來自官方的背書和大力推動——對於周恩來的全面肯定和不遺餘力的歌頌吹捧，不僅是一種對於後毛澤東時代中共政權所面臨的空前的「合法性挑戰」的應對之道，也是由毛欽定的接班人、「英明領袖」華國鋒，以及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領導層為實行他們稱之為「新時期」的戰略與政策的一種動員手段。但與此同時，這裏也確實有着來自民間的巨大原動力。在舉國紀念周恩來的過程中，人們對於周恩來的人格、操守、政治智慧和風範的讚頌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其中所反映出來的情緒是極為複雜的，而最突出也最值得注意的，應是一種揚棄曾由毛澤東主導的中國「革命時代」的強烈願望：對於周恩來的近乎完美的「集體記憶」的塑造及表述，為人們在充滿慘痛經歷與經驗的過去和似乎有着無限希望的未來之間，搭建起一座想像的橋樑。

物換星移，發生在1976年的往事早已成為明日黃花。在周恩來逝世後的五十年間，上述一切一再受到挑戰並不斷遭到「解構」（或至少部分是如此）。「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一個導致中國人反覆對歷史——包括對毛澤東本人以及毛時代的歷史——重新加以審視的過程。其間，周恩來這個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同毛在一起、並一直服務於中國革命及毛的「繼續革命」的關鍵性人物，當然不能不成為重新審視的對象。隨着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許多負面紀錄的披露並進入人們的視野，也隨着人們越來越多地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革命時代（尤其是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共產黨革命本身）的時候，周恩來的形象似乎變得晦暗不明起來。

官方歷史敘述在中國黨和國家的控制下，對於周恩來的評價仍然是完全積極和正面的，把他說成是一位極為傑出的人物、充滿智慧並有着遠大眼光的政治家、世界一流的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以及全心全意投身中國及人類解放事業的無私的革命者。就中國人集體記憶的主流而言，即便各

種疑惑不斷出現，周恩來似乎仍然保持着正面歷史人物的形象，並被當成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崛起的奠基者、見證人和執行者，而為人們（尤其是曾經親身經歷過毛的「革命時代」的人們）所銘記。

與此同時，隨着時間的推移，尤其是隨着中國共產黨革命及毛澤東治下時期大量負面史實的披露，也有越來越多人對於周恩來的「偉人形象」及相關的歷史敘事提出了疑問。在種種質疑的聲音中，不斷有人提出，中國共產黨革命以及革命後所建立的國家曾存在着諸多陰暗面，而周恩來則與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既然如此，甚至有人提出，周本人又怎能不被視為一個基本上應予以否定的歷史人物呢？綜合起來，這些聲音——尤其是其中最強烈的部分——對於周恩來的批判及指控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第一，是對於周恩來（在他們看來）在毛時代所持的一貫追隨毛澤東的政治立場（包括支持給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災難的「大躍進」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始終忠於毛本人的政治態度的批判。第二，是對於周恩來政治上「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以及處理相關問題的態度和方法的質疑。第三，也是最為嚴厲的，是對於周恩來的人格、品質和道德操守的拷問乃至於否定，認為他其實是一個「自私」和「虛偽」的人。[13]

確實，當曾寫過毛澤東傳記的張戎（Jung Chang）和哈利戴（Jon Halliday）這樣的著名作者將毛描繪為希特勒式的惡棍，同時又將中國共產黨革命定義為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時，[14] 人們又怎能想像，在毛澤東的革命和「繼續革命」的過程中始終和他在一起的周恩來，仍然可以被視為一位正面與積極的歷史人物呢？即便是鄧小平，據稱也曾經對周恩來作出過頗耐人尋味的、帶有兩分法的評價。他一方面表示，如果沒有周恩來，則文化大革命可能會演變為一場更大的災難；另一方面又說，如果沒有周恩來，則文化大革命也許不會持續那麼久。[15] 鄧小平是過來人，他的話中意涵，令人深思。

高文謙是一本在中文世界頗有影響力的周恩來傳記作者。他對周的態度和看法的變化，便很能夠說明問題。他出身於一個中共幹部家庭，岳父是長期任周恩來翻譯及助手的浦壽昌。1980年代，他曾任職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一度還擔任過該室周恩來傳記組組長。當時，他曾在一系列論著中，將周恩來描述為有着遠見卓識的領導人，富有獻身精

神和責任感、極為突出的領導才能，以及很高的道德水準。[16]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高文謙離開了中國。根據他自己的說法，那一年發生的事件促成了他思想上的覺醒，並促使他對許多過去想當然的問題重新進行思考。他對周恩來以及整個中國共產黨革命也越來越抱懷疑和批判的態度。於是，在獲得廣泛注意和諸多好評的《晚年周恩來》一書中，他對周恩來的整個政治生涯——尤其是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提出了極為嚴厲的批判，特別對周恩來的為政乃至為人之道（包括道德操守等）提出了尖銳的質疑。[17]

同樣令人深思的，是另一本周恩來傳記的作者余長更的故事。余的本名是冉隆勃，曾長期在中國外交部任職，並是周恩來及中國對外政策的忠實信奉者和執行者。隨着許多中國人、包括外交部的很多人員，對周恩來曾在其中扮演了中心角色的毛時代內外政策的重新探討與思考，余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儘管從總體上看，他似乎仍對周懷有同情之心，但他更覺得自己已不可能堅持過去那種對周不加批判的立場。因此，在他和芭芭拉·巴努茵（Barbara Barnouin）合作寫成的一本周傳記中，他們甚至以極其尖銳的言辭提出，周恩來所「忠於的是堪與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並論的20世紀最殘暴的君主之一」。[18]

周恩來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和他那一代的許多人，何以會走上革命的道路？對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的政治和外交生涯——應當如何看待？他死後何以會引起一個擁有十億人口的大國的舉國哀悼？在之後的五十年間，當人們將他當作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來看待時，對他的基本評價又何以會出現如此深刻的變化，產生如此重大的分歧？要對這些問題做出合理並有深度的回答，不僅需要重新審視周恩來，也不能不帶來對於既產生了周恩來、而周恩來又將自己一生投入其中的中國「革命時代」的反思乃至拷問。

我是毛時代的親歷者和倖存者，在文革中曾有過兩次入獄的經歷。當我在「後毛澤東時代」成為一名歷史學者後，過去三十多年裏，我曾對中國共產黨革命以及中國對外關係——而周恩來則在其中佔有中心地位——做過不少研究。在這本傳記的寫作中，我試圖從批判的視野出發，對周恩

來作為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政治家、國務活動家、外交家，但歸根結柢作為一個人的充滿悖論的生平作出追根尋底式的探求。同時我也看到，在國際學術界（尤其是英文學界）還沒有一本以多種語言、多邊檔案文獻研究為基礎而寫成的、全面記述周恩來一生的傳記。[19] 因此，儘管我自知學識淺薄，仍以近二十年之努力，撰寫了這一本周恩來傳記。

革命不是原罪（revolution is no sin）。[20] 任何革命的發生，都不會是沒有道理的。首先，從根本上看，它一定是產生於舊制度的巨大失敗，產生於生活在舊制度之下的人們從自己日常生活經驗中切身感受到、不經革命便無法擺脫的絕望，也產生於由此導致的、舊制度及舊政權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手段難以避免也無法解決的危機。革命在20世紀席捲中國，更是與中國在近代多難的命運以及充滿悖論的困局、與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尋求激變的決心與行動分不開的。惟其如此，我認為，就其發生的根源和歷史大場景以及多方面、影響深遠的建樹而言，包括共產黨革命在內的20世紀中國歷次革命曾具有巨大的歷史正當性。由此而確定的，則是周恩來作為正面歷史人物的基本地位和形象。說到根本處，在經歷了革命與「革命後革命」年代的疾風驟雨，尤其是經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空前的大浩劫之後，中國這艘「大船」居然能夠不沉，甚至還能夠蹉跎前行，並為長遠的崛起進程開通路徑，原因甚多，但周恩來的作用亦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同時，如同歷史上任何革命（尤其是標榜「改天換地」、「創造新人」的左翼激進革命）一樣，中國革命不僅在發展的過程中有着極為殘酷乃至暴戾的一面，由革命所建立的國家更由於其在理想與現實、目標與手段、表述與實踐、權力與制衡等方面的分離，從一開始便面臨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戰。這一切，更由於中國革命時代產生了毛澤東這樣一個「無法無天」的中心人物，並在完全失去制衡的巨大政治權力的支持下，將「天馬行空」般的烏托邦想像與空前宏大的政治社會改造規劃及超常的群眾動員結合在一起，更使得毛澤東的革命和「繼續革命」成為一種在中國及人類歷史上都未曾有過的將光明與黑暗、希望與絕望、成功與挫折、前行與後退混雜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現象。尤其是，革命未能擺脫歷史上同類事件的俗套，起始於以民智開啟為目標的動員，卻在自身的進程與發展中

(尤其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終結於對民智的全面壓制,真是發人深思,令人嘆息。

由此看來,理解與認識作為歷史人物的周恩來的關鍵,是要將他放到中國的「革命時代」——包括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時代——的宏大及複雜的背景下來加以看待。如果說,周恩來身後所留下的是形形色色的正面與負面混雜在一起的歷史記錄的話,那麼,這主要是因為他是中國「革命時代」的一個中心人物;他的政治與外交生涯,乃至他的人生,都不能不刻上這一時代的深刻烙印,既連接着它巨大和多方面的建樹,又承載着它不堪回首、難以言喻但又必須揚棄的諸多重負。

周恩來作為他所處時代的創造者和參與者,其實首先還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他和他的同志們塑造了革命,也為革命所再造;他們是革命的主角,也是革命的「囚徒」。在他身上和經歷中的種種悖論,根本上也是中國「革命時代」巨大及深刻的困局的折射和反映。在我看來,這應當是記述與探討周恩來一生的基本出發點。本書關於周的敘事及討論,也將循着這一思路而展開。

歸根結柢,我們若要在「後革命時代」告別革命,並使得革命的悲劇不再重演,最重要的恐怕不是簡單地全盤否定革命,而是要釐清革命在何種歷史條件及場景中開始,何以會在20世紀成為時代的主流,卻又何以會走上岔道,尤其是何以會走向自己所宣稱的「人的解放」初衷的反面。同時,從歷史研究和批判的角度來看,何以才能既從根本上肅清革命的負面影響,同時又讓革命諸多的正面遺產得以發揚光大。關於周恩來的探索,應該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有意義的啟示。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宏大及複雜的任務。僅憑這本傳記以及我作為傳記作者的一己之力,絕對無力對上述課題及其中涉及的問題作出任何意義上的「最終的回答」,但本書的討論,畢竟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周恩來的歷史評價問題,因而也會涉及到對於上述問題的探究。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本書是一部旨在「拋磚引玉」的探索之作。

第一部

早 年

第1章

童年

（1898–1910）

淮安，一座歷史悠久的小城，座落於長江以北，中國東部江淮平原的中央。[1] 在這裏，大運河和淮河相交。歷史上，淮安一直是江蘇省商業和貿易活動的一個中心，大批流動人口從這裏經過。很多人因為淮安交通方便，既是地區交通網絡的樞紐，又有着小城市的方便與安寧，而選擇在這裏定居。

1898年3月5日，周恩來出生於淮安城內駙馬巷的一個沒落小文吏的家中。[2] 他是周貽能（又名劭綱）和萬氏（萬冬兒）夫婦的長子，也是淮安周氏家族他這一代的第七個男丁。整個周家都因為他的誕生而充滿喜慶氣氛，周家的長輩們對他期望甚高。於是，家裏除了給他起名「恩來」，還給他起小名為「大鸞」。後來他到了入學的年齡，又獲字號為「翔宇」（意為翱翔在天地之間）。然而，周家的長輩們恐怕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個男孩在長大成人之後，將會成為20世紀中國與世界最為重要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周家並非淮安人氏，而是來自浙江紹興。[3] 周氏根深源長，曾有過顯赫的歷史。據族譜記載，周恩來的先祖或為宋代大學者周敦頤。[4] 恩來與本名為周樹人的20世紀中國大文豪魯迅屬同宗同族，可能有着遠親關係，若論輩份，周恩來應當是魯迅的遠房侄子。[5]

然而，周恩來出生時，家道久已衰落。紹興從來便有着出「師爺」的傳統，周恩來的祖父周起魁（字雲門，又名攀龍）因為外出當師爺的緣故，



圖 1.1：周恩來在江蘇淮安城內駙馬巷的故居。（Liang Zhao / Alamy Stock Photo）

於 19 世紀 60 年代初離開紹興去別處就職，也到過毗鄰浙江的江蘇省。後來，他曾代理過幾個縣的知縣，並做過江蘇省海州直隸州的知州。周家這一支也在 19 世紀 70 年代由紹興遷往淮安。然而，周起魁終其一生從沒有當過州縣級以上的官吏，更沒有獲得過政治上的顯赫聲名。他在周恩來出生幾天後便去世了，所以周恩來對祖父沒有直接的印象。[6] 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的履歷，甚至比他的祖父更不起眼。他既無長才，亦無大抱負，個性上雖有倔強的一面，但絕對算不得強勢或咄咄逼人。一輩子下來，只在縣級或以下的各種機構中當個小職員，賺取一份微薄的收入。同時，和當時中國大多數家庭男人身為一家之長的情況不一樣，他在家裏也從來沒有獲得說了算的地位，更從來沒有當過大家長。[7]

周恩來出生時，周家陰盛陽衰，內外事務都掌控在家裏的女人手中。「大鸞」的兒童時代，是在兩個女人——他的生母和嗣母（也是他的嬸嬸），尤其是後者的關懷照料下度過的。

周恩來的生母姓萬，小名冬兒、九姑，亦出身於一個小文吏家庭，其父（即周恩來的外祖父）萬青選也曾在江蘇省的幾個縣任過知縣。萬氏讀

過幾年書，只算得上粗通文墨，但她為人開朗，頗識大體，辦事能力似乎也很強。她嫁入淮安周家後，很快便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主持者。根據周恩來後來的回憶和敘述，他從母親身上所承繼的是勤奮、處事周到的特質，使他受益終生。[8]

對周恩來影響更大的，似乎是他的嗣母陳氏。他出生後不到半年，恰逢叔父周貽淦身患絕症。叔父無子嗣，根據舊俗，男子若亡故而無後，便為大不孝；但若能有子傳宗，則疾病亦有治癒的希望。於是，在祖母的堅持之下，周恩來被過繼給叔父，並入住叔父家（仍在淮安周家院內，所以周恩來同生母還能經常見面），為叔父「沖喜」。但舊俗並不靈驗，幾個月後，叔父還是病死了。[9]

嗣母暨嬸嬸陳氏，當時僅二十歲出頭。據說，她是虔誠的佛教徒，但從她對恩來的教育來看，她的「信佛」恐怕更是一種生活態度，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信仰。她年輕守寡，「信佛」成為一種精神和心靈的寄託，但這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此岸生活」的延續，實在算不得「彼岸關懷」或「彼岸想像」的追索。作為周恩來的嗣母，她把全部精力和心血放到了他身上。

丈夫過世後，陳氏和恩來的父母一道，遷到萬氏娘家所在的清河縣居住。她還為恩來請了一位乳母蔣氏（又是一個女性長輩），幫助照料他的日常生活。恩來與嗣母的關係極為親密，稱她為「娘」，而稱自己母親萬氏為「乾媽」。[10] 陳氏出身於書香門第，識文斷字。她從恩來幼年時起，便引導他念書。恩來四歲時，嗣母便教他認字；五歲時，又送他進入家塾讀書。在家裏，她親自教恩來誦讀經典。從《三字經》和《千字文》開始，恩來小時讀過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及《詩經》的許多篇章，還喜歡讀小說，如《西遊記》、《水滸》、《紅樓夢》和《三國演義》等等。

陳氏似乎從未讀過佛經等佛教經典，當然也沒有教恩來讀過。年幼的周恩來所受到的教育，是從本質上缺乏宗教元素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為人之道也由此融入了以生活及生命的完善為人生終極目標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儒家的品格。1946年9月，周恩來曾在與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李勃曼（Henry R. Lieberman）的談話中說：「直到今天，我還得感謝母親（娘）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11]



圖 1.2：周恩來出生的房間。（Liang Zhao / Alamy Stock Photo）

周恩來的兩位母親對他的影響最大之處，應在於促使他養成了待人接物時善於察言觀色，處理各種事務時面面俱到的特點，以及具有很強的危機處理的能力。同時，在這種充滿母愛與關切的「女性環境」中長大，是否令周恩來原有的陽剛氣質中多少滲入了某種「陰柔之氣」？是否也在性格上使他缺乏成為最高領袖的魄力及欲望？

周恩來九歲和十歲時，家中突生巨變，生母和嗣母在很短的時間內相繼過世，他從清河回到了淮安的周家老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幾乎在一夜之間長大了。[12]

周家在經濟上入不敷出已有一段時間，兩位母親之死更使得家中陷入債台高築的處境。當時，父親在遠離淮安的湖北謀了一份差使，不僅收入微薄，且很少回家。剛剛十歲出頭的周恩來別無選擇，從一個在母親及乳母的關懷呵護下長大的男孩，變成了「家裏的男人」。他後來提到，當時經常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不斷出入當鋪，典當衣物等以換取家中急需花銷的現錢。以他當時的年齡，這實在是一種尷尬乃至羞辱的經歷。[13] 他不得不常

常看別人的臉色行事，見識了人生的種種世故冷暖。但這樣的經歷，大概也使得他從小就對人生的多面性有了充分的體驗，培養起應對複雜環境以及處世時忍辱負重、面面俱到的能力。

生活雖然艱辛，但恩來並沒有因此中止讀書求學。回到淮安後，在離周家老宅不太遠處，表舅龔蔭蓀(周恩來生母萬氏的表兄)開設了一所家塾，他便到那裏就讀，同學多是他這一輩的表兄弟姐妹。龔蔭蓀本來是一位老派讀書人，但他曾到日本留學(這在當時還是一樁很不平常的事情)，因而受過新思想的影響。除了教授國學經典外，他也不時向學生們介紹關於西方文明的書籍和讀物。在周恩來的記憶中，龔蔭蓀「是我政治上的啟蒙老師」。[14]

回過頭看，周恩來童年所接受的，是有些許新思想浸潤的傳統文化的教育。他不信教，也沒有為自己觀念世界的形成留下宗教意義上的彼岸思索、想像或信仰的空間。他經歷了充滿母愛的孩童歲月之後，又以未及弱冠之齡便開始進入社會，親身體會到現實生活的艱辛複雜，以及從中透露出來的人心和人生的詭異無常。這或許卻為他打開了一扇長大後利用人世間的手段來應對並改造人和社會的門戶。在這一點上，周恩來同毛澤東和許多中共領導人的早年經歷，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

周恩來的童年生活，似乎又為他的個性和待人接物之道留下了兩個重要的印記。第一，這讓他思路縝密，行事靈活，為人有圓滑之處，忍耐功夫好，但在必要時，又表現出百折不撓的韌性。第二，在他的思想深處，童年時代所汲取的中國文化以及先哲的教誨一直有着一席之地。後來，即便在他似乎已經全身心地接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革命哲學之後，這一點亦未完全改變；在他的觀念世界和行事方式中，也依然處處留有那些教誨的痕跡。

正如周恩來後來的言行經歷所顯示，上述特質「奠定」了他充滿挑戰的非凡的人生、政治與外交生涯。這似乎也是他在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這一革命本身便受到了中國威權主義政治文化的深刻滲透)最高領導人的機會面前，總是不願意亦不能夠挺身而出的深層次原因。

第2章

從東北到南開（1910–1917）

一

世事無常。如果1910年的大變動未曾發生，周恩來大概會像他的幾個堂表兄弟姐妹和童年時代的很多朋友一樣，一直在淮安生活下去。1910年的這個變動，首先由表舅龔蔭孫創辦的私塾被抄家封門所引發。不久，龔決定離開淮安，[1] 周恩來失學了。

幾年來，周恩來一直同伯父周貽賡保持通信聯繫。在他父親一輩的四兄弟中（包括那位在周恩來出生後不久便去世的叔父），周貽賡是老大，在事業上比較成功。他和恩來的父親周貽能一樣，一直在各處任職。但比起周貽能，他的工作更穩定一些，同時也得到了周貽能不曾有過的升遷機會。周貽賡沒有孩子，一直將恩來視為己出。當恩來在同伯父的通信中流露出離開淮安、外出求學的想法時，周貽賡在同周貽能和周家其他親戚商量後，決定讓恩來到東北來，跟着他生活和求學。[2]

1910年春，12歲的周恩來離開了淮安。這是他對故鄉的最後告別，他一生再沒有回過淮安。後來，當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後，又一再拒絕了將周家宅院改建為紀念館的各種建議。正如本書以下將要述及的，這裏透露出來的是他即便貴為中國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政治上依然極為謹慎的一面。

此後七年裏，周恩來先是在東北，後來又在中國主要條約口岸之一的天津，跟隨伯父周貽賡生活。這是他一生中極為重要的轉折點，使他

獲得了接受「新式教育」的寶貴機會，也使他接觸到了相對平靜的淮安小城以外的廣大世界。周恩來後來回顧道，從淮安遷到東北的這一變化對他影響極大。否則，他若是蝸居於淮安老家，很可能會一輩子都一事無成。[3]

二

從一開始，遠離故鄉到東北生活與學習的經歷，打開了未及弱冠的周恩來的眼界。他在故鄉以外所看到和體驗到的，是落後的中國面對西方列強和日本的侵略，正處於一派國難深重的環境與氛圍之中。他讀到並學到，1895年，也就是他出生前三年，大清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不僅要向日本支付巨額賠款，還割讓了台灣，並失去了對於朝鮮的宗主權。他出生這一年，中國又發生了以革新教育、經濟和政治為目標的戊戌變法。然而，改革之路並不見容於當時的大環境，僅僅百日之間，變法便告失敗。一度支持變革的慈禧太后在她周圍的死硬派的促動下發動政變，支持變法的光緒皇帝遭到終身軟禁，主張變法的維新人士或慷慨就義（如譚嗣同等「六君子」），或避居海外（如康有為、梁啟超等）。[4] 兩年後，北方京畿地區又發生了義和團的大規模暴亂，隨之而來的是八國聯軍的軍事干預和佔領北京。1901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辛丑條約》，必須支付幾達天文數字的賠款，甚至將事關國家主權和重要收入來源的海關關稅也抵押了出去。

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很難不產生一種強烈的感覺：不僅大清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中國本身也面臨遭到列強分割乃至亡國滅種的危險前景。

周貽賡當時在奉天府（即瀋陽）度支司俸餉科任科員。他雖非富人，但工作穩定，收入尚可。他先是希望在瀋陽為侄兒找一所好學校。但當時正值學年當中，入學不易。而此時，周貽賡的堂兄（也是周恩來的堂伯）周貽謙在瀋陽附近的鐵嶺（又稱銀州）任稅捐局局長，再加上恩來的父親周貽能當時可能也正在鐵嶺。在周貽謙的幫助下，周恩來到鐵嶺入銀崗書院（一所初級小學）讀書。[5]

周恩來在鐵嶺的六個月很快就過去了。1910年10月，他回到瀋陽。這是一個與淮安完全不同的大城市，有着周恩來在故鄉做夢也得不到的教育機會。周貽賡把周恩來送入新建立的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讀書，第二年，辛亥革命發生後，學校改名為東關模範學校。正是在這所學校，周恩來生平第一次接觸到了當時很多人所謂的「新式教育」，除了國文外，還要學習算學、英文、地理、物理、音樂，以及上體育課。[6] 這樣的課程設置，向周恩來展現出之前從未看到或想到過的更為廣大的知識空間。

在東關模範學校中，有兩位教師對周恩來的影響最大。一位是受到進步觀念影響的歷史教師高戈武，另一位是思想舊派的地理教師毛先生。高老師參加了由孫中山領導，以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為目標的同盟會。在他的引導下，周恩來讀了章炳麟和鄒容的著作，而這兩人當時都因思想激進並積極從事反清革命活動而富盛名。鄒容是《革命軍》一書的作者，大膽鼓吹以暴力手段推翻滿清在中國的統治，並進而在中國建設現代共和國，在青年學生及知識分子中極具影響力。他在30歲時英年早逝，更使得他在周恩來這樣的青少年學生眼裏成為烈士乃至傳奇。與高老師比較，毛老師更推崇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著作。康、梁都是1898年戊戌變法的發起者，變法失敗後，他們又竭力要把中國從絕對帝制轉變為君主立憲。在毛老師的影響下，周恩來了解到康、梁關於漸進政治改革的看法。[7]

1911年10月，也就是周恩來到東北的第二年，中國爆發了推翻清朝及千年帝制、建立民國的辛亥革命。在現存的資料裏，我們看不到周恩來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變的直接評論，但卻知道這樣一個細節：儘管當時他還只有13歲，但在獲知革命爆發的消息後，在學校裏帶頭剪去了作為大清臣民象徵的辮子。[8] 這是否可視為一種幾近自發的政治表態？是否可以說，由此而透露出周恩來關心政治的天性，以及帶有時代特徵的、傾向於革命的政治態度？

若比較東北和淮安，前者的氣候遠為寒冷（在冬季更為明顯）；同時，兩地的飲食習俗也大不相同。在淮安，周恩來每餐的主食為大米；但在東北，幾乎每日都必吃高粱米。周恩來後來回顧這段經歷時說，他少年時代在東北度過的這幾年，給了他適應不同的氣候條件以及飲食習俗的機會。而這對他的身體和精神面貌都有好處，使他變得更為健康強壯，也更具有堅韌不拔的意志力。[9]



圖 2.1：周恩來在奉天府（今瀋陽）東關模範學校，1912 年。
（Sovfoto / 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周恩來的學習和閱讀，還同他在東北生活的個人經歷結合在一起，在他身上觸發了某種仍處於朦朧覺醒之中的民族主義意識。瀋陽在 1904 至 1905 年日俄戰爭中曾是戰場，處於日本獲勝後攫取的勢力範圍的中心。周恩來曾訪問當年日俄戰場上的遺址。1912 年 10 月，他在一篇作文中發問：

> 吾人何人，非即負將來國家責任之國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國民之學校耶？聖賢書籍，各種科學，何為為吾深究而悉討？師之口講指畫，友之朝觀夕摩，何為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偉大人物，克負乎國家將來艱巨之責任耶？以將來如許之重負，基礎於小學校三四年中，同學，同學，宜如何奮勉，始對之而不愧哉！

他告誡自己道：「學矣，問矣，思辯矣。」[10] 據周恩來當時的一位同學回憶，在學校的一次修身課上，老師問：「讀書為了什麼？」周恩來回答：「為了中華之崛起！」[11]

要理解周恩來後來的心路軌跡和為人為政之道，不能不記住他和他這一代的許多人對於國家積貧積弱的痛切感受，以及他自弱冠之年起便開始形成的救國志向。

三

如果伯父周貽賡一直在瀋陽工作的話，那麼，周恩來很可能就會跟着他一直待在那裏，也就會繼續在那裏求學讀書了。然而，1913年2月，又一個大變化 —— 一個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比他從淮安到東北更為重要的變化 ——發生了：周貽賡奉調從瀋陽遷往天津，就任天津長蘆鹽運司榷運科科員。[12] 周恩來也隨同伯父，從瀋陽遷往天津。在他的教育和成長中，這是又一件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大事。

天津位於北京以南，距北京約130公里，自19世紀中葉以來，隨着中國與西方國家及日本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便成為中外條約體系下的重要對外通商口岸。這座城市的一個特點是，同開埠後的上海一樣，城市租界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機構主要由外國當局所控制。若與瀋陽比較，天津更具西方色彩，更加商業化，更富大都市的氣派 ——歸根結柢，更接近於現代。對於年青的周恩來來說，這座城市打開了他認識生活與世界的一扇更大的門戶。

周恩來遷到天津後不久，便開始為進入南開學校做準備。他這麼做，實在是不奇怪的。南開建校於1904年（初為敬業中學堂，1907年改名為南開中學堂），由曾任清廷學部侍郎的嚴修（1860–1929）所創辦。嚴修並非常人，他在國學上造詣深厚，又一直希望以西方教育為借鑒，創辦一所新型學校。1905年，他同很多其他學者官員一道，成功地促使清廷終結了在中國已有千年歷史的科舉考試制度。清朝被推翻後，民國政府曾一再邀請嚴修出任高官職務，但都被他婉拒。他的志向，在於集中精力將南開辦成中國現代教育的典範。[13]

嚴修和南開學校董事會很幸運地找到了張伯苓(1876–1951)這個最為理想的人選，出任南開首任校長。張伯苓曾為海軍軍官，1898年清政府被迫將位於山東省的海軍軍港威海衛租借給英國，他親眼目睹了軍港移交的過程。當他看到大清的黃龍旗降下時，恥辱感充斥於心胸之間，當時便決心離開海軍，投身於教育事業來拯救中國。他主張教育應當給學生們傳授新知識、新思想以及新的民族意識。他更身體力行，成為推行這些想法的先行者之一，南開為他提供了將這些想法變為實踐的最好機會。[14] 張伯苓和嚴修一起使南開學校成為那個時代中國教育改革的先驅。

1913年8月，周恩來成功地通過了南開學校的入學考試。從以後的發展來看，在周青少年時代的生活中，入讀南開是最重要的轉變。南開實行四年學制，所以周恩來是1917級的學生。他一進入這所新學校，就喜歡上它了。對他來說，南開的課程設置具有新鮮感和吸引力，包括主、副科兩個部分，主科有國文、英文和數學，副科有物理、化學、中國史地、西方史地、生物、法制、體操等等。[15]

從二年級開始，南開除國文和中國史地以外的所有課程，均使用英文教科書。在理科課程中，學生們還有機會在實驗室中做實驗，而實驗室的設備則是學校從日本進口的。周恩來的強項是國文和數學，同時他對歷史課相當感興趣，成績也很好。與此同時，他還如饑似渴地在其他課程中汲取知識。剛入學時，他在以英語講授的課上遭遇了不小的困難，因此在學習和操練英語上花了大力氣。儘管他似乎從來沒有真正喜歡過英語課，也沒有在這方面獲得過什麼突出的成績，但到後來，至少英語能力已不再是他成為南開最優秀學生的一道障礙了。從二年級起，學校免去了他的學雜費。只有少數南開學生能獲得這一待遇，而他是其中之一。[16]

南開鼓勵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在這方面給了他們很多時間和機會。學校還規定，在週一到週六的課外活動時間，學生一律不得留在教室和宿舍裏，而必須參加體育活動或學生團體的各種活動。[17] 周恩來入南開後不久，就充分利用了學校的這些機會，表現出對各種課外活動的濃厚興趣。

這個時期，諸如報紙之類的新公共傳媒在中國已經越來越普及。周恩來仍然保持着他在東北時養成的習慣，經常讀報，對國內外時事極為關

心。與很多受過教育的同齡人一樣，他在南開就讀的這幾年裏，怎樣才能拯救中國並使之富強起來，或隱或現之間，越來越成為他的人生願景。他閱讀的書籍中，有明末清初大變動時期的大思想家顧炎武、王夫之等的著作。他也對一些西方大家著作的中譯本極感興趣，他的讀書單上有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等等。雖然說，我們很難確切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以及何種意義上受到了這些著作的影響，但他曾讀過這些書這一點本身便表明，他是抱着一種求知若渴的態度來看待形形色色的思想和主張的。[18]

周恩來還是學生社團活動積極的（甚至可以說是充滿熱情的）參與者。二年級時，他和幾位朋友組織了一個「敬業樂群會」。他們把協會的宗旨定為「以智育為主體，而歸宿於道德，聯同學之感情，補教科之不及」。[19] 開始時，這是一個只有20名左右成員的小團體。但漸漸地，它發展為南開最大的學生社團之一，成員人數一度達到了將近300人，幾乎佔南開在學學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周恩來在朋友和同學中的魅力和吸引力，在於他的工作態度極為認真，既謙虛又誠懇，既有能力又講究效率，既能從大處着眼又從小處着手。他先當選為敬業樂群會的智育部部長，後來又成為副會長和會長。[20]

在敬業樂群會積極推動的各項活動中，有一項是話劇表演，得到了嚴修和張伯苓的大力支持，在南開學生中也很受歡迎。這也是周恩來很喜歡的一項活動，並很快便積極地參與進去。給周恩來的很多同學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在一齣名為《一元錢》的戲中反串扮演的女英雄角色。[21]

周恩來扮演女角的行為，會否可能是他的某種特定性傾向的披露？或者如個別論者所指稱，他其實是一個同性戀者？在周恩來南開時期及以後的生活經歷中，沒有任何證據支持他是同性戀者的說法。其實，在他就讀南開時，這所學校還是一所男校，不招女生。當時各種新思潮在青年學生中浸潤傳播，「男女授受不親」的千年陳規受到嚴重衝擊。再加上周氏祖籍浙江紹興，是女子越劇的發源地。周恩來在演劇中反串女角之舉，可以從上述一切中很自然地找到解答的線索。若片面地以諸如此類的事例為據便斷定他為同性戀者，甚至由此無限伸展開去，作為解讀他政治生涯及為人為政之道的基本線索，實在是難以成立的。

多年後，周恩來已成為成熟及卓有成就的政治家、國務活動和外交家，獲得了世界性的聲望和影響。曾在1940年代採訪過他的《紐約時報》記者亨利．李勃曼，在1970年代再次採訪他，之後評論道：「他是一位世界上最偉大的演員。」[22] 任何政治家作為公眾人物，從某種意義上也必須是政治舞台上的演員。然而，被見多識廣的李勃曼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演員」，就不是尋常之事了。周恩來在南開讀書時積極參與話劇表演的經歷，固然可能是他本人內在愛好的表露，但也必定為其「演技」提供了寶貴的操練機會，使得他以後的政治和外交生涯受益匪淺。

四

周恩來在南開讀書的這幾年裏，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以及對外關係繼續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嚴重挑戰。辛亥革命後，清朝雖被推翻，但如何建立一個新共和國卻是一項極其困難（如果不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在北京，建設議會民主的努力並不見容於諸如袁世凱（1912–1916年任中華民國總統）這樣的政治和軍事「大鱷」；在地方上，也常常受到全國各地控制着軍權、財權和政權的不少大大小小的軍閥的漠視和抵制。革命後，幾千年來一直由鄉紳地主階層佔據統治地位的中國社會在結構上幾乎沒有受到觸動。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來說，中國國家與社會究竟將向着何種方面轉變，益發成為一個令他們深感困惑的問題。

如果將中國的國際經歷也納入視野的話，那麼中國人當時的這種困惑便進而轉變為一種深沉的危機意識。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最終站在協約國家一邊參戰。然而，中國人所看到的是，不僅19世紀下半葉列強強加於自己國家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依然存在，帝國主義日本也趁着列強深陷歐戰的機會，以更為咄咄逼人的姿態在中國追求建立排他的勢力範圍，以圖進一步擴大它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在中國攫取的「權益」以及政治和經濟上的統治地位。所有這一切，轉過頭來又不可避免地在中國、尤其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思想中促成了現代民族主義意識的興起。

對周恩來和他的南開同學們來說，又怎能不受到這種民族危機意識以及正在中國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深刻感染？不過，在周恩來就讀南開的

頭兩年裏，儘管他對國際和國內政治感興趣，也為國家的命運感到焦慮，但他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非政治性的。他不僅忙於課業，而且對課外的各種同課業有關或無關、也不一定屬政治範疇的活動，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他每天讀報，有時候也會談到，像他這樣的青年學生若是沒有變革的想法和行動的話，「國事」便難以得到有效處置，國家所面臨的挑戰也難以獲得有效的應對。[23] 他認為，作為學生，最終要能夠「做事於社會，服役於國家，又必賴之以砥柱，倚之為天塹，方能以其所學，供之於世」。[24] 但即便有這些想法，周恩來此時還不是一個革命者。在他入南開後的頭兩年裏，也幾乎從來沒有把國家所面臨的危機同他自己所應當採取的行動聯繫起來。

一個巨大的轉折點，是在周恩來就讀南開的第三年（1915）到來的。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了臭名昭彰的「二十一條」。除了要求中國政府接受日本在東北、山東和長江流域的勢力範圍外，還要求中國政府任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及警察和軍事顧問。這些條件被披露出來後，中國公眾已是民情鼎沸。5月7日，日本又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期接受「二十一條」，更造成了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的民族主義意識的大爆發。

南開教師與學生也不例外。周恩來同許多老師和同學一樣，為日本對中國主權和尊嚴肆無忌憚的踐踏所驚醒並激怒。他從來沒有像此時此刻那樣感受到，中國和中華文明遭受到如此危險的挑戰。吳國楨是周恩來在南開的同學和好友，後來擔任國民政府的一些重要職務（如上海市長和台灣省長）。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他本人和周恩來及其他南開學生在獲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而袁世凱及北京政府於5月9日被迫幾乎全盤接受通牒條件時的情景，做了栩栩如生的描述：

> 在命運攸關的5月8日和9日兩天裏，我們忘記了所有的功課，都在談論日本的最後通牒。大家擦身而過時，都帶着令人沮喪的沉默和羞恥，似乎自身就是國恥的起因。5月9日太陽將要下山時，我記得我正瞧着身旁的李某和周恩來，誰也沒說話。……太陽很快下山了，天也變黑了，在青年人的幻想中，似乎感到某種最不祥的事情將要發生：要麼地球自我毀滅，從而結束一切苦難；要麼奇跡出現，以某種



圖 2.2：周恩來（前排左一）與南開學校老師伉乃如（前排左二）和同學合影，1916 年。（Album / Alamy Stock Photo）

> 未知的方式將這個國家從苦難中拯救出來。那時的心情真是極度痛苦，……那是一種突然而強烈地意識到世界的不公，……那麼我們無疑會甘願走向極端，甚至是集體自殺。[25]

周恩來再也不能把心思完全集中在學習上了。得知「二十一條」的內容後，他在一篇文章中對老師和同學，也對他自己的良知，發出了充滿激情的呼籲：

> 嗚呼！處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髮千鈞之際，東鄰同種，忽逞野心。噩耗傳來，舉國騷然，咸思一戰，以為背城借一之舉，破釜沉舟之計。一種愛國熱誠，似已達於沸點。[26]

像很多同代人一樣，這並不是周恩來第一次憂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但是，他從來沒有像此刻那樣強烈並激憤地感受到，國家和民族已如此接近生死存亡的關頭，而他和他的同學們則負有責任，拯救國家民族於危難之中。

在南開的歲月裏，周恩來第一次採取政治行動。1915年6月6日，他參加了天津各界民眾救國儲金募款大會。儘管還只是一個17歲的少年，但他在這次大會上做了生平第一次可以稱之為「政治鼓動」的演講。他從今日何以「有此之大辱」講起，大聲疾呼道：「我國民之熱血，一是可洗今日之羞也！」因此，若國民「無論貧富貴賤」，人人盡「輸納之天職」，則「國運可以隆盛」。[27]

五

周恩來的上述言論和行動，只是他作為南開學生的經歷走向政治化的開端。這時，他在學校裏已經是一個很多人認識的公眾人物。從那時起，在他上南開的最後兩年裏，他一再向同學們發出呼籲，要他們關注中國的危機已經達到了何等深刻和危險的地步。

1916年10月，周恩來在一次全校演講比賽中進入了決賽。在全校師生面前，他做了一次題為〈中國現時之危機〉的演講，對中國面臨的各種巨大挑戰作出分析。他開宗明義便提出：「中國現時已處於極危險地位，諸君盡知之矣。」中國所面臨的既有內患，又有外禍，危機的性質則「可分為兩層觀：第一屬於事實的，第二屬於精神的」。中國政治體制在辛亥革命後未能走向民主，使他失望；全國各地軍閥突起的現象，令他警覺；而「吾國國民之道德，可謂已達淪喪之極」，更令他深感震驚。與此同時，他還看到外務上「種種驚心動魄之事，均使吾國家入於困難之境」。尤其是，日本固然「地小人少」，「力雖不足，然得寸進寸，得步進步，已陷吾人於危險」。面對如此之危局，應當如何應對？周恩來的答覆似乎不全然以在場的聽眾們為目標，而首先以他自己為對象：「故吾今日之言，願吾最可敬可愛之同學，聞而興雞鳴起舞之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念，……吾茲請以校長之言以終吾篇：『作何事時作何事』」。[28]

周恩來就讀南開的後兩年裏，當他思考如何應對中國社會及政治所面臨的挑戰時，有跡象表明，社會主義思想已開始滲入他的觀念世界。1917年初，在一次短暫訪問北京後，他在一篇文章中記述了「睹社會之腐陋，聞政府之黑暗」，氣憤之極。[29]在南開期間的最後幾篇文章中，他又寫道：

「治人、治於人者，恆常繫諸一人之身，此共和制真諦再是。」他還特別強調：「階級不除，無平等之望。」[30] 這應該是周恩來第一次（或至少是接近第一次）使用「階級」的概念來討論如何應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如果如周恩來上述言論所揭示，他從來便對自己的人生及未來心存理想及願景，那麼，正是在他就讀南開的四年裏，構成了他的世界觀的一些基本要素——尤其是「作事於社會」和「服役於國家」的責任感——在成型的同時亦在他的頭腦中逐步「內化」。在具體的政治傾向上，他仍處於朦朧未清之狀態，也絕對還稱不上是一個激進革命者。然而，就未來人生取向的可能發展而言，南開歲月為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打下了後來成為共產主義革命者的根基。無怪乎，他終生都念念不忘南開是自己的母校。[31]

1917年6月，周恩來以優異成績從南開學校畢業。[32] 此時，他已是胸懷大志，希望為改造中國和世界幹出一番大事業。周恩來寫給同學的臨別贈言是：「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33]

這也成為他——以及他這一代的眾多同齡人——一生的座右銘。

第3章

負笈東瀛
（1917–1919）

一

1917年9月，周恩來在天津登上了東渡日本的輪船。[1] 幾個月來，他一直在考慮從南開中學畢業後的去向問題，並對各種可能的利弊加以比較。他是有選擇的：他可以留在國內，上一所好大學；他也可以像同時代的許多青年學生那樣，去歐洲留學。但經過深思熟慮，他最後決定還是去日本。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他想了解，像日本這樣一個在歷史文化傳統上同中國有相近之處的國家，何以能夠在短短幾十年間便在東亞及世界崛起為一個受到承認的強國。同時，當時中日兩國政府簽有協定，規定中國學生如能夠通過指定日本大學的入學考試，就可以由中國政府支付學費和生活費。[2] 周恩來並非出身富家，如果要去國外學習，這樣的資助對他而言是極重要的。

臨行前，他寫了一首詩，後來曾與幾位友人分享：

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3]

這首詩，被人們普遍認為是周恩來一生中所寫過的詩作中分量最重的之一。這並不僅僅是一首詩，其中所表露出來的是一個年青人為使得生命更有價值、更有意義而渴望走向人生與世界的勃勃雄心。從詩的字裏行間

所透露出來的，是一個初出茅廬，但卻渴望「濟世」、「破壁」的年青人的宏大抱負和志向。從這裏，周恩來走出了邁向南開和中國以外的廣大世界的第一步。

二

然而，儘管周恩來對留學日本有着很高的期許，他在日本的經歷卻並不順利，也鮮有令他心曠神怡的時刻。事實上，他在日本近兩年間所經歷的，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困難、也最充斥着挫折感的一段生活。

他遇到的第一個大挑戰，是如何在短時間內獲得並改善自己的日語能力。對於他來說，這是一種新的體驗。在南開，所有的課程都以中文或英文教授，他因而對日文幾無所知。他到日本後，在幾位南開校友的幫助下在東京落腳，幾乎馬不停蹄地開始補習日文，準備參加大學入學考試。10月間，他進入東京神田區的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習，並在學校附近的一家家具店樓上租了一間小屋居住。

周恩來想要報考的，是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或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這兩所都是日本的著名高校，如獲錄取，就能夠得到官費學習的機會。但要入學，必須先通過考試。他到日本讀書，靠的是來自幾位朋友和親戚為數不多的資助，他清楚地知道家裏(包括曾在東北和天津資助他好幾年的伯父周貽賡)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支付他在日本的學習和生活費用。他若是不能通過大學入學考試而獲得官費助學的資格，是難以繼續在日本學習的。這不僅是一個涉及到自己學習長進的問題，更是一件關係到他能否在日本生存下去的大事。

然而，周恩來所遇到的挑戰卻比他先前的想像要困難得多。他到日本後的頭幾個月裏，學習異常刻苦用功，但日語的進步卻十分緩慢。時間一天天過去，他也益發陷入焦慮之中。在1918年1月11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我心中急的不得了。……我現在唯有將家裏這樣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時時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費，那時候心就安多了。一步一步地向上走，或者也有個報恩的日子。」[4] 然而，要提高日語水平卻並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更何況，周恩來漸漸發現，自己在語言學習上實在

算不上有天賦。儘管他為了學習日文達到日以繼夜的程度，但實現突破卻依然顯得遙遙無期。1月29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我想我現在已經來了四個多月了，日文日語一點兒長進還沒有。眼見着高師考試快到了，要再不加緊用功，不要（説）沒有絲毫（錄）取的望，就是下場的望，恐怕也沒了。」[5]

隨着這一切發展，一種深深的挫折感乃至沮喪感侵入周恩來的心中，甚至使他覺得生活本身也失去了希望和意義。他後來承認，此時此刻的他曾產生一種強烈的衝動，想要就此接受帶有佛教色彩的「無生主義」了。「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繞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不如排棄萬有，走那『無生』的道兒，較着像少事的。」[6]

周恩來在日本期間，從沒有像此刻般感到心靈的孤單和寂寞。自他到日本後，便與同來日本留學的南開校友保持着諸多聯繫，並得到過他們的不少幫助。到了1918年初，他更頻繁、深入地捲進了東京的這個「南開圈子」。[7]這樣做固然幫助他卸去了一些壓力，但同時大概也增加了他心中的不安。這多半是因為他太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把時間和功夫花在日語學習和考試準備上，而不是同他的南開朋友們混在一起、消磨時光。但他所面對的現實生活，又讓他做不到把自己一個人關在屋裏，整日除了學習日文外，其他事情都不做。尤其是這個時候，他對學習日文既沒有產生發自內心的興趣，也看不到明顯的進步。

三

就在這種情況下，1918年2月上旬和中旬的那些天裏，周恩來把日語學習放在一邊，開始讀起同考試準備沒有什麼關係的「閒書」來。一天，他拿起了一本《新青年》雜誌，打開讀了起來，卻再也放不下來。

這本雜誌，當時在中國已是一處知識和政治思想的陣地，推動着新的思想和思維方式的傳播，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等六大主張。[8]《新青年》的編輯、也是創辦者之一的陳獨秀，是北京大學教授，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之一和早

期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早在南開期間就知道有這麼一本雜誌了，甚至還購買並閱讀過幾期。但他當時「因為學校的事情忙」，所以「對於《新青年》雜誌沒有什麼特別的去注意，有時候從書鋪裏買來看過，亦不過過眼雲煙，隨看隨忘的」。[9]

但這一次情況不同了。當他打開《新青年》後，很快便有一種愛不釋手的感覺，完全被其中的想法和觀點吸引住了。尤其是，他「於其中所持排孔、獨身、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10] 心情開始改變了。

早在南開時期，周恩來就有過將來要取「獨身主義」的想法。這幾天，讀了《新青年》後，幾乎在自然而然之間，其中的「獨身」主張引起了他的強烈共鳴，也觸發了他對「戀愛」和「婚姻」之間關係的一些不尋常的思考。在2月9日日記中的「修學」一欄中，他寫下了「自由戀愛無男女，人生何必有妻孥」的字句，並把「婚姻的事」稱為「人生最苦惱的事」。他接着寫道：「人生在世，戀愛是一種事；夫妻又是一種事。戀愛是由情生出來的。不分男女，不分萬物，凡一方面發出情來，那一方能感應的，這就可以算作戀愛。所以馬狗都可以有報恩的事體。」他顯然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獨身主張，又寫道：「至於夫妻，那純粹為組織家庭，傳流人種的關係，才有這個結合。」在這一心境之下，他圍繞着「夫妻」和「戀愛」之間的關係，發了一大段議論：「不過夫妻由戀愛中生出來的，是真夫妻；若隨旁人的撮弄，或是動於一時感情的，這個夫妻實在是沒有什麼大價值。按着這個理推，是戀愛的範圍廣，夫妻的範圍狹。戀愛裏可以有夫妻這一義，夫妻絕不可以包括戀愛的。最可笑現今的人，不懂這戀愛的義理，聽見這兩個字，以為是夫妻中的神聖條件，其實已經是大差了。」[11] 這段話的真義，放到周恩來身上，首先應還是在為他自己「不婚」和「獨身」的選擇張目。在此後幾個月的日記中，他又會不時地回到這個題目，並斷斷續續地寫下了關於「情」、「愛」等的一些「超前」的想法。從這一切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年青人為透徹地解析「婚姻」與「戀愛」之本質的嘗試。尤其是，如果放置到他自南開時就一直堅持獨身的背景下檢視，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在為自己的「不婚」選擇尋找支持的根據。[12]

若從一個更為廣闊的視角，來看待那些日子裏周恩來關於情愛及婚姻的思考，應該可以清晰地發現，這其實是他對於人生意義及做人態度的深

入及廣泛思索的一部分。這一被他後來稱為「大醒悟」的內容，遠遠超出了情愛與婚姻的範疇，而是圍繞着一個意涵深刻的「新」字展開的。他在2月15日至17日的日記中，在總結自己近幾天裏發生的思想突變時寫道：「這個月開月以來，覺得心裏頭安靜了許多。這幾天連着把三卷《新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太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的。」[13]

上述一切，也使得周恩來的情緒以及對生活的態度發生了大的變化。1918年2月11日是農曆新年。他在日記中「乘着今天是元旦，立個在這年內應行的方針」時，為自己設立了三個目標：

> 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14]

2月15日，他在思想上迎來了那個後來被他自己稱為「大領悟」的時刻。除了在那一天的日記寫下了閱讀《新青年》的種種感受外，他在這天和此後幾天的日記中又寫道，「想起我從前所『思』、所『學』、所『行』，實在是一無可取」，到日本後所講的「無生主義」也是「不容易實行」的，而應當「能隨着進化的軌道，去做那最新、最近於大同理想的事情。」他立下的願景是：「我願意自今以後，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去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2月15日這一天長長的日記，是以此結束的：

> 風雪殘留猶未盡，一輪紅日已東升。[15]

兩天後，2月17日，周恩來依然處在「歡愉與興奮」之中。「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將從前一切事體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裏頭非常的快活。『從前的種種譬如昨日死』。我這時候的思想，與這句話一點兒也不錯。」他又寫道：

> 我這時候的喜歡，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還高興十倍。宗教家常說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覺得我這回大領悟，將從前的全棄去了，另闢「新思想」，求「新學問」，做「新事情」，實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樣子了。[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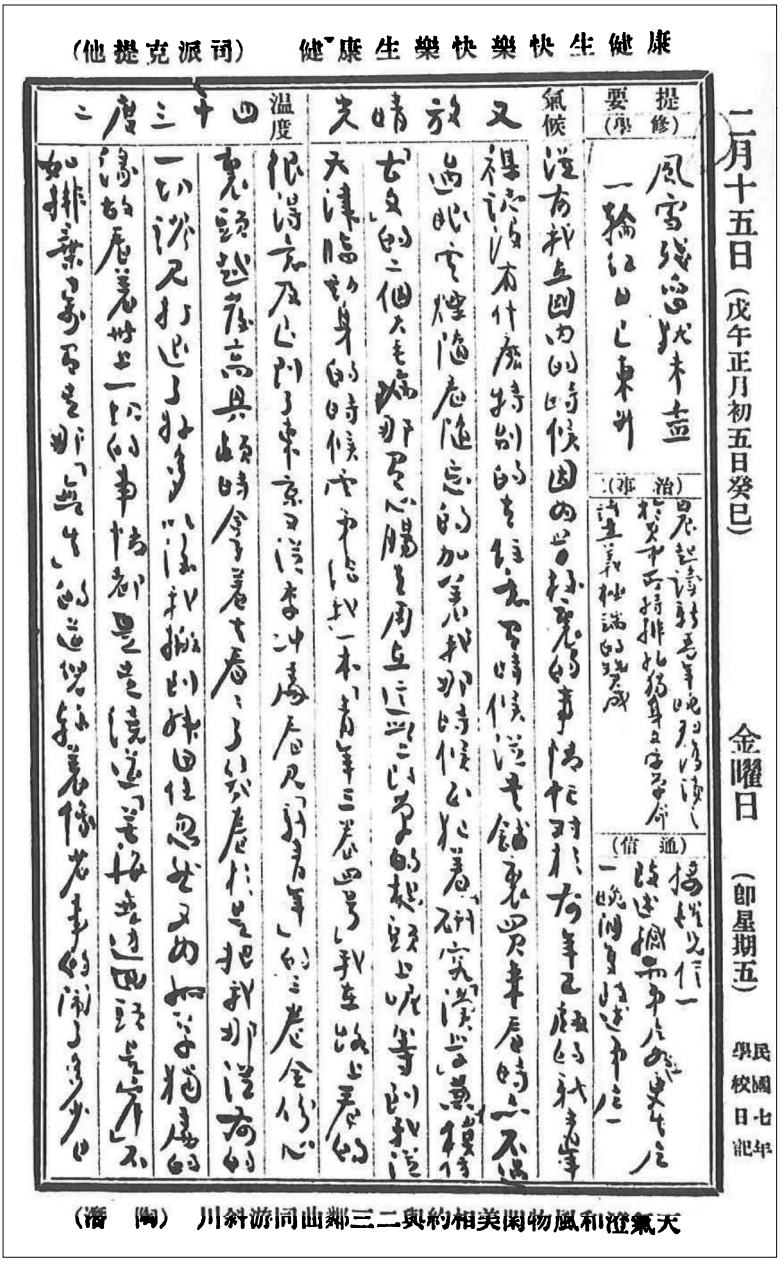


圖 3.1：周恩來日記，1918年2月15日。(《周恩來旅日日記》手稿影印本)

在2月18日的日記中，他仍然沉浸在「大醒悟」的興奮與喜悅中，再一次把自己這幾天的經歷比喻為「重生」和「更生」，並再次反省道，「想起我從前所『思』、所『學』、所『行』，實在是無一可取」，並表示，「我但期望我的『思』、『學』、『行』三者能順着進化的軌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17]

隨着周恩來「大醒悟」經歷的發生，他開始對日本、尤其對日本軍國主義採取了更具批判性的態度。周恩來到日本學習時，儘管對日本在中國的帝國主義野心極為反感，但還是希望把日本當作榜樣，探討如何拯救中國，並使中國走上現代化之路。而在他就讀南開的後兩年，這一點也愈發明顯，日本極富成效的現代化進程仍然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還曾認為，日本的成功有賴於「軍國」及「賢人政治」，而這一點是中國可以也應當向日本學習的。[18]但來到日本後，他看到了日本社會到處都存在着不平等和人群的分化，他覺得有必要重新考慮中國在探索自己的現代化進程時，是否應當走上與日本相同的道路。在他的「大醒悟」中，對日本「軍國」及「賢人政治」又有深入的思考。在2月19日的日記中，他寫道：

> 日本也是行軍國主義的國。軍國主義的第一個條件是「有強權，無公理」的。兩個軍國主義的政策，碰到一塊兒，自然是要比比誰強誰弱了。而且軍國主義必定是擴張領土為最要的事。凡行軍國主義的，必定是擴張領土。個個要擴張。……將來歐戰完後，德意志的軍國主義保怕難保得住了。日本的軍國主義，不知又教誰打呢？「軍國主義」在二十世紀上，我看是絕對不能存留了。我從前所想的「軍國」、「賢人政治」這兩種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現在想想實在是大錯了。[19]

隨着這一切的發生，就在他的「大醒悟」的前後，周恩來也開始重新思考進日本大學學習之事：這是不是深刻理解中日兩國各自現代化道路的的最佳途徑？從更為寬廣的角度來看，這是不是深刻理解人生意義的最好選擇？他沒有放棄日語學習及大學入學考試的準備。這多半是因為，要繼續留在日本並為此獲得家人和朋友的資助，他需要講得通的理由。但與此同時，他已經不再那麼全心全意地把通過考試並進入大學當作頭等大事了。「無處不可以求學問」，他在日記中寫道：

> 人要是把精神放在是處，無處不可以求學問，又何必終日守着課本兒，叫做求學呢？我自從來日本之後，覺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學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舉一動、一切的行事，我們留學的人都應該注意。我每天看報的時刻，總要用一點多鐘。雖說是光陰可貴，然而他們的國情，總是應該知道的。古人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句話實在是謀國的要道。[20]

周恩來還記述了一種「最可怪」的現象：「一班留學生看見同日本人交往的，就罵他漢奸。」他對此大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固然是與日本人打交際的，沒有什麼真只知道拿國家為念的」。他寫道：「若要是先把（同日本人交往）這條路攔住，…… 留學日本也可說是無用了。」[21]

四

自1918年3月4日起一連三天，周恩來參加了早就確定的東京第一高等師範學校的入學考試。結果並不出人意外，他沒有通過。儘管他在學習日文上花了大量的功夫，但蹩腳的日語能力仍然成了他通過大學入學考試的絆腳石。他真是失望到了極點。他在3月10日的日記裏承認，「我自從考完了師範後，心裏頭非常的着急」，同時也暗下決心：「以為七月裏考第一高等，功課若不豫（預）備好了，定然沒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從現在起起首用功，斷然沒有把握。」[22] 他制定了一個新的學習計劃，每天要花13.5小時在準備考試上，只留下3.5小時休息和做「其他事」，睡覺則不超過7小時。[23]

這看上去真是一份認真的計劃。然而，周恩來認真地執行這份計劃的時間卻沒有持續太久。政治又再度侵入了他的生活。此時，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發生後，尤其是在布爾什維克政權於1918年3月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後，東亞國際關係也持續發生變化。日本政府一再催迫中國政府，通過秘密談判簽訂一項表面上以蘇俄為對象的中日共同防禦條約。到4月上旬，中日正舉行秘密談判的消息被洩露，並在媒體上報道出來。許多在日本的中國學生聞訊後大驚失色，將此視為日本在中國再次暴露帝國主義野心——就像幾年前「二十一條」要求的那樣，其目

的是在中國攫取更多的特殊利權。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也極為震驚。他在4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閱英文報，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於中國矣！」然而「我政府尚憒憒，奈何！」[24] 同許多留日學生一樣，周恩來覺得，根本不可能再把心思集中到準備大學入學考試上了。一種極為強烈的衝動促使他把每天複習備考之事置之腦後，而投入到旅日中國學生們的救國活動中去。

進入5月，越來越多的消息表明中日之間簽訂軍事協定的日期迫近，周恩來的焦慮和憤怒也變得愈發強烈。在5月2日的日記中，他寫道：「觀報多時，國事益壞矣。」[25] 在這個關頭，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周恩來準備報考的學校）的中國學生發起終止在日學習、集體返回中國的運動。[26] 周恩來沒有參加到這些學生中去，他在日記中談到各省留日學生討論及「表決歸國」一事時，甚至還記道：「余於斯事持消極反對主義，閉口不言。」[27] 他何以有此態度？這或許是因為他當時還不是在校學生；或許是因為他仍然希望能夠通過日本大學的入學考試，以證明自己的能力，並給留學日本之舉一個交代。或許，在一個更深入的層面，這恰恰也透露出，即便在當時那種人心激憤的群體動員場合，他仍能保持着一份理性思維的政治特質：抗議可以有各種形式，何必一定要回國呢？但在行動上，他仍然積極地投入到留日學生的各種抗議運動中去。整個5月，他的日記中充斥關於中日關係發展的記載。他在5月10日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話：

> 霹靂一聲中日約，亡奴何必更貪生。[28]

儘管中國許多城市都發生了學生及各界民眾的抗議示威活動，但北京政府仍於5月16日同日本簽訂了《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周恩來同許多留日中國學生一樣，義憤填膺（甚至在日記中全文抄錄了協定原文）。5月19日，他參加了由中國留學生組織的「新中學會」，其中很多成員是南開畢業生。這天，他在會上表達自己的「入會意見」時，「說了一大篇話」，透露出他當時的心跡：

> 我們中國所以如此衰落的緣故，全是因為不能圖新，又不能保舊，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發達的原由，是因為民族的變換，地勢的遷移，互相競爭，才能夠一天比一天新。中國的民族是一系的，地

> 位是永據的，所以無進步而趨於保守。文化不進則退，所以舊的也不能保了。……泰東西的文化比較我們的文化，可以說新的太多。……我們來到外洋求真學問，就應該造成一種泰東西的民族樣子，去主宰我們的民族，豈不比着外人強萬倍不止了麼？所以我剛入這會，見着這個「新」字，心裏頭非常着痛快，望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這「新」字，中國才有望呢。[29]

這個時候，周恩來本來應該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準備的，但整個5月，他除了參加抗議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行徑的活動外，幾乎什麼別的事都不做了。

6月上旬，周恩來決心重新拾起3月所訂、已被放下多日的「學習計劃」，試圖全力以赴地投入日文學習和考試準備，這也是他在留日期間最後一次這樣嘗試。我們無法確切地判斷他在多大程度上是按着計劃去做，但我們知道7月上旬，他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考試中，再次名落孫山。

雖然說，這次折戟試場並沒有太出乎周恩來的意外，但這對他來說仍然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他在7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昨前兩日試驗失敗，心中難堪異常。」[30]從中透露的，是這場失敗給他帶來何等巨大的失望。而更使他難以接受的是，同期來日本求學的其他南開畢業生幾乎都通過了大學入學考試，而他作為人們公認的南開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卻一再受挫。這對於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來說，是一個極為沉重的打擊。他甚至在日記中寫道：「不考官立學校，此辱終不可洗！」[31]

但人生的弔詭之處又在於，這個大挫折是不是又促使他重新思考，進入一所日本大學讀書發展，究竟是否適合自己？同時，這是不是也反過來加強了他投入政治活動的意念和決心？

周恩來需要一段休息時間。從7月下旬到9月上旬的五個星期裏，他回中國「度假」。在京、津兩地，他同家人包括父親團聚，也同眾多友人(主要是南開校友)相會。在天津期間，從8月7日至9日，他連續三天回到母校南開，見到了幾位老師和不少昔日的同學。[32]此後他去了北京一週，返津後又幾度再訪母校。從他的日記來看，這段日子他過得相當輕鬆，除探親訪友外，全然沒有關於「國是」之類的討論，也未談及此後的打算和規劃。只是，臨近返回日本時，他得知南開時的好友「慧弟」(即李

福景）已獲香港大學工程學院錄取後，竟「傷心已極」，在日記中「修學」一欄下寫下了「最是傷心此日」的字句。[33] 我們是否可以從中推測，他這趟回國之旅隱含的目的之一，是想看一看國內情形如何，自己應否繼續留在日本，或是應該擇時返國？9月4日，周恩來回到了日本。但從那時起直到次年春天回國，他其實再沒有認真準備過大學入學考試。

五

就在周恩來回國的這段時間裏，日本爆發了「米騷動」。全國許多地方的工人及農民，其中包括不少婦女，都捲入其中。由於米價飛漲，通貨急劇膨脹，農民及低層勞工的收入卻不見增長，政府反而對貪婪及剝削成性的米商予以保護，他們憤而舉行抗議示威，行動有時甚至轉為暴動。此時，周恩來已對存在於日本國家與社會的壓迫及剝削形成了極具批判性的看法。米騷動的發生，進一步促使他對諸如社會主義這些鼓吹激進改造社會的理論給予關注。

周恩來到日本時，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已經發生。他讀報甚勤，當然知道俄國所發生之事，也注意到那裏出現了「過激派」和「赤軍」。在4月23日的日記中，他對此有過記載：

> （俄國）過激派的宗旨最合勞農兩派人的心理，所以勢力一天比一天大。資產階級制度，宗教的約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恐怕要拿俄羅斯作頭一個試驗場了。[34]

但是，當時他的心思更多放在日本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和野心上，並沒有給予俄國和布爾什維克黨以太多的注意，更沒有因此就把俄國的發展和中國未來的改造直接聯繫起來。

周恩來原先曾希望把日本當作探尋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的楷模，但到日本後的幾個月裏，現實已令他對此感到日益失望。米騷動的爆發，更讓他看到了日本社會的深刻矛盾及動盪不安。於是，他又將視線投向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同時也對包括社會主義思想在內的新思潮愈加關注。就在這一過程中，他性格中關切政治的特質開始發酵。



圖 3.2：周恩來（前排左二）在日本京都和南開學校朋友的合影，1919 年 4 月 6 日。（Album / Alamy Stock Photo）

於是，在 1918 年下半年，周恩來閱讀了約翰．里德所著《震撼世界的十天》。這本親歷記，使周恩來對於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奪取政權的情形有了一些了解。他還閱讀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貧乏物語》，以及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1919 年 1 月，在河上肇所辦的《社會問題研究》發刊後，他也馬上便成了這個雜誌的讀者。在這段時間的日記裏，周恩來記道：「二十年華識真理，於今雖晚尚非遲。」[35] 他並未特別說明，這裏的「真理」指的是什麼，或指的是不是社會主義。然而，鑒於他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社會和帝國主義對外政策的尖銳批判，可以說他在日本同社會主義思想的接觸，已為他打開了一條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並不相悖的知識及政治發展的道路。尤其是，他或許已在朦朧中感覺到，這可以為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提供恰當的解決辦法，也是一條值得探討乃至追求的道路。

在這段時間裏，周恩來幾乎已不再花時間在學習日語或準備考試了。1919年3月，當他得知南開學校將要開設大學部並在秋季開學時，馬上就做出了回國的決定。對他來說，這是離開日本的一個很好的理由。當他將要離開時，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當他回想起一年多前東渡的情形時，心中難免失落無奈，自己在日本「浪蕩年餘，忽又以落第返國圖他興」。[36] 但另一方面，當他經過京都時，訪問了附近的嵐山，又顯得心情愉悅，並寫了幾首詩。其中一首，是〈雨中嵐山〉：

雨中二次遊嵐山
兩岸蒼松
夾着幾株櫻
到盡處
突見一山高
流出泉水線如許
繞石照人
瀟瀟雨　霧蒙濃
一線陽光穿雲出

愈見姣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
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見着一點光明
真愈覺姣妍[37]

對於這首詩（以及周恩來在這段時間所寫的另幾首內容相似的詩）的意蘊，究竟應當如何解讀？字裏行間所透露的歡愉之感，可謂躍然紙上。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中國學者，將周在詩中的「一點光明」之句解讀為他已對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心生嚮往。但是，正如本書以下兩章將要討論的，其實直到周到歐洲後的1919年，他仍表示自己「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還要比較探討各種思潮及流派，更還沒有決定究竟應採納何種「主義」。[38] 因此，我們是否可以將周恩來此時表露出的歡愉又理解為，當他對最後能夠體面地離開日本回國，終於鬆了一口氣？

幾天後，周恩來結束了他在日本18個月的「學習生活」，在福岡登上輪船，啟程回國。就周恩來最初入讀日本大學的計劃而言，他的留學東瀛之舉只能說是一場失敗。但是，如果他真的成功進入日本大學就讀，他是否會就此走上一條通過學術途徑「拯救中國」並走向富強的道路呢？這樣的話，他就不會在中國國內政治風雲激盪的時刻回國，並進入到風暴的中心，由此成長為一個具有巨大政治影響的人物了；至少，我們也不會見到後來為人熟悉的周恩來了。

第4章

五四風雲

（1919–1920）

一

1919年4月下旬，正是春暖花開的時節，周恩來回到了天津。南開將要開設大學部，他打算再入南開讀幾年書。

但是，這個計劃很快就會被束之高閣。周恩來回到天津時沒有想到的是，僅在幾天之內，中國現代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五四運動就要爆發。他本人也將在事先並無準備的情況下，近距離捲入這一宏大的政治風暴，並成為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這一經歷，反過來又促使他的政治觀朝着革命民族主義及某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方向轉變，從而進一步打開了他在思想上最終成為共產主義者的大門。正是經過五四風雨的洗練之後，周恩來決定前往歐洲，並將在那裏宣佈自己成為共產主義者，參與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的創建活動。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他在五四運動中的經歷為關鍵的起始點的。

其實，當周恩來從日本回到國內時，諸多跡象已顯示，中國正處於歷史大變動的前夕。整個國家的政治氣氛，尤其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政治情緒，充滿着莫名的緊張。自1月中旬以來，在好幾個月的時間裏，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正在巴黎郊區凡爾賽宮舉行的和會上。像周恩來這樣關心時事及國家命運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人，對於巴黎和會將會為中國做些什麼抱有極大的希望。他們所特別期盼的，是協約國各大國（尤其是

美國）能夠在和會上幫助中國恢復自近代以來開始失去的各種「利權」。說到底，難道中國不也是戰勝國的一員嗎？難道中國在大戰中為協約國一方的勝利所做出的貢獻，不應獲得承認及回報嗎？很多中國人都注意到了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巴黎和會開始時提出的「十四點計劃」。尤其令他們鼓舞的，是威爾遜關於民族自決、民主、保證弱小國家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的主張。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陳獨秀，甚至把威爾遜稱為「世界上第一個好人」。[1]對他們來說，巴黎和會是國際關係中一個新時代將要開啟的標誌，這個時代也將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獲得更為平等的地位。

這種民族主義新意識的勃興，是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裏中國文化知識界深深捲入「新文化運動」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這一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諸如陳獨秀這樣的激進知識分子，以尖銳乃至全盤否定的態度，對中國「舊文化」的種種致命缺陷提出了全面挑戰。[2]從一開始，這種批判同許多激進中國知識分子面對日本對華侵略政策而產生的羞辱感和憤懣結合在一起，不斷升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更是如此。在許多已為激進變革思潮所浸潤的知識青年看來，凡爾賽和會應當幫助中國抵制日本在中國的侵略和擴張野心，而他們也相信和會將會循着這個方向發展。[3]

然而，凡爾賽會議的實際進程卻使得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像周恩來這樣的青年學生，越來越感到困惑及憂慮。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在會上提出了諸如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取消外國軍隊和警察、規範外國郵電服務、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以及讓中國政府決定海關關稅等要求。[4]可是，在巴黎和會上，只有山東問題列入會議的正式議程，而且還是從日本是否將接管德國在這個中國省份的「權益」的角度拿到會上來的。

山東是中國古代聖人孔子的故鄉，長久以來被視為中華文明的聖地。1890年代後期，德國將山東半島變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日本於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時，山東也是日本在中國謀求主導地位的咄咄逼人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反覆提出，中國是戰勝國之一，在山東的權益應完全恢復，但日本卻拒絕

做出讓步。使得整個問題變得更為複雜的是，日本向會議呈遞的「證據」表明，1918年9月東京曾與當時由皖系軍閥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達成秘密協議，段曾同意讓日本在山東獲得「特殊地位」，以換取日本提供兩千萬日元的貸款。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卻並不知道段政權與日本之間有過這麼一宗交易。[5] 隨着東京和倫敦、巴黎及羅馬之間在這一問題的秘密協定的披露——這三個協約國同意「支持日本關於處置德國在山東權益問題上的聲明」——日本的立場進一步得到了加強。[6] 起初，威爾遜總統是同情中國的要求的，並主張否定經由秘密外交所達成的協議的合法性。日本隨之威脅要退出會議，而這將會使得威爾遜創建國際聯盟的計劃受到嚴重損害。威爾遜發現，自己除了在日本的壓力下退讓外，別無選擇。[7] 4月30日，威爾遜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George Clemenceau）一道，接受了日本在接管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上的條件。[8]

當中國在凡爾賽和會上未能收復山東主權這一「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後，早已積聚在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的屈辱感和民族主義情緒，驟然爆發出來。在國內頗有影響力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在一篇社評中指出：「巴黎和會之始，我們多聞所謂的『公正的勝利』、『支持弱小民族的權利』，但是我們得到了什麼？求助他人者是注定要失望的。」[9] 5月4日，三千餘名北京學生走上街頭，舉行遊行示威。當他們路過曾任外交部長、時任交通部長的曹汝霖的住宅時，因認定曹是「出賣」中國利益的負責人，闖入並放火焚燒了曹宅。抗議的浪潮很快又擴展到許多其他城市，使得五四運動成為一種全國現象。

二

學生和公眾的抗議行動在北京爆發時，周恩來剛剛回國不久，也並非身處事件中心的北京，而是在離北京約130公里的天津。然而，他從一開始就對北京事態的發展極為關心，同時也嘗試參加相關的活動。當時，他還不是南開學生，但在5月4日後的一段時間，他幾乎天天以校友的身分去南開學校。[10]

就在這時，周恩來和一向關心並支持自己的南開校長張伯苓發生了第一次嚴重的政治分歧和衝突。在北京學生於5月4日焚燒曹汝霖住宅後，曹躲進了在天津租界的住所。為了改善自己的公眾形象，他先前便已提出，要為南開提供一筆數目不小的捐款。張伯苓意欲接受這一捐款，並準備同意讓曹加入南開校董會。此事被披露出來後，南開學生的反對聲浪高漲，周恩來也對張伯苓的行為大不以為然。他在給南開留日同學的信中，對張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南開的事體，……現在我從各方面看，我說一句，實在是危險的很。校長也許別有肺腑，不過我總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長的人，都這樣說。」周還對張伯苓在南開成為大學後，在基本問題上「迷失方向」表示了失望和不滿。在他看來，南開要做的事，應是「為新」，而不是「要接近賣國賊，從着他搶政府裏的錢，人民的錢，實在是羞恥極了」。他還提出，張伯苓「總是拿中國式的政治手腕辦教育，……天天講Democracy，可是樣樣事武斷，鬧的人心都離體了」。他認為，「『新』的一線生機僅僅在於學生」。[11] 然而，張伯苓卻不為所動，依然我行我素。他有他的道理，做法也許不合時宜，但他卻覺得這樣做是為了南開這所學校——這是師生們最後的家園。但周恩來卻已經難以體察到老校長的這番苦心了。

正是懷着應該由學生們採取行動來拯救南開——從更廣大的意義上說，也是拯救中國——的信念，周恩來希望參加天津的學生運動。5月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由周恩來在南開時期的好友馬駿出任副主席。由於周恩來還未入學南開，他沒有正式參加聯合會，但仍然參加了一些相關活動。5月17日，當一批南開校友以及敬業樂群會的成員集會討論政治問題時，周恩來便出席了。[12]

就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建立的幾乎同時，一批激進的女學生也建立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在它的創會會員中，有一位生於1904年2月、當時年方15歲的小姑娘，名叫鄧穎超。她出身於廣西省的一個清朝官吏的家庭。父親死後，她隨同行醫並在學校教書的母親來到天津，後來又在天津住了下來。五四運動爆發時，她是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雖然她年紀還小，卻對參加政治及愛國活動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她被推舉為同志會的執行理事以及演講隊隊長。此時，她和周恩來並不認識，他們是後來才相識的。她將和周恩來結婚，成為他的妻子。[13]

三

從5月下旬到6月下旬，若以「政治參與」為坐標，周恩來實在還算不上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在目前資料中，幾乎看不到周恩來曾參加過天津學生聯合會或其他組織的任何活動。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周恩來當時還不是南開的正式學生。第二，另一種可能是，他在這段時間裏常常不在天津。[14]

6月下旬，天津學生聯合會決定出版《天津學生聯合會報》。這是一份日刊。聯合會的領導人中有兩位與周恩來相識，一位是周恩來的好友馬駿，另一位是諶志篤。他們仍然記得周恩來曾是南開學校《敬業》和《校風》雜誌的編輯，並寫得一手好文章。於是，他們決定邀請他出任《會報》的編輯。「我願與大家共同努力，負些責任是義不容辭的」，周當即答應下來。他同時向馬、諶二人表示，他一定要讓《會報》的出版幫助「學生愛國運動能堅持下去」。[15] 周恩來立即便着手準備《會報》的出版發行。

7月12日，周恩來在《南開日刊》上先行發表了一篇題為〈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發刊旨趣〉的文章，就他對會報宗旨的看法做了介紹：「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為主旨」，「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16] 九天後，《會報》發刊了。在創刊號上，《會報》的宗旨再次明確為「革心」和「革新」，發表了周恩來寫的題為〈革心！革新！〉的發刊詞。[17] 為什麼要「革心」和「革新」？兩者之間又有什麼關係？這種帶有烏托邦性質的想像，其實是當時在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極為普遍的目標和看法。這裏涉及的，是大思潮和大行動之間的關係：若不實現文化乃至人心的改造，便無從實現對國家與社會的變革與改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那個時代，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很多年青人最終選擇走上由共產主義指導的激進革命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思想出發點。

周恩來出任編輯後，《會報》迅速成長為一個在天津影響力甚大的政論園地，甚至在全國亦有影響。報紙剛開始發行時，每天的印數是五千份上下，很快便增加到近兩萬份。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這都是一個不小的成就。周恩來身為報紙的編輯，極為關注國內外政治問題，並對山東問題做了集中報道。

1919年7月，差不多在《會報》發刊的同時，駐紮在濟南和青島這兩個山東城市的日本軍隊毆打並逮捕了幾個中國人。8月上旬，當濟南民眾在省政府前舉行示威，抗議日本軍隊的暴行時，山東省防司令馬良下令士兵向示威民眾開槍，造成三人死亡。[18] 當這一暴行的消息傳到天津時，周恩來和他的同學們頓時怒火中燒。「國民啊！國民啊！黑暗勢力『排山倒海』的來了。……要有預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國民自覺！國民自覺！」[19] 這是周恩來在8月6日出版的《會報》社評中發出的呼籲。8月23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派出一個十人代表團赴京，會同北京各校及中國其他地區的代表前往總統府，抗議山東暴行並要求懲處馬良。然而，代表們卻遭到了軍警的毆打及逮捕，《會報》立即就此事出版號外。三天後，京津學生兩千多人在北京舉行抗議集會，擔任集會總指揮的是馬駿。經三天對峙後，政府派出軍警驅散學生，馬駿及另幾人遭到逮捕。周恩來立即與幾百名天津學生一道趕往北京，在總統府前露宿示威請願。8月30日，被捕學生獲得釋放。[20]

四

9月2日，周恩來和六位朋友在從北京坐火車返回天津途中，開了一個小會。一個名叫張若名的女生提出，男女學生應當打破他們之間的「封建藩籬」，共同參加政治活動。周恩來隨即建議建立一個結構上更為緊密的新組織，把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活動結合起來。其他人都熱烈支持這一想法。[21]

周恩來和他的朋友們回到天津兩週後，「覺悟社」於9月16日正式成立。周恩來被推舉擔任成立會議的主持人，同時負責編輯出版《覺悟》雜誌。就像《會報》那樣，周恩來在由他起草的〈覺悟的宣言〉中，把覺悟社的宗旨定為「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和『自決』」。他還提出，所謂「覺悟」就是「凡是不合於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為他應該剷除應該改革的」。[22]

周恩來何以在覺悟社宣言中提出「革新」和「革心」的口號？何以會提出將社會及生活的改造同心靈的改造聯接起來？從這裏是否可以看出，他童年時代追隨嗣母讀書時，無影無痕之間便已在他心中留下的彼岸目標可以通過此岸手段來達到的思想傾向的影響？若檢視周恩來在南開期間的讀書單，最有可能觸發此種想法的，應當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我們沒有看到周恩來閱讀盧梭著作後留下的筆記或其他記載。但從思想的相通性來看，我們是否可以發現他那形成中的世界觀與盧梭思想的某種聯繫？再聯想到，當他親身經歷了中共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後、會見基辛格時說，要評價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地位還為時過早；這是不是他在半個世紀後，對自己青年時代「革心」、「革新」的初心及人生願景的反思？或者說，這是否也含蓄地透露了他對於自己畢生參與的中共革命的歷史定位的深深擔憂？

從某種意義上說，覺悟社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兄弟會」或「姐妹會」，或兩者之結合。在二十位創會會員中，十位是男生，十位是女生。為了表明大家的團結和相互之間的平等，所有成員都相互視為兄弟姐妹，也不以姓名相稱。通過抽籤的方式，每個人都獲得了從一號到五十號之間的一個號碼，以其諧音作為名字。周恩來抽到五號，其諧音「伍豪」便成為他在社裏使用的名字。後來，這也成為周恩來眾多化名中的一個。

抽到一號的，是一位年僅15歲的女孩，她取其諧音，在社裏起名為「逸豪」。她就是前面已經提及的鄧穎超。這也是她和周恩來之間後來關係親密的起點，從覺悟社時期開始，伍豪和逸豪相互便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走到生命的盡頭，他們仍將對方視為最親密可靠的戰友。

此時，周恩來已經被新成立的南開大學正式錄取，成為南開文科部的第一期新生。但與此同時，周恩來也已深深地、熱烈地捲入了愛國政治活動，很難再將心思集中到功課學習上來。就在他入南開大學後不久，天津警察廳指責《會報》「於公共安全秩序顯有妨害」，下令要其停刊。[23] 作為該報編輯，周恩來和其他同學一道，決定不服從這一命令。9月22日，報紙出版中斷。在周和他的同志們一再努力下，於10月7日恢復出版。報紙的內容仍然集中在重要的政治問題上，尤其是同山東問題有關的新聞。周恩

來以《會報》編輯和《覺悟社》聯絡人的身分參加了許多活動，並基於親身經驗和感受，寫了不少文章。

10月1日，來自天津的學生代表，與來自上海、山東等其他四地的代表一道來到北京，準備向總統府遞交請願書。周恩來也隨同前來，擔任代表間的聯絡工作。他們要求政府在山東問題上採取更為堅決的態度，並懲治「漢奸」馬良。所有請願代表均遭到逮捕，並被關押了一星期。[24]

學生們被激怒了。為了抗議政府的舉動，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代表經商量後，決定於10月10日在各城市舉行抗議集會。在天津，據稱有四萬至五萬學生及市民在南開校園集會。周恩來也參加了這次集會，並作為學生代表向天津警察廳廳長提出質詢。[25]

11月16日，在福建省省會福州市的一次抵制日貨的集會上，日本領事館衛兵和日本僑民打傷了多名中國學生，並打死一名警察。「福州慘案」發生後，全國各地民情激憤。在天津，學生及各界十餘萬人於12月20日在南開校園舉行抗議大會，聲討日本的帝國主義強盜行徑。[26]集會後，天津學聯組成糾察隊，到各商舖檢查並要求將所有日貨下架。

1920年1月初，直隸省長下令各學校立即提前放寒假，所有學生不得滯留校內，必須回家。張伯苓當時已出任南開大學校長，表示支持這一決定並關閉了南開校園。周恩來和覺悟社的幾位好友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儘管他們對張伯苓本人仍有些許尊敬，但他們還是決定反對提前放假。[27]

1月23日，一批天津青年學生在檢查日貨時，在魁發成洋貨莊的貨架上發現日貨。據報，店主招徠了三個日本浪人，動手並打傷了學生。周恩來和學生聯合會理事會的其他成員得知此事後決定，不僅要繼續抗議，還要進一步擴大行動。當學生們在市政廳前進行抗議集會時，市政當局出動軍警驅趕並鎮壓學生，共有20名學生被捕。[28]

六天後，由周恩來任總指揮，約五、六千名天津各校學生在直隸省公署前示威請願，抗議當局對「日人在華暴行的妥協態度」，並要求省政府促請北京政府達成對福州慘案的「合理解決」。周恩來等四名學生被推舉為代表，不顧軍警阻攔強行進入省公署，要求面見省長，結果遭當局拘捕。[29]接着，周恩來被南開大學正式除名。[30]

五

這是周恩來一生中唯一一次坐牢經歷。監獄生活向來是造就革命者的學校，這對於周恩來來說更是如此。他和難友們先是被關入天津警察廳拘留所，後來又移到天津地方檢察廳看守所。他們身為囚徒，行動自然受到了限制。然而，除了最初幾天外，若以中國監獄的標準，兩處的環境對他們來說實在算不上太過嚴厲。特別是在地方檢察廳看守所，經他們向獄方提出唇槍舌劍的申訴乃至絕食鬥爭後，他們不僅可以閱讀報紙、雜誌和書籍，而除兩名女生另居外，還可以大家同在一處。這樣，周恩來便把繫獄的這幾個月變成了一段拉長的「讀書週期」。他的閱讀相當廣泛，涉及各種思潮。難友們都是學生，他們便組織起了讀書會，交流讀書心得，又就他們讀過的書舉辦討論會，討論「各種社會問題」，並介紹各種新思潮。[31] 他們還年青，都為當局對自己的處置感到憤怒。他們早已深深地相信，在政治上和道義上，自己是對的，而當局是錯的，激進的情緒和思想很容易地便在這段時間裏進一步蔓延成長。他們討論的一個主題（其實也是結論）是：「今後的目的，注重在社會的根本改造」。[32]

周恩來也主持了好幾個討論會，並就他被視為「專家」的一些題目做了講座。他選擇的講座題目集中在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上，包括唯物史觀、「階級競爭史」和馬克思的「餘工餘值說」（亦即「剩餘價值說」）。[33] 當然，這一切並不必意味着周恩來已經成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但至少表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是越來越強烈了。

在被關押的日子裏，他們一直不乏來自公眾輿論、媒體和各校學生的支持。他們的案件也益發在當局眼裏成為「燙手山芋」，因而拼命想找到一個保留面子的方法把它處理掉。從7月6日開始，此案在座無虛席的天津地方審判庭開庭。主審法官知道，他們所面對的公眾輿論都一邊倒地支持被告。如果對周恩來他們的判決過重的話，天津學生聯合會也計劃舉行「先前未曾有過的大規模抗議」。審判持續了十天，7月16日，法官們判決周恩來所犯為「騷擾罪」，他和其他十名男被告每人被判監禁兩個月；兩名女被告則被罰了60塊大洋，沒有刑期。因為周恩來他們的繫獄時間超過被判的刑期，他們在獄中已待了六個月，在宣判後都被立即釋放。[34]

當周恩來和他的難友們走出監獄時，受到了各種背景的大批民眾熱烈歡迎。周恩來自己也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觀念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後來回憶道：「這個時期，我的思想已從贊成革命而走向社會主義。」[35] 比之過去任何時候，他的思想更清晰地透露出一種通過革命手段來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傾向。他所要做的是將自己仍多少處於混沌狀態的革命理念付諸行動，並在行動中進一步澄清並認識自己的革命理念。在這樣的心境下，周恩來做了另一個重要的決定：他準備去歐洲留學，以便「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36]

第5章

歐洲歲月（1920–1924）

一

2009年仲夏，我坐在巴黎意大利廣場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喝着咖啡，久久不願離去。眼前是一條叫做戈德弗魯瓦（rue Godefroy）的小街。這條街的17號，是一間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旅館。我的目光一直打量着它的門和窗戶，而我的思緒卻在久遠的過去和當下之間遨遊。那一年夏天，我在巴黎政治學院當客座教授，幾次到這條街來，為的就是要看看這所房子。之後幾乎每次到巴黎，我都會到這裏走一趟。一個世紀前，周恩來在法國的一年多裏，就住在這個旅館三樓的一個小房間裏，從事革命活動。

周恩來對歐洲感興趣，已有時日。甚至在他1917年去日本留學前，就想到去歐洲的可能性。在五四運動的日子裏，他越來越被諸如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類的激進思潮所吸引，而歐洲正是這些思潮的發源地。1920年6月，他在獄中時寫了一首詩，書贈一位即將赴歐洲留學的朋友，其中寫道：

三月後，
馬賽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1]

詩的字裏行間所深深透露出來的，是周恩來自己對於法國、巴黎和馬賽的強烈嚮往。他出獄後不久，當一個去歐洲學習的機會出現在面前時，他馬上就抓住了。這次機會，又是南開給他帶來的。南開創始人嚴修歷來對周恩來頗為器重，此時拿出七千塊大洋，創立了「范孫獎學金」，並特地規定，以周恩來和李福景這兩位南開最優秀的畢業生為首兩名獲獎者。他們將從嚴修的基金會定期收到經濟上的津貼，用於支付大部分的學雜費用。[2] 李福景是周恩來的好友，他的主要興趣在於科學，後來成了一位科學家。至於周恩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留歐之「主要意旨」在於「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3]

周恩來曾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編輯的經歷，也引起了《益世報》的注意。這是一份有着天主教會背景，在天津出版卻又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報紙。當《益世報》得知周恩來將赴歐洲學習時，便延聘他擔任該報歐洲特約記者。周恩來因此有了另一個收入來源。[4]

從經濟上來看，周恩來在歐洲的處境同他在日本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擁有更多及相對穩定的收入來支付生活費用。同時，學習語言或通過大學入學考試將不會成為他在歐洲生活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在決定要做些什麼時，也將獲得更大的行動自由。

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在上海登上法國郵輪「波爾多號」(*Porthos*)。不知出於何種原因，他所持護照使用的名字並不是周恩來，而是約翰·奈特(John Knight)。[5] 船先後在西貢、新加坡、科倫坡以及印度洋和地中海的幾個港口靠岸停留。他途中發現，「一出國門，中華民族受人歧視欺侮，國際地位甚為低落，極感憤慨」。但他並未因此便一味指責他人，而是覺得：要緊的是要「認識積弱不振的中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能坐視」。[6] 在船上，他還完成了《檢廳日錄》，詳述自己在獄中的經歷。這篇日誌後來在《新民意報》上刊載，然後又以單行本出版。[7]

二

經過一個多月的海上航程，周恩來於12月13日到達法國南部港口馬賽，然後又來到巴黎。根據他原先的計劃，只準備在巴黎稍作停留後便轉

赴目的地英國。但他在巴黎得了一場病，耽擱了三個星期。最後，他於1921年1月5日來到英國首都倫敦，準備入讀愛丁堡大學。[8]

到歐洲前，周恩來便曾致信愛丁堡大學，要求免考錄取。到歐洲後，他再次就此事去信大學。回音很快就來了，他在南開學校的學歷及已修課程獲得承認，只要再通過英語考試，就可以免去各項專業考試進入愛丁堡大學學習。[9]周恩來在南開讀書時，曾有四年時間以英語上課，所以通過英語考試對他來說應該不難做到。同時，愛丁堡大學要到秋季才開學，他也要到那時才需考英語。這麼一來，入學準備的壓力又進一步減輕了。[10]

這時正值一次大戰之後，英國面臨着嚴重的社會不穩、經濟困難以及政治動盪。作為《益世報》特約記者，周恩來的任務就是根據對重要時事的近距離觀察，寫出時評在報上發表。像在日本時一樣，他也把自己在歐洲（尤其是在英國）的經歷當作接受教育的機會。他希望通過住在倫敦，作「社會實況之考查」。「倫敦為世界最大都城」，他寫道，「在倫敦念書，非僅入課堂聽講而已，市中凡百現象固皆為所應研究之科目也。」[11]

從2月初起，周恩來開始在《益世報》發表「倫敦通信」系列。在2月1日見報的第一篇報道中，他談到了「吾人初旅歐土」後大吃一驚的「第一印象」。「感觸於吾人眼簾者」，他寫道，「即大戰後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原因何在？周認為，在於「生產力之缺乏，經濟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種種，均足以使社會上一般人民饑寒失業交困於內外」。此外，「復益以戰爭中精神文明所得間接之損失，社會之現狀遂乃因之以不安」。報道近結尾處，周恩來又做了一個大膽的警示：如果「歐洲危機終不可免而至於爆發也，則社會革命潮流東向，吾國又何能免」？[12]

在這篇報道中，周恩來並未使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然而，他在一封私信中提到，「物價高貴，失業者多，勞資階級之爭無或已時，是歐洲執政者所最苦耳」。[13]儘管周恩來在這裏討論了「社會革命」的前景並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但此刻他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共產黨人。他還要對各種「主義」加以比較，從而也深入探究他自己應有何種信仰。1月30日，他給童年時代與他關係密切的表兄陳式周寫了一封長信，其中坦陳他來歐洲的「主要意旨」：

> 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至若一定主義，固非今日以弟之淺學所敢認定者也。

他在信中比較了英、俄的變革道路之間的差異。兩者一為「保守」，一為「暴動」，孰優孰劣？何者更適合於中國？周恩來雖表現出對俄國道路的推崇，卻並沒有因此完全排斥英國道路。對此，他結合中國之國情和環境，有一番深入的思辨及分析：

> 穩之極，為保守；躁之極，為暴動。然世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動成功者，如今日之蘇維埃俄羅斯也。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態，而求漸進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動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舊弊之效。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14]

然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真的可以在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中求得「中和」之道嗎？對此，周恩來看來是明白的。經過如此細緻的比較及辨析後，他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至實行之時，奮進之力，則弟終以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會之麻木不仁，『驚駭物議』，雖易失敗，然必於此中乃能求振發，是又弟所深信者也。」說到底，在內心深處，他已是傾向於取「暴動」與革命之途了。[15]

周恩來在倫敦逗留既久，也益發感受到英國的生活費用實在是太高了。他在給嚴修和陳式周的信中，不斷提到這一點。在一封信中，他還請求嚴修幫忙，爭取獲得極難得到的政府獎學金。[16] 此時，離他進入愛丁堡大學的時間還有八個月。2月中旬，他決定先離開倫敦，返回生活費用要低得多的巴黎。[17] 這一走之後，除短訪外，他再沒有回到英國來。

三

其實，經濟上的考慮並不一定是周恩來決定離開倫敦的唯一原因。周恩來此時回巴黎，或許是因為他在天津時的兩位朋友——張申府和劉清揚

夫婦——從元旦時起，便已經來到了巴黎。[18] 劉清揚是覺悟社的成員，也是周恩來的好友。周恩來通過劉認識了張申府。張比周年長五歲，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也是受到陳獨秀和李大釗信任的好友。當他來到歐洲時，同陳、李兩人一樣，已經是一位自認的共產主義者，並與陳、李兩人商量過在中國建立共產黨之事。[19] 從表面上看，張申府到法國是為了在里昂中法大學擔任一個報酬豐厚的講師職位（月薪800法郎）。但實際上，按他自己的說法，他還承擔了另一項重要的秘密使命——陳獨秀以對他的「完全信任」，要他在巴黎為將要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吸納黨員。[20]

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張申府是一位頗富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對於共產主義的興趣乃至信仰是極為真實的，但他又天真地希望把共產主義理論同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哲學和孔子的思想結合起來（張申府曾見到過羅素，並對他極為讚賞）。[21] 周恩來曾把張申府當作知識上和政治上的老師。當他從倫敦回到巴黎時，張申府已說服妻子劉清揚加入他在歐洲建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此後，在1921年春天，由張、劉兩人介紹，周恩來也加入了這個小組。[22] 很多年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正式承認「周恩來同志於1921年春在巴黎入黨」——儘管中國共產黨本身要到幾個月以後才成立。[23]

從任何意義上來說，周恩來的這一「入黨」的過程都極不正式，也未按什麼章程辦事。根據張申府的說法，周恩來加入小組時沒有書面材料，沒有入黨宣誓，也沒有正式的程序。事後，只是由張申府給陳獨秀寫了一個條子，在陳獨秀那裏報備了一下。對張申府來說，他讓周恩來加入的，是一個「有共同興趣和想法的朋友之間的小圈子」，這個圈子後來一直很小。除了張申府、劉清揚和周恩來外，還有另兩位成員趙世炎和陳公培。這兩人也都是張申府的朋友，在周恩來之後加入了小組。[24]

在這以後的幾個月裏，周恩來的行動怎麼看也不像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一段時間，他在巴黎郊區上過一個法語補習班。後來，他和國內來的四名工讀生一起，搬到了法國中部的小城布盧瓦（Blois）。除了上過幾堂法語課外，他沒有進過任何學校。實際上，與他在日本時的情況不一樣，他在法國也沒有嘗試考入任何大學或學院。自1921年2月後，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仍考慮或爭取進入愛丁堡大學學習。他似乎也沒有在工廠做過

工，全部時間都花在為《益世報》擔任特約記者寫稿，考查社會實況。與此同時，他看來還在繼續着關於「主義」的深沉思考和探討。

從1921年2月到1922年3月，是周恩來作為記者或報人最為豐產的時期。他總共在《益世報》上發表了五十餘篇報道，包括一些長篇連載。除了自己的名字周恩來或「恩來」外，他還用了一些筆名，如伍豪（這是他在覺悟社用的名字）、翔宇（這也是他的號）、飛飛等。這些報告的資料，主要來自於他對英文報紙的大量和仔細的閱讀。[25] 報告所涉及的，則包括英國礦工大罷工、一戰後的賠款問題、太平洋問題和1921至1922年舉行的華盛頓會議，以及英國和法國之間的微妙關係等等。在這些問題中，周恩來對1921年春末爆發的英國礦工大罷工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從1921年5月到7月，他共發表了九篇長篇報道，敘述並分析罷工的來龍去脈。他表現出對礦工的強烈同情，並對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持高度批判的態度。他在關於罷工的最後一篇報道中寫道：「資本家無往而不為利，欲罷工事之妥協難矣。勞資戰爭，捨根本解決外其道無由，觀此益信。」[26]

作為《益世報》特約記者，周恩來對當時在法國的二千多名中國學生的處境及活動極為關注。這些學生大都來自湖南和四川，多以「勤工儉學」來法，不少人還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們來到法國後，才發現在戰爭中飽受摧殘、戰後又處於經濟蕭條的法國，工作極為難找，生計維艱。到1921年春，本來曾為他們提供些許資助的華法教育會因財政虧空，宣佈與留法學生脱離經濟關係，而北京政府又拒絕給學生以救濟，結果引起學生到中國駐法公使館抗議。[27] 1921年夏，又傳出中法之間秘密談判高利借款及購買軍火等，被學生視為禍國殃民之行為，再次引發抗議。[28] 9月，中國公使館宣佈停止對中國工讀學生的維持費資助，中法大學也宣佈拒絕已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入學，而改為從國內另招新生。留法學生憤怒了，他們佔領了中法大學，招致法國當局鎮壓，蔡和森、李立三、陳毅（這幾人後來都是中共領導人物）等104名學生被強行遣送回國。[29] 這一系列事件不僅是中國留法學生的大事，亦引起了中國國內的相當關注。

周恩來不是勤工儉學生，他也沒有直接參與學生們在中國公使館前的抗議活動或對中法大學的佔領。但他在兩個方面與學生們的活動有關，並

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從1921年3月到12月，他一共撰寫並在《益世報》上發表了四組報道（其中兩組為長篇報道，有一組在報上連載了十多天），對學生活動的起因和發展作了詳盡的敘述和分析。尤其是，他強調學生們行動的意義遠遠超出了他們對於自身利益的捍衛，而是涉及到了中國的尊嚴、命運和主權。[30]

第二，周恩來幫助來自不同地區、有着不同背景的學生相互溝通，調停並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和分歧。學生中有不少人是周恩來的朋友。為了給《益世報》寫稿，他常常和學生們混在一起，並對許多人做了詳細的訪談。在這個過程中，他自己也越來越深地捲入到學生活動的策劃和組織中去。當學生們打算佔領中法大學時，他向他們提議，不要所有人都去，要留下部分骨幹準備「後續行動」。[31] 所有這一切，也加強了周恩來在留法及留歐學生中的地位和影響。這些學生中的很多人將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骨幹成員乃至領導人。在法國的這段經歷，也為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和影響留下了重要的伏筆。

四

1922年春，周恩來思想和政治上的發展達到了臨界點。[32] 直到那時，儘管他對共產主義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乃至思想上的某種依附感，但他從未明確表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他雖然加入了張申府在巴黎組織的共產主義小組，但並沒有與此相關的活動。他確實讀了很多書，也確實想了很多，想得很苦。他想要確立的，是何種「主義」將成為自己在知識和意識形態信仰上的指南。

「轉變的時刻」在1922年2、3月間終於到來了。在一封給兩位覺悟社同志諶小岑和李毅韜的信中，周恩來講到他關於「主義」的反思時清晰地闡述道：「覺悟社的信條自然是不夠用，欠明瞭，但老實說來，用一個Communism也就夠了。」接着，他對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做了詳盡的比較，分析了兩者長短之處，以及在他看來，作為思想和行動指南的共產主義為何優於無政府主義。他在信的結論處寫道：

> 主義問題，……再鄭重聲明一句，便是「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與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其餘的也不必談了。……我以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後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情，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33]

幾天後，在給另兩位朋友的信中，周恩來又確定地表示：

> 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34]

周恩來這一思想上的「突破」何以會在此時發生？與他在日本時不同，周恩來在旅歐期間沒有寫日記。通過閱讀他在這個時期所寫的信件和許多文章，我們可以發現其知識和思想發展軌跡有三個重要特點。第一，在最為實際和緊迫的層面，周恩來真切地為中國的落後而感到臉面全無，也為中國及中華民族所面臨的生死存亡的危險而感到焦慮。他憤怒地譴責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行徑，深信必須「拯救中國」，並使中國強大起來。

但周恩來絕不僅僅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在周恩來和諸如胡志明（Hồ Chí Minh，周在巴黎認識他）這樣的年青共產黨人身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對什麼才是拯救自己國家最有效的道路，以及怎樣才能讓這種努力獲得更大的意義、從而達成更大的目標上，有着共同的關切。周恩來認同發展和民族獨立的理念，但他更被民族解放的思想所吸引。正是在這裏，他感到只有共產主義才能為他提供達到理想及目標的、正確及可行的思想和政治途徑。

更深入地看，周恩來並沒有把拯救中國及改造國家與社會當作自己的終極使命或目標。對他來說，如果這種改造不能觸及人們的靈魂和心靈，或不能帶來他們的「重生」和「新生」，那麼這種進程也就沒有挖掘出自身的全部意義。歸根結柢，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周恩來在尋求真理及人生意義的探究中，最終選擇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終極原因。當他剛剛到達歐洲時，他仍然在擔心，若中國發生革命，在被激進社會和政治變動懷有敵意的「強鄰環繞」的情況下，便會陷入真正的險境。但隨着他在歐洲逗留，尤其是在親眼看到了在他認為是屬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基本問題

之後，他開始相信，共產主義革命固然會帶來各種損失與創傷，但只有通過這樣的革命才能達成創建「新中國」和「新世界」的目標。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任何犧牲都是必要的，任何代價也是值得付出的。[35]

1922年3月初，周恩來和張申府、劉清揚一道從法國來到德國。為減少開支，他們住在柏林南郊的一個小鎮上。此時，周恩來已開始投入在旅歐積極分子中建立中共黨組織的活動。6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成立。周恩來從德國來到巴黎，參加了黨的第一次會議。他強烈主張，所有黨員在入黨時都要宣誓，從而使入黨「帶有政治約束力」。在這一點上，周恩來和張申府的想法和做法明顯不同。他認為，必須用列寧主義的原則來建設黨。在會上，周恩來當選為由三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成員，負責宣傳工作。[36]幾個月後，在周恩來的動議之下，這個新組織向5月在廣州成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提出了入團並成為歐洲支部的申請。

正當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等待團中央的回音時，他們獲知，陳獨秀已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他們立即給陳獨秀發了一封信，顯然希望引起中共領導層對於他們的組織的注意。陳獨秀的回音，是1923年1月發來的。他建議，將「旅歐少年共產黨」改稱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並指示他們同國內共產黨和青年團取得直接聯繫。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於2月17日至20日在巴黎舉行了另一次會議，決定將組織的名稱改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周恩來以布爾什維克黨為榜樣，起草了團的章程，並獲得會議的批准。會議又選出了一個由五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周恩來當選為委員，並出任書記。[37]會議結束後不久，他們就收到了團中央接受他們成為歐洲支部的回信。3月13日，周恩來代表執行委員會向團中央送出了第一份正式報告，保證在「共產主義的統一旗幟下」，他和他的同志們「願努力毋違」。[38]

此時，周恩來已經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他已決心投身於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目標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願意和準備為這樣一個——他堅定地相信——崇高的事業獻出生命。他在追念一位同志和朋友黃愛（他在組織湖南紡織工人罷工時遭到殺害，從而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第一批烈士之一）的一首詩中，寫下了以下的字句：

壯烈的死，
苟且的生。
貪生怕死，
何如重死輕生。

沒有耕耘，
哪來收穫。
沒播革命的種子，
卻盼共產花開！
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
卻不用血來染他，
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39]

從1922年中起，周恩來不再給《益世報》寫稿，而將全部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組織工作上。他做這件事時，既有自己的想法，又十分謹慎。他認為，只有最優秀、最有能力、也最富獻身精神的人才能被吸收到黨內。在周恩來正式介紹入黨的人當中，有一位是朱德。他先前是一位地位顯赫的軍官，卻出於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興趣，在讀了許多「有關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材料」後，毅然放棄了豐厚的待遇，在將近40歲時來歐洲留學。他在柏林找到了周恩來，表達了加入共產黨組織的強烈意願。周恩來與他深入長談後，對他的志願和追求印象深刻，覺得應當接受他。1922年11月，由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朱德加入了中共。[40]他後來成為中國紅軍的主要創建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出任國家領導人達27年之久。周、朱兩人，也成為終生的摯友。

1922年8月，周恩來的工作日程上又增加了他過去已有經驗的一項，就是編輯和出版組織的機關刊物《少年》雜誌。後來，雜誌的名字又改為《赤光》。他希望利用這份雜誌來開展黨的宣傳工作。雜誌的編輯辦公室，就設在本章開始時提到的巴黎戈德弗魯瓦小街17號。[41]

周恩來在《少年》和《赤光》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共產主義和中國〉、〈宗教精神和共產主義〉、〈給勞工朋友的一份信〉、〈十月革命〉、〈論工會運動〉、〈俄國革命失敗了嗎？〉等等。他反覆強調的一個觀點是，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先鋒隊組織，紀律是極為重要的。因此，他大致上贊同張



圖5.1：周恩來在歐洲，大約1922–1923年。
（World History Archive / Alamy Stock Photo）

申府在《少年》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的看法：「紀律是共產黨之魂。失此，共產黨是不能活的。……有紀律，有共產黨；無紀律，無共產黨。……不懂得這個的人，不配加入共產黨，更不配組織共產黨。」[42] 但同時，周恩來又並不認為強調紀律意味着盲目服從或抹殺批判性思考。他在《少年》上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因而強調：

> 共產黨當然不要「既不能又不受命」的自由論者，但共產黨也決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從的黨員。[43]

顯然，即便成為忠誠的共產黨人，周恩來仍然執着地希望能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並為自己留下批判性思考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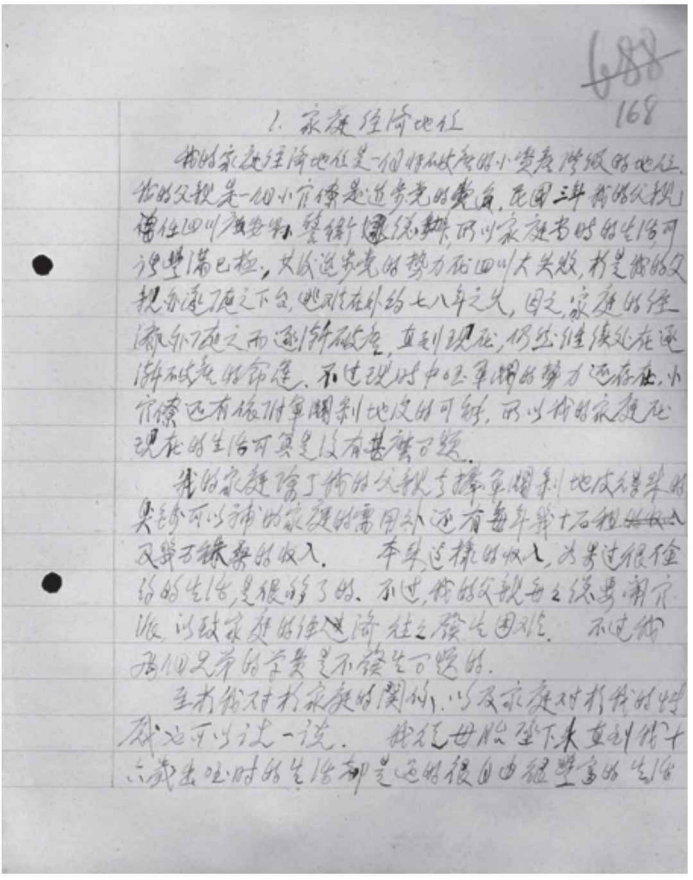
在雜誌的編輯和出版過程中，周恩來碰到了一位比他小六歲的年青人。他身材矮小，身高不到1.6米，說話時帶有很重的四川口音，但精力

充沛，學東西極快。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他參加了雜誌的出版工作，主要負責刻鋼板以及油印，因此而獲得了「油印博士」的外號。他就是鄧小平。[44] 鄧來自四川廣安，出身於一個處於「將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地位」家庭，父親是「一個小官僚」。他童年生活富足，「父母之愛我猶如寶貝一般，……對我很放任」，「不喜讀書更是我的特長」。但隨着父親參與四川地方政爭失敗後家道中落，他的生活環境也隨之改變。父親為「光耀門庭」，傾力資助他留法，但他卻因抗拒家中包辦婚姻，同父親「實際上可以說是已經脱離了關係了」。他自到法國後受到工讀時苦痛經歷的影響，而且通過閱讀《新青年》和社會主義討論集等，開始在思想上「站到社會主義這邊」，並於1923年6月加入了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45] 之後，他來到巴黎，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參與《少年》和《赤光》的編印工作。這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以及20世紀中國和世界歷史的兩位巨人之間，將持續半個多世紀的工作關係和個人友誼的開端。

1923年夏，周恩來從德國遷回法國，一年後離開法國回國前，一直住在巴黎。周恩來的生活來源是什麼？根據周的官方傳記的說法，他「主要靠稿費為生」。[46] 然而，正如前文述及，從1922年中起，周恩來再沒有給《益世報》寫稿，[47] 而他在《少年》和《赤光》等黨的刊物上發表文章，是沒有稿費的。同時，嚴修在日記中最後一次記載為周恩來提供經濟資助是在1922年。[48]

實際上，有證據表明，在周恩來成為職業革命者之後，他和黨組織都通過法國共產黨（或許也通過中共中央），從共產國際獲得了經費上的資助。[49] 有時，經費資助也來自其他渠道。例如，《少年》發刊時，張申府的私人朋友章士釗就提供了1,000法郎的資助。[50] 但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所獲得的經費資助看來是很有限的，因此，在戈德弗魯瓦小街17號三樓那間不到十平方米的斗室裏，只能容下一張床和一張桌子，卻被周恩來當作臥室和《少年》的編輯辦公室。當有人來找周恩來談話時，或者當他需要召集幾個人開會時，就必須到附近的餐館或咖啡館去。[51]

周恩來在歐洲的最後一年，工作的重點日益轉到同國民黨合作上來。早在1922年6月，面對着來自莫斯科的巨大壓力，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領導層發表一個關於當前時局的聲明，其中表明中共願意同「國民黨等革命



1. 家庭经济地位

我的家庭经济地位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官僚，是进步党的党员。抗日战争前的父亲，曾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所以家庭当时的生活可说是阔绰已极，大致进步党的势力在四川大失败，于是我的父亲亦逃难之下台，把财产在外的七八年之久，因之，家庭的经济亦不如之而逐渐破产，直到现在，仍然维持处在逐渐破产的命运。不过现时中层阶级的势力还存在，小官僚还有相对剥削地位的可能，所以我的家庭现在的生活可算是没有甚么问题。

我的家庭除了我的父亲主要剥削地位外，还有每年数十石租的收入及数百银元的收入。本来这样的收入，对当时很优裕的生活是很好了的。不过，我的父亲要维持前方的军费，负担很重，以致家庭的经济常处于窘迫困难。不过我们兄弟的学费是不发生问题的。

至于我对于家庭的关系，以及家庭对于我的影响，也可以说一说。我在世界登下来直到我十六岁出外时的生活都是过的很自由很豪富的生活

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52] 兩個月後，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中共黨員原則上可以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53]

周恩來得知黨的政策中的這一新動向後，馬上表示支持。在《少年》第2期裏，有張申府的一篇題為〈中國共產黨與其目前政策〉的文章，支持國共合作。1923年初，國民黨領袖孫中山派遣王京岐到法國，建立國民黨支部。王本人原來就是留法學生，早就認識周恩來。留法學生佔領中法大學時，他是積極參與者，並因此被驅逐回國。當周恩來得知王京岐以孫中山代表的身分回到法國時，馬上就同他建立了聯繫。6月16日，周恩來同兩位同志一道，和王京岐達成協議，規定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所有成員都可以以個人身分參加國民黨。[54] 周恩來又給王京岐寫信，建議應將三項工作列為首要任務：「一，宣傳民主革命在現時中國的必要和其運動方略；二，為國民黨吸收些留歐華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為國民黨做些組織訓練工作。」[55] 此後，孫中山和國民黨任命周恩來為國民黨駐歐支部特派員及駐巴黎通訊處籌備委員。[56]

11月，國民黨法國支部在里昂正式成立。周恩來和另幾位中共黨員加入了支部，並立即在其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王京岐擔任執行部長，周恩來則負責支部辦公室工作。在王京岐離開法國期間，周恩來曾代理支部執行部長一職，並主持支部工作。[57]

五

在周恩來就讀南開中學、到留學日本、再到參與五四運動的日子裏，他奉行「不婚主義」的主張已為他的同學和朋友們所熟知。然而，到了歐洲後，他的戀愛和婚姻觀在潛移默化中已有改變。從周恩來到歐洲後的第四年(1923)起，他的個人生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越來越頻密地給鄧穎超寫信，這個女孩比他小六歲，從覺悟社的日子開始，他就認識她了。

周恩來到歐洲的頭兩年，一直和另一位女孩張若名保持着相當親密的關係。張若名出生於1902年，比周恩來小四歲。她和周恩來一樣，也是覺悟社的創始成員。1920年初，她又和周恩來一起入獄。周恩來在《警廳拘留記》中，曾節錄了她自1月29日至2月6日的日記，可見他們當時的關

係之親密。[58] 出獄後，兩人明顯地走得越來越近。但那時，周恩來還是獨身主義者，並不斷地告訴人們，他是一輩子都不結婚的。甚至連鄧穎超後來也曾對周恩來的侄女說過：「當時和我們在一起的張若名，和你伯伯接觸比較多。當時我曾經以為，如果你伯伯不堅持獨身主義的話，和她結合可能是最合適的了。我們周圍的人也都這麼認為。」[59] 1920年底，周恩來和張若名又乘同一艘法國郵輪從中國來到法國。[60] 張若名長相清秀，是為人們公認的一個好學生，在中國留學生裏，她的法語學得最好。周恩來和她本來就是革命同志，到法國又都身在異鄉，由此帶來的文化衝擊自然也使得他們更加接近。當時，周恩來已放棄了不婚的想法。所有認識他們的人都覺得，他們將來是會訂婚並結婚的。但是，周恩來後來卻開始主動疏遠張若名。他覺得，張身上有着太多的小資產階級氣息，用他後來對侄女周秉德的話來說：「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者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61]

周恩來的注意力轉向了鄧穎超。他到法國後，一直保持着同鄧的通信聯繫。從1923年中起，周恩來給鄧穎超的信一封接着一封，間隔越來越短了。1923年底或1924年初，周恩來正式向鄧穎超提出兩人正式建立戀人關係。很多年後，在一篇紀念周恩來99歲誕辰的文章中，鄧穎超回憶道：「三年過去，雖然你寄給我的信比過去來得勤了，信裏的語意，我滿沒有在心，一直到你在來信中，把你對我的要求明確地提出來，從友誼發展到相愛，這時我在意了，考慮了。經過考慮，於是我們就定約了。」[62]

六

這時，中國正處於由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所推動的「大革命」的前夜。中共和青年團決定要選派自己的成員回國，參加大革命。周恩來也被選中了。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為周恩來寫了這封介紹信：

> 周恩來——浙江，年二十六，誠懇温和，活動能力富足，説話動聽，作文敏捷，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英文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書看報。本區成立的發啟人，他是其中的一個。曾任本區三屆執行委員，熱心耐苦，成績卓著。[63]

這些評論及意見，是以一種典型的共產黨的語言和風格（又承襲了中國官樣文牘的體例）而寫成的。我們不知道誰是這些文字的作者，但從中可以清楚看出，周恩來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了黨和他的同志們的信任。

7月下旬，周恩來在歐洲逗留近四年後乘船回國。這四年是他政治生涯發展中極為重要的一段時期，他剛到法國時，還只是一名剛剛跨出校門的青年學生。儘管他通過參與五四運動的種種活動而累積起了最初的政治經驗以及在天津激進青年中的聲望，但總的來看，他仍然屬於政治激盪時期無數小人物的其中一個。他的政治活動和影響，也帶有明顯的「地方性質」。同時，雖說他當時已表現出了接受激進改造思想的傾向，但在他的觀念世界中，仍沒有確認何種「主義」為「終極的真理」。在歐洲的這幾年裏，他不僅完全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思想信仰，而且還通過投身於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活動，成為這一當時仍然弱小、但卻表現出了極大活力與生命力的新型政治力量的中堅分子；更重要的是，他把握歐洲接近莫斯科共產國際領導中樞的地利之便，建立起了一系列的人脈關係，並在共產國際的「幹部儲備」名單上榜上有名，從而獲得了一種遠遠超出當地範圍的政治影響力。回首過去，周恩來的歐洲經歷成為他在中國激進革命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的起點——而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個極高的起點。

第二部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第6章

在大革命的風暴中（1924–1927）

一

華南，珠江三角洲的中央、香港以西約200公里處，座落着亞熱帶城市、廣東省的省會廣州。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百年間，這座城市是大清國對外開放的唯一口岸。1839年，中英鴉片戰爭在這裏爆發。大清國在戰爭中完敗，中國進入由西方列強所主導的「條約體系」的大門被打開了，中國同西方國家打交道時「屈辱時代」由此開始。[1] 鴉片戰爭後的幾十年裏，廣州見證了中西之間的文化衝突，與其混雜在一起的是危機和戰爭，以及進入20世紀後中國經歷革命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1924年9月初，周恩來經過一個多月的海上航行後，回到了廣州，目睹了這座城市正在迅速轉變為由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的國民黨組成的「統一戰線」所領導的大革命堡壘。據稱，這場大革命的目標在於驅除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影響，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和國。[2]

這一年，周恩來26歲。在這之前，他沒有擔任過任何軍事或政治行政的領導職務。除了在歐洲年青共產黨人的圈子內，他的名字也基本上不為人所知。然而，幾年來在法國和德國從事革命活動的經歷，使他獲得了具有獻身精神及實幹能力的名聲，現在這成了可資利用的「政治資本」。此外，他似乎也獲得了共產國際和莫斯科的青睞。（可能就是從這個時候或不久之後，他在莫斯科獲得了「莫斯克文」[Moskvin]的別名。[3]）所有這一

切，為周恩來在尚處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中迅速崛起並進入國共統一戰線的核心圈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此後四分之一世紀裏，在中共走向奪取政權的曲折道路上，周恩來有過光明的日子，也經歷過幽暗的時光，但無論是陽光明媚，還是雲遮雨淋，他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一個主要角色。在革命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關頭，都可以觀察到周恩來的作用和影響。這一切若追溯起來，廣州可以算作是起始點。

周恩來在廣州與一個名叫毛澤東的人第一次相遇。[4] 毛澤東出生於1893年，亦即中日甲午戰爭的前一年，比周恩來大五歲。1921年，他作為湖南代表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一次代表會議，是中共創始人之一。1923年6月，他在中共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出任中央局秘書，協助陳獨秀工作。1925年1月，他因病缺席了中共五大，未進入中央委員會。他歷來對農村問題極感興趣，並來到廣州為未來農民運動的組織者和積極參與者們舉辦訓練班。廣州為這位未來的毛主席倡導農村導向的革命新模式及理論，提供了重要的宣講場所。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廣州也可以算作是毛的一個起始點。

周恩來不是毛澤東。他從來沒有登上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寶座，也從來沒有展現出毛那種天馬行空般的烏托邦想像和毛式的個人魅力。如果我們對這兩個人加以比較，說周恩來更是一個行動者而不是一個思想者，大概並不見得是錯的。但是，正如本書前幾章所敘以及接續各部分還要論及的，把周恩來說成是一個沒有自己思想和看法的人，則肯定是不對的。本書的一個重要看法是，周恩來從來不是一個「內化的」的毛主義者；他在個人與集體、摧毀與建設、民主與集中等之間的關係，以及知識及知識分子的價值等基本問題上的看法，是不同於毛的；在他的觀念世界，深植着一種「人道關懷」。他和毛澤東之間的另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正如本書以下將要討論的，並不在於他沒有思想或看法，而在於他缺乏毛澤東那種為登上並保持革命最高領袖的位置而顯示出的捨我其誰、壓倒一切的氣概和決心。

二

周恩來到達廣州前，先在香港停留了幾天。9月1日，他給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請求中央對他的工作安排做出決定，而他準備去廣州，「在廣州耽擱的日期，我須俟C.P.（中共）中央命令而定」。[5] 周的信寫得正是時候。當時，中共領導層正急於擴展黨的影響，因而需要得力的幹部。周恩來有着很好的資歷，又正值中共中央決定重組廣東區委之際，他被任命為委員長兼宣傳部長。[6]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擔任了黃埔軍校教官，講授一門政治經濟課。[7] 黃埔軍校在1923年由孫中山所創建，得到了來自共產國際和蘇俄的大量軍事、財政及其他方面的援助，其主要使命是教育造就革命軍人和幹部。後來，國共兩黨的許多高級軍事將領都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黃埔軍校因此也獲得20世紀中國軍事將領搖籃的聲譽。推薦周恩來到黃埔任職的，是本書前已述及的張申府。他是在1923年回國的，曾短期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後來，當孫中山的密友、亦為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廖仲愷請張申府為黃埔推薦幹部人選時，張申府開列了一個15人的名單，上面的第一人就是周恩來。[8]

不久，周恩來又於1924年11月碰到了另一個大機會：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出缺。在軍校，政治部主任本來並不受到人們的重視，也沒有多少實權。之前，這個職務由資深國民黨人邵元沖擔任。在他的眼裏，這個位置恐怕更是一種「負擔」，而不是「要職」或「肥差」。因此，當邵元沖奉召陪同孫中山北上與北京政府「共商國是」時，他立即便辭去了黃埔政治部代主任一職。周恩來接替邵元沖出任這個職務。[9]

乍一看來，這似乎只是一項平常的任命。但對周恩來在政治上的崛起來說，這卻是極為重要的一步。在周漫長的政治和外交生涯中，這遠遠不是最為顯赫和權力最大的職務；但從政治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這卻是他所坐過的最為關鍵的位子之一。正是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他開始在共產黨人的小圈子之外，表現出了自己敏銳的政治意識和出色的行政和組織才能。更要緊的是，黃埔是國共兩黨軍政幹部的搖籃，後來兩黨許多軍事將領都是黃埔出身，因而也都可以算是周恩來的學生。這使得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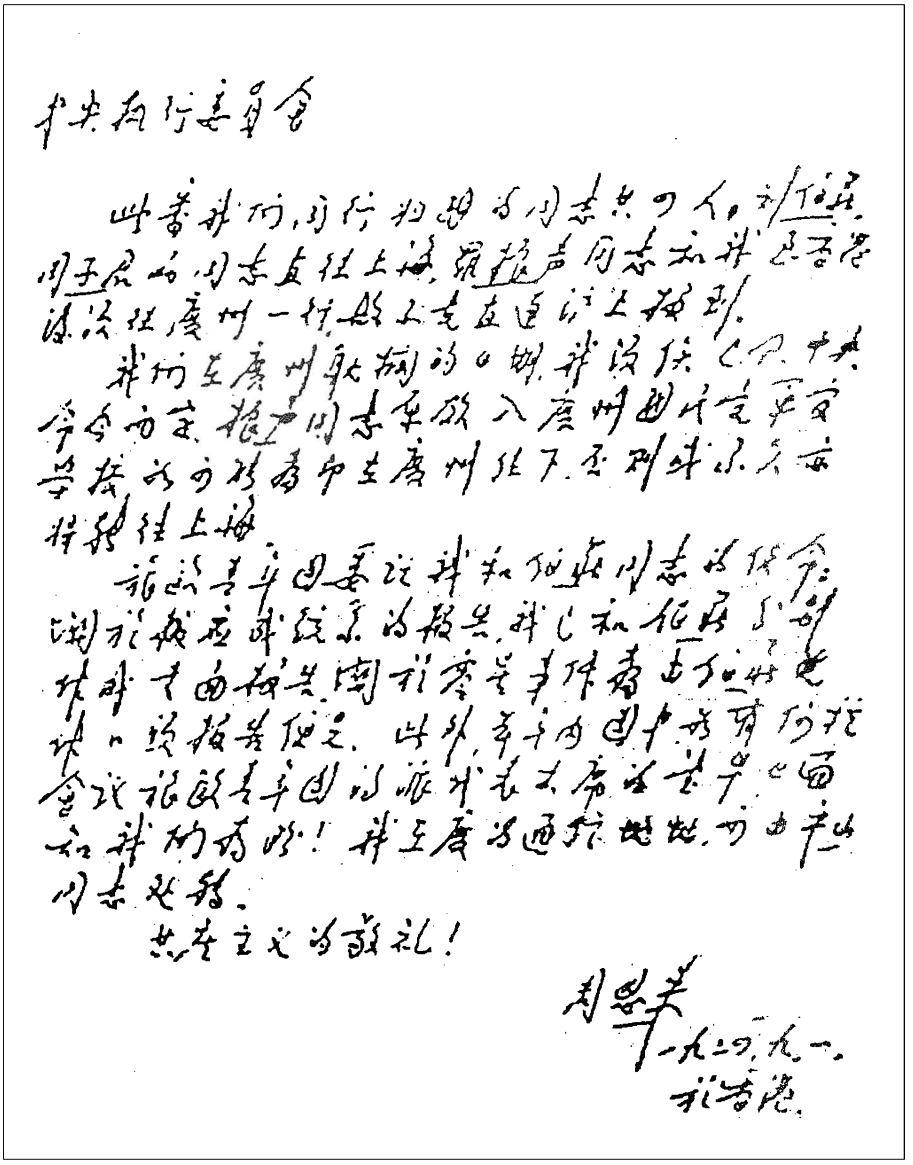


圖 6.1：周恩來給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信，1924 年 9 月 1 日。
（《周恩來手跡選》文電、批考卷上）

在軍界獲得了極高的「輩份」。這對他後來的政治生涯和在政界和軍界兩方面的影響力作用甚大——放在論資排輩特徵突出的中國政治文化背景裏，這就更重要了。

周恩來一旦就任新職，便着手對之實行改造。在建立起日常制度的基礎上，將工作的重點放到對學員的教育和動員上來。在闡明政治部的任務和工作時，周恩來強調黃埔軍校的課程應重視紀律教育以及灌輸「革命精神」，不僅要教學員軍事，也要教政治。[10] 他竭力推介中共，一再強調這是一個代表着政治正確性的黨，而中共同國民黨的合作以及在統一戰線中所起的作用，對於大革命的勝利是不可或缺的。[11] 他還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權力，任命中共同志到黃埔的各個位置上去；同時，他對錄取共產黨員和黨的同情者為黃埔學員，也相當用心。[12]

在加入中共的黃埔學員中，有一位名叫林彪。他生於1907年，出身於湖北黃岡的一個小工廠主家庭。15歲時，他入學武漢共進中學後，便積極投身於學生運動，並於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他考入黃埔軍校，為第四期學員，之後又轉入中共。1926年10月他從黃埔畢業後，加入了國民革命軍。[13] 他是一位軍事奇才，此後數十年間在國共內戰及抗日戰爭中嶄露頭角，崛起為中共最為傑出的軍事將領之一，對中共奪取政權貢獻卓著。1959年後，他以獨特的「擁毛」姿態在中共領導層進一步出人頭地，直至文革中成為毛澤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統帥」及毛的接班人。1971年9月，他卻又「背叛」毛，並在倉促出逃後慘死於蒙古溫都爾汗。廣州，也是林彪的傳奇生平的起點。

周恩來還着力與國民黨同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其中包括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並得到了蔣的青睞。1925年4月，經蔣介石提名，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的另一重要職務——軍法處處長。[14] 根據一本蔣介石權威傳記的作者陶涵（Jay Taylor）的研究，「在蔣介石的眼裏，周恩來是一個誠懇的人」。經歷過在黃埔的共事後，「雖然說，國共兩黨歷經了47年的競爭、對抗和暴力衝突，這兩個人之間仍然存在着一種非同尋常的關係。即便在兩個黨之間發生激烈鬥爭的年代裏，他們之間的互相尊重仍然時不時地會偶爾表現出來」。[15]



圖 6.2：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約 1925 年。
（AFP via Getty Images）

周恩來同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顧問的關係也十分緊密。當時，在孫中山推行「聯合蘇俄」政策的背景下，這些代表和顧問在廣州的影響也不斷擴展。[16] 正如中共創始黨員之一、當時亦為黨的重要幹部張國燾所觀察，周恩來同孫中山的主要蘇聯顧問鮑羅廷保持着「十分親密」的關係，並因而受到了鮑羅廷的「支持和提拔」。[17]

當時和周恩來一起工作的人當中，還有他早在巴黎時就認識的越南共產黨人阮愛國（即胡志明）。胡能夠説流利的中文，當時在廣州擔任鮑羅廷的翻譯。他曾邀請周到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主辦的青年政治訓練班講課。根據胡志明的要求，周還幫忙把好幾個越南革命青年招入黃埔軍校。[18]

1925 年初，當廣東革命政府正準備組織後來被稱為「第一次東征」的軍事行動時，周恩來碰到並抓住了另一個大機會。當時，廣東省全境有三分之二（主要是東部地區）仍在軍閥陳炯明的控制下。陳曾是孫中山的盟

友，但此時由於與孫在政見上的分歧，早已成為廣州方面心腹之患的「兇惡敵人」。1925年1月下旬，廣州革命政府下達了討伐陳炯明的命令，其軍隊的一部分是由黃埔軍校教官及學員所組成的。這支黃埔學生軍在戰鬥中表現出高度的紀律性和高昂的士氣，在打敗陳炯明所部時起了很大的作用。東征期間，周恩來負責軍隊的政治動員工作。戰場上的勝利，不僅證明他倡導的政治教育有效提高了部隊的士氣，也使得很多人開始認為周恩來身上有着可貴的軍事素質。[19] 在一個人們普遍信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時代，這對於周在政治上崛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在廣州的日子裏，周恩來一直處在一種亢奮之中。他在政治舞台上攀升的同時，和鄧穎超的戀愛關係也走向成熟。在周恩來到歐洲去的那段時間裏，鄧穎超一直待在天津。此刻，他們各自天涯已有五年了。如同周恩來曾期待的那樣，鄧穎超在天津也加入了中共，並成為富有獻身精神的黨的積極分子。[20] 在這五年時間裏，他們一直在通信。根據鄧穎超的回憶，周恩來一共給她寫了250封信，但一封也沒有留存下來。很多年後，鄧穎超對周的傳記作者韓素音說：「我們寫信，寫信，……結果愛上了。」[21] 現在，周恩來已經回國，並已在廣州有所建樹，他覺得，已經到了同鄧穎超結婚的時候了。為此，他需要獲得黨的批准。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周恩來根據中共高級幹部結婚需獲得黨內上峰同意的政策，找到了主管此類事務的中央委員彭述之，請求他的批准。彭笑着點頭同意了。[22]

故事的後續發展，反映出周恩來和鄧穎超關於革命與愛情之間關係的理解——對他們來說，前者是第一位的，後者是第二位的。1925年7月，當鄧穎超乘船從天津來到廣州時，沒有人在碼頭上接她。周恩來實在是太忙了，便派了也是黨員和黃埔學員的陳賡去碼頭迎接，粗枝大葉的陳賡卻錯過了鄧穎超，鄧只得自己僱車，找到周恩來的住所來。[23]

但這個「小插曲」對這對即將成為新郎和新娘的年青人來說，似乎並沒有什麼影響。1925年8月8日，周恩來和鄧穎超請了二十多位關係親密的同志和朋友吃飯，而這實際上就成了他們的婚宴。周恩來顯得相當興

奮，威士忌一杯接着一杯，最後居然喝了三瓶。他雖有酒量，但從未喝過這麼多。臨近半夜時分，這場飯局才結束，而周恩來也已喝得大醉。第二天早晨，當周恩來醒來時，據稱鄧穎超對他說的話是：「為了革命，以後不能喝那麼多了。」[24] 周恩來和鄧穎超成了一對「革命夫婦」。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並不愛對方，這裏的一切有着時代的特徵和烙印。周恩來一生都用「小超」稱呼鄧穎超，這是一種對愛人非常親密的稱呼。

對周恩來來說，這也是他和鄧的一種充滿理智和政治上精明盤算的結合。終其一生，鄧穎超不僅是周的妻子，也始終是他最堅定的戰友和利益維護者。周恩來逝世後，鄧出於保護周「名節」的考慮，還提出了全部銷毀1973年中央政治局「批周」會議材料的要求，獲准後，又親自監督燒毀了這批檔案材料。[25]

這種將政治考量加之於婚戀的做法，也成為周恩來的一種「家傳」。很多年後，當周恩來的親侄女、從小在周家長大的周秉德談戀愛時，交了一個曾是留蘇學生的男友，兩人互相傾慕，感情日深。但是，當時正值中蘇關係惡化。當周和鄧知道周秉德的戀情時，便以「同志」的名義，「建議」她同男友中止關係。[26] 因為，革命必須是第一位的。

四

周恩來沒有時間度蜜月。8月20日，廖仲愷遇刺身亡，他有着國民黨領導層內最為親共的名聲。周恩來和其他中共同志一樣，對此感到極為震驚。他的直覺告訴他，廖仲愷之死可能會改變國民黨內親共及反共力量的對比，從而對國民黨本身的發展以及國共「統一戰線」的未來走向產生深刻影響。他深感憂慮。[27]

但是，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還沒有來得及應對國民黨內部及國共之間不斷加深的危機，就碰到了組織並實行第二次東征、消滅陳炯明在廣東的殘餘勢力這個更為緊迫的任務。1925年8月下旬，「黃埔學生軍」經改組並擴充後，成為新建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周恩來被任命為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師政委。正如他在幾個月前的第一次東征中的所為一樣，他再次強調了政治動員對提高部隊士氣和戰鬥力的重要性，並付

諸實施。11月中旬，第一軍打了一連串勝仗，廣東全境已為廣州革命政府所控制。[28]

戰場上的勝利為周恩來打開了通向另一個機會的大門。1925年11月21日，廣州革命政府任命他為東江區行政委員。這是一片很大的地盤，共有25個縣，幾乎覆蓋了剛剛被第一軍佔領的全部地區。[29]這個區域落到廣州革命政府手中，也使它獲得了新的入海口，並成為了它所十分需要的稅收和其他急需資源的來源。在中共歷史上，這也是第一次有黨員出任這麼重要的行政職務。周恩來被任命這一職務本身，就顯示了他在國共統一戰線中不斷增長的政治權力和影響力。為了到東江就職，周恩來辭去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職務，但仍然需要處理第一軍的很多事務。他關於東江的設想是，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組織和動員民眾，尤其是通過組織和動員農民，繼續肅清「反動勢力」的殘餘影響。他更為重視的是第二方面就是制定計劃，在東江發展教育、實業、水利、交通等等，並「引導人民參加政治」，建立「潮梅革命之基礎」。[30]

然而，不待周恩來有時間在東江將各項計劃付諸實施，他卻於1926年3月16日突然被解除了東江行政委員的職務。[31]表面上，他被解職是因為他曾多次提出，自己同時在第一軍和東江地區任職，實在是忙不過來。但實際上，底下的原因恐怕在於國共兩黨以及國民黨內左右派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在共產黨人是否應被允許既保留中共黨員身分、又在國民黨內擔任重要職務的問題上，雙方的爭論更為突出。1925月3月，孫中山因肝癌不治逝世，之後這種緊張更是不斷升級。孫中山活着的時候，為了推行他的「聯俄容共」的方針，曾用他的權威和權力壓制國民黨內這方面的爭論。他死後，一個主要的牽制和平衡因素隨之失去，國民黨內的裂痕變得更為明顯。

當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內一直被視為左派，軍事和政治領導地位正穩步上升。但是，他看到中共的影響在國民黨內持續擴大，也開始擔心中共會在國民黨內造成「黨中有黨」的局面。所以，有一次他曾對周恩來說，他覺得國民黨內的所有中共黨員都應該要麼放棄中共黨籍，要麼退出國民黨及黃埔軍校。[32]這番話引起了周恩來的警覺。1926年初，他特地就這個問題向鮑羅廷報告，並建議採取「適當行動」來限制蔣介石的權力。他也

把此事上報給當時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然而，據他後來回憶，拖延了好久後他才得到回音，而且再沒有任何後續動作。[33]

1926年3月20日，周恩來被解除東江行政委員職務後僅僅四天，國共關係中的一次重大危機，中山艦事件（亦稱「三二零事件」）便發生了。事情來得突然。前一天，蔣介石接到報告，由共產黨員李之龍為艦長的中山艦，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由黃埔駛往廣州。蔣介石不知道為何有此「異動」，也搞不清其動機何在，頓時警覺起來。恰在此時，他接到了身為黨內親共之左派領袖，並同蔣介石角逐國民黨最高領導地位的汪精衛的兩個電話，詢問他的起止。這就更引起了蔣介石的警惕，並懷疑汪精衛可能與中共及蘇聯在廣州的顧問季山嘉（Kissarka，即尼古拉．古比雪夫）沆瀣一氣，試圖綁架他，並用船將他送往海參崴。[34]

情急之下，蔣介石立即便定離開廣州去別處暫避，但「行至半途」，他的想法就變了：「自思何必欲私行予人口實，志氣何存！」於是，他想到「權力可以放棄，責任豈可放棄乎？名位可以不顧，氣節豈可喪失乎？故決心不走」，而是轉而「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以其欲陷我也」。[35]他轉頭回到廣州後，即下令逮捕李之龍。3月20日早晨，他進而下令在廣州實行戒嚴，並解除由共產黨控制的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到天將黑時，他已採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包括包圍蘇聯顧問團駐地，以及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內開展「清黨」，命令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共產黨人退出。[36]

周恩來得到蔣的行動的報告時，極為震驚。根據他將近20年後的回憶，他立即趕往蔣的辦公室，試圖當面提出質詢。然而，蔣卻拒絕見他，並將他在辦公室裏「扣留」了24小時。直到當天夜裏，當蔣搞清楚所謂綁架他的陰謀其實並不存在之後，才取消戒嚴並讓周離開。[37]

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三二零事件」是最具神秘色彩及爭議性的事件之一。國民黨方面堅稱，確實存在着中共試圖綁架蔣介石的陰謀。中共方面則把事件的原因歸於蔣介石故意製造並散佈謠言，以達到在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內「清黨」的目的。[38]過去二十餘年間，中國學者楊天石、楊奎松等令人信服地證明，「三二零事件」極可能是由一樁偶發事件引發。3月18日晚間，一艘從上海開往廣州的商船在黃埔附近遇到海盜攻擊，後向附近的黃埔軍校求救，中山艦隨後奉海軍局命令移往黃埔施救。

第二天，李之龍被告知，一個蘇俄代表團將訪問廣州，他因而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不知道中山艦是在海盜事件後根據海軍局的命令從廣州，移往黃埔，立即便懷疑這是共產黨人試圖綁架他的陰謀，並進而斷定有必要採取行動。[39]

「三二零事件」還有深層次的原因。在國共之間，以及國民黨內的右派和左派之間，矛盾和衝突早在事件前的幾個月一直在發展。就蔣介石本人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傾向而言，他仍然亟欲推進以反帝及追求中國民族解放為目標的「國民革命」。但與此同時，他對共產主義的思想和實踐也已越來越產生了疑問。此外，在蔣介石和汪精衛、以及在蔣介石和蘇聯軍事總顧問季山嘉之間，存在着嚴重的分歧和不信任。孫中山死後，蔣介石和汪精衛成為國民黨最高領袖位置的兩個主要競爭者，日益陷入一場一山難容兩虎的對決。季山嘉是蘇聯在中國級別最高的軍事將領，據說為人極為傲慢。他到廣州後，便看不起蔣，亦為蔣所察覺。兩人都極不喜歡對方。就在「三二零事件」發生前，兩人又在北伐戰略上產生分歧，互相不買帳也不願妥協，關係也更壞了。[40] 蔣介石本來就生性多疑，一旦有事，更容易因他自己的想像而把一件小事搞成天大的事。

到了3月20日晚上，蔣介石已經意識到所謂綁架他的陰謀其實並不存在，而他宣佈戒嚴以及置共產黨軍官於「集體保護拘留」等行動也太過分了。整個3月20日夜裏，直到第二天凌晨，蔣的情緒從憤怒轉為恐慌，壞到了極點。他極其擔心，不知道如何才能平息由他前一天的魯莽行動而帶來的大麻煩。[41] 周恩來和他的中共同志們所面臨的挑戰，則在於怎樣進一步應對蔣。周恩來認為，共產黨人和親共的國民黨左派的力量結合在一起，足以「堅決擊退蔣介石的進攻」。在他看來，中共是能夠向蔣叫板的。考慮到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已被蔣介石的「胡作非為」激怒，而蘇聯軍事總顧問季山嘉也堅決支持「狠狠給蔣介石一個打擊」，情況就更是如此了。更何況，在國民革命軍其他各部，對於「給蔣介石一個教訓」也存在着廣泛的支持。[42]

周恩來到廣州後不久，便已經與毛澤東相識，但相互間的工作聯繫和交叉似乎並不多。根據周恩來近20年後在中共領導層一次會議上的回憶，就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後，他與毛澤東有過一次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

見面。「我在富春家遇毛，毛問各軍力量，主張反擊。我聽了毛的話找季山嘉，他說不能破裂。而當時的軍事力量是可以反蔣的，黃埔有五百餘黨員。」[43]周恩來是在延安整風期間，在「交代歷史」時做了這番回顧的。毛澤東沒有留下關於此事的記述，也沒有關於他在何時何地第一次同周見面的回憶。但周關於中山艦事件後兩人交集的這段話是當着毛的面說的，其內容大致不會差到哪裏去。如果周恩來的回憶和敘述是準確的話，那麼，這一片斷也就是他和這位未來主席之間將延續半個世紀的工作關係的開端，而他將始終處在毛的思想、綱領、權威和權力的籠罩之下。

後來，形勢並沒有朝着周恩來和毛澤東所設想的方向發展。在共產黨這一方面，說話可以算數的，是從蘇聯來的老布爾什維克、時任紅軍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將軍（Andrei Bubnov），當時他正率領一個蘇聯高層代表團在廣州訪問視察。按照他的理解，莫斯科當時的政策仍然是要「團結蔣介石」。於是，他決定要尋求同蔣介石妥協。[44]此後，事情便朝着同周恩來等人的希望相反的方向發展。季山嘉被解除職務，然後又被送回蘇聯。汪精衛對布勃諾夫的決定極感失望，決定離開中國去法國。廣州的政治和軍事權力進一步落入蔣介石的手中。[45]

當蔣介石逐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後，便進而採取行動，將中共黨員從國民黨決策圈中驅逐出去。他在這樣做時，手段極為老到。一方面，他排除中共黨員或限制他們的作用，並同時安插自己的人馬到國民黨的一系列重要位置上去。但另一方面，他又大聲表示，決心同國民黨內的反共右派勢力作堅決鬥爭，並表示願意繼續同蘇聯和中共合作。[46]

5月，國民黨在蔣的指導下召開了二中全會。會議議程的重頭戲是〈整理黨務案〉，要求國民黨內的所有中共黨員做出選擇，或者退出國民黨，或者放棄中共黨籍。全會通過了這一決議。[47]

二中全會之後，中共領導人們開始認識到，蔣介石屬於國民黨內的新右派，或至多只能說是「中間偏右」。然而，中共在這個問題上的戰略其實並不是黨自己可以決定的，而是要由莫斯科做主的。儘管有蔣介石對統一戰線和中共所做的一切，但蘇聯領導人仍然希望同他合作。[48]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領導層做出了另一個看似精深複雜、實則混亂不堪的決定：既不

推翻蔣介石，但也不支持他。這麼一種戰略究竟如何付諸實行？在這個時候，中共領導層內沒有人能夠清楚地回答這樣的問題。[49]

所有這一切，對周恩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4月，他被免去第一軍副政治委員和政治部主任的職務。[50]同他一道，好幾位著名的中共黨員也失去了在國民黨內的職位。中共領導層現在已把周恩來當作「軍事專才」來看待，任命他為廣東省委軍事部部長。周恩來的主要任務是協調為即將到來的北伐做各種準備。7月間，二百多名中共黨員在離開黃埔軍校或第一軍以後，在廣州的一個佛教寺廟參加了一個由周恩來任主任及主要教員的軍事訓練班。[51]幾乎與此同時，以推翻軍閥統治、在民族革命的旗幟下統一中國為目標的北伐戰爭開始了。

五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決定，將周恩來從廣州調往上海，擔任中央軍委委員和中央組織部秘書。這樣，周恩來一下子就對中共最重要的兩項任務——組織人事和軍事事務——擔負起了領導的責任。[52]鄧穎超當時已有好幾個月身孕，因此沒有隨同周前往上海，而是留在廣州。

周恩來到上海的時候，共產黨人已經在那裏組織過兩次武裝起義，但都失敗了。周恩來到達後，黨的領導立即讓他負責在上海組織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工作。周恩來特別強調了做好充分準備和抓住適當時機行動的重要性。[53]1927年3月19日，北伐軍前鋒部隊已到達上海郊區。凌晨，周恩來主持了中共上海市委主席團會議。他說，發動起義的最好時機已經到來了。如果敵軍有「潰退消息」，周提出，「即一面下令罷工，一面今晚動作」。[54]第二天上午9時，周恩來和中共下達了起義開始的命令。據稱，多達80萬上海工人參加了總罷工。在中共領導下的工人糾察隊則對城裏的多處目標發起攻擊，包括火車站、警察局以及郵電設施。到22日下午，敵軍的最後據點上海北火車站亦被工人糾察隊拿下。周恩來宣佈起義成功，由共產黨人起主導作用的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隨之成立。

此時，蔣的部隊（包括對他最為效忠的幾個部分）已經開進上海。3月26日，蔣介石也到了上海。他立即要求工人糾察隊解除武裝。同時，他

也拒絕承認由共產黨人控制的臨時市政府。周恩來有過很多同蔣打交道的經驗，對此深感憂慮，並試圖同他在黨內的同志們分享自己的想法。在3月30日特別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整個的情形，他們對我們已有準備。將來他們對付武漢和上海只有憑武力。同時，對付群眾只有如江西僱傭流氓。」[55] 然而，周恩來並沒有提出什麼可行的計劃，以阻止蔣對共產黨人主動發起攻擊。

進入4月以後，隨着更多的部隊到達上海，蔣介石也進一步加強了對城市的控制。4月5日，他頒佈戰爭戒嚴條例，在上海宣佈戒嚴，嚴厲禁止群眾集會、罷工、未經批准的示威等等。[56] 所有的跡象都顯示，一場可能徹底埋葬國共統一戰線的巨大風暴，越來越臨近了。

「大對決」在1927月4月12日開始。當天早晨，同蔣關係密切的大批上海青幫成員對分佈全市各處的工會及工人糾察隊尋釁並發起攻擊。然後，蔣的部隊以「制止械鬥」為名，幾乎對上海所有的工人糾察隊都予以繳械。第二天，當上海總工會號召工人舉行總罷工並舉行請願示威時，蔣的部隊向他們開火，造成百餘人死亡。三天後，蔣介石正式宣佈實行「分共」、「清黨」。他的部隊和特務則開始在全城展開對共產黨人及親共分子的搜捕及屠殺。

這一切使得周恩來陷入險境。4月11日晚，周恩來收到了一位前同事的弟弟、蔣部下的一位師長斯烈的赴宴邀請。當周恩來到達時，卻被扣留下來，到第二天才被允許離開。[57] 此時，工人糾察隊均已被繳械。周恩來雖然被蔣的行為激怒，卻發現若要與蔣對抗，自己手中卻無牌可打。很多年之後，當周恩來回顧當年的情形時，依然痛心疾首：「那時我們年輕，經驗還不足。……最主要的是沒有精神準備，沒有下一步。」[58]

在「四一二政變」後的那些日子裏，上海變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城市。蔣介石的部隊不斷地圍捕共產黨人和黨的同情者。對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來說，上海的形勢也變得越來越危險。為了保護自己不落到蔣介石的士兵和特務的手裏，周恩來轉入了地下。[59]

蔣介石發動政變後，中共成立了一個由周恩來、李立三、陳延年、趙世炎和共產國際東方部代表維經斯基（Gregory Voitingsky）組成的特別委員

會，應對情勢的發展。4月16日和19日，特委會召開了兩次緊急會議，討論應對挑戰的方略，卻發現諸事均困難之極。當時，武漢仍處於被認為屬於國民黨左派的勢力控制之下，但其部隊當時正在同北方軍閥部隊激戰。那麼，武漢方面究竟是應當集中力量於繼續北伐，還是轉過頭來打蔣？在周恩來看來，答案是很清楚的，鑒於蔣已經變為革命的主要敵人，自然應該首先集中力量打擊他。因此，中共應聯合國民黨內的左派，揭露蔣的「反革命真面目」，武漢方面則應當實行「反蔣第一、北伐第二」的方針，立即開始討伐蔣的軍事行動。[60] 特委會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會後，周恩來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提出了「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的主張，與會其他人也在電報上簽字表示同意。[61]

在這一要緊及危險的時刻，還在廣州的鄧穎超的預產期也臨近了。但到了分娩那一天，由於胎兒過大，嬰兒剛出生就夭折了。「那是一個男孩，近十斤重」，鄧在很多年後回憶此事時，仍難掩喪子之痛。[62] 此時，醫院外已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圍。為了防備敵人的追捕，鄧穎超也立即轉入地下。直到4月下旬，才收到周恩來輾轉送來的信，要她立即赴上海、再登報尋找並與周恩來會合。5月初，鄧穎超到達上海後，使用了周在覺悟社時期的代名「伍豪」在報上登載了尋人啟事。周恩來看到了這個啟事後，和鄧穎超在上海的地下環境會合了。[63]

周恩來這時候在上海已沒什麼可做的了。5月中旬一個漆黑的夜晚，他經仔細化裝後，登上了一艘懸掛英國國旗的輪船，離開上海。[64] 5月20日前後，他到達武漢，這裏現在已經成為大革命的新中心。中共和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左派」組成的「統一戰線」也將在這裏度過最後的時光。

周恩來到達武漢的前幾天，中共剛剛在那裏舉行過第五次代表大會。周恩來錯過了這次會議，但他仍然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並擔任中央委員會秘書長。5月25日，周恩來應邀列席了中央常委的一次會議。會上決定，任命周恩來為中央軍事部部長，並有權在必要時列席中央常委會議。[65] 四天後，周恩來又在常委會中代理當時不在武漢的張國燾的職務。這樣，周恩來到達武漢不到兩週，就進入了中共領導層最內層的決策圈。

5月下半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亦稱為「五月決議」。莫斯科指示中共以「推動土地革命」為目標，組織並實行武裝起義。尤其重要的是，共產國際提出，「必須立即開始建立由革命工農組成的，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八個師或十個師」。[66]

當時，從共產黨人的角度來看，武漢的局勢正在不斷惡化。曾在國民黨內一直以親共的左派領袖聞名的汪精衛，也已經在認真考慮「分共」的問題。汪精衛尤其不會忘記他在「三二零事件」期間及之後的境遇。當時，他曾對於蘇聯的支持抱有很高的期望，並深信蘇聯顧問一定會和中共一道，站在他這一邊同蔣介石對抗的。然而，他覺得自己遭到了背叛，不得不在失望和臉面全無的情況下出國。在當時的情況下，莫斯科和中共又怎能希望在同蔣介石的又一次重要對抗中，並在蔣介石實際上已經佔據了上風的形勢下，汪精衛會堅定地站在他們一邊呢？7月中旬，中共領導層遵照共產國際的意圖進行改組。陳獨秀從黨的總書記退了下來，中共將由一個新的臨時中央常委會來領導。7月13日，中共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宣佈退出「已成為反革命勢力」的武漢政府，並不再與汪精衛合作。兩天後，汪精衛正式宣佈「分共」，但武漢國民政府仍宣佈將「派遣重要同志前往蘇俄」，繼續執行「保護農工」的政策。汪精衛其實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67]後來，情勢的實際發展是，「七一五」後，同三個月前蔣介石在上海「分共」後的情形相似，在武漢政府控制下的地區內，農工運動凋零，大批共產黨員和黨的支持者開始遭到了逮捕和殺害。

隨着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決定「分共」、「清黨」並付諸行動，曾經在大革命中結合一道、包括國民黨革命和共產黨革命的中國革命潮流分道揚鑣，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實，即便如此，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仍然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他們都繼續高舉着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也都強調拯救中國於水火之中、推動中國走向富強並站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他們在政治和軍事對抗中都竭力妖魔化對方，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並以實現這一目標當作自己戰略和政策中的頭等大事。國共之間的血腥內戰也拉開了帷幕。

六

上述一切，是否意味着大革命已經失敗了？無論是中共，還是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都不願意承認這一點。根據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中央決定動員在黨影響下的部隊，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這時，周恩來在黨內已被廣泛認為具有「軍事專長」，於是他受命組織領導起義的前敵委員會，並擔任書記。[68]

7月下旬，周恩來和幾乎所有中共領導人都離開了武漢。周和另幾人先行來到了離武漢不遠的九江，並於7月24日在那裏舉行了一次會議，確定了在南昌起義的計劃。[69]關於起義後的戰略，他們遵循蘇聯顧問布柳赫爾(即加倫將軍)的意見，決定在起義後立即帶領部隊朝南，向廣東方向運動，以求在那裏建立基地，奪取出海口，獲得「國際援助」；然後以廣東為基地，實行由共產黨領導的又一次北伐。[70]7月27日，周恩來由九江秘密潛入南昌。

8月1日凌晨，南昌起義發生，短短幾小時內，起義部隊便肅清城內敵軍，控制了整個南昌城。隨後，又成立了掌握全城軍政大權的革命委員會，周恩來出任委員。但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並不準備在南昌久留。根據他們制訂的計劃，起義部隊將立即南下廣東，奪取出海口，以便在從海上獲得國際支援後，再次實行第二次北伐。[71]

8月3日，根據事先的策劃，起義部隊未經休整便分批開拔，向南進軍。[72]一路上迭經戰事，於9月中旬進入廣東境內，並於9月24日攻佔汕頭這個位於廣東東部的海口城市。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十分高興。但此時，由於連續作戰，起義部隊傷亡減員嚴重，力量已經嚴重削弱。同時，部隊進入廣東後，並沒有得到他們曾希望獲得的來自當地工農民眾的支持。使情況變得更為嚴重的是，在他們的部隊從南昌到廣東的長途跋涉過程中，一直遭到越來越多的敵軍尾隨追擊，當他們佔領汕頭後，敵軍已在潮汕周圍集結了比他們強大好幾倍的重兵，將汕頭包圍起來。隨後，敵軍向汕頭發起進攻。10月1日，周恩來的部隊已被打散，汕頭失守。[73]

周恩來本來還準備率領殘部轉入海陸豐鄉村地區，豎起蘇維埃的旗幟打游擊。然而，汕頭被敵軍包圍太緊，這個計劃根本無從實施。在這個緊要關頭，周恩來得了惡性瘧疾，發起了高燒，有好幾天處於半昏迷狀態。幸虧他先前曾在東江當過專員，在當地仍有一些老關係，根據他的交代，當地的一位地下黨員找來了一條小船，在海上顛簸了兩天後，將周恩來送到香港治病。周恩來大難不死。[74]

到這個時候，在汕頭陷落後的那幾天和幾個星期裏，中共領導人和周恩來周圍的同志中，有那麼多人死了。事後來看，周恩來自己也真是因為運氣好，才逃過了死亡的命運。他在香港躲藏了近一個月。到10月下旬，他已漸漸康復。10月23日，他收到了中共中央通過廣東倖存下來的地下交通線送來的一封信，要他馬上到上海開會。[75] 11月初，他在香港九龍登上了一艘船，前往上海。

從中國共產黨人的視角來看，大革命已以失敗告終。對周恩來來說，這是一段浸透着鮮血的經歷。但最為重要的，應當是他對於從事武裝鬥爭和追求「統一戰線」之間的關係，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確實，在所有中共領導人中，周恩來是最早認識到「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之一，並在蔣介石「分共」之後便將之實踐。這裏，固然有着來自共產國際和莫斯科的影響，但周如此積極主動地採取行動，又顯然是同他本人的認識和理念分不開的。此外，這也促使周終其一生，一直對情報安全事務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重視。中共在大革命中的失敗及由此而帶來的巨大損失，對周來說固然是極為慘痛的，但這也為他提供了極為難得和寶貴的經驗和歷練，並將在此後的年月裏，在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一位更為成熟的領袖的過程中，成為他的極為有用的財富。

第7章

地下上海
（1927–1931）

一

20世紀初年的上海，已是有着「東方巴黎」之稱的現代大都市。但歷史上，這裏曾是一落漁村。到19世紀中葉，上海已逐漸發展為一座有着四圍城牆的小城市。鴉片戰爭中，大清慘敗，並同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之後上海開埠。短短幾十年間，上海佔盡了對外開放後的天時和地利，迅速成長為重要的條約口岸，不僅是中國、甚至也成為東亞的商貿中心。這座城市的一個主要特徵，在於它分割為華界和外國租界，沒有統一的法律和行政機制。如果說，任何現代大城市都難免魚龍混雜，有利於政治反對勢力的地下活動的話，那麼上海都市的四分五裂，更難為城市帶來統一的治理與秩序了。

1927年11月初，周恩來大病初癒後從香港經海路潛入上海。對於年青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這是一個充滿着危機、挑戰和焦慮的時刻，周恩來的同志們也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到來。11月9日至10日，周恩來出席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連續兩天在上海舉行擴大會議。會議由陳獨秀下台後接任黨總書記的瞿秋白主持，但真正控制會議的，卻是共產國際代表維薩里昂·羅明納茨。儘管屋外一片風聲鶴唳，但屋裏參加會議的中共領導人們卻仍然唱着高調，說中國革命應是「無間斷的革命」、「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周恩來也是和唱者之一。他身為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由於起義失敗在會上受到了警告處分。但同時，他在黨內的職

務不降反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並出任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會上，毛澤東也因為在秋收起義上「完全違背中央策略」而受到批判，但和周恩來不同，他被撤銷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1]

此後四年間，直到1931年底，上海成為周恩來從事革命活動的主要基地。這幾年裏，中共最高領導的位置幾度易人，周本人則從來沒有登上過這個「高位」。但實際上，正如下文將述及的，由於他控制了整個黨的組織系統和情報網絡，本來是有條件和機會在黨內成為「群龍之首」的，但他卻沒有走上這條道路。不僅如此，有好幾次，他還因為過分拘泥於「細微末節的小事」，把握不住「大事」上的政治傾向，屢次成為黨內批判和鬥爭的「靶子」。[2] 不過，批判歸批判，不管是誰擔任中共最高領導或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茨幾個月後就走了），周恩來在政治上卻始終不倒，一直在黨內最高層佔有一席之地，並保持着對黨的日常運作的實際控制。

周恩來在處於地下狀態的黨中央擔任新職後，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和同志們所處的是一種四面受敵、充滿危險的環境。確實，若從中共的視角來看，當時的上海是一派「白色恐怖」的氛圍。自蔣介石於4月開始「清共」以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和黨的同情者被捕被殺。國民黨當局和租界警方都千方百計地挖掘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試圖予以摧毀。但與此同時，上海畢竟又是一座「分裂的城市」，受轄於各方的警察情治系統往往互不通氣，更談不上協調行動，還是為中共提供了從事地下活動的相當空間。[3]

鑒於上海當時的條件和環境，中共不僅要在這裏生存下來，還要展開活動，周恩來上任伊始便把情報及保衛工作當作頭等大事，並成為中共情報組織及活動的開山鼻祖及總頭領，終其一生從未放手。他到上海後不久，就建議成立中央「特別事務科」（特科）。[4] 這對於他來說，並不是一件需要白手起家的事情。早在1927年5月，當他還在武漢領導中央軍事部工作時，就在部內成立了「特務工作處」，亦稱特務科。擔任科長的，是一個名叫顧順章的人。他是上海人，工人出身，頗具傳奇色彩，懂一點功夫，又善變魔術，還同地下社會青紅幫有着緊密聯繫，也可算是「道上之人」。特務科主要從事安全保衛以及情報收集的工作。[5]「七一五事變」後，包括顧順章在內的特務科一班人馬從武漢遷往上海。1927年秋，周恩來以這班

人馬為基礎，設立了特科的建制，仍由顧順章負責，從事情報、安全、反諜、除奸、無線電通訊聯絡等工作。[6]

特科組成及展開活動時，有一個關鍵性的有利條件：從一開始，它就得到了莫斯科和共產國際在資金和技術層面的全面支持。一方面，中共派人前往莫斯科受訓（顧順章即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設備、人員和技術上的幫助。這樣，特科建立不久，除其成員的獻身精神外，又很快在技術手段等方面領先其對手和潛在對手。特科成立一年後，中共中央又於1928年11月14日成立了由周恩來、向忠發、顧順章等組成的特務委員會，負責領導中央特科和聯絡共產國際及莫斯科相關部門。[7]

周恩來在上海當時「白色恐怖」肆虐的環境下能夠生存下來，簡直是一種奇跡。這固然同上海市區的相當一部分是租界地盤有很大關係，同時又和他本人的謹慎應對是分不開的。在上海的這幾年裏，他極其注意安全問題，對細節尤為重視。他經常變換住所，在某一處居住絕不超過一個月，每換一個地方就改換一次名字。他總是盡可能地把外出的時間控制在天亮之前和天黑之後，如無緊急情況，白天決不外出，必須外出時，一定經過仔細化裝。他還留起了大鬍子，即便是熟人亦難以辨認。[8]

二

1927年秋冬之際，令周恩來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感到最難以把握的，是關於中國革命究竟處於何種階段、面臨何種前景的問題。1927年12月，中共在廣州發起武裝暴動，曾一度控制主要城區。但幾天之後，在蜂擁而來的優勢敵軍的圍攻下，中共在大革命中的「最後一搏」完全失敗，周恩來的幾位親密同志如張太雷等，也在暴動中身亡。蘇聯駐廣州領事館捲入了暴動，受到國民黨部隊的報復性攻擊，多名蘇聯領事館人員陳屍街頭。此後，蘇聯與國民政府斷絕外交關係。這一切，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打擊是沉重的。如何對形勢做出判斷，確定行動的方向，制定相應的路線和戰略，成為令周恩來和黨的其他領導人感到困惑的頭等大事。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從1927年底、1928年初開始，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黨代表大會的籌備開始了。會議的地點，最後選定在

紅都莫斯科。這固然是出於安全上的考慮——當時在國內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地點召開聚集黨的所有領導人的大會。但更重要的是，在制訂黨在新形勢下的大政方針時，中共精英們需要共產國際在近旁予以指導。

1928年5月初，周恩來攜鄧穎超，打扮成一對古董商夫婦，從上海乘一艘日本輪船到大連。登岸後，幾個日本便衣人員上前攔住他們，並將他們帶到警署盤問。「幹什麼的？」一名便衣問道。「做古玩生意的」，周冷靜對答。「為什麼買那麼多報紙？」「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到東北幹什麼？」「看舅舅。」周一一回答問題後，未露出破綻，便衣們決定讓他走。周夫婦二人當天下午就離開了大連。[9] 之後，他們乘火車穿越東北，進入蘇聯。

5月中旬，周恩來夫婦到達莫斯科。當時，在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內，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在與列夫·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及「聯合反對派」的激烈黨內鬥爭中已經佔據了上風。「中國問題」曾是雙方都不能忽視的重要籌碼，現在也成為斯大林鞏固勝利的重要戰線。[10] 6月9日，斯大林接見中共代表團成員，周恩來亦參加並擔任記錄。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見到斯大林。斯大林講話時，腦子裏顯然有着他和托洛斯基論戰的話題，他講的是中國的形勢，但主要的着眼點其實並不是中國革命應當如何前行，而是怎樣才能徹底擊倒托洛斯基及其他反對派。他強調，在中國不能搞不斷革命（這正是托洛斯基的論調）：「帝國主義仍是最主要的力量，在華（保持着）強大的軍事力量，絕不同於俄國革命。」革命有高潮，也有低潮，「現時我們不能說中國革命已高漲了」。但中共不能坐等革命高潮的到來，而是要在革命仍處於低潮時，「利用此機會以創造軍隊，因為沒有武力是不行的」。周忙着記錄，沒有發言。[11]

「現在還是高潮，因為各地還存在工人和農民的鬥爭」，與會的中共領導人李立三還想同斯大林討論幾句。「低潮時也有幾個浪花」，斯大林板着面孔把李立三頂了回去。[12] 周恩來看着他們，什麼也沒說，也沒有記錄這段對話。

中共代表們帶着困惑、焦慮和迷茫的情緒，亟盼能在革命聖地莫斯科找到答案。於是，他們提出了一大堆問題。其中有理論問題，如中國有什麼樣的資產階級？有幾個階層？中共應如何對待小資產階級？他們也提出

了同當前形勢有關的問題，如革命潮流高漲和革命高潮有什麼區別？在世界革命低落的情況下，中國革命能否靠自己的力量去爭取勝利？最尖銳的問題之一是，為什麼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總是右傾，國際來中國的代表為什麼總是搖擺不定？[13] 莫斯科和共產國際方面出來回答問題的，是有着布爾什維克黨理論家之稱、當時還是斯大林盟友的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他說，中國革命尚未出現高潮，而是處於舊革命浪潮走向新革命浪潮的那個屬於「波谷」的中間階段。[14] 儘管中共代表們表示，布哈林對他們很有啟發，但他們對他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恐怕還是不甚了了。尤其是，怎樣才能將這種理論上的認識轉變為戰略和政策，仍然是未解決的問題。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區的一所舊式莊園舉行。周恩來是會上的中心人物之一，擔任大會秘書長，負責會議的組織工作。[15] 他在會上先後做了組織和軍事兩個報告，還發言對由瞿秋白所作的政治報告做了長篇評論。

這幾個報告中，最重要的是周恩來對應瞿秋白政治報告的長篇發言，這本身其實就是一篇政治報告。對此，周極為重視，單是提綱就密密麻麻地寫了好幾頁。報告中反映出來的，是他的焦慮、困惑、嚮往和許多具體計劃及盤算。關於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以及黨的戰略問題，周的說法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甚至是混亂的。一方面，他對取消不斷革命論表示贊成，因為它很容易同托洛斯基的錯誤相混淆。但另一方面，他又說，我們相信革命是向前的，向着高潮和高漲的方面不斷發展。其實，周在對形勢和戰略敘述中表現出的困惑並不奇怪，這也是當時中共領導人總的思想狀況和水平的反映。瞿秋白在政治報告中就強調說：「革命客觀上是走向高潮，是向上漲而非低落，亦非停滯。」[16] 在這一認識上，周恩來和瞿秋白沒有基本的不同。在周的發言中較為清楚的，是他把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融入了自己的思考當中，並根據斯大林的看法，主張要發動群眾，準備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在目前就應開始割據局面的準備」。[17]

相形之下，周恩來的組織報告要清晰得多。在國民黨清黨後，中共組織遭到重創，大批黨員和黨的同情支持者遭到殺害，還有4,600餘人身繫

獄中。重整黨的組織，並加強黨的紀律性，是中共面臨的最重要且必須應對的挑戰。周報告的重點，強調了集中領導和紀律的極端重要性。如果周恩來自建黨時起就一直認為，中共應當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列寧主義政黨的話，那麼在「白色恐怖」橫掃中國的情況下，這就更重要了。[18]

周恩來還在會上作了軍事報告。這顯示，他仍然是黨內公認的軍事幹才；同時，這也表明了中共及周本人對軍事問題的高度重視。在這方面，中共的教訓是慘痛的。某種意義上說，中共在大革命中的失敗，首先是一種軍事上的失敗，是黨沒有抓住槍桿子的結果。加上斯大林對軍事問題如此重視，周恩來因而強調：「在現在中國軍事新局面下，武裝暴動準備是非常重要的。在準備武裝鬥爭（中），軍事力量是主要因素。」[19]

在7月19日舉行的六屆一中全會上，周恩來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第二天的政治局會議上，又當選為五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另四人是向忠發、蘇兆徵、蔡和森、項英），並兼任中央常委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20] 周恩來是他們當中唯一活着看到了中共革命勝利的人。

後來，周恩來極為重視六大以及其參加六大的經歷。在延安整風中，他成為嚴厲批判的對象，對很多問題都作了檢討，唯獨對六大，他一直堅持「路線基本上是對的」，大方向沒有錯。他在整風中最終「過關」後所作的第一次大報告，也同六大有關。[21] 而對此，在整風中剛剛導演了對周的嚴厲批判的毛澤東，也採取了同意和接受的態度。為什麼？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應當在於六大強調黨內紀律和集中領導的問題。這對於中共作為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定位，以及與此相關的「黨文化」的基礎及核心的形成，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也正是已經確立了黨的最高領袖地位的毛澤東所需要的，並同毛關於中共組織應高度集中的構想有着相通之處。只是，毛後來走得更遠了。

六大結束後，周恩來又以中共領導人的身分，參加了7月17日到9月1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六大，並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22] 這表明，周已受到了莫斯科的重視，並在整個國際共運中嶄露頭角。

共產國際六大結束後，周恩來在莫斯科又待了一個多月。根據官方資料記載，每位派遣在蘇聯受訓的軍事人員，回國時都由周審查。同時，周

也參與解決中山大學學生中爭論分裂問題的調查。[23] 除此之外，他是否一直在莫斯科，又做了些什麼？在去莫斯科開會前，周恩來已是中共特科的頂頭上司，全面負責中共的情報及安保工作。據長期在周領導下負責情報工作的羅青長所述，周恩來後來曾多次說起，在莫斯科期間，他曾為建立中共情治機制及展開情報活動向蘇聯方面「取經」。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相關人員向他傳授介紹了蘇聯「契卡」從事的三項任務，即「打入敵人內部收集情報、籌款、制裁叛徒」。同時，還有一項原則，「這個工作不許在黨內搞」（即不能對黨內的同志搞情報、特工這類手段）。[24] 除此之外，周恩來應該還學習並掌握了從事情報活動的一些特殊技術和手段。他回到上海後，在中共第一個秘密無線電台的建立過程中，一直參與並「給予指導」，同時也編製了它的第一本密碼本。[25] 可以想見，周恩來關於情報活動及技術的專業知識的獲得，同他在蘇聯期間的經歷是分不開的。直到10月初，周恩來才離開莫斯科，乘火車途經東北回國。

三

11月上旬，周恩來回到上海。他要面對的，首先是中共中樞機構在上海的安全問題，以及同莫斯科及共產國際的聯絡問題。因此，安全情報工作依然是周不敢馬虎對待、更不敢忽略的頭等大事。周恩來回到上海後，進一步對特科予以充實和加強。他極為重視技術手段的問題。到1929年10月，在周恩來的直接佈置和指導下，中共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個秘密無線電台。[26] 在1920年代後期上海的特殊環境下，特科作為一個完全處於地下的特情機構，居然能夠在同國民黨方面的情治機構以及租界的情治機構的對抗中，不僅較長時間地生存下來，並一再在一些具體事件的處置上佔得先機。這是如何做到的？可否說這也是蘇聯情報機制和手段同國民黨及租界當局較量的結果？

周恩來還花了大力氣，安排「臥底」和眼線在國民黨以及租界情治機構中。凡這方面的人事，他都親自來抓。由此，產生了中共情報工作中的「龍潭三傑」（前三傑）：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其中，錢壯飛通過關係進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的前身），居然做到了調查科負責人徐恩

曾的貼身助手。這是周恩來在國民黨情治系統中樞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彈。李克農由錢介紹，也進入了調查科，後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工作。胡底則在調查科天津機關電台任職。[27]

周恩來的另一大收穫，是成功策反了國民黨中統駐上海特派員並同英國巡捕房有深厚關係的楊登瀛(即鮑君甫)。同「龍潭三傑」不一樣，楊登瀛不是黨員，至多只是對中共抱有某種同情，他答應幫中共的忙，主要是因為周恩來對他的重金收買。他成了周恩來和特科在中統和租界警察中埋下的最重要的眼線。[28] 特科還設立了紅隊，專門負責使用「非常手段」對付危害較大的敵方特務以及己方的變節分子和叛徒。[29] 特科的負責人雖為顧順章，但顧要向周彙報，周也始終過問並掌控着特科的決策和日常活動。此外，特科的一些最為重要的情報關係，由周恩來單獨掌控，甚至連顧順章也未必清楚。可以說，當時在中國、尤其是在上海這個角逐場上，還沒有哪個機構、哪種力量，有着像中共及共產國際那樣具有獻身精神的人員，以及把情報技術手段的使用和實際任務的執行如此天衣無縫地結合起來的能力。

周恩來及中共中樞所面臨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全力恢復黨在白區的組織機構。他心細如絲，必要時又能夠快刀斬亂麻地來處理問題。1928年12月中旬，周恩來來到他已闊別多年的天津，幫助當時處於癱瘓狀態的中共順天、直隸(即京、津、河北地區)組織恢復活動。他在天津待了一個月，到1929年1月中旬，在他的指導下，新的中共順直省委終於建立起來。[30] 在天津期間，周居然冒着風險，拜訪了南開老校長張伯苓。個中緣由未能知曉，但由此顯露出來的，應包括他對南開的長久不衰的感情。[31]

1929年1月中旬，周恩來回到上海，又值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發生嚴重爭執。在周前往天津期間，向忠發、李立三等已作出了由中央接管並兼任江蘇省委的決定。消息洩露為江蘇省委所知後，引起強烈反彈。周回上海後獲知此事，深知此事若處理不當，可能會對當時已處於劣勢的黨的地下組織造成進一步的損害。於是，他一面同向忠發、李立三交換意見，說服他們收回由中央兼併江蘇省委的成命；一面同江蘇省委溝通，要他們後

退一步，承認錯誤並作出檢討。此後，中央與江蘇省委得以達成妥協，這一問題以江蘇省委改組而得到解決。[32]

周恩來在這一時期所遇到的挑戰中，最重要和最為棘手的是如何處理同毛澤東和中央蘇區的關係問題。從黨內來看，當時周絕對還是毛的「頂頭上司」；他處理與毛有關的各種事務，是他與毛之間發生實質「工作關係」的開端。這種交往和交集，將成為他和毛此後幾十年關係的一塊重要基石。

1927年國民黨實行「清黨」之後，在中共中央仍試圖堅持城市暴動路線的同時，彭湃、毛澤東等一批本來便已對農村革命相當關注的黨員，潛入鄉村山林，動員農民，組織暴動。本來，彭湃的名聲和氣候似乎比毛澤東更大，一度也曾在廣東海陸豐建立起了蘇維埃政權。但到了1928年5月，在廣東當局的大軍圍剿之下，海陸豐根據地失敗了。彭本人則在逃脫後潛往上海（後來在上海被捕後遭到殺害）。[33]

毛澤東於1927年秋在湖南組織秋收暴動，本意是呼應南昌起義，但行動未能銜接上，再加上遭遇強敵，毛澤東帶領着千餘名殘兵，在逃竄中來到位於湘贛邊界的井岡山，收編了佔山為王的王佐、袁文才所部，才得以落腳。後來，朱德率南昌暴動後的殘部前來投奔，壯大了毛的聲勢。起初，毛澤東並沒有建立根據地的理念和計劃。但佔領井岡山後，他發現這是一個江西和湖南兩邊都不管、也派不出精兵強將的地方。通過分土地、打土豪，毛領導的紅軍不僅獲得了農民的支持，也有了給養和補給的來源，勢力和影響逐漸壯大，甚至引起了莫斯科的注意，並獲得正面評價。[34]毛是書生出身，而朱德則是職業軍人。毛與朱德相伴，通過「戰爭中學習戰爭」，後來在中共領導層獲得了「能打仗」的盛名，朱德功不可沒。[35]

然而，到1928年底、1929年初，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軍的發展遇到了瓶頸。1929年1月，在敵軍集中優勢兵力的壓力下，毛、朱部隊放棄了井岡山，轉往贛南，又在大余遭遇了優勢敵軍，倉促應戰之下打了敗仗。同時，又與上海黨中央失去聯繫。[36]

周恩來在黨中央負責軍事工作，處理此事是他的職責。2月7日，他代表中央起草了給毛、朱等人的一封信，史稱「二月來信」。六大後，周及

中央曾幾次給毛、朱去信，均未獲回音。因此，信的基調是悲觀的。根據六大的指示，在中國搞革命，「游擊戰爭將成為主要鬥爭的方式」，而共產國際的看法是，中國的紅軍應該分散存在，若集中便可能會被敵人消滅。周在信中因而要求紅軍應當分成小分隊活動，「朱毛兩同志有離開部隊來中央的需要」。[37] 4月7日，周在代表中央給毛、朱的另一封信中仍表示，「潤之（即毛澤東）、玉階（即朱德）兩同志出來，到現在原則上我們仍然繼續這一個意見」；但同時又留下餘地，「若一時還不能來，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暫時離開那裏，來中央報告與討論一切問題後，再回到你們那裏去工作」。[38]

其實，就在「二月來信」遞送途中時，朱、毛紅軍已經連續打了幾個勝仗。4月3日，當紅四軍前委收到信時，形勢已大為好轉。因此，毛、朱在4月5日給中央的回信中，徑直批評周恩來等人「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毛、朱並拒絕離開紅軍去上海。[39] 6月12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紅四軍來信。周一方面提出，紅四軍指責中央對形勢估量悲觀「不十分正確」，一方面又承認，由他起草的「二月來信」要紅軍分散也「是有些毛病」。會議決定，不再要毛、朱來中央，只要派「一得力人員」來就可以了。[40]

這是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自廣州時期後的第一次重要接觸與交手。周恩來對於與毛、朱分歧的處理，已開始表現出他後來處理同毛有關事務的一些特點。他應清楚感覺到，毛絕非等閒之輩或容易對付之人。儘管從黨內地位來說，當時他是毛的頂頭上司，但他卻沒有用「官大壓一頭」的態度來對待毛，而是對毛表現出足夠的尊重。實際上，從周對這件事的處理中，已可以隱約感覺到他對毛的一種尊重之中夾帶着敬畏的態度。這件事情顯示了周一貫的風格，但是否也透露出周與毛關係中一種分明存在，卻又說不清、道不明的「化學反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9年4月，蔣桂戰爭爆發，敵軍注意力從朱、毛紅軍轉移開去，朱德、毛澤東乘機恢復了井岡山根據地，並在贛南擴大勢力。但此時，紅四軍內朱、毛兩位主要領導者之間卻發生了嚴

重的分歧和爭論。紅四軍放棄井岡山前，設有由朱德任書記的軍委，上面還有由毛澤東任書記的前委。離開井岡山後，在連續作戰的環境下，軍委和前委同時存在，「不便機斷」，於是決定軍委「暫停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也就是集中到毛的手中。[41] 形勢好轉後，部隊擴大，軍委恢復運作。

恰在此時，中央派遣不久前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到紅四軍，前委決定讓他出任臨時軍委書記。劉與朱德是同鄉，又曾一道留學德國。他上任後，便在朱德支持下開始將權力集中到軍委，逐步架空前委。專權的毛澤東當然不會答應，於是提出取消軍委，遭到朱德反對，結果朱、毛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矛盾，紅四軍亦出現了擁朱及擁毛的兩派。6月，紅四軍召開第七次黨代會。主持會議的代理前委書記陳毅對朱、毛都打板子，但對毛打得更重，說「他對此次爭論應負較大的責任」，並批評毛有「形成家長制的傾向」。最後選舉時，毛落選前委書記，陳毅當選。[42]

這一下事情真的鬧大了。毛澤東盛怒之下，採取了走人的態度，回到後方「養病」去了，並向中央告狀。[43] 陳毅急忙趕赴上海彙報，事情搞到了上海黨中央那裏，又要由周恩來處理。8月間，政治局收到來自紅四軍方面以及毛的報告後，連續開會討論這個可能造成紅四軍分裂的事件。在8月13日的會議上，周提出，紅四軍七大的決議「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會議決定由周起草一封給紅四軍的信，並調劉安恭回上海。[44] 陳毅到上海後的8月29日，政治局舉行臨時會議。周讀了各種材料並同陳毅談話後，覺得要避免紅四軍分裂，關鍵還是要把毛請回來。他一面批評毛的「家長制傾向」，一面又批評七大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客觀上助長了極端民主化的發展」。他採取的措施是，朱、毛仍留前委，毛繼續擔任前委書記。[45] 會後，他又同陳毅多次談話，做通了陳毅的工作。之後，陳毅代中央起草了另一封信，經周修改審定後，作為中央指示信，由陳毅帶回紅四軍。[46]

這就是「九月指示」，又一封揭示了典型的「周恩來風格」的信，在對毛澤東、朱德各打五十大板的基礎上，他更傾向毛這一邊。信中批評了毛落選後撂挑子不幹的做法為「不應有的消極觀念」，暗指毛藉着黨的名義，過於獨斷專行。但同時，信中肯定了毛「工農武裝割據」的想法，以及紅

軍的基本任務是實行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先取鄉村，再奪城市。更要緊的是，信中同意紅軍由前委指揮，並將黨代表改為政治委員。信中要求紅四軍全軍維護朱、毛領導，又明確提出由毛澤東任前委書記。[47]

「九月指示」由陳毅帶回紅區後，朱德當即表示接受，朱、陳兩人又恭請毛澤東「出山」。毛得知中央要他回前委主持工作後，馬上宣佈「我病已好」，隨後即「從蛟洋到達汀州，與四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48]之後，毛澤東又乘勝追擊，於12月底在福建古田舉行紅四軍「九大」，通過了後來被認為屬於毛主義中心文本之一的〈古田會議決議〉，強調「黨指揮槍」的原則，確定了毛的軍內建黨路線為黨的正統路線。[49]毛在紅軍內的聲望和權力都大大增加。若是追根溯源的話，周恩來在其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也就在上述過程中，周恩來對於在偏遠鄉村形成武力割據，從事「土地革命」的方式，以及對毛澤東的看法都發生了改變。周雖然早已認識毛，但兩人的關係絕對算不得深厚(相形之下，周同朱德的關係要深厚得多)。周同毛在「不打不相識」的交往中，聯繫多了起來。周恩來從來沒有把事情做絕，而在一些關鍵點上，他對毛可以說是「有恩」的。對此，毛其實是記得的，儘管毛對此從來沒有明言承認過，但他後來確實說過，「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50]這成為周恩來後來在毛治下，儘管毛對他不滿，但仍可以用他，而他則始終不倒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不管怎麼說，大概從此時起，毛在周心目中也變得越發重要了。

四

1930年3月初，周恩來在並無預兆的情況下，「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突然離開上海，前往蘇聯。[51]這件事的緣由，看來同中共領導層內部以及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此時的一場大爭論有關。他的主要任務，則是「以中央代表身分，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自六大以來的工作及解決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爭論等問題」。[52]

一段時間以來，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遠東局之間陷於緊張狀態。自1929年起，由一個「波蘭毛子」和一個「德國毛子」組成的遠東局，便在一

系列問題上，和中共領導層存在分歧，[53] 其中涉及到具體的戰略和政策問題。1929年10月，受到中共影響的廣西軍閥俞作柏和李明瑞揭竿反蔣，中共派遣鄧小平為代表赴廣西，同俞、李合作，後來組織了左右江暴動。國際代表認為，這是混淆了階級陣線的右傾錯誤。共產國際代表從未到過中國鄉村，卻在上海的地下環境裏想當然地認為，中共應當把富農也當作革命的對象，予以打擊和消滅。周恩來等對此不敢苟同，認為這是把俄國的情況生吞活剝地拿到中國來了。其實，這裏涉及的實質問題是，遠東局希望對中共握有全面的領導權，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則不接受。1929年12月，遠東局又以接受共產國際十次全會決議的名義，通過了一個決議，指責中共領導層犯了右傾錯誤。周會同向忠發、李立三同遠東局開會，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雙方關係更為緊張。[54] 中共中央於12月14日決定，派人帶文件去莫斯科直接向共產國際報告。[55] 但周恩來因事情多，並還想同遠東局代表作最後的理論，沒有馬上成行。拖到了1930年3月，中共領導人和遠東局代表又陷入了另一輪爭吵，互相指責對方奉行「右傾政策路線」，實在拖不下去，周才決定走這麼一趟。

同他1928年去莫斯科參加六大的情況不同，這一次，周恩來沒有由東北及西伯利亞大鐵路出發到莫斯科，而是先經由海路到歐洲，再乘火車去莫斯科。但關於他的具體行程等，至今未看到可靠的文獻記載。只知道他在路過巴黎時，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未經事先通報便去訪問了前女友，即當時還在法國的張若名。之後，他路過德國，[56] 4月下旬在柏林參加了旅德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的一個小會，就國際形勢及國內蘇區及紅軍的發展做了報告。[57] 4月27日，他還化名陳寬，在德共機關報《紅旗報》上，發表了題為〈寫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前〉的文章。[58]

周恩來在5月上、中旬之間到達莫斯科，一直待到8月初。他的首要任務，是處理中共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分歧問題。他一到莫斯科，就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一份關於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分歧的報告。[59] 隨後，他的活動重點在於解釋中共的思路與戰略。7月5日，周恩來在聯共（布）十六大上作了題為〈中國革命新高潮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一方面竭力解釋中共的路線和策略，另一方面試圖搞清楚共產國際本身的看法。[60]

7月下旬，周恩來又一次見到了斯大林。根據周本人的回憶，他是和瞿秋白一道見斯大林的，談了一個多小時。周恩來顯然希望抓住這個機會，向斯大林報告並解釋中共的政策路線。但斯大林聽取了周關於中國情況的簡報後，沒有給他太多說話的機會。他宣稱，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大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發展很不平衡。因此，中國革命的發展也必定是不平衡的。在德國，工人們在柏林發動一場起義就可以讓共產黨人奪取全國政權；但在中國，中共需要首先在一省或數省取得勝利，並在那裏建立和擴展革命基地，才能繼而奪取大城市。要實行這樣的一種戰略，就必須建立一支強大的紅軍。因此，斯大林強調說，中國農村的游擊隊發展成為紅軍是一件大事，「這是中國革命的希望之所在，而你們的黨中央還未注意到，以後要作為中心問題來看」。斯大林還說：中國的軍隊能夠在四川這種地方存在下去，你們總不會不如軍閥吧？[61]

在周恩來聽來，斯大林的話更像是對中共戰略的肯定，而不是批判。7月中旬，他在聯共(布)代表大會上發言，講到了中共如何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他說，鑒於中國內部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在全國出現革命高潮以前，蘇維埃政權和紅軍也在個別地區事先存在」，但同時「新的革命浪潮正在廣泛掀起」。[62] 7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既肯定「中國革命運動的新的高漲，已經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又承認「暫時我們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63] 這一模棱兩可的說法，促使周恩來進一步相信，斯大林和莫斯科仍對中共和遠東局代表的爭論持中立態度。他覺得，他來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了。

周恩來到蘇聯的使命中還有一項，即解決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支援的問題。中共自成立後，就一直得到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1927年後，隨着中共全面轉入地下，這種援助也更為重要，甚至涉及到了紅軍的發展及中共地下組織的生存。但共產國際卻一直未能穩定地向中共提供經費，有時還任意削減，雖經中共中央一再交涉，亦未能解決這個問題。[64] 斯大林提出中共應重點發展蘇區和紅軍的意見的同時，也關注起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的問題。8月間，他又單獨會見周恩來，表示這件事一定能夠獲得圓滿解決，並向周許諾：「今後你們應按黃金比價收到經費。」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共產國際聯絡局局長奧西普．皮亞特尼斯

基（Osip Pyatnitsky）也在會見周時說：「今年共產國際駐上海全權代表將給中共支付一切舊債。」他甚至具體承諾：「我負責通過新的途徑把款項寄給中共，我向您保證，在您抵達之前，中共將及時收到按照黃金比價折算的所有現款。」[65] 獲得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方面的這些口頭保證，至少從當時來看，是周恩來此次蘇聯之行的又一大收穫。

根據一些回憶錄及其他資料，周恩來從蘇聯回國之後不久，就「發明」了在中共內部最高層級的「豪密」密碼。[66] 這種說法值得注意，並需要甄別。鑒於密碼（尤其是高級密碼）的編制需要極為專門的知識，周恩來是否可能「發明」或編制出「豪密」？這是大可懷疑的。較為可能的是，由於他是中共情報機構及活動的負責人，他組織並參與了「豪密」的編制。但即便如此，他仍然需要一些這方面的專門知識。由此使人想到，這應當同他在蘇聯1930年訪蘇的經歷有關聯。本來，早在1928年他前往莫斯科參加六大時，就曾有過向「契卡」學習取經的經歷。這一次，他當然不可能放棄進一步同蘇聯情報機構接續前緣的機會，而鑒於在中共和莫斯科之間保持穩定有效的秘密電訊聯繫的極端重要性，密碼編制更成為一項屬於重中之重、並受到他重視的「學習項目」。否則，為什麼不早不晚，恰恰是在他從蘇聯回來後，便做出了「豪密」這一套後來一直為中共高層通訊使用，據稱亦從來未被破解的最高級別的密碼？

五

周恩來於8月上旬離開莫斯科，8月20日前後回到上海。他馬上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把斯大林和皮亞特尼斯基保證向中共提供的費用拿到手。然而，真的要辦到這件事，卻比周的想像要困難得多，拖延的時間也長得多。當時，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的手裏其實並沒有那麼多可以交付的現金。周恩來和中共方面同共產國際代表以及莫斯科方面來回交涉，幾經周折後，斯大林親口答應要給的資金才部分到達中共手裏。即便這樣，這對周和中共來說，也已經是雪中送炭了。[67]

共產國際拖延向中共提供資金，除確實存在籌款的實際困難外，更重要的是當時由向忠發、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在大政方針上

出現了重大分歧。早在周於3月初赴蘇前後，向忠發和李立三等為了在同遠東局代表的爭執中佔據政治上乃至道義上的制高點，不斷提出要「反右傾」。周離開上海的這段時間裏，向、李成為中央的主事者，在「反右傾」上步步緊逼、愈行愈遠。5月中旬，李立三提出，中國是帝國主義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必然是世界革命首先爆發的地區。中國與俄國不同，革命要在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因此不能馬上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68] 6月11日，中共中央通過「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正式確定了迎接「直接的革命形勢」，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戰略。第二天，中央在給共產國際主席團的電報中，闡明中國革命「猛烈發展」的形勢，要在爭取一省及數省首先勝利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革命轉變」，並要求得到「勝利的蘇聯無產階級的有力幫助」。[69] 遠東局代表看到這一決議後立即意識到，這同斯大林當時已實行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大戰略是矛盾的，馬上提出了尖銳的反對。[70] 向、李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同遠東局代表陷入更為激烈的爭論，雙方的矛盾也進一步激化。

7月初，共產國際在回電中指示，中共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蘇維埃政權，並發展紅軍。[71] 向忠發、李立三等誤讀了共產國際的意圖，認為這同他們奪取一兩個中心城市、並進而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的想法是相通的。7月16日，他們向共產國際報告，「現時革命突飛猛進」，完全可能「先行爭取武漢武裝暴動勝利」，再發動南京暴動及上海總罷工，「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72] 幾天後，共產國際即回電明確表態，「反對在目前條件下在南京、武昌舉行暴動以及在上海舉行總罷工」。[73]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國內情勢發生了大的變化，蔣介石和兩位執掌地方軍政大權的軍閥閻錫山、馮玉祥翻臉，在中原地區爆發了蔣、馮、閻大戰。蔣不得不將本已投入「剿共」行動的部隊調去參加與馮、閻所部的激戰。紅軍第三軍團抓住駐長沙敵軍部署空虛的機會，於7月27日攻下長沙並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一來，向忠發、李立三等的腦子更熱了，以為革命高潮真的要來了。8月3日，中央政治局決定，要抓住當下的革命局勢，把暴動進一步推向華北各地，甚至認為，為此「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甚至不惜在滿洲與日本開戰，以使得中國革命「可以得到更快的成功」。[74] 8月5日，中共政治局致電共產國際，請莫斯科「務必批准中央的決定」。[75]

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羅斯特當即急電共產國際報告情況，並同時致信中共中央，指責李立三等已「捲入反對共產國際的鬥爭」，並「慫恿政治局作出關於蘇軍出兵和蘇聯對世界帝國主義宣戰的決議」。[76]

周恩來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回到上海的。他深知，處理向忠發、李立三及中共中央同遠東局的意見分歧是一樁頭等大事，絕不能讓已在雙方之間燃起的大火繼續延燒擴展。於是，兩三天後他便先後約見李立三和向忠發，向他們轉達他所理解的國際指示精神，並強調遵照指示嚴格執行的重要性。[77] 在這兩次談話的鋪墊下，8月22日和24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做主要報告。在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時，為了說服李立三做「深刻的自我檢討」，他盡量輕描淡寫地敘述中共中央和國際的分歧，說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沒有絲毫的懷疑」。中共中央同國際之間，「在路線上沒有什麼不同」；若有分歧，「只是因為對目前的革命發展形勢在程度與速度上有了過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隨後，周恩來又根據他和斯大林的談話，提請中央注意發展紅軍和蘇區的重要性，指出中央「對此注意和領導不夠」。[78]

如此和風細雨般的批評，固然反映出周恩來處理此類黨內高層問題時的一貫風格，也透露出他其實還沒有真正意識到共產國際對中共批評和指示的嚴重性質。對於周恩來所轉達的「國際意見」，李立三和向忠發都不難接受。李立三承認，國際「確與中央策略的決定有程度上的不同」，但這成為他檢討的底線。向忠發則提議給國際去電，表示過去確有「誤會」，經政治局在周恩來回來後的兩次會議，「以前在這些問題上所存在的分歧，現在已不復存在了」。8月25日，中共中央據此給共產國際發了一封由周恩來起草、向忠發署名的電報，報告會議的情況。[79] 然而，問題其實根本沒有解決。一週後，中共中央在一份由周恩來起草、給長江局的指示電中，雖表示在武漢暴動的時機「尚未成熟」，但着重強調的卻是，「整個形勢是有利於革命爭取以武漢為中心的臨近幾省的首先勝利，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80]「立三路線」的話語和精神，在周的文字和表述中依然存活下來。

9月24日至28日，周恩來同從莫斯科回來不久的瞿秋白一起，主持召開了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批判「立三路線」。李立三再次承認，

在大政方針上，他領導下的「中央的策略與工作佈置犯了冒險傾向的錯誤」。[81] 周在會上又扮演了主要角色。9月27日，他在全會上作〈組織報告〉，又一次特別強調了「鐵的紀律」的重要性。[82] 不過，他並沒有採取對李立三一棍子打死的態度。他在傳達國際路線時仍強調，中央的路線「和國際的指示沒有絲毫的不同」，如有偏差，也「只是因為對目前的革命發展形勢在程度和速度上有了過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83] 根據斯大林同周恩來談話中表達的看法，中央政治局提出，「當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務是……蘇維埃的根據地，創造並且鞏固真正堅強的，政治上軍事上有充分無產階級領導的紅軍」。但接着，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又循着自己的思路表示，這樣做是為了「進而佔領一個或幾個工業政治中心」。[84]

10月初，在六屆三中全會後的第一和第二次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提出，希望離開上海到蘇區去工作。會議也選舉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局。[85] 這一切，固然是由於周當時已對農村革命和武裝割據越來越重視，但是否也因為他已經有某種不祥的預感，因而希望離開上海黨中央這個「是非之地」，卻未可知。可是，周在上海的「未了事務」實在太多，一時難以離開。政治局決定由項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先行前往蘇區。[86] 然而，形勢卻在此時急轉直下，一場大風暴隨即來臨。斯大林接到遠東局關於同中共中央爭論的報告及相關文件後，勃然大怒。他認定，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根本沒有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辦事，周恩來回去也完全沒有起到幫助中共領導人改正錯誤的作用。11月16日，共產國際發佈指示，對中共中央提出了上綱上線的嚴厲指責，斷定李立三犯下了「涉及基本路線的嚴重錯誤」，而且這些錯誤「並非偶然」，而是「有系統的」，暴露了他「反對列寧主義和敵視共產國際」的真面目。[87] 在遭到這一番劈頭蓋臉的指控後，李立三的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經完結了。對於周恩來來說，這種疾風暴雨般的批判也一定讓他大吃一驚。這意味着，他去蘇聯走這麼一趟以及回國後所做的一切，統統都是錯誤的。

六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歷史上頗為重要的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掌控會議的共產國際代表帕維爾·米夫（Pavel Mif，原名米哈伊爾·福爾圖斯）曾擔任中山大學校長。他雖然沒有親自與會，但手裏卻握着共產國際指示的尚方寶劍，儼然擺出了一副「太上皇」的派頭，遙控會議的進程。用周恩來的話來說，這次全會「全是米夫佈置的」，會開得很亂，「會場上幾乎不能維持」。[88] 米夫把會議的宗旨定為徹底批判「立三路線」以及三中全會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態度。他還定下調子，「黨內目前主要危險是右傾」，並決定以此為指南來「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李立三在會議上是批判的頭號靶子。儘管周恩來其實算不上是立三路線的制定者，但他是此前黨中央工作的主要負責人，而且自蘇聯回國後又犯了「執行國際路線不力」的大錯，因而仍然受到了嚴厲的批判，並被指為執行「調和主義」的首要人物。

這對周恩來來說如雷灌頂，心中一定有着不少感慨、委屈乃至痛苦，但他必須做檢討，把錯誤都兜下來。他在會上表示：「黨現在正處在困難時期。立三路線是渙散了黨的，現在正要加緊地將它恢復與健全起來。」他還印發自己在三中全會上傳達國際路線的講話，並親筆註明這是「對立三路線調和主義之錯誤，……我發表了它，也正是要全黨來認識和指斥我的錯誤」。[89] 這就是周恩來的黨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其核心是一種「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的信念。[90]

周恩來畢竟是做事的人，缺了他，連中共中央的日常運作也會發生困難。因此，米夫等人雖然批他，卻並不準備打倒他。米夫本人沒有親臨四中全會，參加了會議的國際代表艾偉特（Arthur Ernest Ewert，周恩來稱他為「德國毛子」）在會上做結論時對周網開一面：「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91] 在米夫幕後的策劃和支持下，他在中山大學時的得意門生，從蘇聯回國只有一年多的王明成了會上殺出的一匹「黑馬」，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進入了政治局。會上選舉時，有人提出了周恩來應當退出政治局的動議，但在單獨付諸表決時，僅獲得6票贊成，卻有18票反

對，因而未獲通過。[92] 結果，周恩來雖遭到批判，卻仍然得以留任政治局常委，並繼續負責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周恩來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的這一段境遇，固然是他在黨內高層政治中的一次歷險，但也從側面透露出了他在上海時期的大收穫：由於他實際操控黨的全部日常運作，使得他在黨內上層的權力開始被機制化了。在他的掌控之下，黨內上層的權力運作又日益同他本人聯繫在一起，若是離開了他，很多事情就做不好，甚至做不成了。

六屆四中全會的結果，尤其是米夫等人的強勢做法，在中共黨內引起了極大的反彈；新上台的王明等人在黨內資歷甚淺，影響還不大，一時也難以服眾，這就造成了全會後一系列由黨的領導人物和精英分子牽頭的分裂行動。早在四中全會前，黨內除王明等留蘇回國的一些人外，還存在着羅章龍、何孟雄等反對當時的黨中央的勢力，其成員大都從事各種實際工作。米夫到中國後，他們並不聽從這位莫斯科來的「太上皇」的招呼。結果，米夫在策劃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時，事先根本不同他們商量，搞得他們連開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不清楚，自然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會上，他們雖一再發聲，卻無濟於事。會後，他們緊急發表〈告同志書〉，抗議四中全會及其結果。由於他們多是做實際工作的，在黨內有一定影響，因此一時間得到了不少支持。1931年1月31日，他們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一週後，三十餘人在召開一次秘密會議時或在其他場合被捕，包括林育南、何孟雄在內的24人旋即遭到殺害。

儘管如此，中共非常委員會依然存在並積極活動。周恩來雖然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受到了嚴厲的批判，但面對這些分裂黨的活動，他的態度卻是十分明確的：從一開始，他就堅決反對這樣的活動，而一旦分裂之舉露出水面，他便立即行動，處理這些「分裂分子」。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給分裂分子「斷糧」，切斷他們獲得來自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援助的任何渠道和可能性。[93] 結果，這一黨內反對派還未成氣候，便被徹底壓了下去，中共也仍然維持着統一。

七

就在這個當口，中共在上海以及全國各地「白區」的處境也變得越發嚴峻。國民政府的特情組織不斷發展，技術手段也不斷提高；在上海，各方對付與鎮壓共產黨地下活動上的協調動作也不斷改進。中共地下組織的空間因而受到極大的擠壓，變得越來越狹小，某種災難性形勢的降臨，其實只是時間和機遇問題。

1931年4月，周恩來經歷了一場巨大災難：特科大頭目顧順章突然被捕和叛變。這幾乎將整個中共領導層和他本人置於死地。

顧順章從武漢轉到上海後，一直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特務及安全保衛工作，是周在這方面最為重要的助手，並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周在重用顧的同時，也對他留了一手，並未讓他掌握中共在上海的全部地下據點及聯絡網絡。1931年春，顧護送張國燾去鄂豫皖根據地，4月24日在武漢被國民黨情治機構逮捕，隨即叛變。[94] 中共中央也陷入了遭遇滅頂之災的危險境地。

就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刻，顧順章卻耽誤了時機。他在武漢被捕後，沒有馬上說出一切，而一定要親自到南京面見蔣介石後才肯和盤托出自己所掌握的中共核心機密。[95] 對於顧來說，這是可以理解的。他知道自己的身價，這麼做是一種顯示自己的重要性、並以此來探測國民黨領導層對他如何看待的手段。但他沒有想到這麼一來，卻留下了洩露天機的可能性。當顧順章被捕並叛變的電文到達南京時，經周恩來安插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在徐恩曾身邊任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在處理文電時首先看到了這一極為重要的情報。他立即安排他的女婿（也是共產黨員）連夜乘火車從南京趕到上海，將這一危急情況報告了周恩來。

周恩來立即便意識到，這是一場若處理稍稍不當就可以帶來滅頂之災的彌天大禍，而他只有一兩天的時間。於是，他立即採取行動，將黨的主要領導人迅速轉移，切斷了顧順章所知道或能夠利用的一切關係，並停止使用顧所熟悉的一切地下工作方法。三天後，當國民黨特情系統根據顧提供的情報對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採取全面的肅清行動時，卻大多撲了空。中共地下組織依然受到了嚴重破壞，但逃過了徹底毀滅的命運。[96] 周恩來先

前對顧順章留了一手的做法，頗有遠見。不然的話，周本人和中共領導中樞要在顧順章出事後繼續留在上海，是不可能的。

任何革命都是殘酷的，並可以把人性中最為野蠻暴戾的一面，以「革命」及「正義」的名義，全面釋放出來。在對顧順章案的善後處理過程中，周恩來也表現出了他身上極為果斷乃至迫不得已時行事殘忍的特質。他親自下令特科人員制裁顧的妻子張杏華，並殺害了顧的全家共九人，包括一名兩歲男童，屍體則就地深埋(唯一的倖存者是當時碰巧外出、年僅三歲的顧順章女兒顧利群)。這成為當時轟動上海的一件慘案。[97]

周恩來為什麼會作出對顧順章全家「滿門抄斬」的決定？對此，中共官史或者全然迴避，或者辯解這是因為張杏華和顧家其他成員也參與了中共地下活動，不得已才如此為之。然而，這種「防止機密外露」的說法，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何必連顧家還在牙牙學語的小孩也不放過？尤其是，周恩來在指導特科工作時，一直是不允許使用暗殺等恐怖手段的。這一次何以會例外？這裏反映出的恐怕是，即便是周恩來這樣一個以冷靜和神經堅強著稱的人，在這場「險走麥城」的大變故之下，也難免有政治決策與行動上「失常」的時候。此外，這似乎還包含着「殺一儆百」的意圖，警告其他潛在的叛徒，若是像顧順章那樣背叛黨的話，就會受到最為嚴厲的制裁。正因為這種做法極其殘忍，周恩來在下令動手殺人時，內心絕不平靜。他對身邊的人們表示，不知道這件事是做對還是做錯了，對於這件事情的是非功過的評判，要由後人來決定。[98]

到了1931年下半年，儘管周恩來做出了種種努力並採取了各種防範措施，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的處境仍然變得越來越困難。國民政府的特務機構對中共地下組織的包圍圈不斷收縮，黨的領導人及骨幹成員被捕及自首叛變的事件也一再發生。周本人更是越來越火燭小心，完全不在白天外出；即便在天黑後，沒有非做不可的要事，他也絕對不出門。就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安全問題，引起了莫斯科方面的注意。5月12日，共產國際舉行會議便討論了這一問題，會議批准周恩來去莫斯科6至12個月。[99]

1931年6月22日，工人出身、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在上海被國民黨情治機構逮捕。周恩來立即採取了危機處理的措施，除了他自己立即搬家外，又緊急搬遷黨的各個地下機構。與此同時，他通過中共在上海的各種內線關係，獲取關於向忠發的情報，並伺機將向營救出來，從而將向忠發可能叛變帶來的負面影響大大減低。向忠發被捕後，幾乎馬上就叛變了。幾天之內，又由於人們始終沒有搞清楚的原因，他被蔣介石親自下令處決。[100]

幾乎在同一時候，在上海又發生了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情報人員牛蘭夫婦被逮捕的事件。牛蘭（Hilaire Noulens）原名雅各布．魯德尼克，烏克蘭人，191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後加入契卡，並進入共產國際聯絡部。1930年，受共產國際派遣來中國建立秘密聯絡站，3月間到達上海。1931年6月初，共產國際的一名信使在新加坡被捕，隨身文件中的資料暴露了牛蘭在上海的身分。6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警方逮捕了牛蘭夫婦，並在他們的住所中搜出了大量文件，包括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給國際的報告、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帳冊等等。一時間，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後來，牛蘭夫婦受審，更成為轟動一時的大事。[101]當時，周恩來已經完全轉入地下，因此沒有直接參與由共產國際組織的對牛蘭夫婦「營救」行動。但這件事的發生，尤其是此後租界警方所採取的協調行動，使得周以及中共組織和機構要在上海生存下去越來越困難。在此種情況下，周恩來暫時沒有離開上海，但幾乎完全轉入了地下，並切斷了和外界的所有聯繫。[102]

根據當時為共產國際情報人員、後來又成為毛澤東親家的張文秋的回憶，1931年9月，周恩來在上海同共產國際派遣的大間諜理查德．佐爾格（Richard Sorge）見面，佐爾格並要求周給他介紹可靠的特情人員。[103]佐爾格是1931年1月到上海的，同中共特科人員聯繫密切。他的聯絡人包括蔡叔厚、潘漢年等，這些人都是周恩來的部下。因此，張文秋所敘周恩來本人同佐爾格見過面並有工作上的聯繫，應屬順理成章，有着相當大的可信度。而從張文秋所敘述的細節來看，周恩來同佐爾格絕不可能僅有這一次見面，應當還有其他的聯繫，相互之間也已十分熟悉。但問題在於，張文秋所提供的周恩來此次與佐爾格會面的時間恐怕有誤。張所提到的1931

年9月，已是在向忠發和牛蘭相繼出事之後，周恩來在上海也已切斷了對外界的一切聯繫，處於完全隱蔽的狀態。那他是否會在這個時候還有可能同佐爾格見面？

隨着上海形勢嚴重惡化，周恩來在上海的安全問題也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進一步關注。莫斯科方面再次於7月3日做出決議：周恩來「應從上海前往蘇區，並在那裏自動增補進蘇區中央局」。如果「不能前往蘇區」，可以「來莫斯科待一段時間」。[104] 周恩來不想去莫斯科。他歷來對於軍事工作就極為重視，而此時，在共產國際以及中共領導層的眼中，紅軍和紅區在中國革命全局中的地位則顯得越來越重要。於是，思考再三之後，周恩來決定從上海轉往中央蘇區。12月上旬，他離開上海。

八

至此，周恩來以上海為基地，度過了四年的時光。回過頭去看，他從這段經歷得到的最大收穫是，在直接參與並領導中共日常運作的過程中，建立起了對中共行政組織和情報系統及其運作的牢牢控制，從而使得自己的權力機制化了。

無論是在上海的這幾年裏，還是此後幾十年的歲月中，中共革命和周恩來本人經歷過多少起起伏伏，然而，正是以他在上海的這段經歷為起始點，以他為中心的行政權力機制化——亦即他在黨和國家權力運作體系中所佔據不可或缺的位置——的現象，卻一直延續了下來。由此而產生的，是中共高層政治此後（包括毛時代在內）的一種極為奇特的現象：從未登上過中國共產黨革命或革命後所建立國家最高領導人寶座的周恩來，卻始終處於權力運作網絡的最重要的連接點，從而成為黨的運作（在1949年之後，則是國家的運作）的一個「中心環節」，在幾十年的漫長歲月中幾乎沒有發生過基本的變化。他自然只是一個人，但從中國共產黨革命早期發展的歷史來看，他已開始成為一種現象。如果沒有他所起到的作用，連革命的運作本身（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整個黨或國家的運作）都會產生嚴重的問題，甚至失控或癱瘓。這也是周恩來能夠參與中共革命上層決策半

個多世紀的原因，他雖歷經種種風浪、波折與磨難，卻始終能夠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

可是樹大招風。就在周恩來離開上海後不久，發生了「伍豪事件」。1932年2月，在周恩來已離開兩個月後，上海《申報》等主要報紙上刊登了一項〈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黨啟事〉。而這裏的伍豪，正是周恩來在五四時期組織覺悟社時所用的名字，後來成為他在黨內經常使用的化名之一。這則啟事，實際上是國民黨情治機構炮製的，目的在於打擊瓦解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共。

之後，中共地下組織出於闢謠的目的，又於2月22日在《申報》上刊登了另一條啟事：「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十八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105] 這是在當時情況下，中共地下組織所能想到的否定前面那個偽造啟事的最好辦法。所有這一切的發生，其實同周恩來本人並無關係，他當時也完全不知情，直到後來才知道有這麼一件事。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這件事不僅在十年後的延安整風中被提了出來，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一再被提出，甚至在他身患絕症時，仍然無法擺脫此事的陰影。[106] 中共黨內政治和鬥爭之險惡，以及文革中周恩來在黨內處境中極為困難的一面，從這件事中清楚地暴露出來。

第8章

紅區
（1931–1934）

一

1931年12月上旬，一個漆黑的夜晚，周恩來一副廣東熟練工人的裝束，搭乘一艘屬於英商的小火輪離開上海。[1] 幾天後的深夜，他在廣東汕頭登岸，隨後通過地下交通線輾轉前往紅區。12月22日，他到達了位於紅區東部的福建長汀；月底，他又抵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2]

所謂「紅區」，是人們對處於中共所領導的紅軍佔領下的區域的統稱。自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分共」後，毛澤東等一批中共黨人在各地（但主要是南方各省邊遠處及省與省交界處）揭竿而起，舉行武裝暴動，並舉着「土地革命」的旗幟發動農民，形成武裝割據的局面。到1930年代初，已形成十幾處根據地，亦即紅區。中共及紅軍在這些區域建立的革命政權，又因襲蘇聯的路子稱為蘇維埃，紅區因而也成了「蘇區」。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跨越江西、福建兩省的這一塊中共控制下的地盤，以「紅都」瑞金為中心，成為「中央蘇區」，也是最重要的紅區。它在全盛時期，所轄領土包括16個縣的全部（包括縣城）和28個縣的部分，總人口一度達到三百餘萬。[3]

但對老百姓和參與圍剿紅軍的國民黨部隊一般官兵來說，他們其實並不知道「蘇維埃」究竟是什麼，甚至以為這是中共和紅軍某一大人物的名號。於是，還出現了國民黨軍隊進攻蘇區時，貼出告示懸賞大洋五萬元以求「匪首蘇維埃」首級的笑料。

周恩來離開對共產黨人而言已日益成為「死亡之城」的上海，告別與黑夜相伴的生活，來到天日可見的蘇區，歡悅之情溢於言表。[4] 但同時，他想到將要面臨的挑戰，心中難免忐忑。畢竟，他進入了一種全新的環境。雖說他曾擔任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也參加過兩次東征，但並沒有直接從事作戰指揮的經驗。他唯一的軍事指揮經歷，是南昌起義及之後率部向廣東的轉進，但那卻是一趟失敗之旅，他本人也屬於敗軍之將。自1927年以來，他一直在中央主持軍事工作，但那畢竟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周心裏應當明白，自己到蘇區後能否立足乃至立威，會遇到各種困難。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處理同蘇區「山大王」毛澤東的關係。

自1929年從「二月來信」到「九月指示」，周恩來同毛澤東幾番「交手切磋」之後，兩人幾年裏沒有太多的直接交往。由於周在六屆三中全會後已內定為蘇區中央局書記，又在中央主持軍務，再加上共產國際對紅軍及蘇區極為重視，周對蘇區及毛仍十分關注。1931年1月，項英先行來到蘇區，代周出任中央局書記。4月，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三人代表團又進入蘇區，加入了由項、毛等組成的蘇區中央局。周恩來依然遠在上海，同毛澤東沒有直接交集的機會。即便如此，蘇區事多，周必須參與處理，他與毛之間也很難不植入某種緊張的關係。

項英進入蘇區後，從一開始同毛澤東的關係就不甚和諧。項出身工人，加入中共後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到蘇區前一直在上海等大城市活動。毛是鄉民出身，雖然從未真正進入中央領導核心（除了在中共三大上成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局秘書，協助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在黨內資格甚老，1927年以後，又在鄉村山林之間打江山，一派自說自話、無法無天的心態，蘇區就是他的天下，什麼人都難以管束他。項英是從中央來的，在黨內的資歷也不淺，到蘇區後成為「一把手」，又有一種以「欽差」自居的心態，很難不同依然自視為蘇區「老大」的毛澤東形成相磕的局面。

項英進入蘇區時，一場打「AB」團的運動正搞得如火如荼，毛澤東則是主要的推手。「AB」團是「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簡稱，這本是大革命期間出現在國民黨內部的一個小組織，隨着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分共」、「清共」，「AB」團便已解散，再無活動。但在1930年初的蘇區，

卻出現了以打「AB團」為名而展開的近乎瘋狂的「肅反」運動。本來蘇區初創，領導人中的外來幹部(包括毛)與本地幹部的出身、經歷及社會關係均不同，要達到相互協調及合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出現各種分歧更是家常便飯。1929年的古田會議後，毛一門心思要搞「書記獨裁」，又覺得自己萬事正確，打了勝仗後更是如此，很自然便陷入了同有着不同背景及經歷的幹部的矛盾乃至衝突。毛的處置方法是接過反「AB團」的口號，在蘇區大肆開展「肅反」運動，並把這當作排除異己的一種手段，結果殺人越來越多，幾乎達到失控的地步。[5]

就在項英到達蘇區前不久，發生了矛頭直指毛澤東的「富田事變」。1930年12月初，毛委派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李韶九到富田(江西省委所在地)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並指示對敵對分子可以「大批把他們殺戮」。[6]李到達後，即下令逮捕、並殺害了大多為本地幹部出身的紅二十軍各級領導。12月12日，紅二十軍第174團長劉敵發動兵變，逮捕了李韶九等人。第二天，劉敵等又領頭宣佈脫離紅一方面軍。之後，江西省委領導人段良弼、李伯芳等自行宣佈成立省委，發佈〈通告〉，揭露反AB團的錯誤，並派段良弼前往上海，向臨時中央告狀，劉敵並直接給中央寫信告狀。[7]

起初，在對富田事件及「肅反」的處理上，項英曾希望與毛澤東合作，因而對毛的「鬥爭路線」予以「原則上的贊同」。[8]但在對事變的具體處理上，項主張與二十軍談判，毛則堅持富田事變為反革命事件，兩人相持不下，矛盾越鬧越大，關係也越搞越僵。

這件事報告到中央時，正值六屆四中全會前後，黨內政治氣氛高度緊張。周恩來作為中央具體管事的人也是火燭小心，尤其不敢在「原則問題」上犯錯誤。仔細閱讀蘇區送來的材料後，周已看出富田事變的起因，可能在於「前委來逮捕省委的AB團」而被逼出來的。2月中下旬，政治局幾次開會討論此事時，他一方面表示AB團確是反革命組織，「反AB團是正確的」，而富田事變則是反革命事件。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AB團中也包括「尚有動搖的和紅軍中的不堅定分子」，各方應「停止爭論，一致向敵人作戰」。[9]3月下旬，共產國際遠東局對此事表態，中央政治局據此通過決議，將富田事變定為「實質上毫無疑問地是階級敵人以及他的鬥爭機關AB團所

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同時要求，不要「過分的估量反革命的組織力量及它在群眾中的欺騙影響」。[10]

此時，臨時中央已決定派出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前往中央蘇區，處理毛、項關係及富田事變等問題。三人到達後，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及中共中央的決議，很快便宣佈富田事變為「反革命暴動」。4月18日，紅二十軍兵變領導人應召前來同毛及中央代表談判，卻被全部逮捕，不久又全數遭到處決。[11]

儘管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曾盡量試圖同毛澤東搞好關係，並在富田事件的處理中站到了毛一邊，也批評了項英，但他們對毛其實是有看法的。這裏，固然因為他們所遵循的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爭取一省與數省勝利」的那套想法，同毛在蘇區的所作所為並不協調，有時還達到格格不入的程度；但同時，毛那種打着「黨領導一切」和「書記專政」的旗號、由不得別人說話的做法，更讓他們覺得很不舒服。在這一點上，他們同項英逐漸有了共鳴。

項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等對毛的負面看法，陸續傳報到上海中央和周恩來這裏來。周根據自己以往同毛打交道的經驗，早已知道毛絕不容易相處。但當時，毛澤東在蘇區的權勢可謂如日中天，又在莫斯科和共產國際那裏受到了相當的重視，周也不好隨便對毛採取什麼行動，只能就事論事地處理同毛有關的各種問題。

二

1931年7、8月間，周恩來已決定離開上海轉入蘇區。當時，王明也將去莫斯科出任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中央的工作將由也是從蘇聯回國的博古主持。博古原名秦邦憲，當時年僅24歲，由於在「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中表現突出，在六屆四中全會後出任共青團書記。向忠發死後，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建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當時還不是中央委員的博古不僅成為政治局委員，還進入了常委，並被賦予「負總責」的重任。[12]當周恩來更多地想到如何處理與毛澤東的關係時，他對毛的態度更顯得微妙。一方面，他和王明、博古等一樣，在用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各項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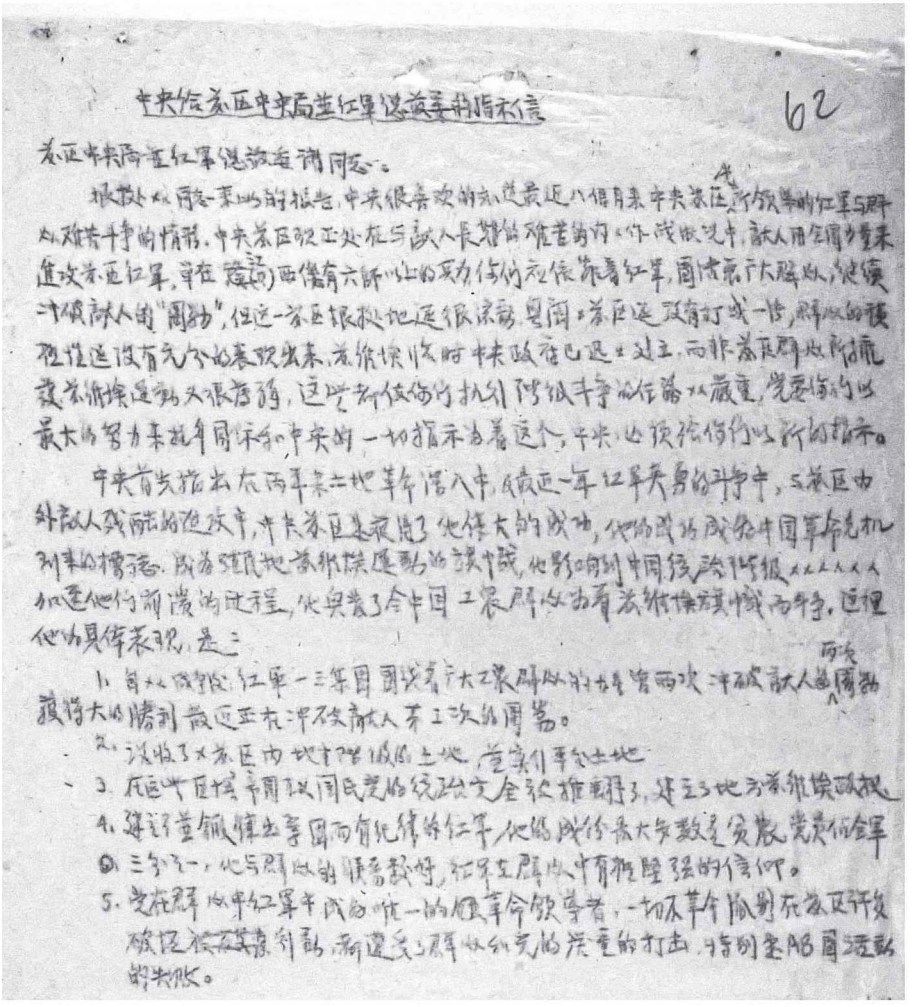
示來對照毛在蘇區的作為時，不免覺得毛在一系列問題上「右」了，需要批判糾正。另一方面，周也知道，自己進入蘇區後要做事的話，就不能不對毛既有所依恃，又有所制約。於是，便產生了周後來在延安整風中自我批判時所說，一系列被說成是他試圖從毛手中「篡黨篡政篡軍」的舉動。[13]

先前，周恩來和中央曾派歐陽欽以中央代表身分前往蘇區，出任蘇區中央局秘書長，協助任、王等工作。7月上旬，在歐陽欽將回上海向臨時中央彙報前，任、王等以蘇區中央局名義寫了一個報告，由歐陽欽帶回上海。報告的內容除個別段落外，中共官方黨史從未披露。[14]但是，正是這個報告以及歐陽欽回上海後向周恩來的當面彙報，引出了由周恩來起草、以臨時中央名義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信，開啟了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的批判。由此推斷，這一報告肯定包括了對毛的諸多批評。

周恩來這封日期為8月30日的信有11,000多字，對毛澤東提出了嚴厲的指責。信裏提出：「中央蘇區現時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同時，又給毛羅列了幾大錯誤。「這種錯誤表現在鞏固根據地和紅軍問題上頭。……紅軍到現在沒有完全拋棄游擊主義的傳統和小團體的概念，這在紅軍已在進行大規模戰爭與擔負着爭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的任務是不相稱的。」周還對蘇區反AB團運動的做法提出批評，指出中央蘇區「將AB團擴大化了」，達到了「誇大敵人的破壞力量與減弱我們自己階級的信心」的地步。信中最讓毛惱火、也可以說是最擊中了他的痛處的，是指責他以「黨的領導」為名，表現出的卻是「家長制」的一言堂作風：「紅軍中亦以黨包辦一切，於是軍事指揮與政治委員的權能便表現不出來。這一切都還存留着極濃厚的國民黨工作方式的殘餘。」[15]這封信亦由臨時中央報送共產國際。

應當說，周恩來是代表臨時中央寫這封信的，其中所表述的，因而並不見得都是他本人的意見，在很大程度上，也透露了臨時中央博古以及王明等領導人對於毛的看法。而王、博等人的出發點，又是以共產國際「爭取一省幾省革命的首先勝利」的指示為基礎的，反映出的是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形勢及任務的判斷。

但說到底，這封信畢竟是出自周恩來的手筆。它在周、毛關係中的地位極為重要。後來紅區發生了贛南會議、長汀會議、寧都會議的一系列



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

62

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

根據你們來電和一系列的報告，中央很喜歡的知道最近八個月來中央蘇區[先][後]領導的紅軍與[廣]大[群]眾的艱苦鬥爭的情形。中央蘇區現正處在與敵人長期的殘酷的[作]戰狀況中，敵人用全[部][力]量來進攻蘇區紅軍，單在[第]四[次]圍剿[已]經有六師以上的兵力衝[入]蘇區紅軍，圍擊[取][得][了]大勝利，[使][得]敵[人]的"圍勦"，但這一蘇區很快地[又][進][行][了]很[深][刻][的]鞏[固]，蘇區這[沒]有打成一片，[群][眾]的積極性這沒有充分的表現出來，蘇維埃政府中央政府已退出江[西]，而非蘇區[群]眾所能[完][全][武]裝[的]蘇維埃還[軟]又很[薄]弱，這些都使得[我]們[領][導][階][級]鬥爭的任[務][加][重]，[党][要][你]們以最大的努力來執[行][國][際]和中央的一切指示為[着]這個，中央也[須][給]你們以[所][的]指示。

中央首先指出在兩年來土地革命[鬥]爭八中，[在]最近一年紅軍[英]勇的鬥爭中，[蘇]區由外敵人[殘]酷的進攻中，[中][央]蘇區[是][獲][得]了[偉]大的成功，[他][們][的][成][功][在][中][國]革命[危]機到來的標誌。[我][們][能][把][蘇]維埃運動的[發][展]，他影響到[中]國統治[階]級[之][內]部加速[他][們]崩潰的[過]程，他與[發][生][中]國工農[群]眾[為]着[蘇]維埃[與][戰]爭[奪]，這裡他[的]具[体]表現，是：

1. 首[先][創]造[了]紅軍一三軍團[與][廣]大工農[群]眾的[基][幹]兩次[打]破敵人[的]圍剿，[而][且][每]次[都]得大的勝利，最近五次[打]破敵人第五次的圍剿。
2. 沒收了蘇區內地主階級的土地，[實]行[平]分土地。
3. 在[蘇]區[政][權][內]有[工]農民[主]的統治[政][權]，建立了地方蘇維埃政權。
4. 鞏[固][並][創]造[了]鐵[的]紀律的紅軍，他[們][的][絕][大][多]數是[貧]農，党[員][領]導[軍]
5. 三[分]之一，他[與][群]眾的[聯][系][很]好，紅軍[在][群]眾中有[相][當]強的信仰。
6. 党[在]群眾和紅軍中[成]為唯一的[領]導[革]命[鬥]爭者，一切[反]革命[派]別在蘇區[沒]有[發]展[機]會，[都][遭][受][了]群眾的[完][全]的[堅][決]的打击，特別[是]AB團[活]動的[破]滅。

圖 8.1：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1931 年 8 月 30 日。
（ф. 514, оп. 1, д. 675, РГАСПИ）

「反毛」以及從毛手中奪取軍權和黨權的事件，其實都是從這封信衍生出來的。然而，直到1980年代末，中共官方史學界一直不提這封信實際上由周恩來起草，而把它同臨時中央同時期的另幾份文件一道，當作「王明左傾路線」的代表性文件痛加批判。1989年，《周恩來年譜，1898–1949》出版，證實了此信是周恩來所寫。[16] 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已經注意到了這個極為重要的史實，並特別在論述中將《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全文發表的此信和《周恩來年譜》中的相關敘述連接了起來。[17] 因此，此信係周起草一節，應該是一個很清楚的史實了。

可是，在近二十餘年間國內出版的許多相關論著中，對於此信係周恩來所起草仍然採取語焉不詳甚至張冠李戴的態度，只說這是臨時中央所為，而對周是信的作者這一點卻避而不談。[18] 在國際史學界，仍有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搞錯。例如，法國學者阿蘭．魯林（Alain Roux）在洋洋灑灑幾十萬言的《毛澤東傳》中，就想當然地說此信是出自於王明之手。[19] 俄裔美籍學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及美國學者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合著的《毛澤東傳》中，也以為此信係米夫及臨時中央新領導人所作。[20]

尤其令人感到詫異的，是《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在這一問題上的明顯疏漏。高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記組組長，對這段歷史和相關史料應當相當熟悉，但在《晚年周恩來》中，他雖然將毛、周關係當作論述的重中之重，卻完全沒有提及周的這封信。高著關於毛、周矛盾歷史淵源的分析討論，是從1932年10月寧都會議講起的，不知為何略去了從周恩來的8月30日指示信到贛南會議和長汀會議這段構成寧都會議「前史」的過程。[21] 這麼一來，正如本書以下討論寧都會議時將要提到的那樣，高著關於這一段歷史的述、論之間出現了脫節。

周恩來8月30日的這封指示信太長，要通過信使送達蘇區。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又給周和中央出了一道難題。10月11日，顯然是在毛的策劃與促動下，蘇區中央局致電臨時中央，提出了兩個要求：第一，中央局要隨方面軍行動；第二，項英「因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認為是黨內派別鬥爭，因此喪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夠領導，中央局決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請中央批准。[22] 這兩個要求相互關聯，其實是毛對周恩來和臨時中

央的一種「先斬後奏」式的挑戰，也是對將要入蘇區出任中央局書記的周的一種「叫板」。

當時，周恩來在上海已蟄伏地下，但這樣一件大事又同他有如此緊密的關聯，不能不予以過問。10月中下旬，臨時中央在給蘇區中央局的回電中，拒絕了來電的第一個要求，強調「中央局是中央在蘇區的代表團，代表中央領導蘇區一切工作，決不能隨方面軍行動」。這就堵住了毛澤東想讓蘇區中央局隨他行動，便於他控制的路子。同時，臨時中央又批准「中央局書記由毛澤東代理」，隨後再加上了一句說明：「中央新代表即可出發來蘇區，會同解決一切問題。」[23] 這樣的應對既穩住了毛，又為周恩來進入蘇區後接管掌控一切權力留下了伏筆。

蘇區中央局10月11日的來電，也使周恩來及臨時中央意識到，蘇區中央局恐怕尚未收到周8月30日的信。於是，10月20日前後，臨時中央又發出了給蘇區中央局的第四號指示電，其中特別強調周恩來8月30日的指示信極為重要，因而責令將要召開的「中區黨大會應根據這一指示原則進行工作，成立決議案，交中央批准，並電告討論經過」。[24]

蘇區中央局任弼時、王稼祥等人，對毛澤東的跋扈作風早就看不慣，並不時同毛有各種磨擦，只是由於毛的強勢作風，又在實際上控制了蘇區的軍權和黨權，實在奈何他不得。因此，他們才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告了毛的狀。周恩來8月30日的指示信以及臨時中央重申周指示信重要性的電報，為他們提供了正面同毛「展開鬥爭」的武器。

11月1日起，在任弼時、王稼祥等人的策劃和主持下，中共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這次「贛南會議」一連開了五天。毛澤東雖然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身分出席了會議，但當任弼時在會上傳達了周恩來8月30日來信的內容後，他在會上轉而成為批判的靶子。任弼時、王稼祥等根據周恩來在信中定下的調子，對毛展開了全面批評。他們抨擊他，思想上有「狹隘的經驗論」的傾向，在土地政策上實行了「富農路線」，軍事上「沒有完全擺脫游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街市戰」的重要性。對於這些批評，毛統統不同意，同任、王等人展開爭論，還推出一幫縣委書記在會上為他說話。[25]

毛澤東在蘇區實行「書記專政」已久，在黨內和軍內均積怨甚深。他死不認錯的態度，更導致了與會者群起而攻之，反而使自己進一步陷入孤立的境地。[26] 最後，會議根據周8月30日來信的精神，通過了五個文件，其中之一是由王稼祥起草，包括批毛內容的〈政治決議案〉，以及由任弼時起草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可以看出，決議完全是循着周恩來指示信的調子寫成的，批評毛制定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原則，「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同周的指示信一樣，決議的矛頭還直指被視為毛主義中心文本的〈古田會議決議〉，不點名地反覆批判指責毛關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做法是「黨包辦一切」，其結果，「紅軍中軍事政治機關，失去其獨立系統的工作，變成了不健全的殘廢機關。這種由黨來包辦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餘毒」。決議相應提出：「把在紅軍中超過政治委員政治部的職權的各級黨的委員會取消，黨的一切組織都應該在政治部管理之下。」[27]

會上還有更厲害的一着，那就是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並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等位置。[28] 這樣一來，毛澤東失去了紅軍總政委的名頭，又不是中革軍委的領導成員，再不能獨攬蘇區的軍事大權。這就走出了把毛排除出紅軍領導層的重要一步，也打開了之後在蘇區連續上演「批毛」大劇的序幕。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終其一生，對贛南會議一直耿耿於懷的原因。

與此同時，周恩來和臨時中央又沒有將毛澤東一棍子打死。贛南會議結束後，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村的大祠堂裏隆重舉行，莊嚴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定都瑞金，瑞金改稱瑞京。關於政府的構成，根據周和臨時中央的明確指示，毛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29] 從此，毛便有了「毛主席」的名分。在外界看來，毛作為「紅色中國」的首腦，權力和聲望應該達到了頂點。但實際上，他當時在中央蘇區的權力和影響力已由於贛南會議而大大削弱了。

三

在上述一系列事件中，周恩來還是幕後人物。他到達蘇區後，就必須面對面地處理與毛澤東的關係了。從哪裏着手做起？周本來就是聰敏之人，此時不但在政治上已相當成熟，對中共黨內鬥爭的「路數」也有了不少親身體驗。因此，他似乎已有腹案，那就是要從對毛在蘇區「肅反」中過火行為的處理入手，既要做得有道理，爭取人心，為自己「立威」並限制毛的權勢，同時也給毛一個下台階。

周恩來採取如此做法，自然有他的考慮。自項英到達蘇區後，便一再向中央報告，毛澤東在蘇區搞肅反搞得過火了。但當時，項的意見被毛壓了下去，並反過來成為他後來失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一職的由頭。1931年夏，歐陽欽向周彙報蘇區的情況時，肅反「失控」引起的蘇區內部各種關係高度緊張，便是彙報的「重點內容」之一。周在8月30日的指示中，雖然以很大篇幅對「肅反擴大化」提出了批評，但沒有否定肅反本身。看來，他是準備在自己到達蘇區有了親身體驗後，再親自處理這個涉及到複雜人事關係的敏感問題。

周恩來進入閩西蘇區後，看到蘇區的肅反運動真的是達到了殺人如麻的地步。政治上的直覺告訴他，此事確實影響極壞，並傷害到了蘇區的根本。若是拿這件事「開刀」並處理得好的話，不僅會大得人心，也有助於為自己進入蘇區後的領導地位立威。12月18日，周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我入蘇區雖只三日，但沿途所經，見到閩西解決社黨所得的惡果是非常嚴重的。」他列舉了種種對無辜群眾任意抓捕及逼供的行為，特別強調了「此事轉變之難與問題之嚴重性」。他提議，中央應立即就此採取行動，「中央如對閩西有決議，對中央區亦有利也」。[30] 後面這句話，分明透露出了周針對毛的意圖，這表明他已下決心要在肅反這件事上與毛「交手」、「過招」了。

12月底，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正式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取代了毛澤東此前擔任的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也把蘇區的大權抓到了自己手裏。[31] 隨後，他馬不停蹄地對「肅反擴大化」採取行動。1月7日，周主

持召開到蘇區後的第一次中央局會議，並在會上發言，主題是檢討肅反出現「嚴重偏差」的問題。周恩來經過一番思索之後，採取的策略是對肅反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既要批毛，但又要給他台階下。在周的主導下，中央局通過了〈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其中提出，「富田事變是AB團所領導的反革命暴動，過去反AB團鬥爭是正確的，是絕對必要的」；接着話鋒一轉，又指出：「過去蘇區肅反工作中的中心錯誤，……是在對反革命派的認識和估量的錯誤，是在對反革命派鬥爭中的方法的錯誤，並且更在非階級路線和非群眾路線的錯誤。」[32]

會上，通過了〈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列舉了肅反中的種種「嚴重錯誤」，尤其是「把反AB團的鬥爭簡單化了，縮小到『打AB團』的捕獲、審問和處置的範圍內」；「還發展到以肅反為一切工作中心的極危險的觀點，在打AB團中更專憑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至造成肅反工作的唯心論」。〈決議案〉在分析錯誤的原因時提出，肅反「所以如此擴大，發生如此恐慌，實有他思想的來源，主要的是沒有對自己階級的堅信心，不相信革命勝利的力量」。[33] 決議中未曾提到毛澤東的名字，卻字字句句都指向毛的所作所為，一下子就把毛放到了「被告席」上。在這件事上，毛自知理虧，因而沒有同周爭辯。

這是周恩來到蘇區後同毛澤東的第一次「較量」。結果，這番較量以毛不得不退讓、周大獲全勝而鳴金收兵。這裏，周的策略與方法起到了極大作用：既批了毛，並把毛批得啞口無言，又在決議中不點毛的名，更不把毛打倒。正是由於周的這種做法，這件事雖然在毛、周之間留下了某種「心結」，但從表面上來看，他們之間的關係當時並沒有嚴重惡化，更沒有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是，這件事畢竟成為毛、周歷史關係上的一個大的「過節」，以及周在毛那裏記下的一筆「帳」。周恩來後來在延安整風對自己上綱上線的「批判」中專門提到，他在中央蘇區時期，曾經在肅反問題上站到了毛的對立面，並當作自己的「罪過」來講。[34] 幾十年後，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根據毛的要求做「歷史上的反省」時，又提到了自己在紅軍時期肅反問題上站到毛的對立面的「錯誤」。[35] 毛終其一生都沒有再真正信任過周，更不會把革命的「千秋大業」託付給周恩來。

長遠看來，毛澤東從這件事中的「得」，恐怕遠超他的「失」。這件事促使毛對進行黨內鬥爭的方式重新思考。當毛澤東在長征後期重新崛起，逐步掌控中共的政治和軍事決策大權之後，曾在黨內多次展開各種整肅運動，包括整風運動和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歷次「黨內路線鬥爭」。毛大體上採取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1930年代初，毛從與周的這番交鋒中得到的經驗，對他來說是極為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是終身受用。

四

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時，紅軍所面臨的外部情勢正處在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1928年底「東北易幟」後，蔣介石達成形式上的「全國統一」。可是，在蔣的南京政府和表面上效忠國民政府的地方實力派之間，仍然存在着極為深刻的矛盾。從1929年3月起，先後發生了蔣桂戰爭、蔣馮戰爭，以及蔣與馮、閻的中原大戰。蔣雖然獲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國民黨內反對派的活動從未停止，並不斷對蔣及其國民政府的正統地位提出挑戰。一時之間，蔣難以全力以赴地處理中共及紅軍「叛亂」的問題。這是紅軍與蘇區在1929年到1931年間得以不斷發展的重要原因。

1930年底，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局已定的情況下，開始集結軍力，組織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到1931年下半年，先後展開了三次圍剿。只是，他每次投入的兵力都不是太大，在戰略制訂、作戰協調、後勤供給以及情報收集上，也存在着諸多缺陷，因而不是毛指揮下的紅軍的對手。1931年9月，第三次圍剿宣告失敗。這之後，中央蘇區及全國各蘇區，也達到了自身發展的頂點。

就在此時，日本關東軍製造了「九一八事變」，繼而一舉侵佔中國東北。國民黨內各反對派要求蔣介石下野，作為實現黨內團結的先決條件。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發表辭職通電後下野。[36]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同駐紮當地的十九路軍發生激戰。中國全國民情激憤，一片抗日呼聲。蔣馬上抓住這個機會，重新出任軍事委員會主席。[37] 然而，在對付倭寇為當務之急的情況下，他實在難以騰出手來對付紅軍和蘇區。紅軍與蘇區的發展面臨着更為有利的局面。

但是，共產國際以及中共臨時中央都對形勢做出了過於樂觀的估計，認為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中國蘇維埃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已經把奪取中心城市的任務提上了日程」。[38] 1932年1月9日，臨時中央決議，「利用目前順利的政治和軍事條件，佔取一兩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39] 周恩來主持下的蘇區中央局也討論了中央提出攻打並佔領江西中心城市的問題。毛澤東對此堅決反對。周雖然也認為，紅軍一時並不具備攻打江西首府南昌這樣的中心城市的實力，但不願違反中央的指令。最後，儘管毛仍持反對意見，周在多數人的支持下拍板決定，紅軍將進攻處於蘇區包圍之中的贛州，以期中央蘇區和湘贛蘇區連成一片。[40] 毛一氣之下，向周和蘇區中央局告病，到瑞金郊外的一座山上「休養」去了。[41] 在毛心目中，這應該是周欠下他的又一筆「帳」。

2月4日，紅軍第三軍團開始圍攻贛州。這座城市三面環水，又有堅固城牆，易守難攻。紅軍部隊缺乏攻城裝備和手段，始終難以越堅城一步。到3月上旬，國民黨方面的援兵已源源而來，紅軍部隊面臨着腹背受敵、遭敵包圍殲滅的危險。情急之下，周恩來只得作出從贛州撤圍的決定，毛澤東也被請了回來。[42] 對周來說，這是他第一次親身見識到毛在軍事指揮上確實有一套。

3月中旬，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趕到前線，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總結贛州之敗的經驗，並討論下一步的戰略和計劃。此時，周對毛「能打仗」和「會打仗」的印象雖然已深了一層，但遠未達到對毛言聽計從的地步。毛在會上主張，紅軍應尋找敵方的薄弱環節，進兵贛東北，將贛閩蘇區連成一片。可是，會議未接受毛的意見，而是決定由彭德懷率領紅軍三軍團組成西路軍，向贛江以西進軍；毛則率領紅軍一、五軍團組成中路軍，北上發展。[43] 會後，毛又向周提出，福建方面的敵軍較弱，閩西的敵軍又在當地紅軍打擊下被迫退入廣東，中路軍應改變行動方面，轉進閩西，並改稱東路軍。林彪和聶榮臻對此表示支持。這一次，周採納了毛的意見。3月28日，周主持的蘇區中央局會議批准了東路軍入閩西的計劃。[44]

毛澤東匆匆趕到前線，觀察當地形勢後，於3月30日致電周恩來，提出了閩南重鎮「漳州難守易攻」，又值敵軍守備空虛，因而提出了「直下漳

(州)泉(州)」的大膽主張。[45] 周接電後，立即從瑞金趕到長汀，同毛會晤商議後，同意了毛的計劃。周並決定不回瑞金，而是留駐長汀，以便就近督戰。[46] 此後，周、毛之間開始了他們在軍事策劃及指揮上的首次近距離合作。他們決定，調動紅一、五軍團向閩南重鎮漳州移動。4月19日凌晨，紅軍向漳州發動攻擊，很快就突破了敵軍陣地，第二天即佔領了漳州全城。這也是周進入中央蘇區後，紅軍打的最大勝仗。

漳州之戰後，正當毛澤東還處於春風得意之時，卻從上海傳來了臨時中央對他的嚴厲批評。4月14日，臨時中央根據自己對「國際路線」的理解，在聽取了從中央蘇區前來的項英的報告後，致電各蘇區黨組織。其中，雖未點毛的名，但提出的批評卻顯然以毛為目標。電文認定，毛拒絕進攻中心城市的錯誤，遠遠不止是「狹隘的經驗論」，而是「機會主義障礙路線的執行」，也是「保守主義」和「防守主義」的暴露。對這一嚴重錯誤的批判，因而也要提到「同機會主義路線鬥爭」的高度來進行。[47]

對於臨時中央的指責，毛澤東大不以為然。這時，他剛剛率軍獲得漳州之役的勝利，還在風頭上，本錢足了，火氣也大。5月3日，他在給臨時中央的電報中，針對中央4月14日來電，公然頂撞道：「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是完全錯誤的」，然後大講了一番「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的必要性，說自己東出漳州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48]

這一來，周恩來被夾到了中間。本來，周是贛南會議批毛一事的始作俑者，但他這麼做只是為了約束毛，而絕不是要打倒毛，應該見好就收的。在贛南會議和蘇區中央局批評肅反擴大化的兩次會議後，批毛之事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現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卻不肯對毛放手，執意要將批判升級，背後又有着共產國際指示的尚方寶劍。他再也躲不開了。

周恩來當然不能違抗中央指令，更不能違背國際的指示。5月11日，他在長汀主持舉行蘇區中央局會議，表示將「立即實行徹底的轉變」，「徹底糾正中央局過去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49] 在毛澤東沒有與會的情況下，這次會議對毛的批判升級。毛澤東在思想上的錯誤，從「狹隘經驗論」上升到了右傾「機會主義」。會上通過的決議更指出，「目前的事變的發展，更加證明了國際與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確與中央局估量的絕對錯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於目前政治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

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決議表示，現任中央局要「徹底糾正」這種「錯誤」。[50]會上還採取了另一個重要的組織措施：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總部和朱德的總司令職務，卻沒有同時恢復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51]

當時，毛澤東還在漳州主事，沒有出席長汀會議。會後，周恩來等人也沒有將會議決議等文件送給毛。毛要等到6月間從前方回來後，才看到長汀會議及其後續的文件，他對此極為不滿。九年後，毛在準備發動整風運動時，用極具諷刺意味的口氣寫道：

> 改組後的中央蘇區中央局採取了先打贛州後打吉安、南昌的方針，一戰遇挫，連贛州也打不進去。隨後我到漳州去了，六月回到長汀，見了這個皇皇大文，茅塞為之頓啟。知道是採的缺席裁判辦法，一審終結，不許上訴的。

毛還說：「這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52]毛說這話的另一層意思應是，像這樣一件趁他不在而大舉批判他，並將不容他申辯的決議強加於他的事情，其實已經包括在周的8月30日指示信以及贛南會議的邏輯中了。在毛眼裏，最大的責任者既不是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也不是項英、任弼時、王稼祥等人，而是周恩來(他正是「改組後的中央蘇區中央局」的書記)。

恰在此時，蘇區面臨的外部情勢又發生了大的變化。1932年5月，中日淞滬停戰協定簽訂，來自日本的威脅因而暫時緩解。同時，各路地方實力派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挑戰也一時得到了控制。蔣介石終於可以放開手腳來對付中共「叛亂」了。6月，他集中部隊，準備展開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他特別強調，要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具體點說，就是我們一方面要發揮軍事的力量，來摧毀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運用種種方法，消極地來摧毀土匪所有的組織，及在民眾中一切潛勢力」。[53]在軍事戰略上，蔣則計劃首先進攻鄂豫皖和湘鄂西蘇區，以斬去中央蘇區這兩個左臂右膀，而對中央蘇區則暫取守勢，待平定鄂豫皖和湘鄂西後，再集中力量進攻中央蘇區。毛迅速率部撤離漳州，回師贛南。

7月21日，周恩來離開瑞金，趕往贛南前線同毛澤東等人會合，參與指揮作戰。在後方，由留駐瑞金的蘇區中央局副書記任弼時和蘇維埃政

府副主席項英主持。於是，中央蘇區領導層有了「前方」和「後方」之分。周到達前方後，於7月25日同毛、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提出「唯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已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54] 中央局一時沒有回覆，周又一再力爭，強調「澤東的經驗和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揮，……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55] 8月8日，中革軍委終於決定，任命毛澤東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委。[56]

在國民黨部隊大兵壓境之下，鄂豫皖和湘鄂西兩區的紅軍連續失利，很快便告吃緊。到8月底，鄂豫皖區各中心已經為國民黨部隊佔領。9月中旬，張國燾更是向臨時中央告急：「請中區及中央緊急動員各區紅軍及工農群眾急起策應。」[57] 臨時中央接到報告後，向蘇區中央局和毛、周所率之中央紅軍主力連連發出指令，要他們立即轉師向北出擊，以便牽制並從側翼打擊進攻鄂豫皖和湘鄂西兩處蘇區的敵軍，給這兩個蘇區以「直接支援」，從而全面粉碎蔣這一次在「剿共」歷史上從無先例的大行動。[58]

然而，當時毛、周所部紅軍還在江西東南部的樂安、宜黃、南城一帶作戰。毛立即對臨時中央的要求表示不同意見，認為當下情勢「不利於馬上作戰」，而應繼續「奪取南豐、赤化南豐河兩岸，……促進敵情變化，準備在運動戰中打擊與消滅目前主要敵人」，「否則急於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他們還為自己辯解道：「這一佈置雖不是立即出擊敵人，但仍是積極進攻的策略。」[59]

任弼時、項英等人身處後方，正為援救另兩個蘇區的紅軍處於萬分焦急之中，當即提出，若按毛、周所述執行，「這在實際上將要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不僅不能與另兩區紅軍的行動「呼應配合」，「更給敵人以時間來佈置」，因而「可以演成嚴重錯誤」。[60] 周恩來與毛澤東等人商量後，9月25日，由周、毛、朱、王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內稱：「現在如能馬上求得戰爭，的確對於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並開展向北開展的局面，我們對此已考慮再四。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行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因此，他們仍覺得應堅持自己的原方案，先赤化南豐河地區，待時機到來再行出擊。[61] 第二天，周、毛等又下令，要所部根據他們的計劃立即採取行動。

這一來，身處後方的任、項等人急了。9月29日，他們以蘇區中央局名義致電周、毛等，直指前方的做法「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為此，「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62] 9月30日，任弼時等人情急之下，又單獨致電周恩來，對他施加壓力道：「我們現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豐河兩岸，做一時期擴大蘇區工作等意見，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並強硬要求周恩來必須對「分散赤化觀點，應給以無情的打擊」。他們還抓住周恩來先前一份電報中曾建議「必要時可召開中央局會議」，再次提出立即舉行這一會議，以批判糾正毛澤東的錯誤。[63] 當天下午，任弼時等一行便離開瑞金，「星夜兼程」，趕往前方。

任弼時、項英等人本來就是循着周恩來的8月30日指示信行事。此時要開的會，實際上是從周的指示信，到贛南會議，再到長汀會議以來所積累的各種緊張因素和矛盾的總爆發。火是周點起來的，但現在火失控了。

五

10月3日起連續五天，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全體成員會議。從一開始，毛澤東便成為與會者群起而攻之的靶子，展開了一場「中央局內部從未有過的兩條路線鬥爭，打破過去遷就和平的狀態」。[64]

會上，周恩來是握有實權的關鍵人物。他若說一句話，在當時毛澤東「民憤極大」、在肅反中大肆濫殺無辜的做法又已建立起了用殺人方式解決黨內問題的「先例」的情況下，毛若被置於死地，也是有可能的。[65] 但是，周恩來卻沒有這麼做，而是採取了一種折衷的方式，用他後來在黨內會議上回顧此事的話來說，就是「我開始是動搖的」。[66] 他一方面對毛提出了嚴厲批評，指出對毛的思想「不能接受」，毛等前方領導人確實「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澤東往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於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周因而「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至於如何付諸實行，他提出了兩種方案，要與會者在其中擇一：「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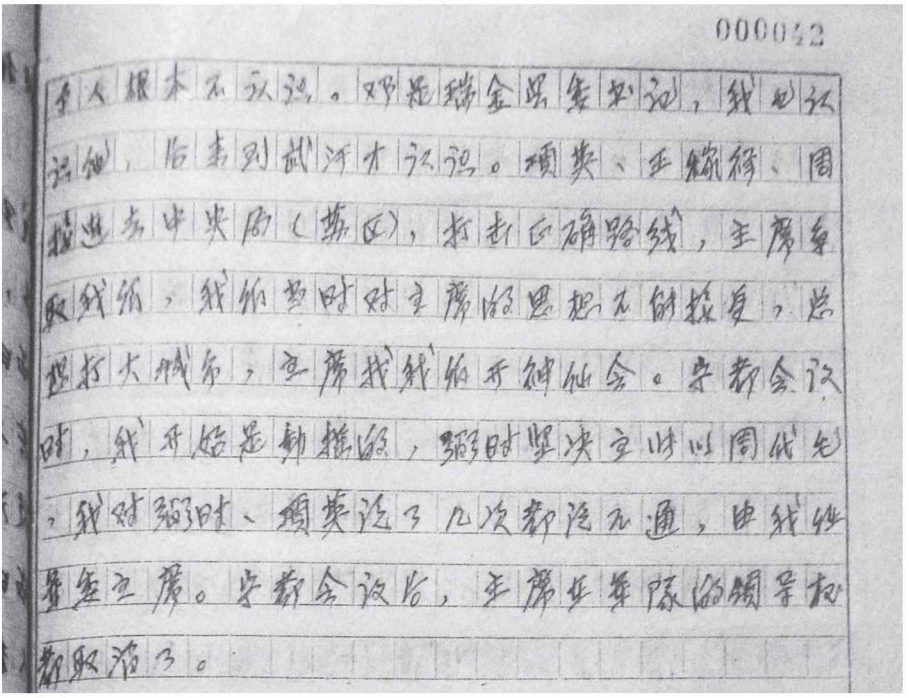


圖 8.2：周恩來在北戴河會議講話中對寧都會議的回憶，1960 年 7 月 16 日。
（855-5-1798，河北省檔案館）

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取這種「和稀泥」的態度，自有他的道理。這固然同他對黨內鬥爭向來多取「中道」的做法一脈相承，同時在這件事上，恐怕還有另一些因素在起作用。周知道，毛在蘇區及紅軍內根基深厚，又是中共創黨元老之一，並在莫斯科榜上有名，要一棍子把他打死是不明智的，即便付出巨大代價也難以做到。既然如此，何必要對毛狠狠地打板子，搞得今後完全無法共事？此外，經過到蘇區後、尤其是在前方的一段共事，周恩來對於毛澤東「能打仗」印象深刻。他恐怕已意識到，紅軍之所長並不在於攻城或陣地作戰，毛的主張是有道理的。更何況，如果把毛打下去，周本人就難免要擔起全面戰爭指揮的重任，並在戰略問題上直接和中央交涉。周對前者並沒有多少把握，更不願意看到後者發生。讓毛繼續負責或者留在前線「助理」，豈不較為理想？

然而，與會者並不理解周恩來的心思和苦衷，他的「調和」態度在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彈。毛同後方中央局領導人的積怨實在太過深厚，結果周在會上也成了人們批評的對象，搞得他在這件事上越來越不好說話。直至會議後一個月，後方中央局成員項英、任弼時、顧作霖、鄧發還聯名致電上海臨時中央，告了周恩來一狀。他們宣稱，在寧都會議這場「從未有過的兩條路線鬥爭」中，周非但「不給澤東同志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這已「不能說只是態度溫和的問題」；「恩來在鬥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68]

這番做法把周恩來逼到了牆角，他除了據理力爭外，別無出路。他在同一天致電臨時中央表示：「我承認在會議中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採取了溫和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夠，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周還表示，不能同意「未將這次鬥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鬥爭戰線」。[69] 周恩來和中央局同事的這番爭論，給臨時中央出了難題。權衡之下，臨時中央在回覆中採取了一種相對折衷的態度，一面說，「中央局會議所取路線和一般的方針是正確的」；一面又說，「澤東同志在會上已承認自己的錯誤，必須幫助澤東迅速徹底的改正自己的觀點和吸引他參加積極的工作」。這一番鋪墊後，臨時中央出來維護周恩來：「恩來同志在會議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然後要求「為擊破敵之圍剿，領導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70]

上述中央覆電中，最奇怪的是「澤東已承認錯誤」一句。這是如何來的？高華認為，這說明毛在會上是做了檢討的。[71] 然而，我們並未看到毛在寧都會議上做過檢討的任何材料。更大的可能應是，周恩來在向臨時中央的報告中「謊報軍情」。明明毛在會上對批評持對抗態度，但周卻對臨時中央彙報說，毛在會上認了錯。這麼做，矛盾不至於進一步爆發，搞得大家都下不了台。這也是周的一片苦心的體現。

所以，若僅僅從寧都會議的進程來看，周恩來其實幫了毛澤東的大忙，緩和了各方對毛的攻擊。在當時毛一再受到中央的指責、又在紅軍及蘇區內部遭到各方反對的情況下，即便周不到中央蘇區，毛也難免會受到整肅。寧都會議由善於「和稀泥」的周恩來主持，實際上起到了某種保護毛的作用，使得毛除了失去軍內的實權外，沒有受到更為嚴厲的懲罰。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仍然對周恩來以及這次會議極為惱火，一輩子都沒有真正原諒周恩來？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關於周、毛過節的論述，劈頭就從寧都會議談起，集中於會議本身以及周在會上及會後表現的分析，卻沒有提到，若沒有周8月30日的指示信，以及後來蘇區中央局從周的信衍生出來的贛南會議和長汀會議，那麼寧都會議恐怕就成了無本之木。這一記述，不管是出於何種原因，都打斷了歷史本身發展的「邏輯之鏈」，從而大大削弱了高相關論述的準確性和說服力。

至於周恩來為什麼在自己的記憶和後來各次重大檢討中提到此事時，都將之列為自己「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說成是歷史上「犯路線錯誤中最嚴重的罪過之一」，並給自己扣帽子，「執行王明路線在組織上尤其是軍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72] 這裏的關鍵，恐怕並不是周在寧都會議本身的所為，而更在於：第一，周是蘇區這一輪「批毛」的始作俑者，從他的8月30日來信到贛南會議，再到長汀會議，正是他的一系列行為為寧都會議打下了根基。第二，是會議的結果，「大多數同志認為毛同志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和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73] 1932年10月12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式通令：「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志，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治局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74] 也就是說，會議的結果是毛下台了，失去了兵權；而周則上台了，得到了軍事指揮權。

寧都會議後，毛澤東離開了紅軍以及蘇區政治權力的中樞，他的紅軍總政委位置則由周恩來接替，承擔起了指揮紅軍的主要軍事責任。而這其實正是毛澤東的心結所在，從毛對此事的記憶以及後來的相關表述中，寧都會議之所以成為周「欠了」毛的一筆帳，正是因為他抓住了寧都會議歸根結柢是因周而來，而周在會後又取代了他在紅軍內的領導地位的「辮子」。

幾十年後，毛澤東在1965年8月5日會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主席艾地時，回憶了寧都會議之後的情形。他說：「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裏，再拿出來，搞得很臭。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75] 毛講這番話時，在座的人中就有周恩來；而毛說的「他們」，周就是首當其衝的一個，不知他當時想了什麼。從毛的角度來說，當時正是

他已經開始為發動文革而「佈局」的時候。這是否也可以解讀為毛對周的一種婉轉的警告？而以周的聰明和經驗，恐怕不會感覺不到這一點。

但實際上，毛澤東說「鬼不上門」是誇大其詞了。寧都會議之後，毛還是蘇維埃主席，仍然握有相當的行政權力。他是有事情做的，邊區的經濟工作就屬於他管。只是，這既不是他的興趣，也不是他之所長。毛的心太大，當時給他留下的局面，在他看來則是太小了。

寧都會議後，毛有了空閒的時間。他除了「吃飯、睡覺和拉屎」外，還做了另兩件事：第一件，讀書；第二件，反思。它們對他後來「復出」後的「新氣象」有很大關係。從長遠看，周恩來在不經意之間幫了毛一個大忙——儘管毛澤東自己恐怕並不見得會這麼看。

六

黨內鬥爭歸鬥爭，仗還是要打。1932年12月，蔣介石在擊破鄂豫皖和湘鄂西兩處蘇區後，又調兵遣將，把「圍剿」的鋒芒指向中央蘇區。12月30日，由何應欽任總司令的贛、粵、閩剿匪總司令部下達命令，已經集結的50萬國民黨大軍將分成左中右三路，江西方向由陳誠任指揮，福建方向由蔡廷鍇任指揮，贛南、廣東方向由余漢謀任指揮，從1月初起進攻中央蘇區。

寧都會議後，周恩來成為蘇區的主要軍事領導人，因而也被推上了虎背，必須立即將全部精力投入到部署並實行「反圍剿」上來。這是周首次獨當一面地指揮這樣一場大戰役。幸運的是，他有朱德作為搭檔，從旁相助。周和朱早在法國時就已認識，還是朱的入黨介紹人。南昌起義時，兩人又有過合作的經歷。朱在蘇區已有幾年經驗，能夠同他合作，自然對周幫助極大。

在這個關頭，周、朱在軍事戰略上同臨時中央發生了分歧：臨時中央一定要周、朱集中兵力進攻南豐；周、朱則一再提出不能如此行事，而應爭取在運動戰中消滅敵軍主力。[76] 但臨時中央不為所動，發出了必須進攻南豐的死命令，周、朱不得不奉命行事。[77] 2月12日，周、朱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對南豐城發起攻擊，國軍指揮官陳誠除命令城內部隊堅守外，當

即調動三路大軍包抄上來，企圖將周、朱所部殲滅於南豐城下。情況緊急之下，周做出了他一生中少有的「抗命」的決策，未經請示臨時中央或經蘇區中央局批准便決定，「改強攻南豐為佯攻，決心先消滅增援隊」。[78] 隨後，周、朱迅速部署並實行一個由三部分組成的行動：以少量部隊繼續對南豐的進攻；將另一部隊偽裝成主力，公開向黎川方向移動，吸引陳誠所部的第二和第三兩路縱隊亦向這一方向跟進；主力部隊則隱蔽移動進入南豐西南一帶，埋伏等待敵軍到來。

就這樣，周、朱給敵軍設下了一個大陷阱。陳誠果然中計，錯誤地判斷紅軍主力在黎川、廣昌一線，並將大軍派往那個方向。這一過程中，敵軍第52、59兩個師在追蹤佯裝主力的紅軍部隊時，側翼暴露，周、朱見狀，當即調動部隊進入黃陂一帶山區設伏。2月27日，敵軍中伏，經兩天激戰，兩個師幾遭紅軍全殲。此戰後，陳誠又調動第二、三縱隊撲來。周、朱又將主力部隊隱蔽轉移部署在草岡一帶設伏。3月20日，突然向毫無準備的國民黨部隊兩個師發起攻擊，兩天連打兩仗，殲滅了敵軍第11師之大部以及第9師之一部。陳誠醒悟過來，卻為時已晚。損兵折將之後，他不得不下令所屬各部撤出戰鬥。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也不得不以草草收兵而告終。

這應該是周恩來在江西蘇區三年時間裏最為得意的時刻，他的權力和威望也都處在上升通道。然而，他卻不見得高興起來，反而常常憂心忡忡。他看到的是，在紅軍取得反圍剿軍事勝利的表象背後，中央蘇區的形勢其實並不樂觀，已孕育着最後失敗的條件和情勢。蘇區已經陷入更大的困局——一種早已存在的結構性困局的深化和放大。

從軍事態勢上來看，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雖以未達預設目標而告終，卻絕不是一無所獲。尤其是，本來同中央蘇區形成犄角之勢的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西蘇區，已為國民黨軍隊所佔領，中央蘇區因而也陷於孤立的地位。同時，在擊破國民黨部隊圍剿的過程中，「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紅軍和蘇區本身也遭受了很大的損失。中央蘇區本身的面積就縮小了將近一半。

更令周恩來感到憂慮的是，蘇區本來便已存在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非但沒有收斂的跡象，反而由於不斷的反圍剿戰爭，變得越來越嚴重。蘇

區的人口和資源本來就有限，連年戰爭都會產生傷亡，逼使紅軍不能不連續實行「擴紅」的動員，到打破第四次圍剿時，已達到幾乎所有青壯男子都去當兵的地步，在蘇區幾乎再也沒有徵兵的餘地和潛力了。[79]

蘇區面臨的結構性困局，還由於中共越來越「左」的土地政策和「殺雞取卵」的徵用政策，而變得極為嚴重。在土地政策上，蘇區一變再變，從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到富農也不分田，並把對富農乃至地主的確定範圍不斷擴大，且已分過田後再重新分田。同時，動不動就對「階級敵人」和「異己力量」採取沒收行動，以獲得戰爭所需的物資供應。說起來，中共領導人與其說是由於意識形態和概念的原因，必須推行階級鬥爭，甚至達到連蘇區的安危亦不顧的地步，毋寧更準確地說，他們也是出於無奈以及別無選擇而這麼做的。非如此，連眼下的日子都過不去。而階級鬥爭的語言，則為持續地採取過激行動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層面的「合法性」。周恩來對於這種「殺雞取卵」的做法，即便內心深處並不贊同，但因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只好推行。

蔣介石的連續圍剿，使得中共與紅軍幾乎完全沒有時間和機會來鞏固根據地，更不必說擴大了。紅軍擊破第四次圍剿後，本以為像以前一樣，會有一段休整的時間。不料，蔣卻幾乎馬不停蹄地就策劃並實行規模更大的新圍剿。周恩來可以清楚地感覺到，紅軍雖然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四次圍剿，但要在蘇區堅持下去，其實是越來越困難了。

七

周恩來成為紅軍最高領導者的時間並未持續。隨着上海的情勢變得越來越險惡，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在那裏終於待不下去了。1933年1月，上海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進入了中央蘇區，取代蘇區中央局的職權，成了周恩來的上司。幾個月後，被博古奉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李德也來到蘇區。這麼一來，周在蘇區和紅軍的政治和軍事指揮權力受到嚴重的挑戰。

面對蘇區政治與軍事領導層的這一大變動，周恩來從一開始就選擇了合作態度，不僅沒有展開任何抗爭便交出了自己的政治權力，也主動讓李

德分享軍事指揮權。1934年2月3日，周恩來被任命為中革軍委副主席。他雖仍是紅軍的主要指揮者，但在決策過程中的地位明升暗降，不再擁有對前線部隊全部的實際指揮權。[80] 在周恩來身上，這也開了一個先例，即他不會為了保持或爭取最高領袖地位而展開抗爭，更不會為此大打出手。

周恩來在臨時中央進駐後，對毛澤東的態度也有微妙變化。寧都會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周對毛就已採取了某種敬而遠之的疏離態度。博古和李德等遷入蘇區後，周已非蘇區的黨軍事務最高領導人，又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博古等對於毛的歧視，以及李德對於毛的忽視。周也因應時勢之改變，進一步拉開了同毛的關係。毛找周，但周很少找毛；而當毛找到周時，周也是不溫不熱，一副公事公辦的面孔。對周恩來在自己「失意」時的這副面相，毛澤東一輩子都沒有忘記。

蔣介石的全面進攻開始後，以博古、李德、周恩來等為主導的中共政治及軍事領導層的一個最大的失策，是未對福建事變加以充分利用。早在第四次圍剿尚在進行中時，蔣介石即將戰鬥力較強的第十九路軍調入福建，參加對紅軍的進攻。這支部隊不屬於蔣的嫡系，又參加過1932年初在上海同日本軍隊的對抗和戰鬥。1933年11月下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出於對蔣介石的不滿，宣佈反蔣，在福州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這一下，蔣的圍剿部署被打亂了。

周恩來的第一反應，是不能錯過這個有可能改變戰爭全局的時機。11月24日，即福建事變後的第四天，周致電中革軍委，指出福建事變後敵情發生了變化，「蔣介石延緩進攻中央蘇區，正調集兵力入閩，鎮壓福建人民政府」。他因而提議，應由「紅三、紅五軍團側擊蔣介石的入閩部隊」。[81] 當時身為中共主要決策者的博古，也曾認為應當抓住並利用這個機會，聯合福建人民政府反蔣。

然而，中共的決策受到了共產國際的牽制。莫斯科從「階級分析」的視角出發，對福建事變持負面的看法。共產國際在給中共的指示中，明確地將福建事變定性為國民黨中「投機分子」的行動，甚至提出應「為蔣介石軍隊和十九路軍提供在邵武地區發生衝突的機會」，讓他們自相殘殺，以使紅軍漁翁得利。[82] 在此情況下，周和中共領導人也不得不跟着共產國際

的「指揮棒」走，改變了對福建事變的態度，未採取同十九路軍配合的有力行動。

蔣介石調集大軍後，本來就已在軍事上對福建方面佔有巨大優勢。紅軍不對福建人民政府施以援手，更使蔣得以心無旁騖地全力對福建用兵。面對危局，福建人民政府內部又出現了分歧和分裂，為蔣提供了對其各個擊破的機會，終於以兵敗告終。

蔣介石解決了福建事變後，又加緊同日本方面就緩和華北局勢進行談判，並於5月31日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對日本做出了重大讓步，達成在華北停戰。這之後，蔣得以再次騰出手來，全力以赴地對中央蘇區實行清剿。紅軍和蘇區在軍事上面臨着極為嚴重的局面。這一次，蔣在政治和軍事上又採取了他在圍剿鄂豫皖和湘鄂西蘇區時的戰略，除了全面強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外，又在軍事上堅定地採取了穩紮穩打、絕不輕敵冒進的戰術，對中央蘇區採取步步為營的「蠶食」行動。

面對來勢洶洶並佔有巨大優勢的敵軍，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紅軍最高決策圈的應對，卻面臨着一種進退維谷的兩難局面：到底是堅持「內線作戰」，還是打出去，把戰爭引向敵方領土？其實，他們並非不想打出去，搞外線出擊（說到底，所謂「外線作戰」的主張，同後來的長征其實有相通之處）。但若真的這麼做，勢必會導致蘇區大片領土丟失；同時，一旦打出去後，在強敵環伺之下，如何保障後勤供應、兵員補給等，也都是問題。再三權衡利弊之下，李、博、周「三人團」還是決定採取以「守土」為目標的陣地戰戰略，和蔣的優勢及強大兵力對抗。於是，從1934年4月下旬起，雙方在被稱為蘇區門戶的廣昌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紅軍調集了九個師的精銳部隊，與在裝備和數量上均佔優勢的敵軍展開血戰，傷亡達到5,500餘人。到頭來，廣昌依然於4月28日失守。

蔣介石得手之後並不着急，依然按部就班，步步為營，逐步向蘇區縱深推進，將紅軍迫入一個不斷收緊的口袋之中。面對國民黨大軍緊逼圍攻，紅軍方面指揮作戰的李、博、周三人團依然應對乏術，蘇區的面積也不斷縮小。更為嚴重的是，蘇區早已存在的各種結構性矛盾，此時更是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的狀態，尤其是面對兵員枯竭、經濟凋零、資源耗盡的現象，更是加劇了竭澤而漁的行為，問題越來越達到了無解的地步。

進入1934年夏天後，紅軍和蘇區日益陷入絕境。對於中共和紅軍領導人來說，情況已經很明顯：這樣的仗實在是再也打不下去了。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都清楚地意識到，中央蘇區的失陷只是時間問題，他們必須另找出路。

第9章

長征
（1934–1935）

一

1934年10月10日，月黑風高。從這一天起，在周恩來等的率領下，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以及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號稱共86,000餘人（包括萬餘民夫），陸續離開中央蘇區。他們所開始的，是後來被稱之為「長征」的戰略大轉移。但在當時，這只是在情勢萬不得已之下被迫採取的措施，說它是轉移也罷，說它是「逃跑」也未嘗不可。這裏的關鍵，是最後的命運和結局。若轉移的結果是紅軍全軍覆沒——而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這絕對是可能的——那麼，這段歷史乃至中國的整個現代歷史就統統都要重寫了。

轉移開始前，關於毛澤東是留在蘇區還是隨紅軍主力參加轉移，是一件同毛的命運攸關的大事。據當時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回憶，李德、博古等掌控了中共軍事和黨務大權的人物曾經想過，要讓毛留在蘇區，承擔起「領導游擊戰爭」的任務。[1] 如果這樣的話，從後來留在蘇區的中共與紅軍領導人大多未能倖存的情況來看（只有項英、陳毅等少數例外），樹大招風的毛澤東的命運恐怕也凶吉難卜了。至少，毛因此將會遠離中共領導中樞，因而將完全失去東山再起、登上黨的最高領袖地位的機會。若真是這樣的話，歷史恐怕也是要重寫了。

毛澤東本人也清楚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得知轉移之事後，便不肯留下，要跟着大部隊走。而在毛澤東是留還是走的問題上，周恩來是有發言

權的。[2] 他堅決主張，毛應當隨紅軍主力轉移。到頭來，周的聲音起了作用。這不僅使得毛得以與紅軍主力一起行動，更得以在長征過程中找到政治上東山再起的機會，從而打開了走向掌控中共及紅軍最高權力的大門。倘若沒有周恩來在這件事上說話，毛是否會像留在蘇區的瞿秋白等人那樣，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亦未可知，那麼歷史還是要重寫了。

其實，這次後來成為「長征」的轉移行動，並非臨時起意或倉促行動。關於轉移的最初策劃，大致上從廣昌失守後就已露出端倪。後來，隨着形勢越來越吃緊，轉移的策劃也緊鑼密鼓地進行。中共中央並就中央紅軍撤離蘇區請示共產國際，6月16日，國際來電批准。[3] 轉移也並非漫無目的，而是準備離開中央蘇區後，經贛南粵北邊界地區，再進入湘西及湘桂邊境地區，同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六軍團會合，建立新的根據地。在關於轉移的最初策劃中，並沒有「北上抗日」的考慮，更沒有準備像後來發生的那樣，要搞穿越十一個省區的「長征」。

為了準備這次轉移，中共和紅軍領導層成立了一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軍事三人團」。儘管周並不見得刻意爭取，但在轉移策劃及實行的過程中，他的實際權力增加了。根據李德的說法，轉移的計劃由他「受政治局委託」起草，再經周恩來加工修改定稿後由政治局批准。撤退整個蘇區，則是周恩來竭力堅持的主張。[4] 周恩來深知此舉關係重大。早在轉移開始前，在他的運籌帷幄之下，中共便派出潘漢年和何長工為代表，同有「南天王」之稱的陳濟棠等與蔣介石有各種矛盾的地方軍閥暗中聯絡談判。[5] 雙方達成協議，互不正面開戰，互通情報，互相通商，在必要時互相借道。[6] 紅軍出發後，陳濟棠等基本上按協議辦事，紅軍一開始行動還算順利，除因通訊不暢而導致的個別例外，未經特別激烈的戰鬥便順利跨過了敵軍三道「封鎖線」。蔣介石見狀後心中難免生疑，在日記中曾寫道：「粵陳聯匪已成乎？應制止之！」[7] 然而，他卻是鞭長莫及，一時間對陳無可奈何。

但問題在於，這樣的大轉移本來貴在神速，但根據周恩來修訂完成後的計劃，紅軍離開中央蘇區時，卻把整個機構及大批裝備都帶着走。這樣做並非沒有道理，因為一到湘西後，蘇維埃政府就馬上可以投入運作。但

這一來，紅軍由於攜帶的罈罈罐罐太多，行動極為遲緩，一天走不了多少路。這是周恩來的一個大失策。

從11月27日起，紅軍開始搶渡湘江，企圖突破敵軍的第四道封鎖線，情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此時，蔣介石對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已有了較為準確的判斷。一番調兵遣將後，在湘江對岸做好了截擊紅軍的準備，企圖「將西竄匪部聚殲於湘江以東地區」。[8] 結果，紅軍主力渡過湘江時遇到了以湘軍為主的敵軍的重兵阻擊。經過慘烈戰鬥，直到12月1日，中央機關和紅軍大部隊得以渡過湘江，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單是兵員便一下子從離開中央蘇區時的八萬餘人銳減到三萬餘人，士氣更是受到了重創，「懷疑和不滿」明顯增長。[9]

不過，蔣介石從紅軍戰略轉移一開始就在戰略層面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在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後的頭兩個星期裏，他對其動向及目的並不清楚。但一旦他確定「贛南匪部已由贛州與大庾之間向西逃竄」後，居然禁不住大喜，言行之間已露出驕橫之氣。11月12日，他在同自己的一班心腹部下談話時說：紅軍「離開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不管他們「走哪條路，久困之師經不起長期消耗，只要我們追堵及時，將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滅紅軍的時機已到」。[10] 這一戰略判斷，後來看還是過於樂觀了。但它卻一直滲透在蔣對「西竄匪部」追擊圍堵的行動中，無形之中，他已幫了周恩來、毛澤東他們一個大忙。

二

渡過湘江後，對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來說，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是：紅軍應向何處行動？是否還有可能像原定計劃那樣，轉進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湘江之戰表明，蔣介石對於中央紅軍的這一戰略意圖已經瞭如指掌。同時，湘軍在湘江之戰中表現兇悍，一旦紅軍進一步進入他們的地盤，勢必竭盡全力與紅軍搏命。戰略目標不定之下，紅軍先是企圖進入廣西，受阻後，又朝着四川、雲南、貴州之間的邊緣地區「見縫插針」地繼續移動，在沒有後方支持作戰的情況下，戰略上越來越被逼入死角險境。

屋漏偏逢連夜雨。中共和紅軍中樞在長征前夕就已失去了和莫斯科的電訊聯繫，之後，重建電訊聯繫的努力又一再受挫，無法向共產國際報告並獲得指示。[11]

在紅軍的處境日益艱難的局面下，中共領導層內部開始出現異動。自反五次圍剿以來的一連串軍事失敗，使得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在軍事指揮上的權威大挫。紅軍高層幹部中，改換軍事領導的問題不僅浮出水面，也變得迫在眉睫。在這種情況下，自寧都會議後便是「閒人」的毛澤東開始四處活動，為東山再起、重新掌控紅軍兵權爭取各方支持。據毛澤東自己後來的敘述，自湘江之戰後，他在行軍途中，坐在擔架上不斷同其他領導人談話，尤其是集中做張聞天和王稼祥兩人的工作，把他們拉到自己這一邊來。其實，按照張聞天的說法，長征開始前一天，他和毛澤東談話，表示自己在博古、李德等之下「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裏很不滿意」，因而「向他（毛）完全坦白了」。長征路上，毛又進一步和他及王稼祥搞到一起，向他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三人更漸趨接近，形成了一個以毛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12]

然而，毛澤東清楚地知道，這裏的關鍵還在於要把周恩來從「三人團」中拉出來。當時，周在黨內軍內也引起了不少怨言，但他畢竟和博古、李德不同。他在軍隊內部輩份甚高，在黨的領導層內也人緣甚廣，他若是說話，還是會有很多人聽的。同時，儘管他同博古、李德等人關係的緊張因素大增，但仍然同他們（尤其是博古）保持着說得過去的工作關係。周恩來的態度可以起到左右局勢發展的作用，在是否讓毛重新出山這件事上是有話語權的。他在這個問題上究竟如何決定並行事，將會對中國共產黨乃至整個中國的命運都產生長遠而深刻的影響。

在當時黨內、軍內的混沌環境中，周恩來並沒有蒙在鼓裏。經歷了長征開始前後的一連串軍事失敗後，他對於毛澤東在私底下的活動，不可能沒有察覺。然而，對於是否讓毛「重新出山」，他卻是躊躇再三。一開始，他對於讓毛澤東重掌軍事大權，也是心中頗有疑慮，不敢貿然行動。確實，他有許多理由不讓毛澤東出山。他對毛的為人實在是太了解了，知道這個人的權力欲極重，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報復心理又極強，絕不

是一個好相處的人。據博古回憶，周後來找他談話交心時說，「老毛這個人最大的缺點是領袖欲太強，好猜疑，主觀，聽不進意見」。[13] 更何況，當時黨內軍內的權勢人物中，也存在着對於毛的諸多抵制，要把毛扶上前台、重新出山，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或做成後不會引起強烈反彈的事情。同時，一向以來對毛成見頗深的博古和李德，一個在黨內決策上、另一個在軍事指揮上仍然握有相當的權力。若要避免黨內上層因「換馬」而出現分裂局面，也需要做通他們的工作，而要操作這件事，又是非周恩來莫屬。若純粹從周自己的角度來看，哪怕他稍微有一點掌握中共黨務和軍事最高權力的野心，當時又正是一個「天賜良機」，畢竟以他在黨內和軍內的人脈和人緣，是在當時的危局下各方仍然可以接受的最高領導候選者之一。總之，周恩來實在可以給自己擺出一大堆理由，不讓毛澤東出山。

周恩來對這件大事的態度，是逐步發生變化的。他一邊騎在馬上行進，一邊思考。最後，促使他的態度發生決定性轉變，下決心將自寧都會議以來一直坐「冷板凳」的毛澤東重新請出來的，是1934年12月中旬召開的黎平會議前後的一場爭論。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軍事三人團終於出現了分道揚鑣的趨勢。周恩來將要作出的，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決定。

大敵當前，對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屬於「喪家之犬」的紅軍來說，最忌諱的就是失去關於行動方向的正確判斷，在這上面再犯大的錯誤的話，那就真的離徹底覆滅不遠了。周恩來和其他中共及紅軍領導人一樣，對這是十分清楚的。紅軍渡過湘江後，究竟是堅持原定計劃向北，同紅二、六軍團會合，還是「見縫插針」，進入敵軍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四川、雲南交界地區，在中共和紅軍決策層中出現了分歧，爭論愈演愈烈。李德主張繼續向北，「與二軍團建立聯繫」。[14] 毛澤東則「根據破譯的敵台的電報資料」提出，李德的計劃會使得紅軍陷入早有準備的敵軍的重圍，因而主張轉而向西，朝貴州方向的敵軍部署薄弱地帶移動。[15] 一時之間，雙方的爭論難分高下。12月12日，中共領導層在地處湖南邊界小鎮通道的一處書院舉行會議。毛提出，紅軍應西進插入敵軍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李德在回憶此次會議時說，毛「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出『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結果，毛澤東的主張在會上獲得多數通過。[16] 三天後，紅軍進入貴州，佔領了黎平。

12月17日和18日，中共領導層在黎平舉行會議，繼續就北上還是西進的問題展開討論，並陷入激烈爭辯。李德在回憶錄中說，他因病未參加黎平會議。[17] 博古仍然主張要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則堅持西進川、黔邊區。激辯之中，不僅王稼祥、張聞天依然支持毛的看法，周恩來也覺得李德的主張「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他以會議主持人的身分在會上表態，「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18] 最後，會議形成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的正式文件，明確提出，北上「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而應當堅決地轉而西進，在「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創立新的根據地。[19] 會議結束後，「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20] 當晚，周恩來親自送去會議決議的英文譯文，希望同李德溝通，但李德卻大發雷霆。他之所以如此，並非僅僅因為軍事行動上的意見分歧，而是因為他認為，周恩來是在擺脫干係並同他和博古拉開距離。以往，周恩來一向尊重李德，對他態度溫和，但這一次也同李德發生了正面衝突，兩人「吵得很厲害」，情緒激動失控之下，周還拍了桌子，「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21] 這表明了黎平會議後周恩來已下決心要同李德等分道揚鑣，並支持毛澤東重新出山。

周恩來何以會作出這樣一個堪稱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選擇？這恐怕首先是出於軍事上迫在眉睫之需。當時，紅軍確實已經瀕臨絕境，且軍心開始渙散、群龍無首，如何殺出一條生路，對周和整個中共及紅軍來說，是屬於「重中之重」的事情。用周後來說的一句話，「現在的最高原則是取得作戰勝利，其他問題要服從這個原則」。[22] 周向來對毛澤東「能打仗」有着深刻的印象，在紅軍已面臨着有可能重蹈石達開全軍覆沒覆轍的情況下，周也知道，以毛的性格和一貫的行事風格，若不讓他重掌實權，他絕不肯在軍事決策上全力與謀。對周來說，讓毛重新出山，大概也屬於是「病篤亂投醫」，不得已的一着險棋。此外，周恐怕也預計到，中央紅軍如能脫離眼前的險地，便可能要與四方面軍會師，而坐鎮四方面軍的張國燾也是權力欲極大之人。周恩來過去曾與張共事，尤其是在南昌起義期間，他甚至曾與張發生過正面的衝突，親身體驗過張威權式的為人為政之道，知道他絕非等閒之輩，不好相處。[23] 而毛澤東亦屬於亂世梟雄一流，在中央紅

軍諸位領袖將領中，恐怕也只有他才有本事鎮住張國燾。周恩來心中或許還有另一層的考慮：到了這個時候，不管讓誰出來當家幾乎都不好辦。讓毛出山，可以為周自己獲得更大的迴旋餘地。

周恩來恐怕並沒有想到(即便想到了，也不可能在當時被當作頭等大事)，風雨際會及變化之下，毛澤東後來將中國共產黨革命帶出了困境並引向勝利，在掌握無限權力後，卻以「革命」和「繼續革命」的名義使中國陷入了大躍進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空前災難。在此過程中，周自己也經歷了一次次難以想像的磨難。倘若他有先知先覺之能耐，是否還會在當時走出允許並支持毛澤東重新出山這一步？這恐怕是人們永遠也無法回答的問題。

三

黎平會議後，紅軍進一步深入西南地區，面臨的敵軍較弱。實力最強的中央軍薛岳部尾追紅軍進入貴州後，卻沒有緊緊盯住不放，而是轉而撲向省城貴陽方向，迅速佔據了本來由貴州軍閥王家烈控制並負責防衛的貴陽及周圍地區。此舉與蔣介石以剿共為名，侵蝕掌控王家烈地盤的戰略考慮分不開。薛岳曾向蔣請示：「本路軍今次入黔，責在剿匪，間接亦為中央對西南政治設施之監視者。」蔣答覆道：「所見甚是。」[24]但這麼一來，中央紅軍面臨的軍事壓力驟然減少，有了喘息的空間，周恩來開始為毛的復出做各種鋪墊工作。

1935年1月7日，紅軍佔領了黔北重鎮、也是貴州第二大城遵義。附近只有戰鬥力較弱的滇軍，蔣的精銳部隊則聚集於數百里外的貴陽周圍，一時還過不來。在沒有大的戰事威脅的情況下，中共及紅軍中樞在遵義逗留了12天。

自黎平會議之後，中共及紅軍領導層內一直爭論着關於下一步戰略移動的方向。李德和博古等對於黎平會議的決定一直不服氣。在此情況下，中共領導層決定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由周恩來負責會議的組織工作。[25]會前，他從自己一貫縝密細緻的作風出發，為可能在會上發生的「逼宮換班」預先做好準備。其中最為緊要的措施是，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權

力，臨時更換了會議警衛的部隊，以防在黨領導層變動時發生突發事件。當時，博古知道周調動了部隊後，就曾抱怨道：「明擺着是武力威脅，不達目的就動武。」[26]

1935年1月15日，中共領導層聚集到遵義城內一座曾為黔軍將領官邸的二層小樓，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持續開了三天的會議，造成了中共軍事與政治領導層的大洗牌。會議沒有留下詳細的記錄，我們對會議過程的了解，主要來自於一個月後中央政治局通過一項與會議有關的決議，參加了會議的陳雲會後寫成的「關於遵義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以及與會者的事後回憶。[27]

在會上，博古作了關於反五次圍剿的軍事總結報告，但「沒有完全承認錯誤」。然而，他這麼做的結果反而使自己在中共和紅軍領導層中更加陷於孤立。周恩來也發了言，提出反五次圍剿的失敗首先是軍事領導失敗的結果，但同博古只講客觀原因以及他人責任的態度不同，他強調了犯錯誤的主觀原因，並「承擔了自己的責任」。[28] 這是周恩來政治上的聰明之處，這樣一來，他就爭取了主動，可以在會上多講話了。會議的中心部分，是張聞天代表他本人、王稼祥和毛澤東做的一個三人聯合報告，其中對黨內和紅軍指揮中的「左傾路線」進行尖銳的攻擊和批判。這之後，毛澤東又單獨做了長篇發言，給「左傾路線」領導人扣了幾頂大帽子，包括「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29] 儘管他同時批評了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但主要的帳都算到了博、李兩人的身上。李德當時的感覺是，毛「對周恩來大大地加以庇護」。[30] 其實，這一切的背後，還有着周恩來作為會議主要組織者的一番安排和運作。根據博古的說法，會議開始時，周臨時改變了原先他和博古商定的會議程序，讓張聞天和毛澤東在會上發言，對博古和李德提出直接挑戰，使他們措手不及。[31] 按照陳雲的記載，「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32] 也就是說，周恩來在會議上完全站到了毛、張、王「新三人幫」這一邊。

在會議形成的決定中，最重要的之一是「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從而讓毛進入了中共最高決策圈。同時，取消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軍事三人團，「軍事最高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

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人」。會後常委分工時又決定,「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以(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3]於是,博古和李德從軍事和政治領導的權威地位上被拉了下來。這一系列的安排,為毛澤東後來進一步掌控中共軍事和政治領導權打開了大門。會後,周恩來為了把會議所造成的政治衝擊減到最小,又主動找博古做了一番「掏心窩子」的長談,說服博古心甘情願下台並交出權力。[34]這樣一來,即便李德仍然不買帳,也掀不起什麼大浪了。毛澤東後來崛起之路上,又少了一道障礙。[35]

若就遵義會議的直接結果而言,並沒有如同中共官方黨史長期以來宣稱的那樣,「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的領導地位」;從會議文件來看,它所建立的,其實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在軍內的「領導地位」。在當時那種軍事情勢及需要壓倒一切的情況下,周恩來若有自己的想法,完全可以名正言順地把黨務和軍務的一切權力都抓到自己手中。但是,周恩來卻並沒有這麼做,這多半是因為他深知自己屬於敗軍之將,最好的方法就是「以退為進」。同時,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並非最會打仗之人,在這上面,毛澤東比他高明。因此,在會議決定的實行、尤其是軍事決策和指揮上,周恩來雖為明文規定的「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人」,卻對毛澤東處處謙讓,把毛推向了決策圈的中心。當時,在各項軍令的發佈上,朱德與周恩來是紅軍「主要軍事指揮者」,因而都由他們單獨或一起發出。但是,周在決策過程中,卻盡量聽取作為「幫助者」的毛的意見,並盡量按毛的意圖行事,故此毛常常在實踐中由「幫助者」變成了決策時最後的下決心者。遵義會議確實為毛此後逐步掌握黨和軍隊的最高權力打開了一扇重要的大門。回過頭來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周恩來主動「讓賢」的態度和「推毛」的做法,才造成了毛澤東攫取掌控黨和軍隊最高權力的可能性。

四

然而,從軍事上來說,在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參與指揮卻沒有馬上使紅軍「轉敗為勝」(更勿論「轉危為安」)。根據遵義會議的決議,在國民黨

各路大軍開始壓向遵義的情勢下，紅軍改變了原先在遵義周圍建立川黔邊根據地的戰略意圖，轉而試圖「北渡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並爭取同張國燾的四方面軍會合。[36] 1935年1月下旬，紅軍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打了遵義會議後的第一仗——土城戰鬥，目的在於打開北渡長江的通道，進入四川，並向四方面軍靠攏。然而，儘管毛躊躇滿志，卻由於輕敵，以及對敵軍力量部署的判斷失誤，這一仗以紅軍受挫、未達預定目的便撤出戰鬥而告終。在毛的直接指揮下，紅軍卻出師不利，打了一個大敗仗。遵義會議上制定的北渡長江、並進而與四方面軍會師的計劃，也因此受挫，只能轉而「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37]

在這之後，在毛澤東的策劃之下，紅軍又穿插於雲、貴、川三省邊緣地區，拼命在國民黨各路大軍的四面圍困中尋找縫隙，來來回回四渡赤水。兩三個月裏，部隊幾乎天天都在急行軍趕路，搞得官兵疲於奔命、怨聲載道，卻全然不知道如此行動的目的，結果毛的新地位也因而出現了危機。譬如，一直屬於毛澤東嫡系的林彪，也對其決策很不理解，大不以為然，甚至抱怨道：「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這樣領導指揮還行？」[38]

面臨此情此景，周恩來卻依然相信，只有毛澤東才能帶領紅軍脫離險境。具體行事中，他為了鞏固毛岌岌可危的地位以及殘存的威信，同時，恐怕也是為了對自己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決定有一個交代，又幫了毛一個大忙。早在江西時期起，周恩來領導下的紅軍情報部門(軍委二局)就掌握了破譯敵方密碼的手段。長征期間，紅軍情報電訊人員，尤其是被稱為「破譯三傑」的軍委二局局長曾希聖、破譯科科長曹祥仁、副科長鄒畢兆等不斷成功破譯敵方所用的密碼，並因而得以掌握大量敵軍部署及移動的情報資料。[39] 周恩來長期掌控黨內軍內的情治事務，也是這方面情報資料的掌控者。但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直接掌管電台的電訊往來，周恩來卻對曾希聖、曹祥仁、鄒畢兆等多次破譯敵方密碼之事守口如瓶，予以嚴密封鎖，即便是其他紅軍高級將領亦不讓與聞。[40] 毛本來就是很會用兵之人，這麼一來，無異於如虎添翼，他判斷軍情時常常更顯得有「先見之明」，軍內也逐漸出現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輿論，大大加強了毛澤東

的權威和權力。這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周恩來不「戀棧」、又「讓賢」操作的結果。

2月下旬，在毛澤東指揮下，紅軍來回折衝，左右漂移之下，不僅一再避開了國民黨大軍圍追堵截的鋒芒，並終於迎來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中央紅軍二次渡過赤水後，抓住敵軍部署上的空擋，再次佔領遵義，並在自長征開始後首次與蔣介石中央軍的正面接戰中，擊敗薛岳麾下吳奇偉部的兩個師，殲敵數千人，並繳獲了大批物資裝備。[41] 這一來，紅軍官兵士氣大振，毛澤東在軍內的威望也上升了。毛又乘機提議，在軍情緊急的情況下，要有一個幾個人的小組根據戰場情況及時作出決斷，不使貽誤戰機。周立即對此表示支持。於是，3月10日，一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成立，由周擔任組長，全權主持軍務。[42] 然而，周仍然覺得，自己在軍事指揮上沒有毛的魄力和把握，經他和張聞天一起提議，中革軍委另於3月4日任命朱德為前敵司令部司令，毛為前敵司令部政委。[43] 朱自井岡山時期起就長期與毛共事，已習慣了遇事對毛退讓三分。周也絕不想在軍事指揮上與毛爭鋒。這樣，雖然周仍是新三人團組長，但軍事指揮大權卻進一步落到了毛的手裏。

此後，也是紅軍命不該絕，從大戰略的層面來看，主要並不是由於毛澤東的神機妙算，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蔣介石認為紅軍已經是必敗之兵，因而沒有作出「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決策，並企圖繼續以追擊紅軍的名義而進入地方軍閥的地盤，所以並沒有把消滅紅軍「殘部」當作頭等大事來做。[44] 再從當時的全國情勢來看，又正值「華北倭患緊急」，「進逼平津」。在蔣看來，「倭寇橫暴逼迫無理，警報頻來而國人不識大體，私利是圖，成見難除，不知危亡之將至」。[45] 結果，又分去了蔣本應集中「剿匪」的注意力。再加上，從軍事指揮的具體情況來看，蔣介石又在判斷紅軍走向時舉棋不定，不斷作出錯誤的部署決定，以至於不時發出「吾中計也」的感嘆。[46]

與此同時，張國燾領導下的紅軍四方面軍也有新的動作。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再要求張「配合中央紅軍行動」的敦促之下，也由於本身面臨着敵軍四面圍剿的巨大壓力，四方面軍於5月中旬撤出了川北根據地，向川西北轉移。[47] 這一舉動，既是希望以此擺脫敵軍的圍困，又藉以策應中

央紅軍的行動。然而，當時張國燾的部隊在數量上遠超毛、周麾下的中央紅軍；他的部隊在巴蜀一帶移動，而毛、周所部卻已被逼入康藏邊遠地區。張部採取開闢新區的大動作後，大批敵軍一下子被他的四方面軍吸引了過去，也就相應地減輕了毛、周的中央紅軍所遭遇的敵軍壓力。

以上兩方面因素結合在一起，讓本來似乎已成困獸的毛、周中央紅軍居然留下突出重圍的空間，獲得了死裏逃生的機會。1935年4、5月間，中央紅軍連續在貴州、雲南間的敵軍空隙間穿插行動，一會兒似乎要突襲蔣介石駐節的貴陽，一會兒又好像要偷襲雲南省會昆明。最後，乘敵軍被搞得暈頭轉向之際，又於5月上旬渡過金沙江，進入川西，把蔣的各路追剿大軍隔斷在彼岸。蔣介石不由得驚嘆道：「匪已全部渡過金沙江，其竄力之速更增余人以惡疾之心理，非速滅此丑，則我民族無噍類矣。」[48]

這之後，毛澤東、周恩來又率領中央紅軍通過彝族地區。5月下旬，強行渡過大渡河，翻過大雪山夾金山。至此，國民黨軍隊的各路追兵都已被紅軍遠遠地拋到了背後。儘管前途依然未卜，但一時之間，紅軍似乎已經沒有迫在眉睫的覆滅危險了。

五

1935年6月12日，由毛澤東、周恩來等統率的中央紅軍，歷經艱辛，終於和張國燾麾下紅軍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在四川藏區的小城懋功會師。這對於中共來說，本來應當是一件大好事。會師之際，兩軍官兵的歡欣之情，溢於言表。幾天後，毛、周與張國燾相見時，更是通宵痛飲，把酒言歡，一派團結、和諧的氣象。[49]

然而，這些只是表面功夫。毛澤東和張國燾均為梟雄，並都有着成為中共最高領袖的勃勃雄心，豈能容得下這種一山兩虎局面的持續存在。更何況會師之後，兩軍在實力上存在的巨大差別也立即顯露出來。周、毛所率的中央紅軍經長途征戰之後，已只剩下不到二萬殘軍，且武器裝備不整，彈藥缺乏。相形之下，張國燾統率四方面軍撤離川北根據地不久，仍號稱擁有八萬雄兵。更何況，經遵義會議改組形成的中共新領導層，並未獲得共產國際的批准，在張國燾等人看來，合法性多少是存在疑問的。

果然，兩軍會師後不久，重重矛盾就顯露出來，並進而引向兩軍的分裂。雙方的分歧，首先是在軍事及政治戰略上表現出來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主張，兩軍應聯合力量，「實行北上方針」，利用「西北幾省反動統治薄弱，又接近蘇聯、蒙古」的有利條件，「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50] 6月26日，在兩河口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在報告中提出，紅軍行動時一定要考慮三個條件：第一，地域上要便於機動；第二，人口要多，且應是漢人區域，群眾條件要好，便利紅軍擴大；第三，物產要比較豐富。以這幾個條件為準，川陝甘地區比之張國燾所主張的松潘地區，都遠為優越。他因而提出，下一步應該向川陝甘發展。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王稼祥等都在會上發言支持周的看法，張國燾也沒有提出反對意見，只是說也可考慮向南，「向成都打」。[51] 三天後，周根據兩河口會議的決議，相應地制定了作戰計劃，準備趁敵軍立足未穩之時，搶先控制松潘地區的北上通道。[52]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張國燾將出任中革軍委副主席。

然而，張國燾並不想實行北上的決定。當毛、周所部紅軍從懋功一帶出發後一路北進，經數週艱苦行軍後進入松潘地區時，張所指揮的部隊卻一直按兵不動。如果說，在兩河口會議上他還沒有完全想清楚的話，那麼，這之後他已經釐清了思路：紅軍主力不該北上，而應向南發展，在川康地區建立、鞏固和擴大根據地。[53]

但和戰略考慮上的分歧相比較，更加觸動雙方神經的是對於政治和軍事最高領導權力的爭奪。兩軍會師之後，張國燾曾與周恩來有過一番談話。張問周：一方面軍實力如何？周答道，「在遵義會議時還有三萬多人，現在可能不到了」。張聽到後，「臉色就變了」。[54] 張的四方面軍的實力居然幾倍於中央紅軍，裝備也要好得多。他本來就是存野心之人，於是便開始一再或暗或明地向毛、周等提出，要在中央領導層的構成上體現出這種「實際情況」，解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55] 毛、周等商量之後，除了對張國燾做出讓步外，別無他法。7月18日，在蘆花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為了給張「騰位子」，周恩來個人退讓一步，辭去了紅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張國燾出任總政委，並擔任中革軍委的總負責者。[56] 接着，四方面軍的其他幾位領導人，也分別佔據了中央的各種高位。然而，毛澤東、周

恩來等和張國燾以及兩軍之間的矛盾並未因此解決，隱然之間，雙方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

8月4日至6日，中共政治局在一個叫做沙窩的小村莊開會，毛澤東、周恩來和張國燾等參加了會議。根據張的敘述，會場設在一個喇嘛廟外的亭子中，「周圍警衛密佈，如臨大敵」。這一切，顯然又是周為「防患於未然」而做出的安排。[57] 毛在會上竭力主張應北上在西北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並詳細講述了其中的用意。他強調：西北地區雖然人口稀少，物質條件缺乏，交通不便，氣候條件不好，但那裏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更何況，若往北走，「地理上靠緊蘇聯，政治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政治有很大意義」。[58] 周恩來在講話中說：「現在的最高原則是取得作戰勝利，只要這樣才能取得一致，所以我們要將問題盡量提到最高原則上解決。」[59] 與此同時，毛、周還恢復了紅軍一方面軍總部，並由周出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60] 這一舉動，分明已有了和張國燾分庭抗禮及「較勁」的意涵。

就在這個當口，周恩來卻突然患了一場重病。從8月中旬開始，他便連日高燒不退，一直發展到昏迷不醒。這是他生命中的一個「大劫」，幾乎要了他的性命。經兩位隨軍醫生診斷，周得的是兇險的阿米巴膿腫。這時，又恰逢紅軍要過環境兇險、沼澤遍佈的草地，只能由戰士組成擔架隊，並由幹部團團長陳賡親自負責護衛，一路抬着周走過了草地。[61] 長征以來，鄧穎超因患肺結核，一直和休養隊一起行動，這時也專門過來陪伴照顧周。[62] 所幸的是，軍中還存有一些治療此病的藥物奎寧，經連日用藥後，周的情況開始好轉，並脫離險境，活了下來。[63]

此時，紅軍部隊已分兵兩路，一路為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另一路則為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的右路軍。就在兩軍分路向北並進時，發生了張國燾要「武力解決中央」的一樁離奇並漏洞百出的「電報事件」，導致了中共以及紅軍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場危機。據稱，9月9日，張國燾致電陳昌浩，要陳率右路軍南下，「徹底解決黨內鬥爭」。當時任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的葉劍英看到了電報後，立即潛往毛駐地報告。毛澤東則迅速抄下電文，當晚便召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等開會。周恩來因得了阿米巴肝膿腫，曾一直發高燒，經治療後尚未痊癒，但還是抱病參加了會議。這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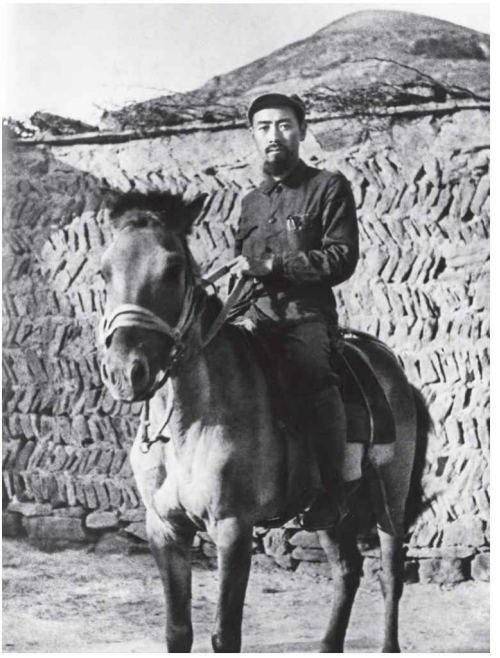


圖9.1：長征到達陝北後的周恩來，約1936年。
（Sovfoto / 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位中共領導人斷定，張國燾意在「危害中央」，因而決定，一、三軍團立即北上，「脱離險地」。[64] 凌晨2時，部隊出發。毛、周等人同時以中央名義致電張國燾，指出「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迅即北上」。[65] 於是，由於這麼一個電報，中共和紅軍分裂了。

那麼，張國燾究竟發了一份怎樣的電報，或是否發過這份電報？在1937年3月20日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清算「張國燾路線」時對此事及電報內容的説法是：「左路軍和右路軍問題的時候，葉劍英同志講密電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北上了。因為電報上説：『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稍微不慎，那麼會打起來。」[66] 但後來回憶此事時，毛關於電報內容又有另一種説法。1971年8月28日，他在長沙和韋國清、丁盛、劉興元談話時，談起了這件事：「以後就出了張國燾

分裂，張國燾打電報給徐向前、陳昌浩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拿出來先給了我，我們才走了，否則，我們就當俘虜了。」[67]

同中共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一樣，關於這個「電報事件」，人們曾提出過各種疑問和假設。電報原文從未找到，毛澤東的「抄件」也沒有留存下來。電報的內容究竟是什麼，也從來沒有一定之說，甚至連毛本人的說法都前後不一致。電報的「收件人」陳昌浩等全然不知道曾有過這個電報，張國燾本人更是堅決不承認發過這個電報。[68] 關於此事的最終「真相」，尚無水落石出之時。

但不管「電報事件」的真相如何，重要的是，隨着毛澤東、周恩來等率部連夜出走，中共領導層和紅軍分裂了，這是紅軍在長征過程中遭遇的另一次嚴重危機。但就毛、周關係而言，它卻使得他們兩人在眼前利益完全一致的情況下，獲得了一連串緊密合作的機會。在這場鬥爭中，周恩來自始至終都和毛「同舟共濟」，站在一起。從這時起，直到後來抗戰爆發之時兩人出現大的分歧，毛、周兩人一直緊密相處，在重要問題的討論和決策中相互間心領神會，配合默契，經歷了兩人半個世紀的關係中最為緊密的一段時光。

紅軍兩個方面軍分裂的一個直接後果，是為毛澤東提供了「亂世出英雄」的新機會，使得他得以進一步加強他在中共黨內和軍內的權威地位。而周恩來對此則表現出忍讓及與毛合作的態度，為中央紅軍渡過這一危局立下了汗馬功勞。

六

1935年9月12日，毛澤東、周恩來等率部與張國燾分離後的第三天，他們在甘肅省境內的俄界召開了沒有張國燾等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下一步的行動方針。會上通過決議，譴責張國燾「分裂紅軍的罪惡的行為」，稱其為張「機會主義估計」和「軍閥主義傾向」的暴露。[69]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主要報告，將同張國燾的鬥爭定義為「是兩條路線的分歧，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的鬥爭」。關於「當前的基本方針」，會議根

據毛的提議決定：「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繫，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70]

會上，還通過了另一個重要的軍事決定，將紅軍一、三軍團及軍委縱隊改編為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林彪任副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同時，決定成立一個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王稼祥和周恩來組成的「五人團」，負責處理重要軍務。[71] 由於這一安排，周恩來將紅軍總政委一職讓給張國燾後，失去了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委的職務，也成為「五人團」中在軍隊中唯一沒有實際職務的成員。他在黨內和軍內的實際地位因此而大大下降，也完全失去了成為黨和軍隊的最高領袖的機會。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否正是周恩來嚮往並追求的結果？

其實，毛澤東、周恩來的北上戰略要付諸實施，依然是困難重重。同四方面軍分裂後，毛、周等也就帶出了七八千人的部隊北上，無論往哪個方向走，若無接應並再遇強敵，命運仍然是凶多吉少。然而就在此時，運氣又站到了他們的一邊。毛、周所部進入甘肅後，到了一個叫哈達鋪的小地方，無意之間撿到了一張過期的《大公報》。上面有一則消息說，陝北不僅有兩支紅軍，還有一小塊蘇區。於是，毛、周等商量之後，立即在附近的榜羅鎮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議，將先前直接到臨近蘇聯的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改為先向陝北移動，「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72] 同時，他們又將陝甘支隊改名為「北上先遣隊」，在長征開始以來第一次給它加上了「北上抗日」的名頭。幾天後，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要北上，張國燾要南下。……目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我們就是要北上抗日。」[73]

這個時候，蔣介石又在並未自察的情況下幫了毛澤東、周恩來的忙。紅軍分裂後，毛、周這一部已成小股。用毛自己的話來講，「我們北上先遣隊人數是少了一點，但是目標也就小一點，不張揚，大家用不着悲觀」。[74] 張國燾所率領的紅軍部隊則是大股，其活動範圍也比較接近四川腹地，更顯得「張揚」，在蔣看來自然更具有危險性。9月29日，他在給甘肅省主席朱紹良的電報中說，毛、周所部紅軍「子彈缺乏、糧食不繼，沿途死亡之數甚眾」。相比較之下，張國燾部在「川北之殘餘紅軍，尚有二

萬餘人」。[75] 蔣因而在軍事部署上，把國軍的清剿重點放到了對付張統率的紅軍上來。一時之間，他雖然嘴上還在說要在甘肅境內將毛、周所部「殲滅之」，但在實際行動上，各路國軍對毛、周所部的追剿卻已經鬆懈下來。畢竟，在蔣介石看來，毛、周所率紅軍餘部覆滅只是時間問題，還用得着時時處處大動干戈嗎？然而，後來的歷史卻證明，對於蔣介石和國民黨來說，這實在是他們在戰略上的一個莫大的失誤。

上述這一切，為毛澤東、周恩來所率領紅軍數千殘兵提供了一絲生存的縫隙。1935年10月下旬，毛、周所率領的陝甘支隊進入了由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控制的陝北根據地。經跨越11個省的長途跋涉後，曾經的「中央紅軍」在人數上雖然只剩下一年前從江西出發時的一個零頭，卻終於找到了一塊暫時可以歇腳的地盤。10月22日，毛在陝西吳起鎮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宣佈：「現在全國革命總指揮部到這裏。」[76] 11月初，中共領導層又成立了西北革命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和彭德懷任副主席，這也是在中共歷史上，周恩來的地位首次明確地定為毛澤東的副手。[77]

對周恩來來說，從長遠來看更重要的是，他在處理和毛澤東的關係時，心態也因這段緊密相處而進一步發生了變化。1935年下半年，在中央紅軍與張國燾及四方面軍對峙的這幾個月裏，同張國燾的鬥爭，對毛、周來說是重中之重的問題。在同張反覆角力爭鬥的過程中，周恩來一直同毛澤東在一起。他應該見識到了毛澤東應對張國燾時手段迭出、無所不用其極的本事，這是他絕對做不出的。毛澤東不僅敢想敢做，更能夠做成。這怎麼能不使得周恩來內心深處本已存在的、對於毛澤東的某種「服膺」之感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並不斷「內化」呢？

然而，這是否就是長征的終結？紅軍所到達的只是人口稀少、土地貧瘠的陝北，所處環境依然險惡，所獲得的也只是一時的喘息時機。周邊駐紮着東北軍和西北軍，都因為紅軍的到來而虎視眈眈；稍遠處，紅軍其實只是暫時擺脫了蔣介石中央軍部隊的堵截，但依然遭到尾追。單憑陝北本身的人力和物力資源，絕對無法支持毛、周這樣一支部隊長期存在，更談不上發展擴張了。更何況，中共和紅軍依然處於分裂狀態。10月5日，張

國燾正式「另立中央」。毛、周領導下的中央和「中央紅軍」同張國燾的「中央」及麾下的四方面軍之間的分裂愈演愈烈，愈搞愈僵。

按照毛澤東、周恩來的想法，紅軍在陝北休整後，還要向蘇蒙邊界地區移動，以爭取「國際支援」。故此「長征」還要繼續下去，生死存亡則更在未定之天。塞北條件艱苦，獲得補給也極為困難。如果紅軍真的走上這條路的話，勢必會遭遇國民黨的大軍圍剿，又會受到近旁日軍的夾擊，是否會成為一次通向死亡的征程，亦未可知。

毛澤東雖然宣告了長征的「勝利」結束，但實際上，中共和紅軍的最終命運仍然處於未定之天。

第10章

「國難當頭，抗戰第一」

（1935–1937）

一

1935年的最後幾個月，來自北方的刺骨寒風在陝北黃土高原刮起陣陣風沙。冬天來了。

周恩來和毛澤東、張聞天等一道，率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不久，又面臨着抉擇的時刻。對他們來說，陝北只是一時的棲身之地，不僅很難據以成大事，即便要生存下去也十分不易。自一、四方面軍會師分手以來，毛、周、張考慮得最多的，是要不要帶領紅軍殘部轉向中蒙邊境地區，以求背靠蘇聯、蒙古，在「國際支援」下東山再起；若實在支撐不住，也可以遁入蘇、蒙境內避難。[1] 到陝北後，他們依然沒有放棄這個想法，待部隊休整並補充兵員後再伺機實施。[2]

同樣令周恩來等人感到揪心的是，他們同張國燾爭奪黨內正統的角逐並無偃旗息鼓之趨勢，張國燾堅持「自封中央」，紅軍與中共仍然處於分裂狀態。[3] 他們初抵陝北時無法預見事情如何發展和了結，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再走一步。

就在此時，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未曾想到的一樁「特大喜事」從天而降。11月中旬，由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派出的林育英（化名張浩，他是林彪的堂兄），偕同報務員趙玉珍，長途跋涉穿越大漠戈壁，帶着用於電台通訊的密碼，到達陝北。[4] 對於周恩來等人來說，這何止是雪裏送炭，簡直是再造之機遇。這裏最要緊的是，從中共黨內鬥爭的角度來看，張浩

的到來讓毛、周、張的「中央」獲得了以後同莫斯科建立通訊聯絡的條件，也使得他們在當下與張國燾的對峙中，得以挾共產國際以自重，逼使張國燾就範並最終放棄「另立中央」的行為。

張浩到達中共中樞駐地瓦窯堡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已率部南下，應對東北軍對陝北的第三次圍剿，並處理當時使陝北蘇區幾近癱瘓的「肅反擴大化」問題。張聞天坐鎮後方，在同毛、周的電報聯絡中通報了張浩到來的消息。但他們主要討論的，是張浩帶來的另一個振奮的消息：莫斯科已同意，「紅軍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5]

12月上旬，毛澤東、周恩來先後回到瓦窯堡。他們同張浩一再談話後，終於說服張浩對張國燾使出一招殺手鐧：由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致電張國燾，要他取消「偽中央」。[6]1936年1月16日，張浩給張國燾去電，開宗明義便說，「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其實，這是一句天大的謊話，共產國際遠在萬里之外，哪裏知道有一、四方面軍分裂這件事，又如何可能派張浩來「解決」這個問題？電報接着說：「我已會着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係，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準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傳達。」[7]這段話裏，又有一句假話，張浩雖有密碼，但毛、周處卻沒有可以同莫斯科通訊的電台，連自己同共產國際也說不上話，又如何幫助張國燾「代轉」發給莫斯科的電報？一週後，張浩又致電張國燾、朱德：「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講了這一番大話後，電文觸及了毛、周與張國燾之爭的要害：「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8]這就是說，張國燾所代表的只是中共的一級地方組織，他的「中央」確確實實地成了「偽中央」，只不過是為了給他面子才不明言罷了。

這一番操作中，除了毛澤東的大手筆外，應該也包含着周恩來的政治智慧。在黨內鬥爭中，他們把張浩到達陝北的好處用到了極致。

就在毛澤東、周恩來所率紅軍在陝北找到落腳點的同時，張國燾的南下之舉卻遇到了嚴重的挫折。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康地區後，立即遭遇到國民黨各路大軍的夾擊，又面臨着幾乎無法掌控的複雜的民族問題，難以在那裏立足並建立起新的根據地。再加上川康地區本來就貧瘠，在後勤上也支撐不起張的幾萬大軍。連續作戰之下，張國燾的部隊一直打不開局面，處境越來越困難了。

面對如此困局，張國燾與毛澤東、周恩來「正統之爭」的路越走越窄了。起初，他還想後退一步。1936年1月27日，他致電林育英、張聞天，要毛、周的中央改為「西北局」，而他的「中央」則改為「西南局」，雙方平起平坐，中央則由遠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暫代」。[9]此時，毛、周及所部紅軍挾共產國際之名義，已佔盡了先機與上風，如何肯同意張國燾的這種建議？林育英、張聞天給張國燾的回電中，對毛、周的中央改為「西北局」隻字不提，卻儼然以中央的口吻，歡迎張國燾對內對外均以西南局名義行事。[10]張國燾沒有跟進反駁。

上述過程中，毛澤東、周恩來他們的運氣真是好到了極點。但同時，這也同他們先前的北上決策是分不開的，也成為毛、周之間一次極有成效的合作經歷，對兩人此後幾十年間的相互看法與關係，起到極大的作用。

張浩來到陝北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改變了中共和紅軍內部「爭奪正統」的局面與走向。若從更大處來看，就中共及紅軍的命運而言，他帶來了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戰略，以及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據此以中央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11]這不僅為毛、周等人先前的「北上」決定所帶有的潛在的「抗日」性質背書，更為中共在大戰略上向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向轉變，並由此而開創出一種全新的戰略格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制定及行動上的空間。

歷史就是如此弔詭。幾個月前，當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與張國燾及四方面軍分道揚鑣時，這一切恐怕並不是他們可以預見到的，但事情的發展卻把他們帶到了這一步。儘管毛、周及中央紅軍此時仍侷促於陝北一隅之地，但展現在他們面前的天地卻驟然間變得開闊起來。



圖 10.1：右起：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秦邦憲（博古）在陝北，約 1936 年。
（CPA Media Pte. Ltd. / Alamy Stock Photo）

其實，早在長征後期，周恩來他們便不斷考慮對中共和紅軍行動的表述加以調整，到哈達鋪後，又把中央紅軍殘部改名為「北上抗日先遣隊」，以突出「抗日」的用意。但在當時，這基本上還屬於一種策略上的舉動，並沒有相應的戰略或政策層面的「配套」。到達陝北後，毛、周等的戰略考慮仍以「反蔣」為中心，即便提及「統一戰線」，也將之定義為「抗日反蔣的總的策略」之一部分，「就是說黨要聯合一切抗日討蔣的力量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消滅蔣介石」。[12]張浩到達陝北後，中共領導層關於黨的大戰略的表述仍無明顯的變化。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發表《抗日救國宣言》，其中仍堅持將抗日與反蔣相提並論，並把蔣介石視為最危險的敵

人。[13] 畢竟，國共兩黨捲入血腥的內戰已有十年，雙方都殺得眼紅，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要改變談何容易？同時，當時毛、周等都不在瓦窯堡，在後方主事的張聞天只能通過電報與他們聯絡，暫時還很難在戰略上有大的轉變。

毛澤東、周恩來於12月上旬回到瓦窯堡後，除處理張國燾分裂這一「燃眉之急」的問題外，他們從張浩處了解到共產國際七大的新戰略後，對內戰的態度開始轉變。12月17日至25日，政治局在瓦窯堡舉行擴大會議，周恩來亦出席。這是一次明顯帶有過渡性質的會議。在軍事及政治戰略表述上，中共領導人仍強調「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但同時，他們又決定改「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並提出「黨內主要危險是關門主義」，要實行「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相結合」的新方針。周恩來對戰略轉變的態度甚為積極，發言中一再強調了「關門主義」的害處。[14] 鑒於當時紅軍同東北軍已開始接觸，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出任書記。[15] 後來的事態發展顯示，這一項工作將改變中共的命運。

一週後，政治局於1936年1月2日再次開會時，中共領導人在時局判斷和戰略闡述上的變化也更為明顯。周恩來在會上發言時，朝着打破「關門主義」的方向又走出了一大步。他提出：「政治形勢的中心是開展民族戰爭，黨的組織任務是團結領導千千萬萬群眾在黨的周圍，進行民族革命戰爭。」[16]

所有這一切，為中共整個大戰略向着以「抗日」為基點，再次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方向發展打開了一扇門戶。從一開始，周恩來就是戰略轉變的主要推手之一。比較他和毛澤東關於同國民黨談判的態度，兩人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毛更注意於雙方「不和」的可能和危險，周則更看重雙方「和」的機會和價值。周恩來身上的民族主義意向更為突出，對於蔣介石的看法也更為積極，對於戰略轉變也表現出了更大的主動性。但在當時，這一點還不突出，也沒有造成毛、周之間明顯的矛盾或對立。

二

中共領導層戰略考慮上的變化，發生在中國內外局勢大變、蔣介石對內戰態度亦出現微妙轉變的關頭。1935年，當毛、周及紅軍還在長征路上為生存而搏鬥時，日本連續採取行動，蠶食進佔華北，成為中國的心腹大患。這一年，上海一家左翼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部抗日救國題材的電影《風雲兒女》，在民眾中風靡一時。這部電影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影響頗大，一時間萬眾傳唱，發出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吼聲。十多年後，這支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從蔣介石的視角來看，當時的情勢可謂又喜又憂。這幾年來，他一直將中共「武裝叛亂」視為心腹大患，一再調兵遣將實施「圍剿」，現在，包括毛澤東、周恩來所部在內的各路紅軍被逐出南方的各個根據地後，已被打成了喪家之犬，顯露出強弩之末的頹勢，「剿匪」大功告成似乎指日可待。蔣心中焉能不喜？

但蔣介石亦有憂。「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迅速佔領了東三省，蔣和國民政府曾試圖通過國聯及西方國家牽制日本，但對一心企圖在中國及東亞建立排他性勢力範圍的日本，這麼做根本無用。1933年，日本乾脆退出國聯。當時，蔣分身乏術，不得不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試圖先行蕩平紅軍以及不服從他的各路軍閥。到1935年，國內形勢已漸趨穩定，但日本的威脅也陡然上升，並危及中國之國本，這又如何能讓他不憂？

上述背景下，蔣介石對「抗日」及「安內」、「剿共」孰先孰後的看法，潛移默化間發生變化。在他的眼裏，中共和紅軍已達到幾近山窮水盡的地步，再難以對他和國民政府形成真正的威脅，他覺得，在繼續「清剿」的同時，以談判為輔助手段最終解決紅軍叛亂問題的時機到了。11月，蔣初步確定，要以「取消蘇維埃政府」、「取消紅軍」等為基本條件，尋求「政治解決」中共問題。[17] 1935年最後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總之今後中心工作為剿匪，可說已達到七分成功，明年則可以抗倭為中心，對匪僅着力於清剿可也。」[18]

蔣介石的探路先從莫斯科開始。他這麼做是因為在他看來，中國若要同日本正面對抗，就必須獲得國際上的支援，蘇聯則是當時最有可能援華

的大國，而「倭寇之所最畏者：甲、我抗戰；乙、我聯俄」。[19] 蔣在1927年「分共」後，同蘇聯一直處於敵對狀態。1932年，國民政府和蘇聯恢復了外交關係，但蔣和莫斯科之間依然猜忌甚深。從1934年下半年起，蔣開始小心探尋同蘇聯方面接觸的渠道及可能性。到了1935年下半年，隨着中日矛盾激化以及紅軍勢衰，蔣介石對於同蘇聯的聯絡也表現出更為積極的態度。他希望，除通過談判的助力解決中共問題外，還可藉此在抗日上同蘇聯掛上鈎。但他的基本信條仍是：「如聯俄決不能容共！」[20]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除了在南京同蘇聯使館接觸外，又派出國民黨要員陳立夫前往歐洲探路，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也在莫斯科同蘇聯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頻頻接觸，相互摸底。與此同時，陳立夫還派親信曾養甫，通過中間人輾轉找到華北地區中共地下組織。由此，開始了中共北方局同陳立夫、曾養甫這條線之間的多次接觸。[21]

但在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對蔣介石的上述新動向並不知悉。他們身處陝北窯洞，當務之急仍是為侷促於陝北的紅軍求一條生路。在瓦窯堡會議上，他們作出了準備東征山西的決定。這是一項帶有「一石兩鳥」用意的大決策，既可以打破紅軍坐困陝北的局面，進入山西尋求擴展地盤並補充兵員的機會；又可以伺機「向綏遠轉進」，朝着蘇、蒙邊界靠攏，形成「背靠外蒙」的態勢。但在場面上，「東征」仍打出了「開通抗日前進道路」的旗號。[22] 在此情況下，同近在咫尺的東北軍拉上關係，確保東征時不至於在背後被插上一刀，是一件性命交關的大事。[23]

瓦窯堡會議後，周恩來以中共東北局工作委員會書記之身，立即開始着手對東北軍的工作。恰好，東北軍亦有同中共及紅軍聯絡的意圖。此前兩個月間，中央紅軍及陝北紅軍同東北軍三次作戰，消滅了張學良手下的兩個師，張心驚之餘，不想再這樣打下去，把自己準備用來光復東北的實力打光，因而希望和紅軍打通關節，達成休戰。1935年最後一天，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幾位同紅軍作戰後被俘獲釋的東北軍軍官牽線之下，紅軍和駐甘泉的東北軍部隊達成了抗日休戰協定。[24]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常委開會，確定將東征山西的決定付諸實施。17日，又做出了相應的人事安排。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等於2月中旬率大軍過黃河入山西。周恩來則擔任後方中央局書記，留下來負責處

理後勤保障以及同東北軍談判等事宜。[25] 2月20日，紅軍大舉渡過黃河，進入晉西南，一開始所向披靡，打了好幾個勝仗，局面似乎大好，毛、周等亦興奮異常。

在陝北後方，周恩來主持下同東北軍的交涉也進行得相當順利。1月20日，周麾下大將李克農經周密安排後，和張學良在洛川秘密會面。第二天，周恩來和毛澤東等收到李克農來電：東北軍中同情國防政府主張者不乏其人，「如中共能站在誠意方面」，張學良願為此奔走，並同中共領導人正式商談。[26] 李克農回到陝北向周恩來當面彙報後，2月初，周經與其他中央領導人商議，決定乘熱打鐵，派李再赴洛川同張會晤。周恩來並指示李克農：不管遇到什麼情況，你們無論如何不能談崩，一定要談好。[27]

就在李克農動身前夕，屬於前中共特科系統的董健吾和張子華，受國民政府方面不同人士(宋子文及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等)的委託，帶着蔣介石希望「政治解決中共問題」的信息，幾乎同時到了西安。又經張學良向蔣電訊詢問落實兩人確實負有傳話使命後，派人護送他們於2月27日到達瓦窯堡。[28] 周恩來得知南京方面有着政治解決意圖的報告後，迅即於3月2日致電正在山西前線的毛澤東等人，主張「對蔣及南京方面，應答應派正式代表去」。他還強調：「這千載一時之機，萬萬不可放鬆。」[29] 3月5日，毛澤東等人回電表示贊同。事關重大，毛、周等商量後決定，要在山西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對策。周恩來隨即動身，前往山西。

與此同時，3月5日，李克農和張學良在洛川再次會面。張表露出他與中共聯絡的又一意圖，請中共幫他和蘇聯牽線搭橋，並要求盡快同中共全權代表見面。李、張最後商定，毛澤東或周恩來將到延安和張會談。[30] 會後，李致電周報告情況。周恩來立即回電，要李也到山西當面彙報。[31] 中共政治局聽取李克農的報告後，於3月16日決定，任命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前往延安同張學良談判。[32]

此時，周恩來還得知，中共北方局組織同駐紮陝西、在陝西土生土長的另一支國民黨部隊，由楊虎城任軍長的十七路軍也有秘密接觸。楊虎城同張學良一樣，並非蔣介石的嫡系，同蔣的矛盾頗深。2月間，北方局派到十七路軍工作的王世英曾同楊虎城就紅軍與十七路軍在抗日共同原則

下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達成協議。3月中旬，周恩來等聽取王世英彙報後，批准了他和楊虎城商定的各項原則。[33]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樓連續開會，全面討論同國民黨談判問題。周恩來在第一天的發言中就表示：黨內在談判問題上「應求得一致」，「首先要反對關門主義，反對束縛在過去的範圍中」。他在幾天後的另一發言中還分析道，「一部分國民黨領導人已經認識到抗日的必要性」，但國民黨內仍存在分歧。有鑒於此，中共應「正確運用上下層統一戰線，推動和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34]

4月初，周恩來回到瓦窯堡。4月7日，他在李克農陪同下，離開瓦窯堡前往延安，4月8日晚到達延安郊外。第二天，張學良乘飛機由西安到達延安。當晚9時，周恩來和張學良在延安城內的一個教堂會面，一直談到第二天凌晨3時，長達6個多小時。對中共來說，這是一次改變命運的會談。周恩來對會談早有準備，尤其對張學良本人做了極為透徹的研究。關於會談情況，周在第二天給中央的報告中作了敘述。張相信「紅軍是真心抗日，剿共與抗日不能並存」，他因而完全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也同意中共建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主張，並「願醞釀此事」。張還同意，同蘇區保持「經濟通商」，表示願意為中共代辦無線電及藥品，「並可送彈藥」。周看出了張急於同莫斯科建立聯繫的意圖，因而表示中共可協助張「派代表赴友邦」。但張也談到，「他現在反蔣做不到」，還要看形勢發展、包括蔣如何行事而定。[35]

會談後，張學良對周佈置在他身邊工作的中共諜報人員劉鼎表示：「周先生為我解決疑難，建立抗日信心。會談後我太滿意了。」[36] 周也在會後致張的信中提出：「為抗日固足惜蔣氏，當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所準備。」[37] 此後，張對蔣的態度有了大變化。4月下旬，他對劉鼎表示，必要時不惜和蔣翻臉：「我要幹就要徹底幹！」[38] 回想起來，正是在這裏種下了西安事變的種子。這當中固然有張自己的原因，但中共方面若是沒有周恩來這樣一位善於與人打交道的人物，能夠在錯綜複雜的環境和條件下抓住許多稍縱即逝的時機，並挖掘出其中的全部潛力，張學良是否還會同中共暗通款曲後，進而對蔣介石採取極端行動？

就在周恩來主導下的對東北軍工作獲得突破性進展的同時，紅軍東征山西的情勢卻出現了大逆轉。面對紅軍入晉後的凌厲攻勢，山西軍閥閻錫山情急之下，改變了一向以來不准其他方面部隊入境的成規，向南京方面求援。蔣介石隨即派遣大軍進入山西，紅軍在戰場上的處境很快就由順勢轉為逆勢，甚至連陝北那塊不大的根據地也受到了威脅。4月下旬，紅軍入晉各部不得不西渡黃河，從山西撤回陝北。

這麼一來，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先前定下的經由東征山西打開國際路線之舉行不通了。他們審時度勢之下，又將眼光投向西面，希望利用紅軍同東北軍之間新近形成的合作關係做文章。5月8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時提出，紅軍要為建立「西北國防政府而鬥爭」。為此，紅軍要以抗日為號召，通過與東北軍聯合行動，奪取寧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與蘇聯結成同盟。[39]

5月12日，周恩來同張學良在延安再次舉行會談。會談的最大成果是，周就中共實行「西北大計劃」的想法，對張做了詳細的說明和解釋，張極受感染。於是，兩人在紅軍與東北軍合作的問題上又走出了一大步，商定了「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以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同蘇聯及外蒙訂立抗日互助條約的計劃」。[40]張學良同中共大大靠近，到6月間更主動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要求。中共中央則認為，可以立即接受張入黨。[41]

在張學良身上的重大突破，使得「西北大計劃」的前景光明了許多。同時，中共代表對十七路軍的楊虎城的聯絡也在繼續。5月20日，毛、周等致電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通知他們，要實現以「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以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的「西北大計劃」，而「國際也已三四次派人來找我們，希望我們在西北成立大局面」。電報歡迎四方軍採取北上方針，並表示「弟等與國燾同志之間現在已經沒有政治上戰略上的分歧，……唯一任務是全黨全軍團結一致，反對日帝和蔣介石」。[42]5月28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時，滿懷欣喜地報告說，「張學良、楊虎城現已不完全接受蔣介石的指揮」。[43]

三

進入6月後，對周恩來和中共來說，更是好事連連。5月底、6月初，「兩廣事件」爆發，兩省實權人物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宣告反蔣，搞得蔣介石疲於應對，對蔣的衝擊甚大。隨後，中共與南京方面的談判亦有大的進展。6月間，雙方破天荒地達成了一份「談判記錄草案」，確認「為求得民族生存，須立即實現民族之聯合戰線，共同抗日」。[44] 面對這樣極為有利的時機，中共領導層立即決定，將「西北大聯合」計劃付諸實施，並與張學良、楊虎城部都簽訂了秘密停戰協定。張國燾方面，歷經掙扎之後也於6月上旬宣佈，放棄自封「中央」的名分。[45] 歷時一年的中共與紅軍的分裂危機，終於以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大獲全勝而告結束。

中共實行西北大聯合計劃的依託點，是必須得到共產國際的「背書」和來自蘇聯的實質援助。6月中旬，中共與共產國際中斷已久的直接電訊聯絡恢復。6月16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詳細彙報了「西北計劃」以及張學良的入黨要求，進而提出要蘇聯方面提供有力援助。[46] 1936年整個夏天，中共與紅軍的全部運作都圍繞着「西北大計劃」展開。到夏末，計劃的推行似乎正在不斷前行。

8月，潘漢年從莫斯科輾轉來到陝北，帶來了共產國際要求中共放棄抗日反蔣口號的意見。對此，周恩來反應甚快。兩天後，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過去抗日必先反蔣的口號，現在不適合，現在應以抗日聯合戰線為中心，抗日聯俄聯紅為中心。」他還提出：「與南京談判應提出實際問題：一、停止內戰；二、抗日民主，發動抗日戰爭。」[47] 毛澤東等其他中共領導人，也對共產國際指示表示贊同，表示「應該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他們同時又認為，循着這條路子，仍可以與東北軍合作，「創造西北國防政府」。[48] 然而，此時形勢突變。8月15日，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6月16日電報的回電終於來了。其中提出：中共「把蔣介石與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議，進行談判」。在具體政策上，共產國際卻對中共對張學良的態度、尤其是「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一節，提出了極為嚴厲的批評。[49]

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萬萬沒有想到，好不容易同國際恢復了電訊聯繫，收到的卻是這麼一個指示。這意味着，這幾個月來他們以「反蔣抗日」為號召，歷經千辛萬苦後搭建起來並一直遵照執行的「西北大聯合」計劃，一下子行不通了。這對周的打擊，或許比對其他中共領導人更大。本來，中共決定吸收張入黨，首先是周的大手筆，也是他做張學良和東北軍工作最為有效的成果。但現在，這一切卻為共產國際戛然喝止，對周恩來是一個極大的打擊。

從「西北大聯合」中抽去了與東北軍合作這一核心環節後，中共和紅軍面臨的情勢，驟然之間變得異常嚴峻。尤其是，蔣介石的各路大軍此時正不斷迫近並壓迫陝北蘇區，若不能公開與東北軍一道抗擊蔣的進攻，紅軍又該如何應對？8月25日，周恩來和毛澤東等人致電中共駐莫斯科代表王明，提出：為避免與南京衝突，靠近蘇聯，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佔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紅軍指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只有佔領寧夏才能改變這一情況」。[50]

上述變化發生時，周恩來指導下同南京方面的談判，仍有一路按着先前的步驟發展。8月27日，一直同曾養甫接頭的張子華來到保安，帶來了曾邀請周「出去談判」的信件和聯絡用密碼。[51] 8月31日，周回函曾養甫；第二天，又給陳果夫、陳立夫寫了一封親筆信。兩封信中，周都表明只要條件成熟，他「亟願與貴方代表進行具體談判」。[52]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正式放棄先前「反蔣抗日」的口號，代之以「逼蔣抗日」。[53]

莫斯科方面其實也絕不願意看到中共及紅軍陷於絕境。9月10日，斯大林親自批准了中共8月25日來電中的援助請求。第二天，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電告中共，同意紅軍實行寧夏作戰計劃，以便為從中蒙邊境接收蘇聯的軍備援助創造條件。[54] 毛、周等商量後，感到陝北紅軍勢力單薄，礙於莫斯科的反對，又不能再同東北軍搞「西北大聯合」，只有集合各路紅軍部隊，方可形成一定實力，實現向中蒙邊界的戰略移動。同時，他們也有「一石兩鳥」的想法：通過三軍會師，徹底解決張國燾「分裂紅軍」的遺留問題。於是，急電二、四方面軍，以執行上述會師計劃。[55]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舉行擴大會議，集中討論如何根據共產國際8月15日來電指示改變並制定中共政治軍事戰略。會上的主流意見是，「從前把抗日和反蔣並提是錯誤的，……我們要聯合蔣介石抗日」。周恩來發言時，也着重於說明聯蔣抗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中共「過去把蔣介石所代表的力量除外是不對的。蔣自國民黨五全大會以來有變化，在對日問題上，蔣是動搖的，但傾向於抗日」。[56] 9月17日，會議通過決議，放棄蘇維埃旗號，提出要建立以抗日統一戰線為基礎的民主共和國。[57]

然而，世事難料。當中共轉而希望「聯蔣」時，蔣介石對與中共談判的態度卻發生了大的變化。11月，潘漢年與陳立夫在南京談判。潘向陳面交了周恩來的親筆信，並口頭轉述了中共方面關於簽訂兩黨抗日救國協定的八項條件。不料，陳提出的對案是：取消中共政權與軍隊，紅軍保留三千人的部隊，師長以上幹部則「一律解職出洋」。潘當即反駁道，這是蔣「剿共的收編條例」，而不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陳不為所動，不肯讓步。只是提出，「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若周與蔣見面，條件還可有所鬆動。潘答道，若不先行解決暫時停戰問題，「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的」。[58]

蔣介石的態度改變，其實並不奇怪。說到底，蔣之所以願意同中共談判，目的在於用政治方式解決「共黨問題」。他從一開始就做了兩手準備，目標從來就是徹底消除「赤禍」。如果通過談判能達到目的，當然好；但如果需要打的話，那就打。對蔣來說，談是輔助的，打才是根本的。當時，在蔣看來，打的好時機出現了。

兩廣事變於9月解決後，蔣介石已可以專注於應對中共與紅軍問題。11月，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餘部和由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方面軍和紅六軍團所部，歷經困苦曲折，終於來到了陝北，與毛、周率領的「中央紅軍」會合。表面上看，三軍會師大大增加了紅軍的聲勢與實力。但實際上，正如楊奎松所指出，紅軍恐怕也因此面臨着最危險的時刻。[59] 多年來，蔣介石要在全國多處同時圍剿紅軍，注意力及兵力很難集中。現在，各路紅軍居然聚集到了陝北這麼一塊不毛之地，正好為蔣提供了「一網打盡」的良機。果然，蔣介石加緊調集大軍，企圖將紅軍各部壓迫於陝北一隅之地，予以全殲。

面對此種情形，周恩來、毛澤東及其他中共和紅軍領導人清楚地意識到，除非在戰場上有所作為，一味同蔣談判是談不出名堂的。11月21日，戰場終於出現了轉機，紅軍集中主力後，在山城堡一戰中殲滅了胡宗南部的一個旅，並迫使胡部收縮後退。這一來，也讓本以為紅軍已不堪一擊的蔣介石吃了一驚，尤其擔心這一「失利對內部不良影響甚大也」。[60]

12月初，潘漢年又同陳立夫會晤，陳開出的條件有了明顯的鬆動。[61]但與此同時，蔣介石並沒有在大戰略上改弦易轍。他一面和中共談判，一面仍在部署對紅軍的「最後一擊」。12月4日，他親自來到西安督戰。

蔣介石沒有料想到的是，這一來他也把同中共及紅軍勾結已深的張學良、楊虎城逼到了死角。蔣閱人不可謂不多，識人也不可謂不深，但他對張學良的估計卻有失算之處。在他看來，「東北軍通共事，已為不可掩事實。然在張漢卿指揮下，尚不為國家害，否則不堪想」。[62]他只看到少帥有一顆「赤子之心」，知道他講義氣、守信用，所以他儘管得到過不少關於張「通共」的情報，卻絕對想不到張會走出「兵諫」這一步。但實際上，張走出通共乃至聯共這一步，同他的「赤子之心」是一脈相通的，他之「義」，是他所理解的國家民族之「大義」。相形之下，周恩來對張的認識以及對與張關係的拿捏與把握，要比蔣高明得多。

四

1936年12月12日，是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一天。

這一天，天還未亮，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變，扣留了蔣介石，試圖迫使蔣改弦易張，同意停止內戰，實現全國協同抗日。張、楊在發動兵變前並沒有同中共商量。但事變一發生，張學良便於12日兩次致電毛澤東和周恩來，通報蔣及一干隨行要員已被扣留，要求告知「兄等有何高見」，並參與事件善後處理。[63]

毛澤東、周恩來等雖然早已知道張學良有「舉事」的想法，但卻沒有想到他會這麼果斷地採取行動。他們和一幫中共領袖的第一反應，是高度興奮。一番簡單商議後，毛、周聯名致電張學良：「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

計」，並要求東北軍和西北軍主力均調動到西安、潼關及平涼一線，防備蔣部軍隊的進擊，紅軍則「絕不進佔寸土」。[64]

12日深夜，中共領導人致電共產國際報告西安發生事變，周恩來即將前往西安，並提出了關於善後處理的五點意見，向國際請示：由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組織三人委員會；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由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等組織抗日聯軍；爭取由林森、孫科、馮玉祥等暫時主持南京政府，準備成立革命的國防政府；爭取蔣介石軍隊。中共領導人並請求國際「支持我們的上述行動」。[65]

第二天，周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對西安事變處置的會議。會上佔主導地位的看法，是要「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毛澤東更是慷慨激昂，先說：「這是革命義舉，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了出來。」[66]接着，他講了一通「殺蔣以謝天下」的道理，特別強調說，事變既已發生，「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從而達到「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的目的。[67]毛有這些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國共之間打了十年血腥內戰，雙方都到了殺人不眨眼的地步，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現在，蔣介石被扣留，不僅毛，其他中共領導人又何嘗不想殺他？

周恩來也因西安事變的發生而處於激動與興奮的情緒之中，因而完全同意毛關於事變是「革命義舉」的看法。對於毛和其他中共領導人「殺蔣」的意見，他沒有反對。但是，作為中共方面與張學良深層次聯絡的直接參與者以及同南京方面談判的主持人，他對事變的善後處理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重點分析了國民黨內各派系的情況以及對西安事變所持態度。他提出，軍事上固然要準備打，但有沒有「在政治上不採取與南京對立」的可能？要而言之，就是設想不同南京對抗，而是爭取推動國民黨的黃埔系、CC派、元老派和歐美派積極抗日。因此，是否「以西安為中心」亦可再加斟酌，「將來，或以陪都形式出現，更為有利」。可以考慮以抗日救亡代表大會之類的群眾團體名義，在西安召開救國會議，並歡迎各方代表前來參加。[68]此後兩天，中共領導層又就如何應對西安事變反覆討論。真正使得中共領導人意見趨於一致的，是他們從收聽到的消息中得知，莫斯科對西安事變做了負面報道。[69]這樣，周恩來

關於通過「不與南京對立」的途徑尋求事變解決的看法，開始在黨的領導層內佔據上風。

12月15日清晨，周恩來一行18人離開保安前往延安，第二天晚上到了延安城外，再從那裏坐張學良派來的飛機前往西安。當時，東北軍已從延安撤退，周恩來在延安停留一天多期間，他從附近調動到延安的一個團的部隊也已到達。周恩來一行於12月17日離開延安後，18日凌晨，國民政府任命的膚施縣長高錦尚帶領千餘民團離開延安。天亮後，紅軍部隊正式接管延安。這座千年古城，從此之後將成為中國的「紅都」。

12月17日下午，周恩來一行到達西安。[70] 周對劉鼎表示：蔣雖然被捉，但既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尼古拉，也不同於滑鐵盧戰役後的拿破崙，他的武裝力量並沒有被打垮，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困難。共產黨要多做工作，不使事變釀成更大的內戰，而要推動抗日，推動革命形勢的發展。[71]

蔣介石被扣留之初態度強硬，拒絕做任何交談及讓步。12月14日，曾任張學良顧問的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持宋美齡手書來見蔣，其中有一句：「寧抗日勿死敵手」。蔣和端納談話後，態度有了鬆動。17日上午，他授命蔣鼎文從西安飛往南京，轉達要南京方面暫停進攻及轟炸西安的手令。[72]

周恩來入住張公館後，未及休息便同張會晤，直至深夜。張提出，當前最迫切的是如何處置蔣介石。他表示，只要蔣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便放了他，並擁護他為全國抗日領袖，不到萬不得已不殺蔣。周同張打交道已有時日，完全知道如何同他談話。他順着張的話頭，先表示同意張的看法，接着闡述自己和中共方面的意見。他從國內外大勢談起，說明蔣被扣留並未改變他的實力，因此對他的「處置亟需慎重」。然後，周又比較了放蔣和殺蔣兩種處置的利弊。「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會使中國免於日寇滅亡」；比較之下，宣佈蔣的罪狀，並「最後把他殺掉」，「不僅不能停止內戰，而且還會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成進一步滅亡中國的便利條件，這就使中國的前途更壞」。周主張，應選擇第一條路，「力爭說服蔣介石，只要他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釋放他回去，……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張還問起共產國際的態度，周支吾了過去。[73]

一番長談下來，張、周兩人的看法達成一致，並擬定了解決事變的五項條件：停止內戰；下令全國援綏抗日；由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並肅清一切親日派；成立抗日聯軍；釋放政治犯並實現民主。張還同意，「在內戰階段不可避免圍攻西安前，(才對蔣)行最後手段」。[74] 從這五條裏透露出來的，是周恩來在政治上高人一頭的敏感和視野，一下子把「民族」和「民主」這兩面旗幟抓到了手裏，西安事變的性質也從「叛亂」變成了「兵諫」。當晚，周特地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提議，對蔣介石的處置應以南京方面不挑起內戰為條件，「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75]

翌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變致電國民黨中央，主張在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開放人民救國運動等要求的基礎上和平解決事變，「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76]

同一天，周恩來還同事變的另一位主角楊虎城會面並告知，中共中央已決定希望通過和平方式解決事變。楊對蔣認識甚深，雖未直接對和平解決的主張提出反對，但仍表示擔心事後會受到蔣的報復。周表示：「抗日已是大勢所趨，只要西北三方聯合一致，進而團結全國人民，蔣想報復也不可能。」[77] 顯然，周在和平解決事變上的態度更為明朗和堅定了。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周恩來到西安後送回的報告，尤其是周、張會晤的報告，再次開會討論對事變的處理。此時，共產國際其實已於16日給中共中央發過一份指示電，只是中共方面無法譯出，要莫斯科重發，因而不知其具體內容。但根據莫斯科方面的公開報道，毛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已知道，莫斯科對扣蔣之舉是不贊成的。中共領導人在肯定事變積極意義的同時，也意識到此事若處理不當，有「造成對中華民族極端危險的新的大規模內戰的可能」。他們決定，要「用一切方法聯合南京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促成全國性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與全國性抗日戰爭的發動」。[78]

12月20日，中共中央終於收到了共產國際重新發來的電報，電文開宗明義就提出：「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在客觀上只能損害中國人民的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並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共產國際敦促中共確立通過與蔣談判解決事變的戰略，「既然這次行動已經發生，就應該考慮實際情況」。中共應以「下述條件為基礎和平解決衝突」：吸收

反日運動代表改組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與同情中國人民抗日的國家建立聯合關係（但不要提聯蘇的口號）。[79] 這等於是周恩來所主張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想法，得到了莫斯科的背書。周接到毛關於此事的通報來電後，立即將國際的來電（刪去了其中指責張學良的一句話）轉告張、楊。[80]

此時，蔣介石姻親宋子文亦親自來西安同張學良等談判。周恩來知道宋是一個關鍵人物，即對張學良提出要見他。但宋因擔心南京方面有不利反應，一時不敢見周。[81] 宋和蔣見面交談後，蔣的態度進一步軟化，「漸次通情達理」。[82] 宋當即飛回南京，又同妹妹、蔣夫人宋美齡一道於22日飛回西安。經兄妹兩人勸說後，蔣表示，若中共同意「（1）取消中華蘇維埃政府，（2）取消紅軍名義，（3）放棄階級鬥爭，（4）願意服從委員長作為總司令的指揮」，他願意考慮做出「改組政府、三個月後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同意聯俄聯共」等政治上的讓步。[83] 蔣並同意宋子文與周相見，「察其態度如何，再定對付方針」。[84]

23日，周恩來與張學良一道同宋子文會面，提出了六項條件：「一、停戰、撤兵至潼關外。二、改組南京政府，排除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五、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六、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宋表示，他個人同意這些條件，並「承認轉達蔣」。據宋記載，周還表示：中共「同意放棄（赤色）宣傳與停止向目前蘇維埃政府控制以外的地區滲透」，並「以一個民主之中央政府來取代中華蘇維埃政府」。但雙方在何種情況下蔣可獲釋放上發生分歧，宋主張，只要蔣下令撤兵，「蔣即回京」。周則堅持「中央軍先撤走，愛國領袖先釋放，之後蔣才可回南京」。[85] 周還表示願與蔣面談。

12月24日，蔣介石見到張學良，口頭上作出一系列承諾，包括撤兵，委任孔、宋為行政院院長，令何應欽出洋；蔣回南京後釋放七領袖，聯共容共，聯俄聯英美。張即將蔣的答覆轉告周恩來。[86] 當晚10時許，周恩來在宋美齡陪同下入見蔣介石，兩人「一別多年，未免生情」。蔣只是說，「你如有事，可與漢卿詳談，余已囑其與你接洽也」。周隨即「道別而出」。[87] 周與蔣十多年前曾在黃埔軍校共事，蔣對周有較好印象，即便經

歷了十年血腥內戰，這一印象看來依然沒有全然逝去。

第二天上午10時許，周恩來先見了宋美齡和宋子文，然後又同蔣介石見面。兩人做了實質性談話，周見到蔣後便解釋道：「一年來，中共一直在力圖避免內戰，以保存國家實力，他們並不指望從西安事變中謀取任何資本。所建議之措施與幾個月來的主張並無兩樣。」[88] 據蔣日記記載，周要求蔣承諾「以後不剿共」。蔣問道：「爾當知余平生之性情如何？」周答道：「余自然知蔣先生之革命人格，故並不有所勉強。」蔣又說：「爾即知余為人如此，則爾今日要求余說『以後不剿共』一語，則此時余絕不能說也！……若爾等以後不再破壞統一，完全受余統一指揮，則余不但不進剿，且與其他部隊一視同仁。」周表態：「紅軍必受蔣先生之指揮，而且擁護中央之統一，決不破壞。」蔣表示：「此時不便多言，余事望與漢卿詳談可也。」[89] 周對與蔣談話的記述，與蔣的說法有所不同。他確實向蔣介石承諾：「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但據他向中央報告，蔣也相應地同意：「停止剿共，聯紅抗日。」蔣還表示，他回南京後，周「可直接去談判」。[90]

周恩來與介石蔣談話後，宋子文提出要蔣介石和宋美齡「今日即走」，張學良「亦同意並願意親身送蔣走」。周與楊虎城雖然「對條件同意」，但認為蔣「在走前還須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並不同意蔣今天走、張去」。[91] 不料，張學良卻擔心，西安形勢複雜，蔣的安全並無絕對保證。他未等周與楊虎城等開會商量出一個結果，便決定馬上放蔣介石回南京，並親自護送蔣去機場及陪送蔣回南京。[92] 當周恩來得知張學良居然陪同蔣介石回南京時，頓時大驚失色，連聲說道：「壞了，壞了！」他當即趕到機場，想予以阻止，但蔣、張所乘飛機已經離去。[93]

周恩來最擔心的，倒不見得是張學良本人的安危——他其實也知道，以蔣的性格及為人，張大概不會有生命危險。真正令他感到驚恐的是，張學良一走，東北軍必定會面臨着群龍無首的局面，西北由中共、東北軍、西北軍構成的「三位一體」的格局就會出現危機了。對周和中共領導人來說，西安事變固然是一件大好事，但事變以如此方式結束，卻並不是他們所希望看到的結果。周知道，事變後要走向國共實現合作，並使得紅軍擺脫侷促於陝北一隅的困境，道路依然漫長。

五

不出周恩來之所料，蔣介石回到南京後，仍對中共持極為懷疑的態度。雖然說，中共方面、尤其是周恩來在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上起了重大作用，但蔣對此並無多少感激涕零；恰恰相反，他看到的是中共的影響力比他原先的想像要大得多。若是任其進一步坐大，必定會對他和國民政府造成巨大威脅。然而，在西安事變後舉國「和」字當頭的情勢下，他也知道，要用武力解決中共與紅軍問題，一時之間恐怕是難辦了。他能做的，是利用自己的領袖地位和南京方面政治上的正統地位和軍事上的優勢，對中共和紅軍施加各種壓力，通過談判與軍事威脅相結合，來壓制這個心腹之患。

中共方面關於西安事變「善後」及與蔣和國民政府的談判，仍由周恩來負責。一開始，中共中央及周都力圖保持西北三位一體的格局，並以此為基礎同蔣談判。蔣也把拆散西北三位一體視為當務之急。他回南京後，不顧先前的承諾，將張學良付諸「軍法審判」判刑十年，再予以「特釋」後，又將他扣留南京「嚴加管束」。[94] 這一來，正如周恩來所擔心的那樣，東北軍陷入了群龍無首的境地。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向周恩來及中共傳話，要求中共「顧念國家艱難，為整個民族着想」，勸說楊虎城及東北軍將領「接受中央建議」，或至少「置身事外」。不然的話，蔣威脅道，「不僅周與蔣所談一切無從實現，且蔣亦不能制止南京討伐行動矣」。[95] 蔣介石出爾反爾的行動，雖然並非完全出乎中共領導人之所料，仍然使他們頗感震動，更在東北軍與西北軍中產生了強烈反應。東北軍將領絕大多數均「群情激奮，主戰」；西北軍軍長楊虎城「恐讓步後西北被分化，亦有戰意」。[96] 周恩來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要推手，面對事變後的複雜局面，他向毛澤東等人陳述利弊；同時，共產國際也明確指示中共：「現在黨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切實停止內戰，……爭取同南京採取聯合行動面對日本侵略者。」[97] 中共中央決定「對南京讓步」，勸說東北及西北兩軍接受蔣的條件，以避免與蔣和南京方面關係破裂。[98] 之後，東北軍內的一批左派將領在失望與憤怒之下，發動兵變，並殺害了張之下唯一可能團結東北軍的軍長王以哲。周竭力調停，未使事態擴大，但西北三位一體的局面也瓦解了。

然而，中共在西北善後上的「合作態度」，卻並未使周恩來與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談判變得容易一些。相反，周和中共在處理西北善後上的影響力，更使得蔣意識到解決「共黨問題」的迫切性。善後尚未達成時，在周和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的談判中，中共方面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做出了「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地位，停止武裝暴動及沒收土地政策」，「蘇維埃制度取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軍事委員會及蔣委員長統一指揮和領導」等重大讓步；顧則同意，「允許分期釋放在獄共黨，不再逮捕和破壞，並容許其在適當時間公開」，中共部隊「人員編制餉額和補充，照國軍待遇，其領導人員，由其推薦軍委會任命，其政訓工作，有其自做」等等。[99]

但在西北善後實現後，蔣介石又得寸進尺，試圖迫使中共做出更大讓步。1937年2月，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要求中共徹底取消紅軍並放棄共產主義信仰。蔣希望做到「編共而不容共」，首要目標是要接管控制紅軍。[100] 周恩來看出，蔣「始終不承認國共合作，而看做紅軍投降」。經毛和中央批准，他採取的談判方針是：「可以服從三民主義，但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絕無談判餘地」；「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但取消共產黨絕不可能」；「紅軍改編後人數可讓步至六七萬，編制可改四個師，但國民黨不得派政訓人員」。[101] 此後，周與顧祝同等談判對手的「討價還價」，集中到了中共「政治改造」和紅軍「軍事改編」這兩大問題上。雙方在中共是否「接受三民主義」等政治問題及其表述上的分歧固然大，但更為根本的仍是軍事問題：周和中共方面要保持對紅軍改編後的控制，國民黨方面則堅持要收編中共部隊，「絕不許其成立軍部或總指揮部」。[102] 雙方在這一層達不成協議，只能讓周直接和蔣來談。

3月26日，周恩來到杭州面見蔣介石。出乎周的意料，兩人的談話極為順利。會談開始後，周即表示，中共擁護蔣及國民黨領導全民抗戰，實現國內和平，改善人民生活。他還強調，「中共非投降，紅軍非改編」，因而要求「蘇區改為邊區」，「紅軍改編為三個師，人數請容許在四萬人以上」，「請設立指揮總部，中央軍政人員只擔任聯絡」等等。蔣當即表示：「這些小節不成問題，即使未談好，也堅決不會再打。」還說，兩黨都要檢討過去失敗，保證永久合作。他又稱讚中共「有民族意識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蔣說，他最看重中共組織與蔣個人及共產國際的關係問題，

以及如何服從蔣的問題。他要中共商量後拿出具體辦法，再派周來同他見面。[103] 談話間，蔣有意無意間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個人對周的信任感。

會後，周恩來攜帶與蔣聯絡的密碼，於4月初回到延安。中央政治局隨即舉行擴大會議，聽取周的彙報後，認為周蔣會談「結果尚好」。4月9日，周致電蔣：「歸膚施（延安）後述及先生合作誠意，均極興奮，現黨中正開會計議綱領及如何與先生永久合作問題。」[104] 一時間，國共談判似乎成功在望。

4月25日，周恩來從延安乘車去西安。途中，在甘泉縣勞山附近，突然遭遇土匪襲擊，倖免於難。周身邊衛隊拼死抗擊，有十多人被打死，其中包括周的貼身隨從副官陳有才和衛隊副隊長陳國橋。周本人僥倖脫險，躲過了一場大劫。[105]

周恩來到西安後，同國民黨方面張沖、顧祝同等的具體談判卻依然不順利，雙方在兩黨間實現組織合作的相關事宜上，幾乎每一個細節都要討價還價，難以形成最後的協議。到頭來，還是要由周與蔣當面商談解決。5月23日，周致電中央報告，準備再赴廬山見蔣，討論國共共同綱領、聯盟或改組國民黨、釋放政治犯、停止全國剿共、改編紅軍等問題。[106] 6月4日，周恩來到廬山見蔣。此時，蔣已定下方針：「甲、經濟從寬；乙、政治次之；丙、軍事嚴定限制；丁、主張堅決，絕對不能遷就；戊、行動須令一致；己、區域與軍官，僅施監察亦可；庚、勿准聯合各黨各派主張；辛、勿准宣傳；壬、改黨名，誓行三民主義；癸、領袖權責」；還確定「對共黨與第三國際關係應令斷絕，……使共黨明瞭中國抗倭須以中國為本而非為其他國家抗倭也」。[107] 從6月8日起的一週期間，周與蔣介石連日會談，他發現蔣態度強硬。在最要緊的軍事問題上，蔣主張中共部隊按照三師十二團改編，上面不可再設立總部，朱、毛都「須出來做事」。他還提出，國共兩黨實現組織上的統一，由兩黨派人建立由他任主席的國民革命同盟會，在重要事務上，他有最後決定權，而後「可與共產國際發生關係」。周表示，上述各項，尤其是關係到軍事及組織者，都不能同意，「與蔣爭論很久不能解決」。[108]

但是，國共談判並未因此走進死胡同。當時，其實雙方對於達成協議均有某種誠意。中共方面，擔任主要談判代表的周恩來更是如此。周雖不

是黨的最高領袖，但這時候他在黨的中樞權力和影響仍然很大。同時，中共這一方針又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制定的，並得到了來自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支持。周恩來從廬山回到延安後，對他和蔣介石的會談也盡量從積極面向中央報告。中共中央最後決定，盡可能再對蔣做出讓步，並再派周恩來上廬山同蔣介石面談。[109] 蔣也認為，「見周恩來(後)，共黨問題大體可定」。[110] 因此，若不發生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話，1937年在中共與國民政府之間的系列談判達成某種具有實質意義的結果，其實是極有可能的。這一來，即便沒有全面爆發抗戰，蔣和國民政府的領導地位仍將得到相應的鞏固。

六

1937年7月7日，是改變中國及世界歷史的又一時刻。這一天，日本軍隊在地處北京近郊的盧溝橋附近舉行演習。之後，他們宣稱演習中有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由中國軍隊駐守的宛平城執行搜查。遭到拒絕後，日軍開始對宛平城發起進攻，守城的中國軍隊奮起抵抗，雙方展開激戰，並進一步擴散到京津地區，是為「七七事變」或「盧溝橋事變」。它成為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觸發點。[111]

這一天，周恩來和博古、林伯渠一道，正在前往廬山與蔣介石作進一步談判的路上。7月15日，他當面向蔣提交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17日，周、蔣開始會談，蔣雖然未立即就發表國共宣言及中共合法化問題表態，但仍表示，他將承認中共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

在之後的具體談判中，國共雙方在紅軍改編及之後的指揮架構，以及中共及邊區的合法地位等問題上仍有分歧，但時局不等人。此次中日之間衝突與以往不同，一方面，日軍在迫使蔣及國民政府全面屈從前，毫無罷手的跡象；另一方面，全中國民情激憤，連同各路軍隊，抵抗呼聲震天動地。8月1日，蔣親電中共領導人，邀請毛、朱、周立即到南京共商國是。一週後，周和朱、葉劍英一道飛抵南京，參加國是會議並繼續與蔣談判。幾天裏，中日戰爭的形勢急轉直下。8月7日，日本政府宣佈「不以

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一週後，又將戰火延伸到上海。隨後，中日雙方分別集結大軍，在上海及周邊地區展開了規模空前的大會戰。中日全面戰爭已成脫韁野馬之勢，再也收不住了。周與蔣及國民政府的談判，在「八一三」上海開戰之後迅速獲得突破。8月22日，國民政府宣佈遠處西北的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延至9月23日，蔣發表談話，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國民黨中央社也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國共兩黨相約共赴國難，形成了抗日統一戰線。

毛澤東自抗戰爆發之時起便認為，中共必須抓住抗日的旗幟，但更需要利用抗戰的時機，全面發展並擴充自身的軍事政治實力，當作中共整個戰時戰略及政策的重心。8月9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抗戰已經開始，準備抗戰的階段已經結束」。「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才能發揮紅軍的長處。……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批評的自由。」[112] 在這一點上，周恩來的看法與毛澤東不同。全面抗戰爆發後，周恩來也捲入了他整個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同毛澤東在大政方針上的重大分歧和爭論。

1937年8月22日，中共高層領導在洛川連續三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的有黨和軍隊領導共23人，這也是抗戰爆發後中共領導層召開的第一次重要的戰略決策會議。周恩來從南京趕回延安參加會議。毛在就「軍事外交問題」的講話中，根據自己的思路，提出了「統一戰線與政治警覺性」問題，提醒與會其他領導人，「黨的階級的獨立性問題應提起全體黨員注意！防人之心不可無，(國共)在階級上根本是敵人！」「國民黨的方針是一方面限制我們，一方面破壞我們」，中共一定要保持高度的「階級的獨立性和警覺性」，「爭取共產黨和紅軍成為抗戰的核心，一切工作準備過渡到工農資產階級聯盟的民主共和國」。紅軍的基本任務則是創造根據地，保存並擴大紅軍，不與敵人打陣地戰，不硬拼，要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113] 在周恩來看來，毛的話並非沒有道理，但也有不對之處。周的基本看法是，「蔣介石既已抗戰，就決不會中途妥協」。周從蔣的個性及國內外形勢來分析，認為毛對蔣的「這種顧慮並不存在」。周還認為，「中共和八路軍的獨立自主，只能就相對而言，不好公開違

抗南京的命令」。在軍事戰略上，周針對毛的看法提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即便在「我們的地區佈置敵人後方游擊戰爭」的情況下，仍需在「必要時集中力量消滅敵人」。「即使八路軍在這種運動戰中，蒙受相當的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這可以在全國人民面前，證明我們努力抗戰。」[114] 毛在會上「舌戰群儒」，周恩來等人沒有能夠說服毛，毛也說服不了周等人。

但毛澤東並沒有因此「失權」。會議結果組成了新的中央軍委，成員增為11人，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周任副主席。8月23日，中央常委決定成立長江沿岸委員會，由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等五人組成，周任書記。[115] 顯然，周依然將在同蔣的聯絡及國共統一戰線中，起到關鍵性作用。這也是周本人樂於所為的。

這次會議，其實已為毛在王明回國後經歷「領導危機」，以及周成為「王明路線」同謀，留下了伏筆。後來，這成了周對毛欠下的又一筆「帳」。

洛川會議結束後，周恩來本來應去南京或武漢，但他卻去了山西。他這麼做是因為山西已成為抗戰的前線，又與陝北毗鄰，在山西主政多年的閻錫山對與中共合作抗日表現出積極態度。在中共領導層和周本人看來，周去山西，可以在加強國共合作並擴展中共力量及影響上有較大作為。

從1937年9月初到11月，周在山西盤桓近三個月。他到後，便立即就八路軍入山西作戰後的指揮關係、後勤供應、作戰地區的急迫問題，同閻錫山會晤協調，過程相當順利。蔣介石發表正式承認中共合法地位的講話後，周對國共聯合抗戰更具信心。9月25日，八路軍一一五師配合閻錫山部主力作戰時，在平型關伏擊日軍一部，獲得了殲敵數百人的勝利。此為中國軍隊在抗戰初期取得的少數勝利之一，也是中共部隊投入抗日後的第一個勝仗。周更覺得，自己在山西有事可做，向中央提出自己留待太原，參與山西抗戰「協調指揮」。[116] 此後，直到11月日軍攻陷太原、山西大規模抗戰臨近尾聲，周一直與閻錫山共事，雖有矛盾，但大體上仍能合作。周對國共抗日統一戰線的信心，也更為加強。

七

11月25日，周恩來從山西飛回延安參加政治局會議。幾天後，這幾年一直在莫斯科擔任中共代表團團長的王明，也乘飛機從蘇聯回到延安。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史稱「十二月會議」。在人們眼裏，王明是拿着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來的。會上，他果然一露面便出手不凡，對毛澤東自長征後期以來在軍內和黨內逐步建立起來的權勢地位，提出了空前嚴重的挑戰。王明到達延安時，毛說，王明的到來是「喜從天降」；但他心裏明白，這恐怕會演變為「禍從天來」，亦未可知。

會議開始當天，王明做報告，一直講到第二天下午。根據莫斯科關於中共在抗戰中服從以國民黨為主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王明提出了「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基本政治口號，主張「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他認為，全國抗戰後政治制度已「開始民主化」，對國民黨已「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決定敵友的標準是抗日不抗日」。在軍事上，「沒有統一的國防軍和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因而要「建立真正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計劃」的「全國統一的國防軍」。[117] 王明的看法，有共產國際的背書。從莫斯科的視角來看，這有助於讓中國拖住日本，從而避免蘇聯在西線和東線陷於兩面作戰的境地。但同時，究其邏輯而言，這又能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危機空前深刻的時刻，將國家與民族命運置於一己利益之上的立場。

在國難當頭以及世界情勢大變之際，王明的這些話無疑是極具分量和感召力的，也同周恩來的親身體驗結合起來，引起了周的強烈共鳴。周在黃埔時期曾經與蔣共事，近幾年來又直接負責並從事同蔣本人及國民黨方面的談判，所以，他對蔣和大多數國民黨人是民族主義者這一點，儘管口頭上不便明言，心裏其實應該是清楚和承認的。

正因為如此，周恩來同絕大多數與會者一樣，對於王明的觀點是贊同的，尤其認為王明提出「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為了統一戰線」的看法極有道理。周在發言中，批評黨內有人把獨立自主提到了首位，卻未

能實行「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並聽任不利於抗日統一戰線的言論及行動泛濫。他提出，「從山西的情況來看，由於沒有實行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黨內、軍內和各地都有不利於抗戰，不利於統一戰線的思想、言論和行動」。[118] 他主張，中共應公開糾正自身的錯誤，同國民黨搞好關係。周恩來在發言中雖然沒有點名，但他批評的矛頭所指也包括毛在內，卻是十分清楚的。

周恩來剛剛從山西前線回來，他在會上的發言是有分量的，並同王明的講話形成了呼應。抗戰以來，毛澤東便一直主張中共必須以加強自己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力為戰略中心和重點，一時間，他在會上陷於孤立的境地。更為嚴重的是，在王明和周恩來形成了一種實際上的「聯盟」的情況下，毛澤東擔心自己正在失去自遵義會議後逐步獲得的權力。會後，他甚至發出了「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的感嘆。[119]

但實際上，毛澤東的話是言過其實了。十二月會議上，中共領導層成立了準備召集中共七大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王明任書記，可謂平分秋色。委員會下的秘書處由毛澤東、張聞天、康生、陳雲、王明五人組成，周恩來不在其列。[120]

說到底，王明表面上雖然得勢，但他在大戰略思維和政治權謀的運用上，其實還是新手；真的要論在權力之爭中與毛澤東分庭抗禮乃至權謀使用的本事，他遠遠不是對手。更何況，王明與周恩來並不是一回事。他們之間的聯盟關係，有其極不穩固的一面：周恩來之所以在十二月會議上支持王明，並不是出於同毛澤東的芥蒂或對於王明本人的信服，而更多的是一種從大原則出發的認識、再加上他根據親身體驗而作出的政策選擇。同時，這也是與周對共產國際決議的服膺態度分不開的。因此，周、王之間當時形成的「政治聯盟」關係具有某種「即時」性質，是會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轉變而產生變動的。

十二月會議結束後，周恩來離開延安，前往武漢組建中共中央長江局，負責南方各省的黨的工作，並就近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直接打交道。王明本來是可以選擇留在延安的。然而，他從「一切以統一戰線為重」的戰略思考的邏輯出發，自然應該前往武漢。更何況，他是喜出政治風頭之

人，豈肯困守於陝北不毛之地？於是，他走出了一步從中共黨內鬥爭的角度來看是大錯特錯的棋子：儘管毛澤東曾請他駐節延安以掌控全局，而他（不管是出於真誠或是幼稚）卻在不可能讓中共中樞機構隨他而行的情況下，執意要前往武漢，以便「襄助」蔣介石從事全國抗戰。問題在於，他一旦離開中共政治和軍事權力的中樞，就給了毛澤東坐鎮延安的機會，可以直接控制中共與莫斯科之間的電訊聯繫，並把握在中共黨內掌控「號令地方」的權力。

這之後，毛澤東和王明之間角逐中共最高權力的攻守之勢開始向着有利於毛的方向逆轉，而一旦此種轉變發生，毛澤東便再沒有給王明任何「翻盤」的機會。在這一大背景下，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也以前者越來越擁戴並服從後者為特徵而再次發生變化。周恩來終其一生，都將工作和生活在毛澤東權力和思想的巨大氣場的籠罩之下，再也走不出來了。

第11章

霧都重慶
（1938–1943）

一

重慶是一座山城，位於長江及其主要支流嘉陵江交界處，依山而建。重慶又是一座「霧城」，年均霧日超過100天。每年10月到翌年4月是重慶的霧季，常常大霧瀰漫，終日不散；戰爭年代，這成為這座幾乎沒有空防力量的城市抵禦敵機轟炸的天然屏障。

我從未在重慶居住，但向來對它懷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和敬意——我曾無數次聽過我的父親和母親講述他們在重慶的經歷。抗戰期間，正是在這座城市，同為流亡學生的父親和母親相遇。他們分別來自上海和杭州，本來不會相識。1930年代後期，戰爭迫使他們離鄉背井，又把他們帶到了日本侵略鋒芒未及的重慶。他們在那裏成為同學和同事，又在那裏結婚。沒有這一段與重慶相關的故事，我是不會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1937年11月20日，在上海失陷、南京吃緊的情況下，為「打破敵人訂城下之盟之妄念」，[1] 國民政府宣佈遷都重慶，山城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但在當時，這還是一項「防範於未然」的決策。南京失陷時，軍政各機關大都先行遷往江城武漢或內地其他城鎮，鮮有直接遷往陪都重慶的。

當時，國共合作雖已形成，但十年血腥內戰的慘痛後果和記憶，哪裏是一朝一夕之間可以抹去的？蔣介石公開宣稱：國民政府將「開誠接納」中共，「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2] 只是，他心目中仍然視中共為「無信

義之徒，決不能成業也」。[3] 12月18日，周恩來在延安參加「十二月會議」後，攜妻鄧穎超，同王明一道抵達武漢，王、周分別就任中共長江局書記和副書記。此後十個月裏，直至武漢於1938年10月下旬失守，江城一直是周恩來的主要工作基地。

12月21日，周恩來和王明、博古一道面見蔣介石。一見面，蔣就說他「等候已久」。王明敘述了對形勢的看法，並轉達「遠方（蘇聯）某些建議」，尤其是幫助中國組建機械化部隊並建立軍事工業的計劃，蔣對此極感興趣。博古講了邊區與國民政府間保持聯絡的辦法。周恩來最實在，提出了一系列具體可行的建議，「如成立兩黨委員會、決定共同綱領，出版日報，成立國防軍事工業、機關軍事工業部、徵兵委員會、補充擴大和改造部隊，協助政府組織擴大國防參議會為民意機關」。蔣當即表示，「所談極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見好轉」，還說：「外敵不足慮，……只要內部團結，勝利定有把握。」[4]

一週後，國共關係委員會開始運作，周恩來任中共方面召集人，並很快就拿出了一份共同綱領草案。[5] 但國共之間的敵意和猜忌根深蒂固，雙方雖然在抗日大局下握手言和，但一旦涉及到具體問題，仍然狀況百出。蔣介石想的是，「對內主國共合併，對外擬與俄再進一步之合作，以應付最近國際形勢之變遷」。[6] 他因而希望，周和中共同意讓國共兩黨合併為一個「大黨」。國民黨內也響起了一片「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軍隊」的喧囂之聲，視中共軍隊和割據政權為「封建軍閥勢力」，應予取締，以免「陷國家於萬劫不復」。[7]

周恩來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這些想法和做法大不以為然，但他對國共合作又是大力贊同並積極推進的。1938年2月，國民政府決定在軍事委員會內設立政治部，由蔣的親信陳誠出任部長。蔣親自出面邀請周擔任政治部副部長，並保證他「可以做很多事」。周反覆考慮後，覺得他「為推動政治工作、改造部隊、堅持抗戰、擴大我黨影響，可以去擔任職務」。[8] 但周又認定，國民黨大、中共小，兩黨若合併為一個大黨，中共注定要吃虧，因而絕不可行。2月10日，他見到蔣時說，國共之間的問題「只有從聯合中找出路」求得解決，但兩黨又都不能取消。蔣當面對周表示可以研究，但心中卻頗為悻悻然，覺得「共黨不願合併，則改造本黨受打擊矣」。[9]

國共關係如此複雜，中共領導層又亟需形成共識，於是，周恩來、王明等連續致電延安方面，提議政治局開會討論「最近時局中發生許多新的嚴重問題」。[10] 2月24日，周和王明一道回到延安，參加了2月27日至3月1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史稱「三月會議」）。周在會上提出，中共政治上仍應實行以擴大統一戰線為主的戰略，但不可和國民黨搞什麼大黨。[11] 但毛不高興，因為這次會不是他想開的，他對會上的討論也沒有主導權。[12] 這段故事關係到毛在黨內建立絕對領導權的勃勃雄心，而此時周、王卻是擋在路上的絆腳石，對此，本書下一章會繼續講述。

3月初，周恩來從延安回到武漢，面臨的頭等大事仍是日益吃緊的抗日戰局。半年多來，抗戰並非全無亮點。日軍開戰時曾宣稱要在幾個月內解決「支那事變」，這一圖謀已被打破。抗戰以來，周和毛澤東都曾提出過中國抗戰將是持久戰的看法，周主持下的《新華日報》還將毛的《論持久戰》在武漢結集出版。戰局發展證明他們是對的。然而，抗戰開始後，中國軍隊雖曾在台兒莊等處作戰中慘勝，但畢竟吃敗仗的時候居多，失地也不斷增加。5月中旬，日軍佔領徐州，隨即朝武漢這座華中重鎮步步逼近。6月27日，國民政府提出「保衛大武漢」的口號。早在十天前，周就與王明、博古一道致電中央提出，中國軍隊的戰略中心應是保衛大武漢。[13] 自此，武漢保衛戰開始，這成為周所面對要務中的重中之重。

9月上旬，周恩來同王明、博古等一道又回了一趟延安，參加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這是中共歷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準備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一年來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中央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14] 周聽到後，不能不產生強烈的思想震撼。這對中共來說是一件特大的事情，意味着毛在黨的領導層的權力和影響必定會進一步上升。從道理上說，周恩來應當等全會開完後再走；但他卻擔心，若武漢陷落，國共關係以及中共在國統區的整個佈局都會出現大調整的需要。毛出於自己的盤算，也力促周提前返回武漢。結果，六中全會只開到一半，周恩來就匆匆離開了延安。[15]

此時，武漢的戰情確實極為危急。面臨日軍大兵壓境的局面，各機關已陸續撤離。戰事延至10月25日，江城終於失守。周恩來在城裏一直待到25日清晨3時，即淪陷前幾小時才離開。27日晚，他到達長沙暫駐。[16]

11月12日深夜，長沙突起大火。短短幾小時裏，全城已陷於一片火海。火起時，周恩來已經入睡，被隨員喚起時，周遭已是一片混亂，道路亦為人群所堵塞。他和葉劍英等幾人「倉猝出火城，衣被盡失，步行二十餘里」，才得以從城中脫身。[17] 後來才知道，大火發生竟是因為長沙軍政負責人聽信日軍已逼近的謠言，根據蔣介石事先批准的計劃倉促下令，放火焚城，以收「焦土抗戰」之效果。三天後，周在衡山向國民黨最高當局提出，必須「懲辦放火首犯」。[18] 但最後，只有層級較低的三位官員受到了嚴厲懲罰。這件事，對蔣和國民政府的聲譽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二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輾轉來到重慶。從這時起，直至1943年6月他被召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陪都成為他常駐和工作的基地。他面臨的任務和挑戰，真是千頭萬緒。此後幾年裏，他獨當一面，在組織構建、統一戰線掌控、情報工作以及外交問題上顯示了出色的才能，但同時也有不少失誤。

武漢失陷時，六中全會仍在進行。在周恩來已離會的情況下，毛及中共領導層決定撤銷長江局，並分別設立由周任書記的南方局和劉少奇任書記的中原局。[19] 1939年1月5日，毛又在未同周事先商量的情況下，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致電周，提出將南方局易名為西南局，管轄中共在華南和西南各省的組織及活動。[20] 毛澤東何以這麼做？沒有直接的資料足以說明他的意圖。但這一動議若付諸實施，定會造成由周任書記的南方局在黨內重要性的下降，也會給周指揮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造成諸多不便，這是周難以同意的。1月7日，他聯名博古、凱豐致電中央書記處，堅持仍「以南方局名稱為好」。[21] 毛看來並不想在這件事上同周對峙，很快便同意了周的意見。[22]

周恩來到重慶後，最令他操心費神的，仍然是日趨複雜的國共關係。隨着抗戰初期「蜜月期」的過去，兩黨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也日益彰顯並愈演愈烈。蔣介石要搞一個「大黨」的事也沒有完。1938年12月，他再次主

張將中共吸收到國民黨中來，並表示：「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取消名義將整個加入國民黨，我都歡迎」，不然，「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麼意義」。[23] 周和王明當即表示，「一個組織辦法做不到」，但蔣仍抓住此事不放。1939年1月20日，蔣約周見面，「又提統一兩黨事」，周「告以不可能」，但蔣仍要他「電中央請示」。[24] 1月21日，中央書記處接到周電報後討論了這件事，隨即致電周，申明國共兩黨合併一事「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同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日建國之合作」，不可混為一談。[25] 1月25日，周覆信蔣，表示「中共絕無排擠和推翻國民黨之意圖」，但國民黨「對中共之部分發展」也不應恐懼或加以限制。這樣，兩黨才能減少摩擦並「貫徹合作到底」。[26]

周恩來的回覆並未出乎蔣介石之所料。這時，面對抗戰以來中共軍事實力與政治影響力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內已是一片「限共」、「反共」的聲音。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蔣在講話中說，對中共問題「須以嚴正的態度處之，共產黨有不當行為，當糾正指責之」。[27] 會上，內部擬定採納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秘密訓令，決定要對中共的言論和活動予以「嚴密限制」。此後，本已陷入緊張的國共關係更趨惡化，摩擦和衝突也不斷升級。

周恩來並非僅僅通過同國民黨打交道來應對國共關係面臨的挑戰。重慶是中華民國的戰時首都，也是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及「中間派」雲集之地。周把同其他各黨派人士交往當作統戰的另一件大事來抓。他在重慶廣交朋友，擴大中共影響的同時，還不斷揭露蔣與國民黨的反共政策與行為。為此，他極重視宣傳及文化工作。早在1937年7、8月間，他就在南京向蔣介石提出，中共希望在國統區辦一份報紙。蔣當面同意後，又暗中指示南京市府不要辦理，事情拖延下來。轉到武漢後，周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又再次當面向蔣提出辦報之事，蔣同意後，周利用「職權」親自督導，很快完成了報紙的註冊手續。1938年1月，《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出版。武漢失陷後，《新華日報》一班人馬也遷到重慶，迅速恢復了報紙的出版發行。周以這張報紙為主要基地，又通過對大後方文化界的廣泛滲透介入，抓住幾乎每一個機會宣揚中共的政策主張，樹立並加強中共在民眾中的正面形象，也以此制約蔣和國民政府對中共的壓制。

周恩來還把手伸入外交領域。1939年4月，根據周的指示，南方局建立了對外宣傳小組，出任正、副組長的是後來成為周手下外交領域大將的王炳南和陳家康。[28] 1940年12月，南方局正式成立外事組，仍由王炳南、陳家康任正、副組長，先後加入小組的有喬冠華、龔澎、章文晉等，一個個後來也都成為周麾下的外交幹將。[29] 周直接掌控外事組的活動，使之成為中共觀察並了解、影響外部世界的一個重要窗口和渠道。從中共的角度看，周恩來在掌控公眾輿論以及同「中間派」和外國人打交道中，做得最漂亮的是他牢牢地抓住了「民族」和「民主」這兩面旗幟，為中共在同國民黨的對抗中佔據了政治、道義、話語上的「制高點」，也為中共在國際舞台上樹立起一種完全不同於昔日「共匪」的新形象，實現了即便為中共平添幾十萬雄師也難以達到的效應。

在大張旗鼓地推進上述各種公開活動的同時，周恩來還暗地裏做着另一件大事。自1920年代後期起，他就一直是中共秘密情報系統和活動的頭號主持者。隨着他本人及中共中樞因安全情勢嚴重惡化等原因而撤離上海，中共在「白區」的地下組織及情報機構迭遭破壞，雖從未達到「全軍覆沒」，但確實已接近完全癱瘓的邊緣。周恩來先是駐節江西紅區，後經歷了長征的生死考驗，而後到達的又是偏遠的陝北地區，在重建白區情報網絡上，即便有心，也是力所不逮。

國共合作大局面的出現，為周恩來在情報活動上重整旗鼓、施展長才提供了新的條件。他到重慶後，馬上就開始以陪都為中心，展開在國統區重建並擴大地下情報網絡的佈局。對這樁大事，周早在武漢期間就已着手準備。1938年1月21日，他在一份為長江局起草給中央的電報中就提出，要立即行動起來，恢復中共在大後方、尤其是四川的地下組織及情報網絡，並「努力發展軍事工作」。[30] 此後，他又派麾下錢之光、周怡、張玉琴(周、張二人係夫婦)等人到重慶籌建八路軍辦事處。[31] 1939年1月南方局正式成立後，周恩來親自掌控情報機要工作，原在武漢的機要人員也在3月間遷至重慶，並在南方局的架構內建立了機要科，由周的親信、南方局辦公室秘書長童小鵬出任科長。此外，南方局還設立了電台科，由錢松甫任科長；文書科，由劉昂任科長。當南方局入駐紅岩村的三層辦公樓後，包括機要、電台、文書三個科的整個情報部門佔據了整個三樓，由此凸顯

出這個部門在周恩來眼中的極端重要性。在情報系統的戰略層面和具體運作佈局上，周恩來承襲了特科時代的做法，但又有革新，把重點放在三個方面。第一，恢復或重建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組織及情報網絡，並為此把一批最優秀、最有能力的幹部調入情報系統；第二，在國民黨軍政系統及組織、尤其是情治機構內部，安插中共的人員；第三，花大力氣建立起可靠的電訊通信系統，尤其是要確保同延安電訊聯繫的暢通。為了保證己方的通訊密碼不為敵方所破解，周恩來對此極為重視，並常常親自干預。這樣，在到達重慶後的短短幾個月間，周恩來就已經鋪開了一張情報活動的網絡，並不斷改進、深化，這成為他在重慶期間整個工作佈局的一個核心部分。

三

1939年3月後，中國抗戰的外部形勢出現異動。一方面，在英、德達成慕尼黑協定後，斯大林為不使戰爭禍水被引向蘇聯，開始改變對德政策，共產國際因此要求各國共產黨做準備，防止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翻臉鎮壓共產黨。另一方面，日本加緊對國民政府的和平攻勢，令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擔憂中國可能會出現「遠東慕尼黑」的局面。[32] 6月初，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提出，要做國民黨乃至蔣介石叛變的準備。[33] 他還提出一份〈反投降綱領〉，認為國民黨的「反共」、「限共」其實是暴露蔣介石勾結乃至投降日本的企圖；在他看來，國民黨反共，「原因在於共產黨是投降的最大障礙，不反共則不能投降」。[34] 這些意見，周並不見得同意，但也沒有對毛提出正面挑戰。

此時，蔣介石對於中共的發展也越來越不放心、不耐煩。6月10日，他召見周恩來時說：「共黨應正式宣佈表示取消共黨之組織與活動，必須名實一致」，否則，「如不願取消，或不遵法令、不顧大局，一如過去行動，乃為妨礙抗戰，即增加敵軍勢力，此種責任應由共黨負之」。[35] 周恩來面臨來自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壓力也更大了。

1939年6月底，周恩來返回延安。7、8月間，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討論中共關於國共關係問題的大政方針。這時，距六屆六中全會開到一

半、周離開延安只不過半年時間，但他卻可以清楚地感到，延安的政治氣氛已有大變化，毛澤東這顆星辰正在冉冉升起。周心中難免起了波瀾，尤其是政治局會議要重點討論他自紅軍到達陝北後就捲入甚深的國共關係，而他與毛的看法卻仍有若即若離之處，他必須認真應對。

正當周恩來為參加政治局會議加緊準備時，7月10日，他遭遇了一次意外事故。這一天傍晚，周和毛澤東的新婚夫人江青同行，騎馬從住所到中央黨校作報告。過延河時，江青策馬在河灘上狂奔，驚動了附近一條狗引發混亂，驚嚇了周的坐騎，令周從馬背上摔下。他落地時伸手支撐，致使右臂折斷。[36] 延安醫療條件簡陋，但來自印度醫療隊的巴蘇醫生（Dr. Bejoy Kumar Basu）等還是馬上為周診治，用當地唯一一台便攜X光機做了拍片檢查，並敷上膏藥。第二天，印度醫療隊的阿特爾醫生（Dr. Atel）從外地趕回延安，為周恩來診斷後，用自己「早年在倫敦學得的方法」，強行將周折斷後外翻的右臂扳直，並打上石膏，他說這樣周很快就會痊癒。但兩天後，當印度醫生再次為周作X光拍片檢查時，卻發現他右肘以上的骨頭接歪了。[37]

7月30日，周恩來依然在傷痛之中，就開始連續參加政治局會議。自8月4日起，他就南方局工作及國共關係作長篇報告，強調中國的統一戰線具有民族、民主、社會的特點，三者是不平衡的；蔣介石「思想基本是反共的」，統一戰線不僅不平等，也並非公開法定，具有片面性的弱點。相應地，中共既要不失立場、堅持原則，又在方法上要機動靈活；既要爭取時機，又不能操之過切、咄咄逼人，要「使競爭互助讓步相互為用」。

對蔣介石，周恩來有自己的看法：蔣固然「不承認統一戰線，實際政策也在那裏限共反共，……存在着（蔣）妥協投降的危險」。但與此同時，蔣「目前的方針及形式上還講團結，還主抗戰，還不願造成全國破裂的局面，這是蔣之思想最矛盾處」。周因而主張，中共應「擁護蔣領導抗戰」，並「承認國民黨在全國軍隊、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同時，對蔣應取務實態度，「在困難時援助他，在蠻橫時拒絕他；誠懇地批評，具體地建議；影



圖11.1：周恩來右臂受傷後和劉少奇在延安合影，1939年。
（Historic Collection / Alamy Stock Photo）

響他左右的進步分子，反對那些落後分子；經過抗戰將領及有正義感的元老，造成進步的集團，來影響他」，總之「對蔣不要過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變」。周主張，在行動上，中共應當對蔣和國民黨「稍作讓步」；新四軍可以實行「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的發展方針。[38]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透出比周恩來高出一頭的氣派。他一方面稱讚周領導下的南方局工作「做得好，各省有成績」，發展了統一戰線和八萬人的黨組織，幫助了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等等。但另一方面，他又批評周的工作有弱點，國統區的「黨不鞏固」，「群眾運動不深入」，統戰只注意上層，「統一戰線中沒有中層階級更大的發展」云云。[39]

8月25日，周恩來做最後報告時說，他和毛澤東及與會者對「時局的估計是一致的」，又說：當前時局有突變的危險，在突變還未來到時，有局部妥協的漸變的現實問題。他回應毛對南方局的批評時做了自我檢討：自己「過去偏於聯蔣，對中層階級聯絡不夠」；「群眾工作做得不夠，即利用公開合法工作做得不夠要利用合法」；在鞏固黨的問題上，「主要是應鞏固已得的陣地，但有的地方也可發展」。[40] 會議結束時，周、毛兩人都有理由感到滿意。

延安的醫療條件簡陋，周恩來手臂受傷後，初期的治療又不得當，幾個星期下來，傷勢遲遲沒有痊癒，右臂也無法動作。經X光檢查，醫生發現周右臂的骨頭已錯位癒合，周邊肌肉萎縮，「有成殘廢之虞」。[41] 8月1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報告周的傷情，並說明「在中國的條件下是不可能治好的」，請求「速派一架飛機來延安把周恩來接到莫斯科去治療手臂」。[42] 8月11日，共產國際覆電，同意讓周去莫斯科治療，但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最好是不派飛機去延安」，而是派汽車到延安接周到蘭州，再從那裏轉赴蘇聯。[43] 但蔣介石得知周恩來將赴蘇聯療傷後，指派了一架道格拉斯飛機到延安。8月27日，周恩來在鄧穎超陪伴下乘坐這架飛機離開延安，並於當天抵達蘭州。一週後，他們一行又乘蘇聯派來的專機到新疆迪化，停留三四天後轉飛蘇聯。

9月12日，周恩來和鄧穎超抵達莫斯科。[44] 這是周第三次來到這座世界革命的紅都。但與前兩次情況相比較，不僅中國的情勢不同了，世界局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周去莫斯科途中，歐洲乃至世界局勢風雲突變。8月23日，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一週後，德國入侵波蘭，英、法對德宣戰。莫斯科及共產國際對世界局勢及世界「主要矛盾」的判斷亦有重大變化，認定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是比德國等法西斯國家更為危險的敵人，共產國際也以此為綱，向中共發出指示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隨之做出相應的判斷：「過去關於法西斯國家和民主國家的劃分，已經失去意義」，「現在世界上最反動的國家，已經轉到英國方面」。[45] 周恩來全盤接受這些看法，並在蘇聯發表〈帝國主義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一文，完全贊同蘇聯及共產國際對歐戰爆發後的形勢判斷。[46]

周恩來到莫斯科後，立即入住克林姆林宮醫院。9月15日，蘇聯醫生為他做了檢查。診斷意見為：

> 根據昨日（九月十五日，在受傷後七十五日）所拍X光照片和受傷後廿一日時所拍X光片情況對照，已有些少的差別。惟下臂至手的骨部位全都完好，傷仍在上臂骨下端，僅傷折骨，大動脈及神經亦完好。按照現時折骨的傷狀及治療的最好可能，宜於施用小手術，將突出於腕之骨去一小部分，使下手臂可以能恢復動作和寫字等，但全手臂不能恢復原狀而帶殘廢。這樣治療約需二月時間。如果施用大手術開刀，不但不能恢復原狀，且有傷及大動脈之虞，其結果恐不能達到施用小手術之預期效果，反而更壞。如果在受傷的當時治療則必施用大手術開刀且可恢復原狀。如在施用小手術治療後二年時，發覺不好現象時，萬不得已再施用大手術，總之現在盡可能避免施用大手術治療。依據診斷意見，在二三日後即可施用小手術。周恩來同志已於昨日（九月十五日）進皇宮醫院。[47]

周恩來隨後又要求季米特洛夫「電話通知該院長再多請幾位該院內外著名專門家共同縝密的檢查，並很好的考慮（究）竟以用大手術或小手術何者為好，盡可能的將手臂達到恢復原狀。並囑該院長要選有經驗及政治上更可靠的醫生負責施用手術。因為過去彭林同志已斷之腿骨在該院施用手術，因醫生不好，結果不良，現在還要重施手術，有這樣的事例，故對此不能不更加注意」。[48] 9月19日，蘇聯醫生依據小手術方案為周恩來做了手臂矯正，以期最大程度地恢復手臂功能。術後，「刀口癒合很好」。但周的傷勢畢竟拖延已久，先期治療又不得力，手臂終於未能接正，「彎曲程度比預期的要大，但是手臂的活動也不可能完全恢復」。[49] 他從此留下了終身殘疾。

除治療手臂外，周恩來在莫斯科還負有當面向共產國際彙報的使命，他未出醫院就開始為此作準備。12月下旬，他出院後，集中精力準備就中國情勢及中共自六屆六中全會以來的戰略政策向國際報告。這對他本人和中共來說，都是一件大事。

同1927年和1930年前兩次到莫斯科的情況不同，這一次周恩來沒有見到斯大林，而是「與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談得較多」。[50] 1940年1月

23日，他寫信向斯大林報告，中國抗戰正處於艱難時期，國共統一戰線內部存在着嚴重的摩擦，投降與分裂是中國面臨的主要危險。[51] 但斯大林仍未見他，據說是因為斯大林覺得，他既然不見國民政府的代表，也不便同周見面。[52] 但這裏恐怕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幾年，蘇聯的大肅反搞得走火入魔，在共產國際秘書處工作的郭紹棠胡亂「招供」，包括周在內的一批中共領導人也被他招出來，一度成為「懷疑對象」，斯大林大概因此不想見周。[53] 不過，當時周恩來並不知道發生在克林姆林宮高牆背後的這一切。幾個星期裏，他寫成了洋洋五萬餘言的〈中國問題備忘錄〉，重點講國共關係、統一戰線及其與中國抗戰前途的關係。周在報告中竭力為中共自六屆六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辯護，特別強調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及作用。[54] 12月29日，周將報告提交共產國際。他知道，斯大林一定會讀到這個報告的。

周恩來在備忘錄中沒有指名批評王明。但此時，王明過去在共產國際的主要靠山米夫在大肅反中受到整肅，王明本人在莫斯科的地位也發生動搖，周不會看不到這些。當季米特洛夫向周問起王明回國後的情況時，周說他的表現不好：「有一個時期，王明跑到武漢，企圖組織自己的班子。」[55] 這段話不僅是對王明的批判，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周的一種自我批評。周後來曾回憶，當時季米特洛夫「非常重視毛澤東，明確講中國黨的總書記應該確定是毛澤東，組織不要交給王明管」。[56] 毛在莫斯科的地位進一步加強了。

周恩來到莫斯科還有一項任務，就是要確保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經費援助。多年來，這一直是中共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抗戰開始後，中共的局面越做越大，經費上的缺口也越來越大。周面見季米特洛夫時，就對中共面臨的財政困難大吐苦水，要求共產國際幫助解決。季米特洛夫一面要中共盡力自行解決困難，一面仍向斯大林彙報說，「1940年度向中國共產黨提供35萬美元的援助是適宜的」。斯大林拍板，「我們將提供30萬美元的援助」。[57] 這對中共來說，不啻是久旱後的一場甘霖。

1月間，共產國際執委會開會，聽取了周恩來的報告。之後，是一段漫長的等待，斯大林需要拿定主意。3月初，共產國際終於就周的報告及中國問題作出決議，肯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58] 季米特洛

夫把決議交給周恩來時特別説明，這個決議是在斯大林主持下做出的。[59] 周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

周恩來知道，已經到了回國的時候。1940年1月底，他和鄧穎超向共產國際提出了回國的申請。[60] 在莫斯科的這幾個月裏，周恩來是極為忙碌的（即便在住院的日子也是如此），但常常更令他焦慮的，是與一種揮之不去的政治上的不確定感。然而，由於一位年青姑娘的經常來訪，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日常生活中增添了一些充溢着親情的歡樂時光。這位姑娘，就是沒有自己子女的周、鄧夫婦的義女孫維世。她出生於1921年，是周恩來當年在德國介紹入黨的老戰友孫炳文的女兒（周同時介紹入黨的另一人是朱德）。後來，周和孫炳文又在廣州有過親密共事的經歷，在那裏，周、鄧夫婦也曾多次見過年幼的孫維世。1927年，孫炳文在蔣介石「清黨」時被捕遇難，周、鄧夫婦也失去了和孫炳文家人的聯繫。1938年的一天，已長成少女的孫維世和哥哥孫泱一道，突然來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要求去延安「參加革命」。她在那裏碰到了「周恩來叔叔」。當周得知她是孫炳文的女兒時，不僅當即批准她去延安，隨後又獲得維世母親任鋭的同意，和鄧穎超認她為義女。孫維世到延安後，進入抗大、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並於1938年5月15日加入了中共。1939年9月，她「經毛澤東同志同意，隨周恩來同志及鄧穎超同志於9月12日到達莫斯科」，準備在蘇聯「學習一種專門技術」。[61] 她經常在週末或節假日去周、鄧處，周恩來很喜



圖11.2：周恩來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的通行證，1940年2月5日。
（ф. 495, оп. 225, д. 139, РГАСП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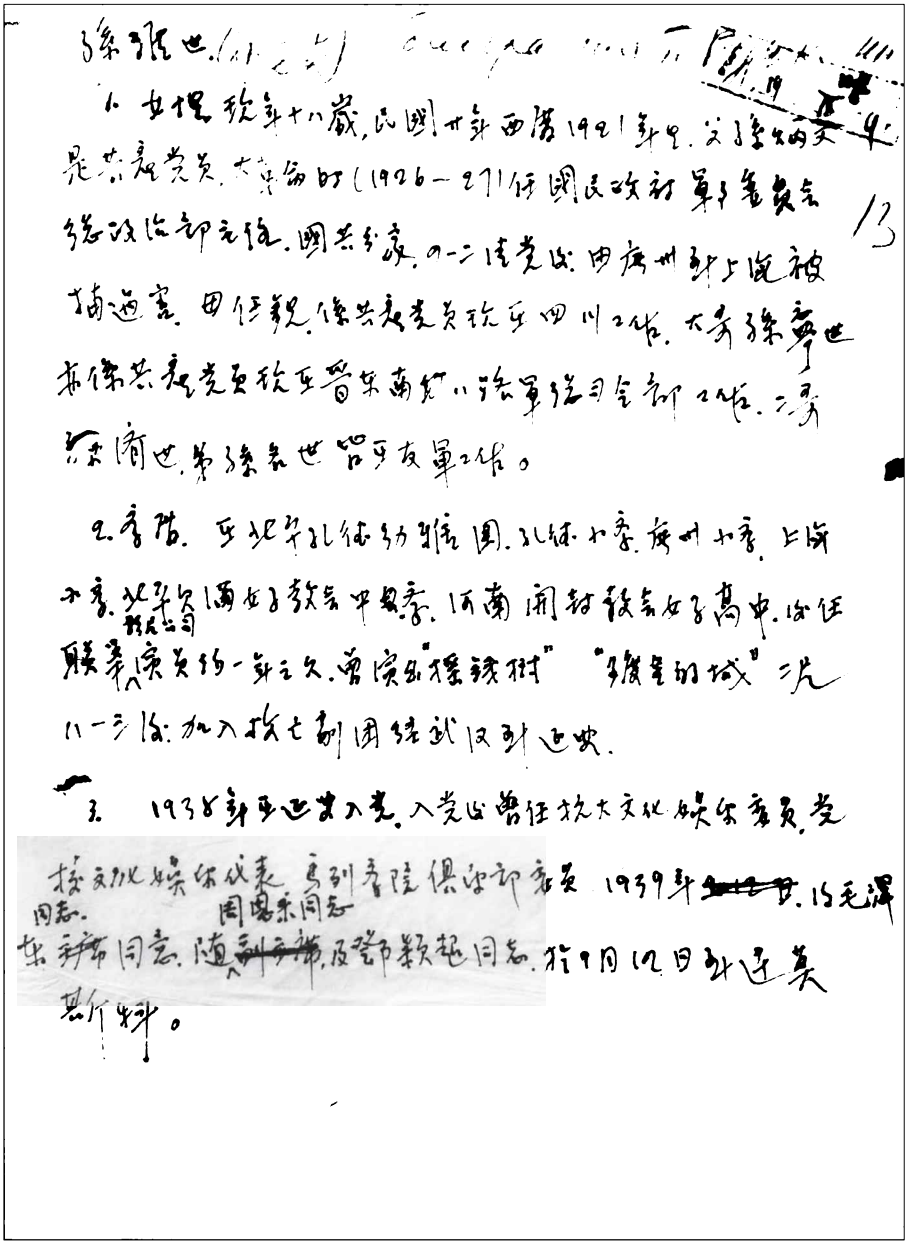


圖 11.3：孫維世手書自傳，1941 年 4 月 2 日。
（ф. 495, оп. 225, д. 1235, РГАСПИ）

歡這個活潑的漂亮女兒，鄧穎超對她更是視如己出、疼愛有加。周、鄧回國後，孫維世留在蘇聯，在莫斯科戲劇學院學習戲劇表演及理論。期間，她和鄧穎超通信不斷。1946年9月，孫維世回中國後，先在東北、後到北京，投身於話劇表演及導演事業。毛澤東、周恩來於1949、1950年訪蘇期間，她擔任中國代表團的翻譯及文秘工作。後來，她出任中央實驗話劇院副院長，創作並導演了多部話劇。[62] 在戰爭年代裏，周、鄧夫婦曾收留照顧過多位中共烈士子女，但只有孫維世一人成了他們的乾女兒。[63] 孫以「爸爸」、「媽媽」稱呼周、鄧，鄧穎超給孫維世的信中稱她為「親愛的女兒」，周恩來在給鄧穎超的信中，也以「你我的女兒」來稱呼孫維世。[64]



圖11.4：周恩來、鄧穎超與繼女孫維世在莫斯科。前排左起：孫維世、鄧穎超、任弼時、蔡暢；後排左起：周恩來、陳琮英（任弼時妻子）、張梅（林彪當時的妻子）。1939年末或1940年初。（Historic Collection / Alamy Stock Photo）

1940年2月25日，周恩來、鄧穎超和任弼時以及日共領袖岡野進（即野坂參三）等一道，離開莫斯科回國。他動身後，季米特洛夫給毛拍去電報，通知毛：「周恩來會親自向你們通報我們就中國問題所討論和協商的所有情況。這些都需要認真加以研究和完全獨立地作出最後決定。如果在某些問題上不同意我們的意見，請速告我們並說明理由。周恩來抵達後請立即電告。」[65] 周一行先乘火車到阿拉木圖，停留數日後，又乘蘇聯方面安排的專機，經迪化轉飛蘭州。然後，由蘭州坐車，在西安停留三四天後，返回延安。

周恩來的同行人員中，有一位是師哲，他已在蘇聯生活了15年，後來又曾長期擔任中共主要領導人的俄文翻譯。他回憶說，離開莫斯科時，共產國際機要部門交給周兩套電訊密碼、一個新的電台呼號及一批包括電台在內的通訊器材，以及大量外幣現鈔。一路上，周一直帶着一隻手提包，須臾不離身邊，沿途一遇軍警憲兵檢查，他就以自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分，擺出一副中將派頭，令他們不敢妄動。[66] 3月25日，周恩來一行回到了延安。

四

在周恩來到蘇聯的這半年多時間裏，國際形勢大動盪的背景下，國共關係愈加惡化。除了政治上更為尖銳的對立外，軍事上也衝突不斷。開始時，雙方的摩擦集中於西北和華北，涉及的關鍵同抗戰前雙方談判中所涉及的問題如出一轍，仍集中在為中共勢力劃界及部隊定編上。

但當周恩來回國時，情況已有變化。蔣介石和國民黨方面在西北和華北勢力相對薄弱，難以有效遏止中共軍事力量的存在和發展。他們的注意焦點，也轉移到限制新四軍在華中及華東地區的發展上來。起初，蔣和國民黨軍方要新四軍在長江下游和淮河流域地區的部隊南調，過長江後移往皖南。但幾個月後，他的想法變了，又要江南地區新四軍北渡長江，並同當地新四軍及相鄰的八路軍一道，全部移往黃河以北。[67]

蔣介石的做法，引起了毛澤東及中共領導層的高度警覺，尤其是對新四軍問題的重視。毛分析，蔣的目的在於「將新四軍調入黃河以北，劃黃

河以北給我，把我送入敵人手上，堵塞歸路困死餓死。我決不能上他的當」。[68] 他相應地提出，新四軍的發展不能限於一地，而是要「在蘇南、蘇北廣大敵人後方直至海邊之數十個縣，尤其是長江以北地區」發展。[69] 5月4日，毛又以中央名義指示東南局及新四軍：在一切日本佔領區和戰爭區域，應不受國民黨限制，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我們應該強調鬥爭，不應強調統一，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70]

周恩來恐怕會覺得，毛澤東的說法過於強調鬥爭，對統一戰線不利。但他未與毛爭執，而是仍按照自己與蔣打交道時要「有理、有利、有節」的想法行事。5月31日，他回到重慶。幾天後，他面見蔣介石時表示，中共擁護蔣，也希望和國民黨合作到底。中共的發展，主要在敵佔區與敵汪爭奪，而不是超過國民黨或要獨霸。蔣回應道，只要中共軍事上服從命令，國共間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周表示：中共願意服從蔣，但國民黨則不能拿命令來脅迫，他與蔣談得並不投機。周會後向中央報告會談情況時說：蔣「投降的危險日益嚴重」，但他對國共「破裂尚未下最後決心」。[71]

為了緩解國共之間的緊張局勢，周恩來同毛澤東等反覆商議後，於6月中旬向國民黨提出一項全面解決兩黨關係的具體方案。除了重申「保障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存在」、「釋放一切在獄之共產黨員」、「實行民主」等主張外，周還提議請國民政府「明令劃定」陝甘寧邊區及其組織，准許八路軍擴編為三軍九師，新四軍擴編為七個支隊，並在八路軍、新四軍和友軍之間明確劃定作戰分界線。[72] 顯然，周希望通過做出這些讓步緩和國共之間的緊張氣氛。

然而，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仍堅持要求中共部隊必須進一步縮編及限制陝甘寧邊區等的範圍，周恩來雖試圖據理力爭，但談判卻難以再前進一步。7月16日，蔣在國民黨內各種反共勢力的壓力之下，以中央政府名義提出〈中央提示案〉，規定中共部隊需在一個月內全部開到舊黃河以北，並將第十八集團軍縮編為六個師和六個補充團，新四軍縮編為兩個師並加入第十八集團軍序列。[73] 這幾近於一道對中共發出的最後通牒。

7月21日，中央提示案送到周恩來手裏。他馬上意識到此事對國共關係提出了抗戰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一週後，他帶着提示案從重慶飛回延安。[74] 7月30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討論由中央提示案帶來的

國共關係的潛在危機。幾天裏，周恩來連續發言，做了關於國共統一戰線的長篇報告。周認為，國共關係確實面臨挑戰，但遠未破局，「蔣介石向日本投降是不可能的」。中共在國統區的方針仍應是扶持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進行民主運動，要求蔣及國民黨實行政治改革。他在講到新四軍時提到，新四軍發展很快，但主要缺點是「沒有建立敵後根據地觀念，不注意做群眾工作」。[75] 8月9日和10日兩天，周又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做報告。他繼續強調，中共在執行「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與分化頑固勢力」的方針時，要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在應對蔣及國民黨時，仍應堅持「打擊其反共行動而爭取其抗戰」。[76]

8月12日，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的發言向黨內發出關於國共談判的通報，說明談判「仍是拖的局面」，要「努力爭取中間勢力」及「孤立和分化頑固勢力」，並將之視為「推動時局的中心一環」。[77] 三天後，中央又發出主要根據周的看法形成的關於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其中強調不能把加強統一戰線當作「官樣文章」和「耳邊風」，而應當認真地去研究，做到「只反對當前直接向我們進攻的極少數人，而聯合及中立極大多數人」，做到「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78]

毛澤東這時在中共領導層已漸漸具有「大老闆」氣象，在會上也以一種高屋建瓴的姿態說話。他表揚周恩來說，在周領導之下，「統一戰線有了很大發展，注意了中間勢力」。中央今後的注意力，第一是國民黨統治區域，第二是敵後城市，第三是自己的戰區。這等於是把周主持下的工作，放到了中共全面戰略部署中的第一位。[79] 毛還說了一句對周來說極要緊的話：「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統歸周恩來管理，以統一黨的領導。」[80] 毛的話是周在會上的一大收穫，不僅肯定了周在南方局的工作，也在為他劃定某種「勢力範圍」的同時，再次確定他在處理國共關係時不可或缺的主導地位。周關於中共固然要同蔣和國民政府周旋鬥爭，但又不能使國共關係破局的看法，也在會上成為共識。

8月25日，周恩來從延安飛回重慶。三天後，他和蔣介石、白崇禧會面。他表示，中共願意在雙方力量劃界以及中共部隊定額縮編上再作出讓步。但是，蔣的態度卻異常強硬，一口咬定，如果中共部隊不全部移往舊

黃河以北，「則一切問題都不能解決」；他還說，中共游擊隊即便要留在當地，也需要「交戰區司令官指揮」。[81]

正當周恩來與蔣及國民政府來回交涉之際，新四軍於10月上旬在蘇北黃橋地區同國軍韓德勤的部隊打了一仗，大敗對方。這一仗，不是周主張打的。從局部來看，這個勝仗大大改善了新四軍在蘇北的戰略態勢，但若從國共關係全局來看，這又是嚴重挑戰，而且要由周來收拾這個攤子。果然，黃橋戰後，國民黨內本來就主張必須在軍事上壓制中共的強硬派找到了口實。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兼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致電八路軍正副總司令朱德、彭德懷以及新四軍軍長葉挺，指責兩軍「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不尊編制數量自由擴充，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不打敵人專事吞併友軍」，並限令兩軍「限於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往中央提示案規定區域內。[82]因10月17日的韻目代碼為「皓」日，故此電亦稱「皓電」。

「皓電」一到延安，在中共領導人中引起了一片震撼，對周恩來的衝擊尤為巨大。他們感到，這一次蔣介石和國民黨是要動真格，掀起新的一波「反共高潮」了。當時，國際局勢詭秘多變，毛和中共領導層又認為「中國的大勢是由國際形勢規定的」，反覆分析之下，毛傾向於相信，蔣「此次反共高潮主要是準備投降日本與德意的步驟」，是「直接投降的準備」。中央決定，對皓電「答之以強硬的『炸彈宣言』」。[83]周憂心忡忡之下致電毛，也對形勢做了較為嚴重的估計：皓電表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蔣及國民黨從「局部剿共」轉為「全面反共」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但同時，周並不認為國共關係已瀕臨破局，皓電固然「原則不能同意，但須答覆」。他還相應地主張，可以對皓電「作表面上服從」的表態，並在軍事上將新四軍主力北移，或者「集結應戰」，或者「立即分散」。皖南部隊一部分秘密轉蘇南渡江，一部分準備就地打游擊。[84]

在中共領導層內，周恩來的態度仍然影響甚大。10月25日，毛覆電周稱，中共應準備蔣介石發動全面反共，並對付最黑暗的局面。但在具體對策上，毛同意中共應「穩健地對付國民黨的進攻，軍事上採取防衛立場，他不攻，我不亂動，政治上強調團結抗日」。[85]這表明，毛及中央已接受周的意見，尤其是同意皖南新四軍軍部渡江北移。

11月1日，周恩來又致電中央，進一步分析形勢道：「蔣現在處於三個陣線爭奪之中。他認為以一身暫時兼做戴高樂、貝當、基馬爾最能左右逢源。」他又想拉英美，又想拉德國，又想和日本談和，又想擺出親蘇的面孔，還要反共，「並以反共為軸心來運用」。但周再次強調，國民黨發動反共戰爭的危險固然嚴重，「破裂的危機已至」，但說到底，「中日妥協不會成功」。中共因而必須據此「迅速考慮各種辦法，權衡輕重比較」，「速行決策指示」。[86]

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中共領導人決定對蔣再做讓步。11月9日，毛澤東親自起草電文，以朱德總司令、葉挺軍長等名義發給何應欽、白崇禧，一面拒絕將八路軍、新四軍移往黃河以北，一面表示為了顧全大局，江南新四軍部隊將移往長江以北，是為「佳電」（因發電日為「佳」日）。[87] 蔣和國民黨方面隨即將12月底定為江南新四軍移往江北的最後期限。[88]

1940年底，國民黨規定的北移期限已迫近，周恩來憂心如焚。12月25日，他面見蔣介石，談新四軍北移之事。蔣的態度看上去十分誠懇，一見面就對周說，他「連日來瑣事甚多，情緒不好，本不想見，但因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難的日子，故以得見面談話為好」；又說：「我難道願意內戰嗎？願意弄坍台嗎？現在八路、新四還不都是我的部下，我為什麼要自相殘殺？」蔣要求中共部隊一定要「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蔣又威脅道，新四軍「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衝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89] 蔣在當天日記中記道，他對中共「一面則準備軍事，一面則仍主政治方法解決，不使全面破裂」。[90] 但周心裏卻極不踏實，在給毛的電報中說，蔣的話靠不住，是對中共「在嚇、壓之餘，又加哄之一着」。[91]

關鍵在於，此時蔣和國民政府定下的新四軍北移的期限已臨，而葉挺軍長和項英政委等新四軍領導人在從何處渡江的問題上卻仍然舉棋不定。12月30日，周恩來根據所獲情報致電中央報告：「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四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佈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毛澤東和中央接獲周的報告後，立即轉告項、葉。[92] 1月2日，毛澤東又親電葉挺、項英，要他

們迅速「渡過江北，以便與胡服（劉少奇）一道，統一指揮各軍打破即將到來的反共進攻」。[93]

葉、項接到中央來電後，又耽擱了幾天，猶豫之間，最後做出了一個自以為聰明、卻大成問題的決定：既不走北路，也不直接走東路，而是先繞道南行，乘國民黨部隊部署未定之時，秘密通過國軍控制地區，再經由浙東北轉後渡江。1月4日，葉、項等率新四軍軍部九千餘人秘密出動，南下茂林，將這一計劃付諸實施。但此時，他們已經錯過了南行的最佳時機。12月底到1月初這段時間裏，國民黨方面在並不知道新四軍軍部將會南下的情況下，為壓迫並確保新四軍北渡，已在南面集結大軍。1月6日，葉、項所部南行轉移中，不期之間，在麻嶺一帶與顧祝同所部國民黨大部隊遭遇。顧判斷新四軍意圖不是北上過江而是「南竄」，當即下令以「新四軍不遵指定路線北渡」為由，集中五師兵力對之實行包圍攻擊，[94]史稱「皖南事變」。

葉、項所部同敵軍接觸前，曾於1月5日向中央報告了自己的具體位置，但第二天與大批敵軍遭遇後，即陷入重圍並關閉電台，幾天裏都失去了與中央的直接電訊聯絡。至9日，陷入敵軍重圍的新四軍軍部建制已被打亂。在這關鍵的幾天裏，不知何故，周恩來所掌控的情報系統卻完全「失聰」，沒有獲得新四軍軍部正遭遇敵軍圍殲的報告。此後，一直到11日，新四軍軍部才通過中原局接通和中央的電訊聯繫。[95]毛澤東及中共中央這才知道，葉、項所部已經命在旦夕。

1月12日，毛和中央急電周恩來，告知新四軍軍部已有「全軍覆滅危險」，要他「向國民黨提出嚴重交涉」，要求國民黨部隊「即日撤圍，放我東進北上」。[96]周接電後，始獲知新四軍軍部遭到襲擊包圍的消息，頓時大驚失色，「拿着電文的手在微微顫抖」。[97]他不僅擔心，他本人固然難免會被認為應對新四軍所遭受的慘重損失負責；他更憂慮的是，國共兩黨本已千瘡百孔的「統一戰線」也會因此而被葬送。13日晨，周先設法和參與皖南事變的國民黨三戰區參謀長通話，對方解釋道，事件起因是「新四軍北移不遵照指定路線，自行向相反的方向（東南），因與友軍誤會」。周隨即就此致電毛澤東報告。[98]13日白天，周又和葉劍英一道找到國民黨方面的劉為章，就皖南事變提出質問，要求「迅速解除對新四（軍）圍攻」。[99]

但此時，經幾天激戰後，新四軍軍部已幾遭全殲，軍長葉挺被俘，政委項英離開部隊，後被警衛員殺害。但當時周恩來並不知道這種情況。同國民黨方面一番交涉後，他一度還對事變處理感到樂觀，因而要中央立即詢問葉、項，究竟「採取哪條道路折進蘇南，以便作更具體的交涉」。[100] 第二天，中共領導層獲得確切報告：「上官雲相十三日未時解決我七千餘人，另有千餘人已命堅決解決。」毛立即致電周：「現在不是走何路線問題，而是救死問題，如不停止攻擊，即將全軍覆滅，請立即要蔣下令停戰撤圍。」[101] 周馬上與代表蔣出面的張沖交涉，張同蔣通話，蔣稱已下令顧停止攻擊，「周可電告葉、項放心東進」。但周同時又確知，國民黨部隊並未停止作戰。1月15日，他將交涉情況報告中央，並說：「蔣之所說都是鬼話。」[102] 此時，其實周不管做什麼都已經太晚了。

五

皖南事變的發生及新四軍軍部覆滅的嚴酷現實，使國共兩黨關係陷入抗戰以來的空前危機。中共領導層為之震撼，毛澤東的反應尤為強烈。自抗戰開始後，毛就一直在黨內大聲疾呼：防人之心不可無。但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許多中共領導人在這一點上和他的想法總有距離。幾年來，國共之間摩擦乃至衝突一再升級，等於再三證實了毛的看法正確。但這一次情況同以往都不同，對國共關係衝擊太大了。1月15日，周還曾給毛及中央發電，提及「當前各小黨派想成立一民主聯盟，以求自保和發展。我們力促其成，條件為真正中間，不要傾向國民黨」。周提出，他會抓住這個機會加強統戰工作，「以繼續揭穿蔣介石」。[103] 毛收到電報後，連一點面子都不給周，當即駁回道：「中間派孫、馮等調和退讓論是有害的，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佳電』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104] 當天，政治局開會討論事變對策時，毛拿項英當靶子，痛斥他「在政治上早已成為俘虜」，對國民黨「只知片面的聯合而不要鬥爭，不要獨立自主的政策」，是「抗戰以來一部分領導同志的機會主義」的代表。[105] 言語之間，也隱含着對周的批評。

對周恩來來說，葉、項所部全軍覆沒的衝擊尤為巨大。本來，他就是中共發出「佳電」的主要推手，又一直負責同蔣及國民黨交涉。現在出了此等大事，幾乎就是狠狠打在他臉上的一記耳光。即便如此，周仍然試圖勸阻毛及中央的過激反應和行動。1月16日，他致電毛表示，在政治上與蔣嚴厲交涉的同時，軍事上不宜過度採取攻勢，「打韓、沈，在政治上為報復，在軍事上為攻堅，易於持久，消耗彈藥，為敵增援，且可引起胡宗南在西北報復的藉口」，造成戰爭擴大的不利局面。[106] 這時，倒是劉少奇講出了周不便講透的話，向中央進言道，此時不能與蔣和國民黨決裂。「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107] 在劉、周等的力諫之下，毛的態度一時間似有所鬆動。

不料，1月17日，形勢再度突變。蔣介石在強大的內部壓力之下，又受到國軍在皖南大獲全勝消息的鼓舞，悍然宣佈新四軍為叛軍，取消其番號並將軍長葉挺交付軍事審判。[108] 消息傳來，延安炸開了鍋，毛澤東的態度更趨於激烈。他在政治局開會時說，蔣介石的行動「表明國民黨與共產黨大破裂的決心」，背後「定有帝國主義指使」。[109] 毛又以隱含對周恩來批評的口吻說：「我們在12月17日以前的估計不適用了。……我們決不能再取游移態度，我們決不能再容忍，我們決不能怕破裂，否則我們就要犯嚴重錯誤。」[110] 1月18日，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指明「重慶談判中證明蔣純以鬼話欺騙你們」，當下國民黨已下決心準備破裂，「重慶環境日險」，周留在重慶「作用日小，因此應立即設法藉故離渝返延」。黨在重慶的幹部亦應「設法分批回延，僅留三數人敷衍門面」即可。兩天後，中央書記處又催促周「於最短期間離渝」。[111]

對於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番號之舉，周恩來極度震驚之下，立即做出了強烈反應。1月18日，他不顧國民政府的禁令，通過《新華日報》刊出了自己的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報首還赫然以狂草印出九個大字：「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112] 周如此大聲疾呼為新四軍鳴冤叫屈的做法，不僅是對蔣及國民政府的強烈抗議，並爭取大後方公眾與國際輿論的同情，也是他在黨的領導層的亡羊補牢之舉。

1月20日，中央書記處未與周恩來商議，就由毛澤東親自起草，搞出了關於事變善後處理的十二項條件，其中特別提出，蔣必須「取消1月17

日反動命令，並宣佈自己是完全錯了」，也必須「懲辦皖南事件的禍首」，以及「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113] 毛明確指示周：「除非蔣介石取消十七號命令及實行其他必要步驟，我們是只有和他對立一途，因為我沒有別的路走。」[114] 周恩來立即遵令行事，以強硬口吻向蔣及國民政府提交十二項條件。

到這個時候，周恩來已經失去了對國共談判的主導權。在中共領導層內部，毛澤東不斷提出要「從根本上考慮」國共關係，並斷言中共與蔣合作「已對我們，對革命沒有任何利益」。[115] 1月25日和1月27日，毛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一再強調：「我們表明態度之後聽憑蔣介石去處置，或者他執行我們的十二條，兩黨重歸妥協，或者實行全面破裂」；「我們已無任何可能再和蔣介石發生關係」。[116] 與此同時，毛還未雨綢繆，決定「為對付蔣之進攻，必須增兵西北」，並立即着手實行相應的軍事部署。[117]

但就在這個當口，日本人居然出來「幫忙」了。毛澤東當時的一個基本判斷是，蔣介石之所以同中共「全面破裂」，是因為「中日實際上已經休戰，不議而和」，日軍甚至可能與國民黨配合反共，因此國共「合作已無存在之可能」。[118] 周恩來出於對蔣介石的了解，從心底裏應該不會同意這些說法。但在當時的氣氛下，他很難理氣壯地說出自己的意見。沒想到的是，毛澤東關於日蔣妥協的聲聲警告言猶在耳，1月下旬，日軍突然調動七個師團，在河南向國民黨部隊發起大規模進攻，前線吃緊。這一來，國民黨內對中共的「主戰派」亂了方寸。蔣介石也派張沖找到周恩來，希望以允許中共駐華中部隊「展期北移」，「新四軍歸入八路軍增編一軍」等為條件，恢復兩黨之間的談判並達成妥協。周恩來答道，不實行中共之十二條，不可能恢復談判。[119]

不過，事態的這種發展本身已說明，周恩來一直堅持日蔣並未勾結是有道理的，而毛澤東關於蔣、日將達成妥協的看法是站不住腳的。後來，毛在政治局開會時承認：「日本人不願意我們去華北。東條公開說：『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共產軍去華北，破壞日本利益。』這一點我們過去卻沒有估計到。」他關於形勢的基本評估也發生變化，同意「日蔣矛盾仍是目前基本矛盾」，蔣及國民黨的「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利用日蔣矛盾仍是我們政策中心」。這之後，周恩來在皖南事變後所承受

的巨大壓力獲得緩解。[120] 然而，毛澤東仍然堅持，中共在十二項條件上「絕不鬆口」，只有在「適當條件」下才會「不拒絕妥協」。[121]

就在國共關係顯露出緩和苗頭之際，美國人也插手幫了一把。周恩來到重慶後的這幾年裏，忙於各種事務的同時，眼睛的餘光其實一直瞄着英、美等西方國家，除了抓住機會同英、美人士交往外，他還同英國駐華大使卡爾（Sir Archibald Clark Kerr）等建立了很好的工作關係。1939年9月歐戰爆發後，即便在中共做出英美等西方國家比法西斯國家更加危險的判斷後，他仍然同英美等國外交官保持着聯繫。到1941年，尤其是德國佔領法國及歐洲低地國家後，日本開始肆意推行「南進」政策，美日關係日益陷入緊張。羅斯福總統其實知道，美日開戰只是時間問題，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國抗戰力量因國共關係破裂而遭到致命打擊。1941年2月，他派勞克林·居里（Lauchlin Currie）為特使訪問中國，實地了解中國抗戰的情況並調和國共關係。[122] 周恩來馬上意識到，這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重要和難得的機會。相形之下，蔣介石卻對這位美國特使的到來十分不安。2月1日，他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記道：「美國受共黨宣傳蠱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華政策，幾乎動搖。」[123]

2月10日，居里同蔣介石會晤，蔣拼命指稱，中共不是抗戰的積極力量。但他越這麼說，卻越讓居里感到他「對共產黨人充滿仇恨，不信任到了極點」，反而越希望同中共直接接觸。他告訴蔣，美國已準備向中國提供價值4,500萬美元的武器和裝備，並同意向中國提供財政援助，以穩定法幣。但美國對國共之間的衝突極為關切，因為這只會讓日本從中漁利。他向蔣提出同周恩來見面的要求，讓蔣十分不爽，覺得美國人根本不了解中國國情，是在多管閒事。然而，他卻不便拒絕居里同周見面的要求。[124]

2月14日，經英國大使卡爾安排，周恩來在卡爾的住所同居里會面。他很知道怎麼同這位其實並不懂中國、對中共既無多少了解也沒有什麼定見的美國人打交道。他情詞懇切地表示，中共絕不是美國的敵人，也絕不希望美國將中共當作敵人看待。中共願意團結抗日，並一直把蔣當作國家的領袖看待，但蔣卻並不視中共為友黨，導致了國共之間的危機情勢。居里表態道，美國支持中國統一抗日，並也認為中國政府應當實行改革。居

里對周的印象是，「他一點不偏激」，是一個「很有意思，也有同情心」的人。[125] 居里與周會面後，又再次勸說蔣要和中共合作。蔣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的印象：「共黨對美國朝野之宣傳已深，居里受其影響之深刻，已成不可救藥之象。」[126]

但對周恩來來說，這正是他最希望看到的結果。這番同居里交往的經歷，使得他更看重中共同美國的關係。後來幾年裏，這將成為他在重慶工作的又一重點，也開啟了他以後同美國官方人士打交道的先河。

六

到2月中旬，在各方因素的影響及制約下，國共關係終於出現了緩和的趨勢。說到底，在抗戰仍在繼續的情況下，國共兩邊哪一方都經不起再來一次皖南事變那樣的衝擊了。恰在此時，預定於3月初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就成了國共合作能否恢復的試金石。抗戰以來，國民參政會一直是國共合作的象徵和重要場所。皖南事變後，二屆國民參政會開會之事於2月間擺上桌面。周恩來馬上意識到，可以抓住這件事做文章，迫使蔣及國民黨作出實質性讓步。2月10日，周同國共兩黨外的各小黨派人士協商後致電毛澤東，建議以中共七位參政員名義提出在參政會議上討論中共十二條善後辦法，並以此作為中共參加參政會的條件，否則就不出席。[127] 幾日後，中央回電同意周的建議。但實際上毛已料定，蔣絕對不肯接受十二項條件，這只是他「用我之政治攻勢（十二條）壓倒蔣之攻勢」，從而爭取政治上主動的策略。[128]

果然不出毛澤東之所料，蔣堅決拒絕接受十二條。隨着會議臨近，蔣面臨的壓力陡然增大。2月25日起，張沖連續三天跑到周處，請周和中共不要堅持十二條，而要「以大局為重」，一定要出席國民參政會。張沖甚至對周說，「為了國家計，他跪下都可以」。[129] 然而，由於毛和中央已明確指示周，「張沖所提條件不能接受」，不管張沖如何「苦苦哀求」，周仍然不為所動。[130] 此後幾天裏，蔣威脅說，中共「決定不出席，唯有根本決裂」。各小黨派擔心出現此種情況，也連續同周會晤，懇求中共出席參政會議。周依然寸步不讓。

2月28日，國民參政會預定開幕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決定提出臨時辦法十二條，不提蔣收回命令、懲辦何應欽等人、取消一黨專政這幾條，並將會議延期兩週再召開。[131] 但實際上，這只是毛把責任推向蔣的又一政治策略，並不指望蔣會接受。果然，當周拿出新條件後，張沖無法做主，也無法給具體答覆。[132]

3月1日，因中共缺席，在各小黨派提議下，參政會召開延遲一日，以爭取中共參加。當天，周恩來急電中央，開宗明義便說：「此次參政會我們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響，……蔣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樣。」會議開幕延期一天，「全重慶全中國全世界在關心，打聽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周表明態度：「單就參政會的文章已經做到頂點，應該轉個彎了，這是我們(周、董、鄧)共同的認識。」但鑒於此事重大，周又沒有把話說死，而是強調「一切待中央立即指示」。[133]

但在延安方面，毛澤東卻依然拒絕妥協。在毛的主持下，中央做出了繼續抵制參政會議的決定。毛認為：「蔣介石正發動一切壓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則過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勢完全崩潰，立場全失，對我一切條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中共「絕不能無條件出席，但明令保證的條件是絕不會答應的，因此須決心不出席」。[134] 到頭來，中共代表沒有在國民參政會上出現。

但這件事對國共雙方都衝擊甚大。說到底，雙方其實都不想「根本決裂」。蔣在參政會上表示，絕不做「剿共」之事，期望與中共「精誠團結，共赴國難」。3月14日，他又約周恩來談話，以「和緩對立空氣」。兩人都知道，要「解決大問題尚非其時」，當周「提到防地、擴軍」等要害問題時，蔣的答覆就只是「敷衍門面」。於是，周提出了「一些小問題(如新華、捕人、發護照、發餉等」。蔣口中唯唯，但周的感覺是，蔣只是「想謀表面和緩，而實際仍在加緊佈置」。[135] 但不管怎麼說，國共關係立即破裂的危險期已經過去了，顯出了「輕輕緩和」的趨勢，自此之後，雙方直接的摩擦和衝突也減少了。然而骨子裏，兩黨領導層間曾有過的點滴信任已被掃蕩殆盡，國共關係的長遠前景比抗戰以來任何時候都更為暗淡。

5月上旬，日軍在晉南中條山地區對國軍大舉進攻，前方情勢甚急。5月5日，蔣介石曾派劉為章面詢周恩來，在日軍大舉進攻時，中共部隊能否出動擊敵，並要周「兩日內答覆」。[136] 幾天後，周根據毛的指示回覆，關於中共部隊配合作戰一節，「當然如此，不成問題」，但蔣必須同意中共的幾項要求：速解決新四軍問題；速發餉彈；停止反共；以及派飛機送周回延安開會。[137] 5月11日，在前線頻頻告急的情況下，蔣親自出馬約談周恩來，力促中共「用游擊戰爭的辦法，切斷同蒲路、正太路、平漢路等，敵人恐慌，一定會恢復原狀」。蔣保證，「你們如配合行動，我絕不會虧待你們，餉彈有了成績後自然發給」；又說，「各地反共捉人，……我一定命他們放人」。周承諾，立即向毛及中央報告。[138] 蔣在當天日記中記道：「中共對晉南戰事，或能望其表示擊敵，余仍以誠摯待之。」[139]

周恩來心目中，民族大義從來是一桿極重的秤。他在給毛澤東及中央的電文中，不僅詳細報告了與蔣介石談話的情況，同時還轉達了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V. I. Chuikov）敦促中共部隊出動支援的意見。此後幾天裏，他又報告道，重慶已出現對中共「沸沸揚揚的輿論批評」。[140] 看來，周恩來是想以此影響毛及中央，作出對國民黨軍隊施予援手的決策。

毛澤東大不以為然。他在幾份覆電中，一面要周恩來堅持與蔣介石討價還價，告訴蔣，「已電總部配合中央軍作戰計劃，惟新四、餉彈、反共三大問題，請蔣速予解決」；一面又要周「告訴（蘇聯）總顧問，要他不要隨便亂說。國民黨至今還說我軍游而不擊，……我們絕不為這些鬼話所動」。[141] 毛決計擺出一副「坐山觀虎鬥」的姿態，嘴裏說好話，但不見兔子不撒鷹，「絕不為國民黨激將法所衝動」。幾天後，他以一封AAA急電向彭德懷秘授機宜，並提醒他不要被周恩來牽着鼻子走：

> 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決不可打得太兇。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兇，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復，國民黨坐收漁利，並將進攻邊區。恩來電是轉給你作參考的，他電中反映國民黨及外國人的壓力，我們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望按此總方針調節我們的行動，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方則打得小些，使國民黨覺得我們真在打就好了。

毛澤東還囑咐彭德懷：「用朱彭名義多向蔣介石及恩來發戰訊報告此點甚重要。」[142] 毛的心中，顯然對周恩來的一些意見和做法頗不以為然，這在他給彭德懷的另一份電報中表露得更為明確：

> 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但絕不為國民黨激將法所衝動。恩來要求將晉東南、晉西北、五台、冀中、冀南、山東都包括在配合範圍之內，我意思主要配合區域應是晉東南和冀南當作主要配合地區，其他作為次要配合區域(即按尋常狀態作戰)。請加考慮作出以具體計劃告我，以便轉告恩來即總顧問。[143]

這之後，華北中共部隊基本上都按照毛澤東的「錦囊妙計」行事。在重慶，周恩來領會到了毛的意圖後，也很快按毛的部署行事，「將八路軍配合作戰的計劃報蔣介石，打擊日軍後即廣為宣傳，並要蔣速發餉彈」。[144]

國共兩黨還在來回交涉之際，前線形勢的發展已急轉直下。面對日軍迅猛攻勢，國民黨部隊連吃敗仗後呈現崩潰之勢。中共部隊還未及出動，蔣介石已下令國軍撤離中條山地區。蔣和國民黨遷怒於中共，強烈譴責中共部隊「坐視不救」。周恩來致函蔣，駁斥「十八集團軍不配合作戰」為謠言，並質問蔣「此舉是何居心」。[145] 國共關係從未清朗過的天空，又增添了一片濃重的烏雲。

七

1941年6月下旬，蘇德戰爭爆發，世界及東方局勢均為之大變。斯大林的一塊心病是，日本是否會趁蘇聯集中應對德國之機，在東方對蘇聯動手？蘇德戰爭爆發後，他很快同意毛澤東幾個月前提出的要求，向中共提供100萬美元的經費援助。[146] 同時，莫斯科又致電延安，要求中共部隊「立即以最為有效的方法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來牽制日軍可能的進攻」。[147] 毛澤東不想這麼做，他的應對招數是斯大林的錢照拿，但卻以種種藉口推搪，就是不大舉出動部隊。7月2日，他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我軍須準備配合蘇軍作戰。……但此種配合，是戰略的配合，是長期的配合，

不是戰役的配合和一時的配合，請在此基點上考慮一切問題。」[148] 7月15日，他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更是把話說透了：

> 假若日本進攻蘇聯時，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顧一切犧牲來動作，有使我們被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據地的可能，這不管從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們採取鞏固敵後根據地，實行廣泛的游擊戰爭，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鬥爭的方針，而不採取孤注一擲的方針。

他因而指示周恩來告訴蘇聯總顧問崔可夫並「轉告遠方朋友」，中共部隊缺少彈藥裝備，「機關槍極少，炮則更少」。[149] 周對毛的意思心領神會，每當重慶蘇聯顧問講到要中共出兵牽制日軍，周就打起太極拳，不斷開口要蘇聯加緊提供援助。[150]

蘇德戰爭爆發後，本來就對蘇聯一直心存芥蒂的蔣介石，看到蘇聯已無暇東顧，對與中共交涉談判的態度一時之間也冷了下來。整個1941年下半年，國共之間的交涉幾乎停頓了下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蔣、周兩人也沒有見面。但同時，國共雙方在軍事上的摩擦也顯著減少了。

1941年8月10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聯合發表《大西洋憲章》（*The Atlantic Charter*），聲明兩國不追求領土或其他方面的擴張，不承認法西斯國家通過侵略造成的領土變更，尊重各國主權和各國人民選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以達到摧毀納粹暴政並重建和平的目標。這對中國和世界來說都是一件大事，國共兩黨都展開雙臂，並大聲喝采。蔣介石在日記中記道，這一宣言「無形中對倭寇與德國已視作同惡相濟之輩矣，實於遠東形勢之影響甚大，可斷美國往日對倭妥協政策，已根本改變」。[151]

毛澤東和周恩來對宣言看得更重。他們這一代共產黨人，最初的政治意識是在「五四」啟迪之下形成的。當年，他們都曾為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計劃」而歡欣鼓舞，又都為美國及協約國家在巴黎和會上對中國的背信棄義而感到憤懣。他們最後選擇走上「俄國的道路」，同這種感受和經歷是分不開的。他們談到同「十四點」一脈相承的《大西洋憲章》時說，「自英德戰爭及蘇德戰爭以來，從沒有這麼好的宣言」，它的發表是「具有世界

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從此開闢了世界歷史的新階段」。[152] 這是20世紀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性時刻，它所彰顯的是中國在世界格局大轉變的時刻，站到了歷史前行的正確一方。

1941年12月，日本襲擊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對中國抗戰的前景及國共關係發展影響甚大，中共對整個國際和國內形勢的判斷也隨之發生了大變化。毛認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雖有可能先「對日取守，而對德取攻」，但對中蘇仍有諸多有利之處，包括「國民黨進攻邊區的可能性減少，……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153] 毛因而認為，「國共關係將有所改善」。[154]

1942年1月，林彪從蘇聯治病回國，一到西安，就大談國共合作乃至共同建國的必要性，蔣對此深感興趣。表面上看，國共似乎重新顯出了合作趨勢。

但在這個當口，周恩來對國共合作前景卻並不看好。1月20日，他給毛的電報中說：英美在南太平洋戰爭失利後不敢得罪蔣介石，致蔣更為驕橫，估計蔣的兩面政策還會繼續，國內困難將更嚴重，但不至崩潰。[155] 2月24日，他又在給毛的電報中說，估計1942年將是「國內政治最困難的一年，但不是最黑暗的一年」。[156] 一直到5、6月，他依然認為「蔣之夜郎自大無以復加」，「對我局部挑釁，政治全面壓迫，是不會放鬆的」。[157]

周恩來對形勢的這種晦暗看法，同他先前對國共合作的積極態度形成對照。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1941年夏天以來，他領導下的中共國統區地下組織和情報系統在國民黨情治機構打擊下，連續吃了大虧。1941年7月，在江西省政府特工處主任馮琦（即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叛徒徐錫根）的策劃指揮下，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和宣傳部長駱奇勳被捕，駱隨即叛變，又供出了代理省委書記顏福華等人。之後，顏又叛變，江西省委完全遭到破壞。馮琦等隨即做出了放長線釣大魚的計劃，指揮已叛變的省委電台繼續與南方工委保持聯繫。[158] 此後，周恩來雖然做出了國統區黨組織不能「秘密組織與武裝鬥爭同時並用」的決定，但對江西省委已遭破壞的情況卻沒有察覺。[159]

到1942年，國統區中共地下黨組織又受到一連串打擊。2月初，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袁曉軒主動投敵叛變。[160] 4月，因與江西省委電台聯繫時斷時續，南委派組織部長郭潛（郭乾輝）前去檢查接洽工作。5月26日，郭遭到早有準備的國民黨特務逮捕，當晚即叛變。第二天，他帶領特務逮捕了中共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等人。此後幾天裏，又帶領特務先後逮捕了南方局負責人廖承志以及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宣傳部長涂振農等人。到7月，在南方各省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達七千餘人，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共地下組織遭受重創。[161]

屋漏偏逢連夜雨。6月下旬，周恩來因患小腸疝氣發炎需動手術住院。之後，「線拆了，痛未止，所以未能出院」。[162] 直至7月中旬，他尚在醫院裏，父親周劭綱在重慶病逝。鑒於當時的情況，鄧穎超未告訴他父親逝世的消息，他因而沒有出席喪儀。待周出院後得知父親已經過世三日，當眾嚎啕大哭，並大聲責備鄧穎超及其他人。[163] 這裏，除了喪父之痛外，是否還夾雜着其他的複雜情緒？

到8月，周恩來別無選擇之下，只得下令南委轄下除敵佔區、游擊區外，一切組織停止活動，已暴露身分的幹部也一律轉移。延至12月，又決定取消南委，停止其工作，停止使用電台，就地秘密埋藏。[164]

在上述情況下，周恩來對國共合作談判拿不出積極態度，也就不奇怪了。這一點，甚至連共產國際也注意到了。1942年6月7日，季米特洛夫接到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Alexander Semionovitch Panyushkin）的報告，講到國民黨正加強對中共的軍事壓力，「中共的所有領導人，特別是在重慶的周恩來，應該盡全力防止將來國民黨對中共態度的更加惡化」。然而，「周恩來的行為卻相反，他不僅不努力調整同重慶國民黨首領的正常關係和確立對蔣介石政府的應有態度，而相反，以其狂妄的行為使蔣介石本人和重慶政府以及國民黨首領和全體黨員對共產黨的態度更加惡化……」報告還指責道：「這不是周恩來行為中的簡單的偶然性錯誤。……看來，周恩來的行為方式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賞識。」又說：「蔣介石因此不想見周恩來，已有7個月沒有接待他了。」[165]

6月15日，季米特洛夫親自致電毛澤東，說「目前的形勢絕對要求中國共產黨採取一切辦法盡可能地改善同蔣介石的關係，加強中國的統一戰

線」，但「有消息說，周恩來在重慶未考慮到這一點，有時以自己的行動助長了挑釁者的氣焰」。[166] 毛馬上回電表示：「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已通知周恩來，讓他徹底執行您做的指示。」[167]

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毛澤東、周恩來等開始考慮重開與國民黨的談判交涉。6月30日，毛致電周，要他利用紀念七七的機會，找王世杰談一次國共關係問題，並表示他願見蔣介石，並請王轉達蔣。[168] 因周當時還在醫院裏，7月5日晚，由董必武出面，同王世杰見面並談話兩小時。董表示，中共「深望國共糾紛能獲致政治的解決」，並「擁護蔣委員長服從三民主義」。[169]

7月21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說他已指定張治中、劉斐同中共談判。[170] 8月14日，蔣再度約見周，說他一週後將去西安，希望約毛澤東在那裏一晤。[171] 會後，周致電毛，說蔣「在態度上還看不出有何惡意」，但「其目的未可測」。他建議，「毛稱病，派林彪為代表到西安見蔣」。[172] 毛開始時同意周的建議，後來又變了，覺得「依目前形勢，我似應見蔣」。周力勸道，「目前蔣雖有了用政治辦法解決國共關係的意向，但具體問題未涉及」，因此「蔣、毛會面時間略早」。最好先由林彪同蔣談，待「具體談判有眉目」後，毛再到重慶和蔣談。[173]

8月22日，政治局會議決定先派林彪見蔣，再看情況決定毛是否見蔣。但毛想來想去，仍傾向於見蔣。他覺得，「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毛甚至認為如果做到這種改善，即是極大利益，就是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174] 這一下，周恩來急了。9月5日，他給毛和中央送出一份長電，講了一堆理由，說明「毛、蔣見面時機略早」。最後，他還提出了另一條毛不能不重視的理由，蔣可能會在「約毛來渝開參政會後，藉口留毛長期駐渝，不讓回延(此着萬不能不防)」。[175] 這麼一來，毛同意了周的意見。

9月中旬，林彪去西安，因路上遇山洪暴發，耽擱了行程，到西安時蔣介石已回重慶。林彪又於10月7日到重慶。13日，林彪和周恩來由張治中陪同見蔣。15日，張治中又代表蔣會見林、周。[176] 談話後，周判斷，通過談判解決兩黨具體問題時機尚不成熟，「林彪此來可完成兩個任務，一是緩和兩方表面關係，二是重開接洽之門，若要超過此種任務，則非在

防地上大讓步不可，恐今日尚嫌其早」。[177] 這一次，毛回電周，「同意所提方針」。[178]

12月16日，經周恩來事先「面授機宜」後，林彪在張治中陪同下見蔣介石。林表示擁護國民黨十中全會宣言和決議。蔣說，只要他活着，解決問題總會公道，不讓你們吃虧，但不許再提新四軍事。[179] 毛澤東根據周對蔣和國民黨的估計決定不去見蔣。到頭來，蔣、毛兩人還是沒有見面。

這之後，周恩來、林彪又同張治中有過幾次會談，但未達成任何協議。1943年3月，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對中共大肆攻擊。3月28日，周、林同何應欽談了一次，也什麼都沒有談成。[180] 此後，談判再無進展。國共之間的這番「扳手腕」，隨着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佈解散，達到了另一個臨界點。蔣介石決定，對國共談判踩剎車。6月4日，張治中正式通知周恩來，國共談判「須擱一擱」再說。[181]

這時，周恩來接到了返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的通知。6月7日，周、林見蔣，蔣表示允許周、林回延安。[182] 6月28日，周離開重慶，啟程回「紅都」。無人知曉，此刻浸潤於他心中的，有幾分是對山城的依依不捨，又有幾分是對前路的隱隱不安。他這一走，要到一年多之後，才會因陪同美國特使赫爾利而短期返回，之後也還會幾次到重慶，但山城再沒有成為他的常駐之地。

自1938年12月起，周恩來以重慶為基地，度過了將近四年半的時光。期間，雖不能說是物換星移，但時勢確實有了轉變。慘烈的抗戰熬過了漫漫長夜，不僅仍在堅持之中，還隨着盟軍在歐亞戰場反攻的逐步展開，終於看到漫長隧道盡頭顯露出的微光。周用心經營的國共統一戰線，雖曾有過像皖南事變後那種墜入死亡邊緣的境況，但畢竟還是生存了下來。他心中難免感慨，其中多少也會夾雜着幾絲欣慰。

在中共內部，周恩來在重慶的這幾年遠離「中樞」。數千里外的紅都延安，一場以捧毛、樹毛為中心使命及意象的整風運動已進行了兩年有餘。周即便身在陪都，也時時可以體察到伴隨毛澤東的太陽冉冉升起而出現的種種變化。這兩年裏，他一直沒有捲入整風之中。但現在，他要離開重慶回延安了。不管他心中有何想法，他大概不會想不到，等待着他的將是他人生及政治生涯中又一段前所未有的經歷。

第12章

紅太陽在延安升起（1941–1945）

一

延安，中國大西北黃土高原上的一座小城，距古都西安三百餘公里，古稱膚施。歷史上，延安雖歷經滄桑，卻從未獲得盛名。西安事變後，如果紅軍沒有從東北軍手中接管延安，而中共中樞又未曾移駐此間，延安也就不可能在中國乃至世界上獲得如此巨大的名聲。從1937年到1946年，這座小城是毛澤東及中共領導人駐節之地，也成了中國的「紅都」。[1]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年間，周恩來除了回延安參加整風的兩年，大部分時間都不在這裏。但發生在紅都的種種變化，卻時時都在他的關注之中，隨着毛澤東逐步登上再無爭議的中共最高領袖寶座，就更是如此了。這些年裏，毛主席的太陽冉冉升起，延安也越來越成為周恩來心目中的「聖地」。

然而，抗戰爆發後的一段時間裏，延安還不是周恩來眼裏的政治中心或重心。在關於黨的戰略、路線和政策的認識上，周恩來與毛澤東仍然存在着分歧。1937年12月18日，「十二月會議」結束後四天，周恩來同王明、博古等人一道抵達武漢。此後，他仍然遵循自己所理解的中共和共產國際的思路，將加強國共兩黨統一戰線及全力推進全國性抗戰當作頭等大事。三天後，他和王明、博古一道面見蔣介石，商討密切國共關係及加強兩黨合作的各項事宜。周恩來是願意全心全意做好這件事的，因而提出了

成立兩黨關係委員會等一系列具體建議，蔣極表贊同，並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此時對共黨應放寬，使之盡其所能也。」[2] 會後一週，國共兩黨委員會就正式成立並開始運作。

但正如前一章所述，國共合作之路絕非坦途。1938年2月，經歷了抗戰初期的「蜜月」之後，國共關係出現了一系列緊張的苗頭。[3] 周恩來、王明等對此深感不安，連續致電延安方面，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以討論「最近時局中發生許多新的嚴重問題」。[4] 毛澤東不想開這個會，待周、王幾次跟進催促後，才勉強同意。[5]

2月24日，周恩來和王明一道，回到延安，參加了2月27日至3月1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史稱「三月會議」。周前來開會時，基本的想法仍然是，悠悠萬事，最要緊的還是要保證抗戰的勝利。在這一點上，他和王明的看法依然相近。他們都認為，中共與國民黨之間的統一戰線縱然遇到了各種問題，還是應當鞏固，不應削弱，中共則應在這一過程中獲得加強。周因而在會上提出，軍事上，戰略方針要以運動戰、陣地戰為主，游擊戰為輔；政治上，仍然要擴大統一戰線。[6] 在這幾點上，毛澤東主張以游擊戰為主以及在政治上要以「中共獨立自主」為先，同周恩來依然存在着分歧。[7] 同十二月會議上的情況相似，周、王的看法在黨的高層中仍然頗有影響力，並在會上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會議還同意，由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8] 在這種情勢下，毛只得暫且再退一步，沒有堅持同王、周等人「較勁」，更沒有像五年前的寧都會議上那樣拂袖而去，但他心裏對此是很不高興的。他後來回憶起這次會議時曾說：「三月會議，長江局先打一個電報，規定議事日程，決定某某要人回長江局工作，這種態度我很不滿意。」[9]

但上述種種還只是表面現象。這一時期中共高層政治的弔詭之處就在於，當毛澤東不得不在黨的大戰略和政策表述上處於守勢時，他實際上並沒有失去對中央實權的影響乃至掌控，尤其是在黨內上層要害位置的分配上，他不僅沒有失去發言權，反而通過坐鎮延安，在實際上加強了自己在這方面的掌控權力。當時，擔任中共總書記的仍是張聞天，他自遵義會議後就成了一位相當堅定的「毛派」，在上述問題上同毛的看

法相近。同時，黨內中樞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任弼時也已轉向毛。延安之外，後來通過「擁毛」而成為黨內二號人物的劉少奇，已經控制了中共在華北的組織及力量。所有這一切，對於毛澤東全面掌控黨的權力，都是極為重要的。

同時，毛澤東在戰略表述和黨內話語權的爭奪上並不安於守勢，而是既「韜光養晦」，又一直在做各種準備，等待形勢的變化以及時機的到來。這一段時間裏，毛拼命寫東西，成為他一生最多產的時期。《論持久戰》、《矛盾論》、《實踐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等等，都是這兩年寫出來的。這些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是馬列主義的，以及具有多少理論上的原創性，在當時和之後都曾引起過人們的許多爭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們幫助毛樹立起了一個他先前未曾有過的形象：他不僅是一位革命的實踐家，更是一位革命的理論家。他通過這些著作，並通過把它們同自己先前的其他論著連接起來，提出並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必須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並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中心論點和意象，形成了後來被當作毛主義論述的一系列核心文本，由此奠定了中共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意識形態表述的理論基礎。在中共黨內，能夠如此結合中國之實際來闡述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本人又有着出眾的權謀心計和巨大的政治鬥爭能量的，除毛澤東之還找不出第二人。

中共黨內的政治風向，漸漸朝着有利於毛澤東的方向轉變。先是抗戰本身的發展，正如毛所預言的那樣，經過最初一年的大規模正面爭奪後，日軍攻城略地，佔領了幾乎所有沿海城市及重要鐵路線等交通命脈，卻未能迫使國民政府投降，抗戰進入了持久戰的階段。同時，中共部隊投入與日軍對抗後，雖有幾次小勝，但損失及傷亡嚴重，許多中共領導人和軍事指揮官逐步意識到，不能輕易地捲入同日軍的正面對抗，不然會把中共本來就不大的一點軍事上的本錢給打光的。與此同時，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在經歷了一段「蜜月」期後，各種摩擦乃至衝突層出不窮，遭遇到嚴峻的挑戰。毛漸漸有資本告訴他的同志們，絕不能把國共之間的統一戰線當成中共的政策之先。他說了一句重話，「黨內要進行階級教育」。[10] 這個話是對王明說的，也是對周恩來說的。

隨着時勢的轉變，黨內的力量對比也悄然地朝着有利於毛澤東的方向進一步變化。就中共領導層內部的攻守之勢的轉換而言，對毛來說，最能夠透露出這一點的，莫過於任弼時的轉向了。江西蘇維埃時期，任弼時曾是毛在蘇區的主要對手。但任對毛的看法，自長征後期，尤其是在中央紅軍到達延安後，逐漸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對毛澤東對於黨內外各種問題的分析與掌控能力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認同，兩人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接近。[11] 任如此，別人也會如此。在中共領導層，任向來以穩重出名，他的這種變化應是毛在黨內上層已得到更多認可的反映。

1938年三月會議後，根據中共領導層的決定，任弼時去莫斯科接替王稼祥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並就中共當時所面臨的局勢及各種問題向共產國際彙報。[12] 這件事，最初竟然是由王明提議的。這也許是因為王明覺得，任屬於「留蘇派」，在江西時期又曾同毛有過很深的矛盾，因此是「自己人」。但實際上，當時任弼時已在大政方針上倒向了毛這一邊，卻為王明所不察。任弼時出使莫斯科，其實正中毛的下懷。後來證明，這對毛來說是一件幾乎有着扭轉乾坤意義的大好事。

任弼時到達莫斯科後，於4月14日和5月17日先後就「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了書面報告大綱和補充報告，其中，正面闡述了十二月會議和三月會議的結果，表明中共領導層極為重視同國民黨的抗日統一戰線，並將之當作自己戰略上的重中之重。報告還提出：中共應在統一戰線中保持組織上的獨立和批評的自由，同時反對投降主義和關門主義。[13] 關鍵還在於，除這些報告外，任弼時為了加強毛澤東的影響力，在莫斯科對各方展開游說活動。[14] 更要緊的是，恰恰在此前後，王明在共產國際的重要靠山和支持者米夫在「大肅反」中遭到了整肅，從蘇聯政治舞台上永遠地消失了。這樣，王明在莫斯科失去了一位極為重要的支持者，在共產國際的影響力也大打折扣。延至6月中旬，共產國際執委會表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包括保持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政治和組織上的獨立自主」。[15] 這一說法，為毛澤東宣稱他獲得了共產國際的支持，留下了極大的空間。

任弼時力挺毛澤東的舉動，也得到了已卸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一職、將要離開莫斯科回國的王稼祥的支持與呼應。自長征時起，王已成為

另一個毛派。他回到延安後，如何向中共領導人傳達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對中共領導層此後的權力分配及政策動向都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這時，任、王兩人聯手做了一件大事。就在王離開莫斯科前，任、王與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會面。據稱，季米特洛夫表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產生出來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爭了吧！」[16]

二

對毛澤東和中共來說，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轉折時刻，終於隨着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而到來。用毛自己後來的話來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17]

這次會議上的一出重磅戲，是剛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在9月14日，亦即政治局為六中全會所召開準備會議的第一天，傳達了據稱是季米特洛夫代表共產國際向他陳述的意見：「今天的環境中，中共主要領導人很難在一塊，因此很容易發生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氣氛。」[18]

本來，王明之所以能夠獲得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也能夠迫使毛澤東不得不讓他幾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黨內中樞大多數人都把他看作是有着共產國際背景的「欽差大臣」。王稼祥的轉述是釜底抽薪之舉，對包括周恩來在內黨的其他領導人產生了巨大的震動，也從根本上動搖了王明與毛澤東爭奪黨的最高領導權的基礎。[19]

周恩來只參加了六屆六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以及全會的前半段。他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時，態度仍有某種曖昧之處。他一方面表示：「我完全同意國際指示和澤東同志的報告。」另一方面又以為自己辯護的口吻說：「我們擁蔣抗日、擁護三民主義是鞏固統一戰線的基礎。」接着，他還加了一句：「但我們必須在保持黨的獨立性的原則之下。」[20] 9月30日，他在全會上做關於統一戰線的報告時提出了十二條原則，其中第一條仍然是「抗戰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戰」，第二條才是「堅持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他還強調，中共應「認定國民黨為主要合作對象，不是削弱國民黨，而是推動國民黨進步」。[21] 這真是一番典型「周恩來風格」的表態，面面俱到，似

乎無懈可擊。這表明，在大政方針上，周的態度雖然已開始朝着「擁毛」的方向發展，但還沒有達到完全心悅誠服地接受毛的主張的程度，對他自己以及王明自抗戰以來在竭力擁護統一戰線上的看法與行動，也還沒有全盤否定之意。對周恩來的這些表現，毛澤東當然會看在眼裏，記在心上。

然而，王稼祥所轉達的共產國際的看法，對周恩來的震動畢竟是很大的。在全會過程中，周可以清楚地感覺到，黨內大勢已經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人倒向毛一邊。這之後，他對毛澤東和王明的態度也開始轉變。全會之後，王明又去了武漢。對此，毛曾竭力反對，提出「在今天的情況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漢去」，但在中共領導層投票時被否決。[22] 其實，毛最擔心的應該是王明回到武漢後同周攜手，仍有可能對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提出實質挑戰。

後來看，毛澤東在這一點上是多慮了。關鍵在於，周恩來對王明的態度已與先前不同。王明到武漢後，周、王兩人關係也漸次疏離。本來，根據中共中樞的表決意見，王明到長江局一個月後就應當返回延安。[23] 但王明到武漢後，就不想走了。而毛也沒有執意催促，一定要王明遵守決議馬上返回。看來，此時毛已意識到周、王並無聯手向他提出挑戰的意圖。後來，周恩來因療傷去蘇聯後，曾同季米特洛夫談起中共這一段的情況，講到王明時說，王明回國後表現「不夠好」。他甚至不顧自己在長江局與王明共事時的實際經歷，說「王明跑到武漢，企圖組織自己的班子」。[24] 由此而透露出來的是，在黨內政治上，周恩來已經轉向毛澤東這一邊了。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最大收穫之一，是在中共組織結構上做出了包括撤銷長江局在內的重大改組。全會只開到一半，周恩來就因為武漢告急，加上毛也希望他盡快回武漢，而匆匆離開延安，沒有參與會議後期的一系列重大的組織安排。[25]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共領導層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南方局，周被任命為書記；同時，成立了以劉少奇為書記的北方局，和以項英為書記的東南局。[26] 這之後，王明的長江局書記的職務沒有了，周擔任書記的南方局在層級上比長江局大大降低，其工作範圍和實際權力也比長江局大大縮小，再也沒有成為另一個中共中樞的可能了。

從上述意義來說，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已開始了對中共領導權的全面掌控。這之後，終其一生，他再也沒有放過手，大權也再未旁落。

三

隨着毛澤東一步步地把中共的最高決策權力抓到自己手中，一個改造中共的宏大計劃也逐漸在他的心目中形成。他要把這個黨變成他的黨；領導這個黨在中國奪取政權；接着，還要不斷地改造這個黨，並帶領和依靠這個黨，進而改造中國和世界。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中共高級幹部會議上，做了題為〈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27] 這其實是毛在為他心目中將要發生的「整風」定調子，並創造出一種意識形態及話語表述層面的大環境。7月，中共中央根據毛定下的調子，做出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28] 8月，又做出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29] 這一切，也可視為「整風運動」發生的前兆。

這期間，國際局勢也朝着有利於毛澤東全面掌控黨內領導權的方向進一步發展。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國入侵蘇聯，甚至一度打到了莫斯科城下。如何使蘇聯在這一空前嚴重的生死存亡危機中生存下來，無疑成為斯大林、蘇共領導層以及共產國際全部政策的重心。這就使得中共和毛澤東——即便在共產國際依然存在、而中共依然是共產國際支部的情況下——獲得了自中共建黨以來未曾有過的制定自身大政方針的空間。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期間總共開了五次會。這是毛澤東從政治上、尤其是從思想上確立並鞏固自己在黨內領導地位的又一個重要里程碑，也可以將之視為整風運動肇始的標誌。會議集中批判和打擊的對象是王明，但所涉及的各項問題，卻都直接或間接地與周恩來有關。隱然之間，周其實已經成為「整風運動」的潛在目標。

周恩來沒有從重慶趕回延安參加九月會議，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他當時確實太忙了。同時，因為他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身分，蔣介石也對他的行動有諸多限制，他若要離開重慶需有護照。更何況，如前一章所述，國共關係正處於一個極為緊張與微妙的時期，有着太多的事情需要周做，他實在離不開。

但同時，周恩來缺席九月會議是否也多少同會議的性質有關？從毛澤東的角度來說，這次會議不讓周參加，要比讓周參加好得多。若是周在場的話，有很多話毛講起來就不那麼方便。萬一周再同王明聯手，也會給毛按照自己的思路推進會議平添好多麻煩。既然如此，從毛的角度來看，還不如讓周缺席為好。近十年前，周召開長汀會議時不是也沒有讓當時正在漳州前線、分身乏術的毛回來參加，就對他做了「缺席判決」嗎？那麼，這一次毛澤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9月10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觸發了關於黨內歷史問題的反省和批判，也為九月會議及之後整風運動的興起定下了調子。毛所抨擊的主觀主義，一個主要的例證就是江西蘇維埃後期以「國際路線」為旗號而推行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其中，毛點了1932年5月11日蘇區中央局通過的一個關於國際局勢的決議的名，說它「完全是主觀主義的東西」。[30]而這個決議，恰恰是在當時任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主持下做出的。[31]

9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高級學習組，由毛澤東出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32]學習的主要內容是閱讀六大以來（亦即1928年以來）黨的歷史文件，並在此基礎上在全黨發動思想革命，「以達克服錯誤思想（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釐清並總結中共自六大以來的歷史經驗。[33]這件事不僅延安在做，也立即擴展到別處，各地中共組織都以延安的做法為樣板，成立了高級學習組。周恩來雖然在千里之外，但因為這次會議太重要並在多方面牽涉其中，一直不敢讓會議進程脫離自己視野之外。中央高級學習組成立後，周恩來及所轄的南方局也不敢怠慢，在中央發出正式通知前，就已在南方局成立了高級學習組，由周親自出任組長。[34]

九月會議上，王明成了眾矢之的，對他的各種批判如潮湧而來，一頂頂大帽子扣到了他的頭上，搞得他的日子很不好過。就在此時，10月4日，王明從毛澤東處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向中共中央詢問中國情勢的電報。季米特洛夫向中共領導層就黨的各項戰略政策提出了15個問題，其中質問道，在德軍繼續進攻蘇聯時，中共準備採取何種行動阻止日本進攻蘇聯。[35]這之後，已處於「困獸猶鬥」態勢的王明，權衡再三之下，圍繞着如何看待並回答這些問題對毛發難，並同毛發生了「激烈的爭辯」。10月8日晚，王明又在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做了一個長篇發言，不點名地指責毛對國

民黨、各地方實力派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過左」了。他還以毛新近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為靶子，說其中的提法不合時宜，不利於「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的形勢需要。[36]

當時，中共畢竟還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莫斯科既然發話了，毛澤東不能不有所表示。於是，10月13日，毛在中共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宣佈，因為王明生病，對他的問題停止討論。[37] 同時，毛又表示，這不等於說王明沒有大錯，他「在武漢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的錯誤，但不是路線的錯誤」。[38] 這樣一來，由於季米特洛夫的干預，王明似乎躲過了這一輪「無限上綱」的批判潮頭，但其實也為他以後遭到更猛烈的批判留下了伏筆。同時，毛這裏所說王明在武漢時期的「政治上組織上」的「原則的錯誤」，當時同王明在一道的周恩來分明也有份。這就為周必定要在整風中受到嚴厲批判，留下了又一個要緊的伏筆。

「九月會議」結束時，已是10月下旬。會議作出另一項實質性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首，由毛、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等五人組成的「組織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同時，又成立以陳雲為首的「組織審查過去被打擊幹部委員會」。[39] 後來看，這兩個委員會要處理的「重大問題」，幾乎無一不同周恩來有着密切關聯。

周恩來缺席了九月會議，他關於會議的全部知識，應該要到兩年後他回到延安參加「整風」時，通過閱讀會議的相關文件才能獲得。我們無從知道他在閱讀這些文件時會有何種感想，但當他看到自己的決策及行事，一樁樁都被毛當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左傾機會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的具體例證予以批判時，他心中應該十分清楚，自己從一開始就是毛發動整風運動最重要的對象之一。

九月會議後，毛針對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從1931年9月到1932年5月發出的九份重要文件，寫了獨立成章又相互聯繫的九篇文章，逐一加以批判，共五萬餘字。除了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外，周恩來作為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也是毛批判的靶子。九篇文章中，有好幾篇同周恩來有關，但當時毛沒有給周看過，只「送給了劉少奇和任弼時兩位同志看過。沒有發表，送出去也就忘記了」。[40]

毛澤東是帶着極為強烈的情緒來寫這九篇文章的，似乎要把他在這些年裏的委屈與憤懣，統統發洩出來。因此，用曾任毛秘書的胡喬木的話來形容，這幾篇文字「用詞辛辣、尖刻，甚至還帶有某些挖苦」，是毛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鬱悶情緒的大宣洩」。[41] 也正因為如此，這幾篇文字雖然屬於毛澤東自己生平最看重的文字，是他的得意之作，他生前也曾多次想要發表，並根據時勢的轉變（如文革前夕和批林批孔運動推進時）一再修改，但最後還是沒有拿出來。毛逝世後，這九篇文字也始終擱置密室，雖有幾次「九篇文章要拿出來了」的風聲，但到底還是沒有兑現。[42] 這裏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應當就是毛曾在其中對周有極為嚴厲的批判，語氣辛辣，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在此，僅引一段毛澤東對周恩來到蘇區後「改組的蘇區中央局」之舉痛加斥責時的表述：

> 「最堅決最殘酷的鬥爭」一來，「主要的火力一放」，一切「右傾機會主義者」休想活命。這是叫我們預備後事的，像阿Q在畫過圓圈綁赴刑場的光景一樣，「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剩下這點希望了。不是嗎？「中央的決議、指示信與這一決議，要一直發到支部去討論，並立即執行。」自己不動手，似有「君子遠庖廚」之意。卻叫支部充當劊子手，命令他們「立即執行」。說時遲，那時快，午時三刻，喝一聲「到」，砍了！……當他們實行篡黨、篡軍、篡政之時，照例都是有這一手的。為了建設他們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領導者們的威信下死勁地給以破壞，而且破壞得異常徹底，使用的手段是異常毒辣。[43]

毛澤東綿綿不絕之恨意，乃至全面「反攻倒算」之心思與意圖，在字裏行間透露無疑。他後來在整風中的做法，比起他上面的描述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四

「九月會議」後，毛澤東「整風運動」的巨艦起航了。他心目中所希望達到的基本目標有二，一曰「統一思想」，二曰「擺平山頭」，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又是相輔相成的。毛澤東得以做到這兩條的「中心工具」及手段，則是實現對黨及其組織系統的全面整頓。這兩條的實現，不僅同毛澤東建

立起在中共黨內的絕對權力與權威關係甚大，也同中共得以最終打下天下關係甚大。相形之下，蔣介石和國民黨鬥不過毛澤東及中共的原因眾多，但追根溯源，他們始終解決不了上面這兩個基本問題，恐怕應當屬於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從一開始就表明，「整風」要在全黨普遍推行，所有黨員和黨的各級組織都要經過整風。因此，整風發動後，以思想整頓和組織整頓為中心任務，涵蓋了黨的整個中下層。

這裏的所謂「思想整頓」，就是要實現全黨根據毛澤東的計劃和想像，既打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旗號，實現毛對於黨的意識形態的界定及解釋權力；又通過在黨內創造出一種無孔不入的「思想改造」的氛圍，激發起人們在「靈魂深處」發生革命的願望及衝動，從而打開一扇造就「無產階級新人」的門戶。這個過程中，既包括「和風細雨」的文件學習和思想交流，又充斥着疾風驟雨般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由此催生出來並肆虐風行的，是無數對人的摧殘和變相逼供的故事。

所謂「組織整頓」，同「思想整頓」密切相關。說到底，就是毛澤東要在組織上掃除一切實際或想像中的異己力量，使得全黨在他的領導下達到組織上的高度統一，也使得他本人獲得再無法制衡的政治權力。組織整頓的核心措施是「審幹」，這在延安達到了幾乎「人人過關」的地步，打擊面極大，無所不用其極。尤其是在延安大搞「抓特務」，達到了完全不講道理的地步，因而在整風中引起反感乃至「民憤」最大，在後毛時期的整風研究中也最受非議。在這件事上，衝在最前面的人是康生，他後來在文革中又成為毛的打手和幹將。這樣搞「審幹」，其實也是在為毛澤東造勢、立威。而康生對毛的意圖領會得最為透徹，執行得也最為「到位」。

康生抓「審幹」，一個重點是在從大後方到延安的幹部、包括準備參加七大的代表中「抓特務」。結果，不查不得了，一查嚇一跳，居然發現這些人幾乎統統不乾淨，不是「特務」就是「間諜」。1943年4月30日，就在周恩來即將被召回延安參加整風的前夕，毛澤東給他發了一份「絕密」電報，並指定要「恩來同志親譯」：

> 從大後方來延幹部及七大代表的審查中證明很多是特務，證明大後方黨組織多數或大多數是特務組織，因此（一）請你及孔原立即暫時

> 斷絕大後方黨一切黨組織的往來，將來整理辦法，俟此研究再告。(二)辦事處及報館必有很多特務混入，請將可疑者面目不清者一律交林帶回。林至西安時，並將西辦人員，大批帶回清理。此事問題很大，務請不露聲色，精密注意。你的公館用人，亦須十分注意。閱後付丙。此事只同(董)必武、林彪、孔原三人商量至要。[44]

對於周恩來來說，這是一個無比嚴重的警示信號。從心底裏來說，他並不相信、也不可能相信毛澤東的這些話。畢竟，南方局和大後方的中共情治系統是由他親自掌控並發展起來的，他對於自己的工作和部下實在是太了解了。如果他領導下的組織系統真的如毛澤東之所指，已經為國民黨情治系統全面滲透的話，那重慶的局面是會大不一樣的，他和中共組織在大後方早就應該沒有立足之地了。但對於毛何以會提出這一空前嚴重的警告，用意何在，他雖不能透徹地理解，卻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視。

我未能看到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就這一「嚴重事件」進一步直接通訊的相關文獻資料，但知道，周回到延安後對此事做了全面否定的「最終答覆」。當時，李維漢是陝甘寧邊區整風運動的負責人，因遇到太多大後方來延安的人員遭到「特務」和「間諜」指控的案子，「甘肅、四川、河南、湖南、湖北、雲南、貴州、浙江、江西等十多個省的地下黨」，統統被說成是已經爛透了的「紅旗黨」，「適值周恩來回延安，這些黨組織都是他領導的」，李當面詢問周：「這是怎麼回事？」周恩來的回覆毫不含糊、極為明確：「正在清理，沒有這回事。」[45] 周恩來敢於對李維漢這麼說，當然是因為他也給了毛澤東相似的回覆。而他有底氣說這個話，是因為毛關於「大後方來延幹部及七大代表的審查中證明很多是特務」的指控，全為子虛烏有，到頭來居然沒有一件是可以坐實的。

實際上，毛澤東後來也意識到，自己和康生之所為確實太過頭了。1944年5月，他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講話中說：「在整風審幹時有些同志受了委曲，現在摘下帽子，賠個不是。我舉起手，向大家敬個禮，你們不回禮，我怎麼放下手呢？」[46] 1944年10月，他在中央黨校的另一次講話中又提到，「審查幹部，反特務，發生很多毛病」，「特別是在搶救中發生過火」。但他同時又說，「天下太平又不太平」，一方面，「大多數黨員沒有問題」，但另一方面，「有些是有問題的」；他還說：「天下太平和特務如麻，

都是不對的。」他在講話中點了康生的名，接着說「去年搶救運動，十幾天，我們馬上就使它停止了」。[47]

1945年2月，已是七大召開的前夕，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的講話時再次「脱帽鞠躬」，向整風審幹中被錯整的同志賠禮道歉。他說：審幹「犯了錯誤，拿件數來說就很多，我是黨校的校長，就在這個黨校犯了很多錯誤，誰人負責？我負責。整個延安犯了很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發號施令的也是我。……如果在座有這樣的同志，我賠一個不是，因為搞錯了」。但毛其實知道，別人是不會要他「負責」的。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還特別提到了「大後方黨的問題」，說：「大後方黨在戰爭時期大概的數量有十萬，恩來同志、董必武同志、在座的還有許多同志他們領導的。」毛以他一貫的「一分為二」手法總結道：「大體上這樣兩條，一條承認那個地方黨有問題，一條承認大多數同志是好的，沒有問題的，純潔的。……這樣的估計應該做出來，應該講南方工作同志有成績。」[48] 這樣，毛等於是把他於1943年4月30日給周恩來那封絕密電報中提出的嚴厲指控推翻了。問題在於，在此類問題上，毛澤東從來就是「矯枉必須過正」的信奉者。所以，他根本沒有因此而怪罪康生（即便是康生在中共建政後很長一段時間裏被「晾起來」時，也是如此），而一旦時機成熟而他又有需要時，馬上就毫不猶豫地重新對康生委以重任。

然而，毛澤東在推行整風時，也並非全然不講策略。若同十年內戰時期「肅反」、「打AB團」時的情形相比較，毛本人的一個大的變化，就是在整風中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49] 也就是說，在整風中，不管將批判對象整得多麼厲害，但絕對不殺人，一般也不輕易地將人投入監獄。[50] 這裏之所揭，其實是毛在政治鬥爭的掌控及政治權謀的使用上已上升到了另一層級。這方面，陳毅的感受很說明問題。江西蘇區期間，陳毅曾與毛共事，但兩人關係並不融洽。1929年的「九月來信」等事之所以會發生，就是毛與陳毅之間矛盾的爆發。長征時，陳毅因身負重傷，留在了江西蘇區，歷經艱辛，倖存下來。整風中，他奉召長途跋涉來到延安，參加運動。毛親自接見，與陳毅徹夜長談。從毛的窯洞中走出來後，陳毅極為感慨，說：十年不見，老毛真是今非昔比，鳥槍換炮。言下之意是，

毛已有了打天下、坐天下的帝王相。[51] 若陳毅有此感受，那麼中共其他高級幹部及將領又何嘗不會感同身受？這是毛得以鞏固自己在中共黨內的最高領導權力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再深入一層來看，毛這麼做，還因為他希望在人們的靈魂深處掀起一場「革命」。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整風開啟了毛時代一系列旨在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運動的先河——其最高潮和集大成者則是那場災難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五

儘管中共全黨都捲入了整風，但以中下層幹部為對象的「審幹」並不是整風真正的重點。歸根結柢，毛澤東說得很明確：「整風主要整高級幹部……將他們的思想打通」；「只要把他們教育好了，下級幹部的進步就快了」。[52] 周恩來不僅是高級幹部，更是自192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在黨中央及中共軍事情報中樞擔任領導職務，並在此過程中多次同毛澤東產生分歧乃至衝突，屬於高級幹部中的「重中之重」。毫不奇怪，周恩來從一開始就在劫難逃，必定成為毛澤東推動整風運動的主要靶子之一。

然而，在整風開始後的頭兩年間，周恩來並沒有馬上受到整肅。其主要原因，應在於他手裏掌控着中共在國統區乃至淪陷區的各種組織關係及情報網絡，又在重慶主持同國民政府及整個外部世界打交道，事關重大。1941年皖南事變前後，國共關係更是出現嚴重危機，「國際干預」是中共領導層用來牽制乃至壓制蔣的「反共圖謀」極為關鍵的一步棋。除了周恩來外，中共領導層中再無第二人能像他那樣掌控並處置當時的複雜局面。他確實難以長期從重慶脱身，回延安參加整風。

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毛澤東搞黨內鬥爭是舉世無雙的高手。從推動整風運動的策略角度出發，他完全懂得絕不能從一開始就全面出擊，以免樹敵過多。他在權衡利弊之後，做出了首先向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等為代表的黨內「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分子開刀的抉擇。其中，就是對這幾個人，他也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方法，要集中打擊的是王明。

毛澤東之所以這麼做，一方面，是因為王明素有領袖欲，又向來受到共產國際的青睞，對毛澤東擔任全黨領袖的威脅因而也比其他人更大。另

一方面，王明在黨內的人脈和人緣關係完全沒有辦法同周恩來相比，甚至也不能同博古、張聞天等人相比(畢竟，博、張兩人都親身經歷過長征)。周恩來早年便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在軍內輩份甚高，又在黨務、軍務及情報活動這幾方面長期從事具體及實際的領導工作，早就在黨內被公認為是「做實事的人」。毛澤東如果在推動整風時先拿他開刀，不僅會轉移批判王明的火力，也會加大整風在黨內、軍內遭到阻礙的可能性。這樣的事情，對當時已在黨內鬥爭中修煉得越來越爐火純青的毛澤東來說，是絕不會貿然去做的。

相形之下，王明等人和周恩來不一樣。他們這幾個人，幾乎都有着從莫斯科「從天而降」，直接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的「空降部隊」般的經歷，因而在黨內、尤其是在軍隊內部的根基和人脈關係並不深厚。而他們在主持中共軍政大計的制訂與實行的過程中，又都有過這樣或那樣需要對「重大失誤」承擔責任或至少難脫干係的「歷史舊帳」，有不少大大小小的辮子可抓。在這些方面，在毛澤東看來，王明的「問題」尤甚。

毛澤東推動整風時所採取的，是步步為營、持續推進的戰略。1942年2月，毛先後做了〈整頓黨風、文風、學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53] 他以極具針對性的口吻，嚴厲批判黨內「教條主義者」，把「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企圖以「比屎還沒有用的教條」來指導革命，其實是「連豬都不如的蠢貨」。[54] 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毛主持下，決定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親自出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55] 這成為統一領導整風運動的中心機構，在一段時間內，它甚至接管了政治局的很多「功能」，把高層整風、尤其是涉及政治局委員的整風的動員及執行權力，統統抓到了自己手裏。關於毛提出的所有參加整風的幹部都要寫帶有自我批評性質的反省筆記及思想自傳，凡涉及高層幹部的，都要由總學習委員會直接掌控。[56] 對這些做法，毛澤東不斷地向周恩來通報，周「依樣學樣」，很快在南方局也成立了學習分委員會。[57]

整風學習在上層展開的同時，毛澤東也在不斷進行組織上的調整。自193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就是「毛派」的張聞天，因為是「留蘇派」，又同1930年代中期前的錯誤路線關係太深，再加上毛對他這個人向來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反感，所以早在1942年初就離開中央去農村搞「調查研究」

了。[58] 歷史上同錯誤路線有瓜葛、並曾站在毛的對立面的任弼時，卻因為當時已是堅定的毛派，且又為毛所喜歡並看重，獲得了更大的權力。歷史上從來沒有犯過路線錯誤、又一再表明是堅定毛派的劉少奇，從蘇北被召回延安，在黨的領導層迅速竄起，漸漸成為毛之下的中共第二號人物。[59]

1943年3月，一件就整風的邏輯而言早就是題中應有之義的大事終於發生了：中共中央領導層實現重大改組。3月20日，在周恩來未出席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定，由毛澤東擔任政治局主席；同時，成立由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三人組成的新的中央書記處，「澤東同志為主席，會期不固定，得隨時由主席召集之，會議中所討論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60] 這樣一來，毛澤東在黨內高層的政治地位，也從最高決策者之一，變為無可爭議的最高決策者。

在這新的結構中，周恩來已經不再是中共最高決策層的核心成員了。同時，這一變化也意味着，隨着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從組織上進一步確立，毛以及整風運動直接「整」到周恩來頭上的日子，已經越來越接近了。[61]

恰在此時，國際形勢又發生了重大變化。1943年5月22日，共產國際宣佈解散。對於毛澤東來說，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雖然說，這些年來共產國際其實對毛一直不乏支持，蘇德戰爭爆發後，莫斯科需要集中應付戰事，共產國際對中共也不得不越來越放手。但毛對於中共的頭上還有這麼一個「頂頭上司」，仍然很不舒服。他最擔心的是，萬一莫斯科對他看不順眼了，要在他頭上動土，那他就會遇到大麻煩。正因為如此，毛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延安和莫斯科之間的電訊聯絡，絕不讓別人參與。[62]

現在，共產國際解散了，毛澤東知道，放開手腳整頓中共的時候終於到來了。在此背景下，整風運動開始進入新的階段。毛感到，動手對付周恩來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六

1943年5月21日，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發來的密電，稱接到季米特洛夫預先通報，「共產國際主席團將於5月22日公佈向各支部關於解散國際工人運動領導中心——共產國際底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於5月21日

會議，完全同意此種建議」。[63] 共產國際解散公佈後，周恩來又於5月24日接到毛澤東和中央來電：「共產國際解散，中央即將開會討論中國的政策，請周恩來即回延安。」[64] 但周恩來在重慶事多，一時難以放下。同時，他又在國民政府任職，離開重慶需要獲得蔣介石批准和發放通行護照，而蔣卻拖延着遲遲不辦。一直到6月7日，蔣與周恩來和林彪會見時，才同意周回延安。[65] 這之後，中央書記處和毛澤東又致電周，指示他「回延安宜速，勿耽擱」，此後又催問他「何時動身」，途中在成都西安等地「望勿耽擱」。[66] 毛澤東還特意指示周：「為使你能順利回延計，對國際解散後蔣對我黨要求無論何項都不要拒絕，只說可以回延商量。當此國家內外困難只能相讓為國等。」[67] 但周恩來仍未能馬上動身。

周恩來這麼做，固然有不得已之處，確實受到了蔣的牽制。但除此之外，是否還因為直覺告訴他：此次回延安與以往不同，是要投身到整風運動中去了，一時半會恐怕回不了重慶。因此，他需要在思想和精神上都做好準備，相關工作也要安排，當然也就需要時間。直到6月28日，周恩來才從重慶動身。他離開延安，已經三年多了。這一次，同抗戰發生以來周恩來多次短期回延安彙報的情況不同，他將會離開一段較長的時間。事後看來，甚至連他是否還會再回到重慶，其實也無法事先斷定。

周恩來離開重慶時，情勢又有變化。共產國際解散後，國民黨方面藉機發難，要求中共解散組織，交出軍隊，從而將「軍權、政權統一於中央」。[68] 7月初，周仍在回延安的途中，他安置在胡宗南身邊長期潛伏的戰略特務熊向暉送出情報：蔣正準備調動大軍，進擊中共控制下的陝甘寧邊區。[69] 毛在先前給周的指示中，曾要他在趕回延安時，在「成都西安兩地望勿耽擱，一則求速，一則避嫌」。[70] 但在接到蔣軍可能進攻邊區的情報後，中共領導層商量之下，決定公開通電，揭露蔣「以武力進攻陝甘寧邊區，迫我就範」的陰謀。[71] 毛也連續發電，指示周路過西安時，當面向胡交涉，「設法轉圜，力求避免戰事」。他同時又指示周：「你們見胡一面，立即北行，勿稍延擱為盼。」[72] 周於7月9日抵達西安後，即根據毛的指示與胡宗南見面交涉，但卻未能「立即北行」，而是停留了一週，只因他和林彪又接到毛的指示：「胡宗南進攻部署已完成，請你們努力在西安設法轉圜，力求避免戰事。」[73] 他同胡宗南等會談、摸清了胡的底細後向毛進言，

「蔣令胡宗南準備進攻尚未進入行動階段」，延安方面不宜「刺激太甚」。[74] 這場國共之間的危機，也逐步緩和下來。

一路耽擱之下，一直到1943年7月16日，周恩來才回到延安。他馬上便感覺到，迎面撲來的是「紅都」政治生活中瀰漫着的一片「擁毛」的氣氛。周恩來的政治嗅覺何其敏銳，他立即採取行動，明確表達了對於毛澤東堅決擁護的態度。8月3日，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他辦的歡迎會上，說了下面這麼一段話：

> 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着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布爾什維克的路線！[75]

這番話在多大程度上是周恩來的肺腑之言？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話其實是他到達延安後對毛澤東的表態，也是他這些日子裏，甚至是這兩三年來不斷觀察和反覆思考後的結果。從後來的發展來看，這段話雖然沒有能讓他逃過整風中成為「靶子」、被嚴厲批判的磨難，但這樣的表態卻為他在整風中生存下來，並在此後繼續留在中共決策層核心，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更為重要的是，這番話也奠定了周此後幾十年間與毛合作及打交道的新基礎。

在此後的幾個月裏，周恩來大量閱讀了各種黨內文件，並根據自己的經歷，圍繞黨內自1920年代後期以來的幾次「路線錯誤」，以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寫出了一篇篇帶有自我批評性質的思想筆記，為直接投入整風並接受對自己的批判做準備。他遵照毛定下的調子，一再對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作了上綱上線的批判。[76] 在這個過程中，他應該讀到了包括直接對他提出嚴厲批判的毛的九篇文章。他也算是見過大世面的人物了，並有過種種生死時刻的考驗，但他可以感覺到的是，這次他將面臨一段讓他刻骨銘心的經歷。

其實，早在周恩來回到延安時，毛澤東便說過，這次批判周恩來，要用的方法是「一棍子把他打暈，再用一盆冷水把他激醒」。[77] 至於究竟怎麼做才算「一棍子打暈」？周恩來若非親身經歷過，恐怕很難想像得到。

從1943年9月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澤東主持下連續開會。毛發言時，又明確提出要批判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這裏，王明作為教條宗派的代表，差不多已被批透批臭了。從兩年前起，他就一直稱病，不再出席政治局會議。所以，儘管他從未認錯，但在毛和黨內上層許多其他人看來，他差不多已經是一隻死老虎了。追着打還是要做的，但已經不再是這次會議的打擊重點了。

至於批判經驗宗派，情況就不同了。在毛澤東看來，這還是一件需要花大力氣去做的事情。據胡喬木回憶，有人在會上提出，「王、博、洛、稼已在黨內沒有大的危險了，再來統治黨已很困難，但經驗宗派的危險還未過去，因此仍是危險的人物。」[78] 胡未指明這番話到底出自誰人之口，但要說這番話正是代表毛的想法恐怕並不為過。「經驗宗派」其實就是一頂為周恩來量體定做的「帽子」。周恩來在黨內是「做實事的人」，要批他的話，還有什麼比這頂帽子更合適呢？很顯然，周恩來已成為這一階段黨內高層整風的主要靶子了。

確實，整風批判矛頭之所向，正一步步向周恩來迫近。9月13日，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最重要的「打手」康生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言。他在談到王明的錯誤時，着重提出了「辦報」問題，並聚焦在《新華日報》上。他宣稱「新華日報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報紙，有很多反共言論，如說蔣介石是全面抗戰的，要時時、事事、處處幫助政府，這完全是投降主義思想」。[79] 其實，中共領導層中誰都知道，《新華日報》自創建後一直處於周恩來的領導與管轄之下，康生把《新華日報》罵成這副樣子，周自然難逃其咎。康生與周恩來的關係向來不錯，此時居然把周拿出來如此「說事」，若沒有毛澤東的預示及背書，是難以想像的。這是整風將要直接整到周恩來頭上的一個明確的信號。

自周恩來回延安後，蔣介石一再詢問他何時可以從延安返回重慶。毛澤東親自為代替周坐鎮重慶的董必武擬定回答：「可告國民黨，周在渝三年無事可做，暫時不擬出來，董被委以全權與彼方談判一切問題。」[80] 這就是說，周恩來一時半會是不會回重慶了。

七

10月10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決定，黨的高級幹部要「重新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和路線問題」，整風運動也將進入「總結和提高的階段」。[81] 周恩來作為黨內「經驗派」的代表人物，成了「重中之重」的批判對象。

從11月13日起，毛澤東主持了歷時三週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徹底清算「內戰中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兩條都同周恩來有關。除了繼續痛打王明這條「落水狗」之外，整風批判的重點終於轉到了周恩來的頭上。

周恩來為了準備做這次檢討，真是達到了嘔心瀝血的地步。11月15日，亦即政治局會議開始的第三天，他寫完了兩萬多字的提綱。從他上交的手稿來看，他遵照毛為整風運動定下的調子，給自己扣上了「經驗宗派的代表」和「教條統治的幫兇」的大帽子，並以「反毛奪權」為中心和主線，展開自我批判。任何問題，但凡他和毛有不同看法，或造成了不利於毛的後果，他就一定是錯的，就要自己給自己打板子。[82]

從11月27日起，周恩來連續五天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對自己在紅軍時期和抗戰初期所犯的反毛的「錯誤和罪過」，進行徹底清算和自我批判。關於紅軍時期，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給他扣上的「篡黨、篡軍、篡政」的帽子，[83] 以「篡黨篡軍篡政的計劃、實行和完成」為主線，敘述了自己或同自己有關的種種「不可饒恕的罪過」。他把自己在中央蘇區反毛澤東的過程概括為四個階段：「一、項英階段，取消肅反為最高峰；二、稼祥、弼時階段，蘇區黨大會（亦即贛南會議）為最高峰；三、周恩來階段，寧都篡軍為最高峰；四，博古、洛甫階段，五中全會為最高峰，篡黨篡政篡軍的完成。」[84]

關於第一階段，周恩來着重檢討了他在肅反問題上和項英沆瀣一氣，站到了毛澤東的對立面的錯誤。尤其是他到了蘇區後，首先就拿肅反擴大化開刀，整到了毛的頭上，更是莫大的「罪過」。第二階段，亦即從贛南會議到長汀會議的過程，毛一步步成了批評和批判的對象。周恩來作為1931年8月30日那封批毛信件的起草者，當然要對此擔責，這在周的自我批判中，成了又一個莫大的「罪過」。周的檢討中，把寧都會議當作自己反對毛

澤東之舉的「最高峰」，正是因為蘇區「批毛」這把火就是由他點起來的。儘管他在寧都會議上採取了「和稀泥」的態度，沒有在會上直接打毛，但他是批毛的始作俑者之一，又在會後取代毛成了蘇區的最高軍事領導人，罪莫大焉。從根子上看，他是絕對逃不過「罪責」的。

至於1934年1月的六屆五中全會，是在毛澤東已經全然失勢的情況下召開的。當時，博古已進入蘇區掌控大權，周恩來也沒有了先前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時那麼大的權柄。但是，周在檢查中，全然不談他在六屆五中全會上曾堅持讓毛進入政治局一事，反而集中大談自己參與排擠並「迫害」毛的罪過，不斷往自己身上潑髒水。

周恩來檢討中的另一重點，是在抗戰初期所犯的嚴重錯誤。他表示，這一「罪過」的實質，是以他為代表的「經驗宗派」和王明的「教條宗派」之間的合流：「這是第二次教條經驗宗派的結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確如毛澤東所說為陳(紹禹，即王明)、周(恩來)、彭(德懷)、項(英)。第一次結合是經驗投降教條，這一次要沒有周、彭、項的擁護，教條宗派是建立不起統治的，故名為教條宗派打天下，或開闢天下。」[85]

周恩來還根據中共「黨文化」中此時已形成的「慣例」，竭力從思想乃至靈魂深處挖掘起自己犯如此嚴重錯誤的根源：

> 我是個破產的封建世家子弟。這個家庭社會給我的(好虛榮)，包庇，愛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猥瑣衝動的劣根性並未很好剷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養，更增加我的黨內奴性、軟弱性，便成為我以後長期富有妥協性缺乏原則性的根源，同時又帶有破壞性。[86]

周恩來為了過整風這一關，並獲得毛澤東的真正諒解和信任，對自己的「嚴重錯誤」及「罪過」的講述，用詞可謂兇險，態度可謂謙卑，並不斷給自己上綱上線。然而，即便他給自己扣上了一頂頂政治上的大帽子，卻因為還沒有被「一棍子打暈」，依然不能輕易過關。與會者除了對周的政治路線和態度嚴加批判外，還對他的政治立場乃至品質，甚至對他骨子裏究竟是不是忠誠的共產黨人提出了質疑。毛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質問周，他何以會在從重慶被召回延安的路上，在西安停留時「完全是顧慮個人的安全而不敢對國民黨方面示強」，其中是否隱藏着「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玄

機。[87] 這樣的指責實在是荒唐到了極點，也是對周恩來的人格的極大侮辱。且不談周逗留西安其實是遵奉毛澤東的指示，單憑周長期駐節國民政府戰時首都重慶這一點來說，他若是真有「異心」，豈不可以就近直接向蔣介石本人表達「獻忠」之心，又何必捨近求遠，在從重慶返回延安的途中、逗留西安期間祭出這麼一番表演？然而，就連這樣的無稽之談也會在中共最高層級的政治局會議上出現，可見當時與會者為了將周恩來「一棍子打暈」，不擇手段，不講基本的邏輯與道理，已經達到多麼荒唐的地步。[88]

在連續批判周恩來的會議上，「跳得最高」、「罵得最兇」的一位，是在整風中黨內地位飆升的劉少奇。他對周「處處抓辮子」、「事事扣帽子」，把周說得一無是處，一副必欲置周於死地的面孔。[89] 只是，劉這麼做時恐怕沒有想到的是，二十年風水輪流轉，他做的這一切，居然成了毛時代黨內政治鬥爭的先例和傳承。到1960年代中期，劉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恰恰是他當年大肆「整周」的行為在另一時空條件下的翻版——只是，他後來的遭遇更為荒唐，結局也更為淒慘。

正當周恩來處於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百口莫辯的時候，毛澤東大概覺得，他已經接近於被徹底「打暈」，其實已經準備放他過關了。只是，毛還需要一個「契機」，一個讓他自己和周恩來都能順理成章地走下來的台階。恰在此時，莫斯科來了一封電報。1943年12月22日，原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以個人名義」致電毛澤東，表示「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使我感到不安」(其實，看到過這封信的人應該都知道，季米特洛夫在信裏表達的不可能只是他個人的意見，一定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他特別提出，「康生的作用令我感到懷疑」，以此間接但清晰地表示對整風運動的不滿。他接着談到了周恩來和王明，並明確表示：

> 開展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責他們推行共產國際建議的民族戰線政策，似乎他們正在把黨推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不應當使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孤立於黨，而應當維護他們，並盡一切辦法為了黨的事業而使用他們。[90]

這段話說得很重，季米特洛夫不僅將周、王相提並論，極力維護兩人，更把周恩來的名字放在王明的前面，可見莫斯科方面對於周的看重。

那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中共也不再是共產國際一員，所以毛澤東已不再需要唯莫斯科之馬首是瞻了。但是，他對於來自莫斯科的聲音還沒有達到可以全然忽視的地步。更何況，毛本來就並不準備打倒周，而只是要給周一個終身都不會忘記的教訓；同時，作為對於政治鬥爭之道越來越得心應手的高手，毛也完全知道做事情要適可而止。因此，收到季米特洛夫的來電後，毛澤東很快便做了一個順水人情，決定對周恩來和王明都予以解脫。然而，若對周恩來、王明兩人之後的實際境遇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不同了。周恩來已經對自己的錯誤有了深刻認識並做出了全面自我批判，將會重新回到原來的領導崗位上，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擁有實權。而王明則是頑冥不化，始終不肯、也沒有認錯，不但再也未能擁有任何實權，實際是在政治上被晾了起來。

毛澤東在給季米特洛夫的回信中，對周、王兩人也是區別對待的。對周恩來，毛澤東說的是好話：「我們同周恩來同志的關係非常好。我們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黨之外。周恩來同志有很大的成就和進步。」對王明，毛一點都不客氣：「王明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反黨活動。這一切都已經通報給黨的全體幹部。當然我們不想把此事向全體黨員群眾公佈。」毛還指責道：「王明是個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幾個人說他在獄中承認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分，之後被釋放。還有人說他同米夫有可疑的聯繫。王明進行了大量的反黨活動。」[91]

毛對周恩來、王明兩人「分別對待」的做法，也是給內心對他依然有不服之處的其他幹部的一種警告。

八

周恩來終於在「整風運動」中過了關。1944年3月3日至4日，他在延安中央黨校做了題為〈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的報告，以他從整風中得到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認識為基點，對六大及其涉及的各項問題作了界定與闡述，突出了毛在路線問題上的一貫正確。[92] 這其實是他在高層整風中終於「過關」的信號。

讓周恩來出來做這個報告，當然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當中也頗具深意。這正是毛的高明之處：在對周狠狠敲打一頓之後，又對他「給出路」，讓他重新回到黨的領導層並發揮所長，其中包括主持黨的統戰和外事工作。如此做法，也確定了此後幾十年間毛、周共事的一條基本路徑。

這之後，中共召開了六屆七中全會。會上，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中共歷史上自1920年代到延安整風前夕的所有問題，做了結論。自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共經歷了從陳獨秀右傾，到李立三、王明、博古左傾，再到抗戰初期王明等人右傾的一系列「機會主義路線錯誤」。正是毛澤東始終站在歷史的正確方向這一邊，不斷同「錯誤路線」做鬥爭，不僅挽救了黨，也把革命引向發展和勝利。[93] 儘管〈決議〉的文字並未明言，但在上述過程中，周恩來多次站在錯誤路線這一邊，則為不爭之事實。現在，中共領導層用正式決議的形式，把這一切肯定了下來。整風運動終於到了可以鳴金收兵的時候。

對於周恩來來說，在整風運動中這番近乎於被毛澤東玩弄於股掌之中的經歷，對他所產生的影響是長遠的，他終其一生須臾不敢忘記。雖然說，自長征以後他便日益心甘情願地接受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同時，他回延安參加整風時也做好了全力擁戴毛的準備，並在到達延安後馬上就用明白無誤的語言表達出來，但毛對他大打出手的做法仍然出乎他的意料，而到頭來又令他不得不在心悸之餘而對毛澤東的權威與權力全面服膺。從此，正如他後來不斷對下屬所叮囑的，他為自己和他們都立下了一條做事時務必牢記的規矩：「多做工作，經常檢討」。[94]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掌控政治權力和操弄政治權謀上將永遠不是毛的對手。而更重要的是，正是從毛那裏，他似乎找到了信念與理性上的某種永久的寄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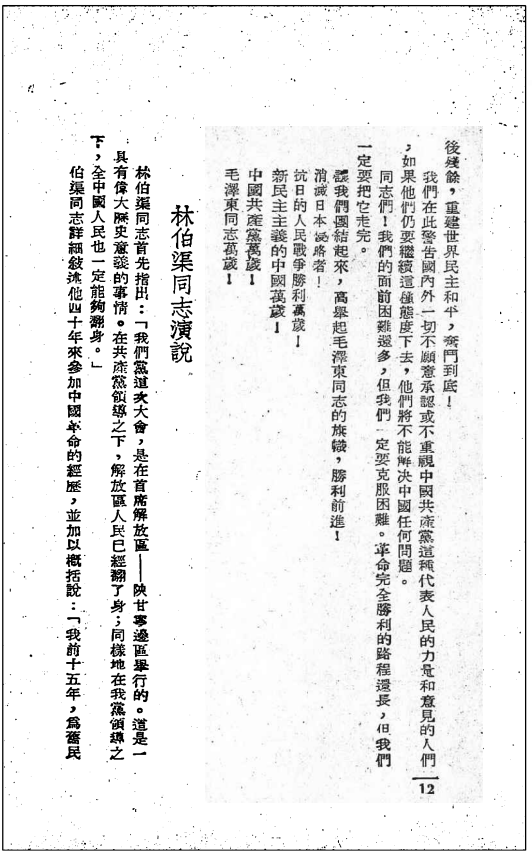
從周恩來的經歷中折射出來的，是經由延安整風而建立起的中共一整套「黨文化」的一些基本特質和要點。其中最重要的是，個人絕對服從組織，全黨絕對服從中央，中央絕對聽從最高領袖。由此而產生的，是革命以「領袖崇拜」(在中共則是「毛崇拜」) 為起點，已經為走向其初衷的反面打開了大門。人性的扭曲和「異化」，同領袖被神化結合在一起，成為「革命文化」和「黨文化」的核心部分。

在上述一切的形成過程中，周恩來是過來人，並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這一「黨文化」的催生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可以想見，周恩來在五天政治局會議上做那番痛苦乃至充滿屈辱的「檢討」時，他的心中絕不會沒有委屈，但他依然竭自己之所能，做了披肝瀝血的自我檢討和剖析。

這裏的可怕之處，並不在於周恩來（以及像他一樣經歷了延安整風的許許多多中共黨人）因此而失去了信仰；真正的可怕之處恰恰在於，他們通過整風，自以為建立起了一種新的信仰，但卻將本應屬於理想及信念範疇的信仰「人格化」及「世俗化」了，並在取消「自我」的同時，將它同對毛的崇拜和對毛的一切思想的服膺混淆了起來。

中國共產黨革命這一有着宏大願景及想像的事業，在這一時刻，也被縮小和矮化到了維繫於一人之身、歸結於一人之思想的地步。周和他的同志們以這樣的方式，將中國共產黨革命「合法性敘述」的最終界定權力，交到了毛澤東手中；而且當這種權力一旦無限膨脹乃至失控時，在機制的層面也沒有留下能夠加以制約的設計。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轉折關頭，革命之幸也同革命在更大意義上之不幸連接起來。革命勝利之日，也正是失去制衡的權力將會肆虐、革命最終走上岔道及走向反面之時。

但就當時而言，毛澤東要確保對自己手中巨大權力的掌控其實仍然是有條件的。這裏的一個關鍵點在於，在此後的歷史發展中，毛是否能夠「善用」此種權力，如他的同志們所希望的那樣，將中共革命引向勝利？是否能夠證明，自己確實配得上同這種無限權力聯繫在一起的「偉大領袖」的特質、屬性和地位？在這裏，一時之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毛失去制衡的權力的崛起提供了某種背書。對毛來說，一個基本的有利條件是，經過整風，中共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高度統一」，更具有「戰鬥力」了。毛躍躍欲試，要經由向國民政府的挑戰，奪取全國政權，來證明自己被授予這種巨大權力的正當性。經過整風之後，周恩來在黨內最高領導層的地位下降了。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舉行。他在開幕式上講話時，是在朱德、劉少奇、林伯渠、岡野進和他本人等幾位發言者中，唯一以高呼「毛澤東同志萬歲！」來結束講話的。他還提出，中共獲得成功及發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毛的領導：



周恩來同志演說

同志們！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逼近勝利的今天，我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地開幕了。我在此，預說大會的成功！

從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現在，已經過了十七個年頭。在這兩個大會之間的十七年中，我們黨經歷了國際、國內、黨內多次的重大事變，走過了千辛萬苦，艱難曲折的道路，終於鍛鍊成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也是一個很強大的很有能力的共產黨了。

我們黨現在有了一百二十一萬多黨員，已經大了三十多倍。在全國最重要的地區，都有了我們黨的組織，有了黨的報紙，有了廣大羣衆的聯系。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眞正羣衆性的政黨啊！

我們黨現在領導了中國解放區的九十一萬多正規部隊和二百二十多萬民兵，近千萬的人民自衛軍，而在六大時候，我們才只有散在各地的數萬農民游擊隊。經過這十七年的戰鬥，現在可以說，我們已經爲中國人民鍛鍊出一支永遠打不敗的人民的軍隊了。

我們黨現在敵後建立了十八個解放區，延陝甘寧邊區共十九個，解放了九千五百五十多萬人口，組織人民選舉了自己的民主政府共九百一十五縣。而在六大時候，我們才只有極少數幾個工農兵代表會議的縣區政府。經過這十七年的奮鬥，現在可以說，我們已經爲中國人民在大塊土地上，建立起政衆關係了。

還樣的黨，是怎樣鍛鍊成的呢？

後續餘，重建世界民主和平，奮鬥到底！

我們在此警告國內外一切不願意承認或不重視中國共產黨這種代表人民的力量和意見的人們，如果他們仍要繼續這種態度下去，他們將不能解決中國任何問題。

同志們！我們的面前困難還多，但我們一定要克服困難。革命完全勝利的路程還長，但我們一定要把它走完。

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起毛澤東同志的旗幟，勝利前進！

消滅日本侵略者！

抗日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澤東同志萬歲！

林伯渠同志演說

林伯渠同志首先指出：「我們黨這次大會，是在首席解放區——陝甘寧邊區舉行的。這是一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情。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解放區人民已經翻了身；同樣地在我黨領導之下，全中國人民也一定能夠翻身。」

伯渠同志詳細敍述他四十年來參加中國革命的經歷，並加以概括說：「我前十五年，爲舊民

圖12.1：周恩來在七大開幕式上的發言，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選》)

> 我們還是依靠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他指示了我們以新民主主義的方向，他教育了我們以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學說，他領導了我們經過中國革命三個歷史時期，創造了偉大的革命力量，經歷了無數次革命鬥爭，克服了無數次艱難困苦，達到了今天的初步勝利。[95]

4月30日，他又在七大做了題為〈論統一戰線〉的大會發言，除了繼續將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巨大發展的原因歸於毛澤東的思想和領導外，又就自己在處理同國民黨的統戰關係時，尤其是抗戰初期在一系列問題上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他說：當時「我們自己也有錯誤。就是說，當時在武漢做領導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內，着重在相信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打勝仗，而輕視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在戰爭上強調運動戰，輕視游擊戰」。[96] 本來，周在整風中受到批判的一大錯誤，就是統戰上的「右傾投降主義」。由他在七大上做這個報告，除了將他的「過關」昭示於全黨外，也表明統戰方面的事務，毛還是要他來管。

即便如此，周恩來的「舊帳」仍然沒有被忘記。在七大上當選中央委員的44人中，周恩來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得票數僅居第23位；而在後來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的13人中，他的中委得票數則是倒數第三(僅居於「教條主義者」張聞天和在黨內人緣一向不好的彭德懷之前)；在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五大書記中，周的中委得票數更是敬陪末座。[97] 對於這一切，周都泰然接受了。

周恩來這個人，本來就沒有什麼最高領袖欲。早在參加延安整風前，他已確立了一項將終生貫徹執行的處理自己在黨內領導地位問題上的準則：在毛澤東為最高領袖的領導體制之下，他絕對不會去覬覦黨的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只要毛澤東還在世，這個位置便是屬於毛的。

在經歷了延安整風之後，周恩來又為自己立下了另一條準則：從此之後，他也絕對不會去爭奪毛之下黨內第二號人物或毛的接班人的位置。在當時劉少奇已經崛起為黨內第二把手的情況下，在劉尚未失去毛信任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周恩來不僅擁毛，同時也擁劉。由此而定下的，則是周、劉之間可以共事，但關係並不親密的基調。劉之後，周對於毛定下的接班人或毛之下的二把手如林彪，也絕對支持和擁護。

周恩來深知只有這樣做，才符合自己的性格邏輯以及他所了解的自己的所長，也才能使得自己不至於在政治上再次陷入萬劫不復的險境。

第13章

在大國政治的漩渦中（1944–1946）

一

周恩來自1943年夏返回延安參加整風後，沒有馬上回重慶。1944年，他幾乎整年都在延安度過。他仍然是中共中央核心決策圈的一員，但比起前幾年來，他在黨內的權力和影響下降了，一時間似乎空閒了不少。

這一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第七個年頭。法西斯國家集團敗象日顯，第二次世界大戰逐漸進入「收官」階段。然而，中國戰場的形勢依然嚴峻，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遇到了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來最嚴重的挑戰。4月起，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失利的情況下，發動了「一號攻勢」（即豫湘桂戰役），企圖打通大陸交通線。國民黨軍隊一經接戰便潰不成軍，短短幾個月間就喪失了從北到南的大片土地，一批城市（包括自抗戰初期以來從未失守的長沙等）以及一系列重要交通線和交通樞紐落到了日軍手中。儘管這一切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軍的大批精銳之師當時正在緬北戰場與日軍激戰，但這仍對蔣本人和國民政府的信譽與權威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對於時勢的此種變化，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其實早已有所預料乃至期待。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國首腦在開羅會議上確定，對日戰爭結束必須以日本無條件投降並將東北、台灣、澎湖等歸還中國為條件。這是中國自抗戰以來，也是自19世紀中葉以來在外交上空前未有的大勝利。隨後，蘇、美、英三國首腦在德黑蘭開會，決定1944年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毛澤東判斷，開羅會議使得日本再難實現與蔣介石的妥協，蔣和國

民政府「可能招致日寇正面進攻之禍」，因而「時局於抗戰、革命是極為有利的」。[1]

其實，開羅、德黑蘭兩會開過後，「預料不久期內日寇必對華發動一全面之攻勢，以消除其後顧之憂」，也是蔣介石的判斷。[2]自1943年夏周恩來返回延安後，國共談判中斷。蔣一度考慮過「武力閃擊延安邊區中共」的計劃，「先搗毀延安匪巢，使之變成流寇，以期各個擊破」，[3]只因為顧慮到這會在國內外產生極為惡劣的影響，才未進一步實施。開羅會議前夕，蔣仍認為，「對共匪以不談方案，而以消極處之」。但他又擺出姿態對董必武說，請周恩來回重慶，因為「請他出來什麼都好談些」。[4]

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回國後，對於同中共重開談判的態度顯得積極了一些。1944年新年剛過，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郭仲容與毛澤東談話時，毛提到，中共「擬於周恩來、林伯渠、朱德中擇一人或三人同行」赴重慶，「晉謁委座請示」。之後，重慶方面回覆「甚表歡迎」。[5]毛澤東「觀察今年大勢」，已看到「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但估計「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6]因此，他不想馬上就讓周恩來出面。延至2月17日，毛通知郭，中共將派遣林伯渠於3月12日之後去重慶，會同董必武一道與國民黨方面談判。[7]同時，1944年1月18日，國民黨方面又由邵力子出面直接致電周恩來，請他赴重慶參加憲政實施協會二次全會。對此，中共領導人又決定先取緩兵之計。2月4日，毛澤東提出，林彪、周恩來擬先後去。2月9日，周覆電邵請假，不參加2月27日的憲政座談會。[8]

但周恩來心中仍然覺得，這實際上是中共的一個機會，應當參與。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周發言時說：憲政運動並非國民黨的發明，而是「先開端於中間黨派，後來有地方實力派參加，……國民黨現又提出憲政運動，是為了取得民主的政治資本來掩護黨治，對付我們，束縛我們」。周認為，中共面臨此種局面不可退縮，而應當「參加憲政運動，表示我們要從政治上解決問題，另方面也影響中間派」。[9]中共領導層當時未採用此議，而是決定由周恩來就憲政問題做講話。3月12日，周在延安紀念孫中山逝世19週年的大會上發表〈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的演說。他說，中共希望以憲政方式解決國共爭端，但要實行憲政，就要首先做到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開放黨禁、實行地方自治等。作為第一步，國民政府

應當承認中共在全國的合法地位，並恢復新四軍番號。[10] 這是周恩來的一次重要亮相，也是他經歷整風後在中共決策圈內地位與影響回升的信號。

4月15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國共關係及與國民黨談判問題，周恩來亦出席並在會上發言。他提出，鑒於「國民黨現在對我們主要採取政治鬥爭」，中共對國民黨主要也要採取政治鬥爭，「目前還是求和緩」，「表示我們是要同國民黨合作」。同時，應要求國民黨「停止進攻我軍，停止在大後方捉人、殺人，停止封鎖我們」，並「實現憲政上的民主自由，開放黨禁和地方自治」。毛澤東對周的看法「心有靈犀一點通」，當即表示，在當前局勢下，中共「這次總的態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們要想求緩和，……使他們不感覺我們威脅他們」。毛還接着周的話頭說，「對中間派主要是宣傳民主，爭取他們的同盟。對英美主要是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人常駐陝甘寧邊區」。[11] 周、毛這一番對話之間，中共進一步抓住了「民主」和「民族」的旗幟，同蔣介石和國民黨展開政治鬥爭時高舉這兩面旗幟的一套大戰略已被勾勒出來。

二

4月18日，上述政治局會議後僅三天，日軍發起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為目標的「一號攻勢」，國民黨部隊隨即顯出全線崩潰之勢。至5月上旬，日軍已打通了平漢鐵路。尤其令國人震驚的，不僅是國軍毫無戰鬥力，更是國軍將領處處表現出的腐敗和無能。各界及輿論對國民政府及國軍的嚴厲批判，如潮湧般而來。毛澤東是大戰略家，從來就有大戰略的眼光，面對「一號攻勢」後的時勢變化，他豈能不馬上抓住。他知道，中共以新的政治和軍事戰略調整來抓住機會、應對挑戰的時刻已經到來。對周恩來來說，時局的巨大變化，也為他重新回到中共核心決策圈提供了新的機會。

在上述背景下，毛澤東和中共的一個大手筆，是提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口號及設想。本來，毛對於由「國民黨提出的憲政運動」並沒有多大的興趣。說到底，在他看來，蔣介石及國民黨一心指望實行一黨執政，對「憲政」的興趣只是停留於做表面文章，中間派又沒有多少政治實力。他同意「參與憲政」之議，也只是在周恩來影響下，出於「影響中間派」及表明

「政治上解決問題」態度的策略考慮。1944年春夏之際國內外形勢的持續轉變，觸動了毛政治上敏感的神經，為他及中共全面接過「憲政」的口號，提出一系列新的政治主張創造了新的環境。

5月4日起，國共談判恢復舉行。中共方面，周恩來未出面，而是由林伯渠接手並會同已在國統區的董必武等，先在西安、再轉回重慶和國方代表舉行談判。會談開始後，國民黨方面的代表張治中等要求林伯渠等提出「解決目前僵局之方案」。林回應道，中共的方案，去年周恩來、林彪已提出過了，唯未獲得國民黨方面的答覆；又說，國共商談可以以周恩來〈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演說的基本精神為根據。[12] 5月中旬，會談轉回重慶舉行時，正逢蔣介石與國民政府方面經歷河南慘敗之際，內外各種矛盾畢露，威信大損。毛澤東隨即在黨的領導層內提出，「要準備應付將來的大事變」。[13] 他對國共談判也有了新的想法，不願再按照先前由周恩來曾向國民黨方面提出過的條件為基礎來出牌。從5月下旬起，尤其是5月25日洛陽陷於日軍之手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林伯渠等在談判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條件，包括「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等。在中共軍隊的整編上，也大大加碼，變為增編為16個軍、47個師。[14] 中共提出的新條件如此激進，以至於張治中、王世杰等國民黨談判代表「拒絕接受」，更不肯向蔣報告轉達。[15] 但林伯渠等人在這裏所表述的，其實還只是中共新的談判底線，此後隨着國民黨部隊在戰場上一敗再敗，中共的條件，尤其是對「民主尺度放寬」的訴求，也一再加碼。到8月，周恩來在給中共談判代表的一份電報中提出：應考慮「提前召集各黨派及各界團體代表會議，改組政府，然後由此政府召開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討論反攻，實行民主」。毛澤東在周的電報下批註道：「應先召集黨派及團體代表會，改組政府，方有召集民選國大之可能。」[16] 此時，聯合政府的方案其實已經呼之欲出。9月15日，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發言時，正式提出了「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的主張。[17]

與此同時，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又深知，「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國共之間的鬥爭，說到底，恐怕還是要在戰場上見分曉。在5、6月間舉行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毛提出，要建立強大的軍隊和根據地，並把佔

領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任務「提到極重要地位」，為大決戰的到來做好準備。[18] 在鞏固擴展各根據地的同時，從1944年中開始，中共便指示各地派出有力部隊開闢新區，包括把游擊戰發展到滬、杭兩大城市周圍及滬寧路兩側，使之處在「我們游擊戰的緊緊包圍之中」。[19] 當年秋天，中共領導層又決定抽調精銳部隊組成南下縱隊，深入到長江以南各地區開闢新的根據地。[20] 對毛和中共領導層來說，這是他們為準備戰後同國民黨的全面對峙而走出的一步戰略上的大棋。

在這一形勢轉折的關頭，除了上述動作外，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還將注意力轉到外交上來。對於中共來說，這是一個過去涉足不多、但在新形勢下必須更多進入的領域。後來看，這也為周恩來在經歷延安整風後重新回到黨內決策的最核心圈子，發揮自己之所長並獲得更大的發言權，打開了一扇大門。

隨着國民黨部隊在日軍攻勢面前一再潰敗，國際上影響極壞。羅斯福總統等美國最高決策者從自身戰略利益出發，對此極為關注。蔣介石和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將軍的關係本來就嚴重不和，此時也更形緊張。史迪威於1942年來中國，擔任盟軍中緬印戰區參謀長。他和蔣介石經歷了一段短暫的蜜月之後，關係逐漸從冷淡走向相悖，又達到了相互厭惡的地步。蔣介石指責史迪威無視他作為盟軍中國戰區統帥的權威，而史迪威則對國民政府的腐敗以及蔣本人在軍事指揮上的無能頗為不齒。看到國民黨部隊在日軍「一號攻勢」前潰敗，史迪威在給羅斯福總統的報告中，充滿着對蔣和國民黨的批判以及對中國軍事形勢的憂慮。史迪威並不親共，但從軍事上的需要出發，他有了同中共合作的想法。[21]

為了了解中國局勢並促使蔣介石實行改革，1944年6月，羅斯福總統決定派歷來「左傾」的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訪問中國。在重慶的三天時間裏，華萊士同蔣共舉行了六次會談。蔣「力述中國共產黨宣傳之虛偽」，還說「中共確以共產國際為背景」，並要美國「對中共問題表示冷靜」。但本來就有「親蘇」傾向的華萊士，反而接過了蔣的話頭，說「中共問題既有蘇聯背景，中國似宜早與蘇聯直接懇談」。他敦促蔣改革政府，並實現國共聯合。他還提出派遣美國觀察組去延安，蔣同意了。[22]

所有這一切，中共方面都看在眼裏。華萊士剛剛踏上中國土地，延安《解放日報》便於6月23日發表歡迎社論，大談羅斯福之「四大自由」已在解放區實現，而國民黨卻「箝制輿論」、「統制思想」，中共則要求「廢止獨裁、實行民主」，並希望華萊士能夠「幫助中國人民促進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23] 7月4日，延安舉行了慶祝美國獨立168週年的紀念會議。周恩來在會上發表講話，對美國民主以及美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精神讚不絕口。[24] 這是他的又一次極為重要的外交亮相。7月28日，一個由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上校任組長的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中共表示熱烈歡迎。毛澤東還親自修改《解放日報》題為〈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其中「戰友們」三字是毛特地加上的。[25] 周恩來也頻頻出面，同包瑞德上校及觀察組成員見面、交談。[26]

8月16日，南方局的一份〈對外交的意見及對中央的建議〉送達中共中央，詳盡分析了蘇美英三大國、尤其是美國的對華政策。報告認為，美國固然「不滿意蔣的法西斯傾向及抗戰不力」，對中共「也懷着很深的戒懼」。但美國「要在海上和陸上完全擊敗日本」，就會「需要聯合中共領導的堅決抗戰力量」。報告建議，中共應指定專人研究國際外交問題，要在財產制度、國際貿易、宗教信仰、民主自由等問題上，「給予明確回答」。同美國人接觸時，要照顧他們的生活方式、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搞好個人關係；爭取「在現實已經造成不能否認時」，美國被迫承認「中共成為中國政治中心」。[27] 周恩來回延安參加整風前，曾長期主持南方局。南方局的工作班底，尤其是外交，完全是由他搭建起來的。他雖然並未直接參與這份文件的起草，但文件中的看法卻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的思路和想法。

兩天後，中央發佈了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這是中共領導層首次專門在外交事務上向全黨發出的綱領性文件，就中共整個外交政策、尤其是對美國政策的目標和手段，作了界定和闡述。指示提出，中國國內外形勢正處於大變動的前夕，黨必須為這種變動做好準備，而外交事務則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應當將統戰工作的經驗運用於外交工作，並將對美國的工作當作全部外交工作的重點。這是因為，比之蘇聯和英國，美國更為深入地捲入了中國的抗戰，黨因而需要給美國以更大的重視。指示強調：

> 如果大家承認八年來國內統戰政策，曾經給我們以極大的發展，那麼，今後國際統戰政策，將可能給我們以更大的發展。而且如果國際統戰政策能夠做到成功，則中國革命的勝利，將必增加許多便利，這是可斷言的。[28]

8月23日，毛澤東和周恩來一道，會見來訪延安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John S. Service)。毛表示：「中國必須實現工業化。而在中國，只有通過自由辦企業以及來自外國資本的援助才能夠做到這一點。中國和美國之間有着互相關聯並相似的利益。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這些利益是互相契合的。我們可以也應當一起工作。……美國將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好合作。我們不怕美國民主的影響——我們是歡迎這種影響的——美國也不必害怕我們會不合作。我們必須合作；我們必須得到來自美國的幫助。」毛還花了大量時間對蔣介石的國內外政策提出嚴厲批判，中共不但在政治上比國民黨更為民主，也在軍事上更具有效率和戰鬥力。他告訴謝偉思：「我們共產黨人認為十分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你們美國人在想些什麼，有什麼打算。我們不能貿然反對你們，不能貿然和你們發生衝突。」這時，周恩來插話道：「對於美國來說，贏得中國抗戰的決定性勝利而又避免內戰的唯一辦法，是既支持國民黨，又支持共產黨。」之後，周恩來又幾次會見謝偉思，告訴他中共正在準備民主改革及建立聯合政府的方案。[29]

毛澤東、周恩來說的這些鼓吹民主以及對美國友好的話，是不是他們及中國共產黨人真實思想的表露？他們是否真的準備將這些想法轉變為中國戰後建設的大政方針？或者，這只是他們「逢場作戲」的政治表演？任何成功的外交政策，在實施層面永遠都帶有表演的成分。最為成功的外交官也多多少少會有着演員的素質，何況學生時代當過演員的周恩來？歸根結柢，外交活動需要自己的舞台。將毛、周這些關於中國戰後國家建設及民主訴求的表述，當作中共在這些問題上的基本看法，或者當作徹頭徹尾的「欺騙」行為，都是不可取的。說到底，以在野之身講民主、爭自由是容易的，甚至是必須的。關鍵在於，當在野之身變為在朝之尊時，是否還容得了「民主」和「自由」? 其要害之所在，則是對於「權力」、尤其是最高權力的制衡。

若從效果來看，毛澤東、周恩來的上述動作顯然是相當有成效的。中共在國內政治話語主導權的爭奪中，抓住了「民族」和「民主」這兩面重要的旗幟，尤其是將「民主」、「自由」的話語權掌控於自己的手中，迫使蔣介石和國民黨處於守勢。他們的話，謝偉思多半聽進去了。包括謝偉思、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在內的美國外交官發回美國的報告中，中共被描述為首先是民族主義者（在一些報告中，甚至將中共視為民主主義者），然後才是共產主義者，而他們關於民主的看法和追求「是真誠的」。[30]

三

就在中共與美方關係發展的同時，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矛盾卻愈演愈烈，並終於升級為激烈的直接衝突。經史迪威反覆提議，7月6日，羅斯福總統向蔣介石提出，必須授予史迪威指揮包括中共部隊的所有中國軍隊的「全部責任和權力」，否則「我們的共同事業將遭受嚴重挫折」。[31] 蔣介石意識到，這個「提議」包含着對於自己權威、政治權力以及軍事指揮權的巨大挑戰。但他覺得，不宜同羅斯福正面對抗，在「拒絕、接受與緩和之三種方針」中，「乃決以緩和處之」。[32] 於是，他一面同意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一面又要求「有一準備時期」，並要求羅斯福派遣一名「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權代表」，來幫助「調整」他和史迪威的關係。[33]

8月18日，羅斯福總統決定派遣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以他的私人代表的身分到中國，處理蔣史矛盾並調停國共關係。[34] 中共領導層對此極為重視。周恩來意識到，這對中共進一步發展同美國的關係既是挑戰，又是一個重要的機會。9月8日，他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其中提出要利用赫爾利來華的機會以及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的影響，「向史迪威、赫爾利、納爾遜提出援助我們的必要，請董必武代表中共及軍隊表示歡迎赫爾利等來延安，並在適當的時候向他們正式提出說帖」。[35]

赫爾利是軍人和政客，不是職業外交官。他來中國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證中國能夠在太平洋戰爭階段起到牽制日軍的更大作用。這之前，他先去了莫斯科，蘇聯外長莫洛托夫（Vyacheslav M. Molotov）告訴他，中共只是「自稱為共產主義者」，蘇聯不支持中共，而「支持美國為中國的統一提

供幫助」。[36] 當時，美蘇戰時盟國關係依然顯得相當牢固。赫爾利因而覺得，只要蔣同蘇聯搞好關係，解決中共問題應不是難事。9月7日，他和蔣首次見面。隨後，他向蔣提出「改造中國」的十項建議，表明擁護蔣統一中國軍隊，並支持蔣「在民主的基礎上」達成政治的統一。[37]

這時，蔣介石鑒於與史迪威之間的衝突已鬧得不可開交，終於決定攤牌。9月24日，他召見赫爾利，稱「國家和個人人格不能侮辱」，要求羅斯福總統召回史迪威，另派一位「富有友誼和合作精神」的軍人到中國戰區任職。[38] 赫爾利將他調停國共關係之事同蔣召回史迪威的要求聯繫起來，向蔣提出，要同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代表見面，並訪問延安。蔣同意了。同時，赫爾利也向羅斯福總統進言，美國對華政策的重中之重是保持中美之間的戰時合作，而蔣介石則是中心人物。他建議羅斯福總統召回史迪威，並以這一決定換取蔣對政府和軍隊的改革。[39] 羅斯福反覆權衡利弊之下，最後於10月18日宣佈從中國召回史迪威將軍。

10月17日，赫爾利在重慶約見林伯渠、董必武。赫爾利說，他和他們談話得到了蔣介石的許可，蔣也同意讓他在必要時訪問延安。[40] 四天後，蔣交給赫爾利一份國民黨方面解決中共問題的方案。赫爾利讀後，覺得蔣所提條件過於苛刻，又同蔣交涉。[41] 11月7日，蔣將修改後的五點方案交給赫爾利，其中根據赫爾利的要求，將國共雙方均承認蔣為「所有中國軍隊的統帥」改為「中共軍隊服從並執行」中央政府命令；同時，強調「中共軍隊經中央政府改組」。[42]

11月7日，為處理國共之間的關係問題，赫爾利飛抵延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到機場迎接。第二天起，他同毛、周就解決國共政治爭端舉行進一步會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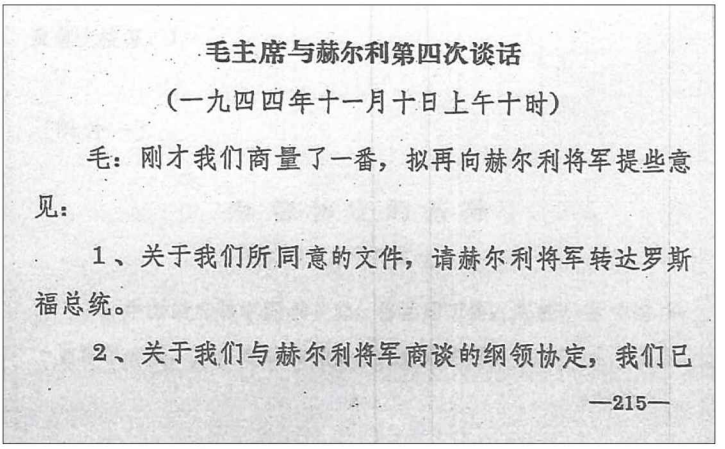
周恩來同美國人打過不少交道，很懂得如何對付赫爾利這位在外交事務中(尤其是在與中共這樣的對手打交道上)尚屬新手的美國人。他和毛在同赫爾利談話時均使出渾身解數，強調中共擁護民主並贊成民族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的政治哲學；中共所要爭取的是在中國建立一種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亦要為抗戰的勝利作出貢獻。同時，他們嚴厲譴責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獨裁及腐敗。[43] 他們用的是美國人的話，賣的是中共的貨。

經兩天會談之後，赫爾利與中共領導人達成了五點協議。中共同意加入聯合政府，國民政府則將實行民主改革，並將所有中國軍隊置於新建立的聯合軍事委員會指揮之下。[44] 赫爾利對此相當滿意。在他看來，這五條的「基本原則幾乎全部是我們的」。尤其是，聯合政府不僅符合民主原則，也絲毫無損於蔣的領袖地位。[45]

但實際上，毛澤東、周恩來關於「聯合政府」的定義和赫爾利是不同的。在赫爾利看來，中共領導人承諾了參加聯合政府，而這一政府將由蔣領導，那它就會增強國民政府的合法性及統治基礎。而根據毛、周的看法，「聯合政府」應是對於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分權和制約，「五點協議」也意味着向蔣介石的「一黨專政」提出挑戰，並進而走向中國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組合。當時，周其實已經預見到，赫爾利在蔣那裏會碰到困難。11月9日，他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報告同赫爾利會談的情況說：蔣認為我們參加政府和成立聯合政府是有區別的，赫爾利則將二者混而為一，所以以為蔣不至於為難，估計蔣必定會對這次會談做出的協定提出修改。[46]

11月10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同赫爾利舉行最後一次會談。毛告知赫爾利，五點協議在前一晚已獲中共中央批准，請赫爾利將這一協議轉交羅斯福總統。赫爾利表示：「還是由毛主席寫一封信給羅斯福總統。我很願意設法使毛主席和羅斯福總統商量問題，這樣可使全世界承認毛主席的地位。」毛問：「但羅斯福總統是否願意接受我的信件？」赫爾利答：「我可以擔保羅斯福總統一定樂意接受毛主席的信件。」毛說：「我可以寫一封信給羅斯福總統，請你轉達。」毛說，他本人不能陪同赫爾利回重慶，「我們派周恩來和你同去。因為估計對於很多細節，蔣先生會有意見，周同志在那裏，可以和赫爾利將軍一道幫助談判」。[47] 當天，毛澤東就寫了一封給羅斯福的信，並請赫爾利帶走。他表示，中共熱切希望與美國合作，他本人也願意訪問美國，同羅斯福總統會面。[48]

11月10日下午，周恩來陪同赫爾利飛往重慶。這是周離開重慶一年多後首次回到陪都。果然不出周之所料，蔣介石看到赫爾利帶回的「五點協議」後，馬上意識到中共對他的「領袖」權威以及國民黨一黨執政的格局提出了挑戰，因而堅決反對。起初，赫爾利搞不懂這是怎麼回事，反而對蔣產生了不滿，還就此向羅斯福總統彙報。羅斯福指示赫爾利以他的名義



毛主席与赫尔利第四次谈话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时）

毛：刚才我们商量了一番，拟再向赫尔利将军提些意见：

1、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

2、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纲领协定，我们已

—215—

毛：但罗斯福总统是否愿意接受我的信件？

赫：我可以担保罗斯福总统一定乐意接受毛主席的信件。特别毛主席剛才所說的話，可以写进去，罗斯福总統看了一定会很高兴。

毛：你的心，罗斯福总统的心，我们的心，都是一致的。

我可以写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请你转达。你是否可以复一封信给我？

赫：我愿意和你交換信件。我給你的复信，将說明接到你的信并致謝意。

（十日上午十二时四十五分毛主席与赫尔利在文件上签字，并交換信件。赫尔利少将于下午二时乘机离延，同行者有周恩来同志及包上校等。）

圖 13.1：毛澤東和美國特使赫爾利的第四次談話，1944 年 11 月 10 日。（中央檔案館）

向蔣施加壓力，要蔣同中共妥協。[49] 但蔣就是不肯讓步，並反覆對赫爾利說明，這是中共的陷阱。最後，他說服赫爾利向中共轉達「三點建議」，其中要求中共將交出軍隊當作加入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第一步，並堅持國民政府應由國民黨一黨主導。[50]

11月21日上午，赫爾利會見周恩來，宣讀了蔣介石的覆案，並做了一番解釋，又說：現在看來，也許他們這個建議才是談判的基礎。周恩來看來早有準備，當即表示，蔣讓中共參加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僅為掛名，毫無實權，根本沒有改變國民黨一黨專政。他指責赫爾利背棄了自己在延安簽訂的協議，並表示要立即離開重慶回延安。[51] 當天，周將同赫爾利會談的情況報告延安，毛在電文上批道：「黨治不動，請幾個客，限制我軍。」[52] 幾句話，就捅到了國共雙方分歧的要害。

第二天，周恩來和董必武會見了蔣介石。蔣以政府的尊嚴不能損害為由，拒絕中共改組政府之議。周駁道：政府是內閣，並非國家，不稱職，何以不能改組？兩人話不投機，這麼一次重要的談話，半小時就結束了。[53] 周走後，蔣大為感慨，在日記中記道：「昨晤周恩來，見其體態驕肆，已不如從前之敬慎矣。」[54]

這之後，周還想擬定一個針對蔣案的覆案，「以要求建立解放區委員會來逼蔣同意成立聯合政府」。11月29日和30日，他就此連續致電毛請示。[55] 12月1日，毛覆電要周不要過早將覆案交對方，而「應堅持五條協定，待七大開後再議覆案」。他還指示：「請周、董同時回延，並告赫爾利周不能原機返渝。」[56] 這分明是告訴赫爾利，他的調停要失敗了。

這時，正逢羅斯福總統任命赫爾利為駐華大使。此後幾天，赫爾利還想拼命挽回局面，再三請中共「務必參加國民政府」。周不為所動，回答赫爾利的就是一句話：中共若這樣參加政府，「不過是做客，毫無實權」；又說，「政府不改組，就無法挽救目前的時局」。[57]

12月7日，周恩來和董必武一道，與美軍觀察組包瑞德同機從重慶飛回延安。第二天，他致電赫爾利表示政府不改組，他就不會回重慶。但同時，他又沒有把門關死，說中共仍願繼續同美國磋商軍事合作的具體問題，並同美軍觀察組保持密切聯繫。[58] 同一天，在周恩來陪同下，毛澤東和包瑞德談話時說，五點建議已是中共對蔣讓步的底線，若走不通，中共

就會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為組成一個獨立的政府作準備。[59] 毛的話顯然也是說給赫爾利聽的，目的看來是通過包瑞德來牽制赫爾利。

赫爾利還在訪問延安時，毛澤東就曾給羅斯福總統寫信，提出了親自訪問華盛頓同美國決策者、尤其是同羅斯福總統會晤的設想，此後，毛、周等又試圖繞過赫爾利，通過美軍觀察組同華盛頓及羅斯福總統建立直接聯繫，以提出中共的政策訴求。可是，他們沒有得到華盛頓方面的任何直接回應。[60]

12月21日，赫爾利致電周恩來，敦促他返回重慶。第二天，周恩來為毛澤東起草回電，表示國共兩方方案差距實在太大，以毛的名義拒絕了赫爾利的邀請。[61] 赫爾利一計不成，又生一計。1945年新年剛過，他就致電毛、周，建議國共兩黨在延安會晤，他也參加。毛澤東回電：這種會議不會有任何結果。[62] 即便一再吃閉門羹，赫爾利依然不屈不撓，又於1月20日寫信給毛澤東，說蔣已有改變，請周恩來回重慶恢復談判。[63] 這一次，中共出於不願同赫爾利和美國太過「鬧僵」的考慮，決定讓周恩來回重慶，繼續與赫爾利周旋，並與國民黨談判。

但周恩來心裏其實很明白，這次的談判照樣是談不出什麼名堂的。果然，雙方的討論又在先改組政府還是先整軍的問題上卡住了。2月13日，周恩來同蔣介石會見，赫爾利亦出席。蔣態度強硬，說話「聲色俱厲」，一口咬定國民黨只能還政於未來的國民大會，決不能把權力交給中共要開的「黨派會議」這樣的「分贓會議」。他還指責中共主張的聯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以及他本人。周也「怒不可遏」，對蔣逐條駁斥，兩人「激烈爭吵」。[64] 在周與蔣以往的交往中，還不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會後，周決定立即返回延安。15日，周發表聲明，公開指責國民黨政府堅持一黨專政，反對民主的聯合政府，導致國共談判毫無結果。[65] 第二天，他飛回延安。

四

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此時決定對蔣及赫爾利採取強硬立場，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毛相信國際形勢正朝着有利於中共的方向轉變。隨着蘇聯紅軍在歐洲戰場迅速推進，蘇聯在遠東參加對日作戰的可能性也不斷增大。

同時，毛、周也相信，美國要實行對日戰爭計劃，就需要繼續得到中共在後勤支援等方面的幫助。1945年2月初，斯大林通知毛澤東，蘇、美、英三國首腦將在雅爾塔舉行峰會。毛得知這一消息時的判斷是：「蘇聯參與東方事件可能性增長」，而「美蔣均急於和我們求得政治妥協」。[66]

然而，當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於2月4日至11日在雅爾塔會晤時，事情卻並沒有朝着毛想像的方向發展。關於中國，斯大林和羅斯福做了一場交易。斯大林同意，蘇聯將於對德戰爭結束兩到三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並不在中國的內部鬥爭中支持中共，而是承認蔣介石為中國的唯一領袖；作為交換，羅斯福同意，讓外蒙古「保持獨立」，並由蘇聯獲得沙俄在日俄戰爭中喪失的領土以及中東鐵路、旅順港和大連等在中國東北的特權。2月11日，包括上述內容的「雅爾塔秘密協定」由三巨頭簽署。[67]

會後，羅斯福在蔣介石的一再追問下，於3月中旬將會議關於中國的秘密協議一節告知了蔣介石。蔣雖感「痛憤與自反」，並發問道：「雅爾塔果已賣華乎？」，[68]但他又覺得還有時間和機會同蘇聯方面在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上談判和討價還價。而斯大林這一邊，卻沒有對中共做同樣的通報。而毛、周等中共領導人，由於不了解雅爾塔密約的內容，在制定內外政策時，仍以蘇聯參加對日戰爭將大大增加自身實力地位為前提。

此時，赫爾利回美國述職。4月2日，他在華盛頓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美國政府支持國民政府，「而不是中國任何武裝的軍閥和武裝的政黨」。[69]毛和中共領導層立即予以憤怒的反擊。4月5日，新華社發表了題為〈我們的堅定而明確的態度——評赫爾利將軍談話〉的文章，對赫爾利提出嚴厲批判。毛澤東批示：「重慶此件很好。」[70]

4月4日，蘇聯宣佈廢除1941年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兩週後，毛澤東在一份黨內指示中，以肯定的口吻說：蘇聯參加對日戰爭已為期不遠，遠東形勢也將因此發生重大變化。今後，中共軍隊將配合盟國作戰，主要是配合蘇軍作戰。[71]

這樣一來，中共實際上捲入了大國之間的政治角逐。然而，後來的發展表明，大國政治的險惡及複雜性遠遠超出了毛、周等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這個從山溝裏出來的「土包子」——的想像。在中國國內，國共兩

黨為爭奪戰後中國政治主導權的競爭也進一步緊鑼密鼓地展開，雙方都希望在戰後的政治和軍事角逐中佔得上風。

從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角度來說，在抗戰過程中，中國面臨着巨大民族危機的時刻，蔣作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領導抗戰，很自然地為他的領袖地位贏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1943年後，美英等國先後廢除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又將中國包括進同盟國「四大國」之列，並邀請蔣介石參與開羅會議關於戰後世界安排的討論，更加強了蔣在國際上的政治影響力。即便國軍面對日軍的「一號攻勢」遭到慘敗，蔣介石仍然清楚地表現出由自己在戰後完全主導中國政治前途的意圖。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在開幕式上說：「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於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國外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只有消滅中共，才能達成我們的任務。」[72]

就在國民黨六大召開的幾乎同時，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於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舉行。後來，毛澤東一直把這次大會稱為整風運動後全黨達成「空前團結」的大會。大會通過的黨章寫入了毛澤東思想，將之列為黨的指導思想。周恩來在會上發言時強調，中共獲得成功及發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他是大會開幕式上發言者中，以高呼「毛澤東同志萬歲！」來結束講話的唯一一人。[73]

中共七大也是一次動員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做了以〈論聯合政府〉為題的政治報告，提出了通過同蘇聯紅軍合作，使中共成為戰後中國的政治主導力量，「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戰略計劃。[74] 在論及中共所面臨的國際形勢時，毛指出，美國現在是聯蔣抗日拒蘇反共，企圖全面獨霸東方。但蘇聯的援助也將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到重大作用。他一面說，中共要「學會自力更生，準備沒有（國際）援助」，但一面又強調說：「最後講，國際援助一定要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75]

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來說，抗戰的最大成果在於八年來，中共的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實力都迅猛發展，周恩來此前對此有過估算。1944年10月，周恩來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敘述了中共的軍事和政治實力。他宣稱，中共已有正規軍57萬，民兵200萬，「幾已達到國民黨現有部隊的相等數目」；同時，還在敵後建立了591個縣政權，「幾已達國民黨政府失去的721

縣的百分之八十二」。[76] 中共既然已具有如此強大的實力，當然絕不會允許蔣在戰後重建國民黨一黨專制的統治。毛因而充滿信心地說：「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這個準備一定要有。」[77]

在七大上，周恩來圍繞着統一戰線問題作了長篇發言，這是會上的一場重頭戲。周詳細回顧了中共和國民黨關係的發展歷史，並總結道，從大革命時期的統一戰線到抗日統一戰線，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中共是否掌握領導權以及團結誰、反對誰的問題。而中共黨內的各種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都在這上面走錯了。中共提出的聯合政府的主張，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政權上的最高形式」，中心仍是中共要掌握領導權。周還說，他自己就在統一戰線上「犯了不少錯誤」，要「看到錯誤的嚴重性」。[78] 周的講話，既是對自己在整風運動中受批判的又一次表態，又點明了七大作為中共「把中國拿下來」的動員大會的主題。

國共兩黨各自召開這兩個大會時，兩黨領導人都認為，抗戰不會在短期內結束，他們因而也還有相當的一段準備時間。6月16日，周恩來在為中央起草的一份指示電中對形勢的估計是：「對日戰爭，今年尚不能達最後決戰階段，明年可能有大變化。」[79] 遲至8月4日，毛起草的另一份指示電中仍提出：「估計日寇明冬可能失敗，還有一年時間供你們作準備工作，你們必須在這時間內準備一切，對付必然要到來的內戰局面，方不至臨事張皇遭受挫折。」[80]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這一方面，自獲知羅斯福和斯大林在雅爾塔達成密約後，就開始同蘇聯進行談判，但雙方在外蒙古獨立、蘇聯在華「權益」以及蘇聯是否保證承認蔣為中國唯一領袖並停止支持中共等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7月中旬，蔣的談判代表宋子文在莫斯科和斯大林的談判中斷。[81] 顯然，蔣對於抗戰結束在即的前景也沒有足夠的估計和相應的緊迫感。

五

毛澤東、周恩來關於抗戰結束時間的判斷，同蔣介石的判斷一樣，很快便被證明是誤判。德國於5月初無條件投降後，東方戰局的轉變真是

迅雷不及掩耳。7月27日，盟國發出了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紅軍隨之大舉進入東北。這個仗，日本人再也打不下去了。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親自出面，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歷時八年之久的中國抗戰，以令人目眩之勢宣告結束。

8月9日，當毛澤東得知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的消息後，極為興奮。他在中央會議上說：同蘇聯紅軍配合作戰，太痛快了，原來以為要與美國配合，真要那樣才是麻煩呢。[82] 毛本人在給中共各根據地負責人的指示中強調，應全力以赴，迅速「佔領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並放手武裝基本群眾，不應稍有猶豫」。[83]

蔣介石豈能容忍中共勢力在戰後坐大，立即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如不許日軍向中共投降、迅速改編偽軍等。但同時，他也知道，在同中共的決戰難以避免的情況下，必須全力加強自己在軍事、政治和外交上的實力地位。鑒於蘇聯已經參戰，蔣知道必須在中蘇談判中作出重大讓步，以換取斯大林不支持中共的承諾。這時，宋子文在莫斯科與斯大林等的談判已重新開始。頭幾天，宋子文還想與斯大林討價還價，而蔣本人直到簽約的最後時刻仍然下不了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決心。但局勢的迅速發展以及對中共勢力在國內坐大的憂慮，迫使蔣最終仍然決定同蘇聯簽約。斯大林給出的回報是，一方面在會談中表示不支持中共，並承認「中國必須只有一個政府和一個軍隊」；另一方面，又在中蘇條約和相關協定中明確承諾，蘇聯在道義、軍事及物質上對中國的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84] 8月14日，即中蘇條約簽字的同一天，蔣介石致電毛澤東，邀請毛赴重慶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並強調：「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85]

這一切，將毛澤東和中共置於一種十分困難的境地。關鍵在於，毛先前對於蘇聯的期待實在是太高了。在這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斯大林又接連給毛和中共領導層發來三封電報，明確提出中共必須同蔣介石進行談判，並達成避免內戰、維護國內和平的協議。在8月23日的電報中，斯大林還警告中共：「我們在14、20日已經忠告過。中國不能再打內戰，如果中國再打內戰，中華民族就走上毀滅之路。」[86]

從斯大林的角度來說，他向毛澤東和中共提出的要求同雅爾塔秘密協定的內容是完全合拍的。但對毛和中共來說，斯大林的行為無異於釜底抽薪。在毛和中共領導層原先同蔣和國民黨爭奪戰後中國的計劃中，蘇聯的援助畢竟佔有關鍵性的地位，而一旦蘇聯拒絕提供援助，這一計劃便失去了實行的條件。中共除了接受斯大林的要求並迅速對大戰略作出調整外，別無更好的選擇。

8月22日，中共中央通知全黨：「蘇聯為中蘇條約所限制即為維護遠東和平，不可能援助我們。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敵軍投降，敵偽只能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給蔣介石。」毛澤東和中共因而決定，將對戰略方針作出重大調整，「以必要兵力着重於奪取小城市及廣大鄉村，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發動群眾鬥爭，並注意組訓軍隊，準備應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87]

在同蔣介石和國民黨談判的問題上，當時中共上層的基本看法是，毛澤東不應該親自前往重慶會談，派周恩來出馬就可以了。[88] 周恩來對此完全同意，也有思想上的準備。說到底，抗戰八年來，他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同蔣介石和國民黨打交道。現在，若要他代表中共同蔣介石談判，對他說來並不是出乎意外或不可勝任之事。8月20日，蔣介石再次致信毛澤東，以極為懇切之詞寫道：「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89] 8月22日，周恩來代毛起草給蔣的覆信：「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到後希予接洽，為懇。」[90]

然而，毛澤東本人對於談判是否由自己親自出面其實已有不同看法。8月23日，政治局會議再次開會討論此事時，毛澤東表示，抗戰已經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全世界，歐洲、東方，都是如此」。關於蘇聯的態度，他分析道：「蘇聯如公開助我，美國必公開助蔣，大戰就可能爆發，和平不能取得。在歐洲，蘇聯助保加利亞而不及希臘，因希臘是英所必爭，中國亦然。」他進而提出：「目前我們要這樣看：蘇聯（表面上）不幫助我們比幫助我們對中國人民更有利。…… 主要因為美國的勢力，我們如佔了京、滬，美國一定要干涉。蘇聯現在也干涉中國，雖然不直接幫助我們，甚至不多講話，但還是真正援助我們的，是不幫助的幫助。」在此

情況下，毛提出：「我們現在在全國範圍內大體要走法國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但國民黨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因為它的攤子未擺好，兵力分散，內部矛盾。加上解放區的存在，中共不易被消滅，人民和國際反對內戰。「我們還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毛因而認為，「這次談判應該去，不能拖」。[91]

周恩來長期同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直接打交道，他在會上的發言是有分量的。但開始時，他對毛澤東是否去重慶的問題仍然持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他一方面表示，雖然責任重大，但他願意承擔同國民黨方面談判的任務。但另一方面，在談到毛是否應去重慶時，他又表示，這還不能「十分肯定」，「因為（毛）總要談的攏才能去」。同時，他還表示，「今天不能作不出去的決定，看我出去談判如何再決定，蔣的陰謀也必須考慮。」[92]

8月23日，蔣介石又公開覆電毛澤東稱：「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93] 這就等於說，蔣是非毛不談的，又把球踢回到中共這一邊。毛、周等接到蔣電後，已可以清楚地體驗到，這分明已是一場政治上搶奪先手的爭鬥，中共豈可落入下風？8月24日，毛澤東回電蔣介石稱：「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94]

8月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並確定毛澤東去重慶的問題。這時，毛澤東已經完全下定了親赴重慶的決心。會上，他解釋了這麼做的原因，關鍵在於「這樣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動權」。他還說，在「有戰後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預四個條件」下，「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即便他去了重慶，黨的「領導核心還在延安，黨內不會有什麼擾亂」，所以「重慶是可以去，必須去」。[95] 周恩來看出毛澤東確實是準備親自到重慶去了，他在發言中也把重心轉向分析此舉在政治上可能產生的積極影響。最後，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由毛澤東親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談判。[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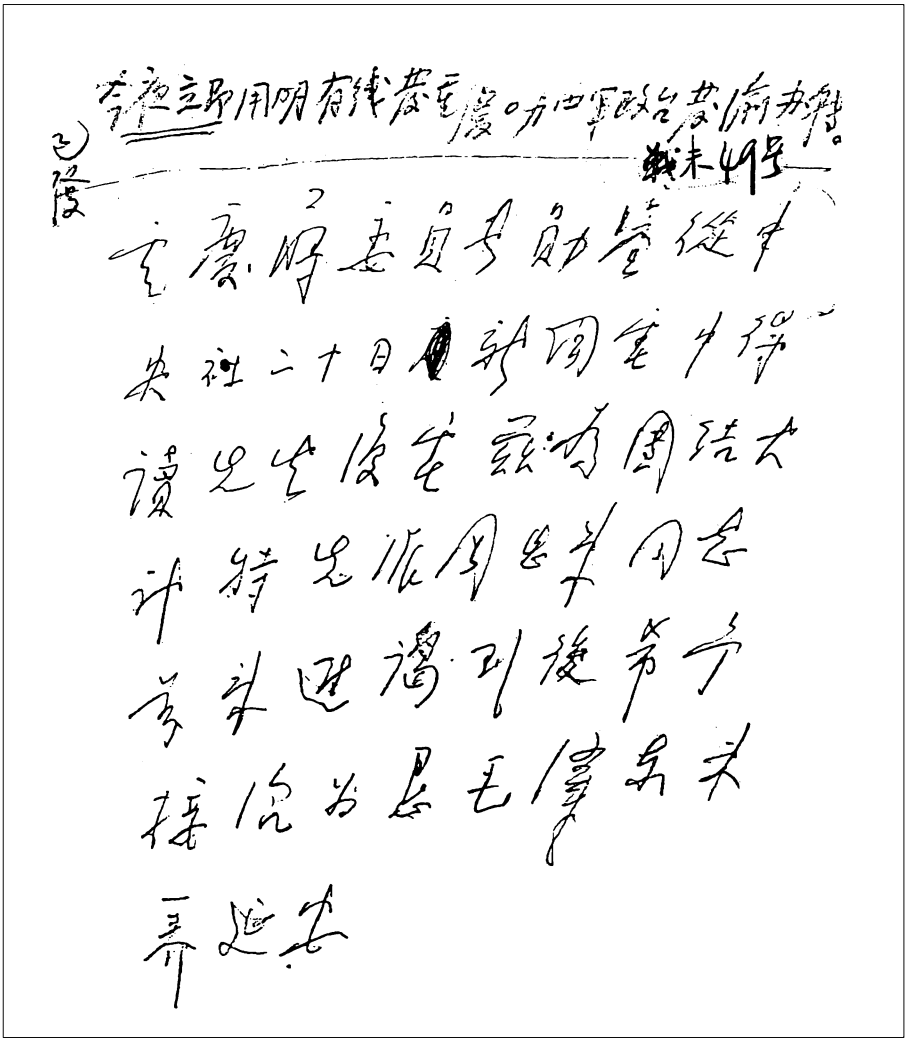


圖 13.2：周恩來代毛澤東起草的致蔣介石的電報，1945 年 8 月 22 日。
（《周恩來手跡選》書信卷下）

回過頭去看，毛澤東決定親自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確實是當時情況下在大戰略上和政治上走出的一步「高招」。蔣介石請他去談判，斯大林逼他去談判，美國人也在看他是不是去談判，而國內輿論和民眾更是把眼睛盯在他和中共身上。結果，他真的去了，這就在政治上把主動權完全抓到了自己手裏。但同時，這其實還稱不上是什麼「險招」。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實際上是很清楚的，他的直覺告訴他，蔣介石不會對他「下毒手」，「估計也不會有什麼危險」。[97] 不然的話，他大概就不會走出這一步棋了。

8月25日會議結束後，周恩來立即給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擔任領導工作的錢之光、徐冰和張明等人發出一份最高密級的急電，通知他們，毛澤東將要到重慶與蔣談判，要求他們做好一切準備工作，特別是保衛和保密工作。他還在電文中就毛在重慶期間的警衛、住房、飲食、交通等一一具體指示，並特別提出，要把辦事處二樓東側的房間騰出來作為毛澤東的宿舍和辦公室，要有專人負責照顧毛澤東，在一樓新建小灶，甚至連要給毛澤東準備的衣服、鞋子和洗臉盆都說到了。[98]

8月28日，毛澤東從延安飛往重慶，周恩來同行。這是兩人自長征之後以及抗戰爆發以來，第一次幾乎「零距離」地共同工作的機會。

毛澤東一行到達後，談判即行開始。9月2日，蔣介石設宴招待毛、周一行。蔣日記中記道，當天下午，他曾突然來了靈感，覺得可以對毛「主動予之妥協」，以中共「接受政令軍令」為條件，准許「整編十二師部隊」，並「委派共黨二人為省之主席，使其滿足一時」。如此，「共黨問題如能獲得解決，則政治建設當無妨礙矣」。[99] 不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的這些話是否他真實的想法。如果是的話，那他那一天真是有點天真了。其實，只要對比一下蔣、毛各自設下的談判方針，就不會對談判的前途抱多大希望了。蔣介石自己定下的方針是：(一) 不得以現在政府法統以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二) 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三) 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100] 毛澤東定下的方針，從他9月3日同王世杰商談時的「建議」中可見端倪。他提出：國民大會代表重選；廢止或修正妨礙「人民平時所享有之自由」的現行法令；給予各黨以合法地位，結社不受限制；承認解放區現存民選政



圖 13.3：前排左起：周恩來、毛澤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1945 年 8 月 28 日。（Everett Collection / Alamy Stock Photo）

權，「不因黨派關係而有所歧視」；中共軍隊須改編為 48 師，並由中共將領指揮。當天，周恩來向對方提交的談判方案中，雖然不再提及「聯合政府」，而是改提中共將「參加政府」及「參加軍事委員會」，但其中也包括了中共控制地方以及掌握軍隊的要求。[101] 如此一來，蔣介石的「政令」和「軍令」之統一，豈不成了一句空話？

雙方的會談目標如此南轅北轍，會談將無果而終的命運，恐怕第一天就已經定下了。此後，談判過程中雙方你來我往，就是不能夠在「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這兩個關鍵問題上取得任何進展。兩邊人士最初也許曾有過的一點點相互信任和期許，隨着「談判」的拖滯，也一步步消耗殆盡。但這樣一場戲不能無限制地演下去，總要有個收場的時候。9 月 27 日，周恩來在會談中提出，關於解放區之處理，可以「暫維現狀，即現各

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區治理之。若此法仍不得同意，只有交給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國民黨談判代表雖然「仍不同意」，但又提不出其他的辦法，也就只能實際上默認周的這種處理。[102]

會談延至10月，雙方都覺得必須收場了。於是，挑了10月10日這個中華民國立國的「黃道吉日」，由兩方簽訂了一個〈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講了一大堆「和平、民主、統一、團結」的空話，也擺了一批談判中未解決的問題，要留給那個八字還沒有一撇的政協會議去處理。到頭來，歷時六星期之久的重慶談判產生的就是這樣的一紙空文。

10月11日，毛澤東飛回延安。周恩來留了下來，處理「各種善後事宜」。毛覺得，他此行的最大收穫之一是識破了蔣介石的虛實。他說：「我看蔣介石兇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我們是路線清楚但調子很低，並沒有馬上推翻一黨專政。我看，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弱。兵敗了，新聞檢查取消了，這是十八年未有之事。」[103] 毛澤東真是把蔣介石看穿、看透了。

六

毛澤東剛剛離開重慶，國共雙方的戰事又迅速升級。其實，就是在重慶談判期間，國共兩方之間的仗也沒有停下來過。毛做出赴重慶談判決定的同時，就明確指示中共各路軍事首長：「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104] 他到重慶後，中共中央即向各地區中共部隊發出指示，命令他們在「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盡可能控制華北和華中的廣大地區。同時，中共中央還決定向東北派出大批幹部，以便在中蘇條約許可的範圍內，爭取在東北打開局面。毛澤東知道，他的重慶之行已經把政治上的主動權抓到了自己手裏，在軍事上完全可以以「弱者」面目出現，用「自衛」的名義，對國民黨打得狠一些。毛赴重慶前後，特地叮囑中共在各地的軍事領導人，對國民黨軍隊不能示弱，「有來犯者，只要好打，我黨必定站在自衛立場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105]

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國際局勢的一個大變化是，隨着美國表明了將獨自佔領日本、不容蘇聯染指的強硬態度，以及美蘇在歐洲對抗的形成，斯大林決定，轉而在中國問題上對美國以及國民黨政府採取更為強硬的政策。9月中旬，蘇聯紅軍代表貝魯諾索夫中校專程飛往延安，同代替毛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和朱德等中共領導人會晤，並告知中共，只要中共部隊不用正式名義進入東北，「尤其是不要讓美國和國民黨方面偵知」，而給蘇聯造成外交上的難堪，那麼蘇聯就不反對中共部隊進入東北。[106] 中共領導人立即就對抗國民黨的大戰略作出了重大調整。9月19日，在留守延安主持工作的劉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決定，在內戰中實行「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107] 毛回到延安後，根據他的意見，中共中央又於10月19日決定，集中主力堅拒蔣軍在東北登陸，「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108] 毛的思路是，先把東北的仗打好，加強中共的實力地位，「控制東北，保衛華北華中」，六個月後，到召開政協會議時，再同蔣和國民黨「開談判」。[109] 東北的局勢是中國局勢的一面鏡子。國共內戰硝煙，正在大半個中國瀰漫開來。

面對國共衝突不斷升級的局面，杜魯門總統等美國決策者面臨着兩難處境。一方面，為了限制蘇聯勢力在東亞的擴展並保持中國的穩定，美國有必要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提供援助；但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干涉又可能讓它直接捲入中國內戰並導致和蘇聯的軍事衝突。這時，赫爾利又突然宣佈辭去駐華大使一職，並公開批判杜魯門的對華政策。經過反覆權衡利弊後，杜魯門總統於12月15日宣佈，美國將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但不會「以美國軍事干涉去影響中國的任何內爭過程」。他還決定派遣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為特使，前往中國對國共爭端進行調停。[110]

當得知馬歇爾將要來華時，毛澤東的第一反應是，他是來「扶蔣、防蘇、壓共」的。[111] 但周恩來的看法卻顯然有所不同，認為對杜魯門聲明及馬歇爾來華都應積極對待。多半是在他的影響下，12月19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指示，將杜魯門的聲明解釋為，儘管「美國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蔣介石的」，但「已決定不直接參加中國內戰，不援助蔣介石武力統一中國，而援助中國的和平統一」。[112]

1945年12月22日，馬歇爾飛抵重慶，周恩來到機場迎接。第二天，他登門拜訪馬歇爾，對馬說：「杜魯門總統的聲明是很好的，而且是和羅斯福總統的政策相一致的。我們對其中的主要論點是同意的。」他還強調，中共要求實現的民主政治同美國式的民主其實很相似。「美國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華盛頓時代的民族獨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的精神；美國的農業改革和國家工業化。」[113]

周恩來很快就發現，馬歇爾和赫爾利不同，卻「與史迪威相似」，為人「直率、樸素、冷靜」，「是一個有智慧的人」。[114]他看到，馬歇爾確實十分希望調停能夠成功，並盡可能在處理解決國共之間的各種分歧時持公正態度。馬歇爾也對周恩來有良好的印象，認為他是一位「誠實和能幹」的談判對手，不僅「極有才幹，也有着很高的道德準則並富有自由思想」。[115]這樣，他們兩人之間很快就建立了一種基本的相互信任。有一次，周恩來搭乘馬歇爾的飛機從延安回南京。由於疲勞，他在機上睡着了。下機時，他完全沒有注意到一個包括中共頂級諜報人員信息的小本子從襯衫口袋中滑出，掉在馬歇爾的飛機上。這是一個「特大事故」。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報告並做了檢查，並通知有可能受到影響的情報人員做好隨時撤離的準備。但是，他並沒有立即讓他們撤離。這是因為，他憑自己的直覺來判斷，像馬歇爾這樣老派的「正人君子」，是不會乘人之危，將他的筆記本轉交給國民黨方面的。果然，馬歇爾很快就派一名貼身參謀，將周的筆記本裝在一個密封的信封裏，當面還給了周本人。筆記中所涉及的中共情報人員，後來都沒有出事。[116]

馬歇爾關於調停的設想，分三步走：第一步，促使雙方實現停戰；第二步，召開政協會議；第三步，完成軍隊整編。表面上看，這個設想似乎更符合中共關於政府改組在先、軍隊整頓在後的邏輯。

12月底，國民黨提議，由馬歇爾牽頭，會同國共雙方代表成立一個三人小組，負責調處停戰及相關問題。馬歇爾已準備了一份停戰令草案，將全國停戰同停止一切軍隊調動及恢復一切交通結合起來實行，停戰生效時，「一切部隊，皆維持其現時地位」。[117]周恩來當即對這一草案表示支持。此後，國共雙方雖然在如何處理向東北調動軍隊的問題上存在分歧，但經馬歇爾來回調停，國共雙方此時又都買他面子，停戰協定很快於1946

年1月10日簽訂。一時之間，周恩來固然喜形於色，劉少奇等其他中共領導人也十分高興，就連毛也同意中共以他的名義宣佈：「中國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將從此開始。」[118]

同一天，政治協商會議正式舉行。但要在這上面達成協議，困難就比簽訂一紙停戰書要大得多了。因為，處於政協議程中心的是政府的改組問題，而這恰恰是中共這幾年來盯住不放，蔣介石卻極為忌諱討論的。1月14日，國民黨代表王世杰拿出了「改革」方案：在國府現有基礎上增補人選，增補者要由蔣指定，國府委員會只有有限權力，且蔣擁有否決權和緊急處置權，國府委員也要由國民黨佔多數等等。[119]

這一來，正好被中共和周恩來抓住了把柄：這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不打自招，他們要搞的就是獨裁和一黨專政，而改革只不過是用來裝點門面。參加政協會議的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也對這個方案群起而攻之，馬歇爾更是極為不安。他曾暗地裏向蔣送過一份改組政府的草案，建議成立一個臨時國府委員會，其中國民黨人並不佔多數，且如果議案獲三分之二以上通過，蔣便不能否決。[120] 蔣對馬的這個方案極為惱火，認為他「對我國內情形及中共陰謀並無了解」，提出的建議為「共黨所不敢提者」，「終將誤大事也」。但蔣再三考慮之下，又擔心「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故不敢貿然同馬歇爾翻臉。[121] 馬歇爾的草案沒有拿出來，但它卻促使蔣和國民黨在政協會議上做出了一系列讓步，包括同意在總共40人的國民政府委員中，國民黨佔20人，包括中共的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亦佔20人，且不再提國府委員需由國民黨中執委通過。幾天之間，政協會議的氣氛大變，走向成功之門似乎打開了。

1月27日，周恩來專程從重慶飛返延安。第二天，中共書記處開會討論政協協議問題。周懷着極為興奮之心情，報告了政協會議的進展。他說，解放區問題將當作一般地方自治問題來對待，不僅打破了國民黨的中共「割據」說，也得到了社會各界同情。軍隊國家化問題，將同政治民主化平行解決。政府改組後，可以保證中共有否決權。[122] 周恩來從來就是謹慎之人，這一次卻對政協會議的結果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他的情緒不能不感染到中共其他領導人，他們也興奮了起來。劉少奇當即代表中央肯定了周的工作。他特別提到，中共雖然做出同意軍隊國家化的大讓步，包

括取消軍隊中黨的工作，但換來了全國範圍內民主運動的勝利。他還說：「武裝鬥爭是必須的，非此沒有今日。但繼續武裝鬥爭則必然在政治上失敗。」周的工作得到了中央書記處會議的完全批准，[123] 但出席會議者中，沒有毛澤東。

第二天，周恩來興沖沖地飛回重慶，帶着一封毛澤東給馬歇爾的致意函。1月31日晚，政協會議以全體代表起立的表決方式，通過了政府組織、和平建國綱領、軍隊國家化、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五項議案。蔣介石致閉幕詞時，全體起立歡呼。馬歇爾的調停看來將大功告成，周恩來也充滿欣喜。

這之後的一段時間裏，中共似乎真的想要走上議會鬥爭的道路了。2月1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黨內宣佈，政協會議通過的五項協議顯示，「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的新階段」；「中國革命的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黨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中共也「即將參加政府」。[124] 對這條路線，劉少奇相當贊同，周恩來也頗為得意，黨的其他領導人乃至廣大黨員大多也是如此。然而，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充滿疑慮。

2月12日，中央書記處討論整軍問題。毛澤東身體尚未痊癒，但仍然親自參加了會議，並對中國能否走「法國式的議會道路」提出了疑問。他說：美國和蔣介石要以全國軍隊統一來消滅我們，我們要逃脫，要統一而不被消滅。他還說，最危險的還不是軍黨分立，最危險的是合編分駐。全國軍隊統一，原則上我們只好贊成，實行步驟要看具體情況。他又提醒眾人，「這是我們與法國不同的」。毛的話等於給熱衷於實現「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其他中共領袖（尤其是周恩來）當頭澆了一桶冷水。劉少奇聽過毛的話後，態度在會上就有變化，表示「以軍隊國家化換取國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險，這種思想要在我們同志中去掉，……因為現在民主化的前途還不知道」。[125]

很快，時勢的發展表明，毛澤東這一次又對了。由國共停戰協定所帶來的和平希望只是曇花一現。到頭來，進一步的談判果然在「整軍」問題上卡住了。2月25日，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簽署了以實現「軍隊國家



圖 13.4：周恩來與鄧穎超在南京梅園新村，1946 年。
（Historic Collection / Alamy Stock Photo）

化」為目標的整軍方案。表面上看，「整軍」的問題似乎已得到了解決。但問題在於，當紙面上的東西要轉變為現實的存在時，國共雙方都發現，軍隊國家化實際上是做不到的。周恩來後來的一段話，一語道破了問題的癥結：「整軍方案對我們雖不利，但蔣亦不能接受，故馬上即以成立國防部、軍改師等辦法偷天換日。」[126] 但實際上，中共方面又何嘗不是如此？當整軍要進入實行階段時，中共中央即再三向黨內發出指示，「除將二分之一主力部隊編為保安部隊外，再保留一部分（大約三分之一）好的軍事

政治幹部，在各解放區隱蔽起來，不要去請國民黨加委，以免受軍事法規的束縛及國民黨的破壞，保持行動的自由……以便在一旦受人襲擊時他們能自由活動」。[127] 雙方都如此行事，整軍怎麼還能做得下去？

果然，未過多久，以東北為焦點，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又重新爆發，更不斷升級。就在馬歇爾在中國奔忙的日子裏，美蘇兩大國之間的關係繼續惡化，並在雙方各自對中國的政策上表現出來。為了限制蘇聯在東亞的影響力，1946年2月，美國對蘇聯和國民黨政府為在東北進行經濟合作而進行的談判，提出了堅決反對。[128] 同時，美國還有意披露羅斯福和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所達成的損害中國主權的協議，觸發了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的一系列反蘇情緒和抗議活動。蘇聯立即以牙還牙，實行反擊。2月下旬，東北蘇軍將領一再發表談話，表示蘇聯決不會允許美國控制東北。3月上旬，蘇聯突然宣佈將從東北撤軍。3月9日，東北蘇軍通知中共，蘇軍將於13日起撤出瀋陽，希望中共接收，而在一切蘇軍撤出的地區，中共部隊都可以自由行動。[129]

上述發展，對於當時在東北處於同國民黨大打出手前夕的中共來說，無疑是一個特大的「利好消息」。中共領導層隨即決定，「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鐵路）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進佔長、哈及中東路」；同時與蘇方交涉，「允許由我方派兵佔領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130]

蔣介石清楚地知道，如果讓中共部隊控制了瀋陽以北的整個東北中部和北部，中共便將在國共全面內戰發生時佔據相對有利的戰略地位。因此，他命令國民黨部隊全力向北推進，不讓中共部隊順利接收瀋陽以北蘇軍退出的各個地區，中共部隊則企圖阻止國民黨軍隊的推進。在這一過程中，雙方都開始將四平當作戰略上的必爭之地。4月上旬，蔣調集大軍，兵臨四平城下。中共在東北的軍事首長林彪也集結大部隊於四平及周圍，誓死保衛，雙方在此地形成對峙之勢。

起初，中共領導層曾希望，周恩來能通過同馬歇爾的交涉，制止國民黨軍隊對四平的進攻，同時又趁蘇軍撤退之際，搶先佔領了四平附近的大城市長春。馬歇爾的應對辦法，是要中共撤出長春，由此來換取蔣不攻或至少緩攻四平。結果，國共兩邊都不聽他的。僵局之下，馬歇爾只好宣佈退出東北調停。[131] 這也成為馬歇爾調停走向破局的開端。

一時之間，四平成為中國內戰的焦點。國民黨大兵壓境後，從4月中旬到5月中旬，雙方在四平經歷了一個月的浴血苦戰，最後林彪所部漸漸不敵。5月18日，林彪令部隊撤守四平，中共方面大規模的四平保衛戰以失敗告終。這一結果，使得本來已經箭在弦上的全面內戰變得不可避免。

四平被國軍佔領之後，周恩來還曾同馬歇爾交涉，試圖以中共放棄長春為籌碼，實現雙方在東北境內停戰。然而，未等他和馬歇爾的商談有任何結果，國民黨部隊已於5月23日佔領了長春。這一來，蔣介石當然不肯就此住手，下令部隊在東北繼續推進。中共方面也清楚知道除了打，別的出路是沒有的。毛澤東於是下令，要中共在關內的部隊對國民黨軍隊展開報復性進攻。[132]

這時，蔣介石才發現，他的戰線拉得有點太長了。即便他在東北的部隊人數眾多，裝備精良，但其攻勢實際上已是強弩之末。而雙方從華北到東北到處都在打仗的局面，卻已經形成了。僅僅幾個月間，「和平民主新階段」就成了歷史。此時，也正是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的時候，周恩來亦於5月搬到南京。中國在以勝利者的身分走出一場慘烈的戰爭後，又走入了另一場慘烈的戰爭。

馬歇爾還想做最後的努力，並要求周恩來予以配合。於是，國共之間又曾幾次達成臨時停戰協定，以便為和平留下一點空間。在預定於6月15日結束的那一輪停戰中，國民黨方面於6月9日提出整軍補充案。周讀後，只說了一句話：「混蛋之至，戰意已大明。」[133] 果然，6月15日未到，雙方又開始大打出手了。

7月2日，周恩來應約見蔣介石。從一開始，談話氣氛就極為緊張。蔣要求中共退出承德、安東、膠濟路沿線及蘇北，不然「一切無法續談」。周當場嚴詞拒絕。之後，蔣在日記中說，周「以悻悻然而去」；又寫道：「此種匪類已不若禽獸矣。」[134] 蔣又開始稱周恩來為「匪」了。這是周一生中同蔣的最後一次面對面談話。

第二天，蔣介石未與其他各黨派商量，便直接向國防最高委員會提出並宣佈，將於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這也意味着，國共談判已經徹底

破裂。儘管馬歇爾還要在中國待到1947年1月，但他在中國的調停使命卻已經徹底失敗了。

蔣介石宣佈召開國大後，就談判而言，周恩來其實已經無事可做了。他不回延安，主要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希望在全國和世界輿論面前，造成一種中共堅守和平陣地到最後一刻的印象。到11月，內戰烽火已經燒遍長江以北。國民黨部隊甚至準備進攻延安。周知道，已經沒有任何必要再留在南京了。

11月16日，周恩來在上海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他表示，發動內戰的責任完全在於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國民黨軍隊若進攻延安，便是全國全面內戰發生之時。他再次將中共描述為和平與民主的追求者，聲明中共「願同中國人民及一切真正為民主而努力的黨派，為真和平真民主奮鬥到底」。[135] 但實際上，周恩來清楚地知道，中共已經下定了全力爭取內戰勝利的決心。第二天，他在給老友郭沫若和于立群夫婦的一封信中預言：「今後要看前線，少則半載，多則一年，必可分曉。」[136]

11月19日，周恩來攜鄧穎超及中共代表團其他幾位成員，乘坐馬歇爾提供的飛機，離開南京，返回延安。

第14章

內戰
（1946–1949）

一

1946年，已是深秋季節。國共內戰烽火四起，打得不可開交。11月21日，周恩來回到延安後的第三天，他就和劉少奇一道到毛澤東的棗園住所開會，討論時局及中共在內戰中的大政方針。毛澤東說：「在七大時我們即估計在日本投降後不克服蔣介石和中國的斯科比，則中國內戰不可避免。在今年一二月似乎變了，後頭還是證明七大的估計是正確的。」[1] 他說這些話，其實也是在提醒劉、周兩人：他們在年初時曾熱衷支持過的「和平民主新階段」的主張是錯的，而他關於內戰必打的看法是對的。

周恩來豈能聽不出毛澤東的弦外之音？他着重講述了自己同國民黨及美國人談判的情況，以及他所掌握的國統區的情資：「談判一年多，中共的和平、民主、統一、獨立的主張贏得了人民的信任，蔣介石的獨裁和內戰政策暴露無遺，也揭露了美國企圖獨霸中國的真實面目。中共還是要以武裝鬥爭為主，並繼續抓住民主、和平、統一、獨立的旗幟。」對中共，「蔣的政策是從削弱到消滅」，但蔣以下的各級官員，「對長期作戰沒有任何把握，連白崇禧等都感覺前途茫茫，一切計劃都以半年為期，半年後毫無打算，海陸空軍的中下級人員，悲觀厭戰更甚」。周恩來還說，蔣介石在政治上和戰略上的弱點甚多，過去一年多的歷史已證明中共能抵抗，也能勝利。[2]

周恩來的這番話令毛澤東極感欣慰，這正是他自年中以來就不斷向黨的其他領導人灌輸的意見：內戰必打，也必能打勝。現在，就連在黨

內歷來以謹慎細心出名的周恩來也說，中共可以贏得同國民黨的這場戰爭，毛怎麼能不高興？他投桃報李，也對周恩來大加稱讚：武裝鬥爭固然是解決問題之根本，但抗戰結束後同蔣的談判仍然是必要的，主要是把和平及民主的旗幟抓到了自己手裏，使蔣介石孤立。他還說了一段要緊的話：內戰是否打得起來已有答案，「剩下的便是我們能不能勝利的問題了」。他認為中共「用三年到五年，最長十到十五年」，是能夠戰勝蔣的。[3]

毛澤東、周恩來都說中共能打、也能打勝，這是同他們對於國際局勢和內戰的外部環境的判斷有關。談話中，毛澤東告訴劉、周，他擔心的是「美國反動派直接援助蔣介石，這就是我們的困難所在」。但毛又分析道：「世界在進步，蘇聯在高漲，美國在面臨危機。……英國和法國可能在不久以後都建立左派的政權，親蘇反美，這樣美國就要在五大國中佔少數。」毛提出：

> 我們的問題是要熬過明年一年，後年就要好轉，那時蘇聯就會恢復，英法就會左傾，美國就接近危機。……美國的基礎是危險的，比蔣介石還危險，他的危機就要到來，比過去嚴重的多。[4]

後來看，毛澤東關於美、英、法的這些分析是錯的，他所描述的危機局面在美國並沒有發生，左派政權也沒有在英、法出現。但他說這番話時想強調的是，中共不必害怕美國對中國內戰的干涉，而這其實是他從另一角度在回答一個劉、周都極為關切的問題。後來，美國果真沒有對中國內戰進行直接的軍事干預，毛的這番預測應驗了。

毛澤東的談話還有另一層極為重要的涵義。他談到世界大勢時說：「世界上三塊地方，美國、蘇聯、美蘇之間，這三塊地方的人都反對美國反動派。」[5]在這裏，毛重複了他1946年8月與美國左翼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談話時提出的看法：「美帝國主義確是準備着反蘇戰爭的」，然而，「美國和蘇聯之間間隔着極其遼闊的地帶，這裏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6]後來，到1947年初，經毛親自修訂，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發表了一篇洋洋萬

言、題為〈關於戰後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的文章，其中又進一步提出，戰後世界格局確實出現了美、蘇兩極對立的局面，但美、蘇之間存在着遼闊的中間地帶，美國的全球擴張首先要以「在中間地帶的國際擴張」為目標。惟其如此，文章強調：

>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的實際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內的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之間，而不是在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蘇聯之間，也不是在蘇美之間。更具體地說，現在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國人民與美國反動派的矛盾，是美英矛盾和中美矛盾。[7]

周恩來也參與了文章的修改，並同陸定一聯名發出黨內通電，要求全黨「仔細研究毛、陸文章」，「當知對蘇戰爭危機目前已不存在，反蘇的叫囂只是企圖獨霸世界(蘇聯除外)的煙幕，故實質上蘇美矛盾在世界制度上雖是基本的，但不是實際政治的主要矛盾」。[8]由此而揭示的，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已透露出「中國中心」意涵的世界視野。即便身處陝北窯洞之中，面臨內戰不斷升級的危局，他們對世界大局的想像居然仍以中國為中心，因而提出了美蘇矛盾亦取決於中美矛盾的看法。除了給自己鼓氣外，這裏的「中間地帶」表述在中共建政後又延伸開去，衍化為毛澤東的「兩個中間地帶」論和「三個世界」論，成為他理解並界定世界大局的一條基本線索。[9]

在誰將成為內戰的勝利一方的判斷上，國、共兩黨領導人的看法大相徑庭。中共方面，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都說，內戰不但可以打，而且可以打勝。而在國民黨方面，蔣介石也深信，「剿匪絕對自信，絕對有把握」。[10]但與此同時，國、共領導人不約而同地認為，1947年將是決定性的一年。11月21日開會時，毛澤東曾對劉少奇、周恩來說：「我們的問題是要熬過明年一年，後年就會好轉。」[11]蔣介石並不知道毛說了這些話，但他卻也相信，自己「能夠在六個月內粉碎共產黨軍事力量」。

後來，恰如國、共兩黨領導人所預言，1947年真的成了決定內戰走向乃至最後結局的關鍵一年。但是，被打屁股的是蔣介石——若從戰局的實際發展來看，1947年是國共雙方軍事態勢開始朝着有利於中共的方向轉變的一年。

二

然而，年初時乍一看來，蔣介石對戰爭前景的看法並非全無道理。1946至1947年之交，中共在戰場上的態勢似乎正處於至暗時刻。國民政府不僅在軍隊人數上遠超中共，裝備遠為精良，而且還擁有中共所沒有的海、空軍，又控制着幾乎全部的大城市及主要交通線。蔣介石自然有理由相信，國軍憑藉軍事上的優勢，同中共打仗應該是勝券在握。

相比之下，當周恩來從國統區回到延安時，中共在內戰中的處境絕對稱不上樂觀。毛、周等一眼望去，中共部隊在各處戰場上均遭遇到優勢裝備的國軍大兵壓境的壓力，警報頻傳。仗打得最激烈也最殘酷的是東北，對國共雙方來說，這是軍事上的必爭之地。對中共來說，東北的重要性恐怕更為明顯，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就說過：「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12] 早在1946年5月，中共部隊經一月苦戰，仍未能保住戰略重鎮四平，接着又丟失了長春，甚至連遠在北邊的哈爾濱也面臨着暴露於國軍攻勢的危險。在關內，中共部隊也處於守勢。1946年10月中旬，國軍經半月激戰後佔領了華北戰略重鎮張家口，更在國內外被認為是中共在軍事上的大失敗。

即便是中共中樞所在的陝北，到1947年初，也成了國軍重點進攻的目標。本來直至1946年底，蔣介石並沒有馬上進攻並奪取延安的計劃。他「不贊成現時攻延安」，而是把眼光盯住了東北；同時，他還要在中原集中兵力「夾擊」劉鄧大軍，以「消滅其主力，為最大目的」。[13] 即便如此，在1946年的最後幾個月裏，中共領導人未雨綢繆，開始對敵軍可能進犯並佔領延安預做準備，將數千名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及家屬疏散到了瓦窯堡。[14]

1947年2月，蔣介石出於外交和軍事的考慮，產生了進佔延安的念頭，並迅速付諸實施。當時，美、蘇、英、法四國外長預定於3月10日在莫斯科開會，「可能干涉中國問題」。蔣希望，佔領延安將使得會上討論中國問題時「蘇聯亦愛莫能助之」。蔣在日記中記道：進佔延安之舉，「此時

行之，對於政略與外交，皆有最大意義也」。[15] 同時，國內戰場上，蔣最初要在六個月內使得戰爭大勢底定的設想未能兑現，他隱約擔心雙方的攻守之勢可能會扭轉，因而也想通過佔領延安來鼓舞士氣並掌控戰場上的主動權。

蔣介石佔領延安的具體計劃，是在2月下旬制定的。儘管他嚴令對此事「絕對保守機密」，但不過幾天之間，周恩來就收到了他佈置在胡宗南身邊的戰略間諜熊向暉送來的情報，獲悉胡宗南部將大舉進攻延安。[16] 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早有必要時放棄延安的想法，在得知蔣的計劃後，很快就決定撤出延安。[17] 3月18日黃昏，毛、周及中共中央首腦機關離開延安。第二天，中共的這座十年「紅都」落入國軍之手。

一時間，蔣介石大喜過望，他在日記中寫道：「十一年來共匪禍國殃民，根深蒂固之老巢剷除於一旦。為黨為國雪恥復仇之念已償其半矣！」[18] 南京，更是一派彈冠相慶的氣象。國際上一般的反應是，國民政府已明顯地在內戰中佔據了上風，中共則已敗象畢露。甚至連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也以為毛澤東和中共中樞已陷入險境，不由得為他們的安全感到擔憂，甚至想到了要毛澤東考慮去蘇聯「避難」。[19]

但後來看，這件在當時看來似乎是天大的事情，到頭來卻只是內戰中的一件「小事」。延安失守後，中共領導層面臨的處境貌似兇險，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這後面還大有各種文章在。[20]

周恩來隨中共中樞撤離延安後，3月29日，在離延安僅百里之遙的一個小地方——清澗縣棗林溝——參加了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循着幾個月前毛、周、劉曾討論過的路子，會議決定中共中樞將分成兩部分，毛、周、任弼時等留在陝北，「主持中央」；劉少奇、朱德等東渡黃河，組成以劉為書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在「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託之工作」。[21]

對於周恩來來說，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安排。他自抗戰初期出任長江局書記後，就再也沒有直接參與中共中樞軍事戰略的制定和軍事行動的指揮。經歷了延安整風後，他在中共領導層的威信縮水、地位下降。抗戰結束前後，他因參與並主持中共和美國人的談判以及國共談判，在黨內的權

力和影響有所恢復。他在內戰中的經歷將成為又一個轉折點，由於上述安排，他作為毛澤東最主要的助手，整個內戰期間幾乎都同毛一起行動，並自1947年8月底起又出任中央軍委代理總參謀長。[22] 因此，他不僅將參與重大的軍事決策，還擔負起了從文電起草到決策協調執行的一系列責任。內戰期間以毛的名義發出的軍事指揮文電，很多都由他起草，絕大多數都是由他簽發的。這樣，周恩來進一步鞏固了他在黨的領導層的地位。

毛澤東、周恩來及中共中樞之所以敢於做出留在陝北這個看上去將自身置於險境的決定，有着戰略上的考慮。周在為中央起草的〈關於我軍撤出延安的解釋工作的指示〉中說：「我們若能將胡敵大部吸引在陝甘寧而加以消滅打擊，這正便利於其他解放區打擊和消滅敵人，恢復失地。」[23] 他們做出這個決定的另一原因是，陝北地勢有利，中共又已在此經營多年，經「減租減息」及各種基層建設後，在當地的根基已深。用毛自己的話來說，「這裏人民、地勢均好，甚為安全」。[24] 毛、周等留在陝北後，對胡宗南部的動作多能及時探悉。而反過來，胡麾下的部隊在陝北行動時卻成了「睜眼瞎」。他們進佔延安後，有幾次其實離毛、周等人所在地只隔着一兩個山頭，甚至有過一方在山脊、一方在山腳的情況，相互之間的空間距離只有區區幾公里，但胡部卻依然抓不住毛、周等的行蹤。

周恩來是中共的情報大頭目，自「特科」創建後就一直掌控着中共的整個情報系統。他在敵情的偵探和掌握上，已為中共中樞留在陝北的決定留有重要的伏筆。早在抗戰之初，周就在國民黨陣營內部、尤其是決策人物周圍盡可能地安排高級特工。他下的其中一步「大棋」，就是在蔣介石手下大將胡宗南身邊安置了戰略特務熊向暉。熊出生於1919年，求學時便思想左傾，並於1936年11月在清華大學秘密加入中共。1937年12月，他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到時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胡宗南處服務。周根據自己對胡的了解，認為熊的「進步青年」氣質同胡的「進步傾向」有契合之處。果然，熊很快便獲得胡的賞識，獲任胡的侍從副官及機要秘書等要職，為胡處理機密文電及起草講話稿等。但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只是周佈下的一着「閒棋」，不到緊要關頭決不拿出來。1943年，熊獲得蔣介石欲令胡宗南進攻陝北的戰略情報後，立即轉報中共中樞，這是他多年裏唯一被「動用」過的一次。內戰爆發後，熊這着「閒棋」被盤活。胡部進佔延安

前後，熊不斷向中共中樞提供胡決策及重大行動的情報，成為周的一個戰略「探頭」。[25]

在周恩來情報佈局的宏大棋盤上，熊向暉還只是眾多棋子中的一枚。這樣的棋子，周和中共手中還有不少。例如，當時國民政府主管作戰的第三廳廳長郭汝瑰，蔣經國的親隨賈一斌，進入了蔣介石侍從室任職的段伯宇、段仲宇兄弟，第46軍軍長韓練成，「佩劍將軍」張克俠，傅作義將軍身邊的閆又文，以及直到國民政府撤至台灣後才暴露出來的國防部次長吳石等，就是其中的另幾位。甚至在蔣介石身邊，他的機要打字員沈安娜也是周恩來安插的。[26] 他們雖未向周及中共提供胡部在陝北行動的情報，卻構成了周恩來麾下一把把深深插入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內部的利劍。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中共在情報技術手段上也有領先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之處。早在特科時期，他對情報技術手段就極為重視。他在1928年和1930年到蘇聯時，都曾同蘇情報機構有過密切聯繫，並接受過密碼製作及破譯上的訓練。同時，他還不斷派人前往蘇聯接受技術培訓，尤其是學習電報通訊截聽及電文破譯的本事，回國後派上了用場。長征期間，周掌控的對敵方電文的截取和破譯，是紅軍未遭致全軍覆沒的重要原因。

周恩來和毛澤東等撤離延安不久，即接到密報：國民黨情報部門已掌握無線電台測向技術，能夠偵知中共方面電台的活動，並大致確定發報的方位。周大吃一驚，當即下令中央電台停止工作三天。3月24日，他以軍委名義致電中共各部軍事首長，要他們「在作戰前部署期間及作戰中，均不用無線電傳達，或將司令部原屬之大電台移開，改用小電台，轉拍至大電台代轉，以迷惑敵人」。[27] 自此，中共中樞大功率電台的信號突然消失，使得敵方在試圖確定中共中樞方位時，先進的測向技術失去了用武之地。

從3月底到4月中旬，為了協調中共中樞撤出延安後的軍事指揮和情報活動，周恩來渡過黃河去了山西，親自部署這樁大事。一番運作後，4月11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致電劉少奇等，指示他們將當時已轉移到晉西北的中央和軍委直屬機關分為三部分：一部分留在晉西北；一部分去太行山區；還有一部分，由軍委一局和中央社會部情報人員組成，由軍委作戰部部長李濤率領，轉回陝北，由周就近直接掌控。[28] 通過這一安排，周把中共情報活動的指揮、部署及運作全部掌握到了自己手裏。

三

國共內戰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場軍事上的對抗，還是政治戰略、經濟情勢、動員能力、宣傳手段等各方面實力的較量。蔣介石的失敗固然是國軍在戰場上一再失利的結果，但也同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組織動員及宣傳鼓動等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嚴重弊病和失誤分不開。而中共則在所有這些方面幾乎都佔據了上風，其中周恩來的指揮運作又至為關鍵。

這裏，尤為重要的一條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從一開始就看穿了蔣介石「民主無量，獨裁無膽」的真面目。毛一語道破天機：「蔣介石兇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29] 而在中共方面，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竭盡全力，試圖把「民主」和「民族」的旗幟都抓到自己的手裏，從而佔據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優勢。

內戰爆發後，周恩來和中共曾面臨過嚴重的挑戰。畢竟，抗戰勝利後人心思定，中共同國民政府打內戰，先在大道理上就輸了一着。1946年2月，美國在雅爾塔協定一週年之際公佈了其內容，立即在國內各界引起了極為強烈的反響，再加上蘇軍佔領東北後的種種惡行不斷被媒體報道揭露，各大城市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反蘇抗議遊行。一時之間，中共處於十分尷尬的處境，既不能聽任其發展擴散，又因事涉蘇聯，也不能對之正面抨擊或激烈反對。當時，周恩來在重慶馬上有諸多動作，提出「要把愛國和排外分開」，以盡力減少「反蘇」風潮對中共造成不利影響。他還看到，在雅爾塔密約這件事上，蔣介石其實也有「投鼠忌器」之處。畢竟，以接受這一密約條款為前提的1945年中蘇條約是由蔣和國民政府同蘇聯簽訂的，他們可以用此事罵蘇聯，卻不能直接怪罪於中共。於是，周又要求國民政府控制民眾示威，以「保證今後的民主秩序」。[30] 短短幾個星期後，這股反蘇風潮居然沒有給中共造成太多的負面影響，還漸漸平息了下來。

周恩來回到延安後，中共中央於1946年12月2日決定改組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兼任部長，以「研討與經管蔣管區的一切工作」。[31] 12月下旬，周接獲中共北平地下組織的報告，12月24日，那裏發生了美軍士兵強姦北京大學先修班女生沈崇的事件。當晚，沈崇看電影途經東單，遭到美國

海軍陸戰隊皮爾遜等兩人的綁架及強姦，警員接報趕到後，當場抓獲美兵一人。[32] 此事見報後，立即激起了公眾的極大憤怒。從12月底起，北京、上海等地高校學生連續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抗議美軍暴行。

周恩來馬上意識到，這是中共可以充分利用的一個巨大機會。12月31日，他親自為中央起草了給國統區黨組織的電文，提出：美軍強姦北平女學生的事件，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城市「已造成有力的愛國運動」，應當「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滬、渝、昆、港、榕、杭等)及海外華僑中發動遊行示威，並堅持下去」。除了「要求美國兵犯罪由中國法庭公開審判」外，還要提出「美軍全部撤離中國，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出賣軍火，進行借款，助長內戰及廢除中美商約、抵制美貨等口號」，從而「使此運動向孤立美蔣及反對美國殖民化中國之途展開」。[33] 一週後，周恩來又代表中央致電當時仍在南京的董必武等人，指示他們加強對蔣管區學生運動的組織與領導。[34]

在周恩來的策劃部署之下，國統區「反蔣抗美」風潮持續蔓延。1947年2月1日，周在政治局會議上專門討論了國統區人民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並稱其為內戰的「第二戰場」。他說：反美鬥爭發展很快，和一年前大不相同，各界都不滿美國的壓迫，中共「和平民主的口號一步步為人民接受」。「鬥爭還要繼續下去，這個運動是配合自衛戰爭最有力的運動」。[35] 兩週後，周又主持起草了中央給北平、天津市委的指示，提出國統區開展反蔣反美人民運動的四項原則：「一、積極擴大深入堅持學生愛國運動，並與學生本身鬥爭聯繫起來。二、積極建立與發展青年積極分子的組織。三、黨的組織仍應精幹隱蔽，不應過分集中統一，但是黨員應以群眾面目出現，積極影響抗暴。四、對特務秘密捕人計劃要公開揭露，取得輿論支持。」[36] 2月28日，中共中樞已獲得國軍將要進犯延安的情報，但周恩來仍然抽出時間，再次為中央起草了給國統區黨組織的指示，提出要「針對目前蔣的鎮壓政策」，「擴大宣傳，避免碰硬，爭取中間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從為生存而鬥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與反特務恐怖的廣大陣線」。具體實施中，各地中共組織要注意適時「變換鬥爭的策略和口號」，尤其「要聯繫到、有時要轉移到經濟鬥爭上去，才能動員更廣大群眾參加，而且易於取得合法形式」。[37]

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國統區的「人民運動」從反美、反蔣擴散開去，形成了「反內戰、反飢餓」等更接地氣、也更能夠動員民眾的主題。5月23日，周恩來在給上海局、香港分局的指示中提出，要「使一切群眾鬥爭都與為着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聯繫起來。在具體策略上，要「放手發動群眾進行反飢餓、反內戰、反借款的鬥爭，向蔣政權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38] 6月3日，他又提出，除進行「要和平要飯吃要自由的運動」外，還要「達到成立全國學聯的目的」。[39] 7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頒佈的「七七」十週年口號中，更是明確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建立和平、獨立、民主的新中國」的主張。[40]

抗戰時期，周恩來曾在武漢和重慶與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周旋數年，得失相伴，體驗頗深。內戰中，他把那幾年裏積累的心得統統拿出來投入使用，還根據時勢之變化，不斷推陳出新。結果，周恩來和中共中樞雖然身處陝北，卻成功地在國統區開闢出了向蔣和國民政府提出嚴重挑戰的「第二戰場」，從「反蔣、反美」，到「反內戰、反飢餓」，再到鼓吹建立「和平、獨立、民主的新中國」，繼抗戰之後，在內戰中再度成功地把「民族」和「民主」這兩面重要的旗幟都抓到自己手中，迫使蔣和國民政府在政治上和道義上先機盡失，不得不處於守勢。

四

歸根結柢，國共內戰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雙方的高下是要在戰場上通過勝負來決定的。進入1947年後，透視種種表面現象，戰局其實遠非國民黨強、共產黨弱那麼簡單。雙方在軍力及武器裝備對比上固然存在着明顯的差距，但雙方領導層的戰略視野和決策智慧、動員能力，以及與之相關的後勤保障能力、戰場上對大戰略的執行力、團隊協同作戰的佈局及部署、部隊的士氣等等，都會對戰局的發展演變產生重大影響。而中共在這些方面幾乎都佔據了上風，周恩來又是一個關鍵的角色。

早在內戰開始時，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就根據自己的經驗，形成了一套極為有效的戰略設想和作戰計劃：在軍事上不以奪取和守住地方為主要目標，而是通過打運動戰，「每次集中大力打敵一部，其比例應

為三對一，最好是四對一，以求必勝，各個擊破敵人」。[41] 毛提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暫時放棄，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暫時放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為了取得最後勝利，否則就不能取得最後勝利。」[42] 周恩來身為軍委總參謀長，又有着從中央蘇區時期就開始同毛一道指揮和國軍作戰的經驗，對毛的這一套戰法心領神會。1947年1月，他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指示電中就明確地提出，同敵軍作戰要「尋求敵之分散部隊及其弱點，集中我之優勢兵力，爭取不斷地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43]

相形之下，蔣介石在軍事大戰略上走的是一條與毛澤東、周恩來完全相左的路徑。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們作戰的綱領可以說是先佔領據點，掌握交通，由點來控制面，由線來控制面，使匪軍沒有立足的餘地。」[44] 內戰初期，國軍遵循蔣的戰略，攻城略地，甚至把中共中樞所在地延安也拿了下來，似乎是一派節節勝利的氣象，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國軍佔領中共手中的城市並控制重要交通線的同時，並沒有消滅中共的多少有生力量，反而需要留下越來越多的部隊來守衛「戰利品」。結果，軍力部署越來越分散，戰線也越拉越長。中共部隊針鋒相對地採取大踏步後退、又大踏步前進的打法，在總體力量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卻每每能夠集中優勢兵力，找準敵方的薄弱環節，不斷消滅其有生力量。

國、共雙方在大戰略上的差異，又由於中共在部隊集結調動上的另一個巨大優勢——從上到下軍令的高度統一——而進一步彰顯出來。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這一方，軍事系統中派系林立，歷來就有「嫡系」和「旁系」之分，導致了蔣在戰略部署和部隊調動上常常遭遇到嚴重的困難。尤其在戰役或戰鬥最為激烈、消耗最大的時候，蔣作為最高統帥「軍令不行」的情況更是頻頻出現。相比之下，毛澤東掌握中共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後，非常講究「五湖四海」，擺平軍內各個「山頭」之間的關係，並立下了「一切行動聽指揮」的鐵的規矩，且在實行中相當到位。周恩來是協調組織各方力量的高手，出任總參謀長後，更使得中共部隊雖在兵員數量和武器裝備上對敵軍處於劣勢，卻能夠在一次次戰役中形成「拳頭」，造成對敵軍的局部優勢。如此，國軍在戰場上屢戰屢敗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任何戰爭，在最基本的層面，都必然是參戰雙方動員能力的比拼和對決，在一場內戰中就更是如此了。在這方面，中共又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

明顯地佔據了上風。1946年5月，內戰即將全面爆發之際，毛澤東在中共中樞的一次決策會議上說：蔣和國民黨有很多優勢，「地區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國幫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點，即不能解決土地問題，民不聊生」。[45] 於是，毛和中共卯足勁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擁護群眾……從地主手裏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實現土地關係的根本改變」，從而「極大地增強我們反對國民黨政治進攻與軍事進攻的力量」。[46] 在中央的指示部署之下，各地中共組織派出大批幹部深入鄉村，推動展開土地改革。1947年9月，內戰已呈白熱化時，中共中央又發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47] 之後，中共更在「保衛土改果實」的口號之下，動員大批「翻身農民」參軍或支前，使軍事實力和戰爭潛力陡然大增。

本來，「耕者有其田」是國民黨的發家口號。看到中共用土改拉攏動員民眾，蔣介石其實是知道其中的利害關係的，所以國民政府也曾一再試圖修訂1930年制訂的《土地法》，以「改進土地制度」。但國民黨不像中共，全然沒有相應的組織動員機制，各級軍政官員也根本不想或不知道如何做這件事，結果所有的土改想法都停留在紙面上。蔣介石一道道戡亂動員命令，還沒有出他自己的辦公室就死在那裏了。國、共兩邊的戰爭動員能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國軍焉能不從上風落入下風？

當1947年秋天來臨時，經過一年多的角逐，內戰戰場上的局勢及雙方的力量對比，恰如毛澤東、周恩來近一年前所料，已明顯地向着有利於中共的方向轉變。幾乎在內戰的所有戰場上，國軍的進攻或者受挫，或者已明顯地露出頹勢。即以陝北戰場來看，從年初起就是國軍的進攻重點。3月間國軍佔領延安後，蔣介石哪裏想得到，他在內戰中的這個「高光時刻」卻成了國軍在陝北戰場上最後的亮點？此後，胡宗南部在陝北根本找不到毛澤東、周恩來等的行蹤，反而在幾個月間，先後在青花砭、羊馬河、蟠龍鎮、沙家店等處一再遭到似乎「從天而降」的中共部隊的攻擊，損兵折將，元氣大傷，佔領延安後的那點「豪氣」早已蕩然無存。陝北如此，東北、華北、山東、中原等各處的戰事的趨勢也大同小異，都是一派中共部隊節節獲勝、國軍卻一敗再敗的局面。周恩來以解放軍總參謀長之

身，坐鎮中共中樞，簽發出一道道中共部隊協同作戰的命令，收到並轉報毛澤東的，則是一篇篇從各處飛來的捷報。

其實，國軍佔領延安後不到三個月，蔣介石就已感到軍情不妙。5月中旬，東北民主聯軍展開夏季攻勢後，迅速擊敗國軍中裝備最精良的新一軍和新六軍，蔣頗受震動。他在6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東北與華北戰局緊張，人心動盪特甚，黨內同志多失信心，頓呈憂惶之象。」[48] 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也意識到戰爭大勢的確已朝着有利於他們的方向轉變。7月下旬，周在中共中樞的一個會議上通報戰爭局勢時說：「敵攻勢已成弩末，僅在陝北、山東兩處進攻，在其他各處我均轉入攻勢。」[49] 幾天後，周又說：中共「只有實行打出去的方針，才能取得整個解放戰爭的勝利，徹底摧毀蔣介石的反動統治」。[50]

幾個月之後，戰場形勢果然朝着有利於中共的方向又走了幾大步。12月下旬，毛澤東把一大幫中共領導人召集到陝北米脂縣的楊家溝村，開了一次中央擴大會議。他一張口就宣佈，戰爭「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中共和國民黨對抗「二十年沒有解決的力量對比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51] 周恩來在會上報告軍事形勢時說：「戰爭的第二年，各條戰線無例外地轉入主動」，中共治下解放區的面積和人口已經達到全國的三分之一。[52] 幾天後，他又在另一個會議上說：「三五年消滅蔣介石，全國勝利，我們要有這個信心。」[53]

五

進入1948年，內戰大勢果然像毛澤東、周恩來所希望的那樣，繼續朝着有利於中共的方向轉變。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在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方面節節失利，進退失據之下，已漸漸露出敗象。2月1日，蔣在日記中記道：「事業日艱，經濟困窘，社會不安，一般幹部心理已完全動搖，信心喪失殆盡，對領袖之輕藐雖未形於外，實已動於中。」[54] 十天後，蔣又寫道：「我軍兵力不足，防不勝防，此剿彼竄，頗難為計。」[55] 再過十來天，蔣日記中出現了這樣極端悲觀的論調：「今日環境之惡劣為從來所未有，其全局動搖，險狀四伏，似有隨時可以滅亡之勢。」[56]

蔣介石發出如此哀鳴，首先是因為他在戰場上實在打不過毛澤東，在周恩來協調指揮下的中共部隊手中吃了一連串敗仗。一年前，國軍佔領延安後，蔣曾拿出來大肆鼓吹。短短一年間乾坤反轉，4月21日，中共部隊重新佔領延安。曾一度飛揚跋扈的胡宗南部連吃敗仗後，黯然退出陝北。

其實，延安再度易手只是國共內戰大勢走向的一個縮影。在各個戰場上，中共部隊雖偶有小敗，但在周恩來那裏，絕大多數時候接到的都是大勝的捷報。從東北到西北、華北、中原、華東，中共部隊幾乎處處在轉守為攻，國軍則一敗再敗，不斷喪師。更令毛澤東、周恩來得意的是，在中共治下的解放區，土地改革正如火如荼地推展。這件事並非由周主持，但他還是根據江西蘇區時期的經驗提出，不能讓土改過激失控，「寧可暫緩發動，不要急於求成，致走彎路」。[57] 土改後，數百萬「翻身農民」轉而投入參軍、支前，使得中共的軍事及後勤保障的實力大大加強。

自1947年3月撤出延安後，毛澤東、周恩來一直留在陝北，並有過幾次有驚無險的經歷。此時，隨着戰局轉變，他們於3月23日東渡黃河，隨後在山西境內和葉劍英主持下的中共後方委員會會合。之後，他們又繼續向東。4、5月間，兩人先後抵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和劉少奇為首的中央工作委員會會師。西柏坡這個以往默默無聞的村莊，在此後近一年的時間裏，成了中共中樞所在地。

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方面，隨着戰場上的連連敗績，政治、經濟及社會上的處境也愈發複雜，前景愈發晦暗。3月29日至5月1日，蔣介石為了在政治上爭取主動並鼓舞士氣，召開了「行憲國民大會」。這是他在政治上不斷陷入被動的情況下，試圖重振旗鼓的一個大招數。周恩來和中共看到蔣要「單方面」召開行憲國大後，馬上抓住不放，指責蔣和國民政府一意孤行地要搞政治上的「獨裁」。在周和中共的運作下，只有兩個小黨（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宣佈參加國大，原本屬於「中間勢力」的民主同盟、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先後宣佈抵制國大，搞得國大還未召開，蔣已在政治上趨於孤立。[58] 國大召開後，國民黨又發生「內鬥」，歷來與蔣不和的李宗仁居然擊敗獲得蔣支持的孫科，當選為副總統，搞得蔣狼狽不堪。國

大的召開，本來是蔣介石拿來救命的藥，反而成了讓他在政治上大大失分的「毒劑」。

除了政治上的挫折外，國統區的經濟和金融局勢也全面亮起了紅燈，成了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一個邁不過去的大坎。內戰開始後，蔣的注意力集中於軍事和政治事務，對經濟金融形勢的處理掌控乏善可陳。兩年多下來，國統區的經濟、尤其是惡性通貨膨脹，更是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1945年8月抗戰勝利時，法幣的發行量為5,596億元，到1948年6月居然猛漲近370倍，達到了196.5萬億元。6月10日，蔣在日記中哀嘆：「經濟危險至此，比軍事更足憂慮。」[59]

面對此種局面，蔣介石下決心使出狠招，於8月19日頒佈《財政緊急處分令》，用金圓券取代法幣。第二天，蔣的長子蔣經國受父親委派，到上海「打老虎」，即打擊囤積貨品的投機倒把分子。然而，小蔣卻在上海遭遇了滑鐵盧。他一路打虎下來，最後觸及到了揚子公司，董事長為蔣介石姻親孔家的大公子孔令侃。此時，蔣夫人宋美齡出面干涉，要小蔣對孔令侃等網開一面，小蔣不肯。當時，正值東北國共兩軍鏖戰之際，蔣介石也已前往北平督戰，卻突然收到宋美齡信件，「速其返滬解圍」，蔣遂於10月8日飛回上海，處理「孔大少不法囤積等問題」。[60] 結果，蔣夫人一番鬧騰之下，老蔣下了「手下留情」的命令，小蔣本來就困難重重的「打虎」之役戛然中止。之後，金圓券出現了如同飛流直下般的貶值，幾個月間就變得幾乎一文不值。由此而流失的，則是蔣和國民政府本來就已所剩不多的人心之所繫。一個月後，蔣在日記中記道：「此全為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動搖，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61] 但問題在於，蔣介石不是最高領袖嗎？他如何能讓孔令侃等的胡作非為達到如此地步？

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來說，尤為致命的是，在幾乎失盡民心的同時，自己人也開始對內戰前途失去了信心。這方面，最令人扼腕的一件事是，11月13日，蔣的「文膽」陳布雷自殺。蔣在日記中記道：「得布雷噩耗，出於意外，又增加無限刺激也。」[62] 關於周恩來得知此事後的反應，未見史料記載。但有一事他是知道的：陳布雷的女兒和女婿都是中共黨員。而陳也知道，自己的女兒即便不是共黨，也是親共的，對他來說，這在心理上是不可承受之重。[63]

內戰還在進行之中，但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卻已經幾乎徹底土崩瓦解了，國統區社會也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民間全然沒有戰時動員的氣氛，蔣的戰爭似乎完全與普通民眾無關。另一方面，根據周恩來的策劃，在中共各級地下組織的推動下，國統區反戰、反獨裁的群運、學運不斷，搞得蔣和國民政府疲於奔命。蔣日記中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文字：「軍事、經濟、黨務皆已敗壞，實有不可收拾之勢，因之政治、外交與教育亦紊亂失敗，亦呈崩潰之象。」[64]

六

直到1948年夏秋之際，如果僅僅從軍事力量對比來看，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似乎還沒有達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儘管內戰戰場上的局面對蔣來說已是險象環生，但即便是根據周恩來的計算，直到7月，蔣和國民政府一方仍在軍隊人數、武器裝備、統治地區的面積以及人口上超過中共。[65] 也就是說，如果蔣和國民政府這一方能夠在戰場上支撐下去，並擇時再行政治、經濟改革之舉，不僅不至於很快就一命嗚呼，是否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亦未可知。然而，就在此後的短短幾個月間，蔣介石在戰場上被逼到了絕境。1948年最後的幾個月裏，中共部隊在幾場重大戰役中獲得全勝，而仍然坐擁數百萬大軍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卻兵敗如山倒，一蹶不振，再也沒有緩過氣來。

其實，1948年夏末秋初，正是毛澤東、周恩來等策劃要打幾個「決定性」的大仗的時候，8月下旬，中共中樞在西柏坡連續11天開會。之後，又從9月8日起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制定下一步的內戰方略。周恩來在軍事報告中明確提出，「應準備若干次帶決定性的大的會戰」。[66] 毛澤東發言時說：內戰達到五年左右，要根本打倒國民黨。周也呼應毛的說法時提出，「我們今天主要的仍然還是爭取五年勝利」。不過，他又說：「如我第三年給蔣之打擊很嚴重，加之其財經崩潰，內部傾軋，則蔣可能垮得早些，勝利會來得快些。」[67] 他講這個話時，正是內戰的第三年。

毛澤東、周恩來的說法中，何以會既出現五年打敗蔣介石的計算，又流露出「勝利會來得快些」的期盼？這裏的癥結，仍在於美國是否會在內

戰的這個節骨眼上出兵干預，這是毛、周自內戰發生以來就一直記掛的。此時，毛以為對此不可不防，但又不可過慮。周恩來對此的分析是：美國「派出幾十萬上百萬大批的軍隊恐怕不可能，這對世界影響太大，美國不能不顧慮。但我們不能不估計到這種可能。也有可能敵人因此而控制一些大城市，使我們必須組織大的力量去圍殲之。因此，勝利到來的時間可能要長一些」。[68] 後來，美國沒有干預。周說的幾個「決定性」的大仗不僅打得比他的想像更大，並都由中共一方獲勝，而且還橫掃了長江以北的國軍主力，使得內戰只打了三年多就已塵埃落定。

中共部隊打大仗的序幕是在濟南拉開的。9月11日，周恩來以中央軍委名義致電許世友、粟裕、譚震林，做出奪取濟南的部署。戰役於9月16日打響。兩軍激戰之際，早已為周親自參與策反的國軍整編84師師長吳化文率部投共，戰場形勢大變。9月24日，共軍佔領濟南。[69] 周恩來馬上意識到，濟南易手已造成整個華東地區雙方態勢的逆轉。第二天，他即代表中央軍委致電饒漱石、粟裕：「我們認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70] 這是要在華中、華東打一場更大的仗了。

幾乎與此同時，林彪、羅榮桓麾下的中共部隊在東北戰場屢戰屢勝後，已將關外的國軍局限於瀋陽、長春一線，若林、羅所部再攻佔處於關外戰略要衝的錦州，則東北國軍將被完全孤立。關鍵時刻，周恩來於10月2日以中央軍委名義致電林、羅，要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對付「山海關北援之敵」，「而關鍵則是迅速攻克錦州，望努力爭取十天內外打下該城」。[71] 10月17日，困守長春的國軍60軍在軍長曾澤生率領下投共，東北「剿總」副司令、守城主將鄭洞國陷入絕境。當天，周恩來即提出，鄭為黃埔一期生，為人老實，「可能爭取其起義」。第二天，周又親自給鄭寫信，促其「回念當年黃埔之革命初衷」，毅然起義，加入解放軍行列。[72] 這一封信是起了作用的。雖然鄭不肯馬上起義，但在城破之時，上演了一幕「在部下挾持下」向中共部隊「投誠」的戲碼。錦州、長春先後失守後，東北的國軍陣腳大亂，曾試圖全力突圍撤回關內，卻不得其門而出，主力盡數遭到圍殲。11月2日，中共部隊佔領瀋陽，東北全境盡入中共之手。

國共雙方決戰的主戰場隨即轉到了華北、華中和華東。就在東北國軍陷入絕境的同時，華北戰場上，由傅作義將軍統率的國軍也陷入了困

境。在淮海戰場上，雙方本來實力相當，但到11月中下旬，國軍連遭敗績後，在那裏的兩大主力集團居然一個已遭分割，另一個亦陷入重圍。毛澤東、周恩來從全局考慮出發，決定先在華北對傅作義部採取牽制行動，11月中旬，周代表中央軍委致電華北、東北軍事首長，指示他們下一步要「尤重在抑留傅部於(北)平、張(家口)、(天)津、保(定)地區，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南撤」，並特別指示「東北野戰軍提前於11月25日左右其向關內開動」。[73] 自11月下旬起，毛澤東和周恩來坐鎮中樞，毛運籌帷幄，周協調指揮，淮海戰場上中共各路大軍將士用命，周多年來在國軍內培植留下的各種「關係」也在關鍵時刻「反戈一擊」，國軍各路兵馬被一大口、一大口地吃掉。到1949年1月上旬，在兩個多月之間，解放軍居然在淮海戰場上把號稱80萬之眾的國軍掃蕩殆盡。

之後，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注重心又轉回到華北戰場。此時，那裏給蔣介石留下的已是一盤死棋。1月17日，解放軍經29小時激戰後佔領天津，等於關上了傅作義部從海上南撤的門戶。在周恩來親自指揮運作下，中共對傅作義軟硬兼施，內外夾擊，通過傅的女兒、中共地下黨員傅冬菊，一直把策反工作做到了傅的家裏。1月21日，中共和傅達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74] 至此，長江以北的戰局已定。周恩來說：形勢的發展「實在是突飛猛進」，內戰「戰局已定」，「今年有把握打垮國民黨」；又說：剩下的，只不過是打掃戰場。[75] 周恩來不是一個容易感情衝動的人，但說這番話時，他的信心和興奮卻溢於言表。

七

1949年到來了——這將成為「新中國」的誕生之年。對毛澤東、周恩來和一大班中共領導人來說，在這一時刻，他們心中怎能不充滿着喜悅和憧憬？他們為之奮鬥了二十餘年的革命事業，已經勝利在望。毛在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元旦獻詞中，提出了「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的問題。他的回答是：

> 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

> 僚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76]

面臨着內戰大勢已去的局面，元旦那一天，蔣介石發表了一篇「求和」聲明。他提出，要在「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等條件下，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77] 對此，毛澤東嗤之以鼻。1月14日，毛爭鋒相對地提出了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法統偽憲法、改編一切反動軍隊等與國民黨和談的先決條件。[78] 這些條件，尤其是懲辦戰犯這一條，豈是蔣介石能夠接受的？此時，在國民黨內部，副總統李宗仁等「反對派」與蔣及其所轄的「正統派」之間的矛盾爭鬥也趨於激化。內外壓力交逼之下，1月21日，蔣介石黯然宣佈「下野」，作為應對之策。2月1日，他回到故鄉溪口後，在日記中記道：「甚嘆當政廿年，黨政守舊與腐化自私，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毫未着手，此乃黨政軍事教育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也。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為晚也。」[79] 只是，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在大陸還會有「今後」嗎？

在中共這一邊，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已在為勝利的到來做具體的策劃。1月6日至8日，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開會議，會上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周恩來參與起草的〈1949年的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決議，其中明確指出，「不但就軍事上來說，而且就政治上和經濟上來說，國民黨是被我們基本地打倒了」，中共要做的是：「我們必須把革命進行到底，而不容許半途而廢」。[80] 這裏之所揭，正如毛澤東在一首著名的詩中所寫：「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他和他的同志們絕不會在勝利將要到來的時刻走「中間路線」，而一定要完全壟斷內戰的勝利果實。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舉行了七屆二中全會。自內戰爆發以來，這還是中共大部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幾乎為全部人數的五分之四）第一次會聚一室。他們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討論了內戰最後階段「徹底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方略，也討論了迎接「新中國」建立的各項重大設想和具體計劃。周恩來不僅出席了會議，並又一次親力親為，部署並掌

控會議的警衛事宜。他特地囑咐負責此事的方志純，一定「要有切實的措施和精確的計算」，做到會議的安全萬無一失，有絕對的保證。[81]

毛澤東在會上反覆強調的主題，依然是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只不過，他的言詞之間透露出的思緒和展示的視野，已經超越了「徹底打倒蔣介石的反動統治」這個革命的直接目標，而是把「革命勝利之後向何處去」這個更大的問題放到了思考和表述的中心。他在全會的中心發言中說：

>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齣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82]

從毛澤東後來的一系列作為來看，這番話頗具深意，其實已是他關於革命後「繼續革命」的一番最初的宣示，也是他開始在更高的層面對「將革命進行到底」作出界定。何為「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若以毛的「破、立之道」為標竿，絕不可以僅僅從字面去理解。從歷史後來的發展來看，不由得會想到，毛是否已經在這裏為他將在中國發動的一系列以改造國家、社會、人、人心乃至人性為目標的政治、社會及文化革命留下了重要的伏筆？只不過，在會上聆聽毛的講話時，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恐怕還不會像毛想得那麼遠，也恐怕還意識不到毛這番話的全部涵義。尤其是，他們恐怕絕不會想到，在此後的四分之一世紀裏，毛會把「革命」的定義擴展到何等深廣的地步，並以「繼續革命」的名義，把中國一直帶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種「天下大亂」的可怖的地步。

在對「革命」及其目標的認識和界定上，周恩來和毛澤東的看法並不全然相同。在會上，周恩來也談到了要「將革命進行到底」，但在其意涵上，他和毛不一樣，強調的是要「完全打倒國民黨」、建立並鞏固一個由中共領導的新政權。因此，他發言的重點也集中在中共奪取政權後要適應由戰爭向建設的轉變，也要承擔起使得長久以來處於分裂狀態的國家走向統一的責任；在具體執政的過程中，「不能一下子都集權，一定要授權地方，才能發揮積極性」。[83]

當時，中共領導層已經確定，將由周恩來出任首席代表，以「速決」的方式直接與國民黨談判。從西安事變前開始參與國共談判算起，周恩來和蔣介石、國民黨方面在談判桌上來往交手，已有十來年的親身經歷。但這一次不一樣，以內戰戰場上的壓倒性勝利為後盾，他和中共已在談判桌上佔據了絕對優勢。面對蔣介石發出的和平呼籲，他早已胸有成竹。蔣介石下野後，周向出任代總統的李宗仁發出的第一個信息是：「中間道路是萬萬走不通的」。[84] 在擬定中共方面的和談條件時，他和毛澤東一樣，都堅決主張蔣介石和國民黨必須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並因而必須把「懲處戰犯」當作達成和平協定的前提條件之一。早在1948年底，他們就制訂了一份「戰犯」名單。其中名列榜首的，毫不意外，正是蔣介石本人，李宗仁則名列第二。以後，名單內容雖略有修訂，但名單卻一直存在。這麼一來，其實已注定國共和談幾乎不可能產生為國民黨方面所能夠接受的和平協定。周恩來對此心知肚明，談判開始前，他就對其結局做出了三種估計。第一種，國民黨改組政府，並承認中共提出的八條；第二種，美國出兵；第三種，和談不成，兩邊繼續打下去。他認為，國民黨不會全盤接受中共的條件；美國出兵的可能性不大，且中共「已有準備」。和談結局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三種，就是不會有結果，內戰會繼續打下去。[85]

4月1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一干中共代表開始同張治中等國民黨方面的代表正式接觸。周、張兩人是老對手，也是老朋友，在談判桌上曾多次相遇，但從未發生過面紅耳赤的爭吵。想當初，即便在國強共弱的背景下，張也幾乎從來沒有令周難堪。但這一次，周恩來一見到張治中就給他來了一個「下馬威」，質問張：「你為什麼在離開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見蔣介石？」這其實是一個相當無理的問題。蔣雖已宣告下野，但國民政府的實際軍政大權仍然掌握在他的手裏，和談的進程及結果，若沒有他的首肯，如何能在國民黨方面起作用？張正是如此回答周的。但周立即表示：「這種由蔣導演的假和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86] 和談開始時的這一幕，實際上已經預示，它最終難以達到結束內戰、實現國內和平的目標。

之後，雙方展開個別交換意見。談判主要的癥結有三：懲辦戰犯，中共部隊渡江，國民黨軍隊改編。南京方面，李宗仁只是名義上的「代總

統」，實權仍在蔣介石手中。中共方面，毛澤東也親自出馬，以「輕鬆而又深入」的方式做張治中等對方談判代表的工作。但這只是表面文章，雙方在三個癥結問題上的根本分歧並沒有真正縮小。張治中等認為，周恩來代表中共方面提出的協定草案「實為一紙降書，南京方面必不接受」。[87] 4月13日，雙方開始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議，周也鄭重地將中共方面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交給張治中等，並說明：如果南京政府真正接受八項條件，一切都好商量。周還特地說明：「中心問題是接收和改編」國民黨軍隊，這「關係到人民革命是否進行到底的根本問題，是不能讓步的」。[88] 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抗戰前後國共之間的談判，軍隊接管和改編，也正是蔣介石抓住不放、堅持向周和中共提出的最基本的條件。只是時勢轉變，這一條現在變成周恩來對國民黨提出的和談基本條件了。

第二天，周恩來一方面委託中共的另一談判代表李維漢，向在北平的一些「民主人士」報告第一次談判的經過及南京代表團的意見；[89] 另一方面親自和張治中長談，解釋中共方面的立場。當晚，他就接到張交來的國民黨代表團對協定草案的四十餘條修改意見。4月15日，雙方舉行了第二次正式會議，雙方唇槍舌劍，但周和中共方面絕不肯在三個癥結問題上做任何實質性讓步。當晚，周將中共方面關於《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後修正案交給張治中等，其中在措辭上做了不少修改，去掉了不少「刺激性」的用語，但渡江並接管政權、懲辦戰犯及軍隊改編這關鍵的幾條依然未變。周恩來強調，這是定稿了，並限定國民黨方面在4月20日以前答覆，不然中共部隊將即行渡江。[90] 張治中等國方談判代表反覆商議之下，覺得別無出路，只能接受修正案，並提交南京方面批准。北平的這場和談，也走完了它的歷程。

4月20日，李宗仁攜行政院長何應欽正式拒絕接受協定修正案，稱其「不啻為征服者對被征服者之處置」。[91] 當日子夜起，解放軍開始大舉強渡長江，幾天後，便佔領了南京，國民政府南遷廣州。長江以南，內戰的戰火仍在延燒之中，但解放軍的攻勢卻如洶湧的狂潮，席捲並沖毀着對手的脆弱的防禦體系。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已接近徹底瓦解。

八

這些年來，周恩來一直是中共涉外事務的主導者和參與者，但他是以反政府的「革命力量」代表的身分來處理外交問題的。隨着「新中國」誕生日益臨近，他和中共將成為國家的執政者，所要應對及解決的外交問題也將發生質變，他和中共也將面臨新的挑戰。

周恩來在這方面碰到的第一件大事，是在1948年11月初中共部隊佔領瀋陽後發生的。多少有點出乎他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意料，當解放軍進駐瀋陽後，美國駐瀋陽總領事瓦爾德（Angus I. Ward）及領館人員居然沒有撤離，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幾天後，應瀋陽軍管會主任朱其文之邀，瓦爾德和英法總領事和蘇聯商務代表一道，與朱在辦公室會晤。之後，朱未經請示批准，又自作主張地回訪了美、英、法三國領事，並表示願意看到美商「在平等的基礎上恢復在東北的貿易活動」。周恩來接到瀋陽方面就此事的報告後，馬上就意識到朱的舉動極不妥當。本來，美、英、法領館等不從瀋陽撤走，就已引起了蘇聯方面的警覺，認為它們「是有政治企圖的」。[92] 朱其文的做法更可能會導致蘇聯人的不滿和美國人的「幻覺」。同時，身為中共的情報首腦，周還擔心在內戰仍在進行的情況下，美國領館會成為一個情報收集的據點。周和毛澤東商量後，在11月10日給東北局的一份電報中直指「朱其文的行為極為不當」，並強調「英、美、法等國既然不承認我們的政府，我們當然也不承認他們的領事」。他並指示，要「利用目前的軍事管制」，「封鎖和孤立美、英等國在瀋陽的外交機構」，讓他們「被迫撤退」。周還特別強調，在外事問題上，要「嚴格按照中央方針行事」，並及時彙報請示。[93]

然而，瀋陽軍管會並未嚴格執行周的指示。11月15日，又未請示中央，便下令美、英、法「前領事館」在36小時內交出所持有的電台。[94] 之後，又因未獲中央指示，沒有立即採取行動。11月17日，毛澤東親自出馬致電東北局書記高崗，對朱其文等的「幼稚行為」提出嚴厲批評。[95] 第二天，毛又再次致電東北局，下令「以軍管會名義」收繳美領館電台，並限制美國等「舊領事館的人員」的行動，以「達到我們內定之擠走英、美、法等國領事的方針」。[96] 這之後，瀋陽軍管局又報告，美國領事館捲入了間

諜活動。這馬上引起了周恩來的高度警覺，並下達了切斷瓦爾德和其他美方人員的外部聯繫，禁閉在領館內的命令。[97] 這一事件，演變為美國與中共之間一場將持續一年之久的外交對峙。[98]

在對「瓦爾德事件」的處理中，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感到了面對更為複雜的外交問題的迫切性。首先，這件事涉及到了中共同蘇聯的關係問題。毛、周等在處理此事時，從一開始就極為重視在東北有着「特殊利益」的蘇聯的看法，一再強調，要認真聽取「辰兄」的意見。由此引申開去，當然也促使他們深入思考新中國同蘇聯結盟這樣的關乎「國本」的大問題。其次，毛、周在處理此事的過程中，也碰到了如何應對美、英、法等西方國家的一個活生生的實例。他們在決心堅持「反帝」的原則立場的同時，也看到他們可能很快便要面對在西方國家採取主動的情況下，是否考慮同這些國家建交的問題。而歸根結柢，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取決於他們對新中國國際定位的思考和外交上大政方針的確定。

在1949年1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外交問題是一場重頭戲。周恩來在講話中提出，中國人民「百年來受壓迫，現在站起來了，要有些氣概」。[99] 會後，中共中央發佈了由周恩來起草、經毛澤東審改後定稿發佈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確地為新政權規定了在外交承認問題上「另起爐灶」的原則：「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因此，新政權不能承認帝國主義國家「現在派在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為的是「使我們在外交上處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100] 這也意味着，新中國將以一個「革命國家」的身分和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然而，歷史的發展從來就充滿弔詭。與這次政治局會議在西柏坡召開幾乎同時，1月10日，毛澤東收到了斯大林關於國共和談問題的一份電報。這位蘇聯領導人提出：蔣介石的和談建議是為了宣示他「贊成停戰，主張和平」，中共不應斷然拒絕，但也絕不能讓美國參與調停；如需要調停，要由蘇聯出面來做。[101] 毛讀後，心中很不爽快。兩天後，他在給斯大林的長篇回電中表示，中共主張在沒有外國調停的情況下直接同國民黨談判，並「要求南京政府無條件投降」。[102] 有意思的是，兩天後毛澤東居然收

到了一封發出日期標明為1月11日的斯大林來電，其中完全改變了斯大林1月10日來電中的意見，強調他主張中共同蔣談判，是因為蔣不可能在沒有美國參與調停的情況下同中共談判，因此必定會拒絕中共的和談建議，這樣他就必須承擔破壞和平的責任了。[103] 1月14日，斯大林又給毛送出了另一份電報，作為對毛四天前來電的回覆，建議中共應和國民黨談判，同時提出蔣無法接受的條件。[104] 毛立即回電，表示同意斯大林的建議。然而，毛在心底裏的想法卻是，斯大林來電的真正意圖是想讓中共考慮同國民黨達成「隔江而治」的協議，不打過長江去。[105] 若是這樣的話，豈不是同他「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主張背道而馳嗎？

就在毛澤東和斯大林都多少覺得有點尷尬的情況下，1月31日，蘇共政治局委員阿納斯塔斯·米高揚（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作為斯大林的代表來到西柏坡，逗留了一週，和毛澤東及中共其他領導人舉行了密集的會談。[106] 這件事，有一段較長的策劃過程。1948年春，隨着中共在內戰中已佔據上風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斯大林也對和毛澤東見面產生了興趣，當毛表示希望面見斯大林時，這位蘇聯領導人很快就向毛發出了秘訪莫斯科的邀請。當時，毛澤東正和周恩來等一道，從陝北轉往西柏坡。但為了要準備訪蘇，1948年4、5月間，毛和周分道而行，在河北阜平縣城南莊逗留了一個多月。後來，斯大林又改變了主意，表示中國內戰正處於緊要關頭，毛不宜遠行，他可以派一名政治局委員到中國聽取毛的意見。[107] 毛澤東這才停止訪蘇的準備，轉赴西柏坡與周恩來等會合。在1月初斯大林和毛澤東之間就和談問題的電報往來後，為了避免雙方之間的誤解擴大，加深對毛及中共領導層的政策及意圖的了解，幾天裏，斯大林就決定讓米高揚啟程來中國。

在中、蘇兩黨的交往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蘇共的一位政治局委員到中國專訪中共領導人的先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對這件事自然極為重視。周恩來親自出馬，對米高揚來訪的接待和保衛工作做了詳盡周密的安排，務求萬無一失。[108] 米高揚到西柏坡後，周幾乎全程陪同，不僅參加了毛澤東牽頭下中共領導人與米高揚的大部分會談，還兩次和米高揚單獨見面談話。毛澤東向米高揚介紹了中共的發展歷史，並一再強調，中共從建立、到觀念和路線的確立，再到一步步發展壯大，都得到了蘇共的指導和

幫助。內戰中，「你們對滿洲的軍事援助佔蘇聯外援的四分之一，這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毛提出，希望蘇共「在中共中央設立代表機構」。周恩來在一旁馬上插話幫腔道：「（我們）真希望蘇聯離中共的距離近些」，這是因為中國革命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要在莫斯科解決的」。毛還一再表示，中國在國際反帝鬥爭中將堅決站在蘇聯一邊，因為「中間道路是沒有的」。[109] 2月1日，周在和米高揚單獨會談時，詳細介紹了中共和美國交往的歷史：雙方的正式接觸始於美軍觀察團1944年到延安的訪問，但後來，在馬歇爾調停期間，中共拒絕美方的調停後，兩邊的關係就中斷了。周表示，中共對美國「不會挑起爭端，但如果美國反對我們，我們就堅決回擊」。他還同米高揚討論了「戰後的經濟恢復工作，成立新政府的總體規劃與設想、對外關係、外貿管理以及中國民主黨派等問題」。[110] 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和朱德一道，和米高揚討論了軍事問題，以及中共和蘇聯之間的情報交換和合作問題。他提出：「我們想請求蘇聯給我們派一些專家和提供製造武器的設備，並派遣一些顧問幫助我們訓練部隊、建立軍事院校和組織包括軍事工業在內的後勤工作。」[111] 米高揚過去與周沒有什麼直接接觸，這次秘訪後，他說了一句話：周恩來應該是中共新政府最合適的總理人選。[112]

米高揚回蘇聯後，馬上就他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會談的情況向斯大林做了詳細的彙報。毛、周講的話起作用了，斯大林聽進去了。這之後，蘇聯加強了對中共的各種援助。[113] 在中共方面，3月13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做總結報告時，講到中蘇關係時明確表示：

> 中蘇關係是密切的兄弟關係，我們與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此點。現在在非黨人士中，也要說明此點，也要做這種宣傳。[114]

米高揚訪華，成為中共與蘇聯關係發展及深化的一個新起點。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共與蘇聯關係不斷增進的幾乎同時，美國人也向中共伸出了觸鬚。3月下旬的一天，周恩來收到來自上海的一份報告：3月25日和26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專程從南京到上海，同「親共」的民主人士陳銘樞秘密會晤。司徒雷登特別提到了

美國人的兩大顧慮：第一，「中共將在蘇、美的對抗中站在蘇聯一邊；第二，中共以武力統一全國後，將會停止同民主人士的合作並放棄民主聯合政府」。他表示，如果「中共能夠真正實行民主，成立一個真正和平獨立民主自由的聯合政府」，同時「改變對美之態度，制止反美運動，如此，美國定願與中共實現友好關係並援助新政府復興與建設新中國」。[115] 司徒雷登在日記中寫道，他在上海和陳銘樞長談了三個鐘頭，「談及了糾正中共對美國的誤解並遏制其偏執等問題」。三天後，他又不顧天氣惡劣，偕秘書傅涇波乘專機從南京飛到上海，在友人家中與陳銘樞長談了三小時，第二天長談了三小時。[116] 周恩來接到報告後，馬上向毛澤東做了彙報，但未對美方做任何回應。

司徒雷登不知道的是，在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發言中特別強調：「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現在不應急於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後的一個相當的時期內也不必急於解決。」[117] 毛、周的這些話，實際上已為中共建政後將執行向蘇聯「一邊倒」、以「反對美帝」為基本特徵的對外政策奠定了基調。後來看，這也是新中國將在國際事務中成為向現存國際體制和體系提出挑戰的「革命國家」的預示。

九

解放軍佔領南京、國民政府南遷廣州後，毛澤東、周恩來發現，他們面臨的外交局面更為蹊蹺，似乎也更為複雜了。一方面，蘇聯大使羅申居然跟着國民政府去了廣州。另一方面，司徒雷登卻沒有去廣州，而是留在了南京。在此後的幾個月裏，中共整個對外政策動向，尤其是與美國和蘇聯的關係，也在周恩來和劉少奇的分別主導下，沿着與美國走向對抗、與蘇聯走向結盟這兩條主要線索，發生了一系列極具震盪性的變化。

南京解放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對司徒雷登的動向極為關注。儘管中共領導層當時已經確立了對外政策的「反帝」原則，但毛、周都是操弄「統一戰線」的老手和高手了，他們固然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妥協，但美國人既然送上了這麼一束橄欖枝，他們也不會隨手就扔到垃圾箱裏去。他們覺得需要考慮，美國對華政策是否正朝着「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的方向轉變」。他

們的想法是：「現美國託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英國亦極力想和我們做生意。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118] 解放軍佔領南京的第二天，幾名士兵擅自進入美國大使館，並闖入司徒雷登臥室「施行室內檢查」。周恩來接到報告後，不禁大怒，當即親自起草了以中央和軍委名義給解放軍總前委的電報，明確提出：「對待各國駐華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及其他外交機關，早經規定一律予以保護，非經特許不得施行室內檢查。」[119]

與此同時，毛、周作為久經沙場的軍事統帥又清楚地知道，儘管內戰已近尾聲，但越是在勝利將要到來的時候，越不能忘記美國干預的危險仍然存在。早在1月19日，中央關於外交政策的指示中便強調：「我們從來就是將美國直接出兵佔領中國沿海若干城市並和我們作戰這樣一種可能性，計算在我們的作戰計劃之內的。現在這一種計算仍然不要放棄，以免在事變萬一到來時，我們處於手足無措的境地。」[120] 在解放軍先後佔領南京和上海後，毛澤東又特地致電各部首長，提請他們注意「今日各帝國主義國家有聯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徵」，尤其是「青島增加了美國軍艦」。他因而強調，「我們應當預籌對策，以期有備無患」。[121]

為了摸清美國人的虛實及底牌，周恩來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將派遣自己的一位助手、1930年代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學校長時曾是他的學生的黃華，出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一職。他並向黃面授機宜：「可以作為燕京大學校友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黃動身南下前，周又指示他：要「特別注意了解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要事事謹慎，多請示報告」。[122] 5月1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起草了一份以毛的名義發給南京市委和華東局的電報，指示黃華，「可以與司徒雷登見面，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但「見面時多聽司徒雷登講話，少說自己意見」。電報明確提出，美國若真的要同中共發展關係，「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餘力量的聯繫」。[123]

黃華去南京赴任時的感覺是，「中央十分注意美國是否會對新中國政權進行武裝干涉」。5月13日，他在同司徒雷登的第一次談話中，就直截了當地提出，美方「應該將美國駐青島等地的海軍艦隻和陸戰隊撤走，以免發生衝突」。[124] 司徒雷登在下一次談話中即向黃通報，美軍已於5月21

日從青島撤走。[125] 毛澤東、周恩來對此極為看重。6月3日，周恩來在以中央名義發給南京市委轉告黃華的電報中說：「青島美軍艦隊確已退走」，同時擺出一副投桃報李的姿態，指示黃華「可向司徒或傅涇波透露個人看法，新政協在佔領廣州後召開」。[126]

在周恩來的遙控之下，黃華在與司徒雷登的秘書傅涇波先行接觸後，從5月中旬到6月上旬，同司徒雷登有過三次深入的交談。然而，他們兩人——以及遠在北平的周恩來——很快就發現，他們進行的其實是一場「雞狗之間的對話」：他們沒有共同的政治語言，更沒有國際規範和行為準則上的共識。司徒雷登一再強調美國在華利益的合法性，並竭力試圖說服中共，應「願意並有能力承擔中國的國際義務」。實際上，他是將中共接受美國關於國際規範和準則的定義當作建立雙邊關係的前提。黃華一再指出，中共與美國發展關係的前提條件是美國必須和國民黨政府斷絕一切關係，並使得中美之間的一切交往都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之上」。[127] 到頭來，黃華和司徒雷登越是談下去，就越能感覺到他們之間在政治觀點上——尤其是他們所代表的政治文化上——存在巨大差異。

6月8日，傅涇波向黃華提及：「司徒雷登有意在返美前到北平見周恩來」，這樣，他「知道中央更高級方面的意見後，回去講話才有力量」。[128] 周收到南京市委的報告後，既對司徒雷登的想法表現出興趣，又在應對此事時極為小心。6月14日，他以中央名義電告南京市委：可同意司徒雷登和傅涇波「到燕京大學一行」，但能否和周見面，則需「待其到北平後再定」。[129] 為了不使司徒雷登產生中共有求於他的念頭，周又決定，請燕京大學校長陸志偉出面，以私人名義邀請司徒雷登以燕大前校長的身分到北平走一趟。[130] 幾天後，傅涇波告知黃華，美國國務院已同意司徒雷登與中共聯絡。[131] 周恩來隨即指示黃華告知司徒雷登，他「去燕京一行」也已獲同意，「彼希望與當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只是，周又強調，中共「對美帝亦絕無改變其政策的幻想」。司徒雷登訪問北平及與中共領導會面二事，均由他「主動提出，絕非我方邀請，此點必須說明，不能絲毫含糊，給以宣傳藉口」。[132] 司徒雷登答道：因美國國會將於7月底休會，時間上恐來不及，同時國會內派別複雜，此時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評論。他將報告艾奇遜，由艾決定他是否去北平。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怪事。6月3日，澳大利亞記者基昂（Michael Keon）向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布轉達，周恩來是中共黨內自由派的代表，他認為：「中國已處於經濟全面崩潰的邊緣，因而急迫地需要來自國外的援助，而這卻是蘇聯所無力提供的，而只能來自美國和英國」，因此，「中美之間若能建立起良好的工作關係，必定會軟化中共對於西方國家的態度」。但當美方試圖同「周的代表」接觸時，卻沒有獲得任何回應。[133] 這一段故事披露後，曾引起學界重視。幾十年過去了，從現有資料看，已可以肯定周從未做過上述表示；這個「信息」多半是由試圖在中共和美國之間擔任「中間人」角色的第三者炮製出來的。其實，周當時已知悉這個謠言。7月24日，他在給南京市委的一份電報中提及：「傅（涇波）所傳基昂報告，完全是挑撥試探之詞，因周（恩來）從未與北大任何教授單獨談話，亦從未談到在經濟須與美國徹底合作。」[134] 周甚至懷疑，這可能是傅為「自重」而放出的謠言。他在另一份電報中指示，黃華若在傅離境前遇見他，「亦可預告以（後）勿做任何招搖撞騙的事，免致將來難於見面」。[135]

其實，就在中共和美國之間這一番各懷盤算的「暗通款曲」發生的同時，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正在發生突破性的轉變。關於周恩來派遣黃華和司徒雷登秘密接觸之事，中共並不是瞞着莫斯科來做的。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黃華每次和司徒雷登或傅涇波見面後，都會向列托夫斯基通報會談的內容。毛澤東和周恩來也曾親自出面，通過蘇聯派往中共的總顧問科瓦廖夫（Ivan Kovalev）不斷向莫斯科通報相關情況。[136] 從春天起，作為對米高揚訪問西柏坡中共總部的回報，中共領導層決定，將派出一個高級代表團訪蘇。6月初，又決定由黨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率領這個代表團。

6月26日，劉少奇抵達莫斯科，開始了對蘇聯長達兩個月的訪問。第二天，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宮親自會見劉，主動表示將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的低息貸款，並提供包括派遣專家在內的其他各方面的援助。[137] 7月4日，劉代表中共向斯大林提呈了一份報告，表明「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138] 斯大林在此後同劉少奇的會談中，不僅對中共作出高度評價，說革命的中心開始轉到中國和東亞，還同意為中共提供各種援助，派出軍事顧問和各方面的專家，甚至對

蘇共過去在中國革命上的一些做法表示了歉意。斯大林還提出，中蘇在推動世界革命運動中要有分工合作，「你們要在東方和殖民地、殖民地國家發揮更大的作用」。[139] 當劉少奇與蘇方的討論涉及到軍事問題時，由於周恩來當時是解放軍總參謀長，也涉入其中，為此與劉少奇有諸多電文往來。[140] 8月中旬，劉少奇啟程回國時，可以說是滿載而歸。

所有這一切，都使得中共和蘇聯的關係出現飛躍的條件成熟了。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聲明，宣佈「新中國」將與蘇聯建立特殊關係，在已趨兩極化的世界格局中奉行對蘇聯和蘇聯集團「一邊倒」的國際政策：

> 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必須一邊倒。[141]

黃華和司徒雷登的會面以及後者訪問北平的計劃，本來就極不順利。毛澤東發表了「一邊倒」聲明後，事情的發展更是急轉直下。華盛頓立即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並命令他必須於7月25日前直接返回華盛頓，中途不得停留。[142] 8月初，司徒雷登黯然離開中國。幾乎同時，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一大篇關於中美關係的《白皮書》。毛澤東親自為新華社寫了五篇時評，從歷史和現實政治的角度，對於美國的對華政策作了極為嚴厲的抨擊，隨之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反美宣傳。中美全面對抗的帷幕，也由此而拉開了。

在上述這一切發生的同時，在中國的南方、西南、以及偏遠的西北地區，內戰仍然進行中。在1949年的最後幾個月裏，蔣介石雖已着手展開向台灣等沿海島嶼的全面撤離，但仍然試圖像他在抗日戰爭中做過的那樣，將大西南轉變為抵抗中共軍隊大規模進攻的最後堡壘，但他的計劃徹底失敗了。1949年12月12日，他從成都——當時四川省第二大城市——匆匆登上一架飛機，前往台灣。這也是他對大陸的最後告別。此刻，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知道，除了佔領台灣、海南、西藏等地仍需花費較大的力氣外，中國大陸各處的戰事已經底定，國民黨的殘餘部隊不可能再掀起大的風浪了。他們已經可以確定以勝利者的身分，全力策劃並迎接一個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的誕生。

註釋

引言

1 周恩來的遺容瞻仰沒有向公眾開放，而是通過極為嚴格的審查程序來「組織進行」。結果，甚至連周的很多親屬、下屬和關係緊密的同事和友人都被拒之門外。否則，前來瞻仰遺容的人數又怎會只有幾千人？

2 關於毛澤東為什麼沒有出席周恩來的追悼會，當時已引起了種種猜測和議論，多年後更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官方的解釋是，毛澤東當時的身體狀況極差，已經無法外出。毛晚年一直隨伺其身旁的張玉鳳便曾為此說做過旁證。問題在於，難道毛連象徵性地對周的遺體告別也做不到嗎？按照當時任毛保健醫生的李志綏的說法，周恩來逝世後，「一組（毛周圍的人員）的日子依舊歌舞昇平。……每天照舊放映電影」。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1994），第584頁。若李的說法確切，那麼其中之意味又怎能不引起人們的種種猜測與聯想？

3 《人民日報》，1972年1月16日，第1版。值得注意的是，悼詞沒有稱周恩來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4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98–202頁；力平、馬芷蓀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730頁。

5 〈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文匯報》，1976年3月25日，第1版。關於此事，一些當事人後來曾澄清說，這篇文章的出現其實同周恩來沒有關係。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第624頁。當時讀了這篇文章的人們，很難不將其視為「反周」的影射。

6 關於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參見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第624–628頁；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2006），第424–425頁。

7 逄先知、李捷等：《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1774頁。

8 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第282頁。

9 逄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第645–646頁。

10 關於這一宏大轉型過程的研究和討論，一本值得注意的著作是傅高義：《鄧小平時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又參見Odd Arne Westad and Chen Jia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China's Road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4)。

11 參見《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2 Han Suyin, *Eldest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98–1976* (New York: Kodansha America, 1994), p. v.

13 關於對周恩來的批判性看法，各方議論甚多。其中影響較大者，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Carle Place, NY：明鏡出版社，2009）。

14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5). 在這本毛傳中，張戎和哈利戴筆下的周恩來也屬反派角色。然而，他們引用資料的做法受到了很多歷史學家的尖銳挑戰。用另一本《毛澤東傳》作者潘佐夫和梁思文的話來說，張戎和哈利戴的毛傳「因為資料不可靠和評價上的偏頗而在學術界受到了批判」；Alexander V. Pantsov with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p. 5。

15 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08–209頁。

16 高文謙是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周恩來傳，1949–1976》、尤其是文革部分的主要作者。他關於周恩來的早期論著，參見高文謙：〈在最後的日子裏——記病重住院期間的周恩來同志〉，《人民日報》，1986年1月4日，第4版；《中華英烈》創刊號；高文謙：〈艱難而光輝的最後歲月——記「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周恩來〉，《人民日報》，1986年1月5日，第4版；《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1期；高文謙：〈周恩來與中國共產黨的三次「左」傾錯誤〉，呂星斗、白雲濤、田百春編：《周恩來和他的事業》（北京：中共黨校出版社，1990），第30–51頁。

17 高文謙所著《晚年周恩來》雖在中國內地成為禁書，但在中國讀者、尤其是在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在這本書的基礎上，高又增寫了敘述討論周恩來早年生涯的七個章節，由Peter Rand和Lawrence R. Sullivan譯為英文並出版；*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trans. Peter Rand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18 芭芭拉·巴努茵（Barbara Barnouin）、余長更：《周恩來的政治生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第253頁。

19 1984年，英國著名記者迪克·威爾遜（Dick Wilson）出版了一本曾產生相當影響的周恩來傳（*Zhou Enlai: A Biography* [New York: Viking, 1984]），試圖對周恩來的生涯作全面的敘述和深入的探討。但是，威爾遜寫作此書時未能以檔案文獻的研究為基礎，因而有其明顯而無法避免的時代局限。

20 在本書英文版出版後，我得知有人把"revolution is no sin"翻譯成「革命無罪」。這是不恰當的，在英文中，"sin"和"crime"有著完全不同的涵義。因此，我謹請讀者諸君注意，我在這裏說的是「革命不是原罪」。

第1章

1 這座小城的名字，近代以來曾幾度變遷。周恩來出生時，小城是山陽縣城所在地。1912年，城市名改為淮安，並一直沿用至今。為避免混亂，本書提到周恩來出生地時，一概使用「淮安」。

2 1940年，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在上交共產國際的一份關於周恩來的報告中，稱周恩來「是一個已破產的官僚世家子弟」。鄧穎超：〈關於周恩來同志〉，1940年2月22日於莫斯科，ф. 495, оп. 225, д. 139,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РГАСП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

3 儘管周恩來出生於淮安，但因周氏家族來自於浙江紹興，周恩來的祖父便是那裏出生的，周恩來也一直將紹興當作「祖籍」或「籍貫」。

4 李海文主編，秦九鳳、周秉宜、張能耿副主編：《周恩來家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第1–5頁。在關於周恩來家世的諸多著述中，這是最為詳盡、完整及可靠的一本。

5 〈周恩來在魯迅逝世兩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新華日報》，1938年10月20日，轉引自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第1頁。

6 李海文主編：《周恩來家世》，第114–119頁。

7 同上，第140–151頁。

8 同上，第151–156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編：《周恩來自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第2頁。

9 《周恩來自述》，第2頁。

10 周恩來後來曾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說：「當我還在繈褓中時，嬸母就成了我真正的母親。直到我十歲，她和我的生母都亡故時，我甚至連一天都沒有離開過她。」參見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38), p. 86。在《西行漫記》的多種中譯本中，周恩來的這段身世敘述卻被刪去了。

11 〈周恩來同志談個人和革命歷史：同美國記者李勃曼談話記錄〉，1946年9月，《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1期，第5頁。

12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5頁。

13 〈周恩來同志談個人和革命歷史〉，第5頁；鄧穎超：〈關於周恩來同志〉，1940年2月22日於莫斯科，ф. 495, оп. 225, д. 139, РГАСПИ；《周總理與故鄉》編輯組：《周總理與故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第17–18頁。

14 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6頁；李海文主編：《周恩來家世》，第225–227頁；《周總理與故鄉》，第19–21頁。

第2章

1 李海文主編：《周恩來家世》，第273–274頁。

2 同上，第206–207頁；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6頁。

3 周恩來後來說：「十二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裏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周恩來同志談個人和革命歷史：同美國記者李勃曼談話記錄〉，1946年9月，《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1期，第6頁。

4 關於周恩來自己成為南開學生後對這些事件對中國利權之損害的討論，參見周恩來：〈或多難以固邦國論〉（1915年冬），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第61–63頁。

5 力平、方銘主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9頁。

6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1頁。

7 〈周恩來同志談個人與革命的歷史〉，第6頁。

8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1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0頁。

9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0頁。

10 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2頁。

11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0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0頁。

12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4頁；李海文主編：《周恩來家世》，第168頁。

13 關於嚴修生平及事跡，參見李冬君：《中國私學百年祭：嚴修新私學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繫年》（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14 鄭致光主編：《張伯苓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孫彥民編著：《張伯苓先生傳》（台北：中華書局，2018）。

15 天津南開中學編著：《周恩來南開中學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第216–217頁。

16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3頁；李愛華：〈關於「周恩來是南開學校唯一免費生」問題的史實考證〉，《黨的文獻》，1997年第2期，第95–96頁。

17 《周恩來南開中學歲月》，第2章。

18 〈周恩來同志談個人和革命的歷史〉，第6–7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0頁。

19 《周恩來南開中學歲月》，第58頁。

20 同上，第60–61、138–139頁。

21 周恩來：〈本校十一週年紀念新劇《一元錢》記〉（1915年冬），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55–56頁；《周恩來南開中學歲月》，第188–193頁。

22 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 eds.,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81.

23 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21–22頁。

24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5頁。

25 吳國楨：《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第24–25頁。

26 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57頁。

27 同上，第45–48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5頁。

28 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169–172頁。

2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2頁。
30 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14、75頁。
31 《周恩來南開中學歲月》，第328–332頁。
32 同上，第271–272頁。
33 〈為郭思寧題詞〉，1917年8月30日，中央檔案館編：《周恩來手跡選》第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第3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3頁。

第3章

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3頁；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7頁。關於周恩來怎樣從中國去日本，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他先到了東北，在瀋陽探訪已調任那裏的伯父後，乘火車經安東（今丹東）過鴨綠江進入當時已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到釜山港後再乘船到達日本（參見Lee, *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 pp. 78–79）。本書採納的是《周恩來年譜》和《周恩來傳》中的第二種說法。
2 李愛華編：《周恩來中學時代紀事長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470–471頁。
3 《周恩來青年時代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第13頁。
4 周恩來日記，1918年1月11日，《周恩來旅日日記》手稿影印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無頁碼，日記影印件按時間順序排列。
5 周恩來日記，1918年1月29日。
6 周恩來日記，1918年2月15日。
7 在周恩來這一段日記中，幾乎每日都有同昔日南開同學和朋友們交往的記載，這成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第1頁。這個雜誌的名字由第2號起改為《新青年》。
9 周恩來日記，1918年2月15日。
10 同上。
11 周恩來日記，1918年2月9日。
12 無論在周恩來的日記中或在他周遭朋友們的回憶中，都沒有關於他可能為同性戀者的任何記述。如此，又怎能從日記中寫下的關於婚姻與情愛的上述看法捕風捉影，武斷地得出他肯定是「同性戀者」、並一生均在政治上受到這一「隱私」及「原罪」的羈絆的結論呢？
13 周恩來日記，1918年2月15、16、17日。
14 周恩來日記，1918年2月11日。
15 周恩來日記，1918年2月15日。
16 周恩來日記，1918年2月17日。
17 周恩來日記，1918年2月18日。
18 周恩來日記，1918年2月19日。

19 同上。
20 周恩來日記，1918年2月4日。
21 同上。此種當年就被周恩來認為絕無可取之處的現象，難道不是我們在進入21世紀後的今天依然常常可以看到的嗎？真是發人深思。
22 周恩來日記，1918年3月10日。
23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6–37頁。
24 周恩來日記，1918年4月4日。
25 周恩來日記，1918年5月2日。
2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7頁。
27 周恩來日記，1918年5月4日。
28 周恩來日記，1918年5月10日。
29 周恩來日記，1918年5月19日。
30 周恩來日記，1918年7月4日。
31 周恩來日記，1918年7月5日。
32 周恩來日記，1918年8月7、8、9日。
33 周恩來日記，1918年8月26、27日。
34 周恩來日記，1918年4月23日。
35 周恩來日記，1918年10月20日。
36 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298頁。
37 同上，第300頁。
38 周恩來致陳式周信，1920年1月30日，《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第24頁。

第4章

1 陳獨秀：《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388頁。
2 關於這一問題最好的研究之一，仍屬Lin Yusheng,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3 參見李大釗：〈威爾遜與平和〉，《李大釗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285頁；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第113–114頁。
4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164、170–171頁。
5 同上，第187–188頁。顧維鈞談到，中國代表團曾要求將這一交易的文本遞送巴黎，但裝有文件的箱子卻在遞送途中消失了。顧懷疑這是日本情報機構的勾當。
6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86.
7 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61–262.

8 同上。
9 轉引自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第505頁。
10 周恩來給留日南開同學的信，1919年5月，《周恩來書信選集》，第3–4頁。他在信中寫道：「我是現在天天到南開去的。我是愛南開的。」
11 周恩來致南開同學信，1919年5月上旬，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302–303頁。
12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47–48頁。
13 金鳳：《鄧穎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參見鄧穎超簡歷，1940年1月21日，ф. 495, оп. 225, д. 139, РГАСПИ（但這一簡歷把鄧穎超的出生年份錯寫為1903年了）。關於鄧穎超在五四時期的經歷，參見金鳳《鄧穎超傳》第2章的討論。
14 參見Chael-Jin Lee, *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1–122。
15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48頁。
16 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304–305頁。
17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50頁。
18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2頁。
19 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310頁。
2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2–33頁。
21 諶小岑：〈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天津「覺悟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第579–597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52頁。
22 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332頁。
23 天津歷史博物館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364–365頁。
24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54頁。
2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5頁。
26 同上，第36頁。
27 力平：《周恩來一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第39頁。
28 周恩來對此事有過一個詳盡的敘述，參見懷恩編：《周總理青少年時代詩文書信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第189–190頁。
29 周恩來的相關敘述，見同上，第199–201頁。
3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3頁。
31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58–59頁。
32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1頁。
33 周恩來曾提供過一個他和難友們在獄中講話的清單。參見懷恩編：《周總理青少年時代詩文書信集》第1卷，第302–304頁。
34 同上，第385–386頁。
35 〈周恩來同志談個人和革命的歷史〉，第7頁。

36 周恩來給陳式周的信，1921年1月30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23–24頁。陳式周是周恩來嗣母陳氏的侄子，比周恩來大約年長十歲，在周恩來童年時期與周的關係極為密切。

第5章

1 懷恩：《周總理青少年時代詩文書信集》第1卷，第258頁。
2 嚴仁賡：〈周恩來和嚴修〉，《黨的文獻》，1990年第4期，第86頁；參見嚴修本人在1921年2月27日、3月13日日記中關於為周恩來提供經濟資助的記載，《嚴修日記》第4卷（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第2354、2356頁。
3 周恩來給陳式周的信，1921年1月30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24頁。
4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4頁。
5 周恩來致嚴修信，1921年2月8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29頁。
6 謝樹英：〈與周恩來同船赴法的回憶〉，轉引自力平：《周恩來一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第44頁；謝樹英：〈八十七春秋憶往事〉（遺稿），《北京文史資料選輯》第36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第89–129頁。
7 周恩來：〈檢廳日錄〉，1920年11月24日，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390–485頁；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4–45頁。
8 周恩來給嚴修的信，1921年1月25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17頁。
9 周恩來給嚴修的信，1921年2月8日，同上，第28頁。
10 同上。
11 《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續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第70頁。
12 周恩來：〈歐戰後之歐洲危機〉，《益世報》，1921年2月1日，轉引自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493–494、498頁。
13 周恩來致嚴修信，1921年1月25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20頁。
14 周恩來致陳式周信，1921年1月30日，同上，第23–27頁。
15 同上，第23–24頁。
16 周恩來致嚴修信，1921年2月9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28頁。
17 周恩來致陳式周信，1921年2月23日，同上，第30–31頁；在這封信中，周恩來提到住在巴黎可以減少六到七成的開支。
18 張申府和劉清揚1920年12月27日到達法國，又在1921年元旦到達巴黎。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5頁；〈張申府談旅歐黨團組織活動情況〉，《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1981年5月），第86–87頁；Vera Schwarcz,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4。
19 張申府：〈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Schwarcz,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pp. 97–99。
20 Schwarcz,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p. 100.

21 同上，第4章；周恩來談到張申府時曾回憶道：「張申府的思想很雜，研究羅素哲學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羅素、馬克思、弗洛依德、愛因斯坦的思想熔於一爐。」《周恩來選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357頁。

22 〈張申府談旅歐黨團組織活動情況〉，第87–92頁。

23 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重新確定周恩來同志入黨時間的報告，1985年5月23日，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8頁。

24 〈張申府談旅歐黨團組織活動情況〉，第87頁。

25 周恩來致常策歐信，1922年3月25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34頁。在這封信裏，當時在法國的周恩來請當時在倫敦的常策歐為他訂閱《泰晤士報》。

26 《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第71頁。

27 同上，第5–21頁。

28 同上，第109–111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9頁。

29 《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第133–153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51–52頁。

30 《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第5–21、83–85、109–111、133–153頁。

3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51頁。

32 關於周恩來在歐洲逐步成為共產主義者的過程，參見Marilyn A. Levine,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pp. 147–149。在我看來，Levine關於周恩來和他那一代的很多青年學子何以會在歐洲成為積極的、富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的論著儘管已出版多年，仍是相關論著中寫得最好之一。

33 周恩來致諶小岑和李毅韜的信，1922年3月，《周恩來書信選集》，第35–41頁。

34 周恩來致李錫錦和鄭季清的信，1922年3月，同上，第46頁。

35 同上，第46–48頁。

36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80–81頁。

37 同上，第82頁。

38 同上，第61頁。

39 《周恩來書信選集》，第49頁。

4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57–58頁；吳殿堯主編：《朱德年譜》新編本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第59頁。

41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84–85頁。

42 同上，第87頁。

43 伍豪：〈宗教精神和共產主義〉（1922年8月），《周恩來早期文集》下，第85頁。

44 楊勝群主編：《鄧小平傳，1904–1974》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第47頁；《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第117頁。

45 鄧小平自傳，1926年1月，ф. 530, оп. 2, д. 15, РГАСПИ；楊勝群、閆建琪主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第17–18頁。

46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84頁。

47 周恩來給《益世報》寫稿也在1922年3月以後戛然而止（最後一篇稿子寫於3月10日，《益世報》則於5月1日發表）。此後，周的這一項稿費收入來源也沒有了。

48 嚴修在1921年11月8日的日記中記道，他為周恩來寄送了720元（約為100英鎊），補助他次年的學費。《嚴修日記》第4卷，第2404頁。
49 Han Suyin, *Eldest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p. 52–53, 422.
50 〈張申府談旅歐黨團組織活動情況〉，第87頁。
51 同上，第84頁。
52 〈中共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1922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第45–46頁。
53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89頁。
54 同上，第90頁。
55 同上。
56 力平：《周恩來一生》，第60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61、63頁。
57 力平：《周恩來一生》，第60頁。
58 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上，第347–350頁。
59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96頁；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鐵竹偉執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第167–169頁。
60 黃嫣梨編著：《張若名研究記資料輯集：「女愛會」、「覺悟社」與「共青團」的婦女先鋒》（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7），第54–55頁。
61 周恩來同侄女周秉德的談話，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96頁；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第168–170頁。
62 鄧穎超：〈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人民日報》，1997年3月5日；亦參見《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97頁。
63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97–98頁。

第6章

1 關於鴉片戰爭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參見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修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14）；Julia Lovell,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2014)。
2 參見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第2、3章；Arthur Waldron,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 中共領袖及許多其他同共產國際和莫斯科有緊密關係的人物，都有俄文化名。周恩來的俄文名是「莫斯克文」，我們不知道他獲得這一俄文名的確切時間。當他在黃埔軍校和中共廣東省委任職時，可能已有了這個名字。
4 1973年7月17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北京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楊問：「周總理，你什麼時候認識毛主席的？」周答：「1925年認識的，1931年以後就同主席在一起工作了。」曹應旺：《魅力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國對外出版有限公司，2014），第29–30頁。

5 周恩來致社會主義青年聯盟中央的信，1924年9月1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69頁；《周恩來手跡選》第2卷（書信卷上），第34頁。
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70頁。
7 同上。
8 〈張申府談旅歐黨團組織活動情況〉，《天津文史資料》第15輯（1981年5月），第88頁。
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70頁。
10 程舒偉、鄭瑞峰：《周恩來和黃埔軍校》（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第16–17頁。
11 王逸常：〈周恩來和軍校政治部〉，廣東省革命歷史博物館編：《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第181頁；力平、彭洪：《周恩來軍事生涯》（北京：華文出版社，1999），第12頁。
12 周恩來：〈關於一九二四至二六年中共對國民黨的關係〉，《周恩來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116頁；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156頁。
13 林彪略歷，1939年2月17日，ф. 495, оп. 225, д. 53, РГАСПИ。
14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78頁。
15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5.
16 關於這個題目，一本資料豐富並仍然有用的著作是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尤其是第5至7章。
17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內部發行），第4頁。
18 Sophie Quinn-Judge, *Ho Chi Minh: The Missing Years* (Singapore: Horizon Books, 2003), p. 98; 亦參見黃錚：《胡志明與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第26–27頁。
19 程舒偉、鄭瑞峰：《周恩來與黃埔軍校》，第5章。
20 金鳳：《鄧穎超傳》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80–81頁。
21 Han Suyin, *The Eldest Son*, p. 58. 在韓素音這本書的英文版中，並沒有提到周恩來給鄧穎超寫的信達到了250封。這個數字是在這本書的中文版提供的，而中文版則是在黨史工作者的「大量幫助」下寫成的。參見韓素音：《周恩來和他的世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66頁。
22 Barnouin and Yu, *Zhou Enlai*, p. 33. 彭述之在回憶錄裏寫道：「周恩來和我談話時，態度隨便，主動熱情，可以說是無所不談。……特別令我感動的是他在個人問題上的坦率友好態度。他對我說，他最眷戀的的人是『小超』，也就是鄧穎超，這是他在『五四』時期在天津認識的。他還向我吐露了知心話，他說他此時最迫切的願望就是再見到『小超』。」《彭述之回憶錄》（香港：天地圖書，2005），第451–452頁。
23 金鳳：《鄧穎超傳》上，第93–94頁。
24 趙煒：《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三十七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145–146頁。
25 參見當事人趙煒關於此事對徐景賢的回憶敘述；徐景賢：《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2013），第296–297頁。
26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第172–176頁。

27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81頁。
28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23–124頁。
2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83頁。
30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28–129頁。
31 同上，第130頁。
32 周恩來：〈關於一九二四至二六年中共對國民黨的關係〉，《周恩來選集》上，第118頁。
33 同上，第119頁。
34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第124–125頁；王宇高（墉伯）、王宇正（垣叔）編：《困勉記》上（台北：國史館，2011），第52頁。
3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6年3月19日，胡佛研究所；又參見王宇高、王宇正編：《困勉記》上，第52–53頁。
36 羅加諾夫（Rogachev）關於1926年三二零事件的書面報告（1926年4月3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第233頁；關於蔣介石在3月19日晚到3月20日的行動，參見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歷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22–123頁。
37 《周恩來選集》上，第120頁；亦參見《包惠僧回憶錄》，第210–211頁。包惠僧接任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同周恩來和蔣介石都保持緊密的工作關係。
38 參見《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32頁。
39 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第119–122頁。在這一論文中，楊天石考定，一個「關鍵人物」是在海軍局服務的國民黨右翼軍官歐陽鐘，他假借蔣介石的名義，發出了要中山艦移動的命令，在最後捲入事件的各方之間造成了嚴重的誤會，並進而造成中山艦事件的發生（第120–121頁）。
40 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第116–118頁；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112頁。
41 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第124頁。
42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32–133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94頁。
43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2年11月27日，轉引《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170頁；周恩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1972年6月10日–12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3）。
44 參見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26年3月21日，胡佛研究所。
45 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三題〉，《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73–74頁。
46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115頁。
4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第712–716頁。
48 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後〉，《歷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22–25頁。
49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115–116頁。

50 劉武生、杜宏奇主編：《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35頁。
5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95頁。
52 同上，第100頁。
53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45頁。
54 周恩來發言記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35–336頁。
55 周恩來在特委會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27年3月30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36頁。
56 Martin Wilbur,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98.
57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58–159頁。
58 周恩來講話記錄，1957年12月22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60頁。
59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60–161頁。
60 周恩來在特委會會議上的發言，《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58頁。
61 《周恩來選集》上，第6–7頁。
62 趙煒：《西花廳歲月》，第158–159頁。
63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64–165頁。
64 同上，第165頁。
6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17頁。
66 共產國際中央執委會之中共中央信，1927年5月，《共產國際、聯共（布）、和中國革命檔案叢書》第5卷，第446–447頁。
67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第106–108頁。
68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21頁。
69 同上。
70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74頁。
71 葉挺：〈從南昌起義到潮汕失敗〉，肖克主編：《南昌起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2 周恩來後來在總結南昌起義的經驗教訓時表示，當時的「主要錯誤是沒有採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後不應該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當時如果就地進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漢被解散的軍校學生和兩湖起義尚存的一部分農民集合起來的，是可以更大地發展自己的力量的」。《周恩來選集》上，第173頁。
73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經驗與教訓〉（192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卷，第408–411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85–187頁。
74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189頁；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3），第74頁。
7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29頁。

第7章

1 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616–633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29–130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224頁。

2 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66、285–286頁。

3 Frederic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chapters 1–3.

4 多年後，周恩來談到：「『特務』這個名詞的發明權是屬於我們的，當年想不出適當的名詞稱呼這一部分的工作，就叫作『特別事務科』。」周恩來在全國第一次情報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0年，轉引自薛鈺：〈周恩來和黨的隱蔽戰線〉，《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66頁。

5 關於特科初建的情況，參見Liang Kan, "The *Te Ke* in Shanghai: A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Secret Service, 1927–1934," *Chinese Historians* 6.2 (Fall 1993): 27–44；穆欣：《隱蔽戰線的統帥周恩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第1章；關於顧順章，參見劉育鋼：《顧順章：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

6 Liang, "The *Te Ke* in Shanghai," pp. 30–33; 劉育鋼：《顧順章：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第4章。

7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50頁。

8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19–220頁。

9 鄧穎超：〈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不盡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第46–47頁。

10 參見斯蒂芬．柯特金（Stephen Kotkin）：《斯大林：權力的悖論，1878–192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第845–851、859–860、875–876頁。

11 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中文手稿），1928年6月9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卷，第477–482頁；《黨的文獻》，1988年第1期，第3–6頁。

12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06頁。

13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192頁。

14 布哈林：〈對現在革命形勢之及我們現在的任務〉，1928年6月29日，《黨的文獻》，1988年第1期，第19–25頁；亦參見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193–194頁。

1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45頁。

16 〈瞿秋白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28年6月28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卷，第329–334頁。

17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09–210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45–146頁。

18 周恩來：〈中共六大組織報告〉，1928年6月30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卷，第335–352頁。

19 周恩來：〈六大以後軍事工作的主要任務〉，1928年7月3日，同上，第353–362頁，引文見第362頁。
20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13頁。
21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第157–187頁。
22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13–214頁。
23 同上。
24 羅青長訪談記錄，1997年6月26日，轉引自薛鈺：〈周恩來和黨的隱蔽戰線〉，《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68頁。
2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51頁。
26 同上。
27 關於「龍潭三傑」，參見穆欣：《隱蔽戰線統帥周恩來》，第5章；開誠：《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2)；楊敏瑞：《錢壯飛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2)。
28 參見穆欣：《隱蔽戰線統帥周恩來》，第77–88頁。
29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pp. 139–142.
30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21–222頁。
31 同上，第224頁。
32 同上，第226–227頁。
33 《彭湃傳》編寫組：《彭湃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34 參見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台北：東大圖書，1997)，第392–394頁；Pantsov and Levine, *Mao*, p. 224。
35 關於毛澤東作為軍事指揮者「入行」之初，在朱德手提面命下學會打仗一節，顧則徐：《朱德別傳——與毛澤東的恩恩怨怨》(香港：天行健，2010)一書中，有精彩的敘述。
36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34頁。
37 中共中央給毛澤東、朱德等的信，1929年2月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31–38頁。
38 中共中央給毛澤東的信，1929年4月7日，同上，第125–139頁，引文見第138–139頁。
39 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同上，第116–123頁，引文見第116–117頁。
4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64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276頁。
41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262頁。
42 同上，第278–279頁。
43 同上，第281頁。
44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36頁。
45 同上，第237頁。
4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72–173頁；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37頁。

47 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來選集》上，第29–42頁，引文見第32頁。信中最後一段，周恩來對毛、朱「各打五十大板」的批評推到了極致，在發表本中被刪去。

48 毛澤東從蛟洋到達長汀後給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84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209頁。

49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12月，《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86–125頁；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290–291頁。

5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7冊（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2023），第225頁。

5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84頁；黃少群：《周恩來在1927–1935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第83頁。

52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84頁。

53 「波蘭毛子」和「德國毛子」是當時中共文件中對這兩位遠東局代表的稱呼，鄙視之意躍然於紙上。

54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59–260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77頁。

55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60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78頁。

56 周恩來1972年會見來訪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副主席、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施羅德時，曾回憶起當年路過德國的情形。《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38頁。

57 張穎：《走在西花廳的小路上》（北京：社會文獻科學出版社，2014），第1–2頁。

58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84頁。

59 周恩來介紹中共中央與遠東局之間的矛盾，1930年5月3日，ф. 514, оп. 1, д. 1121, РГАСПИ。

60 蘇同志（周恩來）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30年7月1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2卷，第203–208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86–187頁。

61 周恩來給斯大林的信，1940年1月23日，ф. 495, оп. 225, д. 139, РГАСПИ；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1943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轉引自楊奎松：〈關於周恩來兩度對共產國際作用的總結和評價問題〉，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編：《周恩來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和世界》上（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2015），第272頁；周恩來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7月14日至18日，855-5-1798，河北省檔案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87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64頁。

62 蘇同志（周恩來）在聯共（布）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30年7月1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2卷，第203–208頁。

63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資料叢書》第12卷，第209–211頁；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30年7月23日通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第6冊，第583–595頁。

64 參見楊奎松：〈共產國際對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的歷史考察〉，《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1期，第1–18頁。其中，對這一問題有極為詳實的考證研究。

65 參見楊奎松：〈共產國際對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的歷史考察（續）〉，《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2期，20–21頁。

66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47頁
67 參見楊奎松：〈共產國際對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的歷史考察（續）〉。
68 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第183–201頁。
69 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任務的決議，1930年6月11日，同上，第257–273頁；中共中央之共產國際主席團信，1930年6月1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共革命資料叢書》第9冊，第202–203頁。
70 共產國際遠東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6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共革命資料叢書》第9冊，第177–182頁。
71 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0年7月初，同上，第216–217頁。
72 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主席團的電報，1930年7月16日，同上，第219頁。
73 同上，第225頁。
74 中央政治局繼續討論目前政治形勢及全國工作佈置，1930年8月3日，轉引自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231頁。
75 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主席團的報告，1930年8月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共革命資料叢書》第9冊，第227–229頁。
76 共產國際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電報，1930年8月7日；共產國際遠東局給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信，1930年8月5日，同上，第221–226、255–256頁。
77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89頁。
78 同上。
79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主席團執行委員會的信，1930年8月2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冊，第333–334頁；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89–190頁。
8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190頁。
81 特生（向忠發）：〈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1930年9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卷，第351–358頁。
82 周恩來：〈在六屆三中全會上的組織報告〉，1930年9月2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第437–457頁。
83 周恩來：〈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1930年9月24日，同上，第405–428頁。
84 特生（向忠發）：〈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1930年9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卷，第351–358頁。
85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73–274頁。
86 同上，第274頁。
87 〈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644–655頁。
88 周恩來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7月14日至18日，855-5-1798，河北省檔案館。
89 周恩來：〈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註，1931年1月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第405頁。

90 周恩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提綱，1972年6月10日（手稿），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85頁。
91 〈共產國際代表在四中全會上的結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第28頁。一些學者看到這一段便想當然地認為，這裏的「共產國際代表」就是米夫，但實際上米夫並沒有出席六屆四中全會，當然也不可能在會上做結論。
92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85頁。
93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249頁。
94 陳養山：〈關於中共特科〉，《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2輯。
95 蔡孟堅：〈兩個可能改變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兼述顧順章自首、匪穴瓦解及我黨清除奸細之經過〉，《傳記文學》（台北）第37卷第5期（1980年11月），第39–48頁。
9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14頁；《聶榮臻回憶錄》上，第127頁。
97 吳基民：《生死搏殺：周恩來與顧順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98 據參與此事者陳養山回憶，周恩來極少抽煙，那時專門要了一支煙，悲愴心情溢於言表。畢生愛惜羽毛的周還感慨，「我們今天這樣做是萬不得已，也不知道將來的歷史怎麼評價我」。
99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258頁。
100 楊奎松：〈向忠發是怎樣一個總書記？〉，《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01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pp. 147–151; 楊奎松：〈牛蘭事件及共產國際在華秘密組織〉，《民國人物過眼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第77–99頁。
102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93頁。
103 張文秋：《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回憶錄》（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
104 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152號記錄，1931年7月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0卷，第340頁。
105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05–306頁。
106 曾憲新：《伍豪事件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第8章

1 黃平：《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79–80頁。
2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19頁。
3 轉引自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274頁。
4 伍豪（周恩來）自蘇中區來信，1931年12月25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97頁。
5 高華：〈「肅AB團」事件的歷史考察〉，《歷史筆記》第1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第103–123頁。
6 總前委致省行委信，1930年12月3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件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98頁。

7 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件始末》，第113–126頁；劉敵給中央的信全文，載景玉川：〈富田事變時劉敵給中央的信〉，《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第84–88頁。

8 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1931年1月16日，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1986年內部發行），第639–642頁。

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08–209頁。

10 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1931年3月28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卷，第317–322頁。

11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修訂版），第30頁。

12 李志英：《博古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第93–96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356頁。

13 這正是周恩來後來在延安整風中做自我批判時，給自己扣上的帽子。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78頁。

14 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263–264頁。

15 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於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後的中心任務，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卷（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355–375頁；ф. 514, оп. 1, д. 675, РГАСПИ。此信係周恩來起草，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16頁。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來應該更為全面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卻沒有包括此信。

1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16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93–294頁。

17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39頁。

18 例如，由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就是如此處理這封信的。《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272頁。

19 阿蘭．魯林：《毛澤東：雄關漫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第222頁。

20 Pantsov with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p. 254; 亞歷山大．潘佐夫、梁思文：《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台北：聯經，2015），第277頁。

21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6–42頁。

22 《任弼時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第173頁；《毛澤東年譜，1898–1949》上，第357頁。

23 《毛澤東年譜，1898–1949》上，第358頁。

24 中央致蘇區中央局第四號電，1931年10月20日前後，轉引自《任弼時年譜》，第174–175頁；又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8冊，第606–607頁。

25 《任弼時傳》，第273–276頁；《任弼時年譜》，第176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272頁。

26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357–358頁。

27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第610–646頁；引文見第642、644頁。

28 《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273頁。
29 臨時中央致蘇區中央局電，1931年10月下旬，轉引自《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358頁。
30 周恩來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1年12月18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76–77頁。
3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19頁。
32 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1932年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卷，第18–28頁。
33 同上。
3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78頁。
35 周恩來：〈對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1972年6月10日–12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6 潘佐夫：《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第201頁。
37 同上，第201–202頁。
38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冊，第78–81頁；參見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259頁。
39 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1932年1月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第34–44頁。
4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20–221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273頁。
41 《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283頁。
42 同上，第283–284頁。
4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22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368頁。
4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368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22–223頁。
45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32年3月30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263頁。
4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23頁。
47 中共中央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第235–242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290頁。
48 毛澤東致中央局電，1932年5月3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271–272頁。
4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24頁。
50 中共蘇區中央局關於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1932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第209–219頁。
51 《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292頁。
52 毛澤東：〈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於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大約1941年上半年，中央檔案館；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292頁。
53 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上(北京：中華書局，2020)，第241頁。
54 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蘇區中央局信，1932年7月25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153頁；《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第394頁。

55 周恩來致蘇區中央局信，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159頁。
56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380頁。
57 同上，384–385頁；《任弼時傳》，第296頁。
58 《任弼時傳》，第297頁。
59 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蘇區中央局並轉中央電，1933年9月23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183–184頁。
60 蘇區中央局給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的覆電，1932年9月25日，轉引自《任弼時傳》，第297頁；亦見《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190–191頁，註1。
61 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給蘇區中央局的電報，1932年9月25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189–190頁。
62 《任弼時傳》，第299頁。
6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34頁；《任弼時傳》，第299頁。
64 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對寧都會議之說明，1932年11月12日，轉引自《任弼時傳》，第297頁。
65 幾十年後，毛澤東回憶起當時的情況時，還曾感嘆道：「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殺掉。」可見，當時他腦袋若「被殺掉」，也不是絕無可能的。毛主席接見艾地率領的印尼共代表團談話記錄，1965年8月5日，中央聯絡部檔案館。
66 周恩來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7月14日–18日，855-5-1798，河北省檔案館。
67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35–236頁。
68 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對寧都會議爭論問題之說明，1932年11月12日，轉引自《任弼時傳》，第301頁。
6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38頁。
70 同上。
71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64頁。
72 周恩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1972年6月10日–12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41頁。
73 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第530頁。
74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16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36頁。
75 毛主席接見艾地率領的印尼共代表團談話記錄，1965年8月5日；又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323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18頁。《毛澤東傳》裏沒有提毛會見的是誰，只說是「一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毛澤東年譜，1893–1949》裏點明了會見的是艾地，但沒有引上面這段話。
76 周恩來致中央局並速傳中央電，1933年1月26日；周恩來致中央軍並轉中央電，1933年1月30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239–240、244–245頁。
77 周恩來致中央局並轉中央電，1933年2月7日，同上，第250–251頁。
78 周恩來致中央局並轉中央的電報，1933年2月13日，同上，第258–259頁。
79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1）。

80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203、336頁。
81 周恩來、朱德致博古、項英、李德電，1933年11月14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315頁；《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第198–199頁。
82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1月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7–8頁。

第9章

1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113–114頁。
2 據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說，在研究留人名單，凡軍事方面的幹部，博古、李德都徵求了他的意見。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提綱，1943年11月15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42頁。
3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埃韋特（和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6月1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冊，第143–144頁；又參見《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41頁。埃韋特（Arthur Ernest Ewert）是德國人，當時任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的代表、遠東局書記。
4 李德（Otto Braun）：《中國紀事，1932–1939》（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第94頁。但另幾位紅軍將領則指稱，撤離時連罈罈罐罐都帶上，其實是李德的主意，參見《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3），第153頁。
5 朱德、周恩來關於派代表與粵方代表談判致周子昆、黃開湘的電報，1934年10月5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346–347頁。
6 《何長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第325–328頁；《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346頁，註1。
7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4年10月17日，胡佛研究所。
8 蔣中正致各將領電，1934年10月31日，蔣中正致外交部轉劉文島電，1934年11月4日，《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4冊，第461、464頁。劉文島，字塵蘇，時任駐意大利公使，與湖南省主席何鍵私交甚篤，此時正準備「赴湘一晤何鍵」。
9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43–344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438頁；《劉伯承回憶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第4頁。
10 晏陽剛：〈追堵長征紅軍的部署及其失敗〉，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第5、7頁。
11 王新生：〈紅軍長征前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考述〉，《黨的文獻》，2010年第2期，第77–82頁。
12 張聞天延安整風筆記，1943年12月16日，《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78–79頁；參見毛澤東談遵義會議，1963年6月，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第126頁。
13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第128頁。此書作者是博古的侄子。博古所憶周說過的這些話，很符合周的性格以及當時的局勢，因而有着相當的可信度。

14 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第113–114頁。
15 《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337頁。
16 同上，第341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46–347頁；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第114頁。
17 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第114頁。但根據周恩來後來在延安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李德似乎是參加了會議的。
18 周恩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11月27日，《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64頁。
19 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1934年12月18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第656–657頁。
20 周恩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11月27日，《遵義會議文獻》，第64頁。
21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48頁。
22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92頁。
23 早在南昌起義時，周恩來便同張國燾有過交集和爭論，對張的強勢作風，他是有親身體驗的。
24 《蔣介石檔案．史略稿本》第28卷，第684頁。
25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49頁。
26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第123頁。
27 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遵義會議），1935年1月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卷，第452–475頁（〈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所載是1月8日）。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遵義會議文獻》，第34–44頁。從內容來看，這實際是一份彙報提綱，而不是傳達提綱，應是陳雲為向共產國際彙報而準備的。
28 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第42–43頁。李德在回憶遵義會議時也說，周恩來發言的重點「放在主觀因素上」。李德聽了周發言後便斷定「他已經明顯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劃清了界限」。參見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第121頁。
29 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1972年6月，《遵義會議文獻》，第67頁；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341–342頁。
30 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第121頁。
31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第128–129頁；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第117–118頁。
32 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第42頁。
33 同上，第42、43頁。
34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第124–132頁。
35 對於博古有「好的一面」，毛澤東是記得的。幾十年後，他還在中央常委開會時提到：「博古、洛甫還是講道理的，沒有把我開除。」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江湖，1964年6月16日（十三陵水庫），855-7-2990-3，河北省檔案館。

36 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第43頁。
37 《毛澤東年譜》上，第445頁；〈軍委關於我軍改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的方針給各軍團的指示〉，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483頁。
38 《聶榮臻元帥回憶錄》，第206頁。聶榮臻回憶錄寫於林彪倒台後，難免有「落井下石」之嫌，但此段故事不可能全盤編造，應有其事。
39 《曾希聖傳》編纂委員會：《曾希聖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4），第3、4章；曹冶、伍星：《紅軍破譯科長曹祥仁》（北京：時代文獻出版社，2014）；曹索菲：〈父親在長征中從事密碼破譯工作〉，《人民政協報》，2006年8月17日；《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2011），第16–20頁。
40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第151–152頁。
41 《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347頁。
42 同上，第353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81頁。
43 朱德、周恩來、王稼祥關於設立前敵司令部致各軍團電，1935年3月4日，《紅軍長征．文獻》（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第280頁。
44 這一段，蔣介石的一件得意之事，就是廢掉了貴州軍閥王家烈，「貴州省府，完全改組，……王家烈知難而退，從此貴州軍政，統制於中央」。蔣介石日記，1935年5月1日，《困勉記》上，第449頁。
4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5年4月24日、5月31日，胡佛研究所。
46 參見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22日、4月27日、5月12日，《困勉記》上，第447、448、454頁。5月11日這一天，蔣與劉湘「商剿匪」時，竟因「本日華北無電來，心甚懸懸，憂鬱無已」。
47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第411–413頁。
48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5年5月10日，胡佛研究所。
49 張國燾：《我的回憶》上，第220–221頁。
50 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領導人關於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致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電，1935年6月16日，《紅軍長征．文獻》編輯組：《紅軍長征．文獻》，第511–512頁。
51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399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87頁。
52 中央軍委松潘戰役計劃，1935年6月29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394–398頁。
53 張國燾：《我的回憶》上，第248–250頁。
54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57頁。
5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88–289頁。
56 中革軍委關於朱德、張國燾任職的通知，1935年7月18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第256頁。
57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256頁。
58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8月6日，轉引自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322頁；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464頁。
59 《周恩來軍事活動大事記》上，第253頁。

60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414頁。
61 魏國祿：《隨周恩來副主席長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6)，第55–58頁；李佐福：〈周副主席病中四十天〉，《懷念周恩來》，第313–316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90頁。
62 金鳳：《鄧穎超傳》上，第202–203頁。
63 同上，第288頁。
64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95–296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471頁。
65 中共中央致張國燾及徐向前、陳昌奉電，1935年9月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第12冊，第304頁。
66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666頁。
6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94–395頁。
68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267–268頁。
69 中共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1935年9月12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第308–310頁。
7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472–473頁。
71 同上，第473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97頁。
7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477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98頁。
73 《聶榮臻回憶錄》，第282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476頁。
74 《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365頁。
75 蔣中正致朱紹良等電，1935年9月29日，《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4冊，第693頁。
76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488頁。
77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299頁。

第10章

1 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8月6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465–466頁；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文獻與研究》，1985年第5期。
2 毛澤東給洛甫的信，1935年12月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408–409頁；又參見毛澤東在所部紅軍營以上幹部會議上所作「直羅鎮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1935年11月30日。毛在報告中說：當前「我們的總任務」是「開闢我們的蘇區到晉陝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完成與外蒙及蘇聯達成一片的任務。」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台北：東大圖書，1995)，第30頁；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492頁。
3 此時，張國燾已宣佈「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責令毛、周「不得在冒用黨中央名義」。張國燾以「黨團中央」名義致彭德懷、毛澤東等電，1935年12月5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第520頁。

4 李海文、熊經浴：《張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第109頁；通訊兵史編審委員會：〈紅軍無線電通信的創建、發展及其歷史作用〉(席杰整理)，《中共黨史資料》第30輯(1989)，第117–118頁。
5 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第20頁。
6 李海文等：《張浩傳》，第126頁。
7 林育英致四方面軍轉張國燾電，1936年1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第321頁。此句中的「世界七次大會」，應指1935年舉行的共產國際七大。
8 林育英致張國燾、朱德電，1936年1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28頁。
9 張國燾致林育英、張聞天電，1936年1月27日，同上，第331–332頁。
10 林育英、張聞天致張國燾致電，1936年2月14日，同上，第371–372頁。
11 李海文等：《張浩傳》，第109–110頁。
12 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1935年10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564頁。
13 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1935年8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第262–268頁。
14 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25日通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598–623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01頁。
1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01頁。
16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76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03頁。
17 楊奎松：《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修訂版)，第5–7頁。
18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5年12月31日，胡佛研究所。
19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5年10月2日，胡佛研究所。
20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6年2月20日，胡佛研究所。
21 楊奎松：《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第15–16頁。
22 毛澤東：〈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935年12月23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第413–422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507頁。
23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1卷，第437–439頁。
24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02頁。
25 同上，第304頁。
26 同上，第304–305頁。
27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78頁。
28 楊奎松：《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第14–15頁。
29 周恩來致洛甫、毛澤東電，1936年3月2日，轉引自楊奎松：《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第9頁。
30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第63頁。
31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78頁；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第63頁。
32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08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78–379頁。

3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08頁。
34 同上，第309–310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78–379頁。
35 周恩來關於與張學良商談各項問題致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電，1936年4月10日，《中共黨史資料》第33輯，第3–4頁。
36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第1000頁；劉殿堯：《劉鼎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第149頁。
37 周恩來致漢卿先生書，1936年4月22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87頁。
38 劉鼎給李克農的報告，1936年4月30日，轉引自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第998–999頁。
39 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第107頁。
40 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等給朱、劉、徐等的電報，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第147–148頁。
41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第120–123頁。
42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147–148頁。
4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16頁。
44 楊奎松：《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第25頁。
45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533–540頁。
46 中央書記處致王明、康生電，1936年6月16日，ф. 495, оп. 225, д. 139, РГАСПИ；Alexander Dallin and F. I. Firsov, eds., *Dimitrov and Stalin: Letter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1934–1943*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96–100。
47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6年8月10日，轉引自金沖及：《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選擇》（北京：三聯書店，2016），第220頁。
48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567–568頁。
49 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7年8月1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7冊，第465–468頁。
5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24頁。
51 同上。
52 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信，1936年9月1日，《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17–18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第253–254頁。
53 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1936年9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第276–277頁。
54 季米特洛夫日記，1936年9月7日、9月11日，《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第46頁。
55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578–579、583、592–594、598–599頁。
5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27頁；又參見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第196頁。
57 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1936年9月1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第282–288頁。
58 潘漢年向中央報告記錄，1936年11月12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92頁。

59 楊奎松：〈西安事變為什麼發生？——兼談蘇維埃革命的政策問題〉，《談往閱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第83–85頁。
60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6年11月22日，胡佛研究所。
61 楊奎松：《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第40頁。
62 徐永昌日記，1936年10月17日，《徐永昌日記》第3冊，第480–481頁。
63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第1121–1122頁。
6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621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99頁。
65 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1936年12月12日，ф. 495, оп. 74, д. 280, РГАСПИ。
66 轉引自楊奎松：《談往閱今》，第104頁。
67 張培森、程中原、曾彥修：〈張聞天和西安事變〉，《黨的文獻》，1988年第3期，第7–8頁。
68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38–339頁；張培森、程中原、曾彥修：〈張聞天和西安事變〉，第8頁。
69 〈中國事變〉，《真理報》，1936年12月14日社論。
7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41頁。
71 同上；劉殿堯：《劉鼎傳》，第289–290頁。
72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第307頁；參見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6年12月14日、12月15日、12月16日，胡佛研究所。
73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405–406頁。
74 周恩來關於到西安後與張學良所談情況給毛澤東並中央電，1936年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第213–214頁。
75 同上，第214頁。
76 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1936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218–219頁。
77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42頁。
78 張培森：《張聞天年譜》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第398頁；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222–224頁。
79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6年12月1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冊，第265–266頁。
8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43頁。
81 周恩來致毛澤東、張聞天電，1936年12月21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246頁。
82 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1936年12月20日，胡佛研究所。
83 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1936年12月22日；與宋子文談判情況，《周恩來選集》上，第70頁。
8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6年12月23日，胡佛研究所。

85 與宋子文談判情況，《周恩來選集》上，第70–71頁。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1936年12月23日。

86 周恩來、博古致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12月2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269頁。

87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6年12月24日，胡佛研究所。宋子文記述，周於12月23日深夜「拜訪了蔣夫人，同時亦與委員長簡單寒暄了幾句」。見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1936年12月23日。

88 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1936年12月25日。

89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6年12月25日，胡佛研究所。宋子文當日日記的記載是，周要蔣保證：「（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許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釋其主張。」

90 周恩來致中共中央電，1936年12月25日，《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34頁。

91 同上。

92 同上；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1936年12月25日。

93 龍飛虎：〈回憶周恩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文史精華》，2001年第12期。

94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第1025–1026頁。

95 潘漢年致毛澤東、周恩來電，1937年1月20日，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348頁。

96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349頁。

97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第270–271頁。

98 周恩來致張聞天、毛澤東電，1937年1月26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致張聞天、周恩來等電，1937年1月27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351–352、354頁。

99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一），第262–263頁。

100 同上，第251–253、264頁。

10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59頁。

102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年3月6日，胡佛研究所。

103 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同蔣介石談判經過致共產國際書記處的報告，1937年4月5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第137–142頁；蔣介石記道：「彼乃出於意外，以為余與彼相見只談對共收降條件之枝節問題也。」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年3月26日，胡佛研究所。

104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69頁。

105 孔石泉：〈跟隨周副主席工作的歲月〉，《懷念周恩來》，第330–331頁；劉久洲：〈在周副主席身邊的日子裏〉，《文史精華》，1996年第3期，第11–12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399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70頁。

10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72頁。

107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年6月1日，胡佛研究所。

108 中共中央關於與蔣介石第二次談判向共產國際的報告，1937年6月1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第334–336頁。
109 楊奎松：《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第77–78頁。
110 《蔣介石先生年譜長編》第5冊，第315頁。
111 關於七七事變何以會演變發展為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參見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pp. 79–85；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pp. 187–200。
11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12頁；金沖及：〈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黨的文獻》，2014年第4期，第57頁。
113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14–15頁；《任弼時傳》，第493–494頁；又參見楊奎松：〈抗戰初期中共軍事發展方針變動的史實考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一文中引用會議文件所作的敘述與討論。
114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86–387頁；又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389–390頁。據張在回憶錄中所述，他是參加了這次會議的；但前引楊奎松一文中所列舉的與會人名單裏，卻沒有張國燾。
11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15–16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86頁。
11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391頁。
117 周國全、郭德宏主編：《王明年譜》（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第92–93頁。
118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01–402頁。
119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北京：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第443頁。
120 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1937年12月13日通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第736–737頁。

第11章

1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年11月14日，胡佛研究所。
2 蔣委員長為中共共赴國難宣言發表談話，1937年9月23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1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第285–286頁。
3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年10月25日，胡佛研究所。
4 陳紹禹、周恩來等關於與蔣介石談判情況向中央的報告，1937年12月21日，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第61–62頁。
5 陳紹禹、周恩來等致中央書記處電，1937年12月26日；陳紹禹、周恩來等致中央書記處電，1937年12月31日，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編：《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121、132–133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37–438頁。
6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8年2月25日，胡佛研究所。

7 參見陳立夫致蔣介石函，1938年2月1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1冊，第325頁。
8 《周恩來傳，1898–1949》上，第485–486頁。
9 陳紹禹、周恩來等致中央書記處電，1938年2月10日，《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156–157頁；王宇高、王宇正編：《困勉記》下，第598頁。
1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12、413頁。
11 同上，第415頁。
12 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7頁。
13 劉武生、杜宏奇主編：《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454頁。
14 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1938年9月14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555–556頁。
1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30頁。
16 周恩來等致中央書記處電，1938年10月28日，《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第295頁。
17 周恩來致鄧穎超信，1938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第7頁。
18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35頁；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一部，第186–188頁。
19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第785–786頁；
20 中央書記處決定，1939年1月5日，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第1冊（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第10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39–440頁。
2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40頁。
22 中央書記處指示，1939年1月13日，《南方局黨史資料》第1冊，第11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102–103頁。
23 陳紹禹、周恩來等關於同蔣介石談判情況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1938年12月1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第793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534頁。
24 周恩來關於與蔣介石談判情況及意見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1939年1月2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第25–26頁。
2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105–106頁。
26 周恩來關於一個大黨問題給蔣介石的覆信，1939年1月25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第34–37頁。
27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6冊（台北：國史館，2015），第14頁。
28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48頁。
29 南方局黨史資料》第3冊，第329–330頁；參見凌青：《從延安到聯合國：凌青外交生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第20–21頁。
30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第158頁。

31 同上，第193頁。
32 《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07頁。
33 毛澤東關於形勢和任務的報告，1939年6月8日，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和反共》，第416頁。
34 毛澤東：〈反投降提綱〉，1939年6月10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96–234頁。
3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9年6月10日，胡佛研究所。
36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第119頁；劉久洲：〈在周副主席身邊的日子〉，《曾與偉人同行》（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54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563頁。印度醫療隊巴蘇醫生日記中，關於周恩來從馬上摔下的原因有不同記述：周的坐騎「顯然是因為突然碰到路旁一個由炸彈炸出的深坑，受到了驚嚇」，才把周摔下來的。Bejoy Kumar Basu, *Call of Yenan: Story of the Indian Medical Mission to China, 1938–43*, edited by Manjeet H. Singh, sketches by David Olivant (New Delhi: All India Kotnis Memorial Committee, 1986), p. 174.
37 Basu, *Call of Yenan*, p. 175.
38 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提綱，1939年8月4日，《南方局黨史資料》第3冊，第18–37頁；中央文獻研究室、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2卷，第240–249頁；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43–47頁。
39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134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57頁。
40 《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561–562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57頁。
41 Basu, *Call of Yenan*, p. 183;《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564頁。
42 中共中央書記處給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39年8月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冊，第244頁。
43 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9年8月1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冊，第247頁。
44 關於周、鄧夫婦抵達莫斯科的時間，隨同他們飛莫斯科的孫維世在一篇以中文手寫的自述中有明確記載：「1939年，經毛澤東同志同意，隨周恩來同志及鄧穎超同志，於9月12日到達莫斯科。」ф. 495, оп. 225, д. 1235, РГАСПИ.
45 毛澤東：〈論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1939年9月14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第599–611頁，引文見第606頁。
4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58頁。
47 對於周恩來同志右臂傷折骨診斷意見，1939年9月16日，ф. 495, оп. 225, д. 139, РГАСПИ。
48 同上。
49 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9年10月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冊，第289頁。
50 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1943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轉引自楊奎松：〈關於周恩來兩度對共產國際作用的總結和評價問題〉，第272頁。

51 周恩來給斯大林的信，1940年1月23日，ф. 495, оп. 225, д. 139, РГАСПИ；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61頁。
52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124頁。
53 潘佐夫、梁思文：《毛澤東：真實的故事》，第451頁。
54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冊，第302–341頁。
55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125頁。
56 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1943年11月27日–12月2日，轉引自楊奎松：〈關於周恩來兩度對共產國際作用的總結和評價問題〉，第272頁。
57 季米特洛夫關於向中共提供財政援助給斯大林的信，1940年2月2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9卷，第27–30頁；ф. 495, оп. 74, д. 317, РГАСПИ。
58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根據中共代表團的報告通過的決議，1940年3月3日，同上，第40–41頁。
59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124頁。
60 周恩來、任弼時的回國申請，1940年1月20日；周恩來、任弼時、鄧穎超的回國手續，1940年1月27日，ф. 495, оп. 225, д. 2835, РГАСПИ。
61 孫維世自傳，1941年4月2日，ф. 495, оп. 225, д. 1235, РГАСПИ；又參見任均：《我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記憶》（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第135頁。任均是孫維世的嬸母。
62 沈國凡：《周恩來養女孫維世》，第140–146頁。
63 中國國內坊間曾一度廣泛流傳，曾任中國總理的李鵬也是周、鄧夫婦的「養子」。但實際上，李鵬只是曾受到周、鄧關照的中共烈士子女中的一位，李鵬本人也說，他和周、鄧夫婦的關係，只是「老同志和烈士後代的關係」。《李鵬回憶錄（1928–198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央電力出版社，2014），第303頁。
64 周恩來給鄧穎超的信，1948年3月7日，《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集》，第70頁。
65 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40年3月17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9卷，第62頁。
66 師哲訪談，1992年8月；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127–132頁；參見《任弼時傳》，第545頁。與周恩來同行的還有日共領導人岡野進（野坂參三），他在回憶錄中有關於這一段的記載，參見《中共黨史資料》第41輯（1992年4月），第234–252頁。
67 楊奎松：《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第146頁。
68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40年4月4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183頁。
69 毛澤東致項英、陳毅電，1940年5月5日，《毛澤東軍事文選》第2卷，第547頁。
7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189頁；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新四軍文獻》第2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第159–162頁。
71 周恩來致中央電，1940年6月4日，《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第484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578–579頁。
72 楊奎松：《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第153–154頁。
73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3冊，第506–509頁。

74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70頁。
75 《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581–582頁；有參見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0年8月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9卷，第77–79頁。
7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72頁。
77 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國共談判情況給彭德懷等的電報，1940年8月12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第459–460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72–473頁。
78 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1940年8月15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第470–472頁。
79 《毛澤東年譜，1893–1949》新版，第201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582頁。
8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新版，第201頁。
8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73–474頁；參見〈周恩來所提調整游擊區域及游擊隊辦法三種〉，1940年9月1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2冊，第508–509頁。
82 何應欽、白崇禧致朱德、彭德懷、葉挺電，1940年10月19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2冊，第504–505頁
83 毛澤東關於目前時局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毛、王關於對付日蔣聯合反共的策略考慮之德懷電，1940年11月3日，中央檔案館編：《皖南事變（資料選輯）》（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第71–72、76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119頁。
8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119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82頁。
8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215頁。
86 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40年11月1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2卷，第277–278頁。
87 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之何應欽、白崇禧佳電，1940年11月9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83–87頁。
88 劉斐和周恩來、葉劍英談話記錄，1940年11月30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4冊，第230–231頁。
89 周恩來關於和蔣介石談話情況給毛澤東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1940年12月26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21–122頁。
90 蔣介石日記，1940年12月25日；《困勉記》下，第753–754頁。
9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91頁。
92 毛澤東、朱德關於皖南新四軍應分批走蘇南告葉挺、項英電，1940年12月30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25頁。
93 毛澤東致葉挺、項英電，1941年1月2日。
94 徐永昌日記，1941年1月8日，《徐永昌日記》第6冊，第6頁。
95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440頁。
96 中共中央關於向國民黨交涉撤圍問題給周恩來、葉劍英的指示，1941年1月12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37頁。

97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上，第224頁。

98 周恩來、葉劍英關於同國民黨交涉情況給毛澤東的報告，1941年1月13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40頁。

99 周恩來、葉劍英關於與蔣介石交涉情況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41年1月13日，同上，第142–143頁。

100 毛、朱、王稼祥關於周恩來、葉劍英與蔣介石交涉情況給劉少奇、葉挺的通報，1941年1月14日，同上，第144頁。

101 毛、朱、王稼祥關於國民黨解決我七千餘人情況給周恩來的通報，1941年1月14日；毛澤東關於向蔣介石交涉停戰撤圍致周恩來、葉劍英電，1941年1月14日，同上，第145頁。

102 周、葉、董致毛澤東電，1941年1月15日，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和反共》，第442頁；又參見周恩來致中央書記處電，1941年1月17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2卷，第293–294頁。

103 周恩來致毛澤東並中央書記處電，1941年1月15日，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497頁。

104 毛澤東關於政治上、軍事上準備全面反攻致周恩來、葉劍英電，1941年1月15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47頁。

105《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256頁；又參見楊奎松：《國民黨的的聯共和反共》，第442頁。

106 周恩來關於軍事行動策略致致毛澤東電，1941年1月16日，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444頁。

107 劉少奇關於主要應從政治上進行反攻問題向毛澤東等的建議，1941年1月15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48–150頁。

108《中央日報》，1941年1月17日。

109《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257頁。

110 毛澤東等致彭德懷、劉少奇電，1941年1月19日；毛澤東給劉少奇的通報，1941年1月23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41年1月25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80、187頁。

111 中央書記處關於設法藉故離渝返延給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的電報，1941年1月18日；中央書記處關於在重慶重要幹部應在最短期間離渝的指示，1941年1月20日，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444、445頁。

112《新華日報》，1941年1月18日。

113《毛澤東選集》第2卷（1991年版），第775頁。

114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41年1月25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190頁。

115 毛澤東關於蔣介石發佈一．一七命令後國共關係的變化及我之對策致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電，1941年1月20日，同上，第183–184頁。

116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41年1月25日，毛澤東致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電，1941年1月25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41年1月27日，同上，第190、191–192、193–194頁。

117 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懷、左權、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小平、呂正操、程子華電，1941年1月24日。
118 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和反共》，第445頁。
11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00–501頁；又參見《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203頁。
120 中共中央關於關於日軍進攻河南及我黨對於時局方針的指示，1941年2月2日；毛澤東關於對蔣介石政治動向的估計給周恩來的通報，1941年2月7日；毛澤東關於在國共關係僵局中對國民黨策略之周恩來電，1941年2月14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202–203、205–206、207–209頁。
121 中共中央關於關於日軍進攻河南及我黨對於時局方針的指示，1941年2月2日，同上，第202–203頁。
122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3編第1冊，第533–535頁。
123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1年2月1日，上星期反省錄，胡佛研究所。
124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3編第1冊，第542–545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1, vol. 4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82–83；*FRUS*, 1941, vol. 5, p. 607。
125 *FRUS*, 1941, vol. 5, p. 608;《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3編第1冊，第552–553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03頁。
126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1年2月22日，胡佛研究所。
127 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41年2月10日，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03頁。
128 毛澤東關於對國民黨策略致周恩來電，1941年2月14日；中央書記處給周恩來的指示，1941年2月14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208、212頁。
129 周恩來關於與張沖談判情況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41年2月25日，同上，第217–218頁。
130 中共中央關於不出席參政會問題給周恩來的指示，1941年2月26日；周恩來關於同張沖談拒絕出席參政會問題給毛澤東的報告，1941年2月26日，同上，第219–220頁。
131 中共中央關於提出臨時十二條給周恩來的指示，1941年2月28日，同上，第222–223頁。
132 周恩來關於與張沖談判情況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41年3月1日，同上，第224頁。
133 周恩來關於出席參政會問題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41年3月1日，同上，第225頁。
134 中共中央關於不出席參政會問題給周、董、鄧穎超的指示，1941年3月1日；毛澤東關於堅決不出席參政會問題致周恩來電，1941年3月2日，同上，第226、228–229頁。
135 周恩來關於同蔣介石談判問題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41年3月15日，同上，第235–236頁。
136 徐永昌日記，1941年5月5日，《徐永昌日記》第6冊，第101頁。
137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12頁；毛澤東等關於當前形勢與我們的方針致彭德懷等電，1941年5月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第263–264頁。

138 周恩來關於蔣要求華北我軍配合作戰等問題向中央的請示，1941年5月10日；周恩來關於與蔣談判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41年5月1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卷，第278–282頁。

139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1年5月11日，胡佛研究所。

140 周恩來關於與蔣談判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41年5月1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卷，第278–282頁。

141 毛澤東要蔣從速解決新四軍、發餉彈、停止反共三大問題致周恩來電，1941年5月10日；毛澤東、朱德就八路軍自當配合中央軍作戰致西安袁曉軒電，1941年5月10日；毛澤東關於要總顧問不要隨便亂說致周恩來電，1941年5月14日。

142 毛澤東等關於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不可打得太兇致彭德懷電，1941年5月15日。

143 毛澤東關於有計劃配合對敵作戰致彭德懷電，1941年5月14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41頁。

144《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12–513頁。

145 同上，第515頁。

146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34號決議，1941年7月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9卷，第197頁。

147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419頁。

148 毛澤東等關於我軍準備在戰略上配合蘇軍作戰致彭德懷電，1941年7月2日。

149 毛澤東關於幫助蘇聯紅軍我們決取廣泛游擊戰的長期鬥爭方針致周恩來電，1941年7月1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51–653頁。

150 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1年7月1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9卷，第206–207頁。

151《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6冊，第602頁。

152 中共中央關於最近國際事件的聲明，1941年8月19日，《解放日報》，1941年8月20日。

153 毛澤東關於國際戰爭形勢的估計給周恩來的電報，1941年12月12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72–673頁。

154 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1年12月1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9卷，第247頁。

155《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38頁。

156 周恩來關於日寇南進後時局估計致毛澤東電，1942年2月24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2卷，第395頁。

157 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42年5月4日；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42年6月19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2卷，第398–399、402頁。

158《南方局黨史資料大事記》，第172–173頁。

159《南方局黨史資料．黨的建設》，第46–47頁。

160 此事也驚動了毛澤東。2月18日，他親自致電彭德懷、劉少奇等，告知「袁曉軒被捕後，已自首，供出許多秘密」。

161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第248–253頁；《南方局黨史資料大事記》，第194–196頁。
162 周恩來致鄧穎超信，1942年7月1日，《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輯》，第11頁。
163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第252頁。
164 《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630–631頁；《南方局黨史資料大事記》，第195–196頁。
165 杰卡諾佐夫給季米特洛夫的信，1942年6月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9卷，第282頁。
166 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的信，1942年6月15日，同上，第285頁。
167 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2年6月24日，同上，第287頁。季米特洛夫將毛的回電「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杰卡諾佐夫同志」，同上。
168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42年6月30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390頁。
169 王世杰日記，1942年7月5日，《王世杰日記》上，第442頁。
170 《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671頁。
171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4冊；《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671頁。
172 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42年8月14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672頁。
173 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42年8月19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672頁。
174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42年9月3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402頁。
175 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42年9月5日，《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51頁。
176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4冊，第236–242、243–246頁。
177 周恩來致毛澤東並中央書記處電，1942年10月26日，《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53–554頁。
178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42年10月28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410–411頁。
179 林彪致中共中央電，1942年12月16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676頁。
180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4冊，第242–243頁。
18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69頁。
182 同上；蔣介石日記，1943年6月7日，引自王宇高（墉伯）、王宇正（垣叔）編：《省克記》（台北：國史館，2011），第234–235頁。

第12章

1 關於陝北、尤其是延安如何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聖地」，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的一本近著有着精彩的敘述和極富洞見的分析。參見Joseph W. Esherick, *Accidental Holy L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Northwest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2)；周錫瑞著，石岩譯：《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2 陳紹禹、周恩來等關於與蔣介石談判情況向中央的報告，193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第61–62頁；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7年12月21日，胡佛研究所。

3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395–397頁。

4 在毛澤東看來，電文言辭「帶有『指示』、『通知』的口吻」。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7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15頁。

5 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第17頁。

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15頁。

7 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51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483–484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15頁。若將上述史料中毛、周各自對於中共軍事、政治戰略的表述加以比較，分歧之處是明顯的。

8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15頁。

9 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第17頁。

10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9年8月24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541頁。

11 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522–526頁；師哲訪談，1992年8月。那年夏天，我曾在師哲老人的家中住了兩週，交談中，他對每位中共領導人都有評論，講到任弼時，他還說，如果任弼時不死，「我的命運也許會不同」，但他自己的日子後來「不會好過」。

12 《任弼時傳》修訂本，第521頁；楊瑞廣、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年譜》(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第370頁。

13 任弼時：〈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1938年4月14日；任弼時：〈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式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1938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第104–113、121–133頁。

14 《任弼時年譜》，第370–372頁。

15 同上。

16 同上，第372頁；徐澤浩等：《王稼祥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第190頁。但是，關於季米特洛夫的這番談話，在他的日記中並無記載，在蘇聯及共產國際文件中亦未見。因而，曾有俄國學者對談話的真確性提出質疑。

17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第231頁。

18 《王稼祥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第141頁；亦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90頁。

19 毛澤東自己後來回顧這段歷史時曾說：「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蘇聯養病後回國帶來的，由王稼祥同志傳達的。」毛澤東：〈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231–232頁。

20 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9月26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522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29頁。
21 周恩來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9月30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523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29–430頁。
22 廖心文：〈抗日戰爭初期長江中央局的組織變動情況〉，《文獻與研究》(1987年彙編本)，第285頁。
23 周國全、郭德宏：《王明年譜》(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第103頁。
24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141頁。
2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430頁。
2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下，第662頁。
27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95–803頁。
28 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第443–446頁。
29 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1941月8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第534–535頁。
30 毛澤東：〈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文集》第2冊，第372–377頁。
31 蘇區中央局關於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1932年5月11日，《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重印本)，第237–241頁。
3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329頁。
33 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1941年9月26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第623–624頁。
34 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第1冊，第176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684頁。
35 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第38頁。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毛澤東已控制了中共中樞同莫斯科的全部電信通訊，何以會給王明看這份電報？一種最直接的解釋是，因為這些問題涉及到了王明，季也希望得到王明的答覆，所以毛不得不拿這份電報給王明看。但從事情本身的發展來看，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這是毛「引蛇出洞」及「欲擒故縱」的一招，由此引出王明的反撲，再從容地壓制下去，從而在同王明的對峙中一舉佔據上風。從事態後來的發展來看，正是朝這個方向演變的。
3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200頁；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297頁，註59。
37 《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33頁。
38 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記錄，1941年10月13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33–634頁。
39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333頁。
40 毛澤東：〈駁第三次左傾路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213頁。

4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214頁。

42 最近一次是中共建黨90週年之際，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聯合編輯出版50卷本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時。但雷聲雖大，雨點全無，到頭來，九篇文章並未包括在這一大部頭的文件集裏。

43 毛澤東：〈駁第三次左傾路線〉。

44 毛澤東給周恩來電，1943年4月30日。電報上方有「弼、劉、康閱後發」字樣。

45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第513頁。

4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278頁。

47 毛主席在黨校的報告，1944年10月25日。

48 毛澤東：〈時局問題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黨校演講〉；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55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580頁。這兩本書中，毛發表演講的時間為1945年2月15日。

49 1943年8月15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明確規定，整風不是肅反，不能重複「錯誤的肅反方針」。整風中實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並嚴禁逼供信，「對於一切大小特務，叛徒……原則上一律採取爭取政策，及寬大政策」。《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卷，第531–537頁。

50 毛澤東1945年2月在黨校講話時談到整風審幹時說，在「一個不殺」這點上，「我講的話要算數，發出去的支票要兌現。一個支票——一個不殺，這一條兌現了沒有？還不是兌了現。如果口裏講一個不殺，結果殺了兩個，那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確，一個不殺，沒有殺兩個，也沒有殺一個」。毛澤東：〈時局問題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黨校演講〉。

51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上，第427–429頁；同一位陳毅親屬的談話，1992年7月。

5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187頁。

53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1–829、830–846頁。

54 毛澤東：〈整頓黨風、文風、學風〉，1942年2月1日，《整頓三風的二十二個文件》。此文經大量修訂、刪節後，題目改為〈改造我們的學習〉，收入《毛選》，但所引內容已被刪去。參見高華：《歷史筆記》，第190–191頁。

5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381頁。

56 同上，第386頁。中共宣傳部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1942年6月8日；中央軍委與總政治部關於軍隊中整頓三風的學習與檢查工作的指示，1942年6月16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第326–330、336–341頁。

57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42年6月1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第331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46頁。

58 程中原：《張聞天傳》，第480–493頁。

59 《劉少奇年譜》，第373、377頁。

60 〈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1943年3月20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第171–176頁。

61 自1942年下半年始，毛澤東即一再指示周恩來向蔣介石提出批准他回延安的請求，但蔣一直不予置理或不同意。1943年2月1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請他「考慮向

國民黨交涉林彪暫留重慶而你回延一行的可能性」(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43年2月13日)；3月下旬，毛又以中央書記處名義提出：「周(恩來)回林(彪)，或周林均回，仍須向彼方正式提出，如彼不允，則林獨回。」(中央書記處關於向國民黨交涉制止其摩擦行為致周恩來、林彪電，1943年3月30日)；5月8日，毛澤東再次指示周：「與張治中再談時及見蔣時，務必提出王明、稼祥去蘇治病及恩來林彪同車返延安事」，毛澤東關於不要刺激國民黨致周恩來電，1945年5月8日。這表明毛認為讓周恩來回延安的時候已經到了。

62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179頁。

63 毛澤東關於決定同意解散共產國際致周恩來電，1943年5月21日。

64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周恩來的電報，1943年5月24日；《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67頁。

6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68頁；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3年6月7日，胡佛研究所。

66 中央書記處關於周恩來宜速回延致周恩來電，1943年6月9日；毛澤東關於周恩來等速回延共商七七宣言致周恩來電，1943年6月15日；《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70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679頁。

67 毛澤東「請周恩來爭取順利回延」致周恩來電，1943年6月4日。

68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第359–360頁。

69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13–14頁；又參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366頁。

70 毛澤東關於周恩來等速回延共商七七宣言致周恩來電，1943年6月15日。

71 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的指示，1943年7月8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第468–469頁。

72 毛澤東關於內戰危機空前嚴重致周恩來電，1943年7月4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449、452頁。

73 毛澤東關於力求避免戰事致周恩來、林彪電，1943年7月7日。

74 周恩來、林彪致毛澤東電，1943年7月13日，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72頁。

7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289頁；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614頁；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76頁(兩處引文有出入)。高華的出處：周恩來：〈在延安歡迎會的演講〉，《毛澤東選集》第1卷(蘇中出版社，1945)，代序〈論毛澤東思想〉，第17–18頁。

7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65–567頁。

77 對一位資深黨史專家的訪談，2013年8月。

7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298頁。

79 同上，第283–284頁。

8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482頁。毛在電報稿上有一段批示：「擬答：周三年在渝無事可做，在國民黨未真想解決問題之前，不擬出來，各事可經董談判，如

至真能解決問題時，周可以出來。——毛澤東十一月十三日。」

8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79頁。

82 關於周恩來在會議上的檢討，本來就是這一時期整風的重中之重，他本人也極為重視。關於周恩來何時做檢討，以及做了多長時間的檢討，官方的《周恩來傳》居然搞錯了，高文謙的書中也搞錯了，說成是1943月11月15至20日。這是把周恩來寫下提綱的時間和實際發言的時間搞混了。周恩來發言的時間，應當是11月27日至12月2日，其中11月29日和30日兩天休會，他發言的實際時間是五天。參見楊奎松：〈關於周恩來兩度對共產國際作用的總結與評價問題〉，第271頁。

83 毛澤東：〈駁第三次左傾路線〉。

84 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78頁。

85 同上，第78–79頁。

86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提綱，1943年11月15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79頁。

87 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75–76頁。

88 這種過程後來被同樣經歷的彭德懷叫做「操娘」。這裏開啟的是又一個「先例」：只要「政治正確」，就可以為所欲為。

89 對一位資深黨史專家的訪談，2017年10月。

90 季米特洛夫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267–268頁。

91 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4年1月2日，《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273頁；Mao to Dimitrov, January 2, 1944,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 pp. 294–295。

92 《周恩來選集》上，第157–187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298頁。

93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載《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2冊，第73–112頁。

94 這是我與多位曾為周恩來下屬者以及資深黨史研究人士訪談時，他們一再提及的。

95 周恩來在七大開幕式上的演說，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選》(作者個人藏本，出版地點、時間不詳)，第10–12頁。

96 周恩來：〈論統一戰線〉，1945年4月30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2冊，第291–319頁，引文見第297頁。

97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選》，第91頁。

第13章

1 毛澤東、彭德懷致鄧小平電，1943年12月16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第673–674頁。

2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3年12月10日，《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7冊，第519頁。

3 蔣介石日記，1943年8月25日，《困勉記》下，第920–921頁；徐永昌日記，1943年9月1日，《徐永昌日記》第7冊，第157頁。

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3年11月12日，胡佛研究所。

5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4冊，第261–262頁。
6 毛澤東關於國共關係問題給董必武的電報，1944年2月4日，《南方局黨史資料》第3冊，第96頁。
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496頁；《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4冊，第262頁。
8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583頁。
9 同上，第585頁。
10 周恩來：〈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1944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第679–686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85–586頁。
11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508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86頁。
12 王世杰日記，1944年5月4日、5月6日，《王世杰日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第601–602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87頁。
13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上的工作報告，1944年5月21日，《毛澤東文集》第3冊，第141頁。
14 毛澤東致林伯渠電，1944年5月15日，《毛澤東文集》第3冊，第130–134頁。
15 王世杰日記，1944年5月22日，《王世杰日記》，第606頁。
1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93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536頁。
17 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關於國共談判的報告，1944年9月15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1冊，第505頁。
18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517–518頁。
19 毛澤東等致中共華中局電，1944年8月3日；毛澤東、劉少奇致饒漱石、張雲逸、賴傳珠電，1944年11月2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728、733–734頁。
20 軍委致鄭位三、李先念等電，1944年10月14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731–732頁。
21 Ch'i Hsi-sheng, *The Much Troubled Alliance: US–China Military Cooperation during the Pacific War, 1941–1945*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6), pp. 581–582.
22 王世杰日記，1944年6月22日、6月23日，《王世杰日記》，第614–615頁；Lyman Van Slyke, ed., *The China White Pap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55–57。關於華萊士訪華所產生的影響，參見Mitter, *Forgotten Ally*, p. 327。
23 〈歡迎華萊士先生〉，《解放日報》，1944年6月23日，第1版。
24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91頁。
2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333頁。
26 David D. Barrett,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 1944* (Berkeley, C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0).
27 南方局同志對外交的意見及對中央的建議，1944年8月16日，《南方局黨史資料》第3卷，第110–117頁。
28 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1冊，第473–477頁。

29 Joseph W. Esherick, ed.,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Random, 1974), pp. 307, 313–314;《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94頁。
30 *FRUS*, 1944, vol. 6, pp. 562–567, 參見Mitter, *Forgotten Ally*, pp. 328–329。
31 Van Slyke, *The China White Paper*, p. 66.
32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4年7月7日，胡佛研究所。
33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3編第3冊，第637頁。
34 *The China White Paper*, p. 67; 羅斯福的信，由馬歇爾起草，Marshall's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July 4,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17, MFA。
3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595頁。
36 Van Slyke, *The China White Paper*, p. 72.
37 *FRUS*, 1944, vol. 6, China, p. 259.
38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4年9月24日，胡佛研究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編第3冊，第662–671、673–674頁。
39 Michael 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73–174.
40 參見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4年11月5日，胡佛研究所。
41 *FRUS*, 1944, China, p. 659.
42 同上，第666頁。
43 毛主席、朱總司令、周副主席同赫爾利少將談話記錄（1944年11月8日–10日）；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341–351頁。
44 Van Slyke, *The China White Paper*, p. 19;《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4冊，第293頁。
45 *FRUS*, 1944, China, p. 699.
46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00–601頁。
47 毛主席和赫爾利第四次談話，1943年11月8日上午10時；《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558頁。
48 毛澤東給羅斯福總統的信，1944年11月10日。
49 *FRUS*, 1944, China, p. 703.
50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4冊，第294頁。
5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02頁。
5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560頁。
5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03頁；王世杰日記，1944年11月22日，《王世杰日記》，第655頁。
5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4年11月23日，胡佛研究所。
5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353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03頁。
56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561頁。
57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04頁。
58 同上，第604–605頁。
59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563–564頁。

60 參見Barbara Tuchman, "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 *Foreign Affairs*, vol. 51 (October 1973): 44–62。
6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07頁。
62 同上，第610頁。
63 同上，第610–611頁。
64 王世杰日記，1945年2月14日，《王世杰日記》上，第677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16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718頁。
65 《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719頁。
66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45年2月3日，《中共中央抗日統一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第790頁。
67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卷第2冊，第541頁。
68 蔣介石日記，1945年3月15日；魏道明給蔣介石的電報，1945年3月12日，《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下，第685–687頁；《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卷第2冊，第542–543頁。
69 *FRUS*, 1945, vol. 7, pp. 317–322.
7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第589頁；又參見毛澤東：〈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1944年7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111–1114頁。
71 轉引自牛軍：《從延安走向世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第180頁。
72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第311頁。
73 周恩來在七大開幕式上的演說，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選》，第10–12頁。
74 毛澤東：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這一講話的發表文本，參見《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376–421頁。
75 毛澤東：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76 周恩來：〈如何解決〉，《解放日報》，1944年10月12日，第1版。
77 轉引自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第519頁。
78 周恩來：〈論統一戰線〉，《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77–110頁。
79 中共中央致廣東區委電，194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145頁。
80 中共中央致鄭維山、李先念等電，1945年8月4日，同上，第200頁。
81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卷第2冊，第571–635頁。
82 轉引自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第521頁。
83 中共中央(由毛澤東起草)致鄭維山、李先念、陳少敏並告華中局的電報，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關於日本投降後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定」，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由毛澤東起草)致王震、王首道的電報，1945年8月11日，轉引自《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1–2頁。
84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3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第1329頁；《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編第2冊，第613–620頁。
85 重慶《中央日報》，1945年8月16日。

86 斯大林致中共中央電，1945年8月23日，ф. 45, оп. 1, д. 31, л. 103, АПРФ；《中共黨史大事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78頁；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274頁。

87 中央、軍委關於改變戰略方針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2冊，第645頁。

88 《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727頁。

89 《中央日報》，1945年8月21日，第1版。

9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9頁；《周恩來手跡選》第3卷(書信卷下)，第57頁。

91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5年8月23日，中央檔案館；參見《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4–12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10–11頁。

92 《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630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395頁。

93 重慶《中央日報》，1945年8月25日。

9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12頁。

9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30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13–14頁。

96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14–16頁。

97 同上，第11頁。

98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30頁；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356、359頁。

99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5年9月2日，胡佛研究所。

100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5年8月29日，胡佛研究所。

101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選編》第7編第2冊，第37–41頁。

102 國共兩黨代表商談經過，1945年9月27日，《重慶談判紀實》(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第219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36頁。

10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417–418頁。

10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13頁。

105 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51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13–15頁。

106 參見楊奎松：《中共和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第531–532頁；曾克林：《曾克林將軍自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第108–111頁。曾克林當時陪同貝魯諾索夫中校訪問延安，是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親歷者。

107 中共中央關於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1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2冊，第685–686頁。

108 毛澤東：〈目前東北發展方針〉，1945年10月19日；中央關於集中主力拒止蔣軍登陸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2冊，第753–754頁。

109 毛澤東：〈動員全力控制東北〉，1945年10月28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43頁。

110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an o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15 December 1945, in Van Slyke,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 607–609.

111 轉引自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485頁。
112 中共中央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動和我等對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2冊，第870–871頁。
11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47頁；參見Daniel Kurtz-Phelam, *The China Mission: George Marshall's Unfinished War, 1945–1947* (New York: W.W. Norton, 2018), pp. 65–66。
114 周恩來接受美國《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李勃曼採訪，1946年9月，《周恩來答問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第169頁。
115 *FRUS*, 1946, vol. 9, pp. 169, 1506.
116 熊向暉：《我的外交和情報生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第31–34頁。
117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編第3冊，第64頁。
118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54頁。
119 孟廣涵主編：《政治協商會議紀實》上（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第344–349頁。
120 *FRUS*, 1946, vol. 9, pp. 139–141.
121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6年1月23日，胡佛研究所；參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6卷上，第26頁。
122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56頁。
123 劉少奇的講話，轉引自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492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656頁。
124 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1946年2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3冊，第108頁。
12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57頁；《劉少奇年譜》下，第20頁；又參見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497頁。
126 《周恩來1946年談判文選》，第696頁。
127 中共中央給葉劍英、饒漱石並周恩來電，1946年2月28日，轉引自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497頁。
128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編第1冊，第453–454頁。
129 參見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第559–560頁。
130 中共中央（由毛澤東起草）致東北局電，1945年3月24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第153–154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62–63頁。
131 *FRUS*, 1946, vol. 9, pp. 802–805.
132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第277–278、283–284頁。
133 《周恩來1946年談判文選》，第442頁。
13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6年7月2日，胡佛研究所。
13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22–723頁。
136 周恩來致郭沫若、于立群信，1946年11月17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356頁。

第14章

1 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的談話（胡喬木記錄），1946年11月21日。

2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23–724頁；《周恩來1946年談判文選》，第695–699頁；《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3、556–559頁；《黨的文獻》，1996年第1期，第63–64頁。

3 毛澤東和周恩來、劉少奇的談話（胡喬木記錄），1946年11月21日；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150–151頁；《劉少奇年譜》下，第56頁；《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196–200頁。

4 毛澤東和周恩來、劉少奇的談話（胡喬木記錄），1946年11月21日；參見《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197頁。

5 毛澤東和周恩來、劉少奇的談話（胡喬木記錄），1946年11月21日。

6 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1946年8月6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1–1201頁。

7 陸定一：〈關於戰後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人民日報》，1947年1月4、5日。毛澤東曾親自對這篇文章進行修改。陸定一本人曾說：「這篇文章是毛主席的思想，我的手筆。」轉引自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344頁。

8 周恩來、陸定一關於國際形勢的宣傳問題給方方等的電報，1947年1月20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41頁。

9 十幾年後，當毛澤東提出「兩個中間地帶」論時，他回顧道：「（中間地帶）這個話不是現在才講的，是1946年就講了。那個時候沒有分第一、第二，只講了中間地帶。……那時美國代替了德、意、日，想控制世界，它的目的是侵略中間地帶，不是打蘇聯。反蘇是個口號，是煙幕，與反華的性質一樣，其目的是要整個中間地帶，以反華為口號。」毛主席同桑吉巴爾專家的談話，1964年6月18日，102-00110-01，外交部檔案館。

10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編第2冊，第854頁。

11 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的談話，1946年11月21日。

12 對中共來說，東北的重要性恐怕更為明顯。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就說過：「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毛主席在七次大會上關於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問題的報告，1945年6月10日。

13 《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台北：國史館，2015），第600頁。

14 《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第235–236頁。

1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年3月2日，胡佛研究所；參見《胡宗南先生日記》上，第632頁；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70–71。

16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第43–45頁。

17 毛澤東在1946年11月21日和劉少奇、周恩來談話時就說過，「現在可能失掉延安」。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談話，1946年11月21日。

18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年3月19日，胡佛研究所。

19 斯大林致阿洛夫醫生電，1947年6月15日，ф. 39, оп. 1, д. 31, л. 23, 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08頁；師哲訪談，1992年8月。

20 中共中央關於我軍撤出延安解釋工作的指示，1947年3月1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第24、115頁；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46頁。

21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46頁；中共中央關於保衛陝甘寧邊區的通知，1947年4月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第130–131頁。

22 中共中央關於周恩來代理總參謀長的通知，1947年8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編審委員會：《總參謀部．文獻（3）》（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第229頁。

23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第115頁。

24 中共中央關於只要打破胡宗南軍即可改變陝北局面給賀龍等的指示（毛澤東起草），1947年3月2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第126頁；中共中央關於保衛陝甘寧邊區的通知，1947年4月9日，同上，第130頁。

25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第43–45頁。

26 周恩來還在蔣介石周圍及國民黨情治系統中樞佈下了另幾處最高層級的「戰略閒棋」，絕不輕易動用。直至他去世，有幾枚還一直處在「潛伏」狀態。

27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第500頁；軍委關於對付敵人無線電測向設備的指示，1947年3月24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3卷，第193–194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45頁。

28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47–748頁；《葉劍英年譜》上，第474頁；王亞志：〈周恩來與轉戰陝北期間的情報、紀要和通訊工作〉，李琦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597頁。

2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417–418頁。

3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第662頁。

31 中央關於中央城工部的工作方針及各地城工部工作辦法的規定，1947年4月29日，《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第153–154頁；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50頁。

32 〈北京市政府關於沈崇事件來往函電選編〉，《北京檔案史料》，1994年第1期；金沖及：《轉折年代——中國．1947年》（北京：三聯書店，2017），第71–72頁。

33 中央關於在各大城市組織群眾響應北平學生運動的指示，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第139–140頁。

34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蔣管區學生運動的組織與領導給董必武等的指示，1947年1月6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第22–23頁。

35 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7年2月1日，轉引自金沖及：《轉折年代》，第86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36–737頁。

36 中共中央給北平、天津市委的電報，1947年2月17日，轉引自金沖及：《轉折年代》，第86–87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38頁。

37 中共中央關於蔣管區工作的指示，1947年2月28日，《周恩來選集》上，第268–270頁；《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冊，第98–100頁。

38 中央關於蔣管區黨的鬥爭方針的指示，1947年5月23日，《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第157–159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53頁。

39 中央關於學運方針給上海局的指示，1947年6月3日，《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第159–160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54頁。

4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58頁。

41 毛澤東：〈學習陳賡部集中主力各個殲敵的作戰方法〉，1946年7月16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第348頁。

42 毛澤東：〈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1946年7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87頁。

43 周恩來：〈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1947年1月6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3卷，第181頁。

44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言論總集》第22卷，第112、113頁。

45 《毛澤東年譜，1898–1949》下，第78頁。

46 中共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解放區土地改革宣傳方針的指示，1946年5月1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3卷，第246、256頁。

47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3卷，第246、256頁。

48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7年6月22日，胡佛研究所。

49 周恩來：〈解放戰爭第一年的戰績〉，1947年7月21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3卷，第233頁。

5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60頁。

51 《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333頁。

52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7年12月26日，《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863–864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76頁。

53 周恩來：〈關於全國戰爭形勢的報告〉，1948年1月11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3卷，第304頁。

5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8年2月1日，胡佛研究所；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8》，第41頁。

5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8年2月11日，胡佛研究所；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8》，第49頁。

56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8年2月23日，胡佛研究所；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8》，第59頁。

57 周恩來：〈老區半老區的土地改革與整黨工作〉，1948年2月22日，《周恩來選集》上，第289–296頁，引文見第293頁。

58 這些黨派中影響最大的應屬民主同盟，但因它與中共達成合作了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協定，已於1947年10月被國民政府宣佈為「非法組織」。

59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8年6月10日，胡佛研究所；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8》，第157頁。

60 徐永昌日記，1948年11月12日，《徐永昌日記》第9冊，第138–139頁。

61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8年11月5日，胡佛研究所；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8》，第296頁。

62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8年11月13日，胡佛研究所；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8》，第301頁。

63 這裏，還想講述一段我個人的故事。文革期間，我曾在外祖父張行簡（字稚鶴）在杭州慶春街毛兒弄的家中住過一段時間，聽他講過不少往事掌故。他和陳布雷是浙江高等學堂的同學，後來又一直和陳保持着友誼和聯繫。在談到蔣的這位親信時，外祖父說過兩句話，我還記得。一句是，陳不該搞政治的。另一句是，聽到他的死訊就知道，蔣氣數已盡。後來，外祖父選擇了留在內地，而沒有去港、台或移居海外，同陳布雷的死是有關係的。

64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8年9月3日，胡佛研究所；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8》，第239頁。

65 周恩來：〈解放戰爭第三年軍事計劃〉，1948年9月13日前，《周恩來軍事文選》第3卷，第425–426頁。

66 同上，第437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523頁。

67 《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33頁；《周恩來軍事文選》第3卷，第425–426頁；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2卷，第645頁。

6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523頁；《周恩來軍事文選》第3卷，第437頁。

69 關於濟南戰役的策劃、準備、進程、結局及影響，參見劉統：《決戰華東——華東解放戰爭實錄》（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第17、18章。

7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809頁。

71 同上。

72 周恩來致鄭洞國信，1948年10月18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415頁。

73 周恩來：〈抑留傅作義部於平、張、津、保地區〉，1948年11月13日；〈徵詢對東北野戰軍入關行動方案的意見〉，1948年11月17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3卷，第530–531、538–540頁；參見《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902頁。

74 這之後，傅作義其實還有三心二意之處，並不時有各種「小動作」，卻再也翻不起大浪了。

7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828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927頁；余湛邦：〈一九四九年國共北平和談始末記〉，《文史資料選輯》第67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56–57頁。

76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75頁。

77 林秋敏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78（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台北：國史館，2011），第320–329頁。

78 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86–1390頁。

79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9年2月3日，胡佛研究所；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9》，第50頁。
80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6冊，第24頁。
81 《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913頁。
82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8頁。
8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836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914–915頁。
84 黃啟漢：《1949年「和談」的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67輯，第13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923頁。
85 周恩來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報告記錄，1949年1月16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922頁。
86 余湛邦：〈一九四九年國共北平和談始末記〉，《文史資料選輯》第67輯，第56–57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925頁。
87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和反共》，第724頁。
8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512頁。
89 同上，第513頁。
90 同上。
91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729頁。
92 楊奎松：〈美國駐瀋陽總領事瓦爾德事件始末〉，《民國人物過眼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第429頁。
93 中共中央致東北局電(周恩來起草)，1948年11月10日，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816頁。
94 Ward to Marshall, November 15, 1948, *FRUS*, 1948, vol. 7, pp. 834–835; William Stokes, "The Future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January 1968): 15; 東北局致中央電，1948年11月15日，中央檔案館。
95 毛澤東關於同意擠走瀋陽美英法領事館的方針致高崗電，1948年11月17日。
96 毛澤東致東北局電(關於瀋陽舊領事館交出電台問題)(由周恩來起草)，1948年11月18日。
97 東北局致中央電，12:00，1948年11月21日；又參見Stuart to Marshall, 21 November 1948, and Clubb to Marshall, 26 November 1948, *FRUS*, 1948, vol. 7, pp. 838–839, 840。
98 Chen Jian, "The Ward Case and the Emergence of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1948–1950,"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July 1993): 149–170.
9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825–826頁。
100 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6卷，第55–60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829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539頁。
101 斯大林致毛澤東電，1949年1月10日，沈志華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第346頁。
102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49年1月12日，同上，第349–350頁。

103 斯大林致毛澤東電，1949年1月11日（毛是在1月14日才收到此電的），同上，第348頁。
104 斯大林致毛澤東電，1949年1月14日，同上，第352–354頁。
105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49年1月14日，同上，第354–355頁。
106 Andrei Ledovsk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ern Affairs* (Moscow), no. 2 (1995): 72–94;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34–344頁。
107 斯大林致毛澤東電，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49年1月17日，沈志華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卷，第354、359–360頁。
108 師哲訪談，1992年8月。
109 米高揚和毛澤東的談話記錄，1949年1月30日，ф. 39, оп. 1, д. 39, л. 1–6, АПРФ；米高揚和毛澤東的談話記錄，1949年1月31日，ф. 39, оп. 1, д. 39, л. 7–16, АПРФ。
110 米高揚和周恩來的談話記錄，1949年2月1日，ф. 39, оп. 1, д. 39, л. 17–24, АПРФ；《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831頁。
111 米高揚和周恩來等人會談紀要，1949年2月1日，ф. 39, оп. 1, д. 39, л. 25–30, АПРФ。
112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46頁。
113 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關係的命運，1945–195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109頁。
114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1949年3月13日。
115 陳銘樞先生報告美大使來滬秘訪二次事，1949年3月26日，轉引自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2冊，第65頁。
116 司徒雷登日記，1949年3月25日、3月26日，《司徒雷登日記》，第97–98頁。
117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6頁
118 中央軍委給總前委、粟裕、張震並告劉伯承、李達、張際春的電報，1949年4月28日，《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280頁。
119 中央、軍委：〈對待駐華外交機關人員及外僑的政策〉，1949年4月26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3卷，第638–639頁；《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6冊，第340–341頁。
120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6冊，第23–24頁。
121 毛澤東：〈預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對策和部署〉，1949年5月2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卷，第600頁。
122 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第79頁。多年後，已過耄耋之年的黃華仍清晰地記得周恩來與他談話時「極為嚴肅」的語氣和場景。黃華訪談，1997年10月。
123 黃華同司徒雷登談話應注意的問題，1949年5月10日，《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293–294頁；參見黃華：〈我和司徒雷登的接觸〉，第26–27頁。
124 《黃華回憶錄》，第81頁。
125 同上，第82頁。
126 中共中央關於允許司徒雷登及傅涇波赴美的指示，1949年6月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6冊，第438–439頁。

127 參見*FRUS*, 1949, vol. 8, pp. 741–767；黃華：〈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幾次接觸〉，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第26–28頁。

128 司徒雷登秘書傅涇與黃華談司徒雷登擬赴北平見周恩來事的報告，1949年6月8–9日，111-00001-11，外交部檔案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21頁。

129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21頁。

130 同上，第21–22頁。

131 同上，第22頁。

132 中共中央致中共南京市委的電報(周恩來起草)，1949年6月30日，同上，第20頁。

133 參見*FRUS*, 1949, vol. 8, pp. 357–360, 363–364, 372–373, 384–385, 394–395, 397–398。

134 轉引自汪朝光：《中國命運的決戰，1945–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第552頁。

135 中央致南京市委並告華東局電(周恩來起草)，1949年7月15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65頁。

136 同上，第107頁。

137 斯大林和劉少奇會談紀要，1949年6月27日，ф. 45, оп. 1, д. 329, АПРФ；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61頁。

138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1949年7月4日，《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第16–17頁。

139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68–369頁；師哲訪談，1992年8月。

140 《周恩來年譜》中有關於此事的多條記錄。

141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2頁。

142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6 p.m., July 1949, *FRUS*, 1949, vol. 8, p. 766.

本書運用史料之廣泛，不僅體現了陳兼數十年研究之功力，更揭示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可獲取或發掘的當代史料之規模——這讓通常認為共和國在檔案開放上一向是「遺忘的荒原」的西方讀者深感意外。憑藉批判性同理心，陳兼無論對周恩來生涯軌跡的整體把握，還是對其各關鍵階段的評判，皆令人難以挑剔。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傑出研究教授）

人物傳記難寫，像周恩來這樣被世人關注和熟知的歷史人物的傳記尤其難寫。陳兼二十年磨一劍，成此巨著，實屬不易。作者在中、美、蘇、英、法、印等多邊檔案文獻的基礎上，把人物置於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考察，盡力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此書既是一部中國革命史，亦是一部新中國外交史。

——**沈志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兼撰寫了我們時代的一部偉大政治傳記。周恩來常被視為迷霧環繞的領袖，但我們若不理解他，就永遠無法理解當今的中國。這部傳記使我們對他的了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耶魯大學歷史與國際關係講席教授）

這本書是周恩來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基於作者數十年在中國近現代史、冷戰史及國際關係領域的研究，本書聚焦黨內政治、國際關係、周恩來對現代中國發展的貢獻三大主題，全書敘述引人入勝，十分易讀且富有參考價值。

——**魏美玲**（Emily Wilcox，威廉與瑪麗學院中國研究教授）

陳兼積二十年之功，重建周恩來的往事，做出了帶有鮮明風格的解讀。人們可以不贊成他的觀點，但不可不讀這本21世紀有關周恩來研究的最新著作。

——**韓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兼是經歷了文革並對這場劫難心心念念的國際學者。他的周恩來研究由樸素情感進入冷峻理性的學術探討，在中外史料互證的基礎上，填補和校正了許多周恩來生平的史事，呈現了一個豐富多元且充滿矛盾的周恩來形象。

——**王海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周恩來終於有了一部與其歷史地位相稱的完整傳記。作品憑藉豐富文獻資料，客觀評估了周恩來對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的深遠影響。

——**拉納・米特**（Rana Mitter，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美亞關係講席教授）

陳兼沒有解開「周恩來之謎」，然而他生動地展示了這個謎何其複雜，促使讀者不由得尋求自己對「周恩來悖論」的答案。

——**夏偉**（Orville Schell，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

中國共產革命如同迷宮，這本傑出的周恩來傳記為人們提供了理解它的地圖與鑰匙。

——**徐國琦**（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cup.cuhk.edu.hk | HONG KONG, CHINA

周恩來 下

陳兼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周 恩 來

周恩來 下

陳兼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周恩來》（上、下兩冊）
陳兼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26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或將其用於人工智能訓練。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88-237-388-4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cup.cuhk.edu.hk

Zhou Enlai: A Life (in Chinese, 2 volumes)
By Chen Jia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2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237-388-4

Image on page ix of Volume 2:
© Reg Innell / Toronto Star via Getty Image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cup.cuhk.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China

目錄

上冊

中文版序：走近周恩來 xxxv

引言 lxv

第一部 早年

第1章 童年（1898–1910） 3

第2章 從東北到南開（1910–1917） 9

第3章 負笈東瀛（1917–1919） 21

第4章 五四風雲（1919–1920） 35

第5章 歐洲歲月（1920–1924） 45

第二部 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第6章　在大革命的風暴中（1924–1927）　63

第7章　地下上海（1927–1931）　81

第8章　紅區（1931–1934）　107

第9章　長征（1934–1935）　133

第10章「國難當頭，抗戰第一」（1935–1937）　153

第11章　霧都重慶（1938–1943）　181

第12章　紅太陽在延安升起（1941–1945）　215

第13章　在大國政治的漩渦中（1944–1946）　243

第14章　內戰（1946–1949）　275

註釋　307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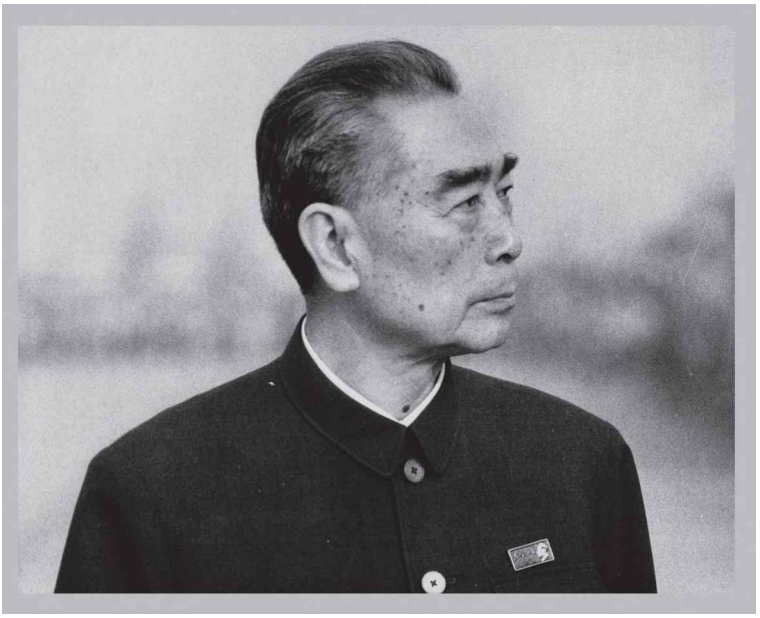
第三部 建設「新中國」

第15章「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1949–1950) 365
第16章 朝鮮戰爭(1950–1953) 397
第17章 高饒事件(1952–1955) 427
第18章 從日內瓦到萬隆(1954–1955) 467
第19章 從「反冒進」到反「反冒進」(1956–1958) 503
第20章 大躍進(1958–1960) 543
第21章 毛澤東退居二線(1959–1962) 583
第22章 主席回來了(1962–1964) 623
第23章「中間地帶」的革命(1962–1965) 657
第24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1964–1966) 695

第四部 文革歲月

第25章 文革大潮初湧（1966–1967） 737
第26章 天下大亂（1967–1968） 767
第27章 林彪事件（1969–1971） 801
第28章 敲開美國的大門（1969–1972） 839
第29章 高處不勝寒（1972–1974） 881
第30章 最後的日子（1974–1976） 915

鳴謝 941
註釋 945
參考文獻 1057
索引 1091



第三部

建設「新中國」

第15章

「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1949–1950）

一

每年秋天，尤其是9月和10月，是北京最美麗的季節。對於毛澤東、周恩來和他們的同志們來說，1949年9月那幾個星期，更是美好的時光。秋高氣爽的日子裏，中共領導人和各民主黨派人士來到北京，參加即將舉行的新政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出席「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一個在中國和世界上開創一段全新歷史的起點。

9月21日，在周恩來主持下，新政協會議舉行。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發表了滿懷激情的講話，大聲地宣佈：「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1]這個話，他是對着全世界說的，但首先也是對着中國的億萬普通民眾說的。後來看，這是他關於「新中國」的一個巨大的合法性聲明。從這個聲明中透露出來的，首先是毛澤東這一代中共領導人（包括周恩來在內）關於歷史和未來在自己這一邊的自信心。但毛的觀念世界又和他幾乎所有的同志們有不同之處；對毛的這一聲明，也必須同他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特定宣示聯繫起來解讀。毛澤東從來不把1949年中共奪取全國政權視為革命的終結，而只是「走完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他從不隱瞞自己作為革命家的勃勃雄心：他想像中的「革命」和「繼續革命」的最終目標，是以「革命」的名義將一種新的政治的、社會的、思想的、文化的秩序加之於普通中國人的心靈和日常生活，創造出一種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王

聖合一」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結構，使得「天下大同」的烏托邦理想成為人間現實；同時，也要通過樹立中國革命（包括「繼續革命」或「革命後的革命」）的經驗為世界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榜樣，摧毀自近代以來中國便一直在其中居於屈辱地位的「舊世界」，開創出一個「新世界」。這就意味着，若從普通人生活經歷的角度來看，毛的革命和「繼續革命」理念混淆了「彼岸想像」與「此岸理想」之間的分野，必定會超越中國共產黨革命曾有過的歷史正當性所能涵蓋和支持的範圍，從而不可避免地面臨着持續的「合法性挑戰」（在這裏，我對「合法性」的定義是普通民眾對毛的「繼續革命」心悅誠服的「內在支持」）。毛的應對之道是，他愈是意識到這種挑戰，便愈是竭力動用自己所掌控的、完全失去制衡的巨大權力推動「繼續革命」。其結果，則是「繼續革命」所面臨的合法性挑戰變得愈加嚴重，最後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裏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只是，在1949年這一「解放元年」，在這個被左翼作家胡風稱為「時間開始了」的時刻，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毛的同志們未必能夠預見毛關於「新中國」的這一合法性聲明的全部涵義。周恩來在新政協會議的講話中，介紹了他主持起草新政協《共同綱領》的經過及體會。他強調說：為了「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應當繼續下去」，而新政協「就是它的最好的組織形式」。[2] 當他講出這些話的時候，可以想見他的心中必定像在場的所有同志們一樣，充滿着勝利時刻的自豪和喜悅，也以他們自己的想像為出發點，滿懷着對於未來的嚮往和憧憬。9月27日，政協會議決定將北平改名為北京。

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舉行的日子。未及天明，周恩來便已起身。他是開國大典的總指揮，確保大典的順利及安全進行是他的職責。他早就來到了天安門，以他一貫的細緻作風，親自對城樓及四周，裏裏外外、上上下下檢查一遍，任何微小之處都不放過。毛澤東向來習慣在夜間工作、白天睡覺，但這一天他幾乎徹夜未眠。下午2時，他來到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周恩來被正式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3時，開國大典開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大聲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當時，周恩來就站在毛的



圖15.1：周恩來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949年9月下旬。(Bettmann Archive / Getty Images [515511618])

身邊，臉上露出微笑，卻又似乎若有所思。此刻，面對着天安門前數十萬人歡呼雀躍的情景，不知他是否會想起，30多年前，自己在弱冠之年曾許下的那個「中華騰飛」的願景？這一天，是否已是願景實現的時刻？不知他會如何作答。此後27年間他持續擔任共和國總理的經歷應該會告訴他，獲得答案絕非那麼簡單。

二

為了1949年10月1日這個歷史性時刻的到來，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從春天起就一直在做各種準備。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做總結時宣佈：新中國「中央政府的主要人員，現在尚不能確定，整個配備還需與民主人士商量。但有兩個人要提出報告的，即我和恩來是否參加政府工作。恩來是一定要參加的，其性質是內閣總理」。[3] 在「新中國」的構建及新政府的組建上，周恩來將擔負起極為重大的責任。

毛澤東、周恩來是在春暖花開的時節進入北平的。3月23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一道，乘汽車離開西柏坡，再改乘火車，於3月25日凌晨到達北平。先期到達的人員，已在西郊的香山為他們準備了辦公地點及住所。此後，他們又決定徵用位於北京城中央、曾為皇家園林的中南海為中央黨政領導人的住所和辦公場所。從5月起，中共領導人開始陸續入駐中南海，中國最重大的決策從此在這裏產生。

周恩來和鄧穎超入住的是豐澤園的菊香書屋，他們很喜歡這個地方。但後來，毛澤東也遷入中南海，周覺得這一處更適合毛居住，便把它讓給了毛。1949年11月，周恩來夫婦搬入了位於中南海西北端的西花廳。這是一個長方形的四進庭院，進大門後為前庭。入二進院後，內有水榭，三面臨水，以短廊連接亭榭。院內有一排正房和耳房，正中懸掛有「西花廳」匾額。三進院內，是周恩來住宿和辦公的區域，中間正房是周恩來的會客廳；東耳房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寢室，旁邊是鄧的辦公室；西耳房是周的辦公室，設有保險箱存放重要文件，尤其是由周親自處理的各種最高等級的情報資料。四進院有廚房、儲藏室等。周恩來夫婦入住西花廳後，一直在這裏生活和工作，直至1974年6月1日，周恩來因病離開西花廳，入住解放軍三零五醫院治療，此後再未回到西花廳居住。周恩來逝世後，鄧穎超仍在西花廳居住。一直到1991年7月，她因病入住北京醫院，直至1992年7月逝世，她再也沒有回過西花廳。

周恩來入駐北平後，即面臨着一項重要的使命：完成將成為新中國「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的起草。這件事，中國領導層自1948年便已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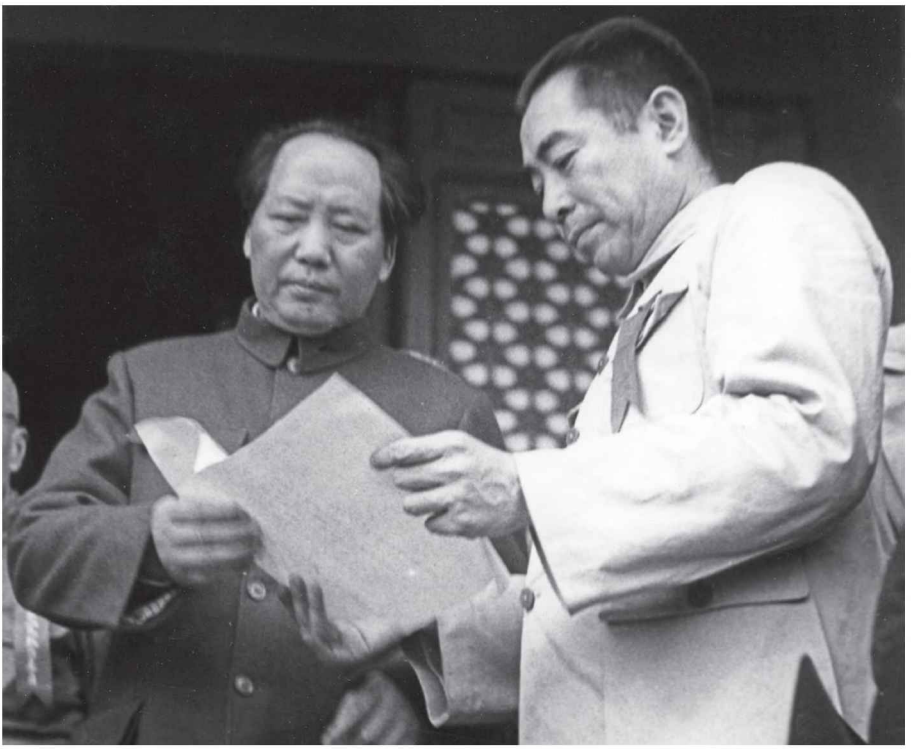


圖15.2：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1949年10月1日。(Sovfoto / 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始進行。當時內戰仍在進行，綱領也相應地定名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到1949年已經完成了兩稿，但隨着內戰戰局的急劇變化，其內容已經過時了。6月16日，周恩來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說：去年，《共同綱領》「我們起草過一兩次」，但當時我們工作重心在「動員全國人民，支援戰爭」上。而現在，「我們的綱領不能不轉向建設方面」，其重點也成為「共同努力，來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綱領的名稱也相應地改為《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4] 6月下旬，周恩來用了整整一個星期，親自主持綱領的起草。此後兩個月間，他又牽頭並廣泛徵求各方意見。到8月中旬，經他親自起草、修訂後的《共同綱領》文本形成了。這個文本中滲透着周恩來的心血，也透露出他關於「新中國」及新政府的一些基本設想。

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這個文本明確規定，首先要在中國建設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它「還不是社會主義」，但「它的鞏固和發展，又將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準備前提」。周還對「中國人民」的權利做了廣泛及明確的規定：他們「應享有思想、身體、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居住、營業、罷工、遊行示威及宗教信仰的自由權利」。為了協調關於公民權力的這種廣泛定義和中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政治主張之間的張力，周提出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內，要對「人民」和「國民」加以區別——他們有着同等的義務，但對於後者中「違反新民主主義國家法律之人」，上述給予人民的權利則不能授予他們。周還提出，將在新中國建立的，是以包括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基礎的「民主聯合政府」，它「既不是一個階級專政，也不是一黨獨佔政府」。這個國家將採納混合的經濟模式，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政策。它還將執行「反帝」及「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同時在「平等互助」的基礎上「擴大陣容」。關於「中國」及構成中國各民族的定位，周的看法是，這是一個多民族的共和國，其國家定位將是「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成」的「中華各民族聯邦」。[5]

8月22日，周恩來將這個文本呈送毛澤東審閱。[6]然而，毛顯然對周的草案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內容並不滿意。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的幾個星期裏，他親自對《共同綱領》文本反覆修改，標題改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形成了最後文本。[7]若同周的那個草案相比較，新文本承繼了關於「中國人民」的「權利」（只是將「身體」改為「人身」，並加上了「遷移」）以及關於新中國將實行新民主主義、還不是社會主義等一系列基本看法。但同時，毛的最後文本又有兩處重要的修正。第一，周文本中的「聯合政府」的提法去掉了，不搞「一黨獨佔政府」的承諾也不見了。第二，在對「中國」作為國家的界定中，關於「中華各民族聯邦」的提法消失了。[8]

這是兩處極為重要、也將產生巨大影響及後果的修正。關於「聯合政府」的主張，是毛、周及中共在抗戰後期，為同國民黨爭奪「民主」的旗幟、迫使蔣介石在政治上處於守勢而提出的。搞「一黨獨佔政府」，正是周恩來在和蔣和國民政府談判、以及在和美國人打交道時，對蔣和國民黨一再提出的指控和批判。周顯然還清楚地記得這一切，因此，他在《共同綱

領》繼續使用「聯合政府」這一提法，並做出中共不搞「一黨獨佔政府」的承諾。而毛在修改草案時把這些都去掉了。他這麼做，已清楚地透露出了新政府必須由中共全面控制的意圖。

「中華聯邦」的提法，其實是中共自建黨以來一貫的看法。中共建黨初期，為突出自身民族政策的「革命」性質，曾提出「統一中國本部(包括東三省)為真正民主共和國」，而讓「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為民主自由邦」的主張。[9] 1932年，中共中央的一項聲明中更明確指稱，國民黨的「五族共和」主張是用來掩飾其「民族壓迫的政策」的，而中共則「承認一切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到承認這些(民族)脫離中國的自決權」。[10] 1936年，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中說：「人民革命取得勝利後」，西藏與外蒙古和新疆都「將形成附屬於中華聯邦的自由共和國」。[11] 這些也是周恩來的一貫看法。1944年3月12日，他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逝世19週年的大會上發言時，強調了「承認中國境內的民族自決權」之必要性。[12] 國共內戰爆發後，他在闡述中共的民族政策時，主張以「保障少數民族自治權」來挑戰蔣及國民黨「取消少數民族自治權」的行為。[13] 他在《共同綱領》草案中重申「中華各民族聯邦」的主張，絕不是偶然的。在毛的修正意見出來後，周恩來也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政協會議上闡釋中共的民族政策時便強調，新中國要「將各民族團結成一個大家庭」，將在民族地區實行區域自治，而「不叫聯邦」，也不會成為聯邦共和國。「我們主張民族自治」，他解釋道，「但一定要防止帝國主義利用民族問題來挑撥中國的統一。……我們國家的名稱，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不實行「多民族聯邦制」。[14]

即便在上述背景下，在政府組建的具體過程中，周恩來仍希望它既要保證中共的領導權力和地位，但又要展示出新中國「海納百川」的氣象與氣度，多少仍體現出「聯合政府」的模樣。為此，他真是煞費苦心。早在1948年9月，他就秘密擬定了一個將受邀參加新政協的77位「民主人士」的名單，並指示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在「今冬明春安排他們秘密前來北方解放區」。[15] 他最注意爭取納入新政府的人，是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宋慶齡早已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並同共產國際有着密切關係，但她久居上海，孫中山又是在北京去世的，是她的傷心之地；她當時身體欠佳，同時

內心恐怕也並不情願因加入新政府而為自己加上一種政治態度上的束縛。因此，她開始時極不願意從上海移駐北京，這也成為她加入新政府的一道大的障礙。周恩來得知情形後，親自修書一封，由夫人鄧穎超前往上海同宋會晤，並留在上海不停地做宋的工作。同時，他還做出安排，讓宋可以在上海和北京兩邊居住。[16] 本來，宋慶齡就同中共關係深厚，又經周恩來下了這一番工夫，她終於到北京參加新政協會議；之後，又同意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職。

這樣的工夫，周恩來也施展在其他「民主人士」身上。最後，憑藉中共作為內戰勝利者驟升的影響和威望，周的多方努力邀約下，政務院組成後果然呈現出一番「民主合作」的新氣象。周恩來理所當然地出任總理，四位副總理除中共的董必武、陳雲外，還包括了黃炎培、郭沫若這兩位非中共黨員的「民主人士」。15名政務委員中，周特意納入了譚平山、章伯鈞、馬敘倫、陳劭先、王昆侖、羅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黃紹竑等九位非中共人士擔任。在各部中，周也讓很多非中共人士出任一些並不屬於「要害部門」的部長。例如，起義將領傅作義當了水利部長，教育家梁希任林墾部長、民盟的羅隆基任森林工業部長、史良任司法部長、民革的何香凝任華僑委員會主任、朱學範任郵電部長、李德全任衛生部長等。

周恩來組建新政府時，毛澤東說了一句話：別的都可繼承，唯獨外交不能繼承，要另起爐灶。[17] 周恩來決定，由自己兼任外交部長，直接掌控外交事務。在他的主持下，外交部主要由兩部分人員組成，其中一部分屬於周恩來自重慶時代就開始搭建起來的外事班子，主要有王炳南、喬冠華、龔澎、陳家康、章文晉等人。內戰爆發後，他們多數人都來到延安。中共中樞從延安撤出時，周已想到這批人有外事經驗，也多少懂一點外文，以後可能成為新中國的外交骨幹，「不要走散了，以後不好找，應該成立一個機構把他們保留下來」。於是，周和葉劍英一道，把大多數人編成一隊。[18] 1947年5月1日，根據周的部署，中央軍委成立了外事組，由葉劍英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把這批人都囊括在內。[19] 1949年，當周組建外交部時，又將他們調入北京，成為外交部「班底」的一個核心部分。

周恩來還從軍隊調來了一批兵團級別幹部，加入外交部，準備讓他們出任駐外大使。關於這麼做的原因，周恩來有過解釋：「外交和軍隊打仗

一樣，外交不過是『文打』而已。」[20] 這批幹部雖然全無外交經驗，但對黨忠誠，又都在抗戰和內戰的環境中有過應對各種複雜局面的經驗，派他們出任大使不會在政治上出大問題，是毛、周可以放心的。後來，在新中國派出的第一批駐外使節——如耿飈(駐瑞典和丹麥大使)、王幼平(駐羅馬尼亞大使)、譚希林(駐捷克大使)、彭明治(駐波蘭大使)、黃鎮(駐匈牙利大使)、倪志亮(駐朝鮮大使)、曹祥仁(駐保加利亞大使)、袁仲賢(駐印度大使)、姬鵬飛(駐民主德國大使銜團長)、韓念龍(駐巴基斯坦大使)等——大多是從他們中選出來的。

三

10月2日，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周恩來依然處在參加開國大典後的巨大興奮之中。他縱然有諸多公事需要處理，卻顯得心神另有所羈，焦急地等待着來自莫斯科的消息。直到晚上，那個令他牽腸掛肚的報告終於來了：蘇聯政府來電，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建立外交關係。[21] 幾個月前劉少奇訪問蘇聯時，斯大林曾保證：「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立即就承認你們。」[22] 他果然兑現了這個重要的承諾。周馬上向毛澤東報告了這個大好消息。

對周恩來和毛澤東來說，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的頭等大事，卻又是一件屬於「題中應有之義」的事。畢竟，自米高揚來到西柏坡及劉少奇訪蘇之後，幾個月來，他們就一直在為這件事做鋪墊，而中共建政後這麼快就迎來了蘇聯的承認和建交，也正是他們所期望的。毛馬上想到，要從中蘇建交為新中國爭取最大的利益，為此他把同蘇聯簽訂一項新的同盟條約、實現兩國之間全面的戰略合作，設為必須迅速達成的目標。從1947年起，毛就有着訪蘇並同斯大林見面的計劃，但因各種原因擱置了下來。現在，中共建政已經實現，中蘇又迅速建交，毛澤東訪蘇的時機成熟了。

在毛澤東為訪蘇設定的任務中，當然包括要從蘇聯獲得實質性的軍事、經濟和其他援助。但放在首位的，還是要同蘇聯簽訂一項新的戰略同盟條約，以取代1945年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與莫斯科簽訂的中蘇條約。對毛和中共領導層來說，新中國立國之初，悠悠萬事，唯此為大。這不僅是

對毛提出的「一邊倒」和「另起爐灶」對外政策總方針的實現，也同新政權建立後大政方針和基本發展戰略的確定及推行，有着極大的關係。

然而，毛還不能確定，斯大林對此會作何感想、有何反應。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未收到斯大林本人發來的賀電，更使得毛心中隱隱不悅及不安。[23] 於是，他想到了一着棋，也是試探斯大林的一種手段：將周恩來是否訪蘇以及何時訪蘇並參與同蘇方的談判聯繫起來，而他自己則不必直接出面、在這些具體事務上同蘇方打交道。11月9日，毛通過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通知斯大林，他準備於12月初啟程離開北京去莫斯科，並特地加上了一句：「至於周恩來同志是否應隨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於毛主席到莫後再定恩來是否去及何時去，此點亦請斯大林酌定。」[24] 11月10日，周恩來請蘇聯大使羅申（Nikolai V. Roshchin）報告斯大林，毛澤東不僅將訪蘇，而且「還會提出中蘇條約問題」，並特地強調，「如果毛澤東同志訪問時要簽訂新的中蘇條約，那麼他（周恩來）可以立即坐飛機去莫斯科簽署這一條約」。[25] 這樣，毛、周把訪蘇的一張「底牌」交給了斯大林。然而，斯大林在回電中只是重申了對毛的邀請，卻沒有邀請周。[26] 這不是一個好兆頭。11月12日，毛澤東致電感謝斯大林，並確認他將於12月初去莫斯科，但沒有提及關於這次訪問的任何具體計劃。[27] 周恩來馬上搭起了一個由各方精英人士組成的班子，開始為毛澤東訪蘇做準備。

1949年12月6日，未到日出時分，毛澤東便來到西直門車站，搭乘專列前往蘇聯。周恩來同劉少奇、朱德等中共領導人一道，到車站為毛送行。[28] 經過十天穿越中國東北和西伯利亞的旅行，毛澤東一行於12月16日正午到達莫斯科。由於蘇方的精心安排，毛的專列進站時，「車站的大鐘正打十二下」。[29] 莫洛托夫、米高揚、布爾加寧、維辛斯基等蘇聯領導人前來歡迎。莫洛托夫和布爾加寧還專門上車，對毛表示慰問。[30]

當晚6時，斯大林攜蘇共中央主席團幾乎全體成員，在克里姆林宮同毛澤東會晤並設宴招待。對斯大林來說，這是一種極不尋常的做法——他從來沒有給過來訪的外國領導人這樣的禮遇。他的慷慨做法，給了毛澤東很大的面子。毛澤東絕非不知感激，但他到莫斯科來，有着更大的盤算；他想要得到的，也是更實質的東西。因此，當斯大林詢問毛的來

訪意圖時，毛澤東以一種典型的「毛式風格」回答道，他要一樣「又好吃、又好看」的東西。這番話由毛澤東的翻譯師哲說出來之後，斯大林似乎對毛的說法不得要領。師哲試圖對毛的說法加以闡釋，說明毛想要的就是中蘇兩國簽訂一項新約。但不知是真是假，斯大林依然是一副不知毛澤東之所云的模樣。在場的蘇聯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甚至忍不住笑了起來。[31]

其實，斯大林很可能只是裝着聽不懂毛說什麼。這裏的癥結在於，他並不打算同中國簽訂一項新的條約。當晚，當雙方進入正式討論時，毛澤東又提出了中蘇之間簽訂新約的問題。斯大林沒有直截了當地駁回毛的要求，甚至還說：「這個問題是可以討論和解決的。」但他馬上又嘆起苦經來，告訴毛，他本人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面臨着很大的困難。1945年的中蘇條約「是根據雅爾塔協定締結的」，斯大林給毛上起課來，「這就意味着這個條約的簽訂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即使對某一條款的修改，也會在法律上給美、英以口實，他們會提出修改關於千島群島、南庫頁島條款的問題」。換言之，1945年中蘇條約是雅爾塔協定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被廢除了，也就違反了雅爾塔協定。這樣，蘇聯在戰後遠東秩序的維護上就會陷入困局，也不符合中蘇兩國的根本利益。因此，斯大林建議，北京和莫斯科不應簽訂一項新約來取代1945年的中蘇條約，而應當想個辦法，在形式上保留1945年的條約，但在實質上把它的內容改掉。[32]

談話間，斯大林點出了蘇聯在旅順港駐軍和使用中長鐵路的問題，這對他是一件大事。從沙俄到蘇聯，獲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一直是俄羅斯遠東戰略的中心目標。為此，俄國在1904至1905年同日本打了一仗，吃了敗仗後，失去了對旅順港和中長鐵路的控制權。二戰中日本戰敗，在1945年的中蘇條約中，斯大林獲得了中長鐵路的共同經營權和旅順港30年的駐軍及使用權。這時，斯大林一面說，「我們作為共產黨人，在別國領土尤其是友好國家的領土上駐軍，是完全不合適的」；一面又說，1945年的條約「保障了蘇聯駐軍旅順的權利，但蘇聯可以不使用這個權利，而是應中國政府的請求撤出軍隊」；又說「駐旅順的軍隊可以留下兩年、五年或十年，就看如何做對中國有利」。無論何種情況，都不需要中蘇之間簽訂新約。

毛澤東看透了斯大林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真面孔，馬上表示蘇聯「不必匆忙從旅順撤軍」，但他仍沒有放棄自己同蘇聯簽約的願望和要求。於是，他和斯大林打起太極拳來，又提到了周恩來的名字，問道：「是否需要周恩來前來莫斯科解決條約問題呢？」[33] 這是毛繼續對斯大林的試探和施壓。蘇聯獨裁者哪裏是等閒之人，馬上便反問毛：「如果我們不能確定要完成什麼事情，為什麼還叫他來，他來幹什麼？」毛沒有直接作答。[34]

會議結束後，毛澤東的情緒壞到了極點。回到下榻的別墅後，他在衛生間裏大叫：「我要拉屎！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拉屎放屁嘛！」從衛生間出來後又說：「人家不談，就都不要談了。睡覺！」[35] 直到兩天後，他才就這次會議給北京的同志們發了一份電報。儘管他在電報開首處說，「斯大林同志的態度很誠懇」，但從電報的內容卻看不出這位蘇聯獨裁者到底誠懇在哪裏。毛告訴北京的同志們，斯大林不贊成和新中國簽訂一項新的條約。但是，在蘇聯向中國提供貸款和其他援助上，兩國有可能通過談判簽訂協議。關於蘇聯租借旅順30年的問題，雙方可以「簽訂一個聲明」來解決，「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變，但在實質上蘇聯實現撤兵」。電報結尾處，毛澤東又提起了周恩來，向他的同志們通報道：「關於是否要中國外長來此的問題，他（斯大林）說簽訂一個聲明似乎外長不來也可以。我說，待我考慮一下是否連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時簽訂協定，如果同時簽訂協定，則外長似宜來此。」很顯然，毛澤東依然沒有改變要把一種「又好吃、又好看」的東西帶回中國的初衷。而周恩來是否來莫斯科同他會合，則成了他同斯大林周旋的策略中一個含蓄卻又關鍵的部分。他要留在北京的同志們考慮，周恩來到底該不該來莫斯科參加談判。[36]

12月21日，中共領導人們在北京開會，討論毛澤東的來電。會議由毛出國期間代行中央主席工作的劉少奇主持，周恩來也出席了會議。討論的一個重點是，如果斯大林不同意簽約的話，中方應當如何對待。劉、周在會後聯名發給毛的電報中建議，即便中蘇不簽訂新約，但「如果蘇聯同意現在簽訂關於旅順、借款、航空及通商協定，恩來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蘇聯方面不準備現在簽訂借款、航空、通商諸協定，只準備就旅順駐兵問題及對一般政治問題發表一個聲明，則恩來同志去莫，

似無必要」。[37] 上述建議應該也是周恩來自己的意思。電文因而表示，如果毛澤東處需要，「在得到你的來電後，恩來同志即可動身」。[38]

12月21日晚，毛澤東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的斯大林70歲生日的慶典。斯大林給足了他面子，不僅讓他坐在自己身邊，還請他發表祝詞。但毛在為斯大林祝壽的宴席上，卻幾乎滴酒未飲。斯大林不斷地「側過臉來和毛澤東講話」，卻「未激起毛主席的一絲微笑」。[39] 毛的心中，還是同蘇聯簽訂條約這件事。第二天，毛澤東把在他和斯大林之間擔任聯絡的伊萬．科瓦廖夫叫到住處來，對他說，希望在一兩天內同斯大林單獨見面，「舉行預定的會談」。他又拿出周恩來說事，說「打算下一步談判解決下述問題：中蘇條約、貸款協定、貿易協定、航空協定，擬請周恩來前來莫斯科完成簽字手續」。他叮囑科瓦廖夫，一定要「把他的話原原本本地報告給斯大林」。[40]

三天後，毛澤東和斯大林再次會談。他們談了不少事情，包括「國際共運、越南、日本、印度、印尼、東方情報局、西歐、華萊士、以及東方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等等。毛又「談到恩來是否應出國的問題」，但斯大林的回答讓毛哭笑不得：「政府主席既已來此，內閣總理又來，則在對外觀感上可能有不利影響。」[41] 毛在給北京同志們的電報中只能報告道，經他和斯大林商談，「研究結果還是認為恩來以不來為宜」。[42] 這是一次漫長的會談，延續了五個半小時，但對毛來說最為重要的問題卻沒有解決。會議結束時，他有一種兩手空空的感覺。

這之後的一個多星期，毛澤東整天待在別墅裏，一部接一部地觀看隨行人員為他找來的俄國影片。[43] 但他心中有事，思來想去，仍然不情願在未簽訂中蘇新約的情況下返回北京。他沒有直接向蘇聯獨裁者提出挑戰。這也是他一再提出要讓周恩來來莫斯科的原因，其實是要用這種方式不斷提醒斯大林，他想要的是中蘇簽訂新約。但每一次斯大林這隻老狐狸都按照字面上的意思來對待此事，拒絕了他。毛深感沮喪，他知道他的住處一定安裝了竊聽器，於是便大聲對周圍的人抱怨道，他在莫斯科就是「天天吃飯，拉屎，睡覺」，什麼事也辦不成。[44] 與此同時，他沒有露出哪怕是一點想要離開莫斯科回國的跡象。這是他以委婉方式向斯大林施加壓力，試圖促使這位蘇聯領導人作出讓步。

毛澤東周圍，都是斯大林設下的耳目，跟蹤着毛的一舉一動，所以斯大林一定得到了毛傳來的信息。他在為如何處理這件事，反覆思量。

這期間，發生了一件怪事。12月24日，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呈送了一份報告，大談中共的種種做法如何同斯大林的指示背道而馳，例如對工人階級在革命和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不重視，土地改革還未推向全國，對外國在華企業沒有「任何限制」等等。尤其是，「儘管英美都積極支持蔣介石」，中共領導人卻仍希望它們「盡快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點在周恩來等人的身上表現尤甚。科瓦廖夫還寫道：「周恩來反對派蘇聯專家到上海和天津，因為在這些地方集中着英國和美國的經濟利益。」[45] 斯大林收到報告後，只讓少數幾名政治局委員過目，卻將報告的副本交給了毛澤東，並對毛說，這是科瓦廖夫搞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個技術人員，卻往政治裏鑽，這是很不恰當的」。[46] 斯大林這麼做，既可以視為對毛的信任，又可以看作對毛的警告。同時，這也是對他為什麼不邀請周恩來訪蘇的一條註腳，暗示周有「親西方」的傾向。這恐怕正是他的狡猾與老到之處，也透露出了他舉棋不定的處境。

到頭來，斯大林再三權衡利弊後得出了結論：在全球冷戰興起、蘇美對抗加劇的情勢下，對他來說，讓中國站在蘇聯一邊實在是太重要了，不可輕易放棄。隨着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毛澤東希望看到的轉折也終於到來了。

1950年1月2日晚，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出現在毛澤東的住處。他們說，是斯大林派他們來聽取毛的意見，特別想知道怎麼才能讓毛的訪問獲得成功。毛馬上意識到，他一直在等待的時刻到來了。他馬上接過話頭說：有三種選擇。第一種，是「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強調「這樣做有極大利益」，不僅將使「中蘇關係在條約上固定下來」，也有國內外的好處。「中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民族資產階級左翼都將感覺興奮，可以孤立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在國際上我們可以有更大的資本去對付帝國主義國家。」毛講到這些時，心中必定想起了他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宣示，所露出的熱衷表情一目了然。當他談到另兩種選擇時，就顯得猶豫得多了。第二種是，中蘇雙方可以「發一簡單公報，僅說到兩國當局……取得了在重要問題上的一致意見」。第三種是「簽訂一個聲明，內

容說到兩國關係的要點，但不是條約」。他還把這三個方案同周恩來是否來訪聯繫起來：如果選擇第一種方案，周就要來莫斯科，否則他就留在北京。莫洛托夫顯然已經獲得了斯大林的明確指示，立即告訴毛，第一個方案最好，周恩來也應該來莫斯科。「是否以新條約代替舊條約？」毛又追問了一句。「是的。」莫洛托夫的回答毫不含糊。[47]

毛澤東大喜過望，「有說有笑」。[48] 莫洛托夫他們前腳剛走，毛澤東後腳就給北京發了一份電報。「最近兩日這裏的工作有一個重要發展」，他告訴北京的同志們，「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來同志來莫斯科，並簽訂新的中蘇友好條約及貸款、通商、民航等項協定」。然而，他又不想讓俄國人產生他急於談判簽約的印象。因此，他指示周恩來：「請於五天內準備完畢。……於一月九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不是坐飛機)來莫斯科。」[49] 幾小時後，毛又發去第二份電報。「恩來同志出國來蘇須在政務院會議正式通過」，毛指示道，「並報告此行係為談判簽訂新的中蘇同盟條約」，周應在政務院會議上「指出這一行動將使人民共和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國家不能不就我範圍，有利於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50]

劉少奇、周恩來等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後，便通宵開會討論。他們對毛澤東「來電所示各項辦法」表示「完全同意」，周「決於9日晚車由北京動身，19日可抵莫斯科」。[51] 會後，周沒有片刻耽擱，馬上着手準備訪蘇。1月6日，在政務院會議上，他遵照毛的指示做了關於中蘇談判的報告。[52] 第二天，他向毛報告道，隨他訪蘇的代表團已經組成。[53]

四

1月20日，周恩來乘火車抵達莫斯科。本來，蘇方為周安排了一座別墅。周為了便於隨時向毛報告，搬入了毛的別墅。為防止蘇方竊聽他們的談話，凡屬要事，毛、周都要走到外面的草坪上商量。[54]

1月22日，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出席了同斯大林的正式會談。這位蘇聯領導人看來已有準備，隨身帶來了自1月初以來助手們已為他準備好的12份協定草案文本，其中包括已經過多次修改的中蘇新約草案文本。[55] 周恩

來上一次走進克里姆林宮，已是多年前的事了。當時，他還是處於「造反者」地位的中共的一名領導人。這一次，他以新中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的身分，隨同身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澤東來同斯大林會談，心中自然會有不少感慨。幾十年後，當時任翻譯的師哲還清楚地記得，那一天他們一行走進克里姆林宮時，心中想的都是一定要搞出一個好的、將會青史留名的中蘇新約。[56]

會談開始後，斯大林提出「有兩類問題需要討論，第一類涉及中蘇現有各項協定，第二類涉及東北、新疆等現實問題」，他建議「先討論已有的協定」。毛澤東隨即表示，他希望簽訂一項新的中蘇條約，以便把「已經存在於我們之間的友好關係固定下來，這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關係方面都會引起積極反應」。斯大林說，他支持毛的想法。

當兩人談到條約「應規定包括哪些條款」時，毛首先想到了條約在中國國內將產生的影響，尤其是條約文本必須同他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聲明相契合。「我們認為，在新條約中必須規定在國際問題上協商的條文」，毛說。「把這一條列入條約將增強我們的地位，因為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還存在着反對在國際關係上向蘇聯靠攏的意見。」斯大林立即表示，條約「寫上這一條是理所當然的」。當談到修改中長鐵路和旅順口協定時，毛澤東提出，「改變這個協定要牽涉到雅爾塔會議的決定」。斯大林馬上接口說：「是的，要牽涉到。那就讓它見鬼去吧！既然我們已經選擇了修改條約的立場，那麼就要走到底。……我們不得不同美國人鬥爭了。」他又問道：「委託誰去起草草案呢？我想，應該讓維辛斯基和周恩來去做這件事。」毛澤東答道：「同意。」[57]

於是，中國方面確定條約及其他協定具體細節的擔子落到了周恩來肩上。他知道，這絕對不會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參與過很多談判，包括同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談判，以及同美國的赫爾利將軍和馬歇爾將軍的談判。但現在他面對的是未曾遇到過的新情況：他必須表現出對蘇聯「老大哥」的「高度尊重」，但同時，他手中還拽着保衛新中國重大國家利益、彰顯而非削弱毛澤東「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宣示的艱巨任務。

1月23日，周恩來和米高揚、維辛斯基等蘇聯領導人的會談開始舉行，馬上就碰到了中蘇簽訂新約這個涉及雙方關係根基及準則的大問題。

蘇聯人有備而來，從1月初斯大林對中蘇簽訂新約開了綠燈後，他們就開始了條約文本的起草，幾經修改後完成了一份草案，並帶到會場。同時，他們也帶來了蘇方有關大連、旅順和中長鐵路的協定草案文本。周讀過後，卻發現協定文本中有「許多重要內容沒有寫進去」。毛澤東聽取周的彙報後，當即指示道：「我們自己重搞一個。」[58]

據周恩來後來在給劉少奇及中央的報告中所述，他在「毛主席指導下」，動手起草中方的條約草案。[59] 1月24日，他和李富春、王稼祥一道搞出了一份草案。[60] 若將這一草案同蘇方提出的文本相比較，正如沈志華在對比考證後指出，「所謂中方起草的條約，實際上是在蘇方提供的草案基礎上修改的，雖文字改動不少，但沒有實質性變化」。[61] 然而，周恩來在給北京的劉少奇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報告中卻說：「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我們起草的，……蘇方對該草案無原則修改。」[62] 對上述分歧，應如何理解？就目前資料而言，明明雙方最後簽約的草案文本是出自蘇聯人之手，但周恩來卻說成是中方搞的。由此反映出的，應是周恩來在條約簽訂中強調「平等」的意識。正如沈志華所指出，毛、周等的考慮是，「一旦外界知道中蘇新約是蘇聯事先起草好的，而中方沒有做任何重要修改就接受了，將會給毛澤東和中共的形象帶來多麼巨大的損害」。[63] 這一論述極有道理。這裏所涉及的，實際上是中蘇簽約同毛「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宣示的關係，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新中國」的合法性問題。毛澤東和周恩來對此絕不會掉以輕心。

不管怎麼說，當周恩來將中方的條約草案文本交給了維辛斯基後，蘇聯方面顯然覺得，這份草案同他們自己的那份確實「十分接近」。因此，中蘇雙方隨即就條約文本達成了協議。毛對此極為滿意，第二天凌晨5時親自致電劉少奇，通報道：「二十四日，經我們起草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送交維辛斯基。……總之，工作是頗為順利的。」毛「請中央加以討論，並以意見相告」，最後加上一句，「請勿外傳」。[64]

但是，毛澤東和周恩來似乎都高興得太早了。從後來的發展來看，此時雙方真正的談判和討價還價還只是剛剛開始。毛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提到，周與維辛斯基「正起草第二個文件，即關於旅順大連中長路協定，大

約今日可以完成草案」。[65] 這裏提到的這幾處（旅順港、大連和中長鐵路）既涉及到蘇聯的重大利益以及斯大林的「核心關懷」，也涉及到關於中蘇新約的範疇、適用範圍、性質等的界定。1月23日，蘇方已將己方關於旅順、大連及中長鐵路問題的協定草案交給中方。當雙方關於這些關鍵問題的談判開始後，周恩來發現，中方的看法同蘇方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絕不能在一兩天內就「可以完成草案」的。

1月26日，周恩來與米高揚等的會談繼續進行。蘇方又拿出了一份關於大連港口協定的草案，要求中方對進出大連港的蘇聯貨物及蘇方對港口設備的使用均免徵關稅；港口行政管理權歸中方，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職務由中蘇人員輪流擔任；在對日和約簽訂前，大連和旅順港一樣，實行軍管。[66] 周恩來對蘇方草案很不以為然。問題的癥結在於，草案涉及到了中國主權，卻沒有兑現斯大林同毛澤東談話時將大連問題交由中方處理的承諾。周早有準備，當天他就把親自主持起草的中方關於三個問題的協定草案交給了蘇方。[67] 這個草案把此前分開處理的旅順港、大連和中長鐵路等三個問題，放到同一個協定草案中來，但更大的不同還在於草案的內容。其中尤其讓蘇方感到頭痛的是，周草案要求蘇方承諾，將旅順港、大連和中長鐵路的「所有權利和義務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蘇方在旅順港和大連「臨時代管或租用的一切財產應由中國政府接收」；在對日和約簽訂之時或在協定生效三年時，蘇聯「將中國長春鐵路及屬於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所有」。[68] 這些要求意味深遠，絕不是周恩來和他的助手們拍着腦袋臨時搞出來的，而是反映了周和毛關於中蘇簽約以及相關協定的基本看法：這個條約一定要拿得出手，起到加強「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新中國合法性宣示的作用。

但是周恩來這麼做，也在旅順、大連及中長鐵路問題上把蘇聯人迫進了死角，必須做出選擇。一開始，蘇聯方面包括「大老闆」斯大林在內，對周的草案反應強烈。好幾位蘇聯領導人讀了周的稿子後，在頁邊和行間留下了「×」記號，提出了很多問題和各種評論，以及「斯大林不同意」之類的批語。[69] 但斯大林並不希望看到會談在這些問題上破裂。畢竟，關於中蘇簽訂新約的談判已經走得夠遠了，到了哪一方都不可能再掉頭轉彎的地步。更何況，不管雙方怎麼談，這三處的權益遲早總是要歸還中國的。

難道斯大林會願意看到，會談竟因為周代表中方闡明的這些條件遭到拒絕而以失敗告終？於是，從蘇方的幾次修改稿中可以看出：儘管蘇聯人很不滿意，但仍在盡量向着周的觀點靠近。

1月28日，周恩來收到了蘇方的最後對案，承諾在對日和約簽訂後或不遲於1952年，將中長鐵路一切權利及所屬全部財產無償移交中方，蘇軍亦將撤出旅順，旅順的民事行政歸中國管轄；雙方將在對日和約簽訂後「處理大連港問題」，其「行政則完全屬中國管轄」。在締約國「任何一方被捲入戰爭時」，經雙方政府同意，「兩國可共同使用旅順海軍基地，以利共同對侵略者作戰」。蘇方則要求中方對蘇聯的物資和原料免稅及免檢，並允許蘇聯付費使用中長鐵路運送軍隊和軍用物資。[70] 至此，中蘇在三個問題上的立場已十分接近。同一天，蘇方又拿出了關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修改後的定稿，雙方在條約的文字及表述上已無分歧，[71] 談判離最後的成功已是咫尺之遙了。

2月8日，周恩來給劉少奇發了一封長電報，總結了中蘇談判所取得的進展。他不無得意地告訴北京的同志們，雙方已就中蘇新約，旅順、大連及中長鐵路協定，蘇聯對中國貸款協定、貿易協定、民航協定等，達成了一致意見。中蘇簽訂新約的時刻快要到來了。[72] 然而，他在電報中沒有提及的是，除上述各項問題外，談判還涉及了另一個秘密協定。先前，當周恩來同米高揚等的會談在簽訂新約以及關於旅順、大連、中長鐵路的協定上獲得了重大進展時，蘇方又提出了蘇聯在新疆的「特殊利益」以及不允許第三國勢力介入新疆和東北的問題。2月10日，莫洛托夫交給周恩來一份蘇方協定草案，其中提出，「在蘇聯遠東地區和各中亞共和國以及在中國的東北和新疆，不得向外國人提供租讓」。[73] 蘇聯人擔心，第三國勢力會進入到東北和新疆這兩處蘇聯的傳統勢力範圍中去。周感到茲事甚大，立即向毛報告。毛馬上把蘇方的要求視為一種冒犯。他對汪東興說：「蘇聯人還是對東北和新疆感興趣，還是想幹雅爾塔那樣的勾當。」[74] 但此時離雙方商定的簽約日期已經越來越近，毛、周絕不希望看到通向簽約之路又走岔。斟酌之下，毛澤東還是決定同意蘇方要求。2月11日，周恩來通知蘇方，除個別文字外，莫洛托夫提出的協定草案已獲得毛的批准。[75]

1950年2月14日，中蘇條約簽訂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斯大林和毛澤東都出席了簽字儀式，周恩來和維辛斯基分別代表兩國在條約文本上簽字。兩國所締結的，是一項戰略同盟條約。締約雙方將「保證共同盡力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同時，「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76] 周恩來和維辛斯基還簽訂了蘇聯向中國提供3億美元貸款的協定，年息為1%。雙方達成協議，貸款的相當部分將用於購買蘇聯的軍事裝備。[77] 蘇方還同意，將於1952年底將中長鐵路移交中國，並將在對日和約簽訂或1952年底前從旅順港撤出蘇聯軍隊。條約的補充協定，則為蘇聯保留在新疆和東北的「特殊利益」和影響留下了空間。[78]

2月17日，毛澤東在蘇聯逗留兩個月後，同周恩來一道乘專列離開莫斯科回國。他們一路行、一路停，走了兩個多星期，心情和去蘇聯時已大不一樣。中蘇結盟將大大加強新中國的安全地位，並為獲得蘇聯全方位的援助做了基礎層面的鋪墊。毛更為看重的是，這也將極大地擴展中共在國內推行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革命的能力。火車進入東北後，他在一個中共高級幹部會議上說，中蘇「兩個大的民族、兩個大國，用同盟條約的方式團結起來了」，這會「在全世界發生很大影響」。同時，「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歷史，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經驗，我們可以用他們的經驗」。回到北京後，毛又說，中蘇條約和協定「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國，這樣就便於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的侵略」。[79] 毛覺得他可以理直氣壯地宣佈，提出「一邊倒」大政方針是對的，並開始奏效了。周恩來一路陪同毛澤東回到北京，也幾次就中蘇關係發表講話。他在東北幹部會議以及回北京後的會議上，專門解釋了中蘇條約對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的處理，指出「1952年就歸還旅順和中長鐵路」，而「旅大的行政已完全由我們管理」。他還特地強調：「我們這次把歷史上的一些懸案作了一個總的解決，這只有我們人民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才能和蘇聯得到這樣的解決。」[80] 他這麼做的深意是，中蘇簽訂同盟條約帶來了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也使得毛澤東「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宣示進一步加強。



圖15.3：周恩來與毛澤東、斯大林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相關協定簽字儀式上，1950年2月14日。(Album / Alamy Stock Photo)

然而，這個中蘇關係的故事還有另一面。毛澤東與斯大林極不相同。斯大林慣於使用權力的語言，行事處世從來便將蘇聯的戰略利益置於一切之上；毛則富有革命浪漫主義色彩，喜歡用哲學語言來闡發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歷史性責任，甚至當他在界定「中國國家利益」時也是如此。儘管他當時並未對斯大林的世界革命領袖地位提出正面挑戰，但他對斯大林把他這位來自「中央之國」的革命領袖視為「小兄弟」的做法，卻有着極度的敏感。[81] 毛從來就不喜歡與斯大林面對面談話，這也是他為什麼堅持要讓周恩來也來莫斯科參加談判，直接同蘇方打交道。[82] 中蘇條約的簽訂，使得「一邊倒」成為中國整個內外政策的基石。但同時，兩國簽約的曲折過程又透露出，中蘇關係的未來發展不會一帆風順。

五

在籌建新政權的同時，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從未忘記國共內戰還未結束，台灣及一系列沿海島嶼仍在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統治之下。國土尚未統一，這是毛澤東即便在訪蘇期間也念茲在茲的另一件大事。

隨着國民黨的殘餘力量在大陸被逐步肅清，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也把「解放台灣」提上了日程。1949年6月14日，毛致電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將領粟裕等，指示他們「注意研究奪取台灣的問題」，要他們考慮「台灣是否有可能在較快的時間內奪取，用什麼方法去奪取，有何辦法分化台灣敵軍，爭取其一部分站在我們方面實行裏應外合」。毛強調，「如果我們長期不能解決台灣問題，則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83] 未等三野方面回覆，毛一週後再次致電粟裕及華東局，除命令他們「準備佔領台灣」外，又批評他們說，此項重要工作「你們尚未來得及注意，但應請你們從現在起即開始加以注意」。毛特別涉及到了周恩來所負責的情報工作，提出：「為使佔領台灣任務早日實現」，有必要在華東局統一領導之下，在上海市、三野及其所轄部隊，「各設一個專門研究策動解決台灣問題的機關，各用幾個人，專門擔任此項工作」。毛還特別指示：「應用極大注意力並不惜花費去做策反工作，……準備裏應外合的條件。如無此項條則，佔領台灣是很困難的。」電報中，毛提出了一個急迫的時間表：「我們希望能於夏秋兩季完成各項準備，冬季佔領台灣。」[84] 未等粟裕等作出部署，7月10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更為明確地提出：

> 我們必須準備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及空軍，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則把握更大。我空軍要壓倒敵人空軍短期內（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慮派三四百人去遠方學習六個月至八個月，同時購買飛機一百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85]

這樁事情，成了毛澤東的一件大心事。不到一個月，他在給粟裕等的另一電報中再次強調了台灣戰役必須滿足海空軍和內應這兩方面條件的重要性：

> 你們積極準備攻台灣是正確的，必須從各方面準備攻台，打破幹部的畏難心理。除你們從陸軍海軍及策反(此項十分重要)積極準備外，我們正從空軍方面進行準備工作。詳由小平面告。[86]

接到毛澤東的指示後，周恩來等馬上以組建海、空軍和發展內應為重點着手推動解放台灣的準備。然而，恰恰在這兩個要害問題上，中共領導人後來都碰到了繞不過去的大坎。首先，他們在海軍建設上碰了壁。本來，毛、周等曾寄希望於蘇聯在海軍建設上大力相助，甚至還想要斯大林在中共發動「解放台灣」戰役時，直接派出蘇聯海軍部隊支援解放軍作戰。1949年夏，劉少奇訪蘇時當面向斯大林提出了由蘇聯向中共實行攻台戰役直接提供海軍支援的請求，不料斯大林卻予以拒絕。[87] 斯大林最擔心的是，這麼做有可能會導致蘇聯與美國之間的衝突。他只答應會為中共提供海軍艦隻，並幫助中共培訓海軍人員。但問題在於，中共若要通過這樣的途徑建立起一支用於支援渡海作戰的海軍，必定要花費時日，遠水救不了近火。在空軍的創建方面，中共更是幾乎要從零開始，步履維艱。劉少奇訪蘇期間，還曾向斯大林要求，由蘇聯提供100至200架雅克飛機和40至80架重轟炸機，幫助中共在蘇聯空校培訓1,200名飛行員和500名技師，並向中國派出空軍顧問。之後，經周恩來指派，中方組織了一個以空軍司令劉亞樓為團長的空軍代表團訪蘇，並在劉少奇回國前趕到莫斯科。代表團向蘇方提出在一年內，依靠蘇聯的幫助建立一支擁有300至500架作戰飛機的空軍。蘇方作出了「將盡力而為」的承諾。[88] 但問題依然在於，中共要依靠蘇聯的援助形成台灣戰役所亟需的空軍作戰能力，仍需時日，面臨的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的局面。

12月16日，毛澤東在克里姆林宮和斯大林會面時，直截了當地提出，要蘇聯「派遣志願飛行員或秘密部隊，以便盡快解放台灣」時，斯大林的回答卻是含含糊糊的。「不排除在這方面提供幫助」，斯大林告訴毛：「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慮周到，這裏主要的問題是不給美國人的干預提供藉口。」接着，他以帶着教訓的口吻說：「沒有必要同美國人或英國人發生衝突。在同美國人打交道時，我們一定要非常小心，也一定要避免不必要的衝突。」[89] 斯大林的這番話，等於是讓毛吃了個閉門羹。

屋漏偏逢連夜雨。1949年入秋以後，中共「解放台灣」的計劃和行動又遭遇了兩次重大的挫折。10月下旬，解放軍佔領沿海城市廈門後，卻在試圖一鼓作氣佔領與廈門隔岸相望的金門島時遭到慘敗。解放軍第十兵團所屬28軍的三個團，在登島後由於遭遇退潮、後援受阻，竟然全軍覆沒。11月，解放軍第七兵團第61師又在試圖佔領浙江沿海的登步島時，吃了另一個大敗仗。這一戰，解放軍部隊登島後不到一天就幾乎佔領了全島。不料，國民黨部隊依仗海、空優勢，迅速向島上調派了四個團的部隊，而中共增援部隊由於潮汐受阻，只得從島上敗退撤兵。

解放軍渡海作戰連續受挫，尤其是在金門吃的大敗仗，為國共內戰以來所未有。這猶如一記當頭棒喝，對毛澤東、周恩來及整個中共領導層的衝擊甚大，也對中共「解放台灣」戰略的制定和實行產生了巨大影響。10月29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向全軍發出通報，提出「必須以金門島事件引為深戒，……務必力戒輕敵急躁，穩步地有計劃地殲滅殘敵，解放全國，是為至要」。[90]

面對海、空軍建設的困難，又遭遇金門和登步登陸作戰失利，11月22日，粟裕在給毛和中央的電報中報告道，蔣介石因金門、登步兩戰受到鼓勵，「將台灣兵力增強舟山、金門諸島」，這樣，雖然會增加攻佔這兩個島嶼的困難，但也可「爭取將國民黨軍殲滅在沿海諸島，造成攻台的有利條件」。粟裕因而提議，三野將定海作戰的時間「推遲到1950年1月或2月，以便充分準備」。[91] 12月5日，周恩來同蘇聯大使羅申談話時說，進攻台灣的任務將十分艱巨，必須做好充分準備，「戰役的日期，看來將安排在1950年9至10月間」。[92]

國民黨方面，蔣介石對於保住台灣這塊「最後的地盤」自然極為重視。早在1948年夏，當國共內戰還處於大決戰前夕時，蔣介石就已有了把內戰部署的重點轉向沿海地區及島嶼的戰略盤算。他在6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後對國際與中國共匪，皆應(以)沿海岸線各省市口岸為主要地區，不應再以抗戰時代之西北與西南為根據地。故江、浙、閩、台當以剿匪與對國際戰爭為核心堡壘，應有整個通盤之計劃，當有以急圖之。」[93] 中共部隊在金門、登步的兩次失利，同蔣在沿海地區及島嶼的部署和準備是分不開的。1950年初，蔣介石又採取了一系列牽制乃至反制中共攻台戰役

的行動，連續派出空軍對大陸沿海城市、尤其是對上海進行轟炸。此後，這一行動雖然由於蘇聯空軍部隊迅速入駐華東地區而受到制約，但蔣已迫使中共在組建空軍時加上了「國土防衛」的任務，從而達到了遲滯中共攻台準備的目的。此後，蔣介石又對其守衛沿海島嶼的戰略和部署作出了重大調整。1950年4月，解放軍在海南島實行大規模登陸作戰行動時，蔣並沒有加派重兵增援守島，反而下令國軍主力撤出海南島，退守台灣。5月中旬，他又下令駐守浙江沿海舟山群島的國軍部隊主動秘密撤回台灣。這樣，解放軍固然順利佔領了海南島和舟山群島，卻並沒有如預期的那樣消滅多少國軍有生力量，要佔領台灣的難度因而加大了。

早在1949年8月，毛澤東在試圖確定發動攻台戰役的時間時就提出：「惟攻台時間如有台灣國民黨海陸空三方面大量可靠內應，則可以早日舉行，否則必須推遲到我方空海兩軍(特別是空軍)條件充分具備之時，故具體時間問題目前不能確定。」[94] 面對攻台準備中所遭遇到的各種困難(尤其在形成海空軍攻擊力量上)，毛、周和中共領導層不得不一再推遲發動解放台灣戰役的時間。[95] 1950年4月，負責攻台戰役的三野在制定「陸海空軍兩棲攻台計劃」時，已經把「三軍協同解放台灣」的發動時間，推遲到1951年春天，並獲得了中央軍委的批准。[96] 4月13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通報道：「奪取台灣的作戰，準備在1951年進行之。」[97] 朝鮮戰爭爆發前夕，在七屆三中全會上，中共領導層又決定在1951年春夏之前不實施對台灣的進攻行動。[98] 也就是說，即便朝鮮戰爭不在1950年6月發生，中共因為缺乏大規模登陸作戰的綜合能力，已不可能在1950年內發動「解放台灣」的戰役。

更為要緊的是，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共「解放台灣」的計劃受到了另一個致命的打擊：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被捕叛變，打入國民黨軍事系統中階級最高的吳石將軍被捕並遭到處決，中共在台灣的地下情報系統遭到了沒頂之災，幾乎被一網打盡。[99] 在安插和發展內應方面，在中共領導層內長期由周恩來負責經營。整個內戰期間，中共在這方面曾佔盡先機。然而，到了要「解放台灣」時，情勢已經改變。對蔣介石來說，「肅清匪諜」是一樁關係到其政權存亡的頭等大事，他剛剛在大陸吃了大虧，焉能對此事不予以極度的重視？他一到台灣，就全面加強「肅

清匪諜」。相形之下，中共情報人員在台灣的活動同在大陸時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台灣在地理上處於四面環海、與大陸隔離的位置，使得中共向台灣派出情報人員並同他們保持聯繫變得十分困難。蔡孝乾於1945年潛回台灣後，發展中共地下組織並不順利，到1948年只有數十名黨員。而國民黨政權在遷台後，處於一片風雨飄搖的氣氛，中共地下組織也有較大的發展，到1950年初，已有近兩千名成員。但1950年初，負責蔡與吳石之間聯絡的一名交通員被捕後，吳亦於3月初被捕，並於6月10日被槍決。蔡雖然潛入了地下，卻仍於4月下旬被捕，並在被攻破心防後叛變，供出一切機密，終於使中共在台灣的地下組織幾乎全軍覆沒。從此之後，除少數幾個與周恩來單線聯絡的「戰略間諜」外，中共再也未能在台灣重建起有效運作的地下情報網絡。多年來，蔣介石在同周恩來的情治對峙中一敗再敗之後，終於得以扳回一城，對蔣來說是性命攸關的一城。

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不僅迅速作出對朝鮮戰局進行干預的決定，並宣佈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使得台海地區「中立化」。這樣，中共使用武力解放台灣的可能性便完全失去了。後來，毛自己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他犯了戰略決策上的錯誤：「在大陸，我們贏了，蔣介石輸了。但是，過江以後，我們犯了一個歷史的錯誤，就是我們沒有集中二野和三野的兵力解決台灣。……可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分兵了。二野轉戰西南了。那時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擁有重兵。其實西南是一部死棋，是下不活的。……而蔣介石在台灣的棋卻下活了。」[100]但這一步棋下錯後的影響卻是深遠的。

六

在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統一中國」的全盤計劃中，同台灣的「解放」同樣佔據着中心位置的，是西藏的「解放」。這也成為他們構建「新中國」的一個重要方面。

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以在國共內戰中保持中立為由，關閉了國民政府駐拉薩代表處，並將所有漢族官員從西藏驅逐出去。這一「驅漢事件」促使中共加快了解放西藏的部署。[101] 9月2日，新華社發表社論

指出，驅漢事件是「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印度尼赫魯政府的策劃下發動的」，目的是「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進一步地喪失獨立自由，變為外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奴隸」，這是「絕不容許」的。[102] 此後，中共領導層在討論「解放西藏」的方略時，既認識到「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103] 又確定「西藏問題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104] 有必要將軍事、外交及統一戰線工作結合起來，尤其必須重視對西藏政治和宗教上層人物的工作。[105] 周恩來在中共領導層主持統戰和外交事務，責任重大。

1950年1月20日，外交部就西藏問題發表經周恩來修訂的聲明，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來北京就「和平解放西藏」問題進行談判。[106] 起初，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廈)仍試圖通過國際外交來阻止解放軍入藏。從1949年末到1950年初，噶廈在一系列聲明中提出，西藏向來享有獨立地位，與中國之間則是一種供施關係，在西藏也不存在外國帝國主義的影響。他們要求中共保證「不進攻西藏」。[107] 噶廈並組建了派往英國與美國的「親善使團」，以爭取倫敦和華盛頓的支持。周恩來得知此事後，即指令外交部發言人指出，這「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謀們所導演的傀儡劇」，[108] 迫使噶廈取消了派出使團的計劃。

與此同時，噶廈還派出了一個以高級俗官夏格巴為首的三人代表團，於3月間抵達新德里，並於4月2日向北京方面提出，願意在擔保「西藏領土不會受到侵犯」的條件下，同北京派出的代表在香港舉行談判。北京方面沒有馬上作答，而是舉行了一系列的內部討論，於5月下旬確定了通過外交、統戰及軍事手段相結合，爭取最終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總方針。隨後，夏格巴得到北京方面的答覆：他們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身分到北京進行談判。在夏格巴等遲遲未有進一步動作的情況下，8月間，周恩來兩次指示中國駐印度臨時代辦申健通知他們：「西藏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認該代表團為西藏之外交代表」，而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或西藏民族的代表」的身分，「和中央人民政府商談和平解放西藏問題，此談判應在北京舉行」。[109] 8月21日，周恩來又知會印度駐中國大使潘尼迦(P. M. Panikkar)：「我們認為西藏代表團是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團，他們應該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來商談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辦法。」[110]

在噶廈方面遲遲未有進一步行動表示的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作出了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的決定。根據周恩來的指示，9月17日，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給夏格巴發出了一封最後通牒式的函件，要求西藏談判者「務於九月二十日之前到達北京」。[111] 隨後，袁仲賢又於9月23日致函夏格巴，警告道：「原定九月二十日期限已過，人民解放軍將按計劃行動」，其後果將由藏人自負，但如果他們「能很快去北京，仍是好的」，並敦促他們「迅即動身」。[112] 夏格巴和西藏使團答覆道，他們必須等待拉薩方面的命令，北京因此決定動用武力。10月3日，解放軍西南軍區發佈了在被稱為「西藏門戶」的昌都打一仗的命令。[113]

昌都戰役於10月6日打響後，持續了兩週。解放軍大獲全勝，於10月19日佔領昌都，藏軍投降。戰鬥於10月24日結束，據稱藏軍有180人傷亡，約900人被俘，另有4,300人投降。[114] 藏軍方面，下達投降令的是昌都軍政總管阿沛．阿旺晉美。這成為他此後終生與中共合作的開端。[115]

昌都戰役尚在進行時，周恩來便指示袁仲賢通知西藏談判代表，正是由於藏方「故意拖延」來京，才導致戰役的發生。但談判的大門依然是敞開的，「如西藏願意談判，代表團應速來京」。[116] 在拉薩，在噶廈當局已無力應對局勢的情況下，支持達賴喇嘛親政的呼聲日益高漲。11月17日，當時年僅16歲的達賴喇嘛比慣例提前兩年執掌政柄。藏方領導人在無法阻止解放軍入藏的情況下，又想到請求聯合國幫助「制止中國的侵略」。[117] 然而，很大程度上由於英國不願意扮演任何領頭的角色（英國人希望由印度來牽這個頭），聯合國最終決定不討論西藏問題。[118]

就在此時，周恩來發現他在外交上面臨着來自印度的挑戰。出於地緣政治上的考慮，印度對解放軍在昌都的軍事行動表現出嚴重關切。10月26日，新德里表示，對於「北京關於已命令解放軍部隊向西藏進軍的聲明」，「深表遺憾」。[119] 隨後，印度政府在另一項聲明表示，「西藏最近的事態發展已經影響到了（中印之間的）友好關係以及世界和平」。新德里還指出，解放軍在西藏的軍事行動將造成國際、尤其是南亞緊張局勢的加劇，並對中印友好關係產生負面影響，也會為那些試圖將中國拒於聯合國之外的國家提供藉口。[120] 周恩立即向毛澤東彙報，兩人商量後，決定堅決駁回。毛親自擬就了中方答覆，其中強調「西藏是中國領土，西藏問題屬中

國內部事務。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經戰爭進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團九月來北京談判」。[121] 10月21日，潘尼迦向周提及，解放軍在西藏的軍事行動會對中國進入聯合國產生負面影響。周根據毛的指示答覆道：「西藏為中國內政問題，任何外國無權過問。」[122] 10月31日，印度外交部副部長梅農(K. P. S. Menon)再次對解放軍入藏「深表遺憾」。毛得知後，又指示周恩來：「(對印度)態度還應強硬一點，應說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地方政府願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餘地。」[123] 11月16日，周恩來親自出面通知印度，中國政府「曾屢次聲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問題完全是中國的一個內政問題」。因此，印度企圖「影響和阻止中國政府對於西藏的國家主權的行使，這不能不使中國政府十分驚異」。[124] 本來，周恩來的強硬反應很可能會引起中、印雙方的嚴重敵對。但是，儘管印度總理尼赫魯和他的許多同事們一樣，擔心解放軍入藏會改變西藏作為中印之間緩衝地帶的作用，他同時相信「有理由認為，由於地理、地形與氣候上的原因，西藏的高度自治幾乎是不可避免的」。[125] 結果，印方除了表達「遺憾與關切」外，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拉薩方面在軍事上吃了敗仗後已無計可施，又缺乏國際社會支持，只能回到談判桌上來，拉薩上層人士中要求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呼聲也越來越大。解放軍佔領昌都後，阿沛．阿旺晉美留在了昌都，並強烈主張噶廈應同共產黨人進行談判。他在呈遞給拉薩的報告中，以自己與解放軍打交道的親身經歷說明，共產黨士兵紀律嚴明，而通過和平方法解決問題將使得西藏人民與家園免遭戰爭的毀滅性影響，因此同北京談判是西藏「保留一定自治地位的唯一機會」。[126] 達賴喇嘛對此表示了謹慎贊同的態度。12月初，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前往地處中印邊界的亞東。1951年1月27日，達賴喇嘛寫信給袁仲賢，表示願意與北京談判。2月1日，袁仲賢代表毛澤東祝賀達賴執政，並歡迎達賴「派代表赴北京商談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事情」。[127] 達賴喇嘛在離開拉薩前，已同噶廈一起，決定授予阿沛．阿旺晉美以全權，「同中國人進行談判」。[128] 在得知聯合國決定不將西藏問題納入大會議程後，達賴喇嘛與噶廈決定派出由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前往北京。

周恩來洞若觀火，他知道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時刻來了。4月22日，阿沛·阿旺晉美等藏族代表抵達北京，周親自到車站迎接。五天後，班禪喇嘛也來到北京，周恩來又會同朱德到車站迎接，並於當晚設宴款待。阿沛·阿旺晉美回憶道，周對他和其他藏方談判代表「極為親切」。中央首席代表李維漢等和西藏代表團的談判從4月29日開始，周恩來主持了首次會議。此後三週裏，雙方共舉行了七次會談，議程集中在三個問題上：解放軍在西藏的地位與角色，達賴喇嘛的地位與權力，以及承認班禪的問題。儘管阿沛·阿旺晉美和他的同事們試圖根據噶廈的指令爭辯道，解放軍完全沒有必要進駐西藏，但李維漢等人不為所動，堅持解放軍必須入藏。與此同時，李維漢等人又保證，在解放軍入藏後，達賴喇嘛的地位和權力以及西藏的宗教政治制度都會得到維護。周恩來定下的這一套「恩威並濟」的策略奏效了。最後，談判雙方並未經過冗長的爭論，便在這些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但此後，談判在是否承認班禪喇嘛的問題上幾乎陷入僵局。歷史上，達賴和班禪兩大集團之間的關係並不和睦。但周恩來知道，若能夠在西藏保持並加強立場上更「愛國」的班禪的地位，不僅可藉以牽制達賴，也必定會加強中央與「西藏地方當局」談判時的實力。於是，李維漢根據周的指示在談判中堅持，一定要在協議中包括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實行合作的條款——而這也意味着達賴喇嘛對於班禪喇嘛地位的承認。一開始，阿沛·阿旺晉美等仍然堅決拒絕這一條件，並強調協議的目的是界定中央政府與噶廈之間的關係，而不是界定藏人之間的關係。但李維漢表示，這對於中央政府來說是一個重要問題，尤其是因為「班禪喇嘛和班禪集團在20世紀歷史上從來沒有捲入過反對祖國的任何活動」；新中國成立後，班禪喇嘛又馬上表達了對中央人民政府的堅定支持。這一番話，必定是在周恩來的指導下說出來的，既表明了中央政府對於班禪「有功必報」的基本態度，也是在提醒乃至警告達賴集團，中央政府並沒有忘記他們在20世紀歷史上種種「不愛國」乃至「賣國」的行徑。阿沛·阿旺晉美是個聰明人，豈能看不出其中的奧秘，於是致電噶廈，提議承認班禪喇嘛。達賴喇嘛與噶廈同意了。[129]

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在北京簽訂。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第一條：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

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中央政府同意維持「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不改變具有封建與神權性質的西藏現存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關於「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協商的方法解決之」。[130]《十七條協議》還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秘密協議:解放軍將進入西藏並駐紮在「國防要點及交通要點」,藏軍將逐步改編並接受解放軍西藏軍區的指揮,軍區指揮人員則由中央政府任命。[131]

《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是北京方面的一個重大勝利。此後,藏族上層人士對達賴是否應當接受《十七條協議》並返回拉薩產生分歧。經過了冗長而激烈的辯論之後,亞東國民大會向噶廈建議,達賴喇嘛應當返回拉薩。[132] 7月14日,中央代表張經武帶着周恩來「一切活動須採取謹慎方針,從長遠利益着想,不宜急躁,尤忌操切行事」的指示,抵達亞東。[133] 兩天後,他向達賴遞交了毛澤東的一封信,信中讚揚達賴喇嘛派代表到北京與中央政府舉行談判之舉,並要求達賴喇嘛與西藏地方政府「認真地實行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盡力協助人民解放軍和平開進西藏地區」。[134] 8月21日,達賴喇嘛離開亞東前往拉薩。10月24日,達賴喇嘛致電北京:「擁護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願意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135] 隨後,班禪喇嘛也發表聲明,擁護《十七點協議》,歡呼「西藏回到祖國」。[136] 來自西藏的兩位最具影響力領導人的贊同,為《十七條協議》帶來了巨大的合法性。自此,西藏正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對毛澤東、周恩來和他們的同志們來說,這是慶祝「中國人(現在也包括了藏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又一個歷史性時刻。

第16章

朝鮮戰爭（1950–1953）

一

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這在北京本來應當是平靜的一天。從6月初起，中共領導人幾乎一直在開會，周恩來也忙得不亦樂乎。這一天，他的工作日曆上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可以稍事休息。

但就在這一天，朝鮮出事了。天還未亮，大批北朝鮮部隊以蘇制T-34型坦克為前導，突破了1945年後將朝鮮半島分割為兩半的三八線，大舉入侵南方。短短幾小時裏便擊潰了對方的抵抗，三天後又佔領了南朝鮮首都漢城（今首爾）。美國的反應迅速，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宣佈，美國軍隊將對南朝鮮李承晚政權施以援手；之後，又宣佈派遣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使海峽地區中立化」，這意味着美國站在國民黨一邊介入了進行中的中國內戰。在美國的推動下，聯合國通過了譴責北方侵略南方的決議，美國對朝鮮戰爭的軍事干預也得以在聯合國的旗幟下進行。

周恩來和毛澤東一樣，知道北朝鮮打算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已有時日，但他們並不曉得戰爭會在這一天爆發。更令他們震驚的是美國迅速捲入，特別是派出第七艦隊進入台海。這些天來，周恩來一直忙於軍隊的整編及復員。朝鮮一打起來，他馬上意識到工作重點要轉移了，必須全力應對由朝鮮戰爭帶來的一系列挑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朝鮮戰爭爆發，首先是半島上共產黨革命力量同右派保守力量之間尖銳衝撞的結果，也同中國革命勝利的影響和全球冷戰的興起有着緊密聯繫。1949年4月下旬，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訪華。周恩來和朱德一道，同他談了四次，毛澤東也親自出面會談。金一通報了朝鮮半島的局勢，並要求將解放軍中的朝鮮族戰士送回朝鮮。毛當即表示同意，並提到如果南方進攻北方，或北方過早進攻南方的話，南方有可能引入日本軍隊，從而使北方在軍事上處於不利地位。因此，北方若同南方開戰，要從「政治上是否有利」來考慮問題，最好讓南方先進攻，才展開反攻。毛還說，「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你們悄悄地派去中國士兵」，但中國內戰還未結束，解放軍一時騰不出手來支援朝鮮，所以「類似北朝鮮進攻南方這樣的行動，只有在1950年初國際形勢有利於這一點時，才可以採取」。[1]

周恩來身為解放軍總參謀長，遣返朝鮮族部隊之事自然要由他組織協調，這件事他辦得乾淨利落。1949年7、8月間，由朝鮮族戰士組成的解放軍164師與166師全建制回到朝鮮。到1949年底，返回北朝鮮的朝鮮族解放軍部隊總數已達4萬人左右。[2]

在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看來，這些部隊不僅鞏固了朝鮮人民軍的防禦能力，更加強了進攻的力量，他的翅膀硬了。1949年7月下旬，他向蘇聯提出，準備要用武力統一朝鮮半島。斯大林從維持戰後東北亞現狀的既定立場出發，不支持金的要求。[3] 毛澤東和中共獲悉金的想法後，也持保留態度。當時，他們在「解放台灣」上遇到了困難：斯大林拒絕對中共進攻台灣提供海空軍幫助；10月間，解放軍渡海佔領金門之戰又以全軍覆沒而告終。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因而希望，在台灣問題解決前，金日成不要向南方發起進攻，以免造成局勢的複雜化。[4]

金日成不甘心，還是一再向斯大林提出進攻南方的要求。1950年1月底，斯大林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表示願意在莫斯科接見金日成，當面商討他進攻南方的計劃。但斯大林不想讓毛澤東知道或參與此事。他要求金日成對「此事要始終保密，不要同其他北朝鮮領導人或中國同志分享」。[5]

不過，毛澤東和中共並沒有被蒙在鼓裏。1950年3月底，就在金日成訪問蘇聯的前夕，毛澤東和周恩來一道會見了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討論「金日成要同毛澤東會見的問題」。毛澤東同意見金日成，並把時間定在

4月底或5月初，也就是金訪蘇之後。交談中，毛直截了當地問李周淵：「打算什麼時候統一國家？」李沒有回答。毛索性挑明了說：「如果你們想在近期對南方發起軍事行動，那麼，就不要進行正式會晤。在這種情況下應進行非正式來訪。」周恩來故意建議說，毛和金「應該正式會晤」，這分明是對朝方的一種試探，李又沒有正面回答。毛說了一段大實話：

> 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統一朝鮮的，統一朝鮮必須要用武力才行。對於美國人，不要怕他們。美國人不會為了這樣一小塊地盤就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6]

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見李周淵之後，4月1日，周在中國軍事情報部門的一次全國工作會議上，也有一番關於支援東方革命(包括朝鮮革命)的極富深意的表述：

> 我們今天勝利了，要有不怕擔當大任的精神，要擔當起解放全世界的重任，而且要有此氣魄。今後我們要幫助東方被壓迫民族兄弟的解放，如朝鮮、印尼、越南等國家，如果這些民族都起來了，得到了解放，那不是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就更大，帝國主義更加容易崩潰嗎？[7]

周恩來對於中國當時所面臨的「國際大任」的分析，同他和毛澤東會見李周淵時對朝鮮統一問題的表態顯然有着一脈相承之處。毛、周等中國領導人既然有如此想法，對於金日成通過一場「革命戰爭」統一整個朝鮮半島的想法和計劃，即便在發動時機等問題上持有異議，也絕沒有斷然否決的道理。

4月，金日成秘密訪蘇。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對南方採取軍事行動，但又告訴他：「朝鮮同志不應預計能取得蘇聯的巨大支援和支持，因為目前它比起朝鮮問題面對其他更為重要的挑戰。……如果你的牙齒被打掉的話，我連一點小忙都幫不上你，你必須請求毛澤東提供所有的幫助。」[8]這樣，斯大林把球踢給了毛澤東。

5月13日，金日成又悄悄地來到北京。聯想到3月間毛澤東、周恩來和李周淵的談話，顯然他來是談「對南方發起軍事行動」的。[9]毛、周當然會想到，如果沒有斯大林的批准，金恐怕走不到這一步。金果然說，斯大林已同意他進攻南方的計劃。會後，毛馬上讓周致電斯大林核實此事。[10]

這麼做，除了對斯大林、金日成兩人「先斬後奏」的做法表示不滿外，應還有兩層意思。第一，戰後朝鮮一直屬於蘇聯「管轄」，現在金日成根據斯大林指示向中方提出進攻南方的問題，也就等於是讓中國參與此事，毛需要斯大林本人對此予以確認。第二，毛澤東還需要確認，一旦中國捲入戰爭，蘇聯不能置身於事外。

斯大林很快回電，確認他同金日成討論了進攻南方的計劃。但他又表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解決這個問題」。[11] 毛澤東並沒有行使斯大林給他的這個「否決權」。這裏，其實還涉及到一個重要的問題。當時，毛和中共領導層已經決定，由於受到缺乏海空軍等一時難以克服的困難的阻礙，將不在1950年內發動解放台灣的戰役。[12] 既然如此，他們當然沒有理由阻止金日成發動以武力統一整個朝鮮半島的行動。毛在會談時詢問金是否需要中方在中朝邊界地區部署幾個師，以便「在必要時」對朝方提供支援，金認為沒有必要。兩人還談及美國是否會干涉的問題，金認為美國不會。毛則表示，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更要注意日本僱傭軍參戰的問題。[13] 據蘇聯大使羅申記載，毛澤東還說了這麼一段話：

> 蘇聯同志受到同美國在三八線劃定的分界線的限制，不便參加戰鬥行動，中國不受這方面的限制，所以很容易就能向北方提供幫助。

毛澤東、周恩來設宴為金日成送行時，金當着他們的面告訴羅申：「我和毛澤東同志談得很順利。他對我和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達成的協議表示支持。」[14] 毛、周兩人被噎得說不出話來。

其實，毛澤東不見得打消了對金日成進攻南方計劃的保留意見，但他卻沒有否決金的計劃；而從金的角度來看，這等於是為他開了綠燈。金日成回到平壤後，再沒有同北京打招呼，而是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自行制定了進攻南方的具體計劃，並加速了發動進攻的準備。

二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領導人首先要着手應對台灣局勢的變化。6月28日，周恩來發表聲明，譴責美國「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

國憲章的徹底破壞」。[15] 同時，中共領導層也對解放台灣計劃做出重大修正。先前，考慮到攻台戰役的複雜性以及準備不足便貿然行動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及影響，中共領導層已決定，在1950年內「不打台灣」；「奪取台灣的作戰，準備在1951年進行之」。[16] 6月30日，周恩來召見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時說：朝鮮戰爭爆發「給我們打台灣增添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擋着」，但這「也有好處，因為我們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打台灣的時間往後推延」。[17]

周恩來的注意力轉到朝鮮局勢上來。在他看來，最要緊的是前線的情況不明。6月30日，他接見原來已內定要去東德任武官的柴成文，告訴他：「我們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聯繫。……現在你帶幾個軍事幹部以使館名義先去。」[18]

7月2日上午，中共領導層開會討論朝鮮局勢。究竟談了些什麼，中方的相關檔案材料從未解密，有關人士的回憶錄中對會議情況也未見披露或涉及。但根據俄國檔案，當天下午，周恩來會見了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周首先提到，「安理會關於朝鮮問題通過的決議是非法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缺席的情況下由美國授意作出的」。中國政府「贊同印度等友好國家推動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努力」，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不應與朝鮮問題混為一談。它們是不同的，應該分別予以解決」。關於朝鮮戰局，周恩來告訴羅申，他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評估是，由於美國的軍事干涉，朝鮮的戰爭行動可能被拖延。他因而提議，一方面，「北朝鮮軍隊應盡快向南推進」，佔領南方各戰略重鎮；另一方面，「應在仁川駐紮足夠強大的部隊，以阻擊美國人在仁川登陸及向漢城的推進」。問題在於，北朝鮮軍隊沒有三頭六臂，怎麼可能全力以赴地同時做這兩件事？周表示，「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中國軍隊可以偽裝成朝鮮部隊進行抗美支持行動」。他又說，中國在瀋陽地區集結了三個軍、九個師、總計12萬人的部隊。他相信這些部隊可以打贏陸地上的美軍，但他們需要空中掩護。周要求蘇方澄清，「蘇聯空軍是否可以提供這樣的掩護」。[19] 斯大林收到羅申的報告後，於7月5日致電毛、周，贊成中方在中朝邊界的軍事準備，並表示如果中國軍隊在美軍越過三八線時入朝作戰，蘇聯將「為之提供空中支援」。[20]

羅申同周恩來談話時以及斯大林給毛、周的電報中，都提到了三八線。後來看，這其實是斯大林為中國出兵援朝設下的一道「緊箍咒」：美軍不過三八線，中國就不出兵，而蘇聯也不會支持中國出兵。周恩來很快就會發現，這之後一直到1950年9月仁川登陸及之後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斯大林的態度未變，實際上也成了中方入朝參戰（或更準確地說是「助戰」）的一個主要「瓶頸」。

7月7日，「由周總理主持，召集軍委之作戰、後勤及空、海、炮、裝甲兵各首長及總政羅（瑞卿）、肖（華）主任討論保衛國防及支援朝鮮獨立統一戰爭問題」，根據毛澤東及前幾日政治局會議的意見，決定以「十三兵團全部和四十二軍共四個軍、十二個師」組建總數約24萬人的「支援軍」，「改穿朝鮮軍服，待由朝鮮取回樣式後，由後勤部佈置趕做」；參戰部隊於7月底前全部運達本溪、安東、輯安一線，準備支援朝鮮獨立統一戰爭。[21]

第二天，周恩來接見了當天將出發去朝鮮的柴成文，對他說：「現在美國的地面部隊已經在朝鮮參戰。……現在朝鮮人民處在鬥爭的第一線，要向朝鮮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麼需要我們做，請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定盡力去做。」[22] 兩天後，周恩來又致電在東北主事的高崗，調動「十三兵團及四十二軍與炮兵第一、二、八三個師至東北本溪至安東、通化至輯安線集結待命」。[23] 7月12日，周陪同毛澤東在北京接見「持金（日成）首相函」前來的朝鮮副總參謀長李相朝。毛建議，應「命令部隊停止進攻，以便將主力拽成一個拳頭」。毛還提到，中方已在中朝邊界地區集結了32萬部隊，「如果朝鮮需要支持，中國可以派部隊入朝」。毛要求金日成在8月1日前派一個「具有權威性的軍事代表團來北京」，並在8月10日前對是否需要中國派兵作答覆。[24] 7月13日，周恩來關於建立東北邊防軍的報告獲中央批准，[25] 大規模的部隊調動也緊鑼密鼓地開始進行。同一天，周恩來還根據軍委會議的討論，向北朝鮮方面要求提供朝鮮軍事地圖及人民軍軍服樣本，並通報朝鮮戰況。[26]

就在參戰準備及動員工作啟動的同時，周恩來也着手處理與朝鮮戰局相關的外交問題。7月12日，他親自起草了關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五項條件：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事力量撤出台灣海峽；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應由北京擁有；召開四國

（蘇、美、英、法）會議討論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的問題。[27] 後來，這成為中國處理朝鮮問題的「官方立場」。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更何況出國作戰。周恩來打過這麼多年的仗，當然懂得這個道理。7月14日，他就東北邊防軍的後勤供應補給做部署，規定「東北境內的機關部隊除武器、彈藥、服裝、醫藥器材、電訊器材、汽車油料由軍委直接補給外，其餘糧料柴草及一切經常費與作戰費等，完全由東北人民政府負責供給」。[28] 之後，周恩來又一再召集「中央和東北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協調並解決部隊後勤供應中出現的各種具體問題。[29] 從這時起，在中國準備參戰及以後的整個參戰期間，周恩來都是「後勤大總管」。

7月底、8月初，中國軍隊的26萬精兵強將已完成在東北邊境一線的部署。隨着美國增援部隊陸續抵達，朝鮮戰局逐漸陷入膠着狀態。下一步怎麼辦？中央政治局於8月4日開會討論這個問題。毛澤東提出：如果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們，甚至挑釁。因此，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須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30] 周恩來完全贊同毛的意見。他表示：如果美帝將北朝鮮壓下去，則對和平不利，其氣焰就會高漲起來。要爭取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中國的因素加上去後，可能引起國際上的變化。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設想。[31] 顯然，毛、周考慮問題的重點，是如何幫助朝鮮贏得戰爭，或至少是避免戰局發生逆轉。第二天，毛澤東致電高崗，將8月底定為東北邊防軍完成參戰準備的期限。[32]

8月14日，高崗在瀋陽主持入朝參戰動員會議。他遵循毛澤東、周恩來講話的路子說：「美國侵略朝鮮的戰爭，是它的整個侵略計劃的一部分。…… 如果美國侵略者佔領了朝鮮，毫無疑問，一定會準備力量，來進攻我們的東北與華北。」他問：「我們究竟是讓它打下朝鮮，…… 等它打到中國來的時候再去消滅它好呢？還是現在爭取主動，配合朝鮮人民軍，在國土以外，消滅敵人，保衛自己好呢？」他答道：「顯然地，在國土以外消滅敵人，是有利於我們，…… 我們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援助朝鮮人民，幫助朝鮮人民解放。」高崗還說，中國若入朝參戰，用志願軍的名義，穿朝鮮人民軍軍服，使用人民軍番號，幹部都用朝鮮姓名。[33]

隨着朝鮮戰局的拖滯，周恩來對戰局發生扭轉的危險也越來越擔憂。8月23日，他帶着自己的軍事參謀雷英夫去見毛澤東，談美軍有可能在仁川登陸的問題。周說，「這是朝鮮戰局帶關鍵性的問題，值得重視」。毛表示，這件事「很重要」。會後，周將此事通報朝鮮和蘇聯政府，並要朝鮮「應有應付最壞情況的準備」。周還嚴令東北邊防軍：「務必在九月底前完成一切作戰準備工作，保證隨時可以出動。」[34]

8月26日，周恩來主持了中央軍委會議並作報告，強調要以「積極態度」來對待朝鮮問題。他說，朝鮮已經成為「目前世界鬥爭的焦點」。中國的參戰準備不僅要加緊進行，也要抓住時機：「一方面如果我們一時準備不好，幾個月不能前去，就會使朝鮮人民失望，這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即不要讓敵人過早知道，使其早做準備，這樣就可以爭取出手取勝。」[35]這之後，周恩來又連續召集中央軍委各部門開會，進一步落實入朝參戰的各項準備。9月3日，周恩來主持完成了〈關於加強邊防軍的計劃〉，並上報毛澤東和劉少奇。根據這個計劃，東北邊防軍的總兵力將逐步增強到11個軍36個師，分為三線部署，兵員總數將達到70萬人。[36]

從上述看，從7月上旬到9月上旬，中共領導層一直在為入朝參戰做積極的準備。毛澤東、周恩來的設想是，中國部隊入朝後，並不直接投入前線作戰，而是幫助朝鮮加強後方及海岸線的防衛，讓北朝鮮能夠集中全力贏得戰爭，至少也要防止戰爭形勢扭轉。當時，黨內上層對此並無意見分歧。

在大力推進參戰準備的同時，毛澤東和中共又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為中心口號，發起了「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並採用一切手段在中國老百姓中激起「蔑視、敵視、鄙視美帝國主義」的情緒和氛圍。中共還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場旨在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活動」的運動，並逐步將之推向高潮。[37]這表明，中共領導人對朝鮮危機的應對實質上是綜合性的。在毛看來，中國的安全利益將通過保障中朝邊境的安全，提高中共在國內的權威和信譽，以及使新中國的國際威望不斷上升來實現。

可是，中國軍隊並沒有在朝鮮人民軍仍處於攻勢時入朝參戰，為什麼？從現有材料看，這主要是因為金日成對於引入中國軍隊助戰猶猶豫

豫，而斯大林出於種種擔心，更不願意對此開綠燈。7月上旬起，金日成曾幾次就中國出兵問題探尋莫斯科的意見，但莫斯科要麼明確反對，要麼根本不回答。[38] 毛澤東、周恩來還一再提醒金日成，在朝鮮人民軍的主力部隊集中於朝鮮半島南端卻又久攻不下的情況下，需要防止敵軍在自己後方兩翼登陸作戰。他們甚至幾次提到仁川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點，然而朝鮮方面卻沒有反應。[39] 同時，儘管周恩來向朝鮮派出了軍事觀察小組，但金日成卻讓他們留在平壤，沒有及時向他們提供有關前方戰事發展的情報。[40] 在沒有來自朝鮮方面的邀請和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情況下，中國出兵朝鮮是不可想像的。

三

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隨後又迅速將朝鮮半島上的人民軍部隊切成兩半，並乘人民軍後方空虛之際，大舉向北推進。朝鮮戰局逆轉。

周恩來得到美軍在仁川登陸的報告後，便知道大事不妙。他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馬上想到，要阻止戰局的進一步惡化。9月18日，周緊急召見蘇聯大使羅申，開門見山就說，中方「完全不知道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計劃。中國曾嘗試向北朝鮮派遣一些中國的軍事技術人員到戰場實地勘察情況，但至今平壤沒有對此做出任何回覆。……中國駐朝鮮大使沒辦法得到關於戰爭形勢的信息，也沒有辦法及時的通報給北京」。他以毛澤東的名義，請求蘇方提供關於朝鮮戰局的準確情報。他還提出，現在西方國家很怕蘇聯和中國參與朝鮮戰爭，「我們應當利用這種恐懼心理採取能夠表明我們意圖的步驟」。這顯然是在試探莫斯科的反應。[41] 第二天，周恩來召見朝鮮大使李周淵，重複了他前一天同羅申談話的內容，又問李周淵，「朝鮮政府下一步對中國政府有什麼要求」。[42] 9月20日，周恩來又直接通過中國駐朝大使倪志亮致信金日成，要求朝方準備長期作戰，千萬不要孤注一擲。[43] 其中的潛台詞，是要朝鮮方面避免把自己的力量先打光，這樣才好等待中國支援的到來。

但是，在是否請中國出兵幫助這件事上，朝鮮人其實做不了主。關鍵在於，斯大林仍然不肯鬆口。當朝鮮方面探詢是否可以請中國幫忙時，莫

斯科依然是不加理睬。兩週過去了，朝鮮人民軍節節敗退，中國方面卻無法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行動。[44]

9月29日，敵軍迫近三八線，人民軍的抵抗已陷於瓦解。金日成致電斯大林，直接向蘇聯求援。9月30日，南朝鮮軍隊越過了三八線。斯大林終於鬆口了，讓金日成向中國求援。10月1日，金日成正式向毛澤東提出了要中國出兵支援的請求。斯大林也致電毛澤東說，若無外部支援，朝鮮革命政權就會崩潰，因此中國有必要出兵援朝。[45]

毛澤東反應迅速。10月1日晚上，他召集周恩來等幾位中央書記在天安門城樓上碰頭，討論朝鮮局勢並談到出兵問題。似乎沒有人對出兵提出異議，但也未做出正式決定，此事要在第二天政治局會議上討論。[46]

當天夜間，周恩來致電倪志亮，要他轉告金日成：在人民軍主力已被阻隔敵後的情況下，應將部隊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分成許多小的支隊……撤至三八線以北」；另一部分留在敵後打游擊，「牽制大股敵人，使其不能北進」。第二天，周又致電倪志亮，要他再轉告金：「凡無法撤退的軍隊，應在原地堅持打游擊，……如此就有希望，就會勝利。」[47]

毛澤東已等不及了，連夜親自動筆起草了一份給斯大林的電報，一開頭就說，中共領導層已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他解釋道，朝鮮問題的解決不僅同朝鮮革命和整個東方的命運攸關，也將對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產生重大影響。中國若出兵，就要達成「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的目標。他要求斯大林澄清，當中國出兵時，「蘇聯是否可以給我們以武器援助，是否可以向朝鮮出動志願空軍，並在美國空軍轟炸北京、天津、瀋陽、上海、南京等處的時候，是否可以使用大批空軍幫助我們防禦上述諸地」。電文中，最為關鍵的是下面這段話：

> 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雖然我們用的是志願軍名義），就要準備美國宣佈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就要準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48]

如果將這段話同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在7、8月間派遣中國志願軍入朝時的設想相比較的話，毛對入朝參戰及其後果的看法有了一個重大變化。兩個月前，志願軍入朝後將以朝鮮人民軍的身分參戰，主要起到保衛後方以及側翼的作用，因此不大可能導致中美之間的全面戰爭。而在這份電文中，他卻設想中國參戰後不僅將同美國軍隊直接開戰，甚至會導致美國進攻中國本土的一場全面戰爭。但毛澤東顯然認為，即便如此，中國仍然應當參戰。

毛澤東的這些想法，不能不引起了黨內其他領導人的強烈反彈。10月2日下午3時，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參戰問題，對中國是否應冒同美國發生全面戰爭、甚至「引火燒身」之險入朝參戰，會場上出現的是一片保留乃至反對的聲音。關於周恩來在會上說了些什麼，沒有文獻記載。但毛後來說過，當時支持出兵的只有「一個半人，我一個，恩來半個」。[49] 由此看來，周恩來至少沒有參加反對出兵的「大合唱」。

會後，毛澤東只好把已經起草好的電報放在一邊，接見了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請他轉告斯大林，由於中國入朝參戰「會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包括「引起中國和美國的公開衝突」，因此多數中共領導人都認為在入朝參戰上應「謹慎行事」，在是否參戰問題上「尚未做出最後決定」。[50]

幾乎就在毛澤東會見羅申的同時，周恩來於10月3日半夜0時10分召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要求他向美國政府傳遞下列信息：

> 美國軍隊企圖正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這是美國政府造成的嚴重情況。[51]

周恩來發出的，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信息。事前，他為此作了充分的準備。據周的英語翻譯浦壽昌回憶，周對於在信息中使用什麼措辭，頗費躊躇，特地找浦壽昌商量，用什麼英語詞彙表達「我們要管」的「管」字。周恩來最後拍板，決定使用「intervene」（干預）一詞。[52]

周恩來為什麼在此刻發出這樣的信息？許多中外研究者認為，這是為了阻止美軍越過三八線向北推進。但問題在於，很難設想中國領導人在敵軍實際上已經越過三八線、而北朝鮮方面的抵抗已經陷於崩潰的情況下，會幼稚地認為僅僅通過這一信息便能夠使得敵軍停止前進。從中共領導層關於出兵與否的討論已處於關鍵時刻的情況來看，周恩來此時發出這一信

息，是為了達到戰術與戰略層面的兩個重要目標：如果這一信息起到了威懾敵方的作用，就能延緩敵軍向北推進，並為中國方面爭取到出兵準備所需的時間與空間。如果華盛頓無視北京的警告而繼續將戰火引向中朝邊境，中國領導人就有充分的理由向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宣告，中國出兵朝鮮是一場師出有名的正義之戰。

關鍵在於，毛澤東的出兵決心並未改變；在中國是否參戰的問題上，黨內上層也沒有在組織上形成多數人的「反對派」。10月2日下午的政治局會議一結束，毛就委託周恩來派專機前往西安，接彭德懷來京開會。[53] 這是他為推動中共領導層朝着出兵方向的另一個關鍵步驟。

10月4日，中央政治局繼續開會。毛澤東先讓不同意出兵的各種意見統統倒出來，彭德懷到得晚了，只聽了一個「尾巴」，沒有發言。周恩來已經知道毛的心思，在會上也沒有講話。[54] 第二天上午9時，毛先讓鄧小平去見彭德懷，向彭「交了底」，把出兵以及要彭出任統帥的意思轉達給他。兩人交談了近一小時。[55] 下午開會前，毛又親自同彭交談，講明了出兵意圖，並對彭說：「我們要盡快出兵，爭取主動。今天下午政治局繼續開會，請你擺擺你的看法。」彭表示，擁護出兵援朝。[56] 會議繼續舉行時，彭德懷果然說話了，大聲疾呼道，「出兵援朝是必要的」，甚至還說，「打爛了，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他還表示，同意出任中國入朝參戰部隊的主帥。周恩來也在會上表態，「堅決支持毛澤東出兵援朝的主張」。這一來，會議的風向轉了，最後做出了出兵的決策。[57]

10月6日，周恩來召集黨政高級幹部開會，傳達並落實中央的出兵決定。他重申自己支持出兵的態度：「現在朝鮮政府一再要求我們出兵援助，我們怎能見死不救呢？黨中央、毛主席決心已定，因此現在不是考慮出不出兵的問題，而是考慮出兵後如何去爭取勝利的問題。」[58]

10月8日，毛澤東正式發佈了出兵命令，並將中國出兵的決定也通知了金日成。[59] 同一天，毛澤東通過蘇聯使館通知斯大林，中共中央已決定出兵，「周恩來和林彪同志已於今日晨8點前往您的所在地」。[60] 周恩來此行任務艱巨，要當面向斯大林解釋，中共領導層決定出兵是不容易的，會面臨種種難以預想的困難，從而落實「中國出陸軍、蘇聯出空軍」的安排，蘇聯對中國沿海地區的空防，以及對中國的大規模軍援。

10月8日，周恩來離開北京飛往蘇聯，10日到達莫斯科。斯大林當時正在黑海之濱休假，於是周恩來又同前往蘇聯治病的林彪一道，馬不停蹄地前往斯大林所在地。10月11日，兩人同斯大林會晤。這恐怕是周恩來一生中最為困難的會談之一。出乎周恩來預料之外的是，這些天一直促使中國出兵的斯大林，卻在中共領導層決定出兵後，在蘇聯是否出動空軍入朝參戰上退縮了。他雖然承諾蘇聯將向中國提供必要的軍事物資援助，卻又表示蘇聯空軍不能和中國軍隊同時入朝參戰，提供空中掩護。[61]

斯大林所想，應是要避免捲入同美國的直接軍事對抗。但這卻給周恩來出了一個大難題，他當然不能自作主張地告訴斯大林，即便沒有蘇聯空軍支援，中國仍然會參戰。於是，他隨機應變，和斯大林討論起中國不出兵情況下的對策(師哲對筆者說，周恩來其實是在「玩」斯大林)。[62]會後，周恩來提出，由他和斯大林聯名給毛澤東發電報報告會談情況。斯大林生平從未做過這樣的事，但鑒於這次所涉及問題的特殊性和緊迫性，他居然同意了。電報說：蘇聯空軍至少要兩個月以後「才能到位」，而要為準備入朝參戰的中國部隊提供裝備和培訓，則「至少要六個月的時間」。[63]

10月12日，毛澤東收到這份聯名電報後，當即命令「東北各部隊仍就原地進行整訓，暫不出動」，並通知斯大林，「已命令中國軍隊停止執行進入朝鮮的計劃」。[64]但是，他出兵的決心並沒有動搖。第二天，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再次討論參戰問題，經「反覆比較利弊得失」，達成了「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的結論。會後，毛馬上致電還在莫斯科的周恩來，要他立即通知斯大林，中國決定還是要出兵朝鮮。毛強調：

> 我們採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65]

同時，毛澤東還指示周恩來繼續同蘇聯領導人磋商，澄清蘇聯對中國提供軍援及空軍支援問題的種種細節。他要求周恩來確定「蘇可以完全滿足我們的飛機、大炮、坦克等項設備」，並允許中國以「租借辦法」而不是

出錢購買這些裝備。毛澤東還特別要求周恩來同斯大林確定，蘇聯空軍並非完全不能入朝參戰，而只是還需要一段準備時間。他指示周恩來告訴斯大林：「只要蘇聯能於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願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外，又能出動掩護空軍到京、津、瀋、滬、寧、青等地，則我們也不怕整個的空襲，只是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如遇美軍空襲則要忍受一些損失。」毛澤東指示周「留在莫斯科幾天，和蘇聯同志重新商定上述問題」。[66]

第二天，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另一電報中提出，如果美軍佔領平壤、德川後「固守不出」，則志願軍入朝初期也可以「出而不戰」，在平德川等以南地區「構築兩道至三道防禦陣線，如敵來攻則在陣地前面分割殲滅之」；「在六個月內如敵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則我軍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可以待「我軍裝備訓練完畢，空中和地上均對敵軍具有壓倒的優勢條件之後，再去攻擊平壤、元山等處，即在六個月以後再談攻擊問題」。[67]只是，後來由於敵軍推進迅速，這一策略並未派到用場。

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立即致信斯大林並繼續同莫洛托夫交涉，以落實蘇聯對中國本土空防的承諾，並保證蘇聯對中國的軍援。莫洛托夫向周恩來重申，蘇聯將向中方提供包括重型武器裝備在內的各種軍援，承擔起中國各沿海城市及東北地區的空防任務，但不能保證出動空軍入朝作戰。周立即就此向毛和中央作出報告。[68]

10月17日，周恩來回到北京。毛澤東又一次命令部隊暫緩入朝的行動，以便聽取周的彙報。[69]當毛確認蘇聯將向中國提供各種軍事援助，包括為中國各大城市提供空防援助，並可能在兩個月後派出空軍掩護中國入朝部隊的地面作戰後馬上表示，「志願軍渡江援朝不能再變」。10月18日，毛發佈了志願軍跨過鴨綠江的最後命令。[70]

四

中國參戰後，很快便扭轉了朝鮮戰局。10月25日，志願軍在雲山地區突襲南朝鮮部隊，不到兩週，敵軍被迫從鴨綠江附近地區後退到長津湖一線。根據斯大林的命令，從11月1日開始，以安東為基地的蘇聯空軍部隊也提前投入了保衛鴨綠江上空入朝交通線的作戰行動。[71]然而，時任美

軍與聯合國軍統帥的麥克阿瑟將軍竟對此不屑一顧，仍於11月中旬宣佈發起一場「以徹底結束戰爭」為目標的「最後攻勢」，美軍也因此落入了志願軍早已設好的包圍圈。從11月25日起，志願軍開始了強有力的反攻，到12月中旬已基本克復了北朝鮮的幾乎所有失地。

戰場上的勝利，使得中朝方面當時若通過談判來結束戰爭，將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12月5日，印度等13個非西方國家提出一項和平方案，建議中國軍隊在三八線停止進攻，並在此基礎上召開關注朝鮮問題的大國會議，以討論最終解決朝鮮危機。[72] 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十三國提案，並成立了一個探求「在朝鮮實現令人滿意的停火基礎」的三人委員會。[73] 印度等國不斷向北京方面保證，十三國建議決非由西方國家所策劃，並會將中國的其他利益(包括台灣問題)考慮在內。[74]

然而，毛澤東卻堅持參戰之初所制定的「殲滅和驅逐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侵略軍」、使戰爭「以戰勝美國的結果而在事實上結束」的目標。若敵方「要求停戰」，他對金日成表示，「我們認為必須敵人承認撤出朝鮮，而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才能談判停戰」。[75] 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也積極貫徹毛「爭取全勝」的意圖。12月8日，他指示陳家康在與印度人會面時質問：為什麼十三國不在美軍－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時提出停火建議，卻在中朝聯軍向前挺進時提出這樣的建議？12月12日，周恩來在約見印度大使潘尼迦時指出，由於三八線已經被美國人打破，中國方面也沒有必要去尊重它。[76] 12月21日，毛澤東命令彭德懷「越過三八線再打一仗」。[77] 第二天，周恩來正式拒絕了十三國建議，指責這不過「是為着美國可以取得喘息時間，準備再戰」的陰謀。[78]

1950年最後一天，中國軍隊發起了新攻勢，於1951年1月4日佔領漢城。1月8日，中朝聯軍先頭部隊抵達三七線一線。在中國軍隊已將戰線大大向南推進的情況下，從1月10日起，蘇聯空軍出動兩個師，進一步掩護並支持中朝地面部隊(包括保衛朝鮮北部的交通運輸線及後勤供給網絡)的作戰行動。這樣，後來對於保障中朝軍隊的基本軍事補給和後勤供應起到了重大作用的「米格走廊」誕生了。[79] 1月13日，聯合國三人委員會提出了解決朝鮮衝突的五項原則，建議交戰雙方「立即安排停火」，「一切非朝鮮的軍隊分適當的階段撤出朝鮮」，然後再召開由蘇聯、美國、英國和中

國等四大國參加的國際會議，「以便依照現存的國際義務和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來獲致遠東問題的解決，其中除其他問題外包括福摩薩（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中的代表權問題」。[80]

從後來的發展看，這是中朝方面結束戰爭的一個絕佳機會。當時，志願軍連續作戰後，亟需休整，再加上缺乏空中掩護，補給線又拉得太長，攻勢已是強弩之末。彭德懷擔心己方側後暴露，下令部隊停止進攻，鞏固陣地。[81] 中朝方面如果接受三人委員會的停火建議，可以讓志願軍鞏固新佔領地區，即便停火失敗，也能使部隊獲得寶貴的休整集結機會。更要緊的是，中朝方面如果接受三人委員會的建議，還會使得美國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當時，美國決策者其實並不同意建議的所有內容，但還是在聯合國投了贊成票。艾奇遜後來解釋道，美國若是不支持該建議，就會導致「失去聯合國多數的支持」。美國投贊成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斷定中國會反對，[82] 這是美國決策者的一場賭博。中朝方面當時若是接受這一議案，除了戰場上的收益外，還會在國際外交上開創有利局面。

然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思維完全被戰場上的勝利所帶來的「優勢意識」所主導，一心要乘勝追擊，在朝鮮戰場上獲得全勝。周由於缺乏對於國際事務的透徹了解，認為三人委員會「先停戰後談判」的意見有利於美國，「因為只要先停戰，美國就有可能保存實力並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區和武裝資本，而談判則可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因而「我們擬拒絕先停戰後談判」。[83] 1月17日，周在對三人委員會建議的回應中指出，該議案偏向美國，因而不能接受。他相應提出的談判條件是：在中國召開七大國會議，並立即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代表獲得在聯合國及安理會的席位，所有外國軍隊立即撤出朝鮮和台灣。印度大使潘尼迦同周談話時其實已提到，「據印度政府了解，美國政府之所以同意這一建議，是因為它預料中國政府會拒絕這一建議」。然而，周並未對此給予充分重視，只是以一句「事情並不常常合乎美國的設想」而一筆帶過。[84] 三人委員會的努力擱淺了。

事後看來，這是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的一次重大誤判和失策。此後，不僅朝鮮戰爭又打了兩年多，也造成了新中國在國際社會的進一步孤立。第二天，周覺察到情況不對後，曾表示願意考慮三國建議，試圖挽回局面，但卻已經太遲了。[85]

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何以會出現這麼嚴重的失算？這固然同他們對形勢過於樂觀的判斷是分不開的。這恐怕也有着中共在國內展開全面的社會整合和動員的深層原因。中國參戰後，正如毛澤東所期待，國內民眾中掀起了愛國主義新浪潮。「抗美援朝」的全面推進，很快便超越了「保家衛國」的宣傳重點，而進入了一個強調在中共領導下建設強大而自豪的「新中國」的新階段。毛、周等人清楚地意識到並熱切地希望，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繼續獲勝將促使運動更加廣泛深入地發展下去。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號召全黨全國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偉大的「抗美援朝愛國運動」，以此來響應志願軍在朝鮮戰場所取得的勝利。通知提出，要「開展蔑視、鄙視、仇視美國帝國主義與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運動」，並通過普遍訂立「愛國公約」，使得中國人民從靈魂深處「擁護毛主席，擁護人民政府，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86] 2月中旬，周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抗美援朝運動「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務使全國每處每人都受到這種教育」。[87]

五

可是，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並不具備乘勝追擊的實力。1月25日，美軍和聯合國軍開始反攻。27日，彭德懷向毛澤東提出暫時撤退、鞏固戰果的建議，但毛在回電中卻命令志願軍以進攻回擊美軍的進攻，甚至認為志願軍可以一直打到三七線以南。[88] 然而，美軍很快就擊退了志願軍的進攻，並趁機進一步反攻，使志願軍處於極為被動的局面。2月下旬，彭德懷專程趕回北京，當面向毛報告戰場情況，提出志願軍應當採取守勢，並輪換前線部隊，加強空中掩護，為春季大反攻做準備。[89] 根據彭的報告，毛對朝鮮戰場應採取戰略的看法開始轉變。周恩來受毛委託，起草了中央軍委〈關於在朝鮮戰場輪番作戰部署〉的指示。而後，毛又親自致電斯大林通報這一新戰略。但毛仍然相信，志願軍有能力通過在戰場上不斷消滅敵軍有生力量，最終把美軍驅逐出朝鮮半島。[90]

3月6日，斯大林覆電，同意毛澤東「關於今後在朝鮮的作戰方針」。為了加強中朝方面在戰場上的地位和實力，斯大林還提出：

> 假如您們能在安東地區留下兩個中國空軍師掩護電站和該交通線的話，我們同意派遣兩個驅逐機師，即第一五一師和第二二四師，在別洛夫將軍指揮下進入朝鮮境內作戰，以掩護中朝軍隊的後方。若朝鮮已有一個金屬跑道，我們則可自蘇聯再給兩條(即鋼板跑道)。與此同時，必須起碼再建築四處洋灰機場，因為只金屬跑道是不夠用的。我希望機場工程在勞動力和器材方面能得到保證。您若同意，我們可給一些高射武器掩護機場並再供給你們一些高射炮(已令炮司分批調一個高炮師去朝鮮)。增訂的六千輛汽車可在今年下半年中交貨。[91]

3月15日，周恩來代表中央致電金日成並告彭德懷：「在目前一個半月內，因我新軍未到老軍未補，敵人有重新進出三八線南北地區的可能。」中方則可暫取守勢，「擬讓敵人進至三八線南北地區」，待「第二番志願軍部隊到齊後」，在「四月底至六月中」展開全面反攻。鑒於「目前在朝鮮作戰的主要困難在於敵人火力強，我方運輸力弱，更主要的則為我方尚無空中掩護」，而斯大林已「同意命兩個蘇聯空軍師進入朝鮮境內作戰，擔任掩護後方交通任務」，「現在在朝鮮境內搶修足夠的機場便成為目前爭取空軍早日參戰的中心課題」。[92]這之後，周恩來親自參與部署，以使「中朝蘇三方進入朝境作戰的空軍部隊增至十七個團，計我方十個團，朝方三個團，蘇方四個團，其中驅逐機十一個團」。為此，「必須在平壤以北、安州以南地段修築六個噴氣式機場(兩個鋼板的、四個洋灰的)，供蘇聯空軍使用」；並在平壤以南地區修築大約十個機場，供中國和朝鮮空軍使用。[93]然而，由於遭受到仍在朝鮮上空掌握着制空權的美國空軍持續及猛烈的轟炸，儘管中朝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上述計劃在朝鮮境內修建的機場沒有一個能夠完成並投入使用。

經過兩個多月的準備，中朝聯軍已在朝鮮戰場上集結了百萬大軍，在並未解決由蘇聯空軍深入朝鮮境內參戰這一「中心問題」的情況下，仍於4月下旬發動第五次戰役。[94]然而，在前方部隊缺乏空中掩護和持續及可靠的後勤支援保障的情況下，這次戰役沒有達到使戰線大幅度南移的目標。最後階段，過於深入敵陣的部分志願軍部隊因撤退不及而陷敵重圍，其中60軍180師「未經激烈戰鬥，即遭全師殲滅性的慘重損失」。[95]

毛澤東開始重新考慮在朝鮮戰場上要實現的目標。他認識到，中國軍隊的實力與中共領導層雄心勃勃的目標之間存在着很大差距，轉而願意考慮在未能獲得全勝的情況下結束戰爭了。

從1951年5月下旬起，中共領導層以及軍方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在朝鮮的戰略作了一次全面評估。周恩來因工作過於繁重「積勞成疾」，經毛和中央政治局批准，離開北京前往大連休養，沒有參加這一決策過程。[96] 據當時任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後來回憶道，在中央討論過程中，「多數同志主張我軍宜停在三八線附近，邊打邊談，爭取談判解決問題。……把敵人趕出朝鮮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經達到，停在三八線，也就是恢復戰前狀態，這樣各方面都好接受」。[97] 毛的主要考慮，集中在停戰對中國國內形勢和國際格局的可能影響上。他和其他中共領導人認識到，志願軍把美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已足以證明中國在抗美援朝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金日成對此有異議，仍希望發動一場大攻勢後再停戰。但斯大林站在毛和中共一邊，支持「邊談邊打」的新戰略。[98]

六

1951年7月10日，停戰談判開始舉行。周恩來也結束病休，回到了北京，並擔負起遙控指揮先在開城、後來轉到板門店舉行的和談的責任。當時，他和其他中共領導人曾認為，停戰協定在幾星期內就可以達成。毛澤東甚至指示談判代表，「設想在停戰協定成立以後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並預籌對策」。[99] 然而，談判的實際過程比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想像要複雜得多，持續了近兩年。最初一段時間，毛還親自過問談判決策，但後來他就放手讓周管這件事了，只有特別重大的決策，周才向毛彙報後作出決定。北京與莫斯科和平壤最高層之間的電報來往，尤其是給斯大林的電報，雖然往往以毛的名義送出，其實幾乎都是由周起草的。

談判從一開始就不順利，直到7月26日，雙方才在談判的五項議程達成協議：(1)通過議程；(2)劃定軍事分界線；(3)對停戰作出具體安排；(4)對戰俘問題作出安排；(5)就有關問題向雙方政府提出建議。[100]

下一階段談判更為曲折，雙方幾乎在每個問題上都斤斤計較，爭論不休。8月下旬，談判中斷。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了對談判本身及中方戰略及對策的評估。他和同志們意識到，自己先前關於談判的考慮過於簡單和樂觀了。在談判桌上展開的是一場「嚴肅政治鬥爭」，如果讓美方佔據上風，中共在國內外的信譽和影響都將受到危害。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的結論是，必須在這場意志之戰中贏得勝利。作為評估結果，並經毛澤東批准，中方決定採取「準備長期作戰，也爭取和談結束戰爭」的戰略方針，並採用進攻性防禦的戰略，以便在戰爭的延長中增加敵方傷亡，迫使敵方在談判桌上同意己方的條件。[101]

10月25日，停戰談判在板門店重開。此後，雙方在劃定軍事分界線及停戰安排上獲得進展。1952年2月19日，雙方又同意於停戰協議簽字後90天之內召開相關國家參加的政治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一時之間，周恩來和中國談判代表認為，談判將在短時間內獲得成果。

然而，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很快就發現，他們原先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遣返問題，成了談判前行幾乎難以逾越的障礙。關於這個問題的談判，是從1951年12月11日開始的。1952年5月2日，美國－聯合國方面提出，戰俘遣返應在自願基礎上進行(這樣，大批的中朝一方戰俘將不會被遣返)。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意識到，美國人的目的在於在談判桌上獲得他們在戰場未能取得的政治上的優勢，而北京所面臨的是一個關係到中國出兵朝鮮是否「師出有名」的重大政治問題，因而不能讓步。

1952年7月13日，美國提出了仍以「自願遣返」為原則的「最後的、不可變更的」方案。金日成主張接受。毛澤東、周恩來以及中國其他領導人花了兩天時間討論此事。7月15日，周在以毛的名義給金發出的一份電報中說：「此間同志一致認為，在目前接受敵人這一挑撥性引誘性的並非真正讓步的方案，並在敵人狂轟濫炸之後接受，顯然對我極為不利。……在現時形勢下，接受敵人這一方案必然要長他人志氣來滅自己威風。」毛、周認為，只有「不接受，並準備敵人破裂，……敵人倒不一定破裂。如繼續拖延，我堅持不退，敵人仍有讓步可能」。周要金日成「不再客氣地提出目前朝鮮急需解決的一些問題，如超過中國力之所及，我當與您共同請求菲利波夫同志予以幫助」。[102] 這表明，毛、周等決定放棄關於戰爭會早日

結束的任何幻想，同美國人在政治和軍事上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慘烈的戰爭仍要打下去。

1951年7月12日，幾乎就在朝鮮停戰談判開始舉行的同時，美、英兩國政府在華盛頓和倫敦同時公佈了對日本和平條約草案。一週後，美國政府又發出通告，將在舊金山召開對日和會。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對日戰爭的主要參戰國。但是，自幾個月前周恩來拒絕接受聯合國三人委員會的建議後，華盛頓便「順理成章」地關上了讓北京參與對日和約起草的大門，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沒有被邀請參加舊金山和會，被排除在界定和確立亞太地區國際秩序的進程之外。8月15日，周恩來發表聲明，指稱美英「所提出的對日和約草案是一件破壞國際協定、基本上不能被接受的草案」，舊金山和會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排斥在外，「也是一個背棄國際義務、基本上不能被承認的會議」。[103] 然而，和會仍於9月4日至8日舉行，簽訂了舊金山和約。周恩來又於9月18日發表聲明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對日單獨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對中國毫無約束力。[104] 對中國和整個亞太地區來說，這都是一樁極大的事情，也是朝鮮戰爭留下的最具長遠影響的遺產之一。在此可以發現進入21世紀後，中國所面臨的東海、南海與鄰國發生領土爭端的一個重要的歷史緣由。

8月中旬，周恩來率領一個龐大的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他要談的主要題目有兩個。一個是朝鮮戰爭以及中方對形勢的估計及談判戰略，並解決中朝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另一個是同斯大林討論中國國內建設的大政方針問題。他將向斯大林提出各種援助要求，除了同朝鮮戰爭直接有關的軍援外，也要討論蘇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全方位援助。隨着中蘇關係在朝鮮戰爭期間的不斷加強，以及斯大林對毛和中共信任的加深，周恩來要通過這次訪問，使中國通過中蘇同盟而獲得的利益「最大化」。

8月20日，周恩來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第一次會談。他先向斯大林簡介了中國國內形勢以及朝鮮戰場的近況。他告訴斯大林，中方已「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並且因為建立了堅固的坑

道工事，也經得住轟炸」。周接着向斯大林解釋了毛和中共「堅持全部遣返戰俘」的原因。這是一場意志的爭鬥，中方願意根據可以接受的條件結束戰爭，但不會屈服於美國的不合理條件。毛認為，如果我方能表現出比美國更大的耐心，那麼敵人遲早會作出更大讓步，也不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關於中方在談判中的底線，周提出在戰俘問題上可以有三種方案。第一，如敵人留下30%中朝戰俘，中朝方面可以留下13%敵方戰俘，以迫使美方改變態度。第二，中朝方面可以建議先停火，然後交換戰俘。第三，中朝方面可以提議：如有戰俘確實不願被遣返，可以暫時送往中立的第三國，甄別他們的意願後，再決定是否遣返。斯大林同意周恩來的計劃。為加強中方在談判桌上的地位，他同意再派五個蘇聯高射炮團入朝。他告訴周，美國人不可能在朝鮮打一場持久戰，如果中朝方面能耐心進行談判，同時在戰場上保持強有力的地位，美國人遲早會接受中朝方面三個方案之一。[105] 之後，金日成也抵達莫斯科參加會談，斯大林要他在戰俘問題上聽從毛、周的意見。9月19日，周再次同斯大林會談，兩人同意：在中朝方面政治和軍事狀況進一步改善前，不向美國人作任何讓步。[106]

除朝鮮問題，周恩來還利用這次會晤的機會，向斯大林提交了中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體方案，並提出了由蘇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全面援助的要求。對此，本書將在下一章詳述。

周恩來回國後，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更加堅定了不輕易在談判桌上向對方讓步的決心。10月8日，中國談判代表宣佈，堅決拒絕對方「不得強迫遣返」的「最後方案」。美國－聯合國方面隨之宣佈，停戰談判無限期休會。但毛、周等中共領導人不為所動，周在10月10日給中國談判代表並告金日成的電報中表示，「對雙方遣返全部戰俘的原則絕不放棄」。[107]

在毛澤東、周恩來等看來，美國在朝鮮拖不起。他們認為，長期打下去對美國很不利：一、要死人；二、要用錢；三、他們在國際國內都有難以克服的矛盾；四、還有一個戰略問題，美國戰略重點是歐洲。[108] 但問題在於，在朝鮮，還沒有打到敵人不得不停戰的程度。周因此提出：「抗美援朝的戰爭還應加強，繼續實行『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一直打得他不得不罷手為止。」[109]

毛澤東、周恩來也沒有把美國的核威懾放在眼裏。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艾森豪威爾一上台就放空炮嚇人」，其中包括「原子彈恐嚇」。但是，周恩來強調說，「原子彈轟炸，我們不怕，而它的盟國就會鬧起來」。[110]

12月16日，周恩來在以毛澤東名義給斯大林的一份電報中指出，「停戰談判已告停頓，而美軍在朝鮮的損失還沒有達到他非罷手不可的程度，估計今後一定時期內（假定為一年），會趨向於激烈化」。同時，艾森豪威爾出任總統後的動向值得觀察。美國人手中的一張牌是「向北朝鮮兩側進行登陸作戰」，「時間可能在明年春季」。周恩來認為，如果能「給敵人以更多更大的殺傷」，朝鮮戰局就會「向着更加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111]

這些日子裏，除了要應對朝鮮戰場上的複雜局勢外，周恩來還遇到了另一件煩心事：他和鄧穎超的乾女兒孫維世「出事」了，而且還間接涉及中朝關係。孫維世從小就是一個大美人，天真、活潑又極有主見，這些都是周、鄧夫婦喜歡她的地方。早在延安時代，她就是大家的矚目中心，也是一些地位顯赫的「老革命」的追求對象。她隨周恩來、鄧穎超去蘇聯後，林彪也在那裏治病。儘管林已經結婚（他當時的妻子是張梅），卻對孫維世一見鍾情，展開了瘋狂的追求，但孫維世卻不為所動。林彪後來同張梅離婚，回國後又同葉群結婚。[112] 孫維世從蘇聯回國後，投身於話劇表演。1950年，她在製作和導演《保爾．柯察金》一劇時，同當時在中國最富盛名的「話劇皇帝」金山墜入愛河。金山已有過兩次婚姻，當時的妻子是名演員張瑞芳。但當孫維世將她和金山的戀情並準備結婚之事透露給周恩來時，周恩來和鄧穎超卻堅決反對。重慶時期，金山曾是周恩來麾下的一名「大特工」，張瑞芳也是周恩來在演劇界發展的地下中共黨員，周對兩人都極為熟悉。

然而，孫維世卻不聽義父、義母的勸告，仍然於1950年10月同與自己「有很多共同語言」的金山結了婚。周恩來沒有出席他們的婚禮，只是由鄧穎超出席並代表家長講話。[113] 1952年夏，為拍攝一部關於中朝戰鬥友誼的影片，時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院長的金山率一個創作組訪問了朝鮮。金日成得知金山的周恩來「乾女婿」身分後，特意指派自己的一位漂亮的女秘書擔任創作組的嚮導兼翻譯。不料，金山卻同她發生了關係。孫維世得知此事後，傷心欲絕。周恩來則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將金山押回北京，



圖16.1：周恩來、鄧穎超和繼女孫維世，1950年代初。
（Historic Collection / Alamy Stock Photo）

甚至發話說「金山應該槍斃」。[114] 周、鄧夫婦都覺得乾女兒應該馬上就同金山離婚。不料，孫維世居然不聽。鄧穎超又通過孫維世的閨蜜、林伯渠之女林利給她傳話，用「黨性」來壓她，勸她「轉到黨的立場上來」。[115] 孫維世在萬般痛苦之下卻依然情絲未斷，決定「要拉金山一把」，再給他一次機會。結果，兩人未離婚。金山只是被開除黨籍並下放勞動，但幾年後，他又在孫維世的運作之下，恢復了黨籍並回到他曾任院長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116] 由於孫維世「不聽話」，她和義父周恩來、義母鄧穎超之間的關係卻再回不到過去那種無比親密之中了。

七

1953年，朝鮮戰爭已經打了兩年半，卻看不到盡頭，停戰談判也依然陷於僵局。2月22日，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將軍提出一個先行交換傷病戰俘

的建議。當時，中方已在朝鮮戰場集中了135萬大軍，且在蘇聯援助下，彈藥、裝備、工事及後勤保障都處於入朝參戰以來最好的狀態。[117] 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商量後決定，對克拉克的建議不予答覆，先觀察一段時間再說。[118]

但情況很快便發生了變化。3月5日，斯大林去世，蘇聯新領導人在結束朝鮮戰爭的問題上有了新的想法。3月7日，周恩來到達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葬禮。四天後，他和蘇聯新領導人舉行會談，但未就朝鮮問題深入討論。此後，周赴布拉格參加捷克總統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的葬禮，直至21日才重返莫斯科。

期間，蘇聯新領導人對朝鮮問題的新看法成形了，希望中朝方面採取主動盡快結束戰爭。他們起草了給毛澤東和金日成的一封長信，其中建議先由金日成和彭德懷對克拉克2月22日的信「給予肯定的回答」，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權威代表（最好是周恩來同志）在北京發表聲明」，對此「表示積極態度」，然後金日成和蘇聯政府也對此表示支持。關於戰俘，「應建議所有堅決要求遣返的戰俘立即被遣返，其餘的戰俘則交給中立國，從而保證公正地解決遣返戰俘問題」。蘇方請周恩來將此信帶回北京。[119]

3月21日晚，周恩來同馬林科夫（Georgi M. Malenkov）、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貝利亞、莫洛托夫和布爾加寧等蘇聯領導人會晤，談中蘇關係和朝鮮戰爭。起初，周仍表示在恢復談判上還可以「再拖一段時間」，並解釋道：「對我們來說，為遣返戰俘而鬥爭是正義的，敵人故意刁難，並非我們節外生枝。」他還提出，拖延停戰「可以消耗美國的兵力和資金，尤其是使敵人在戰略上處於不利地位，而增加西方陣營的內部矛盾」。蘇聯領導人不同意這些看法，明確提出：「過去拖的路線應改為停的路線，不改是不正確的。因為拖下去，不利於蘇聯和中朝人民；停下來，有利於蘇聯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決停戰的有利時機。」

周問：「美國是否仍將推行拖的政策？」蘇聯領導人答：「不能說沒有此可能。因為這是美國人的事情，權操在他手。…… 如我方毫不讓步，美國拖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我方有此讓步，美國拖的政策就增加困難，有迫使其妥協的可能。」

最後，周恩來表示，蘇方提出的讓步「是一個大的轉變」，也是「一個新的方針」，他需要向毛澤東和中央彙報後再答覆。[120]

會後，周恩來立即致電毛澤東，轉達蘇方意見。他顯然已傾向於接受蘇方建議，因而解釋道：「蘇方提議的中心思想，即是準備在戰俘問題上求得妥協，以掌握和平的主動權。」[121] 3月22日，毛覆電周說：「我們同意所提方針。這實際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們向謝明諾夫（斯大林）同志所提三個方案中的一個方案，即將以達成協議的俘虜按比例交換，而將未達成協議的俘虜交給一類的中立國管理，待後解決。……現在提出這方案是適合時機的。」[122] 周立即將中方答覆轉告蘇聯領導人。

3月26日，周恩來回到北京，向毛和中央彙報與蘇聯領導人會談的情況。[123] 第二天，周以毛的名義致電金日成，告知中蘇商談以及中方同意採取新方針的情況，「準備在遣返戰俘問題上作一讓步，以爭取朝鮮停戰，但也準備在爭取不成的情況下繼續打下去」。[124] 3月30日，周恩來發表聲明，對於不願被遣返的戰俘，可以先送到一個中立國家，「以確保他們的遣返問題能得到公正解決」。[125]

通過談判走向停戰的大門打開了，但毛澤東對於這次能否達成停戰協議依然沒有把握。4月3日，周恩來遵照毛的意見，在政務院作關於朝鮮停戰談判的報告時說，「結束戰爭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強，但打的可能性還存在」。[126] 同時，毛澤東還認為，為了促使對方認真對待談判，並打破其「採用軍事壓力來配合談判中的訛詐」的手段，仍「必須採取針鋒相對的方針，以積極行動來配合談判」。[127]

4月26日，停戰談判恢復，儘管雙方為防備談判可能再度中斷而沒有放棄軍事上的準備，但談判仍然在小步持續前行。最後，雙方代表於6月8日就戰俘自願遣返原則上達成了協議。[128] 周恩來以個人名義打電話給李克農，向中國談判代表祝賀。6月15日，雙方軍事參謀人員最後劃定了軍事分界線。經歷了23個月的艱苦談判之後，朝鮮戰場上和平的曙光終於顯露出來。當日下午6時，彭德懷以中朝聯合指揮部司令員的名義，命令所有部隊於6月16日停止攻擊行動。

6月18日凌晨，局勢突變，李承晚為阻擾停戰協定的簽訂，擅自釋放了25,000多名由南朝鮮軍隊監押的北朝鮮戰俘，造成了大批北朝鮮戰俘滯留南朝鮮的既成事實。當晚，毛澤東在住所召集周恩來等開會分析局勢，決定抓住這個時機，「再給予南朝鮮軍隊以軍事打擊」。[129] 經三週準備，志

願軍於7月13日發動進攻，對南朝鮮部隊進行懲罰，重創敵軍首都師和第三師。這之後，周於7月26日告知時任印度駐華大使的賴嘉文，停戰談判中的「一切協議均已準備好」，將於第二天簽字。[130]

1953年7月27日，在停戰談判開始近兩年之後，交戰雙方終於在板門店簽訂了停戰協定。經過三年慘烈的戰爭，最終形成的軍事停火線與戰爭爆發時的雙方分界線只有些許區別。

八

三年朝鮮戰爭終於結束了，周恩來心情歡愉。停戰協定簽訂的前一晚，他陪同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觀看了印度藝術團的一場音樂舞蹈演出。

但中國參加朝鮮戰爭的代價是巨大的。戰場上，數以十萬計的中國士兵失去了生命；台灣局勢的發展變得更為複雜，兩岸之間的持久分裂已成定勢；在中蘇同盟關係得到加強的同時，中國對於蘇聯在經濟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依賴大大加強了(而這又成為導致中蘇後來走向分裂的一個重要因素)；中美之間的全面對抗進一步升級；面對中國在國際安全環境方面所面臨的巨大壓力，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在對各種資源的配置中，將國防和重工業放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並採納了以高度集中為主要標誌的統制性計劃經濟模式，從而成為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持續陷入「短缺型經濟」形態的邏輯出發點。

不過，毛、周和他們的同志們對參戰的得失有自己的看法。中國軍隊既然將美軍－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這就足以使得中共能夠理直氣壯地向全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宣佈，新中國在「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從毛澤東的視角來看，不管中國參加朝鮮戰爭的代價有多大，都不能同其收益相提並論。中國入朝參戰前後，國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帶動了以愛國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為主旋律的廣泛群眾動員，並由此而進一步促成了中國政治與社會的一系列革命性變化，尤其是包括鎮反、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思想改造在內的各種運動席捲全國城鄉。中共的政策、組織和聲望也隨之而開始滲入中國社會的每一個細胞，有效地加強了對於國家和社會的組織性控制。劉少奇的一段話很能說明情況：

> 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很多事情不好辦。[131]

戰爭期間，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以全國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全力推行了一場「思想改造運動」，從而「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崇美、恐美、媚美的錯誤心理」。[132] 這樣做，固然是要把中國入朝參戰所激發的政治動員效應發揮到極致，同時也是要以此開路，使得黨和國家的政治議程以及革命計劃滲透進入到每個人（不僅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深處，促使他們的觀念世界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在手段上，「思想改造」重現了延安整風運動中的許多現象，例如批判和自我批判、對「骯髒內心世界」的揭發和曝光等等，伴隨着各式各樣的「扣帽子」和「打棍子」而來。[133] 1951年9月，周恩來曾在中南海懷仁堂為北京、天津高校的三千餘名教師做了一場以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為主題的報告。他一口氣講了七個小時，現身說法，談到了自己所經歷的「思想改造」過程，雖然艱巨乃至痛苦，卻勢在必行。[134] 之後，大多數聽講者紛紛發表感想，強調他們如何受到了周的感召，如何願意像周那樣，自覺接受「思想深處」的革命。聽眾中有一位北大教授，名叫巫寧坤，剛剛從美國回國。多年後，他敘述了當時的真實感受。他「聽了一個小時之後，思想就不斷開小差，筆記也沒認真記」，並不由得想起了他離開美國前，偶遇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獎的老同學李政道的忠告，要他回國後不要被「洗腦袋」。[135] 1957年，巫被打成右派。而那些當年為周恩來的報告喝采歡呼的巫的同事們，也幾乎無人能在此後一輪輪的政治運動中逃脫受迫害的命運。即便是周恩來自己，也將在毛主導的黨內鬥爭中一次次成為「受批判」的對象。

由此看來，朝鮮戰爭的結束也把中國的發展帶到了一個關鍵性的「十字路口」。對於年青的人民共和國——也對於毛澤東本人、周恩來和他的同志們，以及他們自青年時代起便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岔路口」。

他們的選擇，是要借抗美援朝「獲得偉大勝利」的東風，讓中國在毛澤東想像和計劃中的「繼續革命」的路上走下去。戰爭的經歷，加強並深

化了中共——尤其是毛澤東——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權威性地位。不管周恩來等他的同志們如何看待，毛澤東作為參戰決策的主要推動者在黨內的威望大增，其個人本已極大的政治權力，也將帶上比先前更少受到制衡並更具有個人獨斷的特徵。這一切，一旦時機成熟，就有可能進一步膨脹爆發。此後十餘年間，毛澤東果然把空前宏偉的烏托邦願景和巨大的政治權力結合起來，推出了諸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之類以改造中國的國家和社會乃至人心為目標，但卻造成了災難性後果的「大動作」。而這一切，恐怕是當時同毛澤東一樣沉浸在抗美援朝「偉大勝利」的歡喜之中的周恩來所始料不及的。

第17章

高饒事件（1952–1955）

一

1952年夏秋之際，周恩來的工作重心轉移，他在黨和國家領導機制中的位置也發生了變化。自1951年7月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後，雙方的戰線已在三八線略偏北一帶（除西段部分地區外）穩定了下來。在中國國內，中共的政治和社會控制大為加強，經濟形勢非但沒有因為入朝參戰而持續惡化，反而不斷好轉。廣大民眾的愛國主義情緒，隨着抗美援朝運動的廣泛深入推進，看上去也在「持續高漲」。在中共領導人的議程上，全面推進國內政治社會改造和經濟建設的問題開始躋身前列。

周恩來仍然是朝鮮戰事的大總管；但同時，他開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到了國內。早在1951年2月，毛澤東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想法。會議決定，要從1953年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並成立了由周恩來任組長的五年計劃編制領導小組。[1] 7月9日，周恩來向政治局提議，由病癒歸職的彭德懷代替自己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負責」。[2] 第二天，他又向毛澤東及中央提出，自己「擬將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計劃和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當盡量推開」。[3] 此後，周恩來依然主管外交，但他的主要精力將放到國內經濟建設與改造、尤其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上來。

這麼一件大事該怎麼做？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首先想到的是，要參照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路子，在國家計劃大框架的掌控及調

度之下，建立起一種統制型的經濟體制。7月26日，周恩來為毛澤東起草了一份致斯大林的電報，以毛的名義通報，周將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於8月訪蘇，向斯大林「報告抗美援朝工作及中國國內三年來的重要情況和今後五年建設計劃的總方案」，其中將提出：

> 請求蘇聯政府對於中國的地質勘測、工業設計和裝備、器材訂貨及技術援助等項給以幫助。工業範圍包括鋼鐵工業、有色金屬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工業、電器工業、航空工業、造船工業、汽車與拖拉機製造工業、煤礦工業、石油工業、電力工業、食品工業等。……請求蘇聯政府對於中國的國防建設、軍事裝備、兵工生產、通信設備及朝鮮作戰的軍火補充等項給以幫助；……請求蘇聯政府對中國五年建設計劃中對蘇貿易訂貨的差額給以貸款幫助。[4]

為了準備訪蘇，周恩來搭建起了一個龐大的班子，其中的兩員大將是陳雲和李富春，都被認為是中共領導人裏懂經濟的。8月11日，在周的主持下，〈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完成，提出此後五年的基本任務是：「為國家工業化打下基礎，以鞏固國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並保證中國經濟向社會主義前進。」[5] 中方隨即將這一文件轉送蘇方。

8月17日，周恩來率領五十多名成員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到達莫斯科。他除了就朝鮮戰事同斯大林商談以繼續獲得蘇聯的大規模軍援外，更要爭取把中國入朝參戰後中蘇同盟關係不斷加強所帶來的利益「最大化」，落實蘇聯對中國經濟建設和發展的全面支援。相形之下，第一個任務係當務之急，第二個任務則更為基本，從長遠來看，對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也更為重要。

8月20日，周恩來同斯大林首次會晤。中方參加會見的還有主管經濟的陳雲、李富春，蘇方參加的有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也是管經濟計劃和外交的。會談的重點，如上一章已述及，是和朝鮮戰爭相關的問題，尤其是蘇聯對中國提供軍援。斯大林心情愉悅，在朝鮮戰爭的這兩年裏，他已相信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了。會談中，他對周恩來提出的「對工業資源的勘察、設計、工業設備、技術資料及派人來蘇留學和實

習等事，肯定地回答願盡力之所及予以幫助」。同時，他還說了幾句客套話，如中國在「朝鮮作戰和橡膠兩事上，也是援助蘇聯」。[6]

9月3日，周恩來和斯大林再次會談，主題轉到了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以及蘇聯對中國的全面援助上來。蘇聯方面，除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外，斯大林還帶來了一大批在這種場合一般不出現的黨政要員，包括馬林科夫、貝利亞、米高揚、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庫米金等。這透露出，斯大林對這次同周恩來的會談極為重視，他在全面支援中國上看來是準備全力以赴，要動真格的了。

會談一開始，周恩來就直奔主題：中國正在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希望獲得蘇聯的全面支援。斯大林已經仔細讀過周此前送給他的五年計劃草案，他和周談到了五年計劃規定的發展速度問題。

> 斯：你們五年計劃中工業增長速度，每年為20%，是勉強的，還是留有餘地的？
>
> 周：我們對此尚無經驗。……還要看蘇聯能否供應我們這樣數量的工業裝備。
>
> 斯：要按一定辦得到的來做計劃，不留餘地是不行的。……我建議工業建設的增長速度，每年上漲可降到15%。……意外情況總會有的。留點餘地，總有好處。

但同時，斯大林也給周恩來吃了顆定心丸。周感到，「斯大林同志和聯共中央對我們三年來工作是滿意的，對今後五年計劃的設計、裝備、專家和貸款的幫助也是定了的，只是的確需要作全盤的計算，才能作確定數目的回答」。[7]

9月6日，周恩來給莫洛托夫寫了兩封信。第一封中提出，中國在此後五年內，由於「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需要，從蘇聯進口的裝備和普通貨物以及非貿易支出所需的外匯，預計總數將達184.3億盧布；然而，中國對蘇出口和非貿易外匯收入，預計總數只有138.1億盧布，逆差將達46.2億盧布。周提出，為彌補以上差額，請蘇聯在今後五年內向中國提供40億盧布的貸款，同時中國將向蘇聯支付約值6.2億盧布的美元、瑞士法郎或英鎊。[8]

周恩來給莫洛托夫的第二封信中，提出了一系列更為要緊的要求，為了「迅速提高中國的技術水準」，希望蘇聯向中國提供涵蓋面極廣的一系列關鍵性的技術資料：

> 1. 蘇聯現行的工業及其他人民經濟部門的產品標準，即國家標準、全蘇標準、暫行技術條件及各企業的製造規格；2. 建設礦山、工廠、學校、醫院及其他對象的若干種典型設計；3. 若干種工業及交通企業的技術操作規程；4. 若干種機器及電機的製造圖紙；5. 各工業部門及基本建設中蘇聯全國及先進企業採用的設備利用，原料、材料、電力、燃料消耗的技術經濟定額。[9]

9月8日，莫洛托夫迅速回函周恩來，同意了上述涉及知識產權和先進技術全面轉讓的要求。[10] 後來，蘇聯對中國的知識產權及技術的轉讓幾乎完全是無償給予，只是象徵性地收取了一點紙張和複印費用。[11]

9月19日，周恩來和斯大林第三次會面，並向斯大林告別。22日，他離開莫斯科回國，可說是滿載而歸。斯大林幾乎滿足了中方在朝鮮戰場的所有軍援需求，尤其是在全面支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及國家工業化戰略的實行上，斯大林也幾乎答應了他提出的所有要求。這是一個好兆頭。

周恩來回國後，李富春等人又在蘇聯整整待了大半年，與蘇方「商談對我國經濟建設援助的具體細節，共歷時八個月，對每個項目都進行了極詳細周密的研究，並得到了圓滿的結果」。[12] 在此期間，斯大林於1953年3月逝世，周訪蘇出席斯大林葬禮後，又同蘇聯新領導人深入會談，中共領導層接受了蘇聯關於結束朝鮮戰爭的提議，兩國關係又上了一層樓。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對援助中國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一些在斯大林在世時未能談下來的項目，在幾個月裏都先後拍板。1953年5月15日和6月4日，中蘇雙方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和兩個相關議定書。[13]

由此而開始的，是在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前無先例（恐怕也後無來者）的、從一個大國到另一個大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大轉移，中國的工業發展也從極低的水平開始，在短時間內提高了幾個層級。但同時，這在造成中國在經濟發展上高度依賴蘇聯的同時，也使得毛澤東產生了一種說不清

道不明、卻又是處處皆在的「不平等感」，從而為中蘇兩國走向分裂留下了一道重重的伏筆。

二

周恩來回到北京後，9月24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開會。周就他訪蘇的情況、尤其是斯大林同意為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提供全面的援助，做了詳細的彙報。[14] 毛聽取了周的報告後，說了一段極為重要的話：

>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後才開始過渡。[15]

毛澤東的這段話不是急就章，而是講出了這幾年他曾不斷試圖提出、並將導致中共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戰略發生重大轉變的一個大想法：本來，新中國成立之初，根據《共同綱領》，首先要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待條件成熟後再逐步開始向社會主義轉變。現在，根據毛澤東的意思，新民主主義要被「腰斬」了，必須馬上為向社會主義過渡讓路。

這麼大的一個彎子該怎麼轉？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其他中共領導人能否跟上毛澤東的思想轉變？毛已經想到了這個大問題。他在會上說：「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限制與反限制的鬥爭問題，現在這個內容就更豐富了。」他還特別提到，國營成分在工業中的比例已佔七成，商業零售中的國營還只佔四成。「再發展5年，私營比例會更小，但絕對數字仍會有些發展，這還不是社會主義。」毛發問：「5年以後如此，10年以後會怎麼樣？15年以後又怎麼樣？」[16]

毛澤東的這些話，首先是講給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聽的。這幾年，毛在怎樣走向社會主義這個大問題上，其實已多次同劉、周有過歧見：他要快，他們想穩。這次會議後，劉、周在各自主管的黨務和政務中，仍然沒有馬上把落實毛澤東加快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想法當作頭等大事。不僅如此，公安部長羅瑞卿會後「在相當的範圍內傳達了」毛的講話，卻在「被中央發現後做了檢查並請求處分」。[17] 為此事，毛澤東竟然專門給周恩來等一干中共領導人（但不包括劉少奇）寫信，做自我批評，說

此事是由於他沒有「明確說明此種意見的性質(尚不是決議),傳達範圍和什麼人不要傳達,故有些同志在相當範圍內傳達了」,因此此事「應由我負責」,同時,「羅瑞卿同志因此事請給處分,應無庸議」。[18] 從中共高層政治的後續發展來看,毛澤東心裏對這件事肯定是不高興的,只是「發作」的時機還不成熟。這是此後發生高崗、饒漱石事件一個極重要的大背景。

從周恩來的角度來看,當時更令他觸動的,大概還不是毛澤東在9月24日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和發問,而是1952年夏秋之際中央的一系列重大人事調動。從6月起,幾個大區的書記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勳、饒漱石和高崗先後調入北京,出任中央要職。其中,高崗的調動尤其引人注目。當時稱為「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一馬」指的就是高崗,他是中國政壇上正在冉冉升起的一顆明星。

在調入北京的各路諸侯中,周恩來最重視高崗。歷史上,周、高兩人沒有多少私交,中共建政前也沒有太多的工作交集。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後,周恩來是軍事和後勤事務的大總管,而高崗則主政東北,是志願軍後勤及其他保障的具體指揮者,和周有了較為密切的工作聯繫。這場戰爭,後來打的就是後勤。彭德懷就說過,打朝鮮戰爭靠的是兩個「麻子」:高麻子(高崗)和洪麻子(志願軍後勤部長洪學智)。[19] 周、高兩人也為朝鮮戰事及其後勤保障經常聯繫和通氣。

「五馬進京」後,高崗出任國家計委主任,從周恩來手裏拿走了一部分權力,周的地位相應地下降了。但周知道,這不是高崗一個人的事,另幾位進京的「諸侯」也起了同樣的作用。這是毛澤東在劉少奇的支持下策劃的,高崗他們只是執行者和「受惠者」而已。周恩來的一個直接反應是,在高崗進京後的一段時間裏,他批發文件時,幾次在毛澤東、劉少奇之後就是高崗,之後才輪到周自己,或者乾脆只送毛和高,把劉都跳過去了。高崗的秘書趙家梁看到後,覺得這麼做不符合黨內排座次的規矩,提醒了高崗,高給周打電話說「這樣不好啊」,周才改了過來。[20] 不過,從周對高的「另眼相看」中透露出,他已意識到高崗成為毛澤東「接班候選者」的可能前景。



圖17.1：周恩來，約1954年。
（The Print Collector / Alamy Stock Photo）

毛澤東念茲在茲的，還是要讓10至15年內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成為黨內（尤其是黨的最高領導層內）的共識及頭等大事。1952年底、1953年初，他又幾次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吹這個風，[21] 但沒有產生他希望看到的大的反響。他需要一個恰當的時機，以最有力的方式在黨的領導層內並向全黨提出這個問題。恰恰在這個當口，周恩來和政務院推出了「新稅制」改革，給了毛在路線上和組織上同時「大聲發飆」的一個「由頭」。

中共建政後，很快便建立起自己的稅制。1950年初，在周恩來主持下，政務院頒佈了《全國稅收實施要則》。當時，為了鼓勵與扶植相對薄弱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要則》規定對國營工商業和合作社實行包括免稅和降低稅率在內的優惠政策。幾年下來，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國營工商業和合作社已在國民經濟中佔了更大的比重，其內部調撥、加工訂貨以及代購代銷等經營方式也日益擴大。另一方面，私營企業看到國營經濟的內部調撥不納稅，也更多地通過國營企業直接供貨給私營零售商或委託私營零售商代售，來逃避繳納批發稅及營業稅。結

果，稅收越來越壓在另一部分私人企業頭上，國家收取的批發及營業稅也相應減少。

針對這種情況，在周恩來支持下，財政部在1952年提出了稅制改革方案，要把流通稅放到生產領域徵收，同時對國營企業、合作社和私營企業按照統一稅率徵稅，從而增加國家的稅收。12月26日，周恩來主持政務院會議時說，稅制改革促使國營企業和合作社「加強經濟核算制，努力改善經營方式，擴大推銷面，加快資金周轉」，因而是必要的。[22] 周恩來或許覺得，稅改固然是件大事，但畢竟是屬於他和政務院職權範圍內可以決定的。因此，他沒有向毛澤東彙報，就批准新稅法於12月31日在報上公佈。[23] 然而，新稅法發佈做得較急，之後北京、山東等地出現了物價劇烈波動等情況，並引發了各方一系列的負面反應。

這些年來，毛澤東本來就對周恩來「事必躬親」、凡事都抓在自己手裏的作風不滿。他甚至曾抱怨說：「什麼都是西花廳，哪有頤年堂。」[24] 更何況，從思想深處看，他早就覺得周恩來和劉少奇對於加快向社會主義過渡不熱心、推不動。周未向他彙報就批准新稅法的公佈，之後又出現了一些負面反響，這就讓毛抓住了辮子。1953年1月15日，毛澤東給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寫信，對周提出嚴厲批評：「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卒發表，毫無準備」，結果「在全國引起波動」，「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他要求周等人解釋，「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並「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25]

周恩來受到毛澤東的指責後，大吃一驚，第二天便召集政務院各部負責人開會，「研究改行新稅制後的市場物價問題」。[26] 根據周的指示，財政部稅務總局派出人員赴各地檢查，解決執行新稅制後出現的問題。隨後，財政部、商業部、糧食部負責人又聯名寫信給毛和中央，就實行新稅制的目的及其對物價的影響等作出說明，財政部還專門就此向毛和政治局作了一次彙報。[27]

本來，在稅制改革這樣一件大事上，周恩來未向毛澤東彙報便批准將新稅制付諸實施，確有欠缺之處。但毛批評新稅制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改革後物價出現波動，更不是毛批評周的主要原因。他要解決的是

路線和組織這兩個大問題。2月10日，財政部副部長吳波就新稅制在政治局做彙報後，薄一波和周恩來又就此做了自我批評，其中周再一次就新稅制發佈過程中的失誤承擔責任。然而，毛澤東依然不肯就此放過。他抓住薄一波在稅改中講過「公私一律平等納稅」，說這句話「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28] 毛的這些話上綱上線，其實首先是對着周講的，目的是要通過這件事為提出自己的「總路線」主張做鋪墊。

毛澤東批評新稅制的同時雙管齊下，在組織上對周恩來「削權」。早在1952年12月，毛就在一則批示中提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都必須統一由黨中央規定，制定黨的決議、指示，或對各有關機關負責同志及黨組的建議予以審查批准。」[29] 1953年2月，劉少奇根據毛的意思，設想了一個改組政務院黨組的計劃，由彭真取代周恩來出任書記。[30] 3月10日，中央做出一項重要決定，撤銷成立於1950年1月9日、一直由周任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總幹事會。決定特別強調：「今後政府工作中的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並經過中央討論和決定或批准以後，始得執行。」[31] 根據這一決定以及「五馬進京」後的中央新佈局，政務院的權力將從完全由周恩來掌控改為分成六塊：高崗管計劃，董必武管政法，陳雲管財經，習仲勳管文教，鄧小平管民族、宗教、統戰等，周恩來管外交兼任總體協調工作。這麼一來，周的行政權力縮小了。

毛澤東在中央高層政治佈局上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在此前後，他甚至還有過必要時撤換周恩來的念頭。他曾在同高崗談話時問道：「如果恩來不當總理，你來組閣怎麼樣？」高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含糊其辭地說，可以考慮林彪。[32]

毛澤東固然對周恩來有不滿之處，但對劉少奇的意見似乎更大。延安整風後，劉登上了中共第二把手的高位，然而在內戰和建國前後，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曾幾次偏離毛的路數。這幾年，在怎麼搞社會主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上，毛對他的一些言行頗不以為然，覺得他「右」了。[33] 毛抓住稅制改革對周提出嚴厲批評後，又抓住劉未經過他過目批准就「擅自」簽發文件報告一事大做文章。5月19日，毛專門給劉和中辦主任楊尚昆寫了一

封信：「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後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34] 同一天，毛又把周恩來也包括進來，給劉、周和彭德懷寫信：「請負責檢查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過檢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我看過的（我出巡及患病請假時間內者不算在內），以其結果告我。」毛還以極為嚴厲的語氣提出，「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35]

在此前後，毛澤東還曾密令高崗，要他暗中找人看一下敵偽檔案，調查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一事。[36] 若真有此事，透露出的是毛對於劉的不信任乃至某種深入心扉的懷疑。聯想到文革中劉少奇被徹底打倒時，他於1929年被捕之事又被翻出「算帳」，毛澤東居然會在1953年初想到了這件事，就更值得注意了——這實際上是毛在黨內高層政治中下的一步大「閒棋」，一旦有事就可以拿出來。

幾乎就在上面幾件事發生的同時，北京又出了一樁至今依然說不清的怪事：3月間，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安子文「私下」擬定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引出了一系列大的變故。後來看，這件事是高崗遭到整肅，又把組織部長饒漱石也牽連進來的一個致命的源頭。

事情的起始及經過，由於缺乏可靠的第一手資料，當事人的敘述又相互矛盾，幾十年後依然撲朔迷離。若對現有文獻資料及相關人士的回憶加以梳理，大致可以勾勒出了以下的一個輪廓。

1953年初，毛澤東表達了中央領導可以分為一、二線，自己退居二線的想法。3月的一天，高崗找到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說毛主席找他談話，中央政治局成員要改組，要加強中央各部機構」。[37] 安聽到毛有這個意思，未經授權，也沒有跟高通氣，就草擬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員和各部委分工」的名單。[38] 高崗找安子文，卻沒有找組織部長饒漱石，多半是因為他覺得饒是劉少奇的親信。安雖然也和劉關係密切，但高和他有陝西老鄉這一層兩人都很看重的關係，安的弟弟安志文又曾是高的秘書，兩人可以講得上話。4月間，毛派機要秘書帶着這份名單到高崗處，讓高當着秘書的面看後，又馬上收了回去。[39] 高崗發現，這是一份奇怪的名單，尤

其是政治局委員人選中有「華北山頭」的薄一波，卻沒有高崗所在「東北山頭」的林彪。他馬上懷疑，安子文畢竟是劉少奇的人，若沒有劉的授意，安是不會搞出這麼一個東西的。他後來同和他關係較好的陳雲、林彪、黃克誠等談過此事，但奇怪的是，他卻沒有向毛報告。高以後在自我反省時承認：「這是天大的錯誤。」[40]

那麼，這份名單是否安子文根據劉少奇的授意所擬定？劉本人後來堅決否認他知道此事，我們根據現有資料也無法定論。至於周恩來，可以肯定的是他當時不知道此事，更沒有參與其中。他是在這件事鬧大了之後，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的。

毛澤東對此事的處理頗令人尋味。他嚴厲批評了安子文：「你一個組織部的副部長，有什麼資格擬定中央政治局的名單？」安承認了錯誤並做了書面檢討後，受到了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毛沒有再深究此事，似乎有難言之隱。但他發了一句狠話：「此事到此為止，不許擴散！」[41]

當時，這件事似乎未起波瀾。但到了秋天，高崗和饒漱石各自違反了毛澤東關於這個名單「不許擴散」的禁令，一再「擴散」了名單，又衍生出後續一連串發展，不僅使高失去了毛的信任，甚至搞出了「高饒反黨聯盟」這件大事。[42]

三

夏天到了，從冬天開始的稅制改革風波卻依然沒有平息下去。毛澤東自年初拿新稅制「開刀」以來所做的一切，說到底，都是在為他在總路線上做一篇大文章開路架橋，這個大問題若不解決，他不會善罷甘休。6月1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又提到了稅制改革，再次強調這件事在路線上和組織上都大錯特錯。他說，稅改中提出「公私完全平等，是絕對錯誤的，落後於孫中山」，「在政治上有原則性的錯誤」。他又說，「這一問題事前未向中央請示，也未提交中央討論，在組織上也是嚴重錯誤的」。會議決定，將於6月中旬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原定由薄一波主持，也改由周恩來主持。[43] 這已顯露出毛對這個會議的高度重視，要拿它來大做文章，也預示着會上必起波瀾的前景。

6月12日，全國財經會議開預備會議。周恩來發言，雖然也提到了毛澤東關於總路線的看法，但他又說：「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財政問題，準備解決中央提出的以及各地有意見並且能夠解決的一些問題。」[44] 在毛看來，周的話沒有抓住要害，財政會議要提出和解決的不是財政問題，而是總路線問題。正如他後來所說：「總路線的問題，沒有七、八月間的財經會議，許多同志是沒有解決的。七、八月的財經會議，主要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45]

為了給財經會議定向，6月15日，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劉少奇和周恩來等都出席了。毛在會上開宗明義就把自己關於總路線的新提法講了出來：

>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46]

接着，毛澤東不點名地把一些言論端出來，當作「右傾」思想敲打批判。毛的一個靶子是「確保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這是劉少奇說過的。毛沒有點劉的名，但話說得很兇：有人在民主革命勝利以後，不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錯誤。他還說：「『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 要『確立』是很難的哩！……『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鬥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47]

毛澤東還批判了另一段話，也沒有點名，但周恩來一聽就知道那是衝着他來的。1952年1月5日，周曾在全國政協常委會上說，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存在和發展。「只有這樣，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才能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48] 毛在講話中針對這番言論批駁道：

> 「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49]

毛還藉着批判新稅制，再次抓住「公私一律平等納稅」這個提法，上綱上線地說，這就是共產黨向資產階級投降。面對毛的凌厲攻勢，周恩來哪裏還坐得住？本來，全國財政會議準備開半個月；6月15日政治局開會後，會議的主題從周恩來原先強調的「解決財政問題」轉移開去，延長為兩個月，開成了一個貫徹落實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會議。

毛澤東是黨內鬥爭的大師。會議過程中，他沒有直接碰劉少奇和周恩來，而是抓住劉手下大將、也是周搞新稅制改革的頭號執行者薄一波，藉着批薄上綱上線，同過渡時期總路線聯繫起來。毛說，資產階級的「精神的糖衣炮彈打中了一個靶子，就是薄一波」。薄「走到資產階級那裏去了，成了資產階級的代理人」。[50] 這些話，其實也是毛對劉、周的警告。在具體做法上，毛澤東對兩人既敲打又拉攏，但也有區別。對周，毛讓他出面主持批薄；對劉，毛則要他自己出面檢討。說到底，毛是要促使他們全盤接受過渡時期總路線，使之在中共主流話語中獲得無可爭議的中心地位。

周恩來和毛澤東相處既久，對毛的意圖焉能看不出來？他的態度是盡力與毛合作，把財經會議開成毛所希望的那樣。7月13日，他寫信給薄一波，轉達毛的看法，要薄「更深一層進行檢討自己，從思想、政策、組織和作風上說明問題」。[51] 周實際上是在提醒薄，要他把問題提升到貫徹執行毛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總路線的高度來討論。

然而，薄一波在做檢討時似乎並沒有真正理解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意圖。結果，不管他在會上作檢討時怎樣加碼，卻總是難以「達標」，反而「引火燒身」，被扣上了一頂頂帽子，說他是中國的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式的人物。在這個過程中，高崗「跳的很高」，在與會者中煽風點火，「批薄射劉」：他嘴裏批判薄一波，眼睛卻盯着劉少奇，巴不得讓大火延燒到劉的身上。高崗在會上的發言中「採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一些劉少奇說過的話、做過的事，也當成薄一波的錯誤嚴加抨擊。[52] 高崗生怕別人搞不懂他的來頭，還特意透露，他的發言稿請周恩來看過，經過毛澤東的審閱及修改。[53] 這麼一來，會議的重心變了，從毛強調的總路線問題轉移到對薄一波的「清算」上來。與會者群情激憤，薄一波被整得下不了台，劉少奇甚至也可能被帶進來，成為批判的靶子。

這種局面不是毛澤東想看到的。他確實是高崗「批薄射劉」的幕後人物，但這裏的「尺度」很重要。在毛的設想中，他敲打批評劉少奇和周恩來，是為了給總路線鳴鑼開道。打開局面後，他仍然要同劉、周等黨內「大佬」合作，從而使得總路線能夠順利推行。高崗卻沒有吃透毛的意圖，未能把握住這個尺度。

周恩來恐怕是最能看透毛澤東心思的人，但隨着高崗在會內外呼風喚雨，會上關於「批劉」是毛的意思的傳言滿天飛。一時間，周面臨着一種尷尬的局面：他既不好喝止正在風頭上的高崗，又不能讓會議失控，偏離毛的計算。更何況，他自己也有一種「泥菩薩過河」的感覺。於是，他索性跑去向毛請益。毛指示他，可以請陳雲、鄧小平到會上講話。這兩位本來就很懂黨內高層政治的「門道」，周恩來又一定向他們交了底。他們在會上的講話都極為「得體」，既恰如其分地批評薄一波，又把重點放在落實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性上，改變了會議的氣氛。[54]

會議期間，還發生了另一件大事，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把3月間安子文搞的那個名單捅了出來。饒到中央組織部就任後，一直同安關係緊張，兩人爭執不斷。後來，不知通過何種途徑，饒漱石知道了安子文名單之事。他極為惱火，畢竟他是組織部長，而安子文居然背着他擬定了這麼一張名單。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可以置安於死地的罪名。7月22日，饒、安又在一次組織部會議上發生衝突，安到劉少奇那裏告了饒一狀，饒大怒。兩天後，他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上，在劉少奇和周恩來都在場的情況下，當面質問安子文，3月的那張名單是怎麼回事。安不知所措，因為毛早已發話，此事不得擴散。會後，劉少奇告訴饒，不要再繼續追究此事，到此為止。不料，饒非但不聽，反而對劉心生不滿，也由此種下了自己身敗名裂的禍根。

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饒漱石這麼做並非受到高崗指使。後來，關於他在名單問題上「和高崗勾結」的指責，沒有任何真憑實據的支持。

8月11日，是會議達到高潮的一天。劉少奇在會上發言，不僅就「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錯誤看法」做了自我批評，還翻出了自己的一些舊帳，講到了抗戰勝利後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問題，天津講話中說「資本家剝

削有功」，土改和合作化上右傾保守，以及發展富農黨員問題等等。[55] 這正是毛澤東希望他做的。

這一天，周恩來做了經毛澤東審閱批准的會議總結。他先讀出毛專門加上的一段話，重申「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對手工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特別強調「這條總路線，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了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56] 周在報告中沒有像劉少奇那樣專門做自我批評，但他的講話中有幾句是毛澤東審閱時添加的，由他讀了出來：「修正稅制的錯誤，是違反黨的二中全會決議在這個方面所規定的原則的錯誤。……這正是經濟戰線上一種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表現，正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57] 這些話其實都是針對周的尖銳批判，真不知道他讀時心中會有怎樣的感受。

8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話，重點仍是路線和組織問題。他強調「要在黨內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否則「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徹底解決組織問題。[58] 隱約間，周應該可以感到，從毛的角度來看，在財經會議上雖有收穫，但也有缺憾，事情恐怕還沒有完。

四

全國財經會議後，周恩來清楚地看到，高崗在黨和國家領導層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已達到幾乎可以和他及劉少奇「平起平坐」的地步，在毛澤東底下形成了「三駕馬車」：劉少奇管黨務，周恩來管政府，高崗管計劃和經濟。[59]

高崗確實有想法，也有野心，但他從未在中央工作過，不熟悉高層政治的「路數」。他對劉少奇真的有看法，覺得劉「右」了，能力也不行，又覺得自己和毛澤東理念相近，[60] 批劉是毛想做的，一定會得到毛的支持，也能為他在黨內地位的進一步躥升和鞏固打開通道。1953年10月，他離開北京近一個月，到南方休假，先後到了廣州、杭州等地。他覺得手裏握

有毛的「尚方寶劍」，到處找當地領導人談話。他說，七大後，劉少奇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但毛後來對劉感到失望、不滿意，尤其這幾年，劉的不少意見和毛「不合拍」，「左」右搖擺、很不穩，使毛覺得他「不是好幫手」；又說，劉在中央有一個自己的「圈圈」，重用「華北山頭」的人，排擠林彪這樣不屬於那個山頭的人。往往在談話開始時，他就甩出他得到毛的授意和支持的「底牌」，還頻頻提起那張毛已經明確關照「不要擴散」的安子文名單，作為倒劉的依據。[61]

高崗反對劉少奇，但他不反對周恩來。中共建政後，尤其是在朝鮮戰爭的過程中，他和周的合作相當順利，也相當有成效。[62] 他進京後，周對他極為尊重，並未因為他「一馬當先」之下分了自己的權而對他心懷不滿。對此，高是感覺得到的。在南行過程中，他基本上沒有講周的「壞話」。[63] 高崗一路走下來，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在全國六個大區中，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包括林彪和彭德懷都站到了他一邊。[64] 但實際上，他面臨的卻是一種充滿潛在兇險的局面。尤其是，那張毛澤東已嚴令「不得擴散」的名單，卻被他當作「最大的武器」到處使用，成了一顆大的「定時炸彈」。

幾乎就在高崗南行同時，從9月到10月下旬，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也鬧出了一番大事。7月，饒漱石曾在財經會議期間同安子文大吵，但沒能搞倒他，很不甘心。這次會議上，饒為了整垮安，各種手段一起上，包括明裏暗裏拿安搞的「某張名單」做文章。饒沒有想到那張名單是毛的一塊心病，知道此事的人越少越好，更不能擴散，但是饒卻偏要去碰。這時，劉少奇又出面了，明確告訴饒對這件事不要再追究，但饒居然不聽，反而加深了對劉的不滿。[65] 這一來，饒在毛和劉那裏都犯了大忌。儘管饒是劉的人，但劉已經沒有理由再去挺他了。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又專門做了自我批評，再次把自己的一系列「右傾」錯誤擼了一遍。[66] 他有此舉動，首先是做給毛看的，肯定也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劉是在嚴酷的黨內鬥爭環境裏登上中共第二把手的高位的，也算得上是此中高手。他太知道如何應對自己所面臨的此類挑戰了。

此前，毛澤東支持高崗在財經會議上「批薄射劉」，目的是以高制衡劉。毛有他的大計劃，為了總路線的全面落實和推行，他仍然需要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內「大佬」的合作。劉少奇先後在財經會議和第二次組織

會議做檢討後，毛其實已經準備讓他「過關」了。但高崗卻看不到這一點，他在南方又打着毛的旗號反劉，這就開始把毛的經唸歪了，而他卻渾然不覺。其實，在財經會議期間，毛澤東對高崗的態度已有微妙的變化。在一個小會上，毛曾突然抓住高崗未處理好東北一封「群眾來信」的「小事」，責備高「態度不好」，使正在志滿意得之中的高崗不免尷尬。[67] 不僅如此，毛得知高崗等在會上說劉少奇有一個「小圈圈」、北京「有兩個司令部」時，又在小會上說：北京「只有一個司令部，那就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68] 這個話是講給高崗聽的，也是講給劉少奇、周恩來聽的。劉、周聽進去了，後來看，高崗卻沒有聽進去。

對高崗，毛澤東還有一塊心病，那就是高和蘇聯及斯大林的關係問題。早在1949年12月毛在蘇聯訪問時，斯大林就曾交給他一份科瓦廖夫的報告，當中提到了高崗十分親蘇的態度。對這件事，毛當時沒有說什麼。但高崗「出事」後，他幾次提到了高和蘇聯的特殊關係，認為「高崗裏通外國」，甚至還把斯大林開玩笑的話拿出來說事，說「斯大林特別喜歡他，封他為張作霖」。[69] 對這樣的事，毛澤東是不會忘記的。

五

高崗在南行過程中，一再搬出安子文搞的那個名單來攻擊劉少奇，這件事毛澤東很快就知道了。12月初，葉劍英和譚政到北京參加軍委擴大會議，見到毛時問起，「有薄無林」的名單是怎麼一回事。毛聽後極為生氣，尤其是因為他曾嚴令這份名單「絕對不得外傳」。[70] 這件事碰了他的逆鱗，他決心要追查清楚。

12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高崗等都參加了。毛說，他要離開北京一段時間，到南方休假。他要大家討論，在他外出期間，是否由劉少奇臨時主持中央工作。包括周恩來在內，出席會議的多數人都表示同意，但高崗堅持說：輪流吧，搞輪流好。劉也表示，「由書記處的同志輪流負責為好」。會議最後決定，毛外出期間，「中央書記處會議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高崗、彭德懷參加，集體討論解決問題」。[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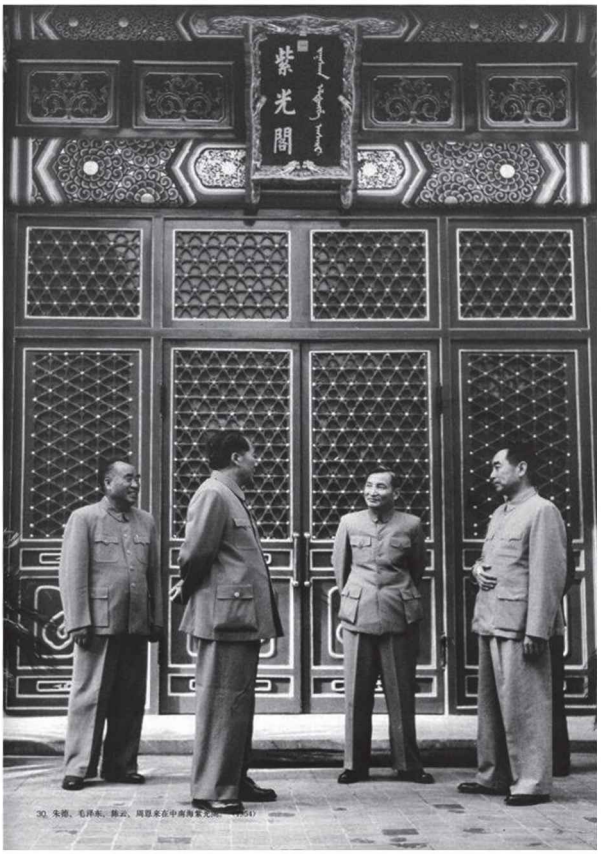


圖 17.2：右起：周恩來、陳雲、毛澤東、朱德在中南海紫光閣，1954 年。
（World History Archive / Alamy Stock Photo）

會議過程中，毛澤東突然發問，是誰把「那個名單」洩露出去的，又說這件事一定要追查清楚。高崗措手不及，沒有答腔。會議結束時，毛又讓高單獨留下，問他：你看那個名單是誰洩露出去的？這其實是毛給高崗的最後機會，如果高當時承認自己做了錯事，那麼毛固然會責怪他，但還不至於把他「拋出去」。然而，高卻王顧左右而言他，始終不敢承認名單是他洩露的。這等於是他當面欺騙毛，讓毛對他大失所望。[72] 這是高的一個特大的敗着，使他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

然而，即便到了這個時候，高崗卻依然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已身處險境。從毛那裏出來後，他又分別找了陳雲、鄧小平。根據鄧的說法，高對他說，劉少奇不成熟，要鄧「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據陳雲說，高仍然拼命兜售「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大家輪流做莊」，並責問陳為什麼在書記處擴大會議上不和他聯合行動，幫他講話。[73]

但這時，毛澤東已有動作。12月15日政治局會議後，毛整整想了一天，從12月17日起連續找其他領導人談話，第一個是周恩來。17日晨，毛、周會面，談話的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但從事情後來的發展看，這是毛為在高崗問題上化被動為主動佈局，並請周出面幫助他掌控局面。大概就是在這次談話中，毛還告訴周，高不但反對劉，也反對周。[74]後來，在處理高崗問題的整個過程中，周成為「擺平」局面的中心人物。[75]

下午5時半，陳雲和鄧小平一道來到毛澤東處。兩人見到毛後，告了高崗一大狀，促使毛更下定了和高崗「分離」的決心。這裏，陳雲是一個關鍵性人物，也成為高崗後來最恨之人。高、陳兩人的關係，是在東北共事時期變得密切起來的。陳雲做事乾淨、果決，高崗對他相當信任，進京後，更是把他當作最親密的朋友，幾乎無話不談。在試圖「倒劉」的過程中，高崗遇事也都和陳商量，講了內心深處的很多想法。不料，這天見到毛時，陳把高崗的話和盤托出，抄了他的後路（其實，我們並不知道陳揭發的高崗言論是否都是高講過的，這在高倒台以後，沒有人會去追究）。陳向毛報告，高打着毛的旗號，發表對劉少奇及黨內其他領導人的各種負面評論，尤其是他揭發高說了「你一個，我一個，大家輪流做莊」的話。鄧小平又加上一句，高崗曾問「誰是中國的列寧，誰是中國的斯大林」，這等於說高不僅在行事時夾入了「私貨」，甚至還覬覦毛的高位。毛和他的俄文翻譯師哲有過一段對話，很能說明問題。師哲說：「高崗自稱對您還是尊重的，也表示決心要擁護您。」毛答道：「等把他們都收拾了，就輪到我頭上了。」[76]毛和陳、鄧談了兩個半小時後，又在8時把周恩來找來，一起參加談話。[77]看來，毛在幾分震怒、幾分尷尬之餘，已有了「整高」之意。這一切，周恩來都看在眼裏，記在心中。

12月18日，毛澤東先後同譚政、鄧子恢、李富春談話後，晚上又約了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談話。12月19日下午，毛同黃克誠談

話。[78] 在這些談話中，看來毛澤東主要做了兩件事。第一件，是進一步搞清楚高崗究竟說了些什麼，尤其是核實高崗究竟在多大範圍傳播了安子文搞的那個名單。第二件，是就「整高崗」和他們通氣、打招呼。

12月19日晚，毛澤東又和陳雲、鄧小平談話。此時，他顯然已下了和高崗「分離」的決心。談話結束時，毛委派陳雲去上海、杭州、廣州、武漢等高崗曾經到過的地方，代表中央向各方領導人打招呼，「要求他們不要上高崗的當」。毛知道林彪和高崗關係密切，還發了一句狠話：「林彪如果不改變意見，我與他分離，等他改了再與他聯合。」[79]

12月20日上午，毛澤東又和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賀龍、葉劍英談話，告訴他們「高饒陰謀活動的真相已大白」。[80] 這就是說，毛已明確地把高、饒聯繫在一起，要把他們放到一道整肅。這天下午，毛澤東同劉少奇談話。這是12月15日政治局會議開過後，毛第一次單獨找劉談話。[81] 這說明，毛對於如何處理高崗問題已胸有成竹，也可以同劉通氣攤牌了。他們究竟談了些什麼已無從考察，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們在對高崗的批判和處置上達成了共識，也在把饒漱石拿出來和高崗一道打上面形成了默契。

當天晚上，毛澤東再次同周恩來談話，其內容可以從第二天毛和羅瑞卿的談話中看出端倪。毛說，羅「睡在鼓裏」，高崗「要在我退居二線時，當黨的副主席。他對陳雲同志說：『黨的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他不是擁護林彪嗎？這時林彪沒有了。他不只要打倒劉少奇，是要打倒我，他也會打倒林彪！」[82]

12月23日下午3時半，毛澤東又同周恩來談話。之後，4時40分，毛同高崗談話。高崗直至此時卻「仍不檢討」，使毛覺得「他已不可救藥」。[83] 這是毛、高的最後一次個別談話，這之後直至高崗自殺身亡，毛再也沒有同他單獨見面。當晚8時40分，毛澤東同彭德懷談話；10時，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開會。[84] 第二天就要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了，這應該是毛在為會上的「攤牌」做最後的佈置和準備。

從12月17日至23日不到一週的時間裏，毛澤東和周恩來或單獨、或同其他人一道，共有六次談話。周在中共黨內人脈深廣，威信甚高，又掌握着很大的行政權力和資源。毛決定同高崗「分離」，幾乎每走一步

都和周商量，在獲得周的合作的同時，也逐漸使自己從高崗帶來的窘境中解脫出來。對周恩來來說，高崗「出事」並非全然出乎意外。畢竟，高崗做事太「衝」了，對中央高層政治的了解也太少、太膚淺；可以說，正是他自己的作為把自己帶入了險境乃至絕境。從個人角度來說，周對高崗沒有惡感。儘管毛說高崗也反對周，但周心裏明白，高不反他。可是，現在高攤上了大事，搞得毛要同他「分離」，同時毛、劉兩人看來也達成了默契，周知道，自己除了站在他們一邊、幫他們擺平局勢外，別無選擇。

12月24日下午2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有劉少奇、周恩來以及高崗、饒漱石等29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與九天前相比較，毛的態度已明顯不同，有了極為明確的傾向性。他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85] 毛宣佈，他要離開北京去杭州，主持憲法草案的起草。會議同意毛的建議，並決定起草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在毛外出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下午4時，毛乘專列去杭州。[86]

六

毛澤東走後，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一道，留守北京。雖然說，毛已宣佈他不在京時由劉主持中央工作，但在高崗問題上，劉是直接的當事人，不好放開手腳說話做事，周的地位和作用極為重要。從12月底到第二年3月中旬，毛一直待在杭州，說是在那裏主持憲法的起草。但實際上，尤其是最初一個多月，他想得最多的還是如何處理高崗問題。

劉少奇和周恩來也知道，高崗問題是必須處理的當務之急。毛澤東離京後僅三天，他們就按照他的關照，搞出了一個黨內團結決議的初稿，給他送去。毛反覆思考後，1月7日，給劉少奇、周恩來等寫了一封信，建議在1月下旬召開中央全會。除批准中央政治局工作和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外，還要通過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87] 在毛提出的會議議程中，並無批判高崗一節，但卻特別要求劉少奇作自我批評。毛還具體指示劉，

稿子「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在稿子完成後「告我一閱」。[88] 第二天，劉給毛送了一個報告，稱「自您走後，此間情況如常，同志們是團結一致地工作」，並一再告訴毛，他和周恩來合作得很好。[89] 1月12日，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決定根據毛提議的議程，從1月30日起召開七屆四中全會。

1月16日，劉少奇在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後，致電毛澤東，送上了他準備在全會上做的檢討，並特別提及「這個檢討已經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諸同志審閱修改過」，請毛「審閱和修改」。他沒有提到高崗，但說到「其中有幾處地方不是檢討，而是辯護，因為有人對這些地方進行過激烈的攻擊。稍加辯護，似有必要」。[90] 這些話，他顯然是針對高崗講的。

1月19日，高崗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自己犯了錯誤，準備在四中全會上做自我批評，想在會前去杭州見毛，商量這件事。他把信交給中辦主任楊尚昆轉送毛，楊卻把信先交給了劉少奇。當天，劉召集周恩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李富春等開會討論此事。他們商量後提出，毛有四種選擇：同意高去杭州見毛；毛自己回北京；由毛指定書記處同高談話；由毛指定劉、周和高談話，並讓鄧也參加。他們覺得，無論是讓高去見毛或毛回北京，都「不好處理」；由書記處出面找高談話又「太重，也不好處理」。他們建議，由毛指定劉、周和高崗談話，鄧可參加，並請毛回覆高崗，不必來杭州，可委託別人找他談話。[91]

這幾條考慮縝密，面面俱到，對毛澤東的心思吃得很透，尤其是無論是讓高崗去杭州見毛、還是由毛回北京見高，都可能發生高、毛兩人「當面對質」的極度尷尬的局面，這是毛要避免的。恐怕除了周恩來，這樣老謀深算的幾條還能出自誰的手筆？

1月21日深夜，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剛從北京來的楊尚昆彙報。第二天，他致電劉少奇說，他收到了高崗的信，同意劉、周等的建議：「我認為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請你和恩來同志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但同時，毛又特別關照，全會的方針應為「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待犯錯誤同志的覺悟」。他還告訴劉、周：「此電請送高崗同志一閱，我就不另覆

信了。」[92] 這樣，毛等於把在高崗問題處理上「便宜行事」的權力讓渡給了劉和周。

劉少奇、周恩來等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後，於1月25日和鄧小平一道，找高崗談話。高崗雖然表示願意檢討，但滿臉還是一副不服氣的神情，談話不歡而散。這正好讓劉、周等可以向毛報告，高崗仍未「覺悟」。[93]

在杭州，毛澤東一直還在考慮高崗的事。思來想去之下，1月28日，他和即將回北京的楊尚昆談話時再次表示，四中全會還是要對高崗「堅持正面批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爭取在黨內團結的決議通過後，會「造成不利其陰謀活動的環境」，再加「增強教育、說服力量」，「給一條路讓他走，有好路走，就不走絕路了，當作一種可能性來爭取」。[94] 顯然，毛依然沒有放棄「保」高的態度。

然而，劉少奇和周恩來似乎並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意思行事。全會召開前四天，他們會見了蘇聯駐華大使帕維爾．尤金。劉告訴尤金，中共黨內出現了高崗、饒漱石為首的派別活動，將召開全會不指名地對「對此相關的人員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周恩來詳細闡述了高崗「對抗中央性質」的問題，說他散佈歪曲黨的歷史的「軍黨論」，又「在黨的領導幹部中暗地散佈對劉少奇的各種臆測和污蔑」，在黨內封官許願、拉幫結派，企圖「在黨內佔有更高的位置」，其性質是「反黨活動」。[95] 談話中，劉、周兩人的配合相當默契，顯露出他們已在處理高崗問題上達成共識：全會上雖然不指名，但對高崗和饒漱石將會嚴厲批判，並視他們的態度決定下一步怎麼走。

2月5日，七屆四中全會召開，毛澤東身為中央主席，卻沒有出席會議。這也是他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後唯一一次缺席的中央全會，其中之意涵耐人尋味。會議的進程，自然由劉少奇和周恩來掌控。會上，他們雖然根據毛的指示，沒有點高崗的名，但卻聽任發言者給高崗扣上「反黨」、「從事陰謀活動」、是「張國燾這樣的野心人物」等一頂頂大帽子。其實，毛澤東還是希望全會上對高崗不要批得太兇。會前，他看了朱德的發言稿後致電朱表示「同意」。[96] 在全會上的重量級發言者中，朱的發言是最溫和的，完全沒有上綱上線，而是把重點放在加強黨內團結上，並把問題的根源歸之於「在一部分幹部中滋長着個人主義、驕傲自滿的情緒」。[97] 但朱德

的話曲高和寡，在會上沒有多大影響。周恩來是朱德的老朋友，也沒有站出來呼應他。

2月7日，高崗做了檢查。但他心裏並沒有想通，更不肯給自己亂扣帽子。他只是說，自己驕傲自滿，「對黨的團結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犯了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錯誤。[98] 這樣的檢查，當然是通不過的。

全會的兩場「重頭戲」，都是在2月10日上演的。第一場是劉少奇的發言，他除了代表書記處和政治局彙報工作外，不點名地對高崗一大通嚴厲指控。隨後，他又做了系統的自我批評，就自己在農業合作化問題、土改中的「左」傾錯誤問題、抗戰後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問題，以及1949年的「天津講話」，分別作自我批評。[99] 劉這麼做以後，以退為進，把身上的「包袱」都甩掉了，更可以對高崗下手了。

第二場重頭戲是通過決議，「批准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00] 這是毛澤東一再強調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促成毛不死保高崗的重要原因。全會把這件事做好了，劉少奇和周恩來就可以在毛那裏「交差」了。

2月10日，全會的最後一天，周恩來講話。他強調要反對「不利於黨的團結和損害中央威信的言論和行動」，「反對個人主義的反黨的言論和行動」，「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做獨立王國」，「反對分散主義、地方主義和本位主義等等」。周講話的調子比大多數人還要高一些，但還沒有過分地給高崗扣帽子。[101]

全會通過了加強黨內團結的決議，但沒有就高崗問題正式定性或做結論。本來，這件事應該暫時告一段落，以等待高崗「覺醒」。可是，五天後，一個高崗問題座談會在周恩來主持下舉行。同時，還開了另一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這兩個會並不在毛澤東的計劃之中，我們也沒有看到劉少奇、周恩來在四中全會期間或之後向毛彙報或商量此事的任何材料。這兩個會何以召開，仍是不解之謎。但正是這兩個座談會，使高、饒問題都徹底升級變質，向着定性為「高饒反黨聯盟」的方向轉變。

高崗問題座談會的第一天，高繼七屆四中全會做檢討後，又做了檢討。他基本上還是「老調」重彈，不肯朝自己頭上扣「屎盆子」。[102] 這天，陳雲也做了重磅發言，當面揭發批判高崗。高實在忍不住，站起來就一些

具體事實同陳雲激烈爭吵，周站出來為陳辯護，指責高崗「血口噴人」，「臨死還要拉上一個墊背的」。[103] 高黯然坐下，再不發一言。

2月17日午後，高崗在家中開槍自殺未遂。此前，他給毛澤東、周恩來各寫了一封信。給周的信，主要是請周看到多年情誼的份上，照顧妻子李力群和幾個孩子。[104] 毛澤東得知高崗自殺未遂後，便知他大勢已去。周恩來同劉少奇商量後，提出了對高崗的緊急處置辦法，將高「交付管教」、加強批判，獲得政治局同意。[105] 這之後，座談會上批高的調子急劇上升。

2月25日，周恩來經精心準備，做了一篇批高開始以來最為嚴厲、也最為系統的發言。他的調子和自己兩週前在四中全會上發言不一樣，為高崗羅列了十大罪狀：第一，製造散佈「槍桿子上出黨」的論調，為分裂黨並伺機奪權服務；第二，從事宗派活動，反對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第三，「利用某同志錯誤地提出的關於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單的個人意見，製成各種流言，廣為挑撥」；第四，私自封官許願，擴大自己的影響；第五，在東北搞獨立王國；第六，假借中央名義，破壞劉少奇等其他中央領導人的威信；第七，剽竊他人文稿，抬高自己；第八，在中蘇關係上撥弄是非，破壞中蘇團結；第九，進行奪取國家權位的陰謀活動；第十，生活作風腐化。周恩來還強調說：

> 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以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個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圖失敗以後，他就走上了自絕於黨和人民的自殺道路。[106]

周恩來講話後，將講話提綱送毛澤東審閱，以便在黨內轉發。毛對周的發言做了肯定的批示。[107] 3月26日，毛在同尤金談話時說，高、饒「聲稱擁護毛和林彪，但是首先打擊劉少奇和周恩來」，這是「事關整個黨的團結的問題」，如不制止，「黨派鬥爭就會像傳染病一樣在黨內迅速蔓延」。[108] 這是毛對此事的正式表態，高崗倒台已是在劫難逃。

高崗曾長期主政東北，有「東北王」之稱。他出事後，對中央來說，「擺平」東北就成了一件極要緊的事情，這趟差使又落到周恩來身上。周恩來對此早有準備，高崗問題座談會結束後，他就同來自東北的林楓、

張秀山、張明遠談話，提到「高崗在東北已有反黨活動，以後野心大起來」，因此中央要召開東北高幹會議，要他們「對高崗在東北時期的錯誤，要有所揭發」，「打破高崗『政治上對，組織上錯』，『東北正確，到北京不好』的觀念」。周還說，對高崗「應該長期管教」，從而「經過批評達到團結」。[109]

3月25日，周恩來攜公安部長羅瑞卿，到瀋陽主持召開東北高幹會議，討論高崗問題。會議開始後，周做報告，向與會的五百多名幹部敘述了高崗、饒漱石「進行反黨分裂活動」的嚴重問題，並就七屆四中全會對高、饒的處理做了解釋。他強調，高崗的問題「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組織錯誤，也不是黨內嚴重的路線錯誤」，而是企圖「分裂黨、反對黨」，蛻變為「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110] 周的話為這次高幹會議點了一把火，引發了與會者一連串層層加碼揭批高崗的發言。他於3月28日返京後，會議由羅瑞卿坐鎮繼續舉行。結果，發言者人人上綱上線，只要「政治正確」，毫無根據的指控滿天飛，終於把張秀山、張明遠、郭峰、馬洪、趙德尊等五位曾與高崗共事的高幹打成了「高崗集團」的「五虎大將」。

據稱，後來周恩來聽取羅瑞卿彙報時曾說：東北高幹會沒開好，沒想到會這樣。[111] 然而，既然中央會議上已把高崗的問題定位為「反黨聯盟」，又怎能沒有「集團成員」? 也許，周心中並不想把事情搞成這副樣子，但到了這個時候，這還由得了他嗎？

1954年2月座談會後，高崗被打入冷宮，交給他的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管教」。[112] 他稍微冷靜下來後，開始寫一份詳細的〈我的自省〉，共五萬多字，完稿後於4月29日上交中央。他幾乎天天在盼望，能從毛澤東、周恩來或中央的什麼人那裏有一點回音。但一天天過去，他只能枯坐空房，面壁思過，最後殘存的生的欲望也一天天逝去。1954年8月17日，高崗吞食了自己私藏積累的超量安眠藥，再次自殺。這一次，他死了。

周恩來得知高崗死訊後，幾乎在第一時間就趕到現場。他還記得高崗第一次自殺時寫給他的信。對高的善後事宜，他做得很仔細。除安排對高遺體的解剖檢查外，他還特別指示要對高予以厚葬。同時，他對高的夫人李力群也相當關照。[113] 周這麼做，倒不見得是因為他內心深處其實知道高

有被冤枉之處而對高有虧欠之意，只是不想再讓這件事情發酵擴散開去，這對任何人都是沒有好處的。

毛澤東通過「拋出」高崗的一番運作，終於把黨內高層的關係「理順」了。隨着劉少奇、周恩來全盤接受他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法，劉也做了系統的自我批評，毛在一系列「大問題」上，尤其是在總路線的提出和推行上，掌握了主動。

對高崗之死，毛澤東是矛盾的。他確實對高不滿，也想給他一個大的教訓，但從心底來說，他並不想把高往死裏整。高崗和他理念相近，能力又強，本是他看重之人。他同意撤銷高的職務，甚至聽任劉少奇、周恩來等給他扣上「反黨」和個人野心家的帽子，主要是因為這件事正在風頭上，他若不如此辦理，在黨的領導層裏實在說不過去。畢竟，此時的毛固然權力巨大，但還沒有達到後來那種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地步。

幾年後，毛澤東曾說：「高崗這件事，我有責任，就是時間延誤了。我本來想同習仲勳談，我與他約了，目的就是跟習講。因為那時高崗想去陝北，我們想保留他的黨籍，還想保留中央委員，讓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願意。可是遲了一步，我沒有來得及講。他自殺了，竟這樣結局，我也覺得遺憾。所以這事怪我，這是個很不好的事。」[114] 這裏透露出來的，是毛先把高「冷藏起來」，待以後有需要或時機成熟時再讓他「出山」的念頭。後來，毛在文革中對鄧小平不也是這樣做的嗎？

然而，出乎毛澤東、周恩來和幾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似乎經歷過政治上各種大風大浪的高崗，不僅全然不解毛澤東的意圖，更在心灰意懶之下走上自殺之路。據說毛得知高崗死訊時，口裏迸出三個字：「沒出息！」其中所包含的惋惜與失望，是可以讓人清晰地感覺到的。

七

從1953年12月起，在中共高層領導討論高崗問題時，饒漱石的名字就不斷被提到，高、饒兩人也被聯繫了起來。但當時，饒依然想當然地認為，他和高崗之間並沒有多少工作上的聯繫，更遑論「相互勾結」。他確實在安子文名單這件事上，碰巧和高崗都犯了「擴散」的錯誤，但至多也就是受到嚴

厲批評、多做幾次檢討罷了。他恐怕做夢也沒有想到，幾乎在高崗連續遭到嚴厲批判的同時，他不僅遭到嚴厲批判，後來還硬生生地和高崗被扯到一起，變成了「高、饒反黨聯盟」的頭目，高崗事件也變成了「高饒事件」。

12月中旬，毛澤東「拋出」高崗的同時，決定把饒漱石也端出來。其實，饒是在毛需要的時候，自己送上門來的一個「靶子」。某種意義上，這也可以說是毛和劉少奇之間一場心照不宣的「交易」。從黨內高層政治的角度來看，高崗是毛的人，而不管饒漱石和劉少奇新近有過什麼分歧，大家都記得他是劉的人。12月20日，毛澤東和饒的「政敵」陳毅談話，起初當毛問起陳對饒的看法時，陳不明就裏，王顧左右而言他；待醒悟過來後，才「把自己所接觸所懷疑的饒漱石的言行和盤托出」。[115] 在12月24日的中央會議上，毛說了那段北京「有兩個司令部」的話，其實已把矛頭也指向了饒，只不過還沒有點他的名。

歷史上，周恩來和饒漱石直接的交往並不多。兩人之間的一段直接「交手」發生在1949年3月，饒漱石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針對周，就中央如何「處理統一問題」發聲，言辭「甚為尖銳」。周「以此深為不安」，專門就此在會上發言「檢討自己在這幾年工作」。[116] 但此後，尤其是在饒漱石從華東調入北京後，周恩來和他之間未出現大的歧見和衝突。

1954年2月3日，饒漱石接到通知，劉少奇和周恩來要找他談話。他到場後才發現，參加談話的還有朱德、鄧小平和陳雲。主講的是劉少奇，周基本沒有說話，他和其他幾位坐在那裏，是為了讓劉的話顯得更有分量。劉要饒在四中全會上做檢討，並告訴他，那個加強黨內團結的決議就是對着高崗和他來的。[117] 饒這才知道，自己攤上大事了。

2月9日，饒漱石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做了檢查。他從歷史講起，說到了自己和陳毅的矛盾。接着，講到了他在組織部和安子文鬧矛盾，批判安，即便在劉少奇要他住手後也未停止，「不尊重少奇同志」。[118] 毫不奇怪，這個檢討未獲通過。關於安搞的那個名單，他在檢查中只是語焉不詳地說了一句，「我對安子文同志提出的某種名單發生過錯覺」，會上也沒有人追究這件事。

2月15日，在高崗座談會舉行的同一天，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的饒漱石問題座談會也開始舉行。鄧小平講話後，陳毅做了中心發言，

列舉饒在歷史上的一些錯誤。[119] 2月23日，饒漱石在座談會上做檢討。他又從歷史問題講起，着重檢討自己處理同陳毅的關係上犯了嚴重錯誤，「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態度也是不老實的」。進京工作後，又在組織部和安子文發生嚴重爭吵，對安「在三月間所提出的某種名單發生過錯覺」，但由於「當時又不便在組織部提出名單問題」，只能抓住安的個別缺點來鬥爭他。之後，又「沒有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勸告和制止，及時地停止爭吵，反而固執己見，一意孤行，並因在這個問題上少奇同志不支持我和一再制止着我，而公開……表示過對他的不滿」。[120]

饒漱石的話說得隱晦，出席會議的大多數人也不見得搞得清這裏的因果關係，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饒、高兩人雖然在中央會議上打過招呼、說過話，但不存在密室中的勾結和共謀。儘管如此，1954年3月1日，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向中央提交的饒漱石問題報告中，仍然指控他「和高崗共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121]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說穿了，饒漱石其實是被拉出來「陪綁」的。關鍵在於，從歷史上來看，饒在黨內地位的躥升，是在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並主管新四軍時開始的。正如他自己在檢查中特別提到的，「我和少奇同志的關係是大家都知道的」。[122] 然而，在安子文名單的處理上，他看走了眼，既得罪了毛，又衝撞了劉，結果他成了毛、劉之間做「交易」的犧牲品。毛要整饒，是以此抵銷「自己人」高崗遭到整肅的損失。劉把饒拋出來，絕不是僅僅因為饒衝撞了他，更要緊的是，這可以撇清自己同名單被擴散的關係，也可以相應地抵銷「倒高」在毛那裏產生的負面影響。

1955年1月，饒漱石在被「管教」後，又因全盤「翻供」並企圖「翻案」，罪加三等，被正式逮捕。這之後，他在關押中精神分裂，於1974年死於獄中。

高崗自殺及饒漱石入獄後，中共黨內又發生了同周恩來關係甚大的潘漢年－揚帆反革命案：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公安局長揚帆先後被捕入獄，這個案子又是事出蹊蹺。尤其是，從中共黨內上層政治的角度來看，就實際效果和影響而言，潘、揚受到整肅，在很大程度「平衡」乃至抵銷了周恩來在高崗事件中的「得分」。

潘漢年出事，似乎是由一樁偶發事件引起。但他「出事」後，應當怎麼定性並處理，卻大有文章在。此事的直接起因，是在宣佈高饒反黨聯盟的同一次會議上，一些據稱和高、饒有牽連的人作了自我批評，有人還交代了自己過去未交代過的問題。毛澤東對此表示肯定，又說高級幹部若有歷史問題未交代的，都應當主動交代；會上沒有來得及講或不能講的，還可以再想一想，寫成材料；尤其是裏通外國問題，都必須向黨交代，講清楚一律歡迎，繼續隱瞞罪加三等。[123] 潘漢年聽後，想到了自己心中存在了十多年的一個「秘密」：抗戰時期，他在上海從事情報活動時，通過關係和汪偽情報機構76號首腦李士群等建立了情報合作關係。1943年3月，他在事先未及請示的情況下，被李士群拉去見過汪精衛。事後，他猶豫之下，一時未向組織報告。後來，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截獲了潘和日、偽之間一系列「勾結」的情報後，抓住不放、大做文章，指控毛澤東和中共「賣國」。這一來，潘就更不好再講此事了。[124] 聽到毛報告後，潘又聯想到，當年曾陪他見汪的胡均鶴最近被捕，怕他會供出此事。4月1日，潘去了找陳毅，講出此事。陳聽後臉色大變，向毛澤東作了報告。對毛來說，潘的「自投羅網」來得正是時候。他在潘上交的材料上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125] 4月4日晚，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到潘下榻的北京飯店，宣佈對他逮捕，當作「內奸」審查。

潘漢年是曾為中共立下汗馬功勞的超級大特工，他當年去見汪精衛後未向上峰彙報，確實是一個大錯。但僅僅憑這麼一件事，無論如何也不至於會被當作「內奸」拿下的。更何況，毛澤東早先發過話，秘密戰線上的人「為獲取情報，完成任務可以使用一切反動面目的手段」，便宜行事。[126] 潘說出這件他瞞了十幾年的往事，又是因為毛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說，不管先前犯下多大的錯，只要講出來，即便不能既往不咎，至少也應該從寬處理。然而，毛卻罔顧事實，「霸王硬上弓」，從一開始就給潘扣上「內奸」的帽子，往死裏整，這就極不正常了。

說穿了，毛澤東在潘漢年的事上大做文章，是衝着周恩來去的。歷史上，周、潘關係密切。從1930年代起，潘就是周麾下情報和統戰系統的幹將，在周領導下做過很多事情，用周自己的話來說：「我同潘漢年交往的歷史最長，關係最深。」[127] 毛把潘打成「長期隱藏的內奸」，實際上也是想給周裝上了一條尾巴。如果真如毛所指控，潘是「內奸」，那等於是說，

周掌控下的中共情報系統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已為敵方深度滲透，而周卻對此渾然不察。這簡直就是照着周臉上狠狠抽打的一記耳光。

周恩來沒有站出來為潘漢年說話。與其說他採取了一種「明哲保身」的態度，毋寧更準確地說，他在這件事情上實在是不好講話。這裏的關鍵在於，周雖然嘴上不說但心裏明白，在高饒事件中，毛澤東和劉少奇「折損」了各自麾下的一員「超級大將」。正好潘自己送上門來，毛拿這件事大做文章，也搞掉周的一員大將，是一點不奇怪的。

周恩來也不是等閒之人。他雖然沒有和毛澤東正面衝突，但還是有一些重要的動作。在周的權力網絡中，他作為中共情報系統「老大」的地位從來就是中心的一環，也是毛一直難以插手的「禁臠」。這首先是因為一些最高層級的情報線索都是直通周恩來，由他親自掌握的。潘漢年出事後，周馬上指示自己的辦公室副主任，也是中共情報系統頭目之一的羅青長，組織了一個小組，由羅任組長，周的秘書許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長狄飛任組員，把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和中央的來往文電和相關檔案翻了一遍。他們發現潘的所有活動，「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同時，根據中央為「秘密工作」定下的規矩，也是完全允許的。對潘的工作，「中央一直是肯定的」。[128]

1955年4月29日，顯然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他麾下的另一員大將、時任中調部副部長的李克農給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首先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提出潘案存在一系列明顯的漏洞和疑點。李強調，中央對於其特工人員打入敵偽組織及利用漢奸、叛徒、特務等從事情報工作都有明確指示，可以做。潘同日偽情治機構及李士群、胡均鶴等建立情報關係，都有正式報告並獲得批准。潘提供的大量情報，包括一些極為重要的戰略情報，對中共領導層決策極有幫助。潘曾參與或知道的中共秘密組織從未被破壞，機密也從未洩露。潘所參與創建的情報網絡也一直仍在活動，對此，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是知道的。[129] 李的報告送出後，再無下文，但周恩來的目的其實已經達到了。周這麼做，並不是為了給潘開脫（他知道這做不到），而是為了保護自己和自己對中共情報系統的掌控。李的報告有理有據，雖然未能為潘免罪，但至少堵上了毛繼續抓住這件事把文章做大、給周埋下一顆定時炸彈的口子。

潘漢年入獄後，延至1963年1月9日，才秘密開庭審判。周恩來對此事極為關心，對多少人和什麼人參加旁聽都有具體指示，還特別關照道，要對審判進行錄音，並為此專門從香港購買了錄音器材。[130] 其實，這場審判只是走過場，「上面」事先已傳話給潘，只要認罪，判刑後就可以釋放。果然，潘以「內奸」、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後，不到一個月就獲得假釋，並獲准與妻子董慧團聚，安置在京郊，偶爾甚至可以進城訪友。[131] 這應該是周恩來做的安排。

文革發生後，周恩來自身難保，潘漢年又被投入監獄，1975年被安置到湖南一個勞改農場，於1977年在憂鬱和對翻案的期盼與失望中去世，當時毛澤東、周恩來均已過世。直至1981年，潘漢年才獲得平反昭雪。[132]

隨着高崗自殺、饒漱石下獄，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開除高、饒的黨籍。中共領導人包括周恩來在內紛紛出面，將「高饒反黨聯盟」的垮台稱為黨的偉大勝利。

表面上看，劉少奇似乎是高崗事件的大贏家。隨着高的垮台，劉作為黨內二把手的地位獲得了鞏固。周恩來同劉一樣，似乎是另一位「大贏家」。高崗倒台後，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後一度形成的劉管黨務、周管政府、高崗管計劃的中央決策格局瓦解。周手上又集中起很大的行政權力，他在黨和國家決策層的發言權也達到了延安整風以來未曾有過的高度。但實際上，事情遠不是這麼簡單。

首先，高崗事件的過程和結局讓毛澤東很不舒服。這件事的發展及最後處理，讓毛看到了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在黨內的影響和勢力膨脹的現實。毛在權衡利弊之下決定，不在高崗問題上同劉、周等人對峙攤牌，而是以某種主動的姿態將高「拿下」。但以毛的性格來說，他對高崗事件如此收場是不會甘心的，總有一天要算這筆「帳」。

更要緊的是，高崗事件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打進了一個不易消除的「楔子」。毛不見得在這個時候就動了要「整劉」並最終打倒劉的念頭——這是後來又經過了很多事情之後才發生的。但恐怕在這裏，已經留下了毛、劉關係徹底破裂並導致文革發生的一個重要的伏筆。

同時，高崗事件也埋下了後來毛澤東一再敲打批判周恩來的一條重要線索。儘管周「打高」是在毛許可下做的，也幫助毛在高崗問題上「解了套」，但他也藉此恢復乃至加強了自己被削弱的行政權力。這一點，難道毛會看不明白？這恐怕加深了毛向來就有的、對周的某種不信任感。不過一兩年間，毛抓住「反冒進」拿周恩來開刀，其中固然包含着毛、周兩人在建設路線及理念上的差異。但是，若從黨內鬥爭來看，毛要抓住一件什麼事再狠狠地批一下周的念頭，是否在高饒事件發生時就已萌生了？

再從長遠來看，高饒事件在中共高層政治中留下的後遺症極大。除毛澤東以外的所有中共領導人(包括周恩來在內)當時恐怕都沒有想到的是，「高饒事件」打開了一隻可怕的潘多拉盒子。它開創了中共建政後黨內高層鬥爭的一個「先例」：在根據缺失的情況下，硬是指鹿為馬，把相互之間並沒有多少「密室」交集的高、饒打成「反黨聯盟」，又進一步把為中共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潘漢年也打成「內奸」。此例一開，後繼者不來也難。周恩來本人始終未像他的很多同僚那樣被「打倒」，但不管他是否願意，都會深深地捲入了每一次這樣的鬥爭，並一再成為被敲打及批判的對象。

八

1955年，隨着毛澤東「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確立，成為中國向社會主義全面過渡開始的一年，也是一個歷史轉折的起始點。但此時，周恩來恐怕還沒有意識到這一轉折的全部涵義，以及他將會捲入的一系列在這個時刻還無法預知的經歷。

1954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毛澤東親自出面歡迎他，周恩來和他密集會談後，解決了斯大林時期中蘇關係中的幾個遺留問題，如取消蘇聯在新疆的勢力範圍、歸還旅順港等等。這之後，隨着從蘇聯的大規模技術引進進入新階段，中蘇同盟關係的發展也進入了黃金時期。

毛澤東出於自己「繼續革命」的理念，以及解決工業化巨大資金來源的需要，從這一年起，在全國農村大力推進集體化運動，建立起國家對農民持續及超額汲取的機制。這是加快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然組成部分，也是為已經搭上急行列車的工業化進程創造內部資本積累的必要、

乃至唯一的途徑。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周恩來介入了「統購統銷」的推出和實行。

早在1953年夏全國財經會議期間，周恩來就曾致電陳雲，就糧食問題向他求教：自1951年起，糧食購銷已由中央統一集中管理，但「自去年下半年，由於疏忽，加以今年部分地區發生災荒，致糧食緊張」。周請陳雲「提出意見，以便中央通盤考慮作出決定」。對此事，陳雲已有考慮。早在1952年初，他就曾提出此後幾年內「我國糧食將不是寬裕的」，「因此徵購糧食是必要的」。接到周電報後，陳回電建議，「繼續維持原來中央統籌統支的辦法不予改變」。[133] 周接受了陳的建議，沒有馬上採取激烈行動。

然而，由於糧食自由市場仍然存在，國家對糧食購銷無法有效控制。1953年夏季三個月，國家收進糧食98億斤，銷售糧食124億斤，缺口很大。[134] 陳雲權衡利弊後又向周恩來提出：只有在農村搞徵購、在城市搞配給，才能解決問題。[135] 周馬上表示大力支持。10月1日晚，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當面聽取陳關於實行糧食統一徵購和配售的彙報後，當即表示贊同。第二天，毛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此事。陳彙報後，毛、周都贊成陳關於實行統購統銷的報告。毛說，實行「糧食徵購、整頓私商、統一管理勢在必行」，即便會引起農民、市民和外國輿論不滿，也還是要做。[136] 會議決定，在全國農村搞糧食計劃徵購，在城市按人頭搞糧食定量配給。這是中共建政後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影響巨大。它實質上是由國家出面，利用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強行對農民「超額汲取」，以此創造國家工業化過程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國內資金來源。同時，這個制度也在社會組織和控制上，從人們的基本生計着手，把每一個人都和國家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有了統購統銷，才能夠在中國產生世界上最厲害、控制最嚴密的戶口制度。

在統購統銷醞釀過程中，1953年9月間，周恩來主持召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為在黨內外進一步宣揚及推進過渡時期總路線鳴鑼開道。不料，會上發生了毛澤東和梁漱溟之間「對峙」、當面相爭的一幕。

梁漱溟曾任民主同盟秘書長，屬於「黨外民主人士」，也是中共的重要統戰對象。他長期投身鄉村建設，覺得自己對農村問題及農民的疾苦

有發言權。中共建政後，毛也就鄉村問題多次和他交談，兩人看上去關係和睦。政協會議開幕後，9月8日，周恩來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梁漱溟在分組討論時發言，對周的報告講了幾句好話後說，要及時發現工作中的問題，黨和政府也要耐心聽取老百姓的意見，解決問題。[137] 會後，周請梁在大會上講一講自己的看法，梁同意了。

9月11日下午，梁漱溟經仔細準備後發言時說，周恩來的報告中只講了「建設重工和改造私營工商業兩方面」，他還希望聽到「像輕工業、交通運輸等等如何相應發展」的計劃。接着，他話鋒一轉，講到「農村問題和鄉村問題」。他說：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城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又說：「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138]

梁漱溟說的都是大實話，周恩來當時沒有反駁。其實，梁的很多話，尤其是發展重工業不能以輕工業和農業為代價，周應該是同意的——兩年多後，周自己在「反冒進」時就說過類似的話。可是，梁的話惹惱了毛澤東。第二天，毛在會上即席發言，批評「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毛還宣稱：「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139]

梁漱溟聽後，知道毛澤東是在批他，心中很不服氣，又自恃與毛是「老朋友」了，一再試圖與毛理論，言語間一再與毛發生衝突。周恩來沒有插話，但毛澤東發飆了，還給梁漱溟扣上了「反對總路線」的大帽子，這就把周逼進了「死角」。這時，正是毛在中共領導層內竭力為總路線「張目」的時候，毛對着梁說的這些話，也可以說是對着周說的，沒有給周留下「和稀泥」的任何空間。9月17日，周恩來在政協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幾乎以蠻不講理的方式批判梁漱溟。他除了照着毛的調子硬說梁有「反對總路線的言論」外，還回溯歷史，引用梁在1949年寫的一篇〈敬告中國共產黨〉的文章，說梁一貫「反共、反人民」。梁站起來質問周，為什麼沒有印發他當時的另一篇〈敬告中國國民黨〉的文章，周未作答。當周說到梁想升官發財時，梁大怒，打斷周：「說我想升官發財？笑話，笑話，笑話！」[140]

周恩來發言時，毛澤東三次插話，指着梁漱溟說：「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你雖沒有以刀殺人，卻是以筆殺人的。」但又說，「對你的此屆政協委員不撤銷，而且下屆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些人受你欺騙。」[141] 梁還想為自己辯解，毛澤東宣佈會期延長一天，准許他明日發言。

第二天，梁漱溟發言不到十分鐘即被制止，整個會場上了響起一片對他的聲討，譴責他「反動透頂」。梁還想說話，並「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毛答道，「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會場上又是一片呼喊：「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台來！」[142] 發聲者中，除中共官員外，還有不少「民主人士」，其中也不乏後來被打成右派的黨外人士。他們看來並未意識到，如此剝奪梁講話的權利，以及如此容忍毛沒有「雅量」的行為，其實也為他們自己以後遭遇與梁相似、乃至更壞的命運，打開了大門。

梁漱溟堅持要把話講完，會議陷入僵局。最後，在周恩來主持下，經表決後多數人(但不包括毛)反對讓梁繼續講話，把他趕下台來，一場僵局和鬧劇就此結束。

周恩來從邀請梁漱溟講話到對他進行嚴厲批判，甚至從歷史上挖他的「反動」根子，不見得是出自他的本意和初衷，而是在當時情勢下，不能不跟着毛澤東的調子說話。但他這麼做時，其實已經開了又一個極壞的先河：在使用「批判的武器」時，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方式算歷史舊帳，給批判對象扣帽子、打棍子。這一套做法後來又被廣泛使用，到了文革中，更是達到無以復加、泛濫成災的地步。最大的一樁，是居然把劉少奇這個「老革命」也被打成了「叛徒、內奸、工賊」，其餘大大小小的類似冤案，又何止萬千！

如果說，梁漱溟受到嚴厲批判始於他涉及了敏感政治問題，又當面「衝撞」了毛澤東，周恩來是被「捲進去」的話，那麼胡風事件的發生和發展同周的關係要密切多了。

胡風事件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就發生的「思想改造」運動。正是從那裏開始，知識分子已開始被視為

「革命」的對象，需要不斷教育、敲打、改造。後來，又經過不斷發酵放大，終於引發出了胡風遭到批判，從思想問題變為政治問題，又變為「反革命罪」，最後竟鋃鐺入獄。從頭至尾，周恩來都是「當事人」之一。

周恩來和胡風的關係源遠流長。他應該比其他中共領導人更清楚地知道，胡風和魯迅關係密切，長期在政治上支持中共，交往較多者大多也是中共的同路人。早在重慶時期，周就和胡風過從甚密，以至於達到了胡風稱周為「父周」的地步。[143] 但在周眼裏，胡風只是一位重要的「統戰對象」，而不是同志。

中共建政後，周恩來和胡風的關係逐漸疏離。在胡風眼裏，周仍是導師和兄長。然而，周對於自己和胡風關係的看法是不一樣的。胡風雖然在政治上擁護中共，甚至將1949年的「解放」視為「時間的起點」，但他一直以為這同他所崇尚的「個性解放」是相通的。其實不然。

隨着中共對知識分子第一輪「思想改造」的展開，胡風同周揚等一批中共文藝官僚的關係日益緊張。早在1930年代，在左翼文人中，胡風就因獨立特行的性格而同講究「黨性」的周揚等人不睦。但到1950年初期，胡風不入中共文藝官僚們的法眼，卻源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部「紅色聖經」中提出的文藝的「階級性」、「黨性」以及這一說法在政治上的巨大「殺傷力」。在周揚等看來，胡風的思想「抹煞世界觀和階級立場的作用，把舊現實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實際上就是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文藝來代替無產階級的文藝」，必須批判。[144]

對此，周恩來只能表示支持。1952年7月，當周揚就「胡風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問題向周請示時，他同意周揚「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檢討步驟」，並指示道，「不要希望一次就得到大的結果」，而「必須認真地幫助他進行開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來一次，既然開始了，就要走向徹底」。周恩來多次收到胡風來信及約見的請求。7月27日，他一面表示「我正在忙碌中，一時尚無法接談」，一面又要胡風同周揚等接洽，對自己的「文藝思想和生活態度作一檢討，最好不過」。[145] 顯然，當時周還是把胡風之事當作「思想改造」問題來對待，需要批判並給予幫助。如果由周恩來掌管此事，依照他對知識分子的看法，胡風即便受到批判，應該是不會被打成「反革命」的。

但後來，毛澤東親自介入了此事，提出「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周恩來不講話了。再接下去，毛讀了胡風等人的通信和日記後，認定胡風他們這一幫人是「反黨小集團」，並指示公安部門介入，來審理「胡風反革命集團專案」。1955年5月起，《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分三批出版，毛親自為之作序，把胡風等稱為「以『文藝』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團」，並指控道：「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146] 5月16日，胡風被投入監獄，長期遭單獨監禁，延至1965年被判刑。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胡風的「父周」——卻徹底消失了。周當時沒有想到的是，由此釋放出的，是對知識分子以言論或以思想治罪、實行全面整肅乃至迫害的洪水猛獸。

文革後，胡風被釋放，繼而獲得平反。然而，二十年的牢獄生活已經摧毀了他身體、心智、乃至精神的健康。此時，周恩來自己在經歷了文革的巨大磨難後，也已經去世好幾年了。

回過頭去看，1953年至1955年是中共建政後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時期。隨着朝鮮戰爭結束，以及蘇聯對中國大規模經濟技術援助的展開，毛澤東覺得時機已到，可以「腰斬」新民主主義、加快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了。對此，周恩來和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中共其他一些領導人起初並不熱衷，並在言辭和行動上都表現了出來。毛澤東同時在路線上和組織上採取果斷行動，對他們連批帶拉，迫使他們在路線問題上就範。

這就是毛澤東在政治上厲害的地方。在他看來，綱舉目張，一旦使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旗幟成為中共領導層的共識，並把中共主流政治話語的制定權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那麼其他的事情就都好辦了。在這一層面的「戰略視野」上，毛澤東比劉少奇和周恩來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他知道，當這樣一個中央層面的決策舞台根據他的意圖搭建起來後，那麼不管劉少奇、周恩來或其他任何中共領導人會有怎樣的演出，也只能是這個由他搭建的舞台上的演員。

從表面上看，高饒事件、潘揚事件以及梁漱溟和胡風事件，相互之間似乎並沒有太大的聯繫，但它們其實都是毛澤東「繼續革命」宏大事業的

組成部分，是它在政治、社會、經濟、意識形態以及文化等諸方面的深刻涵義在這個轉折時期的反映。不過，高饒事件和潘揚、梁、胡事件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對高、饒的處理，是毛和劉少奇、周恩來等其他黨內大佬「談判」及做交易的結果，周在其中仍有很大的發言權。而後三個事件的一個共同點是，在問題的定性上，都是毛凌駕於事實、法律、邏輯、以及中央領導群體的意見和黨政體制之上，一個人說了算。在這幾件事上，周恩來明顯地持有和毛澤東不盡相同的看法，但他卻縱容了毛，有時甚至還成為毛的「幫兇」。對於毛澤東來說，要搞繼續革命，就離不開以這樣的形式搞鬥爭——不鬥、不這樣鬥是不行的。在此後的年月裏，毛的「繼續革命」將不斷地搞下去，各式各樣的鬥爭也將一路搞下去，不斷地吞噬着本應是革命兒女的人們，越來越殘酷，也越來越荒唐。發生於1953年至1955年的這幾個事件，還只是開了個頭。

對於周恩來來說，這兩年的經歷充滿了酸甜苦辣，絕不是幾句話可以概括或釐清的。他因為「管的太多」而被削權，又在新稅制改革上被毛澤東抓住把柄，受到了嚴厲批判。但在對高饒事件的處理中，他長袖善舞，通過幫助毛「解套」，又把很大的一部分權力拿了回來。然而，他還來不及高興，就又因為潘漢年「出事」而被打了一記悶棍。後來看，這其實只是此後二十年間發生在周恩來身上的種種故事的一個不祥的預兆。

第18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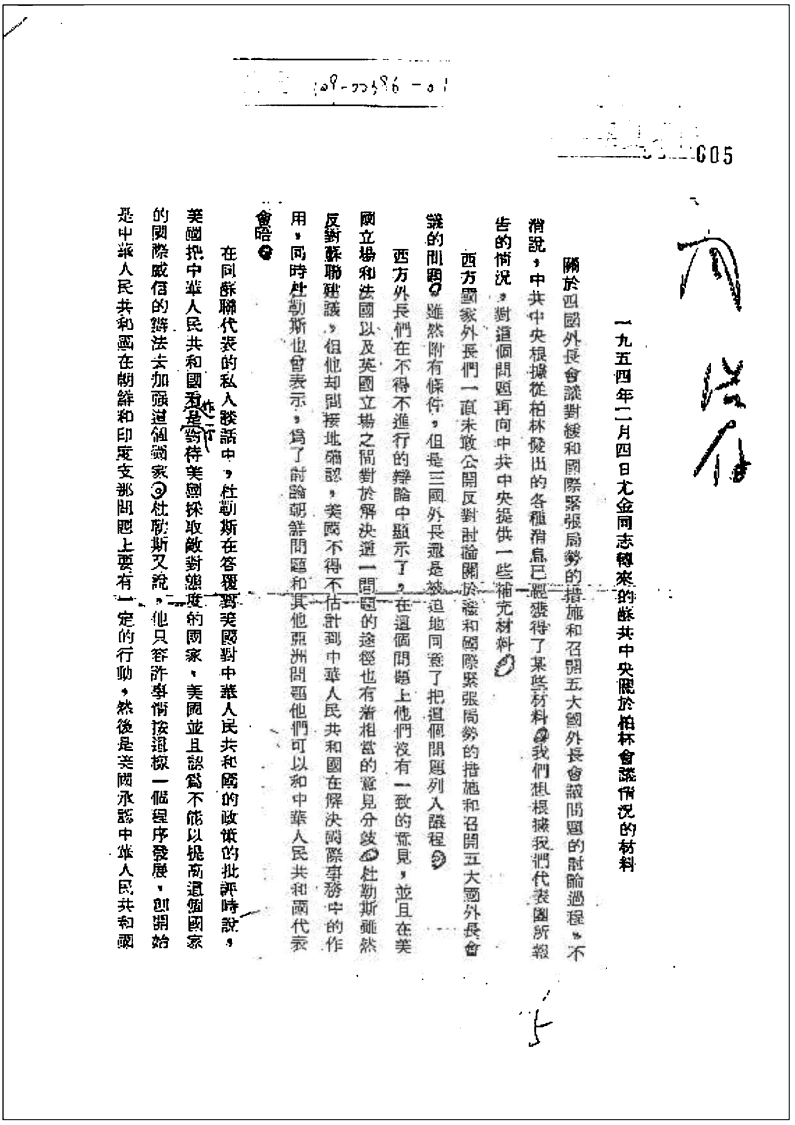
從日內瓦到萬隆
（1954–1955）

一

1954年2月中旬，北京還是春寒料峭的時節。周恩來收到了一個春風拂面般的報告：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在柏林會晤近一個月後宣佈，將在日內瓦召開一次以「解決朝鮮問題」和「在印度支那恢復和平」為目標的高層國際會議。除了這四國及其他「相關國家」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接到了與會邀請。[1]對周恩來來說，這是新中國在外交領域的一個巨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年來，一直被排除在重大國際活動之外，現在卻將以五大國之一的身分被邀請參加日內瓦會議。這是一個明白無誤的、強有力的信號：新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真的在國際舞台上崛起了。[2]

中國國內的經濟恢復與重建以及政治社會改造的推進，也使周恩來覺得新中國「走出去」的時機到來了。「前些年，我們說先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這是毛主席指示的方針」，周恩來在一次關於外交問題的內部談話中說，「當時各項社會改革還未進行，房子還未打掃乾淨，不請客是對的。現在經過初步整理，房子已基本上打掃乾淨了。因此，可以請一些客人來。事實證明，來往是有好處的。」[3]

周恩來馬上着手為參加日內瓦會議做準備。他雖然日理萬機，但還是從繁忙的日程中擠出大量時間，系統地閱讀了有關日內瓦會議的各種文件、報告和情報資料，尤其是仔細研讀了由莫斯科轉送來的美、蘇及其他大國之間的各種來往文件。[4]2月底，在周恩來的指導和親自參與下，外交



一九五四年二月四日尤金同志轉來的蘇共中央關於柏林會議情況的材料

關於四國外長會議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措施和召開五大國外長會議問題的討論過程，不消說，中共中央根據從柏林發出的各種消息已經獲得了某些材料。我們想根據我們代表團所報告的情況，對這個問題再向中共中央提供一些補充材料。

西方國家外長們一直未敢公開反對討論關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措施和召開五大國外長會議的問題。雖然附有條件，但是三國外長還是被迫地同意了把這個問題列入議程。

西方外長們在不得不進行的辯論中顯示了，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沒有一致的意見，並且在美國立場和法國以及英國立場之間對於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也有着相當的意見分歧。杜勒斯雖然反對蘇聯建議，但他却間接地確認，美國不得不估計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解決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同時杜勒斯也曾表示，爲了討論朝鮮問題和其他亞洲問題他們可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會晤。

在同蘇聯代表的私人談話中，杜勒斯在答覆對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的批評時說，美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作是對待美國採取敵對態度的國家。美國並且認爲不能以提高這個國家的國際威信的辦法去加强這個國家。杜勒斯又說，他只容許舉行按這樣一個程序發展，即開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上要有一定的行動，然後是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圖 18.1：尤金轉來蘇共中央關於柏林會議情況的材料，1954 年 2 月 4 日。
（109-00396-01，外交部檔案館）

部起草了〈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其中提出，北京要在日內瓦達到的首要目標是，打破美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封鎖、禁運、擴軍備戰的政策」，並在整個世界面前展現新中國的外交成就。為此，不僅「應該採取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也要「盡一切努力，務期達成某些協議」。在朝鮮問題上，由於美國的消極態度，要取得突破有相當的難度。但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美、英、法三國……的意見並非完全一致，有時矛盾很大，他們的內部困難也很多」。〈初步意見〉因而提出：

> 我們應該採取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並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在日內瓦會議上，即使美國將用一切力量來破壞各種有利於和平事業的協議的達成，我們仍應盡一切努力，務期達成某些可以獲得一致意見和解決辦法的協議，甚至是臨時性的或個別性的協議，以利於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道路。[5]

3月2日，中央書記處開會，批准了周恩來和外交部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上述計劃。[6]

朝鮮戰爭打了三年多，交戰雙方最後雖然達成了停戰協定，但它們之間的嚴重敵對卻依然如故，周恩來做出了朝鮮問題在日內瓦會議上無法獲得解決的預判，因而是毫不奇怪的；他對會議在印支問題上有可能突破的期盼，也是有道理的。1954年初，在由越共（1951年後改稱越南勞動黨）主導的越南獨立聯盟（越盟）領導下，印度支那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戰爭已經打了八年。1950年後，在朝鮮戰爭發生的同時，中國開始對越盟提供大量援助，幫助越盟整訓部隊，並向越南派出了軍事和政治顧問團。越盟的實力大增，在戰場上獲得了一系列勝利。相形之下，法國殖民者卻日益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窘境，既不想在一場看不到勝利前景的戰爭中消耗下去，又不情願就此便從越南和印度支那撤出。[7]對這一局面，周恩來洞若觀火。在中共領導層內，支援越南的事務一直由劉少奇主管，周一般不參與其中；但既然現在印支問題將成為日內瓦會議的主題之一，自然也成了周恩來的關注重點，他必須有充分的準備。

周恩來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和外長，也是中共領導人中曾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打過最多交道的人，他對日內瓦有着自己的想像和願

景。4月12日，他在同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中聯部副部長李初黎、駐越南總顧問羅貴波等談話時，特別提到了出席日內瓦會議對新中國「國際定位」變化的涵義。他說：

> 以前我們同馬歇爾的談判，那時我們還沒有奪取政權，那是唱「野柏子戲」，是無法無天，什麼也不怕的，鬧翻了也就是這麼回事。這次我們到日內瓦，是第一次參加正式的國際會議，是登國際舞台了，又是一個大國，你總要唱一點文戲吧，文戲中也有武戲，但總歸是一個正規戲，舞台戲，要同蘇聯、朝鮮、越南等兄弟代表團互相配合好，要有板有眼，我們一定要爭取有收穫而歸。[8]

周恩來因而強調，新中國在外交上要適應這個角色轉變而帶來的變化，其中實際上已包含着要讓外交開始同國際「接軌」的意涵。同樣的看法，周恩來後來在出席日內瓦會議期間還幾次重述，可見不管這一「角色轉變」在當時的條件下能做到什麼程度，他對於這個問題有多麼重視。[9]

毛澤東對日內瓦會議的看法和想像，和周恩來的這些意見有一致之處，但他的考慮更帶有「高瞻遠矚」和咄咄逼人的意味。在他的心目中，日內瓦會議除了國際上的重要意義外，更有着國內動員上的深刻涵義。新中國誕生之際，毛澤東作了「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宣示，這對於維護並加強新中國的正統性，以及促進毛澤東意欲推行的一系列政治與社會革命計劃的合法性，都有着舉足輕重的意義。1954年，中國正處於從新民主主義向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轉變的重要關頭，就在幾個月前，毛澤東明確提出，要把原定在10至15年內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準備，變為10至15年內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這是涉及新中國發展大戰略的一項重大轉變，其意義和影響非同小可。毛澤東當然會清楚地意識到，沒有什麼比向中國人民表明新政權已使得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得到空前提高，而更能夠促進他們對於新政權各項內外政策的支持和參與了。也可以說，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的表現，將會涉及到毛澤東在國內推行「繼續革命」的計劃會在多大程度上在黨的領導層形成共識，並獲得來自普遍中國人的心悅誠服的內在支持。在毛的心目中，這層意思從來就是擺在第一位的。

周恩來知道，要實現自己為出席日內瓦會議所設定的目標，就「要同蘇聯、朝鮮、越南等兄弟代表團互相配合好」，達成戰略部署上的協調一致。[10]這時，越南人民軍對集結在越南西北山區孤立據點奠邊府的法國軍隊實施合圍已達三個多月，正準備發動最後的總攻。從3月上旬到中旬，周恩來幾番致電胡志明以及在越盟總部工作的中國顧問羅貴波、韋國清等人，提醒越方應當將注意力也放到將在日內瓦展開的「國際鬥爭」上來。[11]周恩來提出，「為了爭取外交上的主動」，越盟部隊要爭取在戰場上打一個大勝仗，為此，中國將盡力向越南方面提供軍事及其他各種支援。周恩來還提出一種設想：「如果要停戰，最好有一條比較固定的界限，能夠保持一塊比較完整的地區。……北緯十六度的問題，似可作為方案之一來考慮。」[12]3月下旬，胡志明和時任越南民主共和國副總理兼外長的范文同訪問北京。周恩來同他們會談時，特地提到了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經驗，重點則是在日內瓦會議上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包括考慮通過分區劃線來實現停戰。根據中方記錄，胡、范兩人都表示同意周恩來的意見。[13]

4月1日至12日，周恩來又同胡志明和范文同一道飛往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會晤，協調中蘇越三方在日內瓦會議上的目標和策略。4月20日至23日，他又在從北京前往日內瓦的途中停留莫斯科，再次同蘇聯領導人會晤。他通過這兩輪會談發現，蘇聯方面也十分希望能夠通過談判解決印度支那問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告訴周恩來，儘管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肯定要竭力維護自己的利益，但日內瓦會議仍然可能在一兩個問題上達成協議。周恩來則表示，中方還沒有參加過像日內瓦會議這樣的重大國際會議的經驗，因而要聽取蘇聯方面的意見。雙方都認為，即便美國方面試圖破壞會議，但只要共產黨方面做到有理有節，會議仍有可能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突破並達成協議。[14]

二

4月26日，日內瓦會議開始舉行。不出周恩來之所料，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幾乎馬上就陷入了僵局，他因而敏銳地感覺到，應當馬上將注意力轉向印度支那問題。會議開幕後僅僅三天，他就在給北京的一封電報

中報告說，會議在朝鮮問題上已「形成敷衍局面」，而在印度支那問題上還有希望。他注意到，法國外長皮杜爾「急於要商談印度支那問題」，除「已與莫洛托夫接觸」外，「並表示願經蘇方與我見面」。他因而認為，「關於印度支那問題有提早討論的可能」。[15]

周恩來的眼光也投到了英國人身上。4月30日，在莫洛托夫的安排下，周恩來同英國外相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在莫洛托夫的別墅「非正式」會晤，這是他首次同西方大國的領導人舉行面對面的會談。期間，艾登詢問道，中國是否願意說服越南方面，在釋放傷病戰俘的問題上提供幫助，周恩來當即表示，「此問題最好由交戰雙方直接談」，應該是很容易解決的。他在談話中還發現，英國人和法國人一樣，對印度支那問題比對朝鮮問題更為重視，這讓他看到了機會。談話中，他似乎在不經意間向艾登發出了訪華邀請：「艾登先生應該去中國一次。」[16]

日內瓦會議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討論，於5月8日正式開始。就在前一天，受困奠邊府的法國軍隊宣佈向越盟部隊投降。越南方面在會前同中、蘇的商討中，曾同意通過將越南暫時劃分為兩個集結區域的方法來結束軍事衝突，但在奠邊府大捷後，他們的想法變了，覺得應該使對方做出更大的讓步。越方出席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團團長范文同宣佈，要在印度支那實現全面停戰，應當由越盟建立對越南大部分地區的實際控制。此外，他還提出，整個印度支那問題應當一攬子地解決，包括承認老撾和柬埔寨的「抵抗力量」(儘管范文同一再否認，這其實是來自越南的「志願軍」)的「恰當的權利和地位」。[17]

周恩來後來承認，他來到日內瓦之前，缺乏對於印度支那各國歷史和國內具體情況的全面了解，不清楚「印支是由三個國家組成的，……三個國家是否能成為聯邦國家，也不一定。因此，本身是複雜的」。[18]同時，他對鞏固中越之間的團結以及支援越南革命也甚為重視。因此，日內瓦會議初期，他和蘇聯方面都曾對越盟方面把越老柬三國視為一體、一攬子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立場表示支持。然而，通過他在會議上的親身經歷，尤其是同老撾和柬埔寨王國政府與會代表的接觸和談話，他的看法逐漸發生了變化。之後，他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研究老撾和柬埔寨的具體情況，因而了解到它們和越南存在着很大差別，「印度支那三個成員國的民



圖18.2：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1954年4月。（Historic Collection / Alamy Stock Photo）

族和國家的界限是非常顯明而嚴格的。這種界限在法國建立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以前就已經存在，而且在三國人民當中也是如此看待的」。在老撾和柬埔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還十分弱小，相比較之下，「柬埔寨、老撾兩個王國政府在大多數人民看來仍然是合法的政府，並且是被世界三十多個國家承認的政府」。周恩來承認，「過去我們在國內沒有看得這樣嚴重。……這次在日內瓦會議的接觸中，我們才懂得問題不是那樣簡單，必須嚴格地以三個國家來對待」。[19]

周恩來意識到，要在印度支那實現停火，越盟方面就必須做出適當的讓步。6月初，周恩來同出席會議的蘇聯領導人莫洛托夫會晤時商定，對中蘇越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的戰略做出了調整，其要點是越南交戰雙方在印度支那全境停火的基礎之上，劃定各自軍隊在南北方的集結地區，並將停火分界線盡可能向南劃定；在老撾和柬埔寨，「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從前曾有志願軍幫助高棉、寮國人民作戰」，通過「在高、寮問題上的讓步，爭取在越南劃區問題上求得補償」。[20] 周恩來還專門找范文同談話，提出「就

地停火」方案對越方其實並不見得有利。相比較之下，通過將越南暫時分為南北兩部分實現停火，將使得越盟控制下的地區連成一片，停火也容易實現。對此，「范文同完全同意」。[21]

6月15日，日內瓦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結束，各方未能達成任何協議。周恩來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壓力，擔心關於印度支那的談判也可能會以失敗告終。在這個關頭，法國議會將一貫在印度支那主戰的總理約瑟夫·拉尼埃(Joseph Laniel)趕下了台，接任總理的是長期以來對印度支那戰爭持批判態度的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他立下軍令狀，若不能在7月20日前在印度支那達成停戰協議，就辭去總理一職。在周恩來看來，這既是一種挑戰，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要是抓住了，就會對印度支那問題的和平解決起到促進作用。[22]

同一天，周恩來同莫洛托夫和范文同再次舉行會議。他開門見山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要讓會談擺脫僵局，越盟方面必須做出讓步，首先要「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從前曾有志願軍幫助高棉、寮國人民作戰」。如果一味採取不妥協態度，會議就難以取得成果，越南共產黨人也會失去通過談判和平解決整個印度支那問題的良機。下面的路該怎麼走？周恩來建議在從老撾和柬埔寨撤出所有外國軍事人員(包括越南「志願人員」)的問題上採取更為靈活的新政策，以己方在老撾和柬埔寨的讓步，換取對方在越南劃線問題上的妥協，並在雙方劃定各自軍隊在南北方的集結地區時，將停火分界線盡可能向南劃定。莫洛托夫事先已同周恩來交換過意見，因而立即對周的建議表示堅決支持。儘管范文同可能仍對此持有不同看法，但日內瓦會議正處於成敗的關鍵時刻，又面臨着周恩來和莫洛托夫立場一致的壓力，他對周恩來的看法「表示同意」。[23]

周恩來又馬不停蹄地就新方案向英法兩國代表吹風。6月16日中午12時30分，周恩來會見了英國外相艾登。會談伊始，周恩來就表示，他對於日內瓦會議未能在朝鮮問題上達成協議感到極為沮喪。隨後，他話鋒一轉，談起了印度支那問題。他告訴艾登，如果美國不在老撾和柬埔寨保持軍事基地的話，中國便願意承認兩國王國政府，並幫助說服越盟從兩國撤出所有軍事支援人員。[24]下午3時30分，周恩來在日內瓦座無虛席的會場

裏，介紹了關於在印度支那實現停火的新方案，其中包括所有外國武裝力量將撤出老撾和柬埔寨。[25]

第二天，孟戴斯－弗朗斯正式出任法國總理。周恩來馬上約見剛剛從巴黎趕回日內瓦的皮杜爾，除了重複已對艾登說過的話以外，他還特地告訴皮杜爾，中國願意看到老撾和柬埔寨繼續成為法蘭西聯邦成員。皮杜爾回應道，要爭取讓軍事會議獲得好的結果。[26]

周恩來的努力，同英法兩國希望不讓會議陷於失敗的態度是合拍的。6月19日，雙方就下一步的軍事會談達成了協議，從而為在老撾和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的談判打開了大門。[27]這之後，會議宣佈休會三週，讓各方有時間為下一階段的會談作好準備。這一來，周恩來可以騰出手來，對中、蘇、越在會議最後關鍵時刻的戰略和對策加以協調。

周恩來的最大關切，正如他在6月19日給北京的一封電報中所說，是必須說服越南同志做出必要的讓步，才有可能在日內瓦會議上達成協議。他認為，如果越南方面要想在日內瓦獲得好的結果，他們就不能不「正視現實」，「應以越南為爭取重點而在高、寮可以酌情讓步」。如果越南方面的方案依然「顯不出重點」並不肯讓步，「這就很難談下去，且與國際形勢和長遠利益顯然不合」。鑒於形勢複雜，時間又相當緊迫，「只憑電報的往返……不易取得一致」，周恩來因而向中央提議，利用日內瓦會議休會的機會，回國「到廣西南寧（後改為柳州）一行」，與胡志明、武元甲等越南領導人當面商討，以便統一思想和戰略。[28]他還報告道，自己已就這一點同莫洛托夫和范文同達成了協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立即批准了周恩來的建議。[29]

周恩來也沒有忘記，孟戴斯－弗朗斯是另一位關鍵人物。他在6月19日致北京的電報中提出：「孟戴斯－弗朗斯雖然主張印度支那停戰，但他不是真正左派，他是以和平口號來團結資產階級各黨派的多數。」周感到孟戴斯－弗朗斯「還是具有搖擺性」，但同時指出他「與皮杜爾不同」，因為他已經做出了若不能在印度支那達成停戰便會下台的保證，因此「目前我策略重心應放在鼓勵法國的積極性上，要使法國不完全聽美國的話，使英國對停戰也表示贊同，只要條件合理就應迅速達成停戰」。[30]6月23日，周恩來趕往瑞士城市伯爾尼，在法國使館同孟戴斯－弗朗斯會面。一見面，周恩來就對法國總理說，他年青時曾經在法國生活過，因而對於法國

人民懷有友好的感情，也希望法國的國際聲譽能夠提高。他接着強調，中國絕對希望印度支那問題能夠獲得和平解決，並因而堅決反對美國對印度支那的軍事干涉或使得印度支那問題國際化。在回應孟戴斯－弗朗斯的要求時，周恩來表示，他一定會試圖說服越盟方面通過談判來達成停戰。[31]

同時，周恩來還在準備回國前的百忙之中擠出時間，分別於6月20日和21日同柬埔寨代表團團長狄普芬（Tep Phan）和老撾代表團團長薩納尼空（Phoui Sananikone）舉行會談。周恩來以極為誠懇的態度向他們保證，中國將尊重柬埔寨王國和老撾王國的主權和獨立，並希望它們能夠像印度、印尼和緬甸那樣，在本地區成為沒有外國軍事基地的「新型國家」。他還鼓勵柬埔寨和老撾同越盟建立直接的聯繫，並表示願意為此提供幫助。[32]

三

在日內瓦會議已處於成敗的緊要關頭，周恩來深知，要使會議能夠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獲得突破，同越南領導人在廣西的會談已成為頭等大事。他太希望會談能夠取得成功，為此他必須說服胡志明和其他越南領導人聽從中國和蘇聯的意見，在日內瓦會議上採取靈活以及適時妥協的立場，不然這次會議作為新中國（也是周恩來本人）的外交亮相，就難免無功而返。當周恩來到達柳州時，他做好了充分準備，決心一定不讓這樣的事發生。

7月3日上午，周恩來同胡志明等越南領導人的會談開始。周恩來開門見山，要求越方介紹戰場上的實際態勢以及雙方力量對比的情況。武元甲做了詳細的軍事形勢報告，表示法國侵略軍雖在奠邊府遭受重創，但還遠遠沒有被打敗，並又向印度支那派出了增援部隊，敵軍的總數已達到47萬左右。相形之下，越盟部隊的總數在30萬上下。此外，河內、西貢、順化、峴港等主要城市也仍然掌握在敵軍手中。他承認，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還沒有發生基本的轉變。

周恩來問：「如果美國不干涉，在法國照樣增加兵力的情況下，我們多久能夠取得印度支那？」武元甲答：「兩三年都不一定能打下來，可能要打三至五年。」[33] 中國派駐越南的軍事總顧問韋國清也參加了會議，武元甲發言後，他做了補充發言，表示同意武元甲的判斷。[34]

輪到周恩來發言了。從7月3日晚上起，他講了兩天，從印度支那的軍事局勢和日內瓦談判之間的關係談起，講了六個問題：「（一）目前形勢和任務；（二）和戰問題；（三）越、（高）棉、寮三國的和平解決方案；（四）談判問題——包括方針、程序、時間和監察問題；（五）越南勞動黨今後的政策和策略及應注意的傾向；（六）今後工作佈置的問題。」發言的重點，則集中到美國軍事干預的危險性上來。他強調，印度支那戰爭已經國際化，其程度甚至超過了朝鮮戰爭。在朝鮮，由於蘇聯和美國都希望使戰爭保持局部化，「雙方陷入僵局」，朝鮮戰爭才沒有繼續擴大。可是，印度支那戰爭不僅牽涉到印度支那三國，也影響到了整個東南亞，甚至歐洲和全世界。隨後，周恩來話鋒一轉，大談美國對印度支那進行軍事干預的危險性。由於「帝國主義國家十分害怕中國革命影響的擴大，它們因而絕對不會允許越南革命取得完全的勝利」。因此，在日內瓦會議上，「如果我們要求過多，印度支那達不成和平，美國一定進行干涉」。而「如果戰爭國際化，對我不利。我們將沒有迴旋餘地，後方、側面都受到威脅」。周恩來的結論是：「制止美國干涉是中心的問題」，否則「在軍事上我們將取不到越南」。他提出，中越蘇在日內瓦會議上要「孤立美國，打破其計劃，否則就中了美國之計」。接着，周恩來陳述了在印度支那達成和平的四項基本條件：「（1）同時停火。（2）劃區，以16度線為界，萬一不成，可考慮以9號公路為界。（3）不運進新的武器彈藥……。（4）不得建立任何軍事基地。」鑒於老撾和柬埔寨的情況與越南不同，應在它們不參加任何侵略集團和軍事聯盟的基礎上，使它們成為「自由、民主、獨立」的「東南亞型的國家」。周恩來還反覆強調，中共「用和平團結老撾和柬埔寨」的做法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任務」以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之間「沒有矛盾」；出於同樣的道理，中共通過和平方法來分化帝國主義國家並「取得全越南」的做法，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任務」之間也「沒有矛盾」。[35]

周恩來的話對越南方面、尤其是對胡志明影響甚大。會議將屆尾聲時，胡志明感謝周恩來「不僅在日內瓦奮鬥，而且來此報告，講的很透徹」，也表示同意周的意見。他還保證，將會根據周恩來的意見調整越南方面的目標和戰略，因為「現在越南是站在十字路口，可能和，也可能戰，主要方向是爭取和，準備戰」。[36]

會議結束時，周恩來的目的可以說完全達到了。中越雙方就下一階段在日內瓦會議上的戰略達成共識，將爭取在16度線劃線停火，但必要時也準備接受17度線為停戰線；在老撾和柬埔寨，則接受建立非共產黨政府的政治解決方案。[37]

胡志明言而有信。7月5日，越南勞動黨中央發出指示(即「七五指示」)，贊同通過暫時將越南劃分為兩個區域來實現停火的新戰略，待法國軍隊撤出印度支那後實現國家統一。七五指示着重指出，為了避免美國直接軍事干涉的危險，全黨應當為通過日內瓦會議實現印度支那問題的和平解決做好準備。[38] 從這一基調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周恩來和胡志明在柳州所達成協議的影響。

7月6日，周恩來回到了北京。當晚，他向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和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做了關於柳州會議的簡報。[39]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舉行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百多人參加的擴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發言，介紹日內瓦會議及柳州會談的情況。他說，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採取的方針是聯合法國、英國、東南亞國家和印度支那三國，即「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國際力量，孤立美國，限制和破壞美國擴大世界霸權的計劃」。他表示，從日內瓦已經取得的進展來看，印度支那問題是可能解決的。毛澤東表示，「周恩來同志的報告很好，我們應當同意他講的這些方針」。毛還指示，要在日內瓦繼續抓住「和平這個口號」，孤立美國。[40] 會議批准了周恩來的報告和中國代表團的方針。

7月9日上午，周恩來從北京飛莫斯科。第二天，他同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等蘇聯領導人舉行了會談。他們同意，「目前應提出公平、合理的，為法國政府所能接受的條件，迅速達成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協議，爭取迅速停戰」。為此，「條件力求簡單、明確，以排除美國的干擾破壞，使協議易於達成；而不要求複雜繁瑣，以免討論費時，節外生枝，拖延談判，致貽誤時機」。[41]

7月12日下午，周恩來從莫斯科飛往日內瓦。當晚7時，他就同莫洛托夫會面，通報了中越領導人在柳州舉行會議的情況。兩人在討論中，着重探討了如不能在16度線上達成協議怎麼辦的問題。周恩來說，這個問

題「在柳州時已與胡志明同志談過」，「可以9號公路為界」。莫洛托夫表示贊同，認為應以此為目標爭取實現解決印度支那問題。於是，中蘇雙方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兩位最主要的人物，在會議最後階段所應採取戰略及其實行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42]

就在這個當口，周恩來發現范文同並沒有按照越南黨中央的「七五指示」行事，仍然在日內瓦會場上持不妥協的態度。周恩來立即意識到，必須同范文同單獨交談，敦促他改變態度，否則會議有可能歸於失敗。7月12日晚，周恩來約見范文同，兩人進行了長談，直到13日凌晨。周恩來單刀直入地告訴范文同，越方的「七五指示」不僅根據中越雙方在柳州會議上的決定，也是中、蘇、越三黨領導人的共識。美國在印度支那進行軍事干預的危險性，就像美國在朝鮮曾做過的那樣嚴重，也是迫在眉睫的。如果一定「用戰爭的方式取得全越（南）」的話，「實際上，美國的干涉是最終不能避免的」。為了阻止美國干涉，中蘇越這一方「要主動、積極、迅速地進行談判活動和解決問題，要使問題簡單化，避免使問題複雜化，要以法方為主要對象，提出的條件要考慮對方接受的可能性，…… 不使孟戴斯－弗朗斯下台」。周恩來還強調說：法國撤軍後，整個越南就都是你們的了。范文同感受到了周恩來的壓力，更無法抵擋周恩來的邏輯，最後他讓步了。[43]

周恩來沒有睡多少覺。7月13日上午10時30分，他已在同孟戴斯－弗朗斯握手見面。他告訴這位法國總理，共產黨這一方希望將停火線定在16度線，但也願意做出必要和適當的妥協。他強調：「現在（雙方）的共同點是比較多的，問題應該可以解決。」[44] 11時45分，周恩來又會見了艾登。他對英國外相說，中越兩方在印度支那實現和平上意見一致。法國倘若在劃線上再向前一步，「越南方面是願意以更多的讓步來迎接法國的讓步的」。[45]

周恩來說話算話。在會議的最後階段，孟戴斯－弗朗斯堅持要把停戰線設在17度線，並表示這是他讓步的底線，不然他就只有辭職。周恩來在莫洛托夫的支持下作出決定，將共產黨方面在16度線設立停戰線的條件改到17度線，以滿足法國方面的要求。最後，日內瓦會議終於在7月21日凌晨在印度支那問題上達成協議並簽字。[46] 當天下午，孟戴斯－弗朗斯

向周恩來辭行，周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記述了他們的一段對話：「孟問我停戰協定沒有按時簽字他是否應該辭職，我說主要的事都已辦了，這點小事不算什麼，他說莫洛托夫和我都和他們總統的意見一樣即不應辭職。他帶笑說等他在（法國）議會上報告時他就說『周恩來總理不要我辭職』。」[47] 周恩來後來在外交部的一次全體會議上總結自己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心得時強調：「我們反對姑息。中國有一句老話，所謂『姑息養奸』，姑息會使戰爭販子更加猖狂。姑息和妥協是不同的。譬如說，……在印度支那統一從高棉、寮國撤出，在越南同意在十七度分界，這是妥協，而不是姑息。」[48]

四

周恩來準備出席日內瓦會議前就曾設想，會議將為新中國提供一個更為廣大的與外部世界接觸並聯繫的舞台，他因而提出：

> 我們除朝鮮和越南問題外，還必須準備其他有關中國、遠東及亞洲的和平與安全等問題的材料與意見。尤其是發展各國間的經濟關係和貿易交通來往，更為緩和國際緊張關係、打破美帝封鎖禁運的有效步驟。在會議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關係也會觸及，我們亦應有所準備。[49]

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在把工作重心放在有關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外交談判上的同時，又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在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貿易和其他關係上花費了不少心思。在他率領的中國代表團的二百多名成員中，有一大批是外貿官員。就在周恩來本人集中精力處理高層外交談判的同時，在他的指導下，在日內瓦會議的聚光燈之外，這些外貿官員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尤其是同英國人，舉行了一系列的「私下會晤」。中方負責這些活動的是外貿部第一副部長雷任民，從5月初起，雷同英國駐華代辦杜威廉（Humphrey Trevelyan）和英國工業協會海外代表泰倫脫（Peter Tennant）接連會晤，探討「兩國發展貿易關係」的相關問題。[50] 5月下旬，雷任民會見了英國的兩位「前排議員」：工黨的英國前外貿大臣威爾遜（Harold Wilson），以及保守黨議員羅布遜．布朗

（Robson Brown）。5月30日，周恩來親自會見了這兩位英國來客。威爾遜建議，英中兩國應當分別在對方首都建立貿易辦公室。周當即答覆，這個建議「我們將加以考慮」。[51] 6月1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建議，「為推進中英關係」，中方應「利用威爾遜及羅布遜．布朗的建議向英方正式提出在倫敦設立常設商務代表機構的問題，此機構應享有完全的外交權力和地位，如同蘇聯早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務代表機構一樣，實際上是一個外交機構」。[52] 同一天，周恩來再次會見艾登。兩人同意，中英兩國將分別在北京和倫敦設立領事級的代辦處；[53] 兩天後，中共中央批准了周的建議。[54] 此後，中英雙方的討論進展迅速。6月17日，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宣佈在對方首都建立代辦處。6月下旬到7月中旬，中國的一個貿易代表團到英國訪問，達成了在兩國之間進一步發展貿易關係的一系列協議。在周恩來看來，這不僅表明「中國和英國之間貿易和外交關係的改善」，也進一步「孤立了美國」以及「擴展了我們在日內瓦會議上取得的成就」。[55]

即便對美國，周恩來也表現出了靈活的態度。毫無疑問，當時的美國是新中國的主要敵國，兩國高度敵對，但他並不拒絕在日內瓦同美國人打交道，甚至把會議視為開闢並保持同華盛頓的聯絡通道的機會。他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印象極壞，但這並不是因為人們所傳說的杜勒斯拒絕在會上和他握手，而是在他看來，杜勒斯的態度強硬，對新中國極為敵視。相形之下，他對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的印象要好得多，並相應地在外交場合對他以禮相待。「美帝國主義分子也不是鐵板一塊，不能一概而論的」，他告訴助手們。[56]

1954年5月19日，英國駐華代辦杜威廉和宦鄉會晤時表示，他願意以「私人身分」為解決中美平民回國問題從中斡旋，宦鄉表示會「請示後答覆」。[57] 周恩來聽取彙報後，馬上意識到其中所包含的機會，決定作出積極反應。5月26日，中國代表團發言人黃華表示，中美雙方應「直接就此問題進行接觸」。6月3日，周恩來在給中央的電報中分析道，「看來美國政府和美國代表團內部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矛盾的」，中方「應再等候一段時期，如美方果真來談，我們按既定方針和他們接觸並以接觸情況決定在何處舉行談判。…… 如美方確實不願與我方接觸，則我們即擬發表聲明，說

明我方懲處犯法美僑保護守法美僑的一貫政策和實際情況，同時揭露和駁斥美方扣留我留學生的無理行徑」。[58]

6月4日，這件事有了重大進展。杜威廉在會見宦鄉時通報道，美方已同意就僑民回國問題同中方談判，並希望杜威廉也參加。美方將以駐捷克大使約翰遜（Ural Alexis Johnson）為代表，希望中方相應地以王炳南大使為代表，並希望會談從第二天便開始。[59] 周恩來當即接受杜威廉的提議。當天下午，宦鄉和杜維廉再次會晤時，雙方同意「明天上午就進行初步接觸」。[60]

從6月5日起，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王炳南和約翰遜在日內瓦舉行了四次領事級會談。雙方主要就各自滯留對方國家的平民回國問題展開磋商。當時，會談雖未能取得實質性的突破，但畢竟由此而打開了中美之間的聯絡通道。7月21日，即日內瓦會議結束之時，雙方同意將通過各自駐日內瓦的總領事館繼續就本國僑民及留學生回國的問題保持接觸。[61] 這也為中美之間在一年多後開始舉行大使級會談打開了一扇門戶。

1954年7月下旬，當周恩來離開日內瓦時，他達到了中方參加會議的幾乎全部目標。他本人在重大國際會議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可謂十分成功。由越盟控制的越南北方，將成為中國和資本主義世界在東南亞的緩衝地帶；中國和諸如法國、英國等西方國家之間新的對話和交流渠道的開通，有助於打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上的孤立處境；而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也意味着它在近現代歷史上，第一次被國際社會（不管是友人還是敵人）承認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所有這一切，又為毛澤東「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宣示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背書」，並轉而為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在國內展開更為廣泛和深入的政治動員和社會改造，提供了新的動力和資源。

五

然而，日內瓦會議剛剛結束，周恩來的興奮和歡悅很快便被一個突如其來的插曲「攪黃」了。會後，他並沒有馬上回國，而是訪問了幾個東歐

社會主義國家，以加強新中國同它們的關係。7月下旬，他正在波蘭訪問時，收到了北京的一封來電，其內容很難不讓他感到困惑和吃驚。這封由毛澤東簽發的電報提出：「中央最近研究了日內瓦會議後的形勢，認為在朝鮮和印度支那停戰後，美國不會甘心於日內瓦會議的失敗，必將繼續執行其製造國際緊張局勢、進一步從英法手中奪得更多的勢力範圍、擴大軍事基地、準備戰爭和敵視我國的政策。」電報接着轉向台灣問題：「現在我們面前仍然存在一個戰爭，即對台灣蔣介石匪幫的戰爭，現在我們面前仍然存在一個任務，即解放台灣的任務。」電報接着以頗為嚴肅的語氣提出：

> 在朝鮮停戰之後，我們沒有及時（約遲了半年時間）地向全國人民提出這個任務，沒有及時地根據這個任務在軍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傳方面採取必要的措施和進行有效的工作，這是不妥當的。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提出這個任務，……那我們將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62]

周恩來的名字在電報中未被提及，但這個電報畢竟是發給他的。其中，關於朝鮮停戰後沒有及時提出解放台灣的任務是不妥當的批評，顯然也將日內瓦會議包括在內。這種批評對周恩來卻是不公平的。[63] 他後來在北京有關外交問題的一次報告中曾為自己辯解說，他「在日內瓦會議的第一次發言中就已提到了台灣問題」，只是「那時不被人們注意」而已。[64] 問題在於，這其實也是時勢使然。若是周恩來試圖在日內瓦會議上以「被人們注意」的方式提出台灣問題，勢必會喧賓奪主，使得會議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討論複雜化，那還有可能達成協議嗎？更何況，電報的基調同周恩來在會議上着力展示新中國在外交上的靈活及理性態度的努力，也顯得何其不協調。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後，卻從毛澤東那裏收到了這樣一封隱含着嚴厲批評的電報，他如何還能興奮下去？

毛澤東在日內瓦會議剛剛結束之際，便以這種明顯「好鬥」的方式提出「解放台灣」的問題，並斷定美國將繼續執行「準備戰爭和敵視我國的政策」，透露出他對於冷戰格局及國際關係的一些基本判斷：不管國際上爭取緩和的呼聲有多高，他仍然深信，國際形勢緊張與對抗的本質並沒有改變。說到底，毛澤東在同意讓周恩來在日內瓦「同美國接觸」這件事上，內心其實仍有保留。幾年後，毛澤東在「反冒進」中批判周恩來時說，日

內瓦會議上同美國接觸，「這與自己一貫的想法不一致，看來還是原來的想法好，即堅持和美國鬥爭，不和美國政府發展關係」。[65] 同時，這裏應該還有着毛澤東一貫抓住國際情勢的變化促進國內動員上的考慮。這封電報中還有一段話，清楚地透露出了毛在這方面的想法：

> 提出這個任務（解放台灣）的作用，不僅在於擊破美蔣軍事條約，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警惕心，從而激發人民的熱情，以推動國家建設任務的完成。[66]

毛澤東要利用國際緊張局勢來達到國內持續動員（乃至超常動員）的意圖，可謂躍然紙上。

這份電報對周恩來突如其來的批評，恐怕還隱含着另一層意思。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促成印度支那和平的表現，除了使他獲得了巨大的國際聲譽外，也肯定會使得他在延安整風及之後在中共領導層遭受重挫的威望和地位，繼他在內戰及建國初期的傑出作為而有所恢復和加強後，獲得了進一步的提高。這是否會觸發毛澤東多少要「壓制」他一下的念頭？這樣一封以中央名義發給周恩來的電報，在他獲得日內瓦的巨大建樹後，居然不談他有功，反而指責他有錯，固然是不公平的。然而，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這是否正起到了給周恩來以某種「警示」的作用？我們在這裏可以洞悉的，是中共建政以後毛、周關係中將一再出現的一個極有意思、也極值得深思的現象：每當周恩來在國務或外交活動中有出色表現時，毛澤東總要在某個問題上找他的「茬」，或小或大地「敲打」、「修理」他一下。日內瓦會議後發生的這一幕，其實還只是此類情況中不算太大的一次。

毛澤東的電報絕不是一紙空文。就在周恩來收到電報之時，《人民日報》其實已於7月23日發表了一篇社論，其中宣佈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67] 這一來，台灣問題重新擺到國際政治對抗的大棋盤上，並成為1950年代中期中國政治及社會全面動員的一個強大的源泉。周恩來被劈頭蓋臉地澆了一盆冷水後，不敢怠慢，不僅做了自我批評，也立即採取行動。7月29日，他在莫斯科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會談時，就花費了大量時間，介紹中共要突出台灣問題的新政策；本來應當是會談中心的、關於日內瓦會議後繼續爭取國際局勢緩和的題目，反而被冷落了。[68]

隨着中共對台灣政策的改變，1954年夏秋之際，中共採取了一系列主動行動，隨之而來的是台海地區緊張局勢的迅速升級。為了顯示中共解放台灣的決心，中央軍委一面下令人民解放軍，準備對佔據浙江沿海島嶼、嚴重威脅出入上海港的海上航道的國民黨軍隊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包括進攻由兩萬國民黨軍隊駐守的大陳島等浙江沿海島嶼，一面下令解放軍駐福建前線部隊向由國民黨軍隊佔領的金門島進行炮擊。[69] 美國政府反應強烈，加緊同台灣進行了簽署「單純防禦性」條約的會談。[70] 為了對美台之間的談判予以阻嚇和報復，中國政府於11月宣佈，11名在朝鮮戰爭期間飛入中國東北地區進行偵察活動時被擊落被捕的美國空軍人員犯有間諜罪，被處以四年至無期徒刑。[71] 1954年12月5日，美國同國民黨政府簽署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國決策層關於如何處理台海危機的討論中，甚至考慮到了必要時以核武器作為應付危機升級的手段。[72] 當時中美之間形勢的緊張，由此可見一斑。

美台條約簽訂後，周恩來立即發表聲明予以強烈譴責，稱其為美國「對中國人民的一個嚴重的戰爭挑釁」。[73] 但與此同時，他並不願意看到中美之間走上直接衝突之路。1954年10月19日，他在同來訪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話時說：「我們對台灣採取行動是內政問題，而美國採取行動是干涉我國內政。」但他又表示，「我們決不主動挑釁，……我們採取任何行動，都會特別注意」。[74] 美台條約簽訂後，周在提出強烈抗議的同時，又對來訪的緬甸總理吳努表示，美台條約使得「戰爭危險增加」。但「如果美國政府願意緩和緊張局勢，從台灣、澎湖和台灣海峽撤走它的一切武裝力量，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中美兩國之間不僅可以和平共處，還可以友好交往」。他同意，吳努可以在「回國後演講時引用我的談話」。[75]

1955年1月，為打通並保證中國浙江沿海交通線，中共領導層又採取行動，搶在美國國會正式批准美台條約之前，由解放軍於1月中旬攻佔了浙江沿海大陳島外圍的一江山島。面對台海地區具有潛在爆炸性的危機局勢，美國決策者全面權衡了軍事捲入的利弊和美方對「共同防禦條約」所承擔的義務之後，提出了要求國民黨主動放棄距離台灣較遠的大陳島的建議。[76] 與此同時，解放軍推遲了對大陳島的進攻。從2月5日起，兩萬多國民黨軍隊搭乘美國軍艦從大陳島撤退，同時將近兩萬名大陳島居民一併

遷往台灣。此後，解放軍進佔已經無人駐防的大陳島，1954至1955年台海危機逐漸告一段落。

上述中共對台灣的「大動干戈」的政策和舉動，同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的所作所為形成了尖銳的反差。這裏所反映出來的，其實不僅是周恩來本人這一段的曲折經歷，也透露出了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戰略及政策層面所面臨的悖論乃至某種困局：既要像周恩來在日內瓦所做的那樣，竭力為新中國追求並塑造一種「和平形象」，但同時又要根據毛澤東的設想，像「引爆」台海危機的做法那樣，堅持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革命國家」身分，奉行自建政以來一貫推行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外交政策。何以如此？說到底，這兩者之間的差別也許並不像看上去那麼大。關鍵仍然在於國內，在於毛澤東試圖不斷創造或發掘持久不衰的群眾動員（尤其是超常動員）的資源的需要。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則中國對外政策行為中上述似乎相互矛盾的兩方面，其實是有着深刻的內在聯繫的：它們在中共對外政策的實踐和表述中，提供了「軟」、「硬」兩方面的手段，相輔相成，同中國人特有的「受害者心態」形成呼應，從而起到引發深植於普通中國人心中的愛國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情緒，從而在更為深入的層次加強並鞏固毛及中國共產黨國家及其「動員群眾」努力的合法性。

六

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周恩來固然在台灣問題上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但當時，在將中國對外政策中「軟」、「硬」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方面以嫻熟老到的手法連接起來這一點上，在中共領導層內還實在找不到能夠出周恩來之右者。1955年春天，台灣海峽的槍炮聲剛剛沉寂下來，周恩來已在為中國和世界上的另一件大事奔忙了：他將要出席另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1955年4月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國家首腦會議。

如果說日內瓦會議是周恩來在國際舞台上的初次亮相的話，那麼亞非會議則為他提供了再次處於國際外交聚焦鏡下的重大機會。關於召開這次會議的想法，又可以追溯到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的經歷。1954年4、5月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緬甸、錫蘭、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等國領導人舉

行會晤，商討是否有可能舉行一次亞非各國首腦會議。當這個想法開始付諸行動時，一些國家在是否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會的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周恩來得知此事後，立即便意識到在非西方國家中擴大新中國的影響是一件極為重要的大事，毛在這一點上完全同意周的看法。他們知道，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又有着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以及近代以來受到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的經歷，只要新中國能夠參加這次會議，就必定為世人矚目，並在會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從而產生巨大的國際和國內的影響和效應。新中國因而必須參加這次會議。[77]

6月下旬，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從瑞士飛回北京的途中，分別在印度和緬甸停留，同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緬甸總理吳努會晤。他在給北京的一封電報中，談到了這次順途訪問的意圖和設想：「此次訪印主要目的，在締造某種形式的亞洲和平公約做準備工作，以打擊美國進行組織東南亞侵略集團的陰謀，並從而推動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復。」[78]

周恩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停留了兩天。這是周恩來和尼赫魯第一次見面。當時，他們相互之間似乎都留下很好的印象。尼赫魯說，周是一個可以交朋友的人。周也說，尼赫魯對新中國極為友好。只是到幾年後，中印之間關係惡化後，周恩來才回顧說，他第一次見到尼赫魯，就覺得他過於傲慢，心中也因此隱隱感到不安。[79]

周恩來在同尼赫魯的會談中，除了討論了印度支那的情勢之外，還討論了在東亞和南亞建立「和平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問題。周恩來對此表示贊同，並表示儘管中印兩國之間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但兩國有着相近的歷史背景和同屬於東方文化的共同點，同時兩國在近代也受到了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的壓迫和剝削。因此，中印兩國完全能夠將雙邊關係建立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之上。周恩來還特別強調說，中印兩國之間的這種關係，將能夠為其他亞洲國家之間關係建立「一個範例」。為了使得尼赫魯相信中國尋求「和平共處」是出於真誠的動機，周恩來還強調，儘管他相信革命的必要性，但他同時也認為革命是不能從一個國家輸出到另一個國家的。「如果人民贊成一種制度，反對也是無效的。如果人民不贊成一種制度，勉強強加是一定要失敗的。」[80] 周恩來訪印結束時，他和尼赫魯發表了中印聯合聲明，其中提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五項原則，不僅應當成為所有國家處理相互關係的基本準則，也應當成為整體國際關係的基礎。[81] 訪問印度後，周恩來又訪問了緬甸，同吳努總理舉行兩次會談後，發表了類似的聲明。[82] 印度和緬甸都表示，堅決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亞非會議。

通過周恩來上述活動而形成的，是中國對外關係中後來被稱之為「萬隆精神」的一個基礎文本，周是文本最主要的作者之一。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中印和中緬聯合聲明的最為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們提出了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中不同於為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所制訂並主導的一套新的規範和準則。在北京的相關陳述中，新中國是這些新原則的倡導者的「事實」，加強了新中國關於自己應當在國際關係的發展中居於中心地位的立場。新中國仍然是一個「革命國家」，但與此同時，周恩來又希望通過對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新中國對於現存國際體系和體制的挑戰也會獲得更大的合法性和普世性。而對周恩來來說，這同他在日內瓦進行的外交活動緊密聯繫在一起，又超越了他在日內瓦的外交活動。通過五項原則的提出，周本人——以及他的「新中國」——便能夠更為理直氣壯地向世界宣佈，新中國在處理國際衝突時是具有理性的國際關係行為者，同時它向現存國際體系和體制的挑戰也是有道理的。

1954年10月和12月，尼赫魯和吳努先後訪問中國，與毛澤東和周恩來舉行了一系列會談。毛同他們的談話海闊天空，涉及甚廣，其中東方人要「有團結起來的感情，有保衛自己的感情」，是一個毛着重講述的題目。[83] 周恩來同他們談話中的重要話題之一，是亞非國家團結起來的重要性。周恩來告訴他們，他一定會出席亞非國家首腦會議。尼赫魯和吳努則都向周表示，他們堅決支持中國參加亞非會議，並希望中國在會上發揮重要作用。[84]

周恩來和尼赫魯會晤時，涉及到了中印兩國之間的疆界問題，但未深談。這個話題是尼赫魯在兩人講到緬甸時引出的：

> 尼：緬甸方面又問，為什麼中國出版的地圖把緬甸的一部分，甚至印度的一部分，都劃在中國以內。固然，這些地圖都是老地圖，但是中國政府為什麼不澄清這一點呢？……

周：地圖問題，這也是一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不錯，中國出版的都是舊地圖，因為我們還沒有進行勘察，也沒有同有關國家商量，不會自行修改疆界。否則，人民會認為我們連國民黨都不如，雖然國民黨倒是亂劃疆的。我們不僅同印度和緬甸，而且同蘇聯、蒙古等國都有未定的疆界，如果把我們的地圖同這些國家的地圖對一下，都會有出入的。……吳努總理建議討論這個問題，他說過去國民黨政府、北洋政府、滿清政府都不談這個問題。我們同意討論這個問題，但是要求一些時間，以便準備。

尼：閣下提到地圖問題，就印度而論，我們的疆界是很清楚的，現在我們就是按此疆界進行管理的。我向閣下談到這個緬甸方面提出的問題，是因為它可以成為我們的敵人手中的一個把柄。我想閣下一定會懂得，如果印度出版一個地圖，沒有把西藏劃為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也會反對的，誤會和疑慮也會由此產生。[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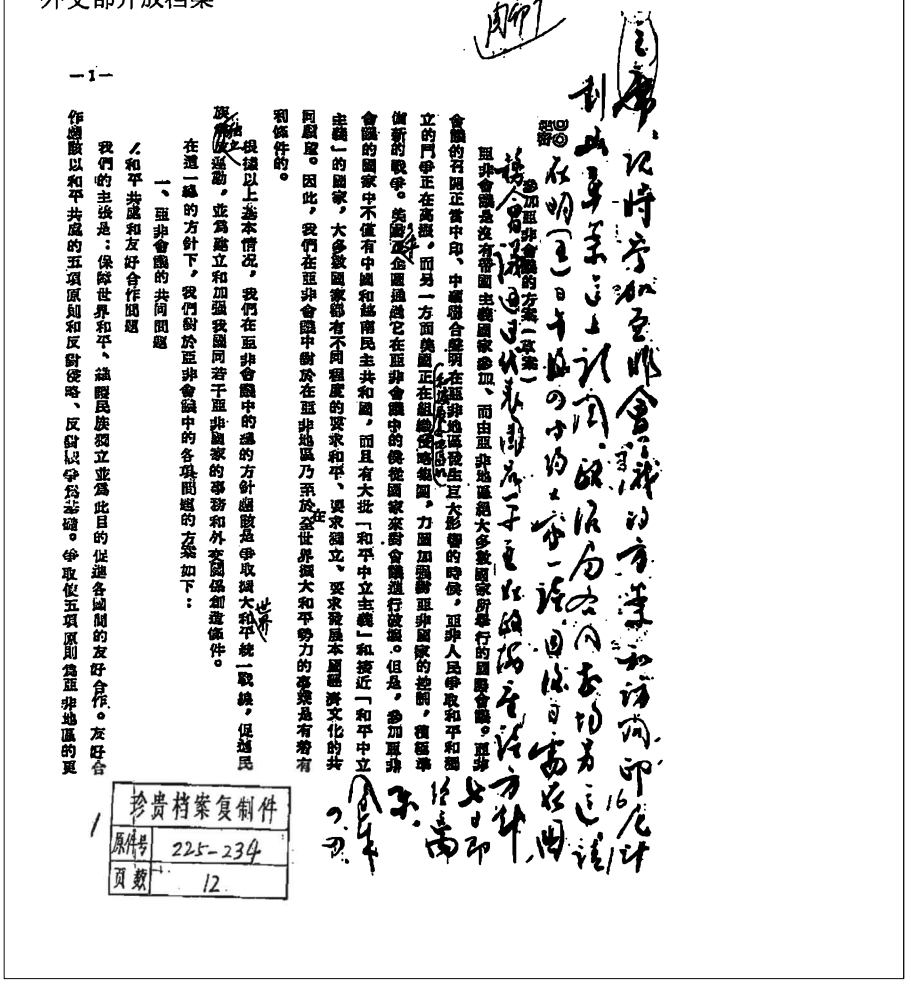
這番對話之後，周恩來和尼赫魯的談話轉向別的話題。但從兩人的這一番交談中，已透露出中、印之間在邊界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周認為，兩國間存在「未定的疆界」，而尼赫魯則斷言，「我們的疆界是很清楚的」。周恩來對這段和尼赫魯的對話極為重視，他後來在試圖解決中國和緬甸及印度之間的邊界問題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親自對清朝和民國時期的各種「舊地圖」檢視比較，然後先從緬甸着手，試圖在成功確定了中緬邊界後，再以此為「模板」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

但無論如何，兩位領導人當時恐怕都想不到，後來兩國竟然會在邊界問題上一直走到兵戎相見的地步，徹底動搖了中印友好的根基。

當中國出席亞非會議一事已成定局時，在北京方面，周恩來負責專門組成了一個班子，討論並制訂出席亞非會議的方案，周本人也直接參與了此事。他親自動筆，對方案草稿反覆修改。[86] 1955年4月初，《方案》最後定稿，其中將亞非會議界定為「沒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參加、而由亞非地區絕大多數國家所舉行的國際會議」。《方案》中的一些關鍵性提法，或出自周，或經他親筆修訂：亞非會議是在「中印、中緬聯合聲明在亞非地區發生巨大影響」，而「亞非人民爭取和平和獨立的鬥爭正在高漲」的情況下召開的。「參加亞非會議的國家中不僅有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而且有

外交部卅放档案

207-00004-01



珍贵档案复制件
原件号 225-234
页数 12

圖 18.3：周恩來親筆修訂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1955 年 4 月 4 日。
（207-00004-01，外交部檔案館）

大批『和平中立主義』和接近『和平中立主義』的國家」。《方案》因而認定，中國參加亞非會議本身「對於在亞非地區乃至於在全世界擴大和平勢力的事業是有着有利條件的」。《方案》因而將中國參加亞非會議的基本方針確定為：「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並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若干亞非國家的事務和外交關係創造條件。」[87] 在周恩來看來，中國出席亞非會議本身就是新中國外交的又一次重大勝利，在會上沒有必要發表任何激進的革命性聲明，尤其是「不討論共產主義問題」。要強調的，是中國和其他亞非國家在歷史文化和近代以來受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侵略的共同經歷，從而使會議獲得成功。[88]

在周恩來前往參加亞非會議的途中，他遇到了總理生涯中最為嚴重的、試圖暗殺他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台灣當局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現在亞非會議會場本身，便意味着北京在對外政策上獲得了一次重大的勝利。台灣情報機構因而動用了它在香港及亞洲其他地區的幾乎全部力量，製造了以謀殺周恩來、阻止中國代表團順利出席亞非會議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墜機事件。根據中國方面公佈的相關資料，這一事件由台灣軍事情報機構所策劃，由其特工人員及被收買的香港啟德機場工作人員，在周恩來原定將要包租乘坐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預植了炸彈。然而，中國情報機構預先截獲了「蔣特對我參加亞非會議代表團首長蓄意暗害」的情報，並判斷「如我首長經香港，他們將對所乘飛機作破壞準備」。[89] 周恩來沒有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而是決定改經緬甸飛往印尼。然而，中國代表團的一些工作人員和隨行記者卻仍然乘坐了這一航班，而儘管得到來自北京方面的警告，港英當局卻未能發現飛機已被預植了炸彈而採取有效行動予以阻止。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北婆羅洲附近海面上空爆炸後失事墜毀。周恩來躲過了這一場本來有可能成為整個冷戰時期最具有爆炸性的謀殺事件。[90]

然而，這一事件亦有疑點。尤其是，中方究竟是通過何種途徑獲得台灣方面要謀殺周恩來的情報的？（一個很大的可能是，周恩來動用了他「埋伏」在台灣頂層的高級特工。）那麼，周恩來為什麼在已知飛機面臨險情的情況下，只是改變了自己的行程，卻沒有制止克什米爾公主號起飛？

電檔

等級 特

發 廣州 批發 超千

外發卯 No. 557 No. 卯 No.

附註 已抄 外交 總理辦公廳

內容 注意蔣幫破壞 類

廣州外事組張告黃作梅同志並轉廣東省委（聯密）

據悉蔣特務我參加亞非會議代表團首長蓄意暗害，如我首長經香港，他們勝對所乘飛機作破壞準備。因此你們對自己行程時間要注意保密，對港段站和你們飛機也特別注意警惕，飛機起飛前能要加緊檢查油箱等可能被放置炸物地方加以檢查較妥。對此事應保持緘默，也不要通知人太多。你們抵印尼後即電我們以免掛念。

外交部
一九五五年四月九日

萬

4.50

195 . . .

圖 18.4：外交部給廣東省委關於「敵蓄意謀殺我出席亞非會議首長」的電報，1955 年 4 月 9 日。（207-00064-20，外交部檔案館）

對此，台灣方面曾長期存在着此事係「中共陰謀」的解釋，給人一種印象，似乎此事之所以發生，是台灣情報方面上了中共的當，使得中共得以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對英國及港英當局施加壓力，從而達到了極大地限制國民黨情治系統在香港活動的預定目的。沒有可靠證據支持台灣方面的指控。但在對克什米爾公主號後與港英當局的交涉中，周恩來和他的部屬們確實將此事可能帶來的「好處」用到了極致。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北京迫使英國政府在香港的管制上做出重大讓步，從而大大加強了此後中共在香港的地位、活動空間和影響力。同時，港英當局驅逐了部分在港的台灣特務，並向台灣方面發出警告，不得在港進行暗殺等破壞行動，否則將禁止在港所有親台勢力的活動。對此，國民黨當局為維護在港利益而不得不同意。1955年10月，港英總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Grantham）以私人身分訪問北京，周恩來和他舉行了歷時三小時的「非正式會談」。周一方面暗示，北京將會「容忍英國繼續管治香港」，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要為香港確定一系列「準則」，例如「英國不應促進香港走向民主或自治，外國勢力不能把香港用作軍事基地，國民黨的破壞活動應予以制止，中國官員的安全應獲得保護，中國的經濟利益不應受到阻礙等等」。[91] 1956年3月12日，英國駐華代辦處向中國外交部提交了一封照會，其中表示：

> 女王陛下政府無意讓香港被利用為對任何人進行敵對活動的基地……女王陛下政府願意說明：如果今後一旦認為香港的設備正被有意地加以濫用的話，香港政府有自由採取它認為必要的任何行動，來對付這種濫用行為。[92]

英國方面的這一表態和承諾，正是周恩來最希望看到的。

4月16日，周恩來到達印尼首都雅加達，第二天又飛往萬隆。他在會上活動的基調，早在會前便已確定。但在會議過程中，他又為活動加上了自己的個人魅力和色彩。他在闡述中國內外政策時，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任何激進或帶有革命色彩的語言。在私下談話裏，他一再強調中國不會向別國輸出革命。在公眾場合，他盡量避免同持不同看法者發生正面衝突，

顯示出自己願盡一切努力促使會議獲得成功的誠意。會議最後階段，周恩來宣佈，北京願意坐下來同華盛頓談判，以緩和「遠東地區的緊張局勢」並解決存在於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93] 然而，即便周一再努力，會場中仍然瀰漫着冷戰時期特有的緊張氣氛，一些親西方國家的代表也繼續或明或暗地對「共產黨中國的野心和侵略行徑」提出指責。

4月19日，是周恩來預定在萬隆會議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的日子，這是他在會上的一齣重頭戲。早在赴會前，他的講話稿經一再修改後完成，並獲得了毛澤東的批准，其中強調，亞非國家都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因而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尋求合作。[94] 但當周恩來來到萬隆後，他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一些親美及親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對於中國的動機和意圖有着深刻的懷疑。對周恩來來說，最令他感到憂慮乃至氣憤的是，他們不僅視新中國為一個有着擴張主義罪惡意圖的共產主義國家，而且還認為中國實際上是蘇聯的傀儡，完全沒有自己特定的認同或意願。[95] 周恩來擔心，這種局面若持續下去，將會破壞中國希望在會議上以及在廣大非西方世界發揮中心作用的前景——而這正是他本人及毛澤東希望通過出席會議達到的主要目標。

當時，他已經沒有時間向毛澤東報告並商量對策。他臨時決定，將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作為書面發言在會上散發，改為作一次更具有針對性的發言。他要突出表達的，是中國代表團在亞非國家之間「求同存異」的願望，從而使得非西方國家通過協調自己的聲音，在世界事務中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4月19日午後，他放棄了休息，親自口述，由秘書浦壽昌記錄，完成了一篇新的講話稿。[96]

當天下午，到了預定的時間，周恩來走上亞非會議的講壇，在座無虛席的會議大廳裏發表講話。「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周恩來以平和但堅定的語調宣佈。「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他問道。「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着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順着這一思路，他提出：「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他承認，「在亞非國家中是

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非兩洲興起了許多獨立國家，一類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一類是民族主義者領導的國家」。周認為，對這些差異沒有必要予以否認。他強調，重要的是「我們這兩類國家都是從殖民主義的統治下獨立起來的，並且還在繼續為完全獨立而奮鬥。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項原則完全可以成為在我們中間建立友好合作和親善睦鄰關係的基礎」。[97]

周恩來講話時，人們凝神傾聽。當他講完時，全場起立鼓掌，一種如釋重負與興奮喜悅交織的情緒，突然間迸發出來。[98]「他不打算改變別人的反共立場，但他改變了會議的方向」，當時在場的美國記者鮑大可（A. Doak Barnett）評論道。[99]

幾乎所有中國外交史研究者都認為，周恩來在萬隆會議的這番發言，是他本來便已極其成功的外交生涯中最為成功的聲明和表述之一。這番話為新中國外交中「萬隆話語」的形成，提供了一個「中心文本」。它首先是一篇關於新中國在一個變化中世界的自我定位的聲明。周恩來明確地將新中國規定為屬於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處於對立地位的廣大亞非國家的一員。從國際政治的意義上來說，講話本身是否使用激烈的革命語言其實是不重要的；關鍵在於，講話的語境和內容已經使它帶有不可磨滅的革命性——講話的中心意圖，便在於對於仍由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所控制的現存國際體系和體制提出挑戰，這同新中國自建國以來便具有的「革命國家」身分是完全一致的。此外，講話中是否還包含着另一層周恩來並未明示、但實際上卻值得注意的意思：當周恩來強調中國由於自身特殊的歷史經驗，而能夠同其他亞非國家在反對殖民主義的事業中「求同存異」的時候，他是否也從一種道義的制高點，對蘇聯在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統治時的中心地位提出了潛在的質疑？

當周恩來在1955年4月的那個下午放棄了小睡，而準備出了這篇講話稿時，他把「新中國」既是「革命國家」又在對外關係中不放棄靈活性的特徵，發揮得淋漓盡致，而這也是周恩來個人政治特質和政治智慧的寫照。周恩來出席萬隆會議的經歷，繼他在日內瓦亮相之後，成為他崛起為世界外交舞台巨人的又一個重要里程碑。

七

萬隆會議後，周恩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發展和亞非國家的關係上來，同時也更主動介入廣大非西方世界的各種國際問題。在他的督導下，有時也是在他的直接參與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同阿富汗、柬埔寨、錫蘭、埃及、幾內亞、伊拉克、敘利亞、蘇丹、也門等亞非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1956年10月，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周恩來馬上決定，以高姿態支持埃及總統納賽爾（Abdel Nasser）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的決定。[100] 他在會見埃及駐華大使哈桑．拉加卜（Hassan Ragab）時表示，「如果納賽爾總統和阿拉伯人民堅持鬥爭，勝利就一定是他們的」，並保證中國將盡力向埃及提供援助。[101] 11月10日，周恩來致電納賽爾，告知他中國將向埃及提供兩千萬瑞士法郎的外匯現款，以支持埃及的反帝鬥爭。[102]

與此同時，周恩來沒有忽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日內瓦會議後，他覺得應當充分利用會議期間打開的同英、法等西方國家的交往渠道，進一步發展同這些國家的關係。1954年秋，在他的親自安排下，已卸任英國首相職位、仍是工黨領袖的艾德禮（Clement Attlee）訪問了北京。周恩來在同艾德禮會面時說，「中國願意採取各種步驟促進中英之間的和平合作」。同時，他敦促英國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並「驅逐國民黨集團」，從而使得中英外交關係具備升格為大使級的條件。談話中，周有意避開了香港問題。[103] 後來，他在一次外交部幹部會議上解釋說：「不成熟的問題，也不要去談，例如香港問題。香港一百年前是中國的，香港的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大家也認為香港是中國的。至於我們是否要收復香港，如何收復，政府還沒有考慮過，我們就不要談。」[104]

周恩來極為重視的另一個國家是日本。1951年舊金山對日和約簽訂後，周恩來提出了嚴重抗議。但同時，他又抓住了日本民間希望發展同中國貿易的苗頭，指示出席1952年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南漢宸同與會的日本三位代表（參議員高良富、眾議員帆足計和宮腰喜助）接觸商談，並於1952年6月1日簽訂了中日之間的第一個民間貿易協定，

商定雙方將在1952年12月31日前完成「購入與售出金額各為3,000萬英鎊」的物資。[105] 由於當時朝鮮戰爭仍在進行，協定未獲有效執行。朝鮮戰爭結束後，日本參、眾兩院分別通過了要求政府緩和對華貿易限制、促進中日貿易的決議。周恩來立即抓住了這一變化，通過各種渠道向「日本朋友」傳話：「我們亦願意同日本回復和平關係，建立平等互利的貿易關係。」[106] 10月，日本國會議員促進中日貿易代表團訪華，在周恩來親自指導下，10月29日，中方與日本簽訂了第二個民間貿易協定。[107]

1954年12月，鳩山一郎接替吉田茂出任日本首相後，對改善中日關係表現出積極態度。1955年1月，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會長村田省藏以「個人身分」訪華，周恩來於1月23日下午和他舉行正式會談。村田表示，他訪華是為中日簽訂新的貿易協定鋪平道路，同時也對中國對日政策（例如是否會支持日共從事「顛覆政府」的活動、如何解釋中蘇條約以日本為假想敵等）提出各種問題。周恩來表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完全適用於中日關係」，儘管日本過去侵略了中國，但中國不會對日本報復，中日貿易關係應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發展，並為中日關係正常化開闢道路。[108] 萬隆會議確定召開時，鳩山一郎曾考慮親自與會，但後來又出於迴避會上的政治議題爭論，並突出經貿事務，改為由經濟產業大臣（經濟審議廳長官）高碕達之助率團與會。中方在會前準備時，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已把日本當作「重點工作對象」之一。4月18日會議開幕式前，周恩來提前半小時到達會場，與高碕達之助簡短交談，並約定另找合適的時間和場合會晤。4月22日上午7時40分至8時半，高碕達之助在廖承志陪同下秘密來到周的住所，會見周恩來和陳毅。周從自己旅日的經歷談起，講到他當年雖然不諳日文，但已能讀日本報紙，了解日本的政治動向。他又由此引申開去，講到中日兩國使用相似的文字，有着千年文化交往的歷史。他強調，兩國儘管政治制度不同，但仍應交流對話，發展經貿往來。[109] 5月4日，中日簽訂了第三個民間貿易協定，各自的出口總額為3,000萬英鎊。之後，雙方又發表聲明，特地說明此次簽訂的協定「在兩國政府的支持和協助下，將會順利地得到執行」。[110] 這之後，中日之間的經貿、文化及其他非官方領域的關係得到進一步擴展，中日「恢復邦交」的問題，也在周恩來同一系列日本來訪代表團的會談中提上了日程。[111]

檔(10) 207-00016-01 P4-5

電稿

抄 蘇歐司、國際司、第一亞洲司、第二亞洲司、歐非司、美澳司、情報司
領事司、禮賓司、人事司、總務司、研究室、條委會(傳專員以上)

等級加急 萬隆台來 卯№

外收№卯 942 類 195 5.4.23

附註 已抄 主席、少奇、恩來、朱德、陳雲、德懷、小平、陳毅
仲勳、尚昆、喬木、外交、粟裕、稼祥、克農、定一、中聯
軍聯、軍情、鄧拓、楊剛、冷西、外貿、中央機要局

每日紀要

外交部：

二十二日上午七時四〇分至八時半日本高崎來訪總理、陳副總理。上午八時半至九時和印尼舉行雙重國籍談判簽字儀式。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半，下午四時至七時代表團長繼續開會，並成立殖民主義附屬國問題起草委員會。下午一時總理請老撾代表團長及其代表三人吃午餐，有副總理等作陪。下午二時半總理參加上述起草委員會。晚七時我參加蘇丹舉行茶會。晚七時至九時總理請印度、緬甸、印尼、錫蘭、阿富汗、尼泊爾、敍利亞、泰國、菲律賓吃晚餐（印度、緬甸因事未到）我代表團代表、顧問參加作陪。晚九時半總理去參加沙特阿拉伯鷄尾酒會。晚十時二五分總理去尼赫魯處同印度、緬甸印度支那四國談印度支那問題。晚十一時請埃及代表團長納賽爾及其代表三人吃晚餐。陳副總理、葉部長、黃大使和我作陪。經濟、文化兩個小委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 46

圖 18.5：周恩來出席亞非會議每日紀要，1955 年 4 月 22 日。(207-00016-01，外交部檔案館)

當時，中美之間仍處於高度敵對，但周恩來覺得即便如此，進一步開拓同美國的對話並非全無可能。為此，1955年4月23日，他在萬隆會議上表示：

> 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112]

這一次，美國有了回應。7月13日，美國在通過英國給中方的回覆中建議，兩國派出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談。7月15日，周恩來接受了美方的建議，並任命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擔任中方的談判代表。[113]會談開始後，雙方首先要集中解決的是各自「滯留」在對方國家的平民（包括留學生）返回自己國家的問題。周恩來極希望會談能夠在這方面取得進展。根據他的指示，王炳南在會談的第一天「突然通知」美方代表約翰遜大使，中方決定釋放11名因從事「非法活動」而在中國被拘押的美方軍事人員。[114]9月10日，雙方宣佈，已就遣返各自國家滯留對方的平民達成協議。[115]

然而，這是北京和華盛頓在大使級會談中唯一達成的協議。除了雙方在台灣的地位、美台軍事條約、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等問題上所存在的尖銳分歧外，中美之間還存在一個「遺留問題」。在11名美方軍事人員被釋放後，仍有兩個美國人唐奈（Jack Downey）和費克圖（Richard Fecteau）因「間諜罪」而被繼續拘押。中方宣稱，他們是1952年10月侵入中國境內從事偵察情報活動，所乘飛機在吉林省山區被擊落後而遭到逮捕。1954年11月23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判處唐奈無期徒刑、費克圖20年徒刑，並於一週後在日內瓦通過中美領事談判通知美方。[116]但美國方面堅稱，唐奈和費克圖是聯合國軍的成員，屬於朝鮮戰爭中的戰俘。1955年初，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öld）訪問北京，當面向周恩來提出了釋放11名美軍人員及唐奈、費克圖的要求。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當即表示唐奈、費克圖兩人絕不能釋放，判處他們「在中國境內犯下的罪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應當按照中國的法律處理」，「聯合國根本無權過問」。[117]在那個時刻，周恐怕沒有想到二十年後，當中美關係

在1970年代初出現了好轉的跡象時，他又親自干預此事，使他們獲得釋放，以作為對美方示好的一個信號。

同一時期，周恩來參與了中共對台灣政策在表述層面的一系列重大調整，並一再代表中共領導層及中國政府向蔣及台灣當局發出通過談判「和平解放」台灣的呼籲。1955年7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118] 幾個月後，他又在另一場合重申，儘管中共仍將在必要時以武力解放台灣，但也願意考慮通過和平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119] 在放出上述一系列「觸角」後，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宣佈：「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120]

伴隨着這些「緩和」言辭而來的，是通過「幕後渠道」而做的各種相應的動作。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表中國願意坐下來同美國談判、和緩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的講話後，5月中旬，印度駐聯合國首席代表梅農專程來到北京，試圖為從緩和中美之間和存在於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斡旋。5月12日至20日，周恩來六次和梅農會談。他說，北京「願意和美、蔣談，但是這是兩個不同的談判，有聯繫，但是必須分開」。同蔣談，是因為「中國是不會放棄解放台灣的要求和行動的，並且會在我們認為有利的時機採取行動。因此戰爭的危機是存在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主張談」。同美國談，是因為遠東曾在朝鮮、印度支那、台灣有戰爭，「現在前兩個地方停了，但台灣卻更緊張」。所以，通過中美談判要解決的是「使美國放棄干涉，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一切武裝力量，從而使中國人民可以和平解放台灣」。[121] 周恩來試圖向蔣介石轉達信息的另一個渠道，是同國共雙方上層都有着複雜關係的香港自由媒體人曹聚仁。1956年10月7日，周恩來在北京同曹談話時，提出了中共領導層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一些新的基本設想。在「通過談判台灣歸還祖國後」，周說蔣介石的位置「總要在中央安排」，「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台灣「還是他們管」，可以由陳誠「做台灣地方長官」。周還提出，為了「為和談製造氣氛」，「我們現在已不公開

宣傳反蔣」。[122] 直到1958年，曹聚仁一直被中共領導人當作同台灣領導人接觸並傳遞信息的「中間人」。周恩來表示，「我們是有誠意的，我們可以等待」。[123]

然而，周恩來當時恐怕沒有想到的是，1958年，隨着大躍進狂潮的掀起，北京對台的「調和」政策會在一夜之間又被打斷。

第19章

從「反冒進」到反「反冒進」（1956–1958）

一

1956年是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多事之年」，也是周恩來政治生涯中很特殊的一年。[1]從年初起，國內外事件不斷，周恩來深深捲入其中，並對他政治生涯的走向影響頗大。

對於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來說，這一年政治日曆上最重要的一頁，是2月間在莫斯科翻開的。蘇共舉行了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蘇聯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釋放出「非斯大林化」的洶湧潮流。中共派出了以朱德和鄧小平為首的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大，但他們沒有被邀請參加赫魯曉夫發表秘密講話的關門會議。[2]事後，蘇方向中共代表團通報了赫魯曉夫的講話並將文本送交中方，但沒有馬上就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充分說明。[3]

幾十年來，在毛澤東、周恩來和所有中共領導人的眼裏，斯大林是國際共運的一面旗幟。現在，赫魯曉夫和蘇共領導層居然拿他「開刀」，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鄧小平等回到北京當天就向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等就蘇共二十大的情況做了彙報。[4]3月中旬至4月中旬，中央書記處在毛主持下，連續開會討論赫魯曉夫的報告及相關問題。周恩來幾乎出席了所有會議。對他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來說，最要緊的是毛對這件事怎麼看。在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就為赫魯曉夫報告定下了基調：赫魯曉夫的做法不僅「揭了蓋子」，也「捅了婁子」。[5]後來，中共領導人關於蘇共二十大以及

赫魯曉夫「非斯大林化」報告的討論，包括周恩來的發言，大體上都是根據毛定下的基調展開的。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報告，首先是大加稱讚。在他看來，報告打破了斯大林一貫正確的神話，有助於糾正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很多問題上的錯誤。毛說，抗日戰爭初期，斯大林錯誤支持了王明把統一戰線置於中共利益之上的右傾機會主義。抗戰結束後，他又不許中共同蔣介石堅決鬥爭，反而強迫中共與蔣介石談判。毛還說，自己於1949至1950年訪蘇時，斯大林對於同新中國簽訂同盟條約的態度曖昧。直到中國派兵入朝參戰後，斯大林才開始把中共視為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6] 毛講述的事情，每一樁都同周恩來有關。其中，抗戰初期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和王明意見相近，是他歷史上的一個「污點」。毛澤東沒有點周恩來的名，但卻等於在提醒周，他沒有忘記一筆筆歷史舊帳。

不過，毛澤東又說，他不同意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儘管斯大林犯有嚴重錯誤，但總體來看，他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評價他時要「三七開」，七分功三分過。[7] 但實際上，毛這麼批赫魯曉夫是有點吹毛求疵了。仔細讀赫魯曉夫的報告可以發現，他對斯大林也是有褒有貶，最壞是「四六開」，並沒有「全盤否定」。在這一點上，毛和赫魯曉夫只是程度和角度的不同，沒有本質的差異。

周恩來在會上多次發言，在對赫魯曉夫報告的評價上，基本上按照毛澤東的口徑說話。他以過來人的身分說，中共歷史上的許多錯誤其實「並不是我們決定的，而是蘇共決定的，或由蘇共主持的共產國際決定的」。他這麼說，既是檢討自己歷史上的錯誤，也是為自己做一點辯解。周恩來是主持外交的，在中共歷史上又一再直接同蘇聯乃至斯大林本人打交道。因此，他在發言中特別講到了「蘇聯大國主義」：「這個問題由來已久。我們搞外交工作時間不長，他們比我們長得很多，理應比較有經驗。但是，看來他們思想比較僵化，許多事情不講策略。」他還具體地評論道：「莫洛托夫很古板，只講鬥、鬥、鬥，對怎樣爭取大多數，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國，考慮不多。……他們把英、法、美這些國家都看作鐵板一塊，沒什麼矛盾可以利用。他們不講利用中間勢力，這也與斯大林過去的公式有關。斯大林一直認為中間派是孤立和打擊的對象，說它是最危險的。」[8]

4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長文，其中提出斯大林雖然犯有種種錯誤，卻仍是應予肯定的正面歷史人物。[9] 同一天，周恩來在駐外使節會議上做報告，系統講述了中央關於蘇共二十大及評價斯大林問題的看法。「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但也是一個犯了錯誤而不自覺的馬列主義者。」蘇共二十大「在國際問題上很成功，但對斯大林的批評並不那麼全面，揭開了蓋子，破除迷信是好的、是不容易的，但做法上有缺點」；但不管怎麼說，「蘇共中央搬開偶像是不容易的，已經移動了位置，便可向前發展，我們要大力支持他們」。[10] 周的發言，依然循着毛定下的路子展開。

二

1956年初，經歷了1955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高潮後，中國國內經濟發展一片熱火朝天。周恩來作為總理，卻已注意到經濟建設中機遇和挑戰並存、尤其是投資過熱的現象。在這一點上，他和毛澤東的視角和看法出現了分歧。

早在1953年，隨着中共領導層確立15年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目標，毛澤東躍躍欲試。他的觀念世界向來有着強烈的革命浪漫主義成分，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造，有着一種旁人無法企及的想像力和獨特的緊迫感。1955年，毛力推農業集體化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秋天，他在一次談話中說：「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一億多人口，我國有六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11] 這番話其實已經開了後來大躍進中「超英趕美」口號的先河。

周恩來和毛澤東一樣，對於要在中國搞社會主義是積極的，但是他是中國經濟建設的「大管家」，又向來都有着比毛更為務實的一面。1956年到來時，他看到的各種報告和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發展已出現了投資過多過快、攤子鋪得太大、資源嚴重浪費和緊張的情況。新年伊始，他就把「反對急躁冒進」、保持經濟平衡發展的問題提上了日程。1月20日，中央召開了一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在會上提出，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計劃，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

劃」。[12] 這應該是他第一次用「冒進」這個詞來描述國內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

就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發表了他建國後第二次關於知識分子的講話。在五年前的講話中，他講述的重點是知識分子對自身觀念世界改造的必要性。在這次講話中，他開宗明義就提出，「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以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知識分子中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成為我們國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13]

周恩來須臾不敢忘記的一件大事，是不能讓已在經濟發展中露頭的「冒進」趨勢擴散、蔓延開來。2月間，他又在同李富春、李先念等幾位副總理和主管部長談話及國務院開會時幾次提出：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亂加快，否則很危險。[14]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對周恩來的看法不以為然。也是在1月20日的中央知識分子會議上，毛提出：美國那點東西，一億鋼鐵，幾百個氫彈，不大算數，中國要超過它，第一步是接近它。[15] 4月下旬，毛、周兩人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生了自延安整風以來未曾有過的正面衝撞。毛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要加快發展，因此應在1955年的基礎上再追加20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周的腦子裏滿是經濟形勢中亮起的「紅燈」，當即提出異議。據參加會議的胡喬木後來回憶，周恩來在會上「發言最多」，一再提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但是，毛不為所動，不等周多說就宣佈散會。周馬上找到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毛聽到這句話後「非常生氣」，不久就離開北京去了南方。[16] 延安整風已經過去十多年了，但毛澤東在這一刻應該再次確認，周恩來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內化」的毛主義者。

但當時，周恩來並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他可能覺得，這只是他和毛澤東在屬於他主管的領域上意見分歧，而他也只不過是在履行國務院總理的職責。同時，這恐怕也同高饒事件後他面對毛時心態上的某種微妙變化有關，1950年代中期，是延安整風後周講話時最放得開的時候，但他其實已大大地冒犯了毛。對1956年4月政治局會議上的這一幕場景，毛澤東一直耿耿於懷，再沒有真正忘記過。

毛澤東去外地後，周恩來仍然循着自己的思路辦事。5月11日，他在國務院會議上說：「反保守、右傾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反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17]之後，他在中央開會討論1955年決算和1956年預算報告時提出：「在當前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着重全面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面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劉少奇聽了周的發言後在會上佈置，由中央宣傳部為《人民日報》起草一篇「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社論。[18]這以後，周依然抓住「反冒進」不放。6月1日，他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今年的計劃搞得不十分妥帖，國務院有責任。超過客觀經濟，結果不是窩工，就是粗製濫造；漲上去以後，收回來很費勁，我們一定要接受這個教訓。[19]

周恩來關於經濟建設的講話在中央領導層是有分量的，在毛澤東不在北京的情況下更是如此。6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討論周主持下制訂的1956年預算報告草案。周發言時，又着重介紹了上半年經濟建設中因「冒進」而產生的種種矛盾和不平衡問題，提出要繼續削減開支、壓縮基本建設經費。會議根據周的報告決定，既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制止急躁冒進，在綜合平衡中實現經濟建設的穩步發展。第二天，周在國務院傳達中央會議精神時說，昨天中央會議已經討論過，計劃和預算是統一的，預算數字一定要削減下來。明知原來的預算完不成，還要列出來，是沒有把實際情況告訴人民群眾。[20]6月10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6月4日中央會議的決定。會議指定胡喬木修改的預算報告中，在指導方針部分根據周的意見寫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只能招致損失。」[21]這些話把周恩來的意思完整地表達出來了。

毛澤東當時仍在外地，上面這幾個會他都沒有參加。不過，劉少奇佈置的那篇反冒進社論的草稿完成送審時，他已經回到了北京。劉少奇和周恩來等都在清樣上批示「同意」，毛卻批道：「不看了。」後來，他回憶這件事時說：那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罵我的，所以我不看。[22]儘管周恩來當時大概還渾然不覺，但毛澤東對於他搞「反冒進」的火氣和反感已經很大了。

6月2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這篇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的社論，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寫道：「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23] 這時，周的看法表面上已成為中央的決定，但實際上毛澤東內心深處根本沒有讓步。周促成中央作出的「反冒進」決定，不僅同毛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更使得他有一種大權開始旁落的危機感。當時，毛澤東忍下來了，但恐怕這時他已有心，一旦政治上時機成熟，就要拿「反冒進」開刀，也狠狠地敲打周恩來。

時至9月，北京已是金秋季節，中共從15日至27日舉行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共歷史上，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大會上的發言的側重點不盡相同。這是一個開得讓周心情舒暢、卻讓毛覺得不那麼舒服的大會。

毛澤東向來是有着天馬行空般想像力的理想主義者，他在大會上講話時，又發表了一些極富「毛色彩」、也極具鼓動性的言論，希望以某種一步登天的方式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其急迫感溢於言表。「美國只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國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應不應該趕上呢？完全應該。」毛還用極為煽情的語言說：

> 你六億人口幹什麼呢？在睡覺呀？……人家一億七千萬人口有一萬萬噸鋼，你六億人口不能搞它兩萬萬噸、三萬萬噸鋼呀？你趕不上，那你就沒有理由，那你就不那麼光榮，也就不那麼偉大。……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24]

周恩來在會上做了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基調與毛澤東很不一樣，他講成績巨大的同時，一再提到「工作中發生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以及必須從中汲取的經驗和教訓。他又一次提出，在制訂發展計劃時，

> 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在編制長期計劃的時候，應該按照我們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根本要求和國家物力、財力、人力的可能條件，實事求是地規定各項指標，同時，還應該保留一定的後備力量，使計劃比較可靠。[25]

八大上還發生了另外兩件大事。第一件，八大通過的黨章中，經毛澤東同意，把七大黨章中關於「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的提法拿掉了。鄧小平在會上做修改黨章報告時，講了一段很重要的話，明顯地表現出將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同「神化個人」及「個人崇拜」劃清界線的意圖，其中提出「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26] 第二件，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提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歸根結柢，「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27] 周恩來全程參與這兩件事，他和劉少奇及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樣，應該都是積極的支持者和推動者。

八大黨章去掉了毛澤東思想，毛雖然對此表示贊同，但內心深處並不真正樂見此事，只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沒有將其看法(尤其是對「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的看法)表露出來。八大表決通過關於「主要矛盾」的決議時，毛舉了手，但他對這個提法恐怕是有意見的。劉少奇在大會開幕當天做了政治報告後，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是在兩天後才開始由胡喬木、陳伯達分頭負責起草，其中政治部分是胡喬木負責的。[28] 那幾天毛澤東特別忙，很可能事先沒有時間仔細看過。[29] 黨史專家韓鋼認真研讀目前可以看到的檔案文獻後，還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細節：在報告決議已有「定稿」、毛批示「照此付印」後，是胡喬木在這一「定稿」上加上了包括「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句話，不知道這之後毛是否看過。[30] 據陳伯達回憶，報告在大會上付諸表決前，毛聽到這句話時就嚕了一句：「這句話不好」，恰好被坐在毛後面的葉飛聽見了，又告訴了旁邊的

陳伯達。[31] 幾天後，在國慶活動時，毛澤東在天安門上突然對劉少奇說，八大關於中國國內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劉大吃一驚，問道：「決議已通過公佈了，怎麼辦？」毛沒有再說下去。[32] 這樣看來，毛雖然覺得這個提法有問題，但畢竟報告已經通過了，而他自己一時之間也還沒有想出一種替代性的「恰當的提法」。[33]

三

1956年在國際上是多事之秋。春天，非斯大林化的衝擊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引起了強烈反響。到了夏天，波蘭出事了。二次大戰後期，波蘭由蘇聯紅軍「解放」後加入蘇聯陣營，建立起共產黨專權的政治體制。1953年斯大林死後，波蘭曾出現實行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聲音，但被壓制了下去。1956年6月，在非斯大林化後「解凍」潮流的影響下，工業城市波茨南的工人走上街頭示威，從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和待遇開始，轉化為一場反蘇及反政府的大規模起義。6月28日，波蘭政府武力鎮壓起義群眾，據學界估計，死亡人數可能達到1,000至1,500人。[34]

由波茨南事件暴露出來的，是共產黨統治在波蘭乃至整個東歐面臨的嚴重危機。它在莫斯科產生了巨大的震撼，也引起了中共領導層的嚴重關注。周恩來最注意的，是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和新華社駐華沙首席記者謝文清發回的報告。他們認為，波茨南事件同赫魯曉夫報告造成了黨員和群眾「思想上的混亂」是分不開的。王炳南強調，事件背後是帝國主義的間諜活動和破壞陰謀，不然不會發展到明目張膽反蘇反共的地步。王、謝兩人都認為，事件同波蘭黨和政府的缺點和錯誤有關，但謝對此看得更重，認為這是導致波蘭工人和普通群眾強烈不滿的重要原因。[35] 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讀了王、謝的報告，並相當重視，[36] 但毛、周兩人從報告中得出的經驗教訓卻不盡相同。對周來說，波茨南事件說明了國民經濟保持平衡發展的重要性。他後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發言時就專門提到了波茨南事件，並強調一定要重視民生，絕不能讓「幾萬或者幾十萬人站在街上請願」的事在中國發生。[37] 毛的看法與周不同，對他來說，最要緊的有兩點，一是不能放鬆對帝國主義破壞陰謀的警惕，「東歐的問題主要是階級鬥爭問

題」；二是要加強黨和群眾之間的聯繫。毛說：「一切不依靠群眾，不依靠階級分析，是很危險的。」[38]

夏末秋初，波茨南事件帶來的震盪還沒有平息，朝鮮又出事了。赫魯曉夫推動「非斯大林化」，也在朝鮮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早在朝鮮戰爭期間及結束後，金日成就用種種藉口把黨內各種「異己」力量搞了下去。[39]戰後，金大權獨攬的意向更為明顯。1955年，他提出「主體」思想，為自己對黨和國家權力的全面控制建立意識形態上的基礎。對金來說，「非斯大林化」固然為他在北朝鮮奉行「主體」路線提供了新的空間，但當斯大林「個人迷信」遭到嚴厲批評時，又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金一味推動對自己的「個人崇拜」。1956年6月，金日成訪問了蘇聯和幾個東歐國家，主要目的是爭取援助，以解決朝鮮當時在經濟上的困難。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會見他時，不僅對他的經濟政策提出批評，還劈頭蓋臉地指責他在朝鮮實行「斯大林式的個人崇拜」，搞得他有點灰頭土臉。[40]

當時，朝鮮駐蘇聯大使李相朝對金日成早有看法，馬上把金挨批的情況轉告了國內同志，早就在等待時機的黨內反對勢力決定採取行動。8月30日至31日，朝鮮勞動黨舉行中央全會聽取金報告訪問蘇聯和東歐的情況，黨內對金不滿的力量準備發起對金「個人崇拜」和國內經濟及其他政策的批判。不料，金在黨內早已遍植耳目，事先已得知反對勢力要向他「發難」的情報，一下子就把他們的聲音壓制了下去，並反過來對他們實行迫害。會後，黨內反對勢力的幾位大將，包括貿易相尹公欽、工會主席徐輝、建築材料相李弼奎、平壤市委書記金剛等知道大事不妙，連夜逃離平壤，直奔中國避難，李相朝等另外幾位高官也在蘇聯申請避難。他們分別向中、蘇領導人控訴金的種種錯誤和罪行。在平壤，金日成和他那一幫人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黨內「延安派」的領頭人物副首相崔昌益和「蘇聯派」的領頭人物副首相朴昌玉開除出黨，並投入監獄。[41]

這件事在北京和莫斯科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毛澤東、周恩來等認為朝鮮的局勢非常糟糕。朝鮮八月危機發生後不久，中共要開「八大」了，本來邀請了金日成參加，但事到臨頭，金變了卦，託病不來中國，改派朝鮮第二把手崔庸健與會。毛、周因此感到，「金日成對我們是有敵

對情緒的」。[42] 9月18日，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同正在北京參加中共八大的蘇聯領導人米高揚舉行了長達三個多小時的會談，討論朝鮮局勢。談話中，毛把金狠批了一通，說他在蘇共二十大後「還在搞斯大林那一套」，「誰反對，就殺誰」；又說，他「對我們黨有敵對情緒」，有可能採取「極端舉措」，「甚至可能提出讓中國志願軍撤出朝鮮的問題」。毛提出，中蘇兩黨應聯合行動，幫助金「改正錯誤」，「必須讓金日成明白，如果不糾正錯誤，他終究無法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43] 這之後，毛、周又會見崔庸健，告訴他中蘇兩黨都認為金在處理黨內問題時採取了完全錯誤的方針。中、蘇同朝鮮關係太密切，「你們國內發生問題，也影響到中國和蘇聯，因此，對你們這些問題我們不能不干涉」。為此，中蘇將聯合派團訪問平壤，以幫助朝鮮同志「改正錯誤」。[44] 整個談話過程中，周恩來沒有多說話，只是在涉及到歷史問題時插上幾句，幫毛澤東的腔。

9月19日至23日，一個由米高揚和彭德懷率領的中蘇聯合代表團訪問了平壤，當面對金日成提出批評。在中、蘇的壓力之下，金被迫讓步。中蘇代表團離開平壤的當天，朝鮮勞動黨舉行了另一次中央全會。崔昌益和朴昌玉恢復了中央委員的職務，徐輝、尹公欽、李弼奎、金剛等人的黨籍也得到恢復。[45] 表面上看，朝鮮局勢似乎穩定了下來，但這只是表象。

朝鮮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進入10月後，東歐又刮起了一場特大風暴，波蘭和匈牙利幾乎同時出現了危機局勢。波茨南事件後，波蘭黨政領導改組，被認為黨內改革派的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出任第一書記。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引起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的嚴重不安。10月18日，赫魯曉夫親自飛往華沙，對波蘭施加壓力。第二天，蘇聯領導人向中國領導人通報，波蘭局勢嚴重不穩，蘇聯準備對波蘭進行軍事干預。[46] 10月21日，毛澤東召集緊急會議討論波蘭局勢，周恩來也參加了。中共領導層決定，如果蘇聯企圖用武力解決波蘭問題，就是干預波蘭內政。毛澤東當即在周恩來等的陪同下召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毛劈頭就要尤金向莫斯科轉達緊急信息：如果蘇聯出兵干涉波蘭內政，中國就將以最強烈的語言提出抗議。[47]

10月21日，蘇方回覆，已決定放棄對波蘭使用武力，並請中共派代表團去莫斯科，商量處理波蘭的危機局勢。當晚和第二天，毛又召集常委開會，他問道：「我們是參加還是不參加？」劉少奇、周恩來等都認為應當參加。[48] 周恩來本來是擔任這一使命的最合適人選，但因為當時他正準備出訪越南、印度、緬甸等七八個亞洲國家，這件事就落到了劉少奇和鄧小平身上。10月23日，劉、鄧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莫斯科。這時，波蘭局勢已開始穩定下來，但匈牙利又出了大問題，連續發生反政府示威遊行，進而發展為武力暴動。毛澤東、周恩來等開會分析局勢後認為，匈牙利的情況和波蘭不同，波蘭危機主要是反蘇，而匈牙利危機則主要是反共。後來，毛澤東對此極為明確地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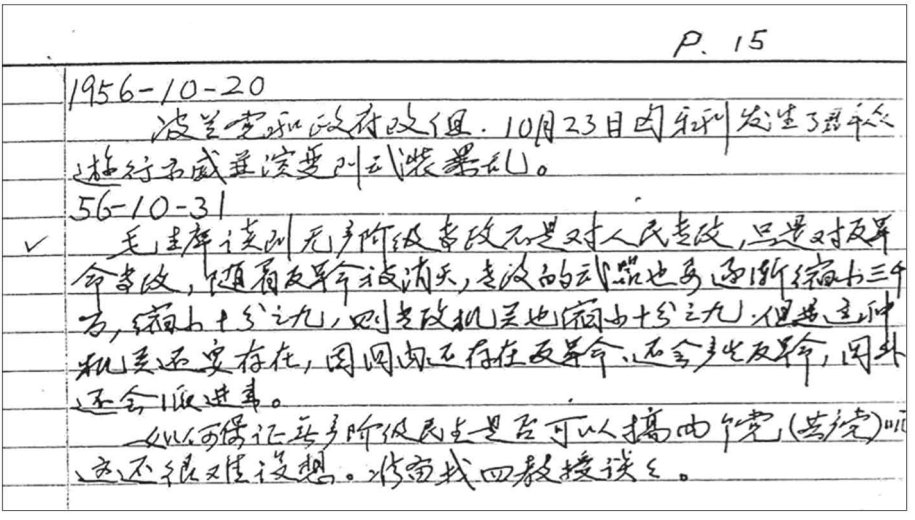
> 波蘭事件是黨領導的，為了達到有限的目的，為了加強社會主義。……匈牙利事件是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反革命分子領導的，為了反革命的目的，為了摧毀社會主義，因此，兩個事件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49]

但同時，中共領導人又一致認為，波匈危機的起源都同莫斯科的大國沙文主義有關。有鑒於此，劉、鄧根據毛澤東等關於「蘇聯是不是可以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放手、放開，讓這些國家獨立自主」的意見，在莫斯科向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建議，由蘇聯發表一項闡明各兄弟黨和國家之間關係平等的聲明。經「雙方長時間的討論」後，赫魯曉夫等同意了這一建議。[50] 10月30日，蘇聯發表了《關於發展與鞏固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誼與合作的宣言》，保證在與兄弟國家與兄弟黨的關係中遵循平等原則。[51]

10月30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接到劉、鄧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告：蘇聯領導人已準備從匈牙利撤軍。毛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向蘇方提出，蘇聯不應在反革命進攻面前放棄匈牙利，並隨即就此與劉通話。[52] 同一天，劉、鄧在離開莫斯科前夕，當面向赫魯曉夫轉達了中共的意見。[53] 10月31日，在匈牙利局面幾近失控的情況下，又為了應對英、法在埃及和蘇伊士運河的軍事干預，蘇共中央決定派出紅軍鎮壓匈牙利暴亂。[54] 從毛、周和中共領導層的角度來看，中共的意見不僅在幫助蘇

共中央正確處理波匈危機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也促使蘇共領導人認識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遵循「平等」原則的重要性。[55] 從此，毛澤東和中共對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看得更高了。

波蘭、匈牙利事件對中共領導層的衝擊和影響極大。在一次私下談話中，毛澤東甚至提出了一個極有意思的問題：「如何保證無產階級民主？是否可以搞兩個黨（共產黨）呢？」但他自己答道：「這還很難設想。」[56] 劉少奇和鄧小平回到北京後，中共中央於11月10日召開八屆二中全會。劉少奇在會上做了一個關於時局的長篇報告，重點就放在介紹他和鄧小平在莫斯科參與處理波匈危機的情況上，再引申談到了從波匈事件中汲取教訓的問題。劉說，「波蘭事件非馬克思主義有一些，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領導權」；事件之所以發生，因為它們「是蘇聯解放的，不是自己解放的」。一個重要的教訓是，「重工投資過多，沒重視輕、農，人民生活沒有改善，領導人特權，人民生活苦，群眾不滿走上馬路」。[57]


P. 15

1956-10-20

波兰党和政府改组。10月23日匈牙利发生了群众进行示威继续要叫云游暴乱。

56-10-31

✓ 毛主席说列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对人民专政，只是对反革命专政，随着反革命被消灭，专政的武器也要逐渐缩小三个方，缩小十分之九，则专政机关也缩小十分之九，但是这种机关还要存在，因国内还存在反革命，还会有些反革命，因外还会派进来。

似可保证无产阶级民主是否可以搞两个党（共产党）呢？这还很难设想。你向我四教授谈之。

圖 19.1：毛澤東談能否搞兩個共產黨，1956年10月31日。（《林克工作筆記》）

周恩來在會上做了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他也從波匈事件講起，着重談到了要從中汲取兩個教訓。第一，要堅持不懈地反對「對外的大國主義，對內的大民族主義，對人民的專制主義」，不然「它就會經常來侵蝕我們」。第二，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這個原則是對的，但是在發展中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他特別提出：「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情值得我們引為教訓。」他還說：「這不發生『左傾』、右傾的問題。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盲動，右了就投降。」[58] 於是，周在報告中又一次提到這兩年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冒進問題，尤其是國民經濟和工業生產發展中的「失衡」現象。「要重工業，還要人民？」他說，應該「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為人民、依靠人民，才能搞起重工業」。周提出，「數量上的增長稍微慢一點，並不妨礙我們實現工業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因此，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要「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總的方面是要收縮一下的，不然站不穩，那就會影響我們的貨幣、物資、勞動、工資等各方面」。[59] 報告中，周恩來說得最兇的一句話是：「應該認識到，不要使中國也發生波茨南事件，幾萬人或者幾十萬人站在街上請願，那問題就大了。」[60]

毛澤東也出席了這個實際上由劉少奇和周恩來唱主角的會議，但他並不同意劉、周關於波匈事件性質的分析，對周的報告尤其反感。但當時他沒有當面向周叫板，而是旁敲側擊地講了一大通話。11月15日，毛在會上做總結報告時，先引了一段《莊子》，接着說：

> 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不平衡，矛盾，鬥爭，發展，是絕對的，而平衡，靜止，是相對的。……這樣來看我們的經濟問題，究竟是進，還是退？我們應當告訴幹部，告訴廣大群眾，有進有退，主要的還是進，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波浪式地前進。

他還特別強調：「要保護幹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61] 毛的這番話，其實都是對着周説的。他心裏也一直記着周在會上的報告。後來，在1958年的南寧會議上，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被當作「右傾」典型在會上印發，受到了嚴厲批判。[62]

同時，波匈事件還進一步喚起了毛澤東面對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時的心理上的優越感。在他看來，「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實際上是授人以柄，作繭自縛。…… 二十次代表大會實際上去掉了斯大林這把刀子，列寧的刀子也丟掉了一半，十月革命轟轟烈烈的階級鬥爭也被丟掉了，而改換為和平過渡或者説是議會鬥爭」。他對此大不以為然。另一方面，他又對二十大「揭開了一個大膿包，搞起了一場大辯論」大為欣賞，認為「這場大辯論可能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開闢正確的道路」。[63] 當然，在他看來，這條道路是要由他和中共去領導開闢的。

四

八屆二中全會結束後，周恩來開始集中準備出訪越南、柬埔寨、印度、緬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亞洲七國。對於周本人、也對於新中國來説，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建國以來，周曾幾次出國，去過蘇聯、瑞士(參加日內瓦會議)、印尼(參加萬隆會議)、印度和緬甸。但像這樣一次集中訪問多國，對周來説還是第一次。

同時，這次出訪還涉及到一樁周恩來這兩年、尤其是進入1956年後花費了大量精力來研究處理的大事，即中國同印度、緬甸等鄰國的邊界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百端待舉，周恩來和中國政府實在沒有時間和精力顧及複雜的邊界問題，因而採取了「暫維現狀」的擱置態度。用周恩來自己的話來説：「建國初期，我們忙於處理國內外重大問題，同時由於對全國邊疆問題還沒有很好研究，因此不可能就着手把這樣複雜、涉及國際關係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解決。」[64] 1954年6月下旬，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短訪印度、緬甸，同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緬甸總理吳努會談。10月和12月，尼赫魯和吳努又訪問了北京，兩人在同周恩來的會談中，都提及了印、緬同中國的邊界問題。周坦承對此還未及深入考慮研究，「中國

政府還沒有把與各國的邊境問題放在日程上。中國政府尚不願接觸這個問題，因為現在處理這個問題尚無可能。在處理這個問題之前，還要做許多工作」。[65] 12月，他經過初步思考後，在同吳努的會談中就邊界問題交換意見，達成共識：「中緬兩國邊界尚未完全劃定，兩國總理認為，有必要根據友好精神，在適當時機，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解決此項問題。」[66] 相形之下，周恩來和尼赫魯之間未就中印邊界問題達成過類似的共識。[67]

1955年11月，中緬邊防部隊在邊界南段一個叫黃果園的小地方發生衝突，「雙方各有數人受傷」。緬方於1956年1月提議，中緬雙方應盡早開始會談，並根據「1941年線」解決邊界問題。[68] 周恩來因此感到，「中緬邊界問題不能不提到我們政府的工作日程上來，加以研究、調查」。[69] 從1956年初起，中緬雙方就邊界問題頻繁交往，周恩來也花費了大量時間，親自調閱、研究中緬邊界以及中印邊界問題的相關文獻資料，同時針對中緬之間存在的一系列「未決問題」(除「未定界的劃界問題」外，還包括邊境貿易、經濟合作、雙方邊民過界耕作、華僑雙重國籍等問題)，親自主持參加討論會，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70]

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碰到了兩個大挑戰——如何看待相關的歷史資料問題和地圖問題。他後來在人大做關於處理中緬邊界問題的內部報告中，對此做了詳細說明。歷史資料問題，涉及到的就是人們經常談論的「自古以來」的問題。周恩來親自閱讀歷史資料並與各方專家的反覆求教及討論後，形成了「對待歷史資料應該遵守的」三項原則。第一，「承認歷史的客觀事實，要還它本來面目」。他在內部報告中指出，歷史是變化的。「漢朝時，越南是我國的一個郡，叫交趾郡，但是我想今天不會有人提出：根據這段史實，現在的越南還應該成為我國的一郡。朝鮮過去是高麗，歷史上也曾經屬過我國，我們當然也不會根據這段史實來提任何要求。」第二，「要從發展上看問題」，「不能把整個歷史翻出來都作為我們談邊界問題的根據」。他提出：

> 中國以史書記載詳盡著稱於世，如果我們把所有史書都搬出來作為討論我國邊界的根據，那就要把整個亞洲都翻騰起來了。……所以歷史

> 上的一些情況只能作參考，只有最後一個階段的史實在有關雙方談判的時候才用得上。比如，拿中國的四至來說，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這三個朝代有些談判的材料，是應該作為法理根據的。

周恩來認為要遵循的第三個原則是，「要根據現在的情況和政策來看待歷史資料。要以我們的歷史的資料作參考，把最後若干朝代的某些談判材料作為法理根據，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看今天的情況和我國的政策」。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清朝康熙年間及以後和沙皇訂的邊界條約」，他分析道，鑒於「十月革命後列寧已經取消了對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上的不平等條約，現在那裏又住着俄羅斯民族，已經社會主義化了，當然就沒有必要去算這筆帳了」。但是，「因為鴉片戰爭而割讓的香港及隨後租出的九龍，那裏仍然住着中國的民族，那裏是殖民地，這筆帳總是要跟帝國主義算的」。[71]

周恩來又談到地圖問題，他說這個問題「更為複雜，……從清朝、北洋政府到國民黨，地圖的變化可以說有六次之多」。其中康熙、道光、光緒三個時期，「因地理知識有限，又沒有很好的勘測，地圖非常粗糙」，沒有什麼借鑒作用。從北洋政府到國民黨統治時期（其中又以1941年為界），這「三個時期變化較大，而這些變化除了已定界和1941年線是根據條約畫的以外，其他就是根據當時的鬥爭情況，人民愛國的要求來畫邊界線的，並不反映實際情況」。然而，「這樣一個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地圖，變成了我們解放以後的一個大包袱。……從清朝以來近六十年來根本沒有統治過的地方，我們在地圖上畫入我國版圖，地圖上出現了虛假的現象。……我們新政府對舊地圖不能負責，這是歷史上的一個積案，需要我們解決」。

經過上述對「過去交涉的歷史資料」和各時期的地圖的仔細考察甄別，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反覆思考，周恩來形成了關於解決中緬邊界問題（以及更廣泛地解決中國同其他國家的邊界問題）的一項重要原則：

> 在解放前國民黨統治到的地方，我們全部接收；有些地方國民黨有過形式上的統治，但實際沒有能管到，我們也要接收，寸土不讓。這個原則在全國範圍也是適用的，例如我們和平解放了西藏，今後還要解

> 放台灣、澎湖。至於我們和外國接壤而沒有定界的地方，我們的原則是守着原來已經到達的界限，其中有些地方在日後談判中將有所調整的，就只能等和平談判來解決。……方案就是，除守住原來應該屬於我們的地方外，便是根據歷史上可以為憑的法理論點，並考慮到我們和有關國家的新的關係和我們的政策來進行談判。這種談判當然是和平談判，絕不能採取另一種方法，不能用武力改變現狀。[72]

上述原則也成為周恩來處理中國和緬甸及印度的邊界問題的出發點。由於緬、印兩國都曾為英屬印度殖民地，兩國同中國的邊界都涉及到「麥克馬洪線」，該線由英印當局根據「安全地形」的考慮，在1914年舉行的西姆拉會議上提出。周恩來經過對相關文獻及地圖的深入研究比對後確定，歷屆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麥克馬洪線」。緬方提出的「1941年線」涵蓋了中緬邊界南段，同那一段的麥克馬洪線高度重合。但這一段和麥線在中緬邊界中、北段及中印邊界的其他部分的不同之處在於：1941年，英國政府乘中國苦撐抗戰危局的機會，以關閉當時是中國對外主要通道的滇緬公路為要挾，以換文形式迫使國民政府承認這一段麥線，是為「1941年線」。

根據這一基本思路，周恩來6月22日在接見緬甸駐華大使吳拉茂(U Hla Maung)時提出了處理邊界問題的另一個重要看法：

> 就中緬邊界的現狀而言，是可以以緬甸獨立、新中國成立那時的現狀來做根據的。[73]

這一說法極為重要，其實是周恩來後來提出「實際控制線」的概念、並將之當作邊界劃定最重要依據做法的雛形，也為中國下一步承認「1941年線」並接受中緬邊界中、北段同麥線重合、自緬甸獨立及新中國立國時即存在的「現狀」(亦即「實際控制線」)留下了口子。正是基於周恩來提出的這一原則，中國後來解決了除印度和(受到印度控制的)不丹以外所有陸上鄰國的邊界問題。

8月27日，周恩來召集各相關部門負責人討論中緬邊界問題，在他的主導下，會議決定在承認「1941年線」上做出重大讓步。[74] 周的基本考慮是：

> 當前，「1941年線」是中緬邊界糾紛的中心問題，……確定我對「1941年線」的基本態度是解決中緬糾紛的關鍵。從法理上講，中、英兩國

> 政府對「1941年線」有過正式換文。根據國際法，某國政權更迭，政治或其他的條約可以不承認或修改，但劃界條約應該承認。我們如不承認「1941年線」，也找不到法理根據。從政治上看，我們主張和平共處。……如在邊界問題上與緬甸搞僵，我會因小失大。基於以上考慮，會議決定原則上最後我國應接受「1941年線」。[75]

當晚九點半，周恩來約見路經北京的緬甸駐蘇聯大使吳旺（U Ohn）和吳拉茂，提出了「一攬子」解決中緬邊界的設想：「在南段，即使我們承認1941年線是有困難的，但是，我們還是願意考慮把中國軍隊撤離1941年線以南的地區。我們同時要求，在北段，緬甸軍隊也從片馬、崗房、古浪這幾個地方同樣由英國文件承認是中國的地方撤走，我們還要求緬甸軍隊撤出今年在北段所佔的五個地方。」同時，周又提出邊界「南北兩端應該同時解決」。[76]

10月，吳努訪華，周恩來在同他的會談中進一步確認：雙方定界，將以「緬甸獨立、新中國成立那時的現狀來做根據」，因此在邊界南段，中方將承認已為國民政府接受的1941年線；在中段，中方收回由英緬當局獲得的「永租地」，但允許緬方在此修建的公路通過；在邊界北段，緬方將交還片馬、崗房、古浪三地，並將「中緬北段邊界劃到接上『麥克馬洪線』的一點為止，但是這只是我們之間的『一個默契』」，不作公佈解釋。周重申，「以上三點要聯繫起來解決」，並強調：「我們為了求得一勞永逸的解決整個邊界問題，委曲求全的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們並盡力克服困難努力實現這一方案。」他還表示，中方「也要用同樣的原則來對待我們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蘇聯、蒙古、朝鮮、越南的邊界問題」。[77]然而，周恩來當時沒有想到的是，他提出的這一套做法在緬甸和其他相鄰國家做通了，但在印度（包括印度實際控制下的不丹）那裏卻無論如何也做不通。

五

周恩來出訪亞洲各國的第一站是河內，這是他首次到越南訪問。從11月18日至22日，周和胡志明、范文同等越南領導人舉行了五次會談，除中越兩黨兩國關係外，主要討論了兩個大問題。第一，是如何應對1954

年日內瓦協議破局後的印度支那局勢。根據兩年多前在日內瓦簽訂的印支停戰協定，越南暫時以17度線為分界線劃分為南北兩區，並規定兩年內要在國際監督下舉行自由普選，實現南北統一。然而，兩年過去了，南方的吳庭艷政權在美國支持下，阻擾普選的組織和進行，還在南方大搞「白色恐怖」，越南南北方的分裂局面繼續存在。周恩來曾為日內瓦協定的達成嘔心瀝血，他也曾告訴越共領導人，以17度線為分界線只是暫時現象。但現在，日內瓦協議遭到破壞，越南南北分裂也出現了長期化的趨勢。對此該怎麼辦？周在會談中的看法是：越南的統一將是「長期的鬥爭」，通過普選實現統一已不可能，「可以作為一個政治鬥爭的口號，但不是行動步驟」。越共要首先集中鞏固北方，徹底完成人民民主革命，使北方成為「人民民主的基地」，才能在此基礎上爭取南方。[78] 這實際上意味着周已經承認，自己曾錯誤判斷日內瓦協議不僅將結束戰爭、也將為越共獲得整個越南打開大門。越共領導人當時沒有同周恩來爭辯，但他們心裏是不高興的。

周恩來和越南領導人討論的另一個大問題，是越南北方土改出現偏差以及財政困難。越南的土改很大程度上是參照中國土改模式進行的，中國顧問團也參與了很多具體政策的制訂。土改出現偏差後，越共領導人自然希望與周商量。越南在抗法戰爭期間，一直得到中國的各種援助，現在越南經濟財政出現問題，也希望同周商談，不僅得到辦法，更得到實際援助。周在土改問題上的看法是，土改有一個經驗積累的過程，出現偏差難免，但因此也讓越共獲得了經驗。至於經濟困難和財政赤字，主要還是戰爭的影響，只要認真對待，是可以克服的。周同意，中國政府除先前已答應無償贈送的8億人民幣(其中6億用於經濟，2億用於軍事)援助外，將向越南提供更多的經濟援助，並加快給予的速度。1957年，中方又向越南追加1億人民幣的軍事援助。[79]

周恩來訪越後，於11月22日轉往金邊，對柬埔寨進行五天訪問。周和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是在一年多前的萬隆會議上相識的。1956年2月，西哈努克親王應周邀請，以內閣首相身分訪問中國，期間毛澤東會見了他。[80] 中柬之間雖尚未建交，但實質性的雙邊關係得到加強。周到達金邊

時，十萬人夾道歡迎。周同西哈努克親王會談時表示，中國人和柬埔寨人是兄弟，中國堅定支持柬埔寨的和平中立政策。西哈努克則表明，柬埔寨雖一時還不便同中國建交，但亟願以五項原則為基礎同中國發展關係。西哈努克後來一再說，他從那時起就認定周恩來和中國是「可以信賴的朋友」。[81] 由此發展出來的，是周本人與西哈努克之間長達二十年的友誼，而西哈努克則一直以中國的親密朋友自居。

11月28日，周恩來抵達新德里，開始訪問印度，這也是他此次出訪的重頭戲。那個年代，印度可以說是中國對外關係中除蘇聯外最重要的國家，中印關係也處在互稱「巴依－巴依」(兄弟－兄弟)的火熱狀態。1954年6月，周曾經短訪印度，並在和尼赫魯總理發表的聯合公報中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0月，尼赫魯又到中國訪問，受到極為隆重的歡迎和接待；周的這次訪問，也是對此的回訪。

周恩來的訪問分為兩段，一共待了近二十天，行程達四千多英里，所到之處都受到了充滿熱情的歡迎。他和尼赫魯的會談似乎也相當順利，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如當時引起全球關注的蘇伊士運河事件)獲得了廣泛共識。兩人還重申了兩國倡導並推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決心。在這期間，周恩來和尼赫魯有兩次談話，但沒有涉及邊界問題。[82]

12月10日至20日，周恩來訪問緬甸。這是他第三次來到這個南方鄰國，日程上的重中之重，就是要為中緬邊界問題的最終解決劃定框架。這之前，周恩來和緬甸駐華大使吳拉茂多次談話，又在10月間吳努訪華時和他深入交談，為他12月訪緬時繼續談判奠定了基礎。雙方面臨的主要困難，還是如何在國內解釋，這也成為周同緬方會談的重點。周在和吳努及時任緬甸總理的吳巴瑞(U Ba Swe)會談時表示，邊界問題不宜久拖，但從中國的角度來看，要解決還有幾個困難：第一，要給中國人民一個清楚的解釋；第二，如果要接受麥克馬洪線，將涉及到藏南地區，就需要說服西藏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等人；第三，國民黨會罵中共賣國。「你們需要時間，我們做工作也需要時間。……我們為了求得一勞永逸地解決整個邊界問題，委曲求全地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們要盡力克服困難實現這一方案。」[83] 周恩來做這番表態時，不僅涉及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其實也

把對中印邊界問題的處理考慮在內。後來，在第二年的全國政協會議和人大會議上，周恩來進一步解釋：

> 如果要否定1941年線，就要修改條約，或者重新廢棄這個條約，這就使人感覺過去歷史上所有劃界的條約都可以改變，絕不是一個條約為止。「1941年線」是乘人之危不公道的條約，但是那是已經簽訂的邊界條約。而這個地方兩國都不是直接統治的，我們按照現在的辦法解決比否定了再重新劃要好得多。兩個利弊相比，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1941年線」我們頂多提出某一點斟酌，而不是給他來一個否定。[84]

對於這個決定，中國駐緬使館和雲南省方面都曾提出反對意見，在國內也非議甚多，但都被周恩來和中央否決了。[85] 在周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向各省區黨委下發了〈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指示〉，以統一國內各部門各界對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的認識。[86]

離開緬甸後，周恩來又訪問了巴基斯坦，這在他此次出訪的國家中，當時看來是最困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巴之間儘管很快就建立了外交關係，但雙方的交往並不密切。當時，巴基斯坦是東南亞條約組織和中央條約組織這兩個由美國掌控的軍事同盟集團的成員，又同與中國關係親密的印度在克什米爾歸屬問題上存在爭端，再加上巴基斯坦在聯合國中國席位的投票一再「站錯隊」，中巴關係也變得彆彆扭扭。但周恩來依然在萬隆會議等場合主動與巴基斯坦代表團接觸。1956年10月，巴基斯坦總理蘇拉瓦底(Huseyn Suhrawardy)訪問中國，周和他會談後，大大拉近了兩國之間的距離。周這次是對蘇拉瓦底訪華的回訪。他對訪問本身並沒有太多的期盼，在訪問中涉及克什米爾等敏感問題時，也施展出他的外交長才，滴水不漏地闡述中國「嚴守中立」的政策。十天訪問期間，周和蘇拉瓦底簽署了聯合聲明，宣佈兩國間「沒有任何真正利益的衝突」，訪問「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友誼」。[87] 當時，周恐怕沒有意識到，在此後的歲月裏，尤其在中印兩國反目為仇之後，巴基斯坦會成為中國在世界上關係最穩固長久的友邦。

1956年12月30日，周恩來又回到印度。他還有兩樁要緊的事，第一樁是中印邊界問題。周到達新德里時，剛剛訪問美、加回國的尼赫魯親自到機場迎接。兩人會談時，尼赫魯果然向周提出了兩國之間的邊界問題，根據印方文獻記載，周恩來表示，儘管「當時的中國政府並未接受麥克馬洪線」，同時這條線「是由英帝國主義者建立的，是不公平的」，但「由於它已是既成事實，也由於中國和有關國家，即印度和緬甸之間的友誼，中國政府的看法是應當承認麥克馬洪線」。只是，他還需要同西藏領導人商討此事，獲得他們的同意。[88] 尼赫魯本人和印度政府後來一直以此為依據宣稱，周恩來在1956年訪印時已經接受了麥克馬洪線，中印之間在邊界問題上不存在爭議。[89] 但周恩來後來澄清說，他從未像尼赫魯所說的那樣接受過麥克馬洪線，中國政府也絕不會承認麥克馬洪線是中印之間的合法邊界線。周當時告訴尼赫魯的是，中方從來沒有越過麥線，並願意「從實際出發」，以麥線為參照同印度就確定中印邊界進行談判。[90] 尼赫魯則反過來把周恩來的說法說成是「欺騙」和「背叛」。[91] 但無論如何，周和尼赫魯或世界上的任何人當時恐怕都不會想到，短短幾年之間，中印兩國就會在1962年因邊界問題而兵戎相見，「巴依－巴依」的歡呼聲也成為絕響；更不會想到半個多世紀過後，中印關係仍然處在1962年那場戰爭的濃重陰影之中，並遠遠看不到從陰影中完全走出來的那一天。

周恩來重返新德里的另一樁大事，是要說服達賴喇嘛回西藏。1956年秋，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都到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週年慶典活動。當時，正值中國國內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背景下，川康藏區也迅猛推行「民主改革」，引起了嚴重反彈，並釀成廣泛的武裝反抗，也在拉薩政治和宗教精英層中產生了強烈反響。達賴喇嘛對此深感困惑，很有可能滯留印度，不回西藏。幾年前，周恩來在西藏實現「和平解放」上用力甚多，之後和毛澤東一樣，對西藏之事極為重視。1954年達賴喇嘛赴北京參加首屆人大會議時，毛幾次親自會見，周也事必躬親，以確保對達賴的接待不出現任何紕漏。[92] 這一次，周恩來竭力試圖勸說達賴回拉薩。

1956年11月29日，周恩來已在新德里和達賴見過面，主要是聽取達賴的意見。[93] 12月30日，周從巴基斯坦回到印度當天，又再次同達賴談



圖19.2：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會見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1955年2月。
（Geopix / Alamy Stock Photo）

話，明確表示，「根據協議，不經過西藏的領導人同意是不進行改革的」；「現在主要是搞好建設，發展西藏的經濟，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有經濟發展了，人民的生活好過了，包括貴族、寺廟的生活水平都比現在有所提高時，看情況再談改革，那時辦法就多了。」[94] 1957年1月1日，周第三次同達賴談話，再次代表毛向達賴保證，「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內不談改革，現在算起來還有六年。六年之後是否改革，如何改革，還是由你決定」。周還說，關於達賴提出的西康問題，「已派人去做善後處理」，但「如拉薩方面派人去視察並幫助處理善後問題則更好一些。因為同是藏族，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究竟在什麼地方，更清楚一些」。周還說：「是中央的缺點，中央改正。是地方的缺點，地方改正。」周並答應在西藏自治區成立時，「我一定去」。[95]

在勸說達賴回拉薩這件事上，尼赫魯也幫了周恩來的忙。他在同達賴喇嘛會面時說，印度的立場向來是「西藏的主權屬於中國，但應實行自治」，勸說達賴返回西藏，不然「將是愚蠢之至，不僅會對他本人也會對西藏造成傷害」。[96] 這些話是對周的話的有力補充，對達賴影響很大。最後，達賴喇嘛於1957年3月底回到拉薩，這是周恩來訪印的一大收穫。

六

本來，周恩來在印度後還將繼續訪問阿富汗和尼泊爾，但11月底，蘇聯表示希望周恩來「在訪問阿富汗後能到莫斯科一談」。[97] 12月初，波蘭又邀請毛澤東訪問，目的之一是加強執政的統一工人黨在即將舉行的波蘭大選中的地位。毛和中央考慮後，提出讓周恩來前往。中共中央致電周，轉達波蘭的邀請，並認為有必要「幫他們一手」，周應當去。12月8日，周覆電「同意中央要我去蘇、波訪問的意見」。[98] 為此，他決定將對阿富汗和尼泊爾的訪問推遲到從蘇、波回來後。周願意做這次訪問，除了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外，應該還因為他自己也希望通過走這一趟，獲得關於蘇聯及東歐情況的第一手經驗。12月16日晚，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周恩來，要他先回北京三五天，再去蘇聯、波蘭訪問。[99]

1957年1月3日，周恩來趕回北京。毛澤東要他回來，主要是因為在周出訪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連續開會後，組織班子寫出了一篇〈再論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大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對匈牙利事件後國際共運所面臨挑戰的一系列基本看法。1956年12月29日，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100] 毛覺得，有必要和周通氣，面授機宜，讓他訪問蘇聯和波蘭發表意見時心裏可以有桿秤。1月4日，毛主持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為周訪問蘇、波定下了「發現問題、提出批評」的基調和框架。[101]

1月7日下午4時，周恩來乘專機抵達莫斯科機場。赫魯曉夫以下，蘇共主席團成員集體出動，到機場迎接。這是當年毛澤東訪蘇時也沒有過的禮遇。他在同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會談中，按照毛和中央常委授予的錦囊妙計，一面重申要「加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一面嚴厲批評蘇聯對東歐國家的大國沙文主義表現，搞得赫魯曉夫等很不舒服。[102] 周尤其注意到，赫魯曉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沒有提到《人民日報》文章。[103] 之後，周恩來又到波蘭訪問。在同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的會談中，周表示支持波蘭爭取平等和維護主權，並說中共「支持波黨的領導是我們的責任」；同時，他又一再提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團結對敵和強調蘇聯的先進作用」，並建議哥穆爾卡等要注意防止內部的「修正主義傾向，它會帶來很多危害」。哥穆爾卡對「以蘇聯為首」的提法表示異議。周

回應道，以蘇聯為首不等於要蘇聯起領導作用，哥穆爾卡多少對此「感到有些失望」。[104]

本來，周恩來此行並不準備訪問匈牙利。他到達莫斯科後，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Kádár János)專程趕來，中、蘇、匈三黨領導人於1月10日舉行了共同會談。在卡達爾的堅持邀請下，周「同意在訪蘇、波後(已定1月16日)率領代表團訪匈一天」。[105]他到布達佩斯後，發現情況「比我們估計得要好些，領導同志很堅決，很團結」，同卡達爾等的會談也比同蘇、波領導人的更為順利。其實，卡達爾有如此表現，也是為了向中國要援助。周答應，除先前已向匈牙利提供的3,000萬盧布的經濟援助外，再貸款1億盧布外匯，加上1億盧布物資。[106]

1月17日，周恩來訪問波、匈後回到莫斯科，繼續同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會談。周強調，波、匈事件的根本性質不同，蘇聯出兵匈牙利做對了，但對波蘭卻「兵臨華沙實行威脅，這顯然是以武力干涉兄弟國家兄弟黨內部事務」。談到批判斯大林問題時，他又戳到了赫魯曉夫等的痛處，說他們長期與斯大林共事，「在助長斯大林的錯誤的逐漸增長這一問題上總是要負一定責任的」。結果，會談的氣氛頓時變得緊張起來。本來，周應該在最後一天同赫魯曉夫等的會談中講五年計劃長期供貨合同、蘇聯顧問專家、中蘇原子能導彈合作和蘇聯援助等重要問題的，周決定都不提了，「不僅是因為時間不夠，主要是為了不使他們感到我們是在乘人之危同他們討價還價，這些事可以留在以後再提或者不提」。[107]1月24日，周給毛及中央發了一份長電報，報告同蘇聯領導人會談情況：「蘇共黨內領導同志的錯誤基本上是思想問題」，常常把蘇共利益和兄弟黨利益對立起來。在對斯大林功過評價的問題上，「他們的看法較過去有些改變，但是我看這只是為了一時的需要，並非出自深刻的認識」。在中蘇關係上，「現在正是大敵當前，所以蘇聯同志對於中蘇團結態度甚殷，但是，我看蘇聯領導者並非心悅誠服和赤懇無間」。對《人民日報》文章，「許多蘇聯領導同志公開舉杯慶賀」，唯獨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等「最負責的三位同志對此文卻隻字不提」。在國際局勢上，蘇聯領導人「缺乏對於整個局勢的全面分析和預見，考慮和討論世界戰略和遠景問題很差」。周說：「總結一句，我覺得對他們不做工作已經勢在不許，但是

又絕不能求成太急。因此，恐非有計劃有步驟長期而耐心地進行這個工作不可。」[108]

周恩來的這篇報告，顯然是他按照毛澤東的看法寫成的，尤其是他對於蘇聯領導人的批評，與其說是在討論蘇聯的問題，毋寧說清楚透露了波匈事件後毛及中共領導層對自己在國際共運中地位和影響的看法。當時，中蘇同盟關係依然如日中天，但讀着周的報告，卻充滿着不祥的預兆。毛澤東很喜歡周恩來的這份電文，當時北京正在舉行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當即批示「此件可以印發到會各同志」。[109]

周恩來離開莫斯科後，又兼程前往阿富汗、尼泊爾、錫蘭（後來增加的一站）訪問，直到2月6日才回到雲南昆明。這一趟出訪，除中間短期回北京一趟外，周共到了亞、歐11個國家，歷時近三個月。那一年他已年近六旬，但一路下來，連軸轉的繁忙日程和時差夾擊，卻鮮有疲態。

七

1957年2月12日，周恩來回到了北京。這時，北京的政治空氣已滲透着絲絲春意。2月底，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各方參加者有1,800餘人。毛澤東在會上講話，題目是「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毛做這個講話的一個重要背景是，自1956年春天以來，在國際上「非斯大林化」解凍潮流的影響下，國內各界出現了不少「早一點取消專政」之類的聲音，各地也出現了一些群眾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的「鬧事」事例。毛說這些問題多是「人民內部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都是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應對「鬧事」，要克服官僚主義，使其不鬧。「官僚主義沒有克服，要鬧就讓他鬧，因為你沒有解決問題。……要鬧就讓他鬧夠……看作是我們改善工作，教育工人、農民、學生的一個過程。」這之後，毛又提出：「我們要向黨內外宣佈，在人民內部無所謂專政，在人民內部講專政是錯誤的。」[110]

毛澤東在北京講了這些話之後，又到外地講。3月17日，他在天津黨員幹部會上說：「現在，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鬥爭基本上結束，八大

決議上面說了。我們全黨要來搞建設。」「對於階級鬥爭基本結束而顯露出來的各種東西，各種不滿意，許多錯誤的議論，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方針？我們應該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討論中、在辯論中去解決。只有這個辦法，別的辦法都不妥。」3月18日，毛又在山東省處以上黨員幹部會議上說，階級鬥爭基本結束，「意識形態這一方面的階級鬥爭，就是無產階級思想跟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這個爭鳴是要爭幾十年的」。[111]

當時，周恩來訪問蘇聯及波、匈後回國不久，對毛的這些話感同身受。3月19日，他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講話時說：我們應該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自己搞好，這是根本大計。這就首先要承認國內的矛盾，要正確處理國內的矛盾，「這一點是從匈牙利的教訓，從批判斯大林問題上取得的」。[112] 4月19日，周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關於整風運動的決議〉草案。4月27日，決議正式發佈，提出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113] 周講到這個決定時說：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首先要在黨內搞通。我們主張從現在開始，自上而下地進行整風，從上層搞起，逐步擴大，黨外人士，我們歡迎一道搞。[114] 這之後，中共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旗號下開始大力推動給黨「整風」的運動，並歡迎和鼓勵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黨外人士參加。

然而，整風開始後不久，在各種聲音中也夾雜着一些對中共的尖銳批評，例如《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說，「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周恩來就認為「出了軌」了。[115] 後來，又有報道說，有人發表了要中共和各民主黨派「輪流坐莊」的言論。毛雖說過「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但聽到此話後居然坐不住了，狠狠地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116] 6月6日，毛在為中央起草〈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時，寫了一段給劉少奇、周恩來等的批示，說整風「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動思想和錯誤思想的人的面貌」，要讓「建設性的批評與牛鬼蛇神(即破壞性批評)都放出來，以便分別處理」，時機一成熟，就動員左派「反擊右派和反動分子」。[117] 言語之間，已露出一股殺氣。

這之後，形勢急轉直下。7月1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撰寫的社論〈文化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發表，其中在整風中發聲較多的民盟和農工民主黨被毛定義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黨派」，右派分子則是「反共反

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118] 短短幾天內，風向突然大變，倡導「百花齊放」的整風運動也以狂風驟雨之勢轉變為反右派運動。

周恩來是這種「轉向」的推手之一。說到底，他是共產黨人，聽不得別人罵共產黨，也不願看到中共對權力的壟斷受到挑戰和削弱。在中共領導層策劃從整風轉變為反右的一系列會議上，他同毛是一致的。用周自己的話來說，中共搞整風，「是為了發展我們的國家，建設我們的國家」，但右派朋友「竟然看成漆黑一團，覺得波匈事件以後，中國也差不多了，……船要沉了，天要黑了，另有打算，那就出了軌了」。[119]

然而，在對「右派」的定性和具體認識上，周恩來同毛澤東仍有不同之處，他的大體看法是，右派分子雖然「站在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但還是「置身於人民的隊伍之中」，也就是說不屬於敵我矛盾。[120]

但是更要緊的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轉變的時刻，周恩來居然在一個更為基本的層面同毛澤東發生了一番「話語對峙」，涉及到關於國家群體及個體之間的關係的認識。他們在各自對這一關係的一段從形式上看極為相似的表述中，卻在何者為先、何者為後上顛倒了過來。反右開始後，毛在講到民主集中制時說：

>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121]

幾週後，周恩來在一次報告中也講到了民主集中制，幾乎重複了毛的排比方式，但有意無意之間，他卻把群體與個體關係的次序顛倒了過來：

> 我們的制度就要有恰當的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紀律，又有個性的發展，又有統一性，政治制度就會適合這一條，思想也要適合這個社會主義的要求，大家接受這個社會主義。[122]

在以上毛、周兩人關於民主集中制的陳述中，毛澤東把「集中」、「紀律」、「統一意志」放在第一位；但周恩來卻把「民主」、「自由」等放在前面，並用「個性的發展」取代了毛澤東的「個人心情舒暢」。仔細推敲起來，這些區別似乎頗含深意，從中透露出來的恐怕正是周內心深處對於個體與

群體、個人與國家之間孰先孰後的真實看法。只是，周恩來當時大概沒有料到的是，從整風到反右的轉變，還會伴隨着毛澤東對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和論述的根本變化，並開始對一年前的「反冒進」算倒帳，而周自己也將成為批判的靶子。

當肅殺的秋風伴隨着「反右」掃過華夏大地時，毛澤東的眼光也轉回到黨內，要把他憋了一年多的對「反冒進」的火氣統統迸發出來，他的一個主要的靶子就是周恩來。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完全是有備而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八大一年前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正式做出修正：

>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23]

現在回看，毛澤東的這一舉動非同小可。他在此後十年間推出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包括文化大革命，都可以在這個關於「主要矛盾」論述的改變中找到理論上的源頭。但在當時，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其他中共領袖們，居然無一人站出來提出一點點的質疑。

毛澤東還在會上對「反冒進」大舉發難，他說：1956年吃了虧，來了一個右傾，來了一個鬆勁。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是「促退」，是向群眾潑冷水，打擊積極性。共產黨應該是促進委員會，只有國民黨才是促退委員會。[124] 全會閉幕式上，毛又說：「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有那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人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125] 這時，儘管毛澤東沒有點周恩來的名，但這些話沒有一句不是對着周說的。

過了一個月，毛澤東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週年慶祝活動，同時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各黨首腦峰會。如果同毛八年前第一次訪蘇相比較，他的感覺是不一樣的。那一次，新中國立國不久，百廢待興，斯大林作為國際共運無可爭議的領袖，同他會面時表現出一種居高臨下

的氣勢。儘管斯大林最終同意了與新中國簽訂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向新中國提供大規模援助，但在毛的記憶中，仍對於同斯大林會面時的不平等感耿耿於懷。[126] 八年過去了，中共不斷推進對國家與社會的改造，國際地位也由於參加朝鮮戰爭、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萬隆會議而大為提高。尤其是，毛認為中共在處理波匈危機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這更使他在面對小他一輩的赫魯曉夫時，有一種強烈的道義和心理上的優越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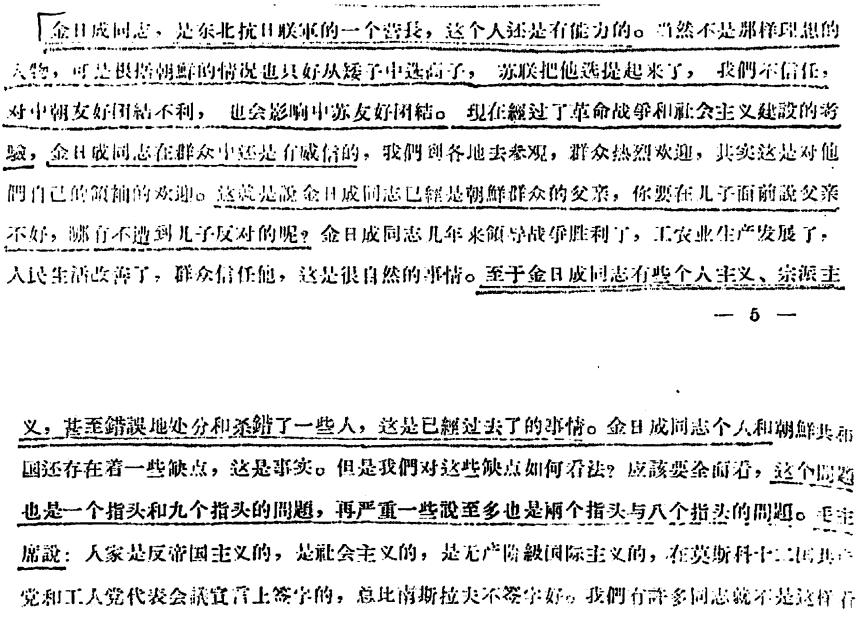
在莫斯科峰會上，毛澤東的這種心態不時在言行中顯露出來，最突出的是11月18日他在會上發表長篇講話那一次。毛自以為那是他的一次「傑作」，從時代特徵和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講開去，談到了和平與戰爭的問題，尤其是核戰爭問題。他以自己特有的風格，以中文語境內聽上去似乎很生動的語言說：「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到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可能損失一半。……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127]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一次極為重要的講話，但毛澤東卻同他在黨內會議上講話時一樣，並沒有事先準備一個經過反覆推敲的稿子。他只帶了一個簡單的提綱，就在現場旁徵博引、盡情發揮，再由中方翻譯口譯為俄文。(當時為毛澤東擔任翻譯的李越然告訴筆者，他對於毛會講些什麼完全沒有數，極為緊張，也根本沒有時間對俄文表達進行推敲，只能「硬着頭皮一句一句地硬譯下來」。)[128] 毛以如此方式發表重要講話，顯露出他覺得自己已是國際共運的龍頭老大。他擺出居高臨下的姿態，用幾近藐視的語言大講核戰爭，這其實並不意味着他贊成打核戰爭，或要以此來實現對世界的社會主義改造，而是以一種極而言之的方式來表達「歷史和未來在我們這一邊」的信念。然而，他的即興表述加上勉為其難的俄文翻譯，卻令現場聽眾目瞪口呆。他的宏大氣魄成了一種狂妄，他對於核戰爭的看法則成了地地道道的無知。[129] 可是，毛澤東對於自己的發言經過粗糙

的俄文口譯後產生的效果渾然不知，反而認定赫魯曉夫他們要同美國等西方國家搞「和平共處」，是在帝國主義的核威脅面前嚇破了膽。

在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對金日成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11月9日，毛會見金時說，中國準備從朝鮮撤出志願軍。毛還提議，金利用不久後訪問中國的機會，由中方把在中國避難的朝鮮反對派都集中起來，由金宣佈對他們實行大赦，了結這件事。毛保證中國永遠不會利用這批人反對金和朝鮮勞動黨。毛還提到，周恩來不久將正式訪問朝鮮，以加強中朝之間的團結和友誼。[130] 1958年1月8日，周恩來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通報了中國將從朝鮮撤軍的決定，並說毛澤東在莫斯科向金日成提出這一建議時，金起初還擔心「現在撤出志願軍不好」，後來才表示同意，「認為這可以給美國出一個難題，有好處」。周恩來說，中國將從朝鮮全部撤軍，「我們撤退後，朝鮮人民軍就可以接防三八線，逐漸可以熟練起來，同時，我們……將把撤回部隊留駐在鴨綠江邊，萬一發生事變，朝鮮政府認為有必要時，我們隨時可以過江抗擊敵人」。[131] 1958年2月，周恩來訪問朝鮮，同金日成談妥，志願軍將分三批在年底前全部從朝鮮撤出。[132] 回北京途中，周恩來在瀋陽同當地領導幹部談到了朝鮮問題以及對金的看法。他說，「我們通過這次訪問，更全面地接觸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實際，根據這種實際情況的了解，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要作重新估價」，不能「只看到人家陰暗的一面，沒有看到人家好的一面」；金日成這個人「還是有能力」的，雖然「不是那樣理想的人物，可是根據朝鮮的情況也只好從矮子中選高子」；金「有些個人主義、宗派主義，甚至錯誤地處分和殺錯了一些人，這是已經過去了的事情」，對他「應該要全面看，這個問題也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133]

毛澤東、周恩來等對金日成態度發生大變化的要因，應在於1957年的一系列變化，尤其是中國國內從百花齊放到「反右」的轉變，促使毛舉一反三，對金大搞「個人崇拜」及鎮壓黨內反對派的行為有了新的感受。同時，朝鮮那幾個反對派跑到中國避難後，根據他們在國內的級別，被好好地養了起來，但他們卻不知謹言慎行。周恩來在瀋陽的報告中即提到，他們(朝鮮反對派)在反右時「到處亂說，不僅反對朝鮮勞動黨，也反



「金日成同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营长，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当然不是那样理想的人物，可是根据朝鲜的情况也只好从矮子中选高子，苏联把他选提起来了，我們不信任，对中朝友好团結不利，也会影响中苏友好团結。現在經过了革命战爭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考驗，金日成同志在群众中还是有威信的，我們到各地去参观，群众热烈欢迎，其实这是对他們自己的領袖的欢迎。这就是說金日成同志已經是朝鲜群众的父亲，你要在儿子面前說父亲不好，哪有不遭到儿子反对的呢？金日成同志几年来領导战爭胜利了，工农业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信任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金日成同志有些个人主义、宗派主

— 5 —

义，甚至錯誤地处分和杀錯了一些人，这是已經过去了的事情。金日成同志个人和朝鲜共和国还存在着一些缺点，这是事实。但是我們对这些缺点如何看法？应該要全面看，这个問題也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問題，再严重一些說至多也是兩个指头与八个指头的問題。毛主席說：人家是反帝国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的，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在莫斯科十二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上签字的，总比南斯拉夫不签字好。我們有許多同志就不是这样看

圖 19.3：周恩來關於中朝關係的講話，1958年2月21日。(1-1411-1958-94，吉林省檔案館)

對蘇共和中國共產黨，認為中、朝、蘇都是集權主義者，不民主，讚揚鐵托」。[134] 結果，他們在毛、周那裏失寵了。

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峰會上告訴毛澤東，蘇聯要在15年內趕上美國。毛聽到後，也在會上宣佈，「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他還說：「中國人是想努力的。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135] 表面上看，毛把中國的趕超目標定為英國，但他從骨子裏真正希望中國要趕超的其實還有蘇聯。毛回國後就在成都會議上宣佈：「蘇聯四十年才搞了那麼點糧食和東西，假如我們十年八年能比上四十年當然好，也應當如此。因為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也不同，比較生動活潑，列寧主義比較多；而他們把列寧主義一部分喪失了，死氣沉沉。」[136] 在毛看來，既然中共已經在道義力量和意識形態上走到蘇共前頭，那麼如果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他和中共就當之無愧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頭人了。

八

在對「反冒進」實施反擊上，毛澤東還沒有離開蘇聯回國，就開始有了新的動作。他在莫斯科審閱批准了《人民日報》的一篇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於11月13日發表。社論又批評1956年的反冒進，還特別強調要把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當作頭等大事。[137]

毛澤東回到北京後，馬上就撿起了批判「反冒進」的題目，同時把促動「大躍進」提上了日程，推出了「趕超英國」的口號，宣佈「一個新的生產高潮已經和正在形成」。[138] 就在這個當口，他把自己已經憋了近兩年的關於周恩來的那口氣釋放了出來，決定要拿周恩來當年大搞「反冒進」這件事開刀，以一種步步緊逼的方式，將批判的矛頭直接對準了身為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

此後，在毛澤東的全力推動下，「反冒進」在黨的政治語彙中越來越成為一個具有負面含義的概念。12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社論，以尖銳的語言批判支持「反冒進」的人們，「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階段」，實際上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139] 隨着對「反冒進」批判的逐步升級，黨內上層的政治氣氛開始緊張起來，周恩來則成了首當其衝的靶子。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寧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開始向周恩來正面「叫板」。這個會議由毛主持，參加者除一些中央領導人外，還有省市委領導人。周一到會場就發現自己成為會上一個主要的靶子，會議印發的文件中，有《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那篇讓毛耿耿於懷的社論，以及周恩來在1956年11月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這些都是用來批判周恩來的。[140] 毛還對那篇《人民日報》社論有一段旁批：「庸俗馬克思主義，庸俗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是尖銳地針對我。」[141]

毛澤東在會上四次講話，在主持會議時又多次插話，一再對周提出批判，話也是越說越重。他先是批評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工作犯了「分散主義」錯誤，向他彙報時「只給成品，不給原料」，這種做法必須反對。講到

「反冒進」時，毛指責說：他被當成「冒進的罪魁禍首」，結果「反冒進」讓六億人民洩了氣。「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如果當日不提反冒進，只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這三個東西。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而不屬於業務問題。」[142] 毛說得最厲害的一句話是：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五十米了。[143] 毛在會上稱讚了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做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還當面問周：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答道：「我寫不出來。」毛宣佈：「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144] 面對毛在會上咄咄逼人的「攻勢」，1月19日，周在會上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評」，承認「反冒進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促進相反的方針」；又表示「在反冒進上的錯誤，我應負主要責任」。[145]

不過，這些對毛澤東來說還只是「熱身」。3月8日至26日，中央又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毛在會上一共六次講話，對周恩來繼續窮追猛打，提出了更為嚴厲的批評。他說：「現在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在南寧會議上批判了反冒進的錯誤。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應採取『冒進』。」他又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並宣佈「今後還要冒進」。[146] 3月25日，周恩來在成都會議上發言，就反冒進問題作了全面的自我批評。除了國內問題外，周的自我批評也涉及到了他在處理新中國對外關係時的「右傾保守」問題。他承認自己所領導的外交部在處理與民族主義國家的關係時忽略了必要的鬥爭；在面對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對日本和美國）時了解情況不夠，行事處世有一廂情願的現象；對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政策中的修正主義傾向，則沒有進行必要的批評。[147]

即便如此，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批判仍然沒有結束。5月，中共召開八大二次會議，毛在會上四次講話，說了好幾句「狠話」：「假如黨分裂，就會亂一陣子。假如有人不顧大局，和莫洛托夫、高崗一樣不顧大局，黨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們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更要注意顧全大局，誰不顧全大局誰就要跌跟頭。」[148] 在毛的凌厲攻勢面前，周只能拼命作更為深入的自我檢討。

但是，這對於周恩來卻並不容易。自從周在延安整風中受到批判以來，十多年已經過去了。雖說他對於整風中的經歷以及由此而獲得的教訓須臾不敢忘卻，但畢竟自那以後還沒有遭遇過毛澤東如此「上綱上線」並抓住不放的追批。怎樣才能寫出一份讓毛滿意的檢討？周絞盡腦汁卻不得要領。據他的秘書范若愚回憶，周寫檢討時曾把范叫去，自己講一句，范記一句，他「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來」。范暫時離開周的辦公室，「讓他安靜地構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來記錄一段」。然而，直至半夜過後，周仍然獨自一人坐在辦公室裏發呆。最後，鄧穎超出面，還是由周口授發言內容，再由范整理成文。[149] 范若愚發現，周「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髮又增添了」。此後，用范的話來說，「周恩來遇事發表意見比較少了」。[150] 也就是說，周恩來不講話了。

毛澤東一生講過的話中，對的很多，錯的也不少。他講得最對的話當中，有一段是：「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家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151] 問題在於，毛雖然講過這個話，但他大權在握、又根本不存在對權力的任何制衡體制，在「人家講話」時，只要不合他的心思和理念，他動不動就給人家扣帽子、打棍子。大凡他不「讓人家講話」時，就是他要闖禍、甚至闖大禍的時候了。他在反「反冒進」上大批、狠批周恩來，把周的口給封住了，沒法講話了。看上去，他當時在這場黨內鬥爭中又是大獲全勝，但其後果——正如歷史告訴我們——卻是極為嚴重的：如果周恩來還能講話，那麼像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大饑荒、幾乎讓天都快塌下來的空前災難，還會如此輕易地發生嗎？

5月30日，周恩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發言。他開宗明義就承認反冒進的錯誤極為嚴重，「我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他把自己的錯誤和右派進攻聯繫了起來，「1957年春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他們利用反冒進的錯誤，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設成就，把1956年躍進中的某些缺點誇大為『全面冒進』，並且進一步否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成就」。周說，「在這個嚴重的階級鬥爭面前，我開始覺醒」，才在1957年6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冒進的錯誤估計」。周還說，自己犯嚴重錯誤「不是偶然發生的」，「錯誤的思想根源是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在多數問題上表現為經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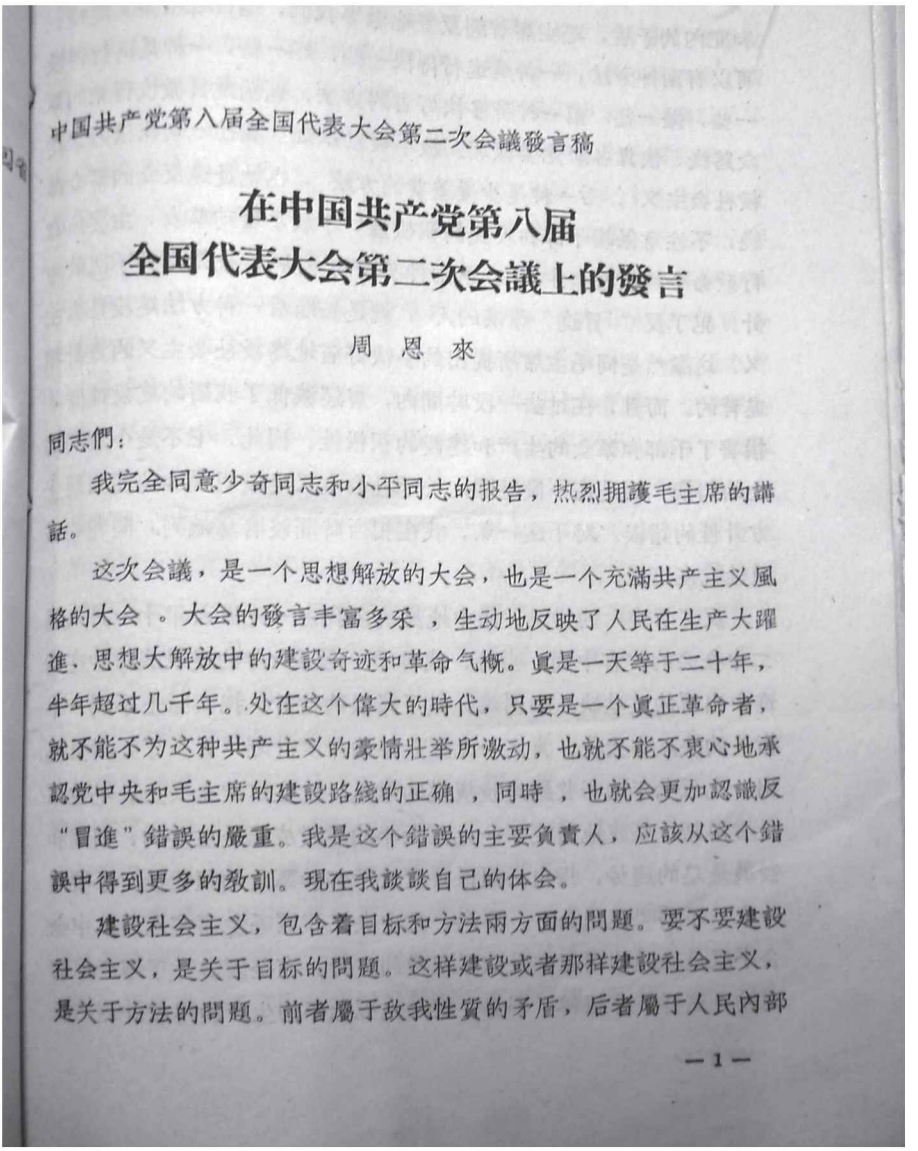
義，在某些問題上則表現為兩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這些錯誤，結果造成了建設工作中的右傾保守的錯誤。這樣，就違背了毛主席一貫主張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總方針」。[152] 除了狠批自己的錯誤，周還大肆歌頌毛澤東，幾乎完全重複了自己十幾年前在延安整風時說過的話：

> 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錯誤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或者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思想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必須下苦功夫，認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學習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學習他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學習他的思想和作風以及他所具有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的風格。[153]

上述文字摘自中共中央下發傳達到縣、團級的八大二次會議文件。這是一個經過「淨化」的稿子，不僅把周恩來檢討的語氣改輕了，也刪去了他對自己上綱上線的一些內容，但讀上去仍令人觸目驚心。難怪周恩來在準備這篇檢討時，會經歷那種身心俱疲的困難時光。

周恩來作了上述檢討後，毛澤東在會上表示：「反冒進解決了，現在中央是團結的，全黨是團結的。」[154] 他同時在會上「乘勝追擊」，提出一個15年奮鬥目標：7年趕上英國，加8年趕上美國。[155] 毛還宣佈：「今年下半年，你們就看到要有一個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還要厲害。」[156] 這等於是說，在「反冒進」問題徹底解決後，大躍進就要開始了。

批判周恩來的鋒芒，甚至侵入到了他長期任部長的外交部。年初，他辭去了外長職務，由陳毅接任。3月6日，中央又宣佈，成立「中央外事小組，負責領導全盤外事工作」，由陳毅任組長；同時在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亦由陳毅任主任。[157] 周恩來在這兩個機構中均無一席之地。陳同周私交甚篤，但他到外交部就職後，仍然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外交部在周領導下的「錯誤」加以清理和批判。從6月上旬起，陳毅在外交部主持召開一系列「務虛會議」。6月17日，他在務虛會第27次會議上講話時，傳達了毛的一系列指示。關於1954年日內瓦會議，毛說，當時同意和美國人接觸，「這與自己一貫的想法不一致，看來還是原來的想法好，即堅持和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發言稿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上的發言

周 恩 來

同志們：

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的报告，热烈拥護毛主席的講話。

这次会議，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滿共产主义風格的大会。大会的發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迹和革命气概。眞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个眞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壯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設路綫的正确，同時，也就会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我是这个錯誤的主要負責人，应該从这个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現在我談談自己的体会。

建設社会主义，包含着目标和方法兩方面的問題。要不要建設社会主义，是关于目标的問題。这样建設或者那样建設社会主义，是关于方法的問題。前者屬于敌我性質的矛盾，后者屬于人民內部

圖 19.4：周恩來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1958 年 5 月 30 日。
（855-4-1273-3，河北省檔案館）

美國鬥爭，不和美國政府發展關係。……這是顯示中國人民能否站起來的問題，帝國主義侵略我國一百多年了，不能忘了。要利用美國對華（封鎖）三原則，關起門來，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158] 毛還對周的其他一些做法提出批評：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談前釋放11名美國人，「是替美國人講話」；1958年2月和日本簽訂鋼鐵長期貿易協定，是「方針性的錯誤」。[159] 6月18日，周恩來在會上做長篇發言，檢討自己在主持外交部工作、尤其是在「反冒進」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他從「個人反省」開始，講到自己犯錯誤的根源「主要是經驗主義，教條主義也有，沒有把局部的經驗提高到原則加以總結，看了一方面的材料，聽了一方面的反映，沒有作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沒有聽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和勞動人民的反映，看不見躍進的可能，因而提出預算不能增加過多，指標不能訂得太高，經過三年馬鞍形的發展，更加證明反冒進錯誤的嚴重」。[160] 務虛會議開到最後，把中國外交要做的幾件事歸納為「搞臭南斯拉夫，鞏固社會主義；打擊美國，搞垮帝國主義；鼓勵日本（左派），爭取民族主義」。[161]

面對毛澤東的一再批判，周恩來覺得自己已不適合擔任國務院總理。他再三思索之下，向政治局提出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這其實也是周以守為攻的一步棋，以此來探明毛澤東的底線。6月9日，政治局開會，劉少奇、朱德、林彪、陳雲、鄧小平等常委都不同意周辭職，毛也沒有表示異議。會議最後決定，挽留周繼續擔任總理。會後，鄧小平專門整理出會議紀要，寫明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並將紀要呈報毛澤東。毛批示：「退（楊）尚昆存。」[162]

就這樣，一場大風波似乎過去了，周恩來保住了總理職位，也仍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從表面上看依舊是中共核心決策圈子的一員。但實際上，這件事並沒有就此完結。6月8日，毛澤東提出要從組織上改組中央決策及實施機制，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等五個小組，分別由陳雲、彭真、陳毅、聶榮臻、陸定一擔任組長，「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同時明確規定，「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163] 兩天後，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

組的通知〉，由陳雲任財經小組組長，彭真任政法小組組長，陳毅任外事小組組長，聶榮臻任科學小組組長，陸定一任文教小組組長，並明文規定「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164] 這一新部署付諸實施後，由於周身為總理卻不是書記處成員，其實際權力縮小並受到限制，國務院某種程度上成了書記處的辦事和執行機構，在決策中只有建議和執行的權力了。結果，周在黨內最高決策層的地位下降，實際上不僅排在毛澤東、劉少奇之後，甚至還落到了林彪、鄧小平、陳雲、彭真之後。在此後幾年裏直至文化大革命發生，他在黨內最高領導層的地位和作用，也更多地成為大政方針的執行者，而不是戰略和政策最主要的制定者了。

這一切很難不讓周恩來回想起十多年前在延安整風中的經歷。那之後，他就為自己和下屬立下了「多做工作、經常檢討」的做事的規矩。但畢竟，整風過去十多年了，再深刻的記憶也難免會蒙上歲月的塵埃。這一次，毛澤東又為他重重地敲響了警鐘。對他來說，這是一種極為嚴厲的警告：如果他偏離了毛的領導以及大政方針，根據自己的意願和判斷講出同毛的意見相悖的話，那麼毛就有本事隨時把他拿出來開刀，甚至在政治上置他於死地。這是周恩來至死都再不會忘記的警告。

第20章

大躍進
（1958–1960）

一

1958年，春去夏來。就在周恩來被毛澤東的狠批搞得灰頭土臉時，「大躍進」的狂潮已開始席捲中國大地，華夏神州沉浸在一片極度亢奮的氛圍中。

狂潮又是毛澤東帶頭掀起的。發展速度問題，同毛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新中國合法性聲明緊密相關。這從來就是他的一種抱負、一塊心病，同他「革命必須繼續」的理念和想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1958年新年伊始，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狠批周恩來、大反右傾，在會上講了工作方法六十條，後來又形成了文字，其中有一番極富深意的話：

> 不斷革命。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在全國範圍奪取政權開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接着又是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後，馬上就要提出新的任務。[1]

在毛澤東的眼裏，中國當時面臨的新任務就是「超英趕美」，他這幾年已講過多次。1955年，他就曾提出：「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我們一定要爭這口氣。」[2] 1957年，他準備對「反冒進」全面發難時，又在莫斯科共產黨峰會上向世界宣佈，中國要在15年內超過英國。[3] 進入1958年，毛澤東在大批「反冒進」的同時又不斷提出「趕超」問題。1月底，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宣佈，要革地球的命，向自然界宣戰，「十五年趕上英國，這個事情要變成一個主要的事情」。[4] 八大二次會議上，他一面在「反冒進」上繼續批判周恩來，一面又說：「現在看來，十五年就可以趕上英國，並且趕上美國。」[5] 不僅如此，他嘴裏講「趕英超美」，眼睛其實還盯着蘇聯：「中國應當成為世界第一個大國，中國人口多，為什麼不應當成為世界第一？在延安的時候，林彪同志向我說，將來中國要趕上蘇聯，當時，我還不相信，我想，蘇聯也在進步呀！現在，我相信了。」[6]

在毛澤東為「冒進」正名後，「躍進」作為他的「不斷革命」論的有機組成部分，便成了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當紅詞彙」。周恩來一再就「反冒進」做檢討的同時，專門給毛寫了一封信，其中提到自己其實早已使用過「躍進的發展」一詞。[7] 毛澤東給周恩來「反冒進」的「嚴重錯誤」蓋棺論定後，也順理成章地為大躍進吹響了進軍號角。

怎麼搞大躍進？毛澤東最重視的是鋼鐵生產。他要以鋼為綱，通過鋼鐵產量的大飛躍，帶動全局。[8] 八大二次會議剛開過，6月17日，他收到了負責計劃經濟的副總理李富春的報告：到1959年，所有工業產品除電力外，都要超過英國。這份報告本來就是按毛的意思一再修改後寫成的，他讀後極為興奮，立即批示轉發。[9] 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隨之決定，要發動全民參與一場「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讓1958年的鋼鐵產量至少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10] 毛又親自委派周恩來出任鋼鐵大躍進領導小組組長，主管協調全民大煉鋼鐵，讓周也騎上了虎背。[11] 毛澤東的頭腦本來就夠熱的了，這時更是變得滾燙。他對趕超英國速度的估計又有新飛躍：「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12]

大躍進的狂飆也颳遍了中國的廣袤農村。夏天的幾個月裏，全國各地都好像着了大火一般，報出的夏糧產量不斷大放「衛星」，畝產從幾百斤開始，火勢幾倍、幾十倍乃至上百倍地往上直竄，並到處蔓延。「捷報」如雪片般飛入中南海，毛澤東看到後心中大喜，居然談起糧食太多了「還要找出路」的問題。[13]

周恩來的處境極為尷尬和困難。從道理上說，他還是總理，經濟建設上的事還要他管，確定生產指標等更是他的職責。但是，他剛剛在「反冒進」上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判，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做「深刻檢討」的餘音依然環繞樑間。6月初中央決策機制調整後，他的頭上又罩着五個分管各領域的中央領導小組，把他的手腳完全束縛住了，在經濟計劃制定和實行上的發言權也大大縮小。更何況，周恩來要面對的，除了毛澤東那雙盯住他的眼睛外，還有像抽了風似的整個中共領導層，包括劉少奇和鄧小平等領導人，都唯恐在高指標的追求上跟不上毛的步伐。陳雲說：「現在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熱，全國許多領導都熱。」[14] 鄧小平後來回顧這一段時也說過一句大實話：「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15] 確實，當時周恩來心中即便有什麼疑惑和不安，也講不出來。面對一浪接一浪的大躍進狂潮，他必須擺出熱烈支持的姿態，說各種為大躍進推波助瀾的話。7月初，他到廣東新會視察時說：我們把社會主義建成，還要進入共產主義，就要實現革命化、群眾化、多樣化，做到城鄉結合、工農結合、體力及腦力勞動結合，中心精神是要有共產主義風格。[16] 周恩來在那年夏天有過多次類似的表態。

即便如此，周恩來偶爾還是會說幾句「潑涼水」的話。7月間，他在廣東幾個地方看到高產密植的示範後，心裏並不相信，但又不能當面戳穿，只好婉轉地說，還是要合理密植。7月7日，他藉着引用毛澤東前幾天不要追求浮誇的一段批語，才較為明確地提出：糧食產量要避免虛假，要保證農民的口糧，「千萬不要講大話，損害群眾的利益」。[17] 周是鋼鐵生產領導小組組長，但他對鋼產量可以如此翻番的報告，其實滿是疑惑。他的工作秘書顧明曾留學日本並在鞍鋼工作，周看到河南新鄉放出生產生鐵102

萬噸的「衛星」後，派顧去河南實地了解情況，顧帶了一些土法煉出的生鐵回京，周看後嘟嚕了一句：「這哪是鐵麼！」[18] 只不過，周恩來發出的疑慮之音是如此微弱無力，幾乎頃刻之間就淹沒在高亢的革命化情緒及語言的汪洋大海之中。

大躍進年代的左傾颶風也颳進了軍隊。根據毛澤東的意思，夏天軍中掀起了一場批判教條主義的狂飆。主持者是國防部長彭德懷，被放上砧板任人批判宰割的主要是劉伯承元帥、粟裕大將和肖克上將。[19] 說起來，這件事並不自1958年夏天始，早在毛不斷批判周恩來「反冒進」的言論和做法時，他就幾次把軍隊中的「右傾」當作批判的目標。在南寧會議上，毛就提出軍隊要整風，要吸取蘇聯的教訓。[20]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又在成都會議上根據毛的意見做出決議，「建議軍委召集一次擴大會議，用整風方式，討論軍事建設中的重要問題」。[21] 這次會議從5月27日開始舉行，先是批判總參謀長粟裕大將的「個人主義」。6月上旬，毛澤東提出了要在軍隊系統反對教條主義、軍閥主義的大問題，並說會議「溫度不夠」，「不開好就不散會」。[22] 這之後，在國防部長彭德懷和總書記鄧小平「掛帥」推動下，會上除粟裕外，劉伯承元帥和肖克大將也成了批判和鬥爭的重點。[23] 6月21日，毛澤東在和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不點名地批評「有些人就是搬外國，不加區別的搬外國」，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得想辦法幫助他們通一通」。[24] 兩天後，他又在軍委擴大會議各組組長彙報會議上，提出「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的口號。

那些年裏，軍隊的事除非同外交等有關，或經毛澤東點名要他參與，周恩來一般是不管的。軍中批教條主義，以及拿劉伯承、粟裕和肖克等開刀，他也沒有直接參與。但歷史的諷刺恰恰在於，一年之後，彭德懷自己在廬山會議上成了嚴厲批判的靶子。他用來批判劉、粟、肖的那套蠻不講理、以勢壓人的手法，本來就是從毛那裏搬來的，到廬山會議上又被毛成倍放大後拿來對付他。這裏的區別只是在於，劉、粟、肖等遭到批判後並沒有被徹底打倒；而在廬山會議上，彭卻被徹底打倒，一直到死也沒有翻過身來。

8月17日至30日，中共領導人在北戴河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準備了一份「彙報提綱」，供會議討論。他開宗明義說，1958年形勢很好，國民經濟大躍進已成定局，要在此基礎上，三年內「在保證盡快地發展糧食、鋼鐵、機器製造以及電力、交通運輸的前提下，……建立起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以及「比較先進的技術基礎」。1958年鋼產量完成1,070萬噸後，1959年要爭取達到3,000萬噸，1960年要達到4,500萬噸；糧食產量1960年要達到人均1,500斤。同時，還要「基本上掌握導彈和原子能的生產技術」。儘管他還講到，1958年「一些指標定得高了一些，有不少缺口難以解決」，但整個提綱的調子是高亢的。[25]

毛澤東當然是會議的中心。他多次發言，涉及面甚廣。他說，1958年要把1,100萬噸鋼產量拿到手，「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大工業國」。在農村，「糧食問題基本上解決」的同時，「不搞人民公社不行」，而且要搞「人多、地大、生產規模大、各種事業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的大社。他甚至發問：「二十二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麼建設共產主義不行了呢？」[26] 周恩來在會上沒有多說話，即便講，也是順着毛的調子，字斟句酌，只講好話，不講反話，更不敢提任何批評性的建議。

最後，會議為大躍進規定了一系列不可能完成的指標：1958年鋼產量要比上一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糧食產量要達到6,000至7,000億斤。[27] 會議還決定，要在農村普遍建立具有共產主義雛形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並宣佈：「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28] 會後，毛意猶未盡，又在「趕超」速度上進一步加碼：「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之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他要求全黨必須解放思想，要有大手筆、大視野：「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29]

大躍進本來就已是洶湧潮流，北戴河會議又如同一場傾盆大雨，把它變為地地道道的「洪水猛獸」。

二

1958年夏天，除大躍進外，周恩來還捲入了另外幾樁看上去不相干、但實際上有聯繫的大事。其中一樁是繼1954年後，台海地區又出現了危機情勢，只是這一次局面更為嚴重，涉及面也更為寬泛。

我還依稀地記得，那年夏天，周圍幾乎總是鬧哄哄的。父母留在單位裏「大煉鋼鐵」，幾個月看不到他們。現在還清晰地留在腦子裏的，是一首那時街上大喇叭不斷放送的歌〈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怒火燃燒，吼聲震天，中國的領土絕不容美帝侵犯。六萬萬人民的意志，誰也不能阻攔，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那是我上幼兒園的最後一年，老師告訴我們，解放軍正在炮打金門。很多年後，我研究冷戰時期中美關係史，才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了解較多。1958年夏天，幾乎在大躍進狂潮席捲全國城鄉的同時，毛澤東和中共對台灣的政策出現了從「文鬥」到「武鬥」的急轉彎，並把前兩年周恩來在台灣問題上說過的話、做過的事都翻轉了過來。

本來，1954至1955年台海危機結束後，中共領導層對台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轉移到強調「和平解放」台灣的路子上來。周恩來是歷史上兩次「國共合作」的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又是全國政協主席，也站到前台，唱起「和平解放台灣」的緩和曲。1955年7月30日，他在人大會議上提出：「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30] 1956年6月28日，他又公開向蔣介石喊話：「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31] 7月29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指示〉。[32] 毛澤東也表示，如果台灣能夠回歸祖國，可以「一切照舊，……可以實行三民主義」。[33] 1956至1957年，周恩來通過一系列私下渠道，例如民主人士章士釗、香港記者曹聚仁等，一再試圖同台灣當局乃至蔣介石本人溝通並建立聯繫。

到1958年夏天，幾乎一夜之間，周恩來唱了兩年多的對台灣寬鬆溫和的調子被打斷。就在全中國都捲入大躍進狂潮時，8月23日，毛澤東一聲令下，解放軍駐福建前線部隊開始大規模炮轟金門。這之後的六個星期裏，解放軍一直持續對金門的炮擊，台海地區再次爆發危機。

這種突然轉變的背後，有着中共對台政策的邏輯。說到底，中共持續實行對台「和平解放」戰略的一個前提是台灣當局要有積極反應。但1955年後的兩年裏，蔣介石堅執不予理睬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毛和中共領導層「以打促談」的心理。再從軍事態勢來看，國民黨部隊佔領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對福建沿海地區及交通線構成了嚴重威脅，這種局面必須改變。那兩年裏，解放軍在福建沿海地區的軍事準備從未停止。1957年春，鷹廈鐵路建成通車，大批重型武器裝備得以運入福建前線；下半年，幾個機場又先後在那裏建成。1958年上半年，解放軍空軍轉場成功，改變了國民黨空軍控制福建沿海制空權的局面，也為奪取沿海島嶼創造了條件。中央軍委開始考慮對金門實行炮擊封鎖的計劃。[34]

更深入地來看，毛澤東決定炮打金門，還同大躍進期間全國的「超常動員」有緊密聯繫。毛是動員群眾的大師，他一定會想到，台海危機局勢產生的外部高度緊張的壓力，會使得因大躍進而出現的內部高度緊張的狀況顯得更加合理。用毛自己的話來說：「面前有一個敵人，緊張對我們有利」；「緊張對西方有利的是能夠擴大軍火生產，對我們有利的是能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緊張使得人們想問題，緊張可以把人們的積極因素調動起來，……可以調動人馬，調動落後階層，調動中間派起來奮鬥」。[35]我們可以這麼看毛澤東的話：如果大躍進是一齣京劇大戲，那麼炮擊金門就是劇中的鼓點。如果沒有這種配合，這齣大戲也就會失去韻律和節奏，那麼大戲的精華與實質也就體現不出來了。

毛澤東決定在8月下旬開始打炮，又和遠在中東的伊拉克局勢發展有關。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發生了反美民族主義革命。隨後，美英出兵黎巴嫩，導致中東出現危機形勢。毛自己的說法是，通過炮擊金門，可以牽制美國的注意力，影響「中東解決」，從而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帝鬥爭。[36]同時，他恐怕也想抓住美國的注意力被牽制在中東的機會，試探1954年美台條約簽訂後，美國對台灣政策的底線究竟在哪裏。

解放軍炮擊金門後，周恩來在外交上的擔子驟然加重。美國因和台灣締結了防衛條約，對此的反應極為強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警告說，中共若以武力佔領沿海島嶼，「將引起嚴重後果」。艾森豪威爾總統也聲

明，金門等島嶼對於保衛台灣極為重要，美國「不會放棄對中華民國的責任」。[37] 美國軍方制定了應急計劃，甚至討論了在台海地區使用戰術核武器的備案。[38]

其實，關於如何阻止美國在軍事上干預台海危機，周恩來早在炮打金門前就已開始考慮。8月21日，他約談章漢夫、喬冠華等，討論確定12海里領海的問題。這件事涉及中國海疆確定的大問題，周在前幾年已開始着手處理，並約請周鯁生、倪征燠、劉澤榮等法律專家就此進行研究。[39] 但此時，他親自抓此事，想的是要以此作為一種手段，限制美艦在中國沿海12海里內、包括金門周邊海域的活動。兩天後，他又專門到北戴河就宣佈12海里領海之事向毛澤東彙報。[40]

隨着台海危機似乎又一次把中美兩國帶到了兵戎相見的臨爆點，9月3日晚，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應對方略。中共領導人分析，美方「估計我們準備解放台灣」，他們「想守住台灣」，但在固守金、馬「尚未下決心」，也「未必敢在金、馬同我們幹起來」。周恩來在會上提出，可「採取宣佈我領海為12海里的辦法，使美國軍艦不敢迫近屬於我領海範圍的金門、馬祖」，獲得會議批准。毛決定，福建前線部隊從第二天起停止炮擊三天，以觀察「各方動態」。[41]

毛澤東還想到了中美關係。他說：「有武戲，又有文戲」，要準備恢復已中斷大半年的中美會談。[42] 日內瓦會議後，中美兩國開始舉行領事級會談，亞非會議後又升級為在華沙舉行的大使級會談，處理了留學生遣返等一些具體問題。1957年底，美國駐華沙大使離任，美方提出由代辦出席會談。中方把這一變動視為對大使級會談有意「降格」，兩邊打起筆仗，互不相讓。[43] 直到台灣危機發生，會談仍處於中斷狀態。

9月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宣佈，中國領海寬度為12海里，適用於台灣及其周圍各島，以及南海「屬於中國的島嶼」，「一切外國飛機和軍用船舶未經我政府的許可，不得進入中國的領空和領海上空」。[44] 這個聲明發表後，蘇聯政府於9月9日照會中國政府，表示「完全尊重」中國政府將「領海寬度規定為12海里」的決定。[45] 9月14日，越南民主共和國總理范文同致函周恩來總理，明確表示越南政府「承認和贊成」中國政府9月4日關於領海決定的聲明，並「將指示負有職責的國家機關，凡在海面上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發生關係時要嚴格尊重中國領海寬度為12海里的規定」。這一信件由越南駐華大使阮康（Nguyễn Khang）於9月21日面交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46]

美國決策者本來就在是否幫助國民黨保衛金、馬等島嶼上存在分歧。周恩來發表聲明的同一天，杜勒斯也發表聲明，一面重申「保衛金馬與保衛台灣相關島嶼」，一面表示美國願意通過談判來解決中美之間的爭端。[47] 9月6日，周針對杜勒斯的聲明又發表聲明，強調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中國政府完全有權對盤踞在沿海島嶼的國民黨部隊予以堅決打擊。但周同時又表示，如果美國願意談判，中國政府也準備恢復中斷了大半年的華沙大使級會談。[48] 此後，中美雙方同意於9月15日恢復舉行會談。

毛澤東當時的想法是，可以通過談判由美國迫使國民黨撤出金、馬等沿海島嶼，既為台海危機「解套」，又恢復並保留這一中美交往的渠道。[49] 周恩來對毛的這一設想極為贊同，他親自準備了一份方案，強調台、澎、金、馬是中國領土，中國政府有權「採取一切適當的方法，在適當的時候」解放它們，並要求「美國政府保證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一切武裝力量」。但同時，方案又頗具新意地提出：

> 如果國民黨軍隊願意主動地從這些沿海島嶼撤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不予追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解放了金門、馬祖等內海島嶼以後，願意爭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灣，並且在一定時期內避免使用武力實現台灣的解放。[50]

周恩來將方案交給中方談判代表王炳南時，又面授機宜：會談中「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研究餘地，你不忙提出我方方案，而將其中過分荒謬之點予以評論，其他則保留下次會議再予以全面回答」。但如果美方「不提具體意見而又急於要知道我方意見，我方亦可使用這一發言要點，並將預定方案提出」。[51]

毛澤東是政治角逐場上的老手。他批准上述方案後，思來想去，覺得仍有不妥之處。9月13日，他寫信給周恩來，就談判策略作出了新的指示：「華沙談判，三四天或一週以內，實行偵察戰，不要和盤托出。彼方

亦似不會和盤托出。」[52] 周隨之轉告王炳南，要他在會上「先與美方周旋，逼其先我露底」。[53]

9月15日，中美大使級會談恢復舉行。美國大使比姆（Jacob Beam）先發言，他強調為防止軍事行動擴大，中方應立即停止對沿海島嶼的炮擊。[54] 雙方隨即短暫休會；復會後，王炳南發言。他先反駁比姆說，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中國有權用「一切適當手段」解放台灣。台海地區緊張的根子，是美國對台灣的侵佔，只有美軍撤出才能緩和下來。但隨後不知為何，也許是周的話講得還不夠清楚，也許是轉達指示的渠道出了問題，王竟然沒有按照毛、周的補充指示行事，把本來應是中方談判底盤的方案端了出來，包括國民黨軍隊如主動從金、馬撤走，「中國政府將不予追擊」，以及在收復金、馬等後，將爭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澎，並「在一定的時期內避免使用武力」。這些主張其實頗有新意，若美方接受，就等於中美雙方在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上達成了某種默契。然而比姆未加思索，當即表示拒絕中方建議，因為美國「不能要求一個盟國從自己的領土上撤出」。[55] 9月18日，王和比姆再次會談時，比姆正式拒絕中方的方案。[56]

當時，毛澤東正在合肥視察，看到9月15日中美會談的報告後，勃然大怒。王炳南居然不等美方亮牌就露出了中方底牌，這必定會造成美方的錯覺，以為中國急於拿下金、馬，等於在美國人面前示弱。毛禁不住破口大罵：王炳南簡直比豬還蠢，豬撞到牆上還知道要掉個頭，王炳南撞到牆上還不知掉頭。[57] 王炳南是周恩來麾下的一員大將，他出了這麼大的差錯，周只好親自出來打圓場，對這個「重大錯誤」承擔責任，把出錯的原因歸於自己沒有對王交代清楚。毛又批評周對王的指示「繁瑣而不扼要，界限不明，軟弱無力，以致犯了錯誤」。毛提出要「召陳毅立即回京，協助你主持此事」，又指示：「每次王炳南發言稿，都由北京起草，不許擅作主張。」毛還要求，一定要在下次會談時採取進攻戰略，以「爭取主動」。[58]

毛澤東發話後，周恩來不敢怠慢，馬上主持開會議討論落實毛的指示。會後，他在給毛的報告中檢討說：「我方方案提得過早，給了對方一個錯覺，以為我們急於求成。」他提出幾條建議以重新「爭取主動」，包括由外長發表駁斥杜勒斯的聲明、動員國內媒體及各界廣泛響應、請求蘇聯和兄弟國家配合行動等等。周還建議，為配合外交活動，「在不觸及美國空軍、

海軍的條件下」，對金門再採取一次海、空、炮三方面協同參加的較大行動。[59] 毛立即回信同意周的建議，稱讚說這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是我們外交鬥爭的必須形態」。[60] 周隨即指示王炳南，在下一次會談中「堅持要求美國撤兵的新方案，以配合我在國內外和在軍事上打擊美國的鬥爭」。[61]

9月22日，中美華沙會談繼續舉行，王炳南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完全不提自己一週前提出的國民黨軍隊由金、馬撤退的建議，而是強硬表示中方決不能接受美方關於在台海地區先實行停火的「荒謬」主張；作為解決台海危機的第一步，美國必須從台海地區撤出所有武裝力量。[62] 結果，中美大使級會談又重新淪為一個雙方相互指責、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的場合了。但不管怎麼說，中美談判這條渠道又開通並保留下來。

與此同時，解放軍福建前線司令部提出，為「配合華沙談判鬥爭」，要對金門「增大壓力」，並拿出一個「陸空炮聯合攻擊，全面開花」的計劃。[63] 本來，這是根據周恩來前兩天給毛澤東的報告制定的，但周看到計劃後，又覺得不妥。9月22日，他給毛寫信建言：三軍聯合作戰「不易配合很好，且有觸及美艦、美空軍的可能」，還「恰好給蔣介石空軍以轟炸我大陸的機會」，因此「在目前形勢下對金門作戰方針，仍以打而不登，斷而不死，使敵晝夜驚慌、不得安寧為妥」。[64] 毛讀後，立即批示「即照此辦理，使我們完全立於不敗之地，完全立於主動地位」。[65] 這樣，解放軍除繼續對金門的炮擊外，並未採取使戰爭升級的其他行動。

9月底，台海危機已持續了一個多月。毛澤東和周恩來注意到，美國的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9月30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稱，美國「沒有保衛沿海島嶼的任何法律義務」，還說如果台海地區能實現停火，國民黨「在沿海島嶼上保持大批部隊就是愚蠢的」。[66] 實際上，這是美國決策者對王炳南9月15日在華沙談判中「和盤托出」的中方建議的反應。但是，它來得太遲了。

杜勒斯的聲明引起了周恩來的警覺。10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台海局勢。周分析說：「杜勒斯的談話，表明美國想趁目前這個機會製造兩個中國，要我們承擔不用武力解放台灣的義務，以此為條件，美國可能要台灣放棄所謂『反攻大陸』的計劃，並從金門、馬祖撤退。」他總結說：「這個政策，一句話就是以金、馬換台、澎，這同我們最近在華沙中

美大使級會談中偵察美方底牌的情況是一致的。」[67] 毛澤東同意周的看法，在會上總結：「美國就是以金、馬換台、澎這麼一個方針，如果我們只搞回金、馬來，恰好我們變成執行杜勒斯的路線了。」[68]

這麼一來，毛澤東和整個中共領導層處理台海危機的思路也發生了變化。本來毛「不是不想拿下金門、馬祖」，但又不得不「考慮美國的態度，切不可以魯莽行事」。在這次會議上，他聽了周恩來發言後說：「蔣介石是不願撤出金、馬的，我們也不是非登陸金、馬不可。」毛想到了「絞索戰略」的概念，「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裏」，變成套在美國脖子上的一根「絞索」。他說：「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裏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打炮，什麼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麼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鬆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裏，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69]

10月5日，毛澤東下令解放軍暫停炮擊兩天，並起草了以彭德懷名義發佈的〈告台灣同胞書〉，宣佈從10月6日起，以美國人不提供護航為條件，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金門，以便使金門等島嶼的國民黨與同胞獲得供應品。同時，毛又向蔣介石伸橄欖枝，說「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又說「歸根結底，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70]

這以後，停火期一延再延，持續一個半月的台海危機終於結束了。但是，它對國共關係的長遠影響卻是深刻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本來就不相信中共，經過這一番又談又打的經歷後，還能指望他們對毛澤東和中共的「統戰」姿態存有任何希望和幻想嗎？周恩來前幾年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努力，也付諸東流。

三

1958年夏天，周恩來要出面應對的另一件大事是：在大躍進浪潮洶湧和台海地區炮聲驟起的背景下，中蘇同盟關係也亮起了紅燈。

9月5日，台海開始打炮一個多星期後，周恩來接到蘇聯駐華參贊蘇達利科夫來電求見。見面後，蘇達利科夫說台海危機發生後，美國做出了強硬表態，他剛剛接到赫魯曉夫親自打來的電話，說莫斯科決定派外

長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於第二天（9月6日）不公開訪華，談一下蘇方「對台灣局勢的看法」。他根據赫魯曉夫的指示說明道：「蘇聯政府正在起草一封以部長會議主席名義致艾森豪威爾的信。信中許多問題提得很尖銳。因為涉及到國際鬥爭中的重大措施，蘇聯同志願意及時地同中國同志交換意見。……如果中國同志同意的話，葛羅米柯同志準備在今天夜裏從莫斯科乘專機起飛，預計明天下午到達北京。」蘇達利科夫的話講得很客氣，但隱約中也透露出了對中方的不滿。周恩來洞若觀火，當即表示，「非常歡迎葛羅米柯同志來北京」。他為中國對台海危機的政策做了一番澄清和解釋，並強調解放軍「炮擊金門、馬祖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灣」，而是要「對金馬駐軍給以打擊，給以懲罰」，同時「在國內教育人民」，並「阻止美國搞兩個中國」。他還表示，如果打出亂子，「中國自己承擔後果，不拖蘇聯下水」。[71]

周恩來的應對中其實已透露出，曾經被稱為「牢不可破」的中蘇關係遇到了麻煩。但本來，直到1958年春天，中蘇關係中雖有小的磕磕碰碰，大體上仍是一派春風拂面的景象。在一些關鍵點上，雙方的同盟關係更顯得如日中天，繼續朝着發掘深度和拓展廣度的方向發展。1957年6月14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Pavel Yudin）根據赫魯曉夫的指示面見周恩來時提出，蘇聯願意幫助中國建立原子能科研中心，發展原子能工業。[72] 1957年8月6日，周恩來致函布爾加寧，明確提出：「我們考慮在我原子能工業建成後，需要進一步生產原子武器和它的投擲工具，請蘇聯方面給予大力援助。」[73] 布爾加寧收到周函後，當即向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表示「原則上無問題」，並說「日內可以答覆」。[74] 8月25日，蘇方正式照會中方，同意中國政府派代表團赴蘇討論「建立原子工業和生產原子武器、火箭武器及航空技術等問題」。[75] 9月初，由聶榮臻元帥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後，同蘇方的會談進行得相當順利。10月15日，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蘇方明確承諾，將向中國轉讓原子能技術並提供原子彈樣品。[76] 在1958年3月舉行的成都會議上，周恩來講到中蘇關係時說：現在世界上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像蘇聯，才能無代價地（除了紙張費外）把整個藍圖給我們。凡是它有一種定型的東西，包括原子彈、導彈這些東西，都願意給我們。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77] 4月8日，周恩來致信赫魯曉夫，

建議着手執行中蘇間原子能技術合作協定。4月24日，赫魯曉夫代表蘇聯政府正式覆信周：

> 周恩來同志：
>
> 蘇聯政府同意您於本年4月8日來函中所提關於根據1957年10月15日蘇中協議為北京提供特別重要的資料和樣品的建議。
>
> 蘇聯部長會議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已被責成同中國方面的代表就組織此項事務的具體問題進行商談，並簽訂相應合同，以便於最近期間即可按您的建議着手提供上述資料和樣品。
>
> 致以共產主義的敬禮！
>
> 尼·赫魯曉夫（簽字）
> 1958年4月24日
> 於莫斯科　克里姆林宮[78]

鑒於此事高度敏感，赫魯曉夫在信中沒有使用「原子能技術及原子彈樣品」的字眼，而用了「特別重要的資料和樣品」。從蘇聯的角度來看，這項承諾非同小可，涉及到的是核擴散這一極端敏感的問題。進入核時代後，這種做法在世界上還從未有過先例，但赫魯曉夫和蘇聯卻對中國做了。他們顯然會覺得，蘇聯把這麼尖端的武器和技術都給了中國，當然有資格要中方「投桃報李」，給予回報。

蘇聯領導人於是要求中方在海軍通訊上為蘇聯提供幫助。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致信彭德懷提出：蘇聯為加強對太平洋地區海軍艦艇的指揮控制，希望通過中蘇合作，用四年時間在華南共建一座大功率長波交換台和一座用於長距離通訊的長波收報台，總投資約為1.1億盧布。他建議由蘇方承擔費用的七成，中方承擔三成，建成後雙方共同使用。[79]

蘇聯建議的背後，既有着俄羅斯戰略文化的影響，也有着蘇美戰略對抗上的考慮。從地理上看，蘇聯在遠東沒有不凍港，這向來是俄國人的一塊心病，又在冷戰中成為蘇聯戰略上明顯的「軟肋」。長波電台若能建成，不僅會極大地改善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在全球範圍內與美國對峙的戰略態勢，也有助於加強缺乏現代海軍的中國的實力地位。

可是，當彭德懷向毛澤東報告此事時，毛卻立即就聯想到：蘇聯的建議涉及到了中國的主權與尊嚴。4月24日，也就是周恩來收到蘇聯同意「提供特別重要的資料及樣品」答覆的同一天，毛批示同意建造長波電台，但提出建造費用全部由中方承擔，建成後也完全歸中國所有。[80] 5月中旬，彭德懷在中央軍委會議上傳達毛的意見：「這個大型電台不要合辦，應由我們自己辦」，還強調「外國人在中國搞軍事基地不好」。6月4日，彭向蘇聯駐華總顧問杜魯若夫陳述了上述意見。[81] 6月7日，毛接到彭報告後，再次指示彭，建設長波電台，「錢一定由中國出，不能由蘇方出。使用共同」；「如蘇方以高壓加人，則不要回答，拖一時期再說」。[82] 6月12日，彭根據毛指示覆信馬利諾夫斯基表示，中國政府同意建立大功率長波電台，並歡迎蘇聯在技術方面給予幫助，但同時強調中方將承擔一切費用，電台完成後由中蘇兩國共同使用。[83]

長波電台的事還在交涉中，中蘇間又在建立海軍聯合艦隊上碰到了新問題。早在1957年，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簽訂後，11月彭德懷訪蘇時，隨行的海軍司令員肖勁光同蘇聯海軍司令戈爾什科夫討論了蘇聯向中國提供海軍新技術、新裝備問題。[84] 1958年4月，海軍經進一步討論後，肖勁光同海軍政委蘇振華、副司令員羅舜初向彭德懷和軍委建議，以中國政府名義請求蘇聯提供新型艦艇設計圖紙和相關資料，彭將報告轉呈周恩來。[85] 6月28日，周恩來再次致信赫魯曉夫，首先提到中蘇於1953年6月4日簽訂的《關於蘇聯在中國海軍建設上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的協定》，已於1957年底執行完畢，「我國的海軍已經初步地建立了基礎，中國人民已經有了一支年輕的海軍部隊，從而加強了我國的國防力量」。他接着提出：

> 為使我國海軍今後能夠逐步地獲得現代技術的裝備起見……我們希望蘇聯政府在可能的條件下，有計劃地，有步驟地供給我們建造新型的戰鬥艦艇和可以攜帶火箭、導彈武器的艦艇的設計圖紙，以及建造這些艦艇有關的機械、部件、材料、無線電技術器材和新武器等設計圖紙和計算資料。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希望蘇聯政府在1958年內開始供給我們建造能夠裝載火箭、導彈的潛水艇、快艇的設計資料和藍圖，以使我國造船工業能夠盡早地開始生產這些艦艇。我們相信，在我國海軍部隊獲得這些新的技術裝備以後，我國的國防力量將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從而有利於我們兩國保衛和平的共同事業。[86]

7月21日，蘇聯大使尤金求見毛澤東，帶來了蘇方的回音。他說，「最近我們中央主席團開了會」，他也參加了會議，並受主席團委託回北京當面向毛報告，徵求毛的意見。尤金解釋，「赫魯曉夫同志說，這些問題不便通過文件來談，惟恐更多的人知道，而用密碼電報也不一定保險」。他向毛闡述了蘇聯領導人對中東局勢和南斯拉夫問題的看法和處理意見後，進入了「中國政府請求蘇聯幫助加強海軍和海岸防禦」這個主題，並強調「這個問題不能通過文件來談」。他說，蘇聯的「技術現在已經能造原子潛艇，發射火箭和原子魚雷」，但是「蘇聯的自然條件使我們不可能充分發揮原子潛艇艦隊的作用」。而「中國的海岸線很長，條件很好」，同時「將來如果打仗的話，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美國」，因此「赫魯曉夫同志希望同中國同志一起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越南也可以參加」。尤金又說：「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同志、彭德懷同志以及必要的助手去莫斯科，把我們的一切東西都看看，然後具體商量。」毛聽後，馬上說這件事涉及到中國主權，他提出：「首先要明確方針：是我們辦，你們幫助？還是只能合辦，不合辦你們就不給幫助？」尤金解釋道：「這只是一個提議，要由兩國共同決定。」但毛不聽，依然順着自己的思路質問道，是不是「你們強迫我們合辦，我們沒有辦法」？[87] 據毛澤東自己說，當晚他一夜未眠。

第二天，毛澤東帶着劉少奇、周恩來等一大幫中共領導人一道，約見尤金，從上午11點半到下午4點半，整整談了五個小時。毛從中共與莫斯科關係發展的歷史講起，批評斯大林「很愛擺架子」，一貫從大國沙文主義立場出發對待中共，還在中國搞勢力範圍。他提出，蘇聯建立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建議的實質是要控制中國：

> (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所以才產生合營的問題。要合營，一切都合營。陸、海、空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部合營，可不可以？或者把一萬多公里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此外，還有什麼理由？……你們可以說我是民族主義，又出現了第二個鐵托。如果你們這樣說，我就可以說，你們把俄國的民族主義擴大到了中國的海岸。

談話過程中，幾乎都是毛一個人在講話，尤金極少有說話的機會。臨近結束時，毛要尤金把他的意見「照樣告訴給赫魯曉夫同志，我怎麼說的，你就怎麼講，不要代我粉飾，好讓他聽了舒服。我說的這些話，就是讓他不高興，因為他叫我不高興。他越不高興，我就越高興。他批評了斯大林，現在又在搞斯大林的東西」。[88]

毛澤東講話時，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幾乎沒有插話。只是在毛講到「你們昨天把我氣得一宿沒有睡覺，他們（指在座的周及其他中國領導人）沒有氣，我一個人有氣」時，周插了一句「這是我們政治局的一致意見」。[89] 不過，周的這句話其實是被毛逼出來的。據當時擔任翻譯的閻明復說，他和其他在場的人看到毛大發雷霆並不斷批評赫魯曉夫時，心裏感到尤金的回應其實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不明白毛「為什麼會發那麼大的火」。[90] 尤金也被毛嚇得半死，「滿頭大汗，說話顛三倒四」，幾天後發生了腦溢血，出現偏癱，被送回蘇聯急救。[91]

赫魯曉夫接到尤金的報告後，第一反應是「莫名其妙」和極度震驚。[92] 7月31日，他趕到北京，此後四天裏，連續和毛澤東舉行會談。一見面，赫魯曉夫就強調，蘇聯絕沒有控制中國的意圖。他辯解道，「共建」長波電台不是蘇共中央的決定，而只是馬利諾夫斯基個人的主張。他又承諾，蘇方將在建台上向中方提供財政與技術援助，電台建成後歸中方所有。講到聯合艦隊時，他責怪尤金沒有準確地轉達莫斯科的意見，又一再表明，蘇聯絕對希望以完全平等的態度來對待中國。可是，毛沒有輕易接受赫魯曉夫的解釋，仍一口咬定蘇聯對中國就是有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蘇聯人「因為掌握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93]

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四天會談中，第一天毛只帶了鄧小平參加，後來三天，中共領導人幾乎全體出席，但周恩來基本上沒有說話；只是在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談到東南亞華僑問題和日本時，他才插了幾句話。[94]

不過，赫魯曉夫親自到北京跑這麼一趟，會談中又拼命附和毛澤東的口氣，給足了面子，毛的火氣總算平息下來。8月3日，中蘇簽訂了關於建立長波電台和蘇聯向中國派遣海軍專家的協定。[95] 雙方還就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發表了會談公報，說兩人「在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一致意見」。[96] 不過，這個話是講給外面人聽的，毛和赫魯曉夫之間的心結沒有解開。尤其

是赫魯曉夫離開北京後，對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說到毛澤東時更是牢騷滿腹。他最忌憚的一點是，毛一再強調兄弟黨之間關係平等，但他卻覺得自己在毛面前根本沒有被平等對待。[97] 毛澤東則一口咬定：「同蘇聯關係的轉變發生於1958年，因為他們要控制中國。」[98]

赫魯曉夫到北京時，毛澤東已決定要炮打金門，但他卻根本不打算同蘇聯這個最大的盟國露出一絲口風。一年後，他又見到赫魯曉夫時辯解道：「你是去年8月間來的。……你們走了以後，我們在8月中旬才決定打。」[99] 在這一點上，毛沒有說實話。

無怪乎，當赫魯曉夫離開北京三週後突然接到解放軍炮轟金門的報告時，當即暴跳如雷。本來，他對於毛讓他匆匆到北京跑一趟就心裏有氣，毛又不預先和他通氣磋商，就冒着同美國發生大規模衝突、把蘇聯也拉下水的危險對金門打炮，這使他覺得是被毛玩弄於股掌之中。[100] 9月初，隨着危機升級，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決定派外長葛羅米柯到北京跑一趟，說是要「了解情況」，並協調中蘇之間的應對戰略，其實也多少帶有某種「興師問罪」的涵義。於是，有了本章先前所述周恩來9月5日接見蘇聯參贊的一幕。

9月6日，葛羅米柯到達北京，周恩來代表中方和他會談。儘管談話背景隱含着緊張，蘇聯人的情緒中也帶着不滿，但周卻像沒事人一般，依然循着前一天和蘇達利科夫談話的路子，向葛羅米柯解釋道，在金門打炮既不是要解放台灣，也不是要馬上在金門、馬祖登陸，「我們就是要打擊國民黨的氣焰，打擊美國的氣焰，支援阿拉伯人民的鬥爭」。葛羅米柯說，「蘇共中央完全贊成中國同志的立場和措施」，周馬上表示「感謝你們的熱烈支持」。[101] 當晚，毛澤東在周恩來等陪同下會見葛羅米柯。毛告訴葛：我們炮打金門，不是要打台灣，也不是要登陸金門、馬祖，而是要調動美國人。毛又說，周恩來發表了12海里領海權的聲明，一個目的是警告美國海、空軍不得入內，另一個目的是告訴美國，它只要不越過這個界線，我們就不打它。毛還說，「我們的方針是我們自己來承擔這個戰爭的全部責任，我們不要你們參加這個戰爭」。[102]

葛羅米柯還沒有離開北京，蘇聯就於9月7日向美國遞交了赫魯曉夫寫給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信，重申在台海危機中站在盟國中國一邊的態度，

並發出警告，如果美國膽敢侵犯中國，蘇聯絕不會袖手旁觀。[103] 但實際上，正像赫魯曉夫一年多後當面對毛所說：你們去年在沿海地區開炮，事先也不通知我們，我們派人來了解，也沒弄清楚。[104] 而葛羅米柯本人關於他1958年秘密訪華的回憶中，更是一口咬定毛當時說過，要蘇聯使用原子彈襲擊美國入侵軍隊。[105] 在中方會談記錄中沒有這一節，中方參加會談者也否認此事。[106] 但不管怎麼說，這只能說明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已覺得，必須同毛的「左傾冒險行徑」拉開距離，原子彈樣品更是絕對不能給中國了。

毛澤東決定採用「絞索」政策後，10月5日，周恩來接見蘇聯駐華代辦安東諾夫，解釋這麼做的理由。他說：美國手裏有三張牌，一是保衛金馬，二是搞兩個中國，三是凍結台灣海峽。美國現在想打第三張牌，將蔣軍勸離沿海島嶼，以換取凍結台海局勢，讓自己脫身。「絞索政策」就是用來擊破美國的「脫身政策」的。我們本來準備分兩步走，第一步收復沿海島嶼，第二步解放台灣。我們現在認為，最好讓蔣介石繼續留在沿海島嶼上。我們不讓美國脫身，要緊張時打它一下，要緩和時鬆它一下，主動權在我們手裏。[107]

對此，赫魯曉夫又是大不以為然。他後來當面對毛澤東和周恩來說：你們既然打了炮，就應該拿下這些沿海島嶼，打了炮又不拿下，令人無法理解。[108] 1958年成了中蘇同盟關係出現嚴重裂痕的一年。

四

歸根結柢，1958年中國的主題還是大躍進。入秋前後，隨着台海危機告一段落，周恩來被軍事和外交繃緊了一個多月的那根神經終於可以鬆弛下來。但他身為總理，又必須把另一根神經繃得更緊，把全部注意力放到大躍進的推動上來。

北戴河會議後，全國城鄉有9,000萬人投入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在看上去無比高漲的革命情緒掩映下，各地熱鬧非凡，紙面上「捷報頻傳」。周恩來身為毛澤東欽定的全民大煉鋼鐵領導小組組長，不能不把完成北戴河會議上定下的產鋼1,070萬噸的指標當成頭等大事。這一年的最

後三個月，他天天跟蹤各地鋼鐵生產的報告，既要鼓勵各地多產鋼，又要排除水分，盡可能搞清鋼鐵生產的實際情況，搞得焦頭爛額。

在農村，北戴河決議公佈後，幾乎一夜之間就冒出幾千個集生產、學習、消費與生活為一體的人民公社。各地報出的糧食產量繼續大放「衛星」，競相攀比之下，幾乎達到了天文數字。所有這一切，又反過來更激發了毛澤東的想像力和眾多中共領導人的革命激情，似乎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真的指日可待。此時，周恩來和大家一道，隨着毛的高昂調子說話，跟着毛的「加快」拍子行動。到年底，北京響亮地宣佈，大躍進的主要目標、尤其是鋼產量1,070萬噸的目標都已達到。全國響起一片歡呼之聲。

但是，周恩來根本不可能真的高興起來。他心裏其實明白，報上公佈的數據靠不住。1959年新年剛過，大躍進的惡果已顯現出來。儘管農業號稱在1958年獲得大豐收，但1959年初，各地卻紛紛報稱出現缺糧、缺油情況，城市糧食、蔬菜及肉類供應大減，鋼鐵生產也出現大「滑坡」。上一年，各地為完成煉鋼指標，都大肆燒草砍樹，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態環境破壞，搞出來一大堆只能充數的「鐵疙瘩」。「年關」一過，1959年頭兩個月的鋼產量一下子跌到只有1958年最後幾個月的一半多一點。北戴河會議上定下的1959年產鋼3,000萬噸的目標，明擺着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毛澤東若不發話，周對此毫無辦法。他後來回顧這一段時曾充滿感慨地說：1959年春天，我身為一國總理，竟然連調整一千噸鋼產量也做不到。[109]

其實，毛澤東即便豪氣沖天，也不能全然無視經濟局面中的「緊張因素」。他作為「虎氣」與「猴氣」兼具的戰略大師，又一向喜歡用打仗的方法來看待經濟建設和發展，當然懂得「勢如破竹」與「進退之道」之間的辯證道理。從1958年底起，他幾次召集開會，中央中央還於11月28日至12月10日舉行了八屆六中全會，討論如何既為大躍進「鼓氣」又「壓縮空氣」，但重點還是放在「鼓氣」上。周恩來因為有其他的事情，未能參加幾個會議。但即便在他參加的會議上，他一般不多講話，要講也只是就事論事，不涉及大政方針。

進入1959年後，隨着經濟形勢中各種失衡現象越來越突出，2月26日至3月5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亦即第二次鄭州會議，集中討

論人民公社的體制問題。毛在會上發言說，要平抑「共產風」和過分集中的趨勢，並整頓人民公社，不能違反按勞分配原則。[110] 周恩來參與了會上通過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若干規定〉的起草。然而，即便在這個似乎是要為大躍進稍許降溫的會議上，毛在作結論時仍提出，「我們一定能夠在1959年實現更大的躍進」。[111] 在毛時代，不管毛多少次講「防左」，他其實從來不「反左」，因為他自己永遠就是「左」的代表和最終的源頭。

在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會議上，討論集中在保住鋼鐵和工業產量，以及通過整頓來鞏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上。但實際上，當時更大也更為嚴峻的問題是，全國糧食生產、徵購和供給已經出現了大缺口。[112] 1959年入春後，各地更不斷有缺糧的報告上達中央。4月17日，毛澤東將兩份關於全國缺糧的報告批轉給周恩來，還加上了一個「十五省兩千五百萬人無飯吃大問題」的總標題。[113] 周收到毛批示後，馬上給15個省委書記寫信，要他們「迅即核實情況，採取措施，調運糧食，以解除兩千五百十七萬人暫時缺糧的緊急危機」。[114] 5月下旬，他在河北視察工作時，根據自己的觀察，向當地領導人提出，「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因此要「給社員六項小自由」：

> 一、飼養；二、允許在山上種些零散地；三、屋前屋後的樹是他的；四、允許上山打些柴，搞些野生植物；五、允許下水打點魚蝦；六、允許搞些家庭副業。[115]

在提出這些給農民「鬆綁」的具體措施後，周恩來仍意猶未盡，似乎不經意地說了另一番極為要緊的話，卻透露出了他關於「個人」與「集體」之間關係的一個大想法：

> 這是大公小私、兩條腿走路嘛，有個人嘛，沒有個人那有集體呢？三人才為眾嘛！共產風來了，就把這些忘了。[116]

在大躍進的狂潮依然洶湧澎湃的情況下，周恩來不僅提出了要給社員「鬆綁」的具體建議，更進一步強調「沒有個人哪有集體」，講出的是他深藏於心間的關於個人與集體關係的執念，也是他多少想要為大躍進的狂熱「降溫」的一種努力。

問題在於，在八大二次會議後周恩來「失權」的機制下，他已經沒有向各地直接「發號施令」的權力。同時，在各地紛紛虛報產量及糧食庫存數的情況下，他也失去了對真實信息的掌控。自合作化以來，這幾年各地都有「春荒」的情況。對1959年來自各地的缺糧報告，周以及整個中共領導層多半又當作局部地區尋常年份的「春荒」來看待，而沒有作為一個具有全局性危險的、新的特大問題予以深究，更沒有採取有力的跟進措施。尤其是毛澤東，收到一份內務部上報的河南省委說「春荒已在全省範圍內停止發展」的虛假報告後，馬上批示轉發「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117] 後來回看，這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失誤，並成為後來全國範圍內普遍出現「大饑荒」的重要原因。

馮客（Frank Dikötter）在頗具影響的《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中，提出了他的一個「驚人的發現」：毛當時已知道各地餓死人的情況，但卻滿不在乎，甚至還有意推動之。作為證據，馮客引用了毛1959年3月25日在上海會議上講的一段話：「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這段話在書中標明的出處是甘肅省檔案館。[118] 我在甘肅省檔案館文件中找到馮客引用的同一文本，卻發現他把這件事完全搞錯了。根據這一文件的記載，這次會議上，薄一波彙報1959年「第一季度工業計劃執行情況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當薄講到「安排第二季度的生產和建設有兩種方法」時，毛插話說：

> 對工業，這三個月要確實的抓一下，要抓緊，抓狠，抓實。工業方面的領導上要出秦始皇。
>
> 要完成計劃，就要大減項目。1,078個項目中還應該堅決地再多削減，削到500個。
>
> 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壞大躍進的辦法。
>
> 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119]

很顯然，毛澤東在這裏講的是工業「項目」而不是「人」，所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是毛講話中常用的擬人化的說法，指的是工業計劃「項目」可以削掉一半，而不是說「人」死一半。

大饑荒無疑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的空前悲劇，毛澤東、周恩來及中共領導層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然而，這並非毛、周有意為之，而是戰略及政策嚴重失誤的結果，馮客的敘述卻把這兩者完全搞混了。

五

1959年春天，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放過了大饑荒的苗頭，另一個重要原因是，3月10日起，拉薩發生了大動亂。包括周恩來在內，中共領導人把相當一部分注意力轉移到應對西藏局勢上來。周恩來同時還要處理中印邊界問題凸顯以及中印關係惡化帶來的嚴重挑戰，這同西藏局勢演變有關，但又有着其自身的發展邏輯和軌跡。

西藏要出大事，其實早有先兆。1949至1951年，中共成功推行了以軍事實力為後盾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戰略。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和噶廈（西藏地方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其中宣佈「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之後八年間，總體來說，中共在西藏推行漸進式的改革政策，但北京和噶廈之間矛盾和衝突不斷。1956年，隨着「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在全國掀起，中共在川康及甘肅、青海藏區推行的「民主改革」引起了藏民的強烈反彈和反抗，也在中共領導層引起了相當的震動。經反覆討論後，中共領導人決定採取以「安撫」為主的政策。當年，周恩來訪問印度時，曾當面向達賴喇嘛轉達毛澤東的話：六年內不在西藏本身進行民主改革。[120] 1957年2月11日，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書記處召集張國華（時任中共西藏工委副書記、西藏軍區司令員）等談西藏問題，陳雲、彭真、李先念、李維漢等出席。鄧在會上說：「八大後（確定）西藏改革六年不改，後來考慮數十年不改。按主席說廿世紀不改，多數人傾向這個方針；現在看最低六年不改。……數十年、五十到一百年不改。西藏作個緩衝地帶，如打仗作別論。……如果要打仗搞獨立國，就要改革。」[121]

然而，鄧小平的這番話並沒有「兑現」。此後，川康等藏區的「改革」一再加碼，強力推行，藏區的反抗（在北京眼裏則是叛亂）也不斷擴散，並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武器及其他援助。1958年，川、康、青藏區叛亂

勢力建立起「四水六崗」組織，逐步蔓延到拉薩附近，在其他地區遭到鎮壓的各路人馬殘部也紛紛湧入拉薩。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西藏完全可能出亂子，上層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對我們是敷衍的。漢族內部一點事沒有也不可能。」[122] 但他對此並不擔心，認為這會促成西藏社會主義改造的到來。他在一個批示中寫道：「西藏要準備對付那裏的可能的全面叛亂。亂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動派敢於發動全面叛亂，那裏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123] 進入1959年，西藏形勢更為嚴峻，毛又說：「總要來一次總決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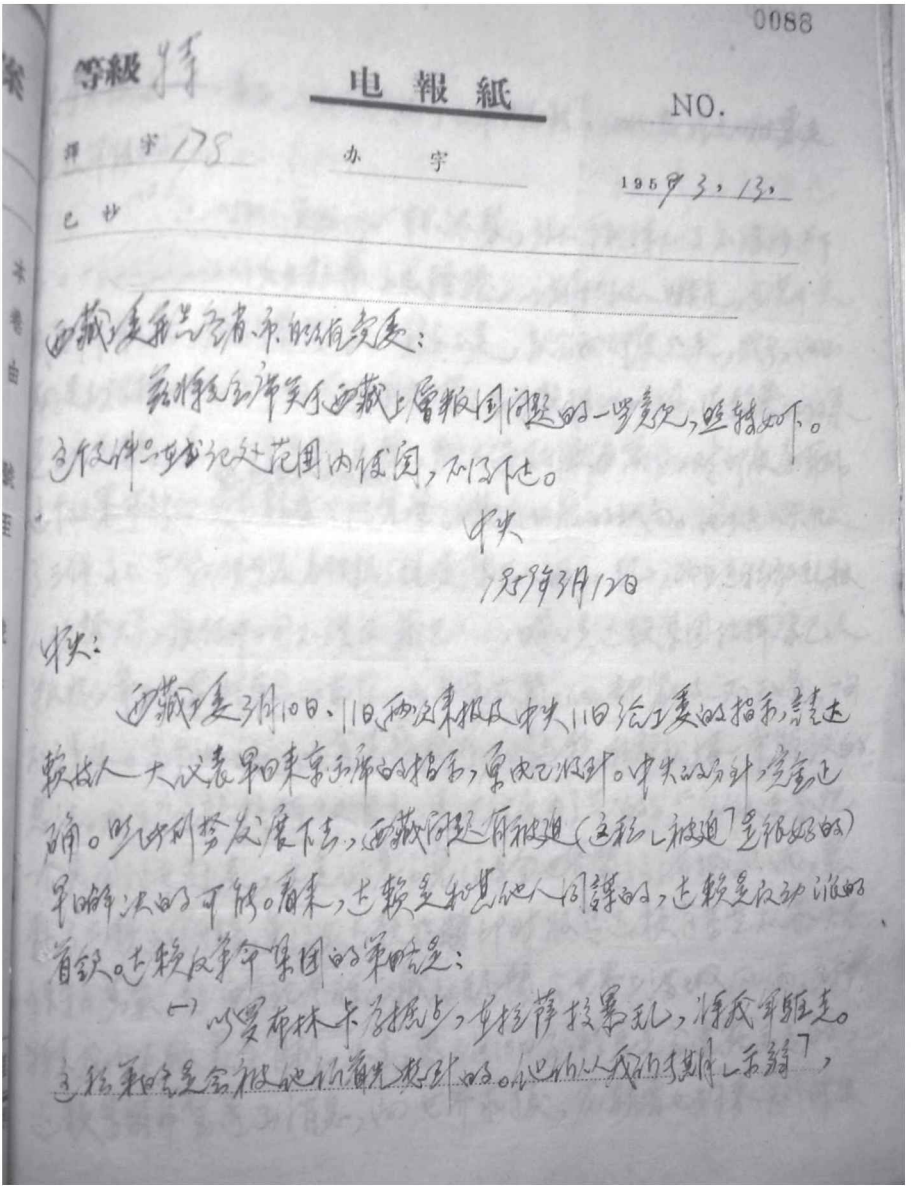
3月10日，形勢終於發生爆炸。那天，拉薩瀰漫着緊張氣氛，街巷間流傳着一個消息：西藏軍區要以邀請達賴喇嘛聽戲為名，扣留他後送往北京。大批情緒激憤的藏民為保護達賴喇嘛，聚集到他駐節的夏宮羅布林卡外。他們與解放軍對峙，衝突頻起，形勢逐漸失控。當晚，中共西藏工委用電話向北京報告，拉薩告急。[125]

當時，毛澤東在武漢。從3月11日晚起，劉少奇召集周恩來、鄧小平等一班中共在京領導人連續開會，討論西藏局勢。他們並沒有把拉薩的動亂視為危機，而更多地當成是機會。他們在給西藏工委的急電中提出：

> 西藏上層的公開暴露叛國反動面目，是很好的事，我們平亂的理由就更為充分。中央軍委正在積極進行軍事準備，但是什麼時候開始平亂行動，要看形勢發展才能決定。因此，你們應切實作好堅守防禦的一切措施，隨時準備迎擊敵人的進攻。如果敵人在拉薩向你們進攻，而你們又能堅守一兩個月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事情就好辦了。[126]

中共領導人還決定，要向西藏加派部隊控制局勢，並在必要時鎮壓叛亂。[127] 第二天，毛澤東致電北京，對形勢做了詳細分析，並批准前一天劉少奇等中央在京領導人所作出的決定，說「中央的方針，完全正確」。他並提出：「照此形勢發展下去，西藏問題有被迫（這種『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決的可能。」他進一步指示：

> 西藏工委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採守勢，政治上採攻勢。目的是：(1) 分化上層，爭取盡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內，使他們兩派決裂；(2) 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3) 引


0088

等級 特

电報紙

NO.

拜 字 175

办 字

1959 3, 13.

已 协

西藏工委并告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省委和军区：

兹将毛主席关于西藏上层报团问题的一段意见，抄转如下。望你们要把这一段范围内传阅，不得外传。

中央

1959年3月12日

中央：

西藏工委3月10日、11日两次来报及中央11日给工委的指示，读过。赞成人大代表早日来京与中央的指示，业已收到。中央的方针，完全正确。这样斗争发展下去，西藏问题一定能够（这个"能够"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看来，这个叛乱是和其他人们的阴谋的，这个叛乱是反动派的首谋。这个叛乱集团的策略是：

（一）以军事为主，重点袭扰，制造混乱，将我军驱走。这个策略是会被他们首先采取的。你们从我们来到（下缺），

> 誘敵人進攻。如果敵人進攻時，在初期，不要多殺傷，更不要還擊，最好使他們顯得一些小勝利，使他們感到驅漢有望，才有大打一仗的可能，否則只會小打一陣，倉惶跳走。當然這樣也不壞，但不如大打一仗更為有利。[128]

劉少奇等收到毛的電報後，立即轉發中共西藏工委及四川、甘肅、青海、雲南四省區黨委，強調指出「我們的方針是讓敵人更囂張些，更瘋狂些，讓他們先攻我們，以便在政治上居於主動，為全面的軍事平亂和實行民主改革取得更加充分的理由」。[129]

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還面臨着如何對待達賴喇嘛去留的問題。起初，他們曾試圖「對達賴本人仍多方做爭取工作」。[130] 但毛很快又認定，「達賴是和其他人同謀的，達賴是反動派的首領」，他進而指示：「達賴及其一群……逃走時，我以為我軍一概不要阻攔，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最好能逃走喇嘛和其他反動分子一二萬至三四萬人。這樣，印度、不丹、可能還有尼泊爾，當然吃不消，但除不丹、尼泊爾外，印度是自作自受，怨不得我們。」[131] 中共領導層決定，「不要怕反動派把達賴劫走。敵人這樣做，不論是否達賴本人的決定，對我們毫無壞處」。[132] 3月10日至16日，經毛及其他中共領導人審閱批准後，西藏軍區司令員譚冠三同達賴三次交換信件。在毛看來，這麼做不僅是為了爭取達賴，也是公開宣傳的工具。3月15日，他給中央的電報中說，以譚名義答覆達賴的信「很好，政治上使我處於主動。看他反應如何」。[133] 但到了3月16日，毛對達賴去留的看法又發生變化。他提出要「盡可能不讓達賴走，將來要放也容易，反正在我們手裏，萬一跑了也不要緊」。[134]

此時，毛澤東的關注重點已從「平叛」轉向「民主改革」，並考慮怎樣才能把這兩者最好地結合起來。他提出兩者的「重點放在拉薩，其他地區慢一步」；他還指示，這兩者互有關聯，但在推行時要「說平叛，不提改革，在平叛下改革，(要)區別對待，先叛先改，後叛後改，不叛不改」。[135] 3月17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決定，要堅決平息叛亂，改組西藏地方政府，改編藏軍，並抓住平叛的時機，進一步在西藏實行政教分離，全面推進民主改革。關於達賴的去留問題，會上的意見是：最好設法使達賴留

在拉薩，如果做不到，他硬是要出走，這也沒什麼不得了。「因為現在我們工作的立足點已不是等待原來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層分子覺悟，而是堅決平叛，全面改革。」[136] 但實際上，就在3月17日這一天，達賴喇嘛已離開拉薩，前往印度。[137] 解放軍未為阻截他採取任何大的行動。

周恩來在會上特地提醒其他中共領導人，西藏事變同印度當局有關，「英國和美國政府在幕後很積極，支持印度當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線。叛亂的指揮中心在印度的噶倫堡」。[138] 周這麼說，是因為近幾個月來他一直在考慮因邊界爭議而繃緊的中印關係，以及這同西藏問題的關係。

3月19日夜，西藏軍區向北京報告，拉薩形勢急劇惡化，「叛亂武裝向我發起全面進攻」。第二天上午9時30分，中央軍委指示，要「全力抓住敵人在拉薩市區，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達，然後聚殲」。上午10時起，解放軍在拉薩展開全面攻勢，並迅速擊潰瓦解「毫無戰鬥力」的藏軍。3月21日，拉薩局勢已完全為解放軍控制。[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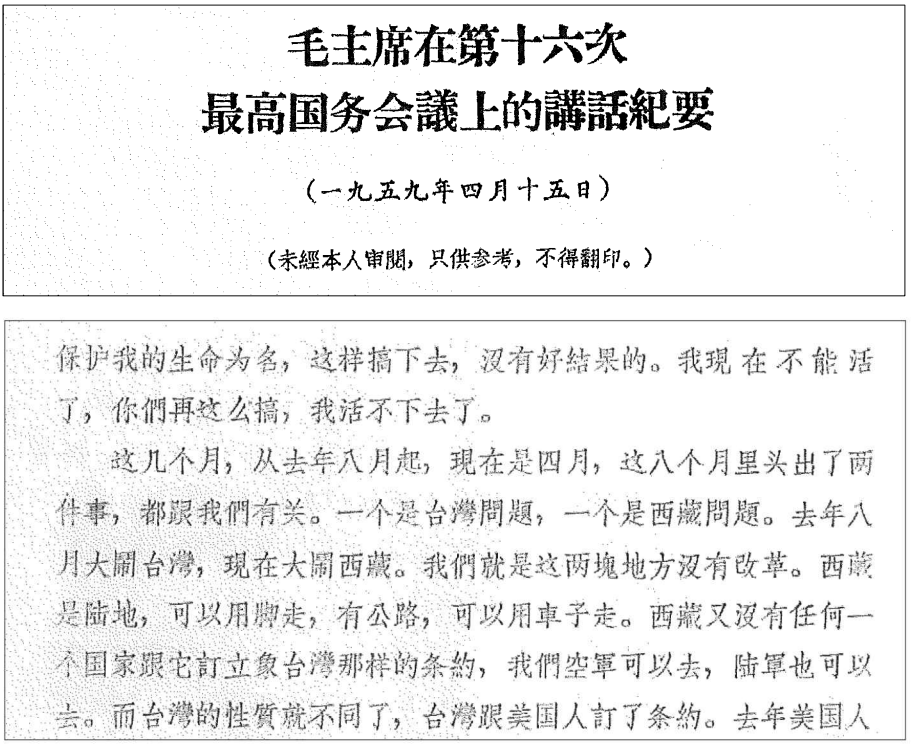
3月22日，劉少奇再次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西藏問題，周恩來出席。會議決定在繼續推行平叛的同時，要立即制定相應政策，着手展開民主改革。經周親自審讀修改後，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在西藏平叛及實行民主改革的指示：「西藏噶廈政府背叛祖國，……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繼續下去。必須堅決放手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可實行邊平邊改、先平先改和未平地區暫緩改革的方針。改革要在照顧西藏特點的原則下進行。」[140] 同一天，周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通報了西藏的情況。他說：西藏實行的農奴制在我們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總是格格不入，原來設想採取等的辦法，只在金沙江以西進行民主改革，西藏可以等，給了機會讓它轉變，但它還是要維持最反動的制度，還是要叛亂，既然這樣，我們就要平叛。同時，周恩來還一再提到，對捲入叛亂人員要區別對待，實行改革要循序漸進，對涉及宗教的問題要謹慎處理。[141]

3月25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一班中共領導人參加。會議主題是大躍進，但毛決定第一天集中討論西藏問題。這也是拉薩叛亂發生後，中共領導人第一次在一起商討此事。他們一致認為要在藏區積極平叛並順水推舟，結合平叛推動民主改革。[142] 3月28日，新華社發佈〈關於西藏叛亂〉的公報。周恩來代表國務院宣佈，

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懲罰叛亂分子。[143] 4月1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一段極有意思的話，把西藏和台灣聯繫起來：

> 這幾個月，從去年八月起，現在是四月，這八個月裏頭出了兩件事，都跟我們有關。一個是台灣問題，一個是西藏問題。去年八月大鬧台灣，現在大鬧西藏。我們就是這兩塊地方沒有改革。西藏是陸地，可以用腳走，有公路，可以用車子走。西藏又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跟它訂立像台灣那樣的條約，我們空軍可以去，陸軍也可以去。而台灣的性質就不同了，台灣跟美國人訂了條約。[144]

此後，解放軍的平叛行動不斷推向西藏各地，「民主改革」也相應展開，「叛亂分子」軍事上一再失利，或遭到圍剿，或逃亡印度及尼泊爾。1960年，整個西藏已處於北京的有效控制之下。



毛主席在第十六次
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紀要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未經本人审閱，只供参考，不得翻印。）

保护我的生命为名，这样搞下去，沒有好結果的。我現在不能活了，你們再这么搞，我活不下去了。

这几个月，从去年八月起，現在是四月，这八个月里头出了两件事，都跟我們有关。一个是台灣問題，一个是西藏問題。去年八月大鬧台灣，現在大鬧西藏。我們就是这两塊地方沒有改革。西藏是陆地，可以用脚走，有公路，可以用車子走。西藏又沒有任何一个国家跟它訂立象台灣那样的条約，我們空軍可以去，陆軍也可以去。而台灣的性質就不同了，台灣跟美国人訂了条約。去年美国人

圖20.2：毛澤東談西藏和台灣問題，1959年4月15日。(91-18-494，甘肅省檔案館)

六

拉薩動亂發生後，周恩來考慮問題時，又一直會聯想到當時已處於微妙狀態的中印關係及其與西藏情勢的交互影響。自1956年周訪印後，他已意識到中印邊界問題可能成為兩國友好關係的「瓶頸」。他除了親自主持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外，還決定要通過首先解決與此有相似之處的中緬邊界問題，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提供可資借鑒的「先例」。

進入1958年，中印關係中緊張苗頭凸現。邊界問題上，除雙方在東段因麥克馬洪線產生的分歧外，在周恩來和中方一直認為不存在問題的邊界西段，也由於印度提出阿克賽欽是印方領土，並對疆藏公路通過其中的一段提出異議，爭執突起。[145] 同時，解放軍在藏區的平叛行動，也日益引起了歷來將西藏視為中印之間「緩衝地帶」的印度朝野各方的不安。1958年12月14日，尼赫魯致信周恩來，全面闡述印度政府對中印邊界問題的立場，提出1954年簽訂的中印協定「已經解決了我們兩國之間的全部未決問題」，因而「兩國之間不存在邊界爭端」。他還指稱，關於麥克馬洪線，周1956年訪印時已明言「打算承認」。[146] 周接信後大吃一驚。在中國領導人中，他和尼赫魯接觸最多，關係也最為密切。但讀了尼赫魯的信後，尤其是讀到尼赫魯明顯地歪曲了他在麥克馬洪線上的陳述，他意識到自己恐怕並不真正了解尼赫魯，中印邊界問題也比他先前的想像要遠為複雜。1959年1月23日，他致信尼赫魯，全面闡述了中國政府對中印邊界的立場：「中印邊界是從未經過正式劃定的。在歷史上，中國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間從未訂立過有關中印邊界的任何條約或協定。」從法理上說，麥克馬洪線「不能認為是合法的」，也「從未為中國中央政府承認」。周建議在解決邊界問題前，雙方暫時保持現狀，避免意外事件發生。[147]

恰在此時，西藏叛亂發生，印度政界及輿論對中國發出一片指責之聲。3月17日，達賴喇嘛等一行逃離拉薩後，一路奔向印度尋求避難，更使得周、毛等中共領導人覺得，西藏叛亂的背後有着「印度因素」在起作用，加劇了中印之間的緊張。[148] 3月22日，周恩來又接到尼赫魯來信，其中再次以不容爭辯的口吻提出，中印邊界「早已確定」，不僅處於東段麥線以南的藏南地區是印度領土，西段阿克賽欽地區也是。尼赫魯要求周和中

國政府無條件接受印方立場，[149] 這封信對周和中共領導層是嚴重的警號。此後幾個月間，周投入大量精力，準備做出全面答覆。

3月25日，周恩來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上海討論西藏平叛問題時，也想到了印度。毛、周等面臨的是一種兩難局面。一方面，他們知道印度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也不能簡單地歸入資本主義陣營，如果把批判的主要矛頭指向印度，只會加強敵視中國的勢力，並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更為孤立。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相信新德里確實對西藏叛亂提供了支持，並已暴露出對中國的領土野心，感到必要時不能不對此予以揭露和反擊。鄧小平在會上傳達毛和政治局常委的指示：「對於印度，我們暫時不公開點他的名。……現在就讓印度多行不義，到一定時候我們再同它算帳。」[150]

這個「一定時候」很快就來了。4月3日，印度外交部向中國駐印大使潘自力通報，達賴喇嘛已於3月31日到達中印邊界並提出在印度政治避難的要求，印度已允許，並給他以「受尊敬的待遇」。[151] 4月8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說：現在英國、美國、印度吵吵嚷嚷，搞反華大合唱，支持西藏叛亂集團，我們要在宣傳上加以反擊。[152] 毛指派周恩來負責此事。4月15日，經周親自主持審定，《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不能允許中印友好關係受到損害〉的社論，集中駁斥印度輿論攻擊中國平叛的言論，並點了尼赫魯的名，一面對他「不可讓中印關係惡化」的講話表示歡迎，一面又批評他「右手向西藏大扔鮮花，左手向中國大扔鮮花」，這顯然「是他最為難的時刻」。[153]

直至此時，周恩來顯然還想在對印度、尤其是對尼赫魯的批評上留有餘地。4月18日，他在全國人大講話時仍稱達賴喇嘛是被「劫往印度」的，「希望他能夠擺脫叛亂分子的挾持，回到祖國來」。[154] 但周後來得知，就在當天，達賴喇嘛在印度發表聲明並由印度外交官員幫助散發。4月24日，尼赫魯又親自會見達賴喇嘛，隨後還舉行記者招待會。這一來，周恩來的迴旋餘地也越來越小了。

從4月19日起，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西藏局勢和中印關係。起初毛同周商議後說，可以利用評論達賴聲明為由頭，點名批評印度擴張主義分子，但暫不點尼赫魯的名。[155] 尼赫魯會見達賴後，毛

的態度變硬了。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我們反擊印度的反華活動，着重同尼赫魯大辯論。現在我們對尼赫魯，要尖銳地批評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鬧翻，要鬥爭到底。」[156]

毛發話後，周恩來隨即採取行動。5月2日，他接見奧地利《人民之聲報》駐京記者佛萊，專門針對「印度和西藏是母子關係」的說法，講述了西藏同中國及印度關係的歷史。他提出：就民族關係而言，印度人是雅利安種，而西藏人和中國的漢族、滿族、蒙古族同屬於黃種人；從宗教關係上說，釋迦牟尼是出生在尼泊爾不是印度，佛教在印度衰弱，興盛的是印度教，中國的佛教徒人數比印度要多得多；從政治關係上說，西藏從元朝開始就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因此連英國殖民主義者也不敢說西藏是印度的一部分。[157]

5月4日，周恩來在一次談話中說：「在西藏問題上，尼赫魯可能有錯覺，想利用達賴討價還價。……我們現在軍隊開到邊境，關起門來平亂，……他們可能拋開西藏問題來掀起反共反華新高潮。」周提出：「對印度我們一定要反擊，這是他們挑起來的。他們搞冷戰，我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158]

兩天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的社論，直指印度歷來對中國西藏存在野心，印度擴張主義分子所繼承的，是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衣缽。[159]同一天，周恩來和毛澤東等接見了蘇聯及各社會主義國家駐中國大使。周詳細講解了中方關於西藏叛亂以及印度與之關係的看法。他說尼赫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要在西藏建立「緩衝國」，阻止民主改革，並且迫使解放軍撤出西藏。毛澤東則強調，中國的政策不是要把尼赫魯推向帝國主義一邊，而是要教育印度人民以及尼赫魯本人。毛說：「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派。」但是，「中國不怕鬼」。[160]之後，周恩來在政協常委會議上說，印度對西藏態度的「本質問題」，就是「希望西藏變成在它影響下的緩衝區」或中印間的緩衝國，這是中印間爭論的中心。[161]

整個1950年代，「印度－中國，兄弟－兄弟」的呼喊曾那麼響亮、那麼感人。然而，它的根基實際上卻又那麼脆弱。隨着西藏叛亂發生，以及

中印邊界爭端的凸顯，短短幾個月裏，中印關係的發展前景已為看不到邊際的濃重陰雲所籠罩。

到1959年中，在中印關係不斷惡化的同時，先前已亮起紅燈的中蘇關係也出現新的警號。大躍進狂潮在中國掀起之初，許多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根據自己耳聞目睹的經歷，已發出這會對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產生嚴重後果的各種警告。但是，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及蘇聯媒體仍對大躍進大體上持肯定態度。[162] 經歷了長波電台、聯合艦隊以及台海危機等一系列事端後，尤其是隨着人民公社運動在中國城鄉遍地開花，大躍進的各種指標變得越來越離譜，蘇聯對大躍進乃至毛和中共的態度也轉壞。1958年12月4日，赫魯曉夫會見美國參議員漢弗萊（Hubert Humphrey）時說：「公社制度對俄國是不適宜的，無論如何這個詞是用錯了。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選用了這個詞。」[163] 毛得知後大不以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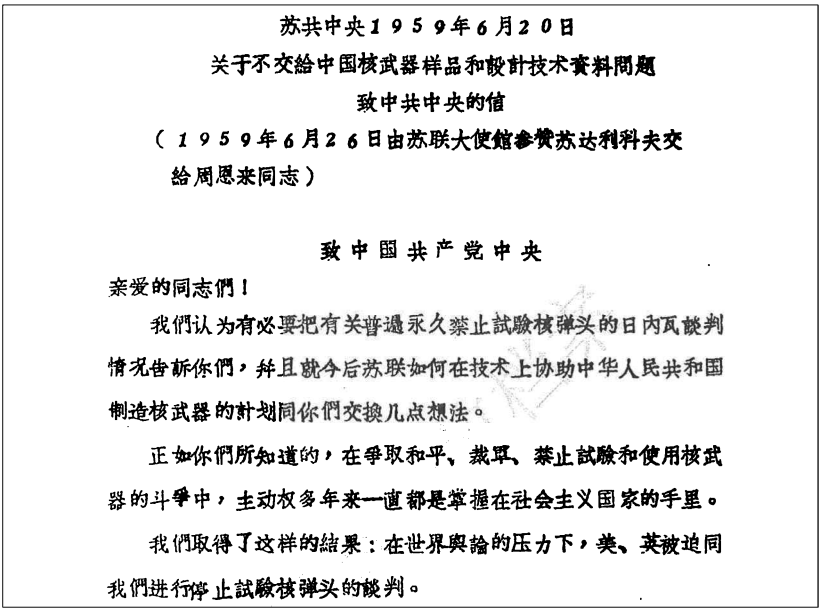
在這個當口，蘇共於1959年1月下旬召開二十一大，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率團出席。從心底來說，周不希望中蘇關係繼續惡化，這一使命給了他一個維護並改善中蘇關係的機會。赫魯曉夫在大會上發言時，一面稱頌中蘇友好團結，一面又話中帶話說，「平均主義並不意味着向共產主義過渡，而是在破壞共產主義的聲譽」；又說，「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會突然出現是不正確的」。[164] 用不着註解，誰聽到這些話都會聯想到，他是在批評中國的人民公社運動。

周沒有在會上同赫魯曉夫正面交鋒，而是照着出發前中共領導層定下的調子，強調國際共運仍然要以「蘇聯為首」。[165] 他同赫魯曉夫等會談時，也盡力為中蘇之間的持續合作開路。結果，他的訪問看上去收穫頗豐。2月7日，周恩來和赫魯曉夫簽訂了擴大中蘇之間經濟合作的八年協定，蘇方承諾向中國提供78個大型工業項目的設備、設計及技術援助，總值達57億盧布。[166]

周恩來其實已預感到，由於內外政策上的分歧，中蘇關係可能會出現大滑坡。6月17日，他會見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迪科時，談到了令蘇聯領導人感到困惑的大躍進問題。他說1958年大躍進搞了四個月，經驗還沒有很好總結，出現生產和生活不平衡。因此，去年主要是追求數量，

今年要在提高數量的基礎上提高質量。[167] 實際上，周恩來這麼做是試圖緩解蘇聯領導人對中國局勢的疑惑。

但這時，1958年中蘇間的幾樁「衝撞」事件已在蘇聯領導層發酵。6月20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稱，蘇聯正準備與美、英在日內瓦進行禁止試驗核彈頭的談判，並「已經就協定的大部分條款取得了協議」。同時，美蘇首腦會議即將召開，「如果西方國家獲悉蘇聯將核武器的樣品和設計的技術資料交給中國，那麼它們就可能嚴重地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爭取和平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所做的努力」。因此，蘇聯「在目前條件下」將不會這麼做，而是「將蘇聯專家的力量集中在幫助中國建立原子工業（包括生產裂變物質）上，這將成為生產核武器的基礎」，待兩年後，視情況「做出我們今後如何共同行動的決定」。[168] 這封信的話說得很婉轉，但它實際上意味着蘇聯將不再向中國提供製造原子彈的技術資料及樣品。與此同時，許多蘇聯專家在回國休假後奉令不再返回中國。莫斯科的做法對中國領導層及中蘇關係衝擊極大。



苏共中央1959年6月20日
关于不交給中国核武器样品和設計技术資料問題
致中共中央的信
（1959年6月26日由苏联大使館参贊苏达利科夫交
給周恩来同志）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

亲爱的同志們！

我們认为有必要把有关普遍永久禁止試驗核弹头的日內瓦談判情况告訴你們，并且就今后苏联如何在技术上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核武器的計划同你們交換几点想法。

正如你們所知道的，在爭取和平、裁軍、禁止試驗和使用核武器的斗爭中，主动权多年来一直都是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手里。

我們取得了这样的結果：在世界舆論的压力下，美、英被迫同我們进行停止試驗核弹头的談判。

圖20.3：蘇共中央關於不交給中國核武器樣品和設計技術資料問題致中共中央的信，1959年6月20日。（109-02563-01，外交部檔案館）

七

1959年春夏之際，中國的外部局勢緊張，國內經濟形勢也繼續惡化。中國農業的形勢尤為嚴峻，大饑荒的火苗已開始四處燃燒。3月下旬，毛在上海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從4月2日至5日，又緊接着開八屆七中全會。當時黨內上層政治氣氛複雜。據參加會議的毛兼職秘書李鋭説，大家的共同感覺是「這一年多來，亂子鬧得太多太集中，毛也感到自己有責任，卻又不願意直接痛快承當起來」。[169] 上海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周恩來都參加了，但對國內問題，他基本不講話。會上雖然決定了調整1959年的鋼、煤、糧、棉產量等，對人民公社實行三級管理核算，以生產隊為基本單位調整，但仍然高舉大躍進的旗幟。會議過程中，整個中共領導層全然沒有把農村可能發生特大饑荒之事，當做潛在的嚴重危險來對待。

4月5日上午，八屆七中全會最後一天，毛澤東作了三個小時的講話。他堅持1958年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最多只是工作上有問題。他把超高指標的制定、人民公社運動一湧而起等，都説成是別人的提議，他本人只是「也熱過一陣子」，「也有武斷」。但同時，他又指責別人不和他通氣，對他進行「封鎖」。到頭來，他提出「權力集中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170]

毛澤東發表重要講話時，從來喜歡翻「歷史舊帳」。這次他重施故技，被他罵得最兇的是彭德懷。毛説：「他是恨死了我的，……因為我跟他鬧彆扭鬧得相當多。會理會議、延安會議、中央蘇區江口會議，我們兩個人鬥。……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71] 當時聽毛講這些話的人，包括彭德懷本人，還不見得能探盡其中奧秘。但後來看，這正是毛幾個月後在廬山會議上把彭一棍子打到底的先兆。

毛澤東講話中也點了周恩來的名，説他和周「打過架」。[172] 毛冗長發言的中心意思，就是堅持周當年搞「反冒進」是錯誤的。這也可視為是毛在給周打「預防針」。毛批周的話，遠沒有他批彭的話那麼厲害。但是，周恩來記住了這些話，彭德懷卻沒有。

到了夏天，各處報告彙總後有一點很清楚：八屆七中全會上縮減後定下的年產1,800萬噸鋼的指標根本完不成，就連1,650萬噸也不行。5月，陳雲提出鋼產量應調整為1,300萬噸，劉少奇、鄧小平都同意，周恩來也表示同意。[173] 6月中旬，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時說：「知道了缺點，這就是有成績。」[174] 實際上，毛是在「定調子」。一方面，大躍進已經搞不下去了；但另一方面，毛又絕不肯收起「大躍進」這面「大旗」。在此背景下，中共領導層自7月初起，在廬山上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前，毛澤東已感到黨內對大躍進的質疑越來越多。6月28日，他從長沙給在武昌的周恩來打電話，講到廬山會議時說，應該冷靜下來學一點政治經濟學。[175] 第二天，毛到武昌後，又召集劉少奇、周恩來，以及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等大區領導人開會，提出要在廬山會議上討論14個問題，其中頭兩個是「讀書」，以及討論「形勢，好轉沒有，何時好轉」。[176] 7月2日，毛又在廬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等一幫中央領導人開會。他又從形勢估計開始說起，劈頭就問國內形勢是好還是壞。他自己答道：「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他還定調子說：「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又說：「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177]

這樣，毛澤東其實已經給廬山會議劃了一個討論的框架。會議開始後，各種發言大體都能遵循毛定下的路子，若有人「缺點多講了一點，就會有人不高興，甚至打斷發言，護短的人還是比較多」。[178] 周恩來在會上發言，也不越毛定的框架：1958年成績很大，總路線完全正確，缺點是生產指標偏高，基建規模偏大，權力下放太多，造成經濟發展比例失調。他提出要抓綜合平衡，可以把工業速度放低一點，今後三年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179] 言語之間，周顯露出了對農業及農村形勢的憂慮，但沒有「上綱上線」來講這個問題。

彭德懷是7月1日上廬山的。他在會議頭一週發言七次，也說「成績是偉大的」，但講缺點時，講了不少別人（包括周）不敢講的狠話和實話。「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彭還有幾句話，在毛看來，簡直就是對着自己說的：「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毛主

席和黨中央在全中國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180]

但是，彭德懷的話並沒有在會上產生太大反響。眼看會議將要結束，他感到「非常憂慮」。7月14日，他思來想去，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對形勢的估計」和「主要經驗教訓」。儘管彭在信中表示「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農村公社化，具有偉大意義」，但他也以大量篇幅談問題和教訓，尤其是說大煉鋼鐵「有失有得」。信中講得最厲害、也最「冒犯」毛的一段話，是批評大躍進左傾錯誤的根源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提出要糾正左傾浮誇風。[181]

毛澤東收到彭信後，沉默了兩天。7月16日，他給信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送給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其他領導人傳閱。[182] 一開始，周似乎沒有搞懂毛的用意以及此事的嚴重性。他的第一反應是，彭信「確實反映了一些實際情況」，又覺得「這沒有什麼」。[183] 這也是當時大多數與會者的看法，同意彭觀點的人也不在少數。總參謀長黃克誠是7月17日上山的，在小組發言中表示支持彭的意見。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發言說：「彭總給主席的信，我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張聞天也是後來上山的，7月21日，他在小組會上作了三小時的發言，除講述大躍進的成績及各種缺點外，還強調對缺點的原因分析不能就事論事，要從思想、方法、作風上去尋找。[184]

這一來，毛澤東急了，也更光火了。在他的眼裏，彭德懷的意見居然有這麼多人附和，是不能容忍的。這不僅對他在黨內至高無上的權威與權力提出了挑戰，也威脅到他的「繼續革命」宏大事業的合法性。

其實，彭德懷已於7月19日提出自己給毛的信係倉促寫成，要求收回。但是，潑出的水豈能收得回去？7月22日，從4時半到9時半，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談話，內容不得而知。但看來，毛是在向這幾位就自己下一步的行動交底，同時也摸清他們的態度。[185]

7月23日上午，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一口氣講了兩三個小時。他一上來就說：現在黨內外夾攻我們，有黨外的右派，也有黨內那麼一批人；但他又說，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掉下來。他上綱上線地宣佈，彭德懷從來便是一個「野心家」和「陰謀家」，而他對大躍進的「全盤否定」則是意在

推翻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並顛覆黨的最高領導。講到氣頭上，毛還說：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

毛澤東講話中還有一段：「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要注意。……重複56年下半年、57年犯錯誤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30公里。」[186]這番話，毛顯然是以周恩來為坐標講的，周聽後怎能不觸目驚心？

然而，即便到此時，周恩來恐怕並未想到，毛澤東要把彭德懷徹底打下去。當天下午，周主持國務院副總理的一個座談會，彭也出席了。周對彭說：「主席說了，基本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有指名。要注意，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周還現身說法，把彭的信和自己在「反冒進」上的錯誤相比較，對彭說：「你還沒有到反冒進的那個程度，但有那麼一個趨勢。你停止了，認識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彭問：「你這個東西為什麼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周答：「你不曉得，開始講，好像我這淨是訴苦的事情，誤會成為洩氣不好。……這就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衝口而出沒有準備好，跑到二中全會講那麼一通。應該謹慎吸取教訓麼。今年你代替我了，因為你不是總理，所以你沒有像我作那麼一個大報告，你寫一封信。……我們應該吸取教訓，站在局內，幫助解決和糾正新發現的缺點錯誤，這才是擁護總路線。」[187]

但實際上，毛澤東已決心要把彭德懷搞倒搞臭。7月25日，他提出：前一段主要是糾「左」，現在要反右，因為右傾抬頭了。[188]之後形勢急轉直下。毛以自己在黨內的無上權威和幾乎不受制衡的權力為後盾，發起對彭以及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等「反黨陰謀」的全面批判，給他們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大帽子之外，毛還着力構建了一幅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和這些黨內「反對勢力」遙相呼應的圖景：「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他說，要就這三件事「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189]

毛澤東對彭德懷「發飆」後，周恩來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7月26日，他召集國務院部長、副部長開座談會，要求大家在小組會上對彭德懷的信

「表明立場，劃清界限」，還從政治、經濟和精神的角度來細算「小洋群」的得失帳，批判彭德懷的「得不償失」論，又規勸彭「不要站在局外指手畫腳」，而要徹底「認識錯誤」。[190] 8月1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語氣更「硬」，給彭扣了一堆帽子，說他的信是一個綱領性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東西，他表面上打着所謂無產階級的旗幟，實際上卻是資產階級的旗幟，向着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發難，實際上卻是向黨的總路線和領導、向無產階級領導進攻。[191]

彭德懷後來說，周恩來「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192] 這是彭的氣話，恐怕講過頭了。想想剛剛經歷過反「反冒進」這場大風波，周恩來實在有難言之衷。

8月2日起，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開始舉行，一連開了兩個星期，成為一次「大清算」的會議。最後揭出了一個以彭德懷為首的「彭、張、黃、周反黨集團」，彭德懷被解除了國防部長職務。毛澤東在閉幕會上說，這次會議「是成功的，是很好的一次會議，避免了分裂，避免了一個大馬鞍形」。[193]

8月19日，周恩來回到北京。之後他「受中央委託」，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並做關於彭德懷歷史問題的報告。毛澤東說，彭歷史上和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周根據這個基調，從江西蘇區說起，到建國後彭主持軍委工作直至廬山會議召開，將彭的歷史分成15個時期講述，說他自參加革命起就有野心，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是反毛的，一直發展到廬山會議上企圖「篡黨篡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人，其實都是「高崗反黨集團」的「漏網分子」和「重要成員」。[194]

廬山會議開始大批彭德懷後，毛澤東提出會議要「解決路線問題」，也要把高指標改下來，[195] 但這兩者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矛盾。八屆八中全會開到後來，「改指標」的差使又落到周恩來頭上。8月17日，周在會上說：這回主席再三說，要我來抓一下今年這個計劃生產建設。陳雲同志還病着，小平同志還病着，這個時候我把這項工作抓一下，也希望大家一起來抓。[196] 回到北京後的8月下旬，周連續在黨外人士座談會、最高國務會議，以及人大常委會上傳達廬山會議精神。除了傳達彭案情況外，周

說還要對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標做出調整，通過「反右傾、鼓幹勁」，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197]

然而，周恩來所要面對的是一系列「不可能的任務」。廬山會議上的「變向」，改變了近幾個月剛剛形成一點氣候的反「左」、糾偏的趨勢，全中國又吹響了「繼續躍進」的號角。尤其是毛澤東，又高唱起「繼續躍進」的調子。[198] 周恩來既要堅持路線上的正確方向，因此必須反「右傾」；但他又要「調整指標」，把過「左」的熱度降下來。哪裏是兩者之間的「平衡點」？對周更大的挑戰還在於，一旦平衡點找得不對，或被人抓住辮子說找錯了，那就可能又一次犯政治上的嚴重錯誤。

更加可怕的是，風向轉變後，農村好大喜功、虛報產量、過度徵購等各種人為因素又結合在一起，各地的糧食生產和供應開始出現越來越嚴重的缺口和斷裂。但在廬山會議後的大形勢下，偌大的中國以及眾多的中共各級領導人中，包括周恩來在內，竟無一人敢站出來大聲追索事實及真相。結果，1959年糧食產量大減，糧食徵購數目卻大增，各地大辦公共食堂，糧食消費和損耗又居高不下。

一場中國及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饑荒災難，正一步步向着華夏大地襲來。

第21章

毛澤東退居二線（1959–1962）

一

當周恩來翻開1960年工作枱曆的頭幾頁時，心中很難沒有一種五味雜陳、滿是糾結的感覺。國內，儘管虛幻的躍進「捷報」依然撲面而來，但整個經濟形勢已是警報迭傳，走上了陡峭的下行通道。國際上，除了同美國的持續對抗外，中國又面臨着同印度關係惡化以及同蘇聯關係緊張的嚴重挑戰。周恩來身為共和國總理，實在有太多的事情要應對。

但此刻，他又必須把讀書當作第一要務來抓。從2月中旬到3月上旬的三個星期裏，他搭建起一個班子，集中精力讀書。[1] 不僅他如此，劉少奇等一班中共領導人，包括年輕時曾在履歷中自承「不喜讀書更是我的特長」的鄧小平，[2] 也都搭起了自己的班子，像模像樣地讀起書來。

這股「讀書風」是毛澤東帶頭開啟的。它的一個背景因素是，1959年5月，毛在二屆人大會議上辭去了國家主席職務，由劉少奇接任。毛的這個動作並不是急就章，從1950年代初中期起，他時不時就說要「退出一線領導」。某種意義上，當年發生高饒事件並鬧成大事，同毛這麼說是有關聯的。大躍進闖了大禍後，毛澤東不會沒有預感：黨內可能會出現不同的聲音。他走出「退居二線」這一步，把應對危局的責任推給了站在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燙手山芋讓他們去接，這是他在政治上為自己留下更大操作空間的「高着」。

廬山會議開始時，毛澤東列出了18個要在會上討論的問題，第一個就是「讀書」。[3] 在政治上，這帶有未雨綢繆的意味。後來，會上發生了彭德懷向他「叫板」的事件，毛以雷霆萬鈞之力批彭之後，似乎大獲全勝，但實際上他受到的衝擊是巨大的。會後，毛在中共領導層正式「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鄧小平等擔負起「一線」的領導責任。1959年11月，毛澤東給劉少奇寫信，專門講讀書的事。這之後，他又親自選出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召來一幫黨內秀才，在杭州找了一塊安靜的地方讀起書來。然後，秀才們整理出一大篇〈讀書筆記〉，在黨內傳播開來。[4]

據毛自己說，他這麼做是要總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不能說他這麼做不真誠，或是逢場做戲（儘管多少有點「做戲」的味道），但說到底，這是他在「退居二線」時走出的一步「大棋」。他掌權後貫徹的一項準則是：無論何時，都絕對不能失去對於中共主流話語的掌控。當時他也是在遵循這一準則行事，讀書時擺出的是一副發展馬列主義的模樣。他說，在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發展水平的條件下，經濟越落後，過渡到社會主義就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難。他還說，窮是中國躍進的動力，因為窮，就要幹，要革命，要不斷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國現在不富，將來富了，也一定會發生問題。[5] 毛澤東的這個舉動意義深遠，在理論層面為大躍進和他的「繼續革命」張目辯護。毛退居二線後，劉、鄧等處在一線的領導人的日常決策權力似乎加強了，但毛其實從來沒有真正地失去權力，尤其是對中共主流話語的界定權力。

毛澤東開了一個頭後，周恩來也緊張了起來。2月上旬，他找了李富春、陶鑄、宋任窮等管經濟或在地方握有實權的幾位中共大員，又帶上了搞經濟的薛暮橋、許滌新，以及搞黨史的胡繩等人，到廣東從化關起門來讀《教科書》。三個星期裏，他們幾乎通讀了《教科書》的社會主義部分。周在這期間三次發言，不斷為大躍進說好話、唱頌歌，說這是毛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以及「中蘇兩國情況不同，經驗不能照抄」等等。但同時，他又提出「不能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毛澤東個人的」，毛還在世時，「毛澤東主義，最好不提」。言語之間，他似乎還想給

大躍進踩上幾腳剎車。他說：「今年又有左的苗頭。」又說：「總不能天天躍進，總有波浪。」[6]

但從年初起，北京仍響徹着「繼續躍進」的高調。大躍進走火入魔的邪火依然在四處延燒，根本不是周恩來或其他人撒下的一點點毛毛細雨可以控制得住的。1月，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基調是毛澤東定的。他在會上說：「去年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績」，「廬山會議以後，很靈，生產月月高漲，連續兩年大躍進，今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些」。[7] 周恩來參加了會議，但不是主角。八大二次會議後，他在經濟計劃決策上被「邊緣化」。他雖然仍是國務院總理，但隨着決策權轉到書記處以及五個中央領導小組，他的實際權力大大「縮水」。很多事情他聽不到彙報，即便有想法也不敢或不能直截了當地講出來，更談不上付諸實施了。這次會議上，關於經濟計劃的報告是由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負責人的副總理李富春做的，講了1960年的經濟計劃和今後三年、八年的設想。[8] 周恩來坐在那裏洗耳恭聽。

會上，大家都按照毛澤東的調子說話，會議也跟着毛的思路宣佈：「1959年的大躍進是全面的躍進，1960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年，可能比1959年的形勢更好。」會議為1960年定下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標，要生產1,840萬噸鋼和6,000億斤糧食，分別比1959年增長33%和11%；從長遠看，要在三年內趕上英國，八年內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基本完成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渡；還要在1960年大辦公共食堂，試辦並推廣城市人民公社。[9]

然而，中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卻同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所描繪的美麗圖景大相徑庭。進入1960年後，大躍進早已露頭的失敗徵兆隨處可見，根本就搞不下去了。1959年的各項主要經濟指標，雖然宣佈「提前完成」，但實際上不僅水分極大，還留下了一系列極為嚴重的後遺症。對周恩來而言，抓鋼鐵生產，1959年的最後三個月簡直就是一場噩夢。廬山會議後，「保鋼」成為必須完成的頭號政治任務。這一年的鋼鐵產量經一再調整後，仍需達到1,800萬噸。周明明知道這根本做不到，但他掛着鋼鐵領導小組組長的名頭，還是要拼命去做。他後來說當時「連調整1千噸鋼產量也做

不到」。[10] 結果，全國各行各業都給「鋼鐵元帥」讓路，大肆折騰之下，生產出一大堆「鐵疙瘩」，再加上各省市各部門競相虛報謊報，終於在年底「超額完成」鋼鐵生產指標。然而，新年一過，靠打強心針和吹大牛湊合成的鋼產量急墜。只是，這時周恩來因為讀書和深度捲入同印度、緬甸等國的邊界談判，暫時從親自抓鋼鐵生產的困窘中解脫出來。

尤其要命的是，一場規模空前的大饑荒已在中國大地蔓延開來。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大減，而糧食徵購數卻大增，許多地方已出現處處餓殍的現象。然而廬山會議後，各地又在「反右傾」吶喊聲中大辦公共食堂，不少地方甚至連種子糧都吃掉了。這一來，缺糧的形勢也變得更為嚴峻。

周恩來雖身為總理，卻沒有深入了解糧食生產及供給正出現越來越大的缺口，一場空前的大災難正在醞釀擴展。3月29日，他收到一封來自安徽的群眾來信，是由主管信訪上告的副總理習仲勳轉來的。寫信者自稱是「一位不願署名的政協委員」，信中說安徽有兩個縣糧荒嚴重，已發生了餓死人及大批農民外逃現象。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警號，周當天就將信批轉給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並附言：「轉上一信，請閱後派人前往兩縣一查，也許確有其事，也許誇大其詞。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轉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這一點。請查明後覆我一信。」[11] 從現有文獻材料中，未看到周恩來還有進一步的跟進行動。

周恩來對這封信的處理，透露出他當時在決策層的尷尬處境以及謹慎小心的心態。同時，他這麼做，多半還受到了普遍存在於中共領導層的一種思維慣性的影響：自建國以來，幾乎每年春天各地都多少會出現春荒現象，到夏收開始後就會緩解，秋收後會進一步改善。因此，周顯然並沒有把這封信當作一場空前大饑荒的警訊，更沒有促使毛澤東和中央立即採取強有力的應對措施。

這是周恩來及整個中共領導層的一個極為嚴重的誤判。3月底、4月初，二屆人大二次會議召開，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分別做經濟計劃、財政預算和農業規劃的報告，全盤批准了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定下的1960年鋼鐵和糧食的生產指標。[12] 這樣，在全局意義上，周恩來收到的那封安徽來信以及諸多其他渠道發出的嚴重警訊被放過去了。

從4月底起，毛澤東到河北、山東、河南等地視察。當他問起當地的農業生產情況時，各省領導人統統報喜不報憂，紛紛向他保證，糧食生產和供應情況很好。4月30日，他在天津同剛剛在那裏主持了農村工作會議的副總理譚震林等人談話，譚告訴他，安徽「死人是個別的，多數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數也不多，而且糧食吃得相當多」。[13] 譚和各省領導人都在投毛之所好，只說他喜歡聽的話。毛澤東這種貌似廣泛徵求意見的做法，也是在給各路諸侯「上套」，讓他們上了大躍進這艘船，就別想下去。

就這樣，從1959年到1960年，在中國各地農村普遍出現糧荒及大批餓死人現象的嚴重情勢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卻對此忽略不見，沒有採取任何針對性的政策和措施，結果整整一年多的時間就這樣被耽擱了。這是地地道道的「人禍」！一場發生在和平時期、史無前例的人間慘劇和特大災難，已是在劫難逃。

二

周恩來沒有抓住糧食生產及供給已出現嚴重危機、大量農村人口餓死的嚴重警訊，除了他在決策層的尷尬處境外，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從1959年中起，他一直盯着日益緊張的中印關係，尤其是兩國邊界上出現的緊張局勢。

8月26日，周恩來突然接到報告，一樁幾個月來他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前一天，中印邊境部隊在邊界東段的郎久地區發生武裝衝突，印軍有2人被擊斃。9月8日，周恩來致信尼赫魯，系統地闡述了中國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也是對尼赫魯3月22日來信的正式回覆。周寫道，中國政府「一方面肯定中印邊界全部未經劃定的事實，另一方面又面對現實，特別考慮到中印之間的友好關係，積極尋求對雙方公平合理的解決方法，並且在邊界問題解決以前，絕不片面改變兩國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他強調，「中國政府絕不承認所謂麥克馬洪線，但是，中國軍隊從未越過這條線。這是為了維持邊境的和睦，以利於邊界問題的談判和解決」。周還說，中印兩國都「長期受到帝國主義侵略」，應「採取互相同情、互相諒解和公平合理的態度，處理兩國的邊界問題」，但印度「竟要求中國

政府正式承認英國對中國西藏地方執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根據。……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來支持這種要求」。周恩來要求印方「立即採取措施」，「回復兩國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14]

9月11日，周恩來在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上做了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的報告。他從中印邊界的歷史沿革談起，又講到兩國當下在邊界問題上的歧見：「最近中印邊界緊張，完全是由於印度的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士故意製造的。他們利用邊界一些糾紛，掀起了一個新的反華運動，污蔑中國『侵略』印度，利用西藏叛亂事件破壞中印友誼，而印度政府也企圖藉此機會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接受印度在兩國邊界問題上的片面主張，並且按照印度的意志修改地圖。」[15] 9月19日，周恩來接見錫蘭駐華大使高伯拉瓦時說：中印邊界是歷史遺留問題。西藏和平解放後，我們派去的解放軍很少，而印度的軍隊和民政人員卻逐步推進，侵入中國領土。中印之間歷次衝突都是由於印度軍隊侵入中國境內引起的。「雖然如此，我們願意保持中印友好，願意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16] 周是在向周邊國家闡明中方的立場，大概也希望錫蘭會給印度傳話。10月9日，周恩來接見印度國大黨議員喬奇姆·阿爾瓦，特別提到西藏問題和邊界問題固然造成中印兩國關係的不愉快，但他強調它們「不是我們發動的」，也只是兩國千年萬年歷史中的插曲，是能夠解決的。[17] 周這麼做，意在爭取印度政界與輿論界對中方立場的理解。

周恩來的話音未落，10月21日，中印邊境巡邏部隊又在邊界西段的空喀山口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衝突。這一次，雙方人員都有更大的傷亡：中方1人死亡，印軍12人死傷、7人被俘（後被釋放）。

8月和10月發生的兩次邊界衝突事件，不僅給中印邊界問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性，也揭示了這一問題的複雜性。西藏平叛發生後，1950年代一直處於友好狀態的中印關係就不斷惡化。這兩個事件又在印度國內引起了強烈反應，公眾對於中印邊界問題的負面輿論也大大增加，成為印度國內政治中一個引人注目並為各路政客大做文章的政治問題。右翼政黨連續在中國使館前舉行示威抗議活動，甚至要求印度和中國斷交。[18]

11月3日，周恩來到杭州參加毛澤東召集的工作會議，討論中印邊界問題。毛提出了自以為很聰明、做得到的一個想法：尼赫魯提出要雙方從郎久撤出，中方可以把這擴大到整個邊界線，「各退十公里，或者十五公

里，或者二十公里，或者三十公里，或者四十公里，中間不要武裝人員，非武裝人員，按照習慣線，各人管理各人的事情」；雙方總理可以在北京或新德里會晤，「就是要和平」。周同意毛的看法，連聲說：「好，好，好。」又說：「雙方聲明在談判前建立一個無槍地帶，這是很主動的。你來了，僅僅接觸，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吵一頓，沒有槍總打不起來。」[19] 會議決定，由周向尼赫魯提出這樣的建議。

11月7日，周恩來給尼赫魯寫了一封長信，表示空喀山口事件是一次「意外的邊境衝突」，提出「雙方武裝部隊立即從東邊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和西邊的雙方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二十公里」，「不再派遣武裝人員駐守和巡邏」，只「保留民政人員和非武裝的警察」。周並建議雙方立即通過外交途徑就此協商。[20] 第二天，周恩來會見印度駐華大使高伯拉斯瓦米·帕塔薩拉蒂（Gopalaswami Parthasarathy），對中方建議做了進一步解釋，他說，「各退二十公里就是一個積極的開路的建議」，雙方立場不同，但基本是友好的，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這是基礎。[21] 11月16日，尼赫魯致信周恩來，同意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會晤；但他又提出，要把中印邊界的東、中、西段分開，雙方在東、中段停止派遣前沿巡邏隊，在西段，印方將「撤退到據我們了解是中國政府最近的1956年地圖上所表明的國際邊界以西」，而中方則「撤退到印度政府在以前的照會和信件中所描述的和官方地圖上所標明的國際邊界以東」。[22] 後來，《泰晤士報》資深記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經仔細比照研究後指出，根據這一建議，「印度只需撤出一個哨所」，而「中國方面就要撤出大約2萬平方英里的土地」。[23]

12月17日，周恩來再次致信尼赫魯，指出尼赫魯的反建議「是不公平的，沒有理由的」，也是「從兩國早已同意的暫時維持邊境實際存在的狀況的原則後退了一大步」。周建議，「兩國總理在本月二十六日舉行會談」。[24] 延至1960年2月5日，尼赫魯才給周恩來覆信，同意和周舉行「會晤」，但同時表示他不能接受中印兩國邊界從未劃定的說法，因而不能與周恩來就此進行「談判」。[25]

周恩來在等待尼赫魯答覆的同時，加緊爭取同緬甸的邊界談判盡快獲得解決並正式簽約。從1950年代中期起，周在考慮解決中國同鄰國的邊

界爭端時就已經想到，印度和緬甸獲得獨立前都是英國殖民地，它們同中國在邊界問題上的爭端也有着很多相似之處。例如，兩國同中國的邊界都包括被稱為「麥克馬洪線」的部分。幾年下來，他已經形成了通過先行解決中緬邊界問題，來為解決中印邊界歧見積累經驗並提供範例的設想。1956年，在中方作出承認「1941年線」的重大讓步後，中緬邊界問題獲得重大進展。1956年6月，周恩來會見緬甸駐華大使吳拉茂時說，「相信人大會批准政府的（邊界談判）方針，因共產黨員超過半數」。[26]

然而，1958年緬甸政局出現變數，獨立後長期執政的自由同盟分裂為兩派。6月，總理吳努重新組閣，將反對派的多名部長和副部長解職。反對派提出對吳努的不信任案，並在中緬邊界問題上，對吳努把片馬、崗房和古浪交還中國提出強烈反對。[27] 8月，吳努解散議會，緬甸政局持續動盪，中緬邊界談判也陷入停滯。

1958年10月，吳努辭職，緬甸軍方領導人奈溫將軍出任看守政府總理。[28] 緬甸政局相對穩定後，1959年6月4日，奈溫向中國政府提出緬方關於解決邊界問題的「最後方案」，希望在此基礎上重啟談判，將邊界協議正式定案。外交部相關人員審閱奈溫的方案後，認為「基本符合我們的底盤，這說明奈溫還有解決問題的誠意」。[29] 12月，周邀請奈溫訪華「就解決邊界問題進行原則性的商談」。[30] 1960年1月下旬，奈溫來到北京，周同他就最後解決兩國邊界問題舉行會談，在中方接受1941年線，緬方同意交還片馬、古浪、崗房三地並將班洪和班老交給中方以換取勐卯三角地區的基礎上，雙方達成了協議。1月28日，周恩來和奈溫在北京簽訂了中緬邊界問題協定。[31]

1月2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95次會議上陳述中緬解決邊界問題的草案。他沒有就中方接受1941年線等對緬方作出的重大領土讓步做任何渲染，而是強調雙方的協議包括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肯定了中緬過去的邊界是「未定界」（亦即否定了英印當局所劃定的1941年線的合法性），「把古浪、片馬、崗房歸還中國」，以勐卯三角地區換回班洪、班老兩部落在1941年線以西的地區。周還強調，對過去國民黨正式簽訂的換文，要修改以後才能承認，然後要定界、豎界樁。[32]

中緬之間看上去十分複雜的邊界問題，終於接近最後解決的時刻。

三

3月中旬，周恩來在廣東讀書後回到北京，馬上集中精力為訪問印度做準備。此時，依據中緬之間解決邊界問題的思路和方法，他經過對中印邊界歷史沿革的仔細研究後，已形成了一套「以東換西」、解決邊界問題的計劃。他的基本設想是，雙方在原則上都應當否定由英國殖民者所制訂的麥克馬洪線的合法性，但同時，他通過提出「實際控制線」的概念並以之為定界的基礎，實際上接受同麥線極為接近的邊界線。根據周的設想，中國將承認印度對於東段實際控制線以南部分的主權，以此換取印度承認中國在西部阿克賽欽地區的主權。根據這一設想，中國將失去東部原為藏南地區的9萬平方公里的爭議領土，而獲得印度承認中國對西部阿克賽欽地區近3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權。

在周恩來看來，他的建議充分考慮到了中印邊界的實際情況，也照顧到了雙方的重要利益。自1950年代初期起，麥線以南的藏南地區就一直處於印度控制之下。而阿克賽欽地區則基本處於中方控制之下，中方在1950年代中期建成的新藏公路亦由此通過，是連接西藏阿里地區與內地的唯一通路，因而在戰略上對中方極為重要。

周恩來的思路中，透露出一種「中國式」的政治智慧。其實，他提出走向和麥克馬洪線高度重合的「實際控制線」的概念，就是為中方接受麥線這一「現實」服務的。周想做的是，先在法律上（de jure）否定麥線，再在事實上（de facto）接受麥線。他希望這麼做可以換得尼赫魯在阿克賽欽地區的讓步，從而繞過麥克馬洪線本身帶來的法律和其他問題，並在國內提供一種講得過去的解釋，為解決邊界問題的解決創造一種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現實基礎。

問題在於，在後來的談判中，尼赫魯卻見不及此——這同他的知識背景、個性以及他對1959年以後印度輿論民情的閱讀是分不開的。雖然印度從未控制過阿克賽欽，但尼赫魯卻在和周恩來的會談中堅稱，由英國殖民者單方面繪製的地圖將阿克賽欽當作印度的拉達克（Ladakh）地區的一部分，並據此堅拒對中方作任何讓步。[33] 這是周恩來所始料未及的。

周恩來試圖把緬甸邊界問題的經驗用於同印度的談判時，除未能預知印方內部的情況變化外，亦忽略了印、緬之間的兩個重大差別。第一，緬甸是一個比印度要小得多的國家，吳努、奈溫等緬甸領導人也沒有尼赫魯等印度精英階層乃至普通民眾的那種「大國意識」以及關於印度「大國地位」的極高的自我期盼，更沒有尼赫魯面對中國時的優越感。第二，比之更具有威權政治特色的緬甸，印度實行更為多元的議會民主制，決策者處理邊界問題時面臨着更多不同的聲音，受到國內政治的諸多限制，迴旋餘地也相應地小得多。[34]

出訪印度前，周恩來對於「以東換西」的一攬子方案能否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打開通路，心中充滿忐忑，但依然燃燒着希望之火。為準備同尼赫魯的會談，他親自主持擬就了一個關於中印邊界會談的方案，對前景的估計是：「此次會談在邊界某些問題上達成某種性質的協議是可能的，全面解決的可能性不大，完全沒有結果的可能性也不大。」他為與尼赫魯會談確定的目標是：「爭取就某些原則問題，或者具體問題達成協議，使目前的形勢進一步緩和下來，為今後繼續會談和導向合理解決準備條件。」[35]在另一次內部講話中，周說得更透徹：「這次談判有什麼結果，希望不能太高。印度情況複雜，要有各種打算，不能有肯定答覆。最壞的就是不歡而散。談不出什麼結果，甚至在外面扔雞蛋、石頭。但也沒有什麼，道理總是在我們這方面。……最好的結果就是像中緬、中尼那樣。看現在的情況，可能性不大，因印度說話說得那麼死，要轉很大的彎子不容易。」[36]

到印度訪問前，周恩來又先行訪問緬甸。此時，緬甸政局又有變化，吳努再度出任緬甸總理。自1月奈溫訪華後，中緬組成邊界問題聯合工作組後即加緊工作，周到仰光本是奔着簽約而去的，但因吳努表示緬甸「國會來不及完成立法手續而不能實現」。[37]周訪緬結束時，只是發表了一個重申雙方已達成原則協議的聯合公報。中緬邊界條約要到1960年10月1日才正式簽訂。

周恩來和吳努的第二次會談中，吳努談到中印邊界問題也可以採取和中緬邊界問題的同樣原則獲得解決。周馬上表示這正是他在做的，「我們完全可以根據中緬解決邊界問題的原則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吳努說他「要把這次談話轉告尼赫魯」，周表示不反對。[38]

當時，中蘇關係已處於十分微妙的狀態。但周恩來知道，蘇、印關係正走在上升通道上，他希望蘇聯能站出來說幾句話，從而能幫助中印談判進展。4月17日，他和吳努舉行了兩場冗長的會談，但還是抽出時間和蘇聯駐緬甸大使列多夫斯基會面。他說：「我們是有解決邊界問題的誠意的。解決問題要雙方有誠意，單靠一方面是不會成功的。目前看來，印度方面包括尼赫魯總理本人還沒有解決問題的意願。所以，可以說尼赫魯只有一半的願望。談判是否成功，還在兩可。我們將盡力爭取達成一些協議，使會談取得某些成就。但是，這不能完全取決於我們這一方面，達成協議要靠會議雙方的努力。」[39]

4月19日傍晚，周恩來飛抵新德里。機場上的場面冷冷清清，再沒有他前兩次到印度訪問時那種萬人空巷的景象。[40]但他仍在尼赫魯的歡迎宴會上表示：「只要處處為兩國友好的長遠利益着想，既考慮到歷史背景，又考慮到當前的實際情況，根據五項原則，互諒互讓，兩國邊界問題是完全能夠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決的。」[41]然而，會談後來的進程卻遠遠不同於周恩來的預料，比他最壞的想像還要困難得多。

周恩來和尼赫魯的第一次會談於4月21日舉行，主要由尼赫魯發言。他堅稱中印邊境已經劃定，喜馬拉雅山就是印度的邊界，在高山地區，兩國一向以分水嶺為界，不存在重大問題。然而中方卻採取了一些「在我們看來是侵略」的步驟，中國在西段阿克賽欽地區修建的新藏公路侵入了印度領土。他還說印度在西藏問題上根本沒有干涉中國內政。[42]

第二次會談中，周恩來詳細闡明了中方立場。他提出，中印兩個古老國家在歷史上沒有像現代國家那樣按照經緯度劃定過疆界，但兩國相處「的確有些傳統習慣線」。在邊界西段，存在爭議的是阿克賽欽地區，雙方地圖存在分歧，「中國的地圖很早就把這個地區畫在中國境內」，印度的地圖有過很多變化。但阿克賽欽一直處於中方控制之下，從未為印方控制，「過去我們從來沒有認為那裏存在問題」，現在是印度向中國提出了領土要求。在東段，雙方存在爭端，麥克馬洪線是英帝國主義所遺留，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麥線以南地區史上稱為「藏南」，屬於西藏地方政府管轄，同英屬印度之間存在着一條傳統習慣線，但後來改變了。周強調中國政府在法

律上不承認麥線，但主張維持現狀，並願意以現實的態度來求得問題的解決。周建議在兩國邊界正式劃定前，可以採取維持現狀和隔離的辦法，以避免衝突，直至分歧獲得合理的最終解決。[43]

在周恩來同尼赫魯的第三至五次會談中，兩人來回辯論交鋒，反覆闡述各自的看法，卻很難找到可以達成妥協的交集點。周發現，尼赫魯幾乎對他提出的每一個看法或建議都竭力反駁，或者根本不屑一顧。例如，周一再提出中印邊界存在着一條傳統習慣線，尼赫魯卻說，他根本不知道周講的是什麼。周提出「在東段，除個別地點以外，我們承認印度行政管轄現在達到的線；在西段，印度也應該承認中國行政管轄現在達到的線」，這是一個「以東換西」的總體解決方案。但尼赫魯對此毫無興趣，仍要周全盤接受印方的主張。他甚至反對使用「談判」（negotiation）一詞來指稱他和周的會談，堅持說這只是「談話」（conversation）。[44]

周恩來先前雖曾想過，他和尼赫魯的談判不會容易，但沒有想到實際進程竟會如此艱難。關鍵在於，尼赫魯根本就不承認中印之間存在着邊界問題，一味地要周全盤接受他的看法。這麼一來，談判怎麼進行得下去？周不希望看到會晤如此告終，絞盡腦汁之下，他在第六次會談中提出，雙方成立一個邊界聯合委員會來討論邊界的確定，在邊界未確定前，雙方維持處於各自行政管轄下的「實際控制線」。周還建議雙方發表一個聯合聲明或公報，說明「我們的會談獲得了進展」。然而，尼赫魯的回應卻極為冷淡，到最後時刻才同意在會談結束時發表一份公報。[45]

4月25日上午，周恩來和尼赫魯舉行了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談。兩人交換了中印各自起草的公報草案後，周發現雙方在公報內容及措辭上也無法達成協議。在中印之間是否存在邊界爭議，是否存在實際控制線，邊界問題的解決應否考慮到包括民族感情在內的各種情況，雙方在從事邊界談判時應否以不提出領土要求為先決條件，以及雙方的會談除純粹的程序問題外是否取得了任何進展等上面，他和尼赫魯都存在着分歧。最後，兩人只發表了一個簡短的公報，說明雙方存在分歧，談判將繼續舉行。[46]

周恩來的新德里之行以失敗告終。他因此產生極為沉重的挫敗和無力感，意識到中印邊界問題比他先前的想像要複雜得多，而解決雙方邊界衝

[11519]

Top Secret 4

IV.

Record of talks between P.M. and Premier Chou En Lai held on 22nd April, 1960 from to A.M. to 1.10 P.M.

PREMIER CHOU: We now have had two days' talks. Both sides have repeatedly stated their position and viewpoints on many questions. Yesterday we made some new points and you also put forward some views on the Simla Convention and made a new proposal. I think this preliminary ~~meeting~~ taking of ~~views~~ avenues should have a destination. Therefore, today I propose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in three parts .-

(1) Facts -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those facts on which our viewpoints are closer to each other.;

(2) Common Grounds - from the beginning I have said that we have come here to find common grounds because it is only from this that we can reach agreement on principles;

(3) The original proposal and new proposal by Prime Minister - I will reply to P.M.'s proposal and also would like to make a counter proposal.

I. Facts:- (i) Eastern sector. On the eastern sector of the boundary we also had a traditional and custmmary line. But the situation later changed. This line had appeared even in maps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including those published in India) by them) during the years 1880 to 1936) and this customary line has always appeared to the south instead of the Mcmahon line. Between this traditional and customary line and the Mcmahon line there was an area occupied by many tribes (as many as 6). As accounts by various travellers would also prove, most of the tribes were under Tibet.

When the British were in India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they kept the line to the south and this line was not changed till 1936. The British only established some up connections with some of the tribes to the north of the line.

Ser. 11578

圖21.1：周恩來和印度總理尼赫魯第四次會談記錄，1960年4月22日。(尼赫魯圖書館)



圖21.2：周恩來和尼赫魯在新德里，1960年4月。
（Everett Collection Historical / Alamy Stock Photo）

突的最佳機會也許已經失去。同時，這也導致了他對於尼赫魯極大的不信任乃至某種厭惡感。他後來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尼赫魯是他所見過的「最傲慢的人」，也是「最難打交道的人」。[47] 中國外交部的一份內部文件甚至說，尼赫魯「一味耍流氓，不願達成協議」。[48] 1961年5月9日，周恩來在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時說，尼赫魯「恬不知恥」，「有奶便是娘」，已經「倒向美國，…… 自覺地作帝國主義的走狗」。[49]

尼赫魯也對周恩來產生了極深的成見，認為周「背叛」了自己對他的信任及支持。後來有一次，在中印邊界戰爭發生後，同兩人都有私人來往的韓素音曾給尼赫魯帶去周的問候，尼赫魯只是「痛苦地迸出一句：『明白了』」。在接到周的另一友好信息時，尼赫魯說：「周的友誼我已經領教夠了。」[50] 周恩來和尼赫魯都對對方徹底地失望了。

四

就在中印關係惡化的同時，中蘇關係也出現了緊張異動的新跡象。自1959月6月20日蘇方突然決定暫緩向中方提供原子彈樣品及相關技術資料後，一度如日中天的中蘇關係，已開始走上下行通道。1959年9月，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同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戴維營會晤。這之後，他回到莫斯科後幾乎未作停留即飛來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慶祝活動。9月30日晚，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赫魯曉夫發表了40分鐘洋洋灑灑的講話。他對美蘇會談所表現出的「戴維營精神」大加宣揚，聲稱這將緩和東西方之間的緊張關係，毛聽後大不以為然。赫魯曉夫又說，「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這是不正確的」，毛澤東不高興了，覺得赫魯曉夫指的就是中國革命和他本人。他當即決定不在國宴上發表講話，而改由周恩來致詞。[51]

10月2日，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各自帶領一大班人馬舉行了正式會談，周恩來也參加了。本來，這為中蘇兩國領導人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會，讓他們有可能通過面對面的交換意見來彌補裂痕。然而，情況卻向着相反的方向發展，以毛和赫魯曉夫為首的中蘇領導人對話，很快便演變為唇槍舌劍的爭辯。

會談開始後，赫魯曉夫介紹了他訪美的情況，認為「艾森豪威爾的確需要緩和」，又說，「我們跟美國只能在經濟上搞競賽，搞和平競賽，不能用武力來試探它的穩定性」。毛澤東又覺得這個話是對着他說的，聽後生氣了。赫魯曉夫接着提到，他從美國人那裏得知，中國還關押着五個美國人，他提出，「如果採取不刺激關係的方針，……最好把扣押的美國人放了」。毛覺得赫魯曉夫是在給美國人當說客，連半點面子都不給他，當即答道：「當然，放是可以的，但是現在不放，要到一個適當的時候再放。要知道，美國人把我們在朝鮮的大量志願軍遣送到台灣去了。」周恩來解釋道，中國不能放人的原因是中方早已釋放了朝鮮戰爭期間被扣押的13名美國戰俘，現在仍被關押的5名美國人，3人是「披着神父外衣刺探中國的情報」的美僑，兩人是駕機來中國偵察、飛機在中國領空擊落後被捕的中央情報局間諜。[52]

雙方談到台灣問題時，赫魯曉夫影射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在處理1958年台海危機時犯了冒險主義的錯誤，還抱怨道：「我們是你們的盟友，卻根本不知道你們在台灣問題上的打算。」他說，十月革命後列寧同意建立遠東共和國，以作為蘇俄和日本之間的緩衝區，毛和中國領導人可以用同樣的方法求得台海緊張局勢的緩和，卻要「為了逗逗貓而炮擊島嶼，不值得」。毛反駁道，我們不想和美國打仗，但也不能「像美國人說的那樣去做，聲明在台灣地區不使用武力，並使這個問題國際化」。周恩來插話說：「要解決我們跟美國的關係，唯一的辦法是美國撤出台灣，從台灣撤兵。至於台灣和大陸的關係，那是我們的內政，我們用什麼辦法解放台灣，用和平的辦法還是用武力的辦法來解放台灣，別人不能干涉。」

赫魯曉夫又把話題轉到中印關係，詰問道：「你們為何要在中印邊界上打死人呀？」他還說，「你們何必去爭那麼一點地方？喜馬拉雅山下荒無人煙，爭那麼一小塊地方有什麼意思」。周恩來是中方處理同印度關係的負責人，他反駁赫魯曉夫：「他們先向我們進攻，我們能怎麼辦？我們總不能向天上射擊吧！」赫魯曉夫說：「我打過仗，不管誰先開槍，可中國人沒死，而印度人死了。」

這時，陳毅接過周的話頭，提高嗓門告訴赫魯曉夫，社會主義國家確實應當團結民族主義國家，但絕不應當姑息它們的錯誤。「你們的方法是遷就」，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

赫魯曉夫大怒：「蘇聯存在了四十二年，沒有遷就過任何人！」又指着陳毅的鼻子說：「你是元帥，我是中將，但不管怎麼樣，是你們先打死了人家的人。」

眼看爭論越演越烈，場面幾乎失控，周恩來打圓場說：「中共和蘇共之間會有爭論和尚未解決的問題，但對外我們一直強調同蘇聯的團結。」毛澤東也講了幾句緩和氣氛的話。但會談完結時，雙方的心結已成，仍是不歡而散。[53]

中蘇關係本來就已經捲入寒流，10月2日會談後更是雪上加霜。鑒於中蘇領導人在10月2日的會談過於情緒化，11月11日周恩來接見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時被告知，蘇共中央主席團已經決定，把10月2日在北京舉行會談的記錄銷毀。周說：上次會談的內容，我們也沒有向下傳達；對會談

中所談論的問題，雙方說明的是各自的看法，我們之間沒有分歧。[54] 雙方商定銷毀各自關於10月2日會議的記錄，但恐怕哪一方都沒有銷毀（俄方至少還保留了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的會談筆記，中方相關檔案從未解密）。

周恩來雖然在10月2日會談中跟着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吵架，但他並不希望看到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10月4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開會討論中蘇關係，會上仍是一片對赫魯曉夫的聲討。周在發言中也批判了赫魯曉夫，但他又提出，中蘇兩黨在對美國以及對印度的問題上確實存在分歧，但還是不要進一步把事情搞大。關於中蘇分歧，「我們暫時還不同他爭論。我們要有耐心，要等待，讓客觀事實和歷史進程來教育他」。會議最後決定，儘管國際上出了修正主義思潮，「我們目前應採取團結為重、不搞爭論、冷靜觀察的方針」。[55]

然而，赫魯曉夫可不是省油的燈。他在返回莫斯科途中，又於10月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發表演說。他說了一番中蘇之間的「兄弟團結」是世界和平基石之類的漂亮話，但又忍不住宣稱，如果有人「像一隻好鬥的公雞那樣渴望戰爭，那是不明智的」。赫魯曉夫是在影射中國和毛澤東，攻擊中國包括大躍進和中美關係的內外政策。[56]

毛澤東哪裏肯咽下這口氣？在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把中蘇關係也列為討論主題。他對赫魯曉夫的指責不止於中蘇關係中的一些具體問題，而是上綱上線地說：蘇聯可能會沿着修正主義的道路繼續滑下去，赫魯曉夫也可能完全變成修正主義。[57] 會後，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印發了〈蘇聯和我國對於重大政治問題的一些看法〉、〈中蘇關於國際形勢的若干觀點〉、〈中蘇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若干觀點〉等一系列文獻材料，向下傳達，第一次將中蘇之間存在重大分歧的情況向黨內幹部「吹風」。

中蘇關係面臨的另一羈絆，是中印關係的持續惡化。1960年1月19日，周恩來得知赫魯曉夫將對印度進行訪問後，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請他轉告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希望赫魯曉夫在訪印期間不要涉及中印邊界問題，以避免中蘇之間的分歧暴露並為印度資產階級所利用。[58] 三天後，契爾沃年科回覆道，莫斯科將一如既往地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嚴守中立」，並反對第三國干預。這一回答引起了中方的強烈反應。1月26

日，周恩來和陳毅召見契爾沃年科，就蘇方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嚴守中立」的表態提出嚴厲批評。周說，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與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衝突時，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卻表示「嚴守中立」是史無前例的，也將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分歧暴露出來。[59] 第二天，契爾沃年科再次求見周、陳，表示他在闡述莫斯科對中印關係的態度時錯誤地使用了「嚴守中立」的說法，然而周仍堅持說，即便不用「嚴守中立」的說法，蘇聯的政策依然是錯誤的，中蘇之間在這一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60]

中蘇矛盾的根子，其實在於中蘇領導人對各自在雙方關係中的定位，尤其是對哪一方更應執掌國際共運之牛耳存在着重大分歧。這年4月，恰逢列寧誕辰90週年。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決定利用這個時機發表幾篇「重頭文章」，宣揚毛和中共在帝國主義、和平與戰爭、無產階級革命等根本問題上的「正確看法」，並不點名地對赫魯曉夫及蘇共的「現代修正主義」立場和觀點提出批判。4月下旬，中共喉舌《紅旗》和《人民日報》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對現代修正主義提出嚴厲批判，並譯成俄、英、德、法、日文等結集出版，通過中國駐外使館散發。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對毛和中共的做法極為惱火，給他們反扣上「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帽子，甚至通過外交渠道同中方交涉。[61]

在此背景下，1960年6月，中共派出以彭真為團長的代表團參加了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會晤」。毛澤東指示，要充分做好他們要整我們的思想準備。[62] 彭真等到達布加勒斯特後，果然遭到蘇共及其他許多黨代表的「攻擊和謾罵」，赫魯曉夫也親自出馬指責批判中共，甚至出現了當面與彭你一句、我一句爭吵不休的場面。[63] 這時，彭真等收到了國內的詳盡指示，是由周恩來起草、經毛批准後發出的。指示詳細敘述了在各種情況下中共代表團的應對之道，一方面要代表團與赫魯曉夫堅決鬥爭，一面又指示彭真在堅決駁斥赫魯曉夫及蘇共的攻擊後，為「顧全大局」，仍要在會晤公報上簽字。周在電報發出前親自打電話給彭真，面授機宜。彭讀到電文後說：「這是周恩來親自寫的，明確、周全，各種情況和對策都替我們想到了。」[64]

布加勒斯特會議後，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決定就中蘇分歧及其歷史淵源進一步在黨內吹風，並要周恩來領頭來做這件事。7月14日至16日，中

共領導層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連續用三個半天做了一個關於中共和共產國際及蘇聯關係的長篇報告。[65] 毛和中共領導層決定讓周做這個報告，因為周自1927年起就是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同共產國際及蘇聯打交道的歷史源遠流長，許多事情他都曾親身經歷。同時，他在黨內人脈深厚，即便因「反冒進」受到毛的嚴厲批判，在黨內的威信和威望猶在，毛要在黨內傳播向蘇聯叫板的信息，還有誰比周更合適？

在報告中，周恩來分五個時期回顧了中共和共產國際及蘇聯交往的過程。他說，從中共的角度看，共產國際是「兩頭好，中間壞」，對中國革命有幫助，但也犯過許多錯誤，如干涉中共的內部事務、不讓其獨立自主發展。斯大林的錯誤更多一些，德黑蘭會議上，承認除東北外的中國都是英美的勢力範圍；二戰結束後，「用很嚴厲的口氣要我們去重慶談判」；在東北，「蘇聯不相信我們能夠勝利」；直到1949年初，「他們認為國民黨還有力量，對我們是否能夠取得全國的勝利還有懷疑」；1949年底、1950年初毛訪蘇，他們「冷淡接待」；在中國出兵朝鮮時，「答應援助，但是要我們出一半價錢」，「援助我們空軍的問題，開始答應了，以後又不答應了」。但「斯大林還有點自我批評精神」，在1949年夏劉少奇訪蘇時，「含蓄地承認了他在中國問題上的錯誤」。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後，斯大林對中國的態度發生變化，「承認中國不是民族主義，不是半個鐵托，而是真正共產主義」，蘇聯援華的156個建設項目「才落實下來」。赫魯曉夫上台後，馬上「就急急忙忙要結束朝鮮戰爭」，可以看出他「很怕美國人，要討好美國人」；他「在國內大權獨攬，在國外也突出個人」；從1958年起，「他就企圖控制我們」，「把中國當成是『黃禍』」。但周又提出，儘管中共同赫魯曉夫的路線鬥爭有「長期性和複雜性」，中共還是應「高舉團結的旗幟」，不應「為着破裂而鬥爭」，而應以「爭取團結為目的」。[66]

顯然，周恩來做這個報告時，並不希望中蘇之間的關係繼續惡化。然而他沒有想到的是，7月16日，亦即他做報告的最後一天，中國政府接到了蘇聯政府的一個照會。蘇方以中方不信任和尊重蘇聯專家，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為紀念列寧而發表的三篇文章等為理由，宣佈召回在中國工作的所有蘇聯專家，中止執行中蘇之間所有的專家合同書和補充合同書，並大幅度地減少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及其他各方面的物質及技術援助。[67] 在大躍

進給中國經濟及社會已造成災難性影響、中共正面臨着自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巨大困難時，赫魯曉夫試圖狠狠地將毛澤東一軍。這對於當時已經處於危局的中國經濟情勢，顯然是極為嚴重的衝擊。

在周恩來的親自參與部署下，中方對蘇聯的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抨擊，指責蘇方「背信棄義」，對中國搞「突然襲擊」，其行為「不論從法律上、道義上、政治上說，都是無法辯解的」。[68] 7月31日，周恩來在北戴河會議上作了關於蘇聯撤走專家後如何應對的報告。周提出要嚴格控制從蘇聯的進口，「如果蘇聯方面提出要保留一些，需要重新簽訂合同」。他說：蘇聯撤專家，「想拿這個來壓我們，這怎麼壓得成呢？……要爭口氣，把欠蘇聯的債還掉」。[69]

但同時，周恩來又親自出面，想要說服蘇方讓部分專家留在中國，以多少控制一下由此而產生的巨大衝擊，但蘇方未予同意。即便如此，在周的主持下，國務院向全國各部門、各地區和聘有蘇聯專家的單位發出通知，指示它們「對即將返國的專家和家屬應當盡一切可能熱情送別，充分表達我國人民對蘇聯專家的謝意，善始善終地搞好和他們的友誼團結」。[70] 8月16日，周又親自主持歡送蘇聯專家的宴會，並發表了一番充滿感激之情的講話，對他們為幫助中國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表示誠摯感謝」；還說：「我們分開了，但相信兩國、兩國人民的友誼是永恆的。」[71] 可是，面對中蘇關係緊張的火勢延燒，周恩來的些許努力是擋不住的。到8月下旬，蘇聯在華專家1,253人全部撤離中國。[72]

赫魯曉夫及蘇方召回全部在華專家的決定，固然對當時已陷入大躍進失敗困局的中國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但從毛澤東的視角看，這並不見得一定是件壞事。本來在黨內上層，大家即便不明言，但總有人會在心裏把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同毛聯繫起來，使得他「一貫正確」的神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也使他在中共決策層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遭到削弱。蘇聯決定召回在華專家後，毛馬上給蘇聯扣上了一頂在困難時向中國「逼債」的帽子(這其實和事實完全不符)，這就使他有理由聲稱，蘇聯「背信棄義」和「落井下石」的行徑是造成中國國內各種困難的原因。同時，這也使毛還能夠在大躍進失敗的背景下更理直氣壯地將「反修」同維護中國主權和核心利益聯繫在一起，從而使得他的「繼續革命」議程仍然能在中共的意

識形態表述中佔據中心地位。而在中共領導層內，沒有人（包括周恩來在內）能夠對這種將「繼續革命」和中國人的革命民族主義訴求如此合為一體的論述提出質疑。[73]

五

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還是在國內，尤其是當時已火燒眉毛、不斷惡化的經濟情勢。不管「繼續躍進」的號角吹得多麼響亮，鋼鐵產量不僅沒上去，反而一直往下掉，整個工業形勢呈現出一片「大倒退」的景象。更要命的是農業和農村的情況，非但沒有點滴「躍進」的味道，連「保底」都做不到了。整個春天，中共領導層一直面臨着城市糧食供應極端緊張的問題，但還認為這只是暫時現象，會隨着夏收開始緩解。4月12日，中央在對李先念的一個關於糧油調撥銷售情況報告的批語中說：「現在距離新糧上市還有五十天，這段時間是糧食調撥、銷售和安排人民生活的緊要關頭。」[74]

然而，5月中下旬過後，農村的糧食調出仍在減少，城市糧食供應也愈發緊張。進入6月以後，北京、上海、天津、遼寧等十個工業城市的糧食儲備更是「天天告急」，達到捉襟見肘的地步。警報如雪片般飛入中南海，毛澤東終於被驚動了，他在經濟決策上「擱置」周恩來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6月8日到18日，中共中央又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同幾個月乃至幾個星期前相比較，毛澤東說話的調子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不到一個月前，毛在外地視察時還不時唱着「躍進」的高調。但在這次會議的開幕式上，他卻說了一段隱約間帶有自我批評意味的話：「建設時間還太短，認識不足。……不要隱諱我們犯的錯誤，只有抓緊總結，才能及時指導。」[75] 如果這段話還說不上同周恩來有太多直接關係的話，會議結束前兩天，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指着周說：「我還是喜歡你在八大一次會議上提的那個東西，它給我們留了這麼大的餘地嘛。」[76] 接着，毛澤東又寫了一篇〈十年總結〉，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分發給與會者。他在文中除了承認「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外，還專門提到周恩來：

1956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麼好啊！[77]

毛澤東的話戛然而止，沒有再往深處說下去，但他分明指的是自己兩年前批判周恩來「反冒進」時為周羅列的錯誤和「罪狀」。彼一時此一時，現在到了毛的嘴裏，卻當作周的功勞講了出來。這算不上是毛在為周平反，政治上更可以看作是毛在發現自己闖了大禍時後退一步，也藉此推卸責任的一種做法。表面上，毛的這些話會讓周的政治處境有所好轉，也會讓他多少可以放開手做一些事了；但實際上，毛說這些話時，又把同時解決「保鋼」和糧食調運危機這兩個「燙手山芋」放到周恩來手裏，讓他牽頭去處理。

會上，毛澤東要從未主管過農業的周恩來「談談農業方面的情況」，並要周「一次把主動權拿過來」。周恩來的講話以「總的形勢很好」開始，對大躍進唱了一番頌歌，但他接着闡述了高指標、高估產給農業帶來的嚴重後果。1960年的「產量又高估了」，結果「我們不但今年陷入被動，而且到1962年的計劃也有完不成的危險」。周還抓住了毛「一次把主動權拿過來」的話，建議對糧食、棉花及養豬的指標做大幅度的下調，不僅為當前想，還要為後幾年想，只有這樣「才能全部轉入主動」。[78]會議後，中共領導層建立於八大二次會議後的決策機制發生變動，中央財經小組停擺，周恩來經毛澤東點名後，在經濟計劃決策上「重新出山」。他一下子就面對着兩個大挑戰：一是保鋼鐵生產，二是抓糧食調運；但在當時，前者仍是第一位的，後者是為前者服務的。

大躍進從一開始就是「鋼鐵掛帥」。1960年夏，這仍是一頂套在眾人頭上的「緊箍咒」。6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雖然討論了基建「戰線拖得過長」的問題，但仍然強調一定要把鋼鐵、煤、運輸等搞上去，這時最大的問題卻是糧食形勢的極度惡化。從年初起，城市的糧食供應就日益緊張，到夏收後仍繼續惡化，各大城市甚至達到了「斷糧」的邊緣。

7月5日至8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經濟問題及國際形勢和中蘇關係。7月12日，國務院財貿辦副主任牛佩琮、糧食部長陳國棟向李先念再次呈送了「關於糧食情況的緊急報告」。第二

天，李先念即將牛、陳的報告轉呈周恩來：「現在的糧食庫存，北京、天津只夠銷四天；上海只夠銷兩天；遼寧只夠銷六天。如不加速調運補充庫存，照現在這個樣子下去，是會出亂子的。」他提出，要「為糧食調運讓路，把糧食調運任務放在第一位」。[79]

然而，這麼一件大事若沒有毛澤東發話，單靠周恩來是推不動的。7月25日，李先念又給鄧小平、毛澤東和中央寫報告：「據糧食部報告，7月22日，北京市區庫存糧食銷不到4天，上海只夠銷6天，天津只夠銷17、8天，遼寧20日庫存糧食銷不到10天，吉林19日糧食存量只夠銷17天……情況危急。」[80]接到報告後，毛澤東、周恩來和整個中共領導層吃驚不小。但他們在考慮應對方略時，卻並沒有把重點放在解決缺糧現象的根子上，而是放在更加強化對農村的糧食汲取，從而保證對城市的糧食調運上。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毛澤東在會上的一句話：其他都可以減速，就是鋼鐵生產指標不能降低。[81]

北戴河會議的最後幾天，中共中央連續做出各種決定。8月10日，發出了〈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和〈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8月14日，又發出〈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82]表面上看，這幾項指示似乎給農業和工業以同樣的重視。但實際上，基於當時農村已普遍出現饑荒，「保糧」本應是最優先事項，但指示卻把「保糧」和「保鋼」相提並論，又要求同時「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等於是讓「保糧」為「保鋼」服務。這一點，在8月15日發出的〈關於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中更為明晰地表現出來。這一指示嚴令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把手要親自掛帥，「確保八月和以後每月糧食調運計劃的完成。時間緊迫，萬萬火急」。[83]顯然這才是毛和中共領導層的頭號關切。

就在會議期間，周恩來批准，在中國根據1960年中阿貿易協定向阿爾巴尼亞提供1.5萬噸小麥、年初又已同意增加援助3萬噸小麥的基礎上，[84]應阿方的要求，在1960年8至12月間再增加援助阿爾巴尼亞5萬噸小麥，第三季度送交3萬噸，第四季度送交2萬噸，並將其「償付作為特別帳目，待以後由雙方協議處理」。[85]這裏的意思是，這5萬噸小麥等於是白送給阿爾巴尼亞了。不僅如此，經周恩來批准，這批糧食將「另租西

方船隻運送」。[86] 這就是說，中國還要用外匯貼上運費。此前，中國還曾同意援助朝鮮10萬噸糧食。這可是一顆顆從中國老百姓嘴裏摳出來的糧食！

8月30日至9月5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彙報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李富春提出「整頓、鞏固、提高」，周恩來改為「調整、充實、鞏固、提高」。[87] 然而，這裏的調整並不包括「鋼鐵元帥」，完成鋼產量指標仍然是壓在周恩來頭上的一座大山。為了「保鋼」，周恩來會沒有少開，鼓勁的話沒有少說。10月10日，周參加中央書記處專門討論「保鋼」的一次會議。之後，他「專門到懷仁堂進行動員，只剩三個月時間裏，無論如何要完成1,800萬噸鋼，1959年是1,600萬噸，筋疲力盡」。[88]

為了「保鋼」，就必須保證城市、尤其是保證產鋼重鎮遼寧等工業城市的糧食供應。周恩來接過向城市糧食調運的協調責任後，很快發現全國各地糧食產量數字極為混亂，當年「預計全國糧食總產量只有2,800多億斤」，但各地上報的卻遠遠超過這個數字。糧食部報告，缺糧究竟已達到多麼嚴重的地步，很難下定論。周恩來與各方討論後，拍板做出一個重要決定：「農業生產的情況如何，各部門可以各說各的，但全國糧食收支計劃必須按糧食部門的數字安排。」[89]

但問題在於，只要「保鋼」這個壓倒一切的任務還壓在那裏，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就不可能把農業和糧食生產當作頭等大事，也不可能把撲滅已經燃遍中國農村的大饑荒之火真正提上日程。國家還要繼續竭盡全力從農村汲取糧食，保證大城市及產鋼產煤工業城市的糧食供應。北戴河會議後，中央一再發出號令，敦促各地完成它們所承擔的糧食調出任務。周恩來甚至一再親自出馬給各省市領導人打電話，用各種方法讓他們承諾多調出糧食。[90] 各地秋收開始後，糧食徵購任務仍普遍落後於中央先前的計劃。於是，中央接二連三發出指令，催促各地務必完成糧食調出任務，[91] 結果又大大加劇了各地早已千孔百瘡的農村地區徵購並向城市調運糧食的壓力。伴隨而來的，是各地徵糧時強迫命令行為的不斷升級。大饑荒的大火更加蔓延開來，燒遍了華夏大地。

六

就在這個當口，「信陽事件」發生了。10月21日，中央組織部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提交了一份詳盡的調查報告，揭露河南省信陽地區存在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的現象。10月24日，李富春將報告轉呈毛澤東。兩天後，毛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92]

信陽事件發展到這個地步，同周恩來是有關係的。自1958年起，信陽地區就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到1960年春天，已達到極為嚴重的地步。當地曾有幹部冒死給周恩來發電報，報告遍佈信陽大批人餓死的慘狀。起初，地區和省領導還試圖扣押電報，不予上傳。但後來，因為擔心會被扣上「對中央領導封鎖消息」的帽子，才被迫將電報轉送中央。然而，周恩來那裏卻沒有回音。實際上，周根本沒有看到電報。即便如此，信陽事發，周恩來仍有失職之嫌。10月27日，他在國務院緊急會議上說：「信陽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我有責任。」[93]

但信陽事件曝光後，卻對周恩來有一個好處：一些他過去不敢講、不便講的話，他可以講了。10月29日，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國內經濟問題講話時說：

> 這樣大的災荒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20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94]

10月31日，周恩來在審改「中共中央關於貫徹執行〈緊急指示信〉的指示」時，特地加入「要讓持不同意見的人參加」。[95]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後，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其中規定：人民公社將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反對共產風，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允許農民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96]11月14日，中央下達「糧食缺，瓜菜代」的緊急指示，以節省糧食消費。[97]

然而，這些措施遠水救不了近火，在大饑荒肆虐面前效果極為有限。其實，這時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應急，那就是打開大量進口糧食的口子。進入12月後，眼看秋收後糧食供應狀況全無改善，大規模進口糧食之事已

不能再拖延下去。然而，這是一個巨大的「禁區」，不僅中國早已捉襟見肘的外匯存底恐怕應付不了，也等於是承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已經徹底失敗。這是周恩來做不了主、也不敢做主的。「解鈴還需繫鈴人」，能夠在這件事上拍板的，只有毛澤東本人。

12月上旬，陳雲從外地回到北京後，馬上約糧食部長陳國棟談話，提出：為緩解糧食供應緊張的情況，應當進口一些糧食。糧食部當即決定向中央提出進口糧食的建議，報告送交李先念，李又轉報周恩來，並由周恩來拿着報告向毛澤東請示。[98]

12月下旬，毛澤東終於鬆口了。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糧食危機是會議的頭號主題。12月30日，陳雲在會上當着毛的面提出，要「進口糧食，現在肯定明年要進口五十億斤，如有可能，還準備多進口一些，能夠抓到六十至七十億斤，就抓來……吃飯第一，建設第二」。毛贊成陳雲的意見，說「這幾條很好」；還說要「進口糧食，第一是吃飯，第二是市場，第三是基建，要確定這個方針」。[99]

然而，毛澤東在會上還說：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100] 只不過，毛在這裏說的「人禍」並不是指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創下的大禍，而是指階級鬥爭和反革命破壞。他甚至還提出，要在那些出事的地區進行「民主革命補課」，[101] 這樣就把問題的根子完全搞錯了。

但不管怎麼說，毛澤東到底同意進口糧食了。至於怎麼做、從哪裏找錢來做，他甩給了周恩來、陳雲他們去處理。

此時已屆年終，周恩來已準備好出訪緬甸，參加早已定下的中緬邊界條約正式簽字儀式及慶祝活動。12月30日，他到達北京機場後，陳雲趕來送行，並告知周，毛澤東已為大規模進口糧食開了綠燈。周恩來在登機前與陳雲及外貿部長葉季壯開了一個小會，確定立即着手進口150萬噸糧食。幾個小時後，周的專機在昆明停留時，他又在同北京通話後，把進口糧食增加到250萬噸。[102]

周恩來到達緬甸後，各種活動排得鋪天蓋地，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指派隨行的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馬上去香港，摸清進口糧食的渠道，以及運輸及支付問題能否解決。1961年1月8日，周得到雷的報告，國際市場糧

食「貨源豐富」，運輸及支付上可「採取租外輪到岸付款的辦法」，需要的外匯經中國銀行「仔細的統籌安排後可以周轉」。[103]

1月中旬，周恩來回到北京後，立即召集葉季壯、雷任民、外貿部對外貿易司長林海雲等開會，進一步了解情況。鑒於糧食情勢極為嚴重，他甚至考慮從美國進口糧食。1月16日，他在書記處會議上講到糧食進口時說：目前正在談判，可能與美國簽合同。[104]第二天，他同李先念談話，李隨即給葉季壯打電話，指示葉「在策略上分兩步走」：第一步，「必要時遷就對方已經提出的條件，先爭取定下二百萬噸左右的糧食」，以「爭取時間，爭取主動，首先把國內的緊急需要安排下來」；第二步，待二百萬噸「搞到手以後」，再「比較從容地談判今年和1962年，甚至1963年的進口糧食問題」。[105] 1月19日，他又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今後三年必須進口糧食」，因為「糧食影響工交、外貿、市場和人的體力」。[106]當周獲知當時國際市場上一噸小麥的價格是60多美元，而一噸大米的價格是100多美元，「出口一噸大米至少可以換回一噸半以上小麥」，周意識到：「出口大米和大豆，換回小麥，不但補償了部分消費，還增加了儲備。」他做出一項重大決定：利用國際市場上大米和小麥的價格差，出口大米，進口小麥。雖然後來中國進口小麥的數量大於出口大米的數量，但「一進一出，在金額上出與進是相差不多的」。[107]為支付購買糧食的費用，周恩來和中央在1960年12月和1961年1月兩次批准，大量出售黃金和白銀。[108]

從1月中旬到3月27日，「已運到國內的糧食93.52萬噸，其中1月份20.6萬噸，2月份24.84萬噸，3月份48.07萬噸」。3月底，已敲定1961年內從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法國、西德、意大利進口小麥、大麥、麵粉、玉米401.5萬噸（含1960年從澳大利亞預訂的小麥27.5萬噸）。[109] 1960年，中國進口的糧油食品金額為3,387萬美元，1961年即猛增為51,770萬美元，其中糧食進口達580萬噸。[110]這些糧食解救了當時全國嚴重缺糧的燃眉之急。不然，大饑荒會成為一場更為悲催的慘劇。

周恩來還做了另一件事。當他發現全國各地有大批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後，「為避免引起誤解」，立即下令對相關信息嚴格保密，不得外傳，有關文件報表等則統統予以銷毀。[111]他這麼做也許出於一種深重的危

機感，也許是出於一種歪曲的責任感。但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這都是一種不可容忍的極端錯誤的行為。

七

對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來說，1961年是在一派極為沉重與陰鬱晦暗的氣氛中到來的。大家嘴上不便明言，但心裏都知道大躍進闖了大禍，把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帶入了危機的深淵。毛澤東深深地隱入「二線」，讓劉少奇和鄧小平開始更像模像樣在「一線」發號施令。周恩來被推上了應對危局的最前列，成了地地道道的「救火隊長」。這一年，中國整個內外政策也發生了重大調整。

1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周恩來在會上發言，講了幾句「三年成績偉大，我們是高速躍進」的場面話後，小心翼翼地講到了1961年面臨的巨大挑戰及應對之道：前兩年糧食嚴重減產，「逼得我們不得不進口糧食，進口糧食是臨時措施，今後三年必須進口糧食」。制定經濟計劃時，「在數字上不能不留有餘地，說錯了也可以收回」。他說，1961年將是「調整的一年」，「躍進很費勁，但調整也很費勁，今年是緊張工作的一年，絕不會比去年鬆」。[112] 像這樣強調形勢困難重重、必須在1961年將「調整」落實推行的講話，周恩來在年初講過好幾次。[113]

從年初開始，周恩來就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集中在處理糧食嚴重短缺的問題上。在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提出要實行「三包三定」政策，即包產、包購、包銷，定產、定購、定銷。這次會議還決定，把1961年度的糧食進口增加到500萬噸。[114] 3月8日，他在接見社會主義各國駐華使節時提出，中國遭到了連續兩年的自然災害，農業減產，農產品不能出口，礦產品也要減少出口，因此欠蘇聯和各兄弟國家的款項需要推遲歸還，「這是我們對兄弟國家最大的要求，也就是對我們戰勝災荒最大的幫助。如果各兄弟國家能滿足我們的要求，我們就非常感謝」。[115] 在周恩來的竭力促動下，中央還決定採取另一項非常措施：在全力恢復農業生產的同時，大幅度減少城市人口2,000萬，下馬各種工業項目，恢復市場供應。這是一項空前廣泛的社會調整運動，涉及面以千萬人計。周恩來最擔心，「這是

一個中等國家的搬家，這是史無前例的，世界上也沒有的。……稍一不慎，就會出亂子」。[116] 短短幾個月間，加上農村政策的調整，周恩來推動壓縮城市人口等措施，以及大規模的糧食進口，緩解了一觸即發的危機。

進入1961年，在1960年中陷入「谷底」的中蘇關係出現了幾個月的「反彈」和改善的趨勢，周恩來是這方面的重要推手。1960年10月31日，他看到中蘇關係有了緩和的苗頭時，即向毛澤東建議，同蘇聯商討中蘇貿易問題，並重開蘇聯援華項目的談判。11月5日，毛批示「同意」。[117] 11月7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朱德等一道，出席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舉行的十月革命43週年招待會。11月10日至12月1日，劉少奇率領包括鄧小平、彭真等在內的龐大中共代表團，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國際會議。中蘇之間雖有交鋒，但又表現出尋求相互諒解及妥協的願望，促成了1960年《莫斯科聲明》的誕生。12月26日，契爾沃年科求見毛澤東，代表赫魯曉夫給毛澤東祝壽。[118]

此後，中蘇關係進入一個「小陽春」時期。1961年2月，劉少奇向蘇聯通報中國的農業形勢和糧食困難。[119] 契爾沃年科交給劉一封赫魯曉夫給毛澤東的信，表示蘇聯願意以借用方式，提供中國100萬噸糧食（30萬噸小麥、70萬噸黑麥）和50萬噸糖。[120]

3月8日，周恩來接見契爾沃年科，感謝蘇聯的幫助並表示，「我們首先動員自己的內部力量，其次利用當前的國際條件，爭取以延期付款的形式從國際市場多進口一些糧食，從而把蘇聯建議提供的糧食留作後備」。周還說，中國接受蘇聯提供50萬噸古巴糖的援助。[121] 3月21日，蘇聯方面回覆，「完全同意中國黨和人民克服暫時困難的信心」，以及把100萬噸糧食作為後備，「根據中國需要隨時起運」。[122] 5月29日，周恩來會見契爾沃年科時又表示，中國黨和政府經進一步研究，「願意接受轉借的30萬噸糧食」。[123] 3月，中國請蘇聯幫助中國印製紙幣，並向中國提供「米格－21」飛機的技術援助。[124] 4月，中、蘇兩國科技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談判，進展順利。蘇方主動提出中國在1960年前的10億元貿易欠款可以在五年內分期償還，中方借用的50萬噸糖的欠款可以在1967年前償還，均不計利息。[125] 6月19日，中蘇政府達成了蘇聯給中國建設和擴建的66個工業項目與其他項目提供技術援助的協議。[126] 截至1961年9月1日，蘇聯已向中

國提供了5,150萬盧布的設備。1961年上半年，在周恩來的協調指揮下，由陳毅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同蘇方在解決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配合很好，體現了雙方商定的協商一致的原則」。[127] 同時，中蘇也在越南南方開展武裝鬥爭上持相近的立場，都認為越南黨的政策重點應放在鞏固北方上，在南方展開鬥爭要見機行事。這一時期，中蘇在如何對待阿爾巴尼亞、裁軍等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但雙方都十分注意不糾纏於這些分歧，以免它們對雙邊關係產生全局性的負面影響。

1958年台海危機後，周恩來前幾年所做的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努力似乎完全失去了推行的空間。即便如此，他並未對蔣介石持全盤否定的態度。台海危機剛剛過去，他就在一次內部講話中強調，「美蔣之間矛盾很大，超過了我們和蔣介石的矛盾」。他問道：「蔣介石還有點積極性沒有？」他的回答是：

> 我們說蔣介石的積極性還有一點，蔣介石的民族性和帝國主義侵略有矛盾，這個民族性就是積極性。……蔣介石在四一二後對我進行大屠殺，十年後不是又聯合抗戰嗎？因此說，儘管他的積極性很少，也要利用。幾年後的情況會發生變化。[128]

果不其然，1960至1961年間，中共對台灣政策經毛澤東同意、在周恩來主導下又發生了重大調整。周與毛澤東商議後，在1960年5月22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中共領導層確定對台灣的新方針：寧可把台灣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也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解放台灣不能急，這一代做不成，可以由下一代去做，要逐步創造條件，等待時機成熟。周恩來通過張治中、傅作義等人將這些意見轉送時在台灣任副總統的陳誠，並聲明「只要台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與兄（指陳誠）意見妥善處理」，是為「一綱」。毛、周等還考慮對台灣實行更為寬鬆的四點做法，是為「四目」：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等條件成熟並徵得蔣之同意後進行；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1961年，為聯絡感情，周通過中間聯

絡人士將蔣介石家鄉奉化的照片送往台灣，照片背後周親筆書寫：「奉化廬墓依然，溪口花草無恙」。由此，形成了中共「一綱四目」的對台灣和緩政策的新框架。[129]

八

當周恩來以及劉少奇、鄧小平等一線領導人竭力使中國從一場巨大的災難中擺脫出來時，毛澤東沒有干預。不過，他心裏是不願意承認大躍進徹底失敗，並已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的。劉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會議上發問道：「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人禍是主要的？」他的答覆是「湖南群眾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話。[130] 毛忍了下來，沒有作聲。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又一次在廬山召開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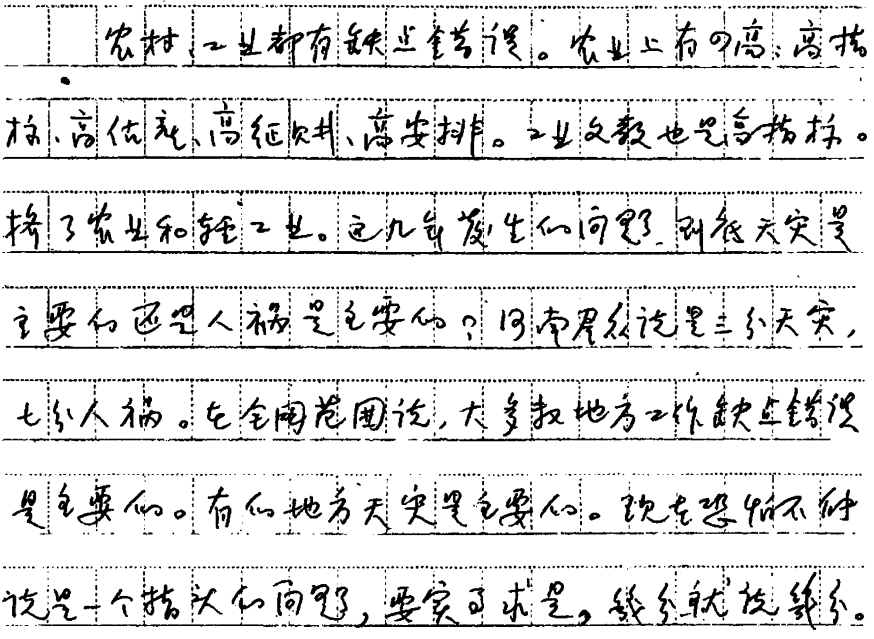


圖21.3：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講話，1961年5月31日。文件中有一處將「湖南」記為「河南」的筆誤。（91-18-494，甘肅省檔案館）

作會議，毛澤東、周恩來等出席。周在會上專門就全國農業形勢和糧食生產及供給狀況做報告。他說，1961年的災情比1959、1960年都更為嚴重，夏糧收成減產已成定局，「少收了170億斤」，「今年到明年糧食年度已無庫存可挖」，因此1961至1962年糧食供應「還要緊張」，「農業的恢復不是短時期所能解決的，要三至五年，……三五年內還有低指標，瓜菜代，節衣縮食。」[131] 毛澤東沒有當面對周的話提出質疑，然而他還是忍不住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又說，「現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132] 毛的這幾句話是直接對着周恩來講的，也是對着劉少奇、鄧小平等「一線」領導說的。他既是在為會議定調子，也是在給周和其他人敲警鐘。

另一個不祥的信號是，1961年的最後幾個月，剛剛顯露出緩和趨勢的中蘇關係又再度逆轉。中蘇於6月19日達成了蘇聯為中國的66個工業等項目提供技術援助的協議後不到兩個月，8月15日，周恩來在同庫梅金談話通知蘇方，中國1962至1963年不打算從蘇聯進口成套設備。[133] 10月15日至23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二大。會議期間，周同赫魯曉夫在對斯大林及蘇共二十大評價上發生了激烈爭論。毛澤東得知後，隨即指示周提前離開莫斯科回國。10月24日，周回到北京時，毛親自帶領幾乎全體在京中央領導人到機場迎接。[134] 這是毛特地做給赫魯曉夫看的，是他對「蘇修」的又一次「不宣而戰」。後來看，這是中蘇大論戰的烽火重燃的前奏。

1962年來了，北京還是一派冬天景象。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卻透露出了幾絲似乎不合時令的早春氣息。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者除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外，還包括地、縣、重要廠礦企業以及軍隊的負責人，與會者達七千人，史稱「七千人大會」。按照毛澤東的計劃，會議原定的主題是反對分散主義，他要在困難時期統一全黨的思想。

但是，大躍進的禍實在是闖得太大了。會議開始後，不少與會者或明或暗、或直或曲地對過去幾年間中央的大政方針提出詰難；更多的人不講話，或者王顧左右而言他。毛澤東見狀，又使出了他一貫的「欲擒故縱」的

手段。1月30日，他在大會上講話時提出，要讓大家「出氣」。只是，這一次他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誠懇：「在北京開這麼個會，要解決問題」，他說。「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麼好了。……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他還表示，「中央的錯誤，有些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同時他又說，「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到頭來，統一和集中仍然是目的。[135]毛在說這些聽上去「求賢若渴」的話時，其實是留下了伏筆的。

劉少奇在1959年後已經掌控了中央一線的領導權。他在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時，就曾提出大躍進後的困難局面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136]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又說：「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137]北京市長彭真一向緊跟毛澤東，並曾被視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138]但他也在預備會議上講了一番其實屬於「小批大幫忙」的話：「我們的錯誤，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其他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和辦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但是，「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139]

彭真的講法已經算得是老到的了。但畢竟，這開了一個口子，那就是：毛澤東也是有錯的，因而也是可以批評的。

周恩來的態度則不同。如果說，會上有誰始終盯着毛澤東的態度和動向，並由此來決定自己的表態的話，那麼除了已為人們所熟知的林彪之外，應該就是周恩來了。他對毛澤東了解極深，對於毛澤東大批「反冒進」這一段往事也記憶猶新，而毛澤東關於民主和集中之間關係的言論，也絕不會逃過他的觀察。他因而鐵了心，絕不在會上講一句批評毛的話，而是把責任統統都攬到了自己和其他人身上。彭真講了毛也有錯誤的話後，周馬上說：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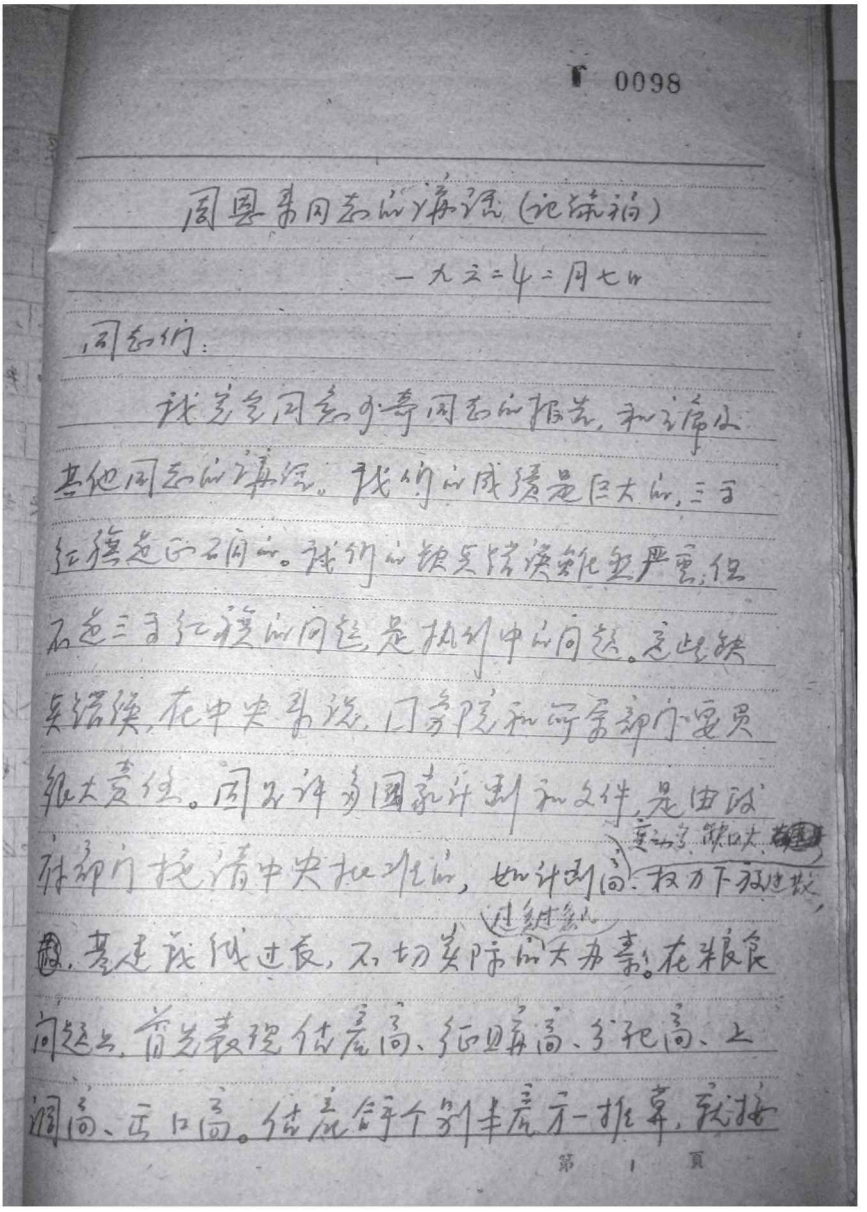
就在這次會議上，林彪在發言中大肆吹捧毛澤東，把問題的根源歸結為「沒有按毛澤東思想辦事」，對此人們已經很熟悉了。但實際上，

如果把林彪的講話放到大會上另一個背景下來看待，它就不顯得那麼出格了。

在會上，周恩來其實比林彪更早地站出來為毛澤東開脫捧場，似乎同林彪有着異曲同工之妙，但周的講話和林的發言有兩個大區別。第一，林只講成績，不講缺點和錯誤；周既講成績，也講缺點和錯誤，而且講得很多很細。第二，林彪不做自我批評，周做自我批評，並強調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早在大會前的準備會議上，周就表示「在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接着他說：

> 在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着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主席講過，不經過反覆，不能取得教訓，現在不是弱了，而是強了。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的早，否則栽的跟頭更大，要中風。現在的問題是要爭取時機，不怨天，不尤人，發憤圖強，埋頭苦幹。不吹，不務虛名。……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全黨要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艄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不解決，寸步難行。……不一心一德，集中統一，就不能解決問題。如果這一點思想不通，辯論三天三夜也可以。[141]

2月7日，周恩來在大會閉幕式上發言，他首先強調：「我們的成績是巨大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我們的缺點錯誤雖然嚴重，但不是三面紅旗的問題，是執行中的問題。這些缺點錯誤，在中央來說，國務院和所屬部門要負很大責任。」接着，他歷數了這幾年國務院和他本人工作中的錯誤：「許多國家計劃和文件，是由政府部門提請中央批准的，如計劃高，變動多，缺口大，權力下放過散，基建戰線過長，不切實際的過多過急的大辦等。在糧食問題上，首先表現估產高、徵購高、分配高、上調高、出口高……58、59年比通常多出口80億斤糧食。這些，政府要負責任。……總之，既沒有從實際出發，又缺乏綜合平衡，留有餘地。」周還硬給自己扣帽子說：「主席說，我們的發展是波浪形的，但我提出的不是波浪



0098

周恩来同志的講話（記錄稿）

一九六二年二月七日

同志們：

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的報告，和主席以及其他同志的講話。我們的成績是巨大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我們的缺点錯誤能夠严重，但不是三面紅旗的問題，是執行中的問題。這些缺点錯誤，在中央負責，国务院和所属部門要負主要責任。国务院各国家計劃和文件，是由我們部門按照中央批准的，如計劃（實际上沒有下放過），基建我們過長，不切实际的大办事業，在粮食問題上，首先表現估產高、征购高、分配高、上調高、出口高。結果餘下分到生產隊一把草，我們

第 1 頁

圖 21.4：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1962 年 2 月 7 日。（855-6-2266-5，河北省檔案館）

形的。」「1960年糧食總產量不到2,700億斤，61年糧食總產量，加上自留地、開荒，不到2,800億斤。」「工業，經過三年的調整，……下降的趨勢已停止。全黨全民經歷了一次最大的考驗。」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但「目前的困難仍然是巨大的」，還需要幾年的努力才能真正擺脫困難。

這樣，周恩來把這幾年出現嚴重問題的責任攬到了自己身上，並再次循着自己在預備會議中發言的路子強調，這一切的發生，都是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思想和指示辦事的結果。[142]

從純粹黨內鬥爭的角度來看，周恩來的做法是經過仔細盤算的結果，他完全做對了。從這之後的發展看，毛澤東對那些在會上批評自己的人一個都沒有忘記。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就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裏，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前後的作為定為「1962年的右傾」。江青後來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口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143] 毛本人也在1967年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Hysni Kapo）、巴盧庫（Beqir Balluku）時說，「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144] 彭真本來是毛的人，但七千人大會後，毛開始覺得他有了「異心」。文革起步時，彭成為最先受到清肅的中共最高層領導人之一。

這一次，周恩來則不屬於毛澤東「清算」的對象。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表現，與他在文革中雖經歷了種種磨難卻未遭致命「整肅」的命運，關係甚大。

九

七千人大會後的一段時間裏，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了外地，劉少奇、鄧小平等仍有過「趁熱打鐵」的機會。七千人大會上出現的「群言堂」的氣氛和實踐，幾個星期後，在2月21日至23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因會議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舉行，也稱「西樓會議」）達到了頂點。這次會議由劉少奇召集並主持，在會上唱主角的，一是劉少奇，二是應劉少奇要求談經濟問題的陳雲。陳雲從五個方面講述了當時面臨的經濟困難：農業嚴重減產，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多發鈔票彌補財政赤字的做法導致了通貨膨脹，投機倒把現象嚴重，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45]

據當時在場的鄧力群回憶，「會上，先由李富春、李先念同志講話，反應不熱烈。陳雲同志後講，熱烈鼓掌不斷」。陳雲講話後，劉少奇馬上說：「我支持你到底。」[146] 劉又說了幾句很重的話：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做鬥爭的勇氣！」劉還說：「現在……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147] 會議決定必須對1962年的計劃做大的調整，尤其是要對重工業和基礎建設指標做「傷筋動骨」的削減。

會上，周恩來同意陳雲的意見，但同劉、陳相比較，他更多地是從處理實際問題的角度出發，着重談如何找到應對和解決的辦法。會後，他表示：「目前財政經濟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而且有些困難我們可能還沒有看到，沒有預料到。……今後十年中要有個恢復時期。」[148] 周恩來還看不清楚的是，毛澤東是否還會繼續「放手」，待在「二線」? 或者，他是否已有重返「一線」的意圖？

七千人大會後，春風也吹進了外交領域。2月20日，當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聯部部長的王稼祥，同副部長伍修權、劉寧一聯名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份關於對外關係工作的「黨內通信」，其中提出四項建議：第一，發表一個對外關係聲明，全面闡明並確認中國對外政策是和平政策，其任務是保證社會主義建設所需的和平國際環境；第二，為了爭取時間，渡過難關，對外採取緩和政策，而不是加劇緊張的政策，避免四面樹敵；第三，在國際鬥爭中要注意策略，有進有退，有攻有守，有爭有讓，有拖有解；第四，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在此前後，王稼祥又先後向中央送出幾份報告，提出不要過度強調世界戰爭不可避免的觀點；對赫魯曉夫不宜用黨內鬥爭的方法，而應採用外交鬥爭的方法；尼赫魯不是中國的敵人等等。[149]

周恩來雖然是王稼祥等三人建議書的第一收信人，同時外交又是周向來管得較多的領域，但我沒有看到他就此事表態的任何資料。這件事由總書記鄧小平負責處理，他將建議書批送劉少奇、彭真，再無下文。[150] 此前，鄧在收到王上報中央的〈關於同赫魯曉夫集團鬥爭方法的建議〉後，即

上報毛，請毛「最好能將你的意見先告訴我們」，但毛卻回答：「請你們先討論一下，以初步意見告我。我還在考慮這個問題，還提不出意見。」[151]毛對此不表態，其實已透露出他對王的意見不以為然的態度。半年後，當中國內外政策重新「左轉」時，王稼祥果然受到了嚴厲批判。

1962年春天，中國政治領域的「早春」景象還滲透了文化知識領域。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周恩來歷來就是有想法的。每當情勢面臨轉折關頭，他都要講知識分子問題。1951年，他曾以自己為例，就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講過話。1956年他在大力「反冒進」的同時，又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再次發言，強調了他們可以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起積極的推動作用。1962年春，周恩來覺得，他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需要說些什麼。這時，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和文化文藝界座談會正好在廣州舉行。3月2日，周恩來為出席這兩個會議的代表做了〈論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他說中共建政前後，「歷來都把知識分子放在革命聯盟內，算在人民的隊伍當中」。建國十二年來，「知識界已有了根本的轉變和極大的進步，組成了一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隊伍」。講到對知識分子的「定位」時，周強調他們屬於列寧所說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階層」。[152]

周恩來回北京前，又鼓動當時也到了廣州的陳毅就知識分子問題發言。3月5日和6日，陳在會上兩次講話「放炮」說：現在的問題，是大家有氣，今天要來出出氣。知識分子問題「很嚴重，嚴重到大家不寫文章，嚴重到大家不講話，嚴重到大家只能講好，這不是好的兆頭。……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危險得很啊！」陳還附和周的說法，要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勞動人民」之冕。他說：「他們是人民的勞動者，是無產階級的腦力勞動者。」[153]

3月28日，周恩來在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做工作報告時，又專門插入一段話：

> 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願意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毫無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如果還是把他們看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154]

這是周恩來在中共建政後，繼1951年和1956年兩次發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後，再度就此發表的大講話。同前兩次講話相比較，在1962年3月的這兩次發言中，他更重視從根本上為知識分子「正名」，也更強調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身分和作用。

毛澤東得知周恩來提出的「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新說法後，沒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155]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毛贊成周的看法，毛的內心對知識分子的基本看法同周大相徑庭。毛的秘書林克在工作筆記中記述，在毛看來，「知識分子是一種歷史範疇，是剩餘勞動的結果，不生產東西、指導生產工作和協助生產，一些知識分子搞主觀主義有害於生產。知識分子有害無益的東西是剝奪了工農的剩餘勞動，等於強盜，不過是文明的強盜」。[156] 毛對知識分子的真實看法在這番話中表露無遺。但對周來說，只要毛沒有明言反對，他就有理由堅持自己的看法。1962年11月，主管宣傳工作的副總理陸定一在書記處會議上表示，周關於知識分子的提法「沒有階級分析」。周得知後大不以為然，反駁道：「對知識分子，說我們提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是沒階級分析，我是代表黨作報告的，是黨批准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少奇在憲法報告上講過有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勞動人民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有什麼錯誤。」[157]

周恩來知道，這麼一件大事還是要毛澤東說了話才算數。於是，他又請求毛表態，毛還是沒有說話。[158] 這本身就是給周的又一個警示的信號。

西樓會議後，在劉少奇主導下，中央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的運作。周恩來建議由陳雲擔任組長，但陳以自己「身體不好」為由，只願意任組員。最後，仍決定由李富春任組長，周是成員之一。[159] 3月7日，中央財經小組開會，討論落實1962年預算及計劃修訂問題。陳雲在會上重申，必須對1962年計劃做相當大的調整，包括對重工業和基礎建設指標做「傷筋動骨」的削減。[160] 3月8日，周恩來在會上發言。關於形勢，他說：「講總的形勢，包括政治、經濟，包括方針、政策、幹部經驗等等，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他贊成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提出的、把困難估計得足一點比不足一點要好的看法，又表示「目前財政經濟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而且有些困難我們可能還沒有看到，沒有預計到」。在具體處置上，

他提出了八條「轉彎的辦法」，關鍵是「經濟計劃工作要從以工業、交通為重點，轉到以農業、市場為重點」，要「按照當前最急需的安排生產」，要「從現在起就要搞綜合平衡」；為此，「基本建設規模還要縮，投資還要削」。[161] 周在講話中透露出來的，既是依然小心翼翼的心態，又蘊含着見機行事的決心。他還要看毛澤東下一步將如何動作。

會議結束第二天，陳雲就離開北京去杭州療養。幾天後，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再次提議還是應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而已在外地的陳雲再次推辭。3月16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一起到武漢面見毛澤東。毛拍板由陳雲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4月19日，中央發出通知，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任組長，李富春、李先念任副組長，周恩來等為組員。

陳雲在黨內做人做事歷來謹慎，在由他出任財經小組組長這件似乎「眾望所歸」的事情上，雖有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人的支持，又有毛澤東的批准，他卻推脫再三。而且，他勉強同意出任財政小組組長後，仍逗留杭州「療養」，直至6月下旬才回到北京。他是否像周恩來一樣，也在觀察毛澤東的下一步動向？難道政治上的風向又要變了？

第22章

主席回來了
（1962–1964）

一

1962年初那段春風習習吹來的時光，回想起來似乎令人神往，卻注定是曇花一現。不到年中，北京的空氣中剛剛有了一絲初夏的氣息，政治上又有寒流襲來，風向也開始朝着「左傾」轉變。這背後的推手，正是這幾年都處於「天端」的毛澤東本人。他準備重新「下凡」了。

早在春天，毛澤東的態度變化已有端倪。他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和西樓會議上的說法和做法，心中頗不以為然；4月9日，他從外地回到北京，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言時已透露出這方面的跡象。講到七千人大會及之後的情況時，他說：現在對一些問題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比如三面紅旗究竟還要不要、究竟還對不對之類，要有一個實踐的過程，要有一個做的過程。[1] 毛的話裏有話，隱含着一種「上綱上線」的戾氣。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遵毛指示，去湖南毛、劉家鄉調查，看到包產或分田到戶顯然對恢復發展生產有利。他寫出調查報告後，分送毛、陳雲，並先行將關於劉家鄉炭子沖的報告送劉少奇。陳、劉兩人極為支持，劉認為「解決人民當前的嚴重困難，採取這樣的辦法是可以的」，陳稱讚報告「觀點鮮明」。[2] 5月，田家英到上海向毛彙報說，毛家鄉湖南韶山的百姓「要求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呼聲很高」，毛的態度卻「相當冷淡」，還衝了田一句：「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3] 毛的意思分明是：他不支持這種做法。

周恩來對這件事也十分關心。他內心是支持包產到戶的想法的。他和陳雲就此交換看法時，兩人也「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見」。[4] 但是，陳雲在政治上向來謹慎，絕不肯在這件事上帶頭大聲疾呼，更不會同毛澤東對着幹。周恩來也知道這件事關係重大，絕不會貿然行事。於是，他讓楊尚昆給還在上海的田家英打電話，詢問「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分放寬一些」，其實是在打聽毛的看法。[5]

本來，田家英是毛澤東派出去的，「主公」(田私下常常稱毛為「主公」)既已表態，他應當就此罷手的。但他是性情中人，又得到了來自周恩來、劉少奇、陳雲各種形式的鼓勵，再到湖南後，他沒有向其他人傳達毛的看法，而是還想「把調查做好」。不僅如此，他還派了兩個人去安徽無為縣考察當地包產到戶的情形，以獲得「更具全局性的經驗」。最後，他進一步得出結論：包產到戶有利於恢復生產，但可能會對以後發展農業經濟形成限制。[6] 6月下旬，田回到北京後，分別向劉、鄧等處於一線的領導人彙報，劉、鄧均表示支持。鄧小平還講了那句後來廣為人知的名言：「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劉告訴田，可以就此向毛彙報。[7] 陳雲的意見和田「不謀而合」，他還從另一角度來看待此事：「現在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我們把田分給農民，有利於動員農民起來保衛自己的土地。」[8] 田家英是否也向周恩來做了彙報？目前沒有看到相關材料。6月30日，陳雲見到周時說，可以考慮用重新分田包產到戶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恢復農業產量時，周表示贊同。[9]

對這件事，毛澤東並沒有袖手旁觀。春末夏初，他又離開北京去上海、杭州、南昌、長沙、武漢等地視察並不斷同各路諸侯談話，「了解夏糧作物長勢及預計收成等情況」。他其實並不相信，形勢真的像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他們說的那麼嚴重。[10]

7月6日，毛澤東從南方回到北京。當天下午，他和陳雲見面，陳建議「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便恢復農業的生產」。毛沒有當場提出反駁，但實際上他「很生氣」。[11] 當天，毛還見了田家英。田力陳可以在農村有組織地搞包產到戶，這「是臨時性的措施，是權宜之計，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毛一言不發，只

問了兩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12] 7月8日，毛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陳伯達和田家英開會。他先從河南、山東兩省的夏收談起，說「形勢不那麼壞」，要劉「找河南、山東、江西的同志談談，了解一下農村的形勢」。接着，毛把話挑明：不贊成搞包產到戶。他說，他「很不同意陳雲同志的意見，但陳雲同志是中央常委，向黨的主席講意見，組織上沒有錯」。他對田家英就沒有那麼客氣了，直言不諱地批評田「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搞什麼包產到戶、分田單幹」。[13] 毛的這些話，分明也是說給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聽的。

毛澤東的話，周恩來聽進去了，而且記得很牢。毛講話後的第二天，他就到陳雲家裏交換看法，可見對此事的重視。[14] 直到一年後，他還在一次講話中談到，「去年7月我們講形勢困難得不得了的時候，主席到了最困難的河南、山東兩省。……到下面實際一看，麥收並不那麼壞，而秋收比夏收還要好一點。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我們談，他說形勢不那麼壞」。[15]

毛澤東表態後，陳雲急忙打了退堂鼓，7月15日離開北京到北戴河療養。7月28日，他致信鄧小平並轉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幾天前根據毛建議搞出的「進一步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同時，他又以自己「心臟狀況很差，體力也極衰弱」為由請假，毛批示「同意」。[16]

劉少奇的反應不一樣。據劉之子劉源的回憶，應該就在7月8日會議之後，毛、劉兩人在中南海游泳池發生了一番言語上的衝突。當時，劉欲同毛說話，但毛開口便質問道：「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劉在毛的一連串指責之下，一時按捺不住，頂撞毛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聽後火氣更大，開始給劉扣帽子：「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後怎麼辦？」[17] 此後，劉控制了自己的情緒，未再張口。但這件事，給本來就已出現裂痕的毛、劉關係留下了一片濃重的陰影。應該就是在此時此刻，毛下了最終要「搬掉」劉少奇的決心。

整個7月，毛澤東繼續找人談話，又接連在好幾個場合吹風，表示對「包產到戶」和「單幹風」盛行等現象的嚴重不滿，並使出他一貫的殺手鐧，上綱上線，提出「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贊成資本主義？」的大問題。[18]

7月18日下午，毛找楊尚昆談話，重點講「是走集體道路呢？還是走個人經濟道路？」期間，毛講到了周恩來，對周和國務院領導下的計委和商業部表示不滿，提出「要反分散主義」。楊聽後「覺得事態十分嚴重！十分不安！」，當晚9時即約周見面，「談主席談話的要點」。[19] 這又一次給周敲響了警鐘。

7月19日，毛澤東又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當着周恩來的面提出「要反分散主義」，並「認為中央各部門是最大的分散主義，這是舊話重提」。他還特別點了計委、經委以及國務院財貿辦的名。[20] 這些部門都是周主管的。毛是藉着這個老話題直接敲打周恩來。

第二天，毛澤東召來了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把「包產到戶」問題端到了他們面前。毛問：「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他自己答道：「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接着說：「但有人主張搞包產到戶。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範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毛還追問：「目前的經濟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21] 毛澤東沒有再單獨找周恩來，但是憑着周政治上的敏感，經歷過「反冒進」還沒有幾年，就是毛不找他談，對於北京上層政治風向的轉變，他是不可能感覺不到的。

二

7月下旬，中共領導人陸續來到避暑勝地北戴河。從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這裏開工作會議。本來，會議設定的主題是討論對國民經濟進一步施行調整、充實和鞏固的問題，周恩來也早已為此做了充分準備，帶着一大堆文件資料來開會。但是，心裏早就憋着一股氣的毛澤東卻是有備而來，把會議的討論引向了另一個方向。

7月28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把討論引到階級和階級鬥爭上來，說了一些很重的話。在談到國內外形勢時，他提出：當前國際國內都有一個共同問題，就是革命究竟由無產階級領導，還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在我們這些國家來說，就是究竟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22] 接下來的幾天，毛澤東又連續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談話。

8月2日晚，他同河北、山西、內蒙古三省區領導人談話時，開口就問各地單幹的情況如何，當聽到單幹問題在這幾處都不嚴重時，他馬上說，「從整個形勢看，前途一片光明」。接着，他又把話題轉向階級鬥爭：「問題主要是反映在國內的階級鬥爭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鬥爭的時間相當長，一百年後還有這個問題，這種形勢要看到。」[23]第二天下午，毛同山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五省區負責人談話，又定調子說：這次會議的問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單幹道路。[24]8月5日，他和中南、華東地區負責人談話，再次狠批了一通單幹，說他「周遊了全國一遍」，發現「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然後，他又回到階級鬥爭這個題目，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鬥爭，這個鬥爭是長期的。」[25]

8月6日，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發言，提出了階級、形勢和矛盾等「三個問題」，並要全體與會者回答，「現在究竟有沒有階級，社會主義國家是否還有階級」；「國際國內形勢，究竟是一個什麼情形？國內形勢是不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有些什麼矛盾」。毛發問：「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毛還說：現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多少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現在這股鬧單幹的風，越到上層越大」。[26]

三天後，毛澤東又在會上說：「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有兩年了。……這兩年講黑暗合法，講光明不合法了。這次會上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這樣的話，他在幾天裏又反覆講了好幾次。[27]毛的話高屋建瓴，由不得別人爭辯，話中又帶有威脅，別人更不敢爭辯了。他甚至還極其情緒化地說：「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說集體沒有優越性，那不是壓我？」[28]

毛澤東的這些話，句句都是衝着那個說「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來的，同時也是對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其他常委的一種嚴厲警告。這一來，會議的整個基調和氣氛都變了。8月11日，劉少奇做了自我批評，表示五月會議對困難估計過分了。[29]

北戴河會議的頭幾天，周恩來缺席。他要在北京會見來自越南和老撾的兩個代表團，又要主持一個處理機構精簡問題的會議，從7月28日起才參加會議。他到北戴河後，顯然已經嗅出會場上充斥着的緊張氣氛。當毛澤東提出三個問題後，8月17日，他在中心小組會議上做了對此堅決擁護的表態：「主席提出的三個問題、五個矛盾，很尖銳，很重要，很適時。先從階級問題談起。階級鬥爭是貫穿各個時期的，是長期的。過去如此，將來相當長時期也是如此，甚至到共產主義。」周恩來還帶着自我批評的口吻，講述了自己對階級鬥爭的認識：

> 階級鬥爭形式是多樣的。我們的同志常在形勢一改變，情況已改變的時候，就模糊了。本來這個問題，從入黨第一課就是講階級，而且以後又常常講，但是一遇到新的情況就模糊了。……正如主席講的一樣，鬥爭形式是表現曲折的，有時激烈化，有時比較隱蔽。但是大體上階級鬥爭凡是到一個重要關頭的時候，就要出現，我們應該意識到。

周恩來還表示，他完全同意毛對當前形勢的分析，「過去一個時期，我們的同志把困難說得多了一些，這對黨內發生消極影響」。「我們的困難問題並不是漆黑一團。」[30]

周恩來上面的話裏，「我們的同志」究竟指的是誰？他沒有明言，但顯然也把劉少奇和他自己包括在內了。即便如此，他還是委婉地為自己做了一點辯護：七千人大會以來，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很努力，沒有洩氣，想方設法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務。他說，要肯定成績。[31]

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舉行八屆十中全會。從一開始，會場上就充斥着肅殺的氣氛。毛澤東第一天講話時又提出：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沒有階級、有沒有階級鬥爭？應當肯定，還是有的。在歐洲，封建階級被資產階級推翻以後，有幾次復辟。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辟的情況。講了這些後，毛點題：中國國家與社會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階級矛盾，也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復辟之間的矛盾。「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並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因此「千萬不能忘記階級鬥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我們可以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

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將講，開一次黨代表大會就講，使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32]

9月26日，周恩來經過仔細準備之後，在會上發言。基本的調子，一是講形勢很好，「今年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二是再次附和並支持毛的「階級鬥爭論」。他說：「毛主席領導我們工作時總是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分析形勢，辨別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中心環節，指出方向，調動全局，解決問題。」他還就單幹和包產到戶問題表態說，在這件事上，「有的人是認識問題，……有的人是方向性的錯誤」；「所以主席抓住這一主要環節，聯繫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方針，突出地提出了鞏固集體經濟，提出幹部再教育，抓住這一主要矛盾，揭露這一問題，以教育全黨幹部」。

在國際問題上，毛澤東在會上攻得最兇的不是美國，而是蘇聯，大講修正主義已在蘇聯泛濫橫行。周恩來在講話中，大概是為了彌補自己年初在王稼祥等提出報告時未予駁回的「過失」，在論及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時，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

> 馬列主義真理，世界革命運動的中心，的確已從莫斯科轉移到北京了。（我們）應當見義勇為，當仁不讓。這是義務，不是干擾，工作是艱巨的，要認真地去做。

周恩來還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並針對王稼祥等的「緩和路線」，相應地提出中國在國際階級鬥爭有三大任務，即「反帝、反修和反對各國反動派」。他說，「我們同美帝的矛盾是個主要矛盾」，同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短兵相接」，同以尼赫魯為代表的反動民族主義的對抗已經白熱化了。[33]

但即便在全會一片「左轉」的聲音中，周恩來依然提出要抓緊當前工作，包括糧棉及時收購、秋後水利建設、基建、抓好煤和木材生產、農業技術改革、商業管理體制改進、工業計劃制訂等。他還講了幾句在當時那種情勢下很大膽、後來看也很有遠見的話：階級鬥爭不應使調整工作受到干擾，反右要防左。他還帶有針對性地提出：「1959年廬山會議還有一個缺點，就是把反右鬥爭搞到底下，搞到群眾中去了。這回要吸取這個教

訓，反右防『左』，不搞運動。」[34] 會上，毛澤東沒有對周的這些話提出反駁，還說「工作不能停」，周準備的幾個關於實行國民經濟調整鞏固措施的文件也都在全會上獲得通過。但後來，周講話中說不要做的事，如不搞運動、不整一般幹部群眾等，毛澤東都做了。

八屆十中全會是中國政治和社會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點。全會開過之後，中國內外政策形成了全面「左轉」的大趨勢。正是從這裏開始，此後幾年間，國內政治生活中「反修、防修」的呼聲震天動地，從四清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再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超常的群眾動員步步升級，一直搞到「天下大亂」的地步。在對外政策上，王稼祥等提出的「緩和路線」受到嚴厲批判之後，黨內再沒有人敢從「緩和」的角度發聲。就連周恩來這樣歷來的「務實派」都說，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從莫斯科轉移到了北京，何況別人？「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毛澤東的話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追求目標，北京以亞洲和非西方世界為主要舞台，開始同時對帝、修、反提出全面挑戰，巴不得把整個世界都攪得一片大亂。

三

1962年春夏之際，國內政治風雲詭秘變幻的同時，在中國的東面和西面，外部安全環境也出現了一系列異動。

從年初起，周恩來就看到中印邊界局勢越來越緊張，也越來越難以控制。自1960年4月周訪印後，中國邊防部隊便根據周同尼赫魯會談時的承諾，堅持不越過乃至不接近雙方實際控制線，並盡量避免和印軍接觸。這樣，中印之間的邊界問題雖然仍屬懸案，但兩國關係並沒有明顯惡化。然而，尼赫魯卻對形勢產生了誤判。他以為印度在中國對外政策中佔有很大的分量，整個1950年代印度又曾在朝鮮談判、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以及保持對西藏的糧食供應等問題上幫過中國大忙，中國應該「感恩戴德」，再加上他和周的個人關係，印度不管在邊界問題上有何動作，都不見得會搞出什麼大事來。從1960年下半年起，他走出了一步大錯特錯的棋子：他不顧印度軍方對雙方軍力的評估以及印軍遠沒有為戰爭做好準備的結論，在中印邊界地區提出並實行「前進政策」。經他批准，印軍不斷在邊界

上步步進逼、蠶食爭議領土，迫使中國邊防部隊不斷後撤，中方實際控制線也不斷後移。[35] 中方雖然一再提出抗議，卻毫無效果。印方我行我素，根本沒有停止「前進」的跡象。

這一情勢發展，使得中國領導層面臨着巨大壓力，也不斷把周恩來逼進死角。本來，1960年4月他訪印後就已對尼赫魯感到極度失望，但當時他恐怕沒有想到，尼赫魯除了在談判桌上不肯做任何讓步，也不肯承認邊界問題的存在之外，居然還會祭出「前進政策」這一招，用咄咄逼人的行動不斷改變中印雙方實際控制線的現狀。這令周對尼赫魯的看法和認識又再打折扣。他後來對將軍大使黃鎮說：「尼赫魯狂妄自大，蠻橫無理，超過我所有談判對手。」[36]

本來，周恩來在中印邊界問題上是全心全意的「主和派」，並相信可以通過「互諒互讓」的談判來解決邊界問題，但隨着尼赫魯「前進政策」的推行，尤其是又在1961年11月推出「前進政策」的「升級版」並加緊實施後，中印邊界雙方實際控制線不斷朝中國一側後移，周終於不得不承認，這條路走不下去了。中國領導層內部關於掌控中印邊界局勢的考慮，也從1961年下半年起，開始同軍事部署逐漸聯繫起來。周恩來在中共領導層內部原來並不主管軍事，但由於中方在中印邊界的部署及行動都同周主管的外交領域有密切關係，他也開始參與中印邊界軍事部署的討論，並成為主要決策者之一。

進入1962年後，隨着中印邊界、尤其是邊界西段（即阿克賽欽地區）局勢的不斷惡化，中國領導層開始為不得已時採取軍事行動做實際準備。2月1日，中央軍委向西藏和新疆邊防部隊下達指示，要他們「制定防止印軍入侵進攻的反蠶食鬥爭方案」。但同時，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中央軍委仍明令邊防部隊實行「不主動惹事和堅持在傳統習慣線中國一側30公里不打槍」的規定，並重申「打不打決定權屬於中央軍委」。[37] 但此後，印軍更為積極地推行「前進政策」。到5月，周愈發感到，不管中方如何努力，中印之間終有一戰的局面恐怕難以避免。5月9日，副總參謀長楊成武準備了一份關於中印邊界形勢及應採取措施的報告，經總參謀長羅瑞卿送交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報告稱：從中印邊境形勢看，印方已決心要進行武裝挑釁，目的是逐步侵入並佔領阿克賽欽地區。在此情況下，中方雖力爭避

免流血衝突，但「武裝衝突是難以避免的，因此軍事上必須做好打的充分準備」。[38] 5月14日，周專門約談總參謀長羅瑞卿和楊成武，當面聽取他們的報告。5月22日，周在總參上報的方案上批示：對中印邊界可能的武裝挑釁，要做充分的準備，並且要在6月底前準備好。如果到時印方竟敢開火，我方不打則已，一打就要全勝，並且要收復印軍侵入的土地。[39] 尼赫魯「前進政策」的加緊推行，終於把周恩來從一個堅定的主和派變成了不得已的主戰派。

四

就在中印邊界形勢不斷逼近戰爭的當口，在東面、福建等沿海地區的安全情勢突然變得異常緊張。蔣介石和國民黨自1949年從大陸退守台灣後，從來沒有放棄「反攻大陸」的念頭。直到1961年，當蔣看到大陸內部因大饑荒而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和社會不穩的報告時，他才覺得反攻大陸的時機真的到來了，並從1962年初起，不斷完善並準備實行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計劃。[40]

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從來就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意圖存有警惕。1962年5月，周恩來掌控下的情報系統獲得確切情報，蔣和國民黨方面實行大規模軍事行動已迫在眉睫，引起中共領導層的高度重視，並把主要戰略注意力進一步集中到台灣海峽。5月22日，周恩來在對總參關於中印邊界方案的批示中寫道：中印邊境不會單打大戰，如有，將是敵人的牽制方面，我們不要受敵人牽制。我們的主要注意力仍應在海上。[41] 5月31日，羅瑞卿在杭州向毛澤東彙報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的情況時，毛說：要準備蔣40萬人秋後登陸，不要為西面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過去。我們的戰略方向還是東面，這是我們的要害。第二天，羅瑞卿根據毛的指示在華東局幹部大會上做備戰報告時說：我們的老對頭蔣介石要搞所謂反攻大陸。西面也要認真對付，但更要認真對付的是這個姓蔣的。我們的主要戰略方向在東面，不在西面。[42] 為了應對台灣方向出現的危機局勢，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立即採取了兩項互有關聯的重大行動。第一項，是向福建沿海地區大規模調動部隊。6月初，羅瑞卿連續召集作戰會議，佈置並掌控這項重

大行動的實施。根據中央軍委和總參的部署，向福建沿海地區的部隊調動和集結，要在6月中旬完成。[43]

毛澤東、周恩來等針對台海局勢採取的另一項重大行動，是設法通過中美華沙大使級談判的渠道，向美國傳遞信息並搞清美國的意圖，促使美國不支持乃至阻止蔣介石採取反攻大陸的行動。毛批准向福建調動集結部隊時指示：南下部隊（到達後）可以公開行動，就是要叫蔣介石知道，目的是破壞他的進攻，推遲他的行動。[44]實際上，毛的意圖恐怕不僅僅是要做給蔣介石看，更是要做給蔣的美國盟友看。

5月29日，周恩來根據中央的決定，率一班部長前往東北調查並督促國民經濟調整計劃的實施。東北是工業重鎮，這件事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周仍在行前專門約見正在國內休假的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對他說：蔣介石認為目前是進犯大陸的好時機，在外中共與蘇聯不和，在內有嚴重的自然災害，真是千載難逢，蔣介石是下決心要大幹一場了。周指示王去見羅瑞卿，由羅向王介紹軍事情況後，周又指示王於6月10日前趕回華沙。周說：經中央認真研究，認為蔣反攻大陸決心很大，但他還存在着一些困難，今天的關鍵是看美國是支持還是不支持，要爭取美國來制止蔣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周指示王，要盡快通過會談，了解美國的態度。[45]周讓王趕回華沙的6月10日，正是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準備粉碎國民黨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的一天。數十萬解放軍部隊也已向福建沿海地區開進集結。[46]

那些天裏，美國人其實也一直打聽王炳南是否在華沙，要同他見面。[47]王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回到華沙後，於6月14日和美國駐波蘭大使卡波特（John M. Cabot）順利約定，第二天舉行「非正式茶敘」。[48]但當夜，外交部又致電王炳南，要他「託病把邀請美大使的時間推遲幾天」。王只得臨時通知卡波特會面改期，之後又有好幾天不敢出門。[49]原來，那幾天南方大雨，一些重要橋樑被沖斷，解放軍部隊向福建的調動集結受到阻礙。[50]毛澤東是把中美會談和軍事調動聯繫起來考慮的，因而叫停了王炳南與卡波特的會面。

延至6月22日，王炳南收到了外交部的新指示，要他「於23日或24日約美大使」會面。[51]王當即邀約卡波特於第二天見面，卡馬上就同意了。

王電告北京後幾小時內，又收到外交部來電，告知他「國內決定在23日北京時間23時廣播關於蔣匪竄犯的新聞」。[52]

6月23日，卡波特應約到王炳南官邸「喝茶」。王根據周恩來面授的「錦囊妙計」，很快把話題轉到台灣局勢。他指責美國政府支持、鼓勵和配合蔣介石集團竄犯大陸沿海地區的計劃，並說「美國是在玩火，蔣介石一旦挑起戰爭，其結果絕不會對美國帶來任何好處。美國政府必須對蔣介石的冒險行動和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負完全責任」。卡波特其實也是有備而來。當時，美國情報機構已偵測到解放軍在福建集結了四十餘萬大軍，可能會對國民黨佔領的沿海島嶼發動進攻。[53] 卡波特當即表示，「中華民國政府對美國政府承擔了義務，未經我們的許可，不得對中國大陸發動任何進攻。我被授權通知貴大使，我們無意在目前情況下給予這種許可」。萬一發生蔣進犯大陸的情況，他說，「美國將明確地聲明與這種進攻脫離關係」。他還澄清說，只有在大陸對台灣發動進攻時，「那是要涉及美國對中華民國的義務的」。卡波特甚至表示：「我們雙方應保持接觸以便盡快制止這種事件。」卡波特反問王，北京方面能否做出同樣的保證。王答：「解放軍武力侵犯台灣的問題根本不存在。」這正是美方希望得到的答案。會後，王立即將會談情況，以及「美既反對蔣幫進攻大陸，同時也反對我進攻台灣或金馬」的立場要點電告北京。[54] 6月27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表示，美台之間早有換文約定，台灣方面未獲美國同意不可採取任何行動。肯尼迪又說，美國不知道台灣方面有「反攻大陸」的意向和行動，也未接到任何相關報告。[55]

這一來，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對美國決策者的態度吃得更準了。之後，他們收到的有關台灣方面的情報顯示，蔣介石已下令停止部隊繼續集結。他們隨即對整個軍事部署做出重大調整，從福建前線的部隊中調出一部分，向西南方向轉移。7月26日，中央軍委就此向毛報告：「目前蔣匪幫大、中規模的竄犯可能，至少已經推遲」，因此，「擬將入閩部隊的部署，即作適當疏散」。毛澤東當即批示「同意」。[56]

緊張局勢過去後，中共對台政策的主軸，又重新回到1960年後提出的「一綱四目」上來。周恩來仍是這一政策實行的負責人。此後的幾年裏，即便在中國大陸政治風向及內外政策基調都開始急劇轉向「左傾」之

申请号：100706005　复印日期:2010-07-06 13:45:32　　111-00605-01

請美澳司办

外交部收电

阅毕请送美沃司

等級 特急提前　　波兰台来　外收(62)　已 705 号

关于与美国大使非正式会談情况

外交部：

今天美国大使卡伯特应邀来我住所举行非正式会談。我按指示讲毕后，他表示欣賞我方的坦率，保証如实报告美国政府。

关于台湾地区局势，卡伯特說："我也了解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增长。关于中华民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虽然我沒有接到精确的消息，但我获有印象，他們最近确是采取了某些軍事措施。我也接到官方的通知，貴方在大陆沿海进行了軍事集結。我相信你們也知道，中华民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承担了义务，未經我們的許可，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进攻。我被授权通知貴大使，我們无意在目前情况下給予这种許可。至于大陆方面正在进行的軍事集結，如果是防御性质的話，人們自然不反对。（这时他掏出电报来念）为了不致发生誤解，我要提醒你方，我們与中华民国之間有着一个协防台、澎的正式协議。美国国会曾授权美国总統可以使用美国軍队来防守台、澎。至于沿海島屿，鉴于中华民国政府在那里駐軍的規模，要想攻占它們，势必进行一个大規模的軍事行动，而这种軍事行动是不易于限制在这些島屿周围之內的。因此，如果发生进攻沿

32

圖 22.1：王炳南關於與美國大使非正式會談情況致外交部電，1962 年 6 月 23 日。（111-00605-01，外交部檔案館）

時，他仍然鍥而不捨地探求同台灣最高領導層接觸的渠道和機會。他知道蔣介石思鄉觀念濃重，特地命人將奉化蔣家拍成照片，託人帶往台灣，並在照片後面親筆題字：「奉化廬墓依然，溪口花草無恙」，真是煞費苦心。[57]

1963年7月，台灣政情出現異動，陳誠因病辭去副總統一職。這幾年，周恩來對陳的動向一直極為關注，陳突然辭職，令周十分吃驚。7月9日，他約見張治中和傅作義討論此事。他分析，陳辭職原因不外有三：美國壓力，內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說：「不管台灣形勢如何，我們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58]

12月6日，周恩來從北京飛抵廣州，此後幾天，他「失蹤」了。原來，他在張治中陪同下來到黃埔港，和張參觀黃埔軍校舊址後，一道登上了南海艦隊846護衛艦，出海視察駐珠江口前線的海軍部隊。護衛艦沿近海航行後，當晚停泊於香港附近的海軍某部駐地。他在這裏要同一位與蔣經國有深交的人士張稚琴會晤。經預先安排後，張從香港秘密來到這裏。周見到張後表示：

> 美國正採取更多的實際行動，要把台灣變成一個獨立政治單位。而國共兩黨可以在反對「兩個中國」問題上形成統一戰線。我們不會因自己強大而不理台灣，也不會因有困難而拿原則做交易。如果單從我們方面看，台灣歸還祖國固然好，既然暫缺那也無損於祖國的強大地位。我們是從民族大義出發，是從祖國統一大業出發。今天祖國的四周邊界問題已解決，唯獨東南一隅尚未完滿，這個統一大業應該共同來完成。

周還請對方給蔣經國帶了幾瓶多年陳酒。會談結果是，周「溝通了當時的台灣當局（蔣介石、陳誠、蔣經國）與大陸之間的交流」，並與對方「在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的問題上，事實上達到了默契」。[59] 周所乘的護衛艦連夜返航，第二天回到黃埔港時，周恩來告訴隨行人員：「這晚上是幾年來睡得最安穩的一夜。」可見，他對此行相當滿意。[60]

上述故事，除童小鵬外，也由長期任周恩來助手並負責對台工作的羅青長，以及擔任安排此次航行的南海艦隊司令員吳瑞林分別講述，因而可信度甚高。但在目前看到的其他材料中，沒有關於這一段及其前因後果的

記載，也不知道究竟是誰、通過何種渠道為周恩來此行做安排。台灣方面，蔣介石和蔣經國日記均已解密，但其中沒有透露關於此事的任何蛛絲馬跡——而從台灣方面來說，像這樣一件極大的事情，沒有蔣介石的親自批准，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兩蔣日記對此事居然全無涉及，其極端重要性可見一斑。

五

1962年6月26日，周恩來從東北返抵北京。這時，蔣介石反攻大陸而造成的緊張局勢已開始緩和下來。隨着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相繼召開，國內問題是周恩來要應對挑戰的重中之重。但與此同時，中印邊界的情勢卻持續惡化，周和中共領導層的相當一部分注意力，不能不繼續集中到中印邊界上來。

周恩來仍沒有放棄盡力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問題，或至少不使局勢進一步惡化。6月4日，他還在東北視察，就在瀋陽會見柬埔寨王國第一大臣賓努親王時，特意把談話引到中印邊界問題上來：我們的立場是明確的，一是維持現狀，二是通過談判和平解決，而且主張停止邊界巡邏。中國已通過談判同緬甸、尼泊爾解決了邊界問題，為什麼中印邊界問題不能這樣解決呢？[61] 周顯然是希望通過同尼赫魯個人關係良好的柬埔寨領導人西哈努克親王傳話，把這個信息帶給尼赫魯。

周恩來回到北京後，中印邊界西段又響起新的警報：7月5日，印度軍隊侵入加勒萬河谷地區，這是印度進入阿克賽欽地區的通道。7月7日，周聽取楊成武彙報後說，印方的行動證實了中央軍委5月下旬做出的判斷，那就是印方的主要企圖是逐步侵入並佔領阿克賽欽地區。[62]

即使到了這個時候，周恩來還是希望把「先禮後兵」做到極致。7月8日，中國外交部向印度提出強烈抗議。同先前比較，這份在周直接指導下寫成的抗議書，措辭極為嚴厲：「中國方面一直在避免同印度入侵部隊發生衝突。但是，中國方面決不能在印度有增無已的武力緊逼面前屈服。中國方面也決不會在遭到無端攻擊時放棄自衛的權力。」「如果印度軍隊堅持入侵和挑釁，則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必須由印度方面承擔責任。」[63]

但周恩來也清楚地知道，單單通過言辭，即便是異常強烈的言辭，恐怕已不能阻止印軍進一步推進。7月9日，周經毛同意後，批准新疆軍區派出一個偵察連，搶先佔領加勒萬河北岸兩個高地。但周又明確指示邊防部隊，「如印軍不開槍，我決不先開槍；如印軍向我包圍進攻，我可自衛，但應少殺傷，多捉活的」。[64] 這是自1959年中印邊界兩次衝突以來，中國邊防部隊第一次獲得授權，迫不得已時可以開火自衛。周向邊防部隊發出這一指示後的兩天裏，神經高度緊張，他在北京一直緊緊地盯着加勒萬河谷地區的情勢發展，並要求新疆軍區每兩小時向他彙報一次情況。[65]

7月10日晚，周恩來聽取楊成武的報告：當天，印軍又在中印邊境西段分三路向中國巡邏隊步步緊逼，甚至在距中國軍隊僅50米處進行挑釁。同時，印軍還動用了直升機運載援軍到達侵略據點，並建立了新的侵略據點。[66] 第二天，周又接到報告，「印度直升機兩架運載援軍到侵略據點，並在附近地區盤旋，偵察和恫嚇中國哨所和巡邏人員」。此外，「另有印度軍隊一支分遣隊沿加勒萬河谷下游前進，建立一個新的侵略據點」。在周看來，情況已極為嚴重，雙方的直接衝突更是一觸即發。當晚，他召集外交及軍事方面相關負責人開會，討論應對方略。[67] 會議一直開到午夜過後才結束，但周仍然趕到毛澤東處，當面向毛報告會議關於處置加勒萬河谷入侵印軍的兩個方案：一是使用武力，驅逐已被中國邊防部隊反包圍的印軍，拔掉印軍新設的據點；二是暫時不使用武力，想辦法逼退印軍。[68] 毛澤東說：印度在我境內設點，我們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現在還要克制，不能急着打。一要進一步暴露尼赫魯的真面目；二是要爭取國際上正確認識中印邊境鬥爭的是非問題，爭取大多數同情和支持我們，特別是要爭取中間派；國際上有些國家對中印邊界問題看得不十分清楚，弄不清誰是誰非，同時我們和印度的鬥爭是複雜的國際問題，不僅僅是印度的問題，美帝國主義、蘇聯等都在支持印度，他們想利用我們存在暫時困難的機會，推我們上陣，整我們一下，但我們不中他們的圈套；我們現在堅持不打第一槍。毛提出：我們的方針是八個字：決不退讓，避免流血；他和周恩來討論後，又補充了八個字：武裝共處，犬牙交錯。[69] 周隨即將毛的指示向總參傳達。7月20日，總參在毛確定的「十六字方針」基礎上，形成了對印

反蠶食鬥爭的二十字方針：「決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70]

7月21日，中印邊界情勢進一步惡化，在西段奇普恰普河谷地區，印軍又一次逼近中方哨所。這時，自1959年8月朗久事件和10月空喀山口事件以來，中國邊防部隊第一次開火，以阻止印軍迫近。[71] 22日凌晨1時半，周恩來接到新疆軍區的報告後，又再次連夜趕到毛澤東處，向毛彙報。[72]

多日來，毛澤東儘管有其他各種事務，但也一直在考慮如何應對印度步步緊逼的問題。這時，他大概已下了必要時對印度用兵的決心。然而，從政治上的考慮出發，他和周恩來商量後還是決定，仍繼續採取「先禮後兵」的對策。周隨即經由總參謀部向新疆邊防部隊發出指示：繼續堅持不打第一槍的原則，要採取你包圍我、我包圍你，你切斷我、我切斷你的手段，有效地制止印軍推進和蠶食。周還強調，「不要怕麻煩，麻煩一點就麻煩一點，我不主動打，這是方針」。只有在印軍發起進攻、再三警告無效的情況下，「我可自衛。但要給印軍留出一條退路；如印軍逃跑，不要阻攔，如印軍不跑，就與其對峙起來」。[73]

這時，情況似乎又出現了一線轉機。恰在這幾天，周恩來接到報告，尼赫魯在會見即將離任的中國駐印大使潘自力時表示，「兩國可以雙方官員報告為基礎進行討論，而未再提中國從西段撤出作為先決條件」。這是否意味着，印度不一定非以從爭議地區撤出軍隊為前提條件，同中國討論邊界問題？周馬上注意到了這一新動向。[74] 當時，中國外長陳毅正在日內瓦參加第二次印度支那會議。7月22日，經毛澤東審閱批准後，周恩來給陳毅發出一份特急電報，指示陳要抓住「尼赫魯還有恢復雙方談判意向這一時機」，約見當時也在日內瓦開會的印度國防部長梅農（V. K. Krishna Menon），陳述中方恢復談判的主張，說明「中印邊界問題，只能由中印雙方直接會談來解決」。周還指示陳：「關於恢復談判的手續、時間、地點和人員級別，如能與梅農談定最好，否則留待外交途徑解決，談判人員級別或者大使級，或者副外長級。地點如北京新德里輪流不便，可改在中立國。」[75] 這是周試圖通過外交途徑，控制中印邊界衝突升級的最後努力。

其實，陳毅當天剛剛和梅農見過面。但他接到周恩來的急電後，仍馬上邀約梅農第二天見面，梅農當即同意。7月23日上午，陳毅再次同梅農見面。[76] 期間，兩人顯然就中印間恢復邊界談判達成了某種協議，並準備就此發表一項聯合聲明 (joint communiqué)。可是，由於梅農「因技術原因」無法同新德里方面取得聯繫，聲明後來未能發表。[77] 實際上，就算梅農當時獲得了新德里的批准發表聯合聲明，談判恐怕也注定不會取得進展。梅農和陳毅會面時，被人偷拍到了一張兩人在一起的照片，印度議會中有人對此抓住不放，硬給尼赫魯扣上企圖「綏靖中國」的大帽子，搞得尼赫魯不得不對他們做了一番「當代世界外交」絕不意味着「不與人接觸」的啟蒙教育。[78]

7月30日，陳毅回到北京後，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了他會見梅農的情況。[79] 周恩來看到印度輿論對於尼赫魯「稍微顯出一點靈活性」的激烈反應，再加上陳毅和梅農已商定要發表的聯合聲明又無端流產，他徹底地失望了。[80] 他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都意識到，通過談判解決或緩解中印邊界爭端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地消失。

從7月下旬到8月底，毛、周和中共領導層都忙於在北戴河開會，關於中印邊界的外交活動一時間似乎靜寂下來。但實際上，這個問題沒有在毛、周的「決策清單」上消失。8月10日，中央軍委在5月至7月的工作彙報中，針對台海局勢自「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的緊急備戰」做了總結，提出要加強「在中印邊境西段，同印度的蠶食政策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毛批准了這一報告。[81]

9月上旬，中共領導層下令，中國邊防部隊在同印度部隊的對峙中，不論在西段還是東段，遇到對方步步緊逼時將不再後退。從9月8日起，「中印雙方部隊在邊界東段的扯冬地區已處於對峙狀態」。[82] 但同時，北京再次下令，除非有來自最高領導層的明確命令，中國軍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准打第一槍。中國軍隊收到命令後，中印雙方邊防部隊在實際上已處於犬牙交錯的對峙狀態。

9月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陳毅、羅瑞卿、雷英夫、耿飈等開會討論中印邊界問題。當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又開會討論此問題。[83] 21日下午，周召集陳毅、羅瑞卿、雷英夫、耿飈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開會

討論此問題。[84] 此時，中共領導層實際上已作出必要時同印度打一仗的決定。

9月下旬，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也是議題之一。9月26日，周恩來在發言中說，尼赫魯已經把衝突「從西段轉到東段」，他的目的是「利用中印邊界問題，來鎮壓國內革命，左右逢源要東西，取得美援」。這樣，中國可能會同印度打仗。「我們的辦法是：軍事共處，長期鬥爭；又鬥爭，又團結；又打仗，又談判」；「我們的鬥爭是有理、有利、有節，後發制人。總是他先挑釁，我們不先開槍。除非到了必要的時候，我們也不出擊。現在，中國軍隊的任務就是看住印度軍隊，反擊他的進攻，切斷他的退路，逼他後退。」[85]

中印邊界局勢的發展，終於在10月達到了臨爆點。10月5日，周恩來接到了總參情報部的報告，其中引用美聯社、法新社駐新德里記者當天的一篇報道說，印度正在加緊備戰，今後幾天裏，印軍可能會發起攻勢。「這將是中印邊界三年衝突以來的第一次真正的戰鬥」，新德里「已決心要把中國人趕出去」。[86] 這份報告引起了周的高度重視。他當即判斷，印度已準備在中印邊界進一步採取行動。他在總參的報告上批示道：「敵人如在東段動手，我們除給予痛擊外，西段也可同時殲滅其若干處據點。」也就是說，中國軍隊將在整個邊界實施「反擊作戰」。他還指示羅瑞卿，「提出方案送中央考慮」。[87] 解放軍從10月初起，開始實行對中印邊界沿線戰備物資及其他物資的大規模輸送。[88]

10月8日，周恩來應召前往毛澤東處，參加討論中印邊界衝突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羅瑞卿上報的方案。在羅瑞卿、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等彙報了中印邊界雙方對峙情況後，毛當場拍板決定，實施對入侵印軍的自衛反擊作戰。[89] 羅瑞卿和楊成武隨即召集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傳達毛的決定，並部署對印作戰。[90]

當天，周恩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向他通報道：印度可能在中印邊界東段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周說：「如果他們一旦發動進攻，我們就堅決自衛。」又說：「他們利用蘇制米式直升飛機在西段和東段進行空投，運送軍需，又是還用蘇制運輸機。印度使用蘇制飛機進行挑釁，對我們前方戰士有影響。」[91] 周的這番話，是在向莫斯科吹風。

1959年中印邊界衝突發生之後，蘇聯領導人的態度曖昧，周顯然希望蘇聯這一次能夠「站對隊」，但要是蘇聯站錯了隊，則又可以給中共批判蘇共留下口實。幾天後，出乎毛、周的意料之外，赫魯曉夫在會見中國駐蘇大使劉曉時說：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蘇聯站在中國一邊，「我和我的同志們完全同意周恩來同志的意見，也完全懂得所謂麥克馬洪線並不是中印的邊界，這是未被任何人承認的一條對英帝國主義有好處的線」。赫魯曉夫保證，「我們將根據周恩來同志同我國大使的談話中所闡述的立場和中國政府給印度的有關照會，採取外交措施」。[92] 第二天，赫魯曉夫又在蘇共中央主席團為劉曉舉行的高規格告別宴會上重申：「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蘇聯是站在中國一邊的。這是蘇共中央主席團的一致立場。如果不幸發生反對中國的戰爭，我們將同中國站在一起。過去我們曾不止一次地公開宣佈過這一點，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我們明天還可以重申這一聲明」；他還表示，「如果蘇聯處在中國的地位，也要採取同樣的措施」。赫魯曉夫還特地就蘇聯向印度出售米格飛機一事再次解釋道，蘇聯「僅僅出於策略的考慮，才沒有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公開聲明」，因為「不能把印度推到美國那一邊去」，他還保證，蘇聯將「暫緩向印度出售米格21型飛機」。[93]

此時，尼赫魯卻根本沒有想到中國領導人已忍無可忍，一場「自衛反擊戰爭」也已迫在眉睫，當時他正準備出訪錫蘭。10月12日，他在機場同新聞界見面時，有記者問他：「給東北邊境特區的部隊下達了什麼命令？」他隨口說了一句大話：「我們的指令是要解放我們的領土。」[94]

尼赫魯的原話是“Our instructions are to free our territory”。新華社在報道尼赫魯的講話時，把這段話譯為「向印度武裝部隊發出的指示是，要把中國入侵者從東北邊境特區的印度領土上清除掉」。[95] 當周恩來和其他中國領導人看到這一報道時，覺得尼赫魯完全露出了馬腳，也讓中國抓住了把柄。

10月17日下午1時30分，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會議，專門討論對印度進行自衛反擊作戰的問題。出席會議者中，除周恩來外，還有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彭真、陳毅、賀龍、聶榮臻、羅瑞卿等。周報告說：從各方面情況看，我們不進行自衛反擊不行了，因此應立即動手。毛問：這個

仗打的贏打不贏？羅回答：打的贏！毛又說：打第一槍要有最高統帥部的命令。打響第一槍之後，仗怎麼打，那就主要由你們負責了。[96] 本來，中國領導人一直在考慮，是只在西段實行反擊作戰，還是在中印邊界全線採取行動。這次會議上最後決定，中印邊界爭端的焦點固然在西段，但邊界東段自然條件較好，較有利於大部隊行動，因此反擊戰的主戰場要放在東段。毛想的是，這個仗要麼不打，要打就要把「印度反動派」打痛。

當晚11時，毛澤東簽發〈中共中央軍委關於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為了保衛祖國邊疆，中央決定進行反擊戰役。在東段，將由「西藏軍區部隊首先粉碎印軍對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克節朗地區的進攻，並準備連續作戰，殲滅可能來援之印軍」。在西段，則由「新疆軍區邊防部隊，首先粉碎印軍的進攻，然後殲滅侵入加勒萬河谷和紅山頭之印軍，並視情況擴大戰果」。[97] 第二天下午，中央軍委向參戰部隊發出指示：「此次對印度反動派作戰，事關國威、軍威，務求初戰必勝，只能打好，不能打壞。」[98]

六

10月20日晨，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東西段同時對印軍實行大規模反擊作戰。印軍幾乎不堪一擊。在西段，短短三天內，解放軍就肅清了班公湖及北面印度推行前進政策後建立的全部據點。至10月29日，已大致推進到先前的中方實際控制線。在邊界東段，解放軍越過麥克馬洪線，擊敗印軍後，在西端佔領了曾為藏南行政中心的達旺，東端逼近了重鎮瓦弄。[99]

戰爭剛一發生，周恩來就在考慮下一步怎麼辦的問題。10月21日，他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說：

> 我們主張國際爭端通過談判解決。拒絕談判的是尼赫魯，發動進攻的是尼赫魯，下令要打的是尼赫魯。衝突的根源是印度要求承襲英帝國主義的衣缽，我們不能老忍讓，要還擊，要做這種準備。他一定要碰，就讓他碰得頭破血流。[100]

這一由毛、周審定的說法，成為中方對中印邊界戰爭「官方陳述」的基調。

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在周恩來主持下寫成的關於邊界衝突的聲明，提出三項建議：雙方確認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停止衝突並各自撤軍，重開談判。「在和平解決前，雙方尊重1959年11月7日存在於雙方之間的實際控制線，雙方武裝部隊從這條線各自後撤二十公里，脱離接觸。」[101]同一天，周致信尼赫魯，對兩國之間發生邊界衝突表示「十分痛心」，並重申中方的三項建議。[102]周恩來這麼做，其實已把中方的底牌告知尼赫魯和印方：恢復尼赫魯推行「前進政策」前雙方的實際控制線，並以此為基礎重開談判。然而，尼赫魯不買帳，答覆道，結束軍事行動的前提，是「恢復1962年9月8日前存在於印中邊界全線的局面」。[103]在周恩來主張的1959年11月7日線和尼赫魯主張的1962年9月8日線之間，差別是約2,500平方英里（或大約6,500平方公里）的土地。這也是自1960年以來，尤其是尼赫魯實行「前進政策」後，印方佔領的土地。顯然，雙方的立場有很大的差異。

在周恩來看來，尼赫魯在印軍節節敗退的情況下，居然拒絕恢復1959年11月7日前的邊界狀況，簡直是匪夷所思。10月29日，周在會見緬甸駐華大使叫溫（Maung Maung Kyaw Win）時解釋説，尼赫魯提出恢復1962年9月8日前的邊界狀況，等於是要在西段由印度繼續近兩年在阿克賽欽蠶食佔領的地區，又在東段要中國從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地方還要往北退。「這怎麼叫停火？這等於是要我們投降！」[104]但鑒於解放軍經一週作戰已逼近1959年11月7日雙方實際控制線，10月24日，總參謀部下令，部隊停止追擊，集結待命。[105]

此後一段時間，周恩來將主要注意力轉向外交，親自出面，向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各國解釋中印邊界衝突發生的前因後果。但此時，尼赫魯和印方並不想住手。經一系列部隊調動和集結後，11月14日，印軍在東段瓦弄地區發起攻勢。[106]兩天後，解放軍展開強勢反攻，擊退印軍。11月18日，解放軍又在東段發動全面攻勢，擊潰印軍後，長驅直入，推進到「傳統習慣線」，亦即中方主張的中印邊界線以南。尼赫魯宣佈印度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11月19日，毛澤東在當天的《參考資料》上看到，尼赫魯和印度總統拉達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在18日的講話中都説，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印之間的分歧。他大概覺得，這一下印度真的是被「打痛

了」，當即批示：「突然大談和平解決。送總理閱。請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領導人過去幾天，是否有過十八日這種論調。」[107] 半小時後，周恩來就趕到毛的住所，向毛彙報並商談對策。[108] 當天午夜，周約見印度駐華代辦班納吉（P. K. Banerjee），表示中方同意拉達克里希南總統的主張，中印雙方應立即開始談判。周說：儘管形勢看來很緊張，但我們應從更遠更深來看，中印兩國應該友好下去。我已答允去去德里，我去過德里四次，再去時將是第五次了。周請班納吉立即向尼赫魯報告。[109]

11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未等尼赫魯回覆，就走出了出乎意料的一步：11月21日，中國政府宣佈解放軍將從11月22日零時起全線單方面停火，並從12月1日起後撤到1959年11月7日雙方實際控制線，並再後撤20公里。一場持續了一個月的邊界戰爭，就此戛然而止。

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戰爭中打得那麼順利，為什麼不乘勝推進擴大戰果？為什麼突然停戰？又為什麼主動撤軍？這其實是毛澤東、周恩來等在開戰前就已商定的。周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言時強調，在中印邊界打仗的目的，是以此為談判開路，「我們還主張談判」。[110] 10月20日，仗打起來後的當天，周又在國務院會議上說，讓尼赫魯碰得頭破血流後，還是要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111] 從一開始，他們就打算抓住適當時機，亦即把印度反動派「打痛」時就停戰的。經過11月16日開始的第二波反擊作戰後，毛覺得尼赫魯和「印度反動派」已被打痛，停戰就成了順利成章的事。

那麼，毛澤東做出停戰及撤軍的決定，是不是因為解放軍在後勤供給上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或預計會遇到這種困難？從毛、周的內部講話及中印邊界戰爭後勤支援的內部文獻來看，這並不是他們作出停戰撤軍決策時的主要考慮。本來，毛、周和中共領導層做好了準備要打的，是一場長得多、也艱巨得多的戰爭，並為此從10月初起，通過1950年代修成通車的川藏、青藏、新藏三條公路幹線，向邊境地區實行大規模緊急物資運送。[112] 但毛、周等沒有想到，印度軍隊居然這麼不經打。整個戰爭持續了一個月，但其中真正開打的日子，前後加在一起不過十天，印軍已潰不成軍。而當時，根據總參後勤部門的報告，中方向邊境地區的物資調動運輸已克服初期的各種困難，漸入軌道。[113] 從目前可以接觸到的檔案文獻及其

他材料來看，毛澤東、周恩來當時沒有接到解放軍因後勤供應問題而打不下去的報告。

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做出停戰、撤軍的決定，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就像周恩來在仗還沒有開打時就說的：這一仗，首先是一場政治仗。[114] 從毛的角度來說，這是隨着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的召開，他從二線全面重回一線的重要步驟。尤其是，中印之間這一仗是否打、怎麼打、打到哪裏為止等等，都經過了毛，由他最後拍板。戰爭決策從來就是政治權力最好的試金石。中印邊界這一仗打下來，毫無疑問，毛澤東進一步鞏固了自己作為軍隊最高統帥的中心地位。

毛澤東還極為看重的是，對印反擊作戰取得勝利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動員效應。對這一點，周恩來理解得相當透徹。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過一段話：

> 認識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可以抓住，從而調動國內外群眾。主席引孟子說：「國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多難興邦。」用多難興邦為動員口號，動員的結果，證明了毛主席的正確。[115]

在西面打的這一個大勝仗，同東面「粉碎蔣匪反共大陸陰謀」的軍事和社會動員結合在一起，使得還遠未走出大躍進災難性後果陰影的廣大民眾中，多少有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這對已決心要在全國範圍燃起史無前例的、超常群眾動員烈焰的毛澤東來說，是一股再強勁不過的東風。無怪乎，10月20日，解放軍發起反擊作戰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就在〈關於中印邊境衝突國內宣傳工作的注意事項通知〉要求，全國人民要「以努力生產，努力學習，努力工作，聽候黨和政府的號召」，並「用可靠方法口頭通知有關黨組織和有關部門執行」。[116] 11月14日，中央發出正式文件，強調自衛反擊戰是正義之戰，確實打出了「軍威」和「國威」。[117] 獲得大勝後，由反擊戰英模組成的報告團又前往各地宣講，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對社會主義祖國的支持與熱愛。這一仗打得收放自如，對毛澤東來說，這表明中國不僅在軍事上獲得了大勝，也佔據了道義上的制高點，打的是一場正義之戰，而這正是他在國內大搞超常群眾動員所必不可少的。

仗打完了，但在國內外還有大量後續工作要做，這個差使自然落到了周恩來頭上。在國內，周要花大力氣解釋的不是為什麼要打這一仗，而是為什麼打了大勝仗之後卻主動停戰撤軍，並把明明屬於「當年西藏管過的地方」交回去。就在宣佈停戰撤軍的11月21日，中央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向黨內外幹部和人民群眾進行必要的宣傳解釋，說明我們對印度反動派實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方針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我們這次主動採取的措施，將使全世界人民看得更清楚，誰愛好和平，誰要戰爭」。[118] 但實際上，在黨內、軍內以及國內各界，對此想不通的人很多。軍內就有不少人覺得停戰、撤軍可以，但在東段至少應留住藏南首府達旺和戰略重鎮瓦弄。周恩來認為，他必須親自出馬講清楚這個問題。11月24日，他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講話，從為什麼要打這個仗講起：尼赫魯不肯放棄大印帝國的思想，不放棄侵略立場，只有通過自衛反擊，才能使他知難而退或者暫時和緩，所以這個仗必須打，而且不能小打，只能大打。那麼，「我們打了不退行不行？就守在那個地方？」周恩來問道，又回答說：

> 當然，可以這樣設想。但是，這樣子主動性不夠，你停在那個地方，你雖然也是主動停火，但是隨時有引起衝突的可能，對這個政策的實現就不徹底，你只有後撤到實際控制線後二十公里，這表示我們政策實行得徹底，影響就大。如果只主動停火不後撤，還會給別人另外一個錯覺，就以為我們打算用武力改變現狀。……我們是為正義而戰，不是為改變現狀而戰。改變現狀是要談判解決的，否則我們沒有法子解釋我們為什麼抗美援朝，我們花那麼大的血的代價，是為了支持正義戰爭，然後我們又撤回來。[119]

周恩來的話，間接地回答了中國是否是由於後勤保障方面的考慮而決定撤兵的問題。而他提出的「為正義而戰」，也代表了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就停戰撤軍在國內作出的最終說明。周特地強調：「這對我們前方的官兵要多多地解釋，對我們廣大人民要好好地解釋。」[120]

七

在國際上，周恩來所面臨的挑戰要嚴峻得多。本來，在他和毛澤東看來，從1959年底到1962年10月的三年裏，尤其是在尼赫魯推行「前進政策」後，中國面對印軍在邊界上步步推進並不斷蠶食爭議領土的局面仍百般忍讓，這一切國際社會應該是看得到的。更何況，中國大獲全勝後又主動撤軍，退回到1959年11月線（亦即印度實行「前進政策」前的雙方實際控制線）以北20公里處，這在世界歷史上更是從無先例的。但在國際上，不僅美、英等西方國家，甚至在很多亞非國家，也出現了大量對中國「訴諸武力」的指責。這裏的癥結在於，印度通過推行「前進政策」搶佔爭議領土是經由一連串的「小動作」實現的，儘管中方一再提出強烈抗議，國際主流媒體卻幾乎從不報道。中國採取大規模的反擊行動後，動靜極大，一下子就把世界的注意力吸引過來。尼赫魯擺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樣，以「哀兵」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再加上他個人在世界上作為反殖、不結盟和民主鬥士的影響力，甚至獲得了許多一直對中印兩國均持友好態度的國家的同情。這是周恩來所始料未及的。

中國軍隊反擊作戰開始後，周恩來立即親自寫信給一系列亞非國家領導人，敘述中印邊界爭端的沿革及衝突發生的原因，強調中國不是要通過軍事手段攫取領土，而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不得已才對印實行反擊作戰，目的仍然是回到談判桌上來，以和平手段最終解決中印之間的邊界爭端。[121] 戰爭以中國單方面停火及撤軍結束後，周又把外交重心轉到同試圖調停中印衝突的科倫坡六國（錫蘭、印尼、緬甸、柬埔寨、阿聯、加納）交流上，反覆說明中印邊界衝突發生的緣由，解釋中方停戰撤軍後通過「互諒互讓」的外交談判解決爭端的立場，以取得它們的支持、諒解或中立。周不知花費了多少口舌，才使他們對中方的立場、態度和處境多少有了一些了解。在這一過程中他發現，儘管這些都算得上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但開始時它們都或多或少地偏向印度。這使他意識到，一定要把新中國外交拓展到更為廣大的亞非地區去。

中印發生戰爭後，在國際上對中國的一片責難聲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沒有想到的是，蘇聯卻一改先前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中立態度，真的就

像赫魯曉夫向劉曉大使說過的那樣，明確地站到了中國這一邊。10月22日，契爾沃年科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遞交了蘇聯政府的一份備忘錄，表示「完全支持你們通過談判解決同印度之間邊界談判的願望」，並表態支持中方關於「麥克馬洪線」的立場，即「麥克馬洪線並不是已定的國界線，它是沉痛的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在劃定這條線的時候，印度的國土還處在強大的殖民主義國家英國的統治之下」，而「當時的中國是個弱國，它不能給英國以應有的反抗。儘管如此，中國並沒有承認這一條單方面劃定的麥克馬洪線」。契爾沃年科在同章漢夫的交談中還表示，「如果印度資產階級繼續侵略，中國自己會有力量和可能給予充分的反擊」。[122] 三天後，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支持中國政府10月24日聲明中關於和平解決中印邊界衝突的三項建議，並表示「臭名昭著的麥克馬洪線……從來都沒有得到中國的承認」。[123] 這麼一來，幾年來一直陷於緊張的中蘇關係似乎出現了改善的轉機。但是，毛澤東不領赫魯曉夫這個情，讓他的熱面孔貼到自己的冷屁股。

幾乎就在中印邊界戰爭發生的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爆發了古巴導彈危機。1962年7月後，蘇聯向古巴派去艦船，並秘密開始在古巴部署中程導彈以及可載核彈的伊爾－28轟炸機。10月14日，這些情況被美國U-2高空偵察機發現。蘇聯的做法完全打破了美國關於自身核心安全利益界定的底線，肯尼迪政府的反應因而極為強烈。從10月14日到27日這14天裏，美蘇針尖對麥芒，發生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核對峙，兩個超級大國和整個世界也被帶到了一場核戰爭浩劫的邊緣。直至最後一刻，理智終於佔據了上風，肯尼迪和赫魯曉夫各退一步：美國承諾不武裝入侵古巴並從土耳其和希臘撤出核武器，蘇聯同意從古巴撤出核武器。一場空前的危機終於過去了。

這場危機的發生，對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來說，來得突然。1959年古巴革命的勝利，是新中國在拉美外交的一項意外收穫。它為中國在拉美打開了一個口子。古巴導彈危機發生後，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堅決支持古巴反對美國的戰爭挑釁。10月28日，在危機已獲解決的第二天，北京舉行一萬多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周恩來出席，大會還發了給卡斯特羅的聲援電報。[124]

赫魯曉夫在中印邊界衝突上支持中國，顯然是希望北京能投桃報李，在古巴危機上支持蘇聯。他在10月13日會見劉曉大使時，就特別說明了蘇聯和美國在古巴問題上的對峙，並表示古巴是「我們在美國人身上插了一把刀」，「美國人只好吞下去」。[125]

然而，毛澤東的心目中早已描繪出了一幅極為宏大的國內外政治藍圖，處於中心的就是在國際上「反修」和在國內「防修」這兩個相互緊密關聯的大題目。在這幅藍圖中，毛沒有把印度和中印邊界衝突看得那麼大、那麼嚴重。他和周恩來當時恐怕都沒有想到，直到半個多世紀後，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的陰影仍籠罩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世界上人口最多、也被認為發展前景最有希望的國家頭上。它所構成的，是21世紀人類將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結果，根據毛澤東的思路，中國在古巴導彈危機上不僅反美，更以重炮抨擊蘇聯，指責赫魯曉夫在古巴部署導彈是冒險主義，撤出導彈是投降主義，是以出賣古巴革命和主權為代價，同美帝妥協。[126]這一下，赫魯曉夫和整個蘇聯領導層被激怒了。他們想不到，蘇聯剛剛在中印邊界戰爭中，不顧自己在印度的戰略利益支持了中國，毛澤東卻根本不領情。這之後，蘇聯對中印邊界戰爭的態度迅速回擺，並開始對中國橫加指責，中蘇關係也隨之嚴重惡化。不過，這恐怕正是要在國內大搞「防修」的毛澤東想要看到的。於是，他順理成章地更高地舉起「反修」的大旗，把「蘇修」和印度反動派放在一道，痛加批判。

古巴導彈危機還有一個大的影響：它使毛澤東更覺得，一定要盡快把中國自己的原子彈搞出來。本來，在1959年蘇聯停止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及技術後，國內又因大躍進失敗而面臨極為困難的局面，毛和中共領導層雖沒有放棄製造原子彈的計劃，但整個工程還是遲滯下來。1962年，隨着國內局勢好轉，製造原子彈的計劃也開始加力實施。古巴導彈危機後，「要把原子彈搞出來」的步伐加快了。10月30日，羅瑞卿提出報告，要「力爭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報告先交到了周恩來手裏，周立即上報毛澤東。11月3日，毛在羅瑞卿的報告上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127]很快，一個由周恩來牽頭的專門委員會成立。它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全國所有人力和資源的集中調配使

用，實現羅報告中提出的在1964年造出第一顆原子彈的計劃。這樣，中國製造原子彈的宏大工程在周的組織協調下，進入了緊鑼密鼓、加緊實行的階段。

八

周恩來辦公桌上有一本工作枱曆，他歷來有在上面記事的習慣。當1962年行將結束、1963年到來時，他在上面記得最多的，應是當時他關注最多的事情：雖然中國已開始走出大躍進失敗後最困難的時期，但仍面臨着國民經濟繼續調整的艱巨任務，不可鬆懈。整個1962年下半年，周恩來做其他事時，這件事他也一直沒有放手過。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前發出的通知是由周恩來為中央起草的。他列出的議題是：糧食、精簡、工資、增產節約和「五反」（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其中除「五反」外，都同國民經濟調整有關。[128]但臨開會前，情況發生了變化。2月6日至9日，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開擴大會議，也讓各中央局一把手參加，為中央工作會議做準備。2月9日晚，毛又找周恩來談話，內容未見文件披露，但從背景和後續發展看，應是討論接下來的中央工作會議該怎麼開。[129]

2月11日，中央工作會議在由劉少奇主持下開始舉行，但其基調和周恩來先前設定的議題不一樣了，主題變為兩個，一是「五反運動」，一是國際上的反修鬥爭。2月25日，劉少奇在會上做了〈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主旨報告。[130]他拼命地想要跟上毛澤東的思想和腳步，但後來看，他無論說什麼或做什麼，還是跟不上。

毛澤東也參加了會議，成為會上當然的中心和主角。他講到湖南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河北保定地區搞四清（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的經驗，又引申開去，從國際上的反修轉到國內的反修。劉少奇講話時，毛插話道：「出不出修正主義，一種是可能，一種是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又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131]

會上，講到反修、四清、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時，周恩來沒有說什麼話。他的發言重點還是糧食和精簡問題，並強調：「不要只看過去兩年的成績，還要看今後五年，甚至於十年。」[132] 他這麼說，同毛定下的會議主調不相干，但也不相悖，應該是經過毛同意的。毛澤東固然要大搞階級鬥爭、反修防修，但經歷了大饑荒後，他已不像批「反冒進」時那樣，動不動就在周着力抓經濟、抓生產時給他上綱上線，搞得他什麼事也不能做。看來，毛沒有全然忘記幾年前從批「反冒進」到「大躍進」的教訓。這以後，直到1964年底，毛、周關係中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毛在大力鼓吹和推動「反修、防修」的同時，對周繼續大抓國民經濟的整頓和調整持某種放任的態度，時不時還講幾句贊成的話。即便到1965年後，這個局面也多少延續了下去，從四清、社教、再到文革，毛的「繼續革命」一路搞到「天下大亂」的地步，周恩來成為在國計民生領域撐在那裏「守攤子」的中流砥柱人物。這是後話了。

二月工作會議上，規定了1963年有兩個相互關聯的大任務：在國際上，要大張旗鼓地反修；在國內，要全力以赴地「防修」，所以要搞四清、五反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其實，新年剛過，中蘇大論戰就已經全面爆發，並不斷升級。二月會議定下調子後，國際上的反修鬥爭成為中共領導層反覆討論的問題，每討論一次，對蘇修批判的調子就升高一次；蘇聯方面也一再提高批判的聲調，還動員各國共產黨參與對中共的攻擊。整個國際共運嚴重分裂。7月初，鄧小平率團赴莫斯科與蘇共代表團會晤，雙方在國際共運總路線以及幾乎所有問題上都發生激辯，互不相讓。[133] 會晤的結果，正如毛澤東事先準備和預料的那樣，把中蘇兩黨關係帶到了全面破裂的邊緣。

在國際上「反修」不斷升級的同時，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四清、五反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在國內鋪展開來。5月2日至12日，毛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開會，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以後被稱為〈前十條〉，其中明確提出必須在農村普遍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34] 此時，毛關於社教運動的基本想法已開始成形。5月7日，他在一個批語裏寫道，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要點是：階級、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幹部參加生產勞動

這一套。會議期間，毛參加集體晚餐時舉杯祝酒：「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義根子乾杯！」[135]

周恩來是從5月10日開始才參加杭州會議，此時〈前十條〉文本已形成。他提了一條意見，要把「團結百分之九十幾」的幹部和群眾改為「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同意了。[136] 一字之差，打擊面之所及，全國恐怕就要少幾十萬、乃至幾百萬人。5月29日和6月13日，周恩來又在中央機關兩次做「一次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的長篇報告，把「五反」中「反官僚主義」這一條拿出來，着重講述。[137] 這些如果代表的是他試圖影響「四清」、「五反」運動走向的努力，那差不多就是他可以做到的極限了。

四清和社教運動納入「階級鬥爭」的軌道在各地鋪開後，運動也帶上了對敵鬥爭的色彩，各種過火行為也層出不窮。為控制這種局面，9月間，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制定了〈後十條〉，如周恩來先前所建議，其中明確提出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並對社教運動做了很多具體規定，以防止過分擴大打擊面。只是，像共和國歷史上迄至那時為止的歷次政治運動一樣，一旦運動的大潮湧起，「擴大化」幾乎是必然的趨勢，哪裏是這種文字上的規定可以限制的。更何況，百分之九十五是一個「虛數」，剩下的百分之五卻往往成為制定指標的依據。中國人口基數大，這會涉及很多人。

會上，周恩來也講階級鬥爭，但他最想講的，還是不要因大搞階級鬥爭而打亂了國民經濟調整和工農業生產的秩序。9月19日，他在會上發言時，抓住這一年出現的北澇南旱的情況說：國內現在遇到的困難，是考驗我們。形勢好了一些，就常常容易發生錯覺，以為很好了，很容易腦筋有點熱。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我們還相當落後，相當貧窮，好轉以後，要上去還需要時間，速度不能估計太快了。[138] 在政治上的「左傾」風勁吹的時候，一有機會，周恩來還是會把經濟穩步發展的問題擺到桌面上來。

九

1963年是多事的一年。二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收到了《中國青年》雜誌編輯部的一封信，報告說他們要發表一篇關於解放軍一名叫雷鋒的班長「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先進事跡的報道，請毛為他題詞，號

召廣大群眾和青少年向他學習。毛澤東讀過報道後，雷鋒的故事觸動了他思想中「創造共產主義新人」那根弦。於是，他揮毫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3月2日在《中國青年》上發表。

周恩來和其他一班黨的領導人得知此事後，立即跟上。3月6日，《解放軍報》刊登了周恩來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志。」同一天的報上，還發表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的題詞。

由此而開始的，是一場很快就席捲全中國的「學習雷鋒」運動，深入到了全社會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和細胞，尤其在青少年中產生了極為巨大的影響。它所開啟的，是一種公民標準全盤「道德化」的進程：在黨和國家巨大權力的支持和整個教育、輿論系統的推動下，以雷鋒為標竿和楷模，它為每一個公民（尤其是將成為未來公民的少年兒童）設置了一系列極為崇高的道德準則和規範，並要求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須尊崇。從廣義看，這其實也是毛澤東為文革這一場注定將捲入千千萬萬青少年的超常動員所作的又一準備。

1964年元旦，周恩來是在國外度過的。從1963年12月中旬起，在三個多月裏，他一個接一個地訪問了歐亞十四國。他出訪前，中央已於11月14日決定，將〈前十條〉和〈後十條〉同時下發全國城鄉。進入1964年後，以四清和社教運動的展開為中心，在毛澤東主導下和竭力推動下，中國國內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左傾之風吹得愈發強勁。與此同時，中蘇之間的大論戰也愈演愈烈。中共連續發表九篇長篇評論，全面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又不斷地強調在國內「防修」的重要性。1964年6月，他在中央會議上提出，要在中國「防修」，就必須高度重視培養合格的「無產階級接班人」的問題。[139] 當時聽到毛講這個話的人們，包括周恩來在內，恐怕還沒有認識到，在毛這個話的內在邏輯中，已經包含了通過文革打倒劉少奇這樣的「中國赫魯曉夫」，並讓真正的無產階級接班人把毛的革命大旗接過來再傳下去的命題。

6月，毛澤東又提出了一個新題目：要重視「三線」建設的問題，這又是一件周恩來不能不正面應對的大事。早在1963年初，隨着國民經濟逐

步恢復好轉，根據周的部署，李富春為首的計委領導小組開始了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準備工作。當時，中國還只是剛剛走出大饑荒的濃重陰影，李富春等搞三五計劃時，也把主要注意力放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上，「集中力量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140] 所有這些同周的想法完全合拍，也得到了周的全力支持。

到1964年，李富春等搞的三五計劃草案已經基本成形，情況卻發生了變化。4月25日，總參作戰部在一份報告中提出，國家經濟建設在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上問題很多，尤其表現在工業過於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且集中在沿海地區，容易受到襲擊，主要交通線及交通樞紐易遭轟炸破壞，水庫緊急洩水能力很小等等。[141] 這份報告立即被毛抓住了。5月11日，毛在聽取李富春等計委領導小組成員關於「三五」計劃的彙報時說：國民經濟有兩個拳頭、一個屁股。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要擺好。要使拳頭有力，屁股就要坐穩。[142] 毛是在批評李搞出的計劃屁股沒有坐穩，但這也是對周的一個警號。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舉行工作會議，重點是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制定。5月27日，毛澤東在劉、周、鄧等出席的中央常委會上提出，在核時代，沒有後方不行。搞「三五計劃」要設一、二、三線的戰略佈局，「經濟建設從戰略上考慮，應該分三線，沿海是第一線，京廣路以西包括蘭州、包頭為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以防備敵人的入侵。毛還再次強調，不能把基礎工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屁股」給丟掉。[143]

毛澤東說了這番話後，劉少奇、周恩來等不能不當一回事，第二天就專門開會討論。周在發言中明確表示，要按照毛的意見把三線建設提上日程，並作為三五計劃的中心環節來抓。但同時，他又提出要對國家建設的佈局有一個通盤和長遠的考慮。「要看到第三線，還要看到一、二線；要看到軍事，還要看到政治、經濟、文化。」在制定「三五」計劃時，「我們要建立三線觀點，同時又必須懂得一、二線怎麼佈局」。[144] 很明顯，周恩來還是想搞平衡，不使三線建設搞亂國民經濟的整個佈局。

6月8日，在毛澤東提出三線建設的同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又大談特談要防止在中國出修正主義。周恩來說了一句，他讀材料時發現，「下面被敵人掌權的不少」。毛馬上以聳人聽聞的口氣說：「我看我們

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掌握在敵人手裏。」[145] 周恩來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一樣，只能和着毛的拍子說同樣的話。6月11日，劉少奇在會上做反修報告時，就順着毛的調子說：既然蘇聯搞了四十多年都可以出修正主義，列寧的黨可以變質，那麼中國共產黨是不是將來也要出？毛馬上跟進說：「注意就可以不出，如果不注意，準出。」又說：「出了也沒有大事，不過幾年、十幾年、幾十年又要走向反面。」[146]

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召集中央常委和大區第一書記開會，說他要談的是兩個「老問題」，「就是地方要搞軍事；還有，要搞接班人，我們這些人要搞接班人」。他大談了一番外敵可能從東南西北哪個方面入侵，以及地方應當如何準備及應對後，又講到「對搞陰謀詭計的人要注意」，隨後點了彭德懷、高崗、張聞天、饒漱石、黃克誠、周小舟、習仲勳、賈拓夫、譚政、鄧華、洪學智等人的名，並特別當着周恩來的面提起一件往事，「高崗給我談了兩小時，攻擊恩來同志，專談恩來不能做總理，要他做。這他（指總理）還不知道，剛才在車上說了才知道」。毛還說在一線，高崗的攻擊「集中少奇身上，集中安子文、彭真」。但在同一講話中，毛又突然蹦出一句話：「高崗，有人陰謀搞死他，……我想挽救他，答應他回延安去。」[147] 不知在座的劉少奇和周恩來聽到毛的這番話後會有何感受，畢竟他們都是當年高崗案的當事人和政治上的受益者。但劉少奇當時恐怕絕沒有想到，毛大講「反修防修」，其實是在為對他「發難」做鋪墊；毛大講「備戰」，則是為空前超常的社會和群眾動員做準備。劉少奇的回應，等於在政治上把自己也「套進去」了，為自己後來被當作「中國的赫魯曉夫」遭到「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的命運，打開了一扇理論上的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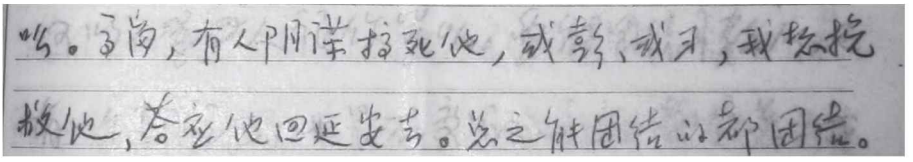


圖22.2：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和大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有人陰謀搞死他（高崗）」，1964年6月16日。（855-7-2840-3，河北省檔案館）

第23章

「中間地帶」的革命（1962–1965）

一

1963年新年過後幾天，周恩來收到了毛澤東書贈他的一首詞，是毛自己寫的：

>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欲學大鵬無大翼，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千萬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農踴躍揮長戟。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1]

周恩來和毛澤東相識共事幾十年，還從來沒有收到過毛親筆書贈的詩詞。這首詞似乎是講國際形勢，其實也是講國內情勢。尤其是「要掃除一切害人蟲」這句，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語境下，同文革開始後風行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有着高度的相通之處。在毛澤東的觀念世界裏，國際、國內均屬「天下」，是不可分割的。周恩來讀這首詞，若在字裏行間讀出毛對國內情勢的解讀乃至對黨內鬥爭的感受，也不足為奇。他當然會想到，毛澤東在此時把這麼一首詞送給他，絕不會沒有深意。

但從字面上看這首詞，毛澤東又確實是對國際形勢有感而發。在那個年代，美國無疑仍然是「新中國」的兇惡敵人。但同時，隨着毛「反修防修」大動作的展開，中蘇之間已與盟友關係漸行漸遠，越來越走向敵對。十幾年前，毛澤東在內戰時期講到世界大勢時提出了「中間地帶」的看法。1950年代中，他在討論國際問題時又用過這個概念。此後，他已有近十年

不用這個提法了。到1960年代初，隨着國內外局勢的變化，他再次對「中間地帶」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又把它拿了出來。只不過，「中間地帶」變成了「兩個中間地帶」。

早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國內形勢過去幾年是不好的，1959年、1960年，這兩年是低潮，因為我們辦錯了許多事」，但「國際形勢是很好的」。[2] 那麼，國際形勢怎麼個好法？周恩來在會上講出了毛澤東的想法：世界革命的中心正在轉向北京。[3] 不過，當時毛、周都沒有使用「中間地帶」或「兩個中間地帶」的說法。

1963年秋天，毛澤東經過對世界大勢的不斷思考，提出「中間地帶有兩個」。[4] 此後，他又幾次用了這個提法，並更明確地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也屬於第二個中間地帶。」他又說：「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5]

這時，毛澤東心中所想應該是要讓國內外情勢的發展交互影響，在「天下」掀起一波波「革命浪潮」，中國本為天下中心，必定會在其中扮演中心角色。他已將屆七旬，離「去見馬克思」的時日越來越近，他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再做幾件名垂宇宙的大事。

周恩來和毛澤東共事的幾十年裏，尤其是在毛狠批「反冒進」以來的這幾年裏，他曾有過多少風風雨雨的經歷。他對毛處處察言觀色，早已成為閱讀毛的心思的「行家裏手」。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才會說「馬列主義真理，世界革命運動的中心，的確已從莫斯科轉移到北京了」。[6] 拿到毛的〈滿江紅〉詞後，他在一系列內外講話中，又一再講到中國面臨着「四海翻騰」、「五洲震盪」的天下大勢，他關於國際大勢的思索，也時不時同國內形勢的變化聯結起來。中國國內政治急劇「左轉」之際，對外關係也進入了多事之秋。

二

周恩來知道，毛澤東講到「兩個中間地帶」時最看重的是第一中間地帶，也就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中，毛格外重視東南亞，尤其是印

度支那。這不僅是因為這一地區同中國相鄰，還因為革命火焰已開始在那裏燃燒，看上去形勢很不錯。更要緊的是，毛的直覺告訴他，革命與戰爭局面在緊靠中國的印度支那出現和擴散，勢必轉變為國內超常動員的一個重大的宣傳課題和動力源泉。對毛的這些想法，以周對毛的了解，當然能夠感受到。他的工作日曆上，東南亞和印度支那也出現得越來越頻繁了。

說起印度支那，周恩來很難沒有一種五味雜陳的感覺，此時，這甚至已是他心中的一處隱痛。1954年日內瓦協議得以達成，他是主要的推手，也成為他外交生涯中的一個「高光時刻」。他曾經希望協議不僅會帶來越南的統一，也會極大地改善中國南面的安全形勢。然而事與願違，美國沒有在日內瓦協議上簽字，之後又支持在越南南方建立起了親美反共的吳庭艷政權。到1956年，不僅日內瓦協議規定的越南全國公民投票未能舉行，甚至連留在南方的越盟人員也遭到了殘酷的鎮壓，越南的和平統一已變得遙遙無期。

面對這一變局，周恩來心中焉能不充滿感慨，卻又是萬般無奈。但同時，從中國當時的情勢和利益考慮出發，他的反應中依然透露出了一種極為現實的決策理性。1955年後，隨着越南舉行全民投票的前景越來越黯淡，南方革命者遭到的迫害和鎮壓也越來越慘烈，周恩來在代表中共和越南勞動黨領導人交換意見時一再提出，越南革命面臨的首要任務在於鞏固北方，而不是爭奪南方。1956年11月，周恩來首次訪問越南，在那裏待了四天。他在和胡志明、范文同等越南領導人的會談中強調：「南北統一是一個長期的鬥爭，通過自由普選統一的問題，可以作為一個政治口號，但不是行動的步驟。北方是人民民主的基地，必須大力鞏固北方，才能爭取南方，統一越南。」[7] 當時，儘管越南領導人並不見得心甘情願，但還是接受了周的意見。

然而，形勢比人強。在南方殘存的革命力量已幾近凋零的情況下，越南黨內「重啟南方革命」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1958年夏，越南勞動黨政治局正式就開展「南方革命」的問題徵求中共的意見。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共中央給出的書面建議是：越南革命所面臨的「最根本、最首要和最迫切的任務」仍應當是在北方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南方，「目前不可能實現革命變革，而只能採取長期埋伏，積蓄力量，聯繫群眾，等待時機

的方針」，「但形勢是會變化的，有利於統一越南的時機一定會到來」。[8] 不過，越南領導人這一次並沒有按照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的意見行事。那幾年，由於越南黨遵循中共的路子在北方搞土改遭遇重挫，中共在越南黨領導人心目中的威望已開始從高點下落。再加上，面對吳庭艷政府的嚴酷鎮壓，南方倖存的前越盟成員已開始點燃起了武裝反抗之火。1959年，在黎筍（Lê Duẩn）等來自南方的領導幹部的強力推動下，越南黨中央順應形勢的發展，做出了「重啟南方革命」的決定。[9] 之後，隨着北越對南越的各種滲透和介入逐步加強，越南南方的武裝鬥爭也從星星之火起始，不斷燃燒擴散開來。同時，一度如日中天的中蘇關係已出現裂痕，毛澤東也對推動世界革命表現出新的熱情，必定也會導致對越南南方革命態度的改變。

1960年5月上旬，周恩來再次訪問河內，他對越南「南方革命」的態度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在同胡志明、黎筍等越南領導人會談時說，在南方應當採取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相結合的靈活態度。在城市，一般地說是搞政治鬥爭，但最後要搞垮美吳集團，沒有武裝力量不行。但他同時強調，武裝鬥爭中也有政治鬥爭，即便在軍事鬥爭已難以避免的時候，仍然需要把政治鬥爭放在重要地位。「鬥爭是長期的，……鬥爭方法不要說死，要根據具體情況。」[10] 1961年6月，范文同訪問北京，毛澤東表示支持在越南南方開展武裝鬥爭，並稱讚道：「你們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來南方形勢比停戰以前好多了，地區也比那時大，……人民要革命，美國人有什麼辦法。」[11] 周恩來和范文同會談時，口氣也有變化。他一面表示「一定要解放南越」，一面又提出「策略上可以靈活，形式上可以多樣化」，「要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相結合，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相結合」。[12] 然而在實際的政策行動上，直到1962年，在中國本身經歷大饑荒嚴重衝擊的背景下，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並未對越黨在南方「重啟武裝鬥爭」表現出太大的熱情。儘管當時中越之間的關係極為密切，但中國除了加強對北方的經濟支援（包括在遭遇大饑荒時仍繼續向越南北方提供大量的糧食援助）、並將援助重點轉向重工業和大型交通運輸工程外，沒有馬上開始對越南的「南方革命」提供大規模的軍事援助。[13] 直到1962年5月，周恩來還在一次政府內部會議上說：「越南民主共和國並不去干涉南越，南越的鬥爭是南越人民的。」[14]

從1962年下半年起，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越南南方的武裝鬥爭發展迅速，漸成氣候。另一方面，八屆十中全會後，中國整個內外政策急劇「左」轉，再加上中蘇大論戰愈演愈烈，毛澤東爭奪國際共運盟主地位的意圖躍然於紙上，他對越南黨在南方開展武裝鬥爭也表現出了先前未曾有過的熱情，並開始在各種場合對1954年日內瓦協議提出批評，甚至承認，「我們犯了錯誤」；又承認：「在南越問題上我們也犯過錯誤，有一個時期我們曾勸你們只搞政治鬥爭不搞武裝鬥爭，你們是正確的。」[15] 這其實也是對周恩來的批評，畢竟日內瓦協議是周的得意之作，在南方以政治鬥爭為主也曾是他的主張。

1962年夏天，周恩來在北京接待了胡志明和負責在南方領導武裝鬥爭的越共南方局書記阮志清（Nguyễn Chí Thanh）。胡、阮提到，隨着南方革命的發展，美國使用空軍乃至地面部隊進行干預的可能性也不斷增加，甚至有可能冒險進攻北方。[16] 實際上，這也是周恩來一直擔心可能發生的情況。1954年日內瓦協定簽訂時，周的一個最重要的考慮，就是無論如何都



圖23.1：周恩來和胡志明在北京，1960年代初。（CPA Media Pte. Ltd. / Alamy Stock Photo）

要防止美國在印度支那的直接干預。如果越戰一再擴大，美國不僅直接捲入南越的戰爭，甚至進攻北越，中國應當如何處置？8月28日，周恩來會見范文同時說，南越的武裝鬥爭「是逼出來的」，南越同志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17] 周當時還表示，美國的動向值得嚴肅關注，但在中國是否會出手保衛北越上，他沒有做出承諾。這麼一件大事是要由毛拍板的。

毛澤東很快就出來講話了。10月5日，他在周恩來等的陪同下會見武元甲時表示：在南越有游擊戰爭，我們非常讚揚南越人民的鬥爭。毛承認，「過去幾年，對於帝國主義如何進攻的問題，我們想得不多，現在得想一想」。又說：「你們的情況，我看是好的，美國還不敢輕易下手，你們處在東南最前線，我們非常關心南越和老撾的情況，你們在那裏已經抓住了美國的一個『指頭』。」[18] 儘管如此，毛並沒有對越南北方做出明確的安全承諾。

毛澤東表態支持越南的「南方革命」後，從1963年初起，中國開始大大增加對越南的軍事及其他援助。當時，中國除大量進口糧食外，又開始從西方引進設備和技術、最需要用錢，這件事對負有總管財政支出責任的周恩來壓力極大。但是，北京仍逐步接近對越南北方做出安全承諾。3月，總參謀長羅瑞卿在訪問越南時，同越南領導人討論了「在敵人進攻北越時，中國如何援助越南，以及雙方如何配合作戰的問題」。[19] 5月，劉少奇訪問越南時，又當面告訴胡志明：我們同你們是站在一起的，打起仗來，你們可以把中國當作你們的後方。[20] 6月4日，毛澤東在武漢會見越南領導人黎筍、長征、阮志清等時說：「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相結合，只小打不大打。美帝和吳庭艷教育了我們。所以我們支持你們的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相結合的方針。」[21] 周恩來沒有參加這次會見，但毛批評的這些看法，都是他曾積極主張過的。他知道，這也是毛澤東又一次在給他敲警鐘。

周恩來馬上採取行動。1963年9月，他親自出面，把越南的胡志明、黎筍、阮志清，老撾的凱山．豐威漢（Kaysone Phomvihane）、富米．馮維希（Phūmī Vongvichit），以及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都秘密請到了中國廣東省從化，由他主持召開了一次會議，實際上是推進東南亞革命的戰略策劃會議。周在會上發表主旨講話時說：

> 東南亞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區之一，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插足很深，反動統治既薄弱又殘暴。但這裏的人民已經覺醒，而且富有鬥爭經驗，共產黨都有一定陣地，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有爭取革命領導權並把革命引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範例。東南亞革命的基本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反買辦資本主義，而要實現這一任務，首先要爭取群眾，擴大統一戰線；其次要深入農村，準備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再次是要加強黨的力量和對各方面的領導。東南亞各國共產黨要加強聯繫，互相支持。

在講到中國的態度時，周恩來保證：「中國作為東南亞革命運動的大後方，我們是責無旁貸，義不容辭，我們會以最大努力來支持東南亞各國的反帝鬥爭。」[22]

10月，老撾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凱山．豐威漢秘密訪問北京，毛澤東接見了他，表示中國將對老撾革命給予全力支持。凱山在同周恩來會談時，要求中國向老撾共產黨人的武裝鬥爭和根據地建設提供直接的援助。周同意了凱山提出的所有要求。[23]

三

進入1964年以後，越南南方的戰火越燃越旺，中蘇之間的大論戰也愈演愈烈。6月下旬，越南人民軍政治部主任文進勇(Văn Tiến Dũng)訪華，毛澤東會見他時說：「我們兩黨兩國要合作，共同對敵。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毛還明確表示：「如果美國冒險打到北越，中國軍隊就應該開過去。我們採用志願軍的形式好。可以說這是人民組織起來的，政府不管。你們是不是也可以組織志願軍開到南越去？可以說這是人民組織的，政府不管。」[24]當時，周恩來正準備訪問越南，參加中、越、老三黨領導人會談，毛的話為他定下了基調。

7月上旬，由中共中央提議，中國、越南、老撾三國共產黨領導人集結河內，又開了一次重要的戰略計劃會議，討論印度支那的革命形勢。[25]周恩來帶着外長陳毅、副外長伍修權、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等出席會談，越南方面來開會的有胡志明、黎筍、長征(Trường

Chinh）、范文同、武元甲、阮志清、黃文歡（Hoàng Văn Hoan）、文進勇等黨政軍領導人，老撾方面來的是凱山．豐威漢、蘇發努馮親王、富米．馮維希。[26] 三方領導人在分析形勢時都同意，美國正試圖把南越作為「進攻社會主義國家的基地」，也作為「特種戰爭」的試驗場。

周恩來在會上發言時再度強調：東南亞是世界矛盾最集中、鬥爭最尖銳、革命條件最成熟的地區。美國企圖把南越、老撾、泰國作為一條戰線，以「特種戰爭」來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美國對東南亞的侵略不會罷手，有可能強化「特種戰爭」，也有可能把「特種戰爭」擴大為局部戰爭，在南越和老撾直接出兵，轟炸或進攻北越。他保證，中國將增加對越南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不管美國採取哪一種辦法，中國「必將出面支持東南亞人民的鬥爭」。關於中國的應對之道，他說：「我們的鬥爭方針是，盡一切可能把戰爭限制在目前範圍內，同時積極準備應付第二種可能的情況。對第二種可能的方針是，美國走一步，中國走一步；美國出兵，中國也出兵。」周還說，要「爭取三五年或更長時間，在不斷勝利中解決問題」。[27]

中、越、老領導人河內會議後不到一個月，周恩來一直擔心美國干預的情況終於發生了。8月2日，美國海軍「馬多克斯」號在越南近海北部灣（亦稱東京灣）與越南魚雷艇發生交火，華盛頓迅速宣佈美國海軍遭遇了挑釁。兩天後，美方又宣稱，美艦再次遭到越南魚雷艇的襲擊。8月5日，美國空軍轟炸了越南北方的幾個重要目標。兩天後，美國國會通過〈東京灣決議案〉，授權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在越南使用武裝力量。

周恩來幾乎在第一時間就聽取了關於北部灣事件的彙報，並會同總參謀長羅瑞卿致電胡志明、范文同、文進勇，詢問事件的具體經過，要越方「查明情況，制訂適當對策，作好準備」。[28] 8月6日，周恩來通過越方的通報和中國軍事情報部門的彙報已經大致掌握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在會見朝鮮駐華大使朴世昌時說：「8月2日的東京灣衝突是真的，對雙方都是不期而遇。8月4日的所謂『衝突』，所謂越南艦艇攻擊美艦事件則根本沒有這回事，而是美國徹頭徹尾的捏造。」他分析說，「美國捏造這個虛構的『受到第二次攻擊事件』，目的就是為了要替8月5日擴大侵略到北越製造藉口」。談到約翰遜政府的動機時，周恩來列舉了六點：「第一，挽救它在

南越的失敗，進行蠱惑人心的報復。第二，試探盟國(包括附屬國)的反應。第三，試探越南的抵抗勢力。第四，試探中越關係和中國的反應。第五，試探社會主義陣營的反應。第六，取得在國內總統競選的優勢。」[29]

8月中旬，黎筍秘密訪問北京，就中越雙方對形勢的判斷及相關戰略同中國領導人溝通、協調。8月13日，他在北戴河見到毛澤東時當面向毛保證，8月2日在北部灣發生的第一次事件決不是由河內下令而發生的；毛也告訴黎筍，根據中方情報，8月4日發生的第二次事件並不是美國的「蓄意進攻」，而是由於對信息的誤判所造成。毛又說：「看來美國人不要打仗，你們也不要打仗，我們也不一定要打仗。既然三方都不要打仗，仗打不起來。」當越方一成員提到「敵人現在正發出進攻北方的叫囂」時，毛說：「如果美國進攻北方，他們要記住，中國人是生了腿的，腿是用來走路的。」他還向黎筍保證，中國將採取一些看得見的行動來表明對越南的支持，其中包括公開地將空軍的一個師和空降部隊的一個師調往昆明和思茅，以兩個高炮師入駐昆明和南寧，同時集結30萬至50萬部隊於靠近中越邊境的南方各省份。[30]

10月5日，毛澤東又在北京會見了來訪的越南總理范文同。談話中，范文同告訴毛澤東，河內將會盡一切努力使戰爭保持在「特種戰爭」的範圍內，並盡可能地不「刺激」美國人。毛一方面鼓勵越南同志全力打垮西貢政權，一方面又同意越南方面應盡力避免同美國軍隊發生正面衝突。毛、范兩人沒有涉及如果美國冒險入侵北方的話，中國應採取何種應對措施的問題。[31] 周恩來連續同范會談，並把關注重點放在毛所說的「全力打垮西貢政權」上。1965年1月下旬，他在會見越南軍事代表團時提議，到1965年底以前，越南方面應該爭取「集中主力」對敵人在南方的「戰略村」發起總攻擊，他還樂觀地估計，這種攻擊同西貢政權的「政治崩潰」結合在一起，可能會使勝利「比我們原來的預想來得更早些」。[32]

然而，在僅僅一個月之後，正值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訪問南越之際，越共採取了襲擊美軍波來古空軍基地的「刺激」行動。華盛頓方面反應強烈，約翰遜總統除決定實行大規模持續轟炸北方的「滾雷行動」外，又開始向南方派送大批美軍作戰部隊。越南戰爭迅速升級了。

四

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來說，「中間地帶」最重要的部分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這裏的一個大背景是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世界範圍的非殖民化進程發展迅速，一系列亞非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用周恩來的話來說，這裏的人民「已經覺醒起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33]

讓毛、周感到意外的特大驚喜是在拉美，古巴革命獲得了勝利。本來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領導的古巴革命發生時，毛、周等對它的興趣並不太大，了解也不多。1959年卡斯特羅在古巴掌權之初，他們仍未對古巴給予太多的注意，但情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卡斯特羅執政後，在古巴實行了一系列激進的政治與社會革命措施，在對外政策上，採取了反對並挑戰美帝國主義的立場，並成為拉美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國家。1960年11月，格瓦拉（Che Guevara）率領古巴革命政府經濟代表團訪華，周恩來負責接待他，並陪同他見了毛澤東。毛稱讚古巴革命的勝利「影響了拉丁美洲，甚至亞洲、非洲」，又問古巴的做法「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有沒有可能性」。格瓦拉說：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古巴的革命是趁着帝國主義麻痺的時候取得勝利的，帝國主義沒有集中力量對付我們」。[34] 周在會見格瓦拉時表示，「去年我們遇到了很大災荒」，但「只要友好國家比我們困難更大，我們一定盡力支援」。[35] 格瓦拉訪華後，中、古關係發展極為迅速。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毛更開始把古巴視為反帝和反修的一面旗幟。只是，中國同古巴相距遙遠，鞭長莫及，對於卡斯特羅來說，蘇聯的援助更為重要，甚至達到了「性命交關」的地步。毛卻為古巴的對外政策強行定性，要卡斯特羅「反帝必須反修」，這對卡斯特羅來說是一種「強加於人」的行為。就在中古關係似乎達到最高潮的時候，卻已為此後的發展留下了不可抹去的陰影。1965年後，隨着卡斯特羅對中國的「反修」做法不斷提出異議，北京開始批判古巴的「修正主義」錯誤，兩國關係一落千丈，到文革中更是一度達到了幾乎「老死不相往來」的地步。

在亞洲，除印度支那以外，毛澤東、周恩來給予高度重視的，是印尼和「新興力量」運動的興起，這也成為周着力最多的另一個亞洲國家。印尼是第一批同新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1955年，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

蘇加諾總統此後訪華，以及周以否定「雙重國籍」來處理這個曾使得蘇加諾總統和印尼政府頗受困擾的問題，為兩國關係開闢了穩定發展的前景。1958年，印尼中蘇門答臘等地發生武裝叛亂，蘇加諾派出軍購代表團秘密訪華，毛、周分別致信蘇加諾和印尼總理朱安達(Djuanda)，表示「堅決支持你們的正義鬥爭」。隨後，中國無償向印尼提供價值約2,000萬美元的武器裝備援助。[36] 1960年代初，印尼為收復荷蘭佔領下的西伊里安，向中國尋求支持和援助，周恩來一再向蘇加諾總統表示，中國支持印尼的立場。中國除繼續向印尼提供軍援外，還於1962年1月向印尼提供1.295億瑞士法郎的貸款。[37] 1958至1960年，印尼曾因華僑問題發生了一系列的排華風潮，周堅持對此「就事論事」地尋求解決之道，未使其影響到中國和印尼關係的全局。[38] 1961年底，蘇加諾因腎病日益嚴重，向周恩來求助；周親自安排派去由泌尿科專家吳階平醫生率領的醫療小組，為蘇加諾治療。臨行前，周接見吳階平等，要他們「團結印尼的左派，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盡一切可能為總統治療，也要多為群眾服務」。吳階平等到達雅加達後，以中西醫結合的方法為蘇加諾治療，使其病情大為緩解。[39]

1962年後，蘇加諾的政治立場急劇左轉，在國內和印尼共結盟，在國際上採取日益激進的反帝立場。他先後指令印尼退出國際奧委會，並由印尼主辦「新興力量運動會」；同時，對被他認為屬於「新殖民主義的產物」的馬來西亞採取對抗態度，並因馬來西亞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於1964年12月30日宣佈退出聯合國以示抗議，倡導反帝的「新興力量」運動。中國政府對蘇加諾的這些舉動均表示積極支持，中國與印尼之間的聯繫也突飛猛進。[40] 在一系列內部講話中，周恩來和他的幾位部下一再表示，印尼已經成為「亞洲革命風暴」的一個新「軸心」。1965年1月，印尼第一副總理兼外長蘇班德里約(Subandrio)訪華，周恩來親自出馬，攜外長陳毅和他連續會談，決定擴大雙方的政治、經濟貿易和技術、乃至軍事上的合作。[41] 當中國與印尼關係似乎達到最高潮的1965年9月底，印尼竟同時有四個高級代表團到中國訪問，毛澤東在和其中一個代表團談話時，甚至表示中國可以同印尼分享核技術。[42] 然而物極必反，那幾天正好是印尼「九三零事件」發生之時，也是中國和印尼關係全面逆轉倒退的開端。

周恩來的眼光還投向了新中國的影響還不大、甚至未曾觸及的「第一

中間地帶」中更為廣闊的其他地區，尤其是非洲。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發生後，周恩來很快就發現，不僅在西方國家，就是在亞非拉國家中，包括許多已同中國建交、對中國友好或至少是沒有敵意的國家，對印度表現出的同情遠超過對中國的同情。這一點，周恩來在同科倫坡六國（錫蘭、印尼、阿聯、加納、柬埔寨、緬甸）打交道的過程中，感受最為深刻。中印衝突停火後，錫蘭發起這六個國家出面，對中印分歧和衝突進行調停。儘管這六國沒有包括北京眼裏的「反動」國家，並都同中國保持着友好關係，但是它們又和印度一樣，都是前殖民地國家。在國家疆域問題上，它們既是殖民統治的受害者，又是殖民擴張所造成的現實的相關利益者。調停之初，它們或多或少地對印度表現出了更為同情甚至「偏袒」的態度，言語之間也都對中國多少有所指責。面對此情此景，周恩來把他的外交長才發揮到極致，反覆向六國領導人解釋中國的立場，尤其是中國何以提出「傳統習慣線」和「實際控制線」的概念及其歷史、法律和現實層面的相關性和重要意義，連一些基本史實也反覆講述。[43] 最後，六國領導人對於中印邊界爭端及邊界戰爭的來龍去脈似乎多了些許了解。這段經歷使得周恩來更加深切地感覺到，中國一定要主動擴展同亞、非國家之間的各種交往，以增進相互之間的了解。由此，他產生了對亞、非國家集中地做一次大規模出訪的念頭。

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3月1日，周恩來租用荷蘭航空公司「波羅的海」號專機，出訪亞非歐十四國，其中的重點是非洲。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他所從事的歷時最長、涉及國家最多的一次出訪。

出訪的第一站，是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即埃及）。周恩來的專機在仰光、卡拉奇短暫停留後，於12月14日抵達開羅。周選擇埃及為出訪非洲的第一站是有用意的，周在機場說：「這是我第一次訪問非洲大陸。」在埃及總統納賽爾的歡迎宴會上，他發言時回憶道：「1924年，當我從歐洲回國途經蘇伊士運河的時候，埃及剛剛擺脫保護國地位，幾乎整個非洲大陸還處在帝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四十年，在人類歷史上只是短暫的一瞬。但是，在這四十年間，世界大變了，中東大變了，非洲大變了。」[44]

周恩來在埃及停留的五天裏，同納賽爾總統舉行了三次會談。期間，

他做了一個大動作：宣佈中國支持阿拉伯各國的反帝和爭取及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支持它們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結盟政策。為呼應納賽爾實現阿拉伯「統一」的目標，周還表示支持阿拉伯國家用自己的方式實現團結和統一。[45] 他花了相當時間解釋中美關係，指責美國是「中美兩國關係不好」的責任方，「在靠近新中國的地方，製造台灣海峽、南朝鮮和印度支那三個緊張地區，實行反華」。「有人說中國好戰、擴張，這是毫無根據的」，中國無一兵一卒在國外，美國卻有百萬大軍駐紮海外，「中國受到美國的包圍和敵視」，才「不得不反美」。然而，「我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美之間並無武裝衝突」。[46] 周恩來和納賽爾還討論了中印邊界爭端問題。周說：「目前是太平無事，…… 如印度不再進入我方的實際控制線，雙方不會發生衝突。」[47] 訪問期間，二人還商定，由中國向埃及提供經濟援助貸款。翌年12月，兩國據此簽訂經濟合作協定，中國將為埃及提供3.45億瑞士法郎的無息貸款，用於購買成套和單項設備及原材料，10年還清。[48]

12月21日，周恩來由開羅飛抵阿爾及爾，開始了他非洲之行的另一場「重頭戲」。在他眼裏，阿爾及利亞同奉行不結盟政策的阿聯不一樣，除了在反帝、反殖上的立場更為堅定外，內外政策也具有更為強烈的社會主義色彩。他在抵達阿爾及爾的講話中，把阿爾及利亞革命的勝利稱為「繼中國革命和古巴革命後，60年代的偉大事件，也可以說是奇跡」。[49] 他在阿爾及利亞的六天裏，和總統本．貝拉(Ahmed Ben Bella)舉行了四次會談，並由後來長期主政阿爾及利亞的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布邁丁(Houari Boumediene)陪同，到各地訪問。本．貝拉曾一再表示，要在阿爾及利亞肅清帝國主義影響，搞社會主義。周恩來同他談話時對之大加稱讚，但同時又建議他不要走得太急，「要肅清一切帝國主義勢力，但在策略和方法上，要避免多方面作戰，原則性和靈活性要很好地結合起來」。[50] 像會見納賽爾時一樣，周還介紹了中美關係的情況。他說：「中美問題要解決，有兩個原則：(1)根據五項原則達成協議；(2)美國原則上同意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 至於美國會不會對中國發動戰爭？我看危險是有的，但是否馬上打，挑起第三次大戰，這種可能性不大。原因是，美國如果在中國開闢戰場，它在其他地方就要大大削弱，而它目前的主要矛盾還是在歐洲。」[51]

周恩來離開阿爾及爾後，於12月27日至31日訪問了摩洛哥。他的主

要目的，除加強中摩關係以及與國王哈桑二世（Hassan II）的個人聯繫外，是「考察和學習北非的石油工業」。因此，他特地參觀了由法國和意大利幫助建設的煉油廠。[52] 之後，他在給中央的一份專題報告中提出，阿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家用外援興建或接管的新工業，都採用現代化設備，特點是投資少，設備新，自動化程度大，收效快，用的勞動力少，這對於我們進口工業設備和進行援外工作，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53]

五

1964年新年前夕，周恩來飛越地中海，訪問他這次出訪中唯一的歐洲國家阿爾巴尼亞。這是他代表毛澤東和中共，在中蘇論戰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做出一個大姿態。當時，阿爾巴尼亞在中蘇論戰中堅決站在中共一邊，中阿關係正處在驕陽似火、熱度節節上升的時期。周走這一趟，可以說是專門為毛澤東去的。短短幾天裏，周和霍查（Enver Hoxha）等阿方領導人舉行了七次會談，是他整個出訪期間會談安排得最為密集的一段。他和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談話的重點是共同聲討赫魯曉夫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霍查不僅處處附和周，甚至往往比周講得還要激動，同時把中阿關係說成「血肉般緊密」。[54] 所有這些也為會談的另一部分做了鋪墊，霍查「獅子大開口」，向周提出了一系列的援助要求。周早有準備，本來就帶來了一個空前的「大禮包」，幾乎滿足了阿方的全部要求。由此而產生的，是20世紀世界歷史上最不平衡的一種同盟關係，只有兩百萬人口的阿爾巴尼亞，按人口比例來說，從中國這個依然貧窮落後的大國那裏得到了世界上最多、最慷慨的援助。但是「好景」並不長久，只持續了十來年。1970年代初，中美關係出現緩和，地拉那便開始和北京反目，甚至搞得周恩來十分難堪。周逝世後的第三年，中阿關係全面破裂。中國多年給阿爾巴尼亞累計近100億元的援助，到頭來統統打了水漂。[55]

這一切，首先是毛澤東要做的，也使得遠未擺脫貧困的中國背上了沉重的「外援」負擔。即便以周恩來之涵養，有時也免不了捲入和「兄弟國家」代表唇槍舌劍的論辯之中。1965年5月21日，他在陪同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科列加（Spiro Koleka）去大寨訪問的飛機上有一段對話，就很能說明問題：

科：我們國家有種植煙草的悠久歷史，目前又建立了捲煙工業。因此，煙草在我們國家是必須種植，而香煙又必須出口的。這方面中國同志過去和現在都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周：中國人不習慣吸阿爾巴尼亞的香煙，進口的煙都堆在倉庫裏賣不掉。

科：中國國家大，有七億人口，有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等於整個歐洲。我們每年向中國出口的煙草的數量不大，才幾千噸；我們每年還要向其他國家出口幾萬噸。捷克、德國、波蘭進口量小，保加利亞還出口煙葉，意大利、南斯拉夫等資本主義國家，只進口自己必須的東西。所以我們的香煙不向中國出口又向那裏出口呢？

周：你這樣談不對。不能一開口就把國家大、人口多擺出來。從原則上說，貿易上只進口自己需要的東西。大國有大國的困難。你們不能強加給我們。我很希望你們三個人中有一位能長期住在這裏，作總理的顧問，我每天把我國的困難情況向你報告一次。

科：我們不是強加給你們。我們兩個國家的奮鬥目標都是為了增加出口，增加收入。我們不能在經濟上長期依賴別人，總是要貸款。

周：貸款可以推遲還，也可以不還。我們寧可給你們貸款，也不要香煙。中國人不習慣吸阿爾巴尼亞的香煙，如果改種中國煙草，那情況就不一樣了。

科：可以種中國煙草。

……

周：我到阿爾巴尼亞時看到，你們的生活水平比我們高。

科：你們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改善吶！比解放以前提高了很多。

周：有改善，但從全國水平來看，大多數人的生活改善得不多。

科：我們是在歐洲，是社會主義的代表者。總理上次訪阿爾巴尼亞時曾說過，阿爾巴尼亞應當與眾不同。我們不能跟中國比，我們要向高的比，不能向低的比，不能後退。

周：希望你們也聽聽我們的意見。我的話你們根本不聽，聽不進去！你們不考慮我們的意見麼！我跟你們說過，我們在備戰，支援越南，你們不相信我們麼！你們純粹是主觀主義地在想像。你們今天到大寨去看看，我們的人民是怎樣生活的。我們的援外任務不斷增加。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要援助，要都像阿爾巴尼亞怎麼行！[56]

科：中国国家大，有七亿人口，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等于整个欧洲。我们每年向中国出口的烟草的数量不大，才几千吨；我们每年还要向其他国家出口几万吨。捷克、德国、波兰进口量小，保加利亚还出口烟叶，意大利、南斯拉夫等资本主义国家，只进口自己必须的东西。所以我们的香烟不向中国出口又向那里出口呢！

周：你这样谈不对。不能一开口就把国家大、人口多摆出来。从原则上说，贸易上只进口自己需要的东西。大国有大国的困难。你们不能強加給我们。我很希望你们三个人中有一位能长期住在这里，作总理的顾问，我每天把我国的困难情况向你报告一次。

科：我们不是強加給你们。我们两个国家的奋斗目标都是为了增加出口，增加收入。我们不能在经济上长期依赖别人，总是要贷款。

周：贷款可以推迟还，也可以不还。我们宁可給你们贷款，也不要香烟。中国人不习慣吸阿尔巴尼亚的香烟，如果改种中国烟草，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科：可以种中国烟草。

三、天然沥青问题

周：中国沒有使用天然沥青的經驗，而且天然沥青都

— 3 —

圖 23.2：周恩來與阿爾巴尼亞政府經濟代表團團長科列加談話記錄，1965年5月21日。（109-04013-01，外交部檔案館）

但到頭來，周恩來依然同意了阿爾巴尼亞絕大多數的援助要求，包括決定「部分接受」阿方要求，從阿爾巴尼亞進口煙葉和捲煙各7,500噸。[57]諸如此類的談話和經歷，在周恩來的總理生涯中不知有過多少次。只不過，僅僅幾年之後，在這一刻看來仍是「堅如磐石」的中阿友誼幾乎在歷史的一瞬之間就轟然倒塌了。周恩來和科列加的上面這段對話，恐怕就是當時其中一個並未引起人們注意的「不祥預兆」吧。

六

離開地拉那後，周恩來飛往突尼斯。這是他在到達非洲後才臨時增加的一站。在那裏，他和布爾吉巴(al-Habīb Būrqībah)總統簽訂了中國和突尼斯建交的公報。在他的預定日程上，下一站應該是加納。但就在他啟程前往加納前，卻收到了加納總統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遇刺未遂的消息。一時之間，當地的安全形勢不明朗，恩克魯瑪本人已經入駐奧蘇城堡。周是否還要按照原計劃訪問加納？他的助手們，尤其是幾位負責安全事務的官員，都竭力主張周不可前往。然而，周卻認為「我們不能因為人家遇到暫時的困難就取消訪問」，仍決定如期訪問。他同時還拍板，「打破通常的禮賓慣例」，同恩克魯瑪的會談在其住處奧蘇城堡舉行。[58]周在加納的五天裏，同恩克魯瑪舉行了五次會談，包括兩次單獨會談。[59]1月15日，他在加納首都阿克拉上演了這次訪非的一幕重頭戲，提出中國政府在對外提供經濟技術援助「將嚴格遵守的八項原則」：根據平等互利原則提供援助，不視為單方面的贈與；嚴格尊重受援國主權，不附帶任何條件或要求任何特權；以無息或低息貸款提供經濟援助，減少受援國負擔；不造成受援國依賴，幫助受援國逐步自力更生；援助項目力求投資少、收效快；提供質量最好的設備和物資，質量和規格不符保證退還；提供技術援助時，保證做到受援國掌握該技術；到受援國工作的中國專家和當地專家享有同等待遇。[60]

此後，從1月16日起，周恩來訪問了位於西非的馬里和幾內亞。這兩個國家都對中國極為友好，其中幾內亞是撒哈拉以南最早承認並同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從周的角度來看，總統塞古．杜爾(Ahmed Sékou Touré)

更是亞非國家在中印邊界戰爭後發表「公平、合理的」主張的元首之一。[61] 這之後，周又轉往東北非，訪問了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里。2月5日，他從非洲回國，結束了歷時五十天的非洲之行。

本來，在周恩來的計劃中，還要去坦噶尼喀等幾個東非國家訪問。但由於這會使得周的整個出訪行程拖得太長，再加上坦噶尼喀於1月20日發生兵變，周取消了東非之行。但坦噶尼喀總統尼雷爾（Julius Kambarage Nyerere）並未忘記此事。1964年4月，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組成聯合共和國；6月，尼雷爾即派第二副總統卡瓦瓦（Rashidi Mfaume Kawawa）訪華，在同周恩來會談中提出了一系列援助要求。6月16日，周和卡瓦瓦簽訂兩國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中國將向坦桑尼亞提供1,000萬英鎊無息貸款，用於成套項目建設。[62] 但中國滿足的其實只是坦方的一個小要求，尼雷爾心中所想，是要中國為建設坦贊鐵路提供援助。12月29日，卡瓦瓦會見中國駐坦桑大使何英時說，尼雷爾希望訪華，當面同中國領導人商討由中國援建坦贊鐵路事宜。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件特大的事情，他同外交部、外經部和鐵道部領導人陳毅、方毅、呂正操等討論後得出結論：援建這麼一個大項目的效果和影響遠遠超過多搞一些中小項目，而且中國在財力和技術上也可以承擔。[63] 1965年2月，尼雷爾訪華，劉少奇、周恩來會見他時，他提出修建坦贊鐵路所需投資很大，但「對我們來說，這條鐵路很重要」，而西方大國和世界銀行都不願投資，他希望中國能考慮援建。劉當即表示「可以考慮」，周又補充說「我們了解它的重大意義」。劉又說：「帝國主義不幹的，我們幹。」第二天，周又陪同毛澤東會見尼雷爾，毛明確表示支持援建這條鐵路。[64] 但當時，雙方決定暫不公佈中國援建坦贊鐵路的消息。1965年6月，周恩來回訪坦桑尼亞，同尼雷爾會談後決定，會後即公佈中國同意援建坦贊鐵路的消息。周同時表示，支持尼雷爾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Kenneth David Kaunda）在英聯邦會議上再作努力，爭取西方發達國家援建這條鐵路。周對尼雷爾說：「西方國家果真能修，中國樂觀其成。」[65]

此後，尼雷爾和卡翁達爭取西方發達國家援助的最後努力仍然鎩羽而歸。1967年6月，中國已處於文革當中，卡翁達訪華，同周恩來會談並與毛澤東會見時提出：贊比亞是內陸國家，南羅得西亞想通過鐵路控制我

們，我們需要新的出海口。周對卡翁達說：我們願意幫助坦桑尼亞修，同時也願意幫助贊比亞修。[66] 9月5日，中、坦、贊三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關於中國援助修建坦贊鐵路的協定。鐵路的修建於1970年10月下旬正式開工，歷時六年，1976年7月建成通車。只是，這時周恩來已於半年多前逝世，未能見證這個他擔任總理期間中國最大的單一援外工程完成。

坦贊鐵路建成的頭幾年，由於南羅得西亞尚未獨立，贊比亞其他出海口均遭封閉，這條通往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港的鐵路成為贊比亞的唯一出海口，客貨運力還能得到較好的利用。但1980年南羅獨立、成為津巴布韋後，坦贊鐵路即出現了嚴重空置的情況，而年復一年，中國卻要承受起鐵路保養維護及補貼虧損的沉重負擔。[67] 周恩來若地下有靈，不知對此會作何感想？

周恩來在昆明、成都兩地休息了一個多星期後，2月14日又再次出國。他在訪問緬甸後，從2月18日起訪問巴基斯坦。這是他第二次訪問該國，但情況與七年前已大不相同。雖然那時中巴已經建交，但中國當時同巴基斯坦的宿敵印度的關係如日中天，而巴基斯坦本身又是與中國處於敵對狀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和中央條約組織的成員。時過境遷，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後，中巴關係迅速改善。周這次訪巴期間，和總統阿尤布．汗(Muhammad Ayub Khan)連續舉行會談。阿尤布特別提到，巴中之間「事實上不僅沒有發生任何戰爭和爭端」，而且「最近的事態發展表明，我們正向着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人民的意志所指的方向前進」。周對阿尤布的用意心領神會，回應道，在中印邊界衝突上，「我們堅持和平談判，但不能放棄原則」，並表示很高興看到「巴基斯坦為維護自己的獨立主權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68] 在周和阿尤布簽署的聯合公報中，兩人表示希望「克什米爾爭端能夠像印度和巴基斯坦向克什米爾人民所保證的那樣，按照克什米爾人民的願望獲得解決」。[69] 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做出這樣的「親巴」表態。從這裏開始的是中巴之間雖未正式結盟、但勝似盟友的關係，一直延續至今。

2月26日，周恩來在東巴基斯坦首府達卡和從國內飛來的國家副主席宋慶齡會合，二人一道訪問了錫蘭。當時，中印邊界衝突已經過去一年

多了，但由於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是科倫坡六國調停的發起人，周恩來同她的談話中仍花費了大量精力解釋中方的立場。他說，「我們已經從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在20公里地區裏，僅設了幾個民政點，我們撤出後絕不會挑釁」，因此「中印邊界局勢客觀上已經和緩下來了」。他還表示，「如印軍前進，我們將採取措施讓科倫坡會議國家出來調解，而不會直接和印度衝突」，只有「六國宣佈調解無效，我將採取自衛措施」。周還稱讚了科倫坡六國的調停：「六國不僅在過去對和緩中印緊張局勢起過作用，而且今後還將起更大的作用。」[70]

3月1日上午，周恩來、宋慶齡坐專機回到昆明。3月30日和31日，周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報告了他出訪亞非歐十四國的情況。他強調，此行「進一步增進了中國同亞非國家的友好關係，從而有利於加強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大團結」。他又特別提到非洲變了，「今天的非洲，已經不是十九世紀末葉或者二十世紀初葉的非洲了，非洲已經成為一個覺醒的、戰鬥的、先進的大陸」；同時，「亞洲的民族民主革命正在深入發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干涉、顛覆和控制，已經成為亞洲反帝民族革命深入發展的一個鮮明標誌」。周提出，中國在國際上「要繼續支持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在國內「要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線上不斷取得新的成就」，才能「更好地盡自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71]

七

毛澤東大罵「中間地帶」的兩頭：美國和蘇聯。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他反美、批蘇，還大罵印度反動派。然而，對於處在「第二中間地帶」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卻表現出了「網開一面」的態度。其實，這正是毛作為大政治家厲害的地方。即便在他出於國內動員的需要，而使得中國的整個對外政策急劇「左轉」的時候，他仍然沒有忘掉「不要四面出擊」以及「利用矛盾」那一套。這一來，周恩來在這方面的運作及施展長才也有了發揮的空間。

周恩來最重視的是日本，這恰好也是毛澤東十分看重的國家。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講到日本時說：「日本還賣給我們化肥，賣給我們特殊

鋼，賣給我們農藥，還準備賣給我們生產維尼綸的世界第一流的設備。而社會主義國家不賣給我們。大概下個月他們的代表就要來了，叫高碕達之助，此人當過日本的貿易大臣。」[72]

毛澤東在這裏提到的高碕達之助，當時正要到中國來，同周恩來會談中日之間發展貿易關係的問題。他是日本的著名實業家，曾在中國東北興辦實業，戰後多次當選為日本自民黨眾議員，並曾任岸信介內閣的通商產業大臣。周恩來和他是老相識了，早在萬隆會議期間就曾和他見面談話，提及他對東北產業發展的貢獻，並邀請他在適當的時候訪華。[73] 1958年5月，日本發生了右翼分子在長崎損毀中國國旗的事件後，中日之間的經濟及文化往來幾近中斷。7月7日，國務院外事辦副主任廖承志根據周的指示，提出了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日本岸信介政府不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不製造兩個中國，不阻礙中日關係正常化。[74] 之後，高碕曾託人轉達口信給周，希望周幫助日本解決當時面臨的生漆原料供應困難的問題，其實是希望藉此促進中日聯繫的恢復。1960年6月岸信介卸任首相，池田勇人接任，表示要同中國大陸改善關係，尋求「進一步穩定、擴大日中貿易的辦法」。周恩來看到了恢復中日貿易關係的契機。8月27日，他會見日本日中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時，重申了中日政治三原則，並提出了中日貿易三原則：通過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三個渠道，促進中日貿易。[75] 同年10月，高碕訪華，周恩來於10月11日和12日連續兩天會見他，提出了中日互不敵對，日本不追隨美國、不搞「兩個中國」、不阻礙中日關係向着正常化發展等改善中日關係的「起碼三條件」。周又表示，日本雖是戰敗國，但戰後已經15年了，中國願意看到日本有它的自衛力量，但這同在美國操縱下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是兩回事，不能混淆。[76] 這之後，中日貿易關係及其他交往逐漸恢復。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的關於日本的那幾句話，給了周恩來又一柄「尚方寶劍」。當月，經池田勇人首相同意，日本自民黨顧問、眾議員松村謙三訪華。周恩來連續四天同他舉行會談，提出「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要向前看，向遠處看」；他同時又表示，「應該採取促進和漸進的辦法」，在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和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基礎上，改善和發展中日之間的政治與經濟關係。[77] 9月19日，中日雙方發表會談紀要，

決定由廖承志和高碕達之助負責，通過以貨易貨、綜合貿易、延期付款、長期合同等方式擴大中日貿易。10月下旬，高碕率領一個龐大的代表團訪華，逗留半個多月。周恩來親自參與和高碕的會談。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達之助簽署了中日民間貿易備忘錄。由於簽約人的姓氏分別為「廖」(Liao)和「高碕」(Takasaki)，備忘錄也被命名為「廖高貿易」或「LT貿易」。

這之後，1950年代後期中斷的中日貿易全面恢復，中日貿易進入「LT貿易」階段。雙方各自在對方首都設立「廖承志辦事處」和「高碕事務所」。1963年6月，在周親自參與下並經毛澤東批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與日本簽訂了採用延期付款方式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的合同，用匯2,277萬美元。[78] 1963年，中日貿易恢復到了1956年的水平。兩年後，中日貿易額又達到了1963年水平的五倍多。[79]

1960年代，中國對外關係在「第二中間地帶」的最大突破，也是周恩來外交生涯中最為得意的一筆，發生在法國身上。1963年底，在周恩來直接掌控及運作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在周的外交生涯中，尤其是在1960年代，這是一件特大的事情。法國是第一個同新中國全面建交的西方主要大國，這件事在世界上影響極大，在大饑荒剛剛過去的中國國內也大大提振了民氣。

周恩來早年曾在法國生活，他作為共產黨人的革命生涯也在法國開始。1954年日內瓦協議的達成，可以說是他和法國總理孟戴斯－佛朗斯合作的傑作。這一段經歷，也使他親身體驗到法國和美國雖為盟國，但兩國之間的關係絕非鐵板一塊，並覺得是可以同法國政治家打交道的。1957年5月，在周的安排下，由中國外交學會出面，邀請剛剛卸職一年多的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Edgar Faure)以私人身分訪華。5月24日上午，周恩來在西花廳會見富爾夫婦時表示，法國要同中國建立完全的外交關係，關鍵是如何解決台灣問題，如果法國方面有困難，「我們可以等待，我們中國人懂得怎麼等待」。[80] 5月30日，周又陪同富爾夫婦見了毛澤東。毛說：「周總理已經跟你們說了，我們希望法國與中國建立完全的外交關係。中法兩國建立正常的友好關係，對雙方都有利。」他又說：「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完全獨立於蘇聯」，所以他不贊成使用「共產黨集團」這個詞。「法

國有着光輝的歷史」，在國際事務中「應該重新起到調和和調節的作用」。毛說這番話時，周在一旁頻頻點頭。[81]

只要播下了種子，總會有發芽的機會，中法關係也是如此。1958年，戴高樂出任法國總統後，周恩來對法國更為關注，尤其注意到戴高樂在「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方面採取的勇敢的步驟」。只是，由於中國支持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法關係一時無法突破。1962年7月阿爾及利亞獨立後，轉機終於到來了。1963年10月21日，富爾帶着戴高樂將軍給他的一封親筆信，又來到中國。這封信並非正式的授權書，但清楚地表明他是代表戴高樂前來商討建交事宜的。周恩來對這件事極為重視，得知富爾要來訪後，反覆考慮之下，決定由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出面邀請並接待富爾。但實際上，富爾來到中國後，不僅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接見了他，周本人也親自掌控他在中國的會談及行程，並多次親自和他會面商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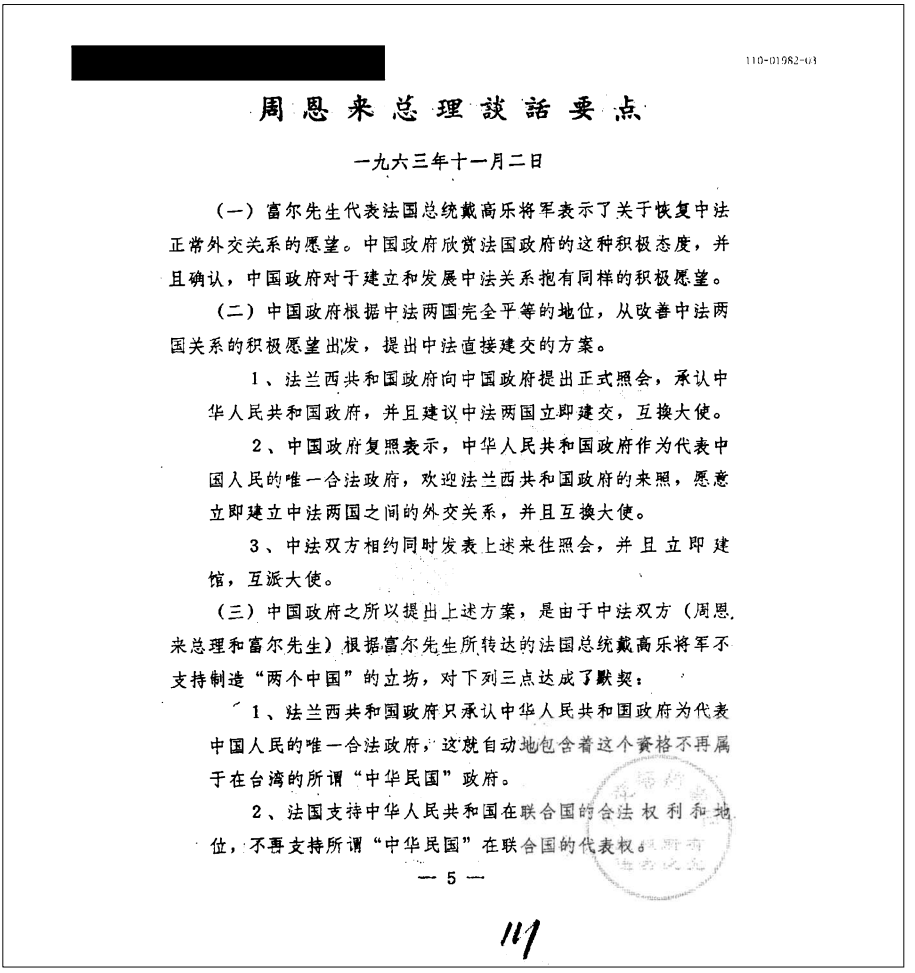
10月22日下午4時，富爾到達北京。第二天上午，周恩來即在西花廳會見他。周說：「現在世界上同中國的關係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不僅在國家關係上承認中國，而且在聯合國支持中國，可以交換大使。…… 第二種類型，英國、荷蘭建立半外交關係；第三種類型，像法國現在同中國的關係，由於台灣等困難，還未能建立正式關係。」周試探道，中法兩國「與其長期等待，不如促進關係，台灣問題解決以前不能建立外交關係交換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關係，如先設立貿易代表機構，半官方的、民間的都可以考慮」。周還明確表示：「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不會改變的，即使不叫『中華民國』或叫台灣政府也不能接受。」富爾當即回覆道，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將「排除英國式的解決辦法，如果我們要採取行動，那就交換大使，如果要發展經濟文化關係，我們可以研究最好的辦法，如派遣常駐機構，政府的或民間的」。會談顯示，雙方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如何處理法國與台灣斷交的問題。[82]

第二天，周恩來安排陳毅和富爾會談。陳反覆強調一個看法：中方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做法，除非法國斷絕和台灣的一切關係，中法就不可能正式建交。如果「你們目前驅逐蔣介石代表還有困難，那我們可以等待」。[83] 10月25日，周恩來再次會見富爾時，富爾提出了中法建交的三種設想：「法國政府正式宣佈承認中國政府，中國政府表示同意，即無條件

承認」;「法國表示願意承認中國，但中國提出接受承認的條件，即有條件承認」;「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認，但兩國形成特殊的局面，即延期承認」。富爾表示，希望中法兩國直接建立外交關係，並提出他的一種「個人的考慮」，以避免給人造成一方把自己的條件加之於另一方的印象。他提議，可以由法國聲明正式承認中國政府，「你們可以答覆說，很滿意法國的建議，同時認為，這種承認意味着同另一個共和國政府斷絕關係，這樣便不形成你方的一種條件，也不會有人說存在兩個中國」，而「你們在答覆中可以明確說，由於台灣島存在的事實情況，如果將來法國同另一個共和國發生任何聯繫，將被中國視為不友好的行動」，這樣「中國不是提出任何條件，也不是使法國丟臉」。周要富爾進一步澄清，法國政府只承認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而不是「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共和國」，以及建交後法國將和台灣斷絕關係。獲得富爾的肯定答覆後，周說雙方「事先要達成默契，確實只承認一個中國，無意將台灣搞成第二個中國或獨立國，這樣遲早能找到解決辦法」。[84]

周恩來知道，同法國建交的進程已經達到了關鍵時刻。這之後，富爾一面向戴高樂報告，一面由周安排專機去大同、雲岡等地參觀。臨行前，他做了一件看似出格的事：他把自己給戴的報告副本交給了中國外交部。[85]經過前幾天的談判後，周恩來和富爾之間已有了某種互信，富爾此舉又增加了周對他和戴高樂的信任。在富爾去外地並等待戴高樂回音的幾天裏，周反覆思考並經毛澤東批准後，做出了一個大決定：不堅持要法國先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然後中法才能建交。10月31日，他會同陳毅同富爾再次會談，提出了一個「積極地、有步驟地建交」的新方案之後，他摳住每一個細節與富爾反覆探討澄清。[86] 11月2日，周根據同富爾商討並親自做了字斟句酌的修改後，形成了一份以「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為題的書面稿，送交富爾：一、法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正式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建議中法立即建交、互換大使；二、中國政府覆照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歡迎法國政府來照，願意立即建交；三、中法雙方相約同時發表上述來往照會，並立即建館、互派大使。[87]這個方案的基礎，是周與富爾達成的三點默契：一、法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已自動包括這個資格不

再屬於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二、法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三、中法建交後，在台灣撤回駐法代表和機構的情況下，法國也相應地撤回駐台灣的外交機構及代表。富爾表示，他雖然未被授權簽署正式文件，但將攜此方案向戴高樂彙報，待戴做出決定後馬上通知中方。[88]



110-01982-03

周恩来总理談話要点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日

（一）富尔先生代表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表示了关于恢复中法正常外交关系的愿望。中国政府欣赏法国政府的这种积极态度，并且确认，中国政府对于建立和发展中法关系抱有同样的积极愿望。

（二）中国政府根据中法两国完全平等的地位，从改善中法两国关系的积极愿望出发，提出中法直接建交的方案。

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

3、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三）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上述方案，是由于中法双方（周恩来总理和富尔先生）根据富尔先生所转达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三点达成了默契：

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 5 —

111

圖23.3：周恩來關於中法建交的談話要點，1963年11月2日。
（110-01982-03，外交部檔案館）

富爾訪問中國後，還要「順訪」印度。周恩來決定派專機送他去印度。周最後一次同富爾見面時，反覆叮囑道，文件一定要保管好，「經過印度時要很注意，不僅印度人自己搞鬼，在印度，美國明的暗的特務到處都是」；富爾答道，「法國在印度的大使館有保險箱，我到印度就放在那裏」。周又說，「在戴高樂總統沒有知道之前不要洩露此事有好處」；富爾保證，「這一定可請放心，從法國說，不會透露的」。[89]

幾天後，周恩來得知戴高樂同意了富爾帶回的上述方案。12月12日，中法建交的後續談判在瑞士伯爾尼舉行。周委派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涉及的具體問題和法國外交部歐洲司司長雅克·德波馬歇(Jacques de Beaumarchais)舉行正式談判。李其實有雙重身分，同時是中央調查部和外交部的成員，而在北京把這兩方面的工作連接在一起的正是周恩來。過程中，李和德波馬歇在公報中是否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一句上發生歧見，德波馬歇表示，法國接受這一提法有困難。當時，周恩來正在阿爾及利亞訪問，李清泉飛往阿爾及爾面見周彙報情況，周當即指示李，只要法國實質上不堅持「兩個中國」的立場，而只是接受上述措辭有困難，中方可以同意在公報文字中刪去這一句，而在公報發表後對外發表自己的解釋，法方則以「以複述中方方案的方式對此加以確認」。[90]這樣，中法雙方就達成了建交的協議。1月27日，中法建交公報正式發表，其內容只有一句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為此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91]戴高樂信守了他對周恩來的承諾，法國政府於2月10日通知台灣，待北京外交人員抵達巴黎後，台灣外交機構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當天，台灣與法國斷交。這是周恩來在外交上取得的又一場「大勝」。

1960年代初，隨着中蘇關係破裂，中國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貿易額也急劇下降。這時，周恩來看到了另一個機會，即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日本發展貿易關係。在1960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與李富春、李先念組成的三人小組(周恩來稱之為「三人同盟」)，並建立對外貿易指揮部。[92]同時，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也要從先前適用於社會主義國際之間交換關係的「記帳貿易」轉為「現匯貿易」。此後，中

國對外貿易的結構開始改變。到1962年，蘇聯佔中國國際貿易的比重從1950年的50%左右下降到26.35%。[93] 1963年6月中國同日本簽訂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以及1964年1月中法建交，打破了多年來美國從技術上封鎖中國的缺口，也進一步打開了中國同西方國家貿易發展的門戶。周恩來舉一反三，把處理中日貿易問題和從日本引進先進技術的做法，運用到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上來。在他的直接領導下，1963年後，中國「又從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瑞典、意大利、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等國家進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儀器等方面的成套設備和技術，共84個項目」，總額超過22億美元。[94] 中國同西方國家的貿易也逐步取代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貿易，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體。到1965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到42.45億美元，比1962年的26.63億增長59%。中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出口總額在全國進出口總額中所佔的比重，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95] 中法建交後，在周恩來親自參與指導下，中國還先後同意大利和奧地利達成協議，在對方首都建立商務代表處。如果不是爆發文化大革命打斷了這一趨勢，中國同「第二中間地帶」國家的經濟、貿易乃至政治關係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恐怕不應該一直等到1970年代初，而是會來得更早些。

八

在中國對外關係中，讓周恩來頗費心思的還有中蘇關係，牽扯了他很大的精力。經歷了1961至1962年短暫的「回暖」後，從1962年下半年起，以中印邊界戰爭和古巴導彈危機為轉折點，中蘇關係又開始走向了持續惡化的道路，中蘇之間的大論戰愈演愈烈。雙方一篇接一篇地發表批判攻擊對方的大文章，你來我往，給對方扣上「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大帽子，「文仗」打得不可開交。中蘇之間的國家關係也出現了嚴重的滑坡，雙邊貿易急劇下降，技術合作和其他領域的各種交流活動也不斷被叫停。

周恩來沒有過深地捲入同蘇聯的大論戰。從1964年初起，他花費了大量精力，指導掌控中蘇之間的邊界談判。這件事關係到兩國之間的領土得失，雖然涉及的面積不大，但注定不好做。然而，經過三輪談判，雙方

按照國際慣例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劃分邊界的原則，除個別問題懸置外，已就東段邊界的具體走向達成協議。[96] 然而，這時毛澤東突然插了一槓。7月10日，他在接見日本社會黨的一個代表團時說：

> 蘇聯佔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就是同赫魯曉夫、布爾加寧提的，1954年他們在中國訪問的時候。……那個帳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帳。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群島，對我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97]

毛在發表這番言論前沒有同周恩來商量，因此周對此完全不知情。但他仍在7月19日和另一批日本社會黨人談話時表示，支持日本關於歸還領土的要求是中國的一貫政策和原則立場。[98] 毛澤東的談話被日本報紙報道後，掀起了軒然大波。蘇聯《真理報》發表長篇文章，駁斥毛的說法。[99] 赫魯曉夫也親自出面，指責毛「有領土野心」，目的是要「重新分配領土」。[100] 本來，在周恩來的掌控督導下，中國同蘇聯的邊界談判的「棋局」已經到了「收官」的時刻，離開達成協議只是咫尺之遙。但被毛這麼一「攪局」，蘇聯方面不幹了，邊界談判沒有取得任何成果，戛然而止。

這件事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產生了很大反響。10月6日，周恩來會見前來參加國慶15週年活動的羅馬尼亞部長會議主席毛雷爾時，專門花了很長時間就中蘇邊界談判破裂做了解釋，把責任全部推到蘇聯一邊。他告訴毛雷爾，中方在邊界談判中提出了三個原則和一些具體建議：第一，清朝和沙皇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不能說是不平等條約」，而19世紀中葉後沙皇強加於清朝的「是不平等條約」，但根據這些條約劃定的邊界，「我們不要求改變，也不提出領土要求」；第二，邊界談判以原有條約為基礎，雙方在劃線時互有取捨，進行調整；第三，邊界線勘定後，用一個新條約取代舊條約，原來的不平等條約就不存在了。但蘇方對此不同意，也不同意雙方先訂臨時協議，維持現狀。這樣怎麼談得下去？[101]

就在中蘇關係的前景為一片黑暗所籠罩時，10月15日，莫斯科發生了一場「宮廷政變」，擔任蘇共一把手達十年之久的赫魯曉夫黯然下台。中蘇關係的發展，一時之間似乎出現了轉機。

當天深夜，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緊急約見毛澤東，中共中央決定由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和他見面，契爾沃年科通報了赫魯曉夫辭職的消息。[102] 周恩來接到伍修權的報告後，第一反應是認為這是件「好事」，馬上轉報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並建議立即開會研究此事。[103] 第二天下午，毛主持中央常委開會時說，赫魯曉夫下台表示要變，但不可能很快就變，更不可能大幅度地變，變到什麼程度還得看一看。[104] 10月22日，中央常委再次開會討論此事時，周恩來和另幾位中共領導人都覺得可以「從正面寫文章，闡述我們的立場」，但毛澤東卻表示：「我主張冷一個時期，觀察一個時期。」他還半開玩笑半帶諷刺地對劉、鄧、周等常委說：「我是中間偏左，你們是左派。他們還是修正主義，但他們現在對美國有顧慮，需要中國這個朋友。」[105]

幾天後，中央常委再開會時，毛澤東的想法有了變化。他看到赫魯曉夫下台對各國共產黨的影響衝擊甚大，中共應抓住這個機會擴大在國際共運中的影響，因而在會上表示：「我們也應該採取行動，可以考慮主動向蘇共提出，我們派代表團去參加他們慶祝十月革命的活動。我們可以考慮這次派出由周總理當團長的黨政代表團去。」會後，毛又就此事同周商量，兩人決定要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去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節。[106]

中共領導層經過討論以及分析局勢後，決定派周恩來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7週年的紀念活動，並同蘇共新領導「就國際共運、中蘇關係以及其他雙方均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毛澤東提議，除由周恩來擔負這一使命外，並讓賀龍元帥「跟總理一起去」。毛給周定下的訪蘇基調是：對蘇共新領導要「一推二看，這個推也不想有多大作為，也不要期待他很快會有什麼大的變化，所以看還是很重要」。[107] 很明顯，毛對周的這次訪問能對已經掉入冰窟的中蘇關係起到何種緩和乃至改善的作用，從一開始就不抱什麼希望。對此，周恩來應該心知肚明。

但實際上，周恩來在這件事上的態度比毛澤東更為積極，他覺得應當嘗試「做工作，推動蘇聯的變化」。10月29日，周恩來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向他通報道：「中共中央決定派以我為首的黨政代表團去莫斯科，也就是說，是黨中央副主席、政府總理一級的。」周同時提出：蘇方能否利用十月革命節將至的機會，邀請包括阿爾巴尼亞在內的十二個社

會主義國家都派代表去莫斯科，以便進行接觸。他還告訴契爾沃年科：我們要把這個建議告訴兄弟國家，希望他們同意我們這樣做。[108]

當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朝鮮、越南、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古巴駐華使節（這五國都在國際共運中傾向中國或持中立態度），請他們向各自的黨中央轉達中共中央的建議：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派代表團赴蘇聯慶賀十月革命47週年，「最好是派總理級的人率團前往」，並藉此機會同蘇聯新領導人會談。他說：「蘇聯的情況是起了變化，這個變化不僅限於蘇聯，而且影響到兄弟國家、兄弟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影響到我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它的代理人。」周還表示，中國的態度是：「我們應該做些推動工作。這就是我們說的：它做的積極的事，我們應該支持。第二，我們推動他們向好的方向變化。第三，有些事情，需要等待看一看。」[109]第二天，周恩來又會見了民主德國、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波蘭、蒙古六國駐華大使，向他們轉達了中方的上述建議。[110]

10月31日，契爾沃年科緊急求見周恩來，帶來了蘇方的回應：「感謝中國這樣重視十月革命節」，並歡迎周訪蘇。周說：「這是個國際節日。這首先是你們的節日，但不僅僅是你們的節日。十月革命給我們開闢了道路。」[111]

11月5日，周恩來和副團長賀龍等一道，離開北京飛往莫斯科，同機前往的還有越南總理范文同。飛行途中，周、范兩人一路都在討論，到蘇聯後會受到怎樣的接待。周說：到莫斯科時，有可能柯西金（Alexei Kosygin）來接，這是最好的估計，也可能派一個部長會議副主席來接。[112]當日莫斯科時間下午6時15分，周恩來和范文同等抵達時，前來迎接的果然是柯西金，周看到後很高興。[113]

第二天，從上午11時10分開始，周恩來和賀龍等連續拜會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老朋友」米高揚。同勃列日涅夫談話時，周提出希望在慶祝十月革命47週年大會上講話，但勃列日涅夫「對此並不感興趣」。其實，這本來就是周的一種試探，勃列日涅夫的反應使他對此行的結果產生了某種不祥的預感。倒是在他和米高揚談話時，兩人涉及了實質問題。米高揚問：「是不是帶來了恢復我們之間關係到十年、十五年前那樣的計劃？」周答道：「我們的願望已經在我們的賀電中表達了。我們希望兩黨、

申请单号:081121015 复印日期:2008-11-21 15:16:33

64.10.30
109-02678-01
外交部档案
P.7-9
收字21
1964年11月3日

外交部絕密发电

发前 乔 已阅 批发 姬鹏飞

已发 莫斯科 外发(64) 特415号

等級 特提 附注

我派党政代表团去苏事

潘大使：

十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約見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向苏方提出了两个提議。第一个提議：我們拟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去苏祝賀十月革命节，順便同苏联党政負責同志进行接触。如果苏方有困难，我們的第二个提議是：欢迎苏联的負責同志到中国来，进行接触，不論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我們都欢迎。形式怎么对苏方有利就怎么办。如果这两个提議現在对苏方領导同志都有困难，那么我們愿意听听苏方建議。总理还說，我們賀电中曾表示，两党两国要在馬列主义、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結起来。为了达到团結，分歧要克服，关系要調整。所以我們要进行一些接触。事情要一步一步地作。

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再次約見苏大使提出

外交部开放档案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圖 23.4：周恩來同蘇聯大使契爾年科的談話，1964 年 10 月 29 日。
（109-02678-01，外交部檔案館）

兩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共同對敵，為我們的共同事業而鬥爭。正是根據這一目的，我們這次來訪，除了參加慶祝活動外，還希望進行接觸，互換意見。我們希望，這會為今後打下一個好的基礎。」[114]

11月7日晚，蘇共領導人舉行招待會。但就在宴會過程中，突然出事了。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也出席了宴會，一番痛飲之後已有些許醉意，見到賀龍元帥時說：「不要讓任何鬼來擾亂我們的關係，不要耍政治魔術，不要讓任何毛、任何赫魯曉夫再妨礙我們。」又說：「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而你們要把毛搞掉。」[115]

周恩來得知此事後，大驚失色。他知道，此事若處理不好將後患無窮。他馬上就招呼了賀龍，一起去見勃列日涅夫。「馬利諾夫斯基這麼講是嚴重的挑釁」，周說，「我們堅決不能同意。」周還質問道：「為什麼在這種友好的慶祝會上竟然發生這樣的事件？」勃列日涅夫大吃一驚，派人查問後，當即向周表示，這件事情不是我們中央的意見，馬利諾夫斯基不能代表我們中央，他喝醉酒了，酒後失言。勃列日涅夫並請周「不必介意」。周當即反駁道：這根本不是什麼酒後失言，而是酒後吐真言，說了他的心裏話。他要求蘇共中央就此道歉。[116]

當晚，周恩來同幾位翻譯核實情況後，連夜用加急密電向中央報告此事。第二天上午，周接到中央回電，要求他「採取攻勢」，對此事「抓住不放」，「絕口不提其他問題」。[117]

11月8日，周恩來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等蘇聯領導人回拜中共代表團時，一見面就又質問道：蘇共歡迎我們來的目的，是不是你們要當眾向我們挑釁？是不是期待中國黨也撤換毛澤東的領導？勃列日涅夫馬上解釋道：他也是事後得知此事的，感到不安和憤怒，馬利諾夫斯基不是主席團成員，所說的話絕不代表蘇共領導的看法，屬酒後失言，再加上翻譯也有錯誤。儘管勃列日涅夫一再表示道歉，周卻仍然不依不饒，反駁說：吃酒後胡說八道，這是不能作為解釋的。我們中國有句老話，「酒後吐真言」。他還說，這件事要向中共中央報告。[118]

從周恩來的強硬和不妥協態度中所表現出來的，是他對這一事件的政治含義的高度敏感。而他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不僅表現出他的政治信念，

還透露出他清楚地意識到任何在這個問題上的遲疑和怠慢，都可能給自己同毛澤東的關係帶來不利影響，甚至會為自己帶來政治上的滅頂之災。

從11月9日到12日，周連續同勃列日涅夫等蘇共領導人舉行會談。他一反平常的風格，自始至終擺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戰鬥風格」。最後，米高揚露出一句：「在同中國分歧的問題上，我們同赫魯曉夫沒有任何不同。」周當即說：「那我們還有什麼可談的？」[119] 12日，周同越南領導人黎筍會談時說：「通過這幾天的接觸，我們發現情況比原來預計的更壞。」[120]

即便如此，周在最後一次同勃列日涅夫等會見時，還是放出了一句話：「這次我們沒有能更廣泛地討論問題，但是我們兩黨協商的大門是開着的。」[121] 不過，周說這個話時心中應該很清楚，這麼一件大事不是他可以做主，而是要由毛澤東拍板的。

11月14日，周恩來回到北京，毛澤東親自率領幾乎所有中共領導人到機場迎接他。[122] 這其實是毛的一種表態，不僅是對周在莫斯科的「堅定表現」的一種「投桃報李」，而且也透露出他根本就沒有意思讓中蘇協商的大門繼續「打開」下去。

當天下午，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做了訪蘇的報告。蘇聯新領導人「根本談不清楚他們為什麼要把赫魯曉夫搞下台，……他們跟赫魯曉夫的分歧並不是什麼路線的分歧，可能只是對赫魯曉夫在某一些政策、某一些問題上所採取的方針，特別是對他的作風不滿」。[123] 中蘇關係一度曾出現的希望的前景，很快又變得黯淡下來。中蘇這兩個共產黨大國之間改善關係的最後機會就這樣失去了。中蘇邊界談判繼續擱置，中蘇關係也將走上全面破裂的不歸之路。

九

幾乎就在赫魯曉夫下台的同時，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這兩件事的發生並沒有必然的關聯，但對於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來說，卻都是大好事。

周恩來對中國核工業和核武器發展的重視由來已久。早在中共建政前，他就注意到這件事。1949年2月，中共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參加在巴黎

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他在審閱代表團成員名單時特別關照，要讓在法國學習核物理後回國的錢三強也參加代表團。當他接到報告，錢準備託自己在法國讀博時的導師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教授幫助訂購中型迴旋加速器的電磁鐵和其他儀器時，立即指示要大力支持，並批給了5萬美元外匯作為購買費用。[124]

1954年赫魯曉夫訪華時，在毛澤東示意下，周恩來對他說：「我們需要一個大的真傢伙！」他又比劃着做了一個原子彈爆炸的手勢，意思是要蘇聯幫助中國發展核技術和核武器。赫魯曉夫對此毫無準備，就說此事太花錢，要從長計議，又說「我們這個大家庭有個核保護傘就行了」，搪塞了過去。[125]

第二年初，中共領導層準備發展核工業。1月14日，周恩來和地質學家李四光、核物理學家錢三強談話，「詳細詢問了我國原子能科學研究的現狀、人員、設備以及鈾礦地質情況」。[126]第二天，由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書記處開會研究核工業發展問題，周約請李、錢帶上鈾礦探測儀器，在開會現場做模擬探礦演示。毛在會上說，發展原子能，「現在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幹，也一定能幹好！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麼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127]會議決定，中國要發展原子能事業。1月31日，周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講話，提出「我們一方面要反對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我們要掌握原子能。如果帝國主義敢於挑釁，那毀滅的將是他們自己」。[128]中央還決定成立由陳雲、聶榮臻、薄一波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指導原子能事業發展工作」。[129]

這之後，周恩來把主要重點放在爭取蘇聯提供專家、技術及其他相關支援上。為此，他多次親自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會談，討論蘇聯向中國派遣專家及提供援助的具體問題。[130]當時正是中蘇關係如日中天的時刻，蘇方也對支援中國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131]1957年6月，尤金面見周恩來時表示，蘇聯願意幫助中國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132]8月6日，周恩來致函布爾加寧，請求蘇聯在「進一步生產原子武器和它的投擲工具」上對中國「給予大力援助」。幾天後，布爾加寧向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表示「原則上無問題」。[133]8月25日，蘇方同意中國政府派代表團赴蘇討論「建立原子工業和生產原子武器、火箭武器及航空技術等問題」。[134]之後，聶榮臻率中

國代表團在莫斯科同蘇方的會談異常順利。10月15日，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將向中國轉讓原子能技術並提供原子彈樣品。[135] 1958年4月8日，周恩來致信赫魯曉夫，建議着手執行中蘇間原子能技術合作協定。4月24日，赫魯曉夫覆信周，同意周關於「為北京提供特別重要的資料及樣品的建議」。[136]

然而，僅僅幾個月後，隨着毛澤東在「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兩件事上對蘇聯發難，再加上毛澤東對台灣危機的處理又引起赫魯曉夫等的「嚴重不安」，蘇聯的態度開始改變。1959年6月，蘇聯通知中國，中止執行雙方關於原子能合作的協定。1960年7月16日，蘇方又宣佈召回在中國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中止執行援助中國建設核工業的協定及相關合同，並在撤走蘇聯專家時帶走了重要圖紙資料。[137] 當時，大躍進已經完全失敗，大饑荒正在中國的廣袤土地上吞噬着數以千萬計的生命，但中共領導層仍決意要搞原子彈。周恩來向二機部部長宋任窮、副部長劉杰傳達了中央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138]

做出上述決定後，中國領導人立即動員全國的各種資源，付諸實行。1961年7月16日，中共領導層做出了關於加強核工業發展的決定，號召全國為「完成原子能工業建設的任務」服務。[139] 為貫徹執行這個決定，周恩來決定在其他預算都大幅度削減時，一定要優先保證導彈和原子彈發展的資金和資源。[140] 8月12日，他又在國防科委北戴河工作會議上說：調整國民經濟要堅決退夠，「但是尖端要有，有了導彈、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導彈、核武器；如果我們沒有導彈、核武器，帝國主義就會使用導彈、核武器」。[141] 周在會上決定，在國務院設立國防工業口，由羅瑞卿負責，直接向他和中央彙報。11月29日，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正式成立。[142]

1962年下半年，中國核工業發展和核武器製造遇到了瓶頸，面臨一系列重大技術難關。10月30日，羅瑞卿向中央彙報，為了在1964年進行第一次原子彈爆炸試驗，有必要「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羅瑞卿向中央建議，由周恩來牽頭「抓總」，成立專門委員會，「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隨時檢查、督促計劃執行情況，並在必須的人力、物力上進行具體調度，及時解決在研究設計和建設中所遇到的問題」。[143] 11月3日，毛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144] 11月17日，

由周恩來親自出任主任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成立，[145] 其「主要任務是：組織有關方面大力協調，密切配合；督促檢查原子能工業發展規劃的制訂和執行情況；根據需要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及時進行調動。委員會決定，由有關方面堅決保證，貫徹執行」。[146] 專門委員會半個月開了三次會。12月4日的第三次會議，批准了〈1963、1964年原子武器、工業建設、生產計劃大綱〉。周提出「十六字方針」：實事求是，循序漸進，堅持不懈，戒驕戒躁。[147] 12月，中央軍委決定國防工業辦公室列入軍隊編制。

正當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全力以赴地推進中國核武器發展的計劃時，這又成為中蘇關係以及雙方論戰的一個焦點問題。1962年8月，莫斯科通知北京，美國政府建議，核大國承擔義務不把核武器及其技術情報轉交無核國家，無核國家也承擔義務不生產核武器或向核大國索取核武器及其情報技術，「蘇聯政府已給以肯定回答」。[148] 北京的反應幾近憤怒，指責莫斯科企圖「壟斷核技術」，並要求蘇聯「不要破壞中國主權，代替中國承擔義務」。[149] 1963年7月，美、蘇、英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中國政府於7月31日發表聲明，指控這個條約的歧視性質，其目的則在於「束縛別人的手腳」，而核大國「自己卻可以繼續製造、儲存和使用核武器」。[150] 11月9日，中共中央在致蘇共中央的一封公開信中宣稱：「越多的國家擁有原子彈，原子武器就越能被禁用。」[151]

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決定，要進一步加快原子彈建造的進程。1963年3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完成。7月，周提出不僅要爆炸一個核裝置，還要進一步解決核武器實用化的問題。年底，他進一步提出：「核武器的研究方向，應以導彈為主，空投彈為輔。」[152] 12月24日，在西北核武器試驗基地進行的原子彈綜合檢測試驗獲得成功。1964年1月14日，蘭州濃縮鈾廠生產出了合格的、可以作為原子彈裝料的高濃縮鈾產品。周恩來得知後表示祝賀，同時要求他們「堅持不懈地繼續完成今後各項任務」。[153]

進入4月，原子彈製造到了最後階段。4月11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專委會第八次會議，決定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採取塔爆方式，並於9月10日前做好試驗前的一切準備，做到「保響、保測、保安全，一次成功」。[154]

這之後，原子彈試驗的準備緊鑼密鼓地進行。6月6日，西北基地進行了一比一模型爆炸試驗；7月20日，原子彈開始最後組裝。8月中旬，根據周的部署，由68名專家及各級幹部組成的首次核試驗委員成立；8月19日，第一顆原子彈裝配組裝完畢。9月1日，舉行核試驗預演。

9月16日和1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第九次綜合會議。周在會上發言：關於核試驗時間，「我傾向於早試」，但具體時間要根據情況在「國慶前下決心」，再報請中央和毛決定。[155] 毛澤東同意周的意見，又說：原子彈是嚇人的東西，「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156]

9月2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報告了專委會關於首次核試驗的討論情況，提出決定試驗「時間以不遲於24日為好」；「如決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為最好，而事前準備時間至少需二十天」。毛當天即批覆：「已閱，擬即辦。」[157] 9月22日，中央常委在聽取周的報告後，決定早日試爆。翌日，周又召集賀龍、陳毅、張愛萍、劉杰等相關負責人開會，傳達了常委決定，講到「10月有四次好天氣，中旬可能趕上也可能趕不上，下旬還有一次」後，又特別指示「要把風向、放射性微塵飛散距離詳細計算，搞出資料」，還要有「嚴密的防空部署」，以及「絕對保守秘密」。[158]

10月11日凌晨，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等報告，張愛萍等已到達試驗現場，「現一切已準備好，……從10月15日到20日之間，由他們根據現場氣象情況決定起爆日期時間」。[159]

10月16日，試爆的一天到來了。下午3時，讀秒到零，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起爆，一團巨大的火球升起，逐漸「定格為一朵直塑在天地之間的蘑菇雲」。在現場指揮的張愛萍等了四分鐘，才以電話向周恩來報告：「成功了！」周沉默片刻後，問道：「是不是真的？」幾分鐘後，周又以電話傳達毛的指示：「要確定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國外不相信怎麼辦？」張當即問身旁的王淦昌：「總理問是不是真的核爆炸？」王答：「是核爆炸。」張隨即肯定地回答是真的，「爆炸後的火球已經變成蘑菇雲」。[160]

當晚，周恩來和毛澤東等一道，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大型音樂劇《東方紅》三千餘名演職人員時，宣佈「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時，他手舞足蹈，喜形於色。中國成了核大國，這對他來說，是否見證「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又一時刻？[161]

第24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1964–1966）

一

1964年將要過去時，中國政壇充斥着一種莫名的緊張。以周恩來的閱歷和政治上的敏感，他當然可以感覺到，正在到來的是中共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場大風暴。但這究竟會是一場怎樣的風暴，他卻不敢想像，恐怕在當時也難以想像。

進入12月，周恩來看到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之間一幕幕矛盾激化及表面化的場景。12月15日起，中央舉行工作會議。這一天的主要發言是劉少奇做的，講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劉說話時，毛幾次插話「嗆」他，分明表現出對他的不滿乃至不屑。劉問：農村「用不用新資產階級分子這個名字」？毛答道：「恐怕農民他不懂得什麼叫資本主義，你講投機倒把，講貪污盜竊，他懂得。」劉談到，運動中「可以不講清黨這個話，（不然的話）恐怕有大批黨員要清掉」。毛又頂他，說「我是贊成（清黨）的。我老早講過，總要搞出幾百萬。他們不像樣子，廣大群眾反對，這不是共產黨員嘛」。[1] 劉固然有自己的想法，但還是揣摩着、想順着毛的思路講話，但橫豎就是說不出毛想聽的話；毛澤東擺出的，是一副和劉少奇對着幹的面孔。

周恩來也在會上做了報告，主要講中蘇關係以及他率團訪蘇的情況。他說：勃列日涅夫執行的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我們要準備新的鬥爭」。講到國內問題時，他說了幾句冠冕堂皇的話：我們首先要把

自己的工作做好，把國內的工作基礎打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好，我們在世界上才更有力量。[2] 他沒有涉及毛、劉兩人在四清上的歧見，毛、劉之間言語不合出現尷尬場面時，他和會上其他人一樣，沒有介入。

12月20日，毛澤東宣佈中央工作會議暫停幾天，由中央常委開擴大會議。毛、劉之間圍繞着四清運動的性質問題，分歧愈發明顯。毛依然話中帶刺，夾帶着一股火氣。說到社教運動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劉少奇問：主要矛盾就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答非所問地說：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劉說：矛盾的性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頂他：什麼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麼性質？劉回應：總不是社會主義。毛說：是資本主義性質，還加個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搞個資本主義就差不多了。[3] 在毛看來，劉把運動的矛頭指向了一般幹部和群眾，而不是真正的當權派，方向錯了。周恩來坐在一旁沒有說話，恐怕也不知道該如何說話。

12月26日是毛澤東71歲生日，他讓江青和汪東興操辦，席開三桌，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請客吃飯。出席者名單是毛自己定的，應邀赴飯局的是三組人：一組是中央領導人，其中有周恩來(但沒有邀請鄧穎超)，劉少奇、鄧小平、李富春夫婦等；第二組是幾位地方諸侯，包括陶鑄夫婦，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等；第三組是各界先進模範人物，有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等。飯局的座席安排，可謂別具匠心。毛澤東讓錢、陳、董、邢等，再加上陶鑄、曾志夫婦，同他一道坐在主桌；劉、鄧、周和中央大員及地方諸侯們另坐兩桌。[4]

整個晚宴氣氛詭異緊張。毛澤東一開口就說：不能光吃飯，還要講講話！又說：有些人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之後是毛的一言堂。他嬉笑怒罵，指鹿為馬，「話特別多」。他講到社教運動中，有人說什麼「四清」和「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言語間，又把矛頭指向劉少奇。[5] 他還突然指着李富春的鼻子說：你們什麼事都不跟我講，你們搞獨立王國。[6] 思想上沒有準備的李富春全然不知所措，但毛的話並不完全是對着他說的，而是話中有話。毛說得最兇的一句話是：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據在場的薄一波描述，「席間鴉雀無聲」。[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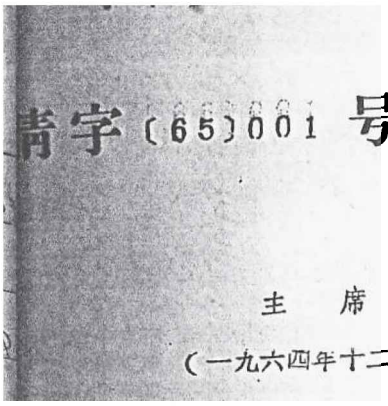
這晚，來自下面的科學家和勞模們不會懂得毛澤東的意思。但周恩來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都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知道毛說這些話的背景和底細。當毛說到李富春在計委搞獨立王國時，周聽來也一定心驚肉跳。畢竟，計委是由他的國務院管的，毛的這番話他必須認真對待。他這頓飯還能吃得好嗎？

毛澤東生日宴席上這一幕的兩天後，他又在政治局會議上演了另一齣「大戲」，當面對劉少奇、鄧小平發起了又一場攻勢。他有備而來，一走進會場就把兩本書放在桌上，一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另一本是《中共八大文件》，其中有《中國共產黨黨章》。毛發問：我是不是黨員？算不算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准不准許人家講幾句話？」他是在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說他們一個不讓他出席會議，一個不要他在會上講話，侵犯了他的公民和黨員的權利。他還要他們去看一下《憲法》和《黨章》，「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毛再次針對劉關於「四清」的提法，說什麼社教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等，統統不對。「運動的名稱就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四清教育運動，也不是什麼矛盾交叉的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8] 毛這麼做，實際上是在「點題」。

面對毛澤東的指責，劉少奇、鄧小平顯得極為尷尬，只能沉默不語。周恩來又是旁觀，毛發問：現在開的「這個會叫集會吧？不算呀」時，周只插了一句：「算集會。」會場的氣氛，一時間緊張到了極點。[9]

本來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央已經制定了一個關於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十七條〉，並準備於12月28日下發。毛澤東講話後，12月31日，中央辦公廳決定通知各地，〈十七條〉「停止下發，並自行銷毀」。[10]

其實，周恩來對毛澤東在政治上會有大動作以及這是否同自己有關，應該早在1964年初便已有所感覺了。3月，毛又想起了1941年寫的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九個文件、長達五萬多字的九篇文章。他找出這幾篇後，批示發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吳冷西，請他們「提意見，準備修改」。[11] 這幾個人當中除周恩來外，其他在整風運動中



青字〔65〕001 号

6 12 067

主 席 讲 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

請你們回去找党章看一下，找宪法看一下，党章看党員权利义务，宪法看民主自由。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頁到104頁，不要犯法，自己遵过，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八十五条、八十七条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集会、結社、言論、出版、遊行、示威的自由，我們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沒有这些自由。出版机关要整頓，許多掌握在坏人手里。我們不是在河北厅开会，算不算集会。要結社，就要把严重四不清的清出去，把支部整頓好，把公社整頓好。譚震林讲那么多集团，分得太細了，会脫离群众。遊行示威。我历来主张群众对官僚主义可以举行游行示威，五七年成都学生要到北京来請愿不准来，有人害怕；雅安、杭州有几个学校要上街游行示威被挡住了。我看不要挡。是反革命遊行示威就暴露了自己；

圖24.1：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12月28日下午。（101-12-120，福建省檔案館）

基本屬於「得利者」，而九篇文章中又有兩篇是專門批判周恩來的。毛澤東這番做法，不能不觸動周本來就已經越繃越緊的政治神經。

到了年末，毛澤東對周恩來另有新的「敲打」。11月26日，毛和劉、周、鄧、彭真等一道，聽取李富春和薄一波等去三線攀枝花地區考察回來後的報告。毛提出：三線要快上。之後，他話鋒一轉，講到了文化部，說「整個文化部都垮了」。然後，又提到了時任文化部常務副部長、並長期擔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的齊燕銘。他對周說：「齊燕銘不好，聽說他是你的秘書長？這個人不能當秘書長。你不如到解放軍找一個頭腦清楚的人。」[12] 周恩來豈能不懂，這是毛慣用的一種給他敲警鐘的方法？多年來，齊燕銘一直深受周的信任和重用。但現在毛既然發了話，周就不能再用他了。這次會後，齊便被免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職務。後來，他在文革中受到了整肅。4、5月間，周恩來總理辦公室正式撤銷。[13]

過了新年，毛澤東再次提起要對九篇文章進行修改，還寫了一段批語，其中有一段關於周恩來的文字：九篇文章中「提了總理的名字，也應該刪掉，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14] 毛的這段話令人尋味。它一方面表明，毛沒有準備將周當作下一輪黨內鬥爭的靶子；但另一方面，毛並沒有說周沒有錯誤，而只是說他正確比錯誤多很多。按照毛一貫的做法，只要有需要，隨時可以再把周的錯誤拿出來說事。這是毛澤東給周恩來上的一道「緊箍咒」。

說起來，當1965年到來時，周恩來本來是有理由鬆一口氣的：到1964年底，大躍進後受到重創的中國經濟和工農業生產，在經歷了1963年的全面恢復後，出現了明顯的增長，全國範圍的供應情況也大大改善。周知道「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中國經濟終於走出了大躍進後的嚴重困境和陰影。

下一步該怎麼走？12月下旬，就在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同時，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也召開了。周恩來將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他在會上做了政府工作報告，其中的一個亮點是，他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5]

周恩來的報告是經毛澤東看過並修改的，毛還在報告中加了兩段很長的話，一段是「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由此談到「在有階級的社會內，階級鬥爭不會完結」；另一段說：「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16] 這兩段話彰顯出了毛一貫的「高屋建瓴」的氣勢和風格。藉着中國眼前及長遠的發展目標這個話題，毛一面從正面為造成了災難性後果的「大躍進」辯護，一面又為他期望追索的「繼續革命」政治議程做鋪墊。這正是毛澤東厲害的地方，周恩來宣讀報告、唸到這幾段時，不知會作何感想？

周恩來的心中不可能平靜。1965年新年過後，中國高層政治中依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愈發呈現出一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在1964年底的那個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同劉少奇的直接對峙中輕易便佔得上風，劉又退讓一步，到年底，他主持制定的〈十七條〉停發。但是，毛「得理不讓人」，並沒有就此住手。1965年初，他親自出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一個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新文件，即〈二十三條〉。1月14日，他在文件定稿時，又批評了劉主持制訂的〈後十條〉：「1963年5月杭州會議寫的第一個十條，為什麼過了三個月，9月北京又搞出個十條，只有三個月，有那麼多經驗？！」毛還危言聳聽地說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指的是書記處和國家計委。[17]

〈二十三條〉定稿時，毛澤東親筆修改，加入了幾段對劉少奇「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提出嚴厲批評的話，說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麼社會裏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麼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裏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18]〈二十三條〉還明確提出：這次運動（已改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文件於1月14日由中央下發。之後，毛在會上說：「文件定了，這個會

可以不開了。這個會開了一個月，開了兩段，中間反覆了一次。我也放了一些炮，現在解決了。」[19]

〈二十三條〉中關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新提法，毛澤東在上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提出過，此時正式寫入文件，後來更為文化大革命所承繼，成為文革的中心任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三條〉出台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已經拉開了。[20]

二

中國國內政治局勢風雨詭秘之際，在南面的越南戰爭繼北部灣事件後又繼續大規模升級。2月7日，越共游擊隊襲擊了位於西貢外圍的波來古空軍基地。美國約翰遜政府立即出動空軍，對越南北方實施報復性轟炸，後來又轉為對北方實行大規模持續轟炸的「滾雷行動」，同時還向南方派出大批美國地面部隊直接參戰。

越南情勢惡化，使得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局勢越發緊張，也把一系列問題擺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及整個中共領導層面前：美國會不會把戰火擴大到越南北方？會不會進一步打到中國，把中國也捲進去？在這個毛澤東正把整個中國推往走向文革之路時，他如何看待越南戰爭升級帶給中國的巨大威脅和挑戰，又準備如何應對？後來看，毛澤東關於越南危機的應對設想，從一開始就有着國際和國內兩方面相互關聯的考慮。根據他的盤算，最理想的情況應該是既最大限度地保持由緊張的國際形勢對國內超常動員所造成的壓力，但又不使得國際局勢發展到失控的地步，導致中國像朝鮮戰爭時那樣捲入和美國的直接軍事對抗。毛澤東不怕打仗，但當他正要把中國引向文革的時候，恐怕並不想打仗，尤其是不想打大仗。

毛澤東遵循這一思路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同中蘇關係和國際共運有關。越戰升級的嚴峻情勢，也為處於分裂狀態的國際共運打開了在反帝旗幟下實現內部協調和整合的一扇門戶。1965年2月初，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訪問中國。這是蘇聯的主要領導人在赫魯曉夫下台後首次訪華。柯西金是蘇共領導層內的「溫和派」，他很想抓住在援越抗美上協調行動這個

題目，說服中共參加由蘇共發起、預定在1965年3月1日召開的共產黨國際會議，進而改善並發展中蘇關係。[21] 周恩來代表中方出面接待柯西金，2月4日和5日，他和柯西金密集地進行了四次會談，兩人商定，為改善中蘇關係，雙方要公開報道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15週年，進一步發展兩國貿易，完成拖延下來的蘇聯援華建設項目，執行好兩國間的文化協定和旅行協定，互派留學生。兩人還談到，雙方也要在援越抗美上協調行動，並在柯西金訪問河內後進一步討論援越的具體措施。但當柯西金提及希望中共參加3月共產黨協商會晤時，周恩來讓他碰了個釘子，一口回絕道，這次會議是根據蘇聯一個黨的意圖召開的，中共不會參加。[22]

2月6日，柯西金去了河內，同越南領導人會談。[23] 2月10日，他飛往朝鮮途經北京，停留一天。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柯西金，並在去賓館的路上舉行了兩人間的第五次會談。從會談記錄看，他們在中蘇協調援助越南上談得很不錯。兩人都同意，中蘇兩國應當動員世界輿論譴責美國對越南的侵略，這件事雙方「要在一起配合」、「共同來做」。他們還就蘇聯經由中國鐵路向越南運送武器裝備達成了協議，並約定第二天上午接着談，簽訂具體的協定。[24] 顯然，周恩來心底裏也希望看到中蘇關係獲得改善。

但到了第二天，形勢突變。周恩來沒有接着和柯西金會談，而是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一大幫中國領導人一道，陪同毛澤東會見柯西金。[25] 在這個由毛主導的場合，氣氛完全變了。毛澤東說話很多，周恩來偶爾插上幾句，劉少奇、鄧小平等其他在場的人幾乎只是陪坐。柯西金先說，蘇聯要無償向越南提供地空導彈、大炮、魚雷艇和其他一系列武器，還希望在援越上和中國同志一道配合行動，對此「越南同志也表示同意」。毛不接柯西金的話頭，反而說不僅要支援越南北方，還要看到越南南方才是焦點，但蘇聯對南方的支援太少。柯西金講到3月初要開共產黨國際會議，毛表態道，中共決不參加。柯西金又提出，中蘇兩黨應該停止公開論戰，為此可以舉行最高級別的會談。毛頂他說，「我贊成公開論戰」；還說，除非蘇共收回攻擊中共的公開信，取消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線，公開論戰要一萬年，少了不行。柯西金說，不要那麼久；毛說，「那就減少一千年，就剩下九千年，一讓步就是一千年，這是最大的讓步了」。會談的氣氛由開場時的輕鬆轉為緊張。周恩來不時插話，為毛幫腔。柯西金說，要盡一切力

量避免戰爭。周說，帝國主義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我們還得打。柯西金說，蘇聯支援越南比中國多。周反駁他道：難道我們支持少了？又說：你們支持印度反動派打中國，這是你們最大的痛處。[26] 柯西金哭笑不得，敗興而去。赫魯曉夫下台後中蘇關係改善的一點希望就此煙消雲散，被毛澤東打掉了。

後來看，毛澤東對柯西金來訪以及中蘇關係改善持這種尖銳對抗的態度，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在他正在引導整個中國向着文革的大方向轉變時，他絕不能丟掉「反修」這面旗幟，更不願意看到中蘇關係在此時出現改善的前景。若非如此，他以「反修、防修」為標榜的「繼續革命」宏大事業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甚至根本講不通了。

即便如此，周恩來仍然想為中蘇關係留下些許餘地。他在送柯西金到機場去的路上，對柯西金說：中蘇兩邊對外交問題、國際問題需要經常交換意見。雙方的觀點和政策可以有不同意見，可以不公開地、非正式地交換意見，了解對方的看法。[27] 他對柯西金說這些話，大概是為了多少緩和一下當時的緊張氣氛，同時也不使得雙方之間交流的橋樑被毛點起的大火完全燒斷。但到了此時，這麼一番話猶如杯水車薪，還會有什麼用嗎？

中國應如何應對越戰不斷升級背景下來自美國的巨大威脅？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心思讀得很透。他知道自己的一個重要使命，是要使得越南戰爭保持為「有限戰爭」，既要讓這把火燒下去，但又不能讓它燒過頭，更不能讓它延燒到中國來，使中國捲入另一場朝鮮戰爭式的中美直接軍事對抗。為此，周恩來想到要向美國「傳話」。

1965年4月2日，周恩來訪問巴基斯坦期間在卡拉奇會見了阿尤布·汗總統。他利用這個機會，請阿尤布·汗應邀訪問華盛頓時，當面向約翰遜總統轉達幾點看法：

> 第一、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第二、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凡是中國答應了的國際義務，就一定要履行；第三、中國已經做了準備。如果美國擴大戰爭，戰爭是會逐步擴大到中國的。對此我們已有精神準備和物質上的準備。[28]

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向美國傳遞警告信息時，仍然記得當年中美兩國面臨在朝鮮兵戎相見的局面，他曾通過美國並不信任的印度，傳遞戰火若是燒向中國「我們要管」的警告，結果「美國不聽話」。這一次，「我們的朋友換了，不是印度而是巴基斯坦了」，不管美國信不信，他對阿尤布．汗說：信息應該可以及時傳到了。[29] 但周沒有想到的是，美國方面後來竟因為覺得阿尤布．汗過於「親華」，臨時取消了他的訪美計劃。[30] 周的話沒能由阿尤布．汗直接轉達給約翰遜總統。[31]

這之後，周恩來又在同緬甸領導人奈溫、印尼副總理蘇班德里約、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等談話時，重複了上面這幾句警告美國的話。[32] 但他無法知道，美國領導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的話，並給予足夠的重視。

到5月底，周恩來想到了同美國有着「特殊關係」、也同中國保持着代辦級外交關係的英國。本來，英國駐中國代辦是一個坐冷板凳的角色，根本見不到中國領導人。5月31日，任職不久的英國代辦唐納德．霍普森(Donald Hopson)卻突然得到通知，中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要見他。談話中，陳毅告訴霍普森，周恩來曾經請巴基斯坦阿尤布總統帶四句話給美國：「(1)中國不挑起對美國戰爭；(2)中國說話算數；(3)中國是有準備的；(4)如果美國轟炸中國，戰爭就沒有界線。」遺憾的是，約翰遜推遲了阿尤布總統訪美，這四句話也許沒有帶到。陳毅要求英國將這幾句話轉告美國，並「向美國施加壓力，要美國撤出南越」。[33] 這件事，英國人辦得極為賣力。幾天後，這幾句話就傳到了白宮。[34] 又過了兩天，周恩來和陳毅從英國方面得知，美國最高領導人收到了中國的信息。[35] 這之後，霍普森還想入非非地想接着同中方討論香港和中英貿易等問題，卻又回到「先前慣常的孤立狀態」，開始坐冷板凳了。

從後來的發展看，周恩來、陳毅等中國領導人一再對美國發出警告，對中美兩國避免在越南捲入另一場朝鮮戰爭式的大規模戰爭，是起了作用的。之後幾年間，美國在越南南方的地面戰爭不斷升級，對越南北方的轟炸也持續不斷。從1965至1969年，中國國內「抗美援越」吶喊不斷，同時派出工兵、道路修建和高炮部隊進駐越南北方，前後一共去了32萬人，但沒有派戰鬥部隊進入越南直接參戰。美國方面也有默契，地面部隊從來沒有進入越南北方，空軍轟炸基本上沒有超過北緯20度線，一直同中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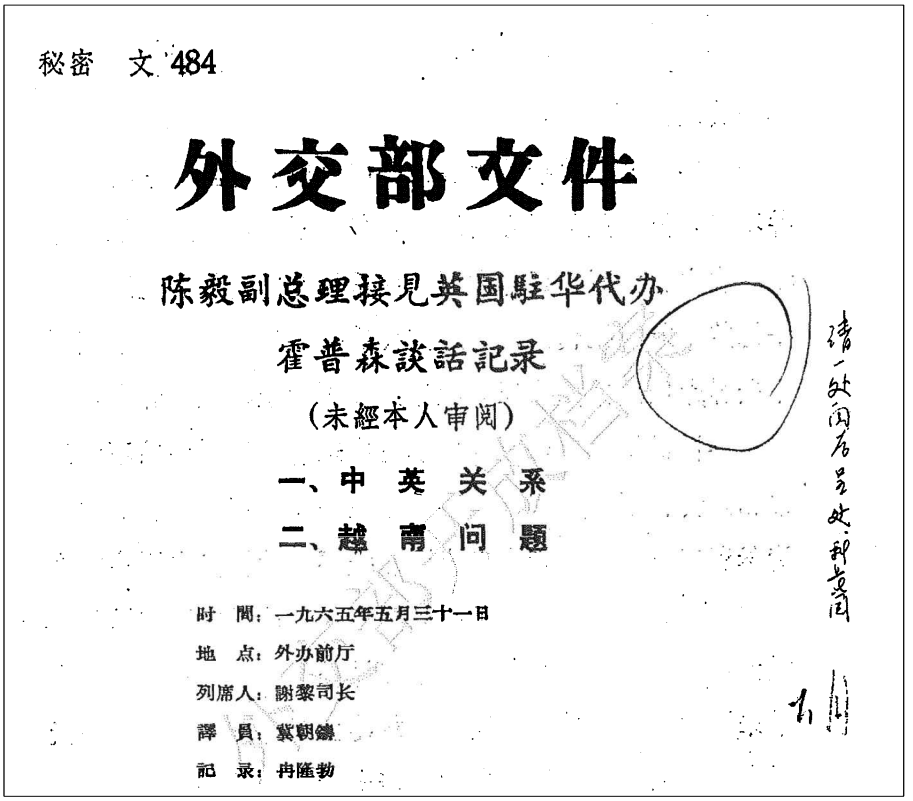
邊境保持距離。到頭來，中美兩國沒有像朝鮮戰爭那樣，在越南重演一場雙方大打出手的直接軍事衝突。[36]

從毛澤東的眼光來看，這正是他希望達到的效果。周恩來的任務完成了。

三

這時，周恩來本來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制定上，這也是他身為總理面臨的一樁頭等大事。但此時，這件大事受到了越戰升級後形勢變化的嚴重影響。自1963年後，隨着國民經濟逐步恢復好轉，在周恩來的部署下，以李富春為首的計委領導小組開始了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準備工作。最初，他們把主要注意力放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上，從而「基本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37]但是，情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1964年5月，毛澤東讀到總參作戰部關於國家經濟建設應當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後，當即提出國民經濟要有「兩個拳頭」（即農業和國防工業）和「一個屁股」（即基礎工業）。毛又說，要使拳頭有力，屁股就要坐穩；「沒有坐穩，沒有站穩，是要跌跤子的。」[38]5月27日，毛澤東又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制定「三五計劃」要設一、二、三線的戰略佈局，第一線是沿海，第二線是「從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第三線是西南。[39]此後，根據毛的意見，周恩來、李富春等在制定三五計劃時，即把三線建設當作一個中心環節來處理。

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後，越南戰爭逐步升級，毛澤東又在一系列場合多次強調三線建設的問題。與此同時，他還對計委提出了嚴厲批評，指責李富春等人「屁股沒有坐對」。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不能不做出反應。到1965年初，根據毛的指示，由周牽頭、以促進三線建設各專項為中心的四個「小計委」產生了，由李富春當主任的「大計委」的權力被嚴重削減。[40]這麼一來，李富春他們原來已形成文本的三五計劃只能被廢置不用了；周知道，必須另搞一個備戰和三線建設將在其中佔據重要地位的新的三五計劃。



秘密　文 484

外交部文件

陈毅副总理接見英国駐华代办霍普森談話記录

（未經本人审阅）

一、中 英 关 系

二、越 南 问 题

时　間：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地　点：外办前厅

列席人：謝黎司长

譯　員：葉朝鏞

記　录：冉匯勃

請一处阅后呈处理意見

我们明白地告訴美国人，我们自己庇护自己，不靠任何人，整个中国大陆是敞开的，要炸就炸，中国将抵抗到底。

周恩来总理曾經請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总統带四句話給美国，我现在也請你把这四句話带給英国政府。这四句話是：（1）中国不挑起对美国战爭；（2）中国說話算数；（3）中国是有准备的；（4）如果美国轰炸中国，战爭就沒有界綫。

圖24.2：陳毅接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的談話記錄，1965年5月31日。
（110-01254-03，外交部檔案館）

FROM PEKING TO FOREIGN OFFICE

Cypher/OTP

Mr.Hopson
No.720
31 May,1965

PRIORITY
CONFIDENTIAL

FO/CRO/WH DISTRIBUTION

D. 10.14 31 May,1965
R. 12.10 31 May,1965

FC 1022/46

Addressed to Foreign Office telegram No.720 of 31 May.

Repeated for information to : Washington
Moscow
Saigon
Hanoi

and Saving to : Paris
UKMIS New York
UKDel NATO
Shanghai
Hong Kong
Bangkok
Singapore (POLAD)

Ch'en Yi received me for over an hour this morning. The whole time, except for ten minutes or so devoted to bilateral Sino British relations, was taken up by his exposition of the Viet Nam situation. He was courteous throughout and in good humour.

2. Main points on bilateral relations were that although not normal, relations were "not bad" either. Usual obstacles to improvement were quoted, e.g., United Nations question, Consulate in Taiwan and our support for American policy in Viet Nam.

3. Main points of interest in his very long expesition on Viet Nam were as follows. The Vietnamese Prime Minister had assured him recently in Bandung that the Vietnamese people would continue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Americans to the bitter end whatever happened. The Vietnamese did not at present need material assistance but only moral and political support from China. Ch'en Yi said Chou En-lai had asked President Ayub Khan to give the following four-point message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 China will not provoke war with United States;

(II) What China says counts;

(III) China is prepared; and,

(IV) If United States bombs China that would mean war and there would be no limits to the war".

/As Presid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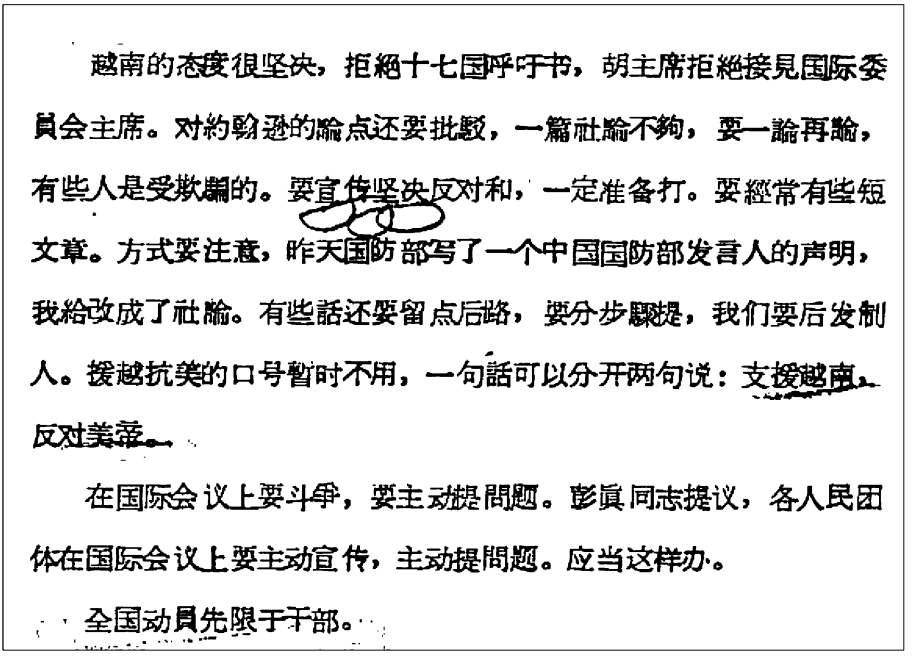
CONFIDENTIAL

圖 24.3：霍普森關於和陳毅談話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1965 年 5 月 31 日。
（FO 371/180990, UKNA）

1965年春天，中共領導層舉行了一系列決策會議，討論越南戰爭升級背景下中國的備戰及應對問題。其中，4月12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集中討論了備戰問題，其內容後來傳達到了省、市一級。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毛澤東沒有參加。劉少奇講了備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鄧小平分析越南形勢時說，美國在越南的特種戰爭破產後，正在擴大戰爭，他列舉了四種可能：第一種，戰爭在南方打；第二種，戰爭「在南北方打，連同老撾一起打」；第三種，戰爭「在我國靠近越南的地區打下去」；第四種，「美帝同我打更大規模的局部戰爭，甚至包括朝鮮」。中國必須以備戰為中心做好應變和參戰的準備。鄧還表示：「我們要盡一切辦法支援越南，……我們對越南同志說，越南不請我們去，我們不去，需要哪一部分去就哪一部分去，需要多少去多少。總理已同有些國家講，我們是準備好了的。我們也告越南同志，不要怕把我們拖進去。」[41]

周恩來在參加這次政治局會議前剛剛召集過一次關於備戰工作的會議，在會上講，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但戰火還是可能延燒到中國，中國要盡一切力量支援越南，國內要把生產搞好，做好備戰工作。大三線能快還是要快，但現在打仗，主要還要靠一、二線。[42]這裏，周已透露出他的一個基本看法：三線要抓，但一、二線也不能放。在4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的發言仍循着同一思路展開。他表示同意鄧小平的意見，一定要準備打，「軍工、三線、援外要加快」，但具體實行時，「有些要放慢，有些要推遲」。對外發言時，「有些話還要留點後路，要分步驟提，我們要後發制人。援越抗美的口號暫時不用，一句話可以分開兩句說：支援越南，反對美帝」。他還提出，「全國的動員先限於幹部」，不要一擁而上。[43]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號召全國都要加強備戰思想，做好備戰工作，並「把四清工作做得更好」。[44]

之後的幾個月裏，隨着越南戰爭升級，毛澤東一再提出：戰爭還是有着發生和不發生兩種可能，我們必須做到有備無患，同時他又不斷強調要把三線建設當作重中之重來抓。[45]對周恩來來說，關鍵的問題仍歸結到三五計劃應如何制定。他在5月11日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指出，制定三五計劃，要做到「四保」：保備戰，保援外，保三線，保重點。[46]這裏的關鍵是確定什麼是「重點」，以及如何保重點。在周恩來的眼裏，「重點」就是農業和吃飯問題，用他自己後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的話來說：


越南的态度很坚决，拒絕十七国呼吁书，胡主席拒絕接見国际委員会主席。对約翰逊的論点还要批駁，一篇社論不夠，要一論再論，有些人是受欺騙的。要宣传坚决反对和，一定准备打。要經常有些短文章。方式要注意，昨天国防部写了一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的声明，我給改成了社論。有些話还要留点后路，要分步驟提，我们要后发制人。援越抗美的口号暫时不用，一句話可以分开两句说：支援越南，反对美帝。

在国际会议上要斗爭，要主动提問題。彭眞同志提议，各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要主动宣传，主动提問題。应当这样办。

全国动員先限于干部。

圖24.4：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65年4月12日。
（101-4-384，福建省檔案館）

> 第一位是農業。……首先抓農業，這不僅為了備戰，也是為了備荒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第二位是國防。不論打仗還是備荒，不吃飯不行，所以，還是得靠農業，把農業放在第一位。[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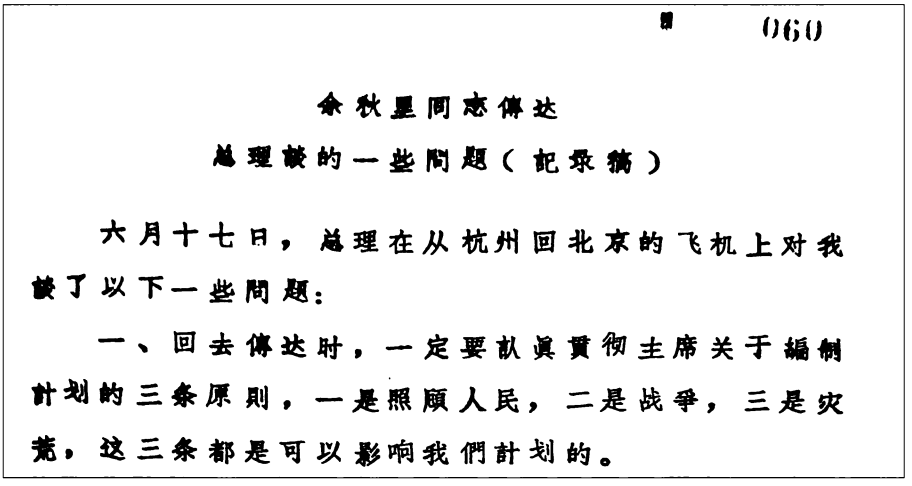
遵循這樣的思路，周提出在制訂計劃時，對生產、建設、備戰、援外工作等，「也還是有一定控制的，不能無限擴大」，不能搞成「1958年特別是1959年那樣的情況，那不行」。[48]然而，周恩來雖然有這些想法，但若沒有毛澤東的明確支持，是不可能成為黨和國家的大戰略的。

6月15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周恩來等開會，聽取余秋里、谷牧關於三五計劃制定和三線建設的彙報。講到要留有餘地時，毛說：「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49]毛說的這幾句話，周恩來在心裏一下子就抓住了。6月17日，他在從杭州飛回北京的飛機上對余秋里等人說：「回去傳達時，一定要認真貫徹主席關於編制計劃的三條原則，一

是照顧人民，二是戰爭，三是災荒，這三條都是可以影響我們計劃的。」[50] 8月23日，他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進一步把從毛講話中提煉出來的三個「關鍵詞」連接起來，當作毛關於備戰形勢下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的中心思想加以陳述：

> 主席提出要我們注意三句話，注意戰爭，注意災荒，注意一切為人民。這三句話，我想合在一起順嘴點，就是備戰、備荒、為人民。[51]

周恩來這麼做時，顯然還牢牢地記得前幾年的大饑荒，因而把「備荒」同「備戰」並列一道提出，以避免一切都給「備戰」讓路，搞得經濟發展完全失去平衡。這一次，毛澤東接受了周恩來的做法。[52] 到頭來，這麼一個由周概括出來的「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最高指示」得到毛的首肯後，在此後十年間，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天下大亂」的情勢下，成為他竭力維護中國國民經濟中的農業基礎和底線，使之不受到重大衝擊乃至破壞的一柄「尚方寶劍」；同時，這也成為三線工程大規模上馬過程中始終存在的平衡和制約因素。



060

余秋里同志傳达
总理談的一些問題（記录稿）

六月十七日，总理在从杭州回北京的飞机上对我談了以下一些問題：

一、回去傳达时，一定要認眞貫彻主席关于編制計划的三条原則，一是照顧人民，二是战爭，三是灾荒，这三条都是可以影响我們計划的。

圖24.5：余秋里傳達周恩來談的一些問題，1965年6月23日。
（855-8-3112-6，河北省檔案館）

1965年夏天，周恩來還以相當的精力，做成了另一件事：他一手導演並達成了對國民黨「統戰」的一件大手筆——曾任中華民國代總統的李宗仁的「回歸」。1949年大陸易手後，李宗仁在香港停留後未去台灣，而是遠走美國。1954年，他被台灣方面正式彈劾罷職後，在美國發表「關於台灣問題的建議」，表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在中國人之間，如假以時日，沒有不能解決的事」，以此對北京暗送秋波。周恩來當即意識到，李宗仁身上有統戰的文章可做，於是親自佈局，將爭取他回歸之事提上日程。[53]

1960年，李宗仁走出了試探北京的一步重要的棋。他將自己收藏的12箱古董送回國，說是自己當年花了11萬美元購入的收藏。周當即讓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專家鑒定，結果發現幾乎全為贋品，其價值最多不過3,000美元。周說，就給他3萬美元吧。毛看到報告後說，李這是「投石問路」，又大筆一揮，批示給李12萬美元，還說：這是一筆政治帳。李拿到錢後說：「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54] 回歸之意也更為強烈。

1965年初，李回歸之事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確保李從美國回北京時不出任何意外。此時，周恩來親自介入了李歸程的規劃。李啟程前，周為了最後敲定此事，又通過程思遠向李保證，李「可以回來在祖國定居」；「可以回來，也可以再去美國」；「可以在歐洲暫住一個時期再定行至」；「回來以後可以再出去，如果還願意回來，可以再回來。總之，來去自由，不加拘束」。[55] 為了防止台灣情報機構在最後時刻用特殊手段阻止李回歸，周部署之下，讓李先去瑞士，再經過巴基斯坦回中國。在此過程中，他親自擬定了「李宗仁行動計劃」，除動員中共在歐亞各地的外交和特情系統為李提供保障外，還親自出面請巴基斯坦方面提供協助，並特地指令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丁國鈺陪同李乘坐巴航班機回國。[56] 7月17日夜，周徹夜未眠，等待李乘坐的飛機進入中國境內後才稍事休息。而後，他親自到上海虹橋機場迎接李宗仁，除在上海宴請李宗仁夫婦外，又長時間同李談話，介紹中共的內外政策及對台政策。7月20日，李宗仁從上海飛往北京，周恩來提前20分鐘搭乘另一專機先行飛回北京，在機場與一大批中共及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一道，歡迎李宗仁歸來。[57] 這是周的統戰生涯中一樁極大的收穫。

四

1965年春夏之際，周恩來同阿尤布·汗、蘇班德里約、奈溫、尼雷爾等亞非國家領導人談話時，除了越南問題外，談得最多的是當時正在緊鑼密鼓籌備的第二次亞非會議。

這次會議的設想，最初由印尼總統蘇加諾在1964年4月提出，當時他希望在1955年萬隆會議十週年之際在印尼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周恩來支持召開會議的想法，但建議開會地點最好放在非洲，另外可在印尼舉行亞非會議十週年的紀念活動。蘇加諾接受了周的意見。1965年4月，在亞非會議十週年之際，周訪問了印尼首都雅加達，除參加慶祝活動外，又會見多國元首，進一步敲定了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舉行第二次亞非會議的計劃。對周恩來來說，這是加強中國的國際影響、宣揚中國的各項主張的一件大好事。



圖24.6：周恩來和印尼總統蘇加諾、埃及總統納賽爾在開羅，1965年。
（Keystone Press / Alamy Stock Photo）

進入夏天後，隨着會議籌備緊鑼密鼓地進行，各種障礙也不斷出現。尤其是，中國同印度等國在是否讓蘇聯與會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為使得會議能夠遵循中國的設想召開，周恩來和陳毅一道，於1965年6月初起訪問巴基斯坦、坦桑尼亞和阿聯，並準備隨後前往阿爾及爾出席第二次亞非會議。周在同坦桑尼亞、越南等國領導人會見時堅持，會議參加者應只限於亞非國家，「其他地區的國家一個也不邀請」，「蘇聯不是亞洲國家」，因此不能與會；同時「帝國主義傀儡政權不能參加」。[58] 然而，當周於6月19日到達阿聯首都開羅時，風雲突變，東道國阿爾及利亞發生政變，本．貝拉總統被推翻。周不願放棄參與會議的計劃，於是他自己留在開羅，由陳毅前往阿爾及爾參加外長會議。但由於阿爾及利亞本身形勢不明，許多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明確表示不會前來開會。最後，為避免亞非國家的分裂，6月26日，聚集阿爾及爾的各國外長決定會議延期舉行。但當時，周恩來仍然沒有放棄開會的想法。[59]

周恩來在亞非國家展開的積極外交活動，雖然未能讓第二次亞非會議按照中國的設想如期召開，對北京來說卻並非毫無收穫。1965年11月，聯合國大會在關於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上，第一次出現了贊成北京和贊成台北的票數打成平手的局面。這是周在國際外交活動的一個大收穫。

就在此時，中國外交形勢已出現了逆轉的洶湧暗流。9月底，印尼形勢突變，印尼共產黨試圖通過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掌控政權，卻遭致軍方和右派勢力的強烈反彈，引火燒身，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滅頂之災。

對於印尼在9月底會「出大事」，周恩來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其實早有思想準備。8月5日，毛、周和來華訪問的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進行了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會談。談到印尼的政治情勢時，艾地表示，印尼共和國內右派勢力之間的激烈鬥爭已接近最後攤牌的生死關頭。毛聽後說：

> 可能你們在今年、明年或後年就要掌握政權。第一條，你們敢不敢奪取政權；第二條，是奪取政權的策略、路線怎樣。……你們只要能掌握住左派，然後配合工農的鬥爭來爭取中間派，把右派壓下去，政權就在你們手裏，否則你們還是得不到政權。

周恩來詳細詢問了印尼軍隊的情況。艾地表示，如果右派採取行動「打我們」，「我黨就有理由進行反擊，……我們就準備建立軍事委員會，其中左派佔主要地位，也包括中間派，這樣可以迷惑敵人」。毛還建議，艾地「不要老是出國」。[60] 當晚，周恩來接着同艾地談話，確定由中國駐印尼大使姚仲民和艾地保持單線聯繫，姚則直接向周本人報告。[61] 艾地回國後，大約在8月中旬，同印尼共中央副主席魯克曼（M. H. Lukman）一道告知姚仲明，印尼共已決心「採取堅決行動奪取政權」，並徵詢中共的意見。8月底、9月初，姚帶來了北京方面的回覆：中共支持艾地的想法，要印尼共「做好準備，下了決心，有進無退，如受到挫折，要下決心轉到農村堅持鬥爭」。[62] 之後，艾地又通知姚，印尼共已決定在9月30日舉事，並自信地認為應該會獲得成功。艾地還向姚提出了一個具體問題：「白天動手好，還是夜間動手好？」幾天後，周恩來代表中共覆電，支持印尼共舉事，至於「白天還是黑夜動手好，看具體條件，這不是關鍵問題」，重要的是要注意策略，即便「起義成功，也不要過早說蘇加諾不是國家元首，『納沙貢』牌子不要隨便丟掉，在國際上還有用」。[63]

9月30日，周恩來在主持國慶招待會時，收到了姚仲明發來的密電以及印尼「出事」的報告，他在回覆姚的電報中指示，「使館要慎重，不要對外議論，不要到處打聽消息。同官方仍正常往來，保持國家與國家的關係。另外要做好思想準備，準備應變，警惕軍方對使館攻擊」。[64] 第二天，周在會見一個成員包括左、右各派人物的印尼代表團時說：「我們剛才得到了幾個外電的消息，說雅加達有一個『將領委員會』陰謀政變，失敗了，說總統的衛隊把他們捉住了。」周又說，根據外電報道「總統很安全」，他的衛隊「組織了一個革命委員會來控制局勢」。[65] 10月3日和4日，周在會見另兩個印尼代表團時又說，由於北京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之間聯繫中斷，除了確定蘇加諾總統本人「很安全」外，他仍然無法對印尼形勢作出明確的判斷。[66] 但實際上，中國駐印尼使館同北京之間的電訊聯繫並未中斷，全部由周親自掌控，遇有急事甚至由周直接回覆，再送毛澤東及劉少奇、彭真和陳毅等中央外事領導小組成員核批。[67] 幾天後，印尼形勢逆轉，右派及軍方開始強力反擊，印尼共不知所措，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困局。根據來自北京的指示，在印尼舉國為「九三零事件」中殞命的幾位右

派將領下半旗哀悼時，中國使館卻沒有下半旗，使自己成了眾矢之的。[68]

兩週後，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已確知，右派勢力已經掌控了印尼的局勢發展，「火已經把紙燒了」，蘇加諾被迫右轉，印尼共面臨嚴峻考驗，「但大屠殺還未開始」，中國駐印尼使館的行動受到了嚴厲限制。[69] 即便如此，遲至11月初，由於蘇加諾曾向中國使館表示「請中國諒解，給他一定的時間，他還是可以控制局勢的」，周恩來和北京方面仍對印尼局勢可能逆轉抱有希望，尤其是希望「印尼共和印尼左派集結力量」，發起反擊。周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說：「印尼現在右派當權」，但「印尼的左派和人民是主流，我們要支持和配合他們。……現在印尼左派正在積蓄力量」。[70] 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陳毅陪同周恩來會見一個朝鮮高層代表團時甚至表示，印尼共「有300萬黨員，只要有幾萬堅決就行了」，「如果右派勢力把蘇加諾搞掉，反而是件好事」，這樣印尼共就可以「堅決地轉向武裝鬥爭」了。[71]

然而，印尼形勢並沒有朝着中共領導人所期盼的方向發展。11月下旬，艾地在中爪哇被捕後遭到殺害。到年底，中共領導人所期望看到的印尼共「堅決反擊」的革命場景也沒有出現；相反，北京不斷收到的是印尼共遭到嚴酷鎮壓、處於土崩瓦解之勢的報告。僅僅幾個月，號稱擁有300萬黨員的印尼共居然徹底覆滅了。蘇哈托和印尼軍方也通過不斷架空蘇加諾總統——周恩來的老朋友，逐步全面接管了掌控政權。

那些年裏，中國為建立「北京－雅加達」的「革命軸心」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資源，周恩來也為此花費了很多心血。隨着印尼變天，這一切都成了明日黃花。對於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領導層來說，尤其是對周曾經花了大力氣推動的毛的「東南亞革命」設想來說，這是一個極為沉重的打擊。1966年3月，在看到印尼共徹底覆滅的命運已成定局、蘇哈托在印尼執掌大權的局面已無法改變時，中共領導層決定銷毀「九三零事件」前後北京和中國駐印尼使館之間的所有秘密來往電訊稿。[72]

印尼局勢逆轉，也使得周恩來這幾個月來一直在努力支撐的第二次亞非會議計劃完全破局。直至10月間，周還在為會議不至於因形勢轉變而壽終正寢做努力。但在一系列障礙無法克服的情況下，周還是於10月22日致信亞非各國元首，提出「與其不顧協商一致原則，強行開會，造成亞非國家的分裂，不如暫時不開」。[73] 但周其實知道，第二次亞非會議大概

是再也開不成了。11月間，他在會見外國代表團時一再表示，第二次亞非會議已不可能再舉行了。[74]

這之後，由印尼開始的中國外交情勢「逆轉」又擴散開去。1966年2月，加納發生軍事政變，當時正在中國和越南訪問的恩克魯瑪總統被趕下了台。接着，加納軍人政權宣佈與中國斷交。

五

1965年夏去秋來之際，國際局勢的變動固然弔詭，耗費着周恩來的心智，但最讓他頭痛乃至神經抽搐的，仍然是越來越吃緊的國內政治情勢的發展。9月18日至10月12日的近一個月裏，中共中央在北京連續舉行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和插話時，充滿着濃濃的火藥味。他講到：「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要造反。」又說：「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麼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75]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黨的領導人和前來開會的各路諸侯都可以清楚地感覺到，毛又要採取政治上的「大動作」了——而且，這是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迄至那時為止，還沒有過先例的「大動作」。

但周恩來這時還不知道，毛澤東動手的第一個公開信號，竟會以一種似乎很不顯眼的方式發出。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署名作者是姚文元。乍一看來，這就是一篇學術批評文章，如果說它有什麼不尋常之處，那就是《海瑞罷官》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

後來才知道，這件事的幕後操縱者就是毛澤東本人，並已在暗中準備了好幾個月。早從春天起，毛的夫人江青便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書記張春橋等的配合下，組織並支持姚文元寫這篇文章。[76]姚文發表後，黨內上層很多人並沒有對此給予太多注意。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尤其是彭本人，對吳晗採取了「保」的態度，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引入學術討論的軌道，並阻止北京各報刊轉載這篇文章。[77]

對於姚文元的文章的發表及其背景，周恩來事先並不知情。然而，姚文發表後，周的直覺應該會告訴他，此事不簡單。因此，他的應對從一開

始就極為審慎。他一面仔細觀察毛的動向，另一方面在毛沒有明確表態的情況下，盡量採取一種「大事化小」的做法，設法不使事情的發展失控。

11月26日，周恩來到上海參加長居中國的美國友人斯特朗的八十大壽慶祝活動。[78] 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是知道姚文發表內情的，擔心這件事會「影響黨內團結」，便請當時也在上海的羅瑞卿給周恩來傳話，告知「姚文的背景和毛主席對北京等地不轉載的不滿」。第二天，周見到陳時說：「你讓羅總長轉告我的那件事，我已經知道了。……感謝你，丕顯同志。」[79]

周恩來回到北京後，立即打電話給彭真，讓北京各報轉載姚文。[80] 周還和彭真一道，親自修改審定《人民日報》轉載姚文的按語，其中強調：對此事應「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81] 顯然，直至此時，周恩來仍然希望把這件事盡可能當作學術問題來處理。

事情很快又有新發展。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的一次談話中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打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82] 不知道周恩來是何時得知毛的這番談話的，但毛的話再清楚不過地道出：批判《海瑞罷官》這件事絕不可能像周曾希望的那樣，僅僅局限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引起的衝擊波仍在擴散時，12月上旬又出了一件大事：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毛澤東信任並掌控中共安全機制的羅瑞卿，突然受到了整肅。

這件事背後最主要的策動者是林彪，但也同羅瑞卿和幾位老帥的緊張關係有一定聯繫。自1959年出任國防部長以後，林彪和羅瑞卿之間的關係曾有過一段蜜月，但隨着他因身體欠佳不能太多管事，尤其是在1963年9月由賀龍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後，[83] 林彪覺得自己被冷落了，同羅瑞卿的關係變得日益緊張，漸漸產生要對羅瑞卿開刀的想法。

11月30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信，說「有重要情況要向你彙報」，他要「先派葉群呈送材料，並向主席做初步口頭彙報」。[84] 當天，葉群就帶着十份材料飛到了杭州，見到毛澤東後，她和毛在密室中談了五個小時。[85] 毛

澤東見過葉群後，12月2日，在林彪送來的一份報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86] 這是毛澤東對林彪做的一個大姿態，表明他已下決心要對羅瑞卿動手。當天，這一批示就到了周恩來以及劉少奇和彭真等人手裏。[87] 但當周看到毛的這個批示時，大概還不知道它在政治上的含義和背後的內幕。

毛澤東決心整羅，應當同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佈局及考慮有密切關係。他要搞文革，就必須得到在軍隊中勢力雄厚、影響極大的林彪的支持。同時，在毛眼裏，他退居二線以及劉少奇在「一線」主政後，羅瑞卿同劉、鄧等走得太近了。再加上，儘管表面上羅的權力極大，但實際上他已經處於一種木秀於林的態勢，除林彪外，他同葉劍英、聶榮臻等幾位老帥的關係也相當緊張，葉甚至在講到羅時也曾說過要「打倒凶神，解放老帥」的話。[88] 只是，羅瑞卿沒有覺察到自己已身處險境。[89]

毛澤東要對羅瑞卿動手，無論是部署這件事並將之付諸實行，還是完成善後，都有必要向周恩來交底。12月5日，毛澤東從杭州到上海，當天就把周恩來從北京召來上海會面。他們談了什麼？最大的可能是，毛就「整羅」的問題當面向周恩來做了交代，並讓周預先佈置。[90] 對周恩來，這應當是一個極大的意外。就在11月底，周剛剛在上海見過羅瑞卿，還收到了他轉達的陳丕顯關於毛對姚文元文章態度的傳話。周知道，他無力阻止這件事的發生。但12月10日羅瑞卿應召到達上海時，他還是特地讓陳丕顯帶着夫人謝志成以「東道主」身分接機，以免使羅「感到突然」。[91]

12月8日，「整羅」的會議在上海開始舉行，整整開了一個星期。會議的過程可以分為兩部分，先是中央常委開會，由毛澤東給眾人打招呼並定「調子」，說「羅是野心家」，「思想同我們有距離」，還點明會議同林彪有關，因為「羅把林彪同志實際上當作敵人看待」。[92]

這之後，會議的規模擴大，除了政治局委員外，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及解放軍高級將領等共61人參加。葉群打着由毛「點將」的旗號，在會上作了總共長達十個小時的三次發言，重點講羅的野心及企圖從林彪手裏「奪權」的問題：「羅的個人主義已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的位置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又會要求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

洞。」她還危言聳聽地說：「羅掌握了軍隊大權，又掌握了公安大權，一旦有事，損失太大。」[93]

會外，周恩來和鄧小平一道，找羅瑞卿談話。周傳達毛的話：羅「反對林，還沒有反對我」；如果羅沒有反對林彪、伸手、反對突出政治這三條，可以把問題先掛起來。對毛本人，羅瑞卿自以為對毛向來忠心耿耿，此時自然感到萬分委屈，也不相信毛會對自己如此絕情，仍然要求和林彪當面對質。周不知如何對羅解釋，只得說：「你怎麼這樣天真，這樣幼稚？」周勸羅「冷靜、不要激動」，也不要去找毛或林彪。[94]

但當時，毛澤東顯然還不準備徹底打倒羅瑞卿，因而說：「我也同羅瑞卿說過，要他到哪個省去搞個省長，他不幹。軍隊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調動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調到江西。」[95] 周恩來對羅瑞卿也沒有持「一棍子打死」的立場。直到1966年1月底，周還在一份本來準備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的批判羅瑞卿的文件上批示，建議「改由總政直接發下，作為內部文件，還可稍留餘地」。[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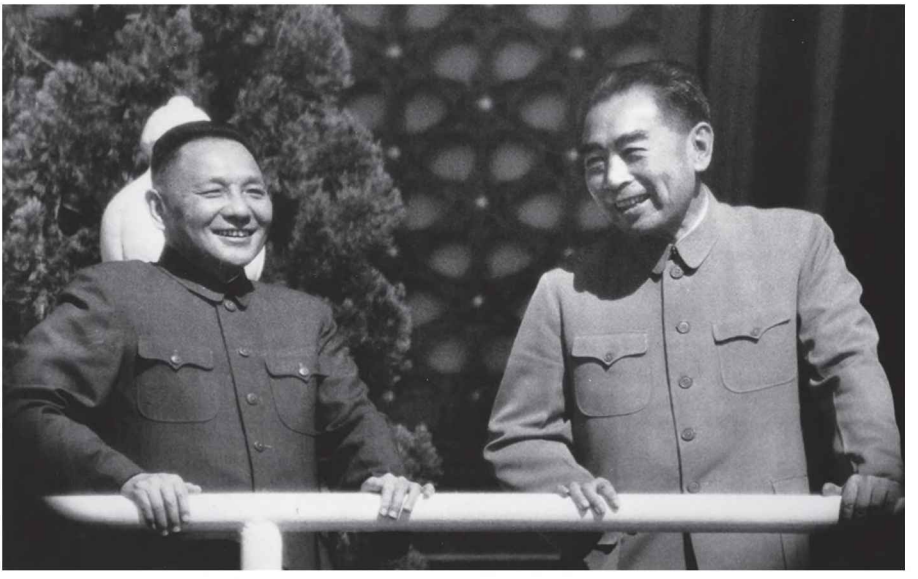


圖24.7：周恩來和鄧小平在天安門城樓上，1965年10月。
（Imaginechina Ltd. / Alamy Stock Photo）

從另一角度看，毛澤東決定整羅，除了進一步拉住林彪外，也是在為自己「立威」。1966年1月5日，他在同江西省黨政負責人楊尚奎等談到羅瑞卿時說：「這個人就是盛氣凌人，鋒芒畢露。」[97] 諸如此類的話，其實也是說給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黨內其他領導人聽的。

羅瑞卿遭到整肅，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就在此事發生前不久，多年來一直擔任中央辦公室主任的楊尚昆也被調離了這一要害崗位。這件事是毛澤東要做到，並由周恩來具體執行，決定也由周出面向楊宣佈。[98] 接任楊職位的，是長期以來一直在毛身邊擔任「內衛」首領的汪東興。這是毛採取大動作前為收權和集權走出的又一步「大棋」。汪、楊兩人的一個最大區別是，楊是黨政官僚，從道理上說，還要對黨和國家負責；汪則是毛澤東的近侍乃至「大內總管」，首先要對毛本人負責，其他責任都是附帶的。這件事對周恩來又是一個極大的衝擊。周同楊的關係一向密切，關於毛那裏的動向，楊過去也曾多次向周「通風報信」。楊尚昆下台之後，周也失去了在毛周遭的一個重要「耳目」。相形之下，周同汪東興的關係原先並不緊密，這是他需要從頭開始認真經營的。

這件事關係到了黨和國家的組織結構及運行體制，周恩來和劉少奇、鄧小平等其他領導人本來是應該說話的。但面對毛澤東作出的決定，他們都沒有說話。這恐怕說明了到這個時候，他們都覺得自己已經沒有在這樣的事情上說話的餘地和空間了。

六

進入1966年，毛澤東對於文革的籌劃越來越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這一年2月，發生了兩件似乎互不相干的事情，先是〈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的制定；幾乎同時，又有江青打着毛澤東指示的旗號，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其實，這兩件事之間有着緊密的關聯。

〈二月提綱〉的提出，可以說是以彭真為代表的黨內「建制力量」試圖為一場正在掀起的運動建立一套「規矩」，努力將之導入他們所設想的軌道

上。為此，他們真是煞費苦心。〈提綱〉中一面提出，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大鬥爭」，也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一面又主張，要堅持毛澤東關於「放」的方針，讓各種意見都放出來，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99]

周恩來沒有參與〈二月提綱〉的起草，但他從一開始就對這件事十分關心。2月5日，周出席了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會議，聽取彭真關於〈二月提綱〉起草的彙報。彭真堅持說，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他和彭德懷也沒有任何關係。劉、鄧對彭真的意見表示贊同，周也沒有提出異議。結果，會議同意了〈提綱〉，並立即向毛澤東報告，還用電報給毛發去了〈綱要〉全文。[100]

2月8日，彭真、康生、陸定一等一起到武漢當面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聽到劉、鄧、周等其他政治局常委已同意〈提綱〉後，沒有當面反對或對〈提綱〉提出質疑。但他還是說，關於這場討論的結論，「兩個月後也做不了」。毛還旁敲側擊地問道：吳晗能不能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答道：不是，但吳晗很緊張。毛說：吳晗可以照樣當他的副市長，他就不緊張了。[101] 這在當時給彭真他們造成的印象是，毛似乎已同意了〈提綱〉。2月12日，經鄧小平簽批後，〈二月提綱〉轉發全黨。[102]

但實際上，毛澤東這時還在讓江青做另一件事，從2月2日至20日，由她出面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又經包括毛本人在內的反覆修改後，搞了一個〈紀要〉。其中提出，自建國以來的16年裏，「文化戰線上存在着尖銳的階級鬥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因此，有必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103] 這件事，林彪本來未參與。但毛澤東在修改〈紀要〉時，親筆在原標題「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前，加上了「林彪同志委託」六個字。[104] 這麼一來，不僅給這個文件徒增了更多的力道和「合法性」，也使得這件事林彪不做也得做，沒有別的選擇。

這是江青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極為重要的亮相。毛澤東的這位夫人，中共建政後很少出頭露面，這幾年來她積極推行「京劇革命」，又代表毛在幕後組織策劃了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這一次終於在政治上

走到了前台。她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這是一個關鍵性的起始點。周恩來本來很少同江青直接打交道，但在這之後，他同毛的這位夫人交集不斷，至死也擺脫不掉。

林彪同意在江青搞的這個〈紀要〉上掛名後，毛澤東也「投桃報李」，很快就決定給12月「整羅」會議後一直掛在那裏的羅瑞卿問題升級定案。3月4日起，毛指定由鄧小平、彭真和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在北京開會，批判羅瑞卿並解決他的問題。羅瑞卿「實在忍受不了」，於3月18日試圖跳樓自殺，大難不死，摔斷了一條腿，但卻留下了終身殘疾(後來，他在文革後復出不久便在德國動腿部手術後死去，也與此有關)。[105] 毛澤東知道後說：「羅瑞卿這人是個危險人物，要看到這一點，並引為教訓。這個教訓一萬年也教不完的。」[106]

上述一系列風波不斷擴大之時，毛澤東又搬出了「反修」這個題目大做文章。3月17日至20日，毛在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和劉少奇、林彪參加了會議，朱德、鄧小平、陳雲請假。會議開始時，討論的是中共應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問題。本來，這件事在會前已由劉、鄧等人主持討論過，周恩來也參加了。他們經過幾度反覆，又再三揣摩毛到底是什麼意思，最後決定可以派代表團與會。[107]

然而，毛澤東在杭州開會講話時，一張口就否定了中共派代表團參加二十三大的動議。毛說：蘇聯是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開這個會的，「他們國內國外都有困難，美國人不會放過他們，西德不會放過他們」；「我們不去，旗幟鮮明，不拖泥帶水，也不必發賀電，只告訴他們說我們不參加就行了。」毛還說：「至於大反華，我們就是要挑起它們，可以挑起來，正合我們需要。」劉少奇辯解道：「第一次說不去，第二次有人說再議一下，兩邊分析利弊，不去就是個嚴重步驟，去麼沒有什麼。」毛立即反駁道：「那也是一個嚴重步驟啊！去與不去，都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步驟。」林彪插話道：「去了，兩頭失踏，那些傢伙反正說不服，人民一頭丟了。」毛隨後一錘定音：「還是列寧的話，要人家不動搖，首先要自己不動搖。我們一去，混淆了國內外視聽。……我們不去，旗幟鮮明，不拖泥帶水」。[108] 這麼一來，中共派遣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之議，也就胎死腹中了。後來看，1966年春，恐怕是中蘇關係有所改善的最後機

會。而由於毛的所作所為，這一「機會」未能轉變為北京與莫斯科之間關係正常化的現實。

對毛澤東來說，他必須抓住「反修」這個題目大做文章。只有牢牢抓住這個題目，以蘇聯「變修」為警示，那麼在中國大張旗鼓地採取「防修」的舉動，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了。更何況這些年來，毛還一直把這場「反修」鬥爭同反對蘇聯干涉及試圖控制中國的「大國沙文主義」行徑連在一起，別人就更不好提出反對意見了。

在這個會上，毛澤東還聳人聽聞地講到了北京有人要造反的問題，說：「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專門講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們怎麼辦。也不要緊，造反就造麼。整個解放軍會跟着造反嗎？他無辦法。」毛還批評了《人民日報》，說「我學蔣介石的辦法，就是不看《人民日報》」，「現在看了，……但是登了那麼多無聊的，什麼海瑞『罵皇帝』，『有鬼無害論』，等等」。[109] 會後，吳冷西在向周彙報時，講到了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的批評，表示要「好好檢討」。周恩來馬上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110] 可見，大凡這樣的場合，周恩來都是把自己放進去，對照自己應持的立場和反應來考慮問題的。

僅僅用不出席蘇共二十三大向「蘇修」叫板，毛澤東還覺得遠遠不夠，他還需要抓住一件什麼事情把火燒得更大，既進一步突出「反修」的題目，又給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扣帽子。當時，由總書記宮本顯治率領的一個日本共產黨高級代表團正好在中國訪問，試圖建立一個「援越抗美國際聯合戰線」。毛抓住了這件事，直接侵入中共與日共關係這個本來由劉、鄧經手的領域，不惜對日共採取背信棄義的非常手段，以一種「家醜外揚」的方式昭告天下，他無法無天，要幹大事了。

宮本顯治一行從2月開始訪問中國、越南和朝鮮。2月中旬，他們先到中國，先後在上海和廣州同彭真等會談，然後又去了河內。2月底，他們再次來到中國，3月4日至8日，連續四天在北京和劉少奇、鄧小平舉行會談。在國際共運和中蘇論戰中，日本一向站在中共一邊，對蘇修持尖銳批判的立場。但這一次，在越南戰爭不斷升級的情勢下，宮本提出支援越南抗美是頭等大事，不應當把反帝和反修完全對立起來，更何況，蘇聯在

赫魯曉夫下台後開始對越南提供援助，已有可能建立更為廣泛的反美統一戰線。劉、鄧則表示，反帝必須反修，不能對蘇共新領導存有太多幻想。會談結束時，雙方仍存在嚴重分歧。[111]

3月11日起，宮本率領日共代表團訪問平壤，在朝鮮逗留了11天，雙方就包括建立反美國際聯合戰線的所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並發表聯合公報。[112] 之後，宮本一行又回到了北京。劉少奇、鄧小平參加毛澤東在杭州召集的政治局會議後，馬不停蹄地趕回北京，同宮本進行了幾輪談判。宮本報告說，越南和朝鮮都贊成建立包括蘇聯在內的國際反美聯合戰線。在這種情況下，劉、鄧和宮本最後在援越抗美以及建立國際反美聯合戰線的問題上達成了妥協意見，根據中方建議，雙方同意發表一個包括反修批修內容的公報，但不點蘇聯的名。[113] 此後，兩個代表團的成員開始着手公報的起草和修改。

劉少奇、鄧小平的做法並非沒有先例。在國際共運大論戰中，為了爭取和團結大多數，中共一般不強求其他黨在批判修正主義時一定要點蘇修的名。而當時，日共在國際共運中屬於大黨，又長期堅持「反修」立場，是中共的堅定盟友。1965年印尼「九三零事件」後，一向支持中共的印尼共瓦解，日共在國際共運中對中共的支持也變得更為重要。更何況，越南和朝鮮這兩個在國際反修鬥爭中一直傾向於中國一邊的黨也表明了支持國際反美聯合戰線的立場，中共若繼續持反對態度，就會在國際共運更加陷於孤立。想到這一切，劉、鄧自然有更充分的理由考慮日共的處境並採納宮本的意見。

周恩來一開始並沒有參加中共代表團和宮本的會談，但在聯合公報的起草修改即將完成的時刻，他出面了。3月26日下午，他出席了首都各界1.6萬人歡迎宮本和日共代表團的集會。[114] 27日晚，雙方就公報措辭完全達成一致後，周又會見日共代表團，對此表示「熱烈祝賀」。他告訴宮本，公報的內容已以急電送交正在上海的毛澤東審閱，正式簽字儀式「可以在日本同志覺得適當的任何時間舉行」。當晚，周和朱德一道，在人民大會堂為宮本一行舉行告別宴會。[115]

然而，周恩來他們萬萬沒有料到的是，毛澤東居然會把這件事徹底翻了過來。3月27日，康生在上海就中、日共會談當面向毛做了彙報。

毛看了周送來的中、日共聯合公報後，馬上扣帽子說，公報不點蘇共的名，是「無頭告示」、怕鬼、旗幟不鮮明、不痛不癢。他當即親手動筆對稿子進行修改，在三處「現代修正主義」前加上「以蘇聯領導集團為中心」的定語。[116]

第二天，毛澤東親自出面，連續兩天在上海同宮本及日共代表團談話。毛把國際關係或黨際關係的規則和禮節統統踢到一邊，對宮本說：劉、鄧和日共代表團達成的協議不算數，要推倒。宮本反覆說明，日中「兩黨都在分別地進行着反帝、反修的鬥爭。如果能夠在一般的肯定這兩點的情況下，發表一個聯合公報，我們認為還是發表為好」。毛答道：「只想講幾句話。你們這種態度是受到蘇共領導歡迎的，這是第一句。但是我們不歡迎，這是第二句。」毛還說：「看來公報發表不成了。不發表公報沒有什麼要緊，發個消息就是了。」結果，中日兩黨之間已經達成協議的聯合聲明被取消了。[117]

毛澤東的這一舉動非同小可。這不僅將他和劉少奇、鄧小平之間的矛盾公之於世，更造成了中共同一向在中蘇大論戰中站在中共一邊的日共之間關係的空前危機，宮本一行在忿忿之中離開中國回國。此後，日共在再三要求毛及中共方面解釋與道歉未果的情況下，正式與中共斷絕關係。在國際共運中，中共失去了一個最重要的盟友。[118]

對於周恩來來說，毛澤東如此出格的做法形同又一記當頭棒喝。毛固然經常不按牌理出牌，但在這樣一件關係到中共臉面和信用的國際大事上，毛居然有如此出格的舉動，這只能說明他採取特大行動的決心已定，並到了倒計時的關頭。

七

毛澤東出了上面的「大招」，台後也有一系列大小動作跟進。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動作，就是直截了當地向周恩來「交底」，並幾乎逼着他表態。

3月下旬，毛澤東打發走了日共代表團後，從3月28日至30日，連續三天同康生等人談話。他嚴厲指責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壞人，要解散」，又說「五人小組，也要解散」，矛頭直指彭真、陸定一等人。他還危

言聳聽地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119] 3月31日，康生從上海回到北京後，立即向周恩來和彭真傳達了毛的談話內容。[120]

周恩來當然知道，這其實是毛對他的一種「攤牌」。這之後，他沒有立即行動，而是等了整整兩天。這兩天裏他固然事多，尤其是到河北邢台處理大地震的善後事宜，但應該也是在思考如何回覆毛。

一直到4月2日晚，周恩來親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其中表示：

> 三十一日康生回京，傳達主席指示。與彭真、康生商定，擬開書記處會議，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這些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這是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並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同時，指出前送主席審閱的〈五人小組報告〉(即〈二月提綱〉)是錯誤的，擬由書記處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邀集上海、北京有關同志加以討論，或者進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寫。[121]

周恩來這封信之所述，正是毛澤東所希望看到的一種關鍵性表態：毛向他交底後，他下決心完全站到了毛一邊。周何以會這麼做？我們無法探究或知悉他在這兩天裏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可以想見的是，這48小時對他來說絕不輕鬆。到最後，他做出的是在一場空前的政治大風暴中站在毛一邊的決定，這同他自延安整風所一貫遵循的準則是一脈相承的。

回頭看，對中共領導層來說，1966年春天的這段時間是一個巨大考驗的時刻。從道理上來說，這也許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及黨內建制力量可以「合力」阻止毛澤東走向文革的最後一個「機會窗口」——這個時刻一旦錯過，便再也回不到原點重新開始。但是，劉、周、鄧等人，在面對毛澤東越來越肆無忌憚的行動時，卻顯得如此軟弱無力、如此優柔寡斷、如此缺乏想像力，完全抵擋不住毛似乎以一人之力而發起的、全然不講道理的「攻勢」。

人們不禁要問，劉、周、鄧以及中共的整個黨和國家機器及建制結構，在毛澤東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為什麼竟毫無還手之力，甚至連絲毫抵制的意向、反抗的意志都完全沒有表現出來？

這裏除了人們很容易看到並想到的毛澤東的權力和權威，以及1943年通過的那個毛在黨內高層決策中有「最後決定權」的決議的作用外，問題的癥結恐怕還在於，劉、周、鄧以及黨內任何其他領導人，在革命合法性的理論敘述上，沒有可以用來同毛的那一套對抗的替代性敘述。

從反修到防修，毛澤東在中國走向文革之路上搞出了一整套理論，並將這套東西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這個敏感話題聯繫起來。自1964年起，他開始指責蘇聯是中國最大的安全威脅，說要為當時仍是中國盟國的蘇聯來打中國做準備。[122] 也就是說，毛用來支撐這一套邏輯的，還有着以「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為中心意象的中國革命民族主義的理念和信念。相形之下，劉、周、鄧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黨內「建制力量」，卻拿不出可以與之抗衡的任何替代性理論或話語。毛澤東用來打動全黨，並最終得以壓制、統制他的同志們的永遠是同一種武器：在烏托邦理想包裹下的巨大權力，以及以巨大權力為後盾而強力推出、並使之成為整個國家和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及其表述底蘊的烏托邦想像。這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由此形成了毛的無上權威，以及構成這種權威及權力的「合法性敘述」的基礎。這是一種現代神話，一種不僅在現實政治層面，也滲入人們觀念世界的「內在的權威」。如果沒有人能夠對這種同不受任何制約的政治權力互為支撐的烏托邦表述提出挑戰，那麼便無人能挑戰毛澤東的這種權威和權力。因此劉、周、鄧以及黨內領導層，誰也跳不出自延安整風以來便形成並不斷加強的、以毛為中心的中共黨文化嚴嚴實實的藩籬。

毛澤東「搞定」周恩來的同時，黨內上層在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相繼倒台後，彭真成了下一個遭到整肅的目標。在中共領導層內，彭真雖然不是常委，但長期以來曾被認為是毛的親信，在黨內權力甚大，一度甚至達到了頂半個總書記的地步。但自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發表了「毛也可以批評」的言論後，毛日益對他存有戒心乃至敵意。整肅彭真，是毛進一步「清君側」的舉動。

一直到4月初，周恩來在對待彭真的態度上還處處留有餘地。這些天，他凡給毛寫報告，都是同彭真一起做的（也可能是彭真拉着他一起做的），但這種局面很快就變了。4月9日起，中央書記處在鄧小平主持下，

連續三天開會，周恩來雖然不是書記處成員，但也出席了會議。會上，討論並批准了中央軍委會議對羅瑞卿一案的定性和處理。4月12日，周恩來和鄧小平、彭真一道寫信給毛澤東，報告「批判羅瑞卿」的結果，給他加上了「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逼迫林彪同志讓賢」，「反對突出政治」，「搞獨立王國」等一大堆帽子。[123]

彭真雖然在信上簽名，但在毛澤東那裏，他其實已是羅瑞卿的「同夥」。在4月9日至12日召開的書記處會上，康生傳達了毛對五人小組及〈二月提綱〉的嚴厲批評，並當面抨擊彭真。[124]這樣，彭真一面參加給羅瑞卿定案，一面自己也成了批判的靶子。4月16日，彭真隨周恩來和鄧小平到杭州參加毛澤東召集的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氣氛極為緊張，彭真進一步受到嚴厲的批判。[125]4月22日，毛做的總結發言更是充滿了火藥味。他說，吳晗的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朝中有人」，中央有，各區、各省市都有。「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126]4月28日和29日，毛又接連對彭真及北京市委提出了極為嚴厲的指控：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階級鬥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階級鬥爭，不鬥不倒」。[127]不僅如此，會上還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聯繫在一起，端出了一個「彭羅陸楊集團」。周恩來表態支持毛，並同彭羅陸楊等「劃清界限」。[128]

本來，彭、羅、陸、楊這四個中共高層大員，並沒有超出工作關係的太多交集，更沒有任何「結黨」的證據，但仍被「指鹿為馬」，強行湊在一起，變成了反黨集團，這是一種極為「任性」的行為。這樣做，除「思想上臭味相投」的臆想外，再無其他可以坐實的材料支撐。

但實際上，這幾位如此被強行「拉郎配」成為集團的中共大員，歷史上早已幾度捲入將相互之間並不相干的同志或其他人打成「反黨集團」的舉動。回想起來，當年高崗和饒漱石受到整肅時，兩個政治上並無太多緊密交集的人物，居然成了「聯盟」；反右中，章伯鈞和羅隆基這兩個向來在政治上相互「抬槓」的人物，居然成了「集團」；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居然也成了「集團」。這樣做，也是除了「思想上臭味相投」的臆想外，根本沒有可以坐實的證據支持的，先例早已有過了。

從高饒反黨聯盟到彭張黃周反黨集團，定案時哪裏有什麼證據，還不是說定案就定了，容不得申辯，更容不得反駁。而彭、羅、陸、楊這幾位，當年在這些事上或者直接參與，有時甚至還扮演過大將或先鋒的角色，或者至少是投了贊成票的。只是現在，「反黨集團」的帽子和「斬首」的利劍落到了他們自己頭上。為別人打開的通往地獄之門，也成了他們自己被送入地獄的通道。

八

直到1966年春末，關於文革的提法，還是「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但到了5月，提法改變了，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一種名號的變化，意義甚大，不僅更符合這場「革命」所涉及的內容上的廣泛性和邊際上的模糊性，也更能夠反映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和想像，尤其是他決心將關於「人心」和「人性」改造的巨大工程付諸實踐的結果。

進入5月後，同文革稱謂上的改變相呼應，〈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這兩個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先後出台。

所謂〈五七指示〉，是毛澤東在看到林彪送上的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在給林彪的一封信中的批示。說起來，這件事的起始同周恩來有關。大躍進失敗後，食品供應極端緊張的狀況也殃及部隊，周讓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參與尋找出路。這一過程中，1960年冬天在由賀龍主持的一次軍委常委會上，邱會作提出了軍隊自己動手從事糧食生產的提議，幾經周折後得到了林彪的支持，軍隊開始從事糧食和副食生產，並很快緩解了部隊吃不飽的問題。此後，軍隊從事農副業生產也成為一項長期方針。到1966年，邱會作又搞了〈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毛看到這個報告後，在給林彪的批示中，從軍隊從事農副業生產這一具體行動引申開去，提出了一系列「大想法」：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不僅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129]

毛在批示中所透露的，是他關於黨和國家、尤其是「上層建築」的「理想形態」的憧憬。這裏既充滿着烏托邦式的想像，又包含着一系列關於黨和國家機制以及「上層建築」改造的規劃，其中透露出來的是毛在即將推出「大破」之時，企圖從一開始就開啟「大立」進程的意圖。後來，〈五七指示〉為文革進入「鬥批改」中的「改」的階段時，在全國各地建立形形色色的「五七幹校」提供了藍圖。但它與毛發出〈五七指示〉時關於理想社會探索的設想，卻相距甚遠。那是後話了。

5月1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毛給林彪的信和總後勤部的報告，說「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130] 但從當時黨內政治鬥爭的角度看，這是毛整個佈局中的另一個重要步驟，用以加強自己發動文革「合法性」的深度和厚度。

從5月9日起，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本人沒有出席會議，但會議的進程卻盡在他的掌控之中。本來，周恩來已經確定要在5月中旬出訪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對羅馬尼亞來說，這次訪問的重要之處在於，蘇聯當時準備7月初在布加勒斯特舉行華沙條約國家黨和政府首腦會議，其意圖之一是藉此對奉行獨立外交路線的羅馬尼亞施加壓力。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şescu）很想通過邀請周到訪，來加強應對蘇聯壓力時的分量。[131] 為了最後落實這件事情，羅馬尼亞還特地派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埃米爾·波德納拉希（Emil Bodnăraş）訪華，盯着北京，以便最後敲定周出訪的行程。一直到5月13日，中方還告訴波德納拉希，周訪問羅馬尼亞的計劃不變，一定會去。但到5月14日，中方卻突然變卦，通知波德納拉希，周決定推遲出訪。[132]

周恩來如此不顧外交禮節，做出這種失禮的舉動，實在是因為中共上層的又一輪政治鬥爭已經達到了關鍵時刻。5月15日，周恩來和葉劍英一道向毛澤東報告，組成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和謝富治為副組長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的工作」。[133] 這已屬於非常時期的一項非常措施。周知道，這個時候他必須留在北京，若是搞不好，恐怕會出大事。

會議期間，周恩來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親自部署部隊的調動配置，「在北京增加了兩個陸軍師，（因為）當時中央有一部分不可靠」，改組並加強京畿地區的安全警衛工作。[134] 他後來談到這一段時說：「步驟是首先從中南海開始，我們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先把中南海的問題解決了。」[135]

5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亦即〈五一六通知〉出台。從各方面來看，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從現實政治層面看，它以「破」為綱，比〈五七指示〉更為重要，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從「破」開始。後來，一「破」再「破」、以「破」治「破」、「破」字當頭，「立」字卻一直是空中樓閣，在「大破」之後始終無法轉入毛所想像和期待的「大立」的進程。到頭來，文革在毛澤東在世時再也收不了場，最後燈枯油盡，只能以徹底失敗告終。

對〈五一六通知〉，毛澤東極為重視，親自做了大段修改和增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這麼幾段話：

> 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
>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136]

隨着〈五一六通知〉這個文件的出台，毛澤東為文革中的「破」定下了想像中的規劃。他的大動作，馬上就要跟進了，周恩來也必須作出明確的表態。這樣，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和周恩來成為兩個主角。兩人的發言最不同尋常，也最具有震撼性的影響力。

林彪的講話，通篇大講「防止反革命政變」經，言語間充滿着戾氣乃至殺氣。林還用極為誇張的語言說：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

萬句」；毛的話「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137]

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為此，他做了精心準備。他先是表示，完全同意林彪的意見，也對「防止反革命政變」發了一番議論。他用「四大家族」來形容彭羅陸楊，說他們「已經奪了我們很多陣地」。之後，他談到反修、防修的重要性：

> 主席說過，社會主義也會出修正主義，有兩種可能。看起來出修正主義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會出現。說哪個國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會出修正主義，是不對的。這就忽視了左、中、右的客觀存在。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

隨後，周恩來話鋒一轉，將重點轉向了「保持晚節」的重要性，發出了緊跟毛澤東的保證。在講話結尾時，他說：

> 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否則的話，即便「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138]

在中共高層領導人中，周恩來的這些話還從來沒有人說過。以周的身分說出這樣有分量的話，在黨的領導層中所產生的影響何止是振聾發聵！這是周對毛澤東的又一次關鍵性表態。他的話有着黨內實際政治力量對比和象徵性上的兩重意義，他的發言把對毛的支持在這兩方面都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這個毛澤東發動文革已是箭在弦上的關頭，周恩來和林彪兩人的表態極為重要——從毛的角度來看，周的表態也許更為重要。自毛回到「一線」後，便在與劉少奇逐步分道揚鑣的同時也對周下功夫，並給予周自「反冒進」受到嚴厲批判以來所不曾有過的尊重。說到底，中國的行政權力及政府的日常運作實際上掌控在周的手中。毛深知，不管是要為發動文化大革命及與劉少奇攤牌爭取更多的支持，還是要使得中國國家機器在出現政治大動盪的情況下仍能保持運作，他都是離不開周恩來的。

但這並不等於說，周恩來就有了挑戰或「挾制」毛澤東的可能。歸根結柢，周若要使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向毛提出挑戰，不僅要有不惜「殺身成仁」的非凡決心和勇氣，更需要相應的合法性宣示的支撐，而這一切恰恰幾乎完全掌控在毛的手裏，甚至已經達到同毛及其「思想」合為一體的地步。在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潮洶湧襲來的時候，周恩來幾乎身不由己地做出了「順勢而行」的選擇，而這恐怕正是毛澤東所希望看到的。

第四部

文革歲月

第25章

文革大潮初湧
（1966–1967）

一

在我的記憶中，多少年過後，那一天——1966年6月1日——留下的印象依然清晰。晚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向北大領導開炮的大字報。之後不久，學校停課了，期末考試也取消了，毛主席號召我們「鬧革命」，我不到一年的中學時代也結束了。當我再一次有機會參加考試並走進課堂，已是11年後高考恢復時的事了。

北大的那張大字報的發表，是毛澤東親自下命令，「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的。[1] 在共和國歷史上，像這樣的事從無先例。尤其是，毛後來還給這一篇很大程度上屬於北大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地方政治」產物（儘管也有全國範圍的政治背景）的文字，冠以「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甚至譽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2] 這一切，更是極不尋常的。這是毛發出的進軍號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齣「大戲」正式登上了歷史舞台。

毛澤東這麼做，周恩來事先並非全無準備，但仍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北大地處京畿，那裏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得紛紛揚揚，也引起了周的關注，他曾提出：「北大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搞運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內外有別。」[3] 就在幾天前，周還曾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一道討論北大的運動，並決定派遣工作組進駐北大以及《人民日報》「領導運動」。會議還未結束，周就到隔壁房間給毛打電話，毛表示同意。[4] 5月30日，

劉、周、鄧又聯名就會上派遣臨時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的部署給毛寫信，毛又批示「同意這麼做」。[5] 然而，僅僅一兩天之間，毛就下令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這是周恩來以及劉、鄧都沒有想到的。這時，毛澤東遠在杭州，劉少奇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從6月3日起，劉連續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者中也有周恩來。會議一面決定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並為運動定出一系列的規矩和限制，一面幾次向毛彙報情況，請毛回北京主事。[6] 但是，毛澤東那裏沒有回音。

6月9日，劉少奇攜同周恩來和鄧小平，乘飛機前往杭州，當面向毛澤東彙報。他們逗留了三天，6月11日和12日參加了毛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們向毛報告北京的運動情況，以及他們準備派工作組掌控運動的想法。毛沒有明確表態，只是以他一貫的風格，用高屋建瓴的口氣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又說：不一定派工作組，「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才派」。[7] 劉、周、鄧又請毛回京，毛澤東仍然不肯，而是要劉繼續主持中央工作。

周恩來回到北京後，立即決定於6月15日開始出訪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途中又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停留，結果一走就是半個月。這件事早從1966年初就開始籌劃，後來曾兩次推遲。[8] 現在，正當北京的政治局面撲朔迷離之際，他決定出訪不再延期。周以總理之身出國這麼長時間，當然需要毛澤東的批准，毛同意了。[9] 其中是否另有深意？但對周來說，他至少得以暫時擺脫北京的政治漩渦，獲得幾分喘息及思索的空間。

7月1日，周恩來出訪後回到北京。在機場接機的人當中有康生，他特地與周同車進城，向周交了一個底：「一是總理不要陷進去，二是文革小組變化很大，總理要參與它的活動。劉、鄧可能站不住了，……總理第一不要參加派工作組的事，第二要密切注意文革的發展。」[10] 康生同周恩來歷來有「私誼」，同毛澤東的關係也相當密切，毛關於北大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信息，就是他上送的。康生的這個動作太大，若沒有毛的首肯，他這麼做是不可想像的。看來，毛澤東在給劉、鄧等人「挖坑」的同時，並不想讓周也掉進去。

這樣，周恩來回到北京後，情況有了一個大的變化。出訪前，他和劉、鄧一道指導掌控運動，遇到問題，便一道向毛彙報，請求指示。回來後，周同劉、鄧之間拉開了距離，很多場合他也隱身不見。

毛澤東仍然待在外地。6月15日，他離開杭州，到他家鄉湖南韶山附近一個叫滴水洞的地方，躲了十幾天。他在想些什麼？用他自己對來看他的省、地負責人的話來說，是「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長征』了」。[11] 6月底，毛澤東從滴水洞轉到武漢。

這時，北京的政治局面呈現出一種奇怪的現象。表面上看，文化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但劉、鄧作為在北京掌控局面的中央領導人，一派小心翼翼的心態，全然不知道應當如何釐清運動的性質、方向、政策、方針等問題。說到底，劉、鄧、周搞不清楚，毛要搞的文革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期間，北大發生了「六一八事件」，持不同意見的群眾同工作組發生嚴重紛爭。[12] 他們更覺得，不僅應當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更應當加強指導，以掌控運動的發展。他們每做決定，都向毛彙報。但毛的反應卻仍然是奇奇怪怪的，要麼根本不發話，要麼講的話令人不得要領。[13] 劉、鄧愈發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摸着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周恩來對派工作組採取的是一種「溫吞水」態度，既不冷，但也絕對不熱。他是在觀察毛那裏的動向。

7月中旬，毛澤東開始有了動作。7月11日，周恩來被召到武昌。上午，他陪同毛澤東會見尼泊爾王太子比蘭德拉（Bīrendra）。當天下午，毛、周兩人屏退左右，談了三個小時；12日上午，又談了兩個小時。[14] 在這五個多小時裏，他們到底講了些什麼，並未看到記錄。可以想見的是，在這個「天下大亂」將臨的時刻，毛一定會當面向周做了某種交底。

周恩來在武昌期間，毛澤東讓他讀了自己7月8日寫給江青的一封同林彪有關的信。毛提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15] 毛讓周讀這樣一封信，也可視為是另一種形式的「交底」。信中，毛也提及了他對林彪在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他大肆吹捧的看法，說「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又說「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毛讓周向林彪轉達了他的看法。爾後，根據毛的意思，信的原

稿銷毀了。[16] 但不知出於何種用意，周卻留下了一份工筆書寫的手抄件。[17] 林彪出事後，這份抄件又被拿出來，作為毛澤東早已對林彪有所警覺乃至警惕的證據。但周當年讀這封信，難道真的會有這樣的感覺？畢竟，那時林彪仍然是中國政治舞台上冉冉上升的一顆明亮的星。這一點，不久後又將被他的地位進一步竄升所證明。

7月16日，毛澤東又做了一件事：他跑到長江裏去游泳了。那一天，武漢正為紀念毛十年前游長江舉行渡江游泳活動，長江兩岸聚集了大量人群。他們見證了毛在江水中「閒庭信步」的場景。這件事被大肆宣傳，又配上毛的一番話：大風大浪也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在大風大浪裏發展起來。[18] 這一來，在全國民眾、尤其是青少年中，掀起的何止是驚天大浪。毛已經73歲了，居然還能到長江裏游泳，那麼他還有什麼事不能幹？

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劉少奇得知後匆匆趕去見毛，卻被衛士告知「主席正在睡覺」，吃了閉門羹。[19] 可是，當時毛其實正在同陳伯達、康生等一班文革幹將談話，但當秘書進來通報劉求見時，他卻說「不見」。[20]

第二天，周恩來出席了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已從毛處得知虛實的陳伯達提出，工作組應該撤銷，但劉、鄧等多數人表示反對。周則用委婉的口氣提出，陳的意見可否「試行一下」，工作組可否「先撤出來，讓群眾自己先搞一段時間，看看，然後再說」。[21] 當晚，毛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但他只是聽劉、鄧等人彙報，沒有就工作組問題明確表態。這又是毛「放蛇出洞」的一貫手法嗎？[22]

7月21日，毛在審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和黨的若干方針問題〉時，加上了一段批語：「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23] 這個文件就是後來的「十六條」。這樣為「文革」定調子，後來看其實很可怕。什麼叫做「思想革命化」？如何才能做到「思想革命化」？這裏的標準和邊際根本無法確定。文革中層出不窮的各種無法無天的行為，都可以從這句「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中找到重要的思想和認知上的源泉。

7月22日，在劉少奇主持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舉行。也許是誤讀了毛澤東回京後沒有馬上就工作組問題做負面表態的意味，鄧小平以罕見的激烈態度對撤銷工作組表示堅決反對，還指着陳伯達的鼻子說：

「統統撤出來，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裏？」劉明顯地持同樣立場。劉、鄧兩人異口同聲地說：多數工作組是好的。在此情況下，周恩來和其他人都不講話了，撤回工作組之議也被擱置。[24] 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這件事他馬上就知道了。鄧的行為，尤其是他在會上和劉一搭一檔、相互呼應的做派，在毛看來簡直就是同自己對着幹，同時恐怕也更加深了他在自己身後天下可能「變色」的焦慮。鄧後來成為中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同這一幕應該是有關的。

毛澤東覺得，已經到出手的時候了。7月23日，他在聽取北京市負責人李雪峰和吳德關於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彙報時，終於攤了牌，說他考慮了一星期，「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現在工作組起了什麼作用？起了阻礙作用。」[25] 第二天，他又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說：不要搞工作組，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不要發號施令。整風，關門整風不行。總之，工作組應該統統撤出來。[26] 第三天，毛澤東又在中央文革和各中央局負責人會議上說：當前要做的，主要是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27]

周恩來得知毛的明確表態後，到劉少奇家中同劉、鄧有過一番交談。7月24日凌晨4時，他給二人寫了一封信，說他們與毛的「不同意見主要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談為妥」；又說，「在北京，工作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個工作組在本單位所發生的情況又有其特殊性，這需要進行現場調查，作具體分析」。[28] 周說這些話，其實是為他自己鋪台階，也是在為劉、鄧在工作組問題上轉彎鋪台階。7月26日，中央中央政治局決定撤銷工作組。[29]

7月29日，北京市委召開大專院校和中學文革積極分子大會，劉、周、鄧都在會上講了話。周恩來在會上傳達了學校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第一，「鬥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學校的當權派」；第二，「批判學校中那種資產階級反動的學術『權威』」；第三，「改革我們教育制度和教學的方針、方法，也就是平常說的教育革命和教學改革」。他還說，文革是「新的事情，新的運動，我們過去都不熟悉的」，對他來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30] 劉少奇和鄧小平都在會上講了話，也和周一樣，提到文革對他們是「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31] 他們說的都是大實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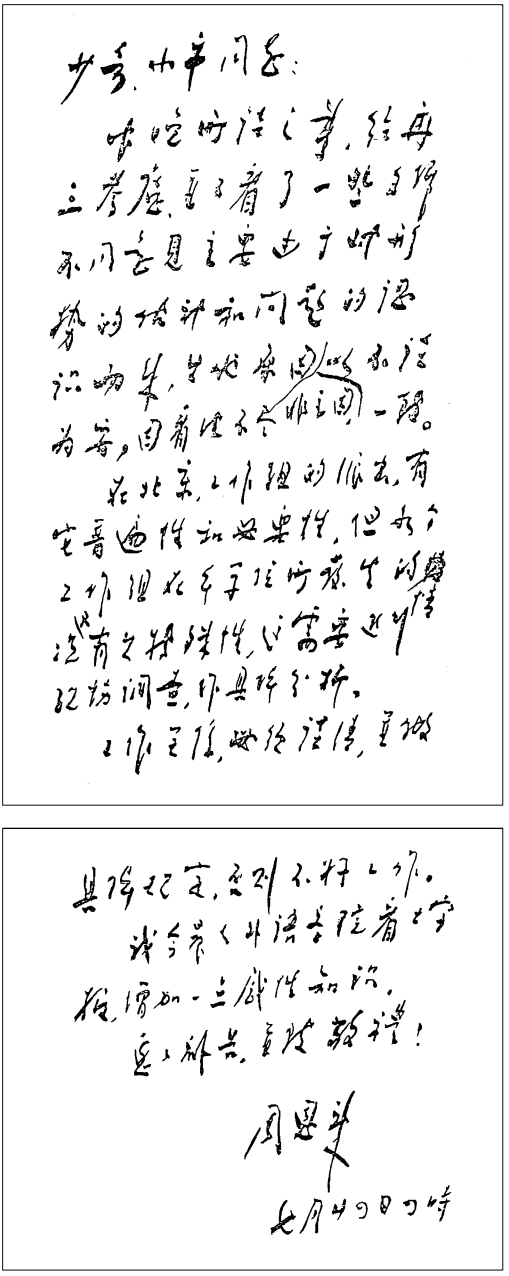


圖 25.1：周恩來給劉少奇、鄧小平的信，1966 年 7 月 24 日。（《周恩來手跡選》書信卷下）

會上出現了極富戲劇性的一幕，也是文革不同尋常的發展軌跡的又一場預演。這一天，毛澤東也到場了，但周、劉、鄧並不知道。他們講話時，毛一直坐在幕後聽。待他們講過話後，參加會議的人們開始齊聲呼喊：我們要見毛主席！這時，毛「像變魔術一樣，從幕後走到台前」，向學生們招手，但一句話未說，只是從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全場「響起震耳欲聾的歡呼聲」。[32]

會後，這一幕場景很快就傳遍了北京各大中學校，會議的錄音更是發到全國播放，在年青人的心目中點起一把大火。[33]但在毛澤東看來，這把火還不夠大。8月1日，他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表示「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又說：「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34]這是又一項非同小可、非同尋常的舉動。它尤其在年青人（並不僅僅是當時仍以「紅後代」為主體的紅衛兵中）所造成的轟動，是不論如何估計都不為過的。

其實，這正是毛澤東希望看到的。他在身體力行為文革造勢，若沒有這種效應，文革就不成其為他想像中的文革了。

二

8月1日起，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始舉行。當天，劉少奇作為前一段中央工作主持者，在會上做工作報告。他講到工作組問題時，毛幾次打斷他，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一不能鬥，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35]

當晚，毛澤東在住處召集周恩來等開會。周在會前根據毛的意見，先後約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先前在清華蹲點）、清華學生蒯大富談話，顯然是談清華的運動。[36]後來看，這也是為牽制劉少奇走出的重要一步。第二天，周恩來先到毛澤東處開會，又回到全會上講話，重點在於對毛的擁護，並主動就工作組派遣問題做檢討。他說，他剛剛在毛那裏開過會。文革的發生和發展，從姚文元的文章到聶元梓的大字報，再「到主席這次回來撤銷工作組200多天」，涉及到的是「一個路線問題」，亦即「敢不敢發動群眾起來，反對修正主義、當權派，不管地方的、中央的」。關

鍵是要「敢於造反，就是要把群眾發動起來敢於革命。怕什麼，北京市亂了一下沒有什麼了不起，……怕什麼，就是怕亂，怕把統治秩序搞亂了，這就不合主席歷來思想」。周還說，在6月初派工作組的決定上，他也有責任。「當時要求派工作組，我們也派了，也報告了主席。認為派了就解決問題了，實際上維持舊秩序。」周還說：「我們革命幾十年了，犯過那麼多錯誤，青年才鬧革命，左一點，右一點，或犯一點錯誤，就不讓犯，不讓革命了？」[37]

8月4日，毛澤東臨時決定，將全會改為政治局常委開會。在場的戚本禹還記得，開會前，毛、劉兩人坐在主席台上，「看上去說話態度都比較激動，像是在爭論什麼問題」。[38] 毛在會上當面對劉開火，說了一大段話：「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搞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所謂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都是假的。」[39] 劉說：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毛說：你在北京專政麼，專得好！毛還厲聲喝道：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40] 一語既出，舉座皆驚。

8月5日，毛澤東找周恩來談話，應該是就劉少奇之事，進一步向周交底及交代。周隨後給劉打電話，建議劉「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41]

當天，毛決定採取一個大行動，寫了一份叫做〈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對劉少奇等「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的行徑提出嚴厲指控，挑明了他和劉、鄧之間的分歧和衝突。[42] 他做這件事時，又是先找了周。據當時在周領導下負責全會保衛工作的廖漢生回憶，周告訴廖：「毛主席下了決心，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晚上把我叫去，交給我，讓我向大會傳達，後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交給我。現在毛主席已下了決心，要改組政治局常委。」[43]

8月6日，根據毛的指示，在大連休養的林彪連夜趕到北京，參加全會。[44] 毛澤東是在搬兵，也是在為全面調整中央領導層做最後的準備。這

之後，全會的風向徹底變了。8月7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在全會上印發。頃刻之間，劉少奇、鄧小平被端了出來，成為眾矢之的。

全會原定開5天，後來延長到12天。最後幾天，全會對中共領導層進行了大調整、大換班。8月12日，新的中央領導班子出來了。毛澤東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政治局常委。在這一新的結構中，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並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周不再是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儘管他和另幾位副主席的職務未被宣佈撤銷），但仍是中央常委；在黨內高層的排名，周在毛和林之後，列第三。[45]

會後，黨和國家的決策及執行機制發生了大變化。中央書記處改組，鄧小平失權，由陶鑄擔任常務書記，又加入了幾個新成員。但這之後，書記處不再單獨開會，而是由周恩來擔任召集人，讓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員參加進來，以中央碰頭會的形式，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運轉。林彪方面，則由葉群代表林彪參加中央碰頭會，以便於林、周之間相互通氣。[46]

這是一個黨政軍空前合一的機構。表面上看，周恩來一下子被置於中樞，幾方面權力的「線頭」都牽在他的手裏。但實際上，真正掌控所有權力的還是高高在上的毛澤東。周從政為人歷來謹慎，儘管這樣一個結構的產生顯然是毛的意圖，但他頂在決策的第一線，看似權力如此之大，其實陷入了他所最怕的「木秀於林」的境地，他又怎能不產生一種更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覺？

三

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8月18日，毛澤東又做了一件大事，在天安門城樓接見檢閱了來自北京和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小將。他是在進一步「放火」，鼓動青年人起來造反。他有一個奇特的想法：「要接受蘇聯的教訓。在蘇聯，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了，後來把列寧主義丟了，同這個也有關係。」[47] 所以，毛想通過讓更多的年青人見到他，把他的思想大旗扛下去。

毛澤東有了這個想法後，短短幾天內，周恩來就牽頭完成了這件百萬人參加的盛事的組織與準備。那天早晨5點多鐘，毛澤東身着軍裝，來到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開始後，又讓北師大附中的女紅衛兵宋彬彬給自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周也一改以往的着裝，同樣穿上了軍裝。[48]

這之後，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文革進入走火入魔的階段。由幹部子弟和「紅五類」組成的各路紅衛兵人馬開始大鬧京城，四處抄家造反，然後又通過大串聯，將這種「革命精神」和行為向全國傳播。這一來，荒唐事不斷發生，其中最突出的一例是北京有紅衛兵要求把紅綠燈信號改為綠燈停止、紅燈通行，為的是「讓紅色染遍全球」。這件事最後搞到了周恩來那裏，他親自出面會見紅衛兵代表，花了幾小時解釋，交通信號不能變，態度極為堅決，把這件事糾正過來。[49]

8月後的幾個月裏，文革運動發展顯出兩個特點。第一，從總體上看，運動仍然處於黨和國家現存機制的控制之下，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的第一把手幾乎都沒有受到衝擊。第二，造反行動的重點還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便有「當權派」受衝擊，所涉及者多是本單位、地區、部門以一把手為代表的政治權勢力量拋出來的。某種意義上，這很像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反右」運動的重演。

面對文革衝擊波不斷擴大，周恩來一面根據他所理解毛的意圖「放火」，一再表示要以革命造反精神，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另一面，他又竭力試圖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給運動「定規矩」，避免火勢變得過大或過度蔓延。

8月下旬，周恩來與陶鑄一道，擬定了國務院機關開展運動的「十條規定」，以便加強對運動的領導，對黨和國家要害及機密部門予以保護，並試圖在部分幹部被「燒」到一定程度後予以保護等等。文件形成文字後，周批註道：這件很好，我註了幾條意見。[50] 這不僅是表露出周自己的想法，其實也是他對於毛澤東深層次意圖及「底線」的試探。如果毛澤東表示反對，他就能進一步摸準毛的「脈搏」；但如果毛同意的話，他就有了照章行事的依據。結果，毛澤東對此的反應是：「一條也不要，何必十條？來一個放任自流。有十六條嘛，都不聽，讓它去搞。」[51] 周恩來、陶鑄他們辛辛苦苦搞出的這十條規定，也就此付諸流水。

9月初，周恩來又主持起草〈有關紅衛兵問題的幾點意見〉，試圖要求紅衛兵「學習和掌握政策」，「分清敵我友，團結大多數」，「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動手打人」等等，給愈演愈烈、不斷出軌的紅衛兵運動定一些「規矩」。9月3日上午，周召集中央文革成員及陶鑄、陳毅、李富春等討論這個規定。康生等中央文革一干人等，摸準了毛的脈搏，在會上堅決反對搞這個規定。結果，這個文件未及上送毛澤東，就胎死腹中了。[52]

8月後，全國範圍還出現了紅衛兵和青年學生四處大串聯的情形。這件事牽涉和關聯甚大，對以北京為中心的全國範圍的交通運輸系統，以及北京和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的接待能力，形成了空前的壓力。這股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結合產生的潮流，是周恩來無論如何也擋不住的。他能做的，就是盡力不讓大串聯造成交通運輸以及國計民生等各個方面的全面癱瘓。[53] 9月15日，他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場合，在天安門上講話時說：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也不要到工廠、企業、縣以下機關以及農村人民公社進行串聯。工廠農村不能停止生產鬧革命。[54] 當毛澤東這個「偉大舵手」指揮中國這艘大船駛入驚濤駭浪之中時，周恩來拼命要做的，就是不使這艘大船觸礁沉沒。



圖25.2：左起：江青、周恩來、林彪、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1966年9月15日。（World History Archive / Alamy Stock Photo）

但周恩來的心中依然充滿不安。就在8月18日，亦即毛第一次檢閱紅衛兵的當天，他在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時，禁不住說了一句心裏話：「新的革命運動，我們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變成保守派。所以，不斷革命不容易。」[55]

到秋天，當北方的風吹去京城樹上最後幾片殘葉時，文革也搞得各級黨和政府組織難以行使權力，各地（主要是城市）局面混亂，但總的來說，黨和政府的現存機制尚未完全失控，天下尚未徹底大亂。本來，毛澤東曾經對周恩來說過，中央機關的文革到10月，全國的文革到年底就要結束的。[56]但到了10月，文革卻全然沒有「收縮」的跡象。相反，1966年最後兩個月，反而成為文革「升級」發展中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這之後，文革開始完全偏離以往任何一次中共政治運動的常軌，走上了一條徹底的「無法無天」之路。這是如何發生的？

從一切跡象看，毛澤東進一步將文革引向「天下大亂」的契機，是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到年底這段時間。這場中央工作會議以及毛對於會議意涵的解讀，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

10月2日，《人民日報》提前發表了《紅旗》雜誌當年第13期的一篇社論，提出「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還說「不能採取折中主義」。[57]這裏，「資反路線」是新的提法，透露出毛要進一步把文革搞大的意向。周恩來看到社論後，曾問毛：歷來黨內路線問題，都是說左傾或右傾，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種提法。毛用英文作答，說「反動路線」就是reactionary line，不是反革命路線（counter-revolution line），意思是不一定是敵我矛盾。這等於是駁回了周恩來的看法，但又為周在實際操作上留下了些許空間。[58]這之後，毛澤東提出要召集各地負責人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而且要開七天，集中討論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59]

但最後，從10月9日至28日，這次會議開了近20天。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部門及各地的負責人。10月16日，陳伯達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身分，在會上做了經毛澤東審閱批准的主旨發言，大講黨內兩條路線之間鬥爭的複雜和尖銳，強調要「去掉幾『怕』，放手發動群眾」，把運動引向深入。[60]

劉少奇和鄧小平也分別在會上發言，做檢查和自我批判，承認自己犯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61] 但是，中共各部門負責人和各路諸侯在會上的表態卻並不熱烈，還不時透露出種種「抵觸」情緒。這一切，毛澤東都看到了。他在會上講話時說：這個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大家不那麼通，有抵觸，是可以理解的。他甚至還說，劉、鄧犯錯誤也有原因，同過去分了一、二線有關，不能完全怪他們。但同時，毛又引用林彪的發言，說「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62]

周恩來是會上的另一個主角。自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他一直試圖從一種黨內鬥爭視角認真體察毛澤東的態度，尤其是毛對劉、鄧的態度。他看到的是，一直到10月會議召開，毛澤東對劉、鄧都採取了又打又保的態度——儘管他對劉、鄧兩人的基本評價和看法其實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對鄧，他似乎還想用；但對劉，他其實已經不想用了。

但周恩來的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文革的下一步究竟怎麼走？周恩來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他在10月工作會議上發言時，一方面說：「目前的形勢還處在運動的初期階段，運動還可能持續五年到十年，主席說五年才能取得經驗。那還不是初期嗎？一浪推一浪，運動是方興未艾，繼長繼增，欲罷不能。」另一方面，他又提到了「對文化大革命是否可以設想一個時間表」的問題，並提出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的運動，「初步設想，在春節前告一段落」。還說，「劉、鄧的檢查要發到縣、團級，是否要擴大，須進一步考慮」。[63]

周恩來的這些矛盾說法，是他對文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還是拿捏不準的表現，這不奇怪。如果說，連毛澤東本人對於文革應當如何界定以及推進還不甚清楚的話，更何況周恩來呢？

四

10月中央工作會議開過後，若僅從當時的現象來看，毛澤東在文革中似乎已經大獲全勝。劉少奇、鄧小平推行的「反動路線」遭到了嚴厲批判，他們本人也作了嚴肅的檢查和自我批判。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央領導層就已經按照毛的意願做了重大改組。10月工作會議後，劉、鄧更

是完全無法工作，徹底「靠邊站」了。毛澤東的權威和權力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其中的涵義，絕不是以他「重回一線」這麼一句話就能夠概括的。

但實際上，毛澤東依然面臨着極為重要的選擇，那就是如何看待及界定「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底」。難道文革可以就此鳴金收兵了嗎？毛既不甘心，也不放心。關鍵在於，他可以隱約地感到，在黨和國家現存體制無形力量的巨大羈絆下，他想通過發動文革而實現的全黨全民「思想革命化」的目標還遠遠沒有達到。他固然擁有幾近無限的政治權力，並處於一種指導並領導文革運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但他似乎又被歷史的某種巨大慣性在「推着走」。

10月工作會議上及其後，毛澤東從中央大員及各方諸侯的態度中所看到的，是一種口服心不服、甚至不加掩飾的「陽奉陰違」的情緒。他越來越明晰地感受到，橫亙在自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設想和實際推動力量之間的，恰恰是本來應成為革命的基本領導及推動力量的龐大的黨政官僚機制。他倒不一定會害怕這種態度會給已經「靠邊」的劉少奇留下自己在世時便捲土重來的餘地——毛澤東對於自己在現實政治鬥爭發展中掌控局面的能力，還是有着極為充分的自信的。他的真正挑戰或最大擔心是在自己身後，他的「繼續革命」的宏大事業是否會被倒轉過來？這樣一來，「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底」，真的成為毛澤東不斷思考、卻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問題。但他在一個關鍵點上顯然是清楚的：這一次事情真是鬧大了，而他所取得的「勝利」卻又如此膚淺。問題在於，下一步究竟怎麼做？其實，連他自己恐怕都不知道，講不出一個所以然。

面對當時的局面，說周恩來依然處於巨大的惶恐不安之中，似乎也不為過。他倒不見得是擔心自己已面臨着被打倒的前景——當時，周恩來的感覺應該告訴他，他處於自反冒進、甚至是自延安整風以來，在政治上相對來說最為「安全」的時段。道理很簡單：毛實在是太用得着他了。周恩來的惶恐不安，主要應當是因為他完全摸不清毛在「大政治」層面究竟想的是什麼，要幹的是什麼。周可以感覺到，毛正在做的是他和中共都從未經歷過的什麼事情。毛從來有着不按牌理出牌的習慣，但這一次，他要

打的應該是一副大得不得了的「牌局」。但周卻不知道毛手裏還有什麼大牌，或這副牌局到底會大到什麼程度。

果然，10月工作會議後，文革並未「收縮」，而是繼續擴大「深入」，並開始由「有限制的群眾運動」走向「無限制的群眾運動」，其中關鍵性的轉折點是從安亭事件到「一月革命」的一系列變化，徹底打破了中共歷來搞運動的一切「常規」。在歷史的實際發展中，正是這兩個事件形成了政治上巨大的「推力」和「拉力」，兩者結合在一起，使得毛澤東一旦放出了「無限制的群眾運動」這個大妖魔之後，卻發現怎麼做也收不回來了。

毛澤東準備把事情「鬧大」的一個重要線索，來自他對於安亭事件的看法和處理。這件事對於毛澤東關於如何定義「文化大革命」並將之推向前行，也對於周恩來進一步知悉毛的動向和態度，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

11月10日，剛剛成立不久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千餘名成員，為了爭取中央文革的支持並獲得政治上的合法地位，集體北上赴京告狀，在上海市郊區京滬鐵路安亭站受到阻攔後，又集體臥軌，阻斷京滬鐵路的交通，造成京滬線中斷二十餘小時。[64]

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這一行動屬於史無前例之舉。上海市委及華東局領導出面調停未果，將情況上報北京。周恩來對此很不以為然，因為這不僅在上海、也會在全國造成大亂。但他沒有直接出面，而是鼓動和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給上海發電：「你們的這次行動，不單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65]

但這之後，事情的發展卻急轉直下。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於11日深夜乘專機到上海，與「工總司」負責人展開談判。起初，他堅持要工人群眾先行返回上海，「有什麼事，到上海再說」。但後來，張春橋在直覺的引導下態度漸變，承認工人們的行為是「革命行動」，並承諾回上海後解決他們提出的各項要求。[66] 至11月12日下午，參與事件的大部分人員回到上海。11月13日下午，張春橋與「工總司」恢復談判。他不顧上海市委先前的決定，在「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組織、承認赴京告狀是革命行

動、所造成後果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負責、市長曹荻秋作公開檢查、對工總司提供各方面的方便」等五項條件上簽字。[67]

張春橋敢在這件事上「先斬後奏」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曾說過文革「光是學生不行，工廠也要開展」。[68]張從中感受到毛澤東要讓工人捲入文革的迫切心理，從而揣摸到了毛的底牌。張回到北京後，身為中央文革顧問的陶鑄仍對張的做法表示反對。[69]當時，陶是周恩來的主要助手，他的態度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周的態度，只是周沒有直接出面。但毛獲報後，馬上同意了張春橋對事件的處理意見。11月14日，毛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員開會時，拿出《憲法》說：工人有沒有結社自由？憲法你們看不看？毛以此支持張的行動，還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先有工人組織這個事實，再有工人組織這個概念。」[70]毛對安亭事件欣然同意並大加讚賞的處理，又開了一個中共執政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先河」。自文革開始以來一直便存在、又經過「十六條」正式肯定的關於工人不能跨行業建立群眾性組織的禁令，也由此而失效。同時，這也打開了紅衛兵運動和工人造反派運動合流的大門。這裏反映出的是毛不顧一切的決心，一種無法用尋常語言講述出來的「惟恐天下不亂」的心態。

周恩來沒有直接參與安亭事件的處理，但他始終關注着事態發展。對於這一事件的全部過程，以及張春橋「先斬後奏」、而毛澤東又對此欣然同意並大加讚賞的情況，他都盡收眼底，但並沒有親自出馬處理相關問題。起初，他曾讓陳伯達出面阻止事態發展；後來當張春橋向他彙報在安亭談判的情況時，他又讓陶鑄出面應對。[71]這就為他在毛表態後迅速「轉彎」留下了充分的餘地。

毛澤東對安亭事件表態的當天，一個全國工業、交通運輸計劃會議在北京開始舉行。這時，陳伯達已經起草了〈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其中有允許工人成立組織、學生到工廠串聯等內容。[72]這個草案拿到會議上討論時，一班黨政官員連聲抱怨，說如果「讓學生和工人聯合起來造反」，會把國民經濟完全搞亂、甚至搞垮。[73]

會上，在周恩來的授意下，由谷牧牽頭，起草了〈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十五條），規定工廠不能停產搞運動，工人只能在業

餘時間參加文革，學生不能到工廠串聯。[74] 然後，草案上報毛澤東。這其實也是周又一次試探毛的「底線」。但是，毛沒有給周留下任何餘地，讀了「十五條」後立即表示：不行。工交企業的運動可以分批分期進行，但對工人建立組織要支持，可以另搞一個規定。[75]

這樣，原定只開五天的工交計劃會議開了近三個星期。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工交計劃會議。6日，林彪做總結發言時說，工交計劃座談會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整個工交企業要徹底把方向來個大轉變。[76]

於是，工交會議上的風向完全變了。會議的後半段，又由陳伯達牽頭，以先前的「十二條」為基礎，也吸收了「十五條」中「業餘鬧革命」等內容，搞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來，經毛澤東批准後，12月9日由中共中央發出。它允許工人在業餘時間參加文化大革命、建立革命組織，工人和工人組織之間可以在本市串聯，學生可以到工礦串聯，工人也可以到學校串聯。[77] 這麼一來，文化大革命擴散到全國工交財貿各單位的大門被打開了。

周恩來在工交會議上，說過一些頗發人深思的話。談到文革造反潮流時，他說「既然擋不住，就只有疏導」。他還說：

> 這個懲罰是我們過去造成的，我們不來承受誰承受？我們不來入地獄誰來入地獄？我們不來入虎穴誰來入虎穴？沒有一種精神準備不行。[78]

這是文革大潮初起時，周恩來內心世界的一次少有的透露。對於這段話，究竟應當如何解讀？這是否如官史所說，體現的是周對文革心存抵觸，卻必須「忍辱負重」地對待？或如戚本禹所言，這其實表露出了他積極支持文革的態度？[79] 我以為，在周對文革的態度和看法中，這兩者恐怕都有。但更為基本的，還是他的無奈。畢竟，自文革開始以來，周固然一直是被推着走的，但他同時竭力想要在理解毛的意圖的基礎上爭取某種「主動」。歸根結柢，周所面對的毛不僅在全黨全國的權力和權威都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一個更為根本的層面，毛還有着一整套當時已成為絕對主流話語的關於繼續革命的大敘述，而周恩來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樣，卻拿不出一套可以用來取代這一套的替代性話語。掌舵的是毛澤東，周恩

來充其量只是船上的大副。他必須根據甚至揣摩着毛的指令，讓中國這艘大船在暗礁密佈的湍流中行進。

那麼，周恩來是否可以或應當採取破釜沉舟的做法，辭職、退休乃至「殺身成仁」？我們永遠無法進入周的內心世界，更不能在這上面得到確定的答案。但我每每看到這樣的問題時，總是禁不住想：如果周倒下了，難道毛澤東的文革就不搞了？可以肯定的是，周若是真的倒下，毛的文革還是要搞下去的。但中國這艘大船，若是失去了周恩來這樣一個相當於疾風驟雨中的「應急錨碇」，便將面臨着更大的、可能翻沉的危險。

這裏，周恩來的個人考慮和他對國家命運和大局的憂慮糾纏一起，剪不斷，理還亂。他置身於一個既走不出去、也解不開來的怪圈，我們作為過來人和後來者，是不能夠、也不應該在這上面妄下斷論的。

五

就在這時，毛澤東發出了一個全新的特大信號。12月26日，適值毛73歲生日，他把中央文革的成員們，包括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戚本禹、關鋒等人召集到家裏一起吃飯。

但這其實並不僅僅是一場飯局，而是毛澤東有話要說。他最擔心的是他死後，「將來資本主義會不會在中國復辟呢？」他自己答道：「這就要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毛說：「這個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同黨內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資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頭的鬥爭。鬥爭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這一次是全面的鬥爭，從上而下，從紅衛兵到工廠、農村、機關，全國都鬧開了。」問題在於文化大革命會不會走過場？「不僅學生被鎮壓，機關裏的造反派、工礦裏的造反派，也遭圍剿。沒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沒有，給領導提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熱氣騰騰的群眾運動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毛澤東還特別提到，「過去講內外有別」，但「文化大革命，內外都要搞」。這番話，幾乎就是對着當時並不在場的周恩來講的。[80] 說話之間，毛澤東突然站立起來，舉起酒杯，說了一句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話：「為明年全國全面內戰勝利乾杯！」[81]

毛澤東以七旬老人之身，發出的吶喊何止是振聾發聵，簡直達到了失去理智、不顧常情、近乎歇斯底里的地步。所有在場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毛真的說了祝願「全國全面內戰」的話。[82] 這是最高指示，是要不折不扣地執行的。

周恩來沒有參加12月26日在毛澤東家中的聚會。但根據戚本禹的敘述，江青第二天就向他轉達了毛的談話。周聽後評論道：主席講的內戰，意思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革命派同黨內走資派的鬥爭，是文鬥，而不是槍炮武鬥、打派仗。[83] 如果戚的回憶是可靠的，這其實是周試圖在掌握毛新說法的解釋權上獲得主動權。

但沒過幾天，周恩來就親耳聽到了毛澤東說，文革就是「全面內戰」。毛在生日飯局上為「全國全面內戰」祝酒後，顯然意猶未盡，對此念念不忘。12月29日，他在中南海住處召集「中央碰頭會」，林彪、周恩來、康生和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馬都參加了。毛多次直言不諱地提到，文革其實就是「全面內戰」。他一開口就危言聳聽地說：

> 現在是全面內戰，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就向我們宣佈了。……現在封了很多報，我贊成封些報紙的。因為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以前《人民日報》、中宣部、文化部，你講你的，他講他的，不聽話。毫無辦法。所以資產階級跑到我們內部，全面內戰，你毫無辦法。現在還有工、農、軍、政，多少年來資產階級向我們全面內戰，我們現在才了解。

毛歷數了一堆文革中出現的亂象（如「『西城糾察隊』亂抓人，沒有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的氣氛」，此時周恩來插話說：「還有紅色游擊隊」），之後毛又反覆地回到全面內戰這個話題：

> 關於全面內戰的觀點，我們要認識。過去黨內外資產階級、工農商學兵，向我們全面內戰，我們長期不覺悟。我周圍的人，上欺、下壓、中排，欺就是欺我，吃喝、××（字跡不清）……鑽進來全面內戰。……資產階級向我們宣佈全面內戰，有些公開搞的，譬如《燕山夜話》，只我們沒有看；有些秘密搞的，如西城糾察隊。工農商三個產業部門，上層建築、政黨、機關。……資產階級向我們宣佈全面內戰，多年了，我們無覺悟。我們現在要向他們宣佈全面內戰，工農

> 商學黨政，全面內戰，主要是對一部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個口號，我看不要用了，太寬了。至於工農學生中，他們自己會搞的。……我主要講的（是），敵人要用全面內戰，我們要用全面內戰去對付敵人。[84]

毛澤東73歲生日宴後，文革小組的幾名筆桿子就聚集在一起，起草1967年的元旦社論。他們都參加了12月29日的中央碰頭會，也都聽到了偉大領袖在講話中多次提到「全面內戰」。他們反覆討論和領會毛澤東的想法後，沒有直接使用「全國全面內戰」的說法，而是用了「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提法，並把焦點集中到什麼是文化大革命的「底」，把社論題目定為〈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85] 社論中最要緊的一段話是：

>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工人運動中，農民運動中，學生運動中，在各個戰線上，都要大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立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關鍵。黨政機關的革命幹部，要打破清規戒律和那些束縛革命的條條框框，到群眾中去，同工人、農民和革命學生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使我們的黨政機關，徹底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化。[86]

這是當時向全國發出的一個極重要的信號：文革又要擴大升級了。

本來，周恩來和很多人都希望，文革大動亂已經快要到頭，要走向秩序的重建了。然而，毛澤東在生日飯局上說的話，尤其在12月29日中央碰頭會上對於「全面內戰」的反覆強調，卻表明真正的大亂還沒有開始。元旦社論的調子和新提法，以及此後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經以對周恩來來說再清楚不過的方式表明，文化大革命要進入一個他無法想像的「新階段」了。

不過，這裏的弔詭之處在於，所有這一切是否就是毛和現存黨及國家官僚體制的徹底對立？說到底，不管毛對當時的體制多麼感到不滿，難道他不正是這個體制最重要的創造者，也是最主要的「獲益者」嗎？因此，在一個非常基本的層面，不管他如何表現出對現存體制的不滿，甚至試圖用想像中的「全面內戰」的手段向現存體制宣戰，他仍然同體制有着「同為一體」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在這一意義上，即便他擁有似乎無限的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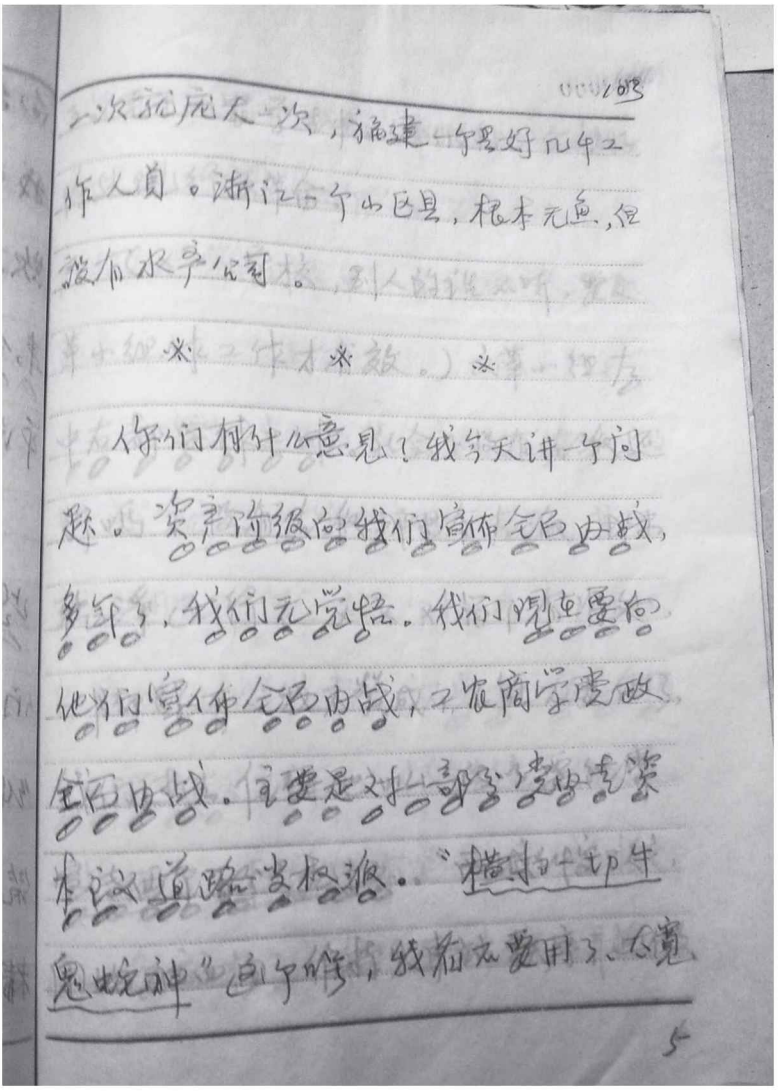


圖 25.3：毛澤東在中央碰頭會議上談文革就是「全面內戰」，1966 年 12 月 29 日。（855-8-3389-9，河北省檔案館）

力和天馬行空般的想像，他在現存體制面前就像一個站立於如來佛掌心的孫悟空，仍然是體制的「最後的囚徒」，周恩來則正是現存體制及其深厚力量的某種「人格化」的代表。從這一意義上説，毛澤東在向現存體制宣戰時，比之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周恩來的合作。

六

文革直到此時，雖然已經造成了各級黨和政府組織難以行使權力、各地（主要是城市）出現各種混亂的局面，但總的來説，黨和政府的現存機制尚未失控，「天下」尚未「大亂」。但毛澤東「全國全面內戰」的想法一旦放出來並轉化為現實，則天下真正「大亂」便只能是唯一的結局了。這同毛「惟恐天下不亂」的性格，以及「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基本想法，是相契合的。

毛澤東採取新步驟，來將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在中央高層政治中的第一個徵兆，是當時從表面上看似乎仍然屬於文革「紅人」的陶鑄受到了整肅。毛生日家宴的第二天，12月27日在中央碰頭會上，江青突然對陶鑄發難，指責他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周恩來聽後大吃一驚，但他還是想要保住陶鑄。據戚本禹回憶，周聽到毛關於「全國全面內戰」的説法後，就馬上把毛談話的精神告訴了陶鑄。[87]

12月29日，毛澤東批評了江青，説她自作主張，其實是認為她衝得太急了。[88]但後來看，這恐怕是因為他當時還沒有下定要把陶鑄拿下的決心，江青卻過早地把這件事情捅了出來。新年過後，陶鑄繼續受到衝擊。1月4日，江青、陳伯達又當眾宣佈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89]周恩來其實還想保陶鑄，1月5日凌晨和陶鑄談話，要他幾天內不要外出。[90]但短短幾天之間，形勢急轉直下。1月8日，毛表達了不再保陶鑄的意思，頃刻之間，陶鑄就從中國政治舞台上被打了下去，成為文革中劉、鄧之後遭到集中批判的又一個「大靶子」。[91]

陶鑄倒台這件事似乎來得突然，但實際上卻早有蹤跡可循。陶鑄本來是華南及廣東的一名「地方大員」，長期受到毛的信任重用。文革全面爆發時，陶鑄被調入京中，迅速躥升為正式排名僅列毛、林、周之後的中國第

四號領導人。一時間，他在政治上炙手可熱，儼然已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僅次於林彪而冉冉升起的又一顆新星。

自陶鑄調入京中並承擔起日常政務和黨務處理後，周恩來和他建立起緊密的工作關係。他不僅是周的幫手，也在日常運作中成為周恩來與文革期間出現的各種巨大麻煩和衝擊波之間的一道屏障。周日理萬機，國務院的許多日常工作是由身兼副總理職務的陶鑄來處理和應付的。在政治理念和處境上，周、陶兩人也有着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不見得完全理解毛的意圖，但在輔佐毛推動和進行文化大革命這一點上，卻都願意盡量按照他們所能看到並理解的毛的思路行事。在這一前提下，他們按照自己過去的經驗，覺得文化大革命不能以中共整個黨和國家機制為「打倒」對象，而仍然應當將黨的各級組織和幹部當作領導群眾運動的基本依靠。他們完全不能想像的是，毛澤東後來居然會走到發動群眾來摧毀中共自身的黨和國家機器的地步。

整肅陶鑄，歸根結柢是毛澤東的決定，也是他決心要將文化大革命推向「深入」並「進行到底」的關鍵一步棋。直至當時為止，儘管文革的群眾運動已在全國興起，但各級黨政組織仍然基本上還完整存在，並仍然對整個局勢有着不同程度的控制。通過打倒陶鑄，毛澤東發出了一個明白無誤的信號：他要向各級黨政組織全面開刀了。

毛澤東走出打倒陶鑄這一步，是由江青在前台操作的，這也是江青及中央文革開始取得巨大政治權力（包括政治上無與倫比的生殺權力）的標誌和開端。陶鑄倒台，還同文革小組內部陳伯達開始被「邊緣化」糾合在一道，成為江青全面掌控文革小組的開端。某種意義上説，文革從此也成為毛澤東和江青的「夫妻老婆店」。

陶鑄倒台，也將周恩來放到一種更為困難和尷尬的局面。1月8日，毛談到他不保陶鑄時説，「這個人不老實」。[92] 沒有直接資料説明，周恩來在聽到這句話時有什麼反應。但他不可能感覺不到，毛的這句話某種意義上也是對他説的。什麼叫「不老實」？不就是陶鑄在執行毛的路線和政策時，沒有實打實地按照毛的想法和意圖行事嗎？但實際上，當時又有多少人（包括周恩來在內）能夠吃透毛的想法和意圖，從而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意圖行事呢？毛澤東説陶鑄「不老實」，也是對周身為「舊政府」代表人

物及政府權力「機制性化身」的一次嚴重警告。正是自此時起，出現了「新文革」和「舊政府」之間存在着尖銳矛盾的說法。

陶鑄受到整肅不是一樁孤立的事件。幾乎就在此事發生的同時，另一個黨內軍內「大拿」賀龍也被端了出來。這件事的直接推手是林彪。在中共軍事系統中，賀龍和林彪是兩個不同山頭的頭，歷史上的關係說不上親密，但並無大的過節。進入1960年代後，由於廬山會議後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林彪身體不好，賀出面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兩人之間漸生隔閡。這也是羅瑞卿被搞下台的一個重要背景因素。文革開始後，賀龍起初並未受到觸動，但以後隨着林彪在毛澤東面前不斷進言，擺出一副必欲置賀龍於死地而後快的面孔，毛的態度變了。他本來就對賀龍與劉、鄧走得太近不滿，同時又對賀帶槍到處行走的行為心存疑惑；到了1967年1月，他在反覆權衡利弊後，決定放棄「保賀龍」的態度。

但即便對毛來說，這其實也是一項極不尋常的舉動。毛處理黨內和軍內人事問題時，從來就注意擺平各個山頭之間的利害關係，並使得各山頭保持某種代表性和相互之間力量上的平衡。賀龍在歷史上沒有反毛的「舊帳」，反而在毛要同江青結婚的事上，有過「保駕」的大功。但這一次，毛居然不顧自己定下的這些不成文的「規矩」，也顧不得賀龍對自己的有用之處，而走出了拋出賀龍這一步，這不僅說明他太有用得着林彪之處，也意味着文革真的要打破常規，進一步鬧大了。

從另一角度看，毛走出整肅賀龍這一步，其實也是對周恩來的又一次「敲打」。歷史上，周、賀兩人關係密切。當年，中共在南昌起事，賀龍就是在周的游說下參與起事並加入中共的。也可以說，賀龍走上共產黨革命的道路，周是引路人。此後的漫長歲月裏，賀龍一直將周當作兄長看待。賀龍倒台，周恩來怎能不產生一種「唇亡齒寒」的感覺？

1967年1月11日，賀龍受到衝擊後，徑自前往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家中「避難」。周恩來匆匆見過賀龍一面後，便因「工作過於繁忙」，未再與賀龍見面。直到1月19日下午4時，周同李富春一道找賀龍談話，告訴他，林彪說他在背後講林彪壞話，並在軍內到處伸手，「毛主席百年後他不放心」。賀龍還試圖分辨幾句，周打斷了他，對他說的最後幾句話是：「你不要再說了。毛主席不是保你麼。我也是保你的。給你找個地方，先

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93]周恩來是話中有話：毛保，他才保，也才能保；至於「改造到老」，既是對賀龍的要求，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第二天凌晨4時，賀和夫人薛明就在周安排之下，移往香山附近人跡罕至的一所平房。然而，儘管賀龍還記得周恩來秋天要「接你回來」的話，日思夜盼，周卻沒有出現。周恩來的做法幾近絕情。賀龍心中也頗有怨言，幾次說：「別人不了解我，難道他周恩來還不了解我？」[94]實際上，周有他的難言之苦衷，尤其是在林彪必欲置賀龍於死地，而毛澤東也決定要打倒賀龍的情況下，他要想改變毛的主意恐怕是難以辦到的。那麼，1967年1月之後，周恩來有沒有在毛澤東面前為賀龍說過話？沒有看到這方面的記錄。這至少說明，此時毛澤東已經把這扇門關死了。賀龍本來便身患嚴重的糖尿病，監控中生活及醫療條件惡化，最後於1969年病亡。

陶、賀相繼倒台時，周恩來召見外事部門司級以上幹部和群眾組織部分領導成員，詢問各人情況後講了幾句話，其中一句是：這次運動是黨內鬥爭歷史上最殘酷的一次。[95]這是他內心深處想法又一次少有的透露。周行事時不能不更加火燭小心，走一步看一步，時時處處盡可能體察毛的想法和意圖。

七

陶鑄和賀龍的相繼倒台，是當時整個中國政治與社會暴風驟雨匯聚的大圖景的一部分。幾乎在這兩件事發生的同時，上海發生了造反派組織全面奪權、接着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事件，當時被稱為「一月風暴」乃至「一月革命」。後來看，這成為文革進入毛澤東所預言的「全國全面內戰」階段的直接入口。

安亭事件後，上海工總司獲得合法地位，工人造反派和學生運動結合起來，上海的文革局勢如江河直下，朝着「大亂」方向迅猛轉變。1966年11月27日，上海的一個紅衛兵組織「紅革會」向郵局提出，要將他們辦的《紅衛戰報》和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一併發送，以便肅清對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上海市委予以拒絕。紅革會採取行

動佔領報社，工總司出面聲援；對上海市委持「保」的態度的另一派工人組織赤衛隊也動員包圍報社，支持市委不對紅革會、工總司讓步。[96] 此事上報北京後，未見周恩來直接表態的資料。陶鑄出面答覆上海市委：「群眾組織的報紙與黨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報紙，這是個原則問題，要頂住。」[97] 陶鑄當時凡事多與周恩來商量，從他的話中多少可以看出周態度的端倪。

但一週後，事情發生了峰迴路轉的變化。毛澤東發話說：黨報的門是可以封的，沒有什麼了不起。[98] 12月5日，中央文革表態：「解放日報附帶發行紅衛戰報無非是揭露市委的錯誤，應該歡迎。」[99] 這時，一直沒有說話的周恩來也讓陶鑄轉告上海市委：「紅衛兵提出把他們的報紙同解放日報一起發行，可以一起發行麼。」[100] 當天，上海市委代表在紅革會和工總司要求市委認錯並轉變立場支持造反派的要求上簽字。[101] 這一來，上海各路造反派聲勢大振，上海市委威信掃地。幾天後，徐景賢、朱永嘉等一批市委寫作班成員宣佈「集體造反」，並於12月18日成立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造反的熊熊烈火在上海市委內部燃燒起來。

這時，上海市委領導開始「轉向」，試圖同擁有近80萬成員的赤衛隊拉開距離，進一步引發了赤衛隊的不滿情緒。12月27日起，數以萬計的赤衛隊員湧入康平路市委大院，要求市委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工總司也調集大批人馬到康平路大院，拳腳相加之下，赤衛隊被趕出院外。一部分赤衛隊員想到了一個多月前的安亭事件，決定去北京告狀。他們攔截了數十列客車與火車，有兩萬多人到達上海以北30公里的崑山車站，京滬鐵路陷於癱瘓。[102]

從表象上看，崑山事件簡直就是安亭事件的翻版和重演，但兩者的差別其實很大：安亭事件同毛澤東的意圖和想像相契合，而崑山事件卻違背了「今上」的計劃和步驟。而從周恩來的角度看，他最擔憂的是不能讓京滬之間的交通大動脈中斷。

1967年1月1日凌晨3時，周恩來突然給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打電話，說「中央決定要你出來工作」，還說：「崑山事件要盡快解決，上海一定不能亂，南北鐵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斷。」[103] 周讓陳丕顯出面處理這件事，應是有他的考慮的。陳丕顯是上海最大的「當權派」，但他在江青到上

海搞「京劇革命」以及姚文元寫《海瑞罷官》等問題上都相當支持配合，江青對他的印象應該不錯，不久前還兩次請他吃飯。[104] 他對周也相當尊重，特別是曾就《海瑞罷官》一事的背景給周「通風報信」。如他能夠出面，不僅對穩定上海局勢有好處，也會在全國範圍內對由省市一把手掌控運動的發展產生某種「示範」效應。陳丕顯當時正處於鼻咽癌手術後的恢復期，一直盡可能稱病不出，但既然周恩來出面親自找他，而他自己也有不甘蟄伏之心。他馬上出來了，於1月1日凌晨5時召集各方開會，強令赤衛隊從崑山撤回。[105] 1月3日，京滬鐵路交通重新開通。

毛澤東也一直注意着上海事態的發展。1月2日，他決定指派張春橋和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分去上海，其實他們等於是毛的「欽察大臣」，可以通過保密電話專線直接向毛報告。[106] 張、姚於1月4日到上海後，《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相繼於1月4日和5日宣佈造反及奪權。雖然說陳丕顯是周恩來請出來的，張春橋大概是怕他搶了自己的風頭，還是執意要把他搞成上海的頭號批判和打倒對象。1月6日，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又舉行十萬人大會，批判炮轟陳丕顯、曹荻秋及上海市委，並發佈了聲討陳、曹的通令。[107] 這是全國第一樁由造反派組織宣佈在省市一級奪權的事件，開創了又一個先例。

毛澤東得到報告後，沒有對上海造反派奪取市委權力一事表態，《人民日報》也沒有報道上海1月6日奪權大會的消息。[108] 直到兩天後，毛召集中央文革成員開會時，不提上海1月6日的奪權大會，而是強調了《文匯》和《解放》兩報的奪權事件。他說：《文匯報》4日造反，《解放日報》5日也造了反。兩張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毛還說：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必將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109]

毛澤東的做法所透露出的，是他在「破」、「立」之道上所遇到的巨大悖論。如何對待現存黨、政、軍等建制力量？難道真的把它們統統砸碎，一切推倒重來？當時，不僅周恩來搞不清楚毛澤東的真正意圖和底線，毛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他說了「全國全面內戰」的話，但事到臨頭，究竟怎麼搞、搞到什麼程度，他卻猶豫了。

這時，在上海以至全國各地，一股強大的「經濟主義」狂潮也伴隨着造反和奪權而迅速擴展開來，說起來這並不奇怪。文革中群眾性造反運動的興起，除自上而下的鼓動外，從一開始也具有自下而上的特質，其中所反映的是中共建政以來積累起來的種種社會、政治和經濟矛盾的爆發。造反之風一旦颳起，普通民眾必然會爭取同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各種經濟利益，對那些相對處於城市社會更底層的民眾（如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就更是如此。這股浪潮初起時，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員出於為群眾運動「煽風點火」的意圖，曾於11月間對主要由臨時工、合同工和外包工組成的全國「紅色造反總部」表示支持。[110] 上海「一月風暴」發生時，普通民眾的各種經濟訴求也伴隨着造反之風蔓延開來，形成了後來被冠之以「經濟主義妖風」的潮流。

1月9日，《文匯報》、《解放日報》發表了以工總司為首的32個革命造反組織的〈緊急通告〉，提出要堅持革命造反和奪權的大方向，反對並制止隨意增加工資、濫發補貼、搶佔公房的經濟主義妖風，並說這是「上海市委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111] 第二天，江青將〈緊急通告〉的相關報道拿給毛澤東看。毛讀後馬上意識到，他可以通過在全國推廣〈緊急通告〉，既支持革命造反派奪權的做法，又不使形勢完全失控。他立即表態說：「此兩件很好」，並說上海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應「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112] 毛澤東還指示，要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聯合發出賀電。

毛澤東對上海〈緊急通告〉的反應，其實也是周恩來這些天來一直在等待並極希望看到的。這一次，他反應異常迅速。1月10日，他同陳伯達、江青、康生、王力、關鋒等中央文革成員一道，接見北京造反派代表及外地群眾代表。周恩來特地讓王力讀了上海〈緊急通告〉，以及《人民日報》發表的〈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社論。[113] 他還說，上海的〈告人民書〉是毛澤東發現並決定向全國廣播的，此後並親自主持開會討論給上海的賀電。[114] 賀電臨發出前根據毛指示，又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外加上了「中央文革」。[115]

1月16日，毛澤東又在中央碰頭會上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主管監督，不管業務。[116] 這之後，周恩來有

了「最高指示」的依據，一方面在原則上大力肯定奪權行動；但另一方面，只要有機會，他就設法給「奪權」加上一系列「緊箍咒」，一再提出既不能用抓生產來壓革命，也不能用喊革命來破壞生產，實行經濟主義實際上也就是修正主義。1月下旬，他在接見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時談到了奪權問題，並試圖理出一條既符合毛的意圖，又不至讓「天下」亂到不可收拾地步的路子。為此，他提出了關於「奪權」的四個要點：第一，要由真正的革命左派奪權；第二，左派要聯合奪權；第三，奪權要以本單位為主進行；第四，一個系統的奪權必須一個一個單位來搞，不能一下子奪權。[117] 他是想盡可能地為接管和奪權劃框框、定規矩。

上海雖然發生了「一月風暴」，卻並不是全國第一個成立「新生革命權力機構」的省市，黑龍江和山東走在了前面，上海似乎落到了後頭。但實際上，在張春橋、姚文元的引導下，上海各路造反派正在做的，卻是一樁他們認為注定會名垂青史的大事。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這件事的源頭，其實就是毛澤東。據王力的回憶，關於新的權力機構用「公社」的名稱，就是從毛那裏開始的。1月中旬，毛曾讓王力打電話告訴張、姚，他在考慮成立「北京公社」的問題。[118] 這不奇怪。毛澤東一向對「公社」這個名詞情有獨鍾，從心底裏喜歡，歷來就稱讚巴黎公社。大躍進中，他又大聲說出「人民公社好」，不僅在農村，也曾在城市大搞「公社化」運動。現在，在張、姚直接參與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這不僅充分體現了毛砸爛「舊國家機器」的意圖，也將他自〈五一六通知〉發佈以來一直在尋求的建立「新國家機器」的想法付諸實施。在張、姚等人看來，這是繼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後，又一次將毛的意圖——一個更為重大、涉及文革根本的意圖——付諸實施的行為。

然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北京卻是一片沉寂。毛澤東把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壓了下來，不讓《人民日報》等報道——顯然他對「公社」的態度變了。據他後來對張春橋、姚文元的解釋，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如果一發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勢必衝擊中央，那就要改國號了，改政體，叫中華人民公社」。毛告訴張、姚：「上海公社還是改過來，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119]

毛澤東否定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稱，透露出來的是他在造反、奪權以及建立「新型國家機器」上的真實態度，像極了一段現代以及現實生活中「葉公好龍」的故事：像葉公一樣，毛在談到想像中的「龍」時，眉飛色舞，心嚮往之；但一旦真龍現身，他卻被嚇壞了。他發現，要統治中國，他還是離不開黨、政府、軍隊（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這些構成現存體制核心及中堅的力量。

問題在於，毛澤東放出了「全國全面內戰」的魔鬼後，又想要設置一個大框框把它罩起來（這其實是周恩來很願意做的），這做得到嗎？大凡群眾運動，都有自己的動力和發展軌跡，不會讓毛玩弄於股掌之中——即便以毛所擁有的巨大權力和權威，在這種事上也達不到「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的效果。

上海「一月風暴」及同時期在黑龍江、山西、貴州等地發生的奪權行動，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示範」效應。從1967年春天起，全國範圍內出現了以「奪權」為目標的群眾運動狂潮，一發而不可收。伴隨而來的則是各地派系林立，為爭權奪利而出現了大大小小、各種形式的武鬥，有些地方甚至動槍動炮，演出了一樁樁真正意義上「全面內戰」的血腥大劇。毛澤東很快就發現，他一旦放出了「全面內戰」這個魔鬼，要收回去就不是一件他可以說了算的事情。

第26章

天下大亂
（1967–1968）

一

1967年「一月革命」過後的那個春天，周恩來經歷了政治生涯中又一段霧霾瀰漫的時光。這麼多年來，他同黨和國家的現存體制一直保持着一種政治上「相依為命」的關係。一方面，某種意義上説，他是現存體制和行政權力的「人格化」，若是沒有他，體制的運作必定會遭遇困難；另一方面，黨和國家的現存體制反過來又成為他的政治地位和行政權力的支撐和依託。在文革大潮的衝擊下，現存體制首當其衝，搖搖欲墜，這對他不能不是一種嚴重的威脅。他行事時必須分外謹慎小心，也必須隨時面對種種事先無法想像的風險。

隨着奪權烽火向全國蔓延開去，「天下大亂」的局面真的出現了。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曾説，文革已經搞了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1] 運動進入到1967年後，他又曾把2至4月當作爭取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決戰階段」。2月3日，他在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和巴盧庫時説：「現在，兩方面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三、四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還要長。」[2]

然而，在「一月革命」向全國發散開去後，文革的群眾運動卻如同脱韁的野馬，毛澤東想收卻收不住，最後持續了九年之久，直至毛去世亦未能終結。

其實，一月革命後已有跡象顯示，毛澤東要讓文革朝着收場方向發展不會那麼容易。本來文革還在繼續，而毛放出了「全國全面內戰」的魔鬼之後，「種瓜得瓜」，各地已是亂象叢生。毛曾希望，以「上海奪權模式」為樣本，在全國各地操控「大決戰」，不讓他自己放的這把大火過度蔓延。他因此採取了一個重要行動：把軍隊引入文革運動，既讓軍隊出面支持「左派奪權」，又通過讓軍隊介入來控制局面，避免完全失控。1月21日，南京軍區黨委報告，安徽合肥地區造反派要舉行15萬至20萬人參加的大會，要求派部隊警衛會場，他們就此事請示中央。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彙報，毛當天就批示：「林彪同志，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他還寫下一段話：「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3] 兩天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聯名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4]

周恩來對軍隊介入文革從一開始就積極支持。1月27日，他根據毛澤東的意思，專門就此事表態：「軍隊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在運動開始時是不介入的，但實際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軍隊去保管，有的幹部去軍隊。在現在的形勢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須支持左派。」[5] 他這麼說，多半是因為軍隊的介入多少會為「天下大亂」的局面帶來些許秩序，並為權力結構的恢復和重建掃清道路，再由此而將文革運動引向結束。然而，這不是他想做就可以做到的。

毛澤東使出讓軍隊參與文革運動這個大招，其實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在黨政權力機構全面癱瘓的情況下，這是保持他及中央文革對全國各地控制的一種手段。但另一方面，這又不可避免地會使得以林彪為代表的軍隊力量（尤其是原紅軍一方面軍和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力量）在中國高層政治版圖中進一步坐大。本來，軍隊在林彪高升後出現的不平衡中還多少有點相對平衡的狀態，也可能被徹底打破。但毛澤東還是做了這件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本來就對軍權抓得很緊，在文革中抓得更緊。林彪身為副統帥，也被冠之以解放軍「指揮者」的名號，但在理論上，若他不知會毛並獲得毛的授權，甚至連擅自調動一個連的權力也沒有。周恩來不是中央軍委成員，在軍隊調動上就更沒有權力了。毛澤東在讓軍隊介入文革的同時，已讓背景和山頭都不同於林彪的徐向前擔任解放軍文革小組

組長。這一組織上的安排，是不是毛防患於未然，用來牽制、約束林彪勢力坐大的一個措施？不管怎麼說，毛相信軍隊仍然牢牢地掌控在他手裏。

二

毛澤東和周恩來當時都沒有想到，做出讓軍隊介入文革的決定後不久，就發生了一批老帥和黨內「老人」捲入其中的「二月逆流」，把毛的大戰略設想一下子打亂了。這樁事情是從幾位老帥和老人面對一月革命後的亂局發牢騷開始的，後來卻因誤讀毛的意圖，發展為他們的一場「抗爭」。

1967年元旦過後，陳毅、李先念、譚震林等幾位老帥和老人幾次聚在一道，發洩對文革亂局的種種抱怨。[6] 1月20日，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軍委碰頭會上，在軍隊要不要搞「四大」以及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受到衝擊等問題上，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三位老帥和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發生嚴重爭執，葉劍英拍了桌子，傷了手骨，然後「揚長而去」。[7] 這之後，周恩來出面，不讓蕭華出席衝擊他的群眾大會。[8] 老帥們也沒有其他對抗行動，事情沒有鬧大。

2月2日，周恩來給文革小組江青等人寫了一封信，提出兩項建議：定期分別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和中央碰頭會，前者「以文革（小組）為主，我參加」，主要討論「形勢和政策及有關文件草案」問題；後者以名列中央常委的周本人、陳伯達、康生、李富春為主，由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聶榮臻、謝富治及江青或文革小組指定的人參加，主要討論「黨政一些業務問題」。[9] 周提出這兩項建議，既是他又一次對毛澤東的試探，也是他試圖以此對當時混沌不明的政治局面多少有所澄清，從而爭取更大的行事空間和餘地。

然而，毛澤東讀到信後很快批示道：「此件不用，退周。」[10] 表面上，周恩來的建議似乎已被毛直截了當地否決，但實際上事情並不這麼簡單。毛顯然從周的信中讀出了什麼，講話行事出現了異動。2月6日，他召集周恩來、葉劍英和江青等文革小組的幾位成員開會時，居然對中央文革提出了嚴厲批評，說：「你們這一攤子人（指中央文革）要接受批評，你們毫無政治經驗，也沒有工人農民經驗，更沒有軍事鬥爭經驗，……一切老幹

部都打倒……你們早晚會被打倒。」又說：「江青眼睛朝天，天下沒有幾個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錯誤統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11] 毛澤東何以說這些話？這裏恐怕有幾層意思，首先是他對幾位老帥的安撫，因而試圖擺出一副「對親者嚴」的面孔，這是他用來擺平各種力量的姿態，也是他想要結束文革的另一個苗頭。此外，這當中是否還含有毛澤東一貫「放蛇出洞」的意思？他是否想看一看，他這麼批評中央文革後，其他人會有什麼反應？

本來，幾位老帥1月20日在京西賓館上演了大發牢騷後揚長而去的一幕後，並沒有什麼在這方面「跟進」的動作。但在毛澤東當着他們的面對中央文革提出批評後，他們似乎誤讀了毛這麼做的涵義。再加上，毛對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一直保持沉默，他們對毛意圖的誤讀更深，膽子也變得大起來了。

2月11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原定的議題是「抓革命、促生產」。參加者除文革小組成員外，還有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等人。會議開始後，他們就站起來抨擊中央文革在運動中的所作所為。其中，前幾天剛剛當面聽到毛澤東批評文革小組的葉劍英跳得特別高，對着中央文革的幾個人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說着說着，葉還對上海人民公社提出指責，「上海奪權，改名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12] 徐向前也帶着火氣幫腔道：「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把軍隊搞亂，還要不要這個支柱？……如果不要這個支柱，我就不幹了！」[13] 葉、徐的這些話，實際上不過重複了毛前幾天對中央文革的批評。但話從他們嘴裏講出來，其實已經破了中共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很多話，毛澤東自己可以講，別人不可以講。周恩來對毛了解甚深，作為會議的主持者，他在會上一直很沉得住氣，沒有加入葉劍英等人對中央文革的指責。[14] 他知道自己所處的是一種極為尷尬和微妙的地位，既不好鼓勵他們，也不想制止他們。

這前後的幾天裏，毛澤東又在幾個場合讓中央文革開會做自我批評。他批評江青，說她「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他又批評文革小組「代替了書

記處，也是獨立王國，……目無政治局，目無常委」；又說，「幹部統統打倒，怎麼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毛還解釋為什麼「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壓着沒有發表」，是因為「人民公社這樣的大事，你們不拿出來，不討論，別的大事，也不討論」。[15] 這一來，老帥老人們更覺得可以說話了。

2月16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碰頭會，除了江青以外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以及陳毅、李先念、譚震林、徐向前、葉劍英等參加，原定議題還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周沒有料到的是，他還沒有來得及宣佈開會，幾位老帥、老人就開始對中央文革發動凌厲攻擊。跳得最高的是譚震林。他擺出一副「老革命」的派頭，指着在黨內資歷要淺得多的張春橋的鼻子說：「你開口閉口講群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個打光。」大概因為江青不在場的緣故，譚說，「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還說，「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16] 說着，他就要離開會場，被周恩來當即喝止。參加會議的幾位老帥中，前幾次會上幾乎沒有說話的陳毅的話仍然不多，但講得最兇。他一開口就把當前情況和延安整風聯繫起來，「延安整風時，我們這些人，有總理、我，都是挨整的」，整人最兇的是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薄一波，但「今天的歷史證明，到底是誰反對毛主席？」他又把中國的情況同蘇聯聯繫起來，「斯大林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結果是修正主義上台」。譚震林要離開會場時，陳毅叫他「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17]

周恩來沒有跟着譚、陳等人發飆。他在會上講得最厲害的一句話是對陳伯達說的：「《紅旗》13期社論，這麼大的事情，老幹部統統打倒了，你們也不跟我們打個招呼，送給我們看看。」[18] 言語之間，周把自己和發飆的老人、老帥們擺到了一起。但表面上，周在會議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一直保持「中立」態度，基本上不說話，只是在譚、陳他們「鬧」得太厲害時，他才出來阻止。[19] 會議期間，周曾給毛打電話，應該是向毛請示報告。[20] 毛顯然並沒有讓他制止老帥老人們說氣話的行為。結果這天會上，中央文革那幫人被搞得狼狽不堪。

會後，周恩來沒有像往常那樣去毛澤東那裏當面報告。[21] 顯然，他是想對當天的事情做「冷處理」。第二天，周在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時講了兩個看法。第一，中央的權不能奪，各部黨組、黨委要恢復，還要行使職權。第二，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不能把老幹部一概打倒。會上，周還「殺雞給猴子看」，下令逮捕了財政部一名支持造反派奪權的副部長。[22]

江青沒有參加2月16日的會，這也是老帥老人們敢如此放肆的一個重要原因。會後，張春橋、姚文元和王力一起，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紀要〉，並向江青講述了會議情況。江青大驚，拉着康生和張、姚等人一道到毛澤東那裏告狀。毛起先只是「笑眯眯地聽着」，並沒有發作。後來，康生講到，陳毅在會上提到了延安整風，說那時的整人也沒有像這一次文革這麼狠。這一下觸到了毛的痛處，他陡然失色，大光其火地說：「難道延安整風也錯了嗎？還要請王明他們回來嗎？」[23]在毛看來，陳毅等人的行為是在一個非常根本的層面對文革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戰，簡直是要在政治上挖他的「祖墳」。這種情形，同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對彭德懷的態度和反應如出一轍。當時，彭提到了延安整風整人時說：「你們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們二十天娘還不行嗎？」毛當時也是大光其火。毛對周也有不滿。張春橋彙報時，講到周對《紅旗》第13期社論沒有送常委審查頗有微言時，毛帶着火氣說：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社論要常委審查批准。[24]

這次談話後，毛澤東等了兩天。2月19日凌晨，他召集林彪、周恩來、幾位老帥、副總理以及中央文革的成員開會，發了「雷霆之怒」。當時在場的康生會後說：「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見到他發這麼大的脾氣。」[25] 毛把前幾天發生的事叫做「大鬧懷仁堂」，用極為嚴厲和尖刻的語言訓斥「鬧事者」，並一口咬定他們的矛頭所向是他和林彪。就在幾天前，毛還一再對中央文革提出批評，此刻卻似乎統統都忘掉了。他斬釘截鐵地說：「中央文革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革，辦不到！」他甚至還用一種近乎無賴的口吻說，「我馬上走，林彪也走，陳伯達、江青槍斃！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26]

周恩來當着毛澤東和所有人的面不斷檢討，說2月16日的會開成那個樣子，他有責任。毛還是照着自己的思路說，這件事要拿到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一次不行就兩次，一個月不行就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會上還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27]從毛澤東那裏出來後，周恩來對傅崇碧說：「壞了，壞了，本來文革要結束了，這一來結束不了了。」

從2月25日起，毛澤東讓周恩來出面主持召開「政治局生活會」，清算「大鬧懷仁堂」事件，到3月18日，開了七次會。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以及譚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等都成了會上挨批的靶子。中央文革江青等一幫人仗着有毛在背後撐腰，趾高氣揚，給這幫老帥和老人扣上「資產階級復辟逆流」的帽子。老帥老人們統統嚇壞了，全線崩潰，一個接一個地做「上綱上線」的檢討。[28]會上，周恩來既是主持者，也是半個受批判對象。他在會上檢討說，自己在政治上「不敏銳」、「遲鈍」。江青沒有讓他太難堪，只是批評他「動搖」。[29]

但是，毛澤東並不打算打倒這幾位老帥和老人。說到底，他已經沒有打倒他們的本錢了。畢竟，老帥們並非幾個人，而是軍內在歷史上形成的各個「山頭」的代表。這時，賀龍已經倒了。若是再將老帥們一個個都打倒，林彪在軍內的勢力難免進一步坐大。毛治黨馭軍歷來講究「五湖四海」、分而治之之道。若軍隊裏真的出現這種情形，如何才能留下一副讓毛仍然可以控制的「殘局」?

在處理和批判「二月逆流」的過程中，中央高層的決策機制發生了大的改組。這之後，不僅中央政治局不再活動，就連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形成的中央碰頭會也不開了。毛澤東發話，讓張春橋通知周恩來：「要把中央文革當作書記處看待，黨和國家的重點問題，要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30]這麼一來，中央文革以毛的文革代理人身分，取代了政治局（以及早已癱瘓的書記處），成為中央最高決策機構。此後幾年間（直到中共「九大」召開），重大問題都由中央文革碰頭會研究處理，掌控了中國政治決策的主導權，周的處境也更加複雜、微妙乃至險惡。表面上，他是這個碰頭會的主持人，但實際上，江青作為「大老闆」毛澤東的化身，才是真正的「二老闆」，同以往相比，周更需要時時處處看着她的眼色行事。此後，周對江

青的態度也發生變化，除繼續表現出尊重外，還盡可能地順着她的意思做事，不同她發生衝突。畢竟，江青是毛的夫人，周知道，她的意思往往就是毛的意思。

三

從心底裏說，即便發生了「二月逆流」以及毛澤東和文革小組的嚴厲反擊，周恩來還是想讓文革「大決戰」走上軌道，從而盡快將文革引向結束。1967年3月13日，他在一次軍以上幹部會議上有一段專門講文革下一步該怎麼走的話。「（文革）第二階段什麼時候完？」他自問自答道，「毛主席說：二、三、四月看出眉目來」。周說：「三月份是個關鍵，……抓革命、促生產。把革命幹勁鼓起來後，革命幹部亮相，大聯合，這些工作做好了，到了五月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級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這樣，大概的眉目就可以看出來。」[31] 講這些話時，周希望文革在幾個月內結束的心情溢於言表。

在這個問題上，林彪採取了同周恩來呼應配合的態度。這次軍以上幹部會議，就是周直接和林彪商量後，由林彪出面召集開成的。3月20日，林彪在會上講話，其中有一段配合周的意圖和調子，談到了革命和生產的關係問題：「支援地方，總的方面還是抓革命促生產。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產，把生產停頓下來，也不要只抓生產，把革命停頓下來。我們應該同時進行，而且應該以革命來帶頭，來掛帥，來促進生產。……生產是不能放鬆的，生產放鬆了，會發生非常大的危險，會轉過來破壞革命。」[32]

但在這樣一件大事上，周恩來或林彪想什麼和說什麼最後並不算數。關鍵仍然在於毛澤東怎麼想，以及準備怎麼做。

本來，毛澤東看來是準備以一月革命的成果為前提，展開「大決戰」，並將文革引向結束。「二月逆流」的發生，一下子打亂了毛的戰略部署。他從參與「二月逆流」的老帥和老人們的行為中清楚地看到，他們這幫人對文革還是一派「口服心不服」的心態，有時甚至連口也不服。這之後，毛做了兩個大動作。第一個是讓軍隊在介入運動上又往前走出一大步，實行

「三支兩軍」，在地方實行軍管。3月19日，中央軍委發佈〈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規定全軍各機關部門除「戰備、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立即「抽調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員」，投入到「三支兩軍」中去。[33] 毛拿出這一招，看來是想通過對地方實行軍管，用軍隊來制約各地奪權過程，進而控制各地政治秩序的恢復和黨政機構的重建，以達到他全面控制下把文革引向「勝利結束」的目的。

就如先前支持軍隊介入運動一樣，周恩來也十分贊同毛澤東走出在各省市實行軍管這一步棋。他知道，這麼做多少還能在「天下大亂」的局面下爭取並保持些許秩序，並為黨政權力機構的重建掃清道路。3月13日，周在軍級幹部會議上講話時，用很大篇幅解釋了為什麼要實行軍管，以及怎樣實行全面軍管的問題。他說，要通過軍管，「在抓革命、促生產中，促進當地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他特別提到，要「幫助當權派中的革命領導幹部出來亮相，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決裂，給他們創造機會，教育革命群眾允許他們出來檢討，這樣才能推動革命『三結合』早日實現」。[34] 顯然，周把軍管看作讓靠邊站的老幹部重獲政治權力，也同時將文革運動引向結束的一條可行途徑。

從另一角度看，周恩來對軍管的態度，也涉及到他和林彪之間的關係協調問題，其中恐怕還牽涉到他洞察了毛、林表面緊密合作背後的微妙局面。這一點，在當時也許還不甚清楚，但隨着文革這齣大劇的場景一幕幕地不斷拉開，會慢慢地被推向前台，也會慢慢地變得清晰起來。這些都是後話。

但是，周恩來對軍管的積極支持又只是局限於各省市及地方層面。在中央層面，就像周在奪權問題上的區別對待一樣，他對軍管也沒有採取一概而論的支持態度。對於像交通、運輸、財經以及主管生產的各部，其有效運作涉及到國民經濟能否正常運轉，他對那裏的軍管不僅支持、甚至可以說是迫不及待，一再表示「不能再耽擱」、「不能再拖」了。[35] 但對在外交部等的「奪權」以及是否實行軍管的問題上，他持強烈保留乃至抵制的態度，至於搞奪權，也要在他的控制下搞。他不想讓外交決策及執行的大權旁落，否則有可能在國際上釀成大事。

毛澤東做的另一個大動作，是劉少奇問題性質的重大升級，從人民內部矛盾轉變為敵我矛盾，文革運動對劉的批判也朝着把劉往死裏整的方向推進。這是毛關於文革「大破」思想在政治鬥爭層面的具體化，也改變了文革運動具體發展的走向。

這裏暴露出的仍然是毛澤東推進文革時的一個最大悖論：他滿腦子都是一套「破舊立新」以及「不破不立」的想法，但他的破、立之道卻是極不平衡的。文革之始，他固然知道政治鬥爭要以打劉少奇為重點，並作為政治上「破舊」的中心步驟；但他卻不知道，打劉之後，怎樣才能或才算把文革進行到「底」。由此而產生的，是「打劉」作為政治鬥爭的範圍與「邊際」問題，以及打劉打到什麼程度、怎樣界定劉的「反動路線」的組織機制問題。如果將此定得緊一些，則政治上的打擊面就會小一些，可行性也就會大一些；但如果將範圍和邊際定得寬泛一些，則政治上的打擊面難免會擴大，難度也越大。

文革初期「批劉」開始時，毛澤東似乎並不想把這件事的邊際定得過於寬泛；或者，他似乎並不準備徹底打倒劉少奇。說到底，毛之所以發動文革，其目的固然包括「打劉」這一層意思，但又不能簡單地以「打劉」來概括。對毛來說，單單「打劉」不是一件難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我動一動小拇指，就能要他完蛋。如果毛的目標僅僅是打劉，那他完全用不着採取發動文革這樣一個大動干戈的行動，也大可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或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後，就為文革收場。但毛卻沒有、也不甘心這麼做。高層權力鬥爭固然是毛發動文革動機的一部分，但不完全是他搞文革的邏輯和根本原因。

二月逆流再度喚醒的，是毛澤東揮之不去的「身後焦慮」。毛擔心，若不將劉少奇徹底打倒，那在自己百年之後，他就還有東山再起的可能。毛不能讓劉在任何情況下還有回魂的機會，或讓劉在他死後搞得「江山變色」。同時毛也希望，通過使劉成為一個「全黨共討之、全民共誅之」的靶子，徹底打倒他，在將文革引向「深入」的同時，也能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一種「同仇敵愾」的氣氛，並以此為動力建立起一種新的統治秩序。毛在徹底打倒劉少奇上下了決心後，從3月開始，他對劉的提法變了，不再稱劉少奇為「同志」。同時，他不僅支持，甚至親自參與了戚本禹寫〈愛國主

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對劉搞上綱上線全面批判，從根本上予以否定，並同意稱劉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36]

上述變化，對周恩來的影響巨大深廣。從大的方面來說，他不會看不到，毛澤東說的文革「大決戰」根本不是幾個月就可以收場的。舊問題還沒有解決，形形色色的新問題又會不斷冒出，哪裏是幾個月就可以了事？

從具體實施的層面來看，毛澤東要把劉少奇從政治上往死裏打，也把周恩來又一次逼進了進退維谷的境地。從歷史上看，周和劉少奇的個人關係算不得親密，但兩人有着相當程度的相互尊重，在工作上也一向可以合作。延安整風中，劉曾是「批周」的一員大將。整風後，劉在黨內的地位上升為第二把手，是毛推出來的，也同周在整風中遭到嚴厲批判並導致黨內地位下降有着緊密聯繫。然而，儘管劉少奇是整風中批周恩來最兇的一個，但周對劉的崛起卻並無抵觸或抵抗之意。根據周一貫的行事準則，他當然知道，劉成為中共第二把手、後來又被當作毛的接班人，也減少了他在重大決策及最高權力分享上同毛發生直接衝突的可能性，從而也增加了他在黨內高層政治中的安全係數及迴旋餘地。中共建政後，周和劉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正面衝突。經過1954年高饒事件後，周、劉之間的合作關係還加強了。當周成為毛批判「反冒進」的靶子時，劉雖然沒有站出來幫他說話，但也沒有落井下石、對他作任何出格的批評。在毛透露出撤換周的總理位置的意向時，劉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一起，堅持讓周留任。大躍進後，毛退居「二線」，劉成為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而周仍然是政府日常工作的負責人，兩人之間的工作關係（尤其是在大躍進失敗後的恢復和調整時期）相當合拍，至少沒有發生過留下記錄的大衝突。

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初，周恩來雖已明顯感到毛這一次真的是來者不善，但對於毛的真正意圖卻依然不甚清楚。在打倒彭、羅、陸、楊的問題上，周一旦看清毛的意圖後，便緊緊跟上；但在毛整劉的問題上，周卻表現出了更為謹慎的態度。他肯定意識到，若是在這件事情上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帶來政治上的滅頂之災。如果連身為國家元首的劉少奇也是說打倒就打倒，那還有什麼是不能衝破的？

隨着劉少奇案性質的改變和升級，周恩來遇到了新的大挑戰。負責此案的中央專案辦公室，是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後成立的，最初集

中處理彭、羅、陸、楊的案子。後來，隨着陶鑄等人先後被打倒，專案辦公室的任務和使命也不斷擴大。劉案升級後，把劉往死裏整成為中央專案辦公室的中心任務，其構成也發生重大改組。周恩來是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召集人，也成為中央專案工作的當然主管，毛澤東順理成章地把主持徹底打倒劉少奇的差使交到他手裏。毛這麼做，有着一石兩鳥的用意。第一，這麼一件做大惡人的事情，只有讓周出來做才最能夠擺平各方的關係。第二，讓周做這件事，今後凡是同劉有關的一切文件簽報等都要由周負責。將來的歷史記錄上，如果這件事搞對了，周只是一個執行者，功勞不見得算到他身上；但如果搞錯了，那麼周很難脫離干係。這件事周不想做也不能不做，注定是要被「拉下水」了。

就在這個當口，使情況變得更為複雜的是，周恩來本人也成為一些群眾組織試圖衝擊和批判的目標。早在二月逆流後，北京高校就出現了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3月底，北京鋼鐵學院學生、幹部子弟張建旗發表了炮打周恩來的聲明。5月中旬，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紅衛兵營」貼出大字報，攻擊周是「反革命兩面派」。5月下旬，張建旗牽頭在北京鋼院成立「五一六兵團」，又貼出〈致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的大字報，攻擊周是「二月黑風」的後台。隨後，他們向外串聯擴展，同一些別的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批判攻擊周恩來。[37] 即便是在被周視為「後院」的外交部，也出現了「疑周」和「反周」的聲音。[38] 幾乎同時，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在「抓叛徒」的過程中，從1930年代舊報紙裏翻到〈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並查明伍豪是周恩來當年的化名。他們把報紙送到中央文革，江青又轉給周。[39]

如果僅僅是來自群眾組織的懷疑和批判，周恩來不怕，關鍵在於毛澤東如何看待此事。毛這時似乎採取了保周的態度。他看到周在社會上遭到攻擊的材料後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並將批示送給周本人，讓他知道有這回事。[40] 中央文革也相應地對群眾中的「批周」行動狠狠地予以壓制，宣佈五一六兵團是受到壞人操縱的反革命組織、炮打周恩來就是反對黨中央等等。[41] 但正是在這裏，也留下了後來「深挖五一六運動」的一個重要伏筆。

對「伍豪事件」又被紅衛兵翻出來，周恩來極為重視，他知道這件事搞不好，他就有可能在政治上被置於死地。他一面覆信江青，說明此事

「純屬敵人造謠」；一面又從圖書館調出當年的報紙，動員手下工作人員從中找出「伍豪啟事」及隨後的否定啟事，並親手編製了一份大事記，然後致信毛說明「伍豪啟事」係偽造，發生在他已到江西之後。[42] 本來，這件事經周如此處理後，應已十分清楚，毛澤東又是1930年代井岡山時代的過來人，很容易看明白。但他對此事的處置卻耐人尋味，並未像對群眾組織「批周」那樣做出明確的批示，而是在周的報告上批道：「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43] 如此做法，幾近於將此事「留中不發」，並沒有下定論。

這裏透露出來的，正是毛澤東的「馭臣」之道，既保周恩來，又在那裏繫一根繩索「拴住」他。在對黨內上層政治鬥爭的掌控中，毛從來講究謀略。說到底，批劉升級後，毛有太多用得到周的地方，不能再過分地擴大戰線。這一年五一節，經他指示並由周恩來安排，捲入二月逆流的老帥和老人們都收到了上天安門的邀請。毛這麼做，是為了集中火力打倒劉少奇。同時，這當中恐怕也隱含着毛擔心林彪的勢力及影響在軍內進一步擴大，因此才下了這一步從長遠看會對林彪產生牽制效應的「閒棋」。

周恩來全力支持毛澤東的這些動作。但同時，他深知毛是隨時都可以變卦的。這之後，周給陳毅等幾位上了天安門的老帥和老人寫信，要他們不要因為「五一團結」而忘乎所以，千萬不可以「翹尾巴」，否則可能「就又要來一個新的反覆」。[44] 這封信中透露出來的，其實也是周對當時形勢及自己處境的判斷。他的話是對這些老人們說的，也是對他自己說的。他和他們分享的，也是自己的切身體會。

四

到1967年夏天，毛澤東曾預言在三、四個月內就可以看出眉目的「大決戰」，陷入徹底失控，卻毫無結束的苗頭。全國範圍內，文革這個大題目和錯綜複雜的地方狀況以及各式各樣講不清、理還亂的地方或單位利益和矛盾糾纏在一起，各地群眾組織無一例外地發生分裂，派系鬥爭愈演愈烈。神州大地上，烽火遍地燃起，奪權行動轉變為各派不顧一切地「搶權」的行為，相互之間大打出手，「全面內戰」達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各地革命委員會的產生，幾乎都遇到了過不去的難關。

這幾個月裏，毛澤東關於「世界革命」的想像也達到了最瘋狂的時候。上半年，他在會見從事武裝鬥爭的馬來亞共產黨代表團時，表示贊成「中國黨以較大的力量來援助東南亞革命，……在幾個地方同時大搞」，還說1954年「日內瓦會議是個錯誤」。[45]（而那件事，恰恰是周恩來做的。）5月，《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在紀念〈五一六通知〉一週年時發表了題為〈偉大的歷史文件〉的編輯部文章，其內容經毛親自審閱及修改，其中提出，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歷史上「第三個偉大里程碑」。[46]

周恩來的日子不好過。除了他本人時不時成為群眾組織的批判對象，「伍豪事件」又被毛「留中」外，他在國務院看重的部下也一個接一個地被打倒，周只能選擇性地保其中「可保」之人。這裏的關鍵仍然在於，他必須看毛和中央文革的眼色行事。這當中，周恩來最重視的是外交部，保得最賣力的是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這也是他在守護自己行政權力的最後的「禁臠」，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其實也是他和毛之間的一場悄然無聲的政治博弈。周出面保陳毅時，吸取了幾個月前陶鑄倒台的經驗，在毛發話前，就在「保陳毅」上把文章做足。只要毛不發聲阻止，他就親自出面為陳毅「背書」。在造反派要批鬥陳毅時，他極力阻止；不成，又親自跑到現場，不肯稱陳毅為「三反分子」，不肯跟着喊「打倒陳毅」的口號，更不許他們有任何過火的動作。[47] 周這麼做不僅是在保陳毅，也是要保住他心目中自我劃定的最後一道防線。

在全國已經陷入一片大亂和局面失控的情形時，毛澤東身處中南海，高高在上，其實並不真的知道天下之亂已達到了何種地步。他內心深處大概一直還認為以自己的威望，只要登高一呼，要達到「天下大治」並不是什麼難事。在他那裏，一時間還沒有要「鳴金收兵」的跡象。

在各地一片大亂中，武漢的情勢顯得尤為突出。從年初起，那裏的群眾就分裂成兩大派，一派是「百萬雄師」，其主張相對保守，不同意徹底打倒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並得到了武漢軍區的支持；另一派是工人造反總部，立場激進，主張徹底砸爛湖北省委，受到中央文革青睞。這兩大派對立嚴重，從春天到夏天，文鬥演變為武鬥，大打出手。軍隊介入後，同

「百萬雄師」站到一起，於是工人造反總部這一派又「猛烈炮轟」軍區，矛頭直指軍區司令陳再道和政委鍾漢華。結果武漢的形勢進一步失控，變得更為複雜。

進入7月後，毛澤東心血來潮，想到要「御駕親征」，親自跑到武漢去看一看。7月13日下午，他召集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說文革「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又說，他要到武漢、長沙「去看看」，還「準備在長江游泳」。周等人還想勸阻毛澤東這麼做，覺得毛去那裏在安全上沒有保障，但毛「吾意已決」，非要跑這一趟不可，並當場命令汪東興準備專列。[48] 第二天凌晨3時，毛澤東由代總參謀長楊成武隨伺「護駕」，坐專列離開北京。周恩來提前半小時飛往武漢，當天上午就到達，為毛打前站。[49] 7月14日晚，毛也到了武漢。接下來的兩天裏，毛和周一起聽取先行來武漢「解決問題」的謝富治、王力等彙報情況。毛發話說，要為工人造反總部平反，也仍然要承認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要做好他們的工作，各派要達成協議，同時要幫助軍區轉彎，陳再道只要承認錯誤，就不要打倒。毛還說，各派「現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武漢和湖北的問題不會那麼難解決。[50]

這幾天裏，周恩來出面召集武漢軍區等軍隊負責人開會，做他們的工作，要求他們必須「轉彎」。7月18日，周做總結發言時，恩威並施，要陳再道、鍾漢華等主動承認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這樣就不會被打倒。私底下，周又跟鍾漢華打招呼，告訴他，毛不準備打倒陳再道。[51] 當晚，周陪同毛召見陳再道和鍾漢華。毛要陳、鍾等「很快轉過來」，再「給百萬雄師做工作」，拉住兩邊開個會，然後發一個聲明，這樣「就團結起來了」。陳、鍾都表示一定轉彎，也一定按毛的話去做。[52]

這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認為武漢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會後，周坐飛機離開武漢，於當夜11時30分回到北京。毛看來心情大好，周臨走前，他對周說：「明年春天文革結束後，要接着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鄧小平、賀龍等還要出來當中央委員。」[53] 毛和周當時顯然都覺得，武漢的局面已經控制住了，也都在想下一步怎麼走，把文革帶向結束。

不料，僅僅一夜之間，形勢突變。毛澤東顯然高估了自己對於群眾運動的影響力和控制能力，周恩來也同樣失算了。毛的話說來容易，別人做

來卻難。7月19日，陳再道和鍾漢華在軍區常委會上做了檢討。下午，謝富治和王力在他們陪同下出席武漢軍區師以上幹部會議，後來又到武漢水利學院參加群眾大會。王力在兩處講話時說，工人造反總部是左派，「要徹底翻案」，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大方向錯了，軍區要轉彎檢討。他實際上是在傳達毛的指令，只是不便明言罷了。[54] 王力的講話傳出後，百萬雄師不幹了。7月20日，一齣驚蟄大劇居然在武漢上演。大批百萬雄師群眾及支持他們的部隊士兵，在不曉得毛住在東湖賓館的情況下衝進那裏，挨屋搜查。他們發現王力後，把他拉到武漢軍區大院批鬥、毆打。[55] 他們不知道毛當時就在隔壁房間，受到了「驚嚇」。[56]

毛澤東「險遭衝擊」之事發生後，楊成武立即打電話向周恩來報告，周聞訊後大驚失色。他以為毛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脅，因而馬上將此事通報林彪和文革小組。林彪、江青當即致信毛，說「武漢形勢不好，毛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脅，要及早轉移」。[57] 7月20日下午，周恩來從北京飛回武漢，緊急着手安排毛撤離武漢的具體事宜。第二天凌晨，毛澤東以一種近乎落荒而逃的方式匆匆離開武漢，在幾十里外的一個軍用機場乘飛機前往上海。[58]

後來看，毛澤東在武漢的這一番經歷，對他的衝擊是巨大的。本來，他以為只要自己「登高一呼」，就一定會萬眾響應，天下歸心，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雖無法探知他當時的具體想法，但從他的後續動作來看，他原先對於群眾運動的看法在自己也幾乎受到直接衝擊的情況之下，開始發生變化。

毛澤東離開武漢後，並沒有回北京，而是到了上海，一直到9月中旬，在那裏待了幾乎兩個月。當時，上海文革運動中的一件大事，是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司）和東方紅兩大派之間的分裂爭鬥，又溢出上柴廠蔓延到整個上海，出現了全市範圍內兩大勢力之間的尖銳對立，一方是遍佈全市支持上柴聯司的「支聯站」組織，號稱有數十萬之眾，另一方是支持上柴東方紅的工總司等主流派造反組織，其背後是以張春橋、姚文元為首的上海市革委會。

某種程度上，上柴聯司和上海支聯站同武漢百萬雄師有相似之處：它們都在普通群眾中有巨大影響，但又都不屬於文革運動的主流派。兩者的

區別是，軍隊在武漢介入了運動，並站到百萬雄師一邊；而在上海，軍隊是同支持上柴東方紅的主流派工總司及其背後的市革委會站在一起的。

毛澤東到上海時，正是這兩大勢力在上海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8月4日，在毛的眼皮底下，由工總司牽頭動員，調集幾十萬工人，發生了砸爛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的事件，遍佈上海的「支聯站」組織也隨之土崩瓦解。此後，上海再不存在能夠向市革委會或工總司等主流造反派提出挑戰的反對派勢力了。毛觀看了關於此事的實拍紀錄片，「看得津津有味」，「覺得上海的形勢和武漢大相徑庭」，工總司「完全能夠左右全局」。[59]

毛澤東的這種態度，恰恰是他當時心態的披露。武漢的七二零事件和上海的八四事件，儘管發生在不同的地方，但它們其實有着深層次的內在聯繫，尤其是它們對毛關於文革中群眾運動及「天下大亂」的看法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導致文革發展中又一個關鍵轉折點的到來。毛對於上海鎮壓聯司和支聯站行動的積極支持表明，他思想深處已對引起「大亂」的群眾運動產生了強烈的反感，開始要把「政治時針」往回撥動了。只是當時這一點還不甚清楚，即便是周恩來，恐怕也未必了解毛澤東的真實想法。

五

毛澤東在外地的這兩個月時間裏，周恩來坐鎮北京。但在那裏，情勢異常複雜，文革運動也出現了失控的局面。自春天劉少奇問題開始大幅度升級後，各路群眾組織對劉的批判烈度也一路飆升。4月，清華大學召開了號稱數十萬人參加的批判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大會。從7月初起，數以萬計的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包圍中南海「火線揪劉」，要劉「滾出中南海」。這些行動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然而毛在武漢見到周時又說，他不同意中南海造反派批鬥劉的做法，「不要面對面搞，還是背靠背好」。[60] 周的處境豈是一句「進退維谷」就可以概括的？他作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的主持人，也知道毛已經鐵了心要徹底打倒劉少奇，並以此為中心來規劃文革前行的軌跡，他決不能隨便去動「火線揪劉」的那幾萬人。但若是讓這場「大鬧劇」就這麼一直演下去，中南海周邊及北京的秩序將被搞得蕩然無存，究竟哪一天會是個頭？

這段時間，王力成了中央文革成員中最出風頭的一個。他是個有野心的人，從武漢回到北京後，他自以為是解決武漢問題的「英雄」(但實際上，毛澤東對他已有看法)，到處講話。本來，周恩來和王力沒有什麼特別的過節，但這時王力卻不自知地把手伸進外交部這塊周的「後院」，把外交部本來已經派系林立、錯綜不堪的文革局面攪得更亂了。

還在春天時，自1965年「九三零事件」後就不斷惡化的中國同印尼的關係又受到新的衝擊，雙方不斷提出嚴重抗議。年初，雙方互相驅逐對方武官。4月下旬，印尼政府又宣佈中國代辦姚登山為不受歡迎的人。4月30日，姚回到北京時，周恩來和江青等中央文革全體成員去機場迎接。第二天是五一勞動節，周又安排姚上天安門城樓並受到毛澤東接見，姚還站在毛和江青中間，挽着他們胳膊拍照片，頓時獲得了「紅色外交戰士」的名號，成了大名人和大英雄。8月4日，他在一次會議上碰到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戚對他說：革命小將衝擊外交部和批判陳毅是正確的，要支持。[61] 姚回到外交部後，向已在部裏奪權的造反派傳達了戚的講話，出來後又轉達給聚集在外交部外的紅衛兵。[62]

8月7日，王力跑到外交部發表講話，表示完全贊成姚登山傳達的戚本禹講話，堅決支持外交部造反派的行動，還說「揪陳毅大方向對，為什麼不可以揪？」[63] 周恩來得到報告後，心中大不以為然，王力實際上已經踩了他的「馬蜂窩」，但他表面上卻不動聲色。他把載有王講話的傳單批給康生和王力，提出三個人見面談一談，但康生和王力居然沒有反應。[64] 周也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後來看，他是在等待最合適的「發作」時機。

8月5日，首都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公開批判劉少奇大會，這之後，中南海周圍的人群大量減少。大批紅衛兵和青年學生又聚集到位於東交民巷的英國領事館外，把領事館團團包圍起來。事情的直接觸發因素，是已經持續了好幾個月的香港大亂局面。從年初起，文革的火焰延燒境外，在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激起了一波波「反英愛國抗暴」的抗議浪潮，遭到港英當局的反彈鎮壓。如何把握應對這一局面，是另一樁讓周恩來頭痛的事情。

文革前十幾年間，對周恩來和中共來說，香港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際貿易窗口、外匯供給處，以及情報收集等的基地。從一開始，周必須守住一個不可打破的底線：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走到「不得不提前收回香港」這一步。因此，當中共駐港機構請示北京時，周幾次指示，中共駐港各機構不能像內地那樣搞文革運動。但同時，周又指示他們積極支持並投入左派影響下群眾的「反英愛國」行動，以向港英當局施加壓力，擴大中共在香港的地位及影響。[65] 顯然，這裏的「度」極難把握。

5月初，九龍一家工廠的工人因勞資糾紛舉行罷工，並同前來干預的警察發生衝突，工會代表前往港府抗議時遭到逮捕。經周恩來批准，5月15日凌晨，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代辦霍普森，向英國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要求港英當局承認錯誤，向受害群眾道歉，嚴懲責任者，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66] 5月18日，北京舉行十萬人聲援香港鬥爭的群眾大會，周親自出席，在此前後，他批准動員群眾在英國駐北京代辦處周遭舉行抗議遊行。但與此同時，周又指示外交部立下「規矩」：可以向英國代辦處提交抗議書，但不能衝擊代辦處，不能阻攔代辦處人員進出，更不能對代辦處人員揪鬥、毆打。[67] 當周得知，上海工人造反派和紅衛兵到英國駐上海僑務代表處及住處舉行抗議遊行，不僅衝入室內砸爛家具及張貼標語，還把僑務代表拖至院內批鬥時，立即提出批評：「為什麼不把北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遊行的規定告知上海執行？」[68]

此後，香港左派群眾的「反英抗暴鬥爭」不斷蔓延擴散，而港英當局也寸步不讓，形勢逐漸失去了控制。5月22日，香港工人和各界群眾舉行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在港督府前同警察發生衝突。當日，港府宣佈實施《緊急條例》。5月23日，港英警察向繼續抗議遊行的群眾開槍，打傷數人，數十人被捕。新華社卻報道說，港英警察「近距離開槍，血洗香港街頭」，「至少有兩百名同胞被打死或受重傷，輕傷的不計其數」；《人民日報》的相關報道，也冠之以〈港英當局在英國政府指使下進行野蠻大屠殺〉的標題。[69]

5月23日當天，周恩來緊急召集相關人員開會，了解情況。第二天和27日，他又召集外辦、外交部、港澳工委有關人員討論對策。周對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有關香港事態的報道提出了嚴厲批評：「這是無政府主義思

潮。雖說我們不承認香港是國外，但它還是在英國統治之下。我們現在既不是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國打仗，我們對英國的鬥爭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不主動出擊。」周還說：「香港的工作照抄內地紅衛兵的做法，行不通。香港《大公報》、《文匯報》的調子不能太高，應當同內地的報紙有所區別。」[70]

5月30日，周恩來又召集外交部和港澳工委有關人員開會討論具體對策。港澳工委又有人提出，要中央批准在香港襲擊警察，「殺他幾個最壞的警官」。周當即嚴厲批評道：「什麼殺一儆百，簡直是荒唐！共產黨是搞政治鬥爭的，不是搞暗殺。」[71] 但問題在於，到底應當在香港採取什麼行動，既不至於引爆局勢，又迫使港英當局就範？會上，除了提出在宣傳調子上進一步升溫外，卻拿不出什麼有效可行的辦法。周恩來躊躇不前的原因，應該在於毛澤東還沒有就此事明確發話。

在此情況下，《人民日報》準備發表一篇關於香港鬥爭的社論，周恩來對這件事的處理卻頗為蹊蹺。6月2日，他在審查社論清樣時，仔細讀了一遍後，一言不發就走了。後來，他請陳伯達對修改社論文字，不讓「宣傳調子太高」。第二天，這篇題為〈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發表，但調子卻仍然很高，也把香港的「鬥爭氣氛」炒得更熱了。[72]

同時，外交部也在準備向英國提出最強烈抗議的照會。6月6日，周恩來再次召集會議討論香港問題時，提到了外交部起草的照會草稿。他就其中「中國政府將採取必要的措施」一句提出批評：「我們採取必要的措施是什麼？你們跟總參商量了沒有？外交不和國防聯繫，照會上寫上就是放空炮，這不符合毛澤東思想。1950年我們對美國侵略朝鮮發表聲明，中國不能置之不理。當時加這一句話時，我國在東北已經調動部隊了。」[73]

香港的局勢繼續惡化。7月8日，中方武裝民兵和港英警察在沙頭角中港邊境發生交火，造成中方兩人、英方五人死亡。這一次毛澤東終於發話了，他說：在香港，「還是不動武」。周恩來拿到了尚方寶劍，第二天，他召集總參負責人談話，傳達了毛的指示。關於沙頭角交火事件，他說了一句：「下不為例。」隨後重申了前一段已變得模糊不清的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政策：「香港不同於澳門，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我們之所以不拿澳門，是保持一個口子在那裏，市場是我們的。如果我們打了過

去，那就是主動出擊了。香港問題，現在是群眾運動，又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如果出動正規部隊，群眾一推動，就控制不住了，你打電話也來不及。香港鬥爭是長期的，我們不能急，搞急了，對我們不利。對主席這個方針，我們要取得一致的認識。」[74]

這正是周恩來的政治處境最為困難的時候，也是他對外交部內部的情勢發展失去控制的時刻。此後，香港局勢並沒有按照周的指示發展。香港左派的情緒如同脫韁的野馬，由遊行、罷工發展到在各公共場所放置真假炸彈，形勢爆炸達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8月中旬，外交部草擬了一份限時最後通牒，要求港英當局在48小時內取消對三家左派報紙的禁令，並釋放19名被關押的記者，「否則英國政府必須對此承擔一切後果」。[75]這一次，周恩來批准了這份通牒。8月20日下午，中方將通牒交給英方。

問題在於，這個通牒發出後，中方手中其實並沒有任何有力的跟進步驟。一種說法是，中方當時的底牌是，如果通牒遭到拒絕，中國將驅逐英國代辦處一個負責新聞工作的二秘。[76]顯然，這樣的後續措施和通牒的內容和語言完全不相稱；或者說，這個「最後通牒」根本就是「放空炮」，本身就是一場賭博或訛詐。

在此類事情上，周恩來向來思考縝密，行事謹慎。這一次，他怎麼會批准這麼一份通牒？他後來曾說，那一天晚上「他實在太累了，沒有仔細考慮就批准了那個照會，這是他的責任」。[77]但更大的可能是，周當時在香港問題上手中已經沒有別的牌可以出了。他既不能讓香港的形勢一直惡化下去，搞得非要「提前收回香港」不可，又找不到別的出路，不使他自己被戴上「右傾投降」的帽子。同時，周可能還認為，北京和倫敦之間在讓香港事件的降溫上存在着一種「默契」。他批准這份通常情況下他絕不會同意的通牒，也許是心存僥倖，希望逼得港英當局做出哪怕是象徵性的讓步，這樣香港的這場「大鬧劇」就有了收場的理由和台階。

然而，這卻是周恩來的一個嚴重的誤判。港英當局收到最後通牒後，仍然堅守己方立場，直到8月22日時限過後，居然未做任何讓步。這一下，北京的事態發展失控了。8月22日晚，包圍英國代辦處的紅衛兵和群眾衝進裏面並放起火來。[78]周恩來知道這次的禍闖大了，而對這件事，他顯然是有責任的。毛澤東得知此事後，「嚴厲批評了周和陳伯達、

康生」。[79] 為了防止毛進一步「算帳」，他必須馬上採取行動，避免事態繼續惡化。

8月23日凌晨，英國代辦處的大火剛剛被撲滅，周恩來就緊急召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周發了一場大火，說縱火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行為，要進一步調查處理。其實，這也是他的一種情緒宣洩，以及「以攻為守」、推卸自己責任的一種手段。接着他話頭一轉，借題發揮，把矛頭轉向了外交部造反派，聲色俱厲地宣佈：姚登山等人在外交部搞奪權「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數的」。他還說，「打倒劉、鄧、陳(毅)」的口號也是錯誤的，是目無中央。[80]

這時，周恩來面臨的是一種天下大亂之際坐困危城，情勢幾近完全失控的局面，他本人的處境也異常險惡。但他卻不是束手待擒之人，思來想去之下，決定先發制人，直接就北京的情勢向毛澤東報告。8月25日午夜時分，一直隨伺在毛澤東身旁的楊成武應周恩來要求，乘專機從上海到北京。凌晨1時，周恩來單獨和楊談話，講了自己「對北京最近事態發展的一系列看法」。他提到，王力在外交部講話，煽動造反派在部裏奪權，不僅在國務院各部引起混亂，也衝擊到了周本人；又說，王力等人還支持火燒英國代辦處的行為，並以揪劉少奇為名，把中南海圍得水洩不通，在國際上造成了惡劣影響。他還說，王在「宣傳上又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其實這並非出自王力之口)，可能把軍隊搞亂。「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談話結束時，周把王力的「八七講話」交給楊成武，要他轉送毛澤東。[81]

周恩來走出這一步，尤其是抓住王力的「八七講話」大做文章，把外交部奪權、火燒英國代辦處、「揪出軍內一小撮」口號的提出等幾件事攪在一起，應當是他深思熟慮後的結果。但他知道，自己這麼做等於是在中央文革的太歲頭上動土，走出的是一步極大的險棋，會引出什麼結果，維繫於毛澤東的一念之差，是無法準確預測的。但他顯然又認為在當時的情勢下，除了走出這麼一步險棋外已別無辦法。楊成武按照周的指示，稍事休息後即飛回上海。8月25日上午9時許，他面見毛澤東，報告了周的意見。[82] 毛當場未作答覆。

楊成武走後，8月25日整整一天，周恩來沒有得到任何回音。他內心的焦慮也越來越大，夜幕降臨時，甚至產生了一種「大禍臨頭」的感覺，情緒壞到了極點。恰在此時，長期居住北京的美國著名黑人學者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的遺孀格魯姆（Shirley Graham），在準備離開中國前來向周恩來告別，周居然同意和她見面。格魯姆見到周時，幾乎吃了一驚。周恩來「看上去極為沮喪，精疲力盡」，說了一段極其傷感、乃至帶着絕望意味的話：

> 整個中國革命可能暫時會失敗，我們會失去一切。但是不要緊。我們這裏失敗了，你們非洲會吸取我們的教訓，會出現你們的毛澤東，你們會幹得更好。因此最終我們會取得勝利。

格魯姆聽後頗受震撼，不知道周恩來到底是什麼意思，但當她試圖追問下去時，周只是說：形勢極為複雜，未來生死未卜。[83]

周恩來這種幾近絕望的心態和情緒，一直持續到了第二天。毛澤東等了整整一天後，終於下了決心。8月26日上午9時，他召來楊成武，說：「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毛又說，「可以先解決王、關，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84]

8月26日中午，楊成武趕回北京後，於12時40分在釣魚台國賓館五號樓同周恩來單獨見面，「逐字逐句」彙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聽後的感覺，絕非一句「如釋重負」可以概括表達。當晚，他在釣魚台國賓館主持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江青、陳伯達、康生等都出席了。周恩來也逐字逐句地宣讀了楊成武記錄下來的毛澤東指示。[85] 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翌年1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儘管王、關、戚是江青同意端出來的，但這對中央文革仍然是一個極大的打擊。

後來看，這一番過程中，周恩來真是把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生存之道發揮到了極致，他選擇的出擊時機實在是抓得很準。當時，一方面文革小組內部，尤其是在江青和王、關、戚之間，由於種種說不清、理還亂的原因，出現了裂痕。另一方面，毛澤東本人在武漢事件的巨大衝擊下，也開始產生從推動文革走向「全面內戰」向着「重建秩序」轉彎的念頭。周以自

己極為銳利的政治敏感，察覺到了這些極其微妙的變化。他採取行動時，絕對沒有穩操勝券的把握。對於他來說，這是一次政治上的大冒險，也可以說是他在文革中少有的一次政治上的「大賭博」；結果，以他大獲全勝而結束。

但是，毛澤東拋出王力、關鋒、戚本禹的最重要原因，卻並不僅僅是為了安撫周恩來，也是為了穩定軍心。武漢七二零事件後，他的嗅覺告訴他，軍隊中已產生了嚴重的不滿情緒。他是靠槍桿子起家，也是靠抓住槍桿子掌權的，他決不能允許軍隊失控。因此，他把提出「揪出軍內一小撮」口號的帽子扣到了王力等人頭上。

同時，文革小組本來是毛澤東推行文革的最大利器。現在，他卻做出了斷其臂膀的決定，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信號。他當然不是要拋棄文革小組，更不是要就此終結文革。這裏透露出來的，應是他已意識到文革作為一種實際的政治過程已經走過頭了，造反派和群眾連他的話都不聽了。或者說，從他的視角看，他發動的革命已經走上歧途。不管他內心有何想法，在行動上，他開始要同文革「群眾運動」分道揚鑣，強行實現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大轉變。即便從毛的角度來看，文革也將越來越成為一種名存實亡的進程。周看準了毛的心思，抓時機極為精準，這是周恩來在政治上厲害的地方。

但這麼一來，比之以往任何時候，毛澤東內心深處難免會時不時對周恩來湧起一種更為強烈、更揮之不去的厭惡乃至隱隱的恐懼。但同時，他比之以往任何時候更離不開周恩來了。1968年1月底，毛看到北京大學一位學生向他反映「伍豪啟事」的信後，批示道：「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86] 毛總算在這件事上給了周一個明確的交代——儘管這件事其實仍然未完。

六

當1968年新年來臨時，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中，只有9個建立了革命委員會。軍隊介入和「文攻武衛」結合在一起，全國各地仍然是一派武鬥升級、內戰不休、遍地烽煙的景象。一時之間，仍然難以平定下來。

毛澤東不斷發出號召，說「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要在全國大搞「圍剿派性」，卻收效甚微。周恩來只能同中央文革及軍隊攜手，一個省、一個省地「救火」，以「解決問題」。文革大動亂局面的終結，依然遙遙無期。

這時，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也變得越來越沒有章法。昨日的座上賓、今日的階下囚，對每一個捲入文革的人來說，這都可能發生。3月間，北京突然發生了「楊余傅事件」，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這幾個曾經的文革大紅人卻莫名其妙地被扭到一起，遭到整肅。

事情並無前兆，幾乎就是在3月21日至22日兩天間發生的。後來看，這三個人獲罪是出於不同的原因：傅崇碧得罪了江青，楊成武冒犯了林彪，余立金同林彪的心腹吳法憲不和，但這三個人並沒有什麼「地下活動」或聯絡。同時，究竟是毛澤東要整他們，還是林彪要整他們，知情者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周恩來即便身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召集人，對這件事何以發生卻也摸不清頭腦。這三個人中，他除同余立金沒有很密切的工作關係外，同楊成武和傅崇碧可以算得上是文革中的「老搭檔」了。直到事件發生前，他並沒有發現他們會遭到整肅的跡象。

3月22日，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被撤銷職務。兩天後，林彪在宣佈整肅他們的大會上發言，當着毛澤東的面列數他們的「罪狀」，扣了一堆帽子，說他們所犯的是屬於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錯誤，是屬於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和兩面派的錯誤，是屬於反毛澤東思想、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又說他們的問題不是很大，但又不是很小。可是講來講去，也沒有講清楚他們到底有什麼問題，給人的感覺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87]

在宣佈楊、余、傅問題的大會上，周恩來也發了言。除了表示堅決支持毛、林的決定外，他還說了一大段稱讚江青的話：「我提幾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戰士。她不是從今天，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就是一個同叛徒，同假共產黨員、特務和社會的反動派作鬥爭的一位堅強勇敢的女戰士。」[88] 周的這些話，首先是說給毛澤東聽的。

3月28日，毛找林彪、周恩來以及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開會，說：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又說：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要調動軍隊幹部，「先作小調動，後作大調動」。[89] 林彪的地位似乎又上升了，但這裏是否留下了毛、林後來衝突乃至最終決裂的又一處關鍵性的伏筆？

距離1968年3月，超過半個世紀已經過去了。但即便今天，我依然可以清晰地記得讀到林彪3月24日講話時的感覺：這篇講話，邏輯上完全不通，給人扣大帽子時，也根本沒有什麼「講道理」可言。

就在那年春夏，我和中學裏的一幫同學對文革中屬於異端思潮的各種文字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居然把它們收集起來，主要由我刻鋼板，印出了兩本厚厚的《思潮集》。幾乎在同一時間，我們不約而同地開始閱讀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和一批馬列經典原著。現在回想起來，這麼做絕不是出於什麼政治上的「覺悟」，而更是出於一種精神的倦怠和思想的困惑。我們是如此，那麼我們的很多同代人又何嘗不是如此？[90]

今天回想起來，當年我們對毛澤東的信仰本來就是一種想像中的虛幻存在，是一種未經深入及批判性思考之下便產生的「跟潮」和「跟風」。那時，這種本來就沒有牢靠根基的「信仰」，又在無情現實的衝擊下，從底部開始動搖了。

當我寫下上述文字時，一個問題又不斷地回到我的思索中：當時，我們離毛澤東那麼遙遠，只是由於每日生活的點點感受，便會產生如此「大逆不道」的念頭，那麼幾乎天天要同毛澤東打交道的周恩來，又會有何種想法？我總覺得，毛澤東對於這一切，應該會有某種心靈「感應」。他發動文革，又放出了「全國全面內戰」的魔鬼，果然達到了讓天下出現一片大亂的局面。然而，怎樣才能看到從大亂中引出他所想像的「大治」的前景？毛澤東卻發現，連他自己也沒有答案。

到夏天，毛澤東儘管口上並未明言，但實際上已對「天下大亂」無休無止的局面產生了厭倦。甚至，連他一直很願意聽到、陶醉於其中的中國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之說，也在他那裏失去了昔日的魅力，視之如

棄履。[91] 他要終結文革中完全失控的群眾運動，重建黨國秩序的決心越來越明晰，也越來越堅定。周恩來幾乎天天都同毛澤東交往，不會體察不到毛思想上的這種變化。

當時，武鬥烽火在全國遍地燃燒，廣西的形勢完全失控，顯得尤為突出。尤其是，這裏是中國（以及蘇聯和東歐國家）援越物資的必經之地。大規模武鬥的發生，不僅阻礙了援越物資及時通過，甚至連搶奪軍火物資等的情況也時有發生，除了越南方面的抱怨外，蘇聯等也一再提出交涉抗議。[92] 所以，周恩來早就對這地方十分注意，並多次親自出馬，試圖解決「廣西問題」，但就是一直解決不了。

周恩來決定，要抓住廣西這個「典型」，搞一個不僅針對廣西，也對全國有效的文件。6月下旬，文件初稿出來了，周親自審閱、修改，在其中加入「堅決停止鐵路系統和地方的群眾組織相互串聯」，所有群眾都要回到本單位和學校參加運動，對煽動群眾破壞鐵路交通的「反革命分子和肇事者」堅決予以法律制裁等內容。這個文件於1968年7月3日發佈，是為〈七三佈告〉，經毛指示，又轉發全國各地。其中指稱，廣西各地發生的大規模武鬥中，參與武鬥者「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機關、部隊」，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93] 佈告發出後，周又親自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嚴令他們停止武鬥、恢復交通，「否則即是犯罪」。[94] 廣西自治區軍管當局拿到了尚方寶劍，馬上對區內各處造反派實行極為嚴厲乃至血腥的鎮壓，廣西也成為文革這一段殺人最多的地方。

本來，毛澤東、周恩來曾希望〈七三佈告〉發佈後，全國範圍的武鬥形勢會得到控制及好轉，但實際上這種情況沒有出現。從7月中旬起，周又花了一個多星期，主持針對陝西地區武鬥情勢的〈七二四佈告〉。他親自修改佈告內容，加上了「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據點、關卡，解散專業武鬥隊」，「中斷的車船交通、郵電通訊，必須無條件恢復」，「搶去的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必須無條件迅速交回」等文字。[95]

7月底，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在北京到來了。7月27日，毛澤東親自決定，派遣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北京大中學校，首先進駐當時武鬥正劇的清華大學。這天上午，數以千計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入清華大學，要求兩派停止武鬥，拆除武裝工事，並上繳武器。從道理上說，清華

造反派沒有理由對此不遵從執行，但出於撲朔迷離的原因，清華「井岡山」一派卻拒絕服從，還實行回擊。下午，清華井岡山武鬥隊的幾百成員用長矛、槍支、自製手榴彈，在校園內多處向工人宣傳隊發動衝擊。到傍晚，五名工人宣傳隊成員死亡，數百人受傷。[96]

7月28日凌晨，毛澤東找來北京高校紅衛兵的「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親自對他們訓話，周恩來也隨伺在座。毛在講話中，特意提到了〈七三佈告〉和〈七二四佈告〉，說這兩個佈告不僅適用廣西和陝西，也適用全國。「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話語之間，充滿着殺氣。[97]這樣，毛澤東以再清楚不過的語言講明，他要和文革的造反現象和群眾的造反運動徹底地分道揚鑣。7月30日，周恩來和江青、陳伯達、康生一道，聯名致信毛澤東，提議將毛7月28日的談話稿向全國傳達，並派出工宣隊和軍宣隊進入大中小學和「其他一些混亂的部門」。[98]毛批示同意。這之後，工宣隊和軍宣隊進入了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從這一時刻起，各種紅衛兵組織土崩瓦解或名存實亡，紅衛兵運動的現象也壽終正寢。

七

就在文革強烈地顯示出朝「收攤」轉變趨勢的時刻，8月20日，國際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這一天，蘇聯大兵壓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這件事，在北京引起的反響非同小可。

對毛澤東和周恩來來說，蘇聯走出侵捷這一步並不全然是意外。早從年初起，隨着具有擺脫蘇聯控制意味的「布拉格之春」改革之風在捷克勁吹時，他們就關注着那裏的形勢發展。7月下旬，文革期間仍然同北京保持着良好關係、也同捷克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聯繫密切的羅馬尼亞，就對北京吹風說，布拉格的改革若持續下去，莫斯科有可能進行軍事干預。[99]8月21日夜，羅馬尼亞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波德納拉希緊急約見中國駐羅代辦馬敘生，除轉報捷克情勢外，又說蘇聯軍隊也可能入侵羅馬尼亞，如果這樣，羅馬尼亞要堅決抵抗。[100]第二天，羅

馬尼亞駐華大使奧列爾．杜馬（Aurel Duma）又向中國外長陳毅通報，羅馬尼亞已為防範抵抗「外國對羅馬尼亞的侵略和干涉」做好準備，請求中國給予支持。[101]

周恩來得知蘇聯侵捷的消息後，當即指示外交部研究對策。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在〈關於揭露和譴責蘇聯武裝佔領捷克的請示報告〉中建議，由《人民日報》發表報道及社論表明中方立場。[102] 蘇聯走出侵捷這一步，對毛澤東震動巨大。8月22日下午，他接到周轉來的報告後，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周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以及李先念、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開會，討論蘇聯侵捷後的形勢及中國的對應之策。毛說：「蘇聯現在是沒有辦法了，不搞，他們的日子不好過了」；又說，要防止蘇聯打中國，「我們要注意，大慶油田被人家一佔，我們就沒有石油了。」會上決定，《人民日報》將詳細報道蘇聯侵捷消息並發表社論，予以嚴厲譴責。[103]

恰在此時，周恩來得知，杜馬大使將於8月23日舉行國慶招待會。本來，中方已決定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出席。周當即決定，他本人將親自出席招待會並發表講話。他指示成立以喬冠華為首的講稿起草小組，8月22日深夜，召集講稿起草小組開會，討論他們搞出的初稿。第二天上午，周又親自花了兩個小時修改講話。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總破產〉的社論。[104]

8月23日晚，周恩來果然帶領一大批中國高層官員，出席杜馬大使的國慶招待會。他講話時，把蘇聯領導人稱為「蘇修叛徒、工賊集團」，「一貫奉行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反革命政策」。他說，「蘇修叛徒集團早已墮落成為社會帝國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其侵捷行徑「同當年希特勒的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今天美帝的侵略越南一模一樣」，是「推行法西斯強權政治的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現」，也「標誌着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總破產」。[105]

周恩來講話中，也像《人民日報》社論一樣，給蘇聯扣上了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後來看，這一點十分重要，意義深遠。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反對美帝」就一直在「新中國」政治話語中佔據着中心地位，並成為毛澤東和中共在推進改造國家和社會的宏大計劃時，實行超常群眾性動員的一根重要支柱。[106] 1960年初以後，中蘇交惡，關係破裂，並捲入一場誰是真正馬列主義者、誰是「叛徒」的大論戰。毛發動文化大革命，

一個最重要的邏輯起始點，就是非如此就不能保證像蘇聯那樣的「資本主義復辟」不在中國出現。即便如此，直到蘇聯侵捷發生前，北京從沒有以「社會帝國主義」稱呼蘇聯，軍事部署上也仍然是以對美為主。現在，《人民日報》社論和周恩來的講話都突出這一點，這不僅是為了進一步證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也為中國領導人重新界定「世界主要矛盾」以及誰是中國及世界人民最大和最危險的敵人，打開了一扇新的門戶，開闢了過去未曾有過的新空間。

八

1968年8月底、9月初，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相繼宣告成立。這是中國大陸最後成立的兩個省級革命委員會。通過國家權力和軍隊對社會的強行「切入」，以及對於各地「造反派」及其他群眾組織的強力的鎮壓乃至血腥的摧毀，採取「三結合」的組織形式，毛澤東兩年前鼓吹的「全國全面內戰」局面終於結束了。9月7日，北京市十萬軍民集會，慶祝這個「全國山河一片紅」時刻的到來。周恩來在會上講話時說，自「一月風暴」後，20個月過去了，實現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的偉大勝利。……我們一定要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大好形勢下，好好地迎接我們掀起的鬥、批、改的新高潮」。[107] 可是，難道這意味着文革真的到了結束收場的時候？樹欲靜而風不止，後來的歷史發展告訴我們，並非如此。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舉行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這是對文革中最大的「政治清算」做一個了斷的會議。但若從中共黨章來看，這次全會從形式和內容上都是不合法的。在八大和八大二次會議上選出的中央委員中，當時在世的還有87人，但大多已經「靠邊站」，甚至已被「打倒」。經周恩來安排，一批在運動中「靠邊站」的中央委員被火速召到北京（有的還是從「牛棚」裏放出來的），但即便如此，可以出席全會的只有40人，根本不足一半。於是，全會開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在把到會的19名候補中央委員中的10人扶正，從而使出席的人數勉強超過一半。[108] 同時，又有數十名根本不是中央委員的「文革新貴」出席了這個「擴大」的全會。

對周恩來來說，他在這次會議所經歷的，是他整個政治生涯乃至人生中黑暗的一頁。會議議程的重中之重，是給劉少奇扣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大帽子，宣佈把他永遠開除出黨，徹底打倒。這件事從頭開始就是毛澤東要做的。但到了這個在政治上給劉「蓋棺論定」的時候，周卻是必須出來唱這齣全會上重頭戲的主角。

這是一件大得不得了的事情。從黨內政治鬥爭的角度看，文革從興起到全面鋪開，都是圍繞着「打劉」而展開的。後來，在後毛澤東時期，當中共領導層做出全面否定文革的結論時，又是同劉少奇案的平反昭雪聯繫在一起的。可以說，劉少奇案是文革興衰的指標性事件。

從年初起，中央專案組就集中大量人力和其他資源為劉案準備材料，到八屆十二中全會前，拼拼湊湊，但根本不聽劉本人的意見和申辯，終於搞出了數千頁的關於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的審查報告。它的目的是徹底打倒劉少奇，讓他永世不得翻身。以周恩來的閱歷和經驗，當他讀到這份報告時，絕不可能看不到其中的無數破綻和漏洞，更不會為報告的內容和結論所折服。然而，作為中央專案組的主管領導和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召集人，他其實沒有別的選擇，而必須在這份報告上簽字，因為這就是毛澤東的意思。周生平經歷的各種事情可謂多矣，但這一次他所面臨的卻是他最艱難的抉擇——一種拷問良知、拷問靈魂的抉擇。要周在這樣一份荒誕不經的文件上簽字，並為此承擔歷史的責任，他極不情願；這份報告轉到他那裏後，在他的辦公桌上放了十幾天。但最後，他還是在文件簽了字，同時還寫下了一大段稱頌這個案子主要炮製者江青的話：

>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註和看法，我也是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註着這三本劉賊叛賣我們黨和犧牲同志們的材料。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種大革命，怎樣能夠把劉賊及其一夥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志的罪狀，挖得這麼深，這樣廣？

像兩年多前文革將要開始時那樣，周恩來又談到保持「晚節」的問題：

> 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要向你（江青）學習！我更要向你學習！[109]

周恩來寫下這些話，首先是給毛澤東看的。他若不這麼做、不寫下這些文字，就等於是明白無誤地告訴毛，在涉及毛發動的文革的合法性這一根本問題上，他和毛是離心離德的。同時，周大概還以為，文革在處理劉少奇這個「最大的政治問題」後，終於到了可以鳴金收兵的時候了。他做的是一件完全違心的事情，但他還是做了。在這件事上，他是政治上的懦弱者。

這是周恩來政治生涯中的又一個至暗時刻。後來，當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文革後出獄後，了解到了周在劉案上的作為後，不願意再原諒他。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我們任何人都不能、也絕對沒有資格在這一點上去責備王光美。但這是否就意味着，因為周捲入了這件事（以及文革期間與此事相同或相似的其他諸多事件），我們就應當對周作徹底的否定？我以為，不可以的。說到底，此時的周恩來的個人處境更像是狂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隨時有傾覆的危險；但從大局來看，他又是中國這艘已被「偉大舵手」帶入驚濤駭浪之中的「大船」上的大副。若他棄船而去，中國這艘大船便可能有沉沒之虞。如何抉擇，對周來說，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周恩來代表中央宣讀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他在大會上的發言中，先是為全會的合法性說了一堆辯護的話。又表示，堅決支持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說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標誌。我無法想像、更不可能重建周宣讀報告和發言時的心情與感受。當我寫下這段文字時，只是覺得自己的筆、自己的語言如此貧乏無力。我只能說，如果連周恩來這樣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地違心行事，毛澤東的這場宏大「革命」必定走向反面和失敗，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八屆十二中全會期間，周恩來還經歷了一樁個人的慘事。10月14日，他的養女孫維世在獄中身亡。周恩來和鄧穎超沒有兒女。孫維世是周的老戰友孫炳文的女兒，從小就由周和鄧撫養長大，是唯一一個他們承認的養女，頗受他們喜愛。儘管由於孫維世在與金山結婚的事情上沒有聽從他們的意見，後來又發生了金山出軌之舉，使得她和養父母之間的關係有所疏離，但周、鄧夫婦依然是喜愛她的（而金山在維世原諒他之後，也再

沒有發生新的狀況）。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3月1日，孫維世因「現行反革命」和「特嫌」等莫須有的罪名被投入獄中。[110] 據說，此事與江青有關，林彪的妻子葉群也插了一手。[111] 在對孫維世展開秘密調查後，江青突然把收集到有關孫的材料擺到周恩來面前，迫使周在逮捕孫的命令上簽字。孫維世死後，周恩來於10月17日批示道：「是否自殺或滅口，值得調查。應進行解剖化驗，以證實死因。」[112] 然而，未等周的批示付諸實施，孫維世的遺體卻已被火化。當鄧穎超得知這一消息後，悲從心來，失聲痛哭並哀嚎道：「她死得好苦啊！」文革結束後，孫維世才獲得「徹底平反」。

孫維世的悲慘經歷並非獨一無二。早在1968年1月，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因在文革前曾同劉少奇的大舅子（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等人聚餐，其間被認為曾有過「不當的言論」，受到了紅衛兵的衝擊審查。相關材料上報到中央文革後，江青隨即轉送周恩來。周看到這件事涉及到王光美的哥哥，馬上就意識到了其中涉及的政治上的巨大危險。於是，他一面將此事馬上上報毛澤東，一面又主動建議由北京衛戍區對周恩壽實行「拘捕審查」。毛澤東對此未予阻止，而只是批示「總理酌辦」，實際上是把又一個「燙手山芋」塞到了周的手裏。周恩來隨即將此事交給謝富治、傅崇碧負責辦理。周恩壽被「保護性拘捕」後，一直關押在北京衛戍區，直到1975年5月才獲得釋放。[113] 所有這一切，無疑是周恩來的悲劇。但從大處看，這難道不也是文革這場大浩劫、乃至中國革命時代的悲劇嗎？

八屆十二中全會過後，毛澤東和周恩來顯然想到（儘管他們各自的出發點和邏輯不見得一樣）這一回，確實是到了要為文革收場的時候。他們也都知道，要把文革引向結束，就要從根本上解決紅衛兵和學生的出路問題。就在1968年底，毛做了一個大動作。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毛澤東的一段「最新指示」（後來被稱為毛的「一二二一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14] 這是毛要為文革收場的極為重要的一步。文革是從學校開始的。幾年來，全國各大中學校沒有畢業生，而是都留在學校「鬧革命」。把成千上萬青年人從城市送入鄉村，是一項「一石兩鳥」的措施。一方面，它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通過把紅衛兵一代送入遠離城市政治中心的農村社會，徹底瓦解並終結了他

們作為群體的政治參與能量和能力。另一方面，這又可以緩解文革這幾年累積下來的巨大的城市就業壓力。同時，從邏輯上來說，這也可以成為文革從遵照〈五一六通知〉而全面鋪開、亦即「破」的階段，朝着〈五七指示〉中想像的方向、亦即「立」的階段，走出的重要一步。

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時，《人民日報》公佈了毛澤東的一段話：「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115] 這讀上去，像極了是在為文革作歷史定位的宣示。一時之間，歷時已經兩年半的文革，似乎真的到了要劃上句號的時候了。

但實際上，這個句號的最後完成，卻將是八年之後——也是毛澤東、周恩來都已經「去見馬克思」之後的事情了。

第27章

林彪事件（1969–1971）

一

1969年4月1日，北京城看上去沒有什麼異樣，似乎是平常的一天。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也沒有什麼動靜，但裏面卻是燈火通明。在周恩來的組織指揮下，中午過後，大批人群乘坐北京新近修成但還未開放的地鐵來到天安門近旁，再通過寬闊的地下通道進入人民大會堂。他們都是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這一天，「九大」在這裏開始舉行。

下午5時，大會開幕。毛澤東致詞說，這次大會要開成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1] 看上去，他是想要通過九大的召開，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但後來看，對毛澤東或毛的文革和「繼續革命」大業來說，九大開得並不成功。尤其是，這次大會導致了曾支持文革的各種力量的深刻分裂，從而為文革最終走向徹底失敗的實際政治進程開了個頭。

其實，九大上將會碰到的問題，早在會前就已經露出端倪。八屆十二中全會開過後，1969年2月，召開九大及起草大會政治報告的事提上了日程。最初，毛澤東讓陳伯達牽頭，同張春橋、姚文元一道起草這個報告。但陳卻發現，他和張在報告的主題思想上存在着重大分歧。陳覺得，文革結束後就要把工作重點轉到發展生產力上來，但張認為革命還沒有完，也不會完。陳把張拋在一邊，自己一個人做這件事，卻又一下子寫不出來。

毛澤東本來就覺得陳有「唯生產力」的傾向，此時正好讓張、姚單獨搞一個稿子，同時強調「要提出矛盾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鬥爭，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2] 陳後來還是堅持寫出了一稿，卻被毛晾在一邊。[3] 張春橋起草的報告一部分接一部分送給毛看後，毛讚不絕口，認為抓住了自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思想的真諦。最後，九大政治報告採用了張的稿子。問題在於，什麼是「繼續革命」? 難道九大不是要宣佈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而是還要繼續搞下去嗎？

周恩來是九大組織工作的主持者，與會務相關的事情，他無論巨細幾乎都會過問。但他沒有參與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對報告準備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他並不見得都很清楚。可是，毛澤東對於陳伯達表現出明顯的冷漠態度，他應該是看得到的。

九大上，政治報告由林彪宣讀，他的表現着實令周恩來吃了一驚，也絕對不會讓毛澤東感到高興。九大前，林彪和陳伯達兩人已經走得很近。陳起草九大報告時，曾同林有過交流，兩人對九大後要集中精力抓生產頗有同感，陳那個被毛否定的稿子其實也反映了林的很多想法。[4] 在張春橋取代陳伯達起草報告後，毛親自修改稿子，還曾幾次給林寫條子，徵詢他對於一些段落和提法的意見。林答覆時，一概「主席畫圈我畫圈」，沒有說過一個「不」字。但實際上，張起草的報告他事先根本沒有看過，毫無準備之下就到大會上宣讀，結果「唸起來不流利，精神不振」，破句連連。[5] 毛澤東看在眼裏，心中自然不快，但什麼都沒有說。這一幕，周恩來都看到了，恐怕不會沒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但從表面上來看，九大開得很順利。毛澤東在開幕式上提議，要讓林彪擔任大會主席團主席，他自己擔任副主席。林誠惶誠恐之下，搶過麥克風大聲說：毛主席當主席團主席，大家說好不好？全場一片「好」聲，林馬上宣佈「通過」。毛又提議，由林任主席團副主席，周恩來任主席團秘書長，自然也「一致通過」。這只是一場表演，但毛這麼做，在與會代表們的眼裏——也包括在周的眼裏——看到的是他對林彪的信任和支持。

九大上，還修改並通過了新黨章。其中，經周恩來動議，打破以往的一切常規，正式寫入「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種做法在中共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林的地位似乎也由此而達到了又一高

點，但當時誰能想到林在僅僅兩年多之後的下場？回過頭去看，「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寫入黨章之時，是否已是他走向自己政治墳墓之路的開端？

4月14日，周恩來在大會上發言。他說，他完全擁護毛澤東的開幕講話、林彪的政治報告和新黨章。他陳述了林在建國前後的一系列功績，並特別強調林在黨內歷次路線鬥爭中從來都站在毛一邊。在毛發動文革的過程中，林更是倡導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對「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以至於世界革命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6] 周是在履行他的責任，闡明林成為毛的法定接班人的正確性。但同時，從心底裏來說，周恩來一貫不爭「老二」位置，也應當樂見林作為毛的第二把手的地位以這種方式確定下來。

毛澤東一再說，九大要開成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但大會越開到後來，各方勢力在權力再分配及「論功行賞」上的爭鬥也越發突出。周恩來是大會秘書長，如何搭建九大後的中央領導班子，最後雖然要由毛拍板，但具體的尺度掌握和坐席排定，仍要由周負責操作。在此類事



圖27.1：毛澤東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投票，其後是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1969年4月。（World History Archive / Alamy Stock Photo）

務中，擺平各方勢力間的關係並把它們「黏合」在一起，從來就是周的特長，但在九大上，這件事卻使他頗費躊躇。最令周頭痛的，是怎麼擺江青的位置(尤其是她是否進常委)。

九大開始後，經毛澤東「欽定」後，由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組成了三人小組，負責確定政治局及常委人選名單。他們最後搞出來的名單中，中央文革成員和林彪以下軍委辦事組的一班人紛紛進入政治局。在進一步確定常委人選時，江青自以為是文革大功臣，又是毛的夫人，覺得自己進常委是理所當然的事。在這種情況下，三人小組一度也把江青放入了常委候選人名單。但周知道，此事要由毛說了才算數。文革中，毛雖曾幾次批評江青，但到頭來，他仍然是江青最堅定的支持者，周絕不會在這件事上去拗毛的意志。結果，毛在常委名單上劃去了江青的名字，說這是「徒有虛名，都不適當」。[7] 這讓周恩來鬆了一口氣，順理成章地把江青從常委候選名單裏拿掉了。

但九大還是在中央委員選舉時出了問題。毛澤東以全票當選，林彪則少了兩票，這多半是因為他和夫人葉群都未投自己的票，以免出現在得票上和毛平起平坐的情況。周恩來也未獲全票，大概他和鄧穎超都沒有投自己的票。問題在於，江青少了十幾票，她懷疑林彪手下那幫大將沒有把票投給她。張春橋等人還提出要追查這件事，後來被毛阻止了。[8] 這麼一來，九大還沒有結束，江青和「軍人派」已經結下了一個不算小的「樑子」。

最後，九大所建立的新的政治權力體制，基本上是由三種勢力「捏合」後形成的。第一種是文革派，以江青為首，也包括陳伯達和康生，以及文革中躥上來的一批政治「新貴」。但這不是鐵板一塊，比如當時仍然擔任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和小組其他成員之間已經產生了很深的裂痕。第二種是以林彪及軍委辦事組的幾位成員為首的軍隊勢力。大批軍隊幹部，尤其是在地方上支左後進入「新興權力機構」而掌權的那一大批軍人，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軍委辦事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林彪麾下的大將，又都進了政治局(其中，黃一度還是政治局常委的人選)，成為這一派的中堅力量。但這裏的複雜之處在於，林彪其實並不能全面掌控軍隊。由於歷史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軍隊裏歷來是有山頭的，情況複雜。第三種是文革中未被打倒或新近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廣義上說，周恩來以及在

中央工作的葉劍英、李先念等都屬於這一派，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周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也算是林彪的老師，在軍中輩份極高。即便他沒有調動部隊的權力，他的話在軍隊將領中還是有影響力的。

在這一權力結構中處於頂端的，無疑是毛澤東本人。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在權力掌控上就可以高枕無憂。從九大後的局面看，林彪的勢力明顯膨脹。若是追根溯源，這恰恰是因為一月革命後毛出於推進運動和控制局勢之需必須倚重林彪，讓軍隊以「支左」的名義介入文革。但這麼做的結果是，毛打破了自己多年來一直在軍中搞「五湖四海」，讓各個山頭的力量相互制約平衡的做法，造成了林彪勢力「尾大不掉」的情勢。後來看，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應對林彪勢力坐大後中央權力機制的畸形狀態，毛發現文革居然停不下來。九大後，又一輪政治鬥爭的潘多拉魔盒被打開，文革居然又搞了七年。

二

九大開過後，在如何對待文革的問題上，毛澤東實際上已陷入一種悖論之中。一方面，他想結束文革運動；但另一方面，在運動本身巨大慣性的推動下，也在毛的一些新想法的支配下，一系列新運動又接踵而來。其中，有整個文革期間最神秘、最荒唐、也最講不清楚的一場「運動」——「清查五一六」。這件事的起始同周恩來有關。北京最初的「五一六」組織，都以主張「批周」起家。到1969年，當年那幾個名為「五一六」的小組織早已銷聲匿跡。但毛仍幾次親自發話，中央也一再發文件，要挖出「五一六分子」。這一點上，這個運動同1930年代初紅區的「反AB團」有如出一轍之處，它是一種虛幻的想像，也是一根可以隨意拿出來打人甚至殺人的棍子。在毛那裏，這麼做其實也是在為給文革動亂找「替罪羊」。1969年後，他幾次在接見外賓時提到「五一六」，說文革出現混亂就是「五一六」破壞的結果。[9]

1970年春夏之交，全國又展開了一場「一打三反」運動，主旨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在實行中，它和「清查五一六」結合起來，除重新揪出少數「歷史反革命」外，主

要的打擊對象是形形色色的「現行反革命」，包括許多昨日的「革命小將」和各路造反派。它的實際作用也只是讓文革中以「大聯合」和「三結合」名義重建起來的新權力結構和建制力量，重新確立起對整個社會的控制。

同時，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吐故納新」的口號，黨內也搞起了整黨，毛的本意或許是藉此讓大多數黨員對文革做正面表態，但實行中，運動卻很快淪為走過場的形式。在全國範圍內，首先是在中央機關，還出現了根據毛的〈五七指示〉創辦的各式各樣的五七幹校，大批幹部集體下放農村。毛的初衷，大概是想以此為文革從「大破」轉向「大立」開闢出一條路。但是，各路幹校在實踐中卻成為人員安置的一種手段，從未使參與者產生轉化為「新人」或創建「新社會」的使命感和光榮感。這顯然不是毛想像中的「理想」體制。所以，毛後來一再提出「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之類的問題。

對這些運動，除了在外交部利用「清查五一六」清除那裏在運動中奪權的造反派，從而恢復控制和重建秩序外，[10] 周恩來幾乎完全不感興趣，至多只是避不開時講幾句應景的話。文革期間，他只要一有機會，就會講「抓革命」的同時「促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重要性。[11] 九大後，這個話他講得更多了。在文革處於高潮的1967年到1968年，國民經濟及生產出現嚴重滑坡。但從1969年起，這一趨勢開始扭轉，這一年工農業總產值從上一年的低點增長了23.8%，其中工業生產的增長更是達到34.3%。[12] 這之後，儘管文革並未結束，但國民經濟仍持續出現增長局面，在到1976年的七年裏，有五年的增長百分比達到了兩位數。無論如何，這同周恩來的持續努力是分不開的。

不過，按照毛澤東的本意，搞「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整黨等運動，確實是要為文革收場的。而文革無法收場，直接原因並不僅僅在於下面，更在於上面，尤其在於中共最高領導層。九大期間，軍人派和文革派之間的分歧和爭鬥已露端倪。九大後，他們之間的矛盾仍頑固地存在，並不斷地深化及表面化。更要命的是，這種矛盾背後的癥結在於毛、林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縫。毛已開始對林不放心，也不大願意讓他擔任接班人了。這裏的關鍵並不僅僅在於林是否可靠，還在於毛、林已顯露出思想上的分歧；同時，從毛的角度來看，林對自己的位置越來越擺得不對了。這是毛、林走向分道揚鑣的關鍵起點。

以周恩來在政治上的敏感，他應該從一開始就可以感覺到毛、林關係的變化，這也使他身不由己地陷入到又一輪政治鬥爭的夾縫之中。從心底的感情和理念來說，周跟林及軍隊系統更為接近。但是，周又絕對不願意同江青及文革派發生正面對抗。他的處境也變得日益複雜、微妙，不能不在政治上「走鋼絲」。

但換個角度來看，對周恩來來說，毛、林關係產生裂痕，至少在當時並不見得是一件壞事。周在九大上的一個大收穫是，他作為黨內毛、林以下第三把手的位置比先前更為穩固，他也竭力試圖同時和軍人派和文革派這兩邊都保持良好關係，左右逢源。更何況，文革一旦進入「收尾」階段，百廢待興，毛用得着周的地方甚多。1967年到1968年間周曾經有過的那種政治上的不確定和不安全感，九大後的一段時間裏可以說是消失殆盡。但周心裏知道得很清楚，在他的地位似乎更為穩固的同時，其中包含的危險也增加了。

歷史的發展有着自己的慣性和邏輯，從來就充滿弔詭，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儘管毛澤東在九大後已經開始對林彪越來越不放心，但整個1969年在毛的促動下，全國出現了一片「要準備打仗」的聲音，結果林彪的勢力也隨之進一步坐大。

早在1969年3月，中蘇邊防部隊兩次在珍寶島發生衝突。這之後，毛澤東在九大上提出了「要準備打仗」的口號。但他當時這麼做，並不見得是因為他真的覺得要打仗了，而主要是為了給「九大」造勢，形成一種全國範圍的動員氛圍。即便如此，這還是為林彪及軍人派的權力和影響的擴大創造條件。九大開過後，中國社會仍瀰漫着一片「備戰」的氣氛。到了8月，又發生了蘇聯邊防部隊突然在新疆全殲中方一個分隊的事件，還不斷有各種傳言說蘇聯準備對中國實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13] 這些傳言其實是蘇方有意製造和散佈的，其目的就是「在北京煽動恐慌」，事實上「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表明蘇聯領導曾有過實施這種打擊的考慮」。[14] 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卻覺得此事非同小可，不能不認真對待。到8月底，中央軍委發佈命令，在邊疆各省份實行全面軍事管制和動員。[15] 這一年國慶到來時，毛說：今年國慶節，地方、軍隊的同志都不要去北京，怕敵人

趁機消滅我們的中心。[16] 到國慶前一天，林彪竟然下令要在北京實行一級軍事準備，部隊全面動員。[17] 他甚至提出，為防備蘇聯炸壩洩水，要把密雲水庫的水提前放掉。後來，幸虧被周攔住，這麼一件極可怕的事情才未發生。[18]

國慶過後，蘇聯什麼也沒有做。同時，中斷多時的中蘇邊界談判在雙方協商後已於9月下旬決定恢復舉行，蘇聯代表團定於10月19日抵達北京。這本來是一件好事，有助於緩和當時處於極端緊張狀態的中蘇關係。可是，「杞人無事憂天傾」，毛澤東此時已陷入自己製造出來的「戰爭即將到來」的恐慌氣氛之中，竟然懷疑蘇聯是否會藉此突襲中國。10月14日，蘇聯代表團到北京前五天，毛把周恩來等召到人民大會堂，說：中央領導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好多人，應該分散些。[19] 當晚，毛就乘專車離開北京前往武漢。三天後，周和政治局根據毛的指示作出安排，除了周本人和總參謀長黃永勝留在北京外，中央其他領導人都要在10月20日之前撤離北京。[20] 黃還和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幾名林彪麾下的大將一道，組成軍委前指，進入西山指揮所。[21]

林彪當時在蘇州休養，但他向來對戰爭問題高度敏感，一片風聲鶴唳之下，10月18日，他未預先知會毛澤東，就口授了一道〈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下令軍隊「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22] 隨後，林的秘書通過電話將指示傳達給黃永勝。黃又下令將林的口諭以「林副主席指示」的名義向全軍傳達。在總參謀部，值班的副總參謀長閻仲川為執行時方便，擅自給指示加上了「林副主席一號命令」的標題，全軍在收到命令後，隨即進入緊急戰備狀態。[23] 無論怎麼說，林彪未向毛澤東報告就發出這一重大動員指示，確有不妥之處。他為什麼會這麼做，在缺乏可靠資料的情況下，無從考證。但就實際效果而言，不管林當時是怎麼想的，他走出這一步，就已在從來對自己的最高統帥權力極端重視的毛那裏犯了大忌。

林彪電話指示的記錄送交周恩來閱時，林的指示已作為「一號命令」下達，周當即批示「請主席閱」。但當汪東興把這個「一號命令」拿給毛看時，毛居然說「燒掉」；還不等汪反應過來，他就自己動手把傳閱件燒掉了。經汪堅持因歸檔需要，才留下了傳閱件的信封。[24] 我們無法確知，毛

當時究竟在想些什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固然會覺得林的行為有越權之嫌，但更會為林一聲令下後全軍呼應的情況而感到震驚。九大後，毛就開始對林不信任了，這麼一來，又加上了反感、擔憂乃至恐懼。

當晚，周恩來打電話給汪東興，詢問毛澤東是否已看過林彪的緊急電話通知，汪答道：「主席看後給燒了。」周驚詫地問：「燒了？」汪給以肯定的答覆後，周「沒有說話」，[25] 但他心中一定明白此事非同小可，毛、林關係確實已出現一道大裂痕。只是，他恐怕仍想知道，還有彌補的辦法嗎？

三

1970年上半年，毛、林之間的矛盾沒有進一步顯露，但實際上，在黨內上層政治看似平和的水面下，危險的漩渦和湍急的暗流正在聚集。問題和麻煩露出水面，最初是從一件乍一看似乎並不那麼敏感的四屆人大的籌備開始的。

那一段時間，毛澤東在武昌，突然之間他想到了四屆人大上會碰到的人事問題。3月7日，他發話說，國家體制可以改變，不設主席和副主席，由人大常委會負責人代表。[26] 但毛並未明言為什麼要做此改動。第二天，汪東興向周恩來傳達了毛的看法。當晚，周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又由汪傳達了毛的看法。既然毛發了話，與會者自然「一致擁護毛澤東的意見」。會上決定，由周恩來同張春橋、黃永勝、謝富治、汪東興一道，負責四屆人大代表確定及選舉的進行；同時，還成立了一個由康生、張春橋等組成的工作小組，負責修改憲法之事。[27]

這之後，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鋪開。3月17日至2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由各省、市、自治區及軍方負責人共百餘人參加，討論此事。在修憲問題上，既然毛發了話不設國家主席，與會者又都表示同意。當時，林彪正在蘇州休養，未出席會議。然而，他也在關注設不設國家主席這件事，並讓秘書給毛的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對此未置可否，只是讓秘書回電：「問候林彪同志好。」[28]

4月中旬，政治局將要開會聽取修憲小組的報告，也將對是否設國家主席之事做出決定。11日，林彪又讓秘書給毛澤東打電話，仍建議由毛兼

任國家主席。「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林還說，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29] 這個電話記錄，同時也傳給了中央政治局。第二天，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包括周在內，多數人支持林的意見。[30] 周會這麼做其實並不奇怪。說到底他很清楚，國家若不設元首，不僅在體制上說不過去，在實踐中也會碰到很多問題。究竟由毛或林彪擔任國家主席，在周看來恐怕不是一個大問題。劉少奇作為黨的第二把手，曾當過近十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林既已被確定為毛的接班人，由他出任國家主席也沒有什麼說不過去的地方。至於林的葫蘆裏究竟賣什麼藥，大概還不是周當時要深究的。會後，周將會議情況向毛報告，第二天毛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31] 但他沒有提及不設國家主席一節。

這件事並沒有就此了結。4月27日，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當天下午就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林彪和周恩來都出席了。毛當着他們的面說：「我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又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32] 毛的話講得很清楚，口氣也有點兇。不過，參加會議的人們當時並不顯得緊張，很多人反而還笑了起來。

其實，這時更讓周恩來頭痛的，並不是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而是林彪麾下的軍人派和江青為首的文革派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並不斷暴露出來。5月17日，發生了一件蹊蹺的事：江青把軍委辦事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幾位大將找去，講了一大通攻擊周恩來的話，主要是說他在歷史上曾站錯隊的問題。[33] 周對江青向來持恭敬謙讓及盡量合作的態度，當時他和毛的這位夫人之間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矛盾或衝突。江青何以這麼做？一種可能是，這其實是毛讓她做的，目的是通過她來試探林彪麾下幾員大將的態度。當然，江青個性衝動，也不能排除這是由於她那幾天情緒不好或因某一偶然小事而發，是她的一種任性行為。黃、吳、李、邱等人本來就對江青及文革派有看法，這一次他們以為抓住了江青的把柄。他們隨後到林彪處彙報工作時，講到了江青攻擊周的事，林聽後「非常氣憤」，當即要他們將此事報告給毛。他們隨即推派黃永勝到毛處

「告狀」。毛澤東卻根本未顯出任何驚奇之處，只是輕描淡寫地應付了黃幾句，要黃他們不要讓江青知道他們來毛處告狀之事，似乎完全無意把此事當作一件大事來對待。據邱會作說，他也把這件事告訴了周恩來。周顯得極為感激，「眼眶濕潤」地說：「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夠理解大事的！」[34] 看來，周恐怕已洞察到此事的複雜之處。江青為什麼會在幾位大將面前攻擊他？軍人派又何以會向他「通風報信」？周絕不會執意去深究此事，更不會去向毛告狀或爭取什麼，但他心中不會忘掉此事，並只會在做人做事時更加小心翼翼。

就在此事發生前後，吳法憲等向林彪彙報時，林談到了設國家主席的事，說還是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又說：「國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來當，別人都不合適。」還說：「我也不適合當這個主席，我的身體不好，不能參加活動，不能出國訪問。」[35] 當時吳的感覺是，林的口氣非常誠懇。毛已說過他不會當國家主席，林何以還堅持此議？官史後來的說法是，林是想要爭國家主席的位置，「搶班奪權」。但此話不通，毛還在那裏，林彪要「搶」到什麼位置，才會有從毛那裏「奪權」的本錢？更何況，國家主席也就是個名頭，並無多少實權，哪裏比得上「副統帥」和「毛的接班人」這個白紙黑字、已經寫進黨章的規定的分量？林還用得着同毛對着幹，去搶奪國家主席的位置嗎？這是一個偽命題。

但這件事還沒有完。7月17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憲法修改起草委員會會議上，宣讀了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及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稿。當中，本來有一句「可以考慮國家不再設主席、副主席，而以人大常委負責人接受外國使節」。但經會上討論後，這句話在修改稿中被刪掉了。毛得知會議情況後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36]

這之後，軍人派和文革派又爆發了一場直接衝突。8月13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開會，討論憲法修正草案定稿問題。結果，吳法憲跳了出來，向張春橋叫板。張在審閱憲法草案稿時，把文中說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句中的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給刪掉了，而這一特定的提法恰恰是林彪首倡的。吳同張大吵，又上綱上線給他扣帽子，說他貶低偉大領袖毛主席、影射攻擊

林副主席等等。周恩來在一旁不斷打圓場，但就是不做兩人之間孰是孰非的判斷。[37] 第二天，周再次主持政治局開會，張做了讓步，不再堅持刪去這三個副詞，於是包括這一特定提法的憲法草案獲得了通過。[38] 一時間，這件事似乎過去了。但周心裏應該清楚事情並沒有完，尤其是又一次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馬上就要召開了。

據周恩來秘書紀東回憶，廬山會議前，他偶然間看到了周寫下的一張字條，親筆抄錄了一首打油詩：

〈不公與不幹〉（西廂記）

做天難做二月天，
蠶要暖和參要寒。
種菜哥哥要落雨，
採桑娘子要晴乾。[39]

周恩來的這首打油詩，活生生地勾畫出了他內心深處的矛盾及難處。周之所指，應該不僅僅是文革派和軍人派之間日益劍拔弩張的對峙，更應該是以他政治上的敏感，想到兩派的背後都有人，一邊是毛澤東，一邊是林彪，這兩個人都是周恩來「碰不得」的。

四

九屆二中全會是8月23日開始舉行的。8月19日，毛澤東上了廬山；第二天，周恩來也從北京飛到江西後上山。在中共歷史上，廬山真是一個多事的地方，每次在這裏開會，多少都會有些故事。12年前、1959年的那次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身敗名裂，林彪通過大舉批彭，實現了政治上的進一步騰飛。這一次，廬山會議又會開成什麼樣子？

8月22日，毛澤東在山上召集中央常委會議，討論全會議程等相關問題。設立國家主席的事又被提了出來，而且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所有常委都對設國家主席持支持態度。陳伯達說，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的位置一元化，林彪、周恩來、康生也都發言贊成此議。周還出點子：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

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由國家主席授權，本人並不一定出面。毛聽着聽着，臉色越來越難看，最後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接着，他又說了幾句狠話：「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又話帶威脅地說：「要把這次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成分裂的、失敗的會。」[40] 九大那個「團結和勝利」的大會剛剛開過一年多，毛又開始講「分裂和失敗」了。

這裏的蹊蹺之處是周恩來的態度。自延安整風以來，尤其是自反冒進以後，他在黨內高層政治中的一個基本行事原則，就是在大政方針問題上絕不跟毛澤東持不同看法，更不會站到毛的對立面去。偶爾出現他和毛意見相左的情況，一旦受到毛的批評，他也馬上做檢討，直到在毛那裏通過為止。為什麼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儘管毛已幾次說出「不要」的話之後，周卻依然會在廬山會議前的常委會上支持設國家主席，並要毛兼任這一職務？這只能說明，或者毛根本沒有就此事向周交過底，或者毛對周做的是一番充滿「暗箱作業」意味的「交底」（具體的內容則無從得知），使周覺得可以持贊成設立國家主席的態度。

8月23日下午，全會開幕。開會時間本來定在3點，但毛澤東和林彪卻直到3點45分才走進會場。據陳伯達記述，「開會之前，林彪個人單獨在一個房間同毛主席談話，周恩來同志和我與其他人，都往另一房間等待，時間並不很短」。[41] 只是，即便陳的回憶是可靠的，我們卻依然無法確知，在那一段「並不很短」的時間裏，毛、林兩人究竟談了些什麼。

會議開始後，周恩來宣佈全會議程為討論修改憲法、經濟計劃以及戰備問題後，毛澤東問林彪和康生：「你們誰講」，林說他要說話。[42] 林有個提綱，說了一個多小時，重點是吹捧毛，反覆說毛是天才。他沒有直接談到設國家主席或要讓毛當國家主席，講話中與此最接近的一段話是：「毛主席的偉大領袖、無產階級專政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用憲法的形式固定下來非常好，非常好！」他還話中帶刺地說，毛的「這個領導地位，在國內、國外除少數極端反動分子以外也都承認」。[43] 但是，他點到為止，沒有直呼其名地把張春橋或其他人端出來。聽他講話的人的感覺是，他說得比較亂，車軲轆來回轉，沒有什麼邏輯。

林彪講的那些捧毛澤東的話，包括「天才論」，毛聽過多次。這一次，林又講這些話，毛起先還在笑。但是，當林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文革派時，毛的臉色變了，漸漸地板起面孔，再無笑容。林講完後，康生又說了一番捧他的話，毛「已近煩躁」，隨即宣佈「今天散會」，然後扭頭就走。[44] 周恩來就坐在毛、林兩人旁邊，這一切他當然都看到了。

在會上及散會後，林彪的講話並沒有馬上產生太大的反響。與會的中央委員們基本上都把林的話當做官樣文章來看待，根本搞不清楚底細。但陳伯達心裏裝着同張春橋的「舊帳」，分明聽出林的話是衝着張來的。散會後，他馬上去問林彪，「講話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答道，「毛主席是知道的」。陳伯達大喜，隨即又去找了吳法憲，兩人溝通了情況，準備在第二天的會上對張春橋開火。[45]

8月24日，全會先是分組收聽林彪前一天講話的錄音。陳伯達在華北小組發言，講述「天才論」，還不指名地批評張春橋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46] 葉群和吳法憲也在各自小組大肆發聲，做了擁護林彪講話的發言。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汪東興的態度。他是毛澤東的「近侍」，在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所有人眼裏，他的行動必定或由毛授意，或得到了毛的批准。他在陳伯達之後發言，對林彪的講話顯得極為熱情，同「軍事俱樂部」的幾位大將一道，為林彪煽起的火苗在火上加油。由於他的身分特殊，影響也最大。[47] 本來，文革幫就不得人心，這一來，張春橋很快就成了眾矢之的，會議的政治氣氛也一下子就炒熱了。

周恩來的態度耐人尋味。這天，他基本上是冷眼旁觀，既不參與放火或火上加油，也不採取行動去滅火。晚上，汪東興打電話請示周：陳伯達編了一個關於天才的語錄，要不要印發？周答道：這個語錄不能發，封存吧。[48] 周是否已覺察到風向不對？還是因為他的政治經驗和嗅覺告訴他，這件事不會這麼簡單？

8月25日上午，全會上印發了載有陳伯達發言的第六號簡報。火燒得更猛了，各小組的發言人不僅都擁護設國家主席，還紛紛要求「揪出」陳伯達發言中提到的「反對毛主席的人」。這一來，張春橋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就連陳毅元帥，也在摸不清狀況的情況下對張上綱上線，講了好多狠話。[49] 一時之間，張春橋等人驚慌失措、陣腳大亂。當天中午，江青

帶着張春橋和姚文元去見毛澤東，聲淚俱下地哭訴他們在會上遭到圍攻的情形。[50]這一場景，像極了四年多前「二月逆流」發生時幾位老帥和老人「大鬧懷仁堂」後，江青帶着張他們去見毛的那一幕。這之後，顯然是遵照毛的囑咐，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又一起去找周恩來談話。[51]他們應該是在向周交底。

下午3點，毛澤東親自出馬，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以外，也讓各組組長參加。毛又擺出了「二月逆流」時訓斥老人老帥們時的那副面孔，臉色鐵青地說：關於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還說：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如果再這樣鬧下去，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開完了會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辭去黨中央委員會的主席。會議決定，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六號簡報，並責令陳伯達、吳法憲等做檢討。[52]這個會一開完，周恩來就到江青、康生那裏和他們談話，內容不得而知，極可能是在交換聽到毛講話後的心得。隨後，陳伯達、汪東興又分別找周恩來談話。[53]據汪說，周告訴他：「你爭取第一個做檢查。」結果，第二天汪就交出了第一份檢討。[54]

從8月26日起，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會議休會兩天。大多數與會者都去遊山玩水，周恩來卻忙得不可開交。連續幾天，毛每天深夜或凌晨，都要和周單獨見面談話，顯然是聽取周的報告並面授機宜。周轉過頭來，也「不分晝夜地找人談話或開小會」。[55]毛親自見了陳伯達，「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說他參加了「軍事俱樂部」。[56]周和康生一道，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要在前幾天的會上跳得最高的吳法憲帶頭做檢討。[57]但這時，林彪卻表現出一種反感及抵觸的態度。他明明應該知道這事是毛推動要做的，仍堅持說吳法憲他們「沒有錯」，要他們「不要檢查」。[58]林彪從來不同毛對着幹，這次何以會如此行事？這至少說明，他心裏確有委屈；同時也透露出，他恐怕對自己的地位做了太高的估計，以為毛拿他沒辦法。這一時刻，已埋下了他一年後的下場的又一重要伏筆。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根據毛的意思，會議仍然由林彪主持，但主要發言者是周恩來。周點了陳伯達和吳法憲的名，說他們自全會一開始就在小組討論中「作了有代表性的錯誤發言，把修改憲法的討

論引導到一個錯誤的方向去，以華北組最為突出」；到後來，是「毛主席扭轉了這一錯誤偏向」。周還說，要「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要給犯錯誤的同志認識、改正錯誤的時間」，顯然他不想在林彪面前把話講得太重，更不希望把這件事情搞得太大。[59]

不過，毛澤東可不想看到這場「廬山風暴」就這麼平息下去。8月31日，他拿出了殺手鐧，寫了〈我的一點意見〉。這很像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那一幕的重演。只是，同那篇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的文字不一樣，在這一篇裏，毛只把陳伯達拿出來開刀。毛說，他和「天才理論家」陳伯達「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但這一次，陳卻「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本來，「天才論」是林彪首創，但毛卻虛晃一槍，說他和林彪「兩人一致認為」，陳提出天才論是錯誤的。[60]

毛澤東採取大反擊行動時，又讓周恩來出面來組織推動這件事。9月1日中午，毛又約周談話。當天下午，周把毛的〈我的一點意見〉拿給陳伯達看，並通知他，將要對他展開批判。[61] 這以後，全會的風向完全轉了過來。陳伯達成了遭到批判的靶子，林彪夫人葉群和吳法憲因先前發言時叫得最兇，也坐上了被告席。即便如此，周還是幫陳伯達說了句話：關於毛和陳的關係，「主席是說在一些問題上，而不是說在所有重大問題上沒有配合過」。[62] 顯然，周還是不想把這把火燒得太大。

9月6日傍晚，全會舉行閉幕會議。林彪主持會議，他要毛講話。毛又說了幾句狠話：「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63] 毛又讓周講話。周說這次會議經過討論，還是按照毛的要求，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周接着說，全會後大家奔向各方，新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在適當的時候開四屆人大，二是要實行國務院制定的197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報告。[64] 周的這些話是言不由衷，還是粉飾太平？應該都是。尤其是，他在發言中竟然未提「批陳」，這應是他再次透露出「廬山上的這場鬥爭」可以到此結束的願望。

據邱會作回憶，下山前，周恩來又和他、吳法憲、李作鵬談話，說「毛主席要『和為貴』，問題在山上處理好，不帶下山」。[65] 然而，待林彪

等人都下山後，9月8日凌晨，毛又把周找去談話。四天後，毛要周恩來和康生、李德生一道，負責陳伯達的專案。[66] 短短幾天裏，毛已經讓周知道，廬山上發生的「這件事」並沒有完。

五

周恩來回到北京後，繼續被毛澤東委以重任，組織對陳伯達的批判，並處理與廬山會議有關的善後事宜。周第一個「放過門」的是汪東興。早在廬山上，毛澤東8月23日發話之後，汪馬上就做了檢查。下山後，他又接着檢查，還專門為此幾次跑去向周「討教」。周是做檢討的行家裏手，看來也盡心竭力地把自己的心得傳授給了汪。接到汪痛苦流涕之下寫成的「深刻檢查」後，毛很快就讓他過關了。[67]

但周恩來最希望看到的，應是葉群和林彪麾下的那班大將，尤其是在廬山上當了「出頭鳥」的吳法憲，能夠主動做檢查。9月22日，周恩來和康生一道見了林彪，把毛對汪東興書面檢討的批示給林看。周向林提議，約黃、吳、李、邱一起讀汪的檢討和毛的批示，「在他們想通後，應給主席、林副主席寫一書面檢討，揭露事實真相，與陳伯達徹底決裂」。[68] 周這麼做，既是給黃、吳、李、邱出點子，讓他們也可以「過關」，也包含着對林的暗示，要他主動尋找並抓住「下台階」的機會。林彪卻未置可否。

周恩來如此行事，自然有他的盤算。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連續找周恩來談話後，他心裏已經明白，隨着毛、林之間的隔閡和矛盾不斷加深，他們的關係變了。如何應對此事，對周是又一次極為嚴重的挑戰。當時看來，他想達到的目的只有一個：盡可能化解毛、林之間的矛盾，讓林彪軟着陸。

從歷史上看，周恩來同林彪的關係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周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時。儘管林那時只是軍校普通學員，但周是認識他的。1927年8月，周、林兩人都參加了南昌起義，林當時還只是一個連長，而周卻是起事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在中共黨內和軍內，周恩來的資歷和輩份都要遠遠高於林彪。

然而，當林彪在中共軍事領導層中逐步展露頭角之後，周恩來以其識人之眼光和一貫的處事風格，對林表現出了相當的尊重。1943年，林代表毛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周甘當他的助手，又對他耳提面命，為他出謀劃策。[69] 1950年10月周、林兩人一起前往蘇聯面見斯大林，商談中國出兵朝鮮的問題，據當時任翻譯的師哲回憶，周事事與林彪商量，兩人之間的關係相當融洽。[70] 1950年代末，林彪先成為黨中央副主席，1959年廬山會議後又出任國防部長，周對林也表現得更為尊重。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林彪正式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周更是處處表現出對林的擁戴。對周來說，這不僅是他服膺毛澤東的決策和權威的又一具體表現，也和他自1940年代以來便一直避免成為毛之下二號人物的做法一脈相承。

從理念上來看，周恩來和林彪有相通之處，尤其是對林彪關於文革告一段落後便應當把注意力集中到發展生產力上來的看法，周完全贊同。同時，從黨內上層政治之爭來看，在「林彪集團」同「江青集團」的對峙中，周從立場及感情上來說，應該都同林更為接近。這一點，從林彪麾下的幾員大將的回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71]

毛、林矛盾擺到周恩來面前後，他從自己自延安整風時便確立的「一定之規」出發，當然會在這件大事上站在毛澤東一邊，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同時，他也知道毛、林矛盾的特殊性：畢竟，林彪是被毛澤東推上中共第二把手的位置的，並已在「九大」通過的黨章中明確規定為毛的接班人，同時林在軍內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即便從純粹「政治鬥爭」算計的角度來看，林彪一派和文革派之間的對峙和鬥爭若持續下去，固然會讓周不斷面臨新的挑戰，但以他的閱歷和經驗，卻不是一個不可解決的難題。至少從道理上來說，這也會為他提供更大的迴旋空間，從而加大他在政治上的「安全係數」。而如果林彪倒台的話，周就會失去他和毛之間一個重要的政治鬥爭「緩衝閥」，而使得自己直接暴露在毛的全面控制意願和政治猜疑心理的面前。因此，從毛、林之間的矛盾開始露頭之時起，只要他們不撕破臉，周就會使出自己「和稀泥」的全部本領，盡力不使他們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升級。

然而，在毛澤東已經對林彪產生了嚴重不滿的情況下，周恩來要想化解毛、林之間的矛盾，說來已經不易，做來更是困難。毛此時應該已下定

了不能讓林任接班人的決心，但一時之間，他還不想或不便同林撕破臉，因而需要考慮對這件「大事」究竟如何處理才好。他拿陳伯達開刀，但批陳的中心卻是他的「天才論」，而這又恰恰是林彪最初倡導的。這種「一箭雙鵰」的做法，是毛在政治上的一着高招，既可以通過「批陳」觸及林彪，同時又給何時和怎樣「打林」留下了空間和餘地。

林彪對毛澤東的動作及背後的動機，從一開始就表現得極為敏感。儘管周恩來一再暗示，要他主動向毛表個態、認個錯，但他卻不肯「配合」。他從廬山上下來後，就抱定宗旨，採取「三不」態度，不管毛如何施加壓力，他都「不說話，不干擾，不自責」。[72]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和林彪同上天安門，兩人沒有就廬山會議或「批陳」有任何交流。但葉群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毛時，毛的態度溫和友好，和她講了很多話。[73] 這其實也是毛給林的一個「信號」，可是林彪依然不肯自己出面。幾天後，葉群交出了一份檢討，吳法憲也做了檢討。[74] 然而，毛澤東想看到的並不是葉、吳兩人的檢討，而是林彪的表態。因此，他對葉、吳兩人檢討的反應極為嚴厲。毛在葉群的檢討信上批道：「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又在吳的檢討上批道：「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什麼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200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75] 毛沒有點林彪的名，但這些話簡直就是對着林說的，不僅已不給林面子，更是想藉此把林「逼」出來做自我檢討。毛做出批示後的第二天，周恩來就和康生一道去見林彪，把毛的批示當面交給他。[76] 但林彪還是抱定宗旨，就是不主動出來說幾句毛想聽的話。對此，周也是無可奈何。

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說，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77] 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信號。「四個偉大」正是林彪提出的，毛同斯諾這樣一個外國人說這個話，說明他在要對林「動手」上的態度，已達到了轉折點。

1970年秋冬，從表面上看，毛、林之間的矛盾似乎沒有明顯的發展，但其實這只是暴風雨到來前的短暫寧靜。就在毛澤東會見斯諾的同一天晚上，根據毛的指示，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召開北京軍區黨委擴大

會議，史稱華北會議。第二天，周恩來向毛報送了前一晚開會情況的報告。會議將「集中討論北京軍區和華北地區對陳伯達問題的認識和揭發」，參加的「人要多一些，時間要長一些」。毛批示「照辦」，並「建議李德生、紀登奎二同志參加會議」，又提出「(黃)永勝、(李)作鵬應同德生、登奎一道參加華北會議」。[78]

在周恩來的具體掌控下，華北會議於12月22日開始舉行，一直開到第二年的1月下旬，來自北京軍區和華北地區的領導幹部近五百人參加了會議。經毛點名後，葉群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也參加了會議。期間，周不斷向毛報告，毛也不斷發出指示。會議的主題是「批陳」，時任北京軍區主要領導的李雪峰和鄭維山則因為「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而在會上成了主要的批判對象。但是，毛的主要注意力其實並不在這兩個人。他最希望看到的，是黃、吳、李、邱等人能在會上自動做自我批評，並藉此把他們從林彪那裏「拉出來」。可是，這幾位大將在會上「既沒有批陳，也不做檢討」。[79] 1月24日，周在華北會議上做總結發言，只好泛泛地說，「會議通過對陳伯達的揭發批判，更加認清了他的反黨罪行，進一步同他劃清了界限」，又宣佈對「緊跟反黨分子陳伯達，反對黨的九大路線，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嚴重錯誤」的李雪峰和鄭維山做出組織處理，「調離原職，繼續進行檢查學習」。[80] 但這並不是毛想看到的結果。

華北會議尚在進行時，毛澤東已經按捺不住了，又提出要軍委召開一個以「批陳整風」為主題的座談會。周恩來當時還在管華北會議，但根據毛的意思也把一部分精力放到這件事上。1月9日起，中央軍委的批陳整風座談會開始舉行，參加的有軍隊將領近150人，會開了一個月。從毛的角度看，開這個會的目的，還是要檢測軍委辦事組黃、吳、李、邱等的態度，並藉此把林彪也牽出來。然而，這幾位大將摸不清毛的意圖和底盤，又不願主動牽出林彪，因而在會上採取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只是被動應付的態度。毛澤東不耐煩了。2月19日，他在周恩來關於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的一個報告上批示道：「請告各位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前期，批陳不痛不癢。」[81] 第二天，他讀到軍委辦事處上報

的學習毛前一天「重點在批陳」指示的情況彙報時，又針對林麾下的幾員大將更為明確地寫道：「你們幾個同志，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麼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採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82]

然而，主持座談會的黃永勝卻覺得，自己根本沒有參加廬山會議，更毋論在會上發言了，因而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檢討的。周恩來看到黃、吳、李、邱這幾個人還不「開竅」，真的是急了。2月22日，他主持政治局會議時講了一大篇話，從自己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說起，開導黃、吳、李、邱說，在政治上犯路線、方向性錯誤，認識和覺悟總是要有一過程，甚至是痛苦的過程，讓他們趕快檢討。[83]會下，周還針對黃永勝的想法說：「什麼會上沒有發言，發言不發言，在主席那裏都是一樣的，主席要打你們的宗派主義！」[84]在毛的壓力下，又經周的提示，黃、吳、李、邱終於在一週後分別交出了「深刻檢討」，承認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本來應該在軍委座談會上主動檢查，但卻沒有這麼做，是「錯上加錯」，一定要在「批陳整風」運動中認真檢查自己。[85]第二天，毛就批示「很好，有了主動，力求貫徹」，意思是還要看他們的行動。[86]這之後，毛的眼睛仍然盯着軍委座談會。3月24日，他收到黃永勝等的又一輪書面檢討後，批示道：「黃、邱、李三同志的檢討都看了，我認為寫得很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87]這裏的關鍵是最後一句話，毛還是要他們用更具體的行動來進一步「坐實」他們檢查中的保證。同一天，毛澤東又和周恩來、康生一道，同黃、吳、李、邱等談話，提出葉群和吳法憲要「重寫檢討」，還要周把黃等人的檢討送給林彪看，並去北戴河向林當面做一次彙報。[88]毛這是更為直接地向林「叫板」，但從另一角度看，也是給林「下台階」的一個「機會」。

3月30日和31日，周恩來和黃、吳、李、邱以及李德生、紀登奎一道，到北戴河同林彪談話。林「面色蒼白，毫無表情」，擺出的仍然是一副「打哈哈」的姿態，說他「完全擁護毛主席自廬山會議以來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並「不溫不火地對黃、吳、李、邱說，錯了要好好檢討」，也同意讓葉群重做檢討。[89]在不得不涉及到自己時，林只是對周說自己「講話有氣，順口而出，放了炮」，被陳伯達「利用了」。即便如此，他還是為

自己辯護說，他在會上講的話，「見到主席我也講過，後台講的話，搬到前台去講」。[90] 林後面的這段話是講給周、也是講給毛聽的，分明是在提醒毛，他在廬山上的講話是和毛通過氣的，要毛不要把他逼得太急。

周恩來一行從北戴河回來後，當天就向毛澤東送了同林彪談話的情況報告，毛也馬上圈閱。第二天，毛又聽取了周及黃、吳、李、邱關於北戴河之行的彙報。據李德生回憶，毛指着黃、吳、李、邱說：「你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沿了！現在是跳下去、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你們自己了！」[91] 毛的這幾句話說得極重。但據邱會作的不同敘述，毛指着他們對周說：「他們幾個人的問題，在我這裏就全部處理完了。」周聽後很高興，說毛的做法「對全黨團結起來，具有重要意義」。[92]

不管毛澤東究竟對周和黃、吳、李、邱說了哪些話，這件事在他那裏確實沒有完。這次談話後兩星期，從4月15日起，周恩來根據毛的指示，主持召開了「批陳整風彙報會」。周在首日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根據毛的意思為會議定下了調子。他說，廬山會議後，葉群和黃、吳、李、邱等五人幾次「失掉自我教育的機會」，在毛「一再督促下，才做出檢討」。這次開會就是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讓他們「聯繫實際，搞好自我教育」，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93] 周恩來的講話字斟句酌，但還是讓被點名的五個人成了會上遭批判的靶子，批他們最兇的是文革派的那幫人以及軍隊裏在文革中躥上去的一批「新貴」。參加會議的朱德、董必武、聶榮臻、李先念、粟裕等元老沒有加入批判。鄧穎超在會上出現過火局面時，也出來阻止（鄧通常是不做這種事的）。[94] 這裏透露出的是，周恩來其實還是希望這個會議能平穩開完，只要在毛那裏可以交代過去就行了。

在周恩來的反覆敦促下，葉群和黃、吳、李、邱在會上又做了一輪檢討。4月24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寫報告：「批陳整風彙報會議已開了九天，各組同志均已多次發言，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表示了在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加強團結的願望。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均有檢討。擬從今日起，各組進入批陳整風、自我教育的經驗交流，並討論回到各地、各方面如何深入向基層傳達。」[95] 這時周最希望的是林彪能到會上講一次話，表一個態，最好做一點自我批評。[96] 但林彪還是不肯出面。周只能乾着急，拿他沒有辦法。

對周恩來的報告，毛澤東批示：基本同意。但又說：暫時似還不必向基層黨員傳達。周又提出：「如主席還有新的設想，亦請批告，如能約我們一談，更所盼望。」這其實是在探毛的口氣，看會議能否就此結束。毛批示，可以不要談了，[97] 這就是說會議可以結束了。4月29日，周恩來在會上做總結發言。他說，廬山會議及其前後，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同反共分子陳伯達問題的性質根本不同。又分析說，這幾個人之所以犯這樣嚴重的錯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聽毛主席的話，站錯了立場，走錯了路線。他最後說：對於犯錯誤的同志，只要真正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採取歡迎幫助的態度。我們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基礎上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98] 周講過話後，會議也宣告結束了。

但實際上，在一點上周恩來應該看得很清楚：在毛澤東那裏，林彪的事情非但沒有完，實際上還只是剛剛開始。

六

幾乎與批陳整風會議召開同時，1971年3月，林彪的兒子林立果聚集了幾個他在空軍中結交的周宇馳、于新野、李偉信等幾個同夥，秘密牽頭搞了一個〈「571工程」紀要〉。其中，通篇都是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經濟發展政策的嚴厲批判，說了一堆大實話。〈紀要〉開篇就提出「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毛澤東實行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對毛澤東本人，〈紀要〉也用的是「大不敬」的言辭，將毛稱為「B52」，說他「已成為當代的秦始皇」，其實「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所有壞事嫁禍於別人」。儘管其中包含着一些擊中時弊、石破天驚的思想，總的來說，它還是一個不成熟的政治文件，或只是一個各種想法的彙集，並非真正成形的政治宣

言。它的名稱中，雖然用了「571」(「武[裝]起義」的諧音)一詞，但這實在算不得一個準備實施政變行動的成熟計劃，其中關於政變組織、參與者以及具體行動步驟的部分，顯得相當潦草空洞。所以，這至多還只是一篇由幾個年青人搞出來的、仍屬於紙上談兵的文字。[99]

林彪是否知道林立果搞了這個〈紀要〉？從目前可以看到的材料判斷，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知道此事。極有可能，林立果是背着父親做這件事的。不然的話，以林彪政治上的經驗，怎麼也不會弄出這麼一個沒有實施可行性的「計劃」。但另一面，即便林彪對此事毫不知情，〈紀要〉所透露的仍是他的一些基本想法和思想狀態。從思想上來說，在毛一再要葉群等做檢討的情況下，林彪和他的家人已經同毛分道揚鑣了，這也是林彪堅持「三不」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麼，是否存在一個由林立果「小艦隊」牽頭，捲入黃、吳、李、邱及各地「林系」將領的反對或謀殺毛澤東的陰謀？在1980年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兩案」的審判中，並沒有四位大將捲入林立果小艦隊圖謀的任何內容。他們所犯的，至多也只是政治上「站錯了隊」的「嚴重錯誤」。其實，即便是這一點也是可以辨析的。從他們的「罪證材料」來看，凡是說他們大肆吹捧林彪、死心塌地跟林走的部分，幾乎都屬於斷章取義。他們對毛的大肆吹捧，以及表現出的忠心及相關表述，比之對林彪，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說到底，他們都是從紅軍時代就在毛的「嫡系部隊」裏，跟着毛走過來的。只不過，由於指揮系統上的原因，他們同林彪的聯繫才比同高高在上的毛更為密切。黃永勝後來說，在林彪問題上，他也搞不清楚毛的真實意圖，毛又不把話講清楚。「他要是明說，我倒也會聽令而行；但他又不明說，就是繞着彎子讓我猜。」[100] 黃的話固然有道理，但毛不把話講明也有他的道理，因為他當時確實不相信黃、吳、李、邱等人了。

批陳整風會議後，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緊張。毛對林的「三不」態度越來越反感乃至惱火；林對於毛的出爾反爾、步步進逼也極為沮喪，但又不敢發作。毛、林之間的關係，也陷入了一種可怕的僵局。

這一年的五一節，林彪出席了在天安門舉行的慶祝晚會。城樓上，他和毛澤東、周恩來同坐一桌，卻沒有同毛或周說說話，也幾乎沒有笑容。

小坐幾分鐘後，他對毛說：「我有點頭痛，要先走了。」毛說了聲「好」，林即起身離開了。[101] 這時，在場的新華社記者甚至還來不及好好地照一張像，記錄下毛、林在一道的情形。周恩來得知此事後，大發雷霆，把記者狠狠地批了一通。然後，周親自動手，從已拍攝的影片中勉強找出毛、林兩人坐在天安門城樓上，但林卻處於側面的一幕，洗印成照片，第二天在報上發表。[102]

林彪心中雖然不服，但同時也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他極端忐忑乃至失常的心態，從他給毛寫的一封未發出的信中，再清楚不過地暴露出來。5月20日，林彪和周恩來會面，「談了黨內團結和相當於政治局以上人員的安全問題」。[103] 三天後，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同周談話的大意，「盼主席能找總理談一談，由總理採取落實的辦法」。信中，林先說文革已取得了偉大勝利，要鞏固勝利，就要貫徹九大的團結路線，保證批陳整風以後「黨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保持鞏固的團結，預防思想糊塗的人和冒險家採取意想不到的冒險行為，破壞黨的團結，導致秩序的混亂，引起國內國外的不良反應」。林的辦法是「暫定十年之內，對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軍區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實行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等四不」，並將這一規定傳達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擔任衛戍部隊的每一士兵，要他們任何時候不執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長對相當於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員的捉人、關人、殺人等命令」。林說，他之所以有這些想法，「是看了這次批陳整風會議文件，有的同志在擔心着安全問題，他們的心情是憂慮的，因而是值得重視和深思的」。[104]

林彪寫好這封信後，卻沒有送給毛澤東。為什麼？一種可能是，林自己也知道這封信的內容並「不完備甚至是不正確的」，想來想去，還是不送為好。另一種可能是，這件事他同周談了，以周的政治智慧和對毛的了解，一定會勸他絕不能給毛寫這封信，他聽從了周的勸告。[105] 一直要到林死後，這封信才被專案人員在他遺留的文檔中發現。

林彪在信中所透露的，是一種極為複雜的心態。他提出的各項要求，從政治上看幾近幼稚。他在信中一面說，對此事要「絕對保密」，一面又建議此決定「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擔任警衛部隊的幹部開會宣佈，由他們口頭上或文字上傳達到每個士兵，並且每隔兩三個月重複向士兵傳達一次，十

年不懈」。如此，哪裏還有保密可言？他心中的恐懼一定達到了極致，以至於為了「自保」和安全，才會產生信中這些在現實政治中毫無可行性的想法。不管怎麼說，這活生生地暴露出他在政治上已陷入進退失據、不知如何辦才好的境地。但同時令人嘖嘖稱奇的是，林彪可以想到要寫這麼一封信，卻不肯像周恩來一再暗示的那樣，向毛澤東做檢討，而是堅持在現實政治中採取「三不」的「鴕鳥政策」。難道他不明白，這在毛那裏是絕對通不過的嗎？此時的林彪，不僅今天的我們看不懂，就是當年的周恩來恐怕也不見得能看懂。

林彪是否考慮過急流勇退？問題的關鍵恐怕在於，他是否做得到急流勇退。文革中，林大肆吹捧毛的同時，他自己受到的吹捧也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他的一貫正確同毛的永遠正確被連接在一起，成為一把雙刃劍，這可以讓他變得極為安全，也可以使他的處境變得萬分危險。但說到底，林彪被歷史大潮推上了毛的接班人的「高位」。這一位置高則高矣，說到底依然是毛給的，也等於把林放在火上烤。對林來說，成亦為毛，敗亦為毛，他不過是一件犧牲品而已。只不過，比起文革中其他的犧牲品，他要大得多、顯赫得多。

這時，隨着毛、林關係越來越逼近「臨爆點」，周恩來的處境也更為困難。7月1日，是中共建黨50週年紀念日。張春橋為《人民日報》起草了一篇社論，周審讀文章初稿時，發現張連「一句也沒有稱頌林彪」，馬上「在文中加了一句『林副主席提倡毛主席語錄』如何如何，使得文章變得更加四平八穩」。[106] 為了做這個中共最高領導人之間仍然處於「團結一致」局面的表面文章，周恩來真是煞費苦心。

然而，毛、林之間矛盾的深化和發展，卻不是周恩來能夠影響、阻止或轉變的。7月9日，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特別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訪華，周恩來攜熊向暉去中南海，向毛澤東彙報當天同基辛格談判的情況。毛卻把話題岔開，向熊詢問總參傳達批陳整風會的情況，還特別追問會上是否傳達了廬山會議的情況，以及黃永勝等是否做了檢討，熊都說「沒有」。毛馬上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107] 毛說這些話時，周就在旁邊。顯然，毛的這些話也是講給他聽的。

七

1971年8、9月間，毛澤東離開北京，開始又一次南巡之行。這時，毛其實已經下決心要對林彪動手了。他面臨的問題不是對不對林動手，而是怎樣動手，以及動到什麼程度。他此次南巡，看來有兩個目的。第一，是對林「敲山震虎」，看一看林和他那一幫人會有何反應；第二，是通過「御駕親征」，在經過各個省市的軍政大員中動員、佈置、點火，讓他們動作起來，準備在九屆三中全會上對林發難、開火。毛這麼做，表現出的是一種對自己閱讀及掌控局勢的無與倫比的信心。幾十年來，從鬥張國燾，批周恩來，批王明、博古，批高崗、饒漱石，批彭德懷，批彭、羅、陸、楊，再到文革中批劉、鄧，他在黨內從無敵手。林彪又如何會在這個層面被他放在眼裏？歸根結柢，林是他捧上去的，這幾年裏，他從未忽視牽制林的勢力，現在真要把林「拿下來」，他知道他是做得到的。

毛澤東面臨的最大問題，不在於高層政治層面，而在於如何就此向普通民眾交代。文革中，剛剛打倒了劉少奇，已經宣佈過「團結」、「勝利」，現在又要打倒被毛自己冊封為「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林彪，即便是毛，要說出講得通的道理也是不容易的。

出於這方面的考慮，毛澤東並不希望赤裸裸地拿下林彪，而是想以一種顧及林的「面子」（其實也是顧及毛本人的「面子」）的方法，讓他從政治第一線上退下來。毛離開北京後，一路走，一路講話，明裏暗裏地抨擊林彪。他把九屆二中全會前後的一系列事情都串聯在一起，說：「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陳伯達後面還有人」；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推翻二中會議的議程和『九大』路線」，他們「心中有鬼」。他的話有些其實講得再明白不過，「有人急於當國家主席，急於奪權」，矛頭已直指林彪。[108]

南巡後期，毛澤東的話也講得更清楚，還多次直接點林彪的名：「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廬山這次鬥爭，……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麼。」「什

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毛說得最狠的一句話是：「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109]他還把林彪下面軍委辦事處的一幫大將也帶進來一道批：「林彪不開口，這些人是不會開口的。」

周恩來很快就知道了毛澤東南巡談話的內容。9月4日，經毛指示，汪東興派專人給周送來了經毛閱改過的沿途講話內容的記錄稿，[110]這是毛在向周「吹風」。幾天後，周又同應毛之召前往長沙、聽過毛講話後又回到北京的華國鋒談話。[111]正好，周恩來開會時見到了黃永勝。周對他說：林彪要是能在廬山會議上做個檢討，或者能在軍委批陳整風會上做個檢討就好了。他還讓黃給林彪傳話，希望林能夠在九屆三中全會上爭取主動。即便到了這個時候，周還在做最後的努力，試圖在毛、林之間「拉和」，至少不讓他們徹底撕破臉。

9月6日後，毛澤東在南巡途中一再點名批判林彪的事，也通過各種途徑傳到了正在北戴河的林彪那裏。[112]林本人的態度，同他自九屆二中全會以來的做法一脈相承，「聽天由命」。他本來就性格孤僻，幾乎從不外出。此後幾天裏，他似乎行止正常，林辦一班人「也像平常一樣各忙各的」。[113]但林彪之子林立果坐不住了。官史的敘述是：9月7日，林立果對「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命令。第二天起，他又和周宇馳等一道想出，要在上海或蘇州附近用各種方法炸毀毛的專列，謀殺毛澤東，並同時在北京攻打江青、張春橋等居住的釣魚台國賓館。與此同時，他還開始做萬一事敗後，讓林彪出走廣州、甚至出逃及另立中央的準備。[114]

林彪對此是否知情？官方公佈關於林案的證據中，有一份據稱是林彪9月8日寫下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的命令辦」。之後，林立果等手執此令，部署「要堅決把反對林副主席的人除掉」。[115]但這份東西疑點甚多。首先，儘管林是「副統帥」，但要發動一場針對毛的政變，僅憑這麼一份語焉不詳的手書，就能起到調動兵馬的作用？同時，這份東西居然還至少有兩份，除了後來林立果小艦隊成員周宇馳等坐直升機出逃被迫降後撕毀的一份外，還在周宇馳老窩裏發現另一份。林彪的手令難道如此不值錢，他會寫下幾份？而且，黃、吳、李、邱等更是對此一無

所知。所以，隨着林彪事件的各種細節不斷浮現，人們也對這份「手令」的真偽提出質疑。有人認為「手令」係林立果或葉群託林彪之名偽造，這並非不可能。

毛澤東是搞政治鬥爭和操弄權謀的頭號高手，哪裏是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那麼幾個毛頭小伙對付得了的？林立果等人既沒有嚴密可行的計劃，更沒有可以有效動用的特務組織和力量，那張「林彪手令」也至多只是在少數幾個人的範圍內傳閱，根本起不到「調兵遣將」的作用。如果他們真想謀害毛的話，那從一開始就是臆想和空談。毛的南方之行越到後來，也越是變得神出鬼沒。9月10日傍晚，毛到達上海後，沒有進城，而是在停靠在虹橋機場附近的專列上過夜。第二天，他在車上見過當地負責人以及專門從南京趕來的許世友等之後，下午1時又突然決定立刻離開上海，直接返回北京。[116] 9月12日中午，毛的專車到達北京豐台車站。汪東興隨即打電話向周恩來報告，毛已回京。周還感到詫異，問汪：「怎麼不聲不響地就回來了，連我都不知道？」[117] 毛隨即把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等召到停在豐台的專列上談話，大談黨內路線鬥爭；又說，黑手不止陳伯達一個。[118] 直到下午4點多，他才回到中南海。

9月12日，林彪一家仍在北戴河。他們應該是在下午某個時候得到毛已回到北京的消息的。此後十來個小時裏，圍繞着林彪發生的一切，尤其是他何以會出走並飛往蘇聯的細節，也許是一個不會水落石出的謎，無法徹底澄清了。一種說法是，林立果得知謀殺毛的密謀失敗後，當即嚎啕大哭，情緒幾近崩潰。此後，他就和母親葉群一道，商量要乘坐當時林立果已調到附近的山海關機場的256號三叉戟飛機，第二天要和林彪一道前往廣州，在當地再圖有所作為，不行的話就轉往香港。他也把這一計劃告訴了小艦隊的另幾個成員。

但奇怪的是，據林彪身邊親隨的回憶，那天從下午直到晚上，林彪本人卻是出奇地淡定，並沒有顯出什麼焦慮不安的神態。晚飯前，他還為女兒林豆豆和準女婿張清林舉辦訂婚儀式，祝賀他們，並和葉群一道與他們合影；晚飯後，又在走廊裏放了一場香港電影。[119] 如果林彪真的捲入了林立果和「小艦隊」謀殺毛的陰謀的話，或知道葉群和林立果要馬上向廣州

轉移的計劃，那他的反應真是超脱得不可思議。後來8點多，林彪和葉群關起門來一番長談後，事情開始急轉直下。

9月12日對周恩來來説，本來只是一個平常的工作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後，並沒有馬上給他安排差使，他得知毛已回京後，也仍按原來定下的日程辦事。晚上，他在人民大會堂主持關於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討論，這也是先前已安排好的。晚上10點左右，周突然接到汪東興的電話：林彪的女兒林立衡隻身到駐紮在北戴河的中央警衛部隊報告，林彪要出走。[120] 周接報後，當然會想到這中間必有大的蹊蹺，當即下令北戴河警衛部隊密切監視情勢發展。但他並未馬上採取其他行動，他有他的難處。畢竟，林彪還是副主席，他不能貿然行事。

這之後，周恩來又接到報告，得知北戴河附近山海關機場停靠着一架256號三叉戟飛機。他即向空軍司令吳法憲詢問「是不是調了飛機到山海關機場」，吳説他不知此事。[121] 晚上11時半，周接到葉群電話，説「林彪要動一動」。周問：是要「天上動，還是地上動？」葉答：「天上動。」周當即以「夜航不安全」為理由，要林不要動。[122] 之後，周立即致電李作鵬，下了一道命令：山海關機場的飛機不要動，要動的話必須要由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人一起下令。[123] 但周的這道命令其實是有漏洞的，關鍵在於周沒有明令不讓這架飛機起飛。畢竟，林彪仍是黨的副主席和毛的法定「接班人」，周不會沒有投鼠忌器之處。同時，周當時根本沒有想到，僅僅10分鐘後，林彪、葉群、林立果不顧警衛的阻攔，從北戴河驅車前往山海關機場。9月13日凌晨0時32分，他們登上256號三叉戟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

林彪何以會這麼做？葉群、林立果和林彪談了些什麼？最大的可能是，葉群和林立果要林彪移往廣州，並將謀殺毛澤東未遂之事告訴了他，使他產生了一種大禍臨頭的感覺，做出了倉皇出逃這一下下策的決定。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林彪的女兒林豆豆一再陳述，當晚林服下過量安眠藥，失去了自我判斷和自主行動的能力，是在葉群和林立果裹挾下外逃的。[124] 此説無法完全證偽，但也有疑點。例如，據目擊者説，林彪是自己上汽車，到機場後又是自己從簡易舷梯爬上256號飛機的（若是他已失去自主能力，別人要把他弄上去還真不容易）。還有林彪警衛參謀李文普的

證詞：他在去機場的車上親耳聽到林彪問，到伊爾庫茨克要多少時間，知道林彪要外逃後，才冒着生命危險從飛馳的林彪座車上跳下去的。[125] 但李又並非第一時間、而是在林彪「出事」後才做出證詞，能完全相信嗎？

歷史上，有着太多永無出頭之日的「謎團」，這是其中的一個。但不管真相如何，關鍵在於林彪走了，最終走出自我毀滅的一步。

周恩來接到林彪座機強行飛離的報告後，大驚失色。即便以他極為豐富的經歷，像這樣的事變也屬於第一次遇到。他立即向毛澤東報告，並請毛離開中南海住所，移往人民大會堂暫住。[126] 同時，他下令在全國範圍關閉所有機場，禁止任何飛機起飛，並打開所有雷達，實行天空監視。周還要求控制中心調度用無線電呼叫256號飛機，要它飛回來，不論在哪裏降落，他本人「都到機場去迎接」。[127]

256號飛機沒有回答，但它起飛後行跡詭異，並沒有直接朝某一個方向飛去，而是在空中轉了一個極大的圈子。飛機先是朝南（廣州方向），又轉向東（北京方向），超過20分鐘後才開始掉頭，一直朝北飛去。[128] 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在這20分鐘裏，飛機上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起飛半個多小時後，256號已接近中蒙邊界，吳法憲打電話向周恩來請示，是否要派機攔截。周說，此事要向毛報告請示。毛答道：林彪還是副主席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129] 不管毛當時是怎麼想的，他這個不把256號打下來的決定，事後看都是一個極厲害的「高招」。

凌晨1時50分左右，256號飛機飛越中蒙邊界，進入蒙古。

八

當周恩來得知256號飛機飛離國境的報告後，未放下電話就罵道：「叛徒！」他又馬上去向毛報告。然後，他把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都召到人民大會堂，通報林彪外逃的消息。[130]

從9月13日凌晨起，一直到中午，周開始一個接一個地給全國11個大軍區和29個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打電話，通報林彪外逃的情況，只是在實在太累時才抽幾分鐘打個盹。這是一件極費力的事。因為擔心被竊聽或其他途徑造成消息外洩，周只能使用暗語：「廬山會議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

人，帶着老婆、兒子逃跑了。」周還向各軍區下令：「從現在起，部隊立即一律進入一級戰備，以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131] 對於黃、吳、李、邱等，他根據毛澤東「先看他們十天」的指示，採取的態度是盡力安撫他們。[132] 他還親自打電話給新華社：「請你們注意外電對中國的反應，特別是要注意北面的反應，如有情況，立即向我彙報。」[133]

當天下午，周恩來召集會議，討論林彪出逃的外交善後問題。他提出，要設想四種可能情況。一、林彪出面公開發表叛國聲明；二、林彪或其他人通過外媒發表講話；三、林彪暫不露面或發表講話；四、暫不發表消息。葉劍英提出，可否發一個先發制人的聲明，以防被林彪在海外發聲後處於更加被動的局面。周恩來將葉的建議上報毛後，被毛否定了。[134] 正當周恩來仍為林出逃後形勢不明而極度焦慮時，晚上他接到空軍司令部送來的一份外情通報：當晚6時04分，空軍技偵部門截獲蒙古國一個雷達團團長向所屬各部發報稱，凌晨2時半，「有一架不明作戰飛機在溫都爾汗東北60公里處着火掉下來了」，蒙古國防部長下令從當晚6時起進入一級戒備。周當即向毛報告，並附上自己的判斷，「也許三叉戟飛機逃出去後真燒死了，也許是敵人迷惑我們」。[135]

9月14日下午2時，周恩來48小時未睡覺，吃過安眠藥後剛剛入睡，外交部突然接獲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啟用專線電話傳來的緊急報告：蒙古外交部通報，中國一架飛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機上人員全部遇難。[136] 周接報後，急忙來到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當面向毛澤東報告了這一消息。[137] 毛的第一反應是：「這個消息可靠不可靠？」[138] 周恩來當即為外交部起草了一份給駐蒙古大使許文益的急電，指示他「即約見蒙外長，告以奉命通知：對中國失事飛機誤入蒙境表示遺憾，請蒙方協助中國使館人員前往失事現場觀察，交還死者骨骸和其他遺物」。經毛批示「照辦」後，即以急電發出。[139] 這裏的一個細節至關重要。中國空軍截聽到的蒙方通訊中明明說飛機是「着火掉下」的，這就存在着它可能是被擊落，但毛、周卻對此未加追究，而籠統地稱之為「失事」。這同中國官方後來的說法，即飛機係因「油料耗盡而在迫降時墜毀」，顯然是存在矛盾的。

據邱會作回憶錄陳述，毛澤東得知林彪座機墜毀後，還要汪東興向政治局傳達一句話：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140] 但汪本人的回憶錄中並無此

節，其他官史中也未提及此事。但不管怎麼說，這恐怕正是毛當時的想法。林彪出逃確實為他自己被毛「拿下」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也為毛提供了一個在林彪問題上為自己「解套」、可遇而不可求的好機會。很大程度上，這恐怕也是周恩來的想法。在這一點上，周和毛是完全站在同一立場上的，因為這裏所涉及的，是中國共產黨革命以及中共國家與政權的合法性問題。

不過，林彪在幫助毛澤東「解決」了一個大問題的同時，也為毛澤東製造了一個更大、而且無法解決的問題：毛在文革的「合法性」上再也沒有辦法可以自圓其說了。

幾天後，在毛澤東親自督導下，周恩來開始着手處理林彪出逃後的各種善後事宜。其中最要緊的，是如何把這麼一樁天大的醜事向黨內各級領導傳達。9月17日，在周主持下，搞出來一個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通知稿的草稿，把林彪說成是一個口蜜腹劍的陰謀家和賣國賊。周隨即拿稿子到毛住處彙報，毛馬上就批准了。這個通知於9月18日下發到省軍級；9月29日，又傳達到地、師級。[141]

周恩來面臨的另一問題，是如何處置黃、吳、李、邱這幾位林彪麾下的大將。周當然知道，林彪出事後，這幾個人都不可能再留在原來位置上了。但對他們究竟如何處理，又處理到什麼程度，卻是要由毛說了才算。林彪出逃後，毛曾說，給他們十天時間，看他們有何動作，所以周沒有去動他們，這其實也是因為毛需要時間理清自己的思路。9月24日，周召集軍委辦事組成員開會，正式宣佈毛的指示，對黃、吳、李、邱實行離職反省。隨後，又決定由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42] 至此，文革中曾風光無限的林彪「軍人派」在中央的勢力全軍覆沒。

同上面這些事相比較，毛澤東和周恩來面對的最大挑戰，還是怎樣才能拿出一種講得通的說法，向全黨和全國人民、乃至向全世界就林彪事件做出可以自圓其說的解釋和交代。為此，周連續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這件事。10月24日，遵循在向黨內中高層領導傳達林彪事件時已形成的思路，搞出了一個強調林彪「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稿子。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將林彪叛黨叛國事件向全國廣大群眾傳達的通知。[143] 在這一過程中，調查人員在林立果住處發現了〈「571工程」紀要〉，

毛、周讀後，都吃驚不小。周本來的想法是，此件不宜外傳。但毛思來想去後，卻下令把這個東西原原本本地傳達下去，以揭示林彪及其一夥的真實面目。11月14日，中央又發出關於印發〈「571工程」紀要〉的通知。[144] 12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下發全國討論。[145]

周恩來面臨的另一件不大但也不小的麻煩事是，林彪屍骨未寒，各處已出現謠傳，說林彪的座機被導彈打下來，就是周下的命令。周對此事相當重視，幾次在黨內會議上對此予以批駁及解釋。10月，他在給廣州軍區領導機關幹部的一次報告說：

> 我再說一遍，林彪的座機不是我命令打下來的，確實是迫降時自我爆炸，自取滅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我僅僅是個常委。在軍隊他是副統帥，而我在軍隊沒掛職，我能命令部隊把黨中央副主席、軍隊副統帥打下來嗎？他是九大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隊把他打下來，我怎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代啊？當然了，林彪座機外逃時，我是及時向主席報告了的。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的組織紀律麼。但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吧。主席尚能寬容林彪，我周恩來為什麼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時也說，林彪還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認錯誤，還可以給他個政治局委員。主席對林彪寬宏大量，我為什麼要置林彪於死地呢？[146]

然而，此類流言並未絕跡。林彪之死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周恩來逝世也已半個世紀，但坊間關於林彪座機是被導彈打下來的各種「故事」，雖無真憑實據的支持，卻依然綿綿不絕地冒出來，充斥於網絡空間。

對毛澤東來說，如果他真的以為林彪外逃並摔死在溫都爾汗給他解了套的話，那真是大錯特錯了。毛的宏大革命事業，是一種信念和信仰。它的最大噩夢，就在於人們不再相信它的那一套了。在這方面，林彪事件對中國社會和普通民眾、尤其是對民心所產生的衝擊之巨大，是無論怎麼表述恐怕都不為過的。

五十年過去了，我依然能夠清晰地記得那個聽到林彪「自我爆炸」消息的時刻及感受。那時在上海，我因為一些莫須有的罪名（主要是參與「反動

讀書小組」及受審查時「態度惡劣」）被關入上海市公安局長寧分局拘留所，經過四天絕食和一場幾百人參加的「專場批鬥會」後，剛剛被放出來，但仍受到嚴密的「群眾監督」，心中真是充滿絕望。聽到林彪試圖政變並謀殺毛澤東，卻落了個倉促出逃、機毀人亡、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這一近乎天方夜譚的故事，極端震驚之餘突然覺得，對於人生乃至個人命運的理解和以往不一樣了。曾經有過的對毛的「繼續革命」偉業種種「擺不上檯面」的疑惑，居然就在這一刻覺得可以擺上檯面了，心中原本隱隱存在的罪惡感也消失殆盡。突然記起，不久前讀過、並幾乎全部手抄下來的《第三帝國的興亡》裏引用歌德的話：「一想起德國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傷，他們作為個人來說，個個可貴，作為整體來說，卻又那麼可憐……。」又想到《聖經》裏，猶大背叛後，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這是救贖，也是自我救贖。

在中國現實生活中，毛澤東在官方表述中依然居於雲端之上，但在我們這些小人物的心目中，他的形象不僅落入人間，甚至開始墜入深淵。當時又想起，就在不久前，我曾在上海家門前的新華路上看到過周恩來的車隊經過（當時，他陪同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到上海訪問），我覺得還隱隱看到了周在車中的身影；在官方發表的照片上，周少有地顯出一副疲態。不禁想到，我們如此，周恩來不知又會有何感受，作何感想？

九

林彪事件對毛澤東本人，以及對這之後毛、周關係和中國整個政治形勢發展的衝擊和影響是巨大的。毛開始做一點「自我批評」，並陸續放出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資派」，讓他們重回政治舞台。這些行動本身，就是對文革潮流的逆轉和否定；也正是在這裏，在政治層面種下了毛澤東身後文革將被「徹底否定」的種子。

林彪事件對毛澤東的另一個直接影響，是它摧毀了毛的健康。從1960年代初起，毛就不斷地說，他已經準備「去見馬克思」了，還一再談論種種可能的死法。他生命的最後十幾年間，一直被一種對死亡的莫名焦慮和恐懼所籠罩，這也是他發動文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但直到文革

開始，毛的健康狀況實際上並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林彪事件後，情況變了。

1972年1月6日，陳毅元帥因癌症逝世，追悼會定於1月10日舉行。在中共領導層，陳毅是一位頗富傳奇色彩的元老。他同毛澤東的交往可謂源遠流長，一直可以追溯到井岡山時代，但早期兩人之間的關係並不融洽，時有矛盾和衝突。但在毛成為黨的最高領袖後，陳便心悅誠服地對毛俯首稱臣，也漸漸獲得了毛的信任和重用。陳毅同周恩來之間，除公事交往之外，也有着很深的私交。文革開始後，陳一開始並未靠邊，直到1967年初，才同其他幾位老帥一道因捲入了「二月逆流」受到衝擊，他的外交部長職務也名存實亡。但即便在此情況下，毛對他並沒有像對賀龍、羅瑞卿那樣有完全打倒的意圖，這也給了周在陳最困難時出面保他的迴旋餘地。1969年初，周又根據毛的指示，讓陳毅牽頭主持幾位老帥關於重大國際問題的討論。然而，直至林彪事件發生，陳仍然居於政治上坐「冷板凳」的處境。

陳毅逝世後，毛澤東本來並沒有參加他的追悼會的打算，追悼會最初確定的規格也並不高，只是比前不久去世的李天佑上將「稍微高一點」。可是，到了追悼會舉行的那一天，毛卻突然改變了主意，決定親自參加，並幾乎立即便調車前往會場。從毛的角度看，這當然絕不僅僅是出於「念舊」，而是有着明顯的政治意圖。至少，這是他在林彪事件後以自己的行動發出的一個信號：如果說，他對陳毅這樣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中共元老的態度出現了鬆動，那是否也意味着他對於文革中被「整」的一大批老幹部的看法也開始發生變化？

本來，周恩來就一直為如何把握陳毅追悼會的分寸以及邀請範圍而頗費躊躇，一直到追悼會舉行的當天上午，仍難以確定各種細節。當他接到毛澤東將要參加追悼會的電話後，馬上採取行動，大幅度地提高追悼會的規格。他下令，通知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員和宋慶齡等其他國家領導人出席追悼會；同時，他也立即向當時在北京的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發出了邀請。隨後，他趕往追悼會現場迎接毛澤東，並親自作最後的現場佈置。本來，陳毅的悼詞已定為由葉劍英元帥宣讀，但毛決定出席後，葉到達現場後將悼詞交給了周恩來宣讀。[147]

毛澤東從陳毅追悼會回來後，由於那天臨時出行，連鬍子也沒有刮，只在睡衣外披了一件大衣就去了會場，在現場受了風寒，再加上林彪事件對他在心理上的沉重打擊，加劇了咳嗽、發燒等肺心病症狀。然而，毛向來不相信醫生，拒絕接受治療，導致病情不斷惡化。[148] 1月25日，周恩來專門寫了一封情詞懇切的信，勸告毛接受治療，卻未能打動他。[149] 之後，毛的病情繼續加劇。2月12日清晨，離美國總統尼克松預定到達北京的時間已經只有九天。周突然接到電話：毛澤東昏死了過去。他立即趕往毛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所，到達時，他「兩腿無力，許久都下不了車」。當他走進毛的臥室時，看到毛「臉色青紫，呼吸極其微弱，幾乎看不出胸部的起伏」，已經失去知覺，脈搏也一度消失，正在搶救之中。情急之下，周「當場大小便失禁，都拉在褲子裏」。周詢問醫生後得知，毛由於肺心病導致嚴重缺氧而突然休克。一番搶救之下，毛的「面色逐步由青紫泛起了淡紅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動作也隱約可見」，居然漸漸清醒過來。[150] 周對毛說的第一句話是：「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手裏。」[151]

周恩來何以會在毛澤東可能瀕臨死亡時，出現了大小便失禁的情形？對於他當時心中之所想及感受，我們無從考察。我們可否如此看待此事：周當然知道，如果毛真的駕鶴西去，以他當時的地位，理所當然地會坐上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寶座；但即便以他那般深厚的閱歷和城府，卻並未在心理上為這一時刻做好準備，因而才會在生理上有如此反應？

這驚險的一幕過後，毛澤東開始接受系統治療，病情也迅速好轉。但這位年邁且日益迫近死亡的「偉大領袖」對於自己病危時刻的記憶，卻絕不會從腦海中抹去。從心理上來說，他對於周恩來的提防也只會變得更加根深蒂固。這一切，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毛澤東在生命最後幾年裏對待周的態度。周、毛之間關係的路，也注定更不會平坦易行。

第28章

敲開美國的大門（1969–1972）

一

九大開過後的兩年裏，周恩來要花費大量的精力應對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緊張關係，後來又要處理林彪事件的善後工作。即便如此，他還一直關注着另一件大事，那就是中美關係。

周恩來同美國打交道的長遠歷史，可以追溯到抗戰時期。他同很多美國人打過交道，其中有寫《西行漫記》的斯諾、羅斯福總統的特使居里、外交官謝偉思、赫爾利將軍和馬歇爾將軍。中共建政後，尤其是朝鮮戰爭發生後，中美兩國捲入全面對抗。「反對美帝」不僅是中國內外政治議程和政策的焦點，也在中國主流政治話語中佔據了中心位置。周是中國對美政策的主要策劃者和執行者，但只要有機會，他也會做出讓中美關係緩和的舉動。1955年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就是在他的推動下發生，又一直在他的督導下進行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美關係陷入了新的低點。這毫不奇怪，文革從一開始就是打着「反修」和「反帝」的名頭發生的。隨着越南戰爭不斷升級、「援越抗美」吹響了文革期間超常群眾動員的響亮號角時，中美關係又怎能不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到1968年底、1969年初，當文革達到高潮後開始走下坡路時，儘管中美全面敵對的狀況似乎依然如故，但隨着中蘇關係不斷惡化，中美關係中發生了幾樁一時未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後來看卻意味深長的事情。這幾件事都同周恩來有關聯。

1968年11月中旬，越南總理范文同訪問莫斯科後來到北京。當時，越南和美國在巴黎舉行和談已有好幾個月了，北京一直對越南持懷疑的態度，批評越方「答應得太快了，太急了，這有可能給美國人一個錯覺，你們急於要談」。[1] 周恩來在和范文同的一次會談中提出，越方急於妥協的立場「有助於美國人解決他們的困難」，如果越方於1968年4月3日同意和美國代表談判的聲明晚發表一兩天，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被刺殺的事件也許就不會發生了」。[2] 這一次，周恩來一開始還是使勁地規勸越南同志不要「上美帝和蘇修的當」，對同美國人談判千萬不能抱太大的希望。然而，當周在政治局會議上彙報同范會談的情況時，毛澤東卻提出：「打是要打，和也要和。尼克松將攤子擺得太散了，這是我歷來講的。越南再打幾年這個話，我們不好講。一切讓他們自己做主。」[3] 11月17日，毛在周的陪同下會見范文同時說，「我是贊成又談又打的」；又說：「我們有一些同志，就是怕你們上美國人的當，我看不會。這個談判不是同打仗一樣嗎？在打仗中間取得經驗得出規律麼。」[4] 毛發話後，周恩來和范文同又舉行了兩次會談，口風也變了，支持越南採取「又打又談」的戰略。

同一個月，還發生了另一件事。當時，中美雙方在華沙舉行的大使級談判自1968年1月中斷後已近一年，雙方幾次確定會期，卻又一再推遲。美國總統大選中尼克松獲勝後，美方提議會談於1969年1月恢復舉行。本來，美國人並不指望會很快收到答覆。但讓他們吃驚的是，北京以「不同尋常的速度」，在幾天內就做出反應，並建議會談在尼克松就任總統一個月後恢復舉行。[5] 這是周恩來拍板決定的。其實，周很注意尼克松當選後美國亞洲政策的動向。1968年11月底，他在會見柬埔寨共產黨領導人潘巴時說，尼克松上台後，恐怕他總要想辦法改善美柬關係；又說，對帝修反鬥爭，「要利用它們中間的矛盾，利用它們不同的利害關係」。[6]

就在這前後，陳毅這位當時已經「靠邊站」的外交部長，給周恩來送了一份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其中有一大段關於美國全球戰略和亞太政策的分析：「美帝的全球戰略仍是以南北美洲為其鞏固後方，緊緊掌握西歐，利用蘇修東歐共同反華（不放棄對蘇修等的顛覆工作），在亞非拉做滅火工作。僅因為美帝侵越便認為其戰略東移，以為美帝可放棄或不重視歐

洲，這是錯誤的。僅僅看見美蘇共同反華，便以為美蘇之間沒有矛盾，以為美帝正在放棄顛覆蘇聯東歐的企圖，也是錯誤的。」[7] 周讀這份報告後，又轉送給毛澤東。後來看，陳毅把他們的一些想法說出來了。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總統就職演說中表示，美國「願意同世界上所有國家發展關係」，不讓任何國家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8] 1月28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走投無路的自供狀〉的社論，《人民日報》同一天還全文發表了尼克松的就職演說。[9] 之後，全國各地主要報紙在轉載《人民日報》社論的同時，也全文發表了尼克松的講話。這樣的做法，在共和國歷史上還從無先例。這個全文發表尼克松講話的決定，是毛澤東在審批周恩來的報告時親自做出的，他明確指示除社論外，「尼克松的演說也應見報」。[10]

2月19日，周恩來被毛澤東召到中南海住處開會，討論國內外大事，參加會議的還有林彪、文革小組成員，以及當時已下放到北京幾個工廠參加勞動的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和葉劍英等幾位老帥。毛還記得陳毅那個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他在會上說：「國際問題有些怪。由陳毅掛帥，你們幾位老總研究一下國際問題。」[11] 會後，周恩來安排陳毅為討論的召集人，並讓他打電話給徐向前、聶榮臻和葉劍英等通知此事，還準備了30份相關文件以及毛澤東和林彪關於國際問題的指示，供他們傳閱，討論後「向中央提供諮詢意見」。周恩來特別關照陳毅，「你們不要被原有的看法和結論框住，你們都是元帥，都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方向，向中央提出建議」。[12]

這樁差使既然是毛澤東交代下來的，老帥們自然不敢怠慢。按周恩來的安排，他們在3月1日開了一個討論國際問題的座談會。到3月16日，一共座談了四次。[13]

二

就在這個當口，中蘇之間出了大事。自1968年8月蘇聯入侵捷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國際上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蘇聯。當時，中蘇邊界東段烏蘇里江一線的情勢高度緊張。從1968年初起，雙方邊防部隊就已在那

裏發生過一系列小衝突。3月2日，兩國邊防部隊在位於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國一側的珍寶島上發生軍事衝突。這一仗是中方幾個月來一直在策劃並準備要打的。早在1月下旬，黑龍江軍區就制定了在珍寶島地區「實施反侵略鬥爭方案」，準備派部隊潛伏在珍寶島上，在蘇聯部隊登島時打它一下。2月19日，在周恩來協調指導下，總參和外交部都同意了這個方案。[14] 3月2日的戰鬥發生前，北京方面已經在人民大會堂設置了指揮所，並通過瀋陽軍區同烏蘇里江邊防前線建立起通訊聯繫。當天一大早，周恩來就來到了指揮所，親自參與對戰鬥的遙控指揮，並隨時向身在中南海的毛澤東報告。[15]

那一天，蘇軍登上珍寶島後，被早已埋伏在那裏的中國部隊打了個措手不及，吃了大虧。[16] 蘇聯人對此很不甘心，中方也知道蘇方很可能會採取報復行動。於是，兩邊又在珍寶島一帶調兵遣將。幾天裏，周恩來同前方的電話聯繫不斷。[17] 3月15日，蘇聯邊防部隊果然又上了珍寶島，中方也早有準備。雙方輕重武器一起上陣，還使用了重炮，發生了一場更大規模的戰鬥。[18]

珍寶島上的這兩仗打下來，本來就處於低谷的中蘇關係更是帶上了濃厚的火藥味。蘇聯這一邊，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屬於蘇聯領導層裏的「溫和派」，不希望看到蘇中衝突繼續升級。3月21日，他抓起電話，通過久未使用的中蘇載波「熱線」連接到北京，開口就說要同毛澤東或周恩來直接通話。不料，北京一端接聽的是一位年輕的接線員，竟然「義正詞嚴」地說：「你是蘇聯修正主義的頭子，有什麼資格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周總理講話？」隨即掛斷了電話。[19] 柯西金不甘心，又從蘇聯外交部給北京外交部掛電話。中方接電話的，是正在值班的蘇聯東歐司司長李連慶。柯西金說，他要找周恩來講話。李答道：「你們黨已變成修正主義了，但我們兩國還有外交關係，我將報告給周總理。」[20] 午夜過後，蘇聯駐華臨時代辦阿里克謝·葉里扎維金（Alexey Yelizavetin）緊急約見李連慶，說明柯西金曾試圖同毛或周通話，卻為中方電話接線員拒接。李回答，他已接到柯西金本人的電話，會馬上向上面報告。[21]

周恩來看到柯西金來電的報告後，於3月22日凌晨召集喬冠華、李連慶等外交部相關人員開會。他對接線員的做法提出了嚴厲批評，同時又半

帶稱讚、半帶批評地對李連慶說：你答得不錯，我們兩國還有外交關係，不能拒絕聯繫，但你說蘇聯黨變成修正主義了，打擊面太大，應該說是蘇聯領導集團。不過，周恩來這時還不想同柯西金直接通話。會上決定，以外交部備忘錄的形式向蘇方提出，如果蘇方有話要說，可以「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隨後，毛澤東在周的報告上批示：「同意備忘錄的立場，即準備舉行外交談判。」[22] 李連慶隨即約見葉里扎維金，通知蘇方，「從兩國當前關係來看，通過電話聯繫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麼話要說，可通過外交途徑向中國提出」。[23] 這一番交往過後，中蘇雙方又有一系列外交照會來往，互相指責對方仍在珍寶島地區製造事端，但雙方在行動上都有所克制。在珍寶島地區，中蘇雙方看上去依然劍拔弩張，但實際情勢已暫時緩和下來。

其實，毛澤東當時並沒有把同蘇聯打仗真那麼當一回事。在他看來，仗不見得打得起來。他想得更多的是要在九大即將召開之際，抓住珍寶島事件大做國內動員的文章。他看上去好像要把這件事搞得很大，但實際上又並不真的想把事情搞得太大。珍寶島的第二仗剛打完，他就說：到此為止，「不要打了」；又說：「大敵當前，就是最好的動員。」[24]

3月15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及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開會，主要講九大召開之事。毛先說：「總感到要打仗。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又說：「原子彈基地要有準備，防止他用飛機轟炸。……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家犯我，我為什麼不能犯人？無非是東西，鐸鐸罐罐打爛，把人消滅一半，地球還是照樣轉。」毛還要周在內部做一次講話，談打仗的問題。[25] 像這樣的話，毛澤東常說，尤其喜歡在講到核戰爭時說，好幾次都把外國人嚇個半死。但周恩來他們一聽就知道，這是毛「極而言之」的風格，正說明他不相信這種事會發生。

毛澤東發話後，從3月起，同召開九大聯繫在一起，全國出現了一波接一波「要準備打仗」的動員高潮。毛在九大上再次說要準備打仗，但又說「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準備，…… 就是要有準備打仗的精神」。[26] 九大開過後，周恩來親自佈置，由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了兩部關於珍寶島事件的紀錄片，在全國廣泛組織群眾觀看。[27] 從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到全國各大中小城市，都按照毛澤東要「深挖洞」的指示，到處發動老百

姓掘地三尺，修建各式各樣的防空工事。某種意義上，這簡直是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的現象在另一時空條件下的重演，在文革中後期中國城市社會生活中，成了一件特大事件。

珍寶島戰鬥後，四位老帥座談會的討論也轉到分析蘇聯對華政策及其戰略意圖上來。3月18日，他們寫出一份報告，對國際局勢做了一般性分析。他們不覺得蘇聯已經做好同中國打仗的準備，也不認為蘇聯會進攻中國，講了一些要提高警惕、加強戰備之類的話，沒有就中美關係等敏感問題提出特別的看法和建議。[28] 他們當時大概覺得，這份報告交出後，就可以在毛那裏交差了。柯西金打電話來後，中蘇雙方外交上打筆仗不斷，但珍寶島地區的實際局勢已暫時平靜下來。周管得多的，是外交部起草和修改關於中蘇邊界衝突的正式聲明（後來這個聲明於5月24日發表）。[29] 這段時間裏，老帥們討論國際形勢的事，他沒有怎麼管。

轉眼到了5月，毛澤東又傳下話來要四位老帥繼續「研究國際形勢」。[30] 那時，九大已經開過。林彪宣讀的政治報告中，用很大篇幅分析國際形勢。四位老帥覺得，既然如此，他們還有什麼必要再把精力花費到研究國際局勢上呢？但這時，周恩來又管起了這件事。5月中旬，他給四位老帥發了很具體的指示，「主席交給你們這個任務，是因為主席認為還有繼續研究的必要」。他要四位元帥「每星期有幾天時間專心考慮國際形勢」，思想上也「不要被框住」，待「有了成熟的想法」先報告他，他會「幫助參謀參謀後再轉呈主席」。周還從外交部抽調出熊向暉和姚廣兩名資深官員、他手下的得力幹將，協助老帥們搞討論、寫報告。[31]

從6月7日起，四位元帥又開始開會，有了周恩來派來的熊向暉、姚廣協助，形式上也比以前更正式了。7月11日，他們給毛、周和中央寫了另一份報告〈關於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他們認為美國不敢輕易進攻中國，因為中美之間隔着遼闊的太平洋，美帝的戰略重點又在西方，美帝想的是把亞洲人推上反華大戰第一線，自己不會親自上陣。相形之下，「蘇修把我國當做主要敵人，它對我國安全的威脅比美帝大」，但「真和中國大打，蘇修還有很大顧慮和困難」。[32] 不過，老帥們沒有涉及中國進一步調整對外政策的問題。

這時，中美關係又有新動向。7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佈放鬆美國公民到中國旅行的限制。五天後，周恩來收到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轉來美國參議員曼斯菲爾德（Mike Mansfield）於6月17日寫的一封信，這位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在信中要求訪華並與周會面，以改變中美兩國「二十年交惡」的現象。[33] 周恩來馬上讓熊向暉向四位老帥通報這些情況。7月29日，老帥們再次開會，他們在討論中談到，美國和蘇聯都想要利用中蘇或中美矛盾，「我應有意識地利用美蘇矛盾」。但此事不可操之過急，「對曼斯菲爾德的訪華要求置之不理。美急於同我接觸，我應保持高姿態，再憋它一個時候」。他們建議，可以在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後，再恢復中美華沙談判。[34] 周恩來沒有對曼斯菲爾德發出訪華的邀請。

到了8月，中蘇衝突又一次突然升級。8月13日，蘇軍在新疆裕民縣鐵列提克地區出動了一個營的兵力，伏擊並消滅了中國的一個邊防巡邏分隊，30名官兵無一倖存。[35] 此事上報北京後，周恩來大吃一驚，毛澤東和整個中共領導層也極為震驚。這幾個月來，北京曾從各方面獲知，蘇聯正在考慮對中國的戰略軍事基地實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36] 但這其實是蘇方為「在北京煽動恐慌」而有意製造和散佈的。[37] 如果本來毛澤東對此還「將信將疑」的話，新疆的事件發生後，他真的緊張了。

8月2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送去一份報告，提議「根據最近邊境各地發生的情況，需要繼中央『七二三』佈告之後，再發出一對穩定局勢有利的命令」。[38] 8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緊急下令，成立由周任組長的人民防空全國領導小組，負責組織疏散城市人口和遷移工廠，以防止核大戰的發生。[39] 8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發佈命令，邊境各省、市、自治區都根據毛澤東「要準備打仗」的號召，「充分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加強軍民聯防，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如果美帝、蘇修侵略中國，「我們就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之」。[40] 此後，以準備對蘇戰爭為中心，不僅在邊疆地區，全國範圍內也掀起了新一輪備戰的群眾動員高潮。

正當北京開始被一種「戰爭恐慌」情緒所籠罩時，9月2日傳來了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逝世的消息。胡是周恩來自1920年代起就認識的老同志和老朋友，晚年一直受到心臟病的困擾。從1969年夏天起，胡的病情嚴重惡化。周得知後，曾親自安排，先後派出三批醫務人員到河內為胡志明

治療。8月下旬，周獲知胡的病情持續惡化後，於8月31日派遣名醫吳階平乘專機飛往河內送急救藥品、了解胡的病情，並指示吳當天返回向他彙報。9月1日，周聽取吳的彙報後，前後用了五個小時研究，又指令吳階平等攜帶藥品和器材趕往越南參與搶救。但吳等人仍在飛往河內途中，胡就過世了。[41] 收到胡志明逝世的報告後，周恩來決定立即飛往河內弔唁，並馬上開始同越方聯繫。一開始，越方答覆說，胡的正式喪禮要在幾天後舉行，越方不便接待。但是，周依然堅持要去，最後雙方做了一項不尋常的安排：周先到河內走一趟，弔唁胡志明，待他回國後，再由副總理李先念飛往河內，出席胡的正式喪禮。[42]

周恩來這種打破一般外交禮儀的做法，表面的理由是為了表達「中越之間以及他本人同胡志明的親密關係」，因而不拘泥於尋常禮儀束縛。但實際上，周這麼做恐怕還有另一層原因：他想避免因為出席胡的喪禮而同蘇聯領導人正面接觸，出現尷尬局面。

果然，蘇聯派出了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參加胡志明的喪禮。出乎周恩來和其他北京領導人意料的是，柯西金未在河內見到周，居然又通過越南外交部向中方傳話，希望回國途中「在北京停留兩三小時」，並詢問：「在此期間，柯西金能否見到周恩來？」[43] 柯的做法給周出了一道難題，但同時這也為他摸清蘇方「底牌」，緩解中蘇之間帶有爆炸性質的緊張關係，提供了一個機會。如果會談能在柯西金「順道」來北京的情況下舉行，對中方來說，面子上就很過得去了，在他看來是可以接受的。周向毛澤東報告後，他們決定同意讓柯西金來北京，但會談要放在機場舉行。可是，當這個答覆再傳回河內時，由於越方在傳遞信息時因通訊設備落後出現延誤，柯西金已在飛回蘇聯途中。當飛機在蘇聯塔吉克斯坦加盟共和國首都杜尚別降落後，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了他的「順訪」要求，立即同勃列日涅夫通話後決定，調過頭來轉飛北京。[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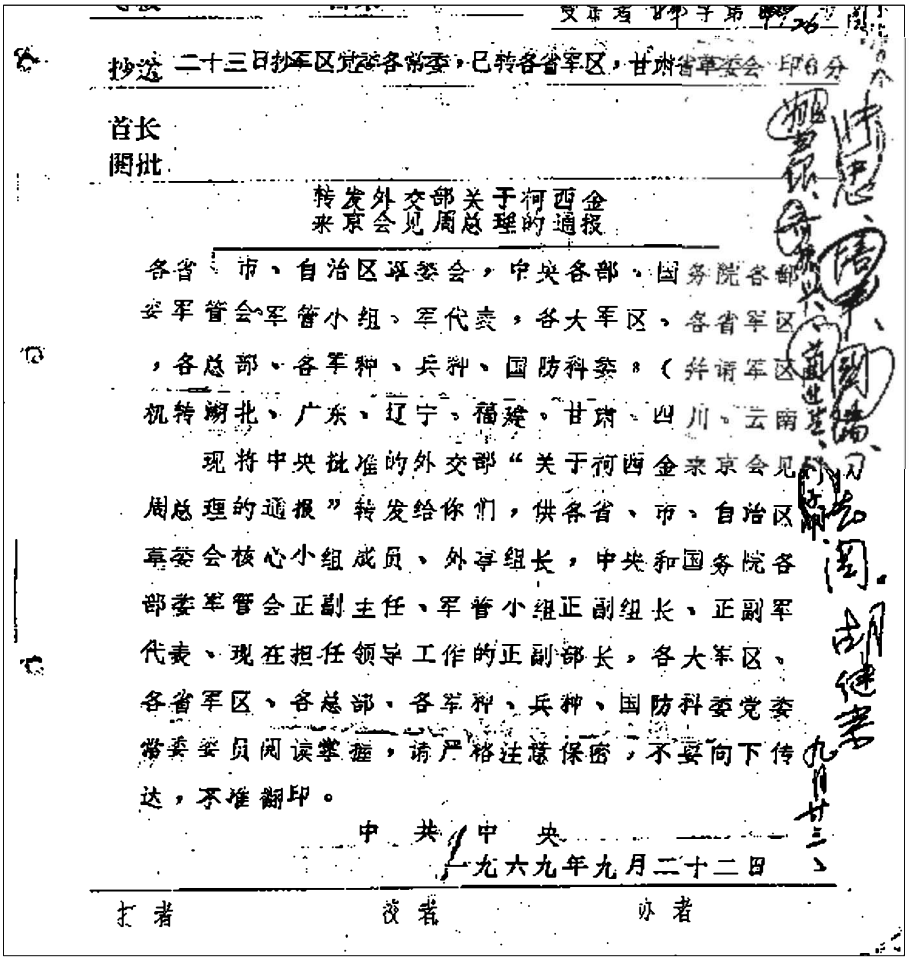
周恩來和柯西金其實有着很多相似之處，兩人都是各自領導層中的「務實派」，實際上都不希望看到中蘇關係一直惡化下去，導致兩國之間發生更大的衝突。從心底來說，周不希望讓中蘇關係朝着戰爭懸崖的邊緣滑下去。柯西金希望中蘇兩國不僅避免戰爭、甚至在雙邊關係上有所緩和的心態，更是溢於言表。然而，他們都受到兩國關係大環境的制約。

那個時代，中蘇關係破裂既久，雙方碰面時早已唇槍舌劍，根本不以「同志」相稱。這次柯西金來，是叫他同志還是先生？周恩來頗費思索。他最後找到了一個理由：既然柯西金繞道來北京，作為一種回報，就對他以「同志」相稱。[45]

9月11日，周恩來同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會談。周先向「柯西金同志」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柯西金立即說：「勃列日涅夫同志和蘇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委託我問候你們，問候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和其他同志。」正式談話中，周開門見山提出蘇聯對中國的核威脅問題：「你們說，你們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來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佈，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就要堅決抵抗，抵抗到底。」然後，周緩和口氣說，中國自己的事情還管不過來，絕不想同蘇聯打仗，而是希望實現兩國關係的正常化。柯西金本來就是蘇聯領導層的溫和派，聽了周的這番話後，明確表示蘇聯也不想和中國打仗。於是，周恩來提出雙方可採取三項臨時措施：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新的武裝衝突，在爭議地區雙方部隊避免接觸。柯西金不僅對這三條表示同意，還補充了一條：雙方邊防部門遇到情況時預先商量，周馬上表示同意，兩人就這四項達成協議。他們還商定，會談後雙方總理互換書信，把這四條定下來。兩國也要盡快互派大使，並擴大貿易。近期內，雙方還要恢復舉行關於邊界問題的談判。[46]

周恩來送走柯西金後，馬上指示助手整理出兩人的會談紀要並上報毛澤東，毛批示「同意」。[47] 在報上發表會談消息的同時，中共中央又向全國發出通報，強調柯西金來北京是「蘇修統治集團內部，在對中國問題上，意見分歧，矛盾重重，舉棋不定」的結果；周恩來出面同他談，是因為「針鋒相對要看形勢，有時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這次會談是一次偵察戰」，仍然「應該做好應付最壞情況的準備，提高警惕，加強戰備，毫不鬆懈」。[48]

這些情況，周恩來都通報了四位老帥。老帥們討論後仍認為，蘇聯不大可能對中國發動大規模進攻；但他們同時強調，中國必須做最壞的準備。9月17日，他們在另一份題為〈我們對目前形勢的看法〉的報告中提出，為了同美國和蘇聯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在適當的情況下，中國可以考慮打「美國牌」。[49] 報告交出後，陳毅又找到周恩來，口頭彙報了一些「不



抄送 二十三日抄军区党委各常委，已转各省军区，甘肃省革委会 印6分

首长
阅批

转发外交部关于柯西金
来京会见周总理的通报

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中央各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军管小组、军代表，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国防科委：（并请军区机转湖北、广东、辽宁、福建、甘肃、四川、云南

现将中央批准的外交部“关于柯西金来京会见周总理的通报”转发给你们，供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外事组长，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正副主任、军管小组正副组长、正副军代表、现在担任领导工作的正副部长，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会员阅读掌握，请严格注意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准翻印。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主者　　校者　　办者

圖 28.1：中共中央轉發外交部關於柯西金來京會見周總理的通報，1969年9月22日。
（91-011-0009，甘肅省檔案館）

合常規」的想法：「在華沙談判恢復時，我們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50]

三

儘管周恩來和柯西金舉行了會談，毛澤東內心深處對於蘇聯可能突襲中國的恐懼卻沒有消除。9月17日，他親自在國慶20週年口號裏，加上了「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一句。[51] 周恩來等又注意到，柯西金回到北京時，在機場「只有二三流人物出來迎接」，蘇方在會談後也沒有跟進的動作。[52] 9月18日，周給柯西金去信，列舉了雙方會談時達成的各項協議，要求柯對此「來信確認，即作為中蘇兩國政府之間的協議，立即生效，並付諸實施」。信中，周還特別提出：「雙方保證，各自的一切武裝力量包括核武裝力量不向對方進攻和射擊。」[53] 柯西金卻覆信說，「我方已採取實際措施旨在使邊境局勢正常化」，卻沒有提及他自己已同周達成協議的雙方換文之事。[54] 這一來，從毛澤東開始，瀰漫於中共領導層的戰爭恐懼感也愈發嚴重。

這時已是9月下旬，國慶20週年已經臨近。這是大慶之年，按照慣例，應當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所有重要領導人都要出席。但是，毛澤東對於究竟該怎麼辦這個活動卻拿不定主意。9月19日，毛在上海同張春橋、王洪文談話。張春橋問：「國慶期間各省市領導幹部要不要去北京？」毛答道：「各守崗位，都不要去。不要讓人家一網打盡。」[55] 第二天，毛到了南京，許世友、杜平向他做了戰備彙報。毛又說：今年國慶節，地方、軍隊的同志都不要去北京，怕敵人趁機消滅我們的中心。杜平說，他要上北京開中央軍委召集的會議。毛說：就去五天，趕快回來，各守崗位。[56]

其實，擔心蘇聯會找什麼機會突襲中國，也是周恩來腦子裏繃得很緊的一根弦。9月11日他和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前，就曾經想到過，蘇聯人會不會重施「用客機運兵偷襲布拉格的故技」，經毛澤東批准後，他親自下令部署部隊加強對北京機場的警戒。[57] 9月22日，周又在全軍戰備工作會議上說：「目前國際形勢緊張，我們要準備打仗，特別要防止敵人突襲，要嚴加戒備。」[58]

這個大慶之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居然是在夾雜着「戰爭恐慌」的氣氛中度過的，國慶越是臨近，這種氣氛越濃。林彪雖然覺得「這個仗八成打不起來」，但又提出「要做八成打起來的準備」。[59] 9月30日，他視察南苑機場後，下令當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幾個機場的飛機，在跑道上設置障礙物，為機場值班人員配發武器，以防止敵人空降突襲。當天深夜，林彪還讓黃永勝致電周恩來，提出要放掉密雲水庫存水，以「防備敵人假日轟炸，造成密雲水庫決堤」。周知道這麼做非同小可，對下游地區的影響尤為巨大，當即堅決反對，否決了此舉。[60]

到1969年10月1日國慶節，蘇聯並沒有對中國採取任何行動。外交上，反倒發生了一件毛澤東、周恩來未曾計算在內的事情，但也是他們的一個情理之內、意料之外的收穫：文革中嚴重惡化的中朝關係，在國慶日出現重大改善。其實，早在1967年春天，當中朝關係出現危機時，周就曾會見秘密來華訪問的崔庸健，使雙邊關係相對穩定下來。1967年10月，周又通過毛里塔尼亞總統達達赫向金日成傳話致意：中國對朝鮮的政策沒有變。[61] 1969年9月10日，崔庸健在河內參加胡志明的葬禮後，回國途中在北京停留，周連續兩天和他舉行會談，談的還是穩定和改善兩國關係之事。[62] 周恩來沒有想到的是，9月30日下午，朝鮮方面詢問中方，朝方有意派遣崔庸健來中國參加國慶活動，不知中方能否發出邀請並接待。周馬上向毛澤東報告。晚上6點多，中方表示歡迎崔庸健訪華。當晚11點，崔庸健的專機在北京機場降落。[63]

10月1日，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崔庸健。崔一見毛就講好話：中朝之間是「一種用鮮血結成的唇齒關係」。他又說：「自從蘇共二十大以來，我們一直是同中國一起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我們主要是思想方面的鬥爭，在對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方式方法上，我們和中國有所不同。」毛答道：你們同他們有區別，不一樣。毛還表示，「真誠地歡迎金日成同志來，…… 他公開來也可，內部來也可」。毛還指着坐在一旁陪同會見的周恩來說，「可以派周總理到朝鮮去」。[64] 第二天，周恩來和葉劍英一起會見崔庸健，敲定了周恩來近期訪問朝鮮的計劃。[65]

國慶日後，隨着10月20日這個雙方已商定在北京恢復舉行邊界談判的日子臨近，毛澤東又開始心神不定。這本來是中蘇關係終於走向緩和的一步，應該是一件好事。可是，仍然處在戰爭恐懼陰影下的毛澤東，卻又懷疑蘇聯人會不會搞鬼。他擔心的是，就像當年對付捷克一樣，莫斯科會藉蘇聯代表團所乘飛機在北京降落的機會，對中國實施突襲。

事後看，這種想法幾近天方夜譚。但在當時，毛澤東卻十分緊張。10月14日下午6時，毛澤東把周恩來召到人民大會堂開會，說：中央領導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好多人，應該分散些。[66] 10月17日，周恩來和政治局根據毛的指示作出決定，除了總理周恩來和總參謀長黃永勝留在北京主持政府和軍隊的工作外，包括毛澤東和林彪在內的其他領導人都要在10月20日之前全部撤離北京。[67] 會後，周恩來又和汪東興商量，提出了一個具體的疏散方案：毛澤東去武漢，林彪去蘇州，朱德、李富春去從化，陳雲去南昌，董必武去廣州。幾位老帥也分別疏散各地：葉劍英去長沙，劉伯承去漢口，陳毅去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徐向前去長辛店，[68] 他們的國際形勢研究也就此告一段落。就連處於戴罪之身的劉少奇也被送去開封，陶鑄去合肥，鄧小平去江西。整個方案由汪東興負責具體實施。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幾名林彪麾下的大將，則組成軍委前指，進入西山指揮所。[69]

10月18日，正在蘇州的林彪在沒有知會毛澤東的情況下，口授了一道〈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當晚，一系列陰差陽錯之後，總參謀長黃永勝等又向全軍傳達了「林副主席一號命令」，使全國軍隊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正如前一章所述，林彪的做法引起了本已存戒心的毛澤東的極端反感和嚴重猜忌，成為毛、林關係由貌合神離一步步走向徹底決裂的關鍵。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發生之後，10月19日蘇聯政府代表團抵達北京，中蘇邊界談判如期開始。蘇聯方面任何意外的行動都沒有採取。毛澤東、周恩來才敢確定，這只不過是一場虛驚。但不管怎麼說，在中共黨內新一輪高層鬥爭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被引發的同時，中蘇之間極端緊張的局勢終於出現了緩和的趨勢。

四

在美國，尼克松總統其實也在考慮怎樣向中國傳遞信息的問題。他就任總統後，本來已定於1969年2月20日舉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因為2月初中國駐荷蘭使館代辦廖和叔要求政治避難並前往美國，中方提出強烈抗議而未能舉行。在雙方不存在直接通訊渠道的情況下，1969年7月，尼克松在訪問羅馬尼亞和巴基斯坦時，分別請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Yahya Khan）向中國領導人傳話：如果沒有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參與，「亞洲就不能向前推進」。[70] 10月，葉海亞·汗總統向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張彤通報了尼克松訪巴的情況。11月中旬，周恩來收到了張彤的報告後，向毛報告：「尼克松、基辛格的動向可以注意。」然而，毛、周顯然還未做好準備。周報告毛：「如何回答葉海亞，待與外交部研究後再報。」[71] 他沒有馬上對美方做出回應。

不久，形勢又有戲劇性的發展。12月3日，在波蘭首都華沙，一場南斯拉夫時裝表演在人民文化宮舉行，各國駐波蘭使節都應邀參加。美國大使斯托塞爾（Walter Stoessel）到現場後，一眼就看到了中國外交官，他以為其中一位是中國代辦雷陽（但其實是二秘李舉卿），馬上攔截上去，用「不太熟練的波蘭語」說：尼克松總統想和中國進行重要的、具體的會談。[72] 這是一個斯托塞爾等了三個月才抓住的機會。早在9月9日，當他回美國述職即將返回華沙時，尼克松破例在白宮接見了他，要他找機會同中國駐波外交官接觸，使中美大使級會談盡快恢復。斯托塞爾回華沙後卻一直找不到適當的機會，直到12月3日的這一幕。[73]

周恩來接到中國駐波蘭使館的報告後，立即拿着去見毛澤東，說：「找着門道了，可以敲門了，拿着敲門磚了。」毛馬上「抓住了這件事」。[74] 怎麼給美方一個適當的回音？這時，周想到了一件事。六週前，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馬丁（Edwin W. Martin）曾給廣東省革委會發函，詢問自2月份起就因為駕駛小艇誤入中國領海而遭到扣留的兩個美國人的近況。廣東方面就此事上報北京，請示如何處置。外交部建議釋放這兩個美國人的報告，在周那裏擱了兩個月。12月4日，周批覆報告：經過政治局在京同志的商榷，擬同意外交部對釋放美國遊艇兩人的意見。隨後，毛批示「同意」。

中國駐波蘭使館接北京指示後，隨即通知美國使館。[75] 12月7日，兩名美國人獲釋。大洋彼岸的基辛格馬上注意到了這件事，並猜想這是周恩來的手筆。[76]

12月11日，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辦雷陽和斯托塞爾在中國駐華沙大使館「非正式」會面。斯托塞爾提出，中美大使級會談應當恢復。同時，他還特別提請雷陽注意，「美國方面近幾個月來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有着積極意味的行動」。[77] 第二天，周恩來接到雷陽報告後向毛澤東提議，「擬擱一下看看各方反應，再定如何回答」。同時，他又馬上會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赫瓦賈·穆罕默德·凱瑟（Khwaja Mohammad Kaiser），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轉告華盛頓，如果尼克松總統希望恢復同中國接觸，可使用雙方在華沙的官方渠道。一週後，巴基斯坦駐美大使海拉利（Agha Hilaly）在華盛頓把周的口信轉達美方。[78]

新年過後，雷陽去美國使館同斯托塞爾「非正式會晤」，這是中國外交官第一次進入美國使館。雙方同意，正式會談於1月20日恢復，將不在波蘭方面提供的會場舉行，而在兩國使館輪流進行。[79] 1月20日，當雷陽和斯托塞爾在中國駐華沙大使館舉行正式會談時，討論了雙方在此後通過「其他渠道」舉行「更高級別的會談」的可能性。[80]

毛澤東和周恩來這時都覺得，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時機已經來了。2月12日，周根據毛的指示，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美關係，起草了給雷陽的指示和中方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中的發言稿。他們決定：「如果美國政府願意派部長級的代表或美國總統的特使到北京進一步探討中美關係中的根本原則問題，中國政府願予接待。」這裏，最後一句的文字經過了周的親自修改，草稿原文是「中國政府願意考慮」，周改為「願予接待」。他還在按語中寫道：經過這一修改，語氣上「就落實了一些」。第二天，毛澤東批准了這個發言稿。[81]

2月20日，雷陽和斯托塞爾會談時，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突出了台灣問題，強調要使中美關係得到根本的改善，前提條件就是美軍撤出台海地區，從而使台灣問題獲得解決。同時，他告知斯托塞爾，中國政府願在北京接待美國的高級代表。[82] 然而，這次會議成了從1955年起斷斷續續舉行了15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最後一次。會後，尼克松總統已不滿足於華

沙這個低層次的談判渠道了，而是希望中美之間的意見交換在更高的層次進行。他通過葉海亞·汗總統轉告北京，如果北京也同意的話，他準備開闢一條白宮直接通向北京的秘密通道。[83] 3月21日，周恩來收到了這個信息，他在上面批道：「尼克松想採取對巴黎談判辦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觸。」[84] 顯然，周是願意接受尼克松的想法的，但是這個信息來得太不是時候了。

就在周恩來接到尼克松信息前三天，3月18日，柬埔寨發生了一場政變，親美的朗諾（Lon Nol）將軍推翻了當時正在蘇聯訪問的西哈努克親王。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從莫斯科來到北京，周恩來親自前往機場迎接，並向親王表示：「我們絕不承認朗諾集團，我們只承認你是柬埔寨唯一的國家元首。我只需要知道，你是不是準備鬥爭到底？」西哈努克立即表示，他絕不會妥協。周馬上說：「我們堅決支持你。」[85] 這之後，形勢發展如飛流直下。周連續三天同西哈努克會談，再次重申，「中國決心支持親王直至親王勝利回國」。隨後，周又邀請越南總理范文同秘密來北京參加會晤。周還同當時正在北京的柬共領導人波爾布特（Pol Pot）會晤，以促成紅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之間的合作。[86] 3月23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佈成立以自己為首的柬埔寨民族統一戰線，並成立「王國民族團結政府」。3月24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說，柬埔寨政變後，美方因擔心中國「加緊反美」，「遲至3月23日提出4月初會談」。周提議，將與美方會談推遲至4月中旬，以觀察事態發展。毛批示同意。[87] 此後，會談又推遲到5月20日。

柬埔寨的局勢仍在繼續惡化。5月上旬，尼克松下令南越境內的美軍大規模入侵柬埔寨，目的在於肅清越共在柬埔寨境內的補給基地。5月16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印度支那局勢。會議決定原定5月20日舉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已不宜舉行，必須推遲；還決定要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大規模群眾集會，並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聲明，嚴厲譴責美國的侵略行徑，支持印度支那及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88] 兩天後，北京再次宣佈中美大使級會談推遲舉行。5月20日，號稱百萬中國民眾聚集天安門，舉行反美集會，毛澤東親自出席大會，並於前一天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89]

然而，北京和華盛頓都不準備就此放棄尋求雙邊關係解凍。6月15日，遵照華盛頓指示，美國駐法國大使館武官沃爾特斯（Vernon Walters）向中國駐法使館軍事參贊方文提出，華沙的會談「太公開也太正式」，中美間「應開闢一條秘密的交流渠道」。[90] 然而，這時中方還沒有做好同美方重開談判的準備。6月16日，周恩來再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決定中美大使級會談進一步推遲，6月20日先由雙方聯絡人員會晤。[91]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不希望讓中美談判的進程完全失去動力。7月10日，他放出了一個姿態，下令釋放自1958年以來因「從事間諜活動」一直被關押的美國人華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Walsh）。[92]

1970年夏，中美之間的接觸速度慢了下來，但這不僅是由於尼克松入侵柬埔寨的決定所產生的影響。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前一章已述及的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矛盾的激化，並在1970年夏末召開的廬山會議上集中地爆發了出來，此事佔據了毛和周恩來的幾乎全部注意力。相形之下，中美關係問題固然重要，畢竟不是當務之急。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暫時擺平了林彪等人帶來的衝擊，才開始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中美關係上來。他也像尼克松一樣，覺得華沙這個渠道「太正式」了。但是，對於在北京接待一個美國高級代表甚至尼克松本人的想法，毛卻比尼克松更多了一層國內動員上的微妙考慮：他既想藉尼克松訪華（如果他真的來中國）彰顯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又擔心這麼一件大事若搞得不好，會對文革的「革命氛圍」產生巨大的瓦解作用。毛因而絕不會讓中美關係解凍的進程根據美國人的想法和速度展開。在這一點上，周恩來對毛澤東的盤算可以說是心領神會、吃得很透。

五

深秋到來時，毛澤東和周恩來從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那裏收到了從華盛頓發出的一個信息。尼克松總統表示，他依然有意派一名高級代表訪問中國。這一次，他們決定積極回應。[93] 11月14日，葉海亞總統到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周恩來對他說：如果美方真有解決台灣問題的願望和辦

法，中國政府歡迎尼克松總統派特使來北京商談，時機可通過葉海亞總統商定。他還說：這是史上第一次，中方對美方的反應是「來自一位領導人，通過一位領導人，轉達給另一位領導人」(from a head, through a head, to a head)。[94] 一週後，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羅馬尼亞副總理拉杜勒斯庫(Gheorghe Radulescu)時，又請「羅馬尼亞朋友轉告華盛頓」，中國政府歡迎尼克松總統的代表甚至總統本人，來北京討論「解決台灣問題」和改善中美關係。[95] 但同時，周要求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把他的口信先「放一放」，不要馬上轉達給華盛頓。結果，巴基斯坦直到12月9日才把周的口信送到美國人手裏。羅馬尼亞的動作更慢，一直到1971年1月11日，華盛頓才收到他們轉來的信息。[96]

周恩來為什麼這麼做？後來看，這也許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當時正在北京訪問有關。斯諾是毛、周和很多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老朋友。1930年代，斯諾隻身來到陝北紅區，對毛、周等做了訪談，後來又以此為基礎寫出《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即《西行漫記》)一書，將過去在西方世界幾乎不為人知的中共革命的故事傳播於天下。中共建政後，斯諾又於1960年和1965年兩次訪華。文革期間，斯諾曾多次申請來中國，卻沒有拿到簽證。1970年8月的一天，住在瑞士的斯諾突然接到早在1930年代就已熟悉的中國駐法大使黃鎮的邀請，請他到巴黎去。斯諾見到黃鎮後，不斷地抱怨有人已經「不再把我看成是中國的朋友」。黃鎮告訴他，「國內幾次來電催促」，「如果你現在提出訪華要求，我想我國政府會愉快接受」。斯諾因為剛剛動過膀胱手術而對此猶豫不定，黃鎮又說：「毛主席幾次問到你的情況，周總理也親自過問你的訪華事宜。……你將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毛主席將把你當作貴賓！」[97]

8月14日，斯諾到達中國。周恩來親自安排了他在中國的行程，先讓他到各地參觀，不斷會見他在陝北時就認識的老朋友們。10月1日，斯諾和夫人應邀到天安門城樓上參加中國國慶觀禮。這時，周恩來走過來同他寒暄後，把他領到了站在城樓中央的毛澤東那裏，讓他站在毛身邊，周安排的攝影師馬上拍下了毛和斯諾親切交談的照片。[98] 這張照片於12月25日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這是毛和周向美國人(但首先還是向中國的普通民眾)發出的一個重要信號。然而，正如基辛格在回憶錄《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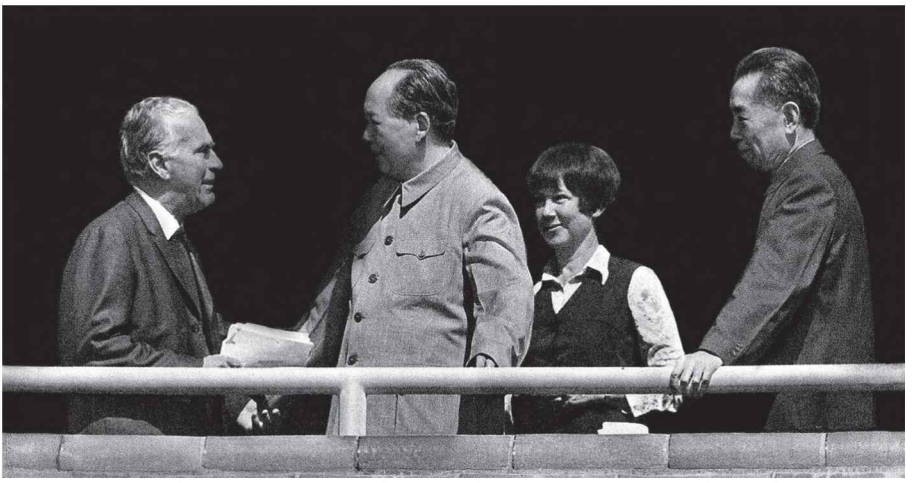


圖28.2：毛澤東、周恩來和斯諾夫婦在天安門城樓上，1970年10月1日。
（CPA Media Pte. Ltd. / Alamy Stock Photo）

宮歲月》中承認的，周顯然「高估了我們的智商」，他和尼克松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重要信號。[99] 但對毛和周來說，比之讓美國人注意到這張照片，更要緊的是要讓千千萬萬中國人注意到它。二十年了——反對美帝的宣傳和教育已深入無數中國人心中，美國在許多人的思想中早已被嚴重地、甚至是徹底地「妖魔化」了。此刻，當毛試圖同美國改善關係的時候，他也需要在普通中國民眾的心目中創造出一種新的美國形象。毛和一位「美國老朋友」的這樣一張照片，登載在《人民日報》（以及全國所有報紙）的頭版，並在報首配上了「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的毛澤東語錄。[100] 所有這一切，都是周恩來親自安排的。甚至連《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這幅照片的尺寸大小，也由周親自決定。[101] 蕭規曹隨，全國其他報紙發表的照片，也都是一樣的尺寸。這麼做，最重要的目的應該是為了讓普遍中國民眾對中美關係可能改善有心理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毛澤東把斯諾請到中國來，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拍攝和發表這麼一張照片，而是另有目的。12月18日，他在中南海住所同斯諾談了五個小時。這之前，11月5日，周恩來先接受了斯諾及夫人的訪談。周說：「中美談

判從1955年開始到現在，沒有解決什麼問題。要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就要談台灣問題，就要談美國武裝侵略和佔領台灣的問題，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我們談判的態度和方針沒有變，要改變的是美國政府。我們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102]

從斯諾的角度看，周恩來的這些話也許像是老生常談，但那是因為周絕不想搶去本來屬於毛澤東的舞台中心位置。毛見到斯諾時，從國內到國際，說了很多話；關於中美關係，毛說：

> 我是不喜歡民主黨的，我比較喜歡共和黨，我歡迎尼克松上台。他的欺騙性也有，但比較少一點。他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來，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麼。……為什麼右派要讓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現時要跟尼克松解決。……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跟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談也行，當做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尼克松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是他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不要讓我們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過美國國務院。[103]

毛澤東同斯諾談話的很大一部分，講到了文化大革命。當時，廬山會議開完不久，批陳整風已經開始成形了。毛談話中有一大段與此有關，有些話明顯地影射林彪。「比如什麼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斯諾說：「我有時不知道那些搞得很過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誠意。」毛說：「有三種，一種是真的，第二種是隨大流的，第三種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104]

毛澤東接受斯諾訪談後，並不想讓他馬上發表。會見後，周恩來派唐聞生去見斯諾，給他送去了經過毛審核的會談紀要。周還讓唐告訴斯諾，暫時不要發表這篇訪談，到「適當的時候」再通知他發表。斯諾聽從了這一指示，一直到1971年4月才發表他對毛的訪談。[105] 但實際上，根據尼克松的說法，斯諾私底下馬上就把毛的話傳給了白宮。所以，在毛與斯諾談話後幾天，尼克松就知道毛歡迎他到北京去。[106]

六

1971年初，中美之間的接觸似乎緩慢了下來；但實際上，兩邊似乎都在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使得雙方能夠順理成章把中美解凍這盤空前的「大菜」推介給本國民眾。畢竟，中美之間全面敵對已經20年了，各自對對方的妖魔化也早已深入人心，要改變這一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需要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機遇。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毛澤東和周恩來預先沒有想到的機會，居然很快就來了。1971年3月下旬，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即將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當時，中國乒乓球運動的水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由於文革的關係，已經六年沒有參加世錦賽。1月下旬，日本乒乓球協會會長後藤鉀二專程來到中國，邀請中國派隊參加這次錦標賽。談判並不順利，中方代表堅持要在公開發表的會談紀要中把「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放在第一條，還必須加上「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是中國的神聖領土」，後藤對此無法接受。周恩來聽取彙報後，親自召集外交部和國家體委等有關人員開了一個協調會，明確提出，後藤既已同意把「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放入紀要，便不應該逼他寫上「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周批評道：他又不是日本外相，你們對朋友的要求太過分了。這樣，在周的親自干預下，雙方終於達成了協議，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將赴日本參賽。[107] 對於當時仍處於文革中的中國來說，這畢竟是一件大事。直到3月中旬，當周恩來召集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負責人討論中國參賽的具體問題時，體委多數人仍對中國派隊參賽持保留意見。最後，周拍板：「我們信守諾言，參加第31屆比賽。」毛澤東也在周親自以鉛筆寫的報告上批示：「我隊應去。」[108]

周恩來對乒乓球隊參賽，事無巨細都親自過問安排。錦標賽開始前，他指示中國代表團必須每天兩次從東京向北京電話彙報。毛澤東也表現出異常的興趣，天天要護士長吳旭君給他讀關於錦標賽的報告，並指示代表團同北京通話的時間由每天兩次增加為四次。[109] 錦標賽期間，中國前世界冠軍莊則棟和美國運動員科恩（Glenn Cowan）在去體育館的班車上不期而遇。乒乓球隊成員在招待會上與美國運動員相遇時，對方又隨口說出了希望到中國訪問的話。這一切，代表團領導都一本正經地當作美國隊希望訪華的「重要動向」，向北京報告。[110]

外交部在討論是否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問題上，意見仍存在分歧。最後，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我們考慮，美左派和有影響的政界人物均尚未訪華，由乒乓球打頭陣，政治上不是很有利，可告美隊，現在訪華時機還不成熟，相信以後會有機會。」4月3日，這份報告送到了周恩來那裏，他放了整整兩天，一直拿不定主意。他知道無論是否批准報告，這麼一件大事還是要由毛澤東本人拍板。再三考慮後，他在報告上批示道：美國隊訪華時機尚未成熟，「可留下他們的通訊地址，但對其首席代表在接觸中應表明我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立場」。[111]

報告在毛澤東那裏放了兩天。4月5日，毛在報告上畫了圈後退回外交部，等於是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可是，到4月6日深夜，也就是美國隊離開日本回國的前夕，事情峰迴路轉，毛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天晚上11點多，毛服下幾片安眠藥後上床睡覺，之後又支撐着起床，叫來護士長吳旭君，要她馬上給外交部打電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112] 當晚，周恩來得知毛的決定後，馬不停蹄地採取行動，連夜指示外交部通過電話通知中國乒乓球隊，正式向美國隊發出訪華邀請。周恩來還特地加上一句：「如果美國選手來華路費有困難，可以予以補助。」[113]

美國乒乓球隊到中國後，周恩來又是事無巨細，親自關照。在北京的首場中美友誼賽前，周恩來接見了中國隊，並特地囑咐他們：「比賽要有勝有負，我們都勝不好，對美國隊不要光我們贏，這次他們頭一次來，都輸了不好。」[114] 他在審閱美國隊日程時批示：對觀眾「要預先通知，應鼓掌的還要鼓掌」。[115] 周還決定親自接見美國代表團，但又不想讓這件事顯得太突出，於是他做了一個特殊的處理：除美國人外，他還將同時接見來中國訪問的加拿大、哥倫比亞、英格蘭、尼日利亞代表團，還就「在人大會堂的接見場地的安排（出席人員、合影、會場佈置、人員座位等），做了詳細安排，並要黃華、錢嘉東同志等到會場去佈置」。[116]

「乒乓外交」的發生，幾乎在一夜之間便改變了中美關係的氛圍，或者用基辛格的話來說，它「引起了國際震盪，激發了全世界的想像力」。[117] 周恩來也清楚地意識到，重新推動中美關係進程的時機已經到來了。4月21日，他通過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傳遞口信，提出中美關係改善的癥結在於

台灣問題，這「只有通過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解決。他表示，「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118] 4月29日，尼克松接到周恩來的口信後，立即表示準備接受邀請。5月10日，他又通過巴基斯坦答覆中方，「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人進行認真交談，雙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關心的問題」。他還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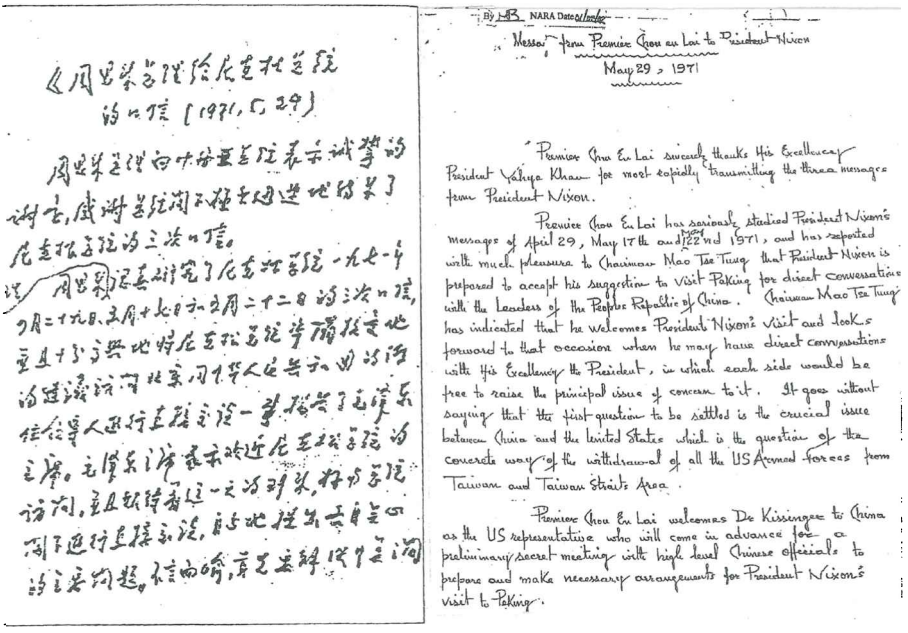
5月下旬，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制訂中美會談中處理雙邊關係、台灣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時應遵循的原則。會後，周親自寫出〈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報請毛澤東批准。他在報告中為中美會談確定了八項原則：一、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事設施，應限期從中國台灣省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二、台灣是中國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外人不容干預；三、力爭和平解放台灣；四、堅決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美國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才能建交；五、中美建交前，可在雙方首都建立聯絡機構；六、不主動提聯合國問題，絕不能接受「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台」的安排；七、不主動提中美貿易問題；八、美國武裝力量從印度支那、朝鮮、日本和東南亞撤走，以保證遠東和平。[120]

周恩來所擬的這八項原則，不僅涉及中美會談將要討論的國際問題，也特別考慮到了如何應對中美緩和必定會產生的國內外影響，以及構建由此帶來的共和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外交戰略轉折的合法性基礎。他在報告中花了大量篇幅，回答中美關係轉向可能在國內外引出的各種問題：中美會談會不會影響美國人民的鬥志？會不會有礙印度支那抗美戰爭和巴黎談判？尼克松、基辛格這一手是否有詐，表面談和，實質不變，小則放蔣出籠，大則引蘇東向？周一一回答了這些問題，他說：近期還不能預言美國有爆發革命的可能，中美人民來往和兩國會談是動員美國群眾的好機會。中美會談有助於印支抗戰和巴黎談判，因為美蘇爭霸的焦點在中東和歐洲，而不是遠東。不論美帝有無欺詐的可能，戰備不懈是中國的經常任務，若有風吹草動，正好鍛鍊中國的動員和作戰能力，也更加暴露反動面目。如能談好，至少可使兩霸相爭加劇，我可增強戰備力量。[121]

5月29日，毛澤東批准了周恩來的報告。[122] 同一天，周又通過巴基斯坦給尼克松總統發出了一封親筆信：

> 周恩來總理認真研究了尼克松總統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和五月二十二日的三次口信，並且十分高興地將尼克松總統準備接受他的建議訪問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諸位領導人進行直接交談一事報告了毛澤東主席。毛澤東主席表示歡迎尼克松總統的訪問，並且期待着這一天的到來，好與總統閣下進行直接交談，自由地提出各自關心的主要問題。……周恩來總理熱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來北京的會晤。[123]

6月2日，這封信到了尼克松手裏。他讀後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124]



Message from Premier Chou en Lai to President Nixon
May 29, 1971

Premier Chou En Lai sincerely thanks His Excellency President Yahya Khan for most rapidly transmitting the three messages from President Nixon.

Premier Chou En Lai has seriously studied President Nixon's messages of April 29, May 17th and 22nd 1971, and has reported with much pleasure to Chairman Mao Tse Tung that President Nixon is prepared to accept his suggestion to visit Peking for direc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Leaders of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Chairman Mao Tse Tung has indicated that he welcomes President Nixon's visit and looks forward to that occasion when he may have direct conversations with His Excellency the President, in which each side would be free to raise the principal issue of concern to it.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first question to be settled is the crucial iss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the question of the concrete way of the withdrawal of all the US Armed forces from Taiwan and Taiwan Straits Area.

Premier Chou En Lai welcomes Dr Kissinger to China as the US representative who will come in advance for a preliminary secret meeting with high level Chinese officials to prepare and make necessary arrangements for President Nixon's visit to Peking.

圖 28.3：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管道」給美國總統尼克松的信，1971年5月29日。（中文信出處：中央檔案館編：《共和國五十年珍貴檔案》下；英文信出處：美國國家檔案館）

5月27日至31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全國外事工作會議；5月30日和31日，他連續兩天在會上做長篇講話。在第一天的講話中，他從世界「正處在大動盪、大變化、大改組中」說起，講到「從世界範圍看，革命運動是在發展」，「大戰一時打不起來」，但戰爭的危險仍然存在。同時，周又強調道，「另一種可能也存在着，比如美國現在就覺得，跟我們中國中斷了二十一年，對美國沒有好處」。因此，周提出「在現在的局面下，我們在國際上來往，要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有所不同」。文革中，「我們同許多國家幾乎中斷了來往，許多方面的活動停止了，現在不行」，不僅「左派、中間派要來，右派也要來一點，這就需要我們適應新的形勢」。周接着說：

> 大戰一時打不起來。有帝國主義，總是要打的，但是可能推遲。在這個形勢下，我們要增加人民的往來，在一個時候在某些問題上妥協。譬如建交，如果美國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它的軍隊，承認一個中國，就中美之間的關係說來，它這樣做就等於認錯，那我們就要考慮建交不建交。中美會談，到現在談了十五年多，主要就是這麼一個問題。

第二天，周恩來又接着講了幾個小時，期間說了一句畫龍點睛的話：「我們現在工作的最大注意力所在，一個是美國，一個是日本」。在講到中國時，周告誡道：「現在有人亂說，中國很強大，是超級大國，這是故意誇大我們，我們絕不要接受。我們不僅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我們現在也還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我們還是一個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意大利說，中國就是第八。……我們就做老八，不要和人家爭。……我們不要吹，藏一手有好處。」不過周又說，畢竟中國「市場這麼大，人口這麼多，我們的國民經濟生產總值、購買力雖然低，但是數量大，有前途，所以就不能不引起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注意……現在世界上要靠貿易來往，互相依存，因此要向外貿易。……凡是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都包含有這個意思。……在這個意義上說，如果(中美)建交了，平等貿易，總是要來往的，互通有無麼」。當時仍處文革時期，各種信息渠道完全封閉，中國人對於外部世界的真實情況幾無所知。顯然是針對此種情形，周在報告中提出，「知

識要從各個方面吸收進來」，介紹國外信息的《參考消息》要編好，發行也要大幅度擴大。[125]

6月4日起，周恩來親自主持中共中央召開、由二百多名各方面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就中美關係解凍向他們「吹風」。這次會議本來預定開五天，但毛澤東指示「改為十天」，最後開了兩個星期。[126] 周恩來對這個會議極為重視，不但全程參加會議，又在會上做長篇講話，會議結束時還做了總結發言。6月4日晚，周恩來先是詳細回顧了中美關係的歷史，罵了一通民主黨，說它「一次又一次地挑起戰爭，朝鮮戰爭是它挑起的，侵越戰爭也是他挑起的」。尼克松上台後，「急於要和我國建立正常關係」，這「一方面是因為形勢所趨，一方面是為他連任總統撈點政治資本」；因此，「他準備派出高級人員甚至是基辛格與中國高級人員對話」。周說，「如果尼克松總統真有解決台灣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派特使來北京商談」，但中國「堅定的立場和高度的原則性」不會改變。「基辛格來談，可能談出一點眉目，以便為尼克松的訪問開闢道路，也有可能完全談不攏，使尼克松的訪問成為不可能，這對我們並無損害。」周強調，「今天的形勢是我們不斷同帝修反鬥爭勝利的結果」，中美如能談好，「至少可使美蘇兩霸相爭加劇，我們可爭取時間增強戰備力量」；如果談不好，也能「鍛鍊我們動員和作戰的能力，……更加暴露美帝的反動面目，提高人民覺悟」。周還特別解釋為什麼要與尼克松談，而不是同也想訪華的民主黨人談：

> 他是當權派，如能得到他的贊同，這些主張在大選前實現的可能性就大些。如先與其反對派談，即使得到贊同，成為競選綱領，當選後亦未必兌現。所以我們先和當權派談，後和反對派談。這樣我們就更加主動了。當權派答應的總要兌現一兩件，如果不兌現，人民就要反對他。他來談，任何條件都不答應，那不是自己給自己製造困難麼。那他就等於以失敗者的姿態回去，對競選總統不利，也可使反對派振振有詞。[127]

會議期間，中共中央向全國廣泛轉發了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和斯諾談話的紀要，並要求「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並認真組織學習」。[128] 6月18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總結發言。他首先強調，把這個會議說

周总理六月四日晚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根据笔记整理）

中美会谈，约翰逊当选后，想和我们谈判，开始在日内瓦，以后到华沙。但他扩大侵越战争，因而我们停止了与他的谈判。华沙会谈，在约翰逊、尼克松交替前后已中断近两年。尼克松上台后，越南战争仍不断扩大，他要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不理他。中苏在边境冲突后，忽有两国总理的会谈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这不能不使尼克松政府急起采取主动。他急的不得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

日，在华沙的一个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大使拉我们一个翻译，把我们翻译搞“假”了，赶快跑，我们的代办走了，翻译被他拖住了，就象上海旧社会四马路的野鸡到处拉人一样。美大使说，尼克松提出要举行大使级会谈，约我们代办会晤，于是华沙会谈又接上了。

圖 28.4：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1 年 6 月 4 日。
（91-007-0028-0001，甘肅省檔案館）

成「是外交問題，是中央管的」，是不對的；「這個會是動員會議，是動員全黨、全軍、全民關心國家大事的重要會議」。為此，對於「主席和斯諾談話的精神」，要「一級一級向下傳達」，做到「使大家都知道國際形勢，都要執行主席的外交路線」。周接着說：

> 中美關係，從人民來往開始。要將中美會談與人民來往結合起來。中美會談談成或談不成，人民之間的來往是不能中斷的。大門已經打開了，人民總是要來往的，與台灣的人民也是要來往的。……大家要看《參考消息》，《參考資料》也要看，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天天看，我們不看不行。……只有這樣才能貫徹執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線、外交政策，要有精神準備，輿論準備。……尼克松要來訪問，既然他找上門來，我們可以同他談。他來了以後，有兩個可能，可能談成也可能談不成。……中美這個會談是曲折的，鬥爭是複雜的。……尼克松來不答應一點東西不行，這是很微妙的。

周恩來在報告中還提出「對極『左』思潮要批判，像火燒英國代辦處，那是五一六搞的，是壞人搞的」；又說，對「主席和主席思想」要「自覺尊敬」，「個人崇拜，有時要強調，有時要降溫」。總之，「要以主席和斯諾的談話為準，要認真組織群眾學習，使群眾得到教育」。[129]

七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途經巴基斯坦秘密訪華，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高級別美國官員第一次到訪。周恩來行事一貫細緻，這一次他更做了極為周密的準備和安排。他親自決定讓長期以來一直在自己身邊工作、並曾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的章文晉前往伊斯蘭堡迎接基辛格一行，同行的還有唐聞生、王海容和唐龍斌。他知道章不愛講話，特地關照他：「這次去接基辛格，你是主人要主動些，不要使從未到過中國的客人覺得太冷淡了。」[130]同時，他又親自部署北京的接待工作。為了絕對保密，他決定讓基辛格的專機在軍方的南苑機場着陸，基辛格一行安排住在釣魚台國賓館大院，所有的會談也在那裏舉行。如果會談成功，那麼雙方將在基辛格離開北京後發表消息；如果不成功，那麼雙方都不會就此對外界透露，讓這件事像「沒有發生過那樣消失掉」。

7月9日凌晨4時30分，基辛格乘坐的巴航專機從伊斯蘭堡機場起飛，中午12時15分抵達北京南苑機場。周恩來安排葉劍英元帥、黃華、熊向暉、韓敘等去機場迎接。周恩來雖然從未見過基辛格，但讀了他的好幾本書，仔細研究過他這個人，已對他的見解和路數了然於胸。他特地安排基辛格一行入住釣魚台國賓館五號樓，並關照把五號樓整理一番，還指示將存放在外交部倉庫的一些珍貴文物（如殷商青銅器、宋官窯瓷瓶等）放到房間的多寶櫃中，所有中英文雜誌及《參考資料》等則放在臥室外的休息室，不放進臥室，以免被認為強加於人。在基辛格逗留北京的48小時裏，周恩來同他舉行了六次會談，共達17小時。

7月9日下午3時許，周恩來來到釣魚台國賓館同基辛格等一行見面，他「滿面笑容，輕鬆愉快地和他們握手」。輪到和基辛格助手洛德握手時，周說：「呵，你是中國女婿啊，今天應該說也是回到娘家了，歡迎你！」[131]下午4時25分，會談開始舉行。周恩來對基辛格說：你是客人，你先講。基辛格拿着事先準備好的講稿說，尼克松總統派他來，是就雙方關心的問題進行預備性會談，並商談尼克松訪華的時間和準備。他隨後照着講稿開始闡述美國對一系列問題的看法。他說，尼克松總統已決心通過談判來結束越南戰爭，在美國的榮譽和信譽得以維護的前提下，將制訂並遵守逐步從越南全部撤出美軍的時間表。講到台灣問題時，他顯得有點緊張地說，美國將從印度支那撤軍，並準備在越南戰爭結束後，從台灣撤出三分之二的軍事力量，還準備隨着中美關係的持續改善，繼續從台灣撤出軍事力量。基辛格還同美國國務院幾個月前所作的關於台灣「地位未定」的聲明大唱反調，明確表示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灣獨立。他接着強調，以這樣的政策為背景，美國堅定地主張台灣問題應當以和平方式來解決。

在基辛格訪華前中美之間的一系列交往中，周恩來本人和中方所有參與者都一再強調，中美關係的癥結是台灣問題，如果這個「根本問題」不能解決，中美關係就無法改善。因此，當基辛格談到台灣問題時，周聽得極為仔細。他馬上意識到，為了給尼克松訪華鋪平道路，基辛格其實已準備在台灣問題上做出重要讓步，尤其是他抓到了基辛格關於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說法。他還意識到，基辛格把美國從台灣撤軍和越南戰

爭結束掛起鈎來，是想在這上面和中國討價還價。基辛格發言後，已到了晚餐時間。餐後，周在發言時強調，美國軍事力量必須從台灣撤出，美蔣條約也必須廢除；但他又說，中美之間在台灣問題上繼續存在的分歧，不應當成為阻止兩國改善關係的障礙。[132]

當天會談一結束，周恩來馬上去向毛澤東當面彙報。當周講到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時，毛頻頻點頭。周又說到，美國準備把台灣問題同越南戰爭結束掛鈎，從台灣逐步撤軍，毛發了一通極有意思的議論，把美國人形容成正處在猴子變人的進化過程中：「猴子變人還沒有變過來，還留着尾巴。台灣問題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長。」毛又說：「台灣不慌，台灣沒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比較起來，越南問題更具有緊迫性。[133] 這麼一來，中方自中美接觸開始以來一再強調必須首先解決的「根本問題」，也由於毛這番「猿雖不是人，但總會演進為人」的說法，不再成為尼克松訪華問題上不可逾越的障礙了。

在第二天上午的會談中，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向基辛格放了一大通「國家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空炮」，搞得基辛格一頭霧水，甚至以為會談要告吹了。但實際上，這只是周為了表明北京仍然「堅持原則立場」在「走程序」。下午，周的口氣和調子又都變回來了，用非常務實的態度同基辛格討論一系列具體問題，兩人也很快達成了尼克松於1972年春天訪問中國的協議。[134]

最後，周恩來和基辛格在擬定宣佈尼克松訪華公報的措辭上遇到了一個難題：尼克松到底是「應邀」還是主動要求訪華的？宣佈時該怎麼說？周向毛澤東彙報這件事時，毛說：「總不見得尼克松是自己邀請自己訪問中國？這不行，要改。」周絞盡腦汁，又同翻譯商量後，想到了可以用「獲悉」這個詞，英語是knowing of，省略了主語。於是，這個問題解決了。[135] 7月11日，基辛格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回到伊斯坦布爾，隨後又出現在公眾的視野裏。7月15日，中美雙方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宣佈了尼克松將於1972年春訪華這一震撼世界的消息。

基辛格前腳離開北京，周恩來後腳就擔負起向中國的盟友們解釋中美緩和問題的任務。7月13日一大早，他飛往河內，短短24小時裏同黎

筍、范文同等越南領導人舉行了三次會談。他詳細通報了中美接觸的經過，還反覆向越南領導人保證，中國絕不會放棄對越南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鬥爭的支持。黎筍等人不斷提出各種各樣的疑問，尤其擔心中美緩和會不會讓越南吃虧。周斬釘截鐵地說：「不會！毛主席和我本人都堅信，從長遠來看，中美關係緩和只會推動美國領導人認識到美國全球戰略的中心是在歐洲，而不是在亞洲，從而促使他們下定從越南戰爭中脫身的決定，因而也會加強越南在巴黎和談中的地位，為越南全國的最終統一創造條件。」[136] 儘管周費盡口舌，越南領導人並沒有被說服。周離開河內後，越南《人民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尼克松主義一定破產〉的社論，其中影射批評中美接觸是為「已經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拋去了一隻救生圈」。周讀後，看出「文中表現出越南同志的擔心和估計」，對此他大不以為然，但他認為這篇社論在中國「可以全文發表，不要摘要，表示我們的光明磊落態度」。[137]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越之間的分歧在這裏露出的還只是冰山一角。周恩來此時恐怕不會想到，不到十年間，中越就會反目為仇，從「同志加兄弟」變成了各自最痛恨的敵人。

7月14日中午，周恩來從河內回到北京後，只停留了半天，第二天凌晨又飛往平壤，和北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舉行了長達7小時的兩次會談。他詳細通報了基辛格訪華的情況，也解答了金的問題。同越南領導人相比較，金的態度似乎要好得多，他不僅對中方同美國接觸表示「完全理解」，還說這實際上是中國長期同美帝國主義鬥爭而取得的成果。然而，金作這樣的表態並不是不要回報的。他提出，中方同美方會談時，要把朝鮮問題以及平壤方面關於解決半島問題的主張向美方提出。周立即表示同意。[138] 一個月後，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周和他會談時，從中共歷史上執行「統一戰線」戰略的經驗講起，詳細解釋了北京決定打開中美關係的原因和邏輯。周說：「我們堅持鬥爭，但必要時絕不拒絕妥協。」[139]

7月15日深夜，周恩來從平壤回到北京後，又馬上會見了流亡北京的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通報基辛格訪華的情況。他安撫西哈努克說，中國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拋棄西哈努克這位老朋友。又說，中美緩和將為親王返回金邊創造條件。[140]

7月17日，周恩來在會見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羅博（Xhorxhi Robo）時，卻遇到了大麻煩和大挑戰。他和羅博是老熟人了，過去兩人見面談話都熱情友好。但這一次，羅博卻讓周碰了個大釘子。周介紹基辛格訪華情況後，又竭力強調中國反帝、反修的基本立場不會因為同美國的接觸而發生變化，但羅博根本聽不進去。[141] 8月12日，羅博向周轉交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直截了當地表示「我們不同意你們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決定」，並指責中國的做法「背叛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事業。[142] 文革這幾年，阿爾巴尼亞一直是中國最親密的國際盟友，中阿之間的「戰鬥團結和偉大友誼」曾達到炙手可熱的地步。從這時起，中阿關係迅速地冷卻下來，雙方的一系列分歧也不斷浮出水面。幾年後，兩國也將由親密戰友變成敵人。

除了同盟國和盟友打招呼外，中共還要同一些「兄弟黨」通氣，說明情況。一般來說，這件事是由中聯部來做的。但這次有個例外，對緬甸共產黨打招呼，由周恩來親自出面。這裏的背景是，幾乎就在中美關係破冰時，中國同緬甸在文革中嚴重惡化的關係迅速修復。1971年8月上旬，緬甸領導人吳奈溫到中國訪問，周同他進行了五次會談，毛也出面會見奈溫，把中緬關係在文革中惡化的責任都推到「五一六分子」和「極左派」的頭上，又說「現在我們兩國關係比較好麼」。[143] 由此，文革中幾近破裂的中緬關係全面好轉。這之後，周恩來會見了長住北京的緬甸共產黨第一副主席德欽巴登頂，專門就中國政府和緬甸政府恢復關係，向中共全面支持的緬共做解釋。周保證：「如果奈溫要來，要談你們的問題，我們不談。你們打，我們怎麼跟他談呢？」但又說：「他要跟我們改善國家關係，搞點經濟來往，貿易來往，這是可以考慮的。」他還引毛的話說：「恢復兩國關係，就是恢復外交關係。奈溫要求同我們搞好關係，目的是為了搞點經濟利益。我們幫他搞點經濟建設，將來緬甸解放了，還不是你們的。」[144]

八

這時，已是林彪出逃事件發生前夕。9月13日，林彪和妻兒一道，強行登上飛機逃離北京，又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整

整一個月裏，無暇他顧。即便如此，一旦他們完全控制了北京的政治局勢，注意力就又開始轉回到中美關係上來。同時，即便在林彪事件期間，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在巴黎，新任美國大使華生（Arthur K. Watson）和中國大使黃鎮充分地利用了這一條新開闢的秘密交流渠道，使雙方發出的重要信息都能在最快的時間內、以最安全的方式送達對方。[145]

10月20日，基辛格又來到北京，這一次他是公開來的。在北京的七天時間裏，他和周恩來會談十次，累計長達23小時40分鐘。同時，雙方助手又就雙邊關係涉及的一般問題和安保、通訊等問題進行分組討論。[146]

周恩來和基辛格會談的前半段，集中在形勢和政策上。後半段的重點，轉為如何起草尼克松訪華後的聯合公報。雙方會談議程上原本沒有這一項，但基辛格提出要搞一個公報，周說中方對此沒有準備，可以由美方先提出一個草案。10月22日晚，基辛格把公報草案交給周，周讀後馬上知道這份草案要大改，但他仍對基辛格說，可以此作為討論的基礎。當晚，周恩來向毛澤東彙報。起先，毛對搞這麼一個公報不感興趣，但周說這是美方的需要，不搞不好。毛說：那就搞，可以各說各的，他們講和平、安全，我們就講革命，其實就是「放空炮」。毛要周「先向他們吹吹」。[147]第二天，周對基辛格說美國的草案不行，要發表公報就要搞一個真實反映雙方的看法，不能給人虛幻的假象。[148]

10月24日晚，基辛格拿到了經毛澤東審讀批准的中方公報草案，他一開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告訴周，他不可能讓一位美國總統在這麼一份充滿尖刻的革命和反帝語言的文件上簽字。但當他讀完這個通篇「放空炮」的稿子後，卻「開始看到，中國人充滿新意的做法也許有助於解決我們面臨的難題」。[149]這之後，他和周坐下來，在雙方助手的幫助下，循着中方草案的路子，重新起草一份公報，既陳述雙方在國際問題和中美關係上的共同點，又用不至於刺激對方的文字，表達各自對於重要的國際和雙邊問題的看法。循着這個路子，一份雙方都能接受的公報草案漸漸成形了。[150]

兩邊碰到的最大難題，是在台灣問題上對各自具體立場和政策的表述，尤其是關於美方對台政策的表述。一直談到10月25日，已經到了基辛格預定離開的時間，雙方還是未能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協議，基辛格決定

推遲一天離開北京。周恩來緊緊抓住不放的，是聲明的文字一定要表明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為「台灣地位未定」留下任何空間。[151] 最後，基辛格提出一種新說法，突破了僵局：「美國認識到，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此不提出異議。」周恩來看到這一提法時，當場拍手叫絕，後來還專門講到這件事：這段話「是基辛格貢獻的，我們挖空心思也沒有想出來。這樣人民的意見也表達出來了。所以博士還有博士的好處」。[152] 這個說法其實並不是基辛格的發明。早在1968年，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Mike Mansfield）在一次關於台灣問題和中美關係的公開演講中，就提出了相似的說法。[153] 儘管基辛格是一位共和黨總統的國家安全特別助理，但他絕不會在這麼一個重要問題上羞於「抄襲」一位資深民主黨參議員的開創性想法。10月26日上午，當基辛格離開北京時，雙方已在除美軍從台灣撤出的時間表以及中方同意「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外的幾乎所有內容上，就公報草案的內容大致達成了一致。對周恩來和基辛格來說，他們都有理由為這六天裏獲得的進展感到滿意。

在和周恩來的會談中，基辛格還提出另一問題：釋放自1952年10月起便一直被關押在中國獄中的美國飛行員唐奈和費克圖，並請求周恩來干預。在這之前，美方曾在中美領事級及大使級會談中一再就此與中方交涉，甚至連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也曾為此專程來中國斡旋。美方一直堅稱，他們屬於朝鮮戰爭中的戰俘，應當根據朝鮮停戰協議獲得遣返。但中方則認為，他們的飛機是在中國吉林省上空執行間諜任務時被擊落的，根本不是朝鮮戰爭的戰俘。這一次，基辛格改變了訴求的方式和內容。他告訴周，唐奈確是中央情報局的人員（為此，基辛格來華前已獲中央情報局確認這一點，他可以將此告知中方），他請求周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為唐奈尋求減刑，並使費克圖如期獲釋（當時，唐奈和費克圖已在獄中度過了19年）。[154] 1971年12月，尼克松訪華前一個多月，費克圖獲釋回到美國。唐奈仍被繼續關押，儘管他的刑期已從無期徒刑變為25年徒刑。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時又當面向周恩來提出，唐奈的母親年事已高，希望能讓唐奈提前獲釋，這「會對美國人民產生積極影響」。[155] 基辛格又在1972年6月和1973年3月訪華時，兩次當面向周恩來提出提前釋放唐奈

的請求：「對美國人民來說，這將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姿態，也將會為他們高度欣賞。」[156] 1973年3月12日，唐奈在獄中度過21年後終於獲釋。他從深圳出境、經香港飛回美國，立即趕往康乃迪克州的一家醫院，在那裏見到了他母親。[157]

基辛格還在北京的時候，紐約的聯合國大會就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舉行表決，先以多數通過了這一問題不是「重要問題」，不需要三分之二以上多數才能獲得通過。接着，又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的壓倒多數，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的提案。這個消息傳到北京時，基辛格正在去機場回美國的路上，這是他先前沒有想到的。本來，對他到北京走這麼一趟，美國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P. Rogers）就曾提出過反對意見，理由是這可能會對同時舉行的聯合國大會關於中國席位的投票產生不利影響。但基辛格表示，他不能對中國人失信，同時他不相信聯合國大會當年就會通過讓中國重回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在尼克松總統支持下，他還是到北京來了。他沒有想到，這個提案真的通過了。不過，比起他剛剛在北京獲得的成功，基辛格很快就從這種挫折感中擺脫出來。對這件事的發生，周恩來也沒有充分準備。10月26日，他在外交部召集會議，商討中國是不是要派代表團出席當年的聯合國大會。由於中方毫無準備，更沒有做過預案，周本人以及與會的外交部官員都傾向於不派代表出席。會議期間，毛澤東派王海容到會場，要周恩來馬上去他那裏。周到毛處後發現，毛的情緒極高，先拿在場的唐聞生開玩笑：「小唐啊，Miss Nancy Tang，你的國家失敗了，看你怎麼辦哪？」[158] 周向毛報告：「我們剛才開會，都認為這次聯大解決得乾脆、徹底，沒有留下後遺症。只是我們毫無準備。我臨時想了個主意，讓熊向暉帶幾個人先去聯合國，作為先遣人員，就地了解情況，進行準備。」毛馬上否定了周的意見：「那倒不必嘍。聯合國秘書長不是來了電報嗎？我們就派代表團去。讓喬老爺當團長、熊向暉當代表，開完會再回來，還要接待尼克松麼。」[159] 這之後的幾天裏，周恩來連續親自主持會議，很快便完成了中國代表團參加聯大會議的準備工作。

1972年1月初，基辛格的副手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eig）到中國訪問，為尼克松訪華打前站。1月4日，周恩來和黑格會談時，談到了最近結束的印巴衝突。黑格說，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十分關注維護和加強中國的「獨立和生存能力」（viability）的問題，當時黑格用viability這個詞時，顯然沒有經過推敲。中方翻譯把這個詞譯為「生存能力」時，周馬上問：為什麼中國的生存能力要美國人關注？這之後，他專門向翻譯核對這個詞在英文中的用法。在1月6日同黑格的會談中，他提出了這件事，說「中國認為，任何國家都不能靠外力維護其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別人的保護國和殖民地」。[160] 黑格不見得完全搞明白周的用意，但還是向周做了解釋，周也沒有抓住這個問題不放。[161] 其實，周的反應和說話並非完全針對黑格。很大程度上，這個話也是說給毛聽的，是為了給周自己同美國人談判中難免要作出的妥協和讓步創造更大的「合法性」空間。這個話，後來在中國相關檔案沒有解密的情況下被選擇性地公佈出來。說到底，他是在為毛和中共對美政策的轉變（從更為深廣的意義上，也是為構建毛和周的「新中國」的合法性敘述）爭取更大的空間。

周恩來在同基辛格以及黑格的會談（黑格返美後即向基辛格做了詳細彙報）中高屋建瓴、收放自如的風格，令自視甚高的基辛格有一種「棋逢對手」的感受。他在2月初給尼克松的一份報告中寫道：「他（周恩來）可以與戴高樂媲美，是我所遇到過的所有政治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位。」他又寫道：「我覺得，你和周恩來可以進行真正的對話，也會享受與他之間在多個層面上的來回互動：無論是關於歷史的討論、哲學問題的論述、戰術性的周旋、強硬的討價還價，還是輕鬆的機智應對，他都能游刃有餘。」基辛格還告訴總統：「你可以確信，他不僅對將和你討論的問題本身有充分準備，也對美國以及你本人做足了功課。他對美國政治和社會也有着很好的了解——儘管他看到的圖景是失真的。」報告中最令尼克松心動的，應該是基辛格提到的這些細節：「他甚至在我得知你1971年7月6日在堪薩斯城發表了講話之前，就仔細閱讀了這個講話；他顯然也一直在心理層面對你進行研究，他知道你喜歡電影《巴頓》（他曾暗示，你像巴頓將軍一樣，也喜歡非傳統的行事方式），至少還讀過《六次危機》（尼克松所著）中的幾個章節。」[162]

DECLASSIFIED
Authority E012958
By TPH NARA, Date 4/5/07

Similarly, a Russian negotiator would never have made the gesture Chou did in one of our communique drafting sessions in October: he suggested we keep in the joint draft some language that we had proposed even though I had said we were prepared to take it out because we were deleting some of their proposed language.

The Chinese "principled" attitude also means that they will respect a similar approach from you. Chou told Bhutto a few days ago, for example, that much of the outcome of your visit would depend on our posture: "China had principles which guided it in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 and it would respond to evidence of the U.S. attitude.

The Chinese reject the notion that compromise is a desirable end in itself. They are, however, willing to make tactical adjustments on the road to their goal and may consider how these fit together with adjustments we make as we move toward our goal. It is essential to keep in mind that certain phrases carry totally different meanings for the Chinese than for us. For example "peace" in the abstract is not a virtue for them: In October Chou gave me a long lecture that justice is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True peace can only result from justice; without it peace is oppressive and transitory.

Thus you should be candid on our disagreements. While sticking to our point of view you should indicate your comprehension of theirs. They would challenge any artificial submerging of differences. They would be unimpressed with vague protestations of "good will" and "friendship." And they would show contempt for any abject posture such as James Reston assumed in his interview with Chou last summer, even while taking advantage of any openings this offers to reinforce their point of view.

What they need to be clear about is whether you know your own objectives, understand theirs, and are serious about both.

Chou En-lai

Chou is the premier exhibit of these Chinese qualities. As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he ranks with De Gaulle as the most impressive statesman I have ever met. Whereas De Gaulle was unparalleled in his grandiose, beautifully structured, monologues, with Chou one can have a dialogue. I think you will enjoy the give-and-take with Chou on several planes, on all of which he is equally at home -- historical discussion, philosophic dissertation, tactical jousting, hard bargaining, light repartee.

You can be sure that he has done his homework, not only on the issues but also on America and you personally. He has a good command of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although his picture must be distorted.

圖28.5：基辛格在尼克松訪華前給尼克松的報告中談周恩來，1972年2月5日。
（美國國家檔案館）

然而，就在尼克松訪華已進入倒計時的關頭，周恩來卻碰到了一件令他極度擔心的事：尼克松到北京後，毛澤東可能不能出來見他了。林彪出逃事件後，毛的健康情況急轉直下。1月8日，他出席陳毅追悼會時，只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大衣就從臥室直奔靈堂，受了風寒。後來，他又不肯好好地接受治療，導致病情不斷加重。2月12日清晨，他由感冒轉為肺心病而嚴重缺氧，突然發生休克，昏迷過去，好不容易才搶救過來。[163] 這一天，離尼克松預定到北京的日子只有九天。周囑咐醫生：「美國總統尼克松到北京，你們一定要讓主席恢復到能夠會見。」[164] 但實際上周恩來和醫生們都不知道，到那時毛的身體狀況能否恢復到可以出面會見這位美國總統的程度。

九

2月21日，北京的天空陰沉沉的，天氣預報說要下雪，但終於沒有下下來。中午時分，周恩來和葉劍英元帥等一干高官來到了首都機場。尼克松乘坐專的機降落並在停機坪上停穩後，周恩來等來到舷梯前。當尼克松和夫人走下專機時，周站在原地不動，並未迎上前去，而是等着尼克松下舷梯後向他走來並率先伸出手後，他才站在原地把手伸出來。在重要的歷史時刻，周從來不會忘記自己的政治家身分。這一瞬間，被周的攝影師拍下來了，它有着清楚的意涵：經過二十年的全面敵對和隔絕後，是美國總統主動要到中國來，又主動向周握手。周恩來覺得，這是一個應當讓所有中國人和新中國在世界上的支持者們感到驕傲的時刻。

這些天，周恩來一直在擔心臥床的毛澤東能不能起來見一見尼克松。沒想到這天毛的精神很好，從早上起就不斷詢問尼克松一行的消息。當他得到尼克松已經到達北京的報告後，要身邊人員通知周恩來，他要馬上見尼克松。[165] 當時，尼克松剛剛在釣魚台國賓館安頓下來，正準備洗一個澡，基辛格就衝進來報告，毛澤東要見他，周恩來已在樓下等候。[166] 尼克松匆匆帶着基辛格和他的助手洛德（Winston Lord）離開賓館，卻沒有帶上國務卿羅傑斯。

毛澤東在中南海住處的書房會見尼克松，他先向尼克松打招呼，「我說話不太利索了」。但實際上，他那天講了很多話。在去中南海的路上，

周恩來告訴尼克松，這次會見的時間只有10分鐘或15分鐘。可是，毛的興致極好，會見持續了1小時15分鐘。[167] 談話中，毛拒絕談「具體問題」，而是跟尼克松和基辛格討論「哲學問題」。他告訴尼克松，他「喜歡右派」，並說「上次選舉時，我投了你一票」。他又說，「如果民主黨人獲勝，中國人就會同他們交道」。毛似乎想給他的美國客人一種印象，他的思想和精神高高在上，不僅可以控制中國發生的一切，也有資格對已知世界的任何有意義的人與事發表評論。對他來說，最要緊的也許不是他和尼克松、基辛格談了些什麼，而是他可以讓中國和世界都看到，他們居然跑到他的書房來聆聽他的教誨。當尼克松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一個世界」時，毛答：「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這時他的滿足感一定是巨大的。

從第二天開始，周恩來同尼克松連續舉行會談，許多議題其實屬於「務虛」，焦點又回到台灣。在2月22日下午雙方的第一次實質性會談上，尼克松給周恩來吃了一顆「定心丸」。他談到了美方處理中美關係時將遵循的五項原則，其中第一項就是：「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我能控制我們的行政機構的話，今後（美國）將不會再發表關於台灣地位未定的任何聲明。」尼克松還表示，「我們沒有也不會支持任何台灣獨立運動」。[168] 此後，周恩來和尼克松關於台灣問題的討論集中在美國武裝力量從台灣撤離和停止對台軍售，以及中國承諾將盡可能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上。周重申，美國既然承認一個中國以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在台灣駐軍及對台軍售，並硬性規定中國政府必須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豈不是干涉中國內政？但他又在2月24日同尼克松會談時表示，「我們對自己有信心」，可以和平地解決台灣問題。[169] 最後，由於雙方都表現出了靈活性，終於就聯合公報的內容達成了協議。

會談最後階段遇到的麻煩，其實是由美國人內部的矛盾引發的。尼克松去見毛時，匆忙間沒有帶上國務卿羅傑斯，卻帶上了基辛格的助理洛德。基辛格和中國副外長喬冠華敲定聯合公報的內容時，也沒有把羅傑斯和隨行的國務院官員們當一回事，認真傾聽他們的意見。2月25日晚，羅傑斯向周恩來表示，希望當面向毛澤東辭行。周一聽就知道這是做不到的，這不僅打破了禮儀程序，而且毛的身體狀態也不容許。周先去找基辛



圖 28.6：周恩來在首都機場迎接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1972 年 2 月 21 日。
（CPA Media Pte. Ltd. / Alamy Stock Photo）

格，說「是不是可以不見」，理由是「辭行一次，主席就要回拜，這樣就太多了」。基辛格說「完全沒有必要」，但周心裏明白，羅傑斯提出向毛辭行的要求，是因為「他們內部有矛盾」，尼克松會見「不要羅傑斯去」，羅心裏不滿。[170] 基辛格和喬冠華敲定聯合公報內容後，羅傑斯和國務院的隨行官員又挑出一堆毛病，要求修改。周當即決定「給他一點面子」。第二天中午，他未同美方事先打招呼，就徑自走到羅傑斯和國務院助手們住的那一層樓，拜訪羅傑斯，向他及國務院同仁對中美關係解凍的貢獻表示感謝。[171] 同時，他也指示喬冠華再同基辛格會晤，對公報文字做最後修訂。在尼克松離開中國的前一刻，公報終於搞出來了。

2 月 28 日，中美《上海公報》正式發表。雙方並未迴避各自的分歧，除了用各自的語言概述對重要國際及雙邊問題的看法和政策外，又表示尊重對方的立場，並強調雙方關於國際規範的一系列共識：尊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主張「任何國家都不該在亞太，或其他任何地區謀求霸權，並應要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企圖與嘗試」。[172] 從多

重意義上來看，這是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文件之一，或許也是周恩來的政治和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建樹之一。

周恩來能喝酒，不過在外交場合一般不多喝酒。但在為尼克松送行的晚宴上，他一杯接一杯地喝了不少茅台，也讓尼克松喝得滿臉通紅。[173]在上海送走尼克松後，周恩來立即趕回北京，向毛澤東彙報同尼克松最後階段會談及《上海公報》發表的情況。3月3日，他精神抖擻，神采飛揚地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百多名領導幹部講解《中美聯合公報》。他逐條解釋了《上海公報》的條款後說，「這次受衝擊最大的是蘇聯、日本和蔣介石」，最重要的是「我們打開了美國的門」；又說，「在原則上我們佔了上風，他們佔了下風」。[174]

這確實是周恩來的時刻，也是中國和世界歷史上極為重要的時刻。從後來的歷史發展看，這一時刻有着深刻而多方面的意涵：它結束了中美之間持續了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全面對抗，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和人口最多的國家之間的關係發展開啟了新篇章。它也改變了冷戰的性質：自1940年代中後期拉開帷幕以後，冷戰就一直是共產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之間的一場有關意識形態，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以及人類基本生活方式的競爭和對抗。中美關係緩和，模糊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作為通向現代性的不同選擇的區別，也瓦解了前者關於國家計劃和統制型經濟是走向現代化更為有效途徑的信念。同樣重要的是，它也改變了中國本身的發展進程。在《上海公報》發表的時刻，中國是否已經邁出了走向「改革開放」的重要一步？

第29章

高處不勝寒
（1972–1974）

一

林彪事件後，周恩來身不由己地成了中國的第二號人物。中美關係緩和的實現，又為他帶來了巨大的國際聲譽。尼克松訪華及之後的那些日子，看上去是周作為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的「盛大節日」，但他心中卻隱藏着一種難以名狀的不安。

在林彪出逃後的日子裏，時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業務組成員的紀登奎見證了周恩來突然失控、嚎啕大哭的一幕：

> 總理獨自一人坐在他臨時的辦公室裏發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我們兩人（紀登奎和李先念）不知道他究竟為什麼事情悶悶不樂，便進去好言勸慰。開始時，總理只是聽着，一言不發。後來當聽到我說到「林彪已經自我爆炸了，現在應該高興才是，今後可以好好抓一下國家的經濟建設了」這樣一席話時，顯然是觸動了他的心事，總理先是默默地流淚，後來漸漸哭出聲來，接着又嚎啕大哭起來，其間幾度哽咽失聲。……最後，總理慢慢平靜下來，半天才吐出一句話：「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麼簡單，還沒有完……」下面就什麼也不說了。[1]

周恩來屬於意志極為堅定、自我控制能力極強之人。他一生中，好像從未有過此種場合的情緒失控。這究竟因何而來？人們對此有過不少觀察和評論。紀登奎本人的說法是，「周的傷心苦悶恐怕主要在於毛、周兩人治國的思路不同，毛強調階級鬥爭，周注重抓經濟，更看重國計民生問題，為此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志難酬」。[2]

紀登奎的說法帶有過於濃重的「官樣文章」色彩，邏輯上亦有自相矛盾之處。如果說林彪事件前，周恩來因為同毛澤東「治國的思路不同」而「一直有志難酬」的話，隨着林彪倒台，他應當有了施展雄心的天地與空間，何以會悲從中來、以至於情緒失控？紀的解釋似乎講不通。

說到底，沒有人能夠進入周恩來的內心世界。他為何情緒失控，恐怕是一個別人永遠無法探知答案的問題。在我看來，也許可以從這樣幾個視角來看待此事。或許，他是因為這些天來精神高度緊張，一下子鬆弛下來後，悲喜之情交互衝擊，禁不住情緒失控，潸然淚下？或許，周在此刻想到文革的禍闖得太大，而他又可能被認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怎樣才能向國人及歷史交代？或許，他在林彪事件後實際上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現實，使他產生了一種極為不祥的預感？林彪曾是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曾有過多少風光，卻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一種兔死狐悲、惺惺相惜的感覺襲上周的心頭，亦未可知？周說事情「還沒有完」，究竟指的是什麼？無人能夠回答。可以肯定的是，這是周恩來的一次罕見的真實感情的流露——直覺告訴他，接下去的路絕不會好走。

二

不管怎麼說，尼克松訪華後的那個春天，在林彪倒台後中國權力構建出現嚴重真空的情況下，周恩來的實際權力上升了。中國面臨的國內外情勢，也隨着冬雪消融而露出了些許春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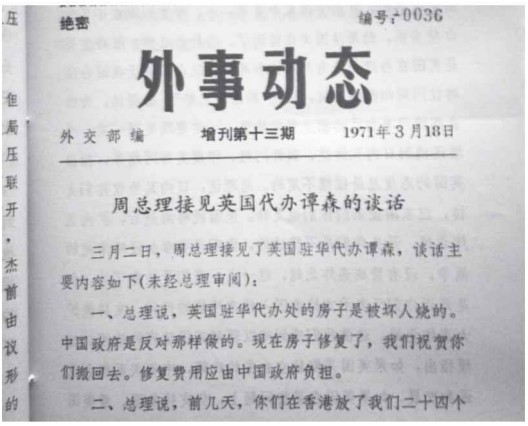
中美關係解凍，以及中國加入聯合國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給中國外交帶來了新局面。在1971年中到1972年底的短短一年多時間裏，有近30個國家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除美國外的所有西方大國都同中國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

尼克松訪華後不到一個月，中英關係便從代辦升格到大使級。在西方大國中，英國首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由於台灣問題的障礙，雙方關係一直停留在代辦級。尼克松訪華前，中英已就雙邊關係升格到大使級有過頻繁接觸。[3] 周恩來親自出馬，利用英國代辦處遷入文革高潮中被燒毀後修復的辦公大樓的機會，於1971年3月2日主動約見英國代辦譚森

（John Denson），就此事道歉：「你們代辦處是被壞人燒的，中國政府是反對的。我們祝賀你們搬回去。修復的費用應由中國政府承擔。」周在回應英方將中英外交關係提升到大使級的動議時表示，主要障礙是英國仍在台灣設有領事館，以及在聯合國一面投票支持恢復中國合法席位，一面又支持將中國代表權問題當作「重要問題」來對待。周要求英國在「台灣法律地位未定」、「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等問題上澄清立場，「如果英國採取獨立自主的政策，中英關係就會改善」。[4] 對於周恩來提出的這些要求，英方一時難以全部接受，中英談判也拖延了下來。尼克松訪華後，在《上海公報》中美國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提出異議」的影響下，中英談判迅速獲得突破，英方接受了在雙邊公報中寫入「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5] 1972年3月13日，中英兩國發表聯合公報，將兩國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

西德是另一個在尼克松訪華後幾個月內便同中國建交的主要西方國家。新中國立國初期，在「一邊倒」的外交框架內，對西德持不承認態度。1955年蘇聯和西德建交後，中國亦宣佈結束對德戰爭狀態。但在冷戰格局下，兩國在建交問題上無任何進展。196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後，勃蘭特（Willy Brandt）出任西德總理。從1970年初起，雙方開始就建交問題接觸。當時，勃蘭特積極推行對蘇緩和的「新東方政策」，對華建交不是他的政策重點；同時，中方對勃蘭特的「親蘇」外交也頗多疑慮，甚至持批判態度。時任新華社波恩分社首席記者王殊在發回北京的報告中，強調德國不是復仇主義國家，西德參加北約有防禦蘇聯的一面；又指出在中德建交上，反對黨基督教民主聯盟持積極態度。王的報告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和重視，並幾次在內部會議上對王提出表揚。[6]

1972年夏，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副主席、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訪華。周恩來於7月19日同他會晤時，憶起自己當年住在德國柏林、到過科隆和哥廷根的情景。他還說，由於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當年的遠見，西德沒有像美、日那樣同蔣介石建立關係，所以中德之間只要建交，不存在關係正常化的問題。[7] 7月21日，周恩來約見從德國應召緊急趕回北京的王殊，聽取他關於歐洲和德國情勢以及中德建交前景的報告。[8] 三天後，在周的建議和安排下，毛澤東在其陪同下約見



绝密 编号：0036

外事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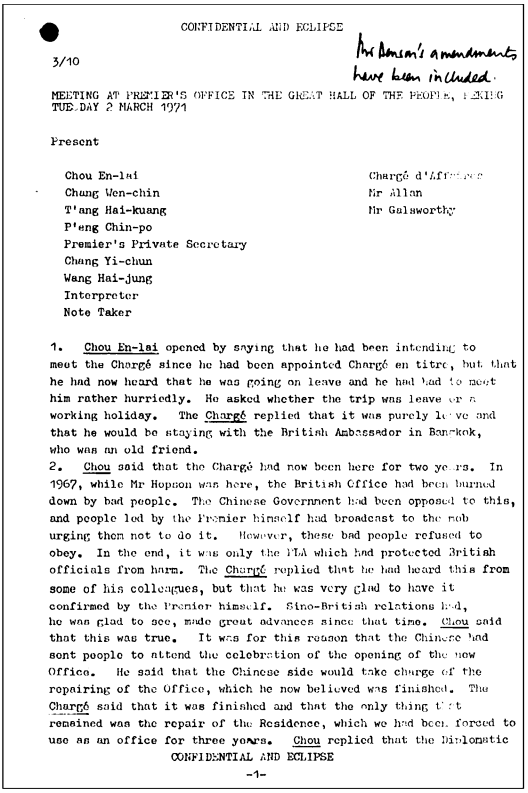
外交部编 增刊第十三期 1971年3月18日

周总理接见英国代办谭森的谈话

三月二日，周总理接见了英国驻华代办谭森，谈话主要内容如下(未经总理审阅)：

一、总理说，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那样做的。现在房子修复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去。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政府负担。

二、总理说，前几天，你们在香港放了我们二十四个



CONFIDENTIAL AND ECLIPSE

3/10

Mr Hanson's amendments have been included.

MEETING AT PREMIER'S OFFICE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PEKING
TUESDAY 2 MARCH 1971

Present

Chou En-lai	Chargé d'Affaires
Chang Wen-chin	Mr Allan
T'ang Hai-kuang	Mr Galsworthy
P'eng Chin-po	
Premier's Private Secretary	
Chang Yi-chun	
Wang Hai-jung	
Interpreter	
Note Taker	

1. Chou En-lai opened by saying that he had been intending to meet the Chargé since he had been appointed Chargé en titre, but that he had now heard that he was going on leave and he had had to meet him rather hurriedly. He asked whether the trip was leave or a working holiday. The Chargé replied that it was purely leave and that he would be staying with the British Ambassador in Bangkok, who was an old friend.

2. Chou said that the Chargé had now been here for two years. In 1967, while Mr Hopson was here, the British Office had been burned down by bad peop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been opposed to this, and people led by the Premier himself had broadcast to the mob urging them not to do it. However, these bad people refused to obey. In the end, it was only the PLA which had protected British officials from harm. The Chargé replied that he had heard this from some of his colleagues, but that he was very glad to have it confirmed by the Premier himself. Sino-British relations had, he was glad to see, made great advances since that time. Chou said that this was true. It wa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Chinese had sent people to attend the celebration of the opening of the new Office. He said that the Chinese side would take charge of the repairing of the Office, which he now believed was finished. The Chargé said that it was finished an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remained was the repair of the Residence, which we had been forced to use as an office for three years. Chou replied that the Diplomatic

圖29.1：周恩來和英國駐華代表譚森的談話，1971年3月2日。
（中文文件出處：外交部《外事動態》，1971年3月18日；英文文件出處：英國國家檔案館）

外交部領導及王殊，討論中德建交的相關問題。毛大談國際局勢，說「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又說他自己在國際上「特別喜歡右派，尼克松一類人」。談話後，周告訴王殊，毛已批准同西德建交的報告。[9] 8月1日，周在外交部的會議上說，要「爭取在社會民主黨手裏同西德建交，這有好處」。他還分析道：「西德跟日本比，可能先同我們建交，因為沒有任何困難。它跟蔣介石不來往，這是阿登納那個時代確定下來的。」[10] 王殊迅速趕回柏林後，破格被任命為中方同西德建交的談判代表。這之後，中德建交談判果然進展順利。9月29日，兩國草簽建交協定；11月11日，協議在北京正式簽署。

法國早在1964年初就率先與中國建交。當時，周恩來曾親自主持這件事。[11] 1966年5月16日，戴高樂在會見中國大使黃鎮時，親口邀請周恩來於1966年秋冬之際訪問法國。[12] 然而，當時中國已處於文革前夜，周婉拒邀請，但又表示「願意邀請蓬皮杜總理於今年下半年訪華」。蓬皮杜（Georges Jean Raymond Pompidou）也以「我的日程很緊」為由婉拒。[13] 文革中，中法關係一時處於「休眠」狀態。1968年1月後，戴高樂又三次請中國代辦轉達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問候，並表示「中法之間不存在任何困難和障礙」。3月，周恩來指示外長陳毅在宴請法國大使時回應，中法雖然制度不同，但不妨礙兩國在重大問題上相互配合。[14] 春末夏初，法國爆發了「五月風暴」，戴高樂總統辭職，之後又幾次表達了訪華的願望。周恩來通過韓素音對他發出了邀請，並表示「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最敬佩的，就是戴高樂將軍拒絕在強權面前屈服以及他維護國家獨立的意志」。[15] 不料，戴高樂於1970年11月去世，此事未成。不過，中法關係已開始轉暖。1972年後，當時已是法國總統的蓬皮杜又生訪華念頭。當他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後，訪華的意願也更為迫切。7月，法國外長舒曼訪華，為蓬皮杜訪華鋪路，周恩來對此極為重視。7月10日，他在會見舒曼時說，中法都不受任何大國控制，主張獨立自主。他還回顧當年留法的經歷，說「我們經常唱的《馬賽曲》和《國際歌》，都出在你們那裏，我們感到非常親切」。[16] 1973年9月，蓬皮杜訪華，周全程親自接待，並陪同毛會見了他。9月13日，周在同蓬皮杜談話時強調，中法都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允許世界上由哪個超級大國來控制」。在講到中國究竟是否大國」時，周說：「我

AUDIENCE DE L'AMBASSADEUR DE CHINE
le 16 mai 1966 à 17 h.

à Bucarest, qui atteste que le Premier Ministre chinois se déplace. Le Général veut répéter ce qu'on a eu l'occasion de manifester antérieurement, à savoir que si M. Chou souhaite venir à Paris, la chose peut être arrangée. La meilleure époque serait l'automne ou le début de l'hiver.

M. HUANG CHEN remercie le Général pour les mesures efficaces qui ont été prises en ce qui concerne les deux immeubles, prend note du fait qu'ils sont en voie de restitution. Il compte bien qu'elle se produira dans les meilleurs délais. En ce qui concerne l'Ambassade de France à Pékin, M. Paye dispose de deux bâtiments et la Chine lui en donnera un autre nouveau. Il existe des maisons pour tout le personnel, qui est bien installé.

En ce qui concerne les déplacements de M. Chou-En-Lai, l'Ambassadeur indique que le département intéressé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français avait avancé l'idée d'un voyage au Chargé d'affaires, pendant l'absence de M. Huang. L'Ambassadeur en référera à son gouvernement. Il estime en tout cas que les visites ne peuvent que contribuer au resserrement des liens.

LE GENERAL DE GAULLE indique que de son côté,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comprenait que le Chargé d'affaires de Chine avait suggéré la possibilité de ce voyage.

L'audience prend fin à dix-huit heures.-

圖 29.2：戴高樂和中國駐法大使黃鎮的談話，1966 年 5 月 16 日。
（AMAE, Asie-Océanie, Chine, 119QO/533,
Compte rendu de l'audience accordée par le général de Gaulle à M. Huang Chen,
ambassadeur de Chine à Paris, 16 mai 1966, p. 137）

們說不完全是，面積大，人口多，這算是大國吧，但從經濟發展來說，差得很遠。如果按國民生產總值來說，你們國民生產總值每人平均接近三千到四千美元，我們是三百美元多點，你們十倍於我們。……我們還要幾十年的努力，至少到21世紀才能達到你們那個水平。我們現在為什麼提出『不稱霸』？是告誡後代！」[17] 在北京的正式會談後，蓬皮杜到山西雲岡石窟和杭州參觀遊覽，周偶而會用自己仍然記得的幾句法語直接同蓬皮杜交談，蓬皮杜「感到很親切」。[18] 如果周恩來願意，他可以把一切場合都變成外交舞台。

英國、德國、法國都是周恩來半個世紀前留歐時曾居住、生活過的國家，直到晚年對他仍有影響。相形之下，青年時代負笈東瀛的經歷，似乎使他對日本更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歷來重視日本，也極希望中國盡早同日本恢復邦交。早在1950年代，當中日兩國還被冷戰隔離的時候，周恩來就注意抓住每一個機會，發展促進中日之間的民間貿易，以及各種文化和體育交流。隨着中美關係出現解凍的趨勢，周恩來也將視野投向日本。他在1971年5月底舉行的外事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明確提出，外交上「現在重點就是對日、對美」。[19] 基辛格1971年7月秘密訪華時，美國沒有事先通報主要亞洲盟國日本。這對於日本政治和社會、尤其是對一向親美的佐藤榮作首相的衝擊巨大，被稱為「尼克松衝擊」（The Nixon Shock）。周恩來洞若觀火，面對中日關係面臨的新機會和可能出現的新局面，1971年10月初，在他的主持下，中方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20] 1972年7月，佐藤辭職。接任首相的田中角榮就職後表示，要將中日關係正常化提上日程。周恩來意識到，實現中日關係突破的時機已到，決定「對日本說，我們同日本友好不排美，就是不反對美國」。[21]

當時，中日雙方在恢復邦交上已有不少接觸。1972年4月，日本自民黨總裁候選人之一三木武夫訪華。此前，他已搶先宣佈贊成中方「建交三原則」。周恩來指示對外友協會長王國權先與三木舉行預備會談，若有進展，自己再出面會見三木。王國權和三木的會談進展順利，很快就達成了

一系列共識。此時，王卻突然提出了釣魚島的主權問題，要三木承認「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甚至暗示三木若不同意，「此次訪華不可能取得成果」，一時之間把三木搞得暈頭轉向，不知這是否也是周恩來的意見。周聽到彙報後，當即決定於4月21日親自接見三木。他對三木說：「王國權很『左』，比我還『左』，給你出了個大難題。他怎麼能這樣不顧及你的來訪目的和現實處境呢？在這點上，他不代表我。」周還說：

> 我們一貫認為，不論在歷史上，還是在國際法上，釣魚島都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你們則認為是日本的領土。雙方存在明顯分歧。這個問題雖然重要，但只能等待將來條件成熟的時候，由兩國通過協商談判，尋找一個合情合理，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目前，我們共同面臨的緊迫問題，不是爭論這個東海島嶼究竟歸誰所有，而是如何克服困難，排除阻力，盡快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22]

在周恩來的直接干預下，三木得以不虛此行。

7月，日本社會黨副委員長佐佐木更三訪問北京。7月16日，周恩來會見他時表示，歡迎田中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來華，商談恢復中日邦交問題，還說：現在我們應該向前看，而不應該向後看，要解決今後的問題。[23] 7月27日至29日，日本公民黨執行委員長竹入義勝以「受田中首相委託」名義訪華，周恩來同他連續三天舉行會談，焦點在台灣問題，討論集中在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上。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及毛批准，周在會談中提出了「中日聯合聲明要點及相關三點」：(1)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2) 日本從台灣撤出其使館，並採取有效措施使蔣介石集團的使館從日本撤走；(3) 對日本的團體和個人在台灣的投資和經營的企業，在台灣解放時，當予以適當照顧。同時，周堅持結束戰爭狀態和復交三原則也要寫入聯合聲明。[24] 會談中，當竹入提及釣魚島問題時，周表示：「釣魚島問題沒有必要涉及。它和恢復邦交相比較，就算不了什麼問題。」竹入表示，回國後將如實向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彙報。[25] 竹入走後，周恩來在外交部的一個會議上說：「我們在東邊的戰略部署還是要抓中日建交，這是大事。」接着，他談到了自己的一些基本考慮：「當然，對田中的接待不能超過尼克松訪華，因為尼克松是世界兩大霸中的一個頭子。如果中日建交，首先將震動亞

洲，影響很廣。……只要中日建交了，《日美安全條約》對付中國的那一部分自然就不起作用了。……如果日本進一步同台灣斷交，那麼，日蔣條約也就不起作用了。」[26]

9月25日至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外相大平正芳訪華。周恩來心中已有腹案。尤其是，毛澤東早已決定中國將放棄對日方的戰爭賠償要求。這不僅是因為蔣介石在當年和日本簽訂《中日和平條約》時已經放棄賠償，更因為毛、周和蔣一樣，都相信只有對日本取「以德報怨」的態度，才能顯示出中國泱泱大國的格局和風度。[27] 更何況在毛、周看來，中日建交中，台灣問題才是更要緊的問題。經過周恩來和竹入的會談，中方已清楚地闡明建交的三點前提，而田中若不同意這三點是不會貿然前來北京的。既然如此，周對於此次田中訪華將能夠達成中日建交當然是有信心的。談判過程中，周全程參與，雙方雖遇到問題，但在周與田中都願意看到會談成功的情況下，都能一一克服。

其中一樁對中方來說很大的事情是，在周恩來的歡迎宴會上，田中首相在致辭中談到日本侵華戰爭時說：「我對過去日本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很多麻煩，再次表示反省之意。」聽到此話後，包括周恩來在內，在場的中方人士都大不以為然，感到疑惑和不滿。難道日本侵華給中國和中國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難，僅僅是一句輕描淡寫的「添了麻煩」就可以表述的嗎？周的臉色變得沉重起來。第二天，他在同田中的正式會談中，用了近一個小時解釋道，「添了麻煩」這個詞是在路上倒水時弄濕了女人的裙子時說「對不起」用的，這對中方來說是不能接受的。田中仔細傾聽，最後說如果中方有更合適的詞彙，可以按中方習慣修改。[28]

9月27日晚，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會見田中和大平。毛說，「你們到北京這麼一來，全世界都戰戰兢兢，它們不大放心了，曉得你們在那裏搗什麼鬼啊」。田中說：「美國聲明支持我們到中國來。」毛說，「美國好一點，也有一點不那麼舒服。說是他們今年2月來了沒建交，你們跑到他們前頭了」，但「基辛格也通知我們了：不設置障礙」。毛又問：「（建交）聲明什麼時候發表啊？」周答道：「後天。」毛說：「可以幾十年、百把年達不成協議，而在幾天之內解決問題。」田中回應：「是的，只要時機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決。」毛說，「現在彼此都有這個需要」，又說，「我這個



圖 29.3：周恩來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1972 年 9 月下旬。
（Bettmann Archive / Getty Images [514871852]）

人現在勾結右派」，在美國投了尼克松一票，在日本，「這回我們也投了你（指田中）的票啊。正是你講的，你這個自民黨主力不來，那怎麼能解決問題呢？」毛完全沒有對田中提及釣魚島問題。[29]

毛澤東和田中的這番友好交談改變了中日會談的氣氛。大平外相在和中國外長姬鵬飛的會談中，極為誠懇地表示他和田中首相都經歷過那場戰爭，「熟知那場侵略戰爭的性質」，但他們不能不考慮到日本的國情和利益。最後一天晚上，在聯合聲明的文字必須敲定前，大平一字一句地讀了一段話，說明這是日方能做的最後讓步：「日本國政府對日本過去通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難，痛感責任，深刻反省。」姬鵬飛隨即離席向周恩來彙報。當時，有人提出應該在「戰爭」前加上「侵略」。周說：誰都可以想到聯合聲明中的「戰爭」就是「侵略戰爭」，不然日本政府為什麼要「痛感責任，深刻反省」？[30] 9 月 29 日，周恩來、田中以及兩國外長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宣佈兩國自即日起建交。

周恩來與田中會談中，也涉及了釣魚島問題。這件事是田中在兩人的第三次會談中先提出來的。根據日方公佈的會談記錄，田中問周恩來：「您對釣魚島怎麼看？不少人向我提到這個問題。」周恩來表示：「這次不想談釣魚島問題。現在談這個問題不好。因為發現了石油，這就成了問題。如果沒有發現石油，台灣和美國都不會把它當回事。」

然而，根據中方當時以外交部顧問身分與會的張香山記載，周和田中這番對話後還有下文。

田中：好！不需要再談了，以後再說。

周：以後再說。這次我們把能解決的基本問題，比如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先解決。這是最迫切的問題。有些問題要等時間轉移後來談。

田中：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問題是能夠解決的。[31]

周恩來和田中都是大政治家，表現出了自己的政治智慧，幾句話之間做出了將釣魚島問題擱置起來、「等時間轉移後來談」的共識。[32]9月29日，中日簽署聯合聲明，周又做成了一件大事。進入21世紀後，在中日關係不斷面臨困擾之時，不禁令人回想起那段兩國由陰霾密佈走向陽光明媚的時光。

尼克松訪華後，周恩來推動的另一件大事，是將「四三計劃」——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口總值達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相關技術——付諸實施。這件事在尼克松訪華前就已開始計劃。1971年下半年，中美關係緩和及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同時，主要西方國家都面臨着生產力過剩的問題。中國國內農業生產長期「以糧為綱」，糧食產量沒有上去，棉花等原料供應一直緊張。要抓農業，化肥生產又跟不上去。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在和毛澤東談話後，幾次同主管國務院業務組日常工作的李先念談起進口化纖成套設備和技術的問題。[33]1972年1月23日，李先念、華國鋒、余秋里聯名向周報送國家計委〈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裝備的報告〉，其中提出從法國、日本等進口總值4億美元的四套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兩套化肥設備，以及為改造擴建老廠所需的關鍵設備和部件。[34]2月5日，周恩來批示同意報告，並呈報毛澤東圈閱批准。[35]

這件事開了一個頭後，各地都爭相要求引進項目，化纖化肥以外的行業也紛紛提出引進要求。國家計委又於8月6日上送關於引進一米七軋機的報告，11月7日上送關於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報告。周都迅速審閱後批示同意。[36] 根據周的指示，李先念等國務院業務組成員着手對技術設備引進做通盤考慮，再統籌安排引進。[37] 1973年1月2日，國家計委根據周的指示，向國務院呈送〈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提出為「引進新技術，支援農業，加強基礎工業和輕工業」，擬從國外引進26個技術設施項目，預計用匯總額43億美元。周恩來又很快批示同意，並報請毛批准。[38] 這就是「四三計劃」。後來，經追加資金投入，預計用匯總額達到了51.8億美元。[39]

在1970年代初，中國一年進出口總額不到50億美元，其中進口總額只有20億美元剛出頭。周恩來支持並批准「四三計劃」，實在是空前的大手筆。這同後來的改革開放不可同日而語，但這是否中國同全球資本主義佔據主導地位的世界市場逐步接軌、並在幾年後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的一個重要的前奏呢？

三

毛澤東是政治角逐場上的老手，對於政治情勢及力量對比的判斷，有着無與倫比的閱讀能力。林彪事件後中國政治形勢的巨大變化，以及對於文革本身作為「政治整肅」過程的否定，使毛不能不意識到，即便以他所擁有的巨大的政治權威和權力，也需要在重新啟用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幹部的問題上有所動作了。林彪事件的發生，也為他把文革中大整老幹部的責任統統推到已經死去的林彪身上，提供了某種機會。如「二月逆流」，毛就說這本來是「對付林彪」的，現在「問題搞清楚了」。[40]

在解放幹部這件事上，周恩來和毛澤東是一致的。毛一旦在這件事上鬆了口，周馬上就着手去做。進入1972年後，直至毛逝世及文革結束的幾年裏，一個接一個（後來甚至一批接一批）在文革中受到整肅的中共高官們重新露面，不少人官復原職。凡需經中央一級批准的案例審核，直至周因生病住院，他幾乎都參與了。現在看到的材料裏，還沒有一個他在其中起了阻攔作用的例子。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在中共黨內，鄧早就是毛關注和欣賞的人物。1950年代後期，毛甚至把鄧小平稱為自己之下的「副帥」。[41] 但到了1960年代，尤其是文革形成過程中及初期，毛因一系列問題對鄧感到失望，甚至覺得他已站到了自己的對立面去，於是鄧在文革中被打倒了。

毛澤東對劉和鄧的態度其實是不一樣的。1967年初，劉少奇的女兒聽到過毛要鄧小平「為革命當黑幫」的說法。[42] 年中，毛曾對王力等說：「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出來。」[43] 無怪乎，在文革高潮中，鄧雖然遭到整肅，但沒有像劉少奇那樣受到被置於死地的衝擊。當鄧小平專案組審查鄧的「歷史問題」時，周恩來為鄧入黨提出證明：「鄧小平是在留法勤工儉學時入團、轉黨的，我和李富春、蔡暢同志均知道此事。」[44] 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被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永遠開除出黨」，但毛卻出面為鄧講了幾句話，在會上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麼，總要使他和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的。」結果，鄧保住了黨籍。[45] 1969年，鄧根據毛的意思下放江西。周親自干預，專門為此致電時任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的程世清，將鄧安排在江西省會南昌附近。[46] 這裏透露出來的不僅是周本人對鄧的看法，也和周已感覺到毛對劉、鄧的不同態度是分不開的。從政治上看，周也是在為日後鄧若「東山再起」，自己可以與鄧共事留下了伏筆。

1972年1月初，毛澤東在參加陳毅追悼會時，同陳毅家人談話中提到了鄧小平，說「鄧小平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聽到後，馬上便讓陳毅家人把毛的話傳出去。[47] 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接見新疆工作會議代表時，周提出：「林彪這夥人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而毛主席講鄧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能混淆。」[48] 但這之後，鄧復出的事停頓了下來，周也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問題的癥結在於，毛澤東仍在等待鄧小平進一步認錯表態，尤其是關於文革的表態。說到底，鄧是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國「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道路的當權派」；要讓他復出，涉及到「文革究竟有沒有必要性」這樣的大

問題，也涉及到黨內上層整體佈局和力量對比的改變。即便是毛，也難以輕易下決心。至於周恩來，對於這樣一件大事，在毛有進一步的動作前，他絕不會貿然行事。

1972年8月3日，一直在觀察情勢、等待時機的鄧小平致信毛澤東，要求重新出來「做些技術性的工作」。他信中最重要、也最能夠打動毛的是這麼一段話：

>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做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49]

鄧小平的這封信，尤其是「永不翻案」這句話，正是毛澤東希望看到的。短短幾天內，毛就批示道：「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有區別。」毛隨後列舉了鄧的三條長處：「(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50]收到毛批示的當天，周恩來即批轉汪東興「立即照辦」，並連夜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的批示。[51]但是，真正操辦此類事務的汪東興，不知出於何種緣故，卻對這件事不甚熱心。一直拖延到12月18日，周恩來又乘在「二月逆流」中被打下去的譚震林確定復出的機會，對政治局分管審幹的汪東興和紀登奎提起：「鄧小平同志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52]這之後，鄧小平回北京的門打開了。1973年1月，鄧收到了通知，2月20日回到北京。3月9日，毛批示同意周主持政治局會議報送的報告，恢復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53]4月9日，周恩來在玉泉山同鄧小平夫婦會面，長談後又一起吃飯，周向鄧交代了「未來的工作中將要面對的險惡的政治環境」，還把一張「王牌」交到鄧小平手裏，告訴他張春橋是叛徒，但「主席不讓查」。[54]

周恩來、鄧小平早在法國就已認識，後來兩人之間有過密切的工作關係，但並無太深的私交，而毛澤東之所以讓鄧出山，恐怕也包含着以此牽

制、乃至必要時用鄧來壓制周的盤算。但從上述看，周對於鄧的東山再起從一開始就從心底裏贊成，並極願意在恰當時機助鄧一臂之力。這不僅是因為他在政治理念上和鄧相近（在當時中國亟需從文革大動亂中走出來的情況下，尤其是如此），即使從個人政治安危計算的角度來看，周也看得很清楚，若是毛能夠讓鄧出任實際上的第二把手的話，就等於在他和毛之間加上了一道安全屏障。

鄧小平，這個後來將改造中國和改變世界的人物，重新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

四

就在周恩來經歷着他漫長政治生涯中又一段最為忙碌的時光時，他的身體狀況突然響起了警報。5月12日，周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像以往一樣，為他做了一次常規體檢，發現他的尿液樣本中有三、四個紅血球細胞。謹慎起見，張醫生做了另一次檢查，尿液樣本中的紅血球細胞增至八個。經會診，5月18日確定周患上了初期膀胱癌——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55]

由吳階平任組長的醫療組馬上搭建起來，並很快提出建議：及早檢查治療，必要時動手術。為此，吳階平代表醫療組寫了緊急報告，請求中央審批，立即為周恩來做膀胱鏡檢查。[56] 中央迅速成立了由葉劍英、張春橋和汪東興組成的領導小組，負責周恩來的治療。收到醫療組的報告後，他們當即向毛澤東彙報。幾天後，毛的批示來了。葉、張、汪接見醫療組的吳階平、卞志強、張佐良，傳達了毛的三點指示：第一不做手術，第二不要告訴周本人和鄧穎超，第三要搞好營養。[57] 毛解釋道：「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要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58]

醫療組成員卞志強醫生回憶，聽到毛的指示後，大家「非常不安和焦急」，不斷彙報請示。然而，「雖詳細解釋需檢查及治療的重要性及錯過治療時機可能發生的嚴重後果等等，但均無濟於事」。醫療組提出的治療方案未獲上峰批准，醫生們只能對周進行「保守治療」。[59]

毛澤東為什麼有這種不合情理的反應？是出於無知或是另有考慮？這恐怕是一個永遠得不出答案的問題。無論如何，毛的批示是需要不折不扣

地執行的。不管他想的是什麼，都耽誤了醫療組對周的及時治療。不到四年後，周死於晚期癌症。

此刻，周恩來的注意力其實集中在另一件事上。5月3日，毛澤東召見他，提出「同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是我黨路線鬥爭中最嚴重的一次」，中央要召開批林整風會。毛還要求周結合自己的經歷，在會上「談一談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60] 周恩來的政治觸覺何等敏銳，又有着同毛這麼多年來交往的經驗，再加上他早就為自己在林彪事件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而心中不安，當然意識到毛這麼做一定有着自己的意圖。他立即採取主動，當天便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召開批林整風彙報會議的通知〉。三天後，獲毛澤東批准。[61]

這一切發生在周恩來確診早期膀胱癌的幾乎同一時間，但他卻必須一面組織並準備批林整風彙報會議，一面反思自己在歷史上的一系列「政治錯誤」，作嚴厲的自我批判。從5月中旬到6月上旬，他花費了大量精力，準備對「個人在歷史上所犯的路線錯誤」再做一次清算。[62]

張佐良醫生對周恩來在那些日子裏的情形做了栩栩如生的描述：

> 忽然間，他卻整日悶在辦公室裏寫起「文章」來，他一不接見外賓，二不出席任何會議，連西花廳的大門都不邁出一步，他趴在桌上整整寫了十來天。……因日夜寫作，睡眠不足，上下眼臉和整個面部都虛腫了。我見他整天繃着臉，沉默少語，鬱鬱寡歡地思考着問題。在那些日子裏，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這期間，不理髮，也不刮鬍子。……成天穿着那件淡藍色條子的睡袍坐在辦公室裏，這種不修邊幅的樣子是我來到西花廳後沒有見過的。[63]

5月21日，批林整風彙報會議在北京開始。參加者有來自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領導人共三百餘人。周恩來是會議的主持者，並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講話，主要是闡述會議印發的文件。他說：「這次第十次路線鬥爭，主要矛頭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這個反黨集團」，因此，會議也定名為「批林整風會議」。在介紹文件時，周突出地講到「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給江青同志的信」。這封信是毛1966年7月8日寫的，信的原稿銷毀了，但周卻留下了一份信的親筆抄錄

件。周強調，毛在這封信中關於林彪的「一些提法，我總感到不安」的說法，以及關於林彪吹捧毛的本意是「為了打狗，借助鍾馗」的暗示，都說明毛其實早就預見到林的路子不正，要搞政變，只不過「當時是為的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眾之氣」，才沒有把林彪端出來。周說，現在來看，「只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預見的這麼清楚」。[64]

周恩來講的這些話，恐怕連他自己都不相信，更不必說要說服出席會議的三百多位黨的中高層幹部了。但是，這些話他不能不講，也只有他才能講。這個批林整風彙報會開了一個月，其實只是走了一個形式，什麼實際問題都沒有解決。

6月7日，周恩來的檢查稿也已大體完成，他給毛寫了一封信表示：

> 我現在認為，把我過去犯的路線錯誤和重大錯誤告訴三百多位老中青黨政軍和各地負責同志有好處，使他們可以批判我，監督我，對我還可以改造，對他們也可以引以為訓。即使不行，至少可以知道我是怎樣一個黨員，主席又是怎樣挽救和教育我的。[65]

從6月10日起連續三個晚上，周恩來在批林整風彙報會上做了題為〈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檢查，對中共歷史上1920、1930年代的六次路線鬥爭做了詳細說明。他一開口就提到，這六次鬥爭他「都參加了，犯過錯誤」，甚至是「重大錯誤」。他在「延安整風時接觸了這一問題，檢討了」，「檢查了一週，有了初步認識」。但「認識是逐步加深的，提高的」，而且年輕的同志不知道這段歷史，所以他要「講講這些情況，可以幫助大家提高認識」。

周在講話中提到的六次路線鬥爭是：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路線、李立三路線、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路線、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王明投降主義路線。他着重就自己在兩次王明左、右傾錯誤中所犯下的「嚴重錯誤」和「很大的罪過」，做了「嚴厲的剖析乃至過分的檢討」。[66]他說，在第一次「王明路線期間，我陷得很深」。「王明路線污蔑主席是『富農政策』，「那時我在上海，任弼時去蘇區，我指出他要有明確的階級路線」，結果「1931年蘇區黨代表大會，任弼時主持的決議攻擊主席是『富農路線』，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又提到，

「我在寧都會議上奪了主席的軍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被迫長征,都是奪了主席軍權所致」。抗戰初期,王明「在武漢搞右傾投降主義,從極左到極右,我又犯了嚴重錯誤」,「成了第二次王明路線支持者」,「王明到武漢,我長江局書記讓給他,這是黨紀所不容許的」。周最後說:「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沒有毛主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能有今日。」周還對與會者說:

> 你們了解我的歷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利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你們有權利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67]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是自延安整風和反冒進以後,周恩來又一次對自己上綱上線的自我批判。

毛澤東在要周恩來在批林整風會上「談談歷史問題」的同時,還要他講一講「伍豪事件」。6月23日,周做了一個〈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刊登所謂伍豪啟事真相〉的報告,並由中央辦公廳派專人錄音,再根據錄音整理出一份文字稿。中央政治局又根據毛指示決定,稿子要由周簽字,再同錄音一道交中央檔案館永久保存。[68]但不知何故,周後來一直未在文字稿上簽字,這份稿子也一直保留在周辦公室的文檔中。[69]

於是,在尼克松訪華後,當周恩來作為傑出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在世界上聲名遠揚時,在中共最高領導層卻經歷了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段極為艱難的時光。但不管怎麼說,到頭來他還是「過關」了。

參加批林整風會的都是中共中高層幹部,他們充滿着對林彪事件後的時局及黨的大政方針的無數疑問。就連毛澤東本人也意識到,必須就文化大革命這幾年的歷史對全黨和全國做出某種交代,對林彪事件做出某種「定性」和解釋。周恩來在批林整風會第一天的發言中講到:「林彪那些極左的話,這個極左,就(是)形左實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個右派。」[70]這些話其實也包含着他試圖為林彪事件「定性」的意涵。對周來說,林彪事件後中共的大政方針應如何轉變、又應當如何表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而這裏的實質是一個周恩來不能不想、卻又無法由他自己來回答的問題:這一次,文革是否終於走到了頭?

8月1日和2日，周恩來對回國述職的大使和外事部門負責人做了一個長篇報告，透露出自己的思路和一些基本想法。他循着自己在批林整風會上講話的思路跨前一步，強調了「極左」的危險性：極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國國內有極左思潮，在我們鼻子下也有，外交部也有，駐外使館也有。極左思潮就是誇誇其談，不實事求是；就是形左實右，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很抽象。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71] 周恩來這種關於批林的要害在於批極左的說法，隱約間也將矛頭指向了極左肆虐的文化大革命，不能不令黨的領導層內一批文革中急速崛起的人物感到極度不安和不快。江青作為他們的代表人物，在得知周恩來的講話後，當即表示了反對意見。幾天後，張春橋、姚文元也提出，批林「不要過頭」。[72]

自文革開始以來，周恩來和「文革派」在諸多具體問題和案例處理上出現過分歧，但大體上還能同他們共事相處。但這一次不同了，他其實是在一個根本的問題上同江青等人發生了分歧，並且也同站在江青等人背後的毛澤東發生了分歧。後來看，這就在實際上揭開了此後幾年間（直至周恩來逝世）江青等以毛澤東為後台、不斷給周恩來找麻煩、動不動就試圖「批周」的序幕，也拉開了毛在1973年親自出馬策動並操縱「批周、整周」的序幕。但在當時，至少從表面上看，關於「批林」如何定性的問題，關鍵仍然在於毛澤東對此持何種態度。

在毛澤東還沒有表態前，周恩來仍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11月下旬，中聯部、外交部在一份報告中提出，準備召開一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徹底批判外交領域中存在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傾向。11月30日，周恩來批示同意了這個報告。[73] 風波平地而起，張春橋對報告提出質疑道：「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江青馬上附和道：「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74] 看到張、江兩人的反應，周恩來不能不想到，他們的做法恐怕得到了毛的首肯；至少，他們是在創造機會，把問題擺到毛面前，讓毛出來表態。

事情很快就有了新的發展。12月5日，《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了一段時間以來在批判極左思潮上，周恩來與張春橋、姚文元存在着不同看法。他提出：「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到底批左是過了頭，還是沒有批透？我覺得總理的指示是正確的。對春橋、文元同

志的講話，我有些想不通。」[75] 這一次，毛反應迅速。第二天，他約見江青，說：林彪歷史上一貫是右的。他要江青將王若水的信轉給周、張、姚三人，由他們一起找王談話，「解決這個問題」。[76]

12月19日，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起接見王若水。周順着毛的表態說：「我講批極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還有工作上的一些問題，不是講林彪的整個路線。林彪叛黨叛國，那是極右了。……我們沒有把林彪定性為『左』。至於表現形式，也是形『左』實右。」之後，周開始批評王若水：「《人民日報》批判無政府主義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來了以後才看的，覺得文章是錯誤的，因為理論上沒有說清楚，聯繫實際也不恰當。」周又說：「把林彪說成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也不對，林彪也有他的政府麼！……現在批林就是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這是批判的主要矛頭。」[77] 在這個關於林彪事件性質的問題上，江、張、姚佔了上風。這樣的結果影響是深遠的：它為以後一系列批判「右傾」和「右傾翻案風」的言辭和運動（包括批判周恩來的「右傾」和「右傾投降主義」）開了一個頭。

上述這一切發生的同時，周恩來的治療也耽擱下來。1972年5月後，醫療組一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周採取保守療法，試圖控制病情。醫療組是瞞着周本人的，但周其實已覺察到自己的病情複雜。吳階平回憶，周向來有刨根問底的習慣，「以前無論給他做什麼檢查，他都會把檢查的原因、原理、結果問個一清二楚，可這幾次檢查之後他都沒有詢問結果，只是一味拼命工作」。[78] 11月11日，醫療組提出書面報告，建議周「宜特別注意休息，增加睡眠，採取減輕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辦法」。12日，毛在報告上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79]

1973年初，情況驟變，1月13日周恩來突然開始尿血，這是癌症復發的症候。吳階平得知周的病情後，找到住在西山的葉劍英，請求立即為周檢查治療。幾天後，葉劍英拿着裝有周血尿的試管，到中南海游泳池當面報告毛澤東。第二天，中央批准了醫療組給周做進一步檢查的報告。[80]

但這件事拖了兩個月。3月9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報告了自己的病情，並請假兩週，遵循「先易後難」的步驟，接受檢查治療。次日，

報告獲毛澤東批准。[81] 之後，周恩來住進設在玉泉山的臨時治療室，接受膀胱鏡檢查。然而，就在檢查前一天，醫療組又接到毛的指示，大意是為了慎重，做檢查和治療要分「兩步走」，「先檢查，後治療」。吳階平馬上去找鄧穎超：「鄧大姐，現在毛主席說了，分兩步走。那麼我們進去看看，什麼也沒有，那也無所謂分兩步走。可是如果看見一塊小石頭，是不是順便把它拿出來就好了？還是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鄧說：「看見那個小石頭，拿出來就算了。」鄧的話讓吳階平「有了底」。[82]

3月10日，周恩來初次發病近十個月後，終於第一次做膀胱鏡檢查。吳階平發現腫瘤情況比預想的要好，僅有三個綠豆大小的病灶，仍屬早期。他不顧毛「分兩步走」的「最高指示」，當即對病灶做了電灼切除，效果顯著，血尿消失。[83] 醫療組為了鞏固療效，從7月起，又對周做灌藥治療。[84] 當時來看，周的病情已得到控制，醫生對預後的設想是樂觀的。

五

周恩來的身體狀況有所改善，他在政治上的「麻煩」卻沒有完。「王若水事件」透露出毛澤東對他的不滿，還只是一個開頭。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會見再次訪華的基辛格時，提出了「一條線」的想法：「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85] 6月5日，毛澤東又在會見越南領導人黎筍、范文同時提出：「我們外交部發過通報，說是美國的戰略中心是在亞洲、太平洋。後來我得到這個消息，我說不一定。它在歐洲、中東、還有美國本土，問題不少。它總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亞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縮一點。而且在你們那裏，吃了虧了。」[86]

中美關係解凍也意味着中國內外國策的基本改變。無論是出於重建新中國合法性敘述的需要，還是為了提出一種既與這種需要相契合、又能讓中國應對國際挑戰的關於世界格局的新理論框架，毛澤東都有必要在理論上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定位」及其與中國的關係做出新的詮釋。正如楊奎松所指出，當時毛澤東的思路和表述在既要堅持革命理念、又要顧及對美和解的現實之間搖擺，處於某種糾結狀態。[87]

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自1973年起，在不同場合提出並闡述他的「三個世界」理論，對世界格局做出了「超越冷戰」的新界定。但毛澤東的新表述在現實政策制定和實行中的涵義，卻是需要別人（包括周恩來在內）不斷體察和領會的，並非一下子就能抓住其「要害」和「實質」——即便對於同毛澤東共事已達半個世紀的周恩來，恐怕也是如此。

6月，外交部的內部刊物《新情況》第153期刊登了題為〈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的文章，評論了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以後的世界形勢，認為美蘇會談「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周恩來讀到簡報後，覺得「寫得不錯，對美蘇核武器會談的分析很不錯」，批示道：簡報所提出的問題「值得研究」。[88] 然而，當毛澤東從唐聞生、王海容二人手裏拿到簡報後，卻表示簡報存在嚴重問題。周恩來得知毛對簡報的批評後，儘管一時間還摸不清毛的意圖，仍立即命令外交部撤回簡報，並表示「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89]

周恩來本來以為此事可以結束，不料毛澤東卻堅持「上綱上線」。7月4日，他約見張春橋、王洪文，再次批評第153期《新情況》中對世界形勢的看法，並說出了自己的意見：「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常吹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他還說：「凡是此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90] 隨後，他話鋒一轉：「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91] 這幾句話說得極重，隱隱中又將矛頭指向了周恩來。

毛澤東談話後，張春橋立即通知周恩來，要求中央政治局開會傳達討論毛的談話。第二天，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張春橋在會上轉述了毛澤東的批評，周恩來也詳細敘述了毛自6月下旬以來對外交部的批評和批示，並再次承擔責任，在會上作檢討。同日，他又給毛澤東寫信，送去了自己3日給外交部的信，並再次檢討。7月12日，他再次召集外交部有關負責人開會，討論起草一篇文章，批評並糾正第153期《新情況》的錯誤。之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此事。三天後，他將親自修改的〈《新情況》153號錯誤何在？〉一文送交毛，並按照毛澤東定下的調

子說：「(美蘇)爭奪是長期目的，是實質，勾結是表面現象，互相利用為自己利益服務，而且勾結是為了更大的爭奪。同時，也會從反面教育更多的人民覺悟起來，反對兩霸。」當天，毛批示道：「檢討不要寫了。」[92]這件事似乎就這樣過去了。但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事情仍然沒有完。

1973年8月24日起，中共十大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並當選為中央副主席，由此凸顯出他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二把手」的地位。復出後的鄧小平也被選入了中央委員會。

然而，在會上大出風頭的卻是新人王洪文。毛澤東曾經談到，王洪文有務農、當兵和做工的三種經歷，因而具備擔任黨的領導人(乃至最高領導人)的資質。王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並從九大中央委員連續跳過了幾個台階，也當選為中央副主席，排名緊隨周恩來之後，成為正式排名第三位的領導人。十大結束後，王洪文又連續陪同毛澤東會見來訪的外國領導人，儼然顯示出毛澤東正給他機會並對他進行考察，要將他捧上可能的接班人地位的動向。

對於毛澤東「扶王」的舉措，周恩來從一開始就顯得極為支持。十大紀錄片中，出現過周和王洪文互相謙讓、要對方走在前面的鏡頭。當周和王首次一道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時，周又將王推到自己前面。這種情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文革初期林彪成為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時，周恩來對林彪也是這麼做的。

至少從表面上看，十大之後，北京的政治運作似乎進入正常狀態，重心轉到了四屆人大的籌備上來。9月12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集中討論四屆人大籌備問題，決定成立組織、憲法修改、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等三個小組，在10月5日前完成各自的工作。會後，周恩來和王洪文在陪同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後，當面向毛彙報了政治局討論籌備四屆人大的情況。兩天後，周又向毛澤東呈送了關於四屆人大籌備各項工作的書面報告，毛圈閱了報告。[93]

六

就在這個當口，周恩來先前已被控制的病情又有變化。10月下旬的一個晚上，他在主持一次政治局會議前去衛生間，出現鮮紅的血尿，提示惡性腫瘤再次復發。吳階平和幾十位專家多次討論，結論一致：必須手術治療。在手術方案被批准前，周恩來需要每週兩次輸血來補充大量流失的血液，[94] 他最需要的是休息治療。然而，周恩來處在政治漩渦中心，根本無法休息。11月中旬，基辛格又到中國來，這是他就任美國國務卿兼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後第一次訪華，周必須把精力集中到接待基辛格上來。

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一共同周恩來舉行了五次正式會談。表面上看，基辛格的訪問進行得相當順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會談涉及了同雙邊關係和亞太地區及全球局勢有關的一系列問題，並「在所有問題上都取得了積極的成果」。[95]

11月12日，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歷時2小時45分鐘，為毛同美國人會見中從未有過之紀錄。談話氣氛輕鬆，內容極為廣泛，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毛澤東向基辛格闡述自己的「一條線、一大片」的想法，並引申開去討論遏制蘇聯擴張的問題，還談到台灣問題、水門事件、中東局勢，甚至講起了「外交哲學問題」等等。毛講到水門事件時頗為不屑，表示搞不懂美國人為什麼居然會抓住這麼一件「屁事」大做文章。[96] 會見中，完全沒有涉及同中美軍事情報合作有關的問題；其中最為接近的，是基辛格對毛說：「我們同蘇聯的交道中，沒有什麼你們不知道的東西，你們可以指望將來也會如此。」毛說：「你們跟我們的看法差不多，就是蘇聯有可能要打中國。」基辛格隨後提到，蘇聯「要摧毀你們的核能力」。毛說：「但是我們的核能力比一個蒼蠅也大不了多少。」基辛格說：「我們認為，如果這種事情還是發生了，這會對我們所有人都產生嚴重後果，所以我們決心要反對。這是我們自己的決定，同中國沒有這方面的安排。」[97] 毛和基辛格對話時，周恩來沒有插話。

基辛格在京期間除正式會談外，周恩來還和他就「中美軍事合作」問題舉行過三次特別會談，第一次在基辛格到達北京當晚便舉行，表明了雙方對此事的重視。基辛格開門見山提到蘇聯曾幾次提出要與美國交換關於

中國的戰略情報，但美方拒絕。接着他談到，美國「不是出於無私，而是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要阻止蘇聯對中國的「大規模進攻」。他接着說：

> 現在，作為這些談話的結果，我已指示，在我們政府內做一些只有四五個人才知情的研究，以便搞清楚我們對這種威脅到底知道多少；從我們的知識出發，可以做些什麼來阻止它；以及我們可以用何種不讓人看出來的方法來(向中國)提供幫助——這是因為，我不認為我們雙方的任何一方希望發展一種正式的關係。這些應該是技術性質的。……對於如何改進你們力量的弱勢地位，以及如何延長預警時間，我們有些想法。我再重複一遍，做這件事時，要非常秘密，讓人看不出來。……我本人也可以在一個小範圍內向總理本人和他指定的助手談一談細節。這件事，不涉及回報或正式關係，而只是根據我們的經驗和一些經過整理的情報資料，而為你們提供的意見。[98]

以周恩來的閱歷，當然知道基辛格提出的問題極為重要，絕對屬於毛澤東所說的「大事」。

11月13日晚，基辛格同周恩來的正式會談結束後，又建議同周「單獨會談」。中方參加者除周恩來外，還有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翻譯唐聞生，以及一位軍事翻譯。[99] 基辛格說，他要談的是中蘇一旦發生戰爭，中美如何進行合作。他表示，美國可以以兩種方式提供幫助，第一種是「提供裝備和其他服務」，第二種是幫助中國建立早期預警能力，在遭到導彈攻擊時及時「獲得確切的警報」。基辛格說，他要談的是第二種幫助。

> 基：關於導彈發射，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衛星系統，可以提供預警。問題在於，如何將這一信息迅速地傳遞給你們。我們準備在我們的衛星和北京之間建立一條熱線，通過它，我們可以在幾分鐘內就將信息傳遞給你們。
>
> 周：通過衛星？
>
> 基：是的，信息先傳遞到華盛頓，再傳遞到北京。……如果你們知道襲擊正在到來，這將使你們轉移你們的轟炸機，如果可能的話，也轉移你們的導彈。為此，你們需要在北京和你們的基地之間有好的通訊設施。……我在想有什麼辦法，能建立一條到北京的熱線而不會引起注意。

周：關於你希望討論的這個特殊問題，我必須進行研究。明天早上你走之前，我會來看你並道別。[100]

這之後，周恩來做了什麼？一種相當流行的說法是，周立即趕到了毛澤東的住處，準備向毛彙報，但不巧的是毛吃過安眠藥後已經睡下，周不敢打擾毛，因而沒有當面向毛彙報。[101]

然而，作為「半個當事人」的章含之有另一種說法。據她回憶，周恩來和基辛格的會談結束後，她的丈夫、時任副外長的喬冠華問周是否有事情交辦。「總理說現在太急了，基辛格的問題要馬上答覆，要報告主席。」第二天早晨，周告訴喬：「基辛格提出來中美之間進行正式的軍事合作，美方用他們先進的衛星技術監視蘇聯在遠東地區的軍事活動；中美相互交換軍事情報。當時，總理告訴老喬，說毛主席同意了，現在就答覆基辛格。」[102] 這就是說，周其實是向毛做了彙報，並獲得了毛的指示。

11月14日早上，周恩來到賓館為基辛格送行。兩人先談了幾句日本問題。[103] 之後，他們屏退左右，只留下翻譯和速記。周告訴基辛格：「我們現在不談細節。…… 如果像你們設想的那樣，你們可以在提供預警上同我們合作，這在情報上是很大的幫助。當然，還有通訊系統問題。但這樣做時不能讓別人覺得我們是盟友。」基辛格表示同意。周接着說，雙方需要很好的、具體的磋商。基辛格此時強調：「我們絕沒有辦法秘密地建立一條熱線。」周表示理解。基辛格又說：「一旦這條線建立起來，我們可以讓它…… 派用場，同時對此保密。」

最後，周恩來說，他和基辛格所談涉及的「是一個十分具體和複雜的問題，所以我在同你們進一步協商前要對它進行研究」。雙方此後的協商，應在「具有權威的級別」進行。「除了你親自來以外，我們會通過聯絡處進行聯繫。就是這裏的布魯斯 (David Bruce) 大使和那裏的黃鎮大使。這件事，只能通過他和一個翻譯來做。」基辛格表示同意：「你們的大使只應該同我聯繫。因為那些知道這件事的人，並不知道我對你說了些什麼。還有，坦率地說 ——這你能理解 ——我只會在我們決定走出一步時，才把這一步告訴我的同事們，不會多說一句。這樣做，洩密的危險會減少到最小的程度。」周說：「是的。我們知道你能夠保密，但你這麼做時一定要非常嚴格。」基辛格答：「是的。」[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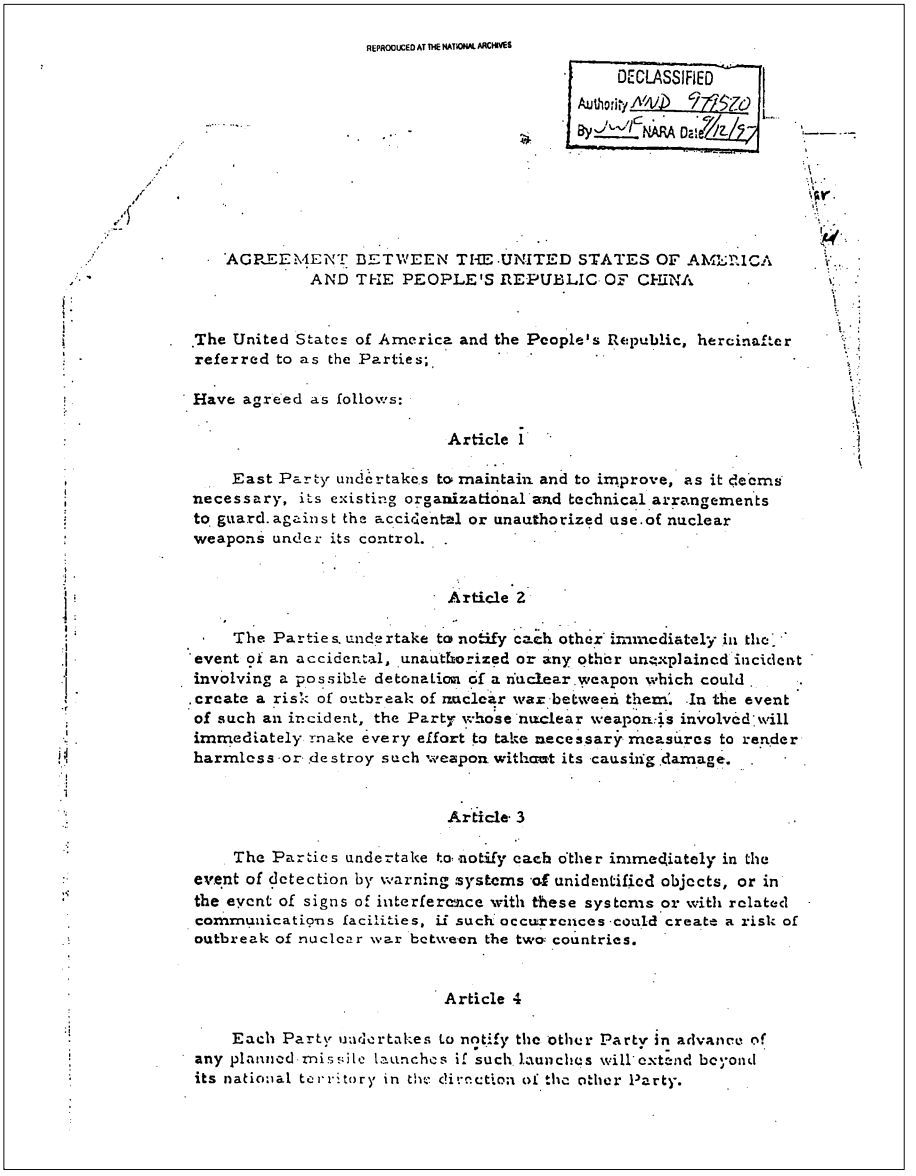
基辛格已準備了兩份協定草案，一份是關於「建立供兩國政府首腦在緊急情況下使用的直接通訊線路」，另一份是關於兩國間建立「熱線」，以防止「在意外或未經授權情況下使用兩國所持有的核武器」，以及「萬一發生此種意外時，雙方立即作出一切努力並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造成危害」。[105] 基辛格解釋說，這個協定同美國1972年與蘇聯簽訂的條約相似。他說：「我們只是需要有一個藉口，來簽定建立熱線的協定。」他把兩份草案都留給了周，說：「你們可以兩個都要，也可以把他們分開。……我們也準備在沒有協定的情況下直接建立熱線。」周恩來最後的回答極為謹慎：「我們必須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因為，考慮到我們國家的性質，如果我們採取這種行動的話，會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影響。……如果不太方便的話，這件事可以等。」[106]

基辛格走後，中方再無人向美方提及此事，這件事也不了了之。[107]

七

基辛格前腳剛走，北京後腳就出了「大事」。根據《周恩來年譜》等記載，毛澤東在聽了唐聞生和王海容的「不可靠的」彙報後「雷霆震怒」，認定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中「說了錯話」。[108] 11月17日，他與周恩來和外交部一班負責人及其他有關人員開會時，針對周恩來和基辛格的會談，說了一段聳人聽聞的話：「不要受美國人的騙。美國人向中國撈稻草，救它的命。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我看基本上一切不要，所謂基本上，就是不跟他搞什麼軍事同盟那一套。現在做生意買得也太多，我是點了頭的，罪魁禍首是我。這回勾結美國，罪魁禍首又是我。」[109] 毛又是在指桑罵槐，他口中「勾結美國」的「罪魁禍首」，除了周恩來還會是誰？毛澤東要求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他的意見。他的話，等於給「中美軍事合作」關上了大門。

毛澤東一旦發話，周恩來當然不敢怠慢，當晚便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的意見，並介紹了自己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江青當即發難，指責周恩來迴避實質，是「右傾投降主義」。周一反常態，拍案而起，爭辯道：「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



REPRODUCED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DECLASSIFIED
Authority NND 979570
By NARA Date 9/12/97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as follows:

Article 1

East Party undertakes to maintain and to improve, as it deems necessary, its existing organizational and technical arrangements to guard against the accidental or unauthorized use of nuclear weapons under its control.

Article 2

The Parties undertake to notify each other immediately in the event of an accidental, unauthorized or any other unexplained incident involving a possible detonation of a nuclear weapon which could create a risk of outbreak of nuclear war between them. In the event of such an incident, the Party whose nuclear weapon is involved will immediately make every effort to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to render harmless or destroy such weapon without its causing damage.

Article 3

The Parties undertake to notify each other immediately in the event of detection by warning systems of unidentified objects, or in the event of signs of interference with these systems or with related communications facilities, if such occurrences could create a risk of outbreak of nuclear wa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ticle 4

Each Party undertakes to notify the other Party in advance of any planned missile launches if such launches will extend beyond its national territory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other Party.

圖 29.4：基辛格在與周恩來一對一談話時攜帶的協定草案。（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

到我的頭上！」[110]第二天，周恩來兩次向毛澤東書面報告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但在檢討時只肯承認，自己在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111]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開會批評周恩來在同基辛格會談時所犯的嚴重錯誤；同時，毛澤東還把林彪事件後一直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元帥也拿出來「陪綁」，批判他在同美國國防部長會談時所犯的「右傾錯誤」。[112]

從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連續開會，展開了對周恩來上綱上線的全面批判，在會上打頭炮的是帶着「尚方寶劍」而來的唐聞生。據章含之回憶，這位當時剛滿30歲、新近才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的女翻譯，足足做了兩個多小時的發言。包括周恩來、葉劍英以及四人幫在內的政治局全體委員們，統統坐在下面洗耳恭聽。毛澤東批周時說得最重的話是：「蘇聯要是打進來，周恩來就是兒皇帝！美帝要是打進來，周恩來就是投降主義！」[113]這些話分量極重，把周徹底打倒也綽綽有餘。

之後，政治局委員們開始輪番向周恩來開炮，批判他在同基辛格的會談中「喪權辱國」，走「右傾投降主義」的路子。章含之作為毛澤東點名的「後排議員」，也列席會議。據她回憶，出席會議的中共高官們爭相發言，對周亂扣帽子，橫加指責。[114]江青和姚文元在發言中將周恩來的問題上升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說他就是「錯誤路線的頭子」。[115]這時，周「完全垮了」，「身體非常不好，精神完全不行了，鬍子也不刮了」。[116]

對周恩來來說，這一切是「無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自延安整風起，他就給自己和下屬立下了「多做工作、經常檢討」的規矩，在受到批判時，一直採取全盤接受、再竭盡委曲求全之能事作自我批評的做法。然而，這一次面對「喪權辱國」的指責，他卻一反以往，拒不接受指控，也不肯按這個調子作檢討或自我批判，而只是反覆強調「我不是投降派」，或者索性「什麼話都不說了」。[117]結果，在沒有得到毛澤東的進一步指示之前，與會者只能不斷重複周是「投降派」的指責，而會議竟然到了不知如何開下去的地步。毛指示會議擴大，讓章含之等一批「後排議員」參加，加強「批周」的火力。

周恩來的治療也受到了嚴重影響。有時他正在輸血，但到了開會的時間，也只能拔下針頭去參加。[118]

就在會議陷於僵局時，剛剛復出並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列席會議的鄧小平發言了。本來，毛澤東讓鄧小平再次出山，就帶有制衡周恩來的用意。而他讓鄧小平出席此次批周的會議，也帶有藉此觀察鄧的立場和態度的意圖。鄧小平「久經滄海難為水」，又有過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經歷，對於毛的意圖焉能體察不到？他在會上一直沒有說話，實際上是在觀察情形，熟悉情況，以便尋找最有利的開口批周的時機，既不能打倒周，又要在毛那裏可以過關。就在這一關鍵時刻，唐聞聲、王海容向鄧小平通風報信，將毛澤東既要狠狠地整一整周恩來、但又不打算打倒他的「底牌」交給了鄧小平。[119] 鄧知道，到了他講話的時候了。

鄧小平發言時，對國際局勢發表了一通看法後，沒有糾纏在「喪權辱國」這一「滔天罪名」上，而是抓住周恩來未及時向毛澤東報告的事由，說「總理表現出來的是外交路線上的錯誤，但你的核心是對待毛主席的態度」。鄧又對着周講了一段話：

> 恩來同志，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我們在座的所有人都認為，我們對毛主席是可學而不可及的；你這次的錯誤在於，你內心認為，毛主席不只是可學的，而且是可及的。這就是你的問題癥結之所在。[120]

毛澤東批周，開始時同時具有路線和態度上的涵義。經鄧講這一番話後，變成了純粹的態度問題。

鄧小平對周恩來的批判，被《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稱之為「誅心之論」。這一看法恐怕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處。鄧說周有着「取毛而代之」的心理，表面上看是極為嚴重的問題，但實際上並不至於置周恩來於死地。說到底，誰不會想到毛澤東百年之後，周若還活着的話便有着「取而代之」的可能性，這並不一定是非分之想，從道理上來說，也是為黨章和黨內實踐所允許的。鄧小平發言後，江青等人拼命地跟進，將「迫不及待」地想要「取而代之」的帽子扣到周恩來的頭上，意思是周要在毛還健在時便準備「搶班奪權」，但這並不是鄧小平的本意，也絕不為周所接受。後來，就連毛本人也對此予以否定。[121]「喪權辱國」的罪名就不同了。在愛

國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早已成為中共及其國家合法性敘述根基的背景下，誰要是被確認為從事「喪權辱國」的勾當，那就只有落得像林彪那樣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了。

周恩來對於這裏的分寸和區別是很清楚的。鄧小平發言後，他開始作自我批評，於12月4日做了一個「上綱很高」的檢討，「內容就是他們要的那些東西」。[122] 當毛澤東得到唐聞生、王海容兩人關於鄧小平發言的報告後，顯得極為滿意，表示「我早就知道他會發言的」，並稱讚鄧在政治上就是比江青等人要技高一籌。毛一時興起，甚至問誰知道鄧小平的住處，要馬上把他找來，只是當時已屆深夜，又一時沒有地址，才沒有這麼做。[123]

八

隨着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繳械」，他似乎已經走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盡頭。據當時在場的周恩來衛士的觀察，每天的政治局會議上以及會議前後，周都顯得極為孤獨，進出會場時，居然沒有人同他打招呼，以示同他「劃清界線」。[124]

就在周恩來似乎已處於被打倒邊緣的時刻，幾乎一夜之間風向轉了，毛澤東突然收起了批周的利劍。12月9日，毛澤東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和王后，周恩來也出場作陪。據會見記錄記載，毛澤東在見到周恩來時，同他「長時間熱烈握手」，然後又指着一同參加會見的唐聞生、王海容等對周恩來說，「總理啊！現在的小將不好惹呢。把他們提起來，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125] 幾句話裏，毛澤東不僅表達了前一陣政治局如此「整周」似乎並非他的初衷，實際上也為「批周」踩了剎車。

會見後，毛澤東同周恩來和王洪文等談話時，便開宗明義為持續了十多天的批周會議定調子。他一方面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也就是說，「批周」這件事的大方向還是對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說：「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要取而代之），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這幾句話，一下子便將周的問題歸結為「人民內部矛盾」，使得周被解脫了出來。從周的角度來看，毛通過「批周」所要傳達的信息，他

毛主席五次讲话

（曾政要传达）

十二月十二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说，我和刘兴同志提议，要邓小平同志为军委之员，是不是也当政治局委员，以后报二中全会追认（经政治局同志一致同意为政治局委员，已发出通知邓照办曾）（曾传达中央文件）。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抓不起纲来。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军委要开个会，我主张各大军区司令员来，议什么？要议军。我提议要议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毛主席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统一调整一致，不一致就不行。主席提议陈锡联当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刚沈阳去）许

15×20=300

第 1 页

圖 29.5：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73 年 12 月 12 日。（瀋陽市檔案館）

已經得到了。第一，處於主宰地位、大權在握的仍然是毛澤東；第二，周恩來必須時時處處小心謹慎，任何時候都不能有超越毛的表現，或造成超越毛的印象。[126]

其實，在毛澤東那裏，事情還沒有完。12月12日至21日，他連續五次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並五次親自指揮與會者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12月12日和13日的兩次會議上，他「乾綱獨斷」，宣佈要對各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動」。同時，他又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提出「軍委要開起會來，軍委要議軍，政治局要議政」，還補充一句：「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而且要議政」。毛還不點名地警告周（主持政治局會議）、葉（主持軍委會議）兩人：「你們不改，我就要開會，到這裏來。我毫無辦法，我無非是開個會，跟你們吹一吹，當面講，在政治局。」[127] 在12月15日的會上，毛當着幾個被招來開會的大軍區司令的面，引申開去，講了一大段聳人聽聞的話：「我還可以打幾仗哩。要打就打麼！天下大亂，包括中國麼！我能吃飯，也能睡覺，所以要打，我最歡迎了。……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幾仗。……一打起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話中有話，隱約間矛頭又指向了周。在12月21日政治局接見參加軍委會議的全體成員時，毛警告道：「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128]

大風暴過後，周恩來又回到了政治局會議主持人的位置。1973年12月22日，他根據毛澤東的意思，起草了中央通知：「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129] 1974年1月18日，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軍委的運作問題，決定向毛提議在軍委內成立一個五人小組，由葉劍英牽頭，有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參加，「討論處理軍委的大事及緊急作戰事項」。兩天後，周和王洪文聯名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又加上了蘇振華，變為六人小組，「大事視情況或直報主席或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後再報主席」。毛澤東表示同意。[130]

雨過並未天晴。此後，毛澤東又幾次提起這件發生在周恩來和基辛格之間的事情。直到1974年底，毛在一次同鄧小平的談話中，談到周恩來和基辛格1973年11月的會談時，又翻出這個舊帳說：「就是保護傘，借一個保護傘給我們。」[131] 這就是說，在毛澤東看來，這件事其實還擱在那裏，在必要時，這個舊帳是可以重新被翻出來的。

第30章

最後的日子
（1974–1976）

一

1974年春天，周恩來的身體狀況又響起了新的警報。3月初，他突然開始大量便血，每天達到一百多毫升。3月8日，他寫信給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要求「通過膀胱鏡進行電灼或者電切除」，如發現病情變化，需要動手術，「則此次不考慮，以後再議」。[1] 3月11日起，他連續幾天到北海公園西側的解放軍三零五醫院做全面檢查。報告出來後，醫生們面面相覷：周恩來的癌症復發且有擴散。他們為他做了電灼治療，然而效果不理想，病情並未獲得控制，「腫瘤發展快，迅速增長，潰爛，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裏蓄積了大量的血液病凝成血塊，堵住了尿道內口，致使排尿發生嚴重困難」；[2] 到5月上旬，又「發現脫落的膀胱乳頭狀組織塊」，這是惡性腫瘤持續轉移的信號。[3]

6月1日午後，周恩來來到辦公室，親自將文件分類歸檔，又對周圍的一切仔細檢視一遍。然後，他在鄧穎超的陪同下，離開居住並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廳，入住與中南海僅一街之隔的三零五醫院。[4] 直至一年多後辭世，他再也沒有回到西花廳的家中居住。

周恩來入院的當天，醫生便為他做了膀胱癌切除手術。這一次同先前的各次治療不同，是一次破腹手術。當時看來，手術效果較好，刀口很快癒合，血尿也消失了。[5] 但是好景不長，癌症不久又復發了。8月10日，醫生又為周恩來做了一次膀胱癌切除手術，[6] 但術後病情仍無好轉。

周恩來是明白之人。他和醫生們都知道，他大概是再也走不出醫院了。

周恩來身在病房，卻並未離開中國高層政治決策的核心圈子。儘管重病在身，政治局會議仍然由他主持。他的病房也常常「門庭若市」，不斷有人來訪。但他心裏很明白，自己所扮演的其實只是權力結構轉變時期的一個過渡性角色。

1974年元旦剛過，一場讓人一時間摸不着頭腦的「批林批孔運動」開始橫掃中國城鄉。本來，林彪事件後，「批林」已成為中國政治話語的中心和當紅詞彙。到了1974年，怎麼「批林」之外又冒出了個「批孔」？不要說一般民眾，即便是周恩來也未必一下子能夠說清原委。

此事的肇始，是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和江青的一次談話。毛講到：中國歷史上，「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7] 江青第二天就在政治局會議上轉述了毛的話，並要求寫入十大政治報告。對周恩來來說，此事來得突然。他一時搞不清楚毛為什麼說這些話。直覺應該告訴他，此事不簡單。周採取緩兵之計，回應江青：「對毛澤東的話需要一段時間消化，不必馬上公佈。」[8]

十大開過後，姚文元控制下的報刊上出現了一連串批孔的文章。接着，10月24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又發出了〈關於在部隊中批孔子〉的意見。這時，北大、清華的一批教師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清理林彪住宅時，發現了不少關於林彪尊孔的證物，尤其是林手書的「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的條幅。毛進一步指示，要以「克己復禮」為中心，把林彪與孔子掛起來批判。[9] 從毛的角度說，這正好說明林彪企圖「復古」，因而在政治上屬於極右。這樣，「批林」和「批孔」開始連接起來。

毛澤東之所以推出批林批孔，應是有着他的大設想的。林彪事件後，文革走上沒落之路，不得不走向終結，但毛又不甘心讓文革就這麼結束。通過批林批孔構建一種「革命仍在繼續」的氛圍，同時建立某種以鄧小平為軸心的、向後文革時期過渡的權力架構，就是毛的應對招數。從組織上說，要讓這兩者聯繫起來，就要讓鄧小平和四人幫在政治上聯手。由此決定，批林批孔同文革初期評《海瑞罷官》那齣戲有相似之處，都是造輿論、

造政治氛圍。但兩者也有很大的不同：評《海瑞罷官》是文革的開場戲，批林批孔則是文革的收場戲，是為收兵而「鳴金」。這一點，江青沒有搞清楚，或是不願意搞清楚。

197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講的就是批林批孔。周恩來不肯匆忙寫進十大政治報告的毛澤東的那些話，僅僅幾個月間，成為一號文件的中心意思。[10] 1月25日，江青未經過政治局討論，事先也不同周商量，就召開了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機關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並讓周主持會議。對此，周心中當然不快，但還是答應了。江青在會上的表現極為亢奮，擺出了一副整人的面孔，一個個地點名；說到興起處，又抓住在座的葉劍英元帥親屬的行為，批葉的「走後門」問題。[11] 周恩來坐在主席台上，看着江青的過頭表現，仍然不動聲色，也不同她正面對峙。[12] 周這麼做，是因為他知道這件事其實是毛澤東要做的。

中聯部部長耿飈在會上遭到了點名批判，會後又繼續受到衝擊，部內甚至出現了「打倒耿飈」的口號。耿找到周恩來訴苦。周說：「我送你三句話：人家打你，不論怎麼打，你不要倒！趕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13] 這些話，實際上也透露出了周自己面對類似情形時的因應之道。

然而，江青已經把毛澤東的經唸歪了。本來，毛是想把批林批孔當作一件關係到政治路線的大事來做，江青卻把它同反對「走後門」之類的「小問題」放在一起來搞，讓毛難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將路線問題和組織問題結合起來一道處理。毛對此極不滿意：「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着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14] 幾天後，毛澤東又寫信給江青：「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15] 這是毛後來批評「四人幫」的一個由頭。

但是，毛澤東沒有當面對江青說清自己的想法。這時的毛，實在已是孤家寡人。江青雖然身為毛的夫人，也不輕易見到毛，要見的話，必須經過汪東興，或者經過仍然擔任毛澤東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王海容和唐聞生。

2月初，周恩來兩次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批林批孔運動的開展。之後，他給毛澤東寫報告，一面表示批林批孔極為重要，一面提出要為這場運動積累經驗，[16] 言下之意是不能使運動「過火」或失控。這是周摸準毛的

心思後做的。他知道，這一次毛要的是在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造成一種「繼續革命」的氛圍，而不是又一次把天下搞得大亂。對周恩來的報告，毛澤東「圈閱」表示同意，再無其他的批示。[17]

二

毛澤東在佈下批林批孔這張營造「繼續革命」政治氛圍的「大網」後，又着手處理組織問題。3月間，發生了另一件大事：由鄧小平率團出席4月在紐約召開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這件事，從一開始就是毛的意思。自1973年初鄧小平復出以來，毛觀察了他一年多。同時，毛也在觀察十大後被推上中央副主席位置的王洪文。幾個月後，毛已感到王不行、「太嫩了」，不僅缺乏資歷，更沒有作為黨和國家一把手的魄力和能力。在1973年12月政治局「批周」會議上，毛澤東又考察了鄧小平一把，鄧的表現令他滿意，他開始做出讓鄧在中央權力結構中更上一層樓的部署。由鄧小平率團出訪，就是這方面走出的另一步。

當時，也是毛澤東正式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的時候。中美關係解凍後，國際環境大變，毛覺得有必要提出關於世界格局的一種新的理論框架，不僅以此對中國對外政策的變化作出解釋，也為他在國內不斷失去原動力的「繼續革命」帶來合法性。1974年2月22日，毛對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說：

> 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富；但是比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8]

幾天後，他又在會見阿爾及利亞領導人布邁丁時說：「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只能跟一些比較窮的國家在一起。」[19]

其實，早在1940年代後期，毛澤東就提出過獨特的「中間地帶」論，認為在戰後國際政治版圖中，存在着一個不受到美蘇兩大國中任何一國所控制的「中間地帶」，並將中國視為中間地帶的一員。[20] 到1960年代，他又在原先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論，已有「三個世界」論的雛形。[21] 1970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門城樓上和緬甸共產黨副主席德欽巴登頂談話時說，「我們對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一般不罵或少罵，要爭取他們，如英國、法國、西德等，這對我們有利，他們是第二中間勢力」；又說，「第一中間勢力是第三世界，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22] 毛雖然仍在用「兩個中間地帶(勢力)」這個說法，但他又把「第一中間勢力」和「第三世界」等同起來。「三個世界」的提法在他那裏已呼之欲出。

毛澤東在1973、1974年提出的「三個世界」論，同他先前的提法有一個大不同：用於劃分「三個世界」的基本標準，是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的程度和水平，而不是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及社會制度之間的競爭和對抗；這裏關鍵詞已經不是「革命」，而是「發展」了。說到底，這是毛對自己「繼續革命」的宏大事業所面臨的日益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的因應之道。自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宣佈「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之時起，使得中國強盛起來並「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就是毛「革命後革命」的一個重要的合法性支撐點。林彪事件後，在毛澤東「繼續革命」再也喚不起人們發出內心的支持和響應時，他提出了以「發展」為主導的三個世界論，除了為中美關係解凍後的外交政策提供解釋外，還包含着另一層深意：這也是向中國人民強調，中國仍然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扮演着中心角色，並以此維護「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合法性宣示。

從毛澤東的角度看，到聯大這樣的場合宣講他的三個世界論，是件大事。本來，最好的人選應當是周恩來，但周病重，去不了。(即使他能去，毛是否就一定會讓他去？)那麼，還有誰比鄧小平更合適？除了鄧這樣級別的人物復出，並在國際舞台上亮相必定會產生的轟動效應外，這也是同當時毛在政治上「捧鄧」的意圖相吻合的。

毛澤東先通過王海容和唐聞生讓外交部寫報告，並把要鄧出馬的意思「寫入送審報告待批」，但又不說這是他的意思。[23] 這件事，毛做得這麼神秘，也許是想看周恩來的反應。周本來就是支持鄧出山的。3月24

日，他看到王海容轉送來的外交部建議由鄧小平率團出席特別聯大的報告後，當即批示「同意這一方案」。[24] 他還特別提出：因「洪文同志忙於指導批林批孔運動，需小平同志在軍委助理，我意，聯大特別會議開三週，小平同志可只出席第一週」。[25] 隨後，周恩來將報告送毛澤東及政治局傳閱。

不料，當政治局討論此事時，江青卻表示反對，並找到王海容，要外交部收回報告。[26] 看到事情搞成這個樣子，毛澤東讓王和唐聞生轉告周恩來：「鄧小平出席聯大，是我的意見，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27] 3月26日，周恩來再次主持政治局開會，傳達毛的意見並討論這件事。政治局多數成員贊成由鄧出任團長，但江青卻仍持「保留意見」。[28] 第二天，唐、王兩人經周授意後，就此向毛做了報告。當天，毛給江青寫了一封短信：「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這是明明白白地向江青「交底」了。當晚，周又主持中央政治局開會，江青這才對由鄧率團參加聯大會議表示同意。會後，周立即向毛報告：「大家一致同意主席關於小平同志出國並參加特別聯大的決定。小平同志已於二十七日起減少國內工作，開始準備出國工作。」[29]

4月2日和3日兩天，政治局連續開會，討論修訂並最後批准鄧小平在特別聯大的發言稿，當中的重點是毛澤東新近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大概心中不快，一起請病假，未參加會議。[30] 4月4日，毛親自出馬，把周恩來、王洪文、江青、葉劍英、鄧小平、喬冠華等召到中南海游泳池開會。毛一開始就發牢騷：我講話不行了，不大清楚。談到鄧小平出席聯大，毛要喬冠華做他的參謀長。講到國內，毛說：「批林，這個行，批孔，就很難了。」[31] 同一天，毛澤東批示同意了鄧小平在聯大的講話稿。[32] 4月6日，周恩來親自到機場，為鄧小平送行。

4月10日，鄧小平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分在聯合國特別會議上發言，闡述了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強調第三世界是由亞、非、拉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所組成的。[33] 這果然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鄧本人在國際上的聲望以及在普通中國老百姓中的形象和影響，也大大加強。

鄧小平回到北京後，給周恩來送去了幾個法國牛角麵包。這是他們當年在法國留學最喜歡吃的，那已是半個世紀前的事了。

三

周恩來入住三零五醫院後不久，毛澤東的身體狀況也亮起了警報。自1972年初那次發病後，毛的健康就每況愈下。到1974年6月中旬，又有新的症狀：舌頭不靈，說話不清，口唇不能閉攏，手腳無力，手掌和小腿肌肉明顯萎縮。中央調集包括心血管內科、神經內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科、外科、重症護理等各方專家，組成專門的醫療組進行會診。醫生們懷疑毛患帕金森症已有好幾年了，但這一次經他們會診，發現毛得的病更為複雜刁鑽，是一種運動神經元症，控制他說話、呼吸和手腳運動的神經細胞出了毛病，逐漸變質死亡。[34] 一般來說，這種病確診後，預後不會超過兩年。醫生們和毛本人知道，死亡離他已越來越近。毛澤東自己也常說一句話：「閻王請我吃燒酒。」[35]

這一來，毛澤東為身後搭班子的事情變得更為緊迫。他終於說出了要為文革收場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36] 這段話，中共中央後來正式向全黨全國傳達。從現實政治的層面看，按照毛的設想，作為「結束文革」整個政治佈局的一部分，也是自己「身後安排」的一部分，他最想做成的是以已經同意「改過自新」的鄧小平為軸心(但不一定是核心)，結合文革派，建立起一種能夠包括並平衡黨內上層各派力量的權力架構。

但幾個月來，毛澤東看到的卻是江青根本不理解他的苦衷，也搞不清他的想法。毛當然知道，江青等人是最堅決、也最無保留地要按他的「革命路線」辦事的；在黨內最高層，他真正能夠全然信任的，恐怕只有江青這幾個人，畢竟江青的政治地位與權力全部來自於她作為毛夫人的身分，所以他們絕不會背叛他。然而，從政治才幹、謀略與個性來說，江青城府不深，有時又太過張揚，每每有令他失望的舉動。江青的做法不僅把批林批孔所要強調的大問題引到岔道上去，也使得政治局內的力量對比出現了不利於「文革派」的變化。

毛澤東這時準備到南方休養。7月17日，也就是他離開北京的前一天，他在中南海游泳池自己的住所主持政治局會議。他對江青等提出批評：「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

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37]這樣的話，毛後來又幾次重複。「四人幫」這個名號，就是毛那裏出來的，不然別人還不好這麼說。

毛澤東講這些話，顯然並不是他對江青等人在政治上的否定。在黨內鬥爭中，毛喜歡給人扣帽子，並總是把帽子同某種主義（修正主義、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經驗主義等等）掛起鈎來。但這一次，他沒有給江青等人扣上任何一頂這樣的帽子。據他說，他們的主要問題是和別人搞不好團結。毛在會上又說：「對她（江青）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38]毛批評江青，着眼點不是路線問題，而是她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問題。毛所希望看到的，是要創造一種鄧小平和「四人幫」攜手的基礎和氛圍，建立一個由鄧小平和江青等人合作、向他身後過渡的權力架構。但江青等人對毛的構想和部署卻看不清楚，在政治上更不懂「團結大多數」的重要性；在批林批孔上，也抓不到「要害」，每每有讓人貽笑大方的舉動，搞得毛沒有辦法，只能親自出馬，壓他們一下。毛的話中，有着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憂慮和感嘆。

開會時，周恩來也在場，毛澤東的這些話，他都親耳聽到了。但他更注意的，應該是毛講的另一句話：九篇文章我不要了，燒了（但實際上並沒有燒掉）。周知道，這句話是講給他聽的。這九篇文章是毛在延安整風時寫的，有兩篇是專門批判周的。據胡喬木回憶，「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細看了一遍，並將其中有關稱讚少奇同志的內容全部刪掉，打算印發中央委員，但後來只發給部分政治局委員看過」。[39]毛在這個時候重新翻出這幾篇文章，又拿到政治局會議上，當着周的面說此事，本身就是對周的又一次「敲打」。

毛澤東推動鄧小平出山的同時，批林批孔運動仍在大張旗鼓地推進。6月中旬，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梁效寫作班子成員開會，江青說：「現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現代的儒，除了林彪、陳伯達以外，難道現在沒有儒了嗎？」[40]這些話或隱或現之間，將矛頭指向周恩來。這件事上，毛自始至終都是支持的。不管他在組織上有何動作，這個路線和思想上的大氣氛，他還是要繼續營造的。

197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5週年，屬於大慶之年。9月30日，周恩來以國務院總理的身分，生平最後一次主持國慶招待會，並發表講話。當他走入人民大會堂宏大的宴會廳時，全場起立，人們向他歡呼，掌聲竟持續了十幾分鐘。此時，很多人已經知道他身患絕症，看到他形容枯悴的樣子，不禁潸然淚下。當周身上的癌細胞正不斷吞噬着他的生命時，他在中國人心中的聲望和威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毛澤東沒有出席招待會，但他會聽到彙報。他不見得會為此感到高興。

此後，中國高層政治的中心內容轉到了關於四屆人大的策劃及相關的政府人事安排問題上來。這是權力結構轉移的又一步，其中心則是由誰來組閣、怎樣組閣。

毛澤東既然已確定讓鄧小平站到政治舞台中心來，在這件事上自然也有相應的考慮。10月4日，毛指示工作人員打電話給王洪文，要他向政治局傳達：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41] 這是毛為建立以鄧為軸心的中央權力架構的又一重要步驟。通過王洪文、而不是周恩來或其他人來傳達這個看法，意思就是要江青他們不要反對。

但江青等人卻對這一點看不懂、看不透；或者是雖然看懂了，還是覺得非要爭一下不可。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開會，江青與鄧小平發生了衝突。江青試圖抓住鄧的幾根辮子，向他發難，不料鄧根本不買帳，反而和江青對着幹。[42] 他敢於如此同江青等人當面頂撞，應當同周恩來在張春橋「有嚴重歷史問題」一事上對他的交底是分不開的。同時，這也是因為他自以為得到了毛澤東的全面支持。

第二天，王洪文飛到長沙，向在那裏休養的毛澤東告狀，結果卻在毛那裏碰了個釘子。毛要王不要總是和江青搞在一起，「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也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志談」。[43] 毛固然是在批評王洪文，同時也是在為他「出招」。

鄧小平的背後還有着周恩來的支持。這不僅是因為周的理念和他相近相通，更因為周憑着自己的政治經驗和敏感看得出，這是他可以支持鄧的時候。10月19日下午，周在醫院同華國鋒、紀登奎、李先念、鄧小平談話，了解兩天前政治局會議的情況。[44] 當晚，他對即將陪同鄧小平去長沙見

毛澤東的王海容、唐聞生說：他們計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耐了很久了。[45] 周這個話，不僅是說給王、唐聽到，更是說給毛澤東聽的。

果不其然，王海容、唐聞生到長沙後，把周恩來的話傳給了毛澤東。第二天，毛在會見來中國訪問的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Poul Hartling)後，又和鄧小平談話。講到組閣和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毛對鄧說：我不發表意見，你們去議吧。簡單明瞭。法國派好。然後，毛又對唐、王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如果他身體還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商量，提出一個人事安排的名單。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總之，方針要團結，要安定。」[46]

毛澤東的話，也是對周恩來通過王、唐給他傳話的「回話」。王、唐一回到北京，就趕到醫院，把毛的話轉達給周。[47] 毛既然發話了，周恩來、鄧小平便抓住這個機會去做，在整個11月間加緊了組閣的行動。

11月29日，周恩來收到解放軍三零五醫院送來的報告，彭德懷因患直腸癌，手術後未能控制發展，轉為肺癌晚期，於當日下午2時52分去世。[48] 之後，中央專案辦公室報告並提議，「將其化名王川，屍體火化後，骨灰存放成都市一般公墓」。王洪文隨即批示，「照報告上所提辦法辦」。[49] 周恩來卻發出了一道頗令人尋味的特別指示，對彭的骨灰「要精心保管，時常檢查，不准換盒，也不准轉移地方，以免找時弄錯」。[50] 周何以會這麼做？當時，在毛的治下，彭案早已成為鐵板釘釘的死案，絕無推倒重來的可能。難道周此刻已經想到，在毛百年之後，彭仍有「翻案」之可能？若彭案如此，那麼毛做的諸如此類的其他大事、搞的其他大案又會發生怎樣的變故呢？從這件事上可以窺見的，難道不正是周藏於內心深處的、關於「毛之後」的某種願景和想像嗎？只是，他恐怕也清楚知道自己已病入膏肓，多半是不能活着看到那一天了。

四

從11月下旬起，葉劍英就不斷問醫生，周恩來能否離開北京，並和醫生商量制定周外出時的保護醫療方案。[51] 12月下旬，四屆人大的人事安

排已到了敲定的時候。周臨時離開醫院，乘專機飛往長沙同毛澤東會面，敲定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

周恩來此行，其實也是代表着當時已在政治局裏與「四人幫」逐步形成對峙之勢的鄧小平而去的。他特地跑這麼一趟，當然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招他去，但同時也表明他對於當時的政治局勢以及毛的意向已有大致判斷，看清了毛要進一步重用鄧小平的意圖。周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恐怕不長了。若要在自己以及毛百年之後保住一世英名，對他來說又有誰是比鄧更為合適的人選？(只是，當時周恩來恐怕沒有想到，鄧小平後來又會再次受到整肅，毛最後作出選擇華國鋒為繼任者的決定。)總之，周恩來的長沙之行，是在他對此已很有把握的情況下付諸實施的。

果然，周恩來的判斷很快便證明是相當準確的。12月23日，就在他飛往長沙的同一天，王洪文也飛抵。當晚7時，周、王一起見毛，毛當即要他們「留三天談談」，之後同他們談了兩個小時。第二天，毛又說，「你們留在這裏談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毛關照，「你們還可再留兩天」。27日，毛對周說，「現在沒有什麼要談的了」。周恩來後來親自整理並寫出了「談話要點」，準備向政治局傳達。周首先記下的，是毛對他和王洪文說：「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在批劉批林運動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來就好。」(周特地記道，「洪文同志有回答，我與洪文同志談了話」。)關於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毛顯然已成竹在胸。他指示，「人大常委委員長提朱德，副委員長董老、宋慶齡列前兩名」外，「可以多些人，國務院副總理要能辦事的，不是榮譽職」；又再次明確指示，「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並誇獎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除擔任先前已定下的第一副總理外，還確定由鄧出任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以及軍隊總參謀長。毛還特地關照周：「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後，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志去頂。」與此同時，毛又「欽定」由毫無軍隊經歷的張春橋出任第二副總理，兼任軍隊總政治部主任。[52] 這裏透露出來的，仍然是毛在政治上的平衡之道。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81歲生日。27日凌晨3時，周恩來來到毛的住所，兩人獨處，徹夜長談。毛肯定了周的組閣安排，還說：「要

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同時，他又對周大講了一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說，「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但還存在着「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等「資產階級法權」，「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53] 毛對周講這些話，並讓他回去傳達，頗具深意。後來，正是從這裏引出去，揭開了毛生命最後一年裏最為重要的一頁：這第一次的文革雖然要結束了，但根據他的理論，今後「七八年來一次」，還要搞多次。周抓住機會向毛提起：據康生說，江青和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毛聽後沒有追問，更沒有反駁，只說了三個字：「知道了。」但從周恩來逝世後、毛出人意料地讓華國鋒接班的「身後安排」來看，周的話他聽進去了。這也許是周此番長沙之行最為重要、也將對毛之後中國政治發展影響最為深遠的收穫。[54]

周恩來的長沙之行以及他和毛澤東的談話，恐怕更反映出了毛晚年所面臨的一個始終存在、但無法解決的悖論：一方面，他絕不放心把權力以及自己所開創的「革命宏業」交到周恩來的手裏；但另一方面，要使他自己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運作下去，又離不開周恩來。實際上，毛在1974年底的做法表明，他知道要收拾文革殘局，周恩來不可或缺。從另一個意義上說，這其實也是周恩來已經人格化和機制化的行政權力的大網，把毛澤東和他那似乎是無限的政治權力給「網住了」的表現。

五

周恩來從長沙回到北京後，身體已極度虛弱，但他卻無法休息。他仍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生命留給的他時間卻越來越少了。12月28日，他回到北京後的第二天便支撐着病體，召集了由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鄧小平等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傳達自己在長沙與毛澤東幾次會面談話的內容，着重講了已獲得毛批准的關於四屆人大的高層人事安排。面對這樣明確的「最高指示」，眾人自然不會提出什麼異議。[55]

12月29日，周恩來又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向與會者傳達毛談話的內容，以及他和毛擬定的四屆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以及國務院副總理的名單，與會者又是「一致批准」。周還在會上傳達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

示：主席要說的是，革命還沒有結束。[56]此刻，不知周心中是否會想起一年前的情景：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因「右傾投降」罪名而遭到了全面批判「圍剿」。但現在，他卻坐在代表毛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位置上。他當然知道，這一切都取決於毛的「一念之變」。更何況，他自知病入膏肓，來日無多，大概是不會僅僅為自己地位的改善而生出欣喜之情的。

1975年1月1日，對周恩來來說是漫長的一天。下午，李先念來到他的病房，談話兩小時。接着，鄧小平又來了，周和他密談35分鐘。[57]隨後，周和鄧一起離開醫院，前往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從7時25分開始，一直到11時20分才結束。根據毛、周長沙會談的決策，會上最後敲定了國務院各部委的人事安排。周繼續擔任總理，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在周病重的情況下，這意味着鄧將承擔總理的大部分責任)，張春橋則擔任第二副總理；其餘各部的位置，確定了「基本不動，個別調整」的原則。[58]會後，周恩來親自動筆，向毛澤東報告道：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會期將先後於1月上中旬舉行。周是小心之人，兩份報告，他都讓王洪文在報告上簽名後再送出。[59]在關於召開十屆二中全會給毛的請示中，他還特地加了一句：「在全會結束時講一下1974年批林批孔沒有搞好等，做自我批評。」毛澤東讓王海容、唐聞生轉告周：「不要講。」[60]

幾天後，周恩來又主持了十屆二中全會。在一番「走過場」的氛圍中，中央委員們通過了毛、周及政治局確定的四屆人大的組閣安排。同時，他們又從周那裏聽到，毛要他們關心理論問題，全黨、全國「還是安定團結為好」。[61]

1月13日晚，四屆人大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周恩來雖然已經病入膏肓，但仍堅持在會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據一位現場目擊者的記述：「周從主席台右側走出來，步履尚稱矯健但消瘦得很，病容滿面。代表們迅速起立，掌聲堪稱經久不息，周幾次招手請大家平靜下來。周開始作報告，五千多字的『報告』，他只唸了開頭的一二百字和結尾的近百字。在全體代表再次起立的一片熱烈掌聲中退出。」[62]在後來發表的報告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周重申了1964年三屆人大提出的分兩步走的設想：

> 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

> 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63]

當時的中國仍處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仍是中國政治話語和生活的主旋律。周恩來何以會重提「四個現代化」？這裏應該有着來自毛澤東的支持，不然周是絕不可能在四屆人大上發表這樣的講話的。同時，這裏也應該有着周恩來自己的信念，否則他在完全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的情況下，何必要用人生最後的力量，來發表這樣一篇講話呢？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



圖 30.1：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做政府工作報告，1975 年 1 月。（Imaginechina Ltd. / Alamy Stock Photo）

2月1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和由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出席的工作會議，確定由鄧小平「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批呈主要文件」。他在傳達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時，特地強調了毛對鄧「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的評價。在會上，周最後落實了關於政府工作的各項安排，這也是他生平最後一次主持這樣的會議。他身為國務院總理的工作，要交給鄧小平來承擔了。[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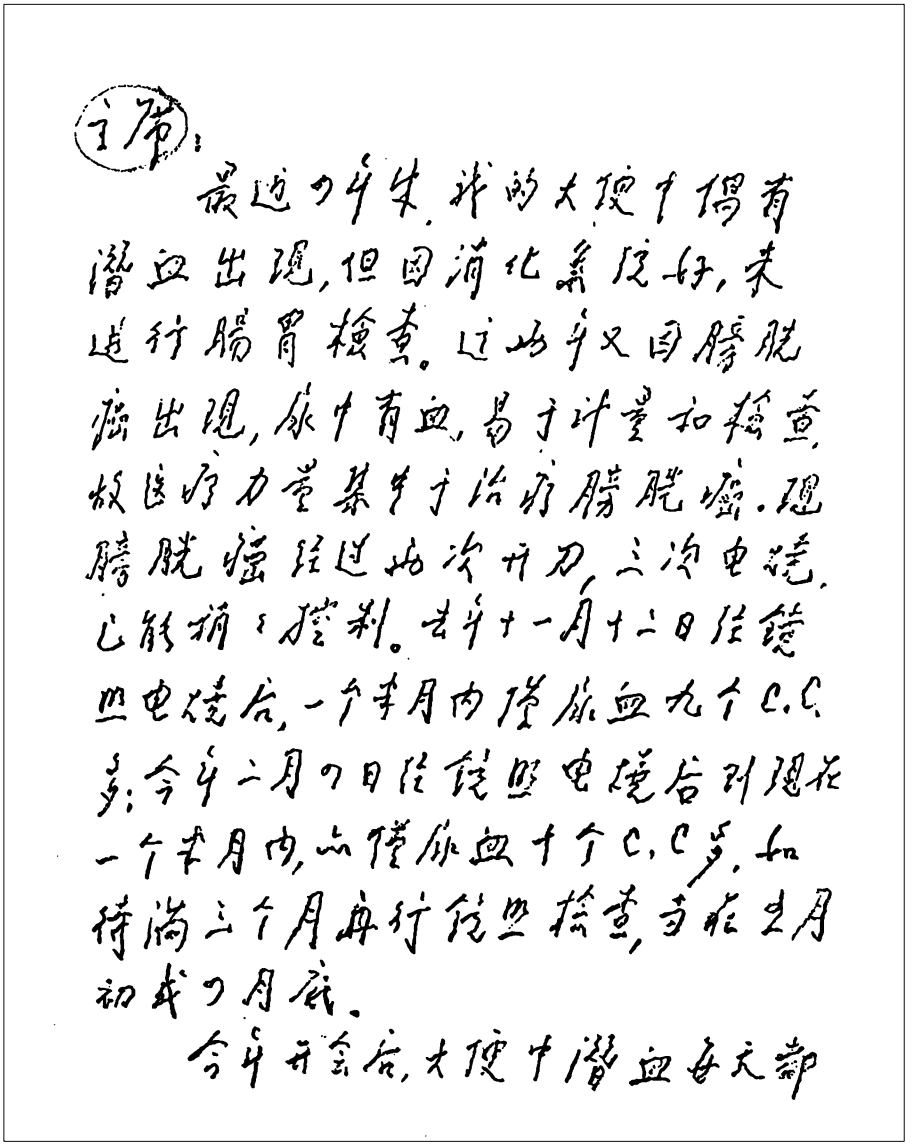
六

四屆人大開完後，周恩來了卻了一樁大心事。他的病情卻又有新的發展，大便檢查中出現隱血，經結腸鏡檢查，發現結腸處又生出腫瘤。切片化驗結果出來後，醫生們目瞪口呆。這不是周原先所患膀胱癌的轉移，而是一種新生的、更為惡質的鱗癌腫瘤。[65]醫生們面面相覷，他們知道從這一刻起，周恩來的生命真的進入倒計時狀態了。

2月2日凌晨3時，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詳細報告了自己的病情。[66]兩天後，經毛批准，他又做了一次手術，長達四小時，然而手術效果不彰。3月6日，醫生為周做腸胃檢查，「發現大腸內接近肝的部位有一核桃大腫瘤」。政治局常委四人小組討論後，決定讓周再次施行手術，此時離上一次大手術只剛剛過了一個月。[67]3月20日，周恩來支撐着病體，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情詞懇切的信，詳細報告他的「病情經過及歷史造因」，並以懷舊的口氣說明：「這一大腸內的腫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窩會議後得的肝膿瘍病在那裏穿腸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領導我們通過草地北上而活到現在的。」[68]他還特地在另一信中拜託毛的生活秘書張玉鳳，此信一定「要在主席休息好後再讀給主席。……千萬不要干擾主席太多！」[69]

3月26日，周恩來又一次做結腸癌手術，時間更長達8小時。手術沒有失敗，但也未能改善病況，他離死亡又近了一步。[70]

4月初，周恩來還沒有從手術中恢復過來，身邊人員告訴他，4月5日，蔣介石在台灣逝世，終年88歲。不知道周當時有何反應，或說過些什麼。他從青年時起就和蔣打交道，一度頗受蔣的賞識及重用；國共分道



主席：

最近今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近半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加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初步控制。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经过电烧后，一个半月内排尿血九个C.C.多；今年二月四日经过电烧后到现在一个半月内，也排尿血十个C.C.多。如再隔三个月再行检查，当在五月初或六月底。

今年开会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

圖 30.2：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1975 年 3 月 20 日。（《周恩來手跡選》書信卷下）

揚鑣後，他和蔣分處高度敵對的兩個營壘，談談打打幾十年。現在蔣已作古，他自己也身患絕症，而中國仍處於文革之中，兩岸統一更是遙遙無期，他心中又怎能沒有萬千感慨？

這時，毛澤東要周恩來向政治局傳達的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在四人幫的熱情推動下，正在迅速發展為又一場遍及全國的運動。2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圈閱批准的〈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社論。18日，經毛批准，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71] 3月1日，張春橋提出全國解放後，對經驗主義沒有注意批過。經驗主義是作為教條主義助手出現的，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72] 4月5日，江青進一步提出，現在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73] 在他們的詞典裏，「經驗主義」這頂帽子本來就是為周特配的。所有這一切，或明或暗之間又將矛頭指向了周恩來。

5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生平最後一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也從醫院出來參加。毛見到他後，和他打招呼，並詢問他的身體狀況。毛召集這次會議，其實還是為了要給鄧小平和四人幫「搭橋」，這也是他為會議定下的基調，他說：「要安定，要團結，教條主義也好，經驗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74] 毛這麼講，其實也是在為鄧小平和江青、張春橋劃框框和定調子，要他們照着做。會上，毛又對江青等人提出批評，要他們「不要搞『四人幫』」。他還說了下面這段話：「歷來我對經驗主義沒辦法，我是沒辦法，(只能)慢慢來，還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可能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我說安定團結，(批)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又要批評資本主義法權。誰過急就要摔下來。」[75] 這是否是對周恩來說的？如果是的話，與其說這表現出毛的氣勢，毋寧說是透露出了他的無奈——他拿周恩來沒有辦法。會後第二天，鄧小平來到周恩來的病房，同周交換了對前一天政治局會議的看法。[76]

5月21日，周恩來給政治局寫了一封信。之後，他和張春橋之間就批評經驗主義問題，展開了言語上的交鋒。周一反以往的做法，即便身患重病，也不肯委屈求全，而是對張的說法提出質疑。結果，張春橋居然不敢

戀戰，掛起了免戰牌。[77] 周恩來恐怕自恃已是行將就木之身，用不着怕張春橋了。

周恩來已經病入膏肓，但毛澤東對他還是不放心。1975年夏天，同樣重病在身、已是風燭殘年的毛又拿出了整風中的九篇文章閱讀和修訂。即便在周逝世後，他也沒有放下這件事。直到他死前一個月，還最後一次重讀了九篇文章一遍。[78]

周恩來對於自己的處境，知道得清清楚楚。6月16日夜，他在將要經受又一次切除腫瘤的大手術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內容讀來使人唏噓、亦令人尋味。

主席：

問候主席，您好！我第三次開刀後，這八十天恢復好，消化正常，無潛血。膀胱出血仍未斷，這八十天（從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間還去主席處五天，一月開全會共兩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還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細胞兩次，可疑細胞只三次，這八十天卻有壞細胞八次，而最後十天壞細胞三次，所以我和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談，他們同意提前進行膀胱照全鏡電燒，免致不能電燒，流血多，非開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手術後情況，當由他們報告。

為人民為世界人（民）的為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懇請主席在接見布特同志之後，早治眼病，必能影響好聲音、走路、游泳、寫字、看文件等。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資料研究後提出來的。只是麻醉手術，經過研究，不管它是有效無效，我不敢斷定對主席是否適宜。這段話，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來

75.6.16.22時[79]

信送出時，周恩來又特地給張玉鳳附上一張紙條，叮囑道：「玉鳳同志：現送十六日夜報告主席意見。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睡得好的時(候)，唸給主席一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唸，拜託拜託。」[80]此時，已是深夜11時30分了。

周恩來在信中對自己的病情一一道來，瞭如指掌。這一次手術從6月16日深夜11時45分開始，持續到次日凌晨3時45分。手術的效果依然不彰，這也成為他給毛澤東寫的最後一封長信。他在信末提到的「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直到他逝世也沒能寫出來。

6月9日，周恩來拖着病體，前往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參加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這件事對周來說極為重要，不僅要對這位屈死的老友有一個交代，也要對自己、對歷史有一個交代。所以，他一定要親自前往弔祭賀龍。他老淚縱橫地在賀龍遺像前鞠了七個躬，還大聲對賀龍夫人薛明說：「我對不起你，我沒有保護好賀龍同志。」[81]這一幕，尤其是當周恩來說出「我的時間也不長了」的時候，不能不讓當時在場的人動容哭泣。

七

1975年夏天，是鄧小平全力開展整頓的時候。他從毛澤東前一段講過的話中找出三句話：學習理論、反修防修；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打出了以毛的「三項指示為綱」的旗號，為「整頓」張目。[82]在這面大旗下，鄧在短短幾個月內，從「國民經濟大動脈」鐵路運輸的整頓入手，又同時對軍隊、國防科技、鋼鐵等一一實行整頓，很快就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期間，即便不斷受到「四人幫」的挑戰，鄧亦不為所動，反而以自己的「鋼鐵公司」對付江青的「鋼鐵公司」，一度甚至還在毛的「支持」下，迫使江青在政治局就自己搞「四人幫」的問題做了檢討。[83]到了夏天，鄧小平全力開展的整頓更是達到了幾近雷厲風行的地步。

毛澤東由着鄧小平這麼做，從一開始就有着相互關聯的兩個目的，一明一暗，緊密地交錯一起。一是，毛要為文革收場，就必須搞整頓，重建並鞏固中共對整個國家機器以及中國社會的控制，同時也把多年來停滯不

前的中國經濟搞上去。說到底，毛是同意「抓革命，促生產」的。毛知道，中國經濟要是搞不上去，他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合法性聲明就站不住腳，更不能服人。二是，毛知道權力最能讓人露出真面目。他可以藉此進一步考察鄧，尤其是要看他大權在握時對文革的真正態度，是不是真的「永不翻案」。

實際上，毛澤東並沒有真正地全部放手。就在鄧小平大力開展整頓的同時，張春橋和姚文元各有一篇大文章發表，大談「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儼然擺出了一副繼續對輿論陣地全面掌控的架勢。入秋之際，四人幫更是以全力推動「教育戰線革命」的舉動，同鄧的整頓分庭抗禮。儘管毛一再強調「以安定團結為好」，中共高層內部的政治鬥爭卻愈演愈烈。在方向和路線問題上，毛仍然相信要由四人幫「把關」。

這一段也是鄧小平重新登上高位後，同周恩來最為接近的時候。[84] 他幾乎每週都要去醫院探訪周，甚至幾天就去一次。談話的時間視乎周的身體情況，有幾次達到了一兩個小時。[85] 周恩來對鄧「全面整頓」大力支持。但同時，周對毛知之甚深，他一再勸告鄧小平，千萬「不要操之過急」。1975年4月28日，周恩來在政治局開完一次批評江青的會議後，曾對吳德說：「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對兩方面的意見正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你是吃不消的。」[86] 周恩來對於同自己關係更為密切、相知更深的葉劍英說的一番話，也更為直接、明白：「要注意鬥爭方式，大權不能落在他們（指「四人幫」）手裏。」[87] 周恩來會對葉劍英、吳德講這些話，當然更會對鄧小平講。四人幫對此極為「感冒」，不斷到毛澤東那裏「告御狀」說，鄧老是往周那裏跑。[88] 毛澤東當時未說什麼，但其實多少是聽進去了。這對後來鄧小平又一次倒台，多少起了一點「加持」的作用。

周恩來一直有的那種「不好的感覺」，並非空穴來風。夏天還未過去，一波評《水滸》、批判投降派的風潮又侵入了中國的政治生活。8月，毛澤東在同陪他讀書的北大中文教員蘆荻的談話中，講到古典小說《水滸》。8月14日，姚文元得知此事後給毛寫報告，表示「這個問題很重要」，「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和討論，……對於反修防修，是有積極意義的」。毛讀後批示「同意」，並發出了一道意涵深刻的指示：「《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

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89] 秋風初起時，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一種充滿弔詭怪異的政治氣氛：一方面，鄧小平仍在大張旗鼓地推動「全面整頓」；但另一方面，由中央報刊帶頭，通過評《水滸》開始大批「投降派」，並揚言要讓「大家知道我們黨內就是有投降派」。[90]

周恩來的政治感覺何其靈敏，他馬上就意識到，此事來者不善。毛澤東批准姚文元報告的第二天，他就調來了幾種版本的《水滸》，親自閱讀。[91] 9月15日，他和別人談到最近報刊上瘋評狂批《水滸》一事時，忍不住說：他們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92] 他在一次同鄧小平談話時再次勸告鄧，凡事不可操之過急，言下之意，是要鄧先不必那麼大張旗鼓地搞整頓。真要做什麼大事，難道不能等到毛澤東百年之後再動手嗎？但鄧並沒有聽進去。[93] 周只能長嘆一聲說，他這個人就是太急。

隨着周恩來的病狀日益惡化，他多年來一直以總理身分從事的外交活動，也終於要拉上帷幕。早在4月間，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訪華。那一段時間，周的身體其實特別不好，但他還是強撐着病軀同金見面，談了十來分鐘。金告別離開時，周和他長時間地擁抱，並手牽手地將金送出走廊。不管周恩來心中對金是怎麼看的，他知道這是他同這位朝鮮領導人的訣別。[94] 4月18日，毛澤東會見金日成，講到了周恩來，也講到了死：「我們Premier（總理）有病，一年裏開過三次刀。一個是膀胱，開過兩次。然後是大腸外面長了個東西，又開了刀。」金說：「鄧小平副主席講過這個事。」毛又說：「……總理生病，我也生病。……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們了。」金問：「為什麼不行了？」毛答道：「上帝請我喝燒酒。」[95]

夏天，周恩來的身體狀況更壞了。8月26日晚，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和賓努親王來到醫院。他們將要返回柬埔寨，是來向周告別的。周心中大概知道，西哈努克親王此去前途坎坷。於是，他話中帶話，對陪同會見的柬共領導人喬森潘說：「殷切希望你們兩派加強團結，鞏固勝利。」（後來看，波爾布特根本不聽周的話。）他最後對親王說的，是一段充滿傷感的話：「因為健康的原因，十分抱歉我不能參加為你們舉行的送別活動，也不能到機場為你們送行了。我們就在此告別吧！」[96]

9月7日，周恩來在醫院會見了羅馬尼亞黨中央書記伊利那·維爾德茨（Ilie Verdeţ）。據會見時擔任翻譯的蔣本良回憶，周面容憔悴，身體虛弱，但還是竭力擺出了一副大國總理的氣派。周對維爾德茨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他還頗為感慨地回首往事：「時間過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參加喬治烏·德治的葬禮，大衣也沒穿，步行走了四個多鐘頭。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連四分鐘也走不了了！」他還特地告訴維爾德茨，鄧小平接了他的班，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他稱鄧為「第一副總理」，並強調「你們完全可以相信，鄧小平同志將會繼續執行我黨的內外方針」。本來，會見只準備不超過20分鐘就要結束的，但在周的堅持下，卻持續了45分鐘。[97] 這是周恩來平生最後一次會見訪華的外賓。

剛過了立秋，周恩來本已相當兇險的病情急劇惡化。8月下旬，他的下腹部出現較大的腫塊鱗狀細胞癌。8月27日，他親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提議由鄧小平代替他「現任的黨和國家的職位」。但此信上交後，毛那裏居然沒有回音。[98] 9月20日下午，他又一次動大手術。這是幾個月來的第四次大手術，也是可能致命的手術，如發生意外，他就將躺在手術台上永遠起不來了。周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對於「蓋棺論定」從來就極為看重，當感到死神已經敲響他的大門時，就更是如此了。進入手術室之前，他突然開始寫東西，又囑咐秘書調來了他在1972年6月23日做的關於伍豪事件談話的錄音整理稿，用顫抖的手，在第一頁上簽了名，並加上「於進入手術室」。當護士將周推入手術室時，他突然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場的鄧穎超馬上叮囑汪東興，一定要把周說話的記錄轉交毛。[99] 周講這些話時，心之所繫應該仍然是兩件事，也是毛澤東晚年給他留下的兩個釘子：「伍豪事件」和對美國「右傾投降事件」。在他看來，這是兩樁隨時都可以被「翻出來」做文章、在政治上置他於死地的事情。他在經歷這次大手術前如此大動干戈，絕不是偶然的。

這一天的手術長達五小時。醫生們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周恩來的全身，無法治療。他們重新縫合了傷口。術後，吳階平向中央領導人報

告，周的癌症已到晚期，性質變化，成為惡性程度很高的「鱗癌」，不能再做手術切除，只能做內科保守治療。一直守候在手術室外的鄧小平得知情況後，指示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周的痛苦，延長生命。[100]

這次手術後，周恩來的病情繼續惡化，免疫力嚴重下降，癌細胞繼續向全身擴散。他連原來每天都要做的幾分鐘散步也停止了。[101] 10月24日，醫生們給周恩來做了第五次手術，術後病況無改善，但周仍不斷找人談話，心中依然記着「投降派」之事。11月15日，他精神較好時，讓秘書趙瑋拿來紙筆，寫道：「我是忠於毛主席、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雖然我犯過這樣那樣錯誤，但我決不當投降派。」[102] 這是他對於評《水滸》、批投降派的一種近乎絕望的回應。

八

1975年深秋，當北方颳來的陣陣寒風將樹上的最後幾片殘葉捲走時，中國的政治大氣氛又變了。毛澤東觀察鄧小平大半年後，開始改變先前對他的支持態度。

10月初，毛澤東同政治局的聯絡通道發生了大變化，王海容和唐聞生「失寵」。毛覺得她們和鄧小平走得太近了。[103] 自周恩來入住三零五醫院後，他見得最多、每次時間也最長的，正是王、唐這「兩位小姐」（其中最長的是4月15日的一次，從下午1時20分到5時30分，長達4小時10分鐘）。[104] 這是他探聽毛身邊情況動向的一條渠道這一點，恐怕也被毛察覺了。從10月10日起，毛的侄子毛遠新從遼寧調入北京，擔任了毛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105]

毛遠新從小在毛家中長大，同江青關係還可以，但算不得親近。文革前他曾到空軍任職，文革初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支持過紅色造反團，接着任「總理聯絡員」處理各地事務。1968年春，毛派他到遼寧，省革委會成立後出任副主任，後又成為遼寧省委書記兼瀋陽軍區政委，在中央文革支持下成了「東北太上皇」，同江青之間的距離拉近了。毛遠新到毛身邊後，江青及四人幫可以同毛「講上話」了。毛做這一改變，說明他對江青等人以及對鄧的態度已經變了。

恰在此時，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先後兩次寫信，告從毛身邊派到兩校的遲群和謝靜宜的狀，兩封信都通過鄧小平轉交毛澤東。對8月份的第一份信，毛沒有反應；第二封信，毛看了，光火了。11月1日，毛召見鄧，批評他為劉冰等轉信的做法。[106] 第二天，毛同毛遠新談話，當毛遠新講到鄧「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我擔心中央，怕出反覆」時，毛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又說，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107]

這之後，毛遠新等根據毛的指示找鄧談話「幫助他」，主要是要他擺正對文革的態度，但談得不好。[108] 毛最後決定不在各種「小事」上與鄧太多糾纏，而只要他做一件事：在政治局主持做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毛還定下了「三七開」的調子，「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109]

這幾天，鄧小平不斷到醫院看周恩來，同周商量。周勸他不要和毛頂着幹。他同毛有着幾十年共事的親身經驗，最大的感受是「毛主席活着，誰也不是對手」。對於鄧小平在受到毛重用後的處境和前景，周一直就有一種「不好的感覺」。他太知道，鄧的上台或可能的下台都取決於毛的一念之差。讓鄧主持做這樣一個關於文革的決議，其實是毛在給鄧「上套」，也是毛對鄧的最後測試和考驗——或許也是給他最後的機會。對此，周恩來看得很清楚（這種事毛不知對周做過多少次了）。此刻周身患絕症，自知命不久矣，他絕不希望看到的應該是，與他有着相同的理念、對毛的「繼續革命」有着相似看法的鄧小平不知進退，在毛也已為死神垂青的時刻卻轟然倒下，再也起不來。

鄧小平思來想去，還是決定不做為文革下結論這件事。11月2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此事時，講了一通自己對文革的偉大意義認識不足之類「自我批評」的話，然後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110] 據說，這是紀登奎給他出的主意。

鄧小平的表態讓毛澤東極為失望，也讓毛看透了鄧——他對文革的態度，在毛最在意的一點上，踩到了毛的痛處。兩年前，他讓鄧重新出山時，鄧檢討中最能抓住他的一句話，是「永不翻案」。這時，毛說：「說

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111]這之後，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已是在劫難逃了。鄧小平沒有聽周恩來要他不同毛頂着幹的勸告，但這裏顯示出的也許是，鄧在這一點上比周看得更遠：他已經說過一次「永不翻案」的話了，他不想再說第二次。不然，毛澤東之後，鄧若在中國掌權，將何以面對文革這段歷史，又何以面對文革之後的未來？

九

進入12月後，周恩來越來越經常地陷入昏睡狀態，但他的求生欲望卻從來沒有這麼強烈，還能進食時，他拼命逼自己多吃幾口，為的是讓身體有力量同癌症搏鬥。[112]12月20日早晨，他從昏睡中突然醒來後對護士說，要見主管情報和統戰工作的羅青長。根據當時的規定，凡周要見人，尤其是羅青長這樣的人，一定要經過政治局批准。當此事報告到仍在主持政治局工作的鄧小平那裏時，鄧說：「總理病成這個樣，他要找誰就找誰。」[113]羅青長匆匆趕到周恩來的病房時才知道，周恐怕是想就情報系統及對台灣工作之事，對羅做一些最後的交代，並特別提及，「不要忘記台灣的幾位老朋友」。[114]同時，周還提到了那份曾給他帶來大麻煩的外交部〈153號簡報〉，要羅他們處理相關問題時，一定要加倍小心。可惜談話未完，周又昏睡過去。羅青長等了許久，周仍未醒來，他只得離去。[115]

此後，陷入昏睡已成為周恩來的常態，清醒的時刻越來越少。12月27日晚，當他又醒來時，要求見唐聞生和王海容。10時50分，王、唐趕到他的病榻旁，逗留了十分鐘。周要她們日後作證，毛澤東曾經在1974年12月底在長沙對周和王洪文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116]這時，周恩來離辭世只有12天了。

1976年元旦過後，周恩來氣若懸絲，進入了生命倒計時的時刻。幾乎所有時間，他都處於昏睡狀態，偶爾醒來，除了提出要聽他一直喜歡的越劇《紅樓夢》片段外，又說要聽毛澤東詩詞的廣播。[117]

1月5日凌晨，周恩來已生命垂危。這一天，他做了入院後的第六次手術。[118]據稱，這是他自己要求的。為什麼這麼做？這樣的手術是毫無意義的，延長的至多只是幾天的生命。它給周帶來的，卻是難以言表的身體

痛苦(儘管他已無法言語)。難道說,即便到了這個離死神已如此接近的時候,他仍然希望自己能在和毛的一場無聲的「生命競賽」中成為「勝利者」,從而讓自己在「毛之後」、再沒有毛的存在所帶來的那片無所不在的巨大陰影的環境和條件下,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嗎?

手術治療果然無用。一直陪伴在周恩來病床邊的鄧穎超已數日無眠,臨時回家。1月7日晚11時,周最後一次醒來,以極為微弱的聲音對吳階平醫生說:「我這裏沒有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康老吧,他那裏更需要你們……」[119]

這應是周恩來生前留下的最後一句話,但卻包含着極為深重的意味。其實,康生已於1975年12月15日去世,只是周恩來似乎並不知道;他說這段話時,已瀕臨死亡,神智已不清醒。他何以會在此刻提到康生?不由得聯想到他在毛澤東81歲生日當夜對毛之所言:據康生說,江青和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或許周恩來這一舉動所透露的,正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心中仍想着要杜絕毛身後出現由「四人幫」接棒、讓「大權落在他們手裏」的政治前景。

當夜,醫院急電鄧穎超,告知周的病況危急,要她馬上趕往醫院。幾分鐘後,當鄧趕到病房時,周已陷入深度昏迷,再聽不到她的聲聲呼喚。[120] 這之後,周恩來的神志再無片刻清醒之時。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當早晨的陽光照入周恩來的病房時,他的心臟停搏,呼吸停止,血壓歸零。房間裏依然迴盪着《紅樓夢》中「黛玉葬花」的音樂。無論在場的人們如何呼喊,再也喚不回周恩來漸漸遠去的靈魂。他走了,享年77歲。

周恩來逝世後,鄧穎超寡居16年。周在世時,她雖曾三次在中共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卻從未出任過黨政方面的任何重要職務。丈夫逝世後,她於1977年進入中央政治局。1982年,她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這是一個周曾任職達22年之久的位置)。為了維護丈夫的名節,也許還是為了掩飾毛治下的一些最為黑暗的片斷,她要求將1973年「批周」的所有相關材料予以銷毀。中共領導層同意了這一要求。她於1992年辭世,享年88歲。

鳴 謝

當我在這本《周恩來》中文版的清樣上改完最後一處時，這些年來我曾走過的路，尤其是那些曾經為我提供過支持、鼓勵和各種幫助人們的身影，又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的眼前。

我首先要感謝的，是我在弗吉尼亞大學的同事、在美國外交史學界久負盛名的梅爾文．萊夫勒（Melvyn Leffler）教授。二十多年過去了，我還清晰地記得2004年金秋的那個下午，Mel告訴我，他正在主編一套以「20世紀偉大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為主題的叢書，希望我能為這套叢書寫一本周恩來簡傳。一番交談之下，我同意了他的提議。若沒有他當年的邀約，這本周恩來傳記（但早已不是他最初所提議的一本「簡傳」了）是不會問世的。二十年後，這本傳記的英文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2024年出版，並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相當影響。

然而，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周恩來》中文版，並不簡單地就是英文版的中文譯本。從一開始，我就是同時以中文和英文寫這本傳記的。2014年，我和哈佛大學出版社簽約出版這本書的英文版時，沒有將書的中文版權授予哈佛，只是同意英文版將先於中文版出版。當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的林道群先生得知此事後，馬上提議由牛津（香港）出版此書；之後，儘管我遲遲未能交稿，他還是一直信守諾言。2021年，在他的全力支持下，牛津（香港）出版了以這本周傳的部分稿子為基礎寫成的《怎忍青史盡成灰：文革政治史批判筆記》。不料，林道群2022年從牛津（香港）提早退休，牛津（香港）後來也改變了其人文社科領域學術著作的出版方向。對於這些年他所給予的信任和支持，我一直銘記在心。謹此致謝！

此後，當台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發行人林載爵先生獲知本書中文版稿子即將殺青、出版卻遇到困難時，經幾位朋友「搭橋」，親自和我在台北見面，並承諾聯經可以不計成本、不做任何刪節地出版此書。他的支持猶如「雪中送炭」，我的感激之情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

本書中文版現在得以出版，是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甘琦社長和她的同事們——葉敏磊、林穎、林驍、陳甜等——的全力支持和幫助分不開的。在我遲遲未能完稿的那些年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同仁們就對我的寫作進展亟表關切，並不斷提出各種建設性的建議。我和港中大出版社簽約後，甘琦社長親自持續跟進我修訂書稿及其他相應工作的進展，並竭力主張與說服我為這本書寫一篇〈中文版序〉，與讀者分享我寫作這本書的這些年裏走過的心路歷程。這本書的責任編輯林驍也是我和陳之宏教授共同翻譯的孔飛力著《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港版的責任編輯。她以最為出色的職業態度和專業精神，對《周恩來》書稿從組織、表述、分析、資料的引用乃至文字校訂等，提出各種看法和建議。文本編輯余敏聰對全書做了細緻縝密的編校工作，認真盡責。在這些同仁的努力下，本書避免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錯誤及各式各樣的誤植，成為一本推敲入微、臻於完善的著作。我為《周恩來》中文版能由港中大出版社出版感到慶幸，在此我謹表示最深切的感謝！當然，本書仍可能存在的各種問題，都是應當由我來負責的。

我是這本《周恩來》的作者，但它的思想與學術基礎的形成和構建，卻離不開許多前輩和導師們的指引、教誨與支持。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當我還是華東師範大學的一名研究生和青年教師時，李巨廉老師、潘人傑老師、王斯德老師、馮紀憲老師以及其他多位老師不僅教我如何從事歷史研究，也激發和培養了我的批判性思維意識。1980年代中後期，我在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讀博期間，戴維．威爾遜（David Wilson）教授、威廉．特利（William Turley）教授和吳天威教授指導我撰寫了以《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中美對抗的形成》（*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為主題的博士論文（經修訂後，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他們為我打開的，是通向國際學術界的一扇門戶。

從那時起，三十多年過去了。在充滿挑戰、卻又不斷會有所收穫的學術研究和著述之路上，我是幸運的，從一開始就得到了那麼多前輩學者的支持和幫助。他們中有孔華潤（Warren Cohen）、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邁克爾·亨特（Michael Hunt）、孔飛力（Philip A. Kuhn）、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南希·塔克（Nancy Tucker）、傅高義（Ezra F. Vogel）、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瑪麗蓮·揚（Marilyn Young）等。他們中的多位已經辭世，但我對他們給予的啟發、支持和幫助的記憶，將伴隨我終生。

我還要特別要感謝許多朋友、同事以及學術同行，他們或者閱讀並對書稿的不同部分提出了寶貴意見，或者與我分享了各種檔案文獻及其他資料，或者為我提供了發表研究成果和獲得寶貴反饋的學術平台。他們當中包括：戴維·艾特威爾（David Atwill）、卞歷南、蔡亮、陳東林、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高家龍（Sherman Cochran）、董明、顧雲深、拉姆·古哈（Ram Guha）、韓鋼、詹姆斯·赫什伯格（James Hershberg）、金沖及、金光耀、蘇爾曼·汗（Sulmaan Kahn）、傑森·凱利（Jason Kelly）、柯偉林（William Kirby）、馬克·克萊默（Mark Kramer）、查爾斯·克勞斯（Charles Kraus）、林道群、瑪麗蓮·A·萊文（Marilyn A. Levine）、李丹慧、李海文、李小兵、廉正保、廖心文、劉曉原、劉亞偉、弗雷德里克·洛格瓦爾（Frederic Logevall）、盧漢超、盧明明、呂德良（Lorenz Lüthi）、拉納·米特（Rana Mitter）、克里斯蒂安·奧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秦紅、謝爾蓋·拉德琴科（Sergey Radchenko）、普里西拉·羅伯茨（Priscilla Roberts）、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單富良、沈志華、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王飛凌、王海光、王希、魏承思、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王大衛（David Wolff）、夏亞峰、蕭冬連、蕭功秦、徐國琦、許紀霖、徐行、徐焰、楊奎松、衣慎思、余偉民、翟強、章百家、張濟順、張曙光、張素林、張楊、周志興、朱學勤，以及多個我在這裏無法一一列出的名字。

我還要感謝在我研究與寫作過程中給予幫助的同事與助理：康奈爾大學的傑森·凱利（Jason Kelly）、唐克實（Christopher Tang）、王心怡、王元崇和周陶沫；弗吉尼亞大學的高蓓和趙涵；華東師範大學的蔣華傑、高嘉

懿、姚昱、谷繼坤；上海紐約大學的王依靈、胡佳蘊。同時，我也要特別感謝哥倫比亞大學的潘強（John Payne）對本書英文版初稿所做的細緻的校訂工作。

我在學術研究與寫作中得到了多家機構在資金與其他方面的慷慨支持。在弗吉尼亞大學，嚴家淦中美關係講席教授基金資助了我關於周恩來的早期研究；在康奈爾大學，我的研究與寫作受益於邁克爾·J·扎克中美關係史講席教授基金以及胡適歷史學講席教授基金的巨大支持。我將永遠銘記邁克爾·J·扎克（Michael J. Zak）在我遇到各種挑戰的時刻給予我的精神鼓勵。

從2014年起，我一直在上海紐約大學任教，持續地獲得了來自各方面的寶貴支持。我特別感謝丁景松先生、俞立中校長、童世駿校長、傑弗里·萊曼（Jeffrey Lehman）常務副校長、姜華主任，以及許多其他同事提供的各種幫助。

這本書的英文版首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我要衷心感謝我的編輯夏米拉·森（Sharmila Sen），她在整個出版過程中提供了許多富有洞見的建議，並始終信任和支持我，即使當我多次推遲完稿之時依然如此。我也非常感謝希瑟·休斯（Heather Hughes）和薩曼莎·M·馬特奧（Samantha M. Mateo）出色的工作。此外，我要感謝凱瑟琳·麥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多年來給予我的鼓勵，以及斯蒂芬·拜特爾（Stephen Beitel）對英文書稿的文字編輯。

我最深切的感激之情獻給我的家人。我敬愛的母親張文鈿女士，從我幼年起就教我閱讀中國文史典籍，令我終生受用；父親陳立強先生，直到九十多歲高齡，仍一直幫助我搜集和整理已出版的中文史料。妻子陳之宏不僅始終關心和照料我的身體健康，作為一位語言天才和20世紀國際史領域的同行學者，她還協助我核校了本書所引用的全部俄文檔案文獻的譯文，她也是本書手稿多個版本的第一位嚴謹而富有批評性洞見的讀者。我謹以這本《周恩來》獻給他（她）們。

註釋

第15章

1 毛澤東：〈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343頁。

2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390頁。

3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1949年3月13日。同一講話中，毛又說：「我不參加政府有好處，就可以有時間想問題；但是不參加也有缺點，大家認為我不參加不妥當，我也有此感覺。內閣上面還有主席團，我做總主席，這樣的好處是可以壓制駕馭李濟深之流的人。」

4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850–851頁。

5 周恩來：《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草案初稿，1949年8月22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291–316頁；關於外交政策，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666–667頁。

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53頁。

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第564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55–559頁。

8 胡喬木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參與了對《共同綱領》的最後修訂。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中，他對這一過程有詳細的敘述，包括各方對修訂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以及毛的回應（第555–559頁）。然而，對於這兩處最為重要的修訂，胡在書中卻完全沒有提及。

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966》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62–63頁。

10 《民族問題文獻彙編》（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177–180、185–186頁。

11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444.

12 《民族問題文獻彙編》，第730–731頁。

13 周恩來：〈評馬歇爾離華聲明〉，1947年1月10日，《周恩來1946年談判文選》，第723頁。

14 周恩來：《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1949年9月7日，《民族問題文件彙編》，第1266–1267頁。

15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808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940–941頁。
16 周恩來致宋慶齡信，1949年6月21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418頁；《周恩來傳，1898–1949》下，第950–951頁。
17 雲水：《出使七國紀實——將軍大使王幼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第5頁；羅貴波也有過相似的回憶，見羅貴波訪談，1992年8月。
18 周恩來致王炳南信，1949年7月29日；周恩來致葉劍英並轉王炳南等的信，1947年11月10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401–404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第744頁。
19 凌青：《從延安到聯合國》，第58–60頁。
20 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第7頁。
21 葛羅米柯致周恩來電，1949年10月2日21時45分，《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彙編(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第4頁；葛羅米柯致斯大林函，1950年10月2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第118、119頁。
22 劉少奇致毛澤東電，1949年7月11日，中央檔案館。
23 毛澤東和羅申談話備忘錄，1949年10月16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130–131頁。
24 毛澤東致王稼祥電，1949年11月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218頁。
25 周恩來和羅申會談紀要，1949年11月10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158–161頁。
26 中共中央致王稼祥、曾湧泉電(周恩來起草)，1949年11月13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第503頁。電文中提及，斯大林已覆電同意毛「十二月初訪莫，但未提及何人同去」。
27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19年11月1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230頁。
28 《汪東興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第11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16頁。
29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87頁；師哲對此的印象極為深刻，師哲訪談，1992。
30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87頁；汪東興：《汪東興日記》，第118頁。
31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89–390頁；1992年8月，四十多年過去了，師哲已年近九十，但在我訪談他時講起當年這一幕，依然給人一種記憶猶新的感覺。
3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59頁；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1949年12月16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175–178頁。
33 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1949年12月16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175–178頁。
34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90頁。
35 《葉子龍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179–180頁。
36 毛澤東致劉少奇電，1949年12月18日，《毛澤東年譜》第1冊，第60頁。
37 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49年12月21日，《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第218–219頁。

38 同上，第218頁。
39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94頁。
40 《毛澤東年譜》第1冊，第62頁。
41 同上，第62–63頁。
42 毛澤東致中共中央電，1950年12月25日，《毛澤東年譜》第1冊，第63頁。
43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91頁。
44 師哲訪談，1992年8月；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91頁。師哲在回憶錄中說，毛的這番話是對科瓦廖夫說的，但在我對他的訪談，他一再說，這是毛對着他和中方其他隨行人員，「故意說給蘇聯人聽的」。後來，赫魯曉夫親口向毛澤東證實，「當時斯大林在（你）的屋子裏安上了竊聽器」。毛主席和赫魯曉夫第一次談話記錄，1958年7月31日下午5時至9時。
45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報告：中共政策的若干問題，1949年12月24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180–187頁。
46 《汪東興日記》，第166–168頁。
47 毛澤東致中共中央電，1950年1月2日晚11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385–386頁。
48 師哲訪談，1992年8月；汪東興：《汪東興日記》，第131頁；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17–318頁。
49 毛澤東致中共中央電，1950年1月2日晚11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385–386頁。
50 毛澤東致中共中央電，1950年1月3日晨4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386–387頁。
51 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致毛澤東電（周起草），1950年1月4日7時半，《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8–9頁。
5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0頁。
53 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50年1月7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10–11頁。
54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97頁；師哲訪談，1992年8月。
55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270–273頁。
56 師哲訪談，1992年8月。
57 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1950年1月22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265–269頁；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84–85頁；周恩來致劉少奇並中央政治局電，1950年2月8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91–92頁。
5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85–86頁。
59 周恩來致劉少奇並中央政治局電，1950年2月8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92頁。
60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53–54頁。
61 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關係的命運，1945–1959》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154頁。

62 周恩來致劉少奇並中央政治局電，1950年2月8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92頁。
63 沈志華：《無奈的選擇》上，第156頁。
64 毛澤東致劉少奇電，1950年1月25日晨5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465頁。
65 同上，第251頁。
66 蘇方提出的關於大連港問題的草案，1950年1月26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278頁。
67 中方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國長春鐵路協定的草案，1950年1月26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279–280頁。
68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草案），《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53–54頁。
69 沈志華：《無奈的選擇》，第157–158頁。
70 中蘇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協定草案，1950年1月28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281–283頁。
71 蘇方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方文本修改後的定稿，1950年1月29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284–285頁。
72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91–96頁。
73 維辛斯基致斯大林報告，1950年2月12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313–315頁。
74 《汪東興日記》，第202頁。
75 維辛斯基致斯大林報告，1950年2月12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313–315頁。這些年來，中國國內網上曾流傳中蘇之間還簽訂了一個涉及廣泛、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如「劃交東北華北海軍基地給蘇聯」、將解放軍「改編為蘇聯紅軍」）的「秘密協定」，解密俄方文件中絕無此件，其內容也極為荒唐。參見沈志華：〈所謂1950年中蘇「秘密協定」〉，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0857.html。
76 《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彙編（1949年10月–1950年12月）》，第136–138頁。
77 同上，第146–147頁；師哲訪談，2992年8月。
78 《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彙編（1949年10月–1950年12月）》，第139–145頁。
79 毛澤東在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50年3月3日，《毛澤東年譜》第1冊，第98–99頁；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1950年4月1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49–50頁。
80 周恩來在東北幹部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50年3月3日；周恩來對十個專業會議代表的講話記錄，1950年3月14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41頁。
81 毛澤東後來一再說，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他訪蘇時，斯大林不信任他，也沒有平等地對待他。參見〈尤金與毛澤東談話紀要：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的錯誤〉，1956年3月31日，ф. 0100, оп. 49, п. 410, p . 9, АВПРФ；毛主席與蘇聯尤金大使第二次談話記錄，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82 師哲訪談，1992年8月。
83 毛澤東致粟裕等及中共華東局電，1949年6月14日。
84 毛澤東致粟裕等及中共華東局電，1949年6月21日。
85 毛澤東給周恩來的信，1949年7月10日。
86 毛澤東致粟裕並告華東局電，1949年8月2日。
87 參見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9–70。
88 呂黎平：《通天之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第132–169頁。
89 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1949年12月16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176頁。
9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157頁。
91 粟裕致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電，1949年11月22日。
92 羅申和周恩來會談備忘錄，1949年12月5日，沈志華：《無奈的選擇》，第206頁。
93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8年6月13日，胡佛研究所；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8》，第161頁。
94 中央軍委致粟裕並告華東局電，1949年8月2日。
95 1950年3月23日，周恩來在給蘇聯國防部站布爾加寧(Nikolai A. Bulganin)的電報中即提到，向蘇聯訂購的海空軍裝備何時到達對中共發動攻台戰役極為重要，「只有在大部分器材都在本(年)度到達中國，才能使台灣戰役的準備來得及」。《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207頁。
96 《中國人民解放軍史》第4卷，第114頁。
9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61頁。
98 He Di,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re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1950," *Chinese Historians*, vol. 5, no. 1 (Spring 1992): 12; 徐焰：《金門之戰》，第116–125頁，特別第124–125頁；又參見林曉光：〈中共對台政策的演變〉，《黨史研究資料》，1997年第3期，第2頁。
99 吳石等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1950年4月11日–1953年6月29日，B3750347701/0039/3132034/34，從台灣「國家檔案資訊網」(https://archives.gov.tw)整卷下載。
100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第135–136頁。
101 Melvyn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613–614.
102 新華社：〈決不容許外國侵略者吞併中國的領土——西藏〉，《人民日報》，1949年9月3日，第1版。
10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277頁。
104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卷，第2頁；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西藏軍區黨史徵集領導小組編：《和平解放西藏》(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59–60頁。
105 《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9–10頁；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6頁。

106 《人民日報》，1950年1月21日，第2版。
107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pp. 623–624.
108 《人民日報》，1950年1月21日，第2版。
10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61、65頁。
110 西藏自治區黨史辦公室編：《周恩來與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第6–7頁。
111 同上，第16頁。
112 同上，第16–17頁。
113 同上，第17頁。
114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Chapter 18; 又參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第1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第212–215頁。
115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p. 687.
1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142頁。
117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pp. 707–708.
118 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8–62.
119 Indian note, October 26, 1950, in Margaret Carlyle, ed.,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9–195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550–551.
120 Indian note, October 31, 1950, ibid., pp. 552–554.
12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261頁。
122 《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33頁。
123 同上，第34–35頁。
124 《和平解放西藏》，第176–178頁；也見Carlyle,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9–1950*, pp. 554–556.
125 B. N. Mullik, *My Years with Nehru: The Chinese Betrayal*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1971), p. 80.
126 《和平解放西藏》，第213–214頁；又參見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pp. 742–743。
127 同上，第119頁；《周恩來與西藏》，第11–12頁。
128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2.
129 《當代中國的西藏》上，第164頁；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 p. 69。
130 關於《十七條協議》的文本，見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 pp. 449–452。
131 《和平解放西藏》，第129–130頁。
132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pp. 757–758;《和平解放西藏》，第218–219頁。
133 《周恩來和西藏》，第22頁。
134 《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30–31頁。
135 《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56頁。
136 《和平解放西藏》，第207頁。

第16章

1 什特科夫關於金日成通報金一在北平談判情況致維辛斯基電，1949年5月15日；科瓦廖夫關於毛澤東通報與金一會談的情況致史達林（斯大林）電，1949年5月18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第187–190頁。

2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6; 金東吉：〈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師回朝鮮問題新探〉，《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114頁。

3 莫洛托夫呈報的擬答金日成的指示稿，1949年9月2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答覆什特科夫請示的決議，1949年9月24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255–259、260頁。

4 史達林（斯大林）致毛澤東電：關於朝鮮問題的答覆，1949年10月26日；葛羅米柯致科瓦廖夫電：轉交斯大林對朝鮮問題的答覆，1949年10月26日，沈志華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2卷，第153、139頁。

5 史達林（斯大林）關於同意會晤金日成討論統一問題致什特科夫電，1950年1月30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309頁；斯大林致史特科夫電，1950年2月2日，ф. 45, оп. 1, д. 347, л. 12, АПРФ。

6 伊格納季耶夫關於毛澤東會見李周淵的情況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4月10日；什特科夫關於關於金日成訪華計劃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5月12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336、381頁。

7 周恩來在軍委情報部第二局、第五局全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0年4月1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第249頁。

8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s*, p. 145.

9 什特科夫關於金日成訪華計劃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5月12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381頁。金到北京前，周恩來為防止消息走漏，還讓師哲騰出中南海的住房，讓金暫住。師哲訪談，1992年8月。

10 羅申關於金日成與毛澤東會談情況的電報，1950年5月13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383頁。

11 史達林（斯大林）關於同意朝鮮同志建議致毛澤東電，1950年5月14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第384頁。

12 1950月4月10日，粟裕向第三野戰軍傳達中央決定：「今年不打台灣和西藏……對台灣要繼續加緊準備」（《金門戰役紀事本末》，第393頁）；4月13日，毛澤東在致斯大林的電報中通報道：「奪取台灣的作戰，準備1951年進行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90頁）。另，據陳小魯告知筆者，粟裕（陳小魯的岳父）後來曾說，當年幸虧沒有貿然就打台灣，不然後果不堪設想；1992年7月同陳小魯的談話。

13 師哲訪談，1992年8月；參見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5月16日，轉引自 Evgeniy P. Bajanov and Natalia Bajanova,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Based on Secret Soviet Archive"（未出版，作者複印本），第52–53頁。

14 同上，第52–53頁。
15 《人民日報》，1950年6月29日，第1版。
16 毛澤東關於購買空軍轉杯器材和聘請空軍顧問給斯大林的電報，1950年4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61頁。
17 《肖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第8、26頁；亦參見He Di,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1950," *Chinese Historians*, vol. 5 (Spring 1992): 12–16。
1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51頁。
19 羅申致菲里波夫（斯大林）電，1950年7月2日，ф. 45, оп. 1, д. 331, л. 75–78, АПРФ。
20 參見斯大林致蘇聯駐華大使羅申（N. V. Roshchin）的電報，1950年7月5日，CWIHP *Bulletin*, nos. 6–7 (Winter 1995–1996): 43。
21 聶榮臻給毛澤東的報告：「軍委會議討論保衛國防支援朝鮮戰爭問題的建議」，1950年7月7日，175-志1-1，解放軍檔案館；毛澤東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批語，1950年7月7日24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第357頁。
2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51頁。
23 周恩來致高崗電，1950年7月10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24頁。
24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電，1950年7月20日，ф. 5, оп. 918795, д. 122, л. 352–355, ЦАМОРФ（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劉武生、杜宏奇主編：《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第131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55頁。
25 周恩來給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的信，1950年7月13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34頁；毛澤東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批語，1950年7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357頁。
26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7月15日，ф. 5, оп. 918795, д. 122, л. 303–305, ЦАМОРФ。
27 柴成文、趙勇田：《抗美援朝紀實》（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第47頁。
28 周恩來致高崗、李富春、林楓等的信，1950年7月14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36–37頁。
2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55、66–67頁。
3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168頁。
3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62頁。
32 毛澤東致高崗電，1950年8月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417頁。
33 高崗在瀋陽軍事會議上的講話，1950年8月13日，轉引自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所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1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第91–92頁。
3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67頁。
35 周恩來：〈充分準備，出手即勝〉，1950年8月26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43–50頁。
36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247–248頁。

37 參見《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第7–8頁；〈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0年7月23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358–360頁。

38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7月15日，ф. 5, оп. 918795, д. 122, л. 303–305, ЦАМОРФ；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7月20日，ф. 5, оп. 918795, д. 122, л. 352–355, ЦАМОРФ；什特科夫致蘇聯外交部電，1950年8月29日，ф. 5, оп. 918795, д. 1227, л. 666–669, ЦАМОРФ。

39 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手稿複印本)，1950年10月2日；參見《毛澤東傳》，第113頁。

40 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第77頁。

41 羅申致斯大林電：周恩來對朝鮮戰事的建議，1950年9月18日，ф. 45, оп. 1, д. 331, л. 123–126, АПРФ。

42 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9月21日，ф. 45, оп. 1, д. 331, л. 131, АПРФ。

43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56–57頁。

44 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9月21日，ф. 45, оп. 1, д. 331, л. 131, АПРФ；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9月22日，ф. 45, оп. 1, д. 331, л. 133–135, АПРФ；什特科夫致葛羅米柯電，1950年9月21日，ф. 5, оп. 918795, д. 125, л. 86–88, ЦАМОРФ。

45 什特科夫關於轉呈金日成給史達林(斯大林)的求援信致葛羅米柯電，1950年9月30日；史達林(斯大林)關於建議中國派部隊援助朝鮮問題致羅申電，1950年10月1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中，第563–565、571頁；金日成、朴憲永致毛澤東信，1950年10月1日，軍事科學院軍史部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1卷，第148–149頁。

46 關於這次碰頭，沒有看到直接的資料。唯一可以依靠的，是楊尚昆1984年接受彭德懷傳記組訪談時的回憶(但楊本人後來又改了口)。張希、王亞志訪談，1992年8月。

47 周恩來致倪志亮即轉金日成電，1950年10月1日夜，《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64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83頁。

48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102–104頁。以上引文中要求斯大林提供空軍支援的部分，在《毛澤東文稿》發表本中刪去。這裏引用的段落，係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毛手稿複印本。

49 師哲訪談，1992年8月。筆者後來同幾位黨史、軍史資深專家的談話，也證實毛澤東有過這一說法。

50 羅申關於轉呈毛澤東關於中國暫不出兵的意見致史達林(斯大林)電，1950年10月3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中，第576–577頁。值得注意的是，若同毛澤東自己起草的那封未送出的電報相比較，他講到贊同出兵時，談的都是自己的意見；而在談到不宜出兵時，引的都是別人的意見。

51 周恩來同潘尼迦的談話，1950年10月3日，105-00009-01，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25–27頁。潘尼迦在回憶錄中詳細記述這次談話的場景和內容。周說："If the Americans crossed the 38th parallel, China would be forced to intervene in

Korea"（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中國將不得不在朝鮮進行干預）。K. M. Panikkar, *In Two Chinas: Memoir of a Diplomat* (London: Allen & Unwin, 1955), pp. 109–111; 印方很快便把周恩來發出的警告轉告美國，參見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Clubb) to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Merchant), October 4, 1950, *FRUS*, 1950, vol. 7, pp. 864–865。

52 參見裴堅章等：《新中國外交風雲》第1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第97頁。

53 彭德懷秘書張養吾記事，1950年10月4日（由張希提供）；王焰等著：《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第400頁。

54 《彭德懷傳》，第401–402頁；《彭德懷自述》，第257頁。

55 彭德懷秘書張養吾記事，1950年10月5日（由張希提供）；張希訪談，1993年8月；彭德懷傳記組訪問楊尚昆記錄，1984年7月20日，轉引自《彭德懷傳》，第402頁；楊勝群、閆建琪主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第944頁。毛澤東為什麼派鄧小平去見彭德懷「交底」？王力的一段回憶說出了可能的緣由：「毛主席派抗美援朝的指揮員時，第一考慮是林彪，林彪因為身體不好不能去，第二考慮鄧小平，但鄧小平國內工作離不開，第三才考慮彭德懷。指揮大規模作戰，指揮百萬大軍的人，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鄧小平。」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20頁。

5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205頁；張希、王亞志訪談，1992年8月。據他們說，彭德懷曾對身邊參謀人員轉述了毛澤東和他談話的主要內容。

57 《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258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84頁。

5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84頁。

59 毛澤東關於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致金日成電，1950年10月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122–123、124頁。

60 毛澤東經蘇聯使館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8日，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132, РГАСПИ。

61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442–449頁；師哲訪談，1992年8月。

62 同上。師哲對筆者說，周恩來其實是在「玩」斯大林。

63 斯大林、周恩來致蘇聯駐北京使館並立即轉告毛澤東的電報，1950年10月11日，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134–135, РГАСПИ。

64 毛澤東給彭德懷等的電報，1950年10月1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151頁；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12日，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141, РГАСПИ。

65 毛澤東給周恩來電報，1950年10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156–157頁。

66 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1950年10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103–104頁。

67 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1959年10月1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161–162頁。

68 周恩來致斯大林信，1950年10月14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404–405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62頁；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447–448頁。

69 毛澤東致彭德懷、高崗電，1950年10月17日下午5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179頁。

7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216頁；毛澤東致鄧華等電，1950年10月18日21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180–181頁。

71 10月29日，蘇聯駐中國總顧問沙哈諾夫告知周恩來：「蘇方又同意派蘇航空員駕噴氣式飛機至安東擔任防空，並可超過中國邊境數里，但須學會幾句中國話的口令聯絡。如此，下月十號可由瀋陽移安東。」11月1日，蘇聯空軍開始在鴨綠江上空域投入戰鬥。周恩來給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信，1950年10月29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427頁；扎哈洛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11月2日，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335頁。

72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39–140.

73 *FRUS*, 1950, vol. 7, part 1, p. 1542.

74 Stueck, *The Korean War*, pp. 140–141.

7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254頁；《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第1卷，第388頁。

76 周恩來總理接見印度大使潘尼迦的談話記錄，105-00009-01，外交部檔案館；K. M. Panikkar, *In Two China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5), p. 118。

77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50年12月2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455–456頁。

7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108頁；*FRUS*, 1950, vol. 7, pp. 1594–1598。

79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第2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第94頁。1951年春，中朝方面還在蘇聯的幫助下，一再企圖在朝鮮北方建設四個「前沿機場」，但在美國空軍的狂轟濫炸下，未能完成。

80 賴伊關於聯合國提案致周恩來電，1951年1月13日，113-00068-01，第1–2頁，外交部檔案館；*FRUS*, 1951, vol. 7, p. 64; 關於提議背景的討論，參見Stueck, *The Korean War*, pp. 152–154。

81 1951年1月10至11日，彭德懷在同金日成、朴憲永談話時明確提出，當時「志願軍實際情況」是：「西線三個戰役六個軍共傷亡近三萬人，凍傷病及少數逃亡約二萬人，總共約減員近五萬人。東線九兵團傷亡一萬八千餘，凍傷及少數逃亡約兩萬餘人，總共約減員四萬一千餘人。運輸困難，給養很差，許多棉衣被毯被敵汽油彈燒毀，送補不來，體力大為消弱，戰鬥單位人員已很不充實，因此，迫切需要補給休整，並恢復交通，改善運輸等工作，以便再戰。」彭德懷同志與金日成同志、朴憲永同志談話紀要，1951年1月10日22時至1951年1月11日1時，173-志1-1，解放軍檔案館。

82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p. 513; 參見Stueck, *The Korean War*, pp. 153–154；Foot, *A Substitute for Victory*, pp. 31–32。

83 中國政府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備忘錄（周恩來起草），1951年1月11日、1月14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4冊，第34–36頁。周恩來向金日成通報此事時強

調：「備忘錄的提議已得到蘇聯政府的同意並願予以支持。」周恩來給柴成文關於將中國政府備忘錄呈送金日成首相的電報，1951年1月14日，173-志1-1，解放軍檔案館。

84 《人民日報》，1951年1月18日；周恩來關於拒絕聯合國提案與潘尼迦談話記錄，1951年1月17日，113-00068-01，第26–34頁；章漢夫接見英國談判代表胡階森談話記錄，1951年1月18日，113-00068-01，第35–37頁，外交部檔案館；*FRUS*, 1951, vol. 7, pp. 91–92。

85 1月22日，中國外交部以答覆印度大使的方式，提出修正方案：在所有外國軍隊從朝鮮撤出的原則被接受並開始實施後，即可先實行有限期的停火，再聯繫政治問題確定談判的全部條件（參見《人民日報》，1951年1月24日，第1版）。1月17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中國共產黨致答覆時完全拒絕聯合國1月13日之建議，此『反建議』是美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也是聯合國所不能接受的。」1月18日，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奧斯汀稱：「北京之答覆，關閉了聯合國安理會和平解決戰線戰爭問題活動史上最新的一章。」外電對周恩來拒絕聯合國提案的反映，1951年1月18日23時，116-00049-02，第21–23頁。

86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的指示，1951年2月2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卷，第24–27頁。

87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1951年2月1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162頁。

88 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1年1月27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51年1月28日，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469–470頁。

89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480–481頁；王焰主編：《彭德懷傳》，第451–453頁。

90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周恩來起草），1951年3月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193–196頁。

91 菲里波夫致毛澤東電，1951年3月6日，175-志1-1，解放軍檔案館。

92 周恩來關於加強空軍問題致柴成文轉金日成並告彭德懷電，1951年3月15日，175-志1-1，解放軍檔案館。

93 周恩來致彭德懷和高崗並報毛澤東電，1951年3月22日，175-志1-1，解放軍檔案館。

94 周恩來致彭德懷並高崗並報毛主席電，1951年4月16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200–201頁。

95 軍委（羅榮桓、賴傳珠、徐立清簽發）：〈第60軍180師受損失檢查報告〉，1952年4月5日，175-志1-1，解放軍檔案館；參見杜平：《在志願軍總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第237–253頁。

9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155頁。

97 《聶榮臻回憶錄》，第741–742頁。

98 參見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 97–98。

99 毛澤東致彭德懷、高崗並轉金日成電，1951年7月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1–2頁；參加了停戰談判的喬冠華後來回憶說：「當時估計，這談判是容易

的。」在毛看來，「三五星期就夠了」，金沖及：《喬冠華談周恩來和新中國外交》（北京：三聯書店，2024），第10頁。

100 *FRUS, 1951*, vol. 7, p. 735.

101 周恩來：〈朝鮮停戰談判和對日和約簽訂問題〉，1951年9月3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234–235頁；柴成文、趙勇田：《抗美援朝紀實》（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第159–160頁。

102 毛澤東致金日成並告李克農電（周恩來起草），1952年7月15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289–291頁。

103 周恩來外長關於美英對日和約草案的聲明送交有關國家情況，1951年8月15日，105-00087-01，外交部檔案館；《人民日報》，1951年8月15日。

104 周恩來外長關於美國及其僕從國家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的聲明，1951年9月18日，118-00306-39，外交部檔案館；《人民日報》，1951年9月19日。

10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56頁；斯大林和周恩來會談記錄，1952年8月20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4卷，第244–251頁。

106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4卷，第294–298頁。

10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63頁。

10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582頁；《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292–297頁。

10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72–273頁。

110 《周恩來外交文選》，第61頁。

111 毛澤東致斯大林電（周恩來起草），1952年12月16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308–313頁。

112 林利：《往事瑣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第56–57頁；沈國凡：《周恩來養女孫維世》（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第86–91頁。

113 沈國凡：《周恩來養女孫維世》，第160–161頁。

114 任均：《我這九十年》，第141頁。

115 林利：《往事瑣記》，第216頁。

116 任均：《我這九十年》，第142–143頁；沈國凡：《周恩來養女孫維世》，第169–170頁。

117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第3卷，第358–372頁。

118 同上，第380頁。

119 蘇聯部長會議關於戰俘遣返問題給各方發出指示的決議，1953年3月19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下，第1295–1300頁。

120 周恩來與蘇共領導人會談記錄，轉引自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403–404頁。

121 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53年3月21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8冊，第200–204頁。

122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53年3月2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第2冊，第133頁。從毛的心底裏來說，這其實不是他心甘情願作出的決定。幾年後，他在同蘇聯

大使尤金談話，講到此事時說：「在朝鮮戰爭中，最後金日成不想打了，你們的馬林科夫也不想打了。我們還想打幾個月。你們看，三家的事情是不好辦的。」毛主席與蘇聯尤金大使第一次談話記錄，1958年7月21日晚10時到深夜1時半。

12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91頁。

124 毛澤東致金日成電（周恩來起草），1953年3月27日，《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91頁。

125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8冊，第217頁；《人民日報》，1953年3月31日。

12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93頁。

127 周恩來在1953年外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3年6月5日，102-00163-01，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59、61–62頁；《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348頁。

128 *FRUS*, 1952–1954, vol. 15, p. 1151.

12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118頁。

13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16頁。

131 劉少奇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1年5月7日，轉引自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1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184頁。

132 中共中央關於在全國時事宣傳的指示，1950年10月26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第436–440頁。

133 1951年11月30日，借抗美援朝之東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搞作的指示〉，提出：「黨和人民政府必須進行有系統的工作，以期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並逐步取得與保持其革命的純潔性。」因此，要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中和高中以上學校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冊，第284–290頁。

134 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改造問題〉，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選集》下，第59–71頁。

135 Wu Ningkun, *A Single Tear: A Family's 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3), pp. 6–7.

第17章

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302–303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130–131頁。

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33頁。

3 周恩來關於7月份工作計劃給毛澤東等的報告，1952年7月10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7冊，第14–15頁。

4 毛澤東給菲利波夫（斯大林）的信（周恩來起草），1952年7月26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7冊，第37–39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76–577頁。

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55頁。

6 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記錄，1950年8月20日，沈志華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4卷，第244–252頁；周恩來致毛澤東並中央電，1952年8月21日，轉引自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第424–425頁；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第372頁。

7 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記錄，1950年9月3日，沈志華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4卷，第276–287頁；周恩來關於同斯大林談話情況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1952年9月6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7冊，第113–119頁。

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58頁。

9 周恩來關於提供技術資料問題給莫洛托夫的信，1952年9月6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7冊，第120–121頁。

1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58頁；周恩來關於在蘇談判情況給毛澤東及中央的報告，1952年9月16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7冊，第143–147頁。

11 周恩來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轉引自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112頁。

12 李富春同志關於與蘇聯政府商談對我國經濟建設援助問題向中央政府委員會的報告，1953年9月3日，1-54-1554，包頭市檔案館。

13 蘇聯政府援助中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1953年5月15日，《黨的文獻》，1999年第5期，第6–9頁；參見「李富春同志關於與蘇聯政府商談對我國經濟建設援助問題向中央政府委員會的報告」，1953年9月3日，1-54-1554-59-82，包頭市檔案館；《黨的文獻》，1999年第5期，第9–18頁；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第423–446頁。

1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61頁。

1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603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第213頁。當時參加這一會議的薄一波在筆記中的記錄是，毛說：「十年到十五年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後再過渡到社會主義。」薄一波給田家英的信，1965年12月30日（複印本），《毛澤東傳》，第238頁。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第213頁。

17 《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244頁；羅瑞卿給毛澤東的信，1952年11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357–358頁。

18 毛澤東：關於羅瑞卿傳達實現社會主義的時間問題給各同志的信，1952年11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356頁。

19 張希、王亞志訪談，1992年8月。王、張兩人均曾在彭德懷處任參謀，王還曾任周恩來的軍事秘書。

20 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第104–105頁。

21 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245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623頁；第2卷，第17–18頁。

2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75頁。

23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1952年12月31日，第1版。

24 轉引自王海光：〈政爭與權爭——「高饒事件」起因再解讀〉，《領導者》，總第26期（2009年2月）。

25 毛澤東關於新稅制問題等給周恩來等的信，1953年1月1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34頁。

2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80頁。

2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第235、237–238頁。

28 同上，第235頁。

29 《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52頁。

30 這同後來安子文搞名單不是一回事。

31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289–294頁。

32 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51頁。

33 據黨內一些元老和王光美的回憶，毛、劉分歧的浮現始於1951年東北的富農問題，即是否允許發展富農經濟以及批准新富農入黨。一位黨史軍史專家給筆者的信，2025年3月。

3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282頁。

35 同上，第282–283頁。

36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第321頁。關於這件事，也有否定意見，如戴茂林在《「毛澤東查劉少奇檔案」真相調查》（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6）一書中，就遍尋此說的各種漏洞，做出毛根本沒有做過這件事的結論。但是，戴的看法又受到了熟諳此段歷史的林蘊暉的批評，林列舉多條證據，說明此事是存在的。林蘊暉：〈評戴茂林《「毛澤東查劉少奇檔案」真相調查》〉，《黨史博覽》，2017年第2期，第42–46頁。

37 《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278頁；安子文在1955年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發言，轉引自林蘊暉：《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第135–137頁。

38 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117–120頁。安子文在1955年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說，這個名單他給高崗看過，隨後就銷毀了，是高把名單的事及其內容傳出去。問題在於，安是在高崗死後，在為「高饒反黨聯盟」定性的黨代會上，當着毛澤東的面講這個話的，他當然不會說這份名單是交給毛的。

39 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118頁。

40 同上，第51、120頁。

41 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316–317頁；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118頁。

42 高崗後來說，他「不聽毛主席的招呼，私下擴散了這個名單，散播自己的錯誤想法；再後來，當毛主席追查是誰洩露此事時，自己又不敢承認，欺騙了毛主席」。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50–51、118–119頁。毛澤東在1955年中共全國

黨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中解釋何以把高、饒說成「反黨聯盟」時，其中的一條理由就是：高、饒都在各處散佈安子文擬的這個名單，「到處這麼散佈，是何居心」。

4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107–108頁。

44 周總理在1953年全國第二次財政會議籌備會議上的報告，1953年6月12日，684-1-185-3，河北省檔案館；又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07頁；《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8卷，第344–345頁。

45 《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04頁。

46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6月15日，《黨的文獻》，2003年第4期，第20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116頁。

47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3年6月1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311頁；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6月15日，《黨的文獻》，2003年第4期，第20–22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81–82頁。

48 《周恩來選集》下，第82頁。

49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6月15日，《黨的文獻》，2003年第4期，21頁；《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81–82頁。

50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94頁。

5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第240頁。

52 《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259頁。

53 張明遠回憶手稿，轉引自林蘊暉：《國史札記（事件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第102頁。

54 金沖及主編：《陳雲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第882–884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第243–244頁；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第290頁。關於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建議「搬兵」之舉，亦有學者根據對現有史料的分析提出異議，指出「搬兵」一說「存在諸多疑點，值得重新審視，並進行進一步研究」。參見戴茂林、魏子楊：〈一九五三年全國財經會議「搬兵」之我見〉，《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1期，第106–111頁。

55 林蘊暉：《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第80頁。

56 周恩來在1953年夏季全國財政經濟工作會議上的結論，1953年8月11日，684-1-185-3，河北省檔案館；又參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第132–143頁。

57 同上。

58 毛主席講話紀要，1953年8月12日晚，684-1-185-1，855-2-249-2，河北省檔案館；又參見毛澤東在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90–94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148–150頁。

59 這是黨史專家王海光提出的一個重要看法。

60 1952年1月10日，高崗在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一個題為〈克服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的報告（由馬洪根據高崗指示起草），獲得毛澤東好評，不僅在《東北日報》和《人民日報》上發表，還由新華書店印成活頁文選向全國發行。高崗由此認定，此時反右傾是毛的大思路。馬雅：《大風起兮：馬洪傳——中共高層政爭內幕》（香港：明鏡出版社，2014），第15–16頁。

61 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第309頁；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149–154頁。

62 1990年代，我同曾在彭德懷手處工作過的王亞志、張希訪談時，他們都談到，抗美援朝期間，高崗功勞很大，「彭總和周總理都說高崗做得好，不然朝鮮這個仗沒法打」。

63 參見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51–52頁。

64 同上，第99–100頁。

65 饒漱石：〈關於我的錯誤的自我檢討〉，1954年2月9日，《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第6輯，第1分冊（洛杉磯：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1995年後非正式印行），第18–24頁。

66 劉少奇：〈在第二次全國組工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10月，《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5冊，第299–310頁。

67 蘇維民：《楊尚昆談新中國歷史若干問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第56頁。

68 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141頁。

69 毛主席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中央檔案館。

70 毛澤東後來說，名單問題不在提名單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佈名單的人。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第318頁。

7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09頁；林蘊暉：《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第118–120頁。

72 林蘊暉、沈志華訪問趙家梁記錄，2005年2月2日，轉引自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第302頁；又見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121頁。

73 朱佳木主編：《陳雲年譜》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191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0頁，註2；《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57頁。

74 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52頁。

7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09頁。

76 師哲：〈憶劉少奇〉，《文史精華》，2022年第1期，第5頁；師哲曾對筆者說，毛澤東不僅是因為高崗同蘇聯的關係問題，更是因為覺得他「不聽招呼，野心太大」，才決定把他搞下去的。師哲訪談，1992年8月。

7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09頁；《陳雲年譜》中，第191頁；《鄧小平年譜》中，第1150頁。

7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09頁。

79 同上，第210頁；《陳雲年譜》中，第191–192頁。

8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10頁。

81 同上。

82 黃瑤、張明哲：《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第295頁。

8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10頁；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187頁。

84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10頁；《鄧小平年譜》中，第1151頁。
8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11頁。
86 同上。
8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63–64頁。
8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16頁。
89 劉少奇關於中央工作情況給毛澤東的信，1954年1月8日，《建國以來劉少奇年譜》第6卷，第9頁。
90 劉少奇關於七屆四中全會籌備等問題給毛澤東的信，1954年1月16日，同上，第25頁。
91 《楊尚昆日記》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第101–10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18頁。
9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21頁。
93 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48頁；《劉少奇年譜》下，第320頁；《鄧小平年譜》中，第1156頁。
94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21頁；《楊尚昆日記》，第102頁。
95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5卷，第13–17頁。
9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21頁。
97 《朱德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647–648頁。
98 高崗：〈在七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1954年2月7日。
99 劉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七屆四中全會的報告〉，1954年2月6日，684-1-316-1，第3–25頁，河北省檔案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第252–260頁；劉少奇：〈我的自我批評〉，1954年2月，《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6冊，第78–92頁。
100 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七屆四中全會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一致通過），1954年2月10日，684-1-316-1，第26–32頁，河北省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第249–250頁。
101 周恩來：〈增強黨的團結，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1954年2月10日，《周恩來選集》下，第119–128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50–351頁。
102 林蘊暉：《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第207頁。
103 朱佳木主編：《陳雲年譜》中，第197頁；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第313頁。
104 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207頁。
10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55頁。
106 周恩來同志在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1952年2月（中央政治局1954年3月1日通過），《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第267–269頁。
10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84頁。
108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5卷，第39–40頁。
109 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217–221頁。
11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59頁；參見張明遠：《我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第389–391頁；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217–221頁；林蘊暉：《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第264–270頁。

111 張明遠：《我的回憶》，第394頁。

112 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尤其是，高崗的這些隨從親信後來竟無一人受到整肅或打入「冷宮」，而是繼續受到重用。

113 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240–244頁；趙家梁口述，張曉霽整理：〈對《回憶高饒事件》的質疑〉，《炎黃春秋》，2009年第12期，第29–36頁。

114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310頁。某種意義上，毛對高的處理有點像文革中對鄧小平的處理，先「打倒」他晾起來，讓他閉門思過，但必要時還可以把他放出來，甚至再次委以重任。

115 劉樹發主編：《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第494頁。

116 《楊尚昆日記》上，第48、52頁。

117 《劉少奇年譜》下，第320頁；景玉川：《饒漱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2010），第242頁。

118 饒漱石：〈關於我的錯誤的自我檢討〉，1954年2月9日，《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第6輯，第1分冊，第18–24頁。

119 陳毅：〈在饒漱石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1954年2月23日，《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第6輯，第1分冊，第18–24、51–58頁。

120 饒漱石：〈關於我的錯誤的進一步自我批評〉，1954年2月23日，《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第6輯，第1分冊，第31–51頁。全文又見景玉川：《饒漱石》，第253–269頁。

121 鄧小平、陳毅、譚震林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1954年3月1日，SZ15-3371，湖北省檔案館；又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6冊，第148–149頁。

122 饒漱石：〈關於我的錯誤的進一步自我批評〉，1954年2月23日，《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第6輯，第1分冊，第31–51頁。

123 張雲：《潘漢年傳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353–354頁。

124 同上，第235–242頁。

125 劉樹發主編：《陳毅傳》，第494頁。

126 毛澤東1941年對〈中央情報部的性質和任務〉的批改，轉引自羅青長：〈發揚情偵工作傳統，切實解決遺留問題〉，1993年4月14日，《情報史研究》，1994年第1期（總第8期）。

127 潘漢年被捕後，在中共情報部門內部引起了巨大震動，人心惶惶，周恩來為了「穩定軍心」，在中調部的一次會議上講了這番話。徐林祥、朱玉：《傳奇將軍李克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第249頁。

128 羅青長：〈發揚情偵工作傳統，切實解決遺留問題〉。根據羅的記述，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也發過話。

129 羅青長：〈發揚情偵工作傳統，切實解決遺留問題〉；開誠：《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18），第390–396頁。

130 彭樹華：《潘漢年案審判前後：審判員親筆披露共和國第一冤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第39–40頁。

131 張雲：《潘漢年傳奇》，第363–364頁。

132 同上，第378–383頁。
133 金沖及主編：《陳雲傳》上，第839–843頁。
134 同上，第842頁。
135 同上，第842、844–845頁。
13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172–173頁。
137 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香港：三聯書店，1988），第135頁；汪東林：《梁漱溟與毛澤東》（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第20頁。
138 汪東林：《梁漱溟與毛澤東》，第21–22頁。
139 同上，第22–23頁。
140 梁培恕：《中國最後一個大儒——記父親梁漱溟》（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第307頁。
141 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第140頁。
142 毛澤東：〈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1953年9月16日–18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107–115頁；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第141–142頁。
143 胡風在給夫人梅志的多封信中曾一再尊稱周恩來為「父周」，參見吳永平：〈胡風書信中對周恩來的稱謂演變考〉，《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3期，第131–142頁。
144 林默涵述，黃華英整理：〈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林默涵問答錄之一）〉，《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
14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251頁。
14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11–12頁。

第18章

1 尤金提供的關於四國外長柏林會議情況的材料，1954年2月4日，109-00396-01，外交部檔案館；亦參見*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16, p. 415。
2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479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56–357頁。
3 周恩來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1954年10月18日，101-5-542，第8頁，福建省檔案館。
4 尤金交來關於邀請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材料，1954年3月2日，109-00396-01，外交部檔案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56頁；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480頁。
5 中國外交部（周恩來參與起草）：〈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1954年2月，206-Y0054，中國外交檔案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56–357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154–156頁。
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56頁。
7 關於這一方面的詳細論述，參見Chen Jian, "China and the French Indochina Wa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173–194；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Chapter 5。

8 周恩來同李克農、李初黎、羅貴波等的談話，1954年4月12日；羅貴波訪談，1992年8月22日。

9 周恩來在日內瓦對代表團談話紀要，1954年6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第453–454頁；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61頁；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第19–20頁。

10 周恩來同李克農、李初黎、羅貴波等的談話，1954年4月12日；羅貴波訪談，1992年8月22日。

1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55頁；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12–13頁。

1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58頁；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12–13頁。

13 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13頁；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舌戰日內瓦》(香港：天地圖書，1994)，第85–86頁。在這個問題上，越南方面後來有不同的陳述。

14 周恩來關於與馬林科夫等談越南問題致中共中央電，1954年4月23日，206-00048-08，外交部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第18–19頁；師哲：《師哲回憶錄》，第480–486頁；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13頁。

15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央電，1954年4月28日，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63頁。

16 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宴請周恩來外長、艾登席間會話摘錄，1954年4月30日，206-00091-01；周恩來就與艾登會面時所談問題致中共中央的報告，1954年5月1日，206-00045-03，外交部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第97–98頁；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58–62頁；亦參見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 May 1954, *FRUS*, 1952–1954, vol. 16, p. 648。

17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央電，1954年5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第122頁；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81–82頁；參見*FRUS*, 1952–1954, vol. 16, pp. 755–756。

18 周恩來—胡志明柳州會議記錄，1954年7月3日，中央檔案館。

19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央電，1954年5月30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168–169頁；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98頁。

2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77–378、380–382、383–384頁；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90–91頁。

21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央電，1954年6月8日(同一天送出了兩封電報)，《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77–378頁。

22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央電，1954年6月14日；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央電，1954年6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第166–167、176–177頁。

23 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90–91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83–384頁。

24 周恩來外長訪英國外交大臣艾登的談話記錄，1954年6月16日，207-00005-05，外交部檔案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83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169頁。亦參見Anthony Eden to Foreign Office, June 16, 1954, FO371-110245, folder 1, UKNA; Anthony Eden, *Full Circl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0), p. 145; *FRUS*, 1952–1954, vol. 16, p. 1158。

25 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關於老撾、柬埔寨問題的發言，1954年6月16日，206-00013-11，外交部檔案館；亦參見*FRUS*, 1952–1954, vol. 16, p. 1158。

26 周恩來總理關於與法國外長皮杜爾談話內容致中共中央的報告，1954年6月18日，206-00046-22，外交部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第281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87頁。

27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央電，1954年6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第176頁；*FRUS*, 1952–1954, vol. 16, pp. 1204–1205。

28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央電，1954年6月19日，轉引自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98頁。

29 周恩來致鄧小平轉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央電，1954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第174頁；中共中央致周恩來電，1954年6月20日，206-00049-01；中共中央致韋國清和喬曉光轉越南勞動黨中央電，1954年6月20日，206-00049-01，外交部檔案館。

30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央電，1954年6月19日，轉引自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98頁。

31 周恩來總理與法國總理兼外長孟戴斯－弗朗斯的會談紀要，1954年6月23日，206-00006-06，外交部檔案館；亦參見*FRUS*, 1952–1954, vol. 16, pp. 1233–1234。

32 周恩來和薩納尼空的會談記錄，1954年6月21日，206-00007-03；周恩來就與柬埔寨和老撾代表團會談致中共中央的電報，1954年6月24日，106-00046-29，外交部檔案館；亦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88–389頁。

33 周恩來－胡志明柳州會談記錄，1954年7月3日；周恩來關於同胡志明和其他越南領導人會談簡況致中共中央電，1954年7月3日13時，206-00049-03，外交部檔案館。

34 周恩來關於柳州會議續報致毛澤東、劉少奇並報中央電，1954年7月4日18時，206-00049-03，外交部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第230頁。

35 周恩來－胡志明柳州會談記錄，1954年7月3日–7月4日；參見周恩來關於柳州會議續報致毛澤東、劉少奇並報中央電，1954年7月4日18時，206-00049-03，第23–24頁，外交部檔案館；又參見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141–142頁；羅貴波訪談，1992年8月22日。

36 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143–144頁

3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94–395頁。

38 Ho Chi Minh, "Report to the Sixth Meeting of the VWP Central Committee, July 15, 1954, *Selected Works of Ho Chi Minh*, vol. 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pp. 290–298.

3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95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255頁。

40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4年7月7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32–33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95頁。

41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轉胡志明電，1954年7月11日，轉引自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147–148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第231–232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96–397頁。

42 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150頁。

43 周恩來和范文同談話（摘錄），1954年7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第190–191頁；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151–152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97頁。

44 周恩來與孟戴斯－弗朗斯談話記錄，1954年7月13日，206-Y0007，外交部檔案館。

45 周恩來總理與艾登談話記錄，1954年7月13日，206-00091-10，外交部檔案館。

46 關於這方面的更為詳盡的論述，參見Chen Jian, "China and the Indochina Settlement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in Mark Lawrence and Fredrik Logevall, eds., *The First Vietnam War: Colonial Conflict and Cold War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40–262。

47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央電，1954年7月22日1時，206-Y0051，外交部檔案館。

48 周恩來對外交部全體幹部的講話，1954年11月3日，1057-8-44，第37頁，河北省檔案館。

49 〈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1954年2月，206-Y0054，外交部檔案館。

50 Record of meeting between Lei Jen Min and Trevolyan and Tennant, May 7, 1954,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PG and UK (Folder 2) (1954), FO 371/110288, UKNA.

51 周恩來總理接見英國威爾遜和羅布遜－布朗的談話摘要，1954年5月30日，207-00008-01，外交部檔案館。

52 周恩來總理就中國英國官方和半官方接觸情況致中共中央的報告，1954年6月1日，206-00046-01，外交部檔案館。

53 周恩來總理和艾登談話要點，1954年6月1日，110-00023-08；周恩來總理關於英國同意我設倫敦談判代表處事致中共中央的報告，1954年6月3日，206-00046-03，外交部檔案館。

54 中共中央對周恩來6月1日電的覆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第416頁。

55 周恩來總理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摘要），1954年8月12日，101-5-542，福建省檔案館。

56 師哲訪談，1992年8月。

57 宦鄉司長和英國談判代表杜威廉的談話紀要，1954年5月19日，206-00011-03，外交部檔案館。

58 周恩來關於英國要求我釋放其犯罪僑民事致中共中央的報告，1954年6月3日，206-00046-05，外交部檔案館。

59 宦鄉司長和英國談判代表杜威廉的談話紀要，1954年6月4日，206-00011-05，外交部檔案館。

60 宦鄉司長和英國談判代表杜威廉的談話紀要，1954年6月4日下午，206-00011-05，外交部檔案館。

6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編：《1954年日內瓦會議》，第401頁；參見*FRUS*, 1952–1954, vol. 14, p. 478。

62 中共中央關於日內瓦會議後對美蔣鬥爭的方針和措施致周恩來總理的電報（鄧小平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起草），1954年7月27日，206-00048-11 (1)，外交部檔案館；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262–263頁。

63 當時，周恩來的幾位隨員得知電報的內容後，就都覺得「這對總理太不公平了」。薛謀洪訪談，1994年8月；擔任周的翻譯的浦壽昌也曾回憶道：周恩來希望得到的是讚揚，但等來的卻是「一盆冷水」；何迪在1996年1月於香港大學舉行的「冷戰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的發言中提供的信息。

64 周總理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摘要），1954年8月12日，101-5-542，福建省檔案館。周恩來是在「有關部門幹部會議」上做這個報告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409–410頁。

65 轉引自國際戰略基金會編：《環球同此涼熱——一代領袖們的國際戰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266–267頁。

66 中共中央關於日內瓦會議後對美蔣鬥爭的方針和措施致周恩來總理的電報，1954年7月27日，206-00048-11 (1)，外交部檔案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263頁。

67 《人民日報》，1954年7月23日，第1版。

6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405頁。

69 參見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第7章中的相關討論；徐焰：《金門之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第166–188頁。

70 參見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p. 178–180。

71 《中美關係研究資料》第2輯，下，第2017–2019頁。

72 參見Gordon H. Chang, *Friends of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6–128。

73 《人民日報》，1954年12月9日，第1版。

74 周恩來總理與尼赫魯第一次會談記錄，1954年10月19日，204-00007-03 (1)，外交部檔案館。

75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的信，1954年12月10日，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430頁。

76 Gordon H. Chang and He Di, "The Absence of War in U.S.–China Confrontation over Quemoy and Matsu in 1954–1955: Contingency, Luck, Deterr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8, no. 5 (Dec. 1993): 1513–1514.

77 〈外交部關於我對亞非會議態度致駐外使節的電報〉，1954年12月25日，《中國代表團出席1955年亞非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2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第25頁。

78 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中共中央電，1954年6月22日，轉引自熊華源：《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第125頁。

79 薛謀洪訪談，1994年8月22日。當時，薛老說了一句話：「周恩來和尼赫魯『八字不合』，尼赫魯從骨子是看不起周恩來這樣沒有西方背景的中國領導人的。」

80 周恩來訪問印度期間兩國總理會談記錄，1954年6月，203-00006-1，外交部檔案館。

81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第100、121–122頁；薛謀洪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第80–81頁。

82 薛謀洪主編：《當代中國外交》，第81頁；又參見周恩來總理和吳努總理第一次和第二次會談記錄，1954年6月28日，203-00007-03，外交部檔案館。

83 毛澤東和尼赫魯第一次會談記錄，1954年10月19日，204-00007-01，外交部檔案館。

8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致駐外使館電，1954年12月25日，外交部檔案館編：《中國代表團出席1955年亞非會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第14、25頁。

85 周恩來總理和尼赫魯總理第二次談話記錄，1954年10月20日，207-00007-05 (1)，外交部檔案館。

86 在中國外交部2004年解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至1955年的外交檔案資料中，包括了經周恩來親自修改、並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的檔案原件，在最初的幾稿中，周恩來親筆做了大量修改。參見〈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1955年4月5日，207-0004-01 (1)，外交部檔案館。

87 〈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1955年4月5日，第8頁。

88 同上，第5頁；〈參加亞非會議初步工作計劃草案〉，1955年1月16日，200700005-3 (1)；外交部亞洲司編：《關於亞非會議問題》，1954年12月15日，207-00085-17 (1)，外交部檔案館。

89 外交部給廣州外事處速告黃作梅同志並廣東省委電，1955年4月9日，207-00064-20，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462頁。

90 關於這一事件的中方解密檔案資料，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編：《中國代表團出席1955年亞非會議》，第144–260頁；相關的研究，參見Steve Tsang, "Target Zhou Enlai: The 'Kashmir Princess Incident' of 1955,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9 (Sep. 1994)。

91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The Secret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London: John Murray, 1993) , p. 27.

92 FO 371-120966, UKNA.

93 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的發言，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34頁。

94 我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上的發言，1955年4月19日，207-00006-1(1)，外交部檔案館；講話全文發表於《人民日報》，1955年4月20日，第1版。

95 周恩來致張聞天並報中央電，1955年4月25日；周恩來致中央並報主席電，1955年4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中國代表團出席1955年亞非會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第78–79、87–90頁。

96 《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208–209頁。

97 周恩來在亞非會議全體會議上的補充發言，1955年4月19日下午，207-00006-02(1)，外交部檔案館；《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20–125頁。

98 李慎之、張彥：《亞非會議日記》(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6)，第17–18頁。

99 A. Doak Barnett, *Chou En-lai at Bandung: Chinese Communist Diplomacy at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a Report from A. Doak Barnett* (New York: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1955).

100 周恩來總理接見印度尼西亞駐華使節談支持埃及反對英法侵略問題，1956年11月2日，105-00309-01，外交部檔案館。

101 周恩來總理和埃及駐華大使拉加卜(Hassan Ragab)談話摘要，1956年11月7日，107-00075-02，外交部檔案館。

102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第283頁。

103 1954年8月14日，周恩來總理接見英國工黨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10-00027-03，外交部檔案館。

104 周恩來總理關於外交問題的報告，1954年8月12日，101-5-542，1-10，福建省檔案館。

105 《中日貿易協議》，1952年6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49–1952》(對外貿易卷)(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第623–624頁。

10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323–324頁。

107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第158–159頁。

108 周恩來總理接見日本村田省藏談話記錄，1955年1月23日下午1時30分，105-00210-03，外交部檔案館；村田省藏「與周總理懇談」，A'-0133，第122–148頁，日本外交部外交史料館。

109 周恩來接見日本高碕談話紀要，1955年4月22日，105-00211-04；章漢夫：(亞非會議)每日紀要，1955年4月22日，207-00016-01，外交部檔案館。

110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第158–159頁。

111 周恩來總理接見日本工商界訪華代表團團長田島正雄談話情況專報，1955年10月14日，105-00210-06，外交部檔案館；周恩來總理接見日本工商界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7月28日，105-00500-06，外交部檔案館。

112 《人民日報》，1955年4月24日。

113 *FRUS*, 1955–1957, vol. 2, p. 643; 周恩來總理與英國代辦歐念儒談話紀要，1955年7月15日，110-00141-04，外交部檔案館。

114 周恩來總理就提前釋放十一名美國飛行員等事與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談話紀要，1955年7月31日，105-00061-04，外交部檔案館；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第46–49頁，《人民日報》，1955年8月2日。

115 *FRUS*, 1955–1957, vol. 3, pp. 85–86.

116 中美領事級談判第十次會談紀要，1954年11月29日下午4時45分，111-00011-02，外交部檔案館。

117 周恩來總理同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三次會談紀要，1955年1月6日–10日，113-00201-02；參見Thomas Christensen, *Lost in the Cold War: The Story of Jack Downey, America's Longest-Held P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chap. 14。

118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2期，第333頁。

119 《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47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542–543頁。

120 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的報告，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320頁。

121 周恩來總理與梅農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談話紀要，1955年5月12日、5月15日、5月18日、5月19日5月20日（兩次談話），105-00056-02、105-00056-03、105-00056-04、105-00056-05、105-00056-06、105-00056-07，外交部檔案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466–467頁。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此有多處記述，稱「共匪周恩來由印度梅農轉達」的「在一般基礎」或「任何基礎」上與其談判的意願，「乃是共匪戲劇性之騙人慣技」。蔣介石：〈上月（1955年6月）反省錄〉，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5》，第174頁。

12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623頁。

123 同上，第624頁；李偉：《曹聚仁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16–17章。蔣介石對周恩來通過曹聚仁轉達的信息大不以為然，稱之為「共匪」企圖離間台北和華盛頓關係的「奇妙而毒辣」之「伎倆」。蔣介石日記，1958年9月29日，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8》，第242頁。

第19章

1 毛澤東後來在1958年成都會議上說：「1956年發生的幾件事沒有料到，就是國際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國內的反冒進問題。」主席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25日，91-18-495，甘肅省檔案館。

2 中共代表團雖未出席會議，但中方在二十大閉幕當天就已知道，「蘇共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同志還向全體代表作了關於反對個人崇拜問題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除了肯定斯大林……有巨大功勞之外，還指出了在他生活和活動的後期，由於他沒有個人謙虛、接受和鼓勵對他個人的崇拜、忽視黨的生活的準則和黨的領導的集體原則，往往獨自對問題作決定的結果，導致了對黨的原則和黨內民主的違背，導致了對革命法制的破壞，導致沒有根據的鎮壓，以及在蘇德戰爭爆發前沒有應有的警惕等等的嚴重的錯誤，並且指出這種領導方式以及這些錯誤，給黨帶來了很大的損失。這個報告，得到了代表們一致的在原則上的贊同。」中國駐蘇使館：〈朱德訪蘇出席蘇共二十大情況，二月二十五日〉，1956年2月25日，109-00985-01，外交部檔案館。

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36、545頁；趙仲元：〈1956年隨朱德參加蘇共二十大〉，《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2期，第89頁。

4 《鄧小平年譜，1904–1975》下，第1275頁。

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45、549–550頁；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496頁；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第6頁。

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45、549–550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2–14、18頁。

7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時，專門講到這個問題：「（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聽說批評斯大林了，又一下子把他貶到了地下九千丈。我們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按照這個分寸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現在如果說他二分錯誤八分成績，左派不滿意；如果說四分錯誤六分成績，另一派人也不滿意。來一個三七開，比較合適和公正。」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央辦公廳，1956年5月7日，SZ1-01-0001-001，湖北省檔案館；毛主席在中央政治擴大會議上的報告（筆記），1956年4月25日，91-018-0001，甘肅省檔案館。這個講話後來經毛一再修改、擴充後，以〈論十大關係〉為題，收入了《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267–288頁。關於毛對斯大林三七開的評價，又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501–502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2頁。

8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9–10頁。

9 《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

10 周恩來在駐外使節和中央機關司局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4月5日，轉引自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4冊，第89–92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562–563頁。

11 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500頁。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第532頁；石仲泉：《我觀周恩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第240頁。

13 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1956年1月14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3冊，第14–51頁。

1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545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第532–533頁。

1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第528頁。

16 胡喬木談1956年「反冒進」和1958年批「反冒進」的一些情況，1982年11月4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269頁。

1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575頁。

18 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41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第634頁。

1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584頁。

20 同上，第585–586頁。
21 《劉少奇年譜》下，第369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第536頁。
2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冊，第587頁；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48頁。
23 《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第1版。
24 毛澤東：〈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96頁。
25 周恩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1956年9月16日，《周恩來選集》下，第218–219頁。
26 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1956年9月16日，《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223頁。
27 中共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1956年9月27日通過，《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第341頁。
28 《胡喬木傳》編寫組：《胡喬木傳》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第268頁。
29 參與這個決議起草的胡繩對當時的情形有一段生動的描寫：「那時會議很緊張，幾乎天天開大會，代表自己報名發言，毛主席、劉少奇不好完全不聽，又要聽會，又要和外國人交往，所以非常緊張，根本顧不到。」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65–67頁。
30 韓鋼：〈「八大懸案」釋疑〉，《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42頁。
31 陳曉農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2011），第138頁。
32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25–26頁。當時任八大新聞組負責人的吳冷西，在回憶錄中對此有另一說法。決議通過後，他馬上去向鄧小平請示，「決議是否照發，還有什麼要修改的」。他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正在議論有關決議的問題」。毛說，「他覺得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說法要斟酌，把『要求』和『現實』、『需要』和『不能滿足』作為主要矛盾是否妥當？『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的關係是否是主要矛盾？我們過去一貫的看法，生產關係同生產力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少奇同志提出是否再加修改才發表。」毛主席說，大會已經通過了，再修改不合黨章，而且現在一時也想不出恰當的提法；明天就照樣發表，以後如何修改從長計議。在場的其他中央同志也同意這樣做。吳冷西：《新的探索和整風反右——吳冷西回憶錄之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第50–51頁。
33 這裏關於毛澤東不同意報告決議中「主要矛盾」提法的敘述，都來自口述史或回憶錄，並沒有當時文獻資料的印證。韓鋼詳細對照考察相關資料後指出，毛澤東在八大後的一段時間裏，在幾次重要講話中「並沒有批評八大決議」的意思；毛對八大決議的異議和否定，是後來才提出的。韓鋼：〈「八大懸案」釋疑〉，第43–45頁。
34 Pawel Machcewicz , *Rebellious Satellite: Poland 1956*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18, 143–144. 中國大使館的一份報告引用波蘭外交部提供的信息說，事件中共有38人死亡，270人受傷；109–01141–01，外交部檔案館。

35 中國駐波蘭使館致外交部電，1956年6月29日；王炳南給外交部的報告，1956年7月5日；中國駐波蘭使館：關於波茨南暴力事件的意見，1956年7月25日，109-00761-02、109-00761-04、109-00761-01，外交部檔案館；謝文清：〈關於波茨南反革命暴亂事件的原因〉，1956年7月12日，新華社：《內部參考》，第1945期（1956年7月28日），第591–604頁；謝文清：〈關於波茨南暴亂事件的看法和分析〉，1956年7月25日，《內部參考》，第1952期，第75–89頁。

36 1957年1月周恩來訪問波蘭時，專門接見了謝文清，說：「你反映了真實的情況，說了真話。謝謝你啦！」謝文清：〈親歷報道華沙事件真相〉，《中共黨史資料》，2007年第3期，第52頁。

37 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計劃的報告，1956年11月10日（記錄稿），中央檔案館。

38 主席在八屆二中全會的總結記錄，91-18-480，甘肅省檔案館。

39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和中朝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第294–308頁。

40 毛澤東、周恩來等和米高揚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18:00–21:00。

41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第333–343頁。

42 毛澤東、周恩來等和米高揚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18:00–21:00。

43 同上。

44 毛澤東、周恩來等和崔庸健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22:30–24:00。

45 毛澤東、周恩來等和米高揚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19:30–21:00。

4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14–15頁；《林克工作筆記》（手稿複印本），1956年10月20日；吳冷西：《十年論戰》，第37–42頁。

47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35–36頁；參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51頁；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803–804頁。

48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44頁。

49 《林克工作筆記》（手稿複印本），1957年1月16日。

5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8頁；劉少奇在八二中全會上關於時局的報告，1956年11月10日，中央檔案館。劉在報告中陳述，他到莫斯科後問蘇聯領導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要根據什麼原則？蘇幫助波、匈，但他們還反蘇，是什麼原因？」劉提議：「你們是否可以發表一個聲明，就是政治經濟都平等的。毛主席講，社會主義之間也可以實行五項原則，你們發表一個聲明好不好？……最後他們同意我們的意見，政治、經濟、軍事都可以放手，華沙條約也可以撤軍。於是，有30號的宣言。」

51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51頁；"The 'Malin Notes' on the Crises in Hungary and Poland, 195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s. 8–9 (Winter 1996/97): 392。

5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18–19頁；劉少奇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時局的報告，1956年11月10日，中央檔案館。

53 劉少奇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時局的報告，1956年11月10日（記錄稿），中央檔案館；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62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53頁。

54 Mark Kramer, "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1956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s. 8–9: 369–370.

55 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第57–58頁。

56 《林克工作筆記》（手稿複印本），1956年10月31日。關於是否可以搞兩個黨，毛澤東並非偶然提及。據李慎之回憶，當時「《內部參考》登了一條消息，說是蘇聯有兩個院士主張搞兩黨制，結果就被蘇共開除黨籍了。毛主席看過這個了，就在常委會上講，吳冷西回來傳達的，說『蘇聯為什麼把他們開除呢？要是我啊，我就要專門向他們請教，你這個兩黨制怎麼搞法？』毛主席說的，全國沒有幾個人知道，只有六個常委，外加一個吳冷西」。劉志勤、王學泰、王毅採訪，王建勛、李爾柔、李三達整理：《李慎之口述往事》（北京：貽慎書屋，2020），第133頁。

57 劉少奇在八屆二中上全會關於時局的報告（記錄稿），1956年11月10日，中央檔案館；又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第556頁。

58 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計劃的報告，1956年11月10日（記錄稿），中央檔案館；周恩來：〈八屆二中全會報告提綱〉，1956年11月10日，中央檔案館編：《周恩來手跡選》第6卷（提綱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第123頁；《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3冊，第444頁；又參見《周恩來選集》下，第229–238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第556頁。

59 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計劃的報告，1956年11月10日（記錄稿），中央檔案館；又參見《周恩來選集》下，第229–238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637頁；《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39–341頁。

60 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1957年計劃的報告，1956年11月10日（記錄稿），中央檔案館；又參見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44頁。

61 主席在八屆二中全會的總結記錄，1956年11月15日，91-18-480，甘肅省檔案館；《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13–329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32–35頁。

62 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48頁。

63 《林克工作筆記》（手稿複印本），1956年11月26日；又見主席在八屆二中全會的總結記錄，1956年11月15日，91-18-480，甘肅省檔案館。

64 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內部報告，1957年7月9日，1057-8-44，第102頁，河北省檔案館。這報告的一小部分曾公開發表，見《人民日報》，1957年7月10日，第1版。

65 周恩來總理與吳努總理第二次會談，1954年6月29日，203-00007-03，外交部檔案館。

66 周恩來總理正式邀請緬甸總理吳努訪華及吳努訪華經過，1954年8月28日–12月19日，204-00154-02，外交部檔案館。

67 1954年10月，尼赫魯訪華，在同周恩來的會談中涉及了邊界問題，兩人的看法明顯存在分歧。尼赫魯說：「印度的疆界是很清楚的，現在印度政府並已按此界線進行管理。」周恩來說：「疆界問題是一個歷史遺留的問題，現在中國出版的都是舊地圖，我們尚未進行勘察，又未同有關國家商量，不會自行修改疆界。吳努總理曾建議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同意，但是我們需要時間，以便準備。」周恩來總理與尼赫魯第二次會談要點，1954年10月20日，204-00007-04(1)，外交部檔案館。

68 中國、緬甸邊境雙方軍隊發生槍擊事緬方致我照會，1956年1月27日，105-00745-01，外交部檔案館。

69 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內部報告，1957年7月9日，1057-8-44，第103頁，河北省檔案館。

70 周恩來總理主持中緬間未決問題討論會，1956年3月7日，105-00447-01，外交部檔案館。

71 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內部報告，1957年7月9日，1057-8-44，第122頁，河北省檔案館。

72 同上。

73 周恩來會見緬甸駐華大使吳拉茂談話紀要，1956年6月22日，105-00307-02，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591頁；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95頁。

74 戴超武：〈中緬邊界問題與尼赫魯的干預及其戰略意圖(1956–1960)〉，《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11期，第57頁。

75 轉引自卓人政主編：《殷殷胞波情——1956年中緬邊民大聯歡》(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119頁；程瑞聲：〈中緬邊界談判親歷記〉，《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4期，第100–101頁；又參見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內部報告，1957年7月9日，1057-8-44，第102頁，河北省檔案館。

76 周總理與緬甸駐華大使吳拉茂兩次談話的要點，1956年8月7日–8月28日，105-00757-02，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614頁。

77 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同緬方領導人談話要點，1956年9月15日–12月24日，203-00019-02，外交部檔案館；參見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4部，第238–239頁。

78 周恩來總理訪問越南雙方會談議題和發表的聯合公報，1956年11月17日，203-00016-02，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第639–642頁；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4部，第138頁。

79 外交部第二亞洲司：我國對越南援助情況，1960年4月，203-00147-07，外交部檔案館。

8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30頁。

81 張青：〈情深意重二十載——周恩來和西哈努克交往紀實〉，田曾佩、王泰平主編：《老外交官回憶周恩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第150頁。

82 周恩來總理電告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他同印度總理尼赫魯談匈牙利問題的情況，1956年12月31日，109-01046-02，外交部檔案館。

83 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同緬方領導人談話要點，1956年9月15日–12月24日，203-00019-02，外交部檔案館；參見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4部，第180–181頁。

84 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內部報告，1957年7月9日，1057-8-44，第102–141頁，河北省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在二屆政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6日，轉引自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4部，第242–243頁；參見楊明偉：《走出困境》，第105頁的相關論述。

85 參見卓人政：〈解決中緬邊界的良好開端——我軍撤出「一九四一年線」以西〉，《百年潮》，2003年第3期，第24–26頁；楊克成：《我對中緬劃界工作的回憶》，第281–282頁。

86 卓人政主編：《殷殷胞波情》，第121–122頁。

87 我駐巴基斯坦使館電報關於周恩來總理在巴訪問情況，1956年12月24日–26日，203-00091-04，外交部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56年第47號（1956年12月30日），第1155–1156頁。

88 Talks with Chou Enlai, January 1, 1957, in Mushirul Hasan,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ries II), vol. 36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05), p. 614.

89 尼赫魯致周恩來信，1958年12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中國和印度關於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和其他問題來往文件彙編，1950.8–1960.4》，第173–174頁。

90 周恩來總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關於中印邊界局勢的談話記錄，1962年10月8日，109-03804-01，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534頁。

91 《中國和印度關於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和其他問題來往文件彙編，1950.8–1960.4》，第177頁。

92 多年前，我曾在一次由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組織的旅美學者和達賴喇嘛的會面中，問及他對1954年北京之行的看法。他說那次經歷，尤其是同毛、周的會面，令他印象深刻。他去北京的路上「心中充滿恐懼」，但在回拉薩的路上卻是「心中充滿希望」。

93 周恩來和達賴喇嘛談話記錄，1956年11月29日，105-00329-01，外交部檔案館；西藏自治區黨史辦公室編：《周恩來與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第142–148頁。

94 周恩來和達賴喇嘛談話記錄，1956年12月30日，105-00329-02，外交部檔案館；《黨的文獻》，1994年第2期，第36–37頁。

95 同上。

96 Hasan,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pp. 618–619.

9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180頁。

98 中共中央致周恩來電，1956年12月4日；周恩來致中共中央電，1956年12月8日，109-00805-01，外交部檔案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3冊，第506–507頁。

9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53頁。

100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第62–91頁。

10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60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頁。

102 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28–230頁；沈志華：《無奈的選擇》，第485–487頁。

10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5頁。

104 沈志華：《無奈的選擇》，第488–489頁。

105 周恩來在同蘇、匈領導人的會談中說：「我們接到匈牙利方面的通知，希望我們提供二億盧布的貸款，其中五千萬盧布的外匯，一億五千萬盧布的物資。經過我們研

究以後，……我們打算除了以前三千萬盧布的援助之外，先貸給一億盧布的外匯，這筆外匯馬上就可以撥付。……在物資方面，我們今年可以提供一億盧布以上的物資，這批物資主要是消費品，部分是礦產品，我們可以先運來。我們鑒於匈牙利在工業上有些減產……，可以用記帳的辦法，但是不要利息。」中國駐匈使館致外貿部並外交部電，〈匈中蘇三方在莫斯科會談時總理對貸款給匈的談話〉，1957年1月18日，203-00097-05，第41–42頁，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184頁。

106 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33頁；沈志華：《無奈的選擇》，第489–490頁。

107 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29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3頁。

108 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28–230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5頁。

10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72頁。

110 同上，第84、92頁；《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6頁。

11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112–113、116–117頁。

11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7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369頁。

11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7頁；《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第222–226頁。

11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6頁。

115 《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386頁。

116 同上。

11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169頁。

118 《人民日報》，1957年7月1日，第1版；《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34–439頁。

119 《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387頁。

120 周恩來：〈在一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57年6月27日，第1版。

121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56–457頁。

122 周總理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草稿），1957年8月4日，SZ1-01-0012-001，湖北省檔案館。這一講話以「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為題，在《周恩來選集》下卷發表（第266–267頁），但在述及民主集中制時，文字上略有修改：「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紀律；又有個性的發展，又有統一意志。」

123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75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46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113頁。

124 毛主席在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時的講話，1957年10月9日，91-18-496，第163–169頁，甘肅省檔案館；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1957年10月9日，1-13-1957，第49–54頁，吉林省檔案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223頁。

125 《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466–479頁。

126 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我到莫斯科來了兩次，頭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黨』那是一句空話，講得好聽，實際上不平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83頁。

127 毛主席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4、16、18日，855-4-1285-1，河北省檔案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81–101頁。毛澤東關於核戰爭、資本主義滅亡、永久和平之間關係的這套「極而言之」的說法，他在黨內會議上也說過好幾次。例如，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說：「原子仗現在沒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幾億人口剩九億，換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滅亡，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毛主席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1958年5月17日下午，855-4-1262-2，第16頁，河北省檔案館。

128 筆者採訪李越然的記錄，1997年10月。

129 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發言之後，會場上是一片墳墓般沉默。……會後各代表團開始談感想。我還記得諾沃提尼（捷共中央第一書記）同志說：『毛澤東同志說他們準備損失6億人口中的3億。那我們怎麼辦？我們只有1,200萬人口。我們到那時將全部損失掉，那就沒有人來恢復我國人口了。』」述弢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第2272頁。

130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第418–419頁。

131 周恩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紀要，1958年1月8日，109-00828-01，中國外交部檔案館。

13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27–129頁；沈志華：《最後的「天朝」》，第428頁。

133 周總理關於中朝關係的講話，1958年2月21日，11411-1958-94，吉林省檔案館。

134 同上。

135 〈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90頁。

136 主席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20日，91-18-495，甘肅省檔案館。

137 《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3日。

138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44頁。

139 〈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人民日報》，1957年12月12日。

14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276頁。

141 轉引自楊明偉：《走出困境》，第12頁。

142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356頁。

143 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48頁。

144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357頁。

14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276–28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20頁。

146 主席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9日，91-18-495，甘肅省檔案館；陳明顯：《晚年毛澤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164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309–310頁。

147 關於周恩來的自我批評，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424–425頁；相關討論，亦見Chen Xiaolu, "Chen Yi and China's Diplomacy," in Michael H. Hunt and Niu Jun, eds., *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20s–1960s: 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Washington, D.C.: Asian Program, 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s, 1994), pp. 91–92。

148 毛主席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1958年5月17日下午，855-4-1262-2，河北省檔案館；又參見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248頁。

149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第361–362頁。

150 同上，第363頁。

151 主席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62年1月30日，855-6-2265-1，河北省檔案館。

152 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第247–248頁。

153 周恩來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1958年5月30日，855-4-1273-3，河北省檔案館。

154 轉引自史唯：〈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第10頁。

155 《八大第二次會議各代表團活動情況》，第14號，1958年5月21日。

156 主席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1958年5月17日下午，855-4-1262，河北省檔案館；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58年5月17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417頁。在河北省檔案館收藏的毛這次講話的打印稿中，沒有這段話。

157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中共中央設立外事小組和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的聯合通知，1958年3月6日，91-004-0283，甘肅省檔案館。外事小組成員為陳毅(組長)、張聞天、李克農、廖承志、葉季壯、劉寧一；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為陳毅，副主任為廖承志、劉寧一、孔原、張彥。

158 陳毅在外交部務虛會議第27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6月17日(記錄稿)，外交部一位資深幹部的工作筆記；又參見陳毅在外交部黨組務虛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6月17日，轉引自何迪：〈毛澤東的美國觀〉，國際戰略基金會編：《環球同此涼熱》，第266–267頁。

159 Hunt and Niu, *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pp. 91–92.

160 周恩來在外交部務虛會議第28次會議上的發言，1958年6月18日(記錄稿)，外交部檔案館。

161 Hunt and Niu, *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pp. 91–92.

16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368頁；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第249頁。

16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424–425頁。

164 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1958年6月11日，91-004-0283，甘肅省檔案館。

第20章

1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1958年1月3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189頁。

2 《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500頁。
3 《毛澤東外交文選》，第294頁。
4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要點，1958年1月28、30日，91-18-495，第200–204頁，甘肅省檔案館；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747頁。就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談到知識分子時說：「知識分子要想勞動人民投降。知識分子在某一點上是最無知識。」
5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8日下午，855-4-1262-1，河北省檔案館；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15–817頁。
6 毛主席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一次講話(記錄)，1958年5月8日下午，91-18-495，第259頁，甘肅省檔案館；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8日下午，855-4-1262-1，第6頁，河北省檔案館。
7 周恩來致毛澤東的信，1958年5月26日夜，1-14-75，吉林省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45頁。
8 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這裏主要是鋼」；「中心問題是搞鋼」；「今年明年要拼命幹，不拼命不行，鋼要保證完成」。《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73頁；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8月17日；毛主席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19日，91-018-0945，甘肅省檔案館。
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429、434頁。
10 《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24–825頁。
1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69–170頁。
12 毛澤東關於向軍委會印發《兩年超過英國》報告的批語，1958年6月2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434頁。
1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3頁；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8月17日，91-018-0945，甘肅省檔案館。9月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時說：「糧食，苦戰三年，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億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億五千萬斤。後年就要放低步調了，因為糧食還要找出路。糧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業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做燃料，經過酒精搞橡膠，搞纖維，搞塑料，等等。」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1958年9月8日，1-14-74，第18頁，吉林省檔案館。
14 劉少奇和鄧小平都可稱是大躍進的「幹將」和吹鼓手。陳雲的話轉引自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第179頁。
15 《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260頁。
1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51頁。
17 同上，第152頁。
18 程華等編：《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第19頁。
19 彭德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發言，1958年7月19日，1/1-11/28，長春市檔案館；朱楹、溫鏡湖、熊錚彥、杜魁元：《粟裕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第23章。
20 轉引自林蘊暉：《烏托邦運動》，第492頁。

21 王焰等：《彭德懷傳》，第550頁。

22 毛澤東在方強對軍委擴大會議開法的意見上的批語，1958年6月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416頁；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第123頁。

23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第82–98頁；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第164–208頁。

24 毛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6月21日，91-0495-018，甘肅省檔案館；毛主席在軍事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根據康生同志傳達記錄稿)，1958年6月21日，855-4-1258-4，河北省檔案館；王焰等：《彭德懷傳》，第555頁；李曼村等：《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第664–665頁。

25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453–454頁。

26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記錄，1958年8月17日，91-018-0495，第311–333頁，甘肅省檔案館；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上的五次講話(記錄)，1958年8月17日、8月19日、8月21日上午、8月24日上午、8月30日，855-4-1265-4，河北省檔案館；又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11–420頁。

27 參見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文件彙集，1958年9月20日，177-001-0408，第1–95頁，甘肅省檔案館。

28 《人民日報》，1958年9月1日。

29 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5日，855-4-1261-4，河北省檔案館；毛澤東：對北戴河會議工業類文件的意見，1958年9月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27頁。

30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2冊，第333頁。

31 周恩來：台灣的解放一定能夠實現，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選集》下，第202頁。

32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工作的指示，1956年7月29日，101-5-841，第25–27頁，福建省檔案館。根據指示，將由「統戰、調查、公安、外交、僑委、總政、軍情負責人成立一對台工作組」，配合中央，「採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以及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以台灣實力派為重點去尋找關係線索，逐步打開缺口」。

3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4頁。

34 葉飛致彭德懷並軍委的報告，1958年1月16日，101-12-221，第1–14頁，福建省檔案館；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第635–642頁；徐焰：《金門之戰》，第196頁；韓懷智主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第387頁。

35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記錄，1958年8月17日，91-018-0495，第311–333頁，甘肅省檔案館；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8月17日，855-4-1265-4，河北省檔案館；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6頁。

36 《彭德懷年譜》，第691頁；毛澤東給彭德懷、黃克誠的信，1958年7月27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487頁。

37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wight D. Eisenhower, 1958*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pp. 639–650.
38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September 10, 1958;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pp. 115–122;又參見Eisenhower, *Waging Peace*, p. 298。
3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63頁。
40 同上；《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20頁。
41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4)，第79–80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33頁。
42 吳冷西：《憶毛主席》，第78–79頁。
43 *FRUS*, 1955–1957, vol. 3, pp. 643–644, 657–659;〈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中美大使級會談的聲明〉，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1958年7月1日，第1版。
44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1958年9月4日，《人民日報》，1958年9月5日，第1版。
45 《人民日報》，1958年9月11日，第1版。
46 越南政府關於承認和贊成中國政府領海決定的聲明稿(中越文)，1958年9月14日，106-00213-02，外交部檔案館；《人民日報》，1958年9月22日，第3版。
47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pp. 134–136.
4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關於台灣海峽地區局勢的聲明〉，1958年9月6日，《人民日報》，1958年9月7日，第1版。
49 吳冷西：《憶毛主席》，第79–80頁。
50 中美雙方關於和緩和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的協議聲明(草案)，1958年9月10日，111-00146-01，外交部檔案館。
51 周恩來致王炳南的信，1958年9月9日，轉引自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第73–74頁。
52 毛澤東關於金門炮擊辦法等問題給周恩來、黃克誠的信，1958年9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75頁；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72頁。
53 周恩來致毛澤東的信，1958年9月13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上，第470頁。
54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pp. 186–187.
55 王炳南致外交部電，1958年9月15日，111-00146-02，外交部檔案館；*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pp. 191–196。
56 王炳南致外交部電，1958年9月18日，111-00146-03，外交部檔案館；Beam to State Department, September 18, 1958, 3 p.m.,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pp. 209–216。
57 薛謀洪訪談，1994年8月；王炳南在回憶錄中沒有提及他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的情況，也完全沒有提到他在第一天的會談中便「和盤托出」中方的五點建議，參見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第75–7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70頁。
5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48頁。
59 《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53頁。

60 同上。
61 毛澤東致周恩來信，1958年9月19日，《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53頁；外交部致王炳南電，1958年9月22日2時，111-00147-01，外交部檔案館。這一電文經周恩來親自修改並批准後發出。
62 王炳南致外交部電，1958年9月22日；王炳南致外交部電，1958年9月23日，111-00147-01，外交部檔案館。
63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471頁。
64 周恩來關於對金門的作戰方針給毛澤東的信，1958年9月22日3時，《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403頁。
6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71–472頁；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58年9月2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88頁。
66 *FRUS*, 1958–1960, vol. 19, *China*, p. 301.
6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77頁；《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第472頁。
68 《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78–879頁。
6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56–457頁。
70 《人民日報》，1958年10月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107–108頁。
71 周恩來同志接見蘇聯大使館參贊蘇達利科夫同志談話記要，1958年9月5日，109-00833-04，外交部檔案館；又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66頁。
72 周恩來總理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紀要（協助中國在華建原子能科研中心），1957年6月14日，109-00786-14，外交部檔案館。
7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67頁。
74 劉曉致外交部並轉中央電，1957年8月15日，109-01726-02，外交部檔案館。
75 周恩來總理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就修改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兩個中蘇經濟協定的來往信函，1957年8月25日，109-00792-01；張聞天副部長會見蘇聯臨時代辦阿波拉西莫夫談話紀要（阿交照會同意我派代表團赴蘇談建立原子能工業、原子核火箭武器等），1957年8月24日，109-01787-04，外交部檔案館。
76 《聶榮臻年譜》下，第623頁；李覺等：《當代中國核工業》，第43頁。
77 周恩來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轉引自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第112頁。
78 赫魯曉夫致周恩來信，1958年4月24日，109-00838-03，外交部檔案館。
79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681頁；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版，1998），第224頁；肖勁光：《肖勁光回憶錄》續集，第201頁。
80 袁偉主編：《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1893–1976）》（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第907頁。
81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680–681頁。
82 毛澤東對蘇聯請求在我國建立特種長波電台問題的批語，1958年6月7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421–422頁。毛澤東在批語中還強調，必須說明「這是中國的意見，不是我個人的意見」。

83 薛謀洪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112–113頁；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第224頁。

84 《肖勁光回憶錄》續集，第176–181頁。

85 同上，第183頁。

86 周恩來關於請求(蘇聯)供給海軍新型裝備的技術資料致赫魯曉夫信，1958年6月28日，109-00838-03，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149頁。

87 毛澤東與蘇聯大使尤金第一次談話記錄，1958年7月21日。

88 毛澤東與蘇聯大使尤金第二次談話記錄，1958年7月22日；經刪節處理後的談話，見《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22–334頁。

89 《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29頁。

90 閻明復訪談，1997年10月。

91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62頁。

92 轉引自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第230頁。

93 毛主席和赫魯曉夫第一次會談記錄，1958年7月31日下午5時至9時。

94 毛主席和赫魯曉夫第三次會談記錄，1958年8月2日下午5時至9時。

95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第226–227頁；薛謀洪主編：《當代中國外交》，第114頁。

96 〈毛澤東和赫魯曉夫會談公報〉，《人民日報》，1958年8月4日，第1版。

97 *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 vol. 3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7), pp. 423–424;《赫魯曉夫回憶錄》全譯本，第3卷，第2259頁。

98 轉引自叢進：《曲折前進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350頁。

9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86頁。

100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0–221; Nikita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pp. 403–405.

101 閻明復：〈1958年炮擊金門與葛羅米柯秘密訪華〉，《百年潮》，2006年第5期，第15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78–179頁。

102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79–180頁；魏史言：〈葛羅米柯關於台灣局勢同毛澤東主席談話的回憶與事實不符〉，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1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第138頁。葛羅米柯關於同毛澤東談話的回憶，以及他對毛的看法，見Andrei Gromyko, *Memoirs*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pp. 251–252。

103 赫魯曉夫就台灣局勢給艾森豪威爾的信(全文)，1958年9月7日，《人民日報》，1958年9月10日，第1、3版。

10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f Comrade N. S. Khrushchev with Chairman of the CC CCP Mao Zedong, 2 October 1959, in Dimitry Volkoganov Collections, Manuscript Division, LC; 閻明復、朱瑞真：〈1959年赫魯曉夫訪華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2006年第4輯(總第100輯)，第30–57頁

105 Gromyko, *Memoirs*, pp. 251–252.
106 閻明復：〈1958年炮擊金門與葛羅米柯秘密訪華〉，第19–20頁。
107 周恩來和安東諾夫的談話，1958年10月5日，《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第474頁；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84頁。
10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f Comrade N. S. Khrushchev with Chairman of the CC CCP Mao Zedong, 2 October 1959, in Dimitry Volkoganov Collections, Manuscript Division, LC; 閻明復、朱瑞真：〈1959年赫魯曉夫訪華的前前後後〉，第40頁。
109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第306頁。
110 鄭州會議記錄，毛澤東同志的講話，1959年2月27日，SZ1-02-0476-001，第7–16頁，湖北省檔案館；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602–606頁。
111 主席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3月，91-18-494，第26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25頁。
112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第426–427頁。
11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21–22頁。
114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599頁。
115 周總理在河北視察工作時的談話記錄，1959年5月24日，855-5-1551-1，河北省檔案館。
116 同上。
117 主席批發內務部關於春荒有所好轉的報告，1959年4月26日，9-18-276，甘肅省檔案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0–31頁。
118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p. 88; 他給出的出處是「毛談話紀要，1959年3月25日，91-18-494，第44–48頁，甘肅省檔案館」。該書中譯本，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第87頁將這一段譯為：「不夠吃會餓死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這顯然是譯文，而不是從原始檔案文件的直接引文。
119 主席在上海會議中的插話，1959年3月25日，91-18-494，第48頁，甘肅省檔案館。
120 周恩來和達賴談話記錄，1956年12月30日，《黨的文獻》，1994年第2期，第36–37頁。
121 張國華工作筆記(手稿複印本)，1957年2月11日。
122 主席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25日，91-18-495，甘肅省檔案館。
123 毛澤東轉發青海省委關於平叛報告的批語，1958年8月24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926頁。
124 《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164頁。
125 楊尚昆日記，1959年3月10日，《楊尚昆日記》，第363頁。
126 中央致西藏工委並四川、甘肅、青海、雲南四省省委和軍區並告各省、自治區黨委電，1959年3月12日23時，855-5-1563-22，河北省檔案館。
127 中共中央致西藏工委等電，1959年3月12日，855-5-1563-22，河北省檔案館；參見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19–120頁。

128 毛澤東致中央電，1959年3月12日上午11時於武昌，855-5-1563-21，河北省檔案館。
129 中央致西藏工委並四川、甘肅、青海、雲南省委和軍區並告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電，1959年3月22日22時，855-5-1563-22，河北省檔案館。
130 中央致西藏工委並四川、甘肅、青海、雲南四省省委和軍區並告各省、自治區黨委電，1959年3月12日23時，855-5-1563-22，河北省檔案館。
131 毛澤東致中央電，1959年3月12日上午11時於武昌，855-5-1563-21，河北省檔案館；《楊尚昆日記》，第364頁。
132 中共中央致西藏工委等電，1959年3月12日，855-5-1563-22，河北省檔案館；《楊尚昆日記》，第364頁。
133 毛澤東致中央電，1959年3月15日下午4時，《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165頁。
134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635頁。
135 楊尚昆日記，1959年3月17日，《楊尚昆日記》，第366頁。
136 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21頁。
137 《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91頁。
13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12頁。
139 楊尚昆日記，1959年3月20日，《楊尚昆日記》，第367頁。
14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12–213頁。
141 同上，第213頁。
142 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21頁。
143 《人民日報》，1959年3月29日，第1版。
144 毛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15日，91-18-494，第7頁，甘肅省檔案館。
145 印度外交部給中國駐印大使館的備忘錄，1958年10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和印度關於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和其他問題來往文件彙編》（北京：外交部內部印行），第293頁。
146 尼赫魯總理給周恩來總理信，1958年12月14日，同上，第172–175頁。
147 周恩來總理致尼赫魯總理信，1959年1月23日，同上，第176–179頁。
148 關於1959年3月西藏叛亂及中央政府的對策，以及中印關係開始惡化的相關討論，參見Chen Jian, "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 and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8, no. 3 (Summer 2006): 54–101。
149 尼赫魯給周恩來總理信，1959年3月22日，《中國和印度關於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和其他問題來往文件彙編》，第180–183頁。
150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95頁。
151 《中國和印度關於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和其他問題來往文件彙編》，第55頁。
152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95頁。
153 《人民日報》，1959年4月15日。
154 《人民日報》，1959年4月19日，第2版。

155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196頁。
156 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25頁；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28–29頁。
157 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91頁。
158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第496頁。
159 《人民日報》，1959年5月6日。
160 《外事動態》，1959年第49期（1959年5月9日），第2–5頁；〈西藏問題與中印關係〉，1959年5月6日，《周恩來外交文選》，第268–276頁；〈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1959年5月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第193頁。
161 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91頁。
162 參見《內部參考》，第2575期（1958年9月5日），第8–9頁；第2581期（1958年9月12日），第3–4頁；第2581期（1958年11月5日），第23–24頁。
163 Allen Whiting, "The Sino-Soviet Split,"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p. 500.
164 周文琪、褚良如編著：《特殊而複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關係編年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516頁。
165 閻明復：《閻明復回憶錄》一，第522–523頁。
166 同上，第523頁。
167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第449頁。
168 蘇共中央關於不交給中國核武器樣品和設計技術資料問題致中共中央的信，1959年6月20日，109-02563-01，外交部檔案館；參見李覺等主編：《當代中國的核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第32頁；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680頁。
169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第473頁。
17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4冊，第13頁。
171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第467–468頁。
172 同上，第469頁。
173 《陳雲年譜》下，第18–19頁。
174 《楊尚昆日記》上，第398頁。
17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80頁。
176 同上，第80–81頁。
177 毛澤東：〈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7月2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75–82頁。
178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66頁。
17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41、242頁。
180 廬山會議文件：彭德懷在小組會議發言摘錄，轉引自《彭德懷傳》，第588–590頁。
181 〈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1959年7月14日，91-18-96，甘肅省檔案館；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741頁。

18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4冊，第191頁。
183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518頁；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19頁。
184 張聞天：廬山會議上的發言，1959年7月21日，《張聞天文集》第4卷，第322–342頁。
18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11頁。
186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91-18-494，第50–66頁，甘肅省檔案館。
187 周恩來同國務院副總理的座談會記錄，1959年7月23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518頁；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74–275頁。
18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16頁。
18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4冊，第230頁。
19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45頁；
191 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76頁。
192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63頁。
193 毛主席在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8月16日，91-18-494，第115–116頁；參見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76頁。
194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302–303頁。
19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22–123頁。
196 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77頁。
197 周恩來：當前形勢和今後的任務，1959年8月22日，SZ1-02-0489-001，湖北省檔案館。
198 9月1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又以典型的「毛風格」，講了一段極其煽情的話：「我們的人民公社、大躍進，很多人罵，但它是要成功的，並且已經成功。……我們要戰勝地球，我們的對象是地球。至於太陽、月亮、水星、金星八大行星（及除了地球以外），將來談一談可以，假若去的話，拜訪拜訪也可以。至於工作、打仗，還是地球，扒到地球不放，戰勝地球，建立一個強國。一定要有這樣的決心！」下面是「熱烈的、經久不息的掌聲」。毛澤東在軍委、外事兩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9月11日，91-18-494，第1–18頁，甘肅省檔案館。

第21章

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88–289頁。
2 鄧小平自傳，1926年1月，ф. 530, оп. 2, д. 5, РГАСПИ。
3 〈廬山會議討論問題〉，1959年7月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4冊，第159–160頁。
4 毛澤東的這些讀書筆記，後來在文革中被披露並開始流傳，出現了不少內容不盡相同的版本。參見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的論點彙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3冊，第238–285頁。

5 林克關於毛澤東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筆記(手稿複印本)，第1–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冊，第315–327頁；林蘊暉：《烏托邦運動》，第532–533頁。

6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580頁。這番話是周1960年2月25日在讀書小組上說的，參見楊明偉：《走出困境》，第50頁。

7 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的講話紀要，1960年1月17日，855-5-1793-5 (2)，河北省檔案館；毛主席在上海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1月17日，101-12-117，第1–7頁，福建省檔案館。

8 房維中、金沖及：《李富春傳》，第536頁。

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冊，第303頁。

10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第306頁。

1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99頁；林蘊暉：《烏托邦運動》，第552頁。

1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069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冊，第371頁。

1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冊，第382頁。

14 周恩來致尼赫魯信，1959年9月8日，《中印邊界往來文件彙編》，第184–190頁。

15 《人民日報》，1959年9月15日；《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52頁；《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第501–502頁。

16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第502–503頁。

17 周恩來總理接見印度議員阿爾尼談話記錄，1959年10月9日，105-00606-01，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59–260頁。

18 中國駐印度使館致外交部電報，1959年10月27日，105-00408-01，外交部檔案館。

19 毛澤東、周恩來在杭州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11月3日，轉引自《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冊，第232–233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551頁。

20 周恩來致尼赫魯信，1959年11月7日，《中印邊界往來文件彙編》，第212–213頁。

21 周恩來會見印度駐華大使帕塔薩拉蒂談話記錄，1959年11月8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553頁。

22 尼赫魯致周恩來總理的信，1959年11月16日，《中印邊界往來文件彙編》，第214–219頁；Reply to Chou En-lai, November 16, 1959, Madhavan K. Palat,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 54 (1–30 November 1959)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14), p. 490.

23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72), p. 138.

24 周恩來致尼赫魯信，1959年12月17日，《中印邊界往來文件彙編》，第220–225頁。

25 尼赫魯致周恩來信，1960年2月5日，《中印邊界往來文件彙編》，第228–229頁。

26 周恩來總理會見緬甸駐華大使吳拉茂談話紀要，1956年6月22日，105-00307-02，外交部檔案館。

27 緬甸自由同盟各派對中緬邊界問題的看法，1958年5月25日，105-00858-02，外交部檔案館。

28 緬甸政局：吳努總理辭職，1958年9月24日–27日，105-00559-01；緬甸政局：奈溫組閣及有關反應，1958年9月28日–10月3日，105-00559-02，外交部檔案館。

29 《外事動態》，1959年第60期(1959年6月6日)，第2–3頁。

30 周恩來總理致奈溫總理信，1959年12月22日，204-00114-03，外交部檔案館；《外事動態》，1959年第118期（1959年12月24日），第2頁；1960年第1期（1960年1月6日），第2頁；1960年第3期（1960年1月17日），第4頁；1960年第4期（1960年1月23日），第2頁；奈溫總理致周恩來總理信，1960年1月3日，204-00114-04，外交部檔案館。

31 《外事動態》，1960年第6期（1960年2月4日），第2頁；楊明偉：《走出困境》，第110–112頁。

3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85頁。

33 其實，對於阿克賽欽是否屬於印度領土，尼赫魯本人以及印度決策層的很多人並不確定。他將此視為一張有用的牌。正如曾任印度國務秘書的他所述：「直至1960年，我們自己對於這部分領土（阿克賽欽）是否屬於我們是心中無底的，我們的盤算是，是否能夠通過放棄我們的訴求，使之成為達成一項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的一部分。」"India and China: Policy Alternatives," n.d., R. K. Nehru Papers, NMML, 轉引自 Srinath Raghavan,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1948–60: A Reapprais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36 (Sep. 9–15, 2006): 3889.

34 這方面的一個突出例證是尼赫魯對拉達克態度的變化。本來，儘管尼赫魯堅稱「東北特區」（即藏南地區）毫無疑問是印度領土，但直至1959年夏，他仍在私下承認拉達克的「邊界線是不確定的」，並在同國會議員的討論中表明這一立場。然而，在來自國會和輿論的巨大壓力下，尤其是在印度最高法院於1960年3月判定「政府不得出讓或接受任何領土」後，尼赫魯說，若在領土問題上讓步，「我就再也當不成印度的總理了！」Raghavan,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pp. 3886–3890.

35 關於中印兩國總理會談邊界問題的方案，1960年4月5日，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02頁；《外事動態》，1960年第22期（1960年4月13日），第2–3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557頁。

36 周總理關於國際形勢在二屆二次人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0年4月10日下午，SZ19-2-233，湖北省檔案館。

37 《外事動態》，1960年第22期（1960年4月13日），第3頁；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會談情況的外交通報，1960年4月25日，203-00036-08，外交部檔案館。

38 周恩來總理和緬甸總理吳努第二次會談記錄，203-00036-02，外交部檔案館；《外事動態》，1960年第25期（1960年4月25日），第4頁。

3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04–305頁。

40 "Chou in New Delhi; Gets Cool Welcome," April 20, 1960, *New York Times*, p. 1.

41 《人民日報》，1962年4月22日，第1版。

42 First Talk, n. d., NMML, P. N. Haksar Papers, I and II Installments, Subject Files, #24;《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559–560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07頁。

43 Record of talks between PM and Premier Chou held on 20th April, 1960, from 5 p.m. to 7 p.m. at the Prime Minister's Residence, P. N. Haksar Papers, I and II Installments, Subject Files, #24, pp. 17–26, NMML;《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560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08頁。

44 Record of talks between P.M. and Premier Chou Enlai held on 21st April, 1960, 4:00–6:30 p.m.; Record of talks between P.M. and Premier Chou Enlai held on 22nd April, 1960 from [?] a.m. to 1:10 p.m.; Record of talks between P.M. and Premier Chou Enlai held on 24th April, 1960, from 10:30 a.m. to 1:45 p.m.; Record of talks between P.M. and Premier Chou held on 24th April, 1960, from 4:30–7:45 p.m., P. N. Haksar Papers, I and II Installments, Subject Files, #24, pp. 27–39, 40–53, 54–68, 69–85, NMML;《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561–562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09–312頁。

45 Record of talks between PM and Premier Chou Enlai held on 25th April 1960, from 10:30 a.m. to 1:45 p.m., n. d., P. N. Haksar Papers, I and II Installments, Subject Files, File #24, pp. 86–103, NMML;《周恩來傳，1949–1976》下， 第563–565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13頁。

46 中印兩國總理聯合公報，《人民日報》，1960年4月26日，第1版；周恩來總理在印度舉行記者招待會及有關情況，1960年4月24日，116-00192-01，外交部檔案館。

47 1963年1月1日，周恩來在北京會見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說：「不是我們把尼赫魯推向美國，而是他要孤立我們，這是我們的看法。……我曾是軍人，打過仗，但更多時間是搞談判。我和蔣介石三次合作或者談判。談判幾十年，將近二十年，有時打，有時談。和美國馬歇爾將軍談過一年，指導過朝鮮停戰談判，參加過第一次日內瓦會談，和陳毅外長一起指導過中美大使在華沙的會談和第二次日內瓦會議，中美大使談判已超過七年，我從來未遇到過像尼赫魯這樣難於談判的對手。」204-01493-09，第79頁，外交部檔案館。

48 《外事動態》，1960年第33期（1960年5月18日）。

49 周恩來總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1年5月9日，109-03757-01，外交部檔案館。

50 韓素音：《周恩來和他的世紀》，第382頁。

51 閻明復、朱瑞真：〈1959年赫魯曉夫訪華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2006年第4輯，第33–34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220頁。赫魯曉夫講話的全文，見《人民日報》，1959年10月1日，第5版。

52 這兩人就是本書第18章中提及的唐奈（Jack Downey）和費克圖（Richard Fecteau）。

53 這次會談情況的中方記述，見閻明復：《親歷中蘇關係》，第189–204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221–227頁。會談的俄文記錄，見赫魯曉夫和毛澤東會談記錄，1959年10月2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中蘇關係》第8卷，第419–432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f Comrade N. S. Khrushchev with Chairman of the CC CCP Mao Zedong,” October 2, 1959, in Dimitry Volkoganov Collections, Manuscript Division, LC。中蘇雙方文本有不少不同之處，這裏的敘述，係以中方記錄為基礎，對比參照雙方文本後寫成。

54 《閻明復回憶錄》，第540頁。實際上，雙方都沒有銷毀關於這次會談的記錄。

55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227–228頁。

56 1959年10月8日，中國駐蘇大使館就赫魯曉夫的講話發回了一份詳細報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4冊，第419–420頁；閻明復、朱瑞真：〈1959年赫魯曉夫訪華的前前後後〉，第53頁。

57 吳冷西：《十年論戰》上，第238–239頁。
58 周恩來和契爾沃年科的談話，1960年1月19日，檔號未標明，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80頁。
5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80–281頁；又參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46–447頁。
6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84頁。
61 中國駐蘇使館致外交部，「蘇聯外交部交給我館一份極不友好的照會」，1960年7月21日；中國駐蘇代辦張偉烈和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杜卡林諾夫談話記錄，1960年7月21日，109-00921-01，外交部檔案館。
62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277頁。
63 閻明復：《親歷中蘇關係》，第234–235頁；見《彭真傳》第3卷，第1039–1053頁。
64 閻明復：《親歷中蘇關係》，第240頁。
65 周恩來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7月14–16日，855-5-1798，河北省檔案館；參見《周恩來選集》下，第300–312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314–332頁。
66 周恩來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7月14–16日，855-5-1798，河北省檔案館。
67 蘇聯大使館就召回在華全部專家致中國外交部的照會，1960年7月16日，109-00924-01，外交部檔案館。
68 中國外交部對蘇聯駐華大使館關於召回在華全部蘇聯專家問題的覆照，1960年7月31日；章漢夫副部長接見蘇聯駐華臨時代辦蘇達利柯夫的談話記錄，1960年7月31日晚10時，109-00924-02，外交部檔案館。
69 周恩來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7月31日，855-5-1798；《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089頁。
70 國務院關於送別返國蘇聯專家注意事項的通知，1960年8月1日，109-00927-01，外交部檔案館。
71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588頁；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306頁。
72 國務院給原聘有蘇聯專家的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特急電報，1960年8月20日，C55-1012-29，山西省檔案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電報特地規定：「原有的專家工作機構和專家招待所的幹部、服務人員、房屋、設備、汽車等一律暫時保留，不要分散，等待形勢發展進一步明朗以後再作決定。」
73 在這種情況下，1960年10月下旬，國務院進一步向各省、市、自治區發出通知規定：「凡蘇聯駐華使館、領館的人員以及過去蘇聯專家組織方面的人員同我方談及關於已經撤退的蘇聯專家重新返華的問題時，都應告以此事我們無權討論，予以頂回。」國務院關於蘇聯專家撤退後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規定，1960年10月25日，13-43-20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
74 《李先念年譜》第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226頁。
7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冊，第414–416頁。
76 同上，第415頁。
7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5冊，第248頁。
78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0年6月14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583–584頁。

79 李先念給周恩來的緊急報告，1960年7月13日，《建國以來李先念文稿》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122–123頁。
80 同上，第123–124頁。
81 轉引自林蘊暉：《烏托邦運動》，第585頁。
82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第516–526、512–515、527–536、537頁。
83 〈中共中央關於確保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196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4冊，第539頁。
84 謝胡主席致周恩來總理的信，1959年12月14日；周恩來總理致謝胡主席的覆信，1960年1月18日；中國駐阿爾巴尼亞使館給外交部的電報，1960年7月23日，109-00962-01，外交部檔案館。
85 謝胡主席致周恩來總理的信，1960年7月21日；周恩來總理致謝胡主席的覆信，1960年8月8日，109-00962-02 (1)，外交部檔案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35、337頁。
86 《李先念年譜》第3卷，第246頁。
87 《陳雲年譜》下，第38頁。
88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第302頁。
8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65頁；楊少橋、趙發生：〈周恩來和我國的糧食工作〉，《不盡的思念》，第230頁。
90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601–604頁。
91 中央在9月2日、14日、18日（兩次）、23日、10月14日、11月17日連續發出指示，要求各地抓緊糧食、油脂、棉、煙、茶、麻的收購和調運，同時一再強調「狠抓鋼鐵生產」，《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5卷， 第12–13、41–44、75–78、79–81、98–101、253–255、275–277、492–497頁。
92 毛澤東對關於信陽問題的調查材料的批語，1960年10月2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5冊，第372頁。
93 喬培華：《信陽事件——大躍進發源地大饑荒慘案實錄》（香港：開放出版社，2009），第155–156頁。
94 周恩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10月29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600頁。
9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63–364頁。
96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第677–681頁。這幾條是周恩來早在1959年5月就曾提出過的。
97 中共中央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1960年11月14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第688–689頁。
98 李先念給周恩來等的信，1960年11月29日，《建國以來李先念文稿》第2冊，第134–135頁。12月5日周批示並報毛；12月12日，毛澤東鬆口同意，「爭取進20億斤」（100萬噸）。
99 主席在各中央局同志彙報時的插話，1960年12月30日，855-6-2047-3，河北省檔案館；參見《陳雲傳》，第1224、1226頁；《陳雲年譜》下，第51–52頁。

100 主席在各中央局同志彙報時的插話，1960年12月30日，855-6-2047-3，河北省檔案館；參見毛澤東：〈對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的批語〉，1961年1月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5冊，第472頁。

101 毛澤東讀了信陽事件的調查報告，為之定性的批示是：「壞人當道，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恨，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鄧力群談國史》第6卷，第352–353頁；喬培華：《信陽事件》，第156頁。

102 《陳雲年譜》下，第55頁；雷任民：〈回憶周總理對外貿工作的關懷和指導〉，《不盡的思念》，第254頁。

10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84頁；《陳雲傳》，第1230–1231頁；雷任民：〈回憶周總理對外貿工作的關懷和指導〉，《不盡的思念》，第254頁。

10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385頁。

105 《建國以來李先念文稿》第2冊，第138頁。

106 周總理在計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1月19日，檔號未標明，甘肅省檔案館。

107 《當代中國對外貿易》，第38頁；林海雲：〈關於周恩來外貿思想的片段回憶〉，《不盡的思念》，第259頁。

108 1960年12月22日，中央決定：「除已批准出售白銀8,000萬兩值7,200萬美元以外，還要出售黃金40萬兩和白銀6,000萬兩共值6,800萬美元。」1961年1月，中央又決定，由原計劃出售「黃金41萬兩，再增加40萬兩，共出售81萬兩」。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1961年糧食和市場問題的安排要點，1960年12月22日；國務院財務辦公室關於1961年對外貿易若干問題的請示報告，1961年1月18日，《中共黨史資料》第111輯(2009年3月)，第161頁。

109 外貿部：今年進口糧食的訂貨、到貨情況，1961年4月，109-03175-05，外交部檔案館。

110 李先念：關於糧食問題給毛澤東並中央的信，1961年7月30日。李在信中道，1961年上半年，「中央下最大決心向外國訂購了520萬噸糧食，1961年6月30日以前搶運到國內215萬噸(43億斤)，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滬、遼和重災區糧食脫銷的危險」。91-18-211-1961，甘肅省檔案館；《當代中國對外貿易》，第393頁；《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422、438頁。

111 周伯萍：《我在糧食部十二年》(自印本)。

112 周恩來在八屆九中全會上的發言，1961年1月19日，91-6-79-1961，甘肅省檔案館。

113 參見周恩來在東北局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61年2月25日，1-1-17-171，第96–106頁，吉林省檔案館；周恩來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談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問題報告紀要，1961年2月26日，91-018-0560，第1–33頁，甘肅省檔案館；周恩來關於國內形勢和當前任務的報告紀要，1961年4月3日，91-018-0560，第34–91頁，甘肅省檔案館。

114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629、608頁。

115 周恩來總理關於外貿問題談話的通報，109-13088-03，外交部檔案館。

116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5月11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685頁。

117 《毛澤東年譜》第4卷，第476頁。
118 閻明復：《親歷中蘇關係》，第276–278頁。
119 沈志華編：《中蘇關係檔案》第9卷，第292–293頁。
120 閻明復：《親歷中蘇關係》，第279頁；契爾沃年科和周恩來會談紀要，1961年3月31日，沈志華編：《中蘇關係檔案》第9卷，第297–298頁。
121 周恩來總理就我國向蘇聯借30萬噸小麥事與蘇聯大使的談話，1961年3月8日，109-03757-02，外交部檔案館。
122 109-03757-02，外交部檔案館。
123 周恩來總理和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的談話，1961年5月29日，109-03757-02，外交部檔案館。
124 沈志華編：《中蘇關係檔案》第9卷，第296、346頁。
125 外貿部：1961年赴蘇聯政府貿易代表團工作總結報告，109-02264-04，外交部檔案館；閻明復：《中蘇關係》，第279頁；周恩來和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會談記錄，1961年6月5日，沈志華編：《中蘇關係檔案》第9卷，第305–307頁。
126 1961年中蘇經濟科技談判的一組文獻，《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4期，第4–24頁；沈志華編：《中蘇關係檔案》第9卷，第351頁。
127 閻明復：《中蘇關係》，第279頁。
128 周總理關於目前台灣海峽地區的鬥爭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的報告，1958年11月10日，1-11-14/94，吉林省檔案館。
129 廖心文：〈周恩來與和平解放台灣問題的方針〉，《黨的文獻》，1994年第5期，第36頁。
130 少奇同志講話，1961年5月31日下午，91-18-494，甘肅省檔案館；《劉少奇年譜》下，第524頁。
131 周總理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1961年8月24日，855-6-2009-4，河北省檔案館；《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646頁。
13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1073頁。
133 沈志華編：《中蘇關係檔案》第9卷，第351–352頁。
134 《人民日報》，1961年10月25日，第1版。
135 主席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62年1月30日，855-6-2265-1，河北省檔案館；參見《毛澤東年譜》第5冊，第75–77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659頁。
136 少奇同志講話，1961年5月31日下午，91-6-81，甘肅省檔案館；參見《劉少奇年譜》下，第524頁；《劉少奇選集》下，第337頁。
137 《劉少奇選集》下，第421頁。劉少奇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記錄整理），1962年1月27日，檔號未標明，甘肅省檔案館。
138 鍾延麟：《彭真：毛澤東的「親密戰友」，1941–1966》（台北：聯經，2024）。
13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026頁；《彭真年譜》第4卷，第169頁；《彭真傳》第3卷，第1063頁。在後兩本的引文中，最後一句為「不良影響」。
140 王海光：《時過境遷——中國當代史採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第197頁。

141 轉引自張素華：《變局》，第109–110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027–1028頁。
142 周恩來同志的講話（記錄稿），1962年2月7日，855-6-2266-5，河北省檔案館。
143 張素華：《變局》，第281頁。
144 毛主席接見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17時20分至19時。
145 《陳雲年譜》下，第110–113頁。
146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鄧力群國史講談錄》（內部資料）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第456頁。
147 《劉少奇年譜》下，第549頁。
148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674頁。
149 《王稼祥年譜》，第486–489頁；《王稼祥傳》，第557–564頁。
150 《鄧小平年譜》下，第1693–1694頁。
151 同上，第1692頁。
152 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1962年3月2日，855-6-2262-5，河北省檔案館；SZ-19-2-275，湖北省檔案館；周恩來總理在全國科學工作會議上的報告，A52-2-156-1，上海市檔案館；又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669頁。
153 陳毅副總理在全國科學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62年3月5日，A52-2-156-6，上海市檔案館；陳毅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兩篇講話，1962年3月，《黨的文獻》，2002年第2期，第3–12頁。
154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426頁。
155 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500頁。毛當時沒有出面反駁周，恐怕主要是考慮到黨內政治——當時毛已經清楚地感覺到，要在黨內掀起後來成為文革的那場大風暴，他太需要周站在自己一邊了。
156 《林克工作筆記》（手稿複印本），1957年3月12日。
15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歷史回顧》，第1007頁。
15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陳晉書，第501頁。
159 《陳雲年譜》下，第113頁；《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2冊，第456頁。
160 《陳雲年譜》下，第133–135頁。
16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62–463頁。

第22章

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96頁。
2 董邊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90–91頁；《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6卷（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稿編委會，2000），第364頁；《陳雲年譜》下，第118頁。
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02–103頁。
4 《陳雲年譜》下，第119頁。

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81頁；董邊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91頁。
6 董邊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91頁。
7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91–92頁；《鄧小平年譜》下，第1714頁；參見錢庠理：《歷史的變局》，第203–204頁。
8 《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2卷，第462頁。
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88頁。
1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01–107頁。
11 同上，第111頁；《陳雲年譜》下，第120頁。
1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11頁。田家英出來後說：「主席真厲害。」他的意思是，毛「善於抓住對方談話的要害，出其不意地提出問題，使他當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93頁。
1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12頁；《陳雲年譜》下，第120頁；《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93頁。
1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88頁；《陳雲年譜》下，第120頁。
15 周恩來對黑龍江省委書記處的講話，1963年6月18日，轉引自《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12頁。
16 《陳雲年譜》下，第121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20頁。
17 王光美、劉源：《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1999)，第49頁。
18 《毛澤東傳》，第1234頁；1962年7月20日，毛召集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時的講話，《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16頁。
19 《楊尚昆日記》下，第196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15頁。
2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15–116頁。
21 同上，第117頁。
22 《毛澤東傳》，第1235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22頁。
23 主席和華北同志的談話(1962年8月2日晚於北戴河)，烏蘭夫同志傳達主席於華北同志的談話(8月2日晚談、8月3日傳達)，855-6-2257-2、855-6-2257-14，河北省檔案館；《毛澤東傳》，第1237–1238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22頁。
24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24頁。
25 主席與中南、華東同志的談話，1962年8月5日，855-6-2257-3，河北省檔案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24頁。
26 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全體會議上第一次講話，1962年8月6日，855-6-2008-7，河北省檔案館；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28–129頁；《毛澤東傳》，第1236–123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92頁。
27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8月9日，855-6-2257-5，河北省檔案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25–128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第1074頁。
2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第1077頁。

29 《劉少奇年譜》下，第558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第1074–1075頁。
30 周恩來在北戴河會議上的發言，1962年8月17日，855-6-2257-9，河北省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691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92頁。
31 周恩來在北戴河會議上的發言，1962年8月17日，855-6-2257-9，河北省檔案館；《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692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92頁。
32 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稿），1962年9月24日，101–12–119，第22–27頁，福建省檔案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51–153頁。
33 周恩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6日，855-6-2008-14、855-6-2262-2，河北省檔案館。
34 周恩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6日，855-6-2008-14，河北省檔案館；周恩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1962年9月26日，《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694頁。
35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chapter 2.
36 朱洪：《黃鎮傳》（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0），第253頁。
37 編輯委員會：《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第122頁。
38 《楊成武年譜》編寫組：《楊成武年譜》（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第362頁。
39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第564頁。
40 林孝庭：《困守與反攻——冷戰中的台灣選擇》（北京：九洲出版社，2017），第5章。
41 《周恩來軍事活動大事記》下，第564頁。
42 黃瑤、張明哲：《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第369–370頁。
43 同上，第371–372頁。
44 同上，第370頁。
45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第86頁。
46 〈中共中央關於準備粉碎蔣匪幫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196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0冊，第293–296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05頁。
47 中國駐波使館致外交部電，1962年5月31日，111-00605-01，第1頁，外交部檔案館。
48 王炳南致外交部電，1962年6月14日，111-00605-01，第16頁，外交部檔案館。
49 中國外交部致王炳南電，1962年6月14日23時；王炳南致外交部電，1962年6月15日，111-00605-01，第18、20頁，外交部檔案館；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第87頁。
50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第87頁。
51 外交部致王炳南電，1962年6月22日，111-00605-01，第28頁，外交部檔案館。
52 外交部致王炳南電，1962年6月22日16時，111-00605-01，第30頁，外交部檔案館；參見中共中央關於準備發表的新華社揭露蔣匪幫軍事冒險計劃的新聞電稿的通知，1962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0冊，第359頁。

53 Telegram, Clough to Rusk, June 21, 1962, no. 799.00/6-21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Clough to Rusk, June 22, 1962, no. 792.00/6-2262, NA.

54 王炳南關於與美國大使非正式會談情況致外交部電，1962年6月23日，111-00605-01，第32–37、39–41頁，外交部檔案館；參見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第86–90頁；亦參見Cabot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3, 1962,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273–275。

55 中共領導層對肯尼迪此次講話極為重視。三個月後，周恩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言時，還專門提及此事。周恩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6日，855-6-2008-14，河北省檔案館。

56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第14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19頁。

57 廖心文：〈1963年，周恩來邊境小島密會赴台信使〉，《百姓生活》，2016年第10期，第50–51頁；廖心文訪談，2017年10月21日。童小鵬在回憶錄中記述，他隨同周恩來參加了這次密會，並披露周「秘密會見」的是「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張樨群」。童小鵬：《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下（北京：華文出版社，2015），第545頁。

58 同上。

59 同上，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599頁。

60 耿仲琳編：《吳瑞林史料》下（自印本），第1335–1341、1348–1349頁；羅青長：〈他曾為周總理護航——回憶吳瑞林同志二三事〉，《最可愛的人：吳瑞林同志紀念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在羅青長回憶吳瑞林的這篇文章中，羅記述道：周恩來和張治中「與兩位能溝通國共兩黨關係的人進行秘密會晤」，這和吳瑞林的敘述和羅本人在其他場合的回憶有矛盾。

61 周恩來與柬埔寨第一大臣賓努談話記錄，1962年6月4日，106-00709-05，外交部檔案館。

6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88頁。

63 《人民日報》，1962年7月8日，第1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集》第9卷，第61頁。

64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第139頁。

65 同上，第140–141頁。

6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13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89頁。

6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88頁；《楊成武年譜》，第366頁。

6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13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89頁。

69 《楊成武年譜》，第367頁；《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第143頁。

70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第143頁。

71 同上，第146–147頁。

7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90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17頁。

73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第141頁。

74 潘自力大使向尼赫魯辭行談話情況，1962年7月13日；外交部就中印邊界問題致潘自力大使電，1962年7月16日（電文經周恩來修改），105-01807-01，外交部檔案

館；參見Allen S. Whiting,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p. 80；"The Afterthoughts of Premier Chou," interview with Neville Maxwell, *The Sunday Times*, December 19, 1971。

7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1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90頁；引文見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4部，第316頁。

76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下，第926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1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90頁；引文見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4部，第316頁。

77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el Nehru: A Biograph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13; Whiting, *Chinese Calculus for Deterrence*, p. 264, n. 19, quoting Arthur Lall's review of Maxwell's book, *The Asian Student*, November 27, 1971.

78 Maxwell, *Indian's China War*, p. 25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290頁。

7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20頁。

8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90頁。

8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38頁。

82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第159–160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96頁腳註。

8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48頁。

8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96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49頁。

85 周恩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6日，855-6-2008-14，河北省檔案館；又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498頁。

8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500頁。

87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699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500頁。

88 總後勤部青藏辦事處：《中印邊界自衛反擊作戰中青藏線戰備運輸工作總結》，1963年1月14日；《當代中國軍隊的後勤工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第7章。

89 《楊成武年譜》，第368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500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64頁。

90 《楊成武年譜》，第368頁。

91 周恩來總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的談話記錄，1962年10月8日，109-03804-01，外交部檔案館。

92 赫魯曉夫在劉曉辭行拜會時的談話，1962年10月13日，109-03809-06，外交部檔案館；又參見劉曉：《出使蘇聯八年》，第121頁。

93 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為劉曉同志舉行的送別宴會上的講話，1962月10月14日，109-03809-04，外交部檔案館；劉曉：《出使蘇聯八年》，第146–150頁。

94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pp. 369–371; *Statesmen*, October 13, 1962.

95 〈尼赫魯公然向印軍發出進攻命令野心畢露，妄圖把中國軍隊從中國領土上「清除掉」〉，《人民日報》，1962年10月14日，第1版。

9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65頁；《彭真年譜》第4卷，第220頁；參見雷英夫：《在最高統帥部當參謀——雷英夫將軍回憶錄》(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第209–210頁。雷英夫把這次會議的時間錯記為10月18日。

9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65頁。
98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第179–180頁。
99 同上，第233–253頁。
10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504頁。
101 《人民日報》，1962年10月25日。
10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504頁。
103 尼赫魯總理給周恩來總理的信（附印度政府10月24日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和印度的來往文件彙編》（1962年10月–1963年3月）（北京，1963），第3–6頁。
104 周恩來總理接見緬甸駐華大使叫溫（Kyaw Win）談話記錄，1962年10月29日，105-01781-02，外交部檔案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571頁。
105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第476頁。
106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pp. 422–430.
10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69頁。
108 同上；《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13–514頁。
10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13–514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69頁；參見Purnendu Kumar Banerjee, *My Peking Memoirs of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India* (New York: Clarion Books, 1990), p. 72。
110 周恩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6日，855-6-2008-14，河北省檔案館。
11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504頁。
112 總參青藏辦事處：〈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青藏線戰備運輸工作總結報告〉，日期、檔號未標明，河北省檔案館。
113 同上。
114 周恩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6日，855-6-2008-14、855-6-2008-14，河北省檔案館。
115 同上。
116 中央關於中印邊境衝突國內宣傳工作注意事項的通知，1962年10月23日，855-6-2288-3，河北省檔案館。
117 中央關於中印邊界衝突和中印關係問題的通知，1962年11月14日，中發（63）第597號文件，855-6-2288-4，河北省檔案館。
118 中央關於向幹部和群眾宣傳解釋政府11月21日關於中印邊界問題重要聲明的通知，1962年11月21日，855-6-2288-2，河北省檔案館。
119 周恩來在人大常委會第七十次會議上關於中印邊界鬥爭的報告要點，1962年11月24日，1057-8-44，第142–150頁，河北省檔案館；又參見《周恩來軍事活動記事》，第575–576頁；《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469–477頁。
120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474頁。
121 周總理致納賽爾和其他一些亞非國家元首和政府領導人：周恩來總理就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覆函阿聯總統納賽爾並致函其他一些亞非國家元首和政府領導人，1962年10月26日，107-00528-11，第56–59頁，外交部檔案館。

122 蘇聯政府致中國政府的備忘錄，1962年10月22日，109-03801-02，外交部檔案館。
123 《真理報》，1962年10月25日。
124 《人民日報》，1962年10月29日。
125 赫魯曉夫在劉曉辭行拜會時的談話，1962年10月13日，109-03809-06，外交部檔案館。
126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支持古巴反美鬥爭的聲明，1962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1962年12月1日；〈保衛古巴革命〉、〈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共同的敵人〉，《人民日報．社論》，1962年10月31日、12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集》第9集，第249–250、490–494、498頁。
12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67–168頁。
128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第294–295頁。
12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89頁。
130 少奇同志關於反對修正主義問題的談話，1963年2月15日，855-7-2526，河北省檔案館：參見《劉少奇年譜》下，第571–572頁。
131 《毛澤東傳》，第1272、1311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96–198、200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27頁。
13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533頁。
133 《閻明復回憶錄》下，第797–842頁。
134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下（北京：中共黨校出版社，1981），第692頁。
135 《毛澤東傳》，第1317頁。
136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第299頁。
137 周恩來報告的題目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556–557頁；錢庠理：《歷史的變局》，第299頁。
13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580頁。
13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7冊，第263–265頁。
14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第1193–1194頁。
141 總參謀部作戰部：〈關於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1964年4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5卷，第396頁。
14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347–348頁。
143 主席在1964年5、6月間中央工作會上前後關於備戰、軍事問題的講話，855-7-2840-2，河北省檔案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354–355頁。
144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812–813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355頁。
14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358頁。
146 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報告，1964年6月11日下午（根據記錄整理），855-7-3059，河北省檔案館；參見《劉少奇年譜》下，第59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358頁。
147 主席在政治局常委和大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6月16日，855-7-2840-3，河北省檔案館。趙家梁在《高崗在北京》一書中記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講到高崗時

說的是：「原想把他留在黨內，保留中央委員，去陝北當地委書記。但他死了，很遺憾。……高崗的死，我看是有人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趙家梁、張曉霽：《高崗在北京》，第256頁。

第23章

1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267–1268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84頁。這首詞後來發表時，毛改了幾句，「欲學大鵬無大翼」改為「螞蟻緣槐誇大國」；「千萬事，從來急」改為「多少事，從來急」；「革命精神翻四海，工農踴躍揮長戟」改為「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

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251頁。

3 周恩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6日，855-6-2008-14、855-6-2262-2，河北省檔案館。

4 《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06頁。

5 毛澤東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己的談話，1964年1月5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的談話，1964年7月10日，參見《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07–508頁。1964年6月18日毛澤東在接見桑吉巴爾專家米．姆．阿里夫夫婦時還說：「（中間地帶）這個話不是現在才講的，是1946年就講了。那個時候沒有分第一、第二，只講了中間地帶，講蘇聯同美國之間是中間地帶，包括中國在內。……那時我們在延安，是同美國記者講的，她叫Strong。」102-00110-01，外交部檔案館。

6 周恩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6日，855-6-2008-14、855-6-2262-2，河北省檔案館。

7 周恩來總理訪問越南雙方會談議題和發表的聯合公報，203-00016-02，外交部檔案館；石仲泉：《我觀周恩來》，第216頁；參見郭明：《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65–66頁。

8 朱良：〈中越關係的一些重要情況〉，《中共對外關係史料》，2002年第5期，第164頁；郭明：《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第66頁；關於越南方面在這方面的描述，參見*The Truth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s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Hano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79), pp. 29–33。

9 Lien-Hung Nguyen, *Hanoi's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War for Peace in Vietnam*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 pp. 46–49; Ang Ching Guan, *The Vietnam War from the Other Side*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Chapter 1.

10 周恩來總理訪越期間和越南總理范文同會談紀要，1960年5月11日，203-00039-01；關於周恩來總理訪問越南的情況通報，1960年6月9日，203-00039-02，外交部檔案館；周恩來同越南勞動黨代表團（胡志明、黎筍、范文同、長征、黃文歡）第二次談話，1960年5月12日，1057-8-44，河北省檔案館；又參見《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279–280頁。

11 毛澤東主席接見范文同總理談話紀要，1961年6月15日，204-01445-04，外交部檔案館。

12 周恩來總理同范文同總理第一次、第三次會談記錄，1962年6月12日、6月15日，204-01445-01，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313–314頁；郭明等：《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第67頁。

13 越南總理范文同就越政府請求中國給予六億人民幣貸款致周恩來總理的信及周總理的覆信，1960年10月17日、10月26日，106-00596-01；接待越南范文同總理來訪的參考資料，1961年5月30日，204-01191-04；自1955年至1962年底，中國對越南的「全部援款為人民幣19.78億元，到1962年底已用11.70億元，其中，無償10.78億元，到1962年底已用8.84億元」。1960年前，中國「着重幫助越南興建了大批輕工業及少數重工業」項目，「以解決人民生活上的迫切需要」；1961年後，中國的援越重點轉為「着重幫助越南興建重工業和大型交通運輸工業及少數紡織工業」，因為「這對於南方解放鬥爭，對於東南亞局勢的發展將具有深遠的影響」。中國駐越南大使館：〈越南資料：我國對越經援問題〉，1963年3月1日，203-00477-03，外交部檔案館。

14 周總理在政府各部門黨外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紀要，1962年5月24日，SZ19-2-275，第5–6頁，湖北省檔案館。

15 毛澤東會見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談話記錄，1962年10月5日，外交部檔案館；毛主席接見越南勞動黨代表團黎筍、長征、阮志清等的談話記錄，1963年6月4日。後來，毛澤東又對胡志明說：「日內瓦協議後，在一九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幾年中，死的人可多了，據說有十六萬人。……是吳廷艷殺的。革命是殺起的，殺了這麼多人。……我跟范文同同志說，日內瓦協議是一個失敗，你們、我們都犯了錯誤。這錯誤教育了我們，付出了十六萬人的代價，然後再從一個班開始，逐步發展起來。」毛主席與胡主席談話記錄（未經本人審閱），1966年6月10日。

16 郭明：《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第69頁；曲愛國等：《援越抗美——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第8頁。

17 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同越南總理范文同的談話，1962年8月27日，106-01386-01；周恩來總理與越南總理范文同談南越革命和援助老撾問題，1962年8月28日，106-01394-14；《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第567頁（時間記為8月27日）。

18 毛澤東會見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談話記錄，1962年10月5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63–164頁。

19 曲愛國等：《援越抗美》，第9頁。

20 《劉少奇年譜》下，第577頁；曲愛國等：《援越抗美》，第8–9頁。

21 毛主席接見越南勞動黨代表團談話記錄，1963年6月4日。

22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第219–220頁。

23 胡振清：《一個外交官的日記》（濟南：黃河出版社，1991），第5頁；權延赤、杜衛東：《共和國密使》（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第13–14頁。

24 毛主席接見越南文進勇等談話記錄，1964年6月24日18時半至19時3刻。

25 中央關於舉行越、老、中三國會談的建議，1964年6月25日，203-00581-02，外交部檔案館。

26 中國駐越南使館致外交部電，中國、越南、老撾三黨會談簡況，1964年7月8日，203-00581-03，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軍事活動大事記》，第413頁；《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413頁。

27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第220–221頁。

28 引自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第408頁。

29 周恩來總理會見朝鮮、羅馬尼亞駐華大使時關於越南局勢的談話摘要，1964年8月6日和8月9日，106-00788-05，外交部檔案館。

30 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還表示，部署在南方各省的部隊不大可能超過30萬至50萬人，因為「還要保衛北京、上海和福建等地區」。毛澤東接見黎筍談話記錄，1964年8月13日16時至18時。

31 毛澤東與范文同和黃文歡的談話，1964年10月5日，載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et al., eds.,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Washington, DC: The Wilson Center, 1998), pp. 74–77。

32 周恩來總理接見越南軍事代表團談話記錄，1965年1月22日，106-00862-01，外交部檔案館。

33 《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93頁。

34 毛澤東主席接見古巴革命政府經濟代表團談話記錄，1960年11月19日，111-00163-02，外交部檔案館。

35 周恩來總理接見古巴革命政府經濟代表團談話記錄，1960年10月18日，111-00163-03，外交部檔案館。

36 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分別覆函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和總理朱安達，1958年6月，105-00363-06，外交部檔案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第57–58頁。

3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第58頁；參見劉少奇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致電印尼總統兼總理蘇加諾，祝賀印尼接管西伊里安，1963年4月27日，105-01834-01；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同印尼副總理蘇班德里約第二次會談記錄（關於印尼退出聯合國），1965年1月25日，105-01910-02，外交部檔案館。

38 參見周陶沫：〈華僑問題的政治漩渦——解析1959–1962年中國對印度尼西亞政策〉，《冷戰國際史研究》第9輯（2010年6月），第155–174頁。

39 陳洋：〈「醫療外交大使」吳階平為蘇加諾治病〉，《世紀風采》，2017年第1期，第9–15頁；Olivia Cox-Fill, *Walking a Tightrope: Memories of Wu Jieping, Personal Physician to China's Leaders*, p. 145。

40 參見周恩來總理致函蘇加諾總統支持印尼退出國際奧委會，1963年2月20日，105-01833-01，外交部檔案館。

41 周恩來總理同印尼副總理蘇班德里約會談情況，1965年1月，105-01319-01，外交部檔案館。

42 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接見印尼代表團談話記錄，1965年9月30日，105-01917-02，外交部檔案館。

43 參見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同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和印尼副首席部長蘇班德里約會談記錄，1963年1月6日，204-01493-08，外交部檔案館。

44 《人民日報》，1963年12月16日。
45 《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87頁。
46 周恩來總理單獨拜會阿聯總統納賽爾談話記錄，1963年12月20日，107-01027-08，外交部檔案館。
47 周恩來總理同阿聯總統納賽爾第三次會談記錄，1963年12月19日，107-01027-07，外交部檔案館。
4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第129頁。
49 周恩來總理和本．貝拉主席第三次會談記錄，1963年12月24日，203-00614-07，外交部檔案館。
50 周恩來總理同本．貝拉總統第四次會談記錄，1963年12月26日，203-00614-06，外交部檔案館。
51 同上。
52 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訪問摩洛哥情況報告，1963年12月30日–1964年1月5日，203-00381-01，外交部檔案館。
53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5卷，第145頁。
54 周恩來總理訪問阿爾巴尼亞期間中阿代表團會談簡報，1964年1月11日，203-00335-06，外交部檔案館。
5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3卷，第271–272頁。
56 周恩來總理同阿爾巴尼亞政治經濟代表團團長科列加談話紀要，1965年5月21日，109-04013-01，外交部檔案館。
57 李先念副總理同阿爾巴尼亞政治經濟代表團團長科列加的談話稿，1965年6月7日，109-04013-04，外交部檔案館。
58 周恩來總理擬按原計劃訪問加納，1964年1月6日–1月9日，108-00387-03，外交部檔案館。
59 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訪問加納時與加總統恩克魯瑪三次會談記錄，1964年1月12日–15日，203-00623-02；周恩來總理同加納總統恩克魯瑪兩次單獨會談記錄，1964年1月14日，108-01375-01，外交部檔案館。
60 《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88–389頁。
61 周恩來總理就中印邊界問題覆幾內亞總統杜爾電，1962年11月13日，108-00290-12；周恩來總理就印邊界問題致幾內亞總統杜爾電，1962年12月1日，108-00290-15，外交部檔案館。
62 外交部通報周恩來總理同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聯合共和國第二副總統卡瓦瓦談話摘要，1964年6月25日，108-00453-02，外交部檔案館。
63 《方毅傳》，第321–322頁。
64 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同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會談記錄，1965年2月18日，108-01389-01，外交部檔案館；毛澤東主席接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談話記錄，1965年2月19日，108-01389-02，外交部檔案館。
65 周恩來總理同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會談記錄，1965年6月5日，106-01269-05，外交部檔案館。

66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2卷，第193頁；《方毅傳》，第327頁。
67 中國原駐津巴布韋大使廉正保的訪談，2006年。
68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5卷，第214–218頁。
69 中國和巴基斯坦聯合公報，1964年2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64年第5號（3月12日），第84頁。
70 周恩來同錫蘭班達拉奈克夫人第三次會談記錄，1964年2月29日，105-01890-02，外交部檔案館。
71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5卷，第227–238頁。
7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256頁。
73 周恩來總理接見日本高碕談話紀要，1955年4月22日，105-00211-04，外交部檔案館。
74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2卷，第20頁。
75 周恩來會見日本日中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的談話記錄，1960年8月27日，105-00735-02，外交部檔案館；又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289–290頁。
76 周恩來總理會見日本高碕達之助等人談話記錄，1960年10月13日，105-00736-01；周恩來總理會見日本高碕達之助談話要點，1960年11月1日，105-00735-01，外交部檔案館。
77 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同松村謙三會談摘要，1962年9月16日–9月19日，10501152-04，外交部檔案館。
78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對外貿易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第432–433、469–471頁；《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256–1257頁。
79 《當代中國貿易》上，第30–31頁。
80 Edgar Faure, *The Serpent and the Tortoise: Problems of the New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8), p. 22.
8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冊，第168頁；Faure, *The Serpent and the Tortoise*, pp. 32–33。
82 周恩來總理同法國前總理富爾第一次會談記錄，1963年10月23日，110-01982-08，外交部檔案館。
83 陳毅副總理接見法國前總統富爾談改善中法兩國關係，1963年10月24日，110-01982-09，外交部檔案館。
84 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接見法國前總理富爾談話改善中法兩國關係，1963年10月25日，110-01982-11，外交部檔案館。
85 外交部絕密文件：富爾準備向戴高樂提出的報告，1963年10月26日，110-01982-07，外交部檔案館。
86 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接見法國前總理富爾談中法有步驟建交方案，1963年10月31日，110-01982-13，外交部檔案館。
87 周恩來就中法建交問題致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信，1963年11月1日（附：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110-01982-06，第127–131頁，外交部檔案館。

88 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同法國前總理富爾會談記錄，1962年11月1日晚9時1刻–10時，110-01982-14，外交部檔案館。

89 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同法國前總理富爾會談記錄，1963年11月2日晚8時半至10時，110-01982-04，外交部檔案館。

90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5卷，第77–78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368–369頁；童小鵬：《風雨四十年》。

91 《人民日報》，1964年1月28日，第1版。

92 中央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1960年8月10日，《建國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第13冊，第512–515頁。

93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對外貿易卷），第8頁。

94 同上，第9頁。

95 《當代中國貿易》上，第31–32頁；參見Jason Kelly, *Market Maoists: The Communist Origins of China's Capitalist Asc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chap. 6。

96 李丹慧：〈政治鬥士與敵手：1960年代中蘇邊界關係——對中蘇邊界問題的歷史考察之二〉，《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第147–156頁。

97 毛主席接見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日本社會黨中、左派人士的談話記錄，1964年7月10日，105-01897-01，外交部檔案館。毛澤東的這個談話記錄，也下發到了省市一級的領導，因而在省、市檔案館中也有存檔件，例如1-35-116，第30–46頁，廣西自治區檔案館；855-19-1040-5，河北省檔案館。

98 周恩來總理接見日本社會黨人談話——關於日本「南千島」問題部分，1964年7月19日，105-0187-04，外交部檔案館。

99 《真理報》，1964年9月2日；蘇《真理報》惡毒攻擊和歪曲毛主席對日社會黨代表團的談話，1964年9月3日，105-00295-04，外交部檔案館。

100 中央辦公廳轉發外交部關於毛主席同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談話的對外表態問題的通報，1964年9月14日，101/4/110，福建省檔案館。

101 周恩來會見以毛雷爾為首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4年10月6日，204-01536-05，外交部檔案館。

102 閻明復：《閻明復回憶錄》第2冊，第859頁。

103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5卷，第275頁。

104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419頁；周恩來關於形勢的講話，1964年10月19日，1/1–20/145，吉林省檔案館。周在講話中把「赫魯曉夫垮台，我們的原子彈爆炸」稱為「雙喜臨門」。

10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422頁。

106 同上，第425頁。

107 同上，第425、429頁。

108 周恩來總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4年10月29日下午8時50分–9時10分，109-02678-02，外交部檔案館；外交部、中聯部關於周總理同蘇大使談話內容致潘自力大使電，1964年10月29日，109-02678-01，第5–6頁，外交部檔

案館；契爾沃年科和周恩來會談紀要，1964年10月29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0卷，第445頁。

109 周恩來接見越南、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古巴、朝鮮五國駐華大使、代辦談話記錄，1964年10月29日，109-02678-04，第23–32頁，外交部檔案館。

110 周恩來接見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駐華大使談話記錄，1964年10月30日，109-02678-05，外交部檔案館。

111 周恩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以及給駐外使館的電報，1964年10月30日，109-02678-0；周恩來總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4年11月1日，12時至12時15分，109-02678-12；外交部致中國各駐外使館電，1964年11月2日，109-02678-0320-22，外交部檔案館。

112 楊明偉：《走出困境》，第384–385頁；參見：范文同和哥穆爾卡會談紀要：周恩來表示願意改善中蘇關係，1964年11月8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0卷，第461–462頁。

113 中國駐蘇使館致外交部、中聯部電：關於到機場迎接我代表團情況，1964年11月6日，203-00294-01，第35–36頁，外交部檔案館。

114 《閻明復回憶錄》第2冊，第862頁。

115 同上，第864頁。

116 同上，第864–865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686頁。

117 《閻明復回憶錄》第2冊，第868頁。

118 勃列日涅夫和周恩來會談記錄，1964年11月8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10卷，第462–469頁；《閻明復回憶錄》第2冊，第865–866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686頁。

119 《閻明復回憶錄》第2冊，第866–867頁。

12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686–687頁。

12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434頁。

122 本來，在外交部擬定並已報請彭真批准的計劃中，前往機場迎接周一行的領導人以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為首，沒有毛澤東。毛顯然是看到這一報告後決定親自前往機場的。外交部：關於歡迎周總理率領的訪蘇黨政代表團回國計劃的請示，1964年11月13日，203-00294-05，外交部檔案館。

123 同上，第434–435頁。

124 錢三強：〈新中國原子核科學技術事業的領導者〉，《不盡的思念》，第294–295頁；李覺等：《當代中國核工業》，第9頁。

125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1頁；師哲訪談，1992年8月。

126 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1955年1月14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2冊，第15頁；李覺等：《當代中國核工業》，第13頁。

127 錢三強：〈新中國原子核科學技術事業的領導者〉，第299頁；《周恩來文化文選》，第530頁。

128 周恩來在國務院第四次會議上的講話，1955年1月31日，《黨的文獻》，1994年第3期，第18–20頁。

129 李覺等：《當代中國核工業》，第15頁。
130 參見周恩來總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就蘇聯援華專家等事的談話紀要，1956年3月22日，109-00743-03，外交部檔案館。
131 這裏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1957年6月，蘇共元老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聯合發起推翻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行動，幾乎獲得成功，之後赫魯曉夫在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支持下，動用軍機將外地的中央委員運到莫斯科，使赫魯曉夫得以在中央全會在多數支持下實行反擊，把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打成「反黨集團」。10月，朱可夫又因風頭太足、「功高蓋主」而被解除職務。當時，赫魯曉夫急需中共表態支持，以鞏固自己在蘇共黨內的地位，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經討論後，做出了支持他的決定。赫魯曉夫同意向中國轉讓原子能技術及提供原子彈樣品，多少帶有「投桃報李」的意思。
132 周恩來總理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紀要（協助中國在華建原子能科研中心等），1957年6月14日，109-00786-14，外交部檔案館。
13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67頁；劉曉致外交部並轉中央電，1957年8月15日，109-01726-02，外交部檔案館。
134 張聞天接見蘇聯臨時代辦談話紀要，1957年8月24日，109-01787-04，外交部檔案館。
135 《聶榮臻年譜》下，第623頁；李覺等：《當代中國核工業》，第43頁。
136 赫魯曉夫致周恩來信，1958年4月24日，109-00838-03，外交部檔案館。
137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第235–236頁。
138 宋任窮：《春蠶到死絲方盡，我們的周總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第69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785頁。
139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7冊，第222–224頁；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787頁。
140 同上。
141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421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787頁。
142 中央轉發羅瑞卿同志關於成立國防工業辦公室問題的報告，1961年11月29日，第14–16頁，甘肅省檔案館。
143 羅瑞卿：〈關於成立原子能工業領導的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的建議〉，1962年10月30日，黃瑤、張明哲：《羅瑞卿傳》，第393–394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788–789頁。
144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167頁。
145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789頁。
146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的決定，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1冊，第426–427頁。
147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792頁。
148 薛謀洪：《當代中國外交》，第119頁。
149 同上，第119–120頁。
150 《人民日報》，1963年7月31日，第1版。

151 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11月19日。
152 劉杰：〈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決策者和組織者〉；《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795頁。
153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796頁。
154 李覺等：《當代中國核工業》，第54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796頁。
155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797–798頁；《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484頁。
156 東方鶴：《張愛萍傳》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第776頁。
157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484–485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409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798頁。
158 東方鶴：《張愛萍傳》，第776–778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799–800頁。
159 《黨的文獻》，1994年第3期，第23頁。
160 劉杰：〈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決策者和組織者〉，《不盡的思念》，第322–323頁；《張愛萍傳》下，第785–786頁。
161 只是，這次成功的核試驗留下了一個遺憾，空中取樣漏空了。三天後，周恩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專門談到了此事，並舉一反三，講到在判斷國際形勢時「識別風向」的重要性。他說：「在座的負責幹部要善於識別風向。如我們的原子彈爆炸，中途風向變了，空中取樣沒有取到，不是由西北向東南，而是在空中變化了，指揮和總指揮都沒把握好，我們那麼多取樣的設備。……對國際形勢，主要是抓住風向，具體的事情知道的多一點少一點關係不大。」周總理關於形勢的講話，1964年10月19日，1-1-20-145，吉林省檔案館。

第24章

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449頁。
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692–693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449頁。
3 主席、少奇同志講話，1964年12月20日下午，101-12-120，福建省檔案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452–453頁；參見林小波、郭德宏：《文革的預演》，第171頁。
4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433頁。
5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71–137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456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131頁。
6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第433頁
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131頁。
8 主席講話，1964年12月28日下午，101-12-120，第1–9頁，福建省檔案館；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12月28日，855-7-2840-8，河北省檔案館；參見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56頁；《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73–1375頁。

9 《楊尚昆日記》，第478–482頁，對此有較詳細記述；又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72–1375頁（其中大段引用了會議記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457–458頁。

10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19冊，第527–533頁；《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75頁。

1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329–330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2頁。

1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438頁；蕭冬連：《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第1090頁；張光渝：〈點名與批判〉，《昨天》第42期（2014年10月30日），第4–5頁。

13 童小鵬：《少小離家老大還——童小鵬回憶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第506–508頁。

1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7冊，第225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330頁。

15 《人民日報》，1964年12月31日，第1版；《周恩來經濟文選》，第563頁。

16 《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325、341頁。

1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457、469頁。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第1132頁。

19 主席在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李雪峰同志傳達），1965年1月14日，855-8-3108-3，第51頁，河北省檔案館。

20 後來，毛澤東於1970年12月18日會見斯諾時，斯諾提問：毛是從何時明顯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毛說：「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21 Sergey Radt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31, 140–141.

22 周恩來總理與過境我國的蘇聯總理柯西金第一次接觸時談話記錄，1965年2月5日，109-03957-04；外交部關於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和柯西金舉行會談給駐外使館的通報，1965年2月10日，109-03958-01，外交部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706頁。

23 中方對於柯西金訪問河內的情況極為關注。越南方面，則由歷來同中方關係親近的政治局委員黃文歡事先向中國駐越南使館通報了柯西金準備訪越，以及越方持「積極歡迎」態度的情況。之後，黃又向中國使館詳細通報了越南領導人同柯西金會談的情況：「蘇方表現態度嚴肅，盡力製造友好氣氛，避開分歧。柯到越南後，從未提及二十大、二十二大、南斯拉夫、印度、日共、印尼共等問題，對中國也沒有作任何攻擊，在介紹北京會談情況時，只是客觀說明。……（並）表示仍然反帝，仍然主張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團結，仍然支持各地民族解放運動。」〈黃文歡通知我館蘇代表團將訪越〉，1965年1月26日，109-02857-02；〈黃文歡告越蘇會談情況——我駐越使館二月八日報告〉，1965月2月8日，109-02833-02，外交部檔案館。

24 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同柯西金等第五次接觸談話記錄，1965年2月10日，109-03957-06，外交部檔案館。

25 在中方先前擬定的接待計劃中，外交部的建議是只「由以總理為首的政府領導人出面接待，黨的領導同志不出面，迎送的人也不完全同對方講對口，…… 不主動安排毛主席和劉主席接見」。周恩來在最後一句下劃線批示：「此事將視情況相繼辦理。」外交部關於蘇聯政府代表團路過北京的請示報告和周恩來總理的批示，1965年1月27日、1月29日，109-03979-05，外交部檔案館。

26 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等和柯西金總理的談話記錄，1965年2月11日，109-03957-07，外交部檔案館；參見Minutes from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 N. Kosygin and Mao Zedong, February 11, 1965,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8039。由美國華盛頓威爾遜中心網上檔案庫公佈的這一談話記錄，係從波蘭解密檔案譯為英文，其內容同中方解密文本大致一致，但也有一些不同。

27 閻明復：《閻明復回憶錄》第2冊，第874頁；閻明復訪談，1997年10月；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708頁。

28 周恩來總理同阿尤布．汗總統談話記錄，1965年4月2日，106-01267-02，第37–50頁，外交部檔案館。

29 同上，第44頁。

30 Richard N. Goodwin, *Remembering America: A Voice from the Sixt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Perennial, 1988), pp. 394–395; 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8–324.

31 但是，根據英國外交文件，巴基斯坦方面還是通過外交渠道把這個重要信息轉達給了美國。FO371/180/990, Foreign Policy, May–June 1965, folder 3, UKNA.

32 周恩來總理和緬甸領導人奈溫會見記錄，1965年4月3日，106-01266-07；周恩來總理出席萬隆會議10週年紀念活動期間就越南問題做工作情況，1965年4月14日–25日，106-01272-01，外交部檔案館；參見裴堅章主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6》（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第456–457頁。

33 陳毅副總理接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談話記錄，1965年5月31日，110-01254-03，第1–12頁；中國外交部關於陳毅副總理接見英國代辦霍普森談話情況的通報，1965年6月20日，110-01254-01，第1–7頁，外交部檔案館；Peking (Mr. Hopson) to FO, no. 721, priority/confidential, 31 May 1965, FO 371/180996, UKNA。

34 Washington (Sir P. Dean) to FO, no. 1460, priority/confidential, 4 June 1965, FO 371/180996, PRO; McGeorge Bundy,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Subject: Ch'en Yi message on Vietnam," Saturday, June 5, 1965, 6:50 p.m., NSF–CO, folder "Vietnam Memos (B), vol. XXXV, 6/1–6/15/65," LBJL.

35 Peking (Mr. Hopson) to FO, no. 746, confidential, 7 June 1965, FO 371/180996, UKNA.

36 參見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1964–1969,"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ter 8。

37 國家計委黨組：〈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1964年4月30日；李富春：〈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說明〉（節錄），1964年5月18日，《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第10、11–14頁。

38 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彙報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時的插話（節錄），1964年5月10、11日，《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第10–11頁。
3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354–355頁。
4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第1205–1207頁。
41 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65年4月12日，101-4-384，第73頁，福建省檔案館。
42 周總理關於備戰工作的指示，1965年4月10日，101-4-384，第16–24頁，福建省檔案館；周總理關於備戰工作的指示，1965年4月12日，855-8-3112-5，河北省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724頁。
43 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65年4月12日，101-4-384，第73–74頁，福建省檔案館。
44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1965年4月12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第141–145頁。
45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91–1392頁。
4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729–730頁。
47 周總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的講話，1965年11月23日下午，855-8-3113-3，湖北省檔案館。
48 段雲同志關於政治局會議精神的傳達，1965年5月15日，91-009-0576，甘肅省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729–730頁。
4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01–502頁。
50 余秋里同志傳達總理談的一些問題（記錄稿），1965年6月23日（河北省委辦公廳印），855-8-3112-6，河北省檔案館。
5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751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02頁。
52 毛澤東聽取河北省委負責人彙報時的談話記錄，1965年11月12日，《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98頁。
53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第293–294頁；宋堃（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憶李宗仁歸來〉，《文史資料選輯》第140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第6–7頁。
54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第294–295頁。
55 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北京：華藝出版社，1996），第175–176頁。
56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第295–297頁。
57 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80–182頁；《人民日報》，1965年7月21日，第1版。
58 周恩來總理同坦桑尼亞尼雷爾總統第二次會談記錄，1965年6月5日，106-01269-05；周恩來總理和胡志明主席談話記錄，1965年6月15日，106-00861-02；周恩來總理接見阿爾及利亞總統特使亞齊德情況，1965年6月2日，107-00927-06，外交部檔案館。
59 周恩來總理和納賽爾總統會談紀要，1965年6月25日，107-01066-01，外交部檔案館。
60 毛主席接見艾地率領的印尼共代表團談話記錄，1965年8月5日。

61 朱良：〈1965年印尼「九．三零」運動〉，《中共對外關係史料》，2000年第5期，第144–145頁；朱良訪談，2009年1月。
62 朱良：〈1965年印尼「九．三零」運動〉，第146頁。
63 同上。
64 同上，第147頁；劉一斌：〈印尼「九三〇事件」發生後〉，《世界知識》，2006年第1期，第26頁；朱良訪談，2009年1月。
65 周恩來總理接見印尼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代表團第二次和第三次談話記錄，1965年10月1日，105-01687-02，外交部檔案館。
66 周恩來總理接見印尼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代表團第三次談話記錄，1965年10月4日，105-01917-01；周恩來總理接見印尼空軍參謀學院考察團談話記錄，1965年10月3日，105-01687-02；周總理接見印尼國防學會代表團談話記錄，1965年10月3日16時，105-01688-05，外交部檔案館。
67 劉一斌：〈印尼「九三〇事件」發生後〉，第26頁。
68 朱良：〈1965年印尼「九．三零」運動〉，第147頁。
69 周總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5年10月12日，855-8-3112-2，河北省檔案館；周恩來在中央座談會上的講話，1965年10月15日，檔號未標明，江蘇省檔案館。
70 周總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的講話，1965年11月13日，855-8-3113-3，河北省檔案館。
71 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同朝鮮李周淵副首相第二次會談記錄，1965年11月11日，106-01476-06，外交部檔案館。
72 朱良：〈1965年印尼「九．三零」運動〉，第148頁。
73 周恩來就亞非會議延期問題致亞非國家或政府首腦的信，1965年10月22日，107-00934-02，外交部檔案館。
74 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同朝鮮李周淵副首相第二次會談記錄，1965年11月11日，106-01476-06，外交部檔案館。
75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65年10月12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96頁。
76 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
77 《彭真年譜》第4卷，第448頁。
7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第767頁。《陳丕顯回憶錄》中也談到此事，只是把斯特朗誤植為早已經去世的史沫特萊。
79 《陳丕顯回憶錄 ——在一月風暴的中心》，第34頁。
80 《彭真年譜》第4卷，第450頁。
81 《人民日報》，1965年11月30日，第5版。
8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47–548頁。
83 1963月9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林彪長期生病，身體不好，建議由賀龍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266頁。
84 林彪給毛澤東的信，1965年11月30日，全文見黃瑤、張明哲：《羅瑞卿傳》，第538頁；《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99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44頁。

85 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第30–31頁。

8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175頁。

87 《彭真年譜》第4冊，第451頁。

88 筆者對一位黨史軍事專家的訪談，2025年4月。

89 關於羅瑞卿同葉劍英、聶榮臻等另幾位老帥關係緊張，以及同賀龍關係密切，參見《丘會作回憶錄》，第377–379頁；《李作鵬回憶錄》，第537–538頁。

90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77–78頁。據高記述：「1965年12月5日，周總理讓我們準備飛機去上海。鄧大姐知道後，問總理這麼突然去上海有什麼事。當知道是毛主席召見時，她也就不再問了。」「記得那次去上海，我只是帶上了洗漱用具，說是一兩天就回來。」「到了上海，總理住錦江飯店南樓十四層。當天，毛澤東召見了總理。晚上周總理就叫秘書周家鼎了解劉少奇主席的行蹤。」關於此次毛、周會晤，在《周恩來年譜，1949–197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等中均無記載。高的回憶有時間有細節，可信度甚高。所有官方資料中，也沒有周恩來從北京到上海的時間。我們知道的是，12月5日周恩來在北京，直至下午5時30分，還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了中國向越南提供貸款和供貨協定簽字儀式(見《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487頁)。因此，毛見周的時間不可能早於12月5日深夜或翌日凌晨。

91 《陳丕顯回憶錄》，第39頁。吳法憲在回憶錄敘述了另一情節：周恩來佈置他派專機去昆明接羅瑞卿到上海時，特地交代他，要親自控制飛機，「作好應變措施，飛機只准往東飛，不准往西飛」。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第560頁。

92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第28頁。

93 同上。

94 黃瑤、張明哲：《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第547頁；錢庠理：《歷史的變局》第5冊，第431頁。

95 毛澤東同楊尚奎、方志純等談話記錄，1966年1月5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00頁。

96 《彭真年譜》第4冊，第463頁。

9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51頁。

98 《楊尚昆日記》，1965年10月29日，第682頁。這件事何以發生，過程撲朔迷離。文革中的說法是，觸發因素是楊尚昆在毛那裏安裝竊聽器。文革後，楊尚昆案得到平反，官方的說法是，楊尚昆佈置安裝的其實是為記錄毛的講話而使用的小型錄音機，而不是竊聽器。但是，李志綏和戚本禹在各自的回憶錄中，仍然堅持楊佈置安裝的是竊聽器。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281–282頁；《戚本禹回憶錄》，第387–388頁。

99 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1966年2月12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610–613頁。

100 《彭真年譜》第4卷，第486–487頁。

10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57頁；《彭真年譜》第4卷，第468–469頁。

102 《鄧小平年譜》，第1893頁；《鄧小平傳》，第1326頁。
103 〈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2月，《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604–610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54–555、562–563頁。
104 同上，第562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229–236頁。
105 黃瑤、張明哲：《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第566–572頁。
106 主席在杭州會議上的一些談話、插話，1966年3月18日、19日，855-8-3389-1，河北省檔案館。
107 吳冷西：《十年論戰》，第935–936頁。
108 主席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3月18日（傳達稿），855-8-3389-3，河北省檔案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67頁；吳冷西：《十年論戰》，第937–939頁；閻明復：《閻明復回憶錄》第2冊，第885–887頁。
109 主席在杭州會議上的一些談話、插話，1966年3月18日、19日，855-8-3389-1，河北省檔案館。
110 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52頁。
111 Masaru Kojima, ed., *The Record of the Talks between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w Mao Zedong Scrapped the Joint Communique* (Tokyo: Central Committee of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80), pp. 137–160; 亦參見《鄧小平年譜》下，第1897頁；《彭真年譜》第4冊，第469–470頁。
112 Kojima, *The Record of the Talks*, pp. 163–168.
113 同上，第169–173頁。
114 《人民日報》，1966年3月27日，第1版。
115 Kojima, *The Record of the Talks*, pp. 188–189; 參見《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491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70頁。
116 毛澤東主席對〈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和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聯合公報（草稿）〉的修改，中辦機要室文件（66）11號（1966年3月28日）。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70–571頁。
117 毛澤東主席接見日共代表團宮本顯治等第一次談話記錄，1966年3月28日；毛澤東主席接見日共代表團宮本顯治等第二次談話記錄，1966年3月29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71–572頁。
118 參見Kojima, *The Record of the Talks*, pp. 1–4。
11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72–573頁。
120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879頁。
12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73頁。
122 毛澤東會見朝鮮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4年10月7日。這次談話中，毛提出了「蘇聯會不會打我們」的問題。
12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27頁。
124 《彭真年譜》第4卷，第480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73–574頁。
125 鍾延麟：《彭真：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第709–712頁。

126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407–1408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80頁。
12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1279–1280頁。
128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2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261–262頁。
130 同上，第264頁。
131 蔣本良：《給共和國領導人作翻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第35–36頁。
132 同上，第37–42頁。
13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1頁。
134 毛澤東接見馬共總書記陳平等談話記錄，1967年1月17日17時–19時；《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第628–629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1–32頁。
135 周恩來接見科學院京區各單位代表談話紀要，1967年1月21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36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1冊，第1–4頁。
137 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1冊，第16–23頁。
138 周恩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第25章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271頁。
2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304頁；主席在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4日，855-8-3389-11，河北省檔案館。
3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29頁。
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4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89頁。
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89頁；《劉少奇傳》，第1016–1017頁。
6 黃錚：《風雨無悔——對話王光美》，第407頁。
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93頁；參見《劉少奇年譜》下，第641頁。
8 蔣本良：《給共和國領導人作翻譯》，第38–41頁。
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91、594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275頁。
10 Wang Li, “Memoirs of a Year and Two Months, June 1966–August 1967,”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 27, no. 6 (Nov.–Dec. 1994): 27.
11 《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165頁。

12 〈關於北大「六一八事件」〉，參見馬若德、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第75–76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9–40頁；又參見中央轉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1966年6月20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第1冊，第51–52頁。這個簡報後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322號，855-8-3414-24，河北省檔案館。

1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94–595頁。

14 同上，第598–599頁。

15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283–285頁。

16 同上；《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0頁；《戚本禹回憶錄》（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6），第464頁。

17 《戚本禹回憶錄》，第464頁。

1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599–600頁；《人民日報》，1966年7月26日。

19 黃錚：《風雨無悔——對話王光美》，第411頁。

20 《戚本禹回憶錄》，第444頁。

2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600頁；《戚本禹回憶錄》，第445頁。戚本禹的回憶在時間上似乎記錯了，但他對周恩來發言這一幕的記憶應當不會錯，也同《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的簡略敘述不矛盾。

2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600頁。

23 同上，第601頁。

24 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5頁；《戚本禹回憶錄》，第445–446頁；《鄧小平年譜》，第1924–1925頁；《劉少奇傳》，第1027–1028頁。

2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601頁。

26 同上；《戚本禹回憶錄》，第447頁。

2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602頁。

28 《周恩來手跡選》第3卷（書信卷下），第246–24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1–42頁。

2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603頁。

30 周恩來在北京市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7月29日，855-8-3408-5，河北省檔案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1–42頁。

31 《劉少奇年譜》，第646–647頁；《鄧小平年譜》，第1926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603頁。

32 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天地圖書，1997），第152頁；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455頁。穆、李兩人當時都在場，對場景有相似的回憶。

33 筆者當年也聽過錄音，現在還記得劉少奇說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時的腔調。

3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301–302頁。

35 《劉少奇傳》，第1032–1033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604–605頁。

3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605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4頁。

3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5頁；《劉少奇傳》，第1033–1034頁；解學恭：〈八屆十一中全會日記〉，《炎黃春秋》，2015年第5期，第52–53頁。解學恭日記中把周講話的時間記為8月4日，可能有誤，因為那一天全會並未開大會。

38 《戚本禹回憶錄》，第456頁。

39 主席在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4日，855-8-3389-11，河北省檔案館。

4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606頁，《劉少奇傳》，第1035–1036頁。

41 黃錚：《風雨無悔——對話王光美》，第414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6頁。

4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304頁。

43 賀曉明：《賀龍元帥的最後十年》（香港：中和出版，2013），第27頁。

44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冊，第609頁。

45 同上，第611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49頁。

4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1頁，註1；《戚本禹回憶錄》，第461–462頁。

47 《王力反思錄》，第950頁。

48 《人民日報》，1966年8月19日，第1版。

49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83頁。

5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1頁。

5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331頁。

5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7頁。

53 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向毛澤東彙報：「最近學生來北京的很多，沒地方住。」毛說：學生「一定要來就讓他來，來二、三百萬不要緊，總有房子住，中南海也可以住，我總想跟學生住在一起」。周只得說：「總得留些地方。我是堅決執行主席指示的。請允許我留點機動。」毛主席同各大區書記和中央常委等同志的談話，1966年10月24日晚，855-8-3389-5，河北省檔案館。

54 《人民日報》，1966年9月16日，第1版。

55 周恩來同范文同談話，1966年8月18日，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0頁。

56 谷牧：〈回憶敬愛的周總理〉，《我們的周總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第16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917頁。

57 〈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紅旗》雜誌1966年第13期社論），《人民日報》1966年10月2日，第1版。

5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2頁。

59 同上，第2–3頁。中央最初在10月5日下達通知時，這個會只準備從「10月9日至11日」開三天，855-8-3391-8，河北省檔案館；毛澤東在會議臨近結束時說：「這次會是我提召開的，原來說開三天，後來說開七天，現在開了兩個禮拜。」毛主席同各大區書記和中常委等同志的談話，1966年10月24日晚，855-8-3389-5，河北省檔案館。

60 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16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1 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196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1966年10月23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2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66年10月25日下午，855-8-3389-6，河北省檔案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第1冊，第150–151頁。

63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8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4 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127–128頁；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65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第317–318頁。

66 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香港：三聯書店，2012），第368頁。

67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第333頁。

68 毛澤東多次說，光是學生不行，工廠也要開展文革。錢理群：《爝火不息：文革民間思想研究筆記》，第529頁。

69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第321–322頁；《王力反思錄》，第954–955頁。

70 轉引自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310頁；《王力反思錄》，第955–956頁；《戚本禹回憶錄》，第536頁。

71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第321–322頁。

72 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第351頁。

73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135–137頁。

7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92頁。

75 轉引自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第351頁。

76 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99頁。

77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182–183頁。

78 周恩來在全國工交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1月24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99頁。

79 《戚本禹回憶錄》，第539頁。

80 同上，第541–544頁；參見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第100–104頁。這裏引用的幾乎都來自戚本禹的回憶，雖然王力的回憶有更為詳盡的敘述，但這裏基本未引用。一種做歷史的人的直覺告訴我，王力的很多話不那麼可靠。

81 關於1966年12月26日毛的這頓「家宴」，王力、戚本禹、關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都有各自的記述（《戚本禹回憶錄》，第541–544頁；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第100–104頁；張春橋：《張春橋獄中家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姚文元的敘述，則出現在徐景賢的回憶錄中）。最早披露出這一段重要史事、也最為詳盡的，是王力的記述。但也正因為他的記述過於「詳盡」，反而顯得不真實，尤其是他並沒有當時留下的筆記。果然，戚本禹在回憶錄中就指責王力關於文革的回憶和記述過於「任性」，不實之處（包括關於毛的這頓「家宴」的記述）甚多。《戚本禹回憶錄》，第543頁。

82 毛澤東是否在家宴上說過「全國全面內戰」這個話，當時與會者在回憶時的說法各有不同。王力說，毛沒有說「要開展全國全面的內戰」，說的是「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現場歷史》，第101頁）。戚本禹指出，「王力說得不對」。張春橋的回憶是，毛說的是「為全面內戰乾杯」（張春橋給女兒張維維的信，1992年12月20日，《張春橋獄中家書》，第128頁）。姚文元在第二天打電話給上海市委寫作班的傳達中說，毛說：「祝全國全面內戰開始！」（徐景賢：《十年一夢》，第8頁）其實，如果毛沒有說「全國全面內戰」，而只是說「全國全面階級鬥爭」，戚、張、姚等是造不出這麼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更不可能不約而同地在不同場合講出來。更何況，如下文所揭，毛澤東在幾天後的中央碰頭會上又十餘次用了「全面內戰」或「全國全面內戰」，他在生日宴上就說了「全國全面內戰」，更是毫不奇怪的。

83 《戚本禹回憶錄》，第544頁。

84 主席講話，1966年12月29日，855-8-3389-9，河北省檔案館。

85 《戚本禹回憶錄》，第544–545頁。

86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人民日報》，1967年1月1日，第1版。

87 《戚本禹回憶錄》，第544頁。

8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27頁。

89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149–150頁。

9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08頁。

91 《戚本禹回憶錄》，第563頁。

92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第449頁；《戚本禹回憶錄》，第562–563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150頁。

9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14–115頁；《賀龍年譜》，第787–788頁。

94 《賀龍年譜》，第788頁。

95 凌青：《從延安到聯合國》，第119頁。

96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第421–433頁。

97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132頁；馬達：《馬達自述——辦報生涯六十年》（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第46頁。

98 馬達：《馬達自述》，第46頁。

99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第435頁。

100 同上，第435頁。

101 同上，第436頁。

102 同上，第539–541頁。

103 《陳丕顯回憶錄》，第117–118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06頁。

104 《陳丕顯回憶錄》，第78–79頁。

105 同上，第119頁。

10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28頁；《王力反思錄》，第764頁。

107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第580–606頁。

108 同上，第606頁。

10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0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419頁。
110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112–113頁。
111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第658–659頁。
11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420頁。
113 中央首長（陳伯達、江青、康生、周恩來）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1月10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人民日報》，1967年1月12日，第1版。
11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11–112頁；《王力反思錄》，第793–794頁。
115 《王力反思錄》，第794頁。
11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4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13頁。
117 周恩來接見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講話，1967年1月26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參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356頁。
118 《王力反思錄》，第764頁。
11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51–52頁；馬若德等：《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第170–171頁。

第26章

1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66年10月25日下午，855-8-3389-6，河北省檔案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10頁。
2 毛澤東接見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17時20分–19時。
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8冊，第433頁。
4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258–259頁。
5 周恩來傳達毛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1月27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 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第356頁；《李富春傳》，第667頁。
7 劉繼賢等：《葉劍英年譜》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第956頁；《徐向前年譜》編委會：《徐向前年譜》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6），第185頁。
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15頁。
9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954–955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22頁。
1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22頁。
1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7–48頁。
12 《葉劍英傳》編委會編著：《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第586–587頁；《葉劍英年譜》下，第959–960頁。
13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449–450頁；《徐向前年譜》下，第201頁；劉志、張麟等：《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第532頁。

14 劉武生：《「文革」中的周恩來》（香港：三聯書店，2006），第192頁。
1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51–52頁。
16 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轉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09–211頁。
17 同上；參見《王力反思錄》，第977–978頁；《戚本禹回憶錄》下，第576–577頁（但戚本禹沒有參加這天的會議）；《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27頁。
1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26頁。
19 同上，第127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956頁。
20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449–450頁。
21 《王力反思錄》，第988頁。
22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957–958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12頁。
23 《王力反思錄》，第979–980頁。
2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27頁；《王力反思錄》，第981頁。
25 《王力反思錄》，第983頁。
26 劉武生：《「文革」中的周恩來》（香港：三聯書店，2006），第198頁；《王力反思錄》，第982–984頁。
27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16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56頁。
2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56頁。
29 《王力反思錄》，第987頁。
3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27頁；《王力反思錄》，第984頁。
31 周恩來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3月13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參見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第92頁。
32 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3月20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369頁。
33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361–362頁。
34 周恩來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3月13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37、139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87–88頁。
3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68頁；《戚本禹回憶錄》下，第606–607頁。
37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504–506頁；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1期（總第294期），第31–45頁。
38 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2011），第92–94頁。
3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54頁。
4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9冊，第97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87頁。
41 中央首長（江青、陳伯達、康生等）對北京學生代表的講話，1967年8月11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54–155頁。
4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85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55頁。
4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50頁。
45 毛主席接見馬共總書記陳平等談話記錄，1967年1月17日。
46 《人民日報》，1967年5月18日，第1版。
47 周恩來與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等革命造反派組織的談話，1967年5月12日；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談話摘要，1967年6月28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965頁。
4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98頁；楊成武著：《楊成武將軍自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第268–270頁。
4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70頁。
5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99–100頁。
51 周恩來在武漢軍區湖北軍區師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7月18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70頁。
5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101–103頁。
53 同上，第103頁。
54 謝富治、王力在武漢軍區師級幹部會議上的指示，1967年7月19日；謝富治、王力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講話，1967年7月19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103頁。
56 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們中有人無意中撞見了毛澤東，匆匆退出。
5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103頁。
58 同上；《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71頁。
59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2003），第276頁。
6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103頁。
61 《戚本禹回憶錄》下，第661頁。
62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第167–169頁。姚登山後來因此受到長達近十年的監禁。但在1980年代初最後結案時，只受到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並在恢復原行政級別後離休。
63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169–171頁；《戚本禹回憶錄》下，第661–662頁。關於王力本人對此事的敘述，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第1015–1016頁。
6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77頁。
65 吳荻舟工作筆記，轉引自吳輝編：《吳荻舟香港文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2），第145–146頁。
66 《人民日報》，1967年5月16日，第1版。
67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第353頁。
68 同上。
69 《人民日報》，1967年5月24日，第8版。

70 陳揚勇：《苦撐危局》，第353–354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55頁；吳輝編：《吳荻舟香港文存》，第159頁。
71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158頁。
72 《人民日報》，1967年6月3日，第1版。
7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69頁；陳揚勇：《苦撐危局》，第355頁。
74 廣東省軍管會辦公室：〈周總理聽取黃永勝等同志彙報時的指示紀要〉，1967年7月10日，轉引自余汝信：《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21)，第470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69頁；陳揚勇：《苦撐危局》，第355–356頁。
75 《人民日報》，1967年8月21日，第2版。
76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161頁。
77 同上，第162頁。
78 Mr. Hopson to Mr. Brown, "The Burning of the British Office in Peking," confidential, September 8, 1967, FC1/14, FCO 21/34, UKNA.
79 吳法憲：《歲月艱難》下，第694頁。
80 周恩來就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與外事口各組織負責人的談話，1967年8月23日凌晨3時，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81頁；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179–180頁。
8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82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967頁；《楊成武年譜》，第455頁。
82 《楊成武年譜》，第455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113–114頁。
83 這一段話，來自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的記述，Sidney Rittenberg and Amanda Bennet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81。在格魯姆本人保存在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Redcliff Institute)的文件中，沒有關於此事的記載。然而，《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中，確有周在8月25日晚會見格魯姆的記錄(見該書第515頁)。如果格魯姆未向李敦白敘述這次會見，李敦白根本無從知道周和格魯姆曾有過此次見面，更毋論編造出這樣的對話。
84 《楊成武年譜》，第455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13–114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82–183頁。
8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83頁；《楊成武年譜》，第455–456頁。
8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9冊，第212頁。
87 林彪在接見軍隊幹部會議上的重要講話，1968年3月24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8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中央首長在接見軍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8年3月24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157頁。
90 很多年後，我讀到當時還不認識的朱學勤的一篇回憶文章，其中講到那時候他和周圍的同代朋友也在讀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還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朱學勤：《書齋裏的革命》(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第69–70頁。

91 1968年5月，解放軍國防工業小組在給中央的一個文件中用了北京是「世界革命中心」的說法，毛澤東於5月16日批示：「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這就是所謂『以我為核心』的錯誤思想。」《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9冊，第4頁。

92 周恩來、李先念對鐵道部關於蘇修等七國鐵路運輸部長會晤的聲明的批示，1968年7月17日，1-1-7403，第148–149頁，鐵道部檔案。

93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佈告，1968年7月3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第138–139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9冊，第259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242–243頁。

9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248頁。

95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佈告，1968年7月24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第152–153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247頁。

96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01–302頁。

9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175–177頁。

9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249頁。

99 蔣本良：《多瑙河之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第76頁；參見王泰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334頁。

100 蔣本良：〈「捷克事件」與周恩來的「六八講話」〉，《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72輯（1999年12月），第37頁。

101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第334頁；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下，第1207頁。

102 蔣本良：《給共和國領導人作翻譯》，第80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252–253頁。

10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185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252頁。

104 蔣本良：《給共和國領導人作翻譯》，第80頁；《人民日報》，1968年8月23日，第1版。

10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252–253頁；《人民日報》，1968年8月24日，第1版；又參見*Peking Review*, supplement to no. 34 (August 23, 1968): iii–iv。

106 相關討論，參見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第4、7章。

107 周恩來在北京市革命群眾慶祝大會上的講話，1968年9月7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第197–199頁。

108 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會議上的講話，1968年10月13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11頁。

109 周恩來給江青的信，1968年9月25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51頁。

110 沈國凡：《周恩來養女孫維世》（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第218–219頁。

111 江青之所以有如此作為，也許是受到了關於毛曾與孫維世有過某種曖昧關係的謠言所影響。葉群則是因林彪曾在莫斯科追求過孫維世而耿耿於懷。

112 沈國凡：《周恩來養女孫維世》，第228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264頁。

113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第263–281頁。

114 《人民日報》，1968年12月22日，第1版。

115 《人民日報》，1968年11月2日，第1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9冊，第362頁。

第27章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9冊，第416–417頁。
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545頁。
3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秘書的證言》（香港：天地圖書，2014），第136–142頁。
4 陳伯達否認他起草九大報告時同林彪沆瀣一氣的指控，但承認他寫報告時曾同林有過兩次會面。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63頁。林彪也同秘書討論過陳伯達的稿子，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214頁。
5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第214–215頁；《邱會作回憶錄》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第620頁。
6 周恩來同志在九大全體會議上的發言，1969年4月14日，91-019-0006，第1–8頁，甘肅省檔案館；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9冊，第394頁。
8 《邱會作回憶錄》下，第646–647頁。
9 毛澤東主席會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談話記錄，1970年6月27日晚7時30分至8時45分；毛澤東會見奈溫談話記錄，1971年8月7日。毛和奈溫之間有一段與此相關的對話。毛：「有一段時間，1967年，我們控制不住我們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麼兩個月，天下大亂。你們大使館還算好的，沒有燒掉，英國代辦處燒了」；奈溫：「是的」；……毛：「那時候也是無政府主義，……都是極『左』啊！這些都是中國人做的事，所以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好人。……他們有一個集團，一個陰謀集團，搞破壞的。」周恩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就是『五一六』的問題，還在這裏清查。」
10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12章。
11 周恩來總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9年3月14日，921-5-32，河北省檔案館；B246-2-385-91，上海市檔案館。
12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360頁。
13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US Reaction to Soviet Destruction of CPR Nuclear Capability," August 18, 1969, SN 67–69, Def 12 Chicom, NA; 參見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78), p. 183。8月30日，《參考資料》刊載了美國報紙*Washington Star*兩天前發表的一篇莫斯科準備對中國實行先發制人的核襲擊的報道。毛澤東和周恩來應該是不會錯過這篇報道的。
14 Mark Kramer, "The Soviet Legacy and Moscow's Disregard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The Wellsprings of Russian War Crimes in Ukraine,"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38, no. 1 (2025): 12–14.
15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1968年8月28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彙編》中，第365–367頁。
1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267頁。

17 其實，林彪並不真的相信蘇聯會進攻中國。國慶節前，他在軍委會上說：「這個仗八成打不起來，卻要做八成打起來的準備。」引自一位黨史軍史專家給筆者的信，2025年3月。

18 本書第28章對此還有更詳細的敘述。

1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270頁。

20 同上，第270–271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29頁。

21 李根清：〈林彪「緊急指示」前後〉，《炎黃春秋》，2015年第11期，第47頁。

22 同上；據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林彪口述電話稿後，他與葉群商量，將電話稿「壓兩個小時」，由葉群同時報告在武漢的毛澤東。張雲生、張叢坤：《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第568頁。

23 張頌甲：〈閻仲川與「一號令」〉，《炎黃春秋》，2015年第9期，第50頁。

24 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第14–15頁。

25 同上，第15頁。

2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283頁。林彪麾下的幾位大將們一口咬定，毛當時還說林彪可以當主席。但這同毛說不設國家主席豈不矛盾？

2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53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283頁。

2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285頁。

29 同上，第291頁。

3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61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291–292頁。

3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9冊，第516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61頁。

3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295頁。

33 此事在《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等官史中均無記載，但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等人在各自的回憶錄中都提到了這件事，因而有相當可信度。

34 《邱會作回憶錄》下，第682–683頁。

35 吳法憲：《歲月艱難》下，第777–778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298頁，對此次談話亦有記載。林彪出事後，官方文件陳述：吳法憲交代，葉群曾私下對他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擺？往哪裏放？但吳後來在回憶錄中翻供，說這個話其實是汪東興說的，但他卻在逼供之下，加到了葉群頭上。

3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11、313頁。

37 《邱會作回憶錄》下，第684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18頁。

38 吳法憲：《歲月艱難》下，第783–784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85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18–319頁。

39 紀東：《難忘的八年——周恩來秘書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第139頁。周恩來在此將這首詞曲的出處寫成了《西廂記》，但實際上在《西廂記》中並沒有這一段。

4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19–321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86–387頁。

41 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1998)，第118頁。關於毛、林在會前談過話一節，《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等各種官史中沒有記載，但《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572頁記述：「到全會臨開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澤東和幾個常委提出『要講點意見』。」在邱會作、李作鵬、吳法憲等人的回憶錄中也都講到全會開幕前毛、林關門談話一節。由此看來，陳伯達所述有較高的可信度。

4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22頁；《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572頁。

43 林彪同志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上的講話，1970年8月23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4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573頁。

45 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第118頁。

46 陳伯達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的發言，1970年8月24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7 汪東興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的發言，1970年8月24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邱會作回憶錄》下，第702頁。

4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25頁。

49 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華北組第二號簡報)，1970年8月24日；吳法憲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西南組的發言(節錄)，1970年8月24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又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第213–214頁。

5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26頁。

5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88頁。

5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26–32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88頁。「要我早點死」的話，見《李德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李參加了這次會議。

5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89頁。

54 汪東興：《毛主席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48頁。

5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29–331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89頁。

5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27頁；《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75頁。

5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28頁。

58 吳法憲：《歲月艱難》下，第806頁。

5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89–390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29頁。

60 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1970年8月3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15頁。

6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31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91頁。

62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第244頁；《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377頁。
6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26頁。
6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92–393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33頁。
65 《邱會作回憶錄》下，第777頁。
6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35–336頁；《李德生回憶錄》，第404頁。
67 汪東興的第二次書面檢查，1970年9月15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參見汪東興：《毛澤東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59–65頁。
68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38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95–396頁。
69 參見本書第11章相關敘述。
70 師哲訪談，1992年8月。
71 這幾位大將的回憶不可避免地有不準確的地方，但他們關於周、林之間關係的描述有許多其他旁證，可信度更高。
72 《邱會作回憶錄》下，第775頁。
73 同上，第733頁。
74 吳法憲第一次書面檢討，1970年9月29日；葉群第一次書面檢討，1970年10月12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7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38、43頁。
7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03頁。
7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73頁。
78 周恩來同志給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請示報告，1970年12月19日，855-10-2-1，河北省檔案館；又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2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61頁。
79 華北會議參考材料，1971年1月17日，919-6-102-5，河北省檔案館；《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028頁。
80 周恩來在華北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71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1）6號，919-6-102-3、855-10-2-2，河北省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29–430頁。
8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69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113頁。
8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69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116頁。
8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38頁。
84 《邱會作回憶錄》下，第747頁。
8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71頁；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黃永勝同志的檢討》，1971年4月15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71頁；《邱會作回憶錄》下，第754頁。

8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74頁。

88 同上，第374–375頁。

89 《邱會作回憶錄》下，第758–759頁；《李德生回憶錄》，第409頁；瞿定國、劉先廷：《曾經滄海——李德生調中央工作前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第254–255頁。

90 周恩來在北戴河和林彪的談話記錄，1971年3月30日、31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314–315頁；又參見《邱會作回憶錄》下，第779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47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76頁。

9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377頁；李德生：〈從「廬山會議」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憶〉，《緬懷毛主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126–127頁。

92 《邱會作回憶錄》下，第760頁。

9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53頁。

94 《邱會作回憶錄》下，第763–765頁；吳法憲：《歲月艱難》下，第841頁。

9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142頁。

96 周恩來的報告因此寫道：「會議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見大家一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同上。

9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141頁。

9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54頁。

99 中共中央關於印發反革命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的通知，1971年11月14日，中發(1971)74號文件。

100 黃正：《軍人永勝黃永勝將軍前傳》(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第550頁。

101 《邱會作回憶錄》下，第778頁。

10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55頁；杜修賢：〈林彪對毛澤東的「不辭而別」〉，《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北京：中央文獻出版杜，1995)，第63–72頁。

103 吳忠口述，陳楚三、李大震整理：〈吳忠談九一三事件〉，《炎黃春秋》，2012年第1期，第26頁；余汝信：〈「林彪信稿」的本來面目〉，《炎黃春秋》，2013年第5期；李根請：〈林彪「散記」中對毛澤東的思考〉，《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

104 〈吳忠談九一三事件〉，第26–27頁。

105 據當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吳忠回憶：「總理說，林彪和他說過此事，總理說有這個必要嗎？」同上，第27頁；前引余汝信：〈「林彪信稿」的本來面目〉一文中也提及，時任林彪辦公室機要秘書的于運深回憶，「葉群給周恩來打了電話，告訴他林彪信稿的意見，被周勸阻了」。

106 張春橋給女兒張維維的信，1991年5月24日，《張春橋獄中家書》，第97頁。二十年過去了，張春橋仍對此耿耿於懷，在信中寫道：「那篇文章我寫得極不愉快。」

107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第392–394頁。

108 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12號，1972年3月17日，855-11-1，河北省檔案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161、163頁；王海光對毛澤東南巡期間談話的各種版本，以時間地點為序，做了彙總和細緻的比較、分析，參見王海光：

〈「九一三」事件循時考〉修訂版，《昨天》第236期（2023年11月30日），第25–61頁。

109 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12號，1972年3月17日，855-11-1，河北省檔案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162–163頁。

11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78頁。王海光：〈「九一三」事件循時考〉修訂版，第43頁。

11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0頁。

112 王海光：〈「九一三」事件循時考〉修訂版，第45頁。

113 李文普：《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

114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歷史的審判》（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第40–42頁；王海光：〈「九一三」事件循時考〉修訂版，第48–49頁。

115 王海光：〈「九一三」事件循時考〉修訂版，第49–50頁。

11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03頁；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第105頁；王海光：〈「九一三」事件循時考〉修訂版，第52–54頁。

117 汪東興：《毛主席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197頁。

11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0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04頁；王海光：〈「九一三」事件循時考〉修訂版，第57–61頁。

119 李文普：〈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1999年第2期。

12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0頁；王海光：〈「九一三」事件循時考〉修訂版，第64頁。

12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1頁；吳法憲：《歲月艱難》下，第862頁。

12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1頁。

123 同上。在1980年的「兩案」審判中，起訴書指控李作鵬將周的命令篡改為「四個首長中的一個首長指示才可放飛」（《歷史的審判》，第40–42頁）。但李作鵬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當時記錄下來的周恩來的原話是：「北戴河的那位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指示中，並沒有「四個人一起」的明確要求。《李作鵬回憶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第768頁。

124 〈林立衡關於「九一三」經過寫給中紀委的材料〉，修改稿及謄清稿，余汝信編：《「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第9–127頁。

125 李文普：〈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

12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05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1頁。

12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1頁。

128 孫煥英：〈歷史將揭開林彪案件的更深層面——空軍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的回憶〉，《民主與法制》，2005年第3期；王海光：〈「九一三」事件循時考〉修訂版，第71頁。

12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05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1頁；吳法憲：《歲月艱難》下，第863頁。
130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041頁；紀東：《難忘的八年》，第125頁。
13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3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040頁。
13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3頁。
133 《中共黨史資料》，2008年第2期（總第106期），第177頁。
134 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第8章。
13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05–406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2頁；《邱會作回憶錄》下，第797–798頁。
13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2頁。
13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06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2–483頁。
138 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212頁。
13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2–483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08頁。
140 《邱會作回憶錄》下，第788頁。
141 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6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第557–559、643–645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06–407頁。
142 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第642頁。
143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將林彪叛黨叛國事件向全國廣大群眾傳達的通知〉，1971年10月24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44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第649–657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209頁。
145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第658–667頁。
146 周恩來給廣州軍區領導機關幹部的報告，1971年10月，轉引自薛慶超：《毛澤東南方決策》（北京：華文出版社，2013），第245頁；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88–489頁。
147 陳揚勇：《重拳出擊——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之後》（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第48頁。
148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524頁。
14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10頁；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447頁。
150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616頁；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537頁；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45–247頁。
151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第330頁。

第28章

1 周恩來、陳毅和春水的談話，1968年5月7日，引自《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第524頁。
2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April 13, 1968," in Westad et al., eds.,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p. 122.
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16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266頁。
4 毛澤東主席會見范文同總理談話記錄，1968年11月17日8時15分至10時15分。
5 〈就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級會議會期問題我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發表談話〉，《人民日報》，1968年11月27日，第5版；參見駱亦粟：《在風起雲湧的年代裏》（北京：新華出版社，2011），第120頁；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 25。
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267頁。
7 陳小魯：〈陳毅和中國外交〉，國際戰略基金會編：《環球同此涼熱》，第155頁。
8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69*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pp. 1–4.
9 《人民日報》，1968年1月28日，第1、5版。
1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9冊，第8頁。
11 《聶榮臻年譜》下，第1107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29–230頁。
12 《徐向前年譜》下，第250頁；陳小魯：〈陳毅和中國外交〉，第155頁。
13 《徐向前年譜》下，第250頁；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下，第1213頁。
14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第318–319頁。
15 肖全夫口述史（打印本）。
16 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衝突〉，《中共黨史資料》，1994年第5期，第6–8頁。
17 陳錫聯採訪錄音記錄稿，1995年7月。
18 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衝突〉，第8–9頁。
19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273頁；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6部，第137頁。
20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6部，第137頁。
21 同上，第137頁。
22 同上，第138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083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36–237頁；毛澤東關於周恩來要求與我通話的處置意見的批語，1969年3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21頁（這一文件，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23年新版中未收入）。
23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273頁；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6部，第138–139頁。
24 轉引自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2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278頁；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第358頁。

2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34頁；又參見：毛澤東在中央碰頭會上的講話，1969年3月15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這兩個文本顯然都是毛講話的摘要。
26 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69年4月2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9冊，第433–439頁。
27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6冊，第143頁。
28 范朔：《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第598–599頁；魏巍主編：《聶榮臻傳》，第614頁；《徐向前傳》，第541–542頁；鄭謙：〈九大前後的戰備工作〉，《中共黨史資料》第41輯，第211頁。
29 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1969年5月24日，《人民日報》，1969年5月25日，第1版。
30 熊向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中共黨史資料》第42輯，第61頁。
31 同上，第61–62頁。
32 同上，第71–74頁。
3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12頁；熊向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第76–77頁。
34 熊向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第78–79頁。
35 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衝突〉，《中共黨史資料》，1994年第5期，第10頁。
36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US Reaction to Soviet Destruction of CPR Nuclear Capability," August 18, 1969, SN 67–69, Def 12 Chicom, NA; 參見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78), p. 183。8月30日，《參考資料》刊載了美國報紙 *Washington Star* 於8月28日發表的一篇關於莫斯科準備對中國實行先發制人的核襲擊的報道。
37 參見Mark Kramer, "The Soviet Legacy and Moscow's Disregard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The Wellsprings of Russian War Crimes in Ukraine,"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38, no. 1 (2025): 12–14。
38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第69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17頁。
39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軍委辦事組：〈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1969年8月27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16–317頁。
40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1968年8月28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彙編》第2冊，第365–367頁。
41 李家忠：《印支外交親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第25–28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16、318–319頁。
4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19頁；《李先念年譜》第4卷，第620頁；李家忠：《印支外交親歷》，第29–33頁。
43 《李先念年譜》第4卷，第620頁；李家忠：《印支外交親歷》，第33頁。
44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6部，第145頁。
45 同上。
46 Information about A. N. Kosygin's Conversation with Zhou Enlai on 11 September, 1969,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6973（自2025年春威爾遜中心被關

閉後，這一部分檔案已轉至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周恩來致柯西金的信，1969年9月18日，《周恩來外交文選》，第462–464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083–1084頁。

4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66頁。

48 中共中央轉發外交部關於柯西金來京會見周總理的通報，1969年9月22日，91-011-0009，第25–29頁，甘肅省檔案館。

49 熊向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第87頁。

50 同上。

5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66頁。

52 熊向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第83頁

53 周恩來致柯西金的信，1969年9月18日，《周恩來外交文選》，第462–464頁。

5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23–324頁。

5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67頁。

56 同上。

57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6冊，第145頁。

58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第699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22頁。

59 引自一位黨史軍事專家給筆者的信，2025年3月。

60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308頁；鄭謙：〈中共九大前後全國的備戰工作〉，《中共黨史資料》第41輯，第219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25頁。

6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195頁。

62 同上，第320頁。

63 王泰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3卷，第36–37頁。

64 毛澤東會見崔庸健談話記錄，1969年10月1日。

6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25頁。

6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70頁。

67 同上，第270–271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29頁。

68 一些老人、老帥對這一撤離北京的決定頗有怨言。《朱德傳》寫作組採訪朱德夫人康克清時，康說朱德等老帥都不相信蘇聯會進攻中國，接到疏散令後，是「滿腹怨氣地離開北京」的。引自一位黨史軍事專家給筆者的信，2025年3月。

69 李根清：〈林彪「緊急指示」前後〉，《炎黃春秋》，2015年第11期，第47頁：《劉少奇年譜》下，第661頁；《鄧小平年譜》下，第1948–1950頁。

70 Editorial Note, *FRUS*, 1969–1976, vol. 17, pp. 51–52.

71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088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34頁。

72 駱以粟：〈我在波蘭的歲月〉，王泰平主編：《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第179–180頁；Stoessel to Secretary of State, 3 December 1969, Record Group (RG) 59,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Subject–Numeric Files, 1967–69, POL 23–8 US, National Archives (NA)。

73 周恩來後來幾次在內部報告中提到此事。其中的一次他描述道：「1969年12月3日，在華沙的一個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上，美國大使拉我們一個翻譯，把我們翻譯搞『傻』了，趕快跑，我們的代辦走了，翻譯被他拖住了，「就像上海舊社會四馬路的野妓到處拉人一樣。」周總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1971年6月4日，91-007-0028-0001，第9頁，甘肅省檔案館。

74 耿飈：〈新中國外交的光輝旗幟〉，田曾佩、王泰平主編：《老外交官回憶周恩來》，第18頁。周恩來後來說，這件事是毛「抓住」的：「1969年12月，美駐波蘭大使在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上追着我們翻譯跑。一個大使追我們一個翻譯，像抓人似的，這是件不尋常的事，主席抓住了這件事。」周恩來同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同志談話紀要，1972年8月1日，1057-8-44，第151頁，河北省檔案館。

7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36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088頁。

76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188.

77 宮力：《跨越鴻溝——1969–1979年中美關係的演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49頁；駱以粟：〈我在波蘭的歲月〉，第180–181頁；又參見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 188–189。

7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38頁；《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546頁；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191。

79 Stoessel to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8, 1970, Subject–Numeric files, 1970–1973, Pol Chicom US RG 59, NA.

80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0, 1970, *FRUS*, 1969–1976, vol. 17, pp. 167–169.

8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48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089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81頁。

8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0, 1970, *FRUS*, 1969–1976, vol. 17: 180–183; 宮力：《跨越鴻溝》，第50–51頁。

83 F. S. Aijazuddin, *From a Head, Through a Head, to a Head: The Secret Channel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rough Pakist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1–3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56頁。

8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56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089–1090頁。

8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55–356頁；王泰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72頁。

8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56頁；Philip Short, *Pol Pot: The History of a Nightmare* (London: John Murray, 2004), pp. 197–200。

8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57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9冊，第504頁。

8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67頁。

89 《人民日報》，1970年5月19日、5月20日。

90 Message to Be Delivered by Major General Vernon A. Walters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dated, *FRUS*, 1969–1976, vol. 17, pp. 220–221;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69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72頁；宮力：《跨越鴻溝》，第59頁。

9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372頁。
92 《人民日報》，1970年7月11日。
9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06頁；參見 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pp. 546–547。
94 Aijazuddin, *From a Head, Through a Head, to a Head*, p. 43;《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091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10–411頁；楊明偉、陳揚勇：《周恩來外交風雲》（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5），第244頁；參見Nixon, *Memoirs*, pp. 546–547。
9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17頁；楊明偉、陳揚勇：《周恩來外交風雲》，第244頁。
96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 700–703; Nixon, *Memoirs*, pp. 546–547.
97 尹家民：《黃鎮將軍的大使生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第205–206頁。
98 楊明偉、陳揚勇：《周恩來外交風雲》，第243頁。
99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698.
100 〈毛澤東會見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人民日報》，1970年12月25日，第1版。
101 楊明偉、陳揚勇：《周恩來外交風雲》，第243頁。
10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07–408頁；〈美國友好人士斯諾關於同周總理談話的兩篇報道〉，1970年11月15日，91-016-0254，甘肅省檔案館。
103 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63–88頁。
104 同上。
105 Edgar Snow,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 [Mao Zedong]," *Life*, 70 (April 30, 1971), pp. 46–48.
106 Nixon, *Memoirs*, p. 547.
107 劉德有：《風雨幾星霜——戰後中日關係親歷記》（北京：三聯書店，2018），第360–361頁；錢江：《「乒乓外交」始末》（上海：東方出版社，1987），第15–22頁；徐寅生：〈我所經歷的中美「乒乓外交」〉，《世紀》，2017年第1期，第41–42頁；關於後藤鉀二的背景以及他下定決心訪華、邀請中國乒乓球隊參加第31屆世界錦標賽的過程，參見Itho Mayumi, *The Origin of Ping-Pong Diplomacy: The Forgotten Architect of Sino–U.S. Rapproche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0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43–444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73頁；趙正洪：〈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中共黨史資料》第39輯，第136頁；徐寅生：〈我所經歷的中美「乒乓外交」〉，第43頁。
109 趙正洪：〈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第144頁；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第30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73頁。
110 錢江：《「乒乓外交」始末》，第170–172頁；徐寅生：〈我所經歷的中美「乒乓外交」〉，第44頁。
11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49頁；凌青：《從延安到聯合國》，第129頁；錢江：《「乒乓外交」始末》，第211頁。一個多月後，周恩來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講

到此事時說，當時「我們歡迎四個國家的乒乓球隊來中國訪問，而對美國隊，覺得僅僅是隊員要求，隊長有點躊躇，因此我們外交部就沒有提，我也沒有提。主席一看說，為什麼不讓美國的來？主席抓住這個時機，一邀請，就轉動了世界」。周總理在外事會議上的講話，1971年5月30日、31日，1057-1-2，河北省檔案館。

112 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第308–309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77頁。

11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48頁；趙正洪：〈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第144–145頁。

114 周總理關於接待加、哥、英、尼、美、奧六國乒乓球代表團的指示，1971年4月10日，855-10-80-10，河北省檔案館；凌青：《從延安到聯合國》，第131頁。

115 總理在幾國乒乓球隊活動日程上的批示，1971年4月11日，B126-2-107-1，上海市檔案館。

116 周總理關於接見美國等乒乓球代表團的具體指示，1971年4月12日深夜及4月14日凌晨，855-10-80-10，河北省檔案館；〈總理在幾國乒乓球隊活動日程上的批示〉，1971年4月11日，B126-2-107-1，上海市檔案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50–451頁；《周恩來外交文選》，第469–475頁；關於美國媒體的相關報道，參見John Roderick, "Chou (Zhou) Says 'New Page' Has Opened," *New York Times*, April 15, 1971。

117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710.

118 Message From the Premi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ou En-lai to President Nixon, Beijing, April 21, 1971, *FRUS*, 1969–1976, vol. 17, pp. 300–30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52–453頁；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714.

119 Message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10, 1971, *FRUS*, 1969–1976, vol. 17, pp. 318–319;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 723–724; 又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095頁；宮力：《跨越鴻溝》，第97–98頁。

120 〈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中發（1971）40號文件。

121 同上。

12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82頁。

123 周恩來總理給尼克松總統的信（1971年5月29日）（周恩來手跡版），中央檔案館編：《共和國五十年珍貴檔案》下（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第1030–1032頁；Message from Premier Chou En-lai (Zhou Enlai) to President Nixon, May 29, 1971, *FRUS*, 1969–1976, vol. 17, pp. 332–333。

124 Nixon, *Memoirs*, p. 552.

125 周總理在外事會議上的講話（未經總理審閱），1971年5月30日–31日，1057-1-2，第1–108頁，河北省檔案館。

12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83頁。

127 周總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1年6月4日，91-007-0028-0001，第1–19頁，甘肅省檔案館。

128 中共中央關於轉發〈毛主席會見斯諾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的通知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示，1971年5月31日，中央討論文件（1971）133號。

129 周總理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的講話（根據筆記整理），1971年6月18日晚10時（根據筆記整理），91-007-0028-0001，第20–38頁，甘肅省檔案館。

130 孔東梅：《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第92頁；唐龍彬：〈一次神秘的外交使命——接待基辛格秘密訪華〉，《世界知識》，1995年第6期，第30–31頁。

131 張穎：《外交風雲親歷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347頁。

13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4:35–11:20 p.m., *FRUS*, 1969–1976, vol. 17, pp. 359–397; 又參見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訪華內幕〉，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2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第40–41頁。

133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訪華內幕〉，第41–42頁。

134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750;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訪華內幕〉，第41–42頁；Haig to Eliot, 28 January 1972, enclosing Kissinger to the President, "My Talks with Chou Enlai [Zhou Enlai]," 17 July 1971, RG 59, Top Secret Subject—Numeric Files, 1970–1972, POL 7 Kissinger, NA。

135 黃華：《親歷和見聞》，第164–165頁。

136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第630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69頁；《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596–597頁。

13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69–470頁；郭明：《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第102–103頁。

13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69頁；《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597頁。

139 周恩來談國際統一戰線，和金日成談話會談摘錄，1971年8月10日，1057-8-44，河北省檔案館。

140 《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59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69頁。

141 Albania Central National Archive (1971), F. 14. / AP–MPKK, File, no. 3, cited from Gjon Borici, The Decline of the Albanian-Chinese Relations, 1971–1978, pp. 108–109;《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59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69頁。

142 Albania Central National Archive (1971), F. 14. /AP–MPKK, File, no. 3, cited from Gjon Borici, The Decline of the Albanian-Chinese Relations, 1971–1978, pp. 108–10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474頁；范承祚：〈中阿關係的春夏秋冬〉，王泰平主編：《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4輯，第245–246頁。

143 毛澤東會見奈溫談話記錄，1971年8月7日。

144 中央聯絡部轉發〈周總理同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頂同志談改善中緬關係問題〉，1971年8月7日，91-011-0002，第24–26頁，甘肅省檔案館。早在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會見德欽巴登頂時，毛曾向德欽通報：「我們考慮同緬甸奈溫政府搞好國家關係，互派大使，想聽聽你們的意見。」德欽表示：「如果對中國有利，並且不影響緬甸的革命鬥爭，我們同意中國同緬甸恢復外交關係。」毛主席會見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頂談話記錄，1970年10月1日。

145 曹桂生：〈回憶中美「巴黎秘密渠道」〉，裴堅章主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2輯，第46–55頁。

146 《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608–609頁；基辛格這次訪問後的報告，參見Memorandum from Kissinger to Nixon, "My October China Visit: Discussions of the Issues," November 1971, *FRUS*, 1969–1976, vol. 17, pp. 524–558；Memorandum from Kissinger to Nixon, "My October China Visit: Drafting the Communique," November 1971, *FRUS*, 1969–1976, vol. 17, pp. 559–570。

147 魏史言：〈基辛格第二次訪華〉，裴建章主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3輯，第67頁。

148 同上，第66–67頁；*FRUS*, 1969–1976, vol. 17, p. 560；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781。

149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 782; *FRUS*, 1969–1976, vol. 17, p. 561.

150 *FRUS*, 1969–1976, vol. 17, pp. 561–566.

151 周恩來對澄清美方在台灣地位問題上的態度高度敏感。當時，正值聯合國將就阿爾巴尼亞等國提出從聯合國和安理會驅逐「蔣介石的代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的提案進行表決的當口（這一提案以壓倒多數獲得通過，成為2758號決議）。周在同基辛格的最後一次會談中提到，他「並不特別喜歡阿爾巴尼亞提案，因為它沒有專門涉及台灣地位問題」。*FRUS*, 1969–1976, vol. 17, p. 540.

152 周恩來講解中美聯合公報紀要，1972年3月3日，1057-8-44，第206頁，河北省檔案館。

153 參見Chen Jian, commentary on "Mike Mansfield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ia Perspective*, vol. 2, no. 3 (Spring 2003): 17–18.

154 此前，在基辛格1971月7月秘密訪華時，他已向周恩來簡單提及這個請求。這一次，他談得更為詳細，並承認了唐奈等是中央情報局特工。*FRUS*, 1969–1976, vol. 17, pp. 446, 555–557.

155 同上，第793–794頁。

156 *FRUS*, 1969–1976, vol. 18, pp. 88–89.

157 Christensen, *Lost in the Cold War*, p. 233.

158 宮力：《毛澤東和美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第301頁。

15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12–413頁。

160 魏史言：〈黑格率先遣組為尼克松訪華安排的經過〉，裴建章主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3輯，第76–79頁；Message from Haig to Kissinger, Beijing, January 8, 1972, *FRUS*, 1969–1976, vol. 17, p. 650。

161 Message from Haig to Kissinger, Beijing, January 8, 1972, *FRUS*, 1969–1976, vol. 17, pp. 650–651;《周恩來傳》，第1104–1105頁。

162 Kissinger to Nixon, "Your Encounter with the Chinese," February 5, 1972, Top Secret/Sensitive/Exclusive Eyes Only, Box 1031, Exchanges Leading to HAK trip to China—December 1969–July 1971 (1), NA.

16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26頁；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80頁。

164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538頁。
165 吳旭君：〈目擊中美關係解凍細節的護士長〉，《神州》，2006年第9期，第53頁。
166 Nixon, *Memoirs*, p. 500.
167 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談話記錄，1972年2月21日；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ruary 21, 1972, 2:50–3:55 p.m., *FRUS*, 1969–1972, vol. 17, pp. 677–684.
16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ruary 22, 1972, 2:10–6 p.m., *FRUS*, 1969–1972, vol. 17, p. 697.
16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ruary 24, 1972, 5:15–8:05 p.m., *FRUS*, 1969–1972, vol. 17, p. 767.
170 周恩來講解中美聯合公報紀要，1972年3月3日，1057-8-44，第194–195頁，河北省檔案館。
171 同上。
172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1972年2月28日。
173 羅銀勝：《紅色名媛章含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第165頁。
174 周恩來講解中美聯合公報紀要，1972年3月3日，1057-8-44，第194–217頁，河北省檔案館。

第29章

1 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組訪問紀登奎記錄，1988年春，轉引自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第10頁。
2 轉引自同上，第11頁。
3 Official calls by Charge d'Affaires of United Kingdom in China on government ministers, 1971, FCO–21/839, UKNA.
4 周總理接見英國代辦譚森的談話，1971年3月2日，外交部：《外事動態》增刊第13期（1971年3月18日）；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第301–302頁；Mr. Denson's meetings with Chou En-lai on 3 March (1971), FCO–21/839, UKNA. 英方文件中一再提及，此次會見是周恩來採取主動。中方為英國代辦處受損支付的費用為22,000英鎊。
5 公報的這一段文字是："[The UK] acknowledges that Taiwan is a provi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這一段的中文是：「聯合王國政府承認中國政府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的立場。」這裏，acknowledge譯為「承認」。
6 王殊：〈從記者到大使〉，王殊、肖向前等：《不尋常的談判》（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第26–29頁。
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38頁；王殊：〈從記者到大使〉，第31頁。
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38頁。
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40–442頁；王殊：〈從記者到大使〉，第38頁。

10 周恩來同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同志談話紀要，1972年8月1日，1057-8-44，第161、168頁，河北省檔案館。
11 參見本書第23章的相關敘述。
12 AMAE, Asie-Océanie, Chine, 119QO/533, Compte rendu de l'audience accordée par le général de Gaulle à M. Huang Chen, ambassadeur de Chine à Paris, 16 mai 1966, p. 137.
13 AMAE, Asie-Océanie, Chine, 119QO/533, Note: Audience de M. Pompidou à l'Ambassadeur de Chine, l Juillet 1966 à Matignon, pp. 116–157; 蔡方柏：《從戴高樂到薩科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第26頁；范中匯等：《將軍、外交家、藝術家：黃鎮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第480–481、544頁。
14 蔡方柏：《從戴高樂到薩科齊》下，第32頁。
15 裴默農：〈首腦外交的風範〉，田曾佩、王泰平主編：《老外交官回憶周恩來》，第66頁。
1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35頁。
17 總理和德國總統蓬皮杜的談話，1973年9月13日，外交部檔案館。
18 顧保玖：《周恩來最後六百天》，第180–181頁。
19 周總理在外事會議上的講話，1971年5月31日，1057-1-2，第84頁，河北省檔案館。
20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20頁。
21 周恩來同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同志談話紀要，1972年8月1日，1057-8-44，河北省檔案館。
22 周斌：《我為中國領導人當翻譯——見證中日外交秘辛》(香港：大山文化，2013)，第236–237頁。
2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36頁。
24 周恩來總理和日本公明黨竹入義勝委員長關於中日邦交正常化會談的要點，1972年7月27–29日，田恆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71–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第89–95頁。
2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40頁。
26 周恩來同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同志談話紀要，1972年8月1日，1057-8-44，第163頁，河北省檔案館。
27 周恩來總理和日本公民黨竹入義勝委員長會談要點，第一次會談，1972年7月27日，田恆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第91頁。
28 周斌：《我為周恩來總理當翻譯——見聞與感悟》(香港：天地圖書，2018)，第111–112頁。
29 毛澤東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談話記錄，1972年9月27日；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49頁；《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98–599頁。
30 周斌：《我為周恩來總理當翻譯》，第121–122頁。
31 張香山：〈中日復交談判回顧〉，《日本學刊》，1998年第1期，第47頁；又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第25頁；日本方面，當時任外務省中國課課長的橋本恕是田中和周恩來會談的與會者，他提供的證言是，田中接着周恩來的話還說了一句，「那也是，那就再找機會吧」。石井明、朱建榮、添谷芳秀、林晚光編：《記錄と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涉》(東京：岩波書店，2003)。

32 中國外交檔案中關於這次談話的記錄還沒有解密。但張香山說，他的記述是以會談記錄為依據的。如此，那就意味着日方所公佈的記錄對周和田中談話作了重大刪節。而從周的表態以及田中的回應來看，雙方顯然在釣魚島是一個「問題」上存在共識。但事情要一步步來做，而他們會談的重中之重和當務之急，是要完成中日關係的正常化。如果讓釣魚島問題「摻和」進來的話，則不可避免地會使得中日會談偏離關係正常化的重點，而被一個當時無法解決的「問題」搞得複雜化。

33 《李先念傳，1949–1992》，第763–764頁。

34 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1972年1月16日，《中共黨史資料》第96輯（2004年第2期），第4–8頁；李先念、華國鋒、余秋里致周恩來函，1972年1月23日，同上，第8頁；《建國以來李先念文稿》第3冊，第158–159頁；《李先念傳，1949–1992》，第764頁。

3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11頁。

36 國家計委：〈關於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1972年8月6日，《中共黨史資料》第90輯，第9–10頁；陳錦華：《國事憶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第10–14頁；《李先念傳，1949–1992》，第766–767頁；《李先念年譜》第5卷，第208–209頁。

37 《李先念傳，1949–1992》，第767頁。

38 國家計委：〈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1973年1月2日，《中共黨史資料》第90輯，第12–19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70–571頁；陳錦華：《國事憶述》，第14–15頁。

39 陳錦華：《國事憶述》，第15頁；《中共黨史資料》第90輯，第24頁。

4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417頁。

41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1959年4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4冊，第13頁。

42 黃錚：《風雨無悔——對話王光美》，第425頁。

43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第96頁。

44 劉武生：《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275頁。

45 轉引自《鄧小平傳》，第1363頁。

46 《鄧小平傳》，第1368–1369頁。

47 《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958頁。

4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09頁；《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958頁。

49 鄧小平寫給毛澤東的信，1972年8月3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0 毛澤東對鄧小平來信的批語，1972年8月1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255頁。

5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45頁。

52 同上，第567頁。

53 毛澤東對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批語，1973年3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301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83頁；《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972頁。

54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275頁。

55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95–300頁。
56 李菁：〈「一代國醫」吳階平〉，《三聯生活週刊》，2011年第12期。
57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第335–336頁；李菁：〈「一代國醫」吳階平〉。
58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618頁。
59 李菁：〈「一代國醫」吳階平〉。
6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23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33、436頁。
6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33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23–524頁；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批林整風彙報會議的通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革十年資料選》第一輯(二)，1981年5月，第172–175頁。
62 周恩來致毛澤東信，1972年5月30日，轉引自《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36頁。
63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08–309頁。
64 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革十年資料選》第一輯(二)，第176–189頁；參見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第34–35頁。
65 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1972年6月7日，轉引自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第35–36頁。
66 周恩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1972年6月10日–12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29–530頁。
67 轉引自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第36頁。
68 趙瑋：《西花廳歲月》，第211–212頁。
69 同上，第211頁。
70 轉引自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第35頁。
7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41–542頁；參見周恩來同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同志談話紀要，1972年8月1日、2日，1057-8-44，河北省檔案館。
7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646頁。
7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65頁。
74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64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66頁。
75 王若水上毛澤東書，《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第178–180頁。
7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66頁。
77 陳揚勇：《重拳出擊：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之後》(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第280頁。
78 李菁：〈「一代國醫」吳階平〉。
79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056頁。
80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01頁；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第337–338頁；李菁：〈「一代國醫」吳階平〉。

8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583–584頁。
82 李菁：〈「一代國醫」吳階平〉。
83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第336–337頁；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27頁；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166頁。
84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166頁。
85 毛澤東會見基辛格博士談話記錄，1973年2月17日；美方記錄見*FRUS*, 1969–1976, vol. 18, pp. 123–138。
86 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黎筍、政府總理范文同談話記錄。
87 楊奎松：〈中美和解過程中的中方變奏〉，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2冊（南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第311–313頁。
88 紀東：《難忘的八年》，第175–176頁；《章含之同志談話》，1998年4月3日（打印稿），第17頁；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328頁。
8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03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84頁；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328頁。
90 徐景賢：《徐景賢最後的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社，2013），第299頁。
9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85頁。
9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04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85–486頁。
9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21–62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99頁。
94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21頁。
95 這是基辛格訪問後給尼克松報告中的話。*FRUS*, 1969–1976, vol. 18, p. 431.
96 毛澤東會見基辛格談話記錄，1973年11月12日；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o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2, 1973, 5:50–8:25 p.m., *FRUS*, 1969–1976, vol. 18, pp. 380–400。當時，為了翻譯「屁事」這個詞，唐聞生還做了一大段解釋。
97 毛澤東會見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談話記錄，1973年11月12日；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o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2, 1973, 5:40–8:25 p.m., *FRUS*, 1969–1976, vol. 17, p. 384。基辛格上述最後一句話，同中方記錄有出入。中方的記錄是：「所以我們決心加以反對。我們已經決定不允許中國的安全遭到破壞。」
9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Zhou Enlai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0, 1973, 9:25–10:00 p.m., *FRUS*, 1969–1976, vol. 18, pp. 326–331.
99 Memorandum, Zhou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3, 1973, 10:00p.m.–12:30 a.m.,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00 同上。
101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第462頁。他引用的是權延赤的書，但卻把事情搞反了。高在《晚年周恩來》中的引文是：「因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後，周恩來下決心承擔責任，拍板做了決定。」權書的原文卻是：「因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後，總理下決心承擔責任，叫醒毛澤東作決定。」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第351頁。也就是說，如果

權書所記述的周恩來衛士的回憶是可靠的，那麼這段引文恰恰印證了章含之的說法，即周向毛做了彙報。

102 《章含之同志談話》，1998年4月3日，打印件，第1–2頁。

10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Zhou Enlai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4, 1973, 7:25–8:25 a.m., *FRUS*, 1969–1976, vol. 18, pp. 427–430.

10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Zhou Enlai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4, 1973, 7:25–8:25 a.m., Kissinger file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這裏，出現了一個在美國檔案系統中未曾見過的現象：儘管這個周恩來和基辛格「一對一」會談的記錄在時間上和上一個註解中所引文件完全重合，但內容卻完全不同。這個文件在基辛格送給美國國會圖書館和耶魯大學的自己的全部檔案文獻中不存在，而是由NSA的資深研究院William Burr通過美國「信息自由法案」(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在基辛格助手洛德 (Winston Lord) 文件中發掘出來的。

10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Zhou Enlai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4, 1973, 7:25–8:25 a.m., Kissinger file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06 在中方關於這次會談記錄中，周恩來還告訴基辛格：「我們還要考慮」，「要報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決定」。見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669頁，其出處為「周恩來同基辛格第三次單獨會談記錄，1973年11月14日」。

107 基辛格對此大惑不解，曾對筆者提起：1973年11月他從北京回美國，他和周恩來討論之事再無下文，他就知道中國方面「有事了」，只是不知道「出了什麼事」。筆者就此事與基辛格的意見交換，2012年3月31日。

10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34頁。根據張玉鳳的說法，王海容和唐聞生曾拿着周恩來和基辛格最後一次會談的記錄稿，將畫有槓的地方唸出來 (但不知是什麼地方)，問周恩來：「您是這樣講的嗎？」周答道：「對，這是記錄稿麼，我就是這個意思。」王、唐兩人隨後從張玉鳳處了解到，周恩來這兩天未晉見毛澤東，亦未給毛澤東打電話，唐當即說：那就怪了，這麼大的事，總理為什麼不請示主席，也沒有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忙着去見基辛格，答應建立核保護？(張玉鳳回憶資料)

109 毛澤東同周恩來談話記錄，1973年11月17日。轉引自李捷：〈從解凍到建交：中國政治變動與中美關係〉，宮力等編：《從解凍到建交：中美關係正常化再探討》(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274頁。

110 《章含之同志談話》，1998年4月3日 (打印稿)，第3頁。

11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34頁。

112 《章含之同志談話》，1998年4月3日 (打印稿)，第6頁；《葉劍英年譜》下，第1066頁。

113 《章含之同志談話》，1998年4月3日 (打印稿)，第4頁。

114 同上，第6頁。

11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34頁。

116 《章含之同志談話》，1998年4月3日 (打印稿)，第5頁。

117 同上。

118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10–314頁。

119 至於唐聞生、王海容為什麼要這麼做，則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我們知道的是，

文革結束後，唐、王曾在外交部受到審查，但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出面保了她們，使她們得以解脫。唐、王兩人此後均極為低調，也從不願接受同她們在毛身邊的經歷有關的任何訪談。筆者曾兩次有機會同她談話，都提出了她應該寫回憶錄的建議，她都笑而不答，把話題岔開到別的事上去。

120 《章含之同志談話》，1998年4月3日（打印稿），第9頁；《徐景賢最後的回憶》，第305頁。

121 12月9日晚，毛先後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時說：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08頁。

122 《章含之同志談話》，1998年4月3日（打印稿），第10頁；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474頁。

123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287–289頁。

124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12頁。

125 《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671頁。毛當時還指着唐和王說：這兩位小將「騎在我們總理頭上拉屎拉尿」。為此，唐聞生對毛極為不滿，曾抱怨道，毛的做法是「他做臉，我們做屁股」。

126 「四人幫」倒台後，鄧穎超向中央要求，銷毀周恩來擔任中央專案組組長時處理劉案等的全部材料以及1973年11月至1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的全部材料（參見徐景賢：《徐景賢最後回憶》，第296頁）。其中，前一點可以理解，但為什麼鄧會提出後面這一點？是否因為會上還涉及到了周恩來的其他什麼「秘密」？由於會議原始文件可能已不復存在，這個問題也許永遠得不到回答。

127 主席五次講話（曾政委傳達），1973年12月，檔號未標明，瀋陽市檔案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67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冊，第510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36頁。

128 主席五次講話（曾政委傳達），1973年12月，檔號未標明，瀋陽市檔案館；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第7–8頁。

129 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為政治局委員並參加中央領導工作的通知，1973年12月22日，中發（1973）44號。

13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44頁。

131 毛澤東同鄧小平談話記錄，1974年11月28日，轉引自李捷：〈從解凍到建交：中國政治變動與中美關係〉，第274頁。

第30章

1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133頁。

2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21–322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57頁。

3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23頁。
4 周恩來選擇三零五醫院的一個原因，應是這裏離西花廳很近。另一個原因，應是這是他在政治上的對手較難插手、更難控制的地方。
5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34頁。
6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167頁。
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80頁。
8 同上。
9 他們整理出了《林彪與「孔孟之道」》。
10 中共中央(1974)第一號文件，轉發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毛澤東批示，「同意轉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331頁。
11 江青、姚文元、遲群、謝靜宜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74年1月25日，《「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第90–109頁。
1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47–648頁；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第254–256頁。
13 《耿飈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第270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130頁。
14 毛澤東對葉劍英來信的批語，1974年2月1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337頁。
15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74年3月20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33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23頁。
1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49頁。
17 同上。
1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339頁。
19 同上。
20 《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1191–1192頁；《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58–162頁。
21 毛澤東主席關於中間地帶的談話，1964年，103-00110-01，外交部檔案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06–509頁；參見本書第24章相關敘述。
22 毛主席會見緬甸共產黨副主席德欽巴登頂談話記錄，1970年10月1日晚上9時25分至10時10分。
2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23頁。
24 劉武生：《周恩來的晚年歲月》，第291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134頁。
25 凌青：《從延安到聯合國》，第147頁。
26 劉武生：《周恩來的晚年歲月》，第291頁。
2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23頁。
28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134頁。
2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58頁。
30 同上，第661頁。

31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27頁。
32 毛澤東對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發言稿的批語，1974年4月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386頁。
33 《人民日報》，1974年4月11日，第1版。
34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556–557頁；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39頁。
3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45–546頁。
3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364頁。
3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40–541頁。
38 同上，第540頁。
3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5頁。
4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38–539頁。
41 同上，第549頁。
42 《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2058頁。
4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62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79頁。
4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79頁。
45 同上；《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52頁；高振普：《陪伴病中周恩來的日日夜夜》，第353頁。
4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54頁；《鄧小平年譜》下，第2060頁；毛毛（鄧榕）：《文革歲月——我的父親鄧小平》，第322頁。
4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80頁；高振普：《陪伴病中周恩來的日日夜夜》，第353頁。
48 《彭德懷年譜》，第852頁。
49 《彭德懷傳》，第745頁；《彭德懷年譜》，第852頁。
50 《彭德懷傳》，第745頁。
51 范碩等：《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第624–625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86頁。
52 周恩來：〈傳達主席在1974年12月23、24、25、27日四次談話要點〉（手稿複印本）；又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62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86–687頁。
53 周恩來：〈傳達主席在1974年12月23、24、25、27日四次談話要點〉（手稿複印本）；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379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87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64頁；《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713–1714頁。
5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87–688頁；毛毛：《文革歲月》，第330–331頁。
5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88頁。
56 同上。
57 同上，第689頁；《李先念年譜》第5卷，第394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頁。

58 《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13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89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頁。

59 周恩來就中央政治局會所議事項寫給毛澤東的報告，1975年1月2日、4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157頁。

6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66–567頁。

6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90頁。

62 毛華鶴：〈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秘密召開記〉，《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第37頁。

63 《人民日報》，1975年1月21日，第1版。

64 周總理、張春橋同志在國務院會議上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1975年2月1日，91-016-0206，甘肅省檔案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93–694頁。

65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167頁；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45頁。

66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70頁。

67 同上，第575頁。

68 周恩來致毛澤東信，1975年3月20日（手稿影印件），中央檔案館編：《周恩來手跡選》第3卷（書信卷下），第318–321頁；《周恩來書信選集》，第633–635頁。這封近千字的長信，周恩來親筆書寫，字跡清晰，竟無一字修改。

6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77頁。

70 據長期擔任毛、周等人的英文翻譯，當時在中國駐美聯絡處任參贊的冀朝鑄回憶，當基辛格得知周恩來身患絕症時，曾建議「他可以把美國最好的癌症專家派到中國給周總理做治療」。但冀將此事報告北京後，「不知道中國是怎麼答覆的」。冀朝鑄：《從紅牆翻譯到外交官——冀朝鑄口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116頁。

71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第220頁。

7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74頁。

73 同上，第577頁。

74 同上，第582–583頁。

75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第163頁。

76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41頁。

7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707–708頁。

7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5頁。

79 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1975年6月16日22時，轉引自顧保孜：《周恩來最後六百天》，第399–400頁。

80 顧保孜：《周恩來最後六百天》，第399–400頁。

8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711頁；薛明：〈周恩來與賀龍〉，《不盡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第617–618頁；李烈主編：《賀龍年譜》，第804頁；高振普：《陪伴病中周恩來的日日夜夜》，第211頁。

82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4–65頁。

8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93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1–62頁。

84 周恩來和鄧小平早在留法年代即為同志，此後幾十年間關係雖不親密，卻從未有發生衝突的記錄。自1973年底的那場「批周」風波後，周恩來和鄧小平政治理念及利益相近，兩人的關係也大大地拉近了。

85 1975年7月16日，從下午5時到7時30分，周恩來和鄧小平的談話居然長達兩個半小時（高振普：《陪伴病中周恩來的日日夜夜》，第382頁）。鄧小平素來講話不多，言簡意賅。這一天，周和他說了這麼多話，可見當時兩人關係的密切程度。

86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第162頁。

87 楊尚昆：〈相知相識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來同志〉，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第44頁。

8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679頁；《毛澤東傳，1949–1976》下，1704頁。

89 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評論，1975年8月1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426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03頁。

90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07–608頁。

9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717頁。

92 同上，第720頁。

93 鄧小平在「批鄧」開始後，也曾對胡喬木承認：過去把形勢看到太簡單了。程中原整理：《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104頁。

94 《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709頁；高振普：《陪伴病中周恩來的日日夜夜》，第197頁。

95 毛澤東主席會見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共和國主席金日成談話記錄，1975年4月18日，下午5時至5時30分。

96 張青：〈情深意重二十載：周恩來與西哈努克交往紀實〉，田曾佩、王泰平主編：《老外交官回憶周恩來》，第172頁。

9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719–720頁；蔣本良：《給共和國領導人做翻譯》，第112–116頁。

98 高振普：《陪伴病中周恩來的日日夜夜》，第236頁。

9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721頁。

100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02頁；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50頁；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181頁。

10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721頁。

102 趙瑋：《西花廳歲月》，第266頁。

103 毛毛：《文革歲月》，第424頁。唐、王兩人曾同鄧小平走得很近，是鄧家的常客。

104 高振普：《陪伴病中周恩來的日日夜夜》，第368頁。

10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13頁。

106 同上，第619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25頁。

107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19頁。

108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27頁。

10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451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20–621頁。

110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31–132頁；《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25頁。

111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中央文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0冊，第450–454頁。發表此件時，把「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這句話刪掉了。

112 高振普：《陪伴病中周恩來的日日夜夜》，第281–282頁；高文謙：〈在最後的日子裏——記病重住院的周恩來同志〉，《懷念周恩來》，第593頁。

113 毛毛：《文革歲月》，第438頁。

114 這裏，周恩來說的「台灣的幾位老朋友」究竟是誰？羅青長的回憶中未提及姓名。有一種可能是，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欲向羅交代的是多少年來一直由他自己保持單線聯繫的幾個中共方面最高層級的臥底的姓名乃至聯絡方式。

115 羅青長：〈銘記不忘〉，《人民日報》，1979年1月9日；關於這件事的不同說法，參見〈羅青長的《銘記不忘》文章〉，郝汀、章鐘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調查部》，2013年自印本，第421–430頁；高振普：《陪伴病中周恩來的日日夜夜》，第265–268頁；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70頁；《周恩來傳，1949–1976》下，第1192頁。

116 王宇清：〈周恩來臨終囑託：要見證「江青有野心」〉，《世紀》，2003年第6期，第9頁。王宇清是王海容的侄子。在這篇文章裏，他只是說，周恩來是在12月的一天對唐、王說這一番話的。據周恩來的工作枱曆，唐、王在1975年12月到醫院見他兩次，但12月10日晚7時35分那一次「沒說話」。只有12月27日的那一次說了話。參見高振普：《陪伴病中周恩來的日日夜夜》，第388頁。另據紀登奎的說法，周恩來還說江青是叛徒。

117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第370頁。

118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168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40–141頁。手術時，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一直守候在外。

119 據《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第726頁記載，周說的是「你們還是去照顧其他同志」。但根據筆者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人士的訪談，他說的不是「別的同志」，而是已久患絕症的「康生同志」。吳階平本人回憶的說法是，周雖然說「其他同志」，但心裏想的卻是康生和江青。Olivia Cox-Fill, *Walking a Tightrope: Memories of Wu Jieping, Personal Physician to China's Leaders* (Bloxham, UK: Skyscraper Publications, 2019), p. 174. 其實康生已於1975年12月15日去世，周恩來說這段話時已瀕臨死亡，神智不清。

120 趙瑋：《西花廳歲月》，第271、274頁。

參考文獻

一、檔案館、數據庫及圖書館原始文件

上海市檔案館
上海紐約大學圖書館
山西省檔案館
中央檔案館
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
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
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檔案館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包頭市檔案館
北京市檔案館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
台北國史館
台灣國家檔案資訊網（https://aa.archives.gov.tw）
四川省檔案館
尼克松總統圖書館（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尼赫魯紀念博物館和圖書館（Nehru Memorial Museum & Library, NMML）
甘肅省檔案館
伍德羅·威爾遜研究中心冷戰國際歷史項目數字化檔案庫（Wilson Cent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伍德羅·威爾遜研究中心數字檔案（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
印度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New Delhi）

吉林省檔案館
江蘇省檔案館
艾森豪威爾總統圖書館（Dwight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杜魯門總統圖書館（Harry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林登・約翰遜總統圖書館（Lyndon B. Johnson Presidential Library）
河北省檔案館
法國外交部檔案館（Les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Français, AMAE）
肯尼迪總統圖書館（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長春市檔案館
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ГАСПИ）
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ЦАМОРФ）
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ВПРФ）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ПРФ）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圖書館（Harvard University Fairbank Center Library）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NA）
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LC）
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Hoover Institute Library and Archive）
英國公共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UKNA）
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Yale University East Asian Library）
香港大學圖書館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Columbia University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浙江省檔案館
馬克思主義者網（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s://www.marxists.org）
康奈爾大學東亞圖書館（Cornell University Kroch Library）
湖北省檔案館
華東師範大學當代文獻史料中心
黑龍江省檔案館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
解放軍檔案館
福建省檔案館
廣州市檔案館
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館
廣東省檔案館

遼寧省檔案館
瀋陽市檔案館
羅斯福總統圖書館（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二、已刊檔案文獻集（含非正式出版物）、其他已刊及未刊原始文獻

〈1961年中蘇經濟科技談判的一組文獻〉。《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4期，第4–24頁。
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26卷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革十年資料選》第一輯。內部印行，1981。
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3冊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1986。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中央檔案館編：《皖南事變（資料選輯）》。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49）》，13冊內部發行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49），20冊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966）》，13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
———：《周恩來手跡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共和國五十年珍貴檔案》。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966）》，50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周恩來答問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等編：《周恩來1946年談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23卷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2012。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彙編（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洛杉磯：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多年內陸續印行。

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編：《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內部刊印，1988。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6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新四軍文獻》。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紅軍長征．文獻》。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

———：《總參謀部．文獻》。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中國外交部編：《中國和印度關於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和其他問題來往文件彙編（1950.8–1960.4）》。北京：外交部內部印行。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選》。作者個人藏本，出版時間、地點不詳。

〈中國和巴基斯坦聯合公報〉（1964年2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64年第5號（3月12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對外貿易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中國統計年鑒，198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一集．1954年日內瓦會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第二集．中國代表團出席1955年亞非會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上、下。北京：中共黨校出版社，198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49–1952》對外貿易卷。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

天津歷史博物館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毛澤東：〈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彙報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時的插話（節錄）〉。《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第10–11頁。
《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毛澤東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
《毛澤東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1。
《毛澤東選集》。蘇中出版社，1945。
《毛澤東選集》，5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王稼祥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北京：三聯書店，1957。
〈北平市政府關於沈崇事件來往函電選編〉。《北京檔案史料》，1994年第1期。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編：〈林彪與孔孟之道〉。《紅旗》，1974年2期。
外交部檔案館編：《中國代表團出席1955年亞非會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布哈林：〈對現在革命形勢之及我們現在的任務〉。《黨的文獻》，1988年第1期，第19–25頁。
田恒主編：《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1971–199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吳輝編：《吳荻舟香港文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2。
李大釗：《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15。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7。
周恩來：〈周恩來同達賴談話記錄〉。《黨的文獻》，1994年第2期，第36–37頁。
《周恩來文化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續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周恩來同志談個人與革命歷史：同美國記者李勃曼談話記錄〉。1946年9月，《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1期，第4–17頁。
《周恩來青年時代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周恩來經濟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林秋敏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1。
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卷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20卷本。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2023。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
《建國以來李先念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2008。
《紅軍長征．文獻》。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中正文教基金會，1978。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耿仲琳編：《吳瑞林史料》。自印本。
馬歇爾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國共內戰與中美關係——馬歇爾使華秘密報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2。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1986。
國家計委：〈關於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中共黨史資料》，第90輯，第9–10頁。
———：〈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中共黨史資料》，第90輯，第12–19頁。
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1972年1月16日〉。《黨史研究資料》，第96輯，2004年第2期，第4–8頁。
《張聞天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
陳毅：〈陳毅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兩篇講話〉。《黨的文獻》，2002年第2期，第3–12頁。
陳獨秀：《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斯大林：〈黨的六大文獻檔案選載（一九二八年六月）：關於中國革命問題（一九二八年六月九日）〉。《黨的文獻》，1988年第1期，第3–6頁。
黃嫣梨編：《張若名研究記資料緝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7。
新華社：〈決不容許外國侵略者吞併中國的領土——西藏〉。《人民日報》，1949年9月3日，第1版。
《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985。
劉武生編：《周恩來軍事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劉焱主編：《周恩來早期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廣東省革命歷史博物館編：《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
《鄧小平文選，1938–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懷恩編：《周總理青少年時代詩文書信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Carlyle, Margaret, ed.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9–195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Volume IV & V.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Volume V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IX.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Korea, Volume VI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Korea and China, Volume VII, Part 1.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Korea, Volume XV, Part 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The Geneva Conference, Volume XV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 II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China, Volume XIX.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 & XVIII, China, 1969–197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2007.

Ho Chi Minh. *Selected Works of Ho Chi Min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Palat, Madhavan K., ed.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2005.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wight D. Eisenhower, 1958.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69.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Van Slyke, Lyman P., ed. *The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Westad, Odd Arne et al., eds.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Washington, DC: The Wilson Center, 1998.

三、人物年譜

力平、方銘主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力平、方銘、馬芷蓀主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49–1976》。送審本。
力平、馬芷蓀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任弼時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朱佳木主編：《陳雲年譜（1905–199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余汝信：《風暴歷程——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軍》。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21。
———編：《陳伯達年譜——中共頭號理論家的跌宕人生（1904–1989）》。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24。
———：《康生年譜——一個共產黨人的醫生（1898–1975）》增訂本。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25。
吳殿堯主編：《朱德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台北：國史館，2015。
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
李烈編：《賀龍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周國全、郭德宏主編：《王明年譜》。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徐向前年譜》編委會：《徐向前年譜》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6。
徐則浩等編：《王稼祥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逄先知等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逄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6卷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張友坤、錢進主編：《張學良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彭真年譜》編寫組：《彭真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楊成武年譜》編寫組：《楊成武年譜》。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
楊勝群、閆建琪主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劉崇文、陳紹疇主編：《劉少奇年譜》上、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上、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劉繼賢等：《葉劍英年譜（1879–1986）》上、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四、日記、回憶錄及口述史資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編：《周恩來自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中國共產黨口述史料叢書編委會：《中國共產黨口述史料叢書》第1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孔東梅：《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毛毛（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王文耀、王保春。《「文革」前後時期的陳伯達——秘書的證言》。香港：天地圖書，2014。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王光美：《我與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王光美、劉源：《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1999。
———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王宇高（墉伯）、王宇正（垣叔）編：《困勉記》。台北：國史館，2011。
———：《省克記》。台北：國史館，2011。
王殊、肖向前等：《不尋常的談判》。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王維澄主編：《李先念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丘會作：《丘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司徒雷登著，陳禮頌譯：《司徒雷登日記：美國調停國共爭持期間前後》。合肥：黃山書社，2009。
尼基塔．謝．赫魯曉夫著，述弢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田曾佩、王泰平主編：《老外交官回憶周恩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寫：《我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記憶》。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何長工：《何長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吳旭君：〈目擊中美關係解凍細節的護士長〉。《神州》，2006年第9期，第49–53頁。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4。
———：《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新的探索和整風反右——吳冷西回憶錄之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吳忠口述，陳楚三、李大震整理：〈吳忠談「九一三」事件〉。《炎黃春秋》，2012年第1期，第22–27頁。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
吳國楨：《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8–1954》。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
———：《蔣中正日記，1955–1960》。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
《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胡佛研究所檔案館。
宋堃（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憶李宗仁歸來〉。《文史資料選輯》第140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
《我們的周總理》編寫組：《我們的周總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李一氓：《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李文普：〈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1999年第2期。
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1994。
李家忠：《印支外交親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從「6.18」事件到「7.29」大會〉。《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11頁。
李琦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李慎之、張彥：《亞非會議日記》。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李德（Otto Braun）著，李逵六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秘書手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李鵬：《李鵬回憶錄（1928–198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電力出版社，2014。
杜平：《在志願軍總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汪東興：《汪東興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肖全夫口述史》。打印本。
谷牧：《谷牧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周伯萍：《我在糧食部十二年》。自印本。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鐵竹偉執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周恩來旅日日記》手稿影印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周斌：《我為中國領導人當翻譯——見證中日外交秘辛》。香港：大山文化，2013。
———：《我為周恩來總理當翻譯——見聞與感悟》。香港：天地圖書，2018。
季米特洛夫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林克：《林克工作筆記》。手稿複印本。
林利：《往事瑣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林默涵口述，黃華英整理：〈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林默涵問答錄之一）〉。《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第4–28頁。
紀東：《難忘的八年——周恩來秘書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胡正清：《一個外交官的日記》。濟南：黃河出版社，1991。

胡宗南：《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台北：國史館，2015。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胡喬木傳》編寫組：《胡喬木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
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
師哲：〈憶劉少奇〉。《文史精華》，2002年第1期，第4–11頁。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社，2003。
———：《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2013。
時念堂、孫煥英：〈歷史將揭開林彪案件的更深層面——空軍專機師師長時念堂的回憶〉。《民主與法制》，2005年第3期。
耿仲琳、彭緒一主編：《最可愛的人：吳瑞林同志紀念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耿飈：《耿飈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馬迪厄（Albert Mathiez）著，楊人楩譯：《法國革命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
馬達：《馬達自述——辦報生涯六十年》。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陪伴病中周恩來的日日夜夜》。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
張文秋：《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回憶錄》。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
〈張申府談旅歐黨團組織活動情況〉。《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1981年5月），第86–87頁。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張明遠：《我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張春橋：《張春橋家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張國華工作筆記》。手稿複印本。
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張瑞靄：《周恩來機長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張穎：《外交風雲親歷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張耀祠：《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香港：中國文革歷史，2016。
梁培恕：《中國最後一個大儒——記父親梁漱溟》。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
凌青：《從延安到聯合國：凌青外交生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章含之：《章含之同志談話》。1998年4月3日。打印稿。
野阪參三著，韓鳳琴譯：〈去延安〉。《中共黨史資料》，第41輯（1992年4月），第234–252頁。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1998。
陳曉農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社，2011。
陳錦華：《國事憶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彭述之：《彭述之回憶錄》。香港：天地圖書，2005。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彭德懷自述》。送審本。
《彭德懷秘書張養吾記事》。未刊稿。
彭樹華：《潘漢年案審判前後：審判員親筆披露共和國第一冤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
曾克林：《曾克林將軍自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99。
程中原整理：《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程瑞聲：〈中緬邊界談判親歷記〉。《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4期，第100–101頁。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一、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1996。
———：《少小離家老大還——童小鵬回憶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北京：華文出版社，2015。
黃平：《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黃啟漢：〈1949年「和談」的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67輯（1980），第1–31頁。
黃崢：《風雨無悔：對話王光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黃慕蘭：《黃慕蘭自傳》。香港：中華書局，2025。
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楊成武：《楊成武將軍自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
楊克成：《我對中緬劃界工作的回憶》。
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楊尚昆日記》上、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2011。
葉子龍：《葉子龍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解學恭：〈八屆十一中全會日記〉。《炎黃春秋》，2015年第5期，第46–54頁。
雷英夫：《在最高統帥部當參謀——雷英夫將軍回憶錄》。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2005。
趙正洪：〈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中共黨史資料》，第39輯，第144頁。
趙仲元：〈1956年隨朱德參加蘇共二十大〉。《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2期，第89頁。

趙煒：《西花廳歲月：我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三十七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劉久洲：〈在周副主席身邊的日子裏〉。《文史精華》，1996年第3期，第11–20頁。
劉伯承：《劉伯承回憶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
劉志琴、王學泰、王毅採訪，王建勛、李爾柔、李三達整理：《李慎之口述往事》。北京：貽慎書屋，2020。
劉英：《劉英自述——張聞天夫人口述歷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劉德有：《風雨幾星霜——戰後中日關係親歷記》。北京：三聯書店，2018，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蔡孟堅：〈兩個可能改變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兼述顧順章自首、匪穴瓦解及我黨清除奸細之經過〉。《傳記文學》(台北)，第37卷第5期(1980年11月)，第39–48頁。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手稿本)》。胡佛研究所檔案館。
鄧在軍主編：《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冀朝鑄：《從紅牆翻譯到外交官——冀朝鑄口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天地圖書，1997。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閻明復：《親歷中蘇關係：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的十年(1957–1966)》。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閻明復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龍飛虎：〈回憶周恩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文史精華》，2001年第12期，第4–12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993。
謝樹英：〈八十七春秋憶往事(遺稿)〉。《北京文史資料選輯》，第36輯(1989)，第89–129頁。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3。
———：《聶榮臻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聶榮臻、李先念、薄一波等：《不盡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懷念周恩來》編輯小組：《懷念周恩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嚴修：《嚴修日記》。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2。
Banerjee, Purnendu Kumar. *My Peking Memoirs of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India*. New York: Clarion Books, 1990.
Dimitrov, Georgi.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Eden, Anthony. *Full Circle: The Memoirs of Anthony Ede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0.
Eisenhower, Dwight D. *Waging Peace: The White House Years, A Personal Account 1956–1961*.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Gromyko, Andrei. *Memoirs*.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Khrushchev, Nikita. *Memoirs of Nikita Khrushchev*.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7.
Kissinger, Henry A.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78.
MacKinnon, Stephen R., and Oris Friesen, eds.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Nixon, Richard.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 *Leaders*. New York: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1982.
Panikkar, K. M. *In Two Chinas: Memoirs of a Diploma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5.

五、作者訪談及所持的訪談記錄

作者與多位周恩來親屬的談話。
作者對多位資深黨史、軍史專家的訪談，1992–2019。
作者對朱良的訪談，2009年1月。
作者對吳建民的訪談，2010年3月、2011年3月。
作者對李越然的訪談，1997年10月。
作者對金沖及的訪談，2017年10月。
作者對姜思毅的訪談，1997年10月。
作者對師哲的訪談，1992年8月。
作者對高振普的電話訪談，2017年10月。
作者與基辛格的對話，2012年3月31日。
作者對張希、王亞志訪談，1992年8月。
作者對張穎的多次訪談。
章含之訪談記錄稿。
作者對陳小魯的訪談，1992年7月。
陳錫聯採訪錄音記錄稿，1995年7月。
作者對黃華的訪談，1997年10月。
作者對廉正保的訪談，2006。
蕭全夫訪談記錄稿。
作者對閻明復的訪談，1997年10月。
作者對薛謀洪的訪談，1994年8月。
作者對羅貴波的訪談，1992年8月22日。

六、報紙、雜誌及期刊

《人民日報》
《人民政協報》
《三聯生活週刊》

《中央日報》
《中共黨史研究》
《中共黨史資料》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中國當代史研究》
《中華兒女》
《中華英烈》
《內部參考》
《文史資料選輯》
《文史精華》
《文匯報》
《文獻與研究》
《日本學刊》
《世界知識》
《世紀》
《世紀風采》
《北京週報》(*Peking Review*)
《北京檔案史料》
《史林》
《外事動態》
《民主與法制》
《百年潮》
《百姓生活》
《冷戰國際史研究》
《炎黃春秋》
《社會科學》
《近代史研究》
《青年雜誌》/《新青年》
《昨天》
《紅旗》
《神州》
《記憶》
《參考資料》
《情報史研究》
《傳記文學》(台北)
《新文學史料》
《新華日報》
《當代中國史研究》
《解放日報》

《領導者》
《歷史研究》
《檔案時空》
《檔案與史學》
《黨史研究資料》
《黨史博覽》
《黨史資料叢刊》
《黨的文獻》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sia Perspecti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China Journal
The China Quarterly
Chinese Historians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Cold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CWIHPB)
Diplomatic Histo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Far Eastern Affairs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ILIRIA International Review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Journal of East Asian-American Relations
Life
Modern China
New York Times
Peking Review
Pravda
The Sunday Times
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5期，第17–21頁。
毛華鶴：〈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秘密召開記〉。《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第36–38頁。
王宇清：〈周恩來臨終囑託：要見證「江青有野心」〉。《世紀》，2003年第6期，第9頁。
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1期，第31–45頁。
王海光：〈政爭與權爭——「高饒事件」起因再解讀〉。《領導者》，總第26期（2009年2月）。

———：〈「九一三」事件循時考（修訂版）〉。《昨天》，第236期（2023年11月30日），第25–61頁。
王新生：〈紅軍長征前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考述〉。《黨的文獻》，2010年第2期，第77–82頁。
史唯：〈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第7–10頁。
史雲：〈1973年基辛格訪華與「幫周會議」風波〉。《二十一世紀》，第95期（2006年6月），第46–56頁。
朱良：〈1965年印尼「九·三零」運動〉。《中共對外關係史料》，2000年第5期，第144–145頁。
———：〈中越關係的一些重要情況〉。《中共對外關係史料》，2002年第5期，第164頁。
余湛邦：〈一九四九年國共北平和談始末記〉。《文史資料選輯》，第67輯（1980），第32–77頁。
吳永平：〈胡風書信中對周恩來的稱謂演變考〉。《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3期，第131–142頁。
李丹慧：〈政治鬥士與敵手：1960年代中蘇邊界關係——對中蘇邊界問題的歷史考察之二〉。《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第147–167頁。
李根清：〈林彪「緊急指示」前後〉。《炎黃春秋》，2015年第11期，第44–48頁。
李富春：〈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說明（節錄）〉。《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第11–14頁。
李菁：〈一代「國醫」吳階平〉。《三聯生活週刊》，2011年第12期。
李愛華：〈關於「周恩來是南開學校唯一免費生」問題的史實考證〉。《黨的文獻》，1997年第2期，第95–96頁。
沈志華：〈所謂1950年中蘇「秘密協定」〉。愛思想專欄，2016年7月31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00857.html。
卓人政：〈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的良好開端——我軍撤出「一九四一年線」以西〉。《百年潮》，2003年第3期，第21–27頁。
周陶沫：〈華僑問題的政治漩渦——解析1959–1962年中國對印度尼西亞政策〉。《冷戰國際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55–174頁。
林曉光：〈中共對台政策的歷史演進〉。《黨史研究資料》，1997年第3期。
林蘊暉：〈評戴茂林《「毛澤東查劉少奇檔案」真相調查》〉。《黨史博覽》，2017年第2期，第42–46頁。
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9–17頁。
金沖及：〈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黨的文獻》，2014年第4期，第56–71頁。
金東吉：〈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師回朝鮮問題新探〉。《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114頁。
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65–67頁。
唐龍彬：〈一次神秘的外交使命——接待基辛格秘密訪華〉。《世界知識》，1995年第6期，第30–31頁。
徐寅生、金大陸、吳維：〈我所經歷的中美乒乓外交〉。《世紀》，2017年第1期，第41–46頁。

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衝突〉。《中共黨史資料》，1994年第5期，第2–12頁。
柴成文。〈周恩來領導之下舉行的中蘇邊界談判〉。《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第45–50頁。
張光渝：〈點名與批判〉。《昨天》，第42期（2014年10月30日），第4–5頁。
張香山：〈中日復交談判回顧〉。《日本學刊》，1998年第1期，第32–49頁。
張培森、程中原、曾彥修：〈張聞天和西安事變〉。《黨的文獻》，1988年第3期，第6–13頁。
張頌甲：〈閻仲川與「一號令」〉。《炎黃春秋》，2015年第9期，第49–51頁。
曹索菲：〈父親在長征中從事密碼破譯工作〉。《人民政協報》，2006年8月17日。
通訊兵史編審委員會：〈紅軍無線電通信的創建、發展及其歷史作用〉（席杰整理）。《中共黨史資料》，第30輯（1989），第117–118頁。
陳洋：〈「醫療外交大使」吳階平為蘇加諾治病〉。《世紀風采》，2017年第1期，第9–15頁。
陳養山：〈關於中共特科〉。《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2輯。
景玉川：〈富田事變時劉敵給中央的信〉。《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第84–88頁。
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歷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16–130頁。
———：〈中山艦事件之後〉。《歷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19–31頁。
———：〈中山艦事件三題〉。《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73–76頁。
楊奎松：〈向忠發是怎樣一個總書記？〉。《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225–255頁。
———：〈共產國際對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的歷史考察〉。《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1期，第1–18頁。
———：〈共產國際對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的歷史考察（續）〉。《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2期，第14–31頁。
———：〈抗戰初期中共軍事發展方針變動的史實考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第4–26頁。
路福貴：〈紅軍「破譯三傑」之鄒畢兆〉。《檔案時空》，2017年第3期，第33–36頁。
廖心文：〈抗日戰爭初期長江中央局的組織變動情況〉。《文獻和研究》1987年彙編本，第283–285頁。
———：〈周恩來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黨的文獻》，1994年第5期，第32–38頁。
———：〈1963年，周恩來邊境小島密會赴台信使〉。《百姓生活》，2016年第10期，第50–51頁。
熊向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中共黨史資料》，第42輯，第56–96頁。
趙家梁口述，張曉霽整理：〈對「回憶高饒事件」的質疑〉。《炎黃春秋》，2009年第12期，第29–36頁。
劉一斌：〈印尼「九三〇事件」發生後〉。《世界知識》，2006年第1期，第26–29頁。
蔣本良：〈「捷克事件」與周恩來的「六八講話」〉。《中共黨史資料》，第72輯（1999年12月），第36–44頁。
鄭謙：〈九大前後的戰備工作〉。《中共黨史資料》，第41輯，第204–233頁。
閻明復：〈1958年炮擊金門與葛羅米柯秘密訪華〉。《百年潮》，2006年第5期，第13–20頁。
閻明復、朱瑞真：〈1959年赫魯曉夫訪華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2006年第4期，第30–57頁。

戴茂林、魏子楊：〈一九五三年全國財經會議「搬兵」之我見〉。《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1期，第106–111頁。

戴超武：〈中緬邊界問題與尼赫魯的干預及其戰略意圖（1956–1960）〉。《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11期，第53–69頁。

薛鈺：〈周恩來與黨的隱蔽戰線——試談民主革命時期周恩來對我黨情報保衛工作的貢獻〉。《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66–73頁。

謝文清：〈關於波茨南反革命暴亂事件的原因1956年7月12日〉。《內部參考》，第1945期（1956年7月28日），第591–604頁。

———：〈關於波茨南暴亂事件的看法和分析1956年7月25日〉。《內部參考》，第1952期，第75–89頁。

———：〈親歷報道華沙事件真相〉。《中共黨史資料》，2007年第3期，第40–53頁。

鍾延麟：〈中共建政後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2009年11月），第169–220頁。

———：〈周恩來與彭真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2期（2014年11月），第261–392頁。

韓鋼：〈「八大懸案」釋疑〉。《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40–45頁。

羅青長：〈發揚情偵工作傳統，切實解決遺留問題〉（1993年4月14日），《情報史研究》，1994年第1期（總第8期）。

嚴仁賡：〈周恩來與嚴修〉。《黨的文獻》，1990年第4期，第86–87頁。

"The Afterthoughts of Premier Chou." Interview with Neville Maxwell. *The Sunday Times*, December 19, 1971.

Borici, Gjon. "The Decline of the Albanian-Chinese Relations, 1971–1978." *ILIRIA International Review*, no. 1 (2016): 107–118.

Chang, Gordon H., and Di He. "Absence of War in U.S.-China Confrontation over Quemoy and Matsu."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8, no. 5 (December 1993): 1500–1524.

Chen, Jian. "The Ward Case and the Emergence of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1948–1950."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July 1993): 149–170.

———. Commentary on "Mike Mansfield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ia Perspective*, vol. 2, no. 3 (Spring 2003): 17–18.

———. "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 and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8, no. 3 (Summer 2006): 54–101.

Cohen, Warren I.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Friends: Zhou Enlai's Associates Reflect o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40s and the Korean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1, no. 3 (July 1987): 283–289.

Esherick, Joseph W.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 21, no. 1 (January 1995): 45–76.

He, Di.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1950." *Chinese Historians*, vol. 5 (Spring 1992): 12–16.

Kramer, Mark. "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1956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s. 8–9 (Winter 1996/97): 369–370.

———. "The Soviet Legacy and Moscow's Disregard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 The Wellsprings of Russian War Crimes in Ukraine."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38, no. 1 (2025): 12–14.

Ledovsky, Andrei.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ern Affairs* (Moscow), no. 2 (1995): 72–94.

Liang, Kan. "The Te Ke in Shanghai: A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Secret Service, 1927–1934." *Chinese Historians*, vol. 6, no. 2 (Fall 1993): 27–44.

"'The Malin Notes' on the Crises in Hungary and Poland, 195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s. 8–9 (Winter 1996/97): 392.

Raghavan, Srinath.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1948–60: A Reapprais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36 (September 9–15, 2006): 3882–3889.

Roderick, John. "Chou (Zhou) Says 'New Page' Has Opened." *New York Times*, April 15, 1971.

Snow, Edgar.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 [Mao Zedong]." *Life*, vol. 70 (April 30, 1971): 46–48.

Spence, Jonathan D. "The Mystery of Zhou Enlai."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28, 2009.

Stokes, William. "The Future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January 1968): 15.

Tagirova, Alsu. "From Crisis Management to Realignment of Forces: The Diplomatic 'Geometry' of the 1969–1978 Sino-Soviet Border Talk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24, no. 1 (2022): 116–154.

Tsang, Steve. "Target Zhou Enlai: The 'Kashmir Princess Incident' of 1955."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9 (September 1994): 766–782.

Tuchman, Barbara. "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 An Essay in Alternatives." *Foreign Affairs*, vol. 51 (October 1973): 44–64.

Wang, Li. "Memoirs of a Year and Two Months, June 1966–August 1967."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 27,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4): 5–89.

七、專著、譯著及編著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周恩來一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力平、彭洪：《周恩來軍事生涯》。北京：華文出版社，1999。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紅軍長征史（修訂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重慶談判紀實》。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

《中共黨史大事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編寫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1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編：《鄧力群國史講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鄧力群國史講談錄》，7冊。內部材料。
丹增、張向明主編：《當代中國的西藏》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天津南開中學編著：《周恩來南開中學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
尹家民：《黃鎮將軍的大使生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方毅傳》編寫組：《方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牛軍：《從延安走向世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王泰平主編：《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 1957–196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三卷) 1970–197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時過境遷——中國當代史採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王焰等：《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冉隆勃：《周恩來和香港「六七暴動」內幕》。香港：明報出版社，2001。
史雲編：《張春橋姚文元實傳》。香港：三聯書店，2012。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司馬清揚、歐陽龍鬥：《新發現的周恩來》。Carle Place, NY：明鏡出版社，2009。
石仲泉：《我觀周恩來》。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
曲愛國等：《援越抗美——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
朱玉主編：《李先念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朱洪：《黃鎮傳》。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0。
朱楹、溫鏡湖、熊錚彥、杜魁元：《粟裕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朱學勤：《書齋裏的革命》。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
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西藏軍區黨史資料徵集領導小組編：《和平解放西藏》。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西藏自治區黨史辦公室編：《周恩來與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
余汝信編：《「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
余湛。〈一次不尋常的使命——憶周恩來最後一次訪問蘇聯〉。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3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吳基民：《生死搏殺：周恩來與顧順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憶周總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呂星斗、白雲濤、田百春編：《周恩來和他的事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
呂黎平：《通天之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宋永毅：《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台北：聯經，2021。
李冬君：《中國私學百年祭：嚴修新私學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繫年》。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李志英：《博古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李海文主編：《周恩來家世》。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黨建出版社，1998。
———：《多棱鏡下的周恩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20。
李海文主編，秦九鳳、周秉宜、張能耿副主編：《周恩來家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李海文、熊經浴：《張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
李偉：《曹聚仁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李曼村等：《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
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香港：天地圖書，1994。
李愛華編：《周恩來中學時代紀事長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李穎：《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李覺等：《當代中國的核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汪文風：《從「童懷周」到審江青》。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
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香港：三聯書店，1988。
———：《梁漱溟與毛澤東》。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
汪朝光：《中國命運的決戰，1945–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
———：《毛澤東、斯大林和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1945–195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

———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 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沈國凡：《周恩來養女孫維世》。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
肖克編：《南昌起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亞歷山大．潘佐夫著，梁思文譯：《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台北：聯經出版，2023。
亞歷山大．潘佐夫、梁思文著，林添貴譯：《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台北：聯經出版，2015。
卓人政主編：《殷殷胞波情：1956 年中緬邊民大聯歡》。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周文琪、褚良如編：《特殊而複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關係編年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周敬青：《解讀林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周錫瑞著，石岩譯：《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周總理與故鄉》編輯組：《周總理與故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
孟廣涵主編：《政治協商會議紀實》。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東方鶴：《張愛萍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林小波、郭德宏：《「文革」的預演：四清運動始末》。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林孝庭：《困守與反攻——冷戰中的台灣選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國史札記（事件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國史札記（史論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
———：《國史札記（人物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2。
———：《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芭芭拉．巴努茵（Barbara Barnouin）、余長庚：《周恩來的政治生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選擇》。北京：三聯書店，2016。
———：《轉折年代——中國．1947 年》。北京：三聯書店，2017。
———：《喬冠華談周恩來和新中國外交》。北京：三聯書店，2024。
———主編：《朱德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主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主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金鳳：《鄧穎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阿蘭．魯林（Alain Roux）著，畢笑譯：《毛澤東：雄關漫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編：《周恩來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和世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范中匯等：《將軍、外交家、藝術家：黃鎮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范碩等：《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修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14。
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
孫彥民編著：《張伯苓先生傳》。台北：中華書局，2018。
孫國權、施振宏編：《周恩來研究資料目錄索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宮力：《跨越鴻溝——1969–1979年中美關係的演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毛澤東和美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等編：《從解凍到建交：中美關係正常化再探討》。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2002。
徐行：《高山景行——周恩來研究新探》。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22。
———主編：《周恩來與中國和世界的和平發展——第五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
徐林祥、朱玉：《傳奇將軍李克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徐則浩等編：《王稼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徐焰：《金門之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柴成文、趙勇田：《抗美援朝紀實》。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板門店談判》。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祝彥：《大革命後的陳獨秀》。青島：青島出版社，2020。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
袁偉主編：《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1893–1976）》。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逄先知、李捷等：《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郝汀、章鐘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調查部》。2013年自印本。
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2006。
馬迪厄著，楊人楩譯：《法國革命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
馬雅：《大風起兮：馬洪傳——中共高層政爭內幕》。香港：明鏡出版社，2014。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修訂版。
———：《歷史筆記》第1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高嘉懿：《敵友之辨——跨陣營交往下的中法關係（1949–1969）》。香港：開明書店，2024。

國際戰略基金會編：《環球同此涼熱——一代領袖們的國際戰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張化、蘇采青：《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上、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
張雲：《潘漢年傳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張雲生、張叢坤：《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
張勤：《中緬勘界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6。
張穎：《走在西花廳的小路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曹冶、伍星：《紅軍破譯科長曹祥仁》。北京：時代文獻出版社，2014。
曹應旺：《魅力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國對外出版有限公司，2014。
———：《周恩來自述評傳》。北京：中譯出版社，2016。
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習仲勛傳》編委會編：《習仲勛傳》上、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郭明：《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
陳明顯：《晚年毛澤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重拳出擊：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之後》。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傅高義：《鄧小平時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
喬培華：《信陽事件——大躍進發源地大饑荒慘案實錄》。香港：開放出版社，2009。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彭湃傳》編寫組：《彭湃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斯蒂芬．柯特金（Stephen Kotkin）著，李曉江譯：《斯大林：權力的悖論，1878–1928》上、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
景玉川：《饒漱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2010。
《曾希聖傳》編纂委員會：《曾希聖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4。
曾憲新：《伍豪事件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游覽：《對抗與革命：冷戰與越南的印支戰爭（1945–1991）》。香港：開明書店，2024。
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
程中原、夏杏珍、劉倉：《1976：從四五運動到粉碎「四人幫」》。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北京：華藝出版社，1996。
程舒偉、鄭瑞峰：《周恩來和黃埔軍校》。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程華等編：《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賀曉明：《賀龍元帥的最後十年》。香港：中和出版，2013。
開誠：《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8。

雲水：《出使七國紀實——將軍大使王幼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黃少群：《周恩來在1927–1935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黃正：《軍人永勝黃永勝將軍前傳》。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黃崢：《劉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黃道炫：《鐵水流：戰時中共革命系統的運作，1937–194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4。
黃瑤、張明哲：《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黃錚：《胡志明與中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楊明偉、陳揚勇：《周恩來外交風雲》。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5。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台北：東大圖書，1995。
———：《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台北：東大圖書，1997。
———：《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1、2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談往閱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民國人物過眼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
———：《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楊敏瑞：《錢壯飛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2。
楊勝群主編：《鄧小平傳（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當代中國對外貿易》。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軍隊的後勤工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董邊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裔兆宏：《歷史的選擇——張聞天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鄒賢敏、秦紅主編：《博古和他的時代——秦邦憲（博古）研究論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
熊華源：《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北京：中央文獻出版杜，1995。
———：《周恩來初登世界舞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
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周恩來主持政務歲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
裴堅章主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6）》。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裴堅章等編：《新中國外交風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

裴默農：《周恩來與新中國外交》。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劉志、張麟等：《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劉育鋼：《顧順章：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
劉武生：《「文革」中的周恩來》。香港：三聯書店，2006。
———：《周恩來的晚年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劉武生、杜宏奇主編：《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劉統：《決戰華東——華東解放戰爭實錄》。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
劉景泉主編，徐行執行主編：《周恩來與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劉殿堯：《劉鼎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劉樹發主編：《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潘鳴嘯著，歐陽因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3。
蔡方柏：《從戴高樂到薩科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蔣本良：《多瑙河之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給共和國領導人作翻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鄭立：《冷月無聲——吳石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
鄭致光主編：《張伯苓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歷史的審判》。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
穆欣：《隱蔽戰線的統帥周恩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
蕭冬連：《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
蕭功勤：《蒙古空難事件再考察》。未刊文稿。
蕭鴻鳴等：《金門戰役紀事本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
錢江：《「乒乓外交」始末》。上海：東方出版社，1987。
錢理群：《爝火不息：文革民間思想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駱亦粟：《在風起雲湧的年代裏》。北京：新華出版社，2011。
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件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戴茂林：《「毛澤東查劉少奇檔案」真相調查》。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6。
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
《〈縱橫〉精品叢書》編委會編：《曾與偉人同行》。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薛慶超：《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毛澤東「南方決策」》。北京：華文出版社，2013。
薛謀洪等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彭真：毛澤東的「親密戰友」，1941–1966》。台北：聯經出版，2024。
韓素音著，王弄笙等譯：《周恩來與他的世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韓懷智主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瞿定國、劉先廷：《曾經滄海——李德生調中央工作前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
魏國祿：《隨周恩來副主席長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6。
魏巍主編：《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
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羅孚：《羅孚說周公：周恩來與當代中國》。香港：天地圖書，2002。
羅銀勝：《紅色名媛章含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
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北京：中華書局，2020。
蘇維民：《楊尚昆談新中國歷史若干問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顧保孜：《周恩來最後600天》。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
顧則餘：《朱德別傳——與毛澤東的恩恩怨怨》。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
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走近周恩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
權延赤、杜衛東：《共和國密使》。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
龔固忠主編：《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
Accinelli, Robert.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Acheson, Dea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North & Co., 1969.
Aijazuddin, F. S. *From a Head, Through a Head, to a Head: The Secret Channel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rough Pakist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g, Ching Guan. *The Vietnam War from the Other Side*.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Apter, David E.,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rendt, Hannah.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63.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
Bajanov, Evgeniy P., and Natalia Bajanova.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Based on Secret Soviet Archiv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py in author's possession.
Barnett, A. Doak. *Chou En-lai at Bandung: Chinese Communist Diplomacy at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A Report from A. Doak Barnett*. New York: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1955.
Barnouin, Barbara, and Yu Changgen. *Zhou Enlai: A Political Lif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7.
Barrett, David D.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 1944*. Berkeley, C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0.
Basu, Bejoy Kumar. *Call of Yanan: Story of the Indian Medical Mission to China, 1938–43*. New Delhi: All India Kotnis Memorial Committee, 1986.

Bianco, Lucien. *Stalin and Mao: A Comparison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Revolution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8.

Burr, William,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8.

Chang, Gordon H. *Friends of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ng, Ju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5.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 "Maoism." In Maryanne Cline Horowitz (ed.), *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pp. 1334–1341.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4.

———. "China and the Indochina Settlement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In Mark Lawrence and Frederik Logvall, eds., *The First Vietnam War: Colonial Conflict and Cold War Crisis*, pp. 240–26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Zhou Enlai and China's 'Prolonged Rise.'" In Ramachandra Guha (ed.), *Makers of Modern Asia*, pp. 147–17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China and the French Indochina War." In Lien-Hang T. Nguyen and Edward Mill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s, Volume 1, Origins*, pp. 173–19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Cheng, T. J., Uradyn E. Bulag, and Mark Selden. *A Chinese Rebel beyond the Great Wal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thnic Pogrom in Inner Mongol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Ch'i, Hsi-sheng. *The Much Troubled Alliance: US-China Military Cooperation during the Pacific War, 1941–1945*.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6.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Christensen, Thomas.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an Conflict, 1949–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Lost in the Cold War: The Story of Jack Downey, America's Longest-Held P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Cohen, Warren I.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5th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Cook, Alexander, ed.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Cottrell, Robert. *The End of Hong Kong: The Secret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London: John Murray Publishers, 1993.

Cox-Fill, Olivia. *Walking a Tightrope: Memories of Wu Jieping, Personal Physician to China's Leaders*. Bloxham, UK: Skyscraper Publications, 2019.

Cumings, Bruce.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 1947–19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Dallin, Alexander, and F. I. Firsov, eds. *Dimitrov and Stalin: Letter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1934–1943.*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Dikötter, Frank.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 London: Bloomsbury, 2013.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 London: Bloomsbury, 2016.

———.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 London: Bloomsbury, 2018.

Dillon, Michael. *Zhou Enlai: The Enigma behind Chairman Mao.*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20.

Esherick, Joseph W., ed.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 *Accidental Holy L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Northwest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2.

Faure, Edgar. *The Serpent and the Tortoise: Problems of the New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8.

Foot, Rosemary. *A Substitute for Victory: The Politics of Peacemaking at the Korean Armistice Talk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Gaddis, John Lew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Gao, Wenqian.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trans. Peter Rand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Goldstein, Melvy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Goncharov, Sergei,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Goodwin, Richard N. *Remembering America: A Voice from the Sixt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Perennial, 1989.

Gopal, Sarvepalli.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Guha, Ramachandra. *Makers of Modern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Han, Suyin. *Eldest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98–1976.* New York: Kodansha America, 1994.

Hobsbawm, Eric. *Echoes of the Marseillaise: Two Centuries Look Bac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1989.

Holdridge, John H.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Hunt, Michael.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Hunt, Michael, and Niu Jun, eds.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20s–1960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1994.

Itoh, Mayumi. *The Origin of Ping-Pong Diplomacy: The Forgotten Architect of Sino-U.S. Rapproche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Pioneer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Liao and Takasak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The Making of China's War with Japan: Zhou Enlai and Zhang Xuelia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The Origins of Contemporar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Zhou Enlai and Jap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The Making of China's Peace with Japan: What Xi Jinping Should Learn from Zhou Enla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Ji, Chaozhu. *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Keith, Ronald C.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Kelly, Jason. *Market Maoists: The Communist Origins of Chinese Capitalist Asc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Kirby, William C.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Kissinger, Henry.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2.

Kojima, Masaru, ed. *The Record of the Talks between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kyo: Central Committee of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80.

Kotkin, Stephen. *Stalin: Paradox of Power, 1878–1928*.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5.

———. *Stalin: Waiting for Hitler, 1929–1941*.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8.

Kuhn, Philip A.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s*. Stanford, CA: Stand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Kurtz-Phelan, Daniel. *The China Mission: George Marshall's Unfinished War, 1945–1947*. New York: W.W. Norton, 2018.

Lary, Diana. *China's Civil War: A Social History, 1945–1949*.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Lee, Chae-jin. *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Leese, Daniel.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Lescot, Patrick. *Before Mao: The Untold Story of Li Lisan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trans. Steven Rendall. New York: ECCO, 2004.

Levine, Marilyn A.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Lin, Paul T. K., with Eileen Chen Lin. *In the Eye of the China Storm: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Lin, Yusheng.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Lovell, Julia.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2014.

———. *Maoism: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9.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s. 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97.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Machcewicz, Pawel. *Rebellious Satellite: Poland 1956*.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cKinnon, Stephen R. *Chen Hansheng: China's Last Romantic Revolutiona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23.

Maxwell, Neville. *India's China War*.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72.

McMahon, Robert J. *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Meyskens, Covell F.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Mitter, Rana.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 "Mao Zedong and Charismatic Maoism." In Ramachandra Guha (ed.), *Makers of Modern Asia*, pp. 93–11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Moore, Aaron William, and Jennifer Altehenger, eds. *How Maoism Was Made: Reconstructing China, 1949–19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Mullik, B. N. *My Years with Nehru: The Chinese Betrayal*.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1971.

Nguyen, Lien-Hung. *Hanoi's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War for Peace in Vietnam*.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

Pantsov, Alexander V., and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2.

———. *Deng Xiaoping: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erry, Elizabeth,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Quinn-Judge, Sophie. *Ho Chi Minh: The Missing Years, 1919–1941*. Singapore: Horizon Books, 2003.

Radtchenko, Sergey.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ea, Kenneth W., and John C.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1.

Rittenberg, Sydney, and Amanda Bennet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Roach, Stephen. *Accidental Conflict: America, China, and the Clash of False Narra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2.

Saich, Tony. *From Rebel to Ruler: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Schaller, 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Schram, Stuart.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Schwarcz, Vera.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elden, Mark.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China in Revolution: Yenan Way Revisite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Shakya, Tsering.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Shen, Zhihua, and Li Danhui. *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Shen, Zhihua, and Xia Yafeng. *A Misunderstood Friendship: Mao Zedong, Kim Il-sung and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hip, 1949–197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Short, Philip. *Mao: A Lif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9.

———. *Pol Pot: The History of a Nightmare*. London: John Murray, 2004.

———. *Mao: The Man Who Made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7.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38.

Spence, Jonathan. *Mao Zedo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Stueck, William.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ettinger, Robert L. *The Conscience of the Party: Hu Yaobang, China's Communist Refor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Chiang Kai-shek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Ramachandra Guha (ed.), *Makers of Modern Asia*, pp. 40–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Torigian, Joseph. *The Party's Interests Come First: The Life of Xi Zhongxun, Father of Xi Jinpin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5.

The Truth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s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Hano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79.

Van de Ven, Hans.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17.

Wakeman, Frederic.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Walder, Andrew G.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Waldron, Arthur. *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Wemheuer, Felix. *A Social History of Maoist China: Conflict and Change, 1949–1976*.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Westad, Odd Arne.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New Yor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Westad, Odd Arne, and Chen Jia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China's Road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4.

Whiting, Allen S.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Wilbur, C. Martin.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Wilson, Dick. *Zhou Enlai: A Biography*. New York: Viking, 1984.

Wu, Ningkun. *A Single Tear: A Family's 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3.

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Yang, Jisheng.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Zhang, Shu Guang. "In the Shadow of Mao: Zhou Enlai and New China's Diplomacy." In Gordon Craig and Francis Loewenheim, eds., *The Diplomats*, pp. 338–37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Zhang, Shu Guang, and Chen Jian, eds.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1944–1950*.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6.

Zhou, Bingde. *My Uncle Zhou Enlai*. San Francisco: Long River Press, 2018.

Zhou, Taomo. *Mi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e Co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索引

一劃

1941年線 517–520, 523, 590
《一元錢》(話劇) 15
一月革命(上海，1967) 751, 761–766
一號攻勢(豫湘桂戰役，1944) 243, 245, 247, 257
「一號命令」(林彪) 808, 851
「一綱四目」613, 634

二劃

〈七二四佈告〉(1968) 793–794
〈七三佈告〉(1968) 793–794
七千人大會(1962) 614–619, 623, 628
九一八事變 118, 158
「九月指示」(周恩來，1929) 91–92, 108
九月會議 221–224
「二十一條」(日本，1915) 17–18, 28–29, 36
二月逆流(1967) 769, 773–779, 815, 836, 892, 894
〈二月提綱〉(1966) 720–721, 728
人大，第四屆(1975) 809–811, 903, 923–929
人民公社 562–563, 607–608；與上海人民公社 761, 765–766, 770–771
《人民日報》484, 505, 507, 526–527, 529, 535, 572–573, 600, 717, 723, 737–738, 748, 755, 763–765, 780, 785–786, 795–796, 800, 826, 841, 856–857, 899–900, 931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365
人民解放軍 292, 297, 301–302, 398, 485–486, 579, 633, 781；昌都戰役 392；渡過長江 296；進入西藏 392–395；介入文化大革命 768–769, 788, 793；濟南戰役 291；金門、登步戰事 388；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應對 632–633；佔領海南和舟山群島 389；佔領東北和華北 291–292；炮擊金門 548–554；中印邊界戰爭 641–646；中蘇邊界衝突 841–844；鎮壓西藏叛亂 566, 569–571
八路軍 176–177, 186, 189, 193, 197, 199–200, 212
《十七點協議》(1951) 395
十四點計劃(威爾遜) 36, 210

三劃

三二零事件(1926)。見：中山艦事件
三月會議 183, 216, 218
三木武夫 887–888
三民主義(孫中山) 173–174, 213, 219, 293
三個世界理論(毛澤東) 277, 902, 918–920
三線建設 655, 705, 708–709

上海 81–83, 112；蔣介石的反共政變 76–77；文革期間（1967）782–783；青幫 76；一月革命（1967）761–766；《上海公報》（1972）878–879, 883；上海人民公社 761, 765–766, 770–771；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751；周恩來領導的工人起義（1927）75–77
上海柴油機廠聯司 782–783
于新野 823
大平正芳 888–890
《大西洋憲章》（*The Atlantic Charter*）210
大革命（1924–1927）63–80
大連 84, 256, 415, 744；港口與關稅 381–384
大饑荒 537, 564–565, 576, 581, 586, 606–609, 632, 660, 691, 710；吸取教訓 709–710；糧食進口 607–609；信陽事件（1959–1960）607, 992n101
大躍進 139, 425, 535, 543–581, 584–585, 602, 604, 608；失敗 585–587, 604–608；毛澤東的看法 543–544；復蘇 651–652
山東半島／省 14, 17, 36–37, 39–42, 209, 286–287, 434, 529, 586–587, 625, 765

四劃

不結盟運動 669
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20日）72–74
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1918）29
中央文革小組 741, 748, 751, 756, 759, 763, 768–774, 779, 782, 789–790, 804, 841
中央專案辦公室 777–778, 924
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1月）99–100, 110, 324n91；六屆六中全會（1938年9–11月）183, 219–220；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3月在西柏坡舉行）293–294, 300–301, 368；七屆三中全會（1950年6月）389；七屆四中全會（1954年2月）448–450, 454；八屆九中全會（1961年1月）610；八屆十中全會（1962年9月）628–630, 641, 646, 658, 676–677；八屆十一中全會（1966年8月）743–745；八屆十二中全會（1968年10月）796–799
中共中央發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110–115
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1925）69；第五次（1927）77；第六次（1928）85–86；第七次（1945）239–241, 257–258；第八次（1956）508–510, 536–537, 544–545；第九次（1969）801–807, 843；第十次（1973）903, 916
中長鐵路 375, 380–384
中南海（北京）366, 369, 424, 444, 447, 618, 645, 731, 740, 755, 760, 831, 837, 841–842, 876, 900, 920–921, 931, 947n9；包圍（1967）783–784, 788
中美大使級會談 482, 499, 540, 550–554, 839, 852–855, 872
「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毛澤東）365, 378, 380–382, 384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 53, 56, 58–59
「中華各民族聯邦」370–371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07, 115, 119
「中間地帶理論」（毛澤東）657–658, 666, 676, 919。又見：「兩個中間地帶」理論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0）381, 385, 702
中蘇條約（1945）259–260, 265, 282, 373, 375
五一六兵團：在北京城 778；在北京鋼鐵學院 778
五一六通知（1966）729, 731, 765, 780, 800
五七一工程紀要（1971）823–824, 833–834
五七指示（1966）729–731, 800, 806
五四運動 35, 37–38, 45, 49–50, 58, 60
五年計劃：第一個 417–418, 427–430, 447；第二個 508；第三個 655, 705
仁川登陸（1950）401–402, 404–405
卞志強 895
反右運動（1957）528–531, 533, 629–630, 746

反布爾什維克（AB團）108–111, 117, 227
「反冒進」459, 461, 507–508, 531, 535–540, 544
反修正主義 602, 629, 650–652, 656, 657, 666, 703, 722–725, 727, 732, 839, 870；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 652, 700, 703
反殖民主義 487–488, 494–495, 663；非殖民化運動 666
天安門廣場：開國大典（1949）366–373
天津：周恩來的坐牢經歷（1920）43–44；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 38, 40；天津學生聯合會 38–40, 43；《天津學生聯合會報》39, 46
《天演論》（赫胥黎）15
孔子 36, 49, 315n21, 916；儒家倫理 5
孔令侃 289
《少年》（雜誌）54–56, 68
少帥（張學良）166。又見：張學良
尤金，帕維爾（Pavel Yudin）449, 451, 468, 512, 533, 558–559, 690, 953–954n122
巴努茵，芭芭拉（Barbara Barnouin）308n18
巴基斯坦 373, 486, 516, 520, 523, 675, 703–704, 711, 713, 738, 852–853, 855–856, 860–862, 866, 871, 901, 1011n31
巴黎和會（1919）35–37, 210
巴蘇（Bejoy Kumar Basu）188, 338n36
巴盧庫（Beqir Balluku）618, 767
文化大革命：安亭事件 751–752；北京大學的大字報 737；中央文革小組 741, 748, 751, 756, 759, 763, 768–774, 779, 782, 789–790, 804, 841；鄧小平的下台、復出與再下台 745, 893–895, 934；亂局升級（1967）779–788；中共和日共的鬧翻 723–725；二月逆流（1967）769–774；二月提綱（1966）720–721, 728；廣西與援助越南 793；香港 785–787；一月革命（1967）761–766；京西賓館的軍委碰頭會（1967）769–770；林彪之死 829–832；劉少奇倒台 776–779；廬山會議（1970）812–817；毛澤東呼籲「全面內戰」753–754；毛澤東派遣「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 793–794；七二零事件（1967）783, 790；五七指示（1966）729–731, 800, 806；五一六通知（1966）729, 731, 765, 780, 800；解放軍的介入 768–769, 788, 793；事前準備 718–721；省級革命委員會 790；陶鑄、賀龍的倒台 758–761；鄧小平的全面整頓（1975）933–935；紅衛兵 743, 745–748, 752, 754, 761–762, 778, 783–787, 794, 799；在林彪死後恢復老幹部工作 892–895；發配青年下鄉 799–800；包圍中南海（1967）783–784, 788；派遣工作組進駐北京的學校 737, 739；周恩來給毛澤東的親筆信（1966年4月2日）726。又見：反修正主義；毛澤東；「全國全面內戰」；周恩來；林彪；「繼續革命」
文進勇 663–664
《文匯報》716, 763–764, 786
方志純 294
日內瓦會議（1954）467–482；中美領事級會談 481；與越南的分歧 474–475；在印度支那問題的協議 478–480；與胡志明及武元甲在柳州的會談 475–478；與英國發展貿易及領事關係 480–481；周恩來在會議取得的成就 482；周恩來的計劃和準備工作 467–471
日本：中日貿易 496–497, 676–678；甲午戰爭（1894）10, 16, 64；福州慘案（1919）42；廣島和長崎 259；帝國主義野心 28–29, 36, 42, 52, 149, 156–158, 168；日本共產黨 196, 497, 723–725；日本社會黨 684, 888；關東軍 118；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175；九一八事變（1931）118；「尼克松衝擊」887；一

號攻勢（豫湘桂戰役，1944）243, 245, 247, 257；米騷動（1918）31；日俄戰爭（1904–1905）12, 16, 256；舊金山和約（1951）417；釣魚島爭議 888–891, 1043n32；山東問題 36–37；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1918）29；中日外交 887–890；二戰投降 258–259；馬關條約（1895）10；二十一條（1915）17；巴黎和會（1919）36–37；與美國開戰（1941）211；周恩來對日本的印象 19, 21, 25–28；周恩來早年在日（1917–1919）21–34；周恩來對中日外交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則」677, 887；周恩來對日本的「政治三原則」與「貿易三原則」677。又見：抗日戰爭
日俄戰爭（1904–1905）12, 16, 256
比姆（Jacob Beam）552
比蘭德拉（Birendra）（尼泊爾國王）739, 911
毛遠新 937–938
毛澤東：反布爾什維克（AB團）108–111, 117；反修正主義 602, 629, 650–652, 656, 657, 666, 703, 722–725, 727, 732, 839, 870；反右運動（1957）528–531, 533, 629–630；秋收起義（1927）82；肅反運動 116–117；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7487–49；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 115；長汀會議（1932）121；（1958）536, 546, 566；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 439, 441, 463, 510, 526, 528–529, 531, 626–630；林彪之死對毛澤東形象的打擊 835；毛與周恩來的對比 72；繼續革命 294, 365–366, 424, 459, 464–465, 470, 578, 584, 602–603；毛主義的核心文本 217；健康惡化 835–837, 876, 921；關於民主集中制 530；與朱德和紅四軍的分歧 91；被解除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位 115；八屆十一中全會（1966）743–745；對二月逆流的譴責 769, 772–773；與周恩來首次相會 64；對外交部的批評（1973）902–903；贛南會議（1931）114–115；高崗 437, 443–444, 453；關於大躍進 543–546, 561–564, 577；古田會議（1929）92, 109；在陝北（1947）279–280, 286；中間地帶理論 657–658, 666, 676, 919；對江青的支持和批評 769–770, 917, 920–922；〈七三佈告〉（1968）793–794；有關赫魯曉夫下台 685；朝鮮戰爭 398–400, 404–413, 415–419, 421–422；對梁漱溟的批評 460–462；黎平會議（1934）138–139；長征 133–151；五七指示（1966）729–731, 800, 806；五一六通知（1966）729, 731, 765, 780, 800；南寧會議（1958）535–536；重慶談判（1945）259–265；元旦獻詞（1949）292–293；皖南事變的應對 203；九篇機密文章（1941）223–224；寧都會議（1932）123–127；華北會議（1970）819–820；核武器 532, 689–691, 693；對周恩來「反冒進」失誤的攻擊 459, 461, 507–508, 531；彭德懷與廬山會議（1959）576–580, 584；寫給周恩來的詩 657–658；有關在社會主義中的「主要矛盾」531；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584；整風運動（1957）529–530；整風運動（延安，1941–1945）221–230；作為紅軍指揮 141–144；與林彪的關係 717–718, 808–829；與劉少奇的關係 625, 695–697, 797–798；限制國務院權力 541；與張國燾的衝突與分裂 148–151, 153–155；要求自我檢討 821–824, 826；七千人大會（1962）614–618；71歲晚宴（1964）696；73歲晚宴（1966）754；六屆六中全會 219–220；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651–652, 695–697, 700, 729, 737；對黨八股和教條主義的批評 229；國共內戰的策略 284–286 周恩來在肅反問題上對毛的批判（1930

年代早期）111；台海危機 485–486, 548–554；電報事件（1935）146–148；八屆十中全會（1962）628–630, 641, 646, 658, 676–677；三個世界理論 277, 902, 918–920；南巡（1971）827–829；向社會主義過渡 431, 433–434, 459, 470, 505；八屆十二中全會（1968）796–799；「兩個中間地帶」理論 277, 355n9, 657–658, 919；訪蘇（1949–1950、1957）374–384, 531–535；西安事變（1936）166–167；針對美國對華政策在新華社刊登的五篇嚴厲批評（1949）305；在周恩來－基辛格會談（1973）後對周的批判 907, 909–911；遵義會議（1935）140–141。又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全國全面內戰」；整風運動（延安，1941–1945）；繼續革命
毛澤東思想 217, 257, 509, 584, 616, 728, 791, 803, 822–823
《水滸》5, 934–935, 937
牛蘭（Hilaire Noulens）103
王力 754, 764–765, 772, 781–782, 784, 788–790, 893, 950n55, 1019nn80–81
王夫之 15
王以哲 172
王光美 743, 783, 798–799, 956n33
王光琦 799
王京岐 58
王昆侖 372
王明 99–100, 113, 164, 178–180, 183, 185, 215–218；作為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 110；與蔣介石 182, 215；與十二月會議（1937）182；作為延安整風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 221–223, 233, 236–237；與周恩來的關係 179, 192；與毛澤東的矛盾 179–180, 219–220, 228–229
王洪文 849, 902–903, 911, 913, 918, 920, 922–927, 939, 1047n121
王炳南 186, 372, 482, 499, 510, 551–553, 633–635, 980n57
王若水 899–901
王家烈 139, 330n44
王殊 883, 885
王海容 866, 873, 902, 907, 910–911, 917, 919–920, 924, 927, 937, 939, 1046n108, 1046n119, 1052n116
王國權 887–888
王稼祥 108, 110, 114–115, 121–122, 136–138, 140, 143, 145–146, 149, 183, 218–223, 345n19, 374, 381, 619–620, 629–630
火燒英國代辦處 787–788, 882–883

五劃

加納 648, 668, 673, 716
包瑞德（David Barrett）248, 254–255
北平。見：北京
北伐軍 75
北伐戰爭（1926）75
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365–367；重新改名北京（1949）366
北京大學：大字報 737–738；六一八事件 739
北部灣事件（東京灣事件，1964）664–665；〈東京灣決議案〉（1964）664
北戴河會議（1958）561–562
北戴河會議（1960）124, 682
北戴河會議（1962）626–630
卡波特（John Cabot）633–634
卡博（Hysni Kapo）618, 767
卡斯特羅（Fidel Castro）649, 666
卡達爾（János Kádár）527
卡爾（Sir Archibald Clark Kerr）205
古巴導彈危機 649–650
古比雪夫（N. V. Kuibyshev）。見：季山嘉
古田會議（1929）92；古田會議決議 92, 115
台灣：中共「解放台灣」的嘗試 386–390；

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計劃 632–637；中共地下情報系統的瓦解 389–390；毛澤東的「絞索戰略」554, 561；與朝鮮戰爭爆發 398；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 549–554, 669, 853, 855–856, 858, 860–861, 863–864, 867–868, 871–872, 877；台灣危機（1954–1955、1958）485–486, 548–554；與馬關條約（1895）10；美台共同防禦條約（1954）485；周恩來與中共的取態 500–501, 548, 598, 612–613, 634, 636–637, 859
史迪威（Joseph Stilwell）247, 250–251, 267–268
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481
右路軍 146–147；陝甘支隊 149–150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300–305
四人幫 909, 916–917, 925, 931, 933–934, 937, 940。又見：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張春橋
四三計劃 891–892
四個現代化 928
「四水六崗」組織 566
四清運動 696
外蒙古。見：蒙古
尼克松（Richard Nixon）840–841, 852–858, 861–862, 864, 866–875；訪華（1972）876–879
「尼克松衝擊」（Nixon Shock）887
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391, 393, 571–573, 587, 619, 629, 638–641；中印邊界衝突 488–489, 524, 589, 642–645, 972n67；與周恩來 487–489, 516–517, 522, 591–596, 630–632, 989n47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1918）28
布勃諾夫（Andrei S. Bubnov）74
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85
布柳赫爾（Vasilli K. Bliukher）79
布朗，羅布遜（Robson Brown）480–481
布爾什維克黨 28, 31–32, 53, 84–85, 87, 103
布爾加寧（Nikolai Bulganin）374, 421, 429, 527, 555, 684, 690, 945n95
布爾吉巴（al-Habīb Būrqībah）673
布魯斯（David Bruce）906
布邁丁（Houari Boumédiene）669, 918
本．貝拉（Ben Bella）669, 713
《民約論》（盧梭）15
民族主義：與五四運動 37；國民黨革命 178；與新文化運動 36；周恩來絕不僅是民族主義者 52；反對「反動民族主義」629；民族主義在中國的興起 16–17；周恩來與中共在擴大代表權上的努力 157, 185, 251, 423
瓦弄 643–644, 647
瓦爾德（Angus Ward）297–298
瓦窯堡會議（1935）157
田中角榮 887, 889–890
田家英 623–625, 995n12
甲午戰爭（1894）10, 16
申健 391
《申報》105
白崇禧 163, 198–200, 275
皮杜爾（Georges Bidault）472, 475
皮亞特尼斯基（Osip A. Piatnitsky）95

六劃

《光明日報》529
「全面整頓」（鄧小平，1975）933–935
乒乓外交（1971）859–860
任弼時 108, 110, 114–115, 121–123, 125, 134, 165, 195–196, 217–218, 223, 230, 241, 279, 345n11, 368, 897
伍修權 133, 328, 619, 663, 685
伍豪 41, 50, 77, 105, 778–780, 790, 898, 936
「全國全面內戰」754–756, 758, 761, 763, 766, 768, 792, 796, 1020n82
全國財政會議（1953）439

共產國際：批准長征 134；情報員牛蘭夫婦在上海被捕 103；布哈林 85；季米特洛夫為王明辯解的電報 222–223；解散 214, 230–231；遠東局與中共的爭論 92–95, 103, 109–110；對中共的財政援助 83, 94–95, 192；任弼時作為中共代表 218；「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1927) 78, 84；恢復與中共的電報通訊 163；中共六大 (1928) 85–86；宋慶齡 371；支持毛澤東 183, 217–220；與特科 82–83；促請中共與蔣介石聯合抗日 157, 164, 172–175, 215；與王明 100, 110, 178–180, 228；與黃埔軍校 65；與西安事變 (1936) 167–169, 172；張浩 153–154；周恩來的別名「莫斯克文」63, 316n3；周恩來對共產國際的評價 232, 504, 601；周恩來的彙報 (莫斯科，1940) 190–192
匈牙利 373, 686, 974n105；周恩來訪匈 527
匈牙利與波蘭危機 (1956) 512–513；對中共領導層的啟示 513, 526, 529；毛澤東的看法 514
印尼 377, 399, 476, 486, 491, 493, 516, 648, 662, 666–668, 704, 712–716, 1010n23；印尼共產黨 662, 713；九三零事件 (1965) 667, 714–715, 724, 784。又見：萬隆會議 (1955)；蘇加諾
印度：亞非會議 (1955) 487–500；與中國的邊界衝突 516–517, 571–574, 587–589, 591–597, 630–632, 637–643；在中印邊界地區的「前進政策」630–632, 644, 648；延安的印度醫療隊 188, 338n36；與西藏 390–393, 565–566；中印邊界戰爭 643–647；周恩來訪印 (1954、1956–1957、1960) 487, 516, 522, 524, 591–596。又見：尼赫魯
印度支那 467, 469；日內瓦會議 (1954) 471–480。又見：越南
同盟會 11
向忠發 83, 86, 88, 93, 95–97, 103–104, 110
安子文 436–437, 440, 442–443, 446, 453–454, 656, 956n30, 956–957n42
安東諾夫 (S. F. Andonov) 561
安亭事件 751–752
帆足計 496
成都會議 (1958) 534, 536, 546, 555, 566, 968n1
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 84–85, 464
朱其文 297
朱德 89–92, 121–122, 127, 141, 143, 145, 154, 156, 193, 199–200, 239, 241, 244, 266, 279, 300, 368, 374, 394, 398, 443–444, 449–450, 454, 478, 503, 540, 611, 642, 654, 722, 724, 745, 822, 851, 925, 1007n122, 1035n68；背景 54；與毛澤東的分歧 91
朴昌玉 511–512
汕頭 (廣東省)，攻佔 (1927) 79–80
江青：對周恩來的攻擊 907；中共九大 (1969) 804；與「中央碰頭會」745, 758, 769；毛澤東的批評 769–770, 917, 920–922；對經驗主義的批評 931；「批林批孔」運動 916–918；二月逆流 (1967) 772–774；賀龍倒台 760–761；與一月革命 (1967) 761–766；與京西賓館的軍委碰頭會 (1967) 769–770；廬山會議 (1970) 812–817；毛澤東的壽宴 696, 754–755；毛澤東的信 (1966年7月) 739；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778；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1966) 720–722；與林彪及其軍人派的分歧 810–811；自我檢討 933；孫維世之死 799；陶鑄倒台 758–761；與鄧小平的衝突 923；對伍豪事件的取態 778–779；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的文章 716；周恩來的騎馬意外 188；對周恩來－基辛格會談 (1973) 引起黨內批判一事上的取態 907, 909–911。又見：四人幫

百萬雄師 780–783
竹入義勝 888–889
米夫（Pavel Mif [Mikhail A. Fortus]） 99–100, 113, 192, 218, 237, 324n91
米高揚（Anastas Mikoyan） 299–300, 304, 374, 378, 380, 382–383, 429, 512, 527, 686, 688–689
老撾 472–478, 612, 628, 662–664, 708
艾地（D. N. Aidit） 126, 662, 713–715
艾奇遜（Dean Acheson） 303, 412, 952n85
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 419, 549, 555, 560, 597
艾登，安東尼（Anthony Eden） 472, 474–475, 479, 481
艾德禮（Clement Attlee） 496
西北大計劃 162–163
西北軍 150, 167, 171–172
西安事變（1936） 166–171；中共的方針 166–169；共產國際的取態 169–170；周恩來的取態 167；周恩來與蔣介石的會面 171；周恩來與宋子文的會面 170；周恩來與楊虎城 169；周恩來與張學良 168–170
西姆拉會議（1914） 519
西花廳 368, 434, 678–679, 760, 896, 915, 1048n4
西哈努克 521–522, 637, 836, 845, 854, 869, 935
西樓會議（1962） 618–619
西藏：解放軍入藏 392–395；噶廈 391；藏人 394–395, 573；西藏叛亂（拉薩） 565–570；新藏公路 591, 593。又見：達賴喇嘛
何應欽 127, 170, 199–200, 207, 214, 296
余立金 791
余秋里 709–710, 891
克什米爾公主號墜機事件（1954） 491–493
克拉克（Wayne Clark） 420–421
吳化文 291
吳石 281, 389–390
吳旭君 859–860
吳努 485, 487–489, 516–517, 520, 522, 590, 592–593, 972n67
吳拉茂 519–520, 522, 590
吳法憲 791–792, 804, 808, 810–811, 814–817, 819–821, 830–831, 851, 1014n91, 1027n33, 1027n35, 1028n41
吳庭艷 521, 659–660, 662
吳國楨 17
吳晗 716, 721, 728
吳階平 667, 846, 895, 900–901, 904, 936, 940, 1052n119
宋子文 160, 169–171, 258–259
宋任窮 584, 691, 696
宋美齡 168, 170–171, 289
宋慶齡 371–372, 675–676, 836, 925
巫寧坤 424
批林批孔運動 916–922
抗日戰爭 175–177, 183–184, 204, 243, 245；蔣介石與 176, 185；日本投降 258–259；毛澤東與九一八事變（1931） 118–119；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 175；周恩來的取態 185, 188–189, 219, 248, 258
李力群 451–452
李士群 456–457
李大釗 49
李之龍 72–73
李四光 690
李立三 50, 76, 88, 93, 95–99；立三路線 97–98；與斯大林會面 84；作為延安整風的打擊對象 232

七劃

佐佐木更三 888
佐爾格（Richard Sorge） 103–104
佐藤榮作 887
何長工 134

李先念 506, 565, 586, 603–605, 608–609, 619, 622, 682, 795, 805, 822, 881, 923, 927, 1052n118；出席胡志明葬禮 846；與二月逆流（1967）769–773；與四三計劃 891–892
李作鵬 804, 808, 810, 815–816, 820, 830, 851, 1027n33, 1028n41, 1031n123
李克農 87–88, 160–161, 422, 457, 470, 977n157
李志綏 307n2, 1014n98
李周淵 398–399, 405
李宗仁 163, 288, 293, 295–296, 711
李承晚 397, 406, 412, 422
李明瑞 93
李勃曼（Henry R. Lieberman）5, 16
李政道 424
李相朝 402, 511
李偉信 823
李清泉 682
李連慶 842–843
李富春 381, 445, 448, 506, 544, 584–586, 607, 619, 621–622, 682, 696–697, 699, 745, 747, 851, 893；與二月逆流（1967）769–770；與國家計劃委員會（計委）655, 705；在莫斯科（1952–1953）428, 430；與第三個五年計劃 655, 705
李越然 532
李維漢 226, 296, 394, 565
李韶九 109
李德（Otto Braun）129–131, 133–141, 328n2, 328n4, 329n28, 372
李德生 817, 820–822, 829
李毅韜 51
李銳 576
李鵬 339n63
村田省藏 497
杜威廉（Humphrey Revelyan）480–482
杜馬（Aurel Duma）795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481, 549, 551–554
杜爾，塞古（Ahmed Sékou Touré）673
杜維廉（Humphrey Trevelyan）482
杜魯門（Harry Truman）266–267, 390, 397
汪東興 383, 696, 720, 781, 808–809, 814–815, 817, 828–830, 832, 851, 894–895, 915, 917, 936, 1027n35, 1052n118
汪精衛 72–74, 77–78, 107–108, 456
沃爾特斯（Walters Vernon）855
沈安娜 281
沈崇 282–283
狄普芬（Tep Phan）476
肖勁光 401, 557
貝利亞（Lavrentiy Beria）375, 421, 429
貝魯諾索夫（Lieutenant Colonel Belunosov）266, 353n106
《赤光》54, 56
《辛丑條約》10
邢燕子 696
里德，約翰（John Reed）32
阮志清 661–662, 664

八劃

「兩個中間地帶」理論（毛澤東）277, 355n9, 657–658, 919；與第二中間地帶 676, 678, 683
亞非會議：萬隆（1955）489–495, 499；第二次（1964）712–716
京西賓館的軍委碰頭會（1967）769–770
協約國 16, 35–37。又見：第一次世界大戰
周小舟 578–579, 656, 728
周宇馳 823, 828
周怡 186
周秉德 59, 70
周恩來：與安子文名單 440；〈雨中嵐山〉33；被捕及監禁（1920）42–43；亞非會議（1955）489–495；覺悟社聯絡人 40；北戴河會議（1962）600–602；與緬甸及印度的邊界問題 488, 516–520,

522–523, 571–574, 587–589, 591–597, 630–632, 637–643；火燒英國駐京代辦處 787–788, 882–883；中共中央發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110–115；獨身主義 24, 59；周恩來的中庸風格 91；中央黨校講話（1944）237–238；中共中央有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248–249；長汀會議（1932）120–121；成都會議（1958）536, 546, 555；《赤光》54, 56；童年、家庭及教育背景 3–7；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改變（1960年代初）682–683；作為中央軍委和解放軍的參謀長 285–286, 305, 398；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 7, 20, 32–33, 35, 39, 43, 49, 51–52, 60；憲政 244–245；政治局的「批周」會議（1973）910–911；「批林批孔」運動 916–922；民主集中制 530；關於非斯大林化 503–504；釣魚島問題 888–891, 1043n32；東江區行政委員 71；最後一次出席政治局會議（1975）929；初會毛澤東 64；連續五天在政治局會議上作自我批評（1943）234；毛澤東對外交部的批評（1973）902–903；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75）923–929；四三計劃 891–892；四個現代化 928；贛南會議（1931）114–115；日內瓦會議（1954）467–482；「革心」和「革新」39–41；大饑荒 537, 564–565, 576, 581, 586, 606–609, 632, 660, 691, 710；大躍進 535, 543–581, 584–585, 602, 604, 608；大革命（1924–1927）63–80；同性戀者的懷疑 15, 311n12；香港 80–81, 284, 371, 391, 458, 491, 493, 496, 500, 518, 549, 608, 636, 704, 711, 784–787；匈牙利與波蘭危機（1956）512–513；赫爾利訪華的調停任務 250–255；大饑荒時期進口糧食 607–609；有關個人與集體的言論 563；《新青年》的影響 56；中日商貿關係 496–497, 676–678；七二四佈告（1968）793–794；克什米爾公主號墜機事件（1954）491, 493；朝鮮戰爭（1950–1953）397–425；黎平會議（1934）138–139；長征（1934–1935）133–151；羅瑞卿下台 717–719；廬山會議（1959）576–580；廬山會議（1970）812–817；毛澤東對周在「反冒進」錯誤的攻擊 459, 461, 507–508, 531；毛澤東對周在日內瓦會議的攻擊 483–484；毛澤東在周恩來－基辛格會談（1973）後對周的批判 907, 909–911；毛澤東對國務院權力的限制 541；在肅反問題上對毛澤東的批判 111；婚姻 69–70；馬歇爾的調停任務 267–273；五四運動 35–44；五一六兵團 778；莫斯克文（周在共產國際的別名）63, 316n3；南昌起義（1927）79–80；南開學校 13–20；南開大學 41–42；南寧會議（1958）535–536；民族主義與周在擴大中共代表權上的努力 157, 185, 251, 423；皖南事變（1941）200–202；新政協會議（1949）365–366, 372；「和平民主新階段」269, 275；無生主義 23, 25；毛澤東的九篇機密文章（1941）223–224；中共九大（1969）802–805；尼克松訪華 876–878；華北會議（1970）819–820；新政協會議的《共同綱領》366, 368–371, 431, 941n8；中國第一顆原子彈 689–693；十月革命節（1964）685–686；與國民黨和平談判（1949）259–265；乒乓外交（1971）859–860；詩歌 21, 33, 45–46, 53–54, 203, 812；國共內戰期間的政治策略 282–286；在林彪死後的地位 881；整風運動（延安，1941–1945）221–230；紅衛兵 743, 745–748, 752, 754, 761–762, 778, 783–787, 794, 799；調往蘇區的

要求 98；辭任國務院總理 540；與舊金山和約（1951）417；第二次亞非會議（1964）712–713；「大領悟」（1918）25；自我檢討 111, 190, 192, 232, 234, 237, 239, 241, 435, 484, 536, 896, 909；七千人大會（1962）614–618；在中共七大的發言（1945）239–241；《上海公報》（1972）878–879；《少年》54–56, 58；向社會主義過渡 431, 433–434, 459, 470, 505；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794–795；台灣 386–390, 485–486, 500–501, 548–554 , 561, 598, 612–613, 632–637, 855–861, 863–864；稅制改革（1953）434–439；在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和衝突上取態 808–829；中共十大（1973）903；「三線」建設 654；對中日外交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則」677, 887；對日本的「政治三原則」與「貿易三原則」677；《天津學生聯合會報》39, 46；促進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1960年代初）682–683；與統一戰線 67, 70–71, 80, 161, 176–180, 183, 188–189, 192, 198, 214, 258, 366, 636, 663, 868；有關統一戰線的發言 258；愛丁堡大學 47–49；抗日戰爭 181–214, 243–259；瓦爾德事件（1948）297–298；經英國轉告華盛頓有關擴大越戰的警告 704；《水滸》5, 935；瓦窯堡會議（1935）157；西花廳 368, 915；黃埔軍校 65, 67–68, 71；西安事變（1936）166–171；《益世報》特約記者 46–47, 50–51；周恩來－基辛格會談（1973）引起的黨內批判 907, 909–911；遵義會議（1935）140–141；恰當的民主集中制 530；六項小自由 563

周恩來，主要活動地點（1949年前）：淮安（1898–1910）3–7；東北（1910–1913）9–12；天津（1913–1917）13–20；日本（1917–1919）21–34；天津（1919–1920）35–44；歐洲（英國、法國、德國，1920–1924）46–60；廣州（1924–1926）63–75；上海（1926–1927、1927–1931）75–105；江西紅區（1931–1935）107–132；長征（1934–1935）133–151；陝北（1935–1937）153–177；武漢（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179–180；重慶（1938年12月至1943年6月）181–214；延安（1943年7月至1947年3月）231–242；陝北（1947年3月至1948年）278–288；西柏坡（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288–301；北平（1949年3–9月）368–373

周恩來，出訪國家及地區：亞洲及非洲（1963–1964）668–670；阿富汗（1957）528；阿爾巴尼亞（1964、1966）670–673, 738；阿爾及利亞（1963）669；緬甸（1954、1956、1960、1964）487–488, 522–523, 592, 608, 675；柬埔寨（1956）521–522；錫蘭（1957、1964）528, 675–676；埃及（1963、1965）668–669；埃塞俄比亞（1964）674；加納（1964）673；幾內亞（1964）673–674；匈牙利（1957）527；印度（1954、1956–1957、1960）487, 516, 522, 524, 591–596；印尼（1955、1965）493–495, 712；摩洛哥（1963）669–670；馬里（1964）673；尼泊爾（1957）526；朝鮮（1958、1971）533, 869；巴基斯坦（1956、1964、1965）516, 523, 675, 703–704, 713, 738；波蘭（1954、1957）482–483, 526；羅馬尼亞（1966）730, 738；索馬里（1964）674；蘇聯（1928、1930、1939–1940、1950、1952、1954、1957、1959、1964）84, 86–87, 92–95, 190–196, 379–384, 409–410, 417–418, 421–422, 428–431, 471, 478, 484, 527, 685–689；蘇丹（1964）674；瑞士（出席日內瓦會議，1954）

471–476；坦桑尼亞（1965）674–675, 713；突尼斯（1964）673；越南（1956、1964、1969、1971）520–521, 659–660, 846, 868–869
周恩來，作為中共和中國情報組織的頭領：中共在華南地下網絡的瓦解（1942）211–212；破譯敵方密碼 142；獲得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情報 632；重慶的情報網絡 186–187；截取台灣情報機構的暗殺計劃 491；發明「豪密」95；對羅青長的最後交代 939；與佐爾格會面 103–104；重新安排中共的情報佈局 280–281；特科（中共中央特別事務科）82–83, 87–88, 101–102
周恩來，病歷：瘧疾（1927）80；阿米巴膿腫（1935）146；手臂骨折（1939）190–191；小腸疝氣發炎（1941）212；癌症（1974–1976）895–896, 900, 915, 923–924, 929, 936–937
周恩來，與不同人物的關係：博古 110–111, 129–131, 133–141, 146, 156, 175, 177, 182–184, 215, 223, 228–229, 234–235, 238；李德 129–131, 133–141；陳伯達 509–510, 625, 740, 745, 754, 817, 820, 823；陳毅 50, 91–92, 227–228, 538, 598, 612, 639–640, 704, 713, 769–773, 795, 847；陳雲 223, 372, 428, 434–435, 440, 445–448, 450–451, 454, 460, 540, 545, 618–619, 622, 624–625, 745；蔣經國 636；蔣介石 67；達賴喇嘛 522, 524–525, 565–566, 571–573；鄧小平 56, 540, 719, 927, 929, 935–936；鄧穎超（妻子）41, 58–59, 69–70, 75, 77, 84, 146, 182, 184, 190–191, 196, 212, 273, 368, 372, 537, 804, 822, 895, 901, 915, 940；高崗 432, 441；胡志明 52, 68, 471, 476–479, 520, 659–664, 845–846, 850；赫爾利 251–252, 254, 267；康生 179, 229, 236, 697, 721, 724, 745, 747, 804, 809, 940；赫魯曉夫 459, 527, 556；金日成 398–400, 404–406, 411, 414–416, 418–419, 422, 511–512, 533, 850, 869, 935；基辛格 867, 871–872, 874；柯西金 686, 688, 701–703, 842–844, 846–849；李克農 87–88, 160–161, 422, 457, 470；李鵬 339n63；林彪 540, 802–803, 808–829；陳氏（嗣母）5；馬歇爾 267–268, 271–273；米高揚 300, 686, 689；尼赫魯 487–489, 516–517, 522, 591–596, 630–632, 989n47；尼克松 876–879；潘漢年 103, 134, 163, 165–166, 455–459, 465；彭德懷 579–580；西哈努克 521–522, 637, 836, 845, 854, 869, 935；宋慶齡 371–372, 675–676, 836, 925；佐爾格 103–104；斯大林 84, 94–95, 379, 409–410, 417–418；蘇加諾 667, 712, 714–715；孫維世（義女）193–195, 419–420, 798–799；萬冬兒 3；王洪文 849, 902–903, 911, 913, 918, 920, 922–927, 939；王明 99–100, 113, 164, 178–180, 183, 185, 215–218；張春橋 716, 751–752, 782, 809, 849, 899–900；張若名 40, 58–59, 93；張學良 159–164, 166–172；周秉德 59, 70；周恩壽 799；周起魁（周攀龍）3–4,；周貽賡 9–11, 13, 22；周貽能 3–4, 9–10
周恩壽 799
周起魁（周攀龍）3–4
周揚 463
周敦頤 3
周貽能 3–4, 9–10
周貽賡 9–11, 13, 22
周貽謙 10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487–488
奈特，約翰（John Knight，周恩來護照使用的名字）46
奈溫 590, 592, 704, 712, 870, 1026n9, 1039n144

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Montesquieu）15
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474–476, 479, 678
季山嘉（Kissarka）73–74
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164, 183, 191–192, 196, 212, 219–223, 230, 236–237, 345n16
居里（Lauchlin Currie）205–206, 839
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690
岡野進（野坂參三）196, 239, 339n66
岸信介 677
帕塔薩拉蒂（Shri Parthasarathy）589
幸德秋水 32
延安：作為中共中央的根據地 215；美軍觀察組（1944）248, 250, 254–255；國軍的攻佔（1947）278–279；延安整風運動 86, 214, 221–230
拉尼埃（Joseph Laniel）474
拉杜勒斯庫（Gheorghe Radulescu）856
拉達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644–645
東北軍 150, 154, 157, 159–164, 167–168, 171–172
松村謙三 677
林立果 823–824, 828–830, 833
林伯渠 175, 177, 239, 244, 246, 251, 420
林利 420
林育英 153, 155。又見：張浩
林豆豆 829–830
林彪 117, 119, 142, 149, 213, 244, 271–272, 291, 419, 442, 544, 615–616；飛機失事 829–832；與安子文名單 442；背景及教育 67；中共九大（1969）802–805；「批林批孔」運動 916–918；批林整風會（1972）896–898；關於「反革命政變」的危險 731–732；作為毛澤東的指定接班人，及周恩來對之的態度 802–803；五七一工程紀要與林彪的不知情 823–824；與高崗 437, 446；與賀龍倒台 760–761；與羅瑞卿倒台 717–719；廬山會議（1970）812–817；與蔣介石會面 214；與斯大林會面 409；對核戰恐慌的反應 807；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1966）720–722；在七千人大會（1962）的發言 615–616；與孫維世 419；與毛澤東的分歧和衝突，及周恩來對之的態度 808–829；給毛澤東的未發信（1971年5月）825；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745；「林副主席一號命令」808, 851；對周恩來請辭的取態 540
武元甲 475–476, 662, 664
武漢：抗戰時期 181–183；文化大革命 780–782；與中共的大革命 77–78；七二零事件（1967）782；汪精衛清共（1927）78；長江局（中共）179–180
河上肇 32
法國：中國留學生 50–51；富爾訪華及與毛澤東、周恩來會面（1957）678–682；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 682；與日內瓦會議（1954）467–482；周恩來與鄧小平的初次相遇 56；蓬皮杜訪華 885, 887；周恩來早年在法（1920–1924）48–60
《法意》（孟德斯鳩）15
《波茨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259
波茨南事件（波蘭，1956）510–512
波爾布特（Pol Pot）854, 935
波德納拉希（Emil Bodnăras）730, 794
波蘭 190, 483, 499, 510–514, 526–527, 633, 671, 686, 852–853, 971nn35–36
波蘭與匈牙利危機（1956）。見：匈牙利與波蘭危機
直隸省學生示威（1920）42
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 38
《社會主義神髓》（幸德修水）32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651–652, 697；與〈二十三條〉（1965）700–701

《社會問題研究》（期刊） 32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210, 256
邱會作 729, 804, 808, 810–811, 815–816, 820, 822, 832, 851, 1027n33, 1028n41
邵力子 244, 372
邵元沖 65
金一 398, 511
金山 419–420, 798
金日成 398–400, 404–406, 411, 414–416, 418–419, 422, 512, 533, 850；對中美重啟外交的態度 869；八月危機 511；主體思想 511；個人崇拜 511；周恩來對金的評價 511–512；周恩來與金的最後一次會面 935
金門島 388, 485, 548–554, 560
長汀會議（1932） 120–121
長江局 179, 187, 220, 279
長征（1934–1935） 133–151, 153–154, 156
阿尤布．汗（Mohammad Ayub Khan） 675, 703–704, 712
阿克賽欽 571, 591, 593, 631, 637, 644, 988n33
阿沛．阿旺晉美（Ngapoi Ngawang Jigme） 392–394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埃及） 668
阿登納（Konrad Adenauer） 883, 885
阿爾及利亞 669–670, 679, 682, 712–713, 918
阿爾巴尼亞 605, 612, 618, 670–673, 685–686, 730, 738, 767, 870, 1007n109, 1040n151
青幫 76

九劃

俄羅斯 48, 375, 518, 556。又見：蘇聯
俞作柏 93
信陽事件（1959–1960） 607
「冒進」。見：「反冒進」
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 686, 688–689
勃蘭特（Willy Brandt） 883
南方局 184, 186, 189–190, 212, 220, 222, 226, 229, 248
南昌起義（1927） 79, 319n71
南開大學 41–42, 778
南開學校 13–14, 18, 20, 32–33, 37, 39, 47
南寧會議（1958） 535–536
南漢宸 496
哈利戴（Jon Halliday） 308n14
哈特林，保羅（Poul Hartling） 924
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öld） 499, 872
契爾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 596, 598–600, 611, 641, 649, 685–686
姚文元 743, 754, 772, 782, 801, 815, 899–900, 916, 920, 922, 934–935；批評《水滸》 934–935；與一月革命 763–765；上海《文匯報》的文章 716–718；在周恩來－基辛格會談（1973）引起黨內批判一事上的取態 909。又見：四人幫
姚仲民 714
姚登山 784, 788, 1023n62
姚廣 844
威爾遜（Harold Wilson） 480–481
威爾遜，伍德羅（Woodrow Wilson） 36–37, 210
威爾遜，迪克（Dick Wilson） 308n19
宦鄉 481–482
思想改造 255, 423–424, 462–463, 620, 954n133
思想整頓 225。又見：整風運動（延安，1941–1945）
政治協商會議 365–367
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 322n56, 883
柬埔寨 472–478, 496, 516, 521–522, 637, 648, 668, 836, 840, 845, 854–855, 869, 935。又見：西哈努克
柯西金（Alexei Kosygin） 686, 688, 701–703, 842–844, 846–849, 1010nn22–23
洛川會議（1937） 177
洛德（Winston Lord） 867, 876–877, 1046n104

珍寶島事件（1969） 843
秋收起義（1927） 82
科瓦廖夫（I. V. Kovalev） 304, 377–378, 443, 943n44
科倫坡六國 648, 668, 676
科恩（Glenn Cowan） 859
突尼斯 673
紀登奎 820–821, 829, 881–882, 894, 923, 938, 1052n116
約翰遜（Lyndon Johnson） 664–665, 703–704
約翰遜（Ural Alexis Johnson） 482, 499
紅色高棉 854
《紅星照耀中國》（斯諾） 856
紅軍：進攻贛州 119；中央紅軍 133–135, 138–139, 143–145, 148, 150–151, 153–156, 159, 165, 218；廣昌失守 131；長征（1934–1935） 133–151；毛澤東的指揮 141–144；解除毛澤東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位 115；與國民黨的談判 172–173；紅軍第一方面軍 126；紅四軍 90–92；紅四方面軍（張國燾） 155, 162；紅二方面軍（賀龍） 134–135, 137–138, 162, 165；攻佔漳州 119–120；陝甘支隊 149–150；東征山西 159–162；電報事件（1935） 與右路軍 146–148；張浩 vs. 張國燾 154–155；周恩來作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委 126。又見：紅區
紅區 107–132；土地政策 129；〈古田會議決議〉 92；結構性矛盾 128–129, 131；「肅反」運動 116–117
《紅旗報》（德共機關報） 93
紅衛兵：衰落 792–794；毛澤東致信 743；檢閱紅衛兵（1966） 745–746；包圍中南海（1967） 783–784；伍豪啟事 779, 790
美軍觀察組（1944） 248, 250, 254–255
美國：原子彈 259；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取態 632–637；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爭論 247, 250–251；中國政策（1940年代） 300–305；與中國的外交關係 205–206, 838–841, 845；帝國主義／對亞洲的干預 477–481, 661–663；十四點計劃（威爾遜總統） 36, 210；介入越戰 664–665；美台共同防禦條約（1954） 485；乒乓外交 859–860；越戰期間與中國的關係 703–705；與新中國的關係 481–482；上海公報（1972） 878–879；沈崇事件（1946） 282–283；中美外交 266–271, 852–858, 904–907；國務院《中國白皮書》 305；台海危機（1954–1955、1958） 485–486, 548–554；對日宣戰（1941） 211
胡志明（阮愛國） 52, 68, 471, 476–479, 520, 659–664, 845–846, 850, 1001n10, 1002n15
胡宗南 166, 203, 231, 279–280, 286, 288, 356n24, 390
胡底 87–88
胡風 366, 462–464, 961n143
胡喬木 224, 233, 506–507, 509, 922, 941n8, 1051n93
英國 37, 210, 302, 472, 480；艾德禮訪華 496；火燒駐京代辦處事件 787–788, 882–883；轉告美國有關周恩來對越戰升級的警告 704；在日內瓦會議（1954） 467–482；與香港 491, 493, 784–787；作為大躍進的趕超目標 534–535, 538, 543–544；愛丁堡大學 47–49；周恩來在倫敦（1921） 47–48。又見：倫敦
范文同 471–475, 479, 520, 550, 659–660, 662, 664–665, 686, 784, 840, 854, 869, 901, 1002n13, 1002n15
范若愚 537
重慶，作為戰時首都（1938–1943） 181
革命民族主義：毛澤東合法性敘述的基礎 911；作為毛澤東與中共動員群眾的手段 486

《革命軍》（鄒容） 11
韋國清 147, 471, 476
香港 65, 80–81, 284, 371, 391, 458, 491, 493, 496, 500, 518, 549, 608, 636, 704, 711, 784–787, 829, 852；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窗口 785
後藤鉀二 859, 1037n107

十劃

《海瑞罷官》（吳晗） 716–717, 721, 763, 916–917
《益世報》6–47, 50–51, 54, 56, 315n47
倫敦：中國貿易辦公室 481；周恩來在《益世報》的「倫敦通信」系列 47；周恩來在（1921） 47–48
原子彈。見：核能工業和武器
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 421
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 512, 526–527
唐奈（Jack Downey） 499, 872–873, 989n52
唐聞生 858, 866, 873, 902, 905, 907, 909, 911, 917, 919–920, 924, 927, 937, 939, 1045n96, 1046n108, 1046n119, 1047n125
埃及：開羅會議（1943） 243–244；蘇伊士運河危機與中國的援助 496；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668；周恩來訪埃（1963） 668–669
夏格巴（Tsepon Shakabpa） 391–392
姬鵬飛 373, 551, 890
孫中山 11, 58, 63, 65, 68, 71, 73, 244, 371
孫炳文 193, 798
孫科 167, 288
孫維世（周恩來的義女） 193–195, 338n44, 419–420, 798–799, 1025n111
宮本顯治 723
宮腰喜助 496
師哲 196, 345n11, 375, 380, 409, 445, 818, 942n31, 947n9, 958n76
徐向前 148, 330n50, 768–771, 773, 795, 841, 851
徐恩曾 101
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 673, 716
旅順 256, 375–376, 380–384, 459
柴成文 401–402
核能工業和武器／核戰威脅 485, 531–533, 550, 649；中國領導層的核戰恐慌（1969） 807, 845, 847；中國首個原子彈 689–693；毛澤東與周恩來對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使用核威懾的態度 419；蘇聯對中國的支援 555–556；周恩來與基辛格討論有關蘇聯對中國的核威脅 904
格瓦拉（Che Guevara） 666
浦壽昌 407, 494, 965n63
特科（中共中央特別事務科） 82–83, 87, 101–103, 280–281, 320n5；紅隊 88
班納吉（P. K. Banerjee） 645
班達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 676, 989n47
班禪喇嘛 394–395, 522, 524–525
秦始皇 564, 823
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 496, 668–669, 712, 999n121
耿飚 373, 640, 917
袁世凱 16–17
袁仲賢 373, 392–393
袁曉軒 212, 343n160
陝西：長征結束 150–151；〈七二四佈告〉（1968） 793–794；西北革命委員會 150；陝北 153–154；陝甘支隊 149–150
馬克斯韋爾，內維爾（Neville Maxwell） 589
馬利諾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 556–557, 559, 688
馬良 40, 42
馬里（Mali） 673
馬來西亞 667

馬林科夫（Georgi M. Malenkov）421, 429, 478, 484, 954n122, 1008n131
馬洪 452, 957n60
馬敘倫 372
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對周恩來的評價 267；調停國共的努力 267–268, 271–273；周恩來對馬歇爾的印象 267；周恩來的筆記本意外 267
馬駿 38–40
《馬關條約》（1895）10
高戈武 11
高文謙 113, 126, 308n16–17, 349n82, 910
高伯拉瓦（William Gopallawa）588
高良富 496
高崗 297, 402–403, 432, 435–437, 439–455, 458–459, 656；與安子文名單 440, 453；「東北王」451；與毛澤東的關係 437, 443–444；與蘇聯的關係 443；與周恩來的關係 432, 441；與劉少奇的對抗 442–443；自我檢討 449–450；毛澤東對高崗自殺的態度 453；試圖自殺 451；周恩來在發言的批評 450
高碕達之助 497, 677–678
高饒反黨集團／高饒事件 432–459

十一劃

國民革命軍 67, 70, 72
《國富論》（亞當．斯密）15
國聯 158
基辛格 852–854, 862, 864, 889；第一次（秘密）訪華（1971年7月8–10日）826, 866–869, 887；與毛澤東會面 901；與周恩來會面 867, 871–872；乒乓外交（1971）860–861；第二度訪華（1971年10月）871–873；與尼克松訪華（1972）876–878；就任國務卿後的首次訪華（1973年11月）904–907；周恩來對基辛格的評價 874；周恩來－基辛格會談（1973）引起的黨內批判 907, 909–911
崔可夫（V. I. Chuikov）208, 210
崔昌益 511–512
崔庸健 511–512, 850
康生 179, 229, 236, 697, 721, 724, 745, 747, 804, 809, 940；北京大學的大字報 738；中共九大（1969）804；二月逆流（1967）769, 772；二月提綱（1966）725–726, 728；給周恩來的訊息 738；在廬山會議（1970）812–817；作為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打手 225–227, 233
康有為 10–11
張子華 160, 164
張玉琴 186
張申府 48–49, 51, 53–54, 56, 58, 65, 314n18, 315n21
張戎 308n14
張伯苓 14–15, 38, 42, 88
張佐良 895–896
張作霖 443
張克俠 281
張杏華 102
張沖 174, 202, 204, 206–207
張秀山 452
張明遠 452
張治中 213–214, 246, 264, 269, 295–296, 348n61, 612, 636, 997n60
張春橋 716, 751–752, 782, 809, 849, 899–900；安亭事件 751–752；九大政治報告 801；對經驗主義的批評 931；二月逆流（1967）771–772；與一月革命 761–766；毛澤東的73歲壽宴 754；與林彪的緊張關係 804, 813–815；周恩來對張的「叛徒」指控 894；周恩來的醫療領導小組 895。又見：四人幫
張若名 40, 58–59, 93
張奚若 679
張浩（林育英）153–157

張國燾 101, 122, 142–151, 153–155, 157, 163–165, 331n3；與中共及紅軍的分裂 148–151, 153–155；電報事件（1935）146–148；周恩來對張的了解 138–139
張梅 195, 419
張愛萍 693
張瑞芳 419
張經武 395
張聞天 136, 138, 140, 143, 145–146, 153–157, 159, 179, 216, 223, 228–229, 241, 578–579, 580, 656, 728, 977n157
張學良 159–164, 166–172
張樨群 997n57
戚本禹 744, 753–755, 758, 776, 784, 789–790, 1014n98, 1019nn80–81
捷克斯洛伐克 794–795
教條主義 228–229, 241, 546, 922, 931
《晚年周恩來》（高文謙）113, 126, 910, 1045n101
曹汝霖 37–38
曹聚仁 500–501, 548, 968n123
曼斯菲爾德（Mike Mansfield）845, 872
梁啟超 10–11
梁漱溟 460–462, 464
梅農（K. P. S. Menon，印度駐聯合國首席代表）393, 500
梅農（V. K. Krishna Menon，印度國防部長）639–640
淮安（江蘇省）3–7, 9–11, 13, 309n1
淮海戰役 291–292
清朝 11, 13, 16, 489, 518, 684
章乃器 372
章士釗 56, 548
章文晉 186, 372, 866
章伯鈞 372, 728
章含之 906, 909, 1046n101
章炳麟 11
第一次世界大戰 16, 36；周恩來的評論 57
第二次亞非會議（1964）712–716
第二次東征 70
統一戰線：在國共兩黨之中 59, 63–64, 70, 74, 76–77, 156, 157, 161, 177–178, 192, 198, 215–220, 636；在國際間的策略 155, 305, 491, 724, 854, 869；對西藏的統戰策略 391；周恩來與 67, 71, 80, 258；周恩來對統戰的發言 258
習仲勳 432, 435, 453, 586, 656
莫洛托夫（Vyacheslav M. Molotov）250, 374, 378–379, 383, 410, 421, 428–430, 471–475, 478–480, 504, 536, 1008n131
莫斯克文（周恩來在共產國際的別名）63, 316n3
《貧乏物語》（河上肇）32
《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692
郭仲容 244
郭汝瑰 281
郭沫若 273, 372, 795
郭峰 45
郭紹棠 192
郭潛（郭乾輝）212
釣魚島問題 888–891, 1043n32
閆又文 281
陳公培 49
陳氏（周恩來的嗣母）5, 314n36
陳丕顯 716–718, 762–763
陳永貴 696
陳立夫 159–160, 164–166
陳再道 781–782
陳式周 47–48, 314n36
陳伯達 509–510, 625, 740, 745, 754, 817, 820, 823；安亭事件 751–753；中共九大（1969）801–805；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748；與林彪 802, 812–814；廬山會議（1970）812–817；十月工作會議（1966）748；《人民日報》有關香港的社論 786；成為二月逆流的批評對象 771–772
陳劭先 372

陳延年 76
陳昌浩 146, 148
陳果夫 160, 164
陳炯明 68–70
陳家康 186, 372, 411
陳雲 223, 372, 428, 434–435, 545, 622, 624–625, 745；與高饒事件 445–448, 450–451, 454；進口糧食 608；在全國財經會議（1953）的發言 440；糧食統一徵購和配售 460；西樓會議（1962）618–619；對周恩來提出辭任總理的態度 540；與遵義會議 140
陳誠 127–128, 182, 500, 612, 636, 979n32
陳銘樞 300–301
陳毅 50, 91–92, 227–228, 538, 598, 639–640, 713, 795；經英國轉告華盛頓有關周恩來的警告 704；文化大革命 780, 784；逝世及其追悼會 836–837；協助周恩來處理外交工作 612；與二月逆流（1967）769–773；提議打「美國牌」847；饒漱石 446, 454–455
陳賡 69, 146
陳獨秀 23, 36, 49, 53, 56, 64, 72, 78, 81, 108, 238, 897
陳濟棠 134, 163
陶涵（Jay Taylor）67
陶鑄 584, 696, 745–747, 752, 758–762, 778, 780, 851
陸志偉 303
陸定一 276–277, 355n7, 540–541, 621, 721, 725, 727–728
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411
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665
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519–520, 522, 524, 571, 587, 589–591, 593, 642–644, 649

十二劃

傅作義 281, 291–292, 358n74, 372, 612, 636
傅涇波 301, 303–304
傅崇碧 773, 791, 799
博古（秦邦憲）110–111, 129–131, 133–141, 146, 156, 175, 177, 182–184, 215, 223, 228–229, 234–235, 238, 328n2, 328n13, 329n28, 329n35, 827
喬治烏．德治（Gheorghe Gheorghiu-Dej）936
喬冠華 186, 372, 550, 795, 842, 877–878, 906, 920, 952n99
喬森潘 935
富田事件（1930）109–110
富爾，埃德加（Edgar Faure）678
幾內亞 496, 673
彭述之 69, 317n22
彭真 223, 435, 540–541, 565, 600, 611, 615, 618–619, 642, 656, 697, 699, 714, 716–728, 771, 1007n122
彭湃 89
彭德懷 119, 149–150, 159, 199, 208–209, 241, 427, 436, 443, 445–446, 448, 512, 546, 554, 556–558, 656, 717, 721, 728, 827, 893, 927, 949n46, 950n55, 951n81, 958n62；作為朝鮮戰爭的中國主帥 408, 411–414, 421–422；與高崗 432, 442；給毛澤東的信 578；廬山會議（1959）576–580, 584；周恩來對彭的態度 579–580
揚帆 455
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南侵 398–399；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 429；國共內戰 259–260；赫魯曉夫的批判 503–505；去世及其葬禮 421；毛澤東對非斯大林化的反應 503–504；與高崗 443；朝鮮戰爭 398–402, 405–410, 413–415, 417–419；毛澤東訪蘇（1949）374–379；與劉少奇會面（1949）373；與周恩來會面 84, 94–95, 379, 409–410, 417–418；對美政策 266；承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 373；中蘇關係 601；中蘇條約（1945）259；中蘇條約（1950）379–385；與雅爾塔協定（1945）256；周恩來的評價 601
斯托塞爾（Walter Stoessel）852–853
斯烈 76
斯特朗，安娜．路易斯（Anna Louise Strong）276, 717
斯密，亞當（Adam Smith）15
斯諾，愛德加（Edgar Snow）309n10, 371, 819, 839, 856–858, 864, 866, 1010n20
曾養甫 159, 164
曾澤生 291
朝鮮 850。又見：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1950–1953）397–425；停戰談判 415–419, 420–423；中國參戰的決定 406–410；中國在仁川登陸前的參戰準備 401–405；「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404；仁川登陸 401–402, 404–405；戰俘問題 415–418, 420–421；金日成、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戰前討論 399–400；遣返解放軍中的朝鮮族部隊 398；三八線 401–402, 406–407, 411, 414–415；與「思想改造」運動 424；周恩來解決朝鮮問題的五項條件 402–403；周恩來與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領導人會晤 421；周恩來與斯大林在戰時的會談 408–410；周恩來對中國介入的警告 407
湖南省：秋收起義（1927）79–80；長沙大火（1938）184；毛澤東在湖南的調查（1962）623–624；紅軍攻陷長沙（1930）96；湘江之戰（1934）135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見：文化大革命
稅制改革（1953）434–435, 437
童小鵬 186, 636, 663, 997n57
粟裕 291, 386, 388, 546, 822, 947n12
舒曼（Maurice Schumann）885
華北會議（1970）819–820
華國鋒 828, 891, 923, 925–926
華理柱（James Walsh）855
華盛頓會議（1921–1922）50
華萊士（Henry Wallace）247–248
費克圖（Richard Fecteau）499, 872, 989n52
賀龍 134, 165, 342n117, 446, 642, 685–686, 688, 693, 717, 729, 760–761, 773, 781, 836, 933, 1013n83, 1014n89
越南：奠邊府 472–473, 476；柳州會議（1954）476–478；北部灣事件 664–665；南方革命 659–662；越戰 701–705, 854, 867；周恩來訪越（1956、1963、1969、1971）520–521, 659–660, 846, 868–869。又見：日內瓦會議（1954）；印度支那；越盟
越盟（越南獨立同盟會）469, 471–476, 482, 659
開羅宣言（1943）243–244
雅爾塔會議／協定 256, 258, 260, 271, 282；斯大林的取態 256, 375
集體化運動 459
雲南省 135, 137, 144
項英 86, 98, 108–110, 113, 116, 120–123, 125, 133, 200, 202, 220, 234
馮玉祥 96, 167
馮客（Frank Dikötter）564–565
馮琦（徐錫根）211
黃永勝 792, 804, 808–810, 820–821, 824, 826, 828, 830, 850–851
黃克誠 437, 445, 578–580, 656, 728
黃炎培 372
黃埔學生軍 69–70
黃紹竑 372
黃華 302–305, 360n122, 481, 860, 867
黃愛 53
黃鎮 373, 631, 856, 871, 885–886, 906

十三劃

慈禧太后 10

敬業樂群會 15, 38
新中學會 29
新文化運動 36
新四軍 181, 196–199, 245；皖南事變（1941） 200–203
《新青年》雜誌 23–25, 56
新政協會議（1949） 365–366, 372；《共同綱領》366, 368–371, 431, 941n8
《新華日報》183, 185, 203, 233
新華社 256, 305, 390, 510, 569, 642, 737, 785, 825, 832, 883
新疆 162, 190, 371, 627, 631, 638–639, 643, 796, 893；中蘇邊界衝突（1969年8月） 807, 845；作為中蘇條約談判的主題 380, 383–384, 459；新藏公路 591, 593
楊天石 72, 318n39
楊成武 631–632, 637–638, 641, 663, 730, 781–782, 788–789, 791
楊尚昆 435, 448–449, 624, 626, 720, 727–728, 949n46, 1014n98
楊尚奎 720
楊虎城 160–163, 166–167, 169, 171–172
楊奎松 72, 165, 901
楊振寧 316n4
楊登瀛（鮑君甫） 88
義和團暴亂 10
萬冬兒 3
萬隆會議（1955） 489–495, 499
葉季壯 608–609
葉挺 199–200, 202–203
葉海亞·汗（Mohammad Yahya Khan） 852–856
葉群 419, 717–718, 745, 799, 804, 814, 816–822, 824, 829–830, 1025n111, 1027n22, 1027n35, 1030n105
葉劍英 175, 177, 184, 201, 288, 372, 443, 446, 718, 805, 832, 841, 850–851, 876, 913, 915, 917, 920, 934；陳毅的追悼會 836–837；二月逆流（1967） 769–771；與基辛格 867, 905；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 833, 909；電報事件（1935） 146–148；周恩來的醫療領導小組 895, 900
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 493
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 555, 560–561
董加耕 696
董必武 177, 213, 227, 233, 244, 246, 250–251, 254, 283, 372, 435, 822, 851
董健吾 160
《解放日報》248, 257, 761, 763–764
資本主義：毛澤東的資本主義觀 292–293, 584, 597, 625–628, 754；周恩來的資本主義觀 32, 50, 52, 438
賈一斌 281
達旺 643, 647
達賴喇嘛 392–395, 522, 524–525, 565–566, 568–569, 571–573, 974n92
鄒容 11
鈴木一雄 677
雷任民 480, 608–609
雷陽 852–853
鳩山一郎 497

十四劃

實際控制線 519, 591, 594, 631, 643–645, 647–648, 688
寧都會議（1932） 123–127, 234–235
廖仲愷 65, 70
廖承志 212, 497, 677–678
滾雷行動（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 665, 701
滿洲（東北）：國共內戰在 271–272, 278, 291；高崗作為「東北王」451；日本佔領 118；林彪的部隊 291；瀋陽（奉天） 271, 291, 297, 401, 403, 406, 452, 533, 637；蘇聯入侵 259；蘇聯的特殊利益 298, 383–384；周恩來早年在 10–13
漳州（福建省） 120–121

熊向暉 231, 279–281, 826, 845, 867, 873
福州慘案（1919） 42
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68
維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 374, 380–381, 384, 428–429
維經斯基（Gregory Voitingsky） 76
維爾德茨，伊利那（Ilie Verdetz） 936
蒙古：作為邊界地區 145, 520；林彪飛機失事 67, 831–832, 870；外蒙古 256, 258–259, 684
蒯大富 743, 794
「豪密」95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5
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 214, 250–256, 264, 266–267, 380, 839
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北京對赫魯曉夫下台的反應 684–689；非斯大林化 503–504；與匈牙利和波蘭危機（1956） 510, 512；回覆周恩來有關提供原子彈予中國的信（1958年4月24日） 556；與毛澤東會談（1958） 559–560；與毛澤東會談（1959） 597–599；與周恩來會面（1954、1957） 459, 527；對個人崇拜的批評 511；撤回援中專家 601–602；下台 684–685；關於中印邊界糾紛和戰爭 642, 649–650；中蘇分裂 558–560, 579, 597–603；暫停與中國的核能合作 691
趙世炎 49, 76
趙德尊 452
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şescu） 730, 852
齊燕銘 699

十五劃

劉少奇：反修正主義 622；背景 184；中央工作委員會 279；「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776–777；與達賴喇嘛 525；在文革初期 737–745；開除出黨 797–798；與毛澤東的言語衝突 625；「三分天災、七分人禍」613, 615；與日共代表團鬧翻的會面 723–725；與匈牙利和波蘭危機（1956） 513–514；毛澤東的批評 438, 618, 625, 627, 695–696, 743–744；與毛澤東、周恩來的會議（1946年11月21日） 275；與斯大林會談 304–305, 373, 601；「和平民主新階段」268, 275, 440, 450；與饒漱石 454–455；與高崗的對抗 442–443；自我批評 442, 450, 627, 749；七千人大會（1962） 615, 618；與越南 469；西樓會議（1962） 618–619；周恩來對劉少奇案的監督和簽字定案 797–798
劉冰 938
劉安恭 91
劉伯承 446, 546, 851, 894
劉亞樓 387
劉昂 186
劉為章 201, 208
劉清揚 48–49, 53, 314n18
劉敵 109
劉曉 555, 642, 649–650, 690
審幹 225–228
廣州 53, 65, 68–75, 296, 301, 441, 446, 620, 636, 828–831；中共武裝暴動的失敗（1927） 83；作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起始點 64；作為林彪生涯的起點 67；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宴」69–70
廣西省 793；軍閥 93
廣昌之戰（1934） 131
廣東省，與周恩來：作為東江區行政委員 71；第一次東征（1925） 68–69；廣州 63–64, 71, 83；作為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 65；視察廣東之行（1958） 545；南昌起義（1927）後攻軍廣東 79–80；在從化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1960） 854；第二次東

征（1925）70；東南亞革命戰略策劃會議（從化，1963）662–663；軍閥 68, 134
德波馬歇，雅克（Jacques de Beaumarchais）682
德國 190, 205, 258, 883, 885；入侵蘇聯（1941）221；山東半島 36–37；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1918）28；周恩來早年在德國（1922）53
德黑蘭會議（1943）243–244
摩洛哥 669–670
歐陽欽 111
歐陽鐘 318n39
潘友新（Alexander Panyushkin）212
潘尼迦（Sardar K. M. Panikkar）391, 393, 407, 411–412
潘自力 572, 639
潘漢年 103, 134, 163, 165–166, 455–459, 465, 960n127
緬甸：亞非會議（1955）487–489；邊界問題及協議 488, 516–520, 522–523, 592, 637；周恩來訪緬（1955、1956、1960、1961）487–488, 522–523, 592, 608, 675。又見：吳努；奈溫
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885, 887, 903
蔡孝乾 389–390
蔡廷鍇 127, 130
蔡和森 50, 86
蔣介石 67, 71–74, 78, 96, 118, 130, 158–160, 172–175, 388–390, 548–549, 612–613, 929；在上海的反共政變 76–77；試圖暗殺周恩來 491, 493；進攻中央蘇區 127–129, 131；《中國之命運》214；國共內戰（1946–1949）275–305；作為黃埔軍校校長 67；與中共合作抗日 181–182；居里訪華 205–206；離開中國大陸 305；破壞中共在台灣的地下網絡 389–390；中山艦事件（1926）72–74；與赫爾利訪華的調停任務 250–255；日本投降 258–259；長征 133–151；與馬歇爾的調停任務 267–273；與華萊士會談（1944）247–248；中條山會戰（1941）208–209；與九一八事變（1931）118；皖南事變（1941）200–202；元旦「求和」聲明（1949）293；與毛澤東、周恩來的重慶談判（1945）259–265；計劃反攻大陸（1962）632–637；圍剿紅軍 134–135；與周恩來的關係 75；下野 293；與史迪威的矛盾 247, 250–251；羅斯福與雅爾塔密約 256, 258, 271；台海危機（1958）548–554；西安事變（1936）166–171
蔣光鼐 130
蔣經國 281, 289, 636–637
鄧子恢 432, 445
鄧小平 93, 408, 432, 434–435, 440, 442, 478, 503, 545–546, 559, 565–566, 572, 576–577, 583–584, 605, 610–611, 613–614, 618–619, 622, 624–625, 642, 652, 654, 656, 696, 702, 726–728, 916, 918, 922–926；背景 56；與八大（1956）509；出席「批周」會議 910–911；在文革初期 737–745；與中共和日共的鬧翻 723–725；與二月提綱（1966）720–721, 728；與高饒事件 445–446, 448–449, 454–455；與匈牙利與波蘭危機（1956）513–514；與江青的衝突 923；毛澤東的批評 697, 894；毛澤東整肅羅瑞卿 719–722；毛澤東在「批周」會議的考驗 910；「毛澤東思想」509；「全面整頓」（1975）933–935；在林彪死後復出 893–895, 903, 913；二度下台 937–939；自我批評 749, 894；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1974）918, 920；越戰 708；周恩來的建議 935；對周恩來請辭的取態 540；周恩來對鄧小平復出的支持 927, 929, 936
鄧文儀 159
鄧穎超 75, 84, 146, 182, 190, 196, 212, 273, 372, 804, 822；童年與教育 38；在重

慶 184；銷毀與周恩來有關的資料 1047n126；李鵬 339n63；嬰兒夭折 77；與宋慶齡 372；孫維世（義女）193, 195, 419–420, 798–799；陪同周恩來到莫斯科接受治療（1939–1940）190–191；西花廳 368；寡居 940；與周恩來在天津相識、通信與結婚 41, 58–59, 69–70；周恩來周癌症治療 895, 901；周恩來逝世 940；周恩來住院（1974年6月–1976年1月）915, 940；周恩來對「反冒進」錯誤的自我批評（1958）537
鄭州會議（1959）562–565
鄭洞國 291
魯迅 3, 463
魯德尼克，雅各布（Jakob Rudnik）103
鴉片戰爭 63, 81, 316n1
黎平會議（1934）137–139
黎筍 660, 662–663, 665, 689, 869, 901, 1001n10, 1002n15

十六劃

噶廈（西藏地方政府）391
戰俘：朝鮮戰爭 415–416, 418, 421–422, 872；美國公民 499, 597, 872
整風運動（延安，1941–1945）86, 214, 221–230
整風運動（1957）529–531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5, 41
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175
蕭華 769
諶小岑 51
諶志篤 39
遵義會議（1935年1月）140–142
鋼鐵生產 545, 562, 585–586；毛澤東的主張 544, 605。又見：大躍進
錢三強 690
錢之光 186, 263
錢壯飛 87, 101
錢松甫 186
錢學森 696
錫蘭 486, 496, 528, 588, 642, 648, 668, 675–676, 989n46
閻仲川 808
閻錫山 96, 162, 177
霍查（Enver Hoxha）670
霍普森（Donald Hopson）704, 706–707, 785
駱奇勳 211
鮑羅廷（Mikhail Borodin）68, 71

十七劃

儲安平 529
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679–682, 874, 885–886
聯合國：哈馬舍爾德訪華 499；與朝鮮戰爭 397, 401, 411–412；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 873；特別會議（1974）918
聯合政府 245–246, 249, 252, 254–255, 257–258, 264, 370–371
薄一波 434–435, 437, 439–440, 564, 690, 696, 699, 771, 955n15
薛岳 139, 143
謝文清 510, 971n36
謝育才 211
謝偉思（John S. Service）249–250, 839
謝富治 730, 769, 781–782, 799, 809
鍾漢華 781–782
韓素音 69, 317n21, 596, 885
韓練成 281

十八劃

彝族 144
瀋陽（奉天府）10–13, 271, 291, 297, 401, 403, 406, 454, 533, 637
瞿秋白 81, 85, 94, 97, 134

糧食生產 563, 581, 586–587, 606, 614, 729。又見：大饑荒
聶元梓 737–738, 743, 794
聶榮臻 119, 330n38, 415, 540–541, 555, 642, 690, 718, 769–770, 773, 795, 822, 841, 851, 1014n89
舊金山和約（1951） 417
薩納尼空（Phoui Sananikone） 476
豐威漢，凱山（Kaysone Phomvihane） 662–664
顏福華 211

十九劃

廬山：九屆二中全會（1970） 812–817；廬山會議（1959） 577, 580–581, 728, 772；廬山會議（1961） 613–614；周恩來－蔣介石會面（1937） 174
羅申（Nikolai V. Roshchin） 301, 374, 388, 400–402, 405, 407
羅明納茨（Vissarion Lominadze） 81–82
羅青長 87, 457, 636, 939, 997n60, 1052n114
羅素（Bertrand Russell） 49, 315n21
羅馬尼亞 373, 600, 684, 686, 730, 738, 794–795, 852, 855–856, 936
羅傑斯（William P. Rogers） 873, 876–878
羅博（Xhorxhi Robo） 870
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205, 210, 247–248, 250–252, 254–255, 267；雅爾塔會議 256, 258, 271
羅隆基 372, 728
羅瑞卿 431–432, 446, 452, 456, 631–633, 640–642, 650, 662, 664, 691, 717–720, 722, 727–728, 760, 836, 1014n89, 1014n91
譚平山 372
譚森（John Denson） 882
譚震林 291, 454–455, 586–587, 769–771, 773, 864
關鋒 754, 764, 789, 790, 1019n81

二十劃及以上

嚴修 13–15, 46, 48, 56, 310n13
「繼續革命」 139, 294, 365–366, 424, 459, 464–465, 470, 578, 584, 602–603；與反修正主義 652, 700, 703；與中共九大（1969） 801；合法性危機 918–919；與五七指示（1966） 729–731, 800, 806；與五一六通知（1966） 729, 731, 765, 780, 800；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文化大革命 652
蘇加諾（Sukarno） 667, 712, 714–715
蘇伊士運河危機 496
蘇兆徵 86
蘇拉瓦底（Huseyn Suhrawardy） 523
蘇區中央局：進攻贛州 119；長汀會議 120–121；與富田事件（1930） 109–110；贛南會議 114–115；毛澤東出任代理書記 113；寧都會議（1932） 123–127；項英出任代理書記 98；周恩來出任書記 107；周恩來的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 110–115
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 599
蘇達利科夫（N. G. Sudarikov） 554–555, 560
蘇聯／蘇俄：反蘇抗議活動（中國，1946） 282；布爾什維克黨 84–85；十月革命四十週年（1957） 531；中蘇邊界衝突 841–844；非斯大林化 503–504；德國入侵（1941） 221；進軍中國東北（1945） 259；米高揚訪華（1949） 299–300；對中國原子能技術的支援 555–556；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 794–795；修正主義 599–600；與中印邊境戰爭 648–649；中蘇關係 70, 300, 378, 384–385, 417, 421, 451, 457, 527, 555, 574–575, 593, 597–599, 604, 611, 614, 650, 682–689, 701–703, 842, 846–847；蘇聯擴張與中

蘇關係 904–906；與中共的電報通訊 163；美蘇關係 271；與黃埔軍校 65, 67。又見：共產國際；斯大林
覺悟社 40–42, 49–51, 58, 77, 105
饒漱石 291, 432, 436–437, 440, 442, 446–447, 449–450, 452–455, 458, 656, 728, 827
顧作霖 108, 110, 125
顧明 545
顧炎武 15
顧祝同 173–174, 201
顧順章 82–83, 88, 101–102
龔澎 186, 372
龔蔭蓀 7, 9
贛南會議（1931） 113–115

本書運用史料之廣泛，不僅體現了陳兼數十年研究之功力，更揭示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可獲取或發掘的當代史料之規模——這讓通常認為共和國在檔案開放上一向是「遺忘的荒原」的西方讀者深感意外。憑藉批判性同理心，陳兼無論對周恩來生涯軌跡的整體把握，還是對其各關鍵階段的評判，皆令人難以挑剔。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傑出研究教授）

人物傳記難寫，像周恩來這樣被世人關注和熟知的歷史人物的傳記尤其難寫。陳兼二十年磨一劍，成此巨著，實屬不易。作者在中、美、蘇、英、法、印等多邊檔案文獻的基礎上，把人物置於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考察，盡力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此書既是一部中國革命史，亦是一部新中國外交史。

——**沈志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兼撰寫了我們時代的一部偉大政治傳記。周恩來常被視為迷霧環繞的領袖，但我們若不理解他，就永遠無法理解當今的中國。這部傳記使我們對他的了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耶魯大學歷史與國際關係講席教授）

這本書是周恩來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基於作者數十年在中國近現代史、冷戰史及國際關係領域的研究，本書聚焦黨內政治、國際關係、周恩來對現代中國發展的貢獻三大主題，全書敘述引人入勝，十分易讀且富有參考價值。

——**魏美玲**（Emily Wilcox，威廉與瑪麗學院中國研究教授）

陳兼積二十年之功，重建周恩來的往事，做出了帶有鮮明風格的解讀。人們可以不贊成他的觀點，但不可不讀這本21世紀有關周恩來研究的最新著作。

——**韓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兼是經歷了文革並對這場劫難心心念念的國際學者。他的周恩來研究由樸素情感進入冷峻理性的學術探討，在中外史料互證的基礎上，填補和校正了許多周恩來生平的史事，呈現了一個豐富多元且充滿矛盾的周恩來形象。

——**王海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周恩來終於有了一部與其歷史地位相稱的完整傳記。作品憑藉豐富文獻資料，客觀評估了周恩來對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的深遠影響。

——**拉納・米特**（Rana Mitter，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美亞關係講席教授）

陳兼沒有解開「周恩來之謎」，然而他生動地展示了這個謎何其複雜，促使讀者不由得尋求自己對「周恩來悖論」的答案。

——**夏偉**（Orville Schell，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

中國共產革命如同迷宮，這本傑出的周恩來傳記為人們提供了理解它的地圖與鑰匙。

——**徐國琦**（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cup.cuhk.edu.hk | HONG KONG, CHINA

ISBN 978-988-237-388-4
9 789882 373884